

三教九流大观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三教九流大观

（中）

青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清
封面设计：李呈修

三教九流大观

李　山　主编

出　版
发　行：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614342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
开　本：16
印　张：156
字　数：3500千字
版　次：1998年6月第1版
印　次：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册
书　号：ISBN 7—225—01565—6/J·570
定　价：698.00元（全三册）

序　言

所谓三教九流，最初指儒、释、道三教以及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九家，后来泛指宗教和学术中的各种流派。而在一般人心目中，三教九流则泛指社会各色人物和各种行当。因此，“三教九流”实际上成了社会的代名词。

在旧时代的中国社会，儒家思想（有时称儒教）、佛教和道教，是中国人信仰世界的三大主流，其中尤以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影响显著。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仍然遍及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中国人群的划分，最早是从商周时期开始的，士农工商的定位，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但在士农工商的主流社会之外，还有许多以其它职业为生的人，组成一个个特殊的群落。这些群落人数不多，但在社会中的影响却极大，不可忽视。其中有些群落，如侠客，以除暴安良为己任，是社会的稳定因素。而像流氓这一群落则增加了社会的混乱和动荡。土匪这一群落常常有其特殊的背景，但在历史上是为害的时候居多。帮会在建立的初期往往是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成分越来越复杂，帮会也就成为社会的毒瘤，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青楼女子在旧时代大多饱含辛酸，身世之悲，令人一掬同情之泪。而在今天，卖淫成为丧尽道德之后追求金钱的赤裸裸的手段。其它从旧社会延续下来的种种丑恶也一时难以尽言。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讲，了解过去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必要的，社会人物虽然形形色色，但万变不离其宗，知道过去，也就大概能知道今天。

是为序。

目 录

儒·儒教

佛　教

道　教

洪　　邦

青　　帮

竹　联　帮

香港黑社会

镖　　行

侠　　客

土　　匪

流　　氓

赌　博

优　伶

占　卜

娼　妓

典　当

乞　丐

三百六十行

三百六十行图解

道　教

概 说

道家与道教

世界有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国也有三大宗教，即佛教、道教、儒教。

佛教与道教主张出世，宗教职业者、专一的信奉者要出家，不过世俗人的生活。儒教主张入世。儒教、道教是中国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佛教为外来宗教，其生活习惯、服装、礼仪与儒、道不同。儒、释、道三教并称，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可，那是在隋唐时期。南北朝已有三教的说法，但不普遍。国家每逢重大节日，诏三教公开辩论，北周已开始，唐代成为制度。大文学家白居易有好几次在三教辩论中代表儒教发言，《白氏长庆集》还保留有他参加辩论的发言提纲。佛教的著作和教义比较明确，唯独对道教的意义的理解比较含混，道教内部和反对道教的人士也没有讲清楚。

先说道家。学术界长期流行一种见解，认为老子、庄子为道家，这是一种误解。春秋战国时期，只有老子学派、庄子学派。老子与庄子没有直接的传授关系。老子或庄子从未自称为“道家”，只有儒家自称为儒，墨家自称为墨。儒墨两家各有自己一派的传承关系。孔子、子思、曾子、子夏、孟、荀均有传授关系，墨家有巨子相袭制度。儒墨两家，系统清楚，号称显学。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第一次提出“道家”名称。司马谈的道家反映了汉朝政治统一后，思想界趋向统一的思潮趋势。秦及汉初有许多学派反映统一的趋势，秦朝有《吕氏春秋》，汉初有《淮南子》，后来有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汉初道家是吸收儒、墨、阴阳、名、法各家思想的长处而创立的新体系。老子、庄子都是阴阳、名、法出现以前的人，前人怎能吸收他们死后的人的思想？这个“道家”乃是黄老思想的一个分支，与先秦老子、庄子关系不大。

老子是哲学家，不是宗教家，也未创立宗教，与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一开始就是宗教家，创立佛教的情况不同。老子的著作是学术性的，不是宗教性的，也与佛教经典不同。老子被拉进道教，并奉为教主，那是很晚的事了。东汉末年，汉中张鲁信奉五斗米道，令信徒们念《老子》五千文。念《老子》的也只是巴蜀的五斗米道，影响地区仅限于汉中地区。中原广大地区的道教徒信奉《太平经》，这是一百多卷的大书，内容庞杂，没有多少老子的思想。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形成于东汉末年，方术、巫术是它的前身。神仙方术信仰由来已久，古代巫、史、祝、卜是与神打交道的专家，他们处在国家的领导层。民间巫术用符水治病，借卜筮占吉凶。战国以后，神仙方士宣传不死之药可以长生，投合上层贵族要求长期享乐的欲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广大群

众缺医少药，方士们用符水治病，驱鬼祭神，在下层群众中也得到推广。早期道教还没有系统的理论。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困苦，于是出现了《太平经》。此书成书时间约在东汉安帝、顺帝统治时期，此书为集体创作，书成于于吉、宫崇等人之手。

关于老子如何被道教捧上教主的地位，现在还无法做出准确的说明。从时间推断，应在东汉时期。首先出现在宫廷和上层贵族阶层。光武帝儿子楚王刘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诏书也说“楚王通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到桓帝时(在位时间是 147～167)，延熹八年(165)正月遣中常侍左悺赴苦县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赴苦县祀老子，九年(166)在濯龙宫祠老子，。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后汉书·西域传》)。这里透露老子被道教奉为神，与先秦的老子无甚关系，而是与西方的佛教与本土的黄老信仰搭伴，以教主的形象出现的。求神佛保佑，祈福延年，是少数上层贵族享有的奢侈品，然后再普及到下层社会，“后遂转盛”。

道教建立后，沿着两条路线传播。上层路线与历代朝廷、官方相配合，可以称为正统的官方道教。还有在社会下层广大群众中传播的道教，它与民间巫术、符咒结合得比较紧。农民起义也往往利用道教这个组织形式。黄巾起义就是第一次道教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例子。宋代的方腊，清末的义和团也大体归为这一类。

理论研究，典籍著作，教义发挥，与佛教之间长期互相争辩，也属于官方道教。从北宋开始编辑道教全集《道藏》，多达七千多卷。

官方道教与民间道教并不是绝对对立，如符咒、炼丹、气功等民间与官方的道教都很重视。佛教到后期，大乘兴起，崇拜的偶像越来越多，引出了许多佛，不止释迦牟尼一位。道教到了南北朝时，老子已不占重要地位，老子这个形象也被塑造得更加神秘，演变成“太上老君”。道教的神也越来越多，有等级品位。道教的神与佛教不同处，还在于除了男神之外，还有许多女神，女神也不像庄子寓言中的藐姑射之山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更多的神是结了婚的某某夫人。

历代反对道教的学者，对作为思想家的老、庄和作为宗教组织和道教不甚区别。唐朝的韩愈反对佛老，“佛”是宗教的佛，明显无误；“老”是太上老君，还是《道德经》作者老子，他没有讲清楚。宋代的大哲学家朱熹，直接继承了韩愈的道统说，崇儒家，排佛老，佛老并称“二氏”。朱熹驳斥的佛教也指明是释迦氏之教，他驳斥的道教更多的情况下指的是老庄。这种长期的误解，连清代大思想家王夫之也未能避免。他批判“二氏”，涉及道教系统时，重点没有放在道教上，而是指向老庄哲学。老子哲学讲无为、清静、抱一，与道教的宗教修养有关，但老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与道教毕竟有所不同。“道家”、“道教”长期混用，成为习惯，如近人陈垣先生搜集历代道教碑刻，汇编成集，名为《道教金石略》。陈先生是研究宗教史的专家，老庄哲学与东汉以后的道教，他是清楚的，他也把“道教”写作“道家”。可见积重难返。

为了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观念含混，有必要把道家与道教严格区别开来。总括起来，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1) 先秦无道家，只有老子哲学、庄子哲学，以及与他们的哲学相应的老子学派、庄子学派。

(2) 汉代的道家代表西汉时期融合各派的一种思潮，它以黄老清静无为思想为基础，包括儒、墨、阴阳、名、法各家的部分内容。

(3) 学术界习惯把老庄学派称为道家，是后起的一种学派分类观念。东汉时期严君平《老子指归》开始有了以老庄为道家的倾向。魏晋玄学早期“老庄”联称，后期“庄老”联称。魏晋以后，以老庄为道家的分类法得

到承认。这个“道家”不同于司马谈的道家，仍属于哲学。

（4）道教是宗教。它有团体、教派、教义、宗教规范仪式、宗教组织、固定数量的信徒、固定的教派传授系统、共同信奉的经典、固定的传布地区等。以上这些特点，使它区别于道家，与儒、佛并称为三教。

以上四点是用来区别道家与道教的标志。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不像佛教那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但也不能说道教作为宗教的影响只限于中国，道教对日本影响就很大。日本的神道教与日本天皇及朝廷的制度，有不少道教的影子。最近日本道教研究专家指出：（1）日本天武三十年（685），为行使中央集权，制定“八色之胜”，八姓中“真人”列为第一等级，“真人”为道教术语。“天皇”一词也源于道教。（2）象征天皇的两种神器，镜和剑，都是道教的法器，用以照妖降魔，天皇传位时，以镜和剑授与新天皇。（3）天皇宫廷尚紫色，道教称上帝居紫微垣，天皇宫殿门称“紫门”。推古女帝即位第十一年（603），圣德太子制定六色十二阶冠位，大华三年（647）制定七色十三阶冠位，只有最高官位阶得用紫色。唐宋规定紫色为高级官员的服色，和尚、道士中有声誉、地位的得赐紫衣。唐文化习尚、也影响到日本宫廷贵族。（4）祝天皇长寿的祝辞，据《延喜式》载，“谨请皇天上帝，三极大君，日月星辰，八方诸神，司命令籍，左东王父，右西王母，五方五常，四时四气，捧以银人，请除灾祸。捧以金刀，请延帝祚。咒曰：东至扶桑，西至虞渊，南至炎火，北至弱水，千城百国，精治万岁，万岁。”这完全是抄自道教的祠祀辞句。只有在中国方位才好说东至扶桑，日本即扶，不必称东至。（5）天皇拜四方仪式，据《江家次第》载，“圆融天皇天禄四年（974）元旦拜四方仪式，天皇朝北遥拜北斗七星中的本命星，并念咒文曰：‘贼寇之中，过度我身，毒魔之中，过度我身，……厌魅之中，过度我身，万病除愈，所欲随心。急急如律令。’”这咒文也是照抄道教的。（6）神道教。《日本书纪》在《孝德纪》中“惟神也者，随神道也”，“天皇信佛法，亦尊神道”，“佛法”与“神道”对置。从奈良到江户，把天皇家族的始祖天照皇大神当作国家神祭祀，立伊势神宫。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子孙，是人间神。（参见福永光司教授《日本文化与道教》，该文发表于1982年中日学术座谈会《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有中文本）。

道教的宗教影响，除日本外，朝鲜及越南也有经过改变的道教信仰。

近三十年学术界道教研究的风气遍布全世界。北美洲。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西德、英国，都有研究道教的学者及研究组织，也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著作，日本学者的研究成绩尤为显著。

几类：（一）历代道书，包括神仙、内丹、外丹、符箓、科仪、戒律、方术及道教类书；第二，道家著作及历代注释，如《老子》、《庄子》、《列子》、《阴符经》等书注疏；第三，医药卫生著作，如《黄帝内经》、《肘后备急方》等；第四，诸子百家著作，包括儒、墨、名、法、兵、纵横、杂、小说、术数各家，数量可观；第五，历代著名道士文集，如《华阳陶隐居集》（陶弘景）、《广成集》（林光庭）、《太古集》（郝大通）等；第六，史传地志著作，如王瓘《广黄帝本行记》，查志隆《岱史》等。其他天文、生物、化学，不一而足。《道藏》的编辑出版。起了收集、保存祖国文化古籍的作用，它是一部超大型中国思想文化史丛书，不仅研究道教史需要它，研究中国文化也要熟悉它。

道 教 特 征

我国现有五大宗教，即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作为宗教，它们有共性，亦即有着共同的本质与社会作用；但在教

理教义方面，它们之间却有所差异，亦即各有其特殊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各具其特征。比较正确地把握这些特征，有助于比较全面地认清道教，也有助于辨别它与其它宗教以及民间迷信的区别。

道教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我们先从表面形式上谈起。人们偶尔在大街上见到穿古汉装的人，俨然如未卸戏装的京剧演员，觉得很新鲜，往往好奇地打听："你是哪个民族？"其实这是位道士，他穿的是道袍，戴的是古冠巾，着的是云履。他是以从事道教活动为职业的人。他们的宗教活动场所称为宫、观、道院、庙，如山西永乐宫、北京白云观、句容茅山道院、北京东岳庙等等。一座宫观便是一个以宗教为纽带的宗教组织实体，道士大都居住在宫观院庙之内。道教分两大派，全真派为出家道士，蓄发、须，头顶挽髻，素食，重清修；正一派为在家道士，一般均不蓄发，重符箓，主要从事斋醮仪式活动，也叫作道场，有唱诵，有舞蹈，有乐器伴奏，腔调声韵各与其地方剧相近似。这两派道士，都以太上老君、玉皇大帝为最高天神。

道教在形式上的特征很明显，在教理教义方面的特征也同样明显。

一、它是在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包含有我国古代社会的宗教意识与民族文化。追溯道教的思想渊源，最古的是殷商时代的鬼神崇拜，继之是战国时期的神仙信仰以及东汉的黄老道。可以说道教是我国古代社会鬼神崇拜的延续和发展，道士是古巫祝、方士之遗绪。古代巫祝的占卜、祈祷，方士的候神、求仙等等，靡不为道教所承袭；道教所崇奉的天神、地祇、仙人，莫不由历代相沿流传而来。从道教教理教义上看，我国古代社会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以及谶纬之学等宗教色彩较浓的思想，也都是道教神学理论的思想源泉。道教所宣扬的规戒科禁，亦即宗教道德，也不外乎封建社会儒家所主张的伦理道德。道教的仪法，也基本是本于儒家的礼法仪式。因此，说它具有汉民族宗教意识与文化的特质。

二、道教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一部卷帙浩繁的《道藏》，分三洞四辅十二类，共5485卷。南朝梁刘勰《灭惑论》说道教是"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五说："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究竟什么是道教的核心内容？是老庄哲学思想，是神仙信仰，抑或是符箓禁咒呢？我以为老庄哲学不过是道教吸取来文饰其教的；符箓禁咒不过是一种迷信方术，道教也有的道派是不崇尚符箓诸术的；只有神仙信仰才是其核心内容，去掉神仙信仰，也就不成其为道教了。或者有人会说，道教之所以叫"道教"，正是因为信仰老子的"道"，才叫道教。其实，"道教"一词，在南北朝以前，只是一个为诸子百家所共用的概念，那时诸子百家无不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称之为"道"，以其"道"教化众人，便称之为"道教"。使用"道教"一词最早的是儒家，把尧舜禹汤文武的先王之道和孔子的五经之道谓之"道教"；其次便是墨家、道家、阴阳家。佛教传入中国，"菩提"汉译为"道"，菩提之教，从而也称道教。东汉末出现的五斗米道，也同诸子百家一样自称"道教"，即，"以善道教化"之意。以后由于道教崇尊老子，逐渐完成对老子的神化，别家也就不再自称"道教"，以示区别，而"道教"一词也就成了五斗米道的专称。或谓，从张道陵造作符箓以后才有道教，其实道教这种信仰与教团组织，早在汉成帝时就有了，甘忠可造作了《包元太平经》，崇奉天神赤精子；尔后汉顺帝时的于吉、宫崇已编纂了《太平青领书》，已经有复文符图了。那时也只是行世的一种道术。符箓禁咒，到以后也只是道术之一。惟有神仙信仰，惟有认为就在这个世界上有仙境、有形体长生不死的活神仙、人们可以追求而登仙，这才是道教最核心的内容，是它的特征。

三、道教理想的境地与虚幻的追求。任何宗教都有它理想的境地与追求，比如极乐

世界、天堂等，而道教所主张和追求的理想境界是两重的。第一是在世俗的、现实的世界上，按道教教义建立一个理想的王国，即一个极大公平、和平的世界，人人都安居乐业，竟其天年，世界上没有水旱灾害，没有战争，没有疫病。这实际是在封建社会农民所理想的有灵光圈的王国。这种理想，在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太平经》中讲得很清楚。东汉末太平道的信徒们，并曾为此而斗争。道教宣扬的另一种理想境地叫“仙境”，得道成仙便可以外生死、极虚静、超脱自在、不为物累，在仙境过仙人的生活。道教的“仙境”并不完全指渺茫的天国，如道教所宣称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便都是我国一些十分秀丽的境地。所谓成仙，也并不是说人死后灵魂入“仙境”，而是说人的形体可以长生不死，你可以和人们生活在一起当活神仙，也可以到“仙境”去超脱自在。由于这种追求的渺茫、虚幻，后来才兴起所谓“尸解”、“蝉蜕”，以自圆其说。正因为道教理想是要实现一个公平、和平的境地，故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张向邪魔妖鬼等恶势力作斗争；正因为幻想形体长生不死而成仙，故而也在一定程度鼓励人们向自然作斗争，争取延年益寿，甚而长生久视。我以为这也是道教的一个特征。

四、道教乐生、重生和贵术。宗教是苦难者的呻吟，不少宗教教义认为人生充满了痛苦，无可流连，因而把对幸福的想往寄托于虚幻的天国，幻想死后灵魂得救。但道教却与这些大相径庭，认为生活在世界上是一件乐事，死亡才是痛苦的，因而它的教义是乐生、重生，鼓励人们至少要争取竟其天年，最高理想是长生不死。早期道教的重要秘典《老子想尔注》，就把《老子五千文》中的“天大、地大、王亦大”，改为“天大、地大、生大”，认为“生”比“王”重要。《道藏》的首经《元始无量度人经》也是强调“仙道贵生”。正因为它乐生、重生，因而便寻求能够使人长寿的方法，这就是所谓道功道术。从理论上讲，道教强调形神相须，生道合一，认为欲长生便必须安神固形，性命双修，于是乃有所谓性功与命功，性功修心，命功练形。道教所行养生之术很多，如外丹、内丹、服气、胎息、吐纳、服饵、辟谷、存思、导引、行跻、动功等等。道无术不行，道寓于术，道教重术、贵术，把古代社会所流行的养生之术，皆吸取进来，加以宗教的解释与发挥。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所撰《中国科技史》第二册《道家与道教·绪言》中说：“我记得曾在成都听冯友兰博士说过，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不太反科学的神秘主义体系。”这大概就是从道教重术，贵术这一点所得出的结论。我认为是有些道理的。

五、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宗教一般都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皆由天定，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但道教却并不这样断言，相反认为寿命并不是由天决定，而是决定于自己，魏晋时出现的重要经典《西升经》就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强调个人不懈地修炼，不抱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这一点，颇具有向自然作斗争的精神。可是这种思想在道教的发展中逐渐淡漠，为宿命论所掩盖，而在道教古籍中这是颇具特色的。

六、万物有灵，乃至人体的各种器官俱有神灵。道教是多神教，最高的神仙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以下有三十六天帝，还有大明、夜明之神，北斗之神，五星五行之神，太一、文昌、列星诸神，风雨雷电诸神，五岳、五镇、四渎、四海诸神，还有五祀八腊、城隍土地、先农先蚕等等。宇宙遍有神灵，就连人体的各种器官，也都有神灵住守，如：发神苍华字太元、脑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垄字灵坚、耳神空闲字幽田……等。神不仅主宰宇宙的一切，甚而人体的小小器官也被神灵所控制。神权的绳索束人之紧迫，可谓极至了。

道教的圣人

太上老君

春秋后期的某年仲秋。函谷关。

向以鸡鸣为号的关门，今天破例开得很早。关门内外，清洁如洗，一尘不染。关令尹喜正襟端坐，似有等待。不多时，即见一老者飘然而至，关令连忙下座参拜，执弟子之礼。老者早知尹喜命中应得道法，乃应其所求，停住关中，俱以长生之事授之，并著作道书上下两篇，洋洋 5000 余言。事毕，谢绝尹喜苦留师事之意，西渡弱水，长涉流沙，世人莫能知其的终。

老者何人？道教教主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老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厉乡曲仁里人。据传，其终感大流星有妊，怀之 72 年，乃剖左腋而出，生而白首，遂名老子。老子修道务德，以自隐无名为要，在春秋时代即具神秘色彩。大儒孔子去周室时曾问礼于老子，老子寥寥数语，指陈精妙，孔子如堕迷雾，三日不愿说话。弟子问其印象，孔子曰：“鸟，我能知其飞；鱼，我能知其游；善，我能知其走。走者，罔而猎之；游者，纶而钓之；飞者，矬而射之。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在孔圣人心目中，老子是神妙莫测，可见其首而不见其尾的犹龙神人，和他相比，孔子自叹无可奈何，渺小寻常，这与后人眼中的仙者没有什么两样。史家司马迁在为老子作传时，对他这样的传奇人物更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把传说异闻一并抄录，待人自辨。由于后世道徒尊奉老子为教主，所以有关老子生平大事神化附会更多，这无异给我们认识老子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据后人考证，老子约生于周简王六年(公元前 580 年)，约卒于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 500 年)，曾任周守藏室之史，精熟各种典章制度。晚年，看到五霸争胜，周室腐败，愤而去职，退隐他处。老子一生恬淡无欲，专以长生为务，故仕周虽久而名位不迁，被人誉为不求名利的隐君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是怎么被推为道教教主的呢？

道家与道教，本来是有区别的。先秦道家，是以老庄为代表的一个学术派别，而道教则是东汉时期形成的一种宗教。但二者又并非毫无联系。道家哲学，乃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首创于老子的“道”，是《道德经》的基本思想，老子把它视为超越时空限制的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既是宇宙本体，又是万物规律。老子的“道”因其本身界属模糊不清，“玄之又玄”，十分神秘，所以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在《庄子》书中，庄周把“道”解释成为“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的东西，“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并说，黄帝得道，以登云天；颛顼得道，以处玄宫，“西王母得之，

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司马迁的《史记》在列传老子时也说，老子修道养寿，“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这种以“道”为万古常存，得“道”以后即可长生久视、成为神仙的思想，为后来的道教所吸引。另外，道教的基本信仰，也是老子的“道”，其教义思想和神仙方术无不发端于此；道教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长生不死、即身成仙，也同样是利用了道家哲学中的一些神秘思想。

老子地位的逐渐上升，始于汉初。西汉承秦末敝，专尚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所以以“无为而治”为特点的黄老思想在西汉初年极为盛行。在此前提下，解说《道德经》的著述亦纷纷出现，仅《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就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等数种之多。东汉时，神化老子的倾向已见之于文字。东汉明帝、章帝之际，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云：“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明，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把老子直接等同于“道”，老子成了先于天地的至上神灵。崇拜老子的现象在东汉也已出现。汉桓帝因无子嗣而在宫中设立黄老祠，延熹八年(公元165年)还派人前往苦县祭祀老子。九年，于濯龙宫再祭老子，祭式依照祭天仪式进行。至于当时的一般崇尚道术之士，更将老子奉为祖师。陈相边韶于延熹八年所作《老子铭》称，世之好道者“以老子离合之混沌之气，与三光为始络终。观天作谶，升降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象在旁；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渡世。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老子已取代黄帝成为好道这士心目中的最高偶像，黄帝只好降居次要地位。老子取代黄帝不仅在于他磅礴不羁、飘逸空灵、恣肆汪洋般自由变化的能力，更主要的是他著有被后人奉为圭臬的《道德经》。

道教自创立之日起，即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尊奉老子为教主。张道陵草创五斗米道时，也自云其经典为老子亲授，同时还自作《老子想尔注》。在《老子想尔注》中，张道陵继承发挥了王阜的“道即老子”的思想。该书认为“道”就是“一”，“一”本在天地之外，可以自由进入天地之中，亦往来于人身中。“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常居昆仑，教化众人。《混合皇帝纪》亦云：“老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身也，元气之祖宗，天地之根也。”于是“老子”与“道”在道教中便神化为众生信奉的神灵。“道”是天地万物之源，因而作为“道”的化身的太上老君也就成为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阴阳之主宰、万神之帝君。

魏晋时候，道教受佛教思想传译的刺激，道士们掀起了著述道经的热潮。虽说著述，但原则上采用了“太上曰”、“道曰”等形式，把所著道书说成是老君亲授。随着道教的发展，神化老子的现象已逾出常规。葛洪《神仙传》言其出生神异，形貌奇特，曰：“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曰：“老子黄白色、美眉、广颡长耳，大目踈齿……鼻纯骨双柱，耳有三漏门，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道教极力标榜老子和《道德经》，不仅是出于本身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三教对抗形势的需要。道教思想直接渊源于老子，但在发展过程中又融合了其他多种思想成份，以至杂而多端，不可辨认，迫切需要象《道德经》中那样的“道”来加以概括。而老子“善摄生者无死地”的长生思想以及传说中老子的高寿又与道教修道成仙的宗旨相吻合。所以，崇奉老子对道教本身的发展是有利的。秦汉以后，老了被尊为圣哲，受人尊敬礼拜，地位极高。况且孔子亦曾问礼于老子，老子位在孔子之上，所以以老子为教主有利于抗儒。汉末佛教传入后，长期被视为黄老之术的一种，晋时亦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

言老子西入天竺变身为佛，教化胡人为浮屠，佛教由此而起，老子俨然又为佛教教主。因此，在三教对抗中，崇奉老子，有利于提高道教的地位和声势。

历代帝王对神化了的老子，或立庙祀奉，或加尊号册封，其中尤以唐代为甚。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在羊角山为老子立庙，武德八年(625年)又规定三教次序：道先、儒次、佛最后。唐太宗谓“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须使“尊祖之风殆诸万叶”。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于开元十年(722年)下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每年依道法斋。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设立“崇玄学”，置生徒，令其诵习《老子》，每年按明经例考试。唐玄宗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制令士庶均需家藏一本。赵宋王朝对老子亦极力推崇，宋真宗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时还在太学、辟雍为《道德经》置了博士。

道 教 教 义

道教的几个基本信仰

道教的教义，上及老庄、中述神仙、下及符箓，其神仙理论、神仙系统、道功道术、斋醮科仪、宗派源流等等，十分庞杂。但庞杂中也还是显示出它的基本信仰，亦即信徒所必须持守的信条，一切教义都是从这些基本信条上演绎出来的。弄清道教基本信仰，有利于我们认清道教的面貌。为简明起见，兹对这些基本信条略作概述。

大道无形　　生育天地

各世界性宗教，无不有自己的创世纪，道教也是如此。《常清静经》说："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这就是道教宇宙生成论的最简短的概括。

道教的创世纪，以《太上老君开天经》讲得最为集中，最为清楚。《经》中说，在未有天地时，"太清之外不可称计，虚无之里寂寞无表"。而后，"八表之外，渐渐始分。下成微妙以为世界，而有洪元"。"洪元"是道教创世纪的第一大世纪。

"洪元"经过万劫而有"混元"，又过万劫而有"百成"，"百成"八十一万年后而有"太初"。"太初"是道教创世纪的第二大世纪。这时太上老君从虚空而下，为"太初"之师，"口吐开天经一部"，四十八万卷，一卷有四十八万字，一字辟方一百里，以教"太初"。这时才分别天地，创造了日、月、人。

"太初既没"，便进入了道教创世纪的第三大世纪——太始。这时太上老君下凡为师，"口吐太始经一部，教其太始置立天地"。"太始者，万物之始也"。以后便是"太素"世纪，"天生革甘露，地生醴泉，人民食之，乃得长生"。此前历史为上古。

中古始于"混沌"之世，经历"九宫"、"元皇"、"太上皇"、"地皇"、"人皇"、"尊卢"、"句娄"、"赫胥"而至"太连"。太连之时，"天生五炁，地生五味，人民食之，乃得延年"。

在"太连"之后，进入下古，首有"伏羲"，老君下凡为师，名无化子，又名郁华子，教示伏羲，推旧法、演阴阳、正八方、定八卦。这时的人民有名无姓，世上也没有五谷杂粮，"皆衣毛茹血，腥臊臭秽，男女无别，不相嫉妒，冬则穴处，夏则巢居"。伏羲没后而有"女娲"，女娲没后而有"神农"。神农之时，老君下凡为师，曰大成子。"作《太微经》教神农尝百草，得五谷，与人民播植，遂食之以代禽兽之命也"。神农没后而有"燧人"。燧人之时，老君下凡为师，"教示燧人钻木取火，续日之光，变生为熟，以除腥臊"。燧人没后而有"祝融"，老君下凡为师，号广寿子，"教修三纲、齐七政。三皇修道，人皆不病，作《按摩通精经》"。次有"高原"、"高阳"、"高辛"、"仓颉"、

"轩辕黄帝"。黄帝之时,老君下凡为师,号力牧子。"黄帝以来,始有君臣父子,尊卑以别,贵贱有殊"。黄帝之后,次有"少昊"、"帝颛顼"、"帝喾"、"帝尧"、"夏禹"……

关于天地的开辟者以及万物的创造者,道经中有的说为"太上老君",有的说为"元始天尊",有说为"灵宝天尊"。《九天生神章经》说,"三号虽殊,本同一也",都是"道"的人格化与别名。

"大道"生成宇宙及万事万物,这也是道教最基本的教义。太上老君是创世主,这是道教徒不可动摇的信念。

道教宗元于三宝

《云笈七签》卷三《道教本始部》中说:"上古无教,教自三皇五帝以来有矣。教者告也,有言有理有义,有授有传。言则宣,教则告。因言而悟教明理,明理则忘言。即有能教所教,必在能师所师。"这就是说,立教必有教理教义,必有经诰,必有师授。那么道教之经诰从何起始,说经者为谁?《云笈七签》卷三《道教所起》中说:"寻道家经诰,起自三元。"又说:"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从混洞太无元生天宝君;从赤混太无元生灵宝君;从冥寂玄通元生神宝君。"三元即三宝,天宝君、灵宝君、神宝君分别治于三清境,故三宝又称三清。三清境即玉清境、上清境、太清境;又名三天,即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天宝君治在玉清境,即清微天,"其气始青";灵宝君治在上清境,即禹余天,"其气元黄";神宝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其气玄白"。

三宝君、三清,在道教经书中即指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太上老君)。三宝君各为经教之祖师,也就是三洞之尊神。这就是说,把天上之道经秘箓传授给世人的是三宝君。三宝君传三洞真经,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道教三洞宗元》说:"天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真教主;灵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玄教主;神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神教主。故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经。第一洞真为大乘;第二洞玄为中乘;第三洞神为小乘。"道教将全部经书分为"三洞",根据史实应起始于南朝刘宋时的陆修静,但按道教教义则远托于三宝君之说教。认为从远古以来便是如此。

三洞又分为七部,即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后四者为辅经,太玄辅洞真,太平辅洞玄,太清辅洞神,正一总辅通贯。道教统称之为三洞尊文、七部玄教。

道教宗元于三宝君,故敬信三宝(三清、三元、三尊),这也是道教徒的基本信仰。

生道合一　长生久视

道教是一种以生为乐,重生恶死,甚而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在早期道教行世时,便已强调重生的教义。如《老子想尔注》便把《道德经》第十六章中的"公乃王、王乃大"改为"公乃生,生乃大";把第二十五章中"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的"王"字均改为"生"。《注》中说"生,道之别体也。"意即:这个"生",如生长、生命、生存,都是道的表现形式;"生"和天地同样重大。又如《太平经》中说,"夫天道恶杀好生。"也是重视"生"。晋代的道教理论家葛洪,便鼓吹服食金丹"能令人不老不死",而且主张最好是止家不死,当活神仙。这也是追求生,以至于永生。

道教又认为,人的生命并不决定于天命。《西升经》说:"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意即人的生命之存亡、年寿之长短,决定于自身,并非决定于天命。人只要善于修道养生,安神固形,便可以长生不死。这是道教异于其它宗教的一大特征。道生万事万物,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而一,一而二,是须臾不离的。这也是道教的基本教义。

正由于道教有生道相守、生道合一的基本教义，故而道教采摭、造作了许多修道养生的方术，诸如外丹、内丹、存思、守一、服气、服饵、导引、行跻、房中、守庚申等等。希求“保神固根，精气不散，淳白不分，形神合道”，达到生道合一，长生久视。道教常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来表达上述含义，这便是“深根固蒂，长生久死”。

天界、仙境、地府及“五道”

道教以太上老君（或曰元始天尊）为创世主，道经中宣称太上老君所创造的这个天地，无限广阔浩渺，上至极远之玄天，下及极深之地府，有诸天帝之天庭，有仙人游乐之仙境，亦有恶鬼所入之地狱。这个天地既包括“彼岸世界”，也包括人们所生存的世俗世界。关于诸天之划分及诸天之数目与名位，地域之划分及诸洲诸国之数与名，以及仙境、地府阴曹之名位，在道经中说法不一，现谨据《云笈七签》所载，加以介绍。

道教有三十六天说（见附表），总由三宝君所统。其欲界为“有色有欲，交接阴阳，人民胎生”。欲界以上的色界、无色界，“人寿命长”，但未断生死。四梵天又叫种民天、圣弟子天，是“人断生死，三灾所不能及”。三清境则是九圣、九真、九仙所居。

道教又谓有九地三十六音，即有三十六土皇，以应三十六天。道教以人死为鬼，鬼入阴曹地府，受阎罗王之审判，恶鬼即被打入地狱受罚。

道教谓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三岛，皆人迹所稀绝，为仙人游息之处，有不死之仙草。十洲为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风麟洲、聚窟洲。三岛即昆仑、方丈、蓬丘。

道教又谓在地上的诸名山中，有仙人及真人统治之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其中，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七十二福地，在名山大川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多得道之所。

<table>
<tr><td rowspan="2">圣境四天</td><td colspan="3">大　罗　天　(36)</td></tr>
<tr><td>三清境</td><td>玉清境清微天(35)
太清境大赤天(33)</td><td>上清境禹余天　(34)</td></tr>
<tr><td>四梵天</td><td></td><td>贾奕天　(32)
玉隆天　(30)</td><td>梵度天　(31)
常融天　(29)</td></tr>
<tr><td rowspan="3">三界二十八天</td><td>无色界四天</td><td>秀乐禁上天　(28)
渊通元洞天　(26)</td><td>翰宠妙成天　(27)
皓庭霄度天　(25)</td></tr>
<tr><td>色界十八天</td><td>无极昙誓天　(24)
无思江由天　(22)
始黄孝芒天　(20)
太安皇崖天　(18)
太焕极瑶天　(16)
观明端静天　(14)
笠落皇笳天　(12)
玄明恭华天　(10)
太极濛翳天　(8)</td><td>上揲阮乐天　(33)
太黄翁重天　(21)
显定极风天　(19)
元载孔升天　(17)
玄明恭庆天　(15)
虚明堂曜天　(13)
曜明宗飘天　(11)
赤明和阳天　(9)
虚无越衡天　(7)</td></tr>
<tr><td>欲界六天</td><td>七曜摩夷天　(6)
玄胎平育天　(4)
太明玉完天　(2)</td><td>元明文举天　(5)
清明何童天　(3)
太皇黄曾天　(1)</td></tr>
</table>

以上所引述的这些，原本为古神仙家、方士虚拟的关于神仙世界的传说，后来为道教所承袭，成为道教的神仙世界。对神和仙及其所统治的神仙世界的信仰与向往，乃是道教信仰的基础。不景仰这个神仙世界的浩渺，也就是不承认创世主——“道”的浩大与力量之无穷；不相信上有诸天、天帝、天庭、天神，也就没有了道教对天神的崇拜的内容，从而祈禳醮仪符箓等等也就没有必要了；不相信地上有仙人、仙境，也就没有了道教徒追求得道成仙、长生久视的愿望。所以说，对神仙世界的崇拜，乃是最基本的信仰，自然是道教不容惑疑的根本教义。

道教在南北朝以后有所谓转轮“五道”之说，何谓“五道”？《老君太上虚无自然本经》说：“一道者，神上天有神；二道者，神入骨肉，形为人神；三道者，神入禽兽，为禽兽神；四道者，神入薜荔，薜荔者饿鬼名也；五道者，神入泯黎，泯黎者地狱名也。”意思是，人应守道，如多欲则乱本真，不能还返于道，其神便入“五道”，善则为神为仙，有罪则入地狱。不相信“五道”的存在，也就是不承认人的一切变化皆由冥冥中之神所主宰。这也是道教信仰的基本内容。

天道承负　　因果报应

天道循环，善恶承负。这一教义，早期道教便已载入《太平经》。何谓承负，《太平经》中有两种解释：其一是说，前人有过失，由后人来承受其过责；前人有负于后人，后人是无辜受过，这叫承负。换句话说，即前人惹祸，后人遭殃；如果为善的话，则是前人种树，后人遮荫。其二是说，天地人三统共生，长养财物，欲多则生奸邪，害而不止便会乱败，不可复理便还返于虚无，复归元气恍惚。这样的自然循环，也叫承负。这两种说法，前者是就一个家族内子孙祸福的根源而言，后者是指整个自然与社会的变化而言。

关于承负的时间，一说以十世为一循环，即某一人的过失，由其十一世孙受惩；一说承负有三种安排，“帝王三万岁相流，臣承负三千岁，民三百岁”。总之，承负的时间虽不相同，但前人之过均由后人受惩的说法一致。这样，个人的祸福便与个人行为之善恶无因果关系，一切听天道循环，受其承负。怎样才能断止承负而免除厄运呢？一说人要行善积德为后世子孙造福，一说要虔诚信道修行，免除自身的承负之厄。

除相信天道承负外，也有相信现实因果报应的。认为吉凶祸福乃是个人行为善恶的必然报应。“善者自兴，恶者自败，观此二象，思其利害。凡天下之事，各从其类，毛发之间，无有过。”认为上有日月“照察”，身中有心神与天“音声相闻”，有诸神疏记人的善恶，过无大小，天皆知之，到了一定的时候，天便校其善恶，予以赏罚，对善者则赐福、增寿，对恶者则降福、减寿，还要把他的鬼魂打入黄泉，打入地狱。

这种善恶报应的宗教观念，在后世出现的很多道经中，都是被竭力加以阐发宣扬的内容，逐渐成了一般道教徒信仰中最根本、最普遍、最渗透人的意识的教育。

承负与报应，在说法上虽有不同，但实质上都认为客观存在的超自然、超社会的支配力，决定着人的命运，都是用神仙信仰来制约、规范人的行为。在这样的教义思想基础上，因而出现了宗教道德，出现了戒律、清规，出现了修正、修善、积德、修性等等的修持方法。如果不是虔诚的信仰天道承负及善恶报应，则等于是不承认冥冥中有天神照察一切、主宰一切，也就无所谓修持，从而也就不是道教徒了。

道教修炼方法

道教作为汉民族所固有的一种宗教，除

了它特有的宗教教义、文书经典、道法仪式外,还具有一整套系统的修炼方法。这是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及其他宗教不可相比拟的。其中有许多东西还具有生命力,作为道教的精华,传习至今。

从道教发展史上看,历代道教徒都把“修道”放在首位,他们认为生、老、病、死虽是宇宙中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但通过他们自身的修炼,遵循一定的方法,是可以达到祛病延年,“长生不死”的。因此,在道教发展的不同时期,就产生了不同的修炼派别与许多实践方法。梁朝刘勰把道家修炼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最上乘者指先秦时代老子提倡的清静无为;中乘者为秦汉方士们的神仙服饵;最下乘的是东汉末期张道陵、五斗米道徒的符箓禁魇(见《灭惑论》)。到了宋代,马端临又依修炼的内容分为清静无为派:代表人物为黄帝、老子、列子、庄子等;炼养派:代表人物为赤松子、魏伯阳等;服食派:指卢生、李少君、栾大等;符箓派:以张道陵、寇谦之为首(见《文献通考》)。明、清以来,史学家们认为道教的修炼法可以简捷地分为炼养与符箓两大派。本文则结合现代医学理论把道教的修炼方法为精神、呼吸、形体、食物、内丹、房中术等几个方面来分别叙述。

精 神 修 炼

道教是以古代《老子》、《庄子》哲学体系作为思想基础的,因此对世界的生成,社会的发展,人与社会、自然界的关系等的认识使它形成了“清静无为”、“离境坐忘”的精神修炼核心。

这种修炼方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除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名位的奢望,即“去物欲,简尘事”。《庄子·达生》曰:“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所以道教徒认为人类受生成形以后,因生存的需要,猎取外物,为己所用,但自然界博大无边,无穷无尽,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穷的物质名利,势必会劳神伤身。所以“衣食虚幻,实不足营。虽有营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司马承祯《坐忘论》)。“以名位比道德,则名位假而贱,道德真而贵。能知贵贱,原须去取,不以名害身,不以位易志”(同上)。这一切身外之物,皆是“情欲之余好,非益生之良药”。所以道教一再强调修道立身之人重要的是断简事物,“知生之有分,不务分之所无;识事之有当,不任事之非当。任非当则伤于智力,务过分则弊于形神”(《坐忘论》),“必静必清,无动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庄子·在宥》)。

物欲之起,固然由于外界存在的刺激,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我”的存在,由于“我”的眼、耳、鼻、舌、感觉、思想意识接受了外物的引诱,所以道教徒认为必须“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老子》)。塞之则心不动,闭之则万物不入,我心不起,万念即灭,见素抱朴,正是保守本真的方法,也是“收心习静”的精神修炼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强调了“心”的作用,把“心”比喻为利剑,可以斩断情丝邪魔,这正是宗教唯心主义的特点。

在“收心”的过程中,还要做到“虚心”、“安心”,心不受纳外物,也不分心于外界,这是心对内、对外的两种不同的修炼。做到此,即达到“心不着物,又得不动”的“静定”。在此,应当指出这种“静定”并不完全是庄子所说的“至人之用心若镜”的心之虚静状态,而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这个“动”,便是心能“生慧”,心能把“烦邪乱想,随觉则除”的利剑作用,对心灵的净化与专一,对外在事物的屏弃与超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功夫做到此,就达到处物而心不染、处动而神不散、本心不起、离乎万境的道教精神修炼的最高境界了。

道教修炼的思想是追求在心理上、精神上、社会环境中达到清静无为的出世境地。隋唐之际,受到佛教的影响,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进一步发展充实了道教修炼体系,并

对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然而作为社会中的人，是不能靠任何修炼超脱现实，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尽管道教徒非常重视这一修炼，但千百年的道教史证明没有一个修炼者达到了他们所谓的最高修炼标准。

呼 吸 修 炼

道教的呼吸修炼，即所谓"气"的修炼（简言之为"气功"，但不包括现代硬气功的范畴）。道教中的"气"，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指呼吸自然界的空气；二指父母精血媾精时的元气，又称"先天气"；三指通过饮食物质所化生的能维持生命存在的活力，即人体内的一种能动力，各脏腑器官的功能作用等，又称为"后天气"。通过呼吸修炼达到养气全神，祛病延年的作用，这是道教修炼的另一核心问题。

呼吸修炼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服气法，它与现代气功中所讲的调息、吐纳、内视气功法、守丹田气功法等是相似的。《庄子·刻意》说"吹响呼吸，吐故纳新"。嵇康《养生论》说："呼吸吐纳，服气养身"，就是服气修炼。人的呼吸，本就是吐故纳新，但吸纳新鲜空气在道教中却有许多种方法，如服六戊气法、服三五七九气法，道教徒认为吸入天地间的四时正气，日、月、星辰的精气，就可以长生。吐故气，在汉代以前就有吹、响、呼三种方法。吹是吹出凉气；响是呵气；呼则呼出体内旧气，即二氧化碳气。汉代以后就发展为六种方法了。《服气疗病论》曰："凡行气以鼻纳气，以口吐气，微而引之，名曰长息。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纳气一者谓吸也。吐气六者谓：吹、呼、唏、呵、嘘、呬，皆出气也。"又曰："吐气之法，时寒可吹，温可呼。委曲治病，吹以去热，呼以去风，唏以去烦，呵以下气，嘘以散滞，呬以解极。"此法一直沿习，到唐代仍以六字气诀来治病。服气修炼法的要旨是通过深呼吸，锻炼肺部的活动能力，加强氧气的摄入量，扩大二氧化碳的排出量。呼吸中要求气息均匀轻缓而深长，从而达到服气养身、服气疗病的双重目的。

在呼吸修炼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鼻无出入之气的最佳境界时，即达到道教呼吸修炼的最高境界——胎息。《抱朴子·释滞》曰："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人在胞胎之中。"道教徒认为用鼻呼吸，"一窍即开，元气外泄，泄而不止，劳及性命"。所以强调息之深沉，吸之以踵，使身体内部的呼吸自我循环，如同婴儿在母腹中的呼吸状态，又如同龟鹤入蛰时的呼吸方法。道教中有关资料较多，如《服气经》、《服气精义论》、《尹真人服无气法》、《赤松子服气经》、《胎息经注》、《太上养生胎息气经》、《高上玉皇胎息经》等书。

此外，还有行气布气法，这是在呼吸修炼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气功疗法。当气体进入身体之后，在主观意念的诱导下，在人体内循行一定的路线运行，作用于四肢经络、五脏六腑，引起内脏功能的某些变化。在这一运行中，潜在地就存在着疏通气血、改善机体功能的防病治病作用，故《疗病论》曰："以我之心，使我之气，适我之体，攻我之疾，何往而不愈哉！"这种行气养身疗病法所根据的理论是建立在祖国医学经络学说、脏象学说的基础上的。《疗病论》曰："用气攻病，虽攻其处，肤腠散出，然兼依明堂图，取其所疗之穴，想而引去，尤佳。"这在现代临床治疗中确有一定的疗效，尤其是对于精神情绪有关的疾病，如失眠、高血压、慢性胃病等。在练功的过程中，努力做到意行气行，意到气到，经过一段时期，自己就会感觉到体内有一股热气流随着呼吸节奏、意念控制在体内循行，并且想到哪里，就运行到哪里。将气运到患病之脏腑、经络，就意守之、导引之，反复疏通，就能改善有病部位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调整神经功能，加强各部分组织的功能，从而减轻病势，以至痊愈。

行气疗病法还包括为他人治病，如现代气功师用手掌运气发热，治疗内科、神经科疾病等，均属于行气布气法的修炼。

形 体 修 炼

道教的形体修炼包括按摩、导引、拳术等内容。按摩，即循行一定的经穴，用按压、揉摩、捏推等手法作用于人体；导引、拳术则是引导四肢百骸，做各种屈伸俯仰运动，使之“导气令和”，“引体令柔”，达到疏经活血、理气止痛的防病疗病效果。晋代葛洪《玄鉴导引法》说：“道以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劳动故也。导引之道，务于详和。俯仰安徐，屈伸有节。导引秘经，千有余条，或以逆却未生之众病，或以攻治已结之笃疾，行之有效，非空言也。一则以调营卫，二则以消谷水，三则以排却风邪，四则以长进血气。”《神仙导引论》曰：“人之五脏六腑百骸九窍，皆一气之所通，气流则形和，气滞则形病。导引之法，所以行血气，利关节，辟除外邪，使不能入也。故修真之士，以导引为先。”故道教徒尤为重视。在《庄子》里有“熊经鸟申”两种方法，《淮南子》中就增加有“凫浴猿躩，鸱视虎顾”四种，汉末华佗进一步发展成虎、鹿、熊、猿、鸟五禽戏。《抱朴子》中又出现了龙导、龟咽、燕飞、蛇屈、兔惊等各种模仿动物动作的运动方法。隋唐以至近代由导引所衍化派生出来的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慢行百步功等都是行之有效的运动方法。

导引行气、各有专门，行气的专讲吐纳，导引的尤重屈伸，但道教徒认为两者必须密切联系，以气先行，以形后随，即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这正是道教形体修炼的特点。

食 物 修 炼

首先是食气辟谷法。此法盛行于晋、唐之际，到了宋、元以后出现了道教丛林，则鲜有覆蹈者。辟谷是不吃谷物，但不是不吃食物。开始由一日三餐减为二餐、一餐，适应一个时期后，则以饮水服气为主，同时服用一些辅助食品，如：白术、山药、黄精、巨胜、茯苓、花生、大枣、栗子、核桃等，由于这些大多为中草药，兼有补养气血的作用，故可以达到解饥、祛病、延年的多重效果。正由于修炼辟谷法，许多道士兼通医药学，为民众治病，促进了祖国医学的发展。

其次为道教徒每日必做的鼓漱功。这种修炼方法包括叩齿、搅舌、鼓漱、咽津液等过程。《遵生八笺》中记载：“平明睡醒时，即起端坐，凝神息虚，舌舐上腭，闭口调息，津液自生。渐至满口，分作三次，以意送下。久行之，则五脏之邪火不炎，四肢之气血流畅。诸疾不生，永除后患，老而不衰。”后世把鼓漱功发展为单独的修炼方法。从现代医学来看，叩击牙齿能促进牙龈、牙周膜、牙髓腔部位的血液循环，增加牙齿的营养供应，还能使食物残渣脱落，保护齿面清洁，不易发生龋齿、牙松动等口腔疾病。唾液是正常的生理分泌物，其中含有溶菌酶、淀粉酶、分泌性抗体等成分，有助消化、杀菌、解毒、抵抗某些疾病的作用。故修炼此法，可以保护牙齿，清洁口腔，促进唾液的分泌，加强消化功能，使嚼咬肌不易萎缩，面颊不易塌陷。此法已成为现今口腔医疗保健操之一。

外丹也是道教徒的一项重要修炼方术，主要采用金石药剂或辅以草木合剂，经过炉火烧炼的化学反应后形成的丸剂。《抱朴子·金丹篇》曰：“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不老不死。”所以自西汉方士创制金丹后，上自帝王，下至道士均以炼丹为事。东汉魏伯阳继承了前代阴阳五行家、神仙家的方术，借《周易》爻象论述炼丹修仙的方法，撰成了《参同契》，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丹法的著作，被道教徒奉为“丹经王”。

从此外丹术成为道教所特有的一项重要修炼方法。随着外丹术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但服食丹药致死者也日多，服食者对此亦产生怀疑。南宋以后，全真道皆主内丹，外丹就衰落下来。外丹术经过长时期的烧炼实践，对我国古代化学、医药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内　丹

内丹是在服气、行气、导引、胎息、房中术等修炼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金元以后道教徒修炼的核心。

内丹家认为人皆禀受父母先天血气而生，后因酒色劳役，致使精衰神疲，以致死亡。修炼者即是要通过自我修炼(补养亏损)，达到精神充沛，气血旺盛。内丹家以人体比做炉鼎，以精、气、神为对象，循行一定的经络，经过一定的炼养步骤，使精、气、神在体内凝成“类如鸡子”形的丹，即是内丹。

内丹家以《参同契》、《悟真篇》为主要丹书，其他可参阅的有《金丹大要》、《金丹四百字》、《还源篇》、《翠虚篇》等。

房　中　术

房中术起源于战国方士，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就有《容成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务成子阴道》等八种。东汉时期张道陵始将房中术引为修炼方法之一。房中术又称“黄赤之道”，“男女合气”之术，多为糟粕。但其中有一部分是讲摄精固气、节欲保身、房中禁忌和正当交合方法的性卫生知识。北魏寇谦之改革旧天师道后，力斥此术，此后便逐渐消亡了。

上面介绍了道教的几种修炼方法，道教的修炼除了外丹外，服气、行气、导引、特别是内丹都是气与身体的有机结合，都是相辅相成的修炼方法。但道教作为一个多神教，信奉不同神祇，有不同的祭祷庆拜仪式，道教徒每日要上殿诵经习符，焚香礼拜，还要遵守道观戒律，这些道教门喻为修持功；道教作为宗教，又要传戒授道，济度众人，还要为统治者登斋设醮，办道场，做法事，这些被道教门喻为广修功德的“积德功”。这两种修炼方法对道教徒来讲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道教基本典籍

《太平经》和《抱朴子》

《太平经》是后汉时原始道教的经典，流行于民间，属民间道教的性质，它的理论思维基本上代表民间道教类型的特色。

《抱朴子内篇》是晋代神仙道教的代表著作，是在魏晋之际民间道教被官方抑制以后，上层社会门阀士族崇信神仙道教的理论和方术集大成的专著。

原始道教产生的气候和土壤是当时社会、政治、文化、信仰诸矛盾。原始道教的活动家、理论家同世俗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一样，都是企图解决现实社会的矛盾问题，不过所采取的表现方式和途径有所不同罢了。

神仙道教所关心的不是民间的疾苦、现实政治的黑暗腐败等问题。而是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和地位，想方设法，妄图达到长生不死，永远在天国里享受人间帝王贵族一般的荣华富贵的生活。这就决定着民间道教和神仙道教性质的不同，后者对前者采取对立和排斥的态度。

道教是神学宗教形态的一种。神学宗教最普遍的基本特征就是相信有神。这是任何神灵崇拜，概莫能外。道教是在中国的土壤里生长的，有它自己的特色。首先，原始道教的形成在汉代，因之在原始道教的经典《太平经》里往往反映出汉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特色。其次，它又是经过较长时间的累积、不同手笔的增修而成的庞杂体系，兼容并蓄着不少文化思想的精华与糟粕，须要细心剖析，认真评价。在这篇短文里，不能详谈，只能有重点地简略说明几个社会政治思想问题。

比如，《太平经》里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言论，这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拥有一百七十卷的巨帙的《太平经》并非世外桃源的产物，故也未能例外。也有改良主义的言论，不可忽视。这此言论，与豪门世族的思想不一样，主张任用贤才，公平办事；减省刑罚，避免重刑死法，保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反对贵戚豪家穷奢厚葬，靡费社会上大量财力和物力。又主张沟通民意，下情上达，能使万民直言疾苦和弊害。如果做到这些，这大致符合国家太平的气象。

特别是那些反映农民善良愿望的言论尤为难能可贵，是值得珍视。众所周知，封建社会里主要劳动的负担者是广大农民(手工业往往是农民的副业)。所以农民群众主张自食其力是天经地义。“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衣食者”。这是农民群众的生活原则。剥削阶级靠别人供给衣食，绝没有这样的亲身感受和想法。自食其力的反面是四肢不勤地剥削他人，剥削的对象是终日勤劳衣食无着的穷民。《太平经》描述富翁剥削穷人说：“或有遇得善富地，并得天地中和之财，积之乃亿亿万种，珍物金银亿万，反封藏于幽室，令皆腐涂。见人

穷困往求，骂詈不予，既予不即许，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乃止。赐予富人，绝去贫子，令使其饥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太平经合校》246页)富人们就是这样贪得无厌，狠毒心肠！在《太平经》看来，天地间的财物，原是用以共养众人的，不能让个人或极少数人独占为私有。“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太平经》认为天地间的财物应该公有公用，谁也不许独占，即如帝王私人府库里的钱财，原来也是从天下万户百姓那里征调得来的。比如大仓里的米粟，本来不是老鼠所独有的。这个劳动人民自己体验的道理很通俗、很切近实际，可是蕴含着十分深刻的真理和智慧的光芒。从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主张，到天地间万物共养人的道理的一贯性，做为原始道教理论的一个方面，不仅是尔后道教史上绝无仅有的思想，而且其通俗透辟感人肺腑的力量，也是当时世俗的政论家所望尘莫及的。早期民间道教思想的精髓就在此。

这种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不是孤立的出现、偶然的流露。它和《太平经》里某些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有着血肉相通处，因为该书残缺甚多，现在仅存五十七卷，只能略引一些主要文字，以见一斑。在宇宙生成论方面，主张原初物质——元气产生天地万物，“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各自有祖始”。又说：“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也；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太平经合校》305页)天、地、人三才都是从元气自然而然化生而成。这里没有涉及超自然的上帝或其他什么神秘的力量创造天地人和万物。显然，这是吸收了汉代流行的元气论的唯物主义观点。看来似乎有些奇怪，宗教本来宣扬神学，但同时有意无意地宣传唯物论，这个矛盾，令人难以理解，这同汉代谶纬迷信书里出现元气论一样，事情的错综复杂的状况是如此，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太平经》的言论本是以阴阳五行为家，原始阴阳五行学说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它说：“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太平经合校》221页)相生相养，即对立物的相互联结，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对立物相互转化。只要事物的变化达到一定的极限，阴能变为阳，阳能变为阴。所谓“阴极反生阳”，就是这个意思，反之亦然。这在自然界是容易理解的，如气候的变化即是寒极反暖、暖极反寒。但一论及人间社会，受根深蒂固的封建伦常思想束缚，就难以坚持这个阴阳互相转化的原理了。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老学派的古佚书《经法》，其《四度篇》虽则承认“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但是强调“君臣易位谓之逆。”指明君臣(包括君民)易位是反悖纲常的大逆。而《太平经》没有受此拘束，竟有君、民变化无常的思想，断言：“一衰一盛，高下平也；盛而为君，衰即为民。”(《太平经合校》723页)这个十六字箴言，在当时正统思想家看来无疑是异端。由此可见汉初黄老之学与东汉原始道教经典中某些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史称汉顺帝时，有司奏宫崇所上《太平清领书》为“妖妄不经”，把它收藏起来了。这是《太平经》首次遭受不幸的厄运。原始道教经典的这些思想，做为教义教理的一部分，除了对汉末民间道教如太平道、五斗米道和隋以前李氏(李弘等)道的活动有若干影响外，在道教史上毕竟成为绝唱，不再有什么继承发挥和传播的迹象了。因为它同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官方舆论和法令不允许，应时而兴，产生了神仙道教并且得到迅速而广泛地发展。

我国的神仙思想，起源很早。魏晋时期，

继民间道教而兴的神仙道教的形成，具有系统的理论和众多的方术，始完成于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内篇》。

神仙道教的最大目标，就是幻想成为长生不死的神仙。民间道教追求的是现世的利益，贫苦人家要求富人减轻剥削，救穷赒急；要求穷哥儿们自愿互助互济，有疾病则乞求神灵的符水来解除痛苦，如此等等。他们现世生活的日子很不好过，决没有想求什么长生不死的快乐。只有帝王贵戚门阀豪族平时享尽荣华富贵而又厌倦这种物质的生活，想到世事变幻无常，人生不免一死；一死，什么都享受不到，精神上感觉无限空虚，内心里发生一阵阵悲凉的情绪。长生不死的神仙信仰，才成为他们的玄思和梦想。抱朴子深信天地间有不少特异的事，比如夏天草木都在生长，而荞麦枯萎了。冬季草木凋落，而竹柏长青。常言生必有死，而龟鹤能够长存。从此推论，"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论仙》)。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所谓以药物养身，术数延命，是有可能的；但过此而往，超越延年益寿的界限，妄求长生不死，这就荒谬透顶了。他强调学仙的方法，必欲恬愉澹泊，涤除嗜欲；必欲静寂无为，忘其形骸；必欲止绝臭腥，休粮清肠，如此等等。清静无为，恬愉澹泊，止绝臭腥，如果控制适中，对保健身体来说，可能有一定的益处，但欲以此求长生，成神仙，未免想入非非，不可究诘了。

抱朴子提倡神仙道教，在理论上反复申述神仙是可学的。在方术上历举金丹、仙药等方诀，令人勤求道法，相信成仙。方术纷纭，首推金丹为仙道之大要。丹法众多，或得自祖传师授，或亲自搜访所得，详加审核，并做试验。神仙道教的主观愿望——贪求长生不死是荒谬的。但是炼丹术的实验，客观上以原始化学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从炼制金丹的实验中观察到的化学变化，有两句概括的名言："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砂。"(《金丹篇》)丹砂就是硫化汞，将丹砂锻炼，其中所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游离出水银。再使水银和硫黄化合，便生成硫化汞。这就是抱朴子对还丹总结的话。又如葛洪对于铅的化学变化的认识也是深刻的。他说："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黄白篇》)"铅性白也"，是说铅经过化学变化可以变成胡粉，即铅白。铅白加热后经过化学变化，成为赤色的铅丹。这两句简括的话，正是对铅的化学变化作了一系列实验之后得出的结论。举此二例，可见他对于炼丹过程的观察是严密认真的，具有科学家实验的精神。在这里，他没有以宗教家的玄想代替科学研究，所以在科技史上能够做出卓越的贡献。

炼丹家往往兼攻药物学和医学。《抱朴子内篇》的《仙药篇》更详述诸芝、五玉、云母、雄黄、真珠、桂、巨胜等等，据说服之可以延年长寿，甚至相信可以成仙。此外，他还撰有《金匮药方》(疑即《玉函方》)一百卷、《肘后备急方》八卷、《神仙服食药方》十卷等医药书籍多种。就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一书看来，他对传染病如天花、结核病等都有研究，对免疫法也有准确的认识，贡献不小。特别值得重视的，他从化学实验的变化，观察到一些自然物能够以人工的方法来制造。外国科技成果新工艺产品的输入，也给他以启迪。他说："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论仙》)水精本是自然之物，属玉石之类，现在可以用人工方法制成。葛洪进一步认为云、雨、霜、雪是天地间自然物的变化，只要人们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和方法，都可以人工制造。他明确地说："云、雨、霜、雪，皆天地之气也，而以药作之，与真无异也。"(《黄白篇》)抱朴子生于一千七百年前的封建社会，已经探索用人工的方法制造人造雨、人造冰、人造雪，真是古代文化史上了不起的科学家！

《抱朴子·杂应篇》还有这样的话:“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从这寥寥十余字中,透露了中国最早的关于飞机螺旋桨的原理。这是科学家的巧思,绝不是宗教家的玄想。今人古工艺史家王振铎氏为此创制了飞车复原图,登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4年第六期上。

总的来说,《太平经》做为原始道教的经典,它的特点,与神仙道教的《抱朴子内篇》不同,理论多,方术少。在庞杂的思想体系中,一些有关社会政治的进步言论尤为出色,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不但为后来神仙道教所不能言和不敢言,就是比世俗思想家的言论也是更大胆、更深刻,大大超越了一般宗教教义的性质和范围。

神仙道教做为民间道教的对立面而出现,在《抱朴子内篇》里,诸种方术加多,有关社会政治思想,偏向维护封建秩序,这是神仙道教的本质和立场所决定的,这是消极方面。另一方面,葛洪做为学问渊博的道教学者,注重自然科学技术的探索与观察,客观上做出了积极的有益的贡献,在文化史上的价值也是应该肯定的。

《道　　藏》

每种宗教都有它的教义和经典。有些大的宗教,经典很多,后世教徒们为了便于学习钻研和保存,把这些书籍汇集起来编成一部大的丛书。佛教的典籍汇编起来叫《大藏经》,一称《大藏》。道教的典籍汇编起来叫《道藏经》,一称《道藏》。

《道藏》之名,始于唐代。它是包括道教经典及其有关书籍的一部大丛书。现在把《道藏》的编辑、分类、内容及价值简单介绍一下。

道教创始于汉代,魏晋以前,道教的书籍不多。葛洪在《抱朴子·遐览篇》中所列道经有六百七十卷,符箓五百多卷,共一千二百卷。刘宋时道士陆修静广为搜集道书,编为《三洞经书目录》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其中除道经、符图之外,还包括一些医药书籍,这是《道藏》最早的结集。唐玄宗开元时下诏搜访道经,辑成《开元道藏》凡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到了宋朝,宋太宗时曾命徐铉等校正道经,至宋真宗时,在徐铉等编校的基础上,由王钦若领衔、张君房主持辑成道藏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装为四百六十六函,每函按照《千字文》顺序编号,起“天”字,止于“宫”字,所以这部道藏就叫《大宋天宫宝藏》。张君房又摘其精要编为《云笈七签》一百二十二卷,所以《云笈七签》有“小道藏”之称。宋徽宗时,又把《天宫宝藏》增加到五千四百八十一卷,并在福州闽县刻板,这是整部《道藏》的第一次刻印。刻成后贮存于闽县天宁万寿观,故称之为《万寿道藏》。金代金章宗时曾刊印《大金玄都宝藏》凡六千四百五十五卷。元初全真道士宋德方遵其师丘处机的遗志,奉命刊印道藏于平阳(今山西临汾)玄都观,经历八年刻成七千八百余卷,经板藏于玄都观,故称《玄都道藏》。遗憾的是,上述《道藏》均已先后亡佚。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是明代《道藏》。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诏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编修道藏,永乐八年(1410)张宇初病逝,他的弟弟张宇清升为天师,继续主持编修。至正统十年(1445)刊成,总计五千三百零五卷,装为四百八十函,仍用《千字文》编号,称为《正统道藏》。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又命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校刊《续道藏》凡一百八十卷,装为三十二函,称万历《续道藏》。正续《道藏》总计五千四百八十五卷,共五百一十二函。明刻《道藏经》板储藏于大光明殿,旧址即现在北京西安门大街光明殿胡同,传到清代经板已有残缺。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光明殿被烧毁,道藏经板也全部被

焚。本世纪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借北京白去观所藏《道藏经》加以影印，这就是现在流传的涵芬楼影印本明正续《道藏》。

《道藏》旧来都按“三洞’、“四辅”的七部分类法。所谓“三洞”，就是洞真、洞玄、洞神。洞是通的意思。“洞真”是说通向真仙之道。类似佛教的大乘经典。“洞玄”是说通向玄妙之道，这是中乘。“洞神”是通于神灵，能够召制鬼神，这是小乘。所谓“四辅”就是把“三洞”以外的经论分为太玄部、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四类。“太玄”取“玄之又玄”的重玄之义，“太平部”因此《太平经》为首而得名，“太清”取至清虚无之义，传说此经降自太清境，因而得名，这三部是分别辅助洞真、洞玄、洞神三部。“正一部”是以道德为宗，贯通三洞，所以“正一部”是辅助“三洞”，遍陈上中下三乘之义。

“三洞”之中，每洞又分为十二类。即(1)“本文”，就是道经的原文。(2)“神符”，指以符箓咒语为主的道书。(3)“玉诀”，是注解道经的文字。(4)“灵图”，是以神灵图象为主的道书。(5)“谱录”，记神仙谱系。(6)“戒律”载道教的清规戒律及功过格之类书籍。(7)“威仪”，记道教的礼仪制度，斋醮、祀神的仪式等。(8)“方法”，讲修进及招魂制鬼之法。(9)“众术”，即炼丹及变化之术。(10)“记传”，为道史及神仙传记。(11)“赞颂”，是以赞词、颂偈为主的道书。(12)“表奏”，列斋醮、祭祀所用的章表，奏疏等程式。

“三洞”的分类法源于道教的神学体系。道教认为道经都是从天而降的神书。“三洞”经书是由三洞教主即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三位尊神传下来的。这些道经本来都在天上，藏于天宫。据道教神话传说，在太古之初，空中“飞玄之气”凝结成字，这些字都有一方丈大，八角放射光芒。像这样的神话，怎么可能做出科学的合理的分类呢？所以“三洞四辅”的分类法，虽是道教传统的分法，但是实际上，这样分类既很混乱，也是不适用的。使人看了只会产生莫明其妙的神妙感而已。

《道藏》卷帙浩繁，商务印书馆从《道藏》中选出一百七十六种影印为《道藏举要》，这是《道藏》的一个选本。清代有《道藏辑要》收道书二百八十七种，其中有一百一十四种是正续《道藏》以外的道书。另有《道藏精华录》一百种，其中也有《道藏》未收的书，这些都是《道藏》的选本。

《道藏》是一部大丛书，收书种类甚多，正续《道藏》共收书一千五百种左右。其中有几百万字一部的大书，也有少到百十字一种的短篇。例如《灵宝领教济度全书》三百二十卷，《道法会元》二百六十八卷，这些都是几百万字的书。而《阴符经》只有三百字，《太上老君说了心经》仅一百四十四字。最短的是《高上玉皇胎息经》只有八十八字。

《道藏》内容庞杂，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其中大量的是道教的经、论、戒律、符诀、法术和威仪、斋醮等书。关于道教历史传记方面的有《列仙传》《历史真仙体道通鉴》《七真年谱》等。记载古地理神话的如《山海经》，关于名山宫观的有《南岳总圣集》《天台山志》《宫观碑志》等。有儒家《周易》类的书籍，如焦氏《易林》、周敦颐、邵雍的《周易图》等。《道藏》中所收诸子类的书有一百多种，从先秦到唐宋都有。先秦的如《老子》《庄子》《孙子兵法》等。唐宋的如《天隐子》《素履子》《无能子》等。《道藏》中所收医药类的书达二十种如《黄帝内经》、《灵枢经》、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等。有天文历象方面的书，如《盘天经》《通占大象历星经》等。《通占大象历星经》即所谓《甘石星经》。此书虽为唐宋人所缀辑，但在天文学史上是一部颇有价值的书。有占卜数术之类的书，如《黄帝龙首经》《玉匣记》等。有堪舆书，如《黄帝宅经》《堪舆完孝录》之类。有选编的书，如马总《意林》是摘录诸子的书，曾慥《道枢》摘选许多丹道炼养的书编成。

《道藏》的价值是多方面的，现分五点来

说明。

(1)《道藏》为道教著作的总汇，是研究道教教义、流派、经典和道教史必需的、首要的资料。

(2)《道藏》里有医药、养生的书各数十种，这些书都是历史上长期医疗卫生、养生经验的总结，其中有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

(3)《道藏》除大量的道教典籍之外，还保存有不少的古籍。在《道藏》中关于《道德经》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南华经》的有十多种。这些都是研究《老子》《庄子》的重要资料，并且其中有好些种书仅赖《道藏》本得以保存，流传下来。

(4)《道藏》是明正统(1436—1445)时的刻本，而明道藏的底本好些出于宋藏本，因之《道藏》本在版本学和古籍校勘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5)《道藏》中保存有不少科技史的资料。道教讲求炼丹，其中的外丹黄白术就是古代的化学实验。《道藏》中的许多外丹书为中国古代化学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总之，《道藏》这部大丛书，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有其重要的价值。但由于它分类编排不合理，不便检阅。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曾编有《道藏子目引得》，七十年代，法国巴黎曾出版《道藏通检》。为了便于了解和检阅《道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道教研究室用了几年功夫编撰了《道藏提要》。从提要可以知道各书的梗概，后面并附有《道藏》书名及编撰人的索引。只要知道书名或某一著者、编者的名字就能很快地查出《提要》及此书在《道藏》涵芬楼影印本与台湾缩印本的册数。有了这一工具书，研读《道藏》就比较方便了。

《云笈七签》

《云笈七签》是一部大型道教类书，凡122卷，大约170万字左右，编于北宋真宗时期。编者张君房，宋真宗景德(1004—1007)进士，安陆(今属湖北)人。曾任尚书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御史台等职。后因“鞫狱无状”，谪官宁海。

张君房在编《云笈七签》之前，曾编辑名为《大宋天宫宝藏》的《道藏》。宋真宗时，司徒王钦若等人同时推荐海宁谪官张君房主持编修《道藏》。大中祥符五年(1012)冬，张君房被任命为著作佐郎，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于是，君房得到藏于秘阁(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之一)的全部道书，并陆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市)、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县)亦各千余卷，以及朝廷陆续赐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等，率领其他道士依照三洞四辅分类法，删去重复，分门别类，编排次序，编成4565卷，题名曰《大宋天宫宝藏》。至天禧三年(1019)，抄录成七部献给朝廷。秘阁道书包括哪些，旧《道藏》为何代遗物，志书未载。但可以肯定，《大宋天宫宝藏》当收进不少宋前古道书。同时，也增加了不少宋代新道书。

《云笈七签》就是在这样一部空前宏富的新编《道藏》的基础上编辑的。君房在《大宋天宫宝藏》大功告成之后，“掇云笈七部之英，略宝蕴诸子之奥”，编成《云笈七签》。这就是说，《云笈七签》的全部内容均是采撷《大宋天宫宝藏》而成，是其精华荟萃。在这个意义上，《云笈七签》可称得上《大宋天宫宝藏》的缩编。“云笈”指道教书箱，“七签”即《道藏》七部——三洞四辅，“云笈七签”四个字连起来就是“道藏”的意思，君房以之为书名，大概是有意指明其为《大宋天宫宝藏》缩编，系小《道藏》。事实也是如此。从内容的广泛性来看，现存明《正统道藏》中其他任何一部书都无法与《云笈七签》比拟。

《云笈七签》是以类书的形式完成缩编任务的。张君房自称其编《云笈七签》时，“采摭机要，属类于文”，“考核类例，尽著指归”(《云

笈七签序》)。这就是说,《云笈七签》将摘录的道经原文,重新进行了分类编次。其每卷卷首均有标题,低两格独占一行,指明该卷为何种内容,笔者称这种标题为类名。全书约有50类,每一类辖一卷或数卷不等,少数类名有副名。类之中再列小标题,低三格独占一行,可称之为项名。

自刘宋陆修静、孟法师编撰道经书目以来,以三洞四辅为纲目的七部分类法一直是《道藏》分类的传统。而《云笈七签》却放弃了七部分类法,另辟蹊径。七部分类法自唐代以来,与新道经实际需要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云笈七签》的分类比起七部分类法来,更准确,更细致,更具有科学性,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云笈七签》的分类编次颇有系统性。其内容可分为七大部分。

第一部分卷1至卷3,为"道德部"、"混元混洞开辟劫运部"和"道教本始部"三类,围绕一个"道"字,论道德,论述宇宙生成、变化及其主宰,详释道教品位和发源、天尊老君名号及历纪年号、《灵宝经》传授、三洞四辅36部之仙源等。该部分突出的是道教神学的哲学基础。

第二部分卷4至卷20,为"道教经法传授部"、"经教相承部"和"三洞经教部"三类,围绕一个"经"字,述三洞经法传授经过,《上清经》之传授世系及杨羲至李含光十师传说,道经品格,分类原则、名称和主要内容。该部分突出的是道经。

第三部分卷21至卷28,包括"天地部"、"日月星辰部"、"十州三岛"、"洞天福地"和"二十四治"五类,释四梵三界三十六天及三十六天帝、三十六土皇内讳等,述日月星象、三台北斗二十八宿诸星神及三奔、服日月星气、存思日月星神、卧斗、升斗诸法、述仙山位置、帝王神话及神奇景象,释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方圆、位置及仙主,述二十八治位置、仙迹和仙主。该部分突出的是道教的彼岸世界。

第四部分卷29至卷31,为"禀生受命"类,述人生之源、体内诸神、保炁长生法、存思长生法及隐身、变化法等。该部分突出的是从生命奥秘证明人可成仙。

第五部分卷32至卷86,包括"杂修摄"、"斋戒"、"说戒"、"七签杂法"、"存思"、"秘要诀法"、"杂要图诀法"、"杂秘要诀法"、"魂神"、"诸家气法"、"金丹诀"、"金丹"、"金丹部"、"内丹诀法"、"内丹"、"方药"、"符图"、"庚申部"和"尸解"等十九类,介绍成仙的各种途径。

第六部分卷87至卷95,包括"诸真要略"、"仙籍旨诀"、"诸真语论"、"七部语要"、"七部名数要记"、"仙籍语论要记"、"仙籍理论要记"和"仙籍语论要记"八类,述靖气洁精法、三元之术、绝情去欲正性修行之训、理神养性立身修道警句、修性修善之教,论神仙可学、阴阳和合、众生道性无异、世界虚无、法性和道性等。该部分主要讲人应修仙。

第七部分卷96至卷122,包括"赞颂歌"、"歌诗"、"诗赞词"、"赞诗词"、"纪"、"传"、"传录"、"列仙传"、"神仙传""洞仙传"、"神仙感遇传"、"传"和"道教灵验记"等十三类,为诸经及修道之人赞诗、神仙赠答授受诗歌、神谱、仙传及灵验故事。该部分突出讲神仙生活。

这七部分依次排列,始终围绕着修炼成仙这个主题。张君房编辑《云笈七签》,广泛的目的是"少畅玄风"。他评价《云笈七签》说:"习之,可以阶云汉之游,览之,可以极天人之际"(《云笈七签序》)。这一评价透露出,修炼成仙正是张君房取材和编辑的指导思想。事实也是如此,《云笈七签》只录与这个主题有关的最直接的道经,将《道藏》中诸子百家及道教仪轨等基本剔除在外,实为《道藏》中有关修炼成仙的主要道经的缩影。

《云笈七签》的分类亦有不够精审之处。如某些类名区别不大,某些类之间内容相差

无机，还有个别类名跳过其他类名后重现。其次，它前九类名均称“某某部”，以后则无“部”字。再有，某些类名、项名直接移用所著录之子的书名，子书中篇章名亦低三格独立一行。在这种情况下，几种名极易混淆。这同《云笈七签》不少地方全引或大部引原书有关。

《云笈七签》现存版本有蒙古乃马真后三年(1244)刻《道藏》本、明《正统道藏》本和明清真馆本。清初《四库全书》本的底本是浙江孙仰曾家所藏明中书舍人张萱所刻本，与明清真馆本相同。此外还有清《道藏辑要》、民国《四部丛刊》、《道藏举要》、涵芳楼影印《正统道藏》以及近20余年来台湾、日本几种影印《正统道藏》等版本，均与《正统道藏》本同，但《道藏辑要》本有所删削。乃马真后本《云笈七签》距原本时间最近。《正统道藏》本《云笈七签》亦基本保持宋本旧貌，如卷80所收《元览人岛山形图》，“元”字避“玄”讳。有些著作甚至保存着宋前旧貌，如《云笈七签》卷32所收梁陶弘景著《养性延命录》，有《老君道经》、《老君德经》、《老君妙真经》等经名，而不称《混元道经》、《混元德经》和《混元妙真经》。

综上所述，《云笈七签》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内容丰富，广泛，中心突出。

《云笈七签》所辑录的资料大部分标明出处，仅标明的道经及其他典籍即达千种以上。

《云笈七签》保存了不少《正统道藏》它帙未收的完整佚经或片断。完整的发《紫阳真人周君内传》、《茅三君传》、《精灵真人裴君传》、《真系》、《洞仙传》等，片断就更多。这些为研究道教补充了丰富的宝贵资料。此外，《云笈七签》保存的佚经片断和引用的书目，也是考证道经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由于《云笈七签》内容全面，主题突出，分类科学，所以阅读它可以帮助对道教初感兴趣的人，较迅速地对道教教义有一个较完整的轮廓印象。它也可以帮助对道教教义某个方面感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迅速查找到所需要的资料。通过阅读《云笈七签》，还可以窥知汉魏六朝至北宋初年道教教义的基本内容，得到一个较清晰的总印象，帮助我们宏观的认识前期道教，因而有助于了解北宋以后道教教义的演变和发展。

第二，带有一定程度的丛书性质。如果有一个好的目录，我们则可以将其相应部分当作丛书利用。

第三，存宋本旧貌。《云笈七签》中的一些道经同时也收录于《正统道藏》它帙中。由于《云笈七签》保存宋本旧貌，所以它对于校勘具有重要作用。《云笈七签序》也称“以裨文馆雠之职”。

总之，《云笈七签》具有很高的阅读、研究和使用价值。

《云笈七签》的作者张君房在整理道经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人物。在他之前，宋真宗曾命人编成一部4359卷的道藏，赐名《宝文统录》。但是这部《道藏》质量很差。其“纲条漶漫，部分参差，与《琼纲》、《玉纬》之目，舛谬不同。岁月坐迁，科条未究”。因此，枢密直学士戚纶、翰林学士陈尧佐、故相司徒王钦若转而同时推荐张君房，最后，由他编成质量颇高的《大宋天宫宝藏》。这一史实表明，君房通晓道教，学识在许多大道士之上，不愧为出色的《道藏》总编辑。

《云笈七签》所表明的张君房的水平，还不止于此。《云笈七签》是类书，《大宋天宫宝藏》是丛书。编辑类书比编辑丛书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张君房自述编辑《云笈七签》的过程说“虽年栖暮景，而宝重分阴，于是精究三乘，详观四辅，采摭机要，属类于文。探晨灯红映之微，综玉珮金珰之说。泥丸、赤子、九宫，爰系于一方；神室、婴儿、百道，皆根于两半。至如三奔三景之妙，九变十化之精，各探其门，互称要妙。刻舟求剑，体貌何殊，待

兔守株，旨意宁远。因兹探讨，遂就编联”(《云笈七签序》)。事实也正是如此，张君房虽然述而不作，但他通过编辑《云笈七签》，刻苦钻研道教教义，不愧是一位杰出的道教学者。

从《云笈七签》收录的内容还可以推测，张君房所重视的道教学，偏重于个人修炼成仙，轻视救济利人的斋醮、仪轨等。他的道教思想的这种特点，与他身为道教学者而非道教活动家，大概不无关系。

研究《云笈七签》的文章并不多见，日本学者福永光司在其著作《道教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1987 年 9 月第一版)中，曾对《云笈七签》所引资料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目前研究较多的是如何更方便地使用《云笈七签》这部工具书。日本、法国和中国学者都编写了读书的引用书目、简目与索引，但都不够完善。为了便于国内学者进一步使用《云笈七签》，在以前成果的基础上，重编《云笈七签详目和所引书目》，还是有必要的。

道教的轨仪制度

道教的戒律与清规

斋戒、祭祷，在我国古已有之。如《礼记·曲礼》："戒斋以告鬼神"，《易经·系辞》："圣人以此斋戒"。

道教崇敬神仙，注重祭祀祈祷，而且认为神仙禀质清净高雅、整洁肃穆，因此要求祭祀者必须在祭祀之前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整洁心、口、身，以示虔诚。斋戒原本是一回事，但后来道教把它分而为二，"戒"是斋的进一步发挥，带有强制性，且有固定条文。道教三洞经书的十二类中，每洞皆有"戒律"，讲的便是各种斋戒。早期道教即有所谓"道诫"，如《太平经》中"虚无无为自然图道毕成诫"，"贪财色灾及胞中诫"、"不孝不可久生诫"等。所谓"道诫"，即"道君"对人所降的劝诫、警告、文告、是教团用来规范人心，约制其行为的。戒律系由道诫发展而来。所谓"戒律"，即教团假借天神之名，用以约制教徒思想言行，防止"恶心邪欲"、"乖言戾行"的规定。道教教义认为，人的罪福、生死、贵贱等，都是行愿所得，非道非天非地非人所为，学道的人必须积善、定念、修德、理身，有所禁戒而不为恶行，精进为善，积德累功，以求正果；否则，学道不受戒就无缘登上仙界。因此，戒律是教徒必须遵守的行为、愿念的准则，违背了要获罪受谴。

道教十分注重"戒律"，认为"学道不受大智慧道行本愿上品大戒，元缘上仙也"（《云笈七签》卷三十八《说戒》）。

道教戒律的种类很多，律条有简有繁，约制有松有紧。总的来说，道教主张随缘受戒，因人品高下受戒，《玉清经·本起品》即说："上品之人，身先无犯"，故用不着持戒；"下品之人，恶心万般，难可禁制"，戒也戒不住。因此戒律主要是对那些"心有上下"的中品之人，使他们"以戒自制，不令放逸"，用宗教道德导之向"善"，勿使为恶。

道教之有戒律，并非出自佛教，实源于我国古代之斋戒；但就其某些内容及条文形式，或有所模仿于佛教。道教的正式戒条，是两晋南北朝上清、灵宝及新天师道等道派所造作，一般都托言是元始天尊或太上老君所下传。其内容不外是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特别是三纲五常观念为主旨。如所谓"五戒"规定：一者不得杀生；二者不得茹荤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四者不得偷盗；五者不得邪淫。道教称这五条是"积功归根"五戒。有所谓"八戒"，即：一者不得杀生以自活；二者不得淫欲以为悦；三者不得盗他物以自供给；四者不得妄语以为能；五者不得醉酒以恣意；六者不得杂卧高广大床；七者不得普习香油，以为华饰；八者不得耽著歌舞，以作娼妓。陆修静宣称："受持八戒，思真行道，通而无穷，显验必速，皆如所期也。"除此之外，还有"十戒"、"二十七戒"等等。

早期道教传戒是公开的，由于朝廷镇压黄巾起义，牵连到道教，故魏晋以后转入秘密传戒。全真道兴起后，丘处机创全真龙门派，又恢复了公开传戒。清初"龙门七祖"王常月，在北京白云观传戒；他承继了全真龙门派的传戒内容及程式，其内容分初真戒、中极戒、天仙戒三部分，道教称之为"三坛大戒"，整个过程要一百天。道教传戒，只能在有律师之"丛林"（又称十方丛林，即为教团所公有的大宫观）进行，由各地宫观（包括私有的子孙庙）选派道徒去集中受戒。一次受戒弟子多至千人。现北京白云观还藏有王常月所遗留下来的演戒科仪书《全真说戒威仪科》，也还有记述清末道士陈至霖传戒情况的碑刻。

道教的戒律虽然繁复，但总的来说，在实施中不及佛教要求之严格；就道教内部来说，全真道较重戒律，而正一道则十分松驰。

道教除戒律外，还有所谓"清规"。戒律是防止犯罪的警戒条文，而清规则是对违反戒律的道士的惩罚条例。清规由各道观自己订立，轻者被罚跪、责杖、驱逐，重则被处死。元丘处机住持长春观（即今白云观）时，订有所谓《执事榜》，亦即该观清规。现将清咸丰六年所公布榜文，略举几条以示梗概：

开静贪睡不起者，跪香（就是罚跪，等一支香烧完了才准起来）；

早晚功课不随班者，跪香；

上殿诵经礼斗，不恭敬者，跪香；

本堂喧哗惊众，两相争者，跪香；

三五成群，交头结党者，迁单（即驱逐）；

公报私仇，假传命令，重责迁单；

毁谤大众，怨骂斗殴，杖责驱出；

茹荤饮酒，不顾道体者，逐出；

违犯国法，奸盗邪淫，坏教败宗，顶清规，火化示众。

上述戒律清规，皆属历史陈迹，时代变，道教戒律清规也不能不有所变。现在，其内容与国家法律相抵触者，已大都自动取消；与法律不矛盾的，则依然沿用。我们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弄清其宗教道德的内容、性质及其与信仰的关系。

道教的占卜与符箓

道教界常有"道无术不行"及"道寓于术"之说，认为行术即是演道。道教所从事的道术很多，占卜及符箓就是其中最主要的。

什么是占卜？古人用龟壳、蓍草以卜筮吉凶，叫做占卜。道教承袭了这种古巫觋之风，以卜占为沟通神意之术。《太平经》卷四十中说：

古者圣人问事，初一卜占者，其吉凶是也，守其本也，乃天神下告之也。再卜占者，地神出告之也。三卜占者，人神出告之也。

占卜就是求神预示吉凶。后世道教演变而为卜卦、抽签、测字等等。香火道士往往以此术骗财，误事坑人，弊害甚大，早已为清修道士所不为。

什么是"符"？《说文解字》说："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史记·孝文本纪》："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索隐谓："汉旧仪，铜虎符发兵，长六寸，竹使符出入征发。"故"符"是帝王下达旨令的凭证，它具有无尚的权威。后来方术之士，亦谓天神有符，或为图，或为篆文，在天空以云彩显现出来，方士录之，遂成神符。或者说，天神授给了方士神符。神符之说，东汉已有之，如《后汉书·费长房传》说：

翁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或在宅坐，独自恚怒，人问其故，曰：吾责鬼魅之犯法者耳。……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

东汉晚期兴起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便已大量造作和使用神符了。如《太平经》卷一至十七所说后圣李君传授青童大帝的二十四诀中，便有"服开明灵符"、"佩星象符"、"佩五神符"。认为服符水、佩符图均可以"灾害不

能伤,魔邪不敢难”。服符水也称为“吞字”,因符“以丹为字”,故亦称“丹书吞字”。现在所能见到的道教最早的符字,便是《太平经》一〇四至一〇七卷中所载的“复文”。《太平经》一〇八卷说:“欲除疾病而大开道者,取决于丹书吞字也。”这时已把符字、符图宣扬为天神的文字与图符,据有神威,吞符则是天神之旨令入人体中,佩符则是有天神护佑,因而有病自除,有邪魔亦不敢侵犯。又据《三国志·张鲁传》载,张陵“学道鹄鸣山中,造作符书”。道书中说太上老君授给张陵的符图有七十卷。五斗米道亦行以符水为人治病和以符咒召劾鬼神之术。魏晋南北朝造作符图及信行符图之术更盛,如《抱朴子·登涉篇》便说:

有老君黄庭中胎四十九真秘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书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说姓名,再拜受取,内衣领中,辟山川百鬼万精、虎狼虫毒也。

“箓”本来是记录之意。一种“箓”是指戒录,即道教所谓登真箓,也就是奉道人的名册,另一种则是指记录天神的名册。据《云笈七签》卷四十五《明正一箓第三》说:

箓者,太上神真之灵文,九天众圣之秘言,将以检劾三界官属,御运元元,统握群品,鉴骘罪福,考明功过善恶轻重,纪于简籍。

即依照天神的旨令,检劾三界官属之功过,同时也按他们的职责去役使他们。因此符、箓并用,统称“符箓”。“符”与“箓”总起来说,即依照天神所授信符,按诸神名册所定之职责,命令某神去执行。故掌握了符箓,便有了代天神役使三界官属的权威。北魏时,太武帝(拓跋焘)采纳道士寇谦之进言,亲备法驾,接受道教符箓,盖意即太武帝受神意而有了劾召百神,统御宇宙一切的神权。这对其维护统治地位,是十分有利的,故后世帝王颇多效法其事。

道教有所谓“三山符箓”,指魏晋南北朝以后,龙虎山、阁皂山、茅山分传之天师、灵宝、上清三宗经箓。明以后统称正一符箓。

《正统道藏》的洞真部、洞玄部、洞神部中之神符类、灵图类以及正一部内,都载有很多的神符宝箓。

在坛醮祈禳等宗教活动中,常与符箓并用的还有禁咒、令、印。

禁咒,亦称神咒、神祝,即天神的语言。《太平经》卷五十中说:“天上有常神圣要语,时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应气而往来也。人民得之,谓之神祝也。”宣称对病者念神咒,便能召神为除疾。念神咒役使鬼神之术,源于古时的巫祝。《抱朴子·至理篇》中说:“吴越有禁咒之法,甚为明验。”道教坛醮等仪式中,亦常念禁咒。

令,即仿照官府公文口气对鬼神下命令,坛醮法器中有令旗,道士念咒中常有“急急如律令”之语。

印,仿照官府之印所刻的天神之印,其作用略与符同。《抱朴子·登涉篇》中说:

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

《隋书·经籍志》中说:

又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

这种“印”,至今犹为坛醮中的法器之一。

综上所述,道教宣称:“占卜”是表达神的意旨,预示吉凶的;“符箓”是天神的旨令与众神之名录,可以役使鬼神,排除邪魔和成仙;这些所谓的“术”,来源于古之巫祝,尔后演变而为道教的主要教术。道士为人占卜以“决吉凶”;卖符箓以“驱鬼辟邪”;为人斋醮祈禳以“祛灾求福”;念咒以“去灾、退鬼、避猛兽”。这些术,在道教属符箓派,主要为正一派道士所操持。

道教的宫观

在祖国各地众多的名胜古迹中,佛寺道

观以它们独具的特色吸引着人们。在历史上,它们曾是人们精神寄托之所在,无数人拜倒在神灵佛祖面前,祈求赐予幸福,消除灾祸,由于一些封建帝王的崇佞释道,寺观也曾几度获得巨大发展,香火鼎盛。在今天,大多数人虽然并不迷信宗教,而游览胜迹,探寻个中奥秘,仍是人们的兴趣所在。

道观或称道宫,是道士修行、供奉祭祀神灵、做斋醮祈禳等宗教活动的场所。它的产生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从中也可以了解到道教发展史中的一些知识。

据道教传说,最早的道观是陕西终南山的楼观,建于周康王时。《楼观本起传》说:"楼观者,昔周康王大夫关令尹(喜)之故宅也。以结草为楼,观星望气,因以名楼观。此宫观所自始也。"(《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引)这和把老子奉为道教始祖一样,是托古自尊,并不可信。

宫、观之名,本来并不是为道教所专设专有的。宫字最初的含义是房屋,《战国策·秦策》:"(苏秦)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款饮,效迎三十里。"这里说的宫,就是指家中的房屋。秦王朝皇帝专权制建立以后,宫字成了帝王所居房屋的专名,俗民百姓便不能再使用了。

观字本是动词,即今日观望之义。作为古建筑之名,它是指那些建有相当高度,且可以登临其上四处观望的建筑,一者为宫门前两边的望楼,一者为台榭。

宫、观本是普通的供居止游息的建筑,后来又与祭祀神灵发生了关系,据可靠史料,至迟在汉武帝时就已出现这种情况。

汉武帝欲求长生不死,喜好神仙方术,于是方术之士纷纷前来投效,公孙卿即是其中之一。《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公孙卿报告说在缑氏城见到神仙,武帝赶去却没有见到,公孙卿便说只要做好迎神仙的准备,慢慢地神仙就会来,于是汉武帝令"郡国各除道(修治通路),缮治宫观名山神仙的宫观,这从上下文意及与"名山神祠所"所列即可知。后来修建的蜚廉桂观、益延观,如缑城(即缑氏城),置枣脯,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于是武帝下令在长安建蜚廉桂观,在甘泉宫建益延寿观,派孙公卿持使节迎候神人,还修建了通天茎台,下有祠宇,用以招徕神仙。

汉武帝令全国各郡国修缮宫观,不是所有的宫观都在内,而是指那些用来祭祀迎候神仙的宫观,这从上下文意及与"名山神祠所"所列即可知。后来修建的蜚廉桂观、益延寿观,更明确指出是迎神祀神之所。祀神之所称为宫,是因为帝王居住的房屋被特别冠以"宫"名,连类以及,皇帝祭祀神灵的祠宇也升格为宫,以显示其不同于一般祠宇的地位。称之为观,与其建筑形式仿照缑氏城有关,即可以登临观望,这是为了观察神仙的踪迹以便于迎接。

道教产生于东汉末期,最早有张角创太平道,用饮符水治疾的方法发动群众,发展到三十六方几十万人,最后掀起了黄巾大起义。几十万人能够在同一天起义,乃是因他们有一套宗教的组织系统,利用宗教活动进行联络,但是关于他们的宗教活动的内容、宗教活动的场所等具体问题,现在已不知道了。现在所知最早的宗教活动场所是五斗米道的静室一类。

张陵在巴蜀汉中传布五斗米道(即天师道),也利用了为人医病的手段,其方法是让人跪拜,在静室中思过,饮符水,同时由五斗米师为他请祷。据说凡是诚心信道的人,用此法医治就能痊愈。受这种宣传的影响,道徒们便要虔诚地念经奉道,而本来是治病思过的静室,就被用作奉道的处所了。

静室又称靖室,或单言靖,是取其安静之义,以屏除干扰,诚心修道。静室最初并不是道民家家都设,也没有固定的格局,贫苦人家往往兼做他用(近现代信仰道教的一般人家仍然如此)。后来的道经中才作了种种规定,

如"不连他屋","不余杂物","唯置香炉、香灯、章案、书刀四物"等等。

作为五斗米师,家中自应设有静室,一般称之为治,大概是因为道师有统领道众之责的缘故。师治可设厨会,为道民求福,为病者救度,为亡人解罪过。厨会又叫饭贤,因为要设馔请清贤道士若干人,一同为主人烧香求福。此外,在每年规定的一些会日,还要举行祭祀祖师、交纳道米等例行的宗教活动。

为了便于统领徒众,五斗米道又设置了一些不同等级的治所,其中直接属于天师的有二十四治,后来第三代天师张鲁雄据巴蜀汉中时,就是用这套组织机构施行统治的。

治的建筑原是很简陋的,不过是一些茅屋或瓦屋,唐释明概在《决对傅奕废佛僧事并表》中曾说到:五斗米道"杀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坛,戴以草屋,称二十四治",即指出了这种情况。另外,道经中判罚犯科法的道民交纳建天师治的覆屋草或屋瓦的规定,也证实了这一点。后来道经中对立天师治有很多详细的规定,如"地方八十一步,法九九之数,唯升阳之气。治正中央名崇虚堂,一区七架六间十二丈,开起堂屋;上当中央二间上作一层崇玄台"(《要修科仪戒律钞》引《太真科》)等等。

静室、靖室,取名于安静之意,并不是某种特定建筑物的专名,所以在魏晋时期还可以见到一些其他名称的道室,如李宽的道室称为庐,杜明的道室称为治(借用原来师治之名);一些山居修道者,住在山洞中,有的还在洞旁筑有馆舍,如许翙"即居方隅山洞方园馆中"(《真诰》卷二十)。另外,魏元帝时终南山还筑有楼观。

南北朝时期,寇谦之、陆修静等改革道教,创立了新的南、北天师道,吸收儒家封建礼法制定斋仪,以服饵修炼求仙,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欢迎,北天师道更一度成为国教。于是有很多崇信道教的皇帝纷纷延请有名的道士,并在都邑为他们修建居住修行的处所。南朝有刘宋时修建的崇虚馆、齐代的兴世馆、梁代的朱阳馆等;在北朝有后魏太武帝为寇谦之建的五层重坛道场,北周建有通道观、玄都观等。

隋唐时期道教在上层社会极为盛行,尤其李唐王室奉老子李聃为先祖,崇道风气更盛,所修道观极多(唐朝不再称馆),据《唐六典·祠部》记载:"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此外,唐高宗还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时还在太清宫建玄宗像,侍立于老子塑像之右,后来又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陪祀老子,更显示出对老子的尊宠。既然老子被封为"皇帝",唐初六帝都要做他的陪侍,于是道观也就仿照皇宫之名而升格为道宫了。以后的各个朝代,都有大事修建道观之举,而大的道观多以宫称之。

道馆之名,有的学者指出是承袭了山居修道者的馆舍之名。我认为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借用古时国家所设的接纳招待宾客的馆舍之名,以示对道士的优礼。南北朝时,终南山楼是北方道法重镇,这是北朝庙宇称观的原因之一。唐代奉老子为皇帝,是称为道宫的一个原因。而后来宫、观取代以往诸名成为道教庙宇的通名,乃因为它们古时就是祀神祠宇之名,与道教供祭神灵有相通之处。

皇帝召请道士,并为他们修建馆、观、宫等奉神修道之所,标志着道教得到了官方承认,因而导致了道教的兴盛。由于是皇帝下令用国家财产修建,其道观规模都很庞大,后魏太武帝为寇谦之建坛、宇,并供养道士一百二十人;唐玄宗免除茅山紫阳观附近二百户百姓的租税,令其专管观中洒扫之事,都说明庙宇不小。宋真宗时建玉清昭应宫,"总二千六百一十区",更是洋洋大观。

唐宋时期修建道观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其建筑形式、格局等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时各宫观建筑虽不相同,但都是由供奉神灵的殿堂、斋醮祈禳的坛台(有的是举行斋醮时临时建)、讲经诵经之室、居住之室等

几部分构成。这种建筑格局以及宫殿式的建筑形式、皇宫式的中轴线布局,都为后世所承袭。此外,道观内普遍供奉神像,始于宋真宗时,后世沿之不改。

宋代以后,道教庙宇的名称和建筑形式都没有大的变代。十二世纪中叶,注重清修的全真派在北方兴起,适应其严格修行(出家、不许结婚等)的理论,对宫观制度加以改革,建立了十方丛林与子孙庙两个系统。

全真教的子孙庙又称为小庙,它属于私有财产,故没有接纳十方道众的义务;庙中师父即住持,又称当家,兼管庙中宗教事务和庙产;师父一旦故去,庙产即由继承法嗣的徒弟接管,师徒代代相传,犹如家产的子孙继承(子孙庙之名缘此);师父可以收授弟子,称道童,教以道经和经咒,待十方丛林开坛传戒时送去受戒后即为正式道士,但小庙师父自己无权传戒。

全真道十方丛林是依照佛教的丛林制度而设立的(它的首领如方丈、监院、都管等名目就是从佛教那里来的),又称为十方常住。其庙产属于本教或其某一派公有,凡是道教徒都有在此挂单居留的权力(经过一定手续考核);十方丛林不招收弟子,专为小庙推荐来的弟子传戒;丛林内有一整套组织机构,主持宗教事务和管理财产的大小执事都由道众公议推举产生,不称职者也可公议罢免或处罚。另处,十方丛林还悬挂钟板作为日常作息号令,道众依号令做日常宗教功课,项目繁杂,管理严格,是全真道小庙和正一教道观所不及的。

岁 星 祭 祀

位于北京西便门外的道教名观——白云观,每年旧历正月都有盛大的庙会,尤以初七、初八日最热闹,众多的士女都来到元辰殿祭拜岁星,向自己的本命星辰烧香礼拜,祈求一年平安。这种祭拜岁星的习俗,又称作“顺星”。

“顺星”的习俗由来已久,是伴随着元辰殿(瑞圣殿)的修建而兴起的。元辰殿系金代十方大天长观遗留下的一座建筑,它始建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当时因金章宗母亲瑞圣皇太后得病求医,求治不愈,于正月初八日祈祷丁卯元辰神,疾病痊愈。于是敕建丁卯瑞圣殿,中奉丁卯元辰神像,左右仿原十方大天长观延庆殿(早已不存),陪祀六十元辰神像。由此,遂有向元辰神祈福免灾之说,称之为“顺星”。所谓“顺星”,就是即使是不顺利的流年,通过祈祷,得到星辰保佑,就可变为顺利之意。后来,逐渐演变成以正月初八日为特定的顺星佳节,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到了元代,十方大天长观更名长春宫,“顺星”之俗更盛,但元辰殿的主神丁卯元辰像几经变化,最后形成瑞圣殿中奉的主神为后土娘娘像。后土在道教中为四御之一,乃掌天地、山川、诸星之女神。后土两侧立“上辅先生太公姜真君神像”、“上清先生灵宝廖真君神像”。

明初长春宫废圮。永乐时敕建白云观,瑞圣殿被保留下来,成为白云观的西路殿堂。明末白云观再废,清初道教全真龙门派第七代宗师王常月重修白云观,改瑞圣殿为元辰殿,民间称之为“顺星殿”。这个时期白云观有中兴之势,香火极为隆盛。参加顺星会与燕九节成为当时京畿仕商农工的两大乐趣,届时游人如云,老幼争相瞻仰拜谒,经年不衰。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近代。

元辰殿的六十甲子托沙神像毁于“文革”期间。幸好观内保存的原清宫如意馆画的六十甲子像完好无损,1983年,中国道教协会决定以如意馆画像为蓝本,重塑六十甲子像。并将中位改为斗姆像,两侧为北斗星的左辅、右弼。新塑像为重彩泥塑,像高三尺九寸,均为座式。六十甲子神像有文、有武、有喜、有

怒，神态各异，生动活泼，栩栩如生。每位神像手中持有一物，或枪、或剑、或琴、或简笏等等，这些都是每位本命元辰的历史地位以及其法力的象征。

下面再谈谈六十甲子与太岁神和祭星（顺星）的习俗仪式。六十甲子由天干地支相配而成。干支的名称早在甲骨文时代就有记载，《壹是纪始》有“制干支始于伏羲”之说。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干和十二支顺序相配，由甲子起，至癸亥止，满六十为一周。故名六十甲子。我国古代很早就用干支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周而复始，循环使用。

战国时期天文占星家根据天象纪年，即星岁纪年法，星指岁星，岁指太岁。大概在西汉时，又根据岁星纪年，推算组合成六十个年名，每年有一个岁星值年，周而复始，六十年为一周。道教称值年岁神，加以供奉，六十个岁神即六十甲子辰神。根据历史记载，我国祭星活动早在殷周时代就有，但年立星神最早为北魏太祖时，《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载：“按礼志太祖立星神，一岁一祭”。又曰：“高祖太和三年祷星于北苑。”又载：“太和十五年诏罢城北星神祠。”又据杜佑《通典》载，北魏道武帝时已立“神岁十二”专祠。说明在北魏时每年要祭祀星辰，并且还专门设有祭祀岁星神的祠。

岁神又称“太岁”，因岁神为值年之神，掌理人间一年祸福，称“值年太岁”（俗称为“岁君”）。后来道教又把太岁称为“大将军”，《神枢经》曰：“大将军者，岁之大将也。”

在道教中六十甲子神均有真名实姓。关于他们的姓名，史书中没有记载，可能是后人加上的。白云观元辰殿的六十甲子神像名称与道藏所记甲子本命元辰的姓名均不相同。究竟这些姓名来自何时，根据为何，都尚待考据。但从六十甲子前五位神名来说乃按五行、五方而立名的，例如：甲子为金，其名金（辨）；乙丑为木，名（陈）材；丙寅为火，名耿（章）；丁卯为水，名沈（兴）；戊辰为土，名赵（达）。《云笈七签》中有干支神姓名，但也与此不符。例：甲从官阳神也，姓宾名远生；乙从官阴神也，姓扶名司马，丙从官阳神也，姓王名师子；丁从官阴神也，姓洪名寄生等。

大概在汉代时期术数家拿十二种动物来配十二地支，子为鼠、丑为牛、寅为虎、卯为兔、辰为龙、巳为蛇、午为马，未为羊、申为猴、酉为鸡、戌为狗、亥为猪（见《论衡·物势》和《论衡·言毒》）。后以为某人生在某年就肖某物，如子年生的肖鼠，丑年生的肖牛，……称为“十二生肖”，也叫“十二属相”。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四则谓十二属相之说起于东汉。

奉祀本命元辰的风俗可能是始于辽代，《方朔占书》载：岁后八日，初一鸡日，初二狗日，初三豕日，初四羊日，初五牛日，初六马日，初七人日，初八谷日，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阴则灾。古人迷信，认为初七这一天天气如果是睛天，那这一年人口平安，大吉大利。由此正月初七日成为人们祀本命元辰的日子。但白云观祭元辰是由祭奉丁卯本命元辰开始的，而丁卯降诞日为旧历正月初八，初八日本是祈谷之日，故更含有人谷并祈，“上祈人寿年丰，下祷万事如意”之意。

按照白云观旧制，每年正月初八日晚举行祭星仪式，届时设坛，斋供一桌，币帛五份，定香二束，蜡烛两对。坛中间要布三台（上、中、下），左辅、右弼、七星，共十三盏灯，另燃灯花108支。经师们跪叩礼拜，诵北斗经，顺星诰。按照道教教义，更认为修真炼性，须致力于本命元辰，此本命元辰即一灵真性之所在，惟能致力于此，除去杂念私心，方能长寿永生。

现在，求神保佑的人少了，北京人春节期间往北京白云观元辰殿“顺星”这一传统，已成为人们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一项活动和一种节日习俗。

道 教 音 乐

道教音乐是道教在斋醮活动时使用的音乐,又称“法事音乐”或“道场音乐”。

道教音乐不但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和较高的艺术水平,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和群众基础,而且它的产生、发展和我国民族音乐有密切的关系,因而是一种具有中国特点的宗教音乐。

道教创于东汉,在早期科仪中道教音乐的资料,现在能见到的不多。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寇谦之所得的“云中音诵”,即“华夏颂”、“步虚声”,是道教音乐较早的书面记载。

唐代道教因受帝王之崇拜,盛行一时。高宗令乐工制作道调;武后重视道教,曾一度把内教坊改名为云韶府;玄宗不但令道士、大臣进献道曲,还亲自研究道教音乐,纠正当时道士演唱的一些讹错。同时,唐代道教音乐还不断吸收民间音乐、西域音乐的养分,例如把《无愁》改为《长欢》,《苏罗密》改为《升朝阳》,《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等等。道教音乐在唐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

唐末五代时期,道教音乐继续吸收民间音乐。到北宋时,出现了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道教音乐的谱集——《玉音法事》,其中记录了从唐代传至宋代的道曲共50首,是一份极其重要的道教音乐的文献。

明代道教音乐不但有新的发展,而且更加规范,可以说已进入“定型”阶段。明成祖时,又出了一本道教音乐的谱集——《大明御制玄教乐章》,该书用我国传统的工尺记谱法,记录了道曲14首。从中可以看到,明代道教音乐极其丰富,既有承袭唐、宋、元之旧乐,又有吸收南北曲音调的新制道曲,还有直接采用民间小调和音乐,如“清江引”、“采茶歌”等等。明末清初的叶梦珠在其著作《阅世编》卷九中,列举童年所听的道教音乐与老年所看到听到的道教音乐中的差别,对道教音乐发展变化之快很不理解,他惊叹晚年所听的道教音乐“引商刻羽,合乐笙歌,竟同优戏”。可见,明代道教音乐已经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明末以来,道教逐步衰落,但是民间的道教活动,仍然很流行。甚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末,道教斋醮仪式在江南及南方各省的农村中,仍然十分流行,这就使明代的道教音乐传统基本上保存至近代。

通过上面这一简单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到,道教音乐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它包含有独唱、吟唱、齐唱、鼓乐、吹打乐和器乐合奏等多种音乐形式,在斋醮法事中,这些形式不断更换,灵活地组合,恰如其份地表现出召神遣将、声势磅礴的场面;镇压邪魔、剑拔弩张的威风;盼望风调雨顺、求福祈愿的心情;清静无为、仙界缥缈的意境。为道教的斋醮增添了庄严而强烈的气氛,给人以“耳听仙乐”之深刻印象。道教音乐漫长的发展历史以及它的艺术成就,说明了它理应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精华的组成部分之一。

道教音乐作为一种宗教音乐,它与其它宗教的音乐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用音乐来渲染和加强宗教仪式的气氛,“赞”、“颂”采用庄严而节奏缓慢的旋律以及吸收民间音乐素材的创作方法等等。

但是,由于道教是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的,道教音乐势必也受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特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状况、民众的欣赏习惯、道教的教义和宗教仪式结构等的制约,因此,道教音乐必然会产生与其它宗教音乐完全不同的情况,显示出中国的民族宗教音乐的明显个性。首先,在演唱和演奏方面。道教音乐的诵唱和乐器演奏均由道士(即职业的宗教徒,相当于天主教、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担任。因此就要求道士不但要熟悉道教经卷,精通斋醮仪式,而且还要有演唱道曲、

演奏乐器、吟表(类似戏曲念白的宗教念白)、禹步(类似舞蹈的步法)等艺术的本领。随着历史发展,对于一个道士应有的艺术水平的要求也愈来愈高。所以,江南民间流传一句谚语说:“出一个秀才容易,出一个佳(能干)道士难。”就是说,一个道士不但要学会宗教的一套,而且在演唱、演奏上也要有较好的艺术水平,只有在唱、念、做、演奏乐器等艺术方面才能出众的道士,才有资格在斋醮法事中担任“都讲”、“高功”等较高的职务。因此,在道士学道过程中,正一派道士从小就要化费大量的时间习艺,这种习艺从教授的形式到学习的内容,几乎和近代戏曲科班相差无几。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南方诸省和江南一带正一派道士,实际上大都具有初级的艺术水平。而且在一大群具有初级艺术水平的道士中还不断产生一些著名的音乐家。如著名的民间音乐家阿炳,他的《二泉映月》是家喻户晓的名曲,他从童年至三十岁左右,都是无锡雷尊殿的道士,他的艺术生涯中有较长的一段时间是从事道教音乐,从艺术学习的规律上来看,这位艺术家曾经受过二十余年的道教音乐的熏陶,道教音乐要求道士演奏、演唱的特点,使阿炳打好了“童子功”的艺术功底。

其次,在音乐和宗教仪式的关系上。中国道教音乐,特别是正一派道教音乐在宗教仪式——斋醮法事中的运用是贯穿性的,由于道教宗教仪式的结构和内容极其繁杂,所以,与此相对应的道教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也就十分丰富,且具有内在的连贯性。从唐代以来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道教音乐不断吸收其它音乐,使音乐和斋醮法事内容的结合日益紧密,形式日趋多样,以致斋醮仪式由开始到结束,包括中间情节的变化,都由音乐把它贯穿起来。道教诵唱歌曲约在元代之前,逐步形成了“步虚”、“颂”、“赞”、“偈”等几种格式,其每种格式有多种的曲调和词。它们在道教斋醮中,并不是单独使用一种词或一首曲,而是以法事情节组合串连各种步虚、赞、颂、偈等道曲。比方说我们把每首歌用英文字母替代的话,在这一出法事中,音乐的组合是 A—B—C—D,而在另一出法事中则是 A_1—E_2—C_3—F_2(字母下的阿拉伯数字代表同歌异词)。这种类似戏曲板腔运用的方法,我称为是道教音乐的贯穿性和情节性的特点。而当具有这种特点的音乐同念白、诵经腔、禹步、吟表等组合在一起,确实极似中国戏曲的一般模式,只不过道教音乐如果以北宋出现的谱集《玉音法事》中已有 50 首道教歌曲的情况来看,那么这种模式的产生,还在戏曲、戏文之前。所以,明末清初的文人观察道教斋醮的演习,像叶梦珠所说“竟同优戏”。他把道教斋醮比作戏曲,是并非偶然的。即便是近代,江南道教的斋醮也还是这样,在过去一般农民的心目中,看法事就像看一场戏或一场音乐剧一样,而实际上是一场宗教仪式的“演出”。

最后,在道教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关系方面。道教音乐是一种带有中国各地地方音乐特点的道教音乐。这个地方音乐特点表现之一:同一主旋律的赞、颂、步虚、偈等,各地的行腔、旋律装饰(民间音乐称之谓“加花”)都带有本地地方音乐特色而演唱起来各不相同。例如同一首步虚曲调,在演唱上,苏州与上海不同,带有苏州地方音乐的特点,成为苏州腔。地方音乐特点表现之二:同一首词的赞、颂、步虚、偈等,各地选用本地音乐特点的旋律,词同曲不同,例如同一首《三清偈》,广东的是广东曲,台湾是台湾曲,上海是上海曲,各不相同。道教是产生在地大人多、方言和音乐各地不同、民歌和民间舞蹈风格各异的中国,因此,它的斋醮科仪有统一的经典,而它的音乐却没有统一的规定,古代道教这样做,是明智的,是符合人民音乐欣赏的习惯的。道教音乐具有地方音乐的特点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和斋醮活动地点以及音乐在斋醮中的作用等关系甚大。道教的斋醮仪式,特别是江南和南方诸省的正一派道教的

斋醮,除了少量在宫观中进行,绝大多数是在地方民众的集会和信众家中进行的,即在“庙观以外”的地方活动。同时,道教音乐配合斋醮,除了感动神灵之外,还有安抚和警戒信众的作用,《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八引“太真科”中说:“斋台之前,经台之上,皆悬金钟玉磬……非仅警戒人众,亦乃感动神灵。”在信众中活动又要使信众受到触动,如果不以他们熟悉的方言及音乐曲调,怎么能达到目的呢?道教音乐的地方音乐的特点,正是顺应斋醮活动的地方以及它对音乐作用的要求的实际情况,以及民众的欣赏习惯的条件下,不断地发展和积累,致使中国道教音乐出现了极其丰富而复杂的局面。道教音乐带有地方音乐的特点,不但受到信众的欢迎,反过来,它又对道教的发展传播以及与农民的联系等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诚然,道教音乐的特点远不止以上三点。例如:道教的斋醮仪式中往往穿插进不属于宗教音乐范畴的民间音乐、戏曲等。道教音乐应用的场面往往很难唱歌奏乐,元人所编《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三云:“施主追悼之际,惨戚装怀,讴歌词曲,尤为不便。”但在长期的实践中,道教音乐从“不便”中形成了一整套的解决办法,使哭丧变为闹丧,在音乐的艺术创作上呈现出一些规律,等等。

应该看到,道教音乐作为一种宗教音乐,与欧美的宗教音乐有相同之处;同时它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有与欧美宗教音乐的不同之处。因此,研究和估价道教音乐,我们不能生搬硬套欧美的宗教音乐理论,而应该从客观事实出发,以中国道教音乐的历史与现状、内容和特点作为基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分析,总结出我们有关中国宗教音乐的理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道教音乐的中国特点的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道 教 史 略

产生、发展和演变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产生于东汉中叶。东汉王朝从和帝刘肇开始，政治上逐步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争夺政治权力，把持朝政，使东汉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和黑暗，整个社会一直动荡不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特别是在外戚、宦官两大集团激烈争夺政权的过程中，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农民丧失土地以后，一部分沦为依附于豪强地主的佃农或雇佣，受着极其残酷的剥削，更多的农民则变成无家可归，辗转道路的流民，处境尤其悲惨。再加上当时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疫病流行，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造成人民深重苦难的现实世界，就是宗教赖以滋生的气候和土壤。"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页)一方面，广大人民在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常常幻想有一种神灵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宗教的身上；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也极力企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借以消弭随时可能发生的反抗斗争，同时还希望利用宗教来为他们的统治祈求长治久安和个人的益寿延年。于是，宗教的产生，就成了客观的社会需要。可见，道教产生于东汉之际，并不是偶然的。

当然，这些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仅是说明道教所赖以产生的气候和土壤，要回答道教如何产生的问题，就需要进一步考察它的思想渊源和酝酿、孕育的过程。

道教的思想和方术，其渊源是"杂而多端"的，大体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古代的宗教思想和巫术。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甚为崇拜，视之为神灵，对它们进行祭祀和祈祷，并由此而逐步形成了一个天神、地祇和人鬼的神灵系统。道教承袭了这种鬼神思想，并将这个神灵系统中的许多神灵作为道教神灵的组成部分。古代殷人认为，卜筮可以决疑惑、断吉凶，巫师可以交通鬼神。依仗巫术可以为人们祈福禳灾。这种巫术，也为道教所吸收和继承。

二、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早在《庄子》和《楚辞》里，有关神仙思想的言论已屡见不鲜。稍后，在燕齐一带出现了鼓吹长生成仙之术的神仙方士。这种神仙方术原无系统理论，这些方士便利用战国时齐人邹衍终始五德之运的五行阴阳学说解释他们的方术，从而形成了所谓神仙家，即方仙道。传说崇尚方仙道的宋毋忌等都向往神仙。以后神仙家的信仰和方术皆为道教所承袭，神仙方术衍

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术，神仙方士亦逐渐衍化为道士。

三、谶纬神学。“谶”是一种宗教性的预言，即所谓“诡为隐语，预决吉凶”。起源较早。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即曾利用谶语。纬是相对于儒家经典而言，即用图谶的观点结合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推验灾异祯祥，这种风气是由董仲舒开其端，并逐步形成为谶纬之学，致使儒家经典宗教化，孔子亦被神化。西汉末至东汉初，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谶纬之学盛行，儒生与方士逐渐合流，造成极为浓厚的宗教气氛，这对道教的孕育和出现，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道教融合了谶纬思想，用他们神化孔子的办法来神化老子，并吸收谶纬术为其方术之内容。

四、黄老思想。黄老学说起于稷下道家学者，他们同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道家创始人。至汉初，文、景以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治黄老之学者蜂起。黄老思想包含很多神秘主义的因素；加上治黄老之学者，本来就有许多神仙方士，他们以神仙长生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对这些因素作出宗教性的解释，使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相结合，而向神仙方术的方向发展。至东汉，进一步将黄帝、老子神秘化，又由着重尊崇黄帝，转而推崇神化后的老子，逐步形成崇奉老子为神明的黄老道，并与方仙道逐步合流，成为早期道教的前身。

下面谈谈早期道教的两大派别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是张陵于东汉顺帝时（126—144）在西蜀鹤鸣山创立的，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自称出于太上老君的口授而造作道书。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在川西北和陕南一带传道。太平道是事奉黄老道的张角于东汉灵帝时（167—189）所创，以《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为主要经典，以“中黄太一”为其奉祀之至尊天神。教徒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这两个早期道教的大派别，主要是在下层群众中间流行，都受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部分反映劳动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思想影响，并与农民反对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等要求相结合，为农民起义所利用。太平道于中平元年（184）发动了黄巾起义，一时“八郡同时俱发”，“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被东汉王朝残酷镇压以后，传授不明。五斗米道亦与黄巾起义东西呼应，张陵之孙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统治将近三十年，自号师君，以鬼道教民。并设义舍为过往行人免费提供食宿。有隐瞒小过者，须修补道路百步，将功抵过，略示惩戒。对犯法者，宽宥三次，尔后再犯，方处以刑罚。史称“民夷便乐之”，朝廷“力不能征”。献帝建安二十年（215），为曹操所灭。

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曹操，深知下层人民可以利用道教来进行宣传和组织，造反起义。他吸取东汉王朝的教训，对道教采取了镇压与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把一些道徒方士“集之于魏国”，以防止他们“挟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在张鲁投降之后，一方面对张鲁及其五子和他的臣僚都拜官封侯，利用他们的影响来笼络群众；另一方面又采用调虎离山之计，把张鲁及其子女和臣僚以及汉中人民大量北迁，对五斗米道的根据地进行瓦解。

此时，天师道内部也开始分化。张鲁在迁到邺城的第二年即死去，五斗米道失去统一的领导。于是，北迁后的祭酒主者们人人各自设治传教。这样，一方面天师道在北方广泛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又同时陷入组织涣散、纪律松驰、思想紊乱的状态，从此便开始发生分化。两晋南北朝时候，这种分化日益加剧。一部分向上层发展，参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活动。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对民间早期道教进行改造。东晋葛洪系统总结战国以来神仙方术的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为道教构造种种修炼成仙方法，并建立了一套成仙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

容，对后来道教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他攻讦民间早期道教，诋毁农民起义，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宣扬道教徒要以儒家的忠孝仁恕信义和顺为本，否则，虽勤于修炼，也不能成仙，为上层化的官方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高级士族参加道教的也日益增多，出现了许多天师道世家。这些高级士族参加道教以后，必然把他们的思想也带到道教中来。反映这种思想的上清、灵宝等派别遂相继出现，并迅速得到了发展。

道教在上层化的同时，民间仍然传播着通俗形式的道教，并不断发动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西晋时，道士陈瑞首先在巴蜀犍为地区利用天师道组织发难。继之而起的李特、李雄所领导的流民起义，亦与天师道有密切关系。他们在青城山天师道首领范长生支持下建立了成汉政权，凡经六世四十七年，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3)才被桓温所灭。在晋代，杜子恭一派的天师道，在江南地区也颇有影响。东晋末，孙恩、卢循利用这派组织发动了起义，并提出了“诛杀异己”的口号，诛杀了高级士族中“世奉张氏五斗米道”的道徒王凝之，表明这时道教内部存在着改造与反改造的激烈斗争。

对民间早期道教的成功改造，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北魏太平真君年间(440—450)，嵩山道士寇谦之在崇信道教的魏太武帝和宰相、儒士崔浩的共同支持下，自称奉太上老君的意旨，“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制订乐章诵诫新法，“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佐国扶命”，代张陵为天师，是为北天师道；在南朝刘宋，则有庐山道士陆修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葛玄、葛洪)”，搜罗经诀，尽有上清、灵宝、三皇各派经典，遂“总括三洞”，汇归一流；又依据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制度，并吸收佛教修持仪式，广制斋戒仪范，以改革五斗米道，“意在王者遵奉”，称为南天师道。道教的教规、仪范经过寇谦之和陆修静订之后，便逐步定型。在此基础上，陶弘景继续吸收儒、释两家思想，充实道教的内容；构造道教神仙谱系；叙述道教传授历史，主张三教合流，对以后道教的发展影响甚大。经过南北朝时候的改造，遂使上层化的官方道教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步得以健全和充实，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御用工具，以后便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崇奉和扶值。

从隋唐到明代中叶，均系道教的兴盛和发展时期。只是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一发展过程又呈现出各有不同特点的两个阶段。隋唐到北宋，是道教教理不断深化和向前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这时整个国家基本上是统一的，虽然有过五代十国的分裂，但为时不久。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在唐宋时期也较为繁荣。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道教本身来说，一方面由于它经过魏晋南北朝与儒、释之间的大辨论之后，促使它加强教理的研究，进一步吸收儒、释各家的思想来充实自己的理论；道教内部南北不同的学术流派亦互相交融，从而使它的教理向纵深和细密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唐宋时代的许多封建统治者，都奉行崇教政策，利用道教为巩固他们的统治服务，他们在大力提高道教地位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对道书的研究，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来加以推动。例如，设立道举制度，规定贡举人皆须兼通道经，并把《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定为“真经”，作为“明经”科的内容之一进行考试，规定士庶均须家藏《道德经》一本，又置崇玄学和玄学博士，并配置生员，定期宣讲道书，令群官百僚观礼，不断派人收集和整理道书，加以缮写或刊印，颁布天下，以广流布，便于学者研习，又亲试“四子”举人和带头为道经作注，以及对道士的学业进行培训和考核，不才者勒令还俗，……如此等等。上之所好，其下必甚。所有这些措施，不能不造就一时的风尚，使对道书的研究蔚然成风，道书的造作日

益增多，道教的理论大为发展，著名的道教学者相继出现。如唐之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施肩吾，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彭晓、谭峭、闾丘方远，北宋时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贾善翔等，都是道教史上或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他们或者创为论著以阐述自己的学说，或者通过整理注释道经以发挥自己的思想，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在道教的教理、历史、修持方法和医学、药物学、养生学以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其中许多著作不仅对当时道教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且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也有相当的影响，对宋代理学的形成起了更为直接的作用。

南宋偏安，先后与金、元南北对峙，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这种形势下，道教内部也随之宗派兴起，互争教会的领导权，从而形成与前一阶级显著不同的特点。在南方，除旧有的龙虎天师、茅山上清、阁皂灵宝等三山符箓派仍然受到南宋统治者的尊崇而外，自称独得异传而先后别立宗派者也甚多，如神霄派、清微派、混元派(天心正法派)、东华派、净明派等，多系从三山符箓分化而来。还有所谓金丹南宗者，专主内丹修炼之说，奉张伯端为祖师，亦可称之为紫阳派，后来归入全真。这些派别大多倡导儒、释、道三教的同源一致，大量融合儒、释思想，特别是以援引、融摄理学思想为其特色，这与当时南方理学影响愈来愈大有关。在北方，则有金大定七年(1167)由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亦认为三教同源，主张三教合一，尤以更多地援引、融摄佛教思想为其特色。此外，金初还有刘德仁创立的大道教，后称真大道教，萧抱真创立的太一道，皆一度在北方流传，但历时不久，即衰落下去了，唯有全真道，由于受到元代统治者的支持而盛极一时。天师道为与新起的全真相抗衡，遂与上清、灵宝、净明等符箓派逐渐合流。到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被授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符箓各派遂由正一派所统一。此后，道教遂正式分为正一和全真两大宗派，在明代继续流传。明代统治者对道教特别是正一道十分重视，尤以明世宗为甚，自号“玄都境万寿帝君”，亲自斋醮，任命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担任朝延重要官职，深入宫延，参与朝政，使政教发生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明代对道书的整理也十分重视，正统十年(1445)和万历三十五年(1607)所编纂的正、续《道藏》，共5485卷，对道教经典的保存和传播，起了较大作用。南宋以后，特别是明代，道教的各种劝善书逐渐盛行；用诗词等文艺形式来表述道教教理的著作以及宣扬道教法术的神魔小说，也日益增多，一时道教文学特别兴盛，这盖与当时部分文士不愿仕金、元而隐居入道者较多有关。

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道教，也随之逐渐走向衰落。但在上层化的官方道教日趋衰微的时候，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活动却很活跃。以各种宗教互相融合为特点的民间秘密宗教，虽然派别繁多，思想渊源复杂，但其中有些派别在思想上、乃至在组织上，同道教仍有一定的关系，属于变相的道教。如清初出现的八卦教，便是属于这类秘密组织之一，后来的义和拳，和道教也有一定的关系。

上面对道教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作了简要的介绍。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曾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化学、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以及民俗、民族关系和农民运动各个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它所积存下来的大量经籍文献，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全面了解我国的历史，探讨我国哲学思想和科学、文化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社会主义两上文明建设服务，有必要对这一亟待开辟的学术领域进行认真的研究。

五斗米道和太平道

道教是我国自创的一种宗教。关于道教的起源问题,后世道教徒编造过许多说法。如起初有借托老子为道教创始人的说法,以后在佛教传入后,受到佛教关于佛国净土迷信的影响,道教徒也编造出一套天宫神仙世界的说法来与之抗衡,并抬出一个据说在天地未分之前就已存在的所谓“元始天王”(或“元始天尊”)作为道教的教主,而老子则成了“元始天尊”所引渡的一个“得道尤精”的“天仙上品”(见《隋书·经籍志》、葛洪《神仙传》)等。其实,道教是从我国古代原始宗教的巫术,特别是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至东汉末年,才开始出现并形成最初的道教组织。

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其主要内容是追求长生久视,肉身成仙。方士们或倡导吐纳导引,或鼓吹炼丹制药,或从事巫祝术数等。东汉时期,神仙方术逐渐形成两个派别,一派以内修炼丹为主,如相传为东汉桓帝时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作。这一派以后发展为道教中的“丹鼎派”。另一派以符箓咒语为主,如相传为东汉末出现的《太平经》(又称《太平清领书》),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作。这一派以后发展为道教中的“符箓派”。内修丹鼎派的炼制外丹,是需要有相当的财力、物力才能做到的,因此它在统治者、上层社会中比较流行。相反,画几张符箓,造一碗咒水则制作方便,因此它结合着“治病”,在下层社会劳动人民中有较大影响。

东汉末年由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和由张角创立的“太平道”,都是利用符箓咒水辟邪驱鬼,为人治病,从而在下层社会劳动人民中组织起最早的道教团体的。“五斗米道”最初具有某些劳动者反抗官府、相互救济的积极精神,因此被统治者诬称为“米贼”。而“太平道”则以宗教的组织形式,发动了汉末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

“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为东汉顺帝时人,原籍江苏丰县,客居四川,学道于鹤鸣山(或作“鹄鸣山”,相传在四川大邑县境内)中,自称“天师(后来道教徒称他为“张天师”,“五斗米道”也称作“天师道”),借托太上老君口授,造作“道书”,传授道徒。据《后汉书·刘焉传》、《三国志·张鲁传》等记述,因为“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所以人们称其为“五斗米道”。又说,其道首为人治病,痊愈后病家要出五斗米,所以也称为“五斗米师”。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行道,张衡死后又由其子张鲁继之。经过张陵到张鲁三代的传道,又加上与地方军阀势力的结合,五斗米道在川北,汉中有很大的势力。据《张鲁传》载,张鲁“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影响十分大。在他把持的汉中政权中,他实行政教合一,“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即按宗教组织系统治理民政。张鲁等把初学道者称为“鬼卒”,把入道较久,“受本道已信”的道徒称为“祭酒”,使他们“各领部众”,而在其上又设有“大祭酒”,层层统领。这些祭酒在他们管理的范围内要设立“义舍”、“置义米肉”,使“行路者量腹取足”。就这些情况看,“五斗米道”带有一定的下层劳动人民要求互助的性质。但需要指出的是,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政权还是依靠于东汉朝廷和地方军阀的,后来又投降了曹操,因此不可简单视为“农民政权”。又据《三国志》注引《典路》等记载,汉中在张鲁入据之前,已有张修在该处传五斗米道,他也是以符咒为人治病,并令祭酒以《老子》五千言教习道徒。汉献帝中平元年,他率领道徒起义,与黄巾军相呼应。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张修亦亡。

“太平道”是以崇奉《太平经》而得名的。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述,在东汉顺帝时,一名叫宫崇的道士向朝廷进献他老师于吉(有的史书作“干吉”)在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太平清领书》,但被认为其中“多巫觋杂

语”,“妖妄不经”,未予重视。又说,以后张角“颇有其书”,利用这部书组织太平道,发动黄巾军农民起义。据《后汉书·皇甫崇传》记载,张角为钜鹿人,他在汉灵帝光和年间传播“太平道”,通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派遣弟子到各地去“以善道教化天下”。十余年间,徒众发展至数十万,分布于全国各州,组织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他们声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动了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因为他们起义时“皆着黄巾为标帜”,所以人称为黄巾军。“太平道”发动的农民起义,目的是明确的,即推翻“苍天”(刘汉皇朝),建立“黄天”(农民理想的政权),实现“太平”(均平)。可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起义最后为曹操率领的地主武装所镇压。

关于现存《太平经》是否就是于吉、张角所崇奉的《太平清领书》,以及《太平经》究竟反映了哪个阶级的利益等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太平道”以“太平”为名,以“黄天太平”(《三国志·孙坚传》)为纲领,显然是与《太平经》有关的。《太平经》中的一些说法,曾为张角领导的太平道起义军所利用。如《经》中说:“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太平经合校》卷 67)等等,即可为太平道的平均要求所借用。又如太平道所以定在“甲子”日起义,也是与《经》中所谓“甲为首,子为本”,“今甲子天正也”等说法有关。

由上述情况看,东汉末年形成的原始道教,主要活动于下层劳动人民中,并与农民反对封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等要求结合在一起。它的宗教活动内容还比较简单,主要是古代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的“阴阳五 行”、“巫觋杂语”、“符水咒说”、鬼神崇拜等,在宗教理论方面虽说有象《太平清领书》这样的经典,以及奉读《老子》五千言等,但总起来说,也还是比较简单略、粗糙,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道教教理。因此,还带着较多的民间宗教的色彩。

魏晋以后,统治者注意了对原始道教的利用和改造。这时除了继续在民间流行着的道教外(如东晋孙恩、卢循等仍然以五斗米道来发动并组织起义),在当时许多门阀士族中也流行起来,如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王氏家族就“世事五斗米道”。而为了适应门阀士族的需要,对原始道教的改造就提了出来。晋代著名道士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北魏的寇谦之等都是对原始道教进行改造,使道教适合门阀士族统治者的需要,使道教的教理、教规、教仪系统化的重要代表。如寇谦之即假托得到太上老君的旨意,命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指张陵、张衡、张鲁)伪法”,提倡“专以礼度为首”等等。经过他们的改造和发展,“天师道”(即五斗米道)成了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道教正统了。

汉魏六朝时期

中国在秦汉时期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并且确立了以儒家的经学(即经董仲舒改造之后的神学化的新儒学)作为封建专制国家正统的官方思想意识形态。但是在东汉后期,这种政治与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局面开始遭到了破坏。东汉王朝自顺帝之后,政治日益腐败,宦官专政、外戚当权,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人民群众流离失所。严重的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的激化,终于导致了汉末农民大起义和军阀豪强的割据战争,使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趋于崩溃。东汉以后,经过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的统一,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天下大乱和南北朝对峙,直到 589 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先后经历了长达三四百年

之久的分裂混乱。在这段分裂时期，封建社会不仅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儒家学说虽然仍然是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但随着经学的衰落，其地位已相对削弱，而东汉开始形成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却兴盛起来，并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发展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新变化，为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鼎立，共同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局面，奠定了基本格局。

道教在汉魏六朝时期产生和演变为官方思想意识的过程中，曾先后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发展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于东汉后期，在古代黄老道家学说与神仙方术结合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原始道教的教义和民间道教团体。第二次是在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经过内部的重大改革，逐渐从原始的民间宗教团体发展成为较为完备成熟的官方正统宗教。这一发展过程，具有某些符合一般宗教发展过程中共同的规律性的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探讨。

据史记书记载，东汉顺帝时，琅琊方士宫嵩诣阙献上《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一百七十卷。这部道教最初的重要经典继承了古代道家与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并受儒家经学、谶纬神学、神仙方术，以及墨家某些政治经济主张的影响。其思想内容主要是神化老子为天神，宣扬“精气神”三者混一的长生成仙之术和“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兴国广嗣之术，为统治者巩固专制政权和享乐长生的需要服务，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均平财产、追求太平理想的愿望。它的问世，标志着早期道教基本教义初步形成，对汉代原始道教团体的创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东汉灵帝时，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利用《太平经》在中原地区传布太平道。奉“中黄太一”为最高神，以跪拜首过、符水咒语为人治病。十余年间，徒从增至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设立三十六方(“方”为教区组织)，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设渠帅统领其事。张角因后汉政治腐败、灾疫流行、人民困苦不堪的形势，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于灵帝中平元年(184)利用太平道组织农民起义，一时“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因起义军皆头著黄巾以为标帜，故史称“黄巾起义”。这次起义前后坚持了十余年，虽然后来被统治阶级残酷镇压下去，但东汉王朝也在起义的震动下开始走向灭亡。

东汉顺帝时，沛人张陵自号天师，学道于蜀郡鹤鸣山，创立了原始道教的另一派别——天师道。因奉道者须缴纳五斗米，故亦称五斗米道。张陵死后，其子张衡、孙张鲁相继嗣天师位，继续传道于巴蜀。五斗米道亦以请祷首过、符水禁呪为人治病，奉老子为教主，以《五千文》为经典，设立二十四治(“治”亦为传教区，主要分布于巴蜀汉中地区)，置祭酒统领道民，众多者号称治差别大祭酒。汉末张鲁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雄距巴郡、汉中近三十年，境内汉族与少数民族人民皆信向之。直至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入汉中，张鲁投降，五斗米道政权才被消灭。

《太平经》的问世、太平道在中原的传播、巴蜀五斗米道的兴起，是东汉原始道教形成过程中的三件大事。黄巾起义失败和汉中政权覆灭后，道教受到沉重打击，迅速发展的势头被暂时抑制。三国西晋时期，道教发展转入低潮。太平道从此消声匿迹，不再见于史籍记载。五斗米道被迫迁至北方，失去道领，处于组织涣散状态。江南和巴蜀地区虽然有一些小的民间道教组织活动，但也没有很大的影响。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四海辐裂，短期的统一安定再次破裂，现实世界的苦难不安促使道教在东晋南北朝再次兴起。这时不仅下层人民中信奉道教的更多了，而且统治阶级中也出现了大批信徒。东晋南北朝许多名门望

族，如北方的崔氏、寇氏、江南的瑯琊王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吴郡杜氏、晋陵华氏、吴兴沈氏、陈郡殷氏、丹阳葛氏、许氏、陶氏，乃至东晋皇室司马氏等等，都信奉天师道。这些门阀士族地主大批涌入道教，带来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思想情趣。我们知道，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政治上消极没落，精神空虚而又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一个腐朽阶层。显然，他们更醉心于那种追求长生不死，脱俗离世，闲散放浪，游历名山大川，采药炼丹，或者诵经礼拜于静室，海阔天空地冥思幻想的神仙道教，而对经典不备，教义简单，方术仪式粗俗，并且还不时鼓动起义造反的民间道教必然感到强烈不满，企图对之进行彻底地改造。于是，从东晋后期至南北朝前半期，首先由道教中的道教信徒发动，掀起了改革道教的运动。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除去旧天师道中原始粗俗的巫鬼道术、斋仪制度和鼓动造反的教义，同时吸收儒家和佛教的某些思想伦理和礼仪戒规，创造出一套新的教义理论和科仪制度，并从而形成了新的道派组织。

我们先看北方，天师道在经历了曹魏西晋十六国时期的沉寂之后，北魏初年，出身贵族的嵩山道士寇谦之在北方大族崔浩的支持下出面改革道教。他自称老君及其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山，赐以《云中音诵新科之戒》二十卷，《箓图真经》六十卷，以及各种道法，并授他天师之位，令他清整道教，辅佐北方泰平真君(指魏太武帝)。寇谦之的道教改革，“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废止祭酒官职的世袭制，激烈抨击民间道教冒充老君之号“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谋害国家的造反活动。把他儒家的纲常伦理列为道教戒规的内容，吸收佛教轮回思想为道教教义，并模仿佛教仪轨，主张立坛宇、修功德，诵经持戒。经他改革后的新天师道，“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炼”。424年，寇谦之以新经献给迁都平城刚刚即位的魏太武帝。翌年，于平城东南设天师道场，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440年魏改年号太平真君。442年，太武帝亲至道坛符受，封谦之为国师。至此，道教首次获得国家宗教的地位，并且以后在北朝一直受到崇奉。

在南方，东晋后期，吴郡大族杜子恭曾整顿五斗米道组织，清除某些巫觋之术，一时“远近道俗归化，十年之内操米户十万。”杜氏在江南复兴的五斗米道，在信仰与信徒的阶级成份方面均与原张氏米道有很大不同。不过，似乎他的改革还不太彻底，故后来东晋末孙恩、卢循等人又利用五斗米道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晋起义。起义失败后，南方五斗米道便一蹶不振，而新的道派却从此兴起了。

东晋末至南朝齐梁时，以江南句容附近的茅山为中心，兴起了一个新的道派——茅山上清派。它创始于刘宋道士陆修静，完成于齐梁道士陶弘景之手。而它的产生又可追溯到东晋时新出现 的几组道教经典。

早在两晋之际，出身于句容士族的葛洪总结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撰《抱朴子内篇》一书，详细论证了长生成仙的可能性，讲述了各种修炼成仙的方术，提出了以神仙养生之术为内，以儒术(纲常名教)应世为外，儒道兼修的修炼长生理论，并且猛烈抨击民间道教，诋毁农民起义。这部著作为后来东晋南朝的道教改革作了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葛洪《抱朴子内篇》曾提及和引用过《灵宝五符经》、《三皇文》等道书。东晋末年，葛洪族孙葛巢甫造构《灵宝经》数十卷，并编造了自葛洪从祖葛玄以来葛氏家族一直传承《灵宝经》的谱系，使《灵宝经》发展成一组重要的道教新经典。至刘宋陆修静又“更加增修，立成仪轨，于是灵宝之教大行于世”。另外，相传由葛洪岳父鲍靖炮制的《三皇文》，经后人改纂增益后，至陆修静、陶弘景时，也形成了一组有十余卷的《三皇经》。

东晋哀帝时，江南句容另一大士族许谧、

许翙父子伙同晋陵士族华侨、晋琊琊王(即后来的简文帝)司徒公府舍人杨羲等人炮制了另一组经典《上清经》。哀帝兴宁二年(364),杨羲等诡称魏夫人(原天师道女祭酒魏华存)及众真降授《上清经》三十余卷,以及诸真传记、修行杂事等道书。东晋末,又经许氏后人及道士王灵期等人改写增修,遂使《上清经》风行于世。后陆、陶等人亦曾搜集整理此经。

东晋时形成的三组新经典,为道教上清派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教义、方术及科仪制度。刘宋陆修静改革天师道,开创新道派,首先就是从整理这些道经,构造"三洞真经"(洞真《上清经》、洞玄《灵宝经》、洞神《三皇经》)体系开始的。《上清经》是茅山派的根本经法。上清派视天师为"旧道",斥责其巫鬼道术为"浊生之下道",自称修行得道可升入"上清天",其修行理论认为人身中各部位均有真神镇守,修道者思神服气、叩齿咽液、固精安神,辅以诵经念咒,可以内保脏腑,外却灾邪,飞升成仙。这种方术符合士族贵族的口味,大受欢迎。《灵宝经》法的特点是重符箓斋醮、济度众生,不仅自度,而且度人。这即适合于贵族,亦得中下层民众的欢迎,故流传更广。《上清》、《灵宝》,都大量吸收乃至直接抄袭当时翻译过来的佛经义理,如涅槃轮回、因缘业报观念,阴司三界之说等等,以充实道教教义。对儒家的道德规范、礼法制度和佛教的戒律仪轨也大量吸收改造,以构造道教的戒规醮仪、宫观生活制度等等。在这方面陆修静所作的改革创造最多,他"著斋法仪范百余卷",改造天师道斋法以请神收鬼、首过祈福为主的巫鬼之术特点,而创立灵宝斋法,以设会礼拜为主,强调以斋直作为道德和心性修养之本。梁陶弘景撰《真灵位业图》,排列神仙等级,建立了以元始天尊为首位的道教神灵崇拜谱系。陆、陶二人对天师道的组织制度也作了改革。南朝时,天师道以祭酒统领道民的政教合一制度被纯宗教的道师弟子关系取代。宗教活动场所从简陋的靖庐发展为道馆。宗教活动经费从依靠道民交纳租米钱税改为依靠收取斋事贶信,国家赏赐供给和庙产馆田收入。至此,南方的道教改革已基本完成,新形成的道教茅山派后来在隋唐时取代天师道成为道教的正宗。

由上可见。东晋南北朝时期由道教中的封建贵族发动的道教改革,使道教的面貌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经过这次改革,道教从原始粗陋的五斗米道发展成了有相对完整的经典、教义、戒律、方术仪式和教会组织的成熟的宗教,从分散的民间宗教团体转变为官方正统宗教,最终完成了其创立的过程,成为足以同儒释并立的、封建国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来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就是儒家学说,不曾有过"真正的"宗教,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其实。回顾汉魏六朝道教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它尽管有其特殊的特点和历史背景,但与西方早期基督教从古代犹太教中脱胎而出、并逐渐发展为罗马帝国国家宗教的历史过程相比,二者之间仍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现象。在阶级社会中,从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发展形成的宗教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规律,这倒是在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唐代的道教

道教是汉族自创的一种宗教,目的在对抗外来宗教——佛教。汉族统治阶级也曾想利用鬼神来欺骗民众,《周易观卦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彖辞》相传是孔子所作。如果确是这样,是孔子也知道宗教对统治者的好处。可是孔子所传的儒学,却是不语神怪专重人事的一种学说,儒学对统治阶级有很大的好处,但说教者是所谓圣人而不是天帝或代天帝立言的半神人。儒学虽在汉族封建社会里生了不拔之根,但比起

宗教来,不能不说是相形见绌,因为它缺乏鬼神的威力,最大限度只能管人(民众)的生前,不能管人的死后,而管到死后是更有力地管活人的重要方法。西汉今文经学以董仲舒为代表,曾力图改造儒学成为宗教,结果毫无成就,想改造孔子从圣人变为天神,事实上是困难的。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兴起,在阻碍儒学宗教化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东汉统治阶段更着重在创立宗教化的儒学,谶纬大为盛行,同时古文经学也盛行起来,反对谶纬,使孔子保持儒师的本来面目。东汉统治阶段创教运动完全失败了。

佛教是强烈的麻醉剂,它那一大套什么布施得福,许愿(贿赂)免罪,净土地狱,因果报应,精神不灭,六道轮回等等耸人耳目的骗术,东汉统治阶段当作新奇的工具,予以接受和利用,是毫无困难的。但汉族有传统的伦常道德,那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等五伦。佛教恰恰是破坏这些伦常的异端。汉族统治阶级决不肯放弃儒学的伦常,也决不肯放弃佛教的骗术,而佛与儒又各已定型,不能融佛儒为一教,这样,东汉统治阶级只好采取提倡儒学,限制佛教(只许胡僧传教,不许汉人出家),放任道士创立道教。胡僧到魏晋间还叫做乞胡,他们靠讨饭度日,所有骗人的方法,如果不行施出来,就无法谋生。道士在旁偷看,把所有骗术都学会了。骗术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敢说无边无际的大话,所谓大言不惭,就是佛教绝技之一。道士本来也是敢说大话的,得到佛教的启示,说大话的本领并不比佛教差一些。它迅速拥出黄帝老子为教主,宣称读《道德经》五千言,与读佛经有同样的功德。东汉初年,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念的是道经,拜的是释迦,只要能降福,念什么拜什么都无所谓。当时胡僧势力孤弱,没有汉僧作徒党,又不曾译出佛经,只好让信徒读道经。尤其使佛徒不堪的是道士造"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谎话,后来演化为"《老子化胡经》"。《化胡经》虽在西晋末出现,故事却在东汉时开始编造,编造的方法不外取佛书用以瞎吹释迦的话头,一概搬来给老子装上。例如说老子生下来,即有九龙吐水灌洗其身,化为九井。老子生下即能行走,一步生一朵莲花,共有九朵。老子"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宣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化胡经》又说"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这样说来,释迦是尹喜的后身,又是老子的徒弟,对佛教是很不利的,佛教徒心怀愤恨,但在东汉魏佛教势力薄弱时期,只好默认这种侮辱,并且还可能默认佛是尹喜后身而减轻传教的阻力。

《史记·老子列传》称为隐君子的李耳,被道教徒装扮成比释迦高一辈的大神圣,道教有了教主,还缺少道经,必须从速制造。东汉张道陵造《灵宝经》及《章醮》等24卷(一说数百卷),粗具宗教规模。东汉顺帝时琊邪人于吉派遣学生宫崇到宫门献上所谓神书——《太平青领书》170卷,"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这是《太平青领书》的宗旨,所有两汉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灾异谶纬,以及神仙家的长生术,都可以包罗在这个著书宗旨里面。因为东吴孙策杀了道士于吉,结果对孙策不利。曹操引为教训。照曹植《辩道论》说,曹操招收道士,不是想求神仙,而是"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这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矛盾,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塑造出来的道教,现在反成了统治者阶级看作奸诡妖恶的可怕之物,这说明黄巾起义是道教被敌对阶级——农民阶级所利用,对统治阶级说来,道教还必须切实驯化,即增加儒学的伦常,佛教的因果报应,再其次是神仙家的长生术,这样,才能真正成为无后患的工具。东晋葛洪著《抱朴子》,是继《太平青领书》以后第二次制造标准道书。葛洪的先世葛玄,孙吴时造《上清经》,葛玄的弟子郑隐,有道书数百卷,传授给葛洪。葛洪凭借葛玄

的遗业著《抱朴子》。《抱朴子·内篇》专谈炼丹术，这自然是道教本色。外篇专谈人事，谈来谈去，不能超出儒学的范围。道教这一次著书尝试又失败了。葛洪著《抱朴子》以前，道教已经造了不少道书，据《抱朴子·遐览篇》所记异书，大体上分经、图、记、符等四类。这几百卷道书，根本目的是要炼金丹，金丹一成，所有道书都可以作废。统治阶级需要道教，是要像佛教那样，能麻醉广大民众，葛洪著《抱朴子》，依然缺乏宗教的麻醉作用。

南朝刘宋时，有道士陆修静选《灵宝经目》，他对宋明帝说，“道家经书并药方、咒、符、图等，总1228卷，1090卷已行于世，138卷，犹隐在天宫”。陆修静所说道书卷数比《抱朴子·遐览篇》多几倍，大概晋宋间又有人大造道书。造书的方法，看来主要是偷窃佛书，陆修静所说“或采搏余经，或造立序说，或迴换篇目，裨益句章，作其符图”。所谓采搏余经，就是剽窃佛书，所谓迴换篇目，裨益句章，就是取原有道书，改头换尾，增添文句，算是新书。陆修静本人是否剽窃佛书，造出道经，尚无明证。他和名僧东林寺释慧远是朋友，慧远是收藏南北译出佛经最多的僧人，陆修静从东林寺看到许多佛书，窃取一些来补益道书，应该说不是不可能的。陆修静造论文八篇，其中一篇题为《自然因缘论》，所谓因缘，显然受佛书影响，加自然二字便成为道教讲因缘。按照这个方法，取佛书原文，改换几个专用字，如世尊改为天尊，佛道改为真道，真金像改为元始真，佛书很方便地就变成道书。自从道士发现这个方法以后，道教的宗教作用，开始可以同佛教比高低，佛教一整套谎话骗术，道教全部搬来，应有尽有，佛教独家出卖的麻醉剂，现在变成两家分卖了。对统治阶级说来，多开一家麻醉剂分店，以广招徕，并无不利处。它知道让道士偷窃佛书，是充实道教的最好方法，所以任令道士继续偷窃，同时又助佛徒继续译出新书，以便道士永远有新书可偷。纵南北朝以下，统治阶级调剂佛道儒三大势力，力求三方有相当的平衡，使各显其用。道教愈是宗教化，就愈为统治者所重视，而宗教化的关键，在于偷佛书是否足够，尽管僧徒痛心疾首，指控道士偷窃，证据十分确实，却无人查究。统治者利用宗教，是很巧妙的，道教在这种扶植下，发达起来了。

陆修静第一次编道书的总目，说明刘宋时道教已积累起不少的图书，可以自立门户。陆修静以后，又续有添造，南朝齐时陈显明造《六十四真步虚经》，梁时陶弘景造《太清经》及《众醮仪》10卷。北朝元魏时寇谦之造《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又造《录图真经》60卷。陆修静与寇谦之同时，这说明南北朝初期，南方和北方，道教都已经是成熟的宗教，可供统治者利用，北朝魏太武帝甚至要兴道灭佛，北方道教势力似乎比南朝更强大一些。北周武帝又一次兴道灭佛，道士焦子顺等人，乘机偷窃佛经一千余卷作为道书。当时玄都观道士奏上道经目录有2040卷。陆修静说道经1090卷，到北周忽增至2040卷，所增之书，主要是《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书884卷，焦子顺等所偷佛书一千余卷，大概要隐藏一些时候，陆续宣布。依《玄都经目》说，道书共有6363卷，其中2040卷有书可查，其余4323卷并未见书。按《隋书经籍志》载佛书有6198卷，周武帝时佛书卷数比隋要少一些，《玄都经目》所说4323卷未见的书，当是指尚未偷来的佛书全部。如果周武帝的统治能延长若干年，佛书将要全改为道书。

道教偷佛书愈多，本身与佛教的区别就愈少，佛教用来诱惑愚人的一套，道教也应有尽有，有些还是道教比佛教得到统治阶级更多的欢心。例如佛教无父无君，不知忠孝，这在统治阶级看来，是最大缺陷。道教补起忠孝两条，就满足了统治阶级的要求。《玉清经·本地品》说元始天尊讲十戒，第一戒不得违反父母师长，反逆不孝；第二戒戒杀生，与佛戒同；第三戒不得叛逆君王，谋害家国。另一

道书说五戒十善，五戒全同佛教，十善则第一是孝顺父母，第二是忠事君师，二善正补佛教之不足。大抵南北朝末年，佛道两教势均力敌，只要争取到统治者的偏宠，就能暂时压倒对方。隋唐两朝特别是唐朝，佛道两教斗争的形势，甚为剧烈，朝廷忙着做调剂工作，不敢使宗教太显著地失去均势。下文着重讲唐朝的道教，必要时也不能不涉及佛教和儒学。

道教高谈清静无为，佛教专演苦空寂灭，不过这都是些装门面的话头，实际完全相反，他们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有些甚至是政治阴谋的发动者。周武帝兴道灭佛，佛徒助隋反周，特别是女尼智仙，给隋文帝影响最大。周武帝死后，著名道士焦子顺便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符，帮助他阴谋夺取周政权。隋文帝即帝位，尊焦子顺为天师，经常和天师商议军国大事，怕他往来疲劳，在皇宫附近立一个五通观，使他安居。焦子顺助隋灭周，目的是想在新政权中为道教占一地位，极端崇佛的隋朝，道教还能保持仅次于佛的地位，这大概就是焦子顺政治活动的结果。统治者对道教总没有对佛教那样放心，开皇十三年(593年)命令私家不得藏纬图谶。道教的妖言，使隋文帝畏惧起来了。隋炀帝刚即帝位，于大业元年(605年)，便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概烧毁，私藏禁书，查出后处死刑。又在东都洛阳置道术坊，所有懂得五行占候卜筮医药的人，令聚居坊中，朝廷派官检查，不许随便出入。道术坊中人固然也与佛教徒有关，但关系更密切的却是道教徒，隋炀帝这种处置，显然是怕有人像焦子顺那样给政治野心家密告受命之符。事情果真是这样。一个著名道士王远知给唐高祖李渊密传符命。又有僧徒景晖授李渊密记，说他当承天命。道士僧徒看到旧统治不稳，在强宗豪族中寻找可能取得政权的人，给他传符命，事成算是助义有功，事不成，传者口说无凭，可无危险。地主阶级分出若干利益，扶植宗教，原意是要它们起助顺作用，但在统治者地位动摇时，它们又起助反作用。隋朝的经验，使唐朝十分注意儒佛道三种势力的均衡问题。

李渊本是迷信极深的庸人，他在起兵反隋时，对佛许下大愿，说做成皇帝，一定大弘三宝。这个庸人在做成了皇帝，并且削平群雄，政权稳固以后，感到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对朝廷是不利的。他排除众议，下诏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勒令被沙汰的人还俗，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其余寺观，一概废弃。寺观比例，似乎两教待遇公平，实际是打击佛教，暗助道教。因为佛教在隋朝得到无限制的发展，现在寺数大减，自然要大批僧尼还俗；道教人数有限，与佛教有不差多少的容身地，还俗就不是什么迫切的利害关系。这个诏令刚宣布，唐太宗发动政变，停止沙汰僧道。

李渊所姓的李，无疑是北周的贵姓，这种关陇贵姓，远不能和山东士族比高低。李渊自称出陇西李氏，即使是真的，门第也不算高。著《道理经》的李耳，早被道教徒吹成高大无比的教主，李渊想提高门第，和教主攀亲是个简便的方法。李渊即帝位的第三年(620年，武德三年)，晋州人吉善行，说在羊角山地方见到一位骑着白马的老叟，叫他转告唐天子说：我是你的祖宗，今年击贼(王世充)获胜后，子孙享国一千年。李渊听了吉善行的话，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庙。这样，李渊与李耳的祖孙关系就算确定了。次年，他到终南山拜谒老君庙。大概羊角山立庙以后，其他地方也相继立庙，宣扬皇帝与老君是亲属。李渊利用道佛二教，还利用儒学，619年(武德二年)他命令国子监里立周公(先圣)孔子(先师)庙各一所，四时致祭。625年(武德八年)，他亲到国子监，正式宣布三教地位，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

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继承权，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唐太宗。唐太宗迅速获胜，道教按照唐高祖与道抑佛的既

定方针继续得到发展。王远知是茅山道士陶弘景的徒弟。唐太宗战胜王世充和窦建德，回到长安，有一天同房玄龄着普通人衣服去见王远知，王远知迎出来说道，这里面有圣人(皇帝)，难道是秦王么？这显然是诈术，秦王身被黄金甲，率铁骑万匹，坐兵车，押王窦二俘到太庙行献俘礼，王远知在路旁看热闹，岂有不认识秦王之理，他行施这一诈术，秦王果然被迫承认了。王远知接着说，将作太平天子，希望好好的干。唐太宗不久登上帝位，给王远知在茅山特造太平观，表示崇敬，这个王远知也就俨然成了神仙。所谓神仙异人，说穿了无非是行施诈术是否得售，王远知就是行诈得售的一人。唐太宗为推崇李耳，在儒学方面有所安排，626年(贞观二年)取消周公的先圣名义，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这是因为老聃不过是东周的一个史官，周公则是西周开国元勋，要周公屈居老聃下，似乎不顺。孔子相传是老聃的学生，尽管唐太宗大崇儒学，不妨碍老第一，儒第二的次序。佛道两教互相排挤，都想本教独尊，637年唐太宗下诏，确定男女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这是僧道争地位，道教得政治上助力，夺得优势的第一次。639年，道士控告僧人法琳毁谤皇宗(李耳)，唐太宗派大臣查勘，判定法琳有罪，流放到益州，法琳在路上死去，又一次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不过，唐太宗偏护道教，仅仅是要确定李姓是教主李耳的子孙，并不减损对佛教的信仰，所有佛教徒佞佛的行动，他不曾缺少一件。他信佛教实际比信道教更深，他吃天竺僧的长生药就是明证。他尊崇道教，完全是一种政治行动，目的在提高李姓的地位。638年即贞观十二年，唐统治已经巩固，吏部尚书高士廉奉命选成《氏族志》，居然仍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仍居次位。唐太宗出面斥责，才改列皇族为第一，外戚为第二，降山东崔氏为第三。皇族能够勉强列在第一位，首先是因为皇权巩固，其次是道教主姓李，否则就是唐太宗发怒力争，未必能使旧士族承认，可见提倡道教还是有效的。

唐高宗与武则天是夫妻，但争夺权力的矛盾显然存在，唐高宗以道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武则天以佛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666年，即政权全归武则天的第六年，这个实际已经失位的懦夫，到孔子庙行礼，赠太师名号，这大概是对儒生表示求助。他又到亳州老君庙行礼，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圣母曰先天太后，上尊号丝毫无救于李姓的失势。武则天召集僧道百官议《老子·化胡经》，并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经》一概焚弃，不得列在道经之内。这一来佛教徒大占优势。唐高宗教诸州营造孔子庙堂及学馆，儒与道联合，可能给佛徒一种压力。武则天上奏请令王公百官都学《老子》，每年依《孝经》《论语》例考试士人。唐高宗令道士棣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僧徒自称是释子(释迦的儿子)，唐高宗这样处置，意思是说凡道士都是李耳的儿子，应该拥护李姓的皇帝，又令贡举人必须兼通《道德经》，实际是要合儒道为一个拥李的力量。683年，唐高宗死，武则天夺取帝位的活动愈益迫切，佛徒助武则天夺位有功，得到的报酬是明令规定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男女道士之前。这时候，道教徒知道失势，要恢复首位无望了，就有些道士要求弃道当僧，如洛阳弘道馆主杜义乞改行为僧，武则天赐名玄嶷，并特赐僧寿三十岁，老道士一下变成老和尚，有资格反道了。他作《甄正论》，斥责道经，说是全出伪造，这个道教的叛徒，大受佛教徒的称颂，其实，唐高宗不死，杜义到死也决不会变玄嶷。佛教正在得势，有一个僧人请求销毁《老子·化胡经》，武则天指定八个学士(儒生出身)讨论这个僧人的请求，讨论的结果是“汉隋诸书所载，不当除削”。为什么一向崇佛曾下令焚弃《化胡经》的武则天会保护《化胡经》，可能她正要杀悍僧薛怀义，杀死以前，对道教表示一些好意。宗教只是统治者用来摆弄别人的玩具，宗教徒希望充当的，起初也无非是这种玩具，每当被摆弄的时候，就有得

利的机会。到了后来,即统治者本身中宗教毒极深的时候,宗教就要反过来摆弄政治,甚至宗教指使教徒发动宗教战争,取得政教合一,使政从属于教。武则天中佛教是很深的,但还能保持清醒,掌握摆弄佛道两教的权力,所以她是一个能干的皇帝。她晚年也求长生药,令僧人胡超合药,三年合成,所费钜万。这个僧人名胡超,可能是胡僧冒用汉姓名。大概胡超合药不敢用峻烈药物,这样他自己免了死,武则天也免了死,吃长生药不死,除去武则天恐无第二人。

唐中宗恢复帝位,起初意识到自己复位是唐朝中兴,赶紧下令贡举人依旧学《老子》,老君依旧称玄元皇帝。不久韦皇后掌权,佛教徒又得势。华严宗所谓三祖的法藏,著述甚富,声名甚大,曾被武则天封为贤首菩萨戒师,他在唐中宗时,与僧慧范(太平公主的奸夫)等九个人,因造圣善寺(纪念武则天的佛寺)有"功",同时受赏,九人并加官阶,赐爵郡公或县公。他是慧范一流的僧人,非善类可知。唐中宗韦皇后作恶不久,就都死去。同样昏懦的唐睿宗继位作皇帝,他依然受佛教的引诱,走向灭亡的道路,"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佛教控制唐政权似乎颇有可能了。可是,道教起着对抗的作用,使得佛教遇到阻碍。佛道争夺权利互不相让,唐睿宗无法判先后,令在法事集会上,僧尼男女道士并进并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玄宗看到了佛教所含有的危险性,即位以后,大兴道教,实际就是阻遏佛教的无限发展,同时也是受长生术的欺骗。唐玄宗自称梦中看到老子,醒来画出真容,又教人画老子像许多张,分送天下各州开元观安置,令当时男女道士庄严迎候,像到后行道七昼夜,朝廷给钱作设斋行道的费用。又赐钱给亲王公主以至全国文武百官兵士,令假日酒食宴会,表示庆喜。这样大规模地提倡道教,佛教是相形见绌了。佛教有四大菩萨,唐玄宗和道教徒李林甫等捧出四个真人来相对,他们对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庄子著有一部书,列子、文子各有一部伪书,还可以说凭书得封号,庚桑子仅仅名见于《庄子》,硬凑成四真,其荒诞无稽,与佛教四大菩萨相同。宗教本来是从荒诞无稽中产生出来的,不管它有什么说法,都只能一笑置之。道教得势,就企图压抑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最早是唐太宗,取消周公的先圣名号,升孔子为先圣,事实上古文经学盛行的结果,述而不作的孔子决不能代替作者之谓圣的周公,唐太宗受到儒生的抵制,计划失败了。武则天换了一个办法,她封周公为褒德王,孔子为隆道公,老子的名号是玄元皇帝,王爵公爵自然应向皇帝低头,可是,周公的资望,远非老子所能攀附,要周公作老子的侍从,唐玄宗等道教徒也是难于说出口的。后来又出了一个办法,索性推开周公,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宣称文宣王与圣祖(老子)同时,是圣祖的学生,应该在太清太微二宫圣祖像前,更立文宣王道像,与四真列侍左右。儒家是否肯忍受道教这种侮辱呢,没有人出来说话,大概是忍受了。因为孔子给道教主当侍从,并不妨碍儒生的仕途,而且只在两个道宫里当侍从,在其他许多学宫里,孔子依然南面称王,足为儒生增光。儒者满足于王号,周公的先圣地位,也就无人保卫,从此学宫中的周公,因孔子封王而自然退位。开元天宝时期,道教极盛,佛教相对地衰退,这从佛教徒贺知章弃佛当道士可以看出当时的气候。

唐朝皇帝与道教,不管在政治上有何企图,想要得长生药,却都是一样的。自唐宪宗起,许多皇帝是贪生怕死的愚夫,贪生便要信道教的长生药,怕死便要佞佛求来生的福报,化死后的灾难,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都是吃长生药丧命的,唐武宗灭佛,以为可得老君的欢心,唐宣守兴佛,不吃道士药,专吃太医李元伯所制长生药,以为太

医非道也非佛，结果还是中毒死了。至于大臣名人因服长生药而死的为数更多，道教毒死了一批统治阶级中人，这就是统治阶级提倡道教的一点成绩。

每个宗教都有排斥异已独吞利益的愿望。佛道两教都像饿虎似地想独吞利益，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可以概见恶斗的危险性。唐初，有道士宋冀，在隆山县新立道观。释道会勾结总管段伦，改观为寺，道众不伏，拒绝迁移。释道会又勾结安抚大使李袭誉，引兵到县，四面鸣鼓，一时驱出，道众怨诉，要求归还道观。道会说，我恨不得天下道观都改为寺，这一所是绝不能归还的。僧徒勾结官府强夺道观，行为极为恶劣。道教徒对待僧徒，也是恶毒有加，例如李抱真为泽潞节度使，军资匮乏，管下有一老僧，声名甚大，李抱真同他商量说，请和尚宣称在操场焚身，后面掘一条地道通我住宅，等火发作，和尚可入地道避到我家来。老僧很满意，正式申请焚身。佛教信徒，男女群集，舍财无数。七日满期，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李抱真遣人堵塞地道，老僧被一阵猛火烧成灰土。李抱真收取所积财物，送入军资库。这种充满杀机的阴毒行为，如果扩大起来，变成军阀间的冲突，那就可能出现宗教战争。可是唐朝最高统治者，除了少数昏君（如唐中宗）甘心充当佛教的俘虏外，其余皇帝都知道调和三教对自己有利。唐德宗开三教谈论例，促进三教的调和。公元796年（贞元十二年），德宗生日，令儒官与和尚道士讲论，这些人都是精选出来的老滑头，谁肯在皇帝生日自讨没趣！《南部新书》说。三教讲论的格式是“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有这个格式，三教间矛盾大体上调和了。

因为朝廷要调和三教，三教中自然会产生一批巧宦佞人，适合朝廷的需要，又适合自己做官发财的需要。代表人物如太常卿韦渠牟，他初读儒书，博览经史，后来做道士，又做和尚，自称尘外人，或称遗名子。唐德宗时参加三教会讲，口才便捷，很得皇帝的重视。又如宰相韦处厚，他佩服世教（儒），栖心空门（佛），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这种不伦不类的怪物，正好是适合做大官的材料。

儒与佛调和，佛的方面也逐渐和儒合流。僧徒行儒业的很多。中晚唐诗文中，常见文僧、诗僧、琴僧、草书僧等名号，可见不少和尚对儒的学业，很是精通。儒佛之间最大的抵触是忠孝问题。忠和孝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纲常，孝为忠之本，在家是孝子，出仕是忠臣，所以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本身统治，必需提倡忠孝。但佛教有无父无君的教义，这个教义也是佛教信仰的根本，如果根本动摇，佛教的以无为本、以生为苦和超世的向往，都无法说通。所以大部分和尚在君父问题上，不肯让步。他们知道，尽管不让步，封建统治者也舍不得抛弃佛教，因为权衡得失，佛教的免灾得福，因果报应，使被压迫阶级忍受一切苦，不敢起反抗心，统治者因此所得之利，是足以抵补无父无君之弊而有余的。而且佛教虽说无父无君，并未影响汉族各阶层人士之礼法思想和行为，即使是和尚，也还紧紧依赖统治者，得些实际利益，在平常情况下，哪能真的做到无君。所以儒佛之间的这个矛盾，虽然长期存在，还是能够调和下来。不过尽管如此，这个问题终究是佛儒进一步合流的一个大障碍，于是有和尚出来提倡孝道。佛徒师生间，实行儒家的三年丧制，大反佛教的教义，但大有利于佛教的推广。

南宗禅学出现后，佛儒的调和，更大进一步。佛与儒调和，也与汉族的宗教——道教调和。佛道两教，有着可以调和的基本论点。例如佛说性空，道说无名，皆以虚无为本，两教又都以有生为苦厌世无我的思想。在超世的向往上，道有神仙洞府，佛有极乐净土。此外如静坐（道）、禅定（佛）的持修方法，符箓（道）、咒语（佛）的法术等，彼此之间也都有共同的地方（以上佛教以大乘空宗为据）。至于

互相模仿窃取经书，更不待言。道教剽窃佛书，前面已经说过。佛教偷取道教教义，在唐代可以密宗为例。密宗吸取了佛教以外天竺各外道的宗教仪式以及各种神秘法术，内容很庞杂，唐玄宗时开始在中国传播，肃、代、德三朝大盛。密宗的做法，和道教有相同的地方，不少方术，彼此也相似。有些显然是抄自道经的。如道教崇拜北斗星，密宗称为妙见菩萨。道教的司命、司禄之神及泰山府君，也见于密宗经文。密宗又画道教的符，用以治病隐身，求财免灾。此外如七七、九九之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讳、十二肖诸神等，都是道教所有而为密宗窃去。晚唐以后，密宗衰微，其法术大都与道教合流。

金元之际北方三大教派

宋徽宗、钦宗的北虏，赵构南下称帝，这标志着北宋的消亡，南宋偏安政权的建立。自此，黄河流域的大片国土沦于金人之手。金政府为了统治北方民众，先立宋太宰张邦昌为楚帝，不久被窜；又立汉奸刘豫为齐帝，建都大名府。刘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耻厚颜地以“子皇帝”的身份处处取悦金人，因此遭到北方遗民的唾骂。在这国亡家破，民族受辱，社会动荡，民风混乱的华北大地，士大夫不过“苟全性命于乱世”，老百姓也只求“一日三餐有谷粮”。南宋政权的孱弱，政治前途的黯淡，遗民的生活，也掩盖不了信仰危机的加深，这一非常时期，正是宗教产生的机缘。因此，在这片沦亡的土地上先后创立起三种新的道教教派，它们是太一教、大道教、全真教。

太　一　教

太一教创立于金熙宗天眷年间(1138—1140)。始祖为萧抱珍，他以“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统一”为教旨，概称其教为“太一教”。根据史料稽查可以确定出近二百年中的七代传承教谱，而在七代教主中，教迹显著者也只有始祖萧抱珍、二祖萧道熙、四祖萧辅道和五祖萧居寿。

始祖萧抱珍，卫州人。他声称曾得仙人所赐秘录，擅长祈祷诃禁法术，要乡间郡里常以符录、符水为百姓治病；用祈祷咒语驱除蝗灾、求雨止雨，利用这些济世利民的手段，得到河北地区民众的尊崇。他以传授“太一三元法录”为名，在河南汲县建立了第一个庵堂，信奉者日众，从此创立了太一教。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被召至京，为皇室治病，受到礼遇，赐改庵堂为“太一万寿观”，太一之名由此显赫，大定二年(1162)诏准人粟购买度牒，道士所居之处，没有名额者，也可以输买，因此萧抱珍又建太清、迎祥两观，广招信徒入教。太一教借皇家的宠遇，得以在北方地区迅速发展，使太一教初具规模。萧抱珍卒于大定六年(1166)赐号“太一一悟传教真人”。

二祖萧道熙，本姓韩，字光远，卫州人。少年嗣教，得到元世宗的嘉奖，准他在汲县建立朝天观，作为祭祀始祖萧抱珍的永久道场。后被召至京师，任天长观(现北京白云观)住持。二祖仍以符水为大众治病，并在燕京、河北一带发展太一教教徒。后赐号“重明真人”。

四祖萧辅道，字公弼，号东瀛子。忽必烈为太子时，曾与萧辅道来往密切，故世祖即位后，赐号“中和仁靖真人”，当时人们喻为山中宰相。萧辅道凭借与元帝室的特殊关系，又广为结交上层官僚、士大夫及文人雅士，教派力量渗透于各阶层。元朝初期，太一教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巩固。萧辅道卒于元宪宗二年(1252)，在位三十七年。

五祖萧居寿，本姓李，字伯行，道号淳然子，汲县人。十三岁即拜萧辅道为师，掌管符录科式。中统元年(1260)特赐号“太一演化贞常真人”。至元十一年(1274)特旨于奉先

坊创太一广。福万寿宫,主领祠事,并醮祀太一六丁神,以继太保刘秉忠之术。从此太一教又增加了一教法内容。至元十三年(1276)赐太一掌教宗师印。十七年卒(1280),享年六十,在位二十九年。

六祖萧全祐,洺水人。至元十七年(1280)世祖赐号"观妙大师",后改为"承化统一真人"。大德元年(1297)建太一集仙观。当时太一教徒东起山东,西至陕西,几乎遍及江北整个地区。可是到了成宗继位,太一教渐失皇宠,北方全真教大兴,南方正一教流行,尽管七组萧天祐被赐号为"太一崇玄体素演道真人",也无法挽救太一教衰落的趋势。

太一教以"元气混沦,太极剖判,至理统一"为教门宗旨,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教门法则,是儒、道思想结合的体系。以老子"弱者道之用"为处世原则,以崇尚符录为行世手段。信奉者需出家,遵守教门戒律;居住宫观始称庵,后改宫,墓称塔。接受法嗣者必须先受秘录法物,改姓始祖"萧"姓,这是所有道教派别中仅有的一派。

太一教与当时兴盛起来的真大道教、全真教一样是以拯救民众和社会为目标的重视践性的三教合一的道派。然终因一主之好而兴,一主之恶而亡。其史料散见于《滹南集》、《秋涧集》、《元遗山集》、及《一悟真人传》、《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碑》等。

大　道　教

大道教创始于金初,始祖刘德仁,沧州乐陵人,号无忧子。自幼喜读诗书。靖康乱起,徙居盐山。由于身历北方社会的战乱,颇尝流离之苦,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愤世疾俗的思想。同时又受到儒家、佛教的影响,把挣脱苦海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信仰上,于是他自称遇一白发老翁(暗示老子),授以《道德经要言》,以此言论为救世大道的理论基础,对己可以修身,对人可以化度,在河北一带民众中广为宣传。信徒渐渐增多后,便创立了大道教。刘德仁定教规九条,其曰:

(1)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

(2)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

(3)除邪淫,守清静。

(4)远势力,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

(5)毋事博奕,毋习盗窃。

(6)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

(7)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

(8)毋恃强梁,谦尊而光。

(9)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自此,我们可以看出大道教是以老子思想中的"清静无为"、"少思寡欲"、"和光同尘"、知足长乐、慈俭不争为教义的;是以禁世欲、禁杀生、禁饮酒、止邪念为戒律的;是以朔望礼拜,祈祷治病,召神劾鬼,自力耕作,苦节危行,不求他人施舍,不崇尚符录,不涉金丹神仙为教行的。这正说明大道教创教初期是在系统地吸收了儒、墨、道家的仁、义、忠、孝、勤、俭、无为的思想,以及佛教五戒十善的戒律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大道教是儒、墨、道、释诸家思想的产物,是战乱时期北方众及士大夫为求生存而提出的适应社会生活准则的宗教化,是当时人民精神依托的对象,故此创教不久,即得到迅速发展。大定元年(1161)金世宗召见刘德仁,大定七年(1167)被赐为东岳真人,后赐封为无忧普济开微洞明真君。

大道教居处始称庵,后为宫观,墓称塔,与太一教同,传承法物有衣钵,与佛教极相似。

大道教二祖陈师正、三祖张信真,四祖毛希琮传承教门,教法不严,渐致混乱。五祖郦希诚号太玄真人,妫川水峪人。先为教门举正,传教于山东,毛希琮病危时,召回燕京天宝宫。继承法位后,出整颓纲,使教风重振,得到元宪宗的支持,特改名为"真大道",以区

别以前之大道教，同时也是对郦希诚的赞誉。郦希诚建造房山的隆阳宫，广度信徒，从此真大道在河北燕京一带兴盛起来。郦希诚卒于至元十年(1273)，享寿五十六，在位十五年。

至元五年(1268)，元世祖命六祖孙德福统辖诸路真大道，政府加强了对真大道的统一管理。至元十八年(1281)七祖李德和与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共同商定焚毁诸路道经，是对道教的一次清整。

八祖岳德文，涿州人。师事五祖郦希诚，出家于怀来水峪之太玄宫。十八岁受教，领文书、谷帛、受戒之事。七祖掌教，署为法师，充教门诸路提点。至元二十一年(1284)宣授崇玄广化真人，掌教宗师，统辖诸路真大道教事。赐玺书，深受朝廷礼遇，民间尊称"岳祖祖"。岳德文常使人四处布教，江南奉其道者已达三千余人，庵观四百余所。可知真大道教曾传及南方民众。

九祖张清志，奉天县人。十六岁依七祖李德和出家于天宝宫。岳德文大德三年(1299)卒后，张清志掌教，但厌恶谒请逢迎的杂事，又因教门内部的倾轧、管理的混乱、私设监刑等，便隐逸于华山。五年之内三位摄教者先后死去，无人统领真大道教，朝廷遣使访寻张清志，张清志被迫复位。复位后，即改革真大道，严整教纳，执行坚峻，其曰："吾教以慈俭无为为宝，今听狱讼，设刑威，若有司然，吾教果如是乎？继今以始，凡侄梏鞭笞之具尽废之。"从此众安害息，五年宿弊，一旦息除。

真大道教的特点是以清修寡欲，谦卑自守、力作而食为教旨，以无为保正性命，以无相驱役鬼神为教行。信教者仍须出家，遵守教戒。真大道教流行于河北燕京地区，所建宫观甚多，如大都之天宝宫、玉虚宫；平谷之迎祥宫；房山之隆阳宫；缑山之先天观；许州之天宝宫；辉州之颐真宫等，现存无几。

有关真大道教史料较少，可参阅《吴草庐集》中《天宝宫碑》以及《宋学士文集》、《重修隆阳宫碑》及《大道延祥观碑》、《大道教碑》等。

全　真　教

全真教创立于金初。因始祖王喆自题所居庵为全真堂而得名。王恽论曰："自汉以降，处士素隐，方士夸诞，飞升炼化之术，祭醮禳禁之科，皆属之道家。稽之于古，事亦多矣。徇末以遗本，凌迟至于宣和极矣。弊极则变，于是全真之教兴焉。"全真教与太一教、大道教一样同属于金元之际道教改革派之一。

始祖王喆，生于宋徽宋政和二年(1112)，原名中孚，字允卿，后改名世雄，字威德。入道后始改名为喆，字知明。因仰慕陶渊明之高风亮节，取道号为重阳子。早年为儒生，兼习射骑。相传金正隆四年(1159)曾遇甘河仙人密付口诀，饮馔神水，自是断绝俗念，悟道出家。于终南山筑墓穴名曰"活死人墓"，开始修道。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云游至山东宁海，遇马钰(道号丹阳)、孙不二拜以为师，从此在山东宣扬全真之道。后又收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为弟子，并在文登、莱州、登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金莲会、三教平等会。大定九年(1169)，与弟子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西归，卒于西归，卒于道中，葬于终南山刘蒋村，从此全真道尊为祖庭，金章宗赐庵名灵虚观，元太宗加封为重阳万寿宫。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封王重阳为全真开化真君；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为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王重阳著有传道诗词千余首，编于《重阳全真集》内，又有《教化集》、《立教十五论》、《分梨十化集》等。

王重阳创立全真教，而真正发扬光大其教者，实属丘处机。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山东栖霞人。十九岁出家入道，二十岁拜王重阳为师，金大定十四年(1174)穴居陕西磻溪六载，后又在龙门山潜心修炼，开创全真龙门派。明昌元年(1190)，下诏禁罢全真等教，丘

处机回归栖霞。泰和八年(1208)金章宗赐所居观名太虚观。贞祐二年(1214),丘处机以宣扬“不杀不争”,“正心纯一”,招安山东起义军杨安儿,深受朝廷嘉奖,名噪一时,信奉者众。其后南宋及金庭先后遣使来召,俱未应。元太祖十四年(1219),遣使臣刘仲禄召请丘处机西上,丘处机深识政局趋势,偕弟子十八人从莱州出发,行程万余里,到达西域大雪山,拜见成吉思汗。以“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晓喻元太祖,深得太祖器重,尊为神仙。回燕京后,赐以虎符、玺书、命掌管天下道教,免道院和道人一切赋税差役。丘处机居燕京白云观,建立“平等”、“长春”、“灵宝”等八会,开创传戒制度,公开设坛说戒,广收门徒。全真教得以大力发展,盛行元代,流传至明清。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诏赠丘处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称号,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又加封为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其著作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磻溪集》等。

全真教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仕新朝,不尚符录,不炼黄白之术。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教宗,以性(精神)命(身体)双修为修道之根本。它认为“人心常许依清静,便是修真捷径。”注重修习内丹,认为“夫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修为基。节欲食,绝思虑,静坐以调息,安寝以养气。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宁神于极,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继承和发展了内丹修炼的理论和方法,成为道教中重大派别,一直影响至明清。

全真教之所以比太一教、大道教兴盛、流传长久,成为元一代道教领导集团,除了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外,其中最主要原因是教徒能恪守戒律,遵守观规,注意自我的身心修养,得到民众的尊崇。其中一部分道教徒文化水准较高,又广为接交士大夫阶层,唱酬往来,撰碑立纪,影响深远,同时又留下了不少教史史料。全真道徒注重教史的修撰,第一部著作则是真常真人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除了记载丘处机西上会见成吉思汗的过程、对答、酬唱外,对研究当时的地理、民俗、蒙古政治等均有参考价值。其次全真子宋披云继凿石龙山道教石窟,重刊《金藏》于平阳。秦志安撰著《金莲正宗记》,前收钟、吕,后述七真,是一部全真教早期的教史。其后他在修撰《道藏》中增入了《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绛仙》、《婺仙》等有关全真教史料,保存了有价值的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道谦,以儒士入道,终身未尝废书。历任重阳宫主事,京兆道门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除自著《筠溪集》外,还著有《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三卷、《七真年谱》一卷、《终南山记》三十卷、《甘水仙源录》六卷,使全真教史大备,历来为道教史家所重视。

全真教由一个有民族意识的宗教而兴起,援儒摄佛,吸收二教思想,形成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三教合一的新道教派别。为了招纳三方面的群众,把《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孝经》列为信徒必读经典,教人“孝谨纯一”、“正心诚意,少思寡欲”。注重在下层民众中传教,广为结纳中层士大夫阶级,谋求上层达官贵族、皇家宗室的支持,因此教派基础深厚,思想意识渗透各阶层,影响深远,是太一教、大道教不可比拟的。后期受到元代统治者的拉拢,由一个“勤作俭食”“求返其真”的民众教团,变成了出入公门、煊赫一时的官方宗教,其本身便走向了背叛教旨的反面。明太祖推翻了元朝统治,全真教受到了冷遇,代之而起统一诸路道教的便是江西龙虎山张天师正一教派。

明代的黄天教

明清时代,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作为正统宗教的道教与佛教也逐渐走入下坡

路。在宗教信仰的领域,代之而起的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民间宗教运动。数以百计的教门,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在这种环境中,深受正统宗教特别是道教影响的黄天教便应运而生,成为一支以佛、道相混,外佛内道为特征的新型教派。

黄天教的产生

黄天教,又叫黄天道、皇天道,由明代嘉靖年间李宾创立于直隶万全卫。创教不久,迅速风靡了直隶、京畿、山西,又在明末清初传入江浙。清初的思想家颜元曾经指出:“我直隶隆庆、万历前,风俗醇美,信邪者少。自万历末年添出个黄天道,如今大行,京师府县,以至穷乡山僻都有。”(颜元《四存编》)可见黄天教流传盛况。

创教人李宾,道号普明,直隶怀安人,生年不详,死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青年时代曾经务农,后他应征入伍,驻守长城。退伍后到万全卫膳房堡创教。关于李宾的师承,史无记载。有的史料说他“参师访友,明修暗炼,悟道成真,性入紫府。蒙玉清敕赐,号曰普明虎眼禅师,设立黄天圣道……”(《虎眼禅师遗留唱经》)李宾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开始讲经说法,进行传教活动。他普著《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和《清净真经》。创教初期活动范围在山西大同、直隶宣化一带,特别是桑干河两岸。后来传教中心在万全卫膳房堡附近的碧天寺。碧天寺为五进大殿。号称“祇园”,前三进为佛殿,最后一进高阁为道教三清殿。李宾与其妻王氏(号普光)即在此寺内修行。李宾死后,教权由普光接掌。普光死于万历四年(1576),与其夫合葬于碧天寺内。教徒修建十三层高塔,号明光塔,以示崇拜。从此碧天寺成为黄天教圣地,每年四时八节做会,教徒不远千里,云集于此,“多金舍寺”(《乾隆二十八年四月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

李宾只有二女,故其夫妇死后,教权即由女儿及外孙女依次递传。至清代初叶,黄天教教权再次回到李姓手中,由李宾胞兄李宸后代把持。

李氏家族从李宾起传了七代,历时二百一十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月,当局破获黄天教传教中枢,乾隆皇帝派朝臣兆惠及直隶总督方观承等会同办案,大肆逮捕教徒,毁寺拆塔。并掘出普明、普光等人尸骨,“投弃城外车道,寸磔扬灰,宣示众庶。”清政权对黄天教如此镇压,足见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巨大。此案一兴,对黄天教打击颇大。但李氏之败,并不意味着黄天教的没落,不过是导致教权易手罢了。在万全县一带,黄天教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沉寂,到光绪初年,再度大兴。信仰者“鸠工庀材,建庙祀之,名曰普明寺”(民国《万全县志》)。随后,又有许多黄天教庙宇拔地而起。

黄天教与道教诸流派

(一)黄天教与内丹派 从表面上看,黄天教是崇佛的:圣地碧天寺前三进为佛殿,寺门以“祇园”命名,取佛教“祇树给孤独园”之义;创教人及主要传承人皆冠以佛号;主要经书名目亦有类于佛经。但黄天教不过是外袭释教的一点皮毛。它主要继承的还是道教的思想资料。纵观黄天教初期的几部经书,贯穿着一条修炼内丹,以求长生的主线。所谓内丹,是以人体为一鼎炉,炼神化气,使精、气、神凝聚成“圣胎”。所谓圣胎,又称丹珠或金丹。黄天教经书讲:“得道之人,先通内用。养神、养气,神气不散,结成大丹”。“修行人,参求大道,……养成他,仙丹一粒”(《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在黄天教徒的眼中,修行是结丹的条件,结丹是修行的结果。一旦丹成,就突破了凡与圣,生与死的界限。所谓“结金丹,九转后,自有神通”。就可以“赴蟠桃,永续长生”,达到天无园缺、人无生死、无饥无

饿、无染无污、来去纵横如意、“寿活八万一千岁，十八童颜不老年”的幻想境界。

李宾等人的内丹理论当然不是独创，而是继承了两宋以后道教内丹派的修炼宗旨。道教丹鼎派自隋唐以后，由主炼外丹转向内丹。宋代张伯端集修炼内丹理论之大成，著《悟真篇》，对后世影响极大。《悟真篇》所言，大抵是排斥外丹，讲求修炼内丹的方法及“妙用”。所谓：“人人本有长生药，自是迷途枉自抛。……丹熟自然金屋满，何需寻草学烧茅。“天仙非金丹不能成”，“盖天仙除金丹之道，则余无他术”(《悟真篇注释》)。这些说法显然对黄天教的修炼理论有很大的影响。

黄天教有自己的一套修炼方法。在创教及传教人看来，人身是一个小天地，宇宙是一个大天地，两者本为一体。天的精华是日月星，地的精华的水火风，人的精华是精气神。认为天地人“凑三才”才能达到丹珠自成的效果。所以这个教门十分注重“取日精月华，天地真宝”，“昼夜家，采取它，诸般精气，原不离，日月光，诸佛之根”(《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十分崇拜日月天地。从明代末叶起，信仰者就“唤日光叫爷爷，月亮叫奶奶”，“每日三次参拜”(颜元《四存编》)。这种参拜仪式一直延续至清代。

黄天教创立后，随着教派的发展，崇拜教主的气氛日益浓重，普明、普光慢慢变成了宗教偶像。教内把普明比作太阳，把普光比作月亮。碧天寺内所建明光塔即日月塔。教内还编有《朝阳天盘赞》、《朝阳遗留排天论》、《太阳生光普照了义宝卷》等等，都是把普明、普光等人奉为太阳、太阴(月亮)加以崇拜的。这种崇拜仪式与修炼内丹的理论融为一体，构成了黄天教最基本的宗教内容。

(二)黄天教与全真道　黄天教不仅受到两宋以来内丹派的影响，还受到金元时代产生的全真道的影响。元初，全真道鼎盛一时，教势几乎囊括整个北部中国，后来因与佛教争宠而骤然失势。明初，朱元璋以正一道为正宗，全真道再度失势，除通邑大都尚保有实力外，信仰下移，与民间教派合流。这一点在黄天教经卷中有明显的反映：“普贤全真大道，千圣不闻，万祖非说，今遇古佛慈悲，指透天真大道。”“今遇着一真僧，说破虚空全真大道。”(《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在创教人普明看来，黄天教即全真道，全真道即黄天教。所以他讲“大道本全真”，“全真大道，乃在家菩萨，悟道成真”。当然黄天教并不是全真道。全真道以兼修性命、圆融三教为宗旨，也有兼炼内丹者。但是黄天教毕竟继承了全真道部分教义思想。黄天教也讲性命双修，诸如“性命合，同为一体”，“性命要两投”，“性命是阴阳”等等，把修性修命，同视为要义。与全真道不尽相同的是，黄天教把兼修性命作为“结丹出神”的条件，而全真道则追求全精、全气、全神，认为三者的统一便是“性命之道”。

全真道还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凡圣同一，这一点对黄天教影响很大。黄天教经卷总是强调“生仙生佛，不离人伦”，“性命相合，凡圣同根”。认为儒家提倡的人伦道理是济养万物的根本，是成仙成佛的基础。不同的是，全真道虽然倡三教合一，推崇儒教，却不许信仰者娶妻生子，而要出家修行。黄天教徒则家居火宅，娶妻生子，各守常业。甚至主张夫妻双修，共同悟道。

(三)黄天教的道场　黄天教创始人李宾是反对做道场的，认为除修炼内丹外，别无正法。所以诸如修庙建塔，念经诵忏等等都在扫除之列。但后世传承人为了现世的经济利益却违背了祖训而广行道场。黄天教有《普静如来钥匙真经宝忏》四卷，其内容，多为道经所载。从这部“宝忏”的份量，可以推知黄天教道场的宏大规模。不仅如此，清代一些黄天教徒还以制造道场乐器为终生职业，可见该教做道场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黄天教道场分两种，一种做于宗教节日，一种是为请忏者“消灾去祸”，宗教节日共有

十二个，是时教徒云集碧天寺，住持该寺的道士与教主李姓配合，教主主持做会，道士则念经诵忏。至于请忏者则情况各异，分别念诵不同经忏。《普静如来钥匙真经宝忏》内又包含九种经忏，诸如《造恶地狱宝忏》、《超拔亡灵宝忏》等。在道场内，人们感受到的是浓重的宗教气氛和盛大的宗教活动场面。这是一种使人受到震慑而心怀畏悚的神秘环境。

在行道场的宗教家眼中，世间无一人无罪恶，无一处无罪恶，茫茫人寰就是罪恶的渊薮。甚至杀猪屠狗、妯娌吵嘴、乱泼污水等等也都成了罪愆。至于欺师背祖、毁天骂地、不尊皇王、污蔑神灵则罪无可逭。只有在道场的经忏声中才能洗涤罪恶，免堕地狱。黄天教就是利用各种宗教手段，使愚昧的民众沉溺其中，遂使教势长盛不衰。

我们指出黄天教与道教的诸多内在联系，仅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为什么这个教门能在明嘉靖一朝从底层迅速崛起？嘉靖是明代国势衰败的一朝。有明亡国，不亡于崇祯，而亡于嘉靖、万历。衰败的因素很多，但世宗崇道，神宗佞佛，是重要原因。嘉靖皇帝初登基即好鬼神事，日事斋醮。先征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继招陶仲文，大加宠信。嘉靖二十年后，帝"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他在位几半世纪，崇信道教，影响波及整个社会生活。上至朝廷、下至民间无不受其风熏染。廷臣需撰青词，青词是否称旨，往往关系身家荣辱。道士地位骤然提高，达官显宦多师事道士，以问道家故事(参见《明史》邵元节、陶仲文等传)。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民间，"求道访真"，参师会友，秘撰丹方、经书，几成风习。李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于嘉靖三十二年"悟道成真"，并进而自创教门，自造经书，自称教主的。可以说，黄天教兴起的重要原因是正统道教影响的结果，是封建王朝政治腐败，宗教空气迷漫的一种产物。

清代的道教与红阳教

提起红阳教，一般人都比较陌生，甚至连这个教名也从未听说过。事实上，这是一个与道教有密切联系的民间教派，在明清两代北部中国曾有过广泛流传，教徒众多，影响甚大。只不过因其受到封建王朝的禁止，正统宗教的排斥，不大见之于经传罢了。

红阳教与道教的关系，从清代中叶发生的教案——刘和案中可见其端倪。嘉庆二十年(1817)十二月，直隶总督方受畴，经过明查暗访，在山东德州曹家庵红阳教首刘和家，起出图像和大量经卷。其中一部经卷的刊记中，发现有"山东济南府德州河西高海庄清修观刊销释随堂祖明经板，……康熙三十六年孟夏吉旦"字样。上报朝廷后，皇帝遂令山东巡抚陈预到高海庄清修观查办，经讯问道士明云，在南乡庙内起获经板十九块，明云并称：此板片流传已久，前因官差搜查红阳教经卷，恐致起出被累，故将板片收藏于南乡庙内(嘉庆二十三年正月初四陈预折)。

这件事证明，清代红阳教的许多经卷，是由道教宫观刊刻印刷的。道士们对这些经板不仅妥为保管，传之百年而不失，即使在官府严厉追查时，还把它秘密转移，藏而不露。从中我们可以推断，这些道士是把红阳教的宝卷，当作道教经典一样，视为珍宝，奉若神明的！如其不然，何至于甘冒吃官司，被判刑的风险呢？

红阳教的创教祖师飘高，他究竟是何许人，在研究者中间有不同看法。经过我们考证，认为飘高就是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令属河北省)的韩太湖。

据《广平府志》卷六十韩太湖传及明刻本宝卷所记韩太湖生平可知：韩太湖，号宏阳，曲周人。生于隆庆四年(1570)五月十六日，早岁曾读书，懂医道。十九岁出家，在北禅山

曹溪洞静修多年，得真人口诀，著明心经救苦忏文若干卷。受封敕为“正德明医真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十五日，正式创立红阳教。死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六日，时年仅二十八岁。

红阳教的全名叫作“混元红阳教”，简称红阳教、红阳法，又称混元门、混元教。“混元”是道教创世纪说中所说的天地化育生成以前的一个极遥远的时代，北宋真宗曾敕封道教祖师老子为“混元上德皇帝”，把他抬到天地自然的教化者的崇高地位；到了金元之际，社会上曾出现过以混元为名的道教支派，在北部中国广泛流传。在明代，社会上崇礼真武大帝的风气很盛，以佞道闻名的嘉靖皇帝，又特别封赠真武为“混元六天传法教主……天尊”。所有这些，对濡染道教甚深的韩太湖，当然会产生影响。故此，他才在红阳之上，冠以“混元”二字，借以标榜与道教的亲缘关系。至于“红阳”一词，则是由劫变观念演化而来。所谓三阳劫变，即过去之世是青阳，燃灯古佛掌教，现在之世是红阳，释迦文佛掌教，未来之世是白阳，弥勒佛掌教。红阳末劫是世人遇到的最大劫灾，谁能躲过末劫大难，就可以到达无限美好的未来白阳之世。飘高祖师于现在之世临凡，降生“寒(韩)门”，就是来拯救东土众生，逃离红阳末劫之灾，登上法船，驶向极乐的“天堂”。

我国民间的传统信仰是多神崇拜。几乎每种自然现象和社会领域，都有一位尊神作主宰。山有山神，海有龙王，木瓦匠有鲁班爷等等。至于天、地、财、灶，则家家供奉，人人礼拜，普遍遵循着“礼多神不怪”的信条。道教这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就沿袭着这个传统，几乎中国老百姓崇拜的所有神灵，都被纳入了道教系统。红阳教随俗效道，也崇拜多神。在红阳教宝卷中，仅有名号的神灵，就有几百位之多。当然，在众多神灵的世界里，并不是平等的，他们也和俗世一样，分等级，论贵贱。

在众多神祇中，红阳教推尊混元老祖为最高神。明清时代许多民间教派，教把无生老母奉为最高女神。唯有红阳教独出心裁，设置了一个凌驾于众神之上的混元老祖，而把无生老母放在妻室的服从地位。究其原因，恐怕也只能从它与道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求得解释。

在混元老祖和无生老母之后，则要数飘高祖师。他是老祖和老母鉴于尘世红阳末劫将至，特派遣到东土临凡，普度众生的使者。而且指出，飘高是老母最疼爱的幼子，是老子、孔子、真武诸位兄长的小弟弟，人间真正的救世主(见《混元红阳飘高临凡经》)。僧俗男女，只有入他的教，读他的经，才能得到进入“天宫”的门票。

在红阳教的教义中，最富有诱惑力的内容，是它的速成救赎说。认为东土众生，不论高低贵贱，都是天宫中无生老母的儿女。这些儿女离母投东，为世俗功名利禄所惑，迷失本性，陷入无穷的苦难。人们在苦海中挣扎，悲惨万状，而且末劫来临，难逃难躲。要想脱苦免劫，只有一条路，即入教诵经，礼拜飘高祖师，就能立刻明心，回归“天宫”，永伴老母，无生无死，快乐无穷。这一以神灵担保的救赎说，就是红阳教众多宝卷中反复咏唱的主题。可以想见，它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和其他宗教一样，劝善惩恶的道德说教，在红阳教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它所宣扬的伦理道德，鲜有自己的独创性。在宝卷里，主张三教合一，说什么释迦如来临凡，留大藏真经，建天下寺院，超度亡灵。要天老祖临凡，转生李老君，治天地乾坤，立山林，烧丹炼药，留道德清净真经。善林老祖投胎，是为孔圣人，留下四书五经，仁义礼智信，领三千徒众。于是，飘高将道释两教的清规戒律和儒家的纲常伦理熔铸于一炉，权充作本教的道德观。因而，它的道德观与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道德观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红阳教祖韩太湖本人也不安心于只在下层民众中传教，时刻梦想争取王公贵戚们的信奉和支持。一旦在家乡曲周左近打下根基以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来了京城。在《叹世经》卷首，谈到了韩太湖到北京传教发迹的情况："自从万历年中，初立混元祖教，二十六岁上京城。也是佛法有应，先投奶子府内，转送石府宅中，定府护持大兴隆。天下春雷动，御马监程公，内经厂石公，盔甲厂张公，三位护法，同赞修行。世间稀有，博览三教全真，留经吐卷在凡心。"

据此可知，韩太湖二十六岁来到北京，交结权贵，寻找靠山，得到王公勋戚（如定国公）和有权势的太监的信奉支持。正是依靠内经厂石公的奥援，才得以在皇家经厂印造大量红阳教经卷（其印数之多，印制之精美，非其他教可比），扩大了红阳教的影响。这之后，红阳教便在京畿内外，迅速流传开来，信徒也日渐增多。入清以后，统治者视邪教为叛乱之根源，镇压唯恐不烈。红阳教的活动地区因近在畿辅，威胁枢要，所以往往首当其冲，教案迭起。仅在清史档案中，就查到红阳教案件三十七起。

韩太湖是一位出家的道人，没有子嗣。在他死以后，红阳教的祖师就以祖师传承的形式，递传下来。据嘉庆二十二年德州红阳教首刘和供词，到那时红阳教祖已传到了第十二代。这表明，在数百年间，红阳教虽屡遭镇压取缔，但它的组织系统却一直未被打乱，而是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在曲周县周围农村，传承接续，从未中断。可见其在农民群众中受到虔诚信奉，有极强的生命力。

还是在刘和一案中，曾搜出迄今所见到的最多的经卷和图像。总计经卷八十八本，图像十一轴。从这些图像和经卷，我们可以对红阳教有一个更具体的了解，并从中看出它与其它宗教的联系。其中不仅有三清、太上、玉皇、元始天尊、普化天尊、真武、清净、全真、清微等大量的道教神祇和专名词，而且有的本来就是道教的正式经典，如《元始天尊说济渡血湖真经》等即是。

最后，谈一下作为民间教派的红阳教有哪些特点。

其一是在它的教义中，尽管更接近于道教，但却不严格拘守哪一个正统宗教，主张兼容并包，三教合一，而且采取机变的以"我"为主，即三教皆备于"我"的态度。因而，红阳教的经卷内容，显得很庞杂，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在表达方面，文字通俗易懂，合辙押韵，多用活在老百姓口头上的语言，便于诵读咏唱。故此，被官府和正统宗教讥之为"荒诞不经，鄙俚不堪"。然而，也正因为如此，红阳教更适合低层次的群众，即文化不高或根本不识字的劳动群众和下级道士们的信仰需要，受到他们狂热的信奉。

其二是注重坛场仪式，善于作斋醮。红阳教与接近禅宗系统的民间教派（如无为教）轻视经教仪式不同，十分重视筑坛诵经，设斋打醮。在它的经卷中，大多是供斋醮用的经忏。教徒们不仅逢节作会诵经，而且常常应村民之请，为丧葬之事设道场，超度亡灵。当然，念经作会，设斋打醮，也是红阳教敛钱的重要手段。

其三是特别重视招引妇女入教。红阳教仿效道教经典，编撰了一部《混元红阳血湖宝忏》，专门为妇女念诵。其内容是说妇女经血、生儿育女血污，触犯神明，死后被打入惨不忍睹的血湖地狱，永无出期。欲求解脱，只有入教设坛，讽诵《血湖宝忏》一途。这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往往产生自卑自贱心理的妇女，有特殊的吸引力。档案史料证明，红阳教取得了很大成功，妇女在该教中占有较大比重。

其四是更注重现实苦难的解救。一般正统宗教，教导人们在现实社会中要茹苦含辛，逆来顺受，以换取来世的幸福。红阳教则不同，更注意解除教众今生今世的痛苦，宣扬入教免劫除灾治病。教祖韩太湖就以"正德明

医真人"自许,以为人治病有奇效而享有盛名。此后,红阳教的大小头目,都以治病除灾相号召,逐渐形成了红阳教的传统,同时也是它吸收教徒的重要手段。据清代档案中红阳教犯的供词,绝大多数人都是因病求治,才加入了红阳教的。

道 教 人 物

天 师 张 道 陵

在中国,能与儒教相抗衡的本土宗教只有道教。道教天师道的张天师世家与山东曲阜的孔子世家之所以能并驾齐驱,同显尊崇,与天师道第一代天师张道陵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张道陵,字辅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汉留侯张良八世裔孙。据传,其母夜间做梦,得神人所授蘅薇香草,感而有妊,遂于东汉建武十年(公元34年)上元之夜生下男婴,取名道陵。道陵幼龄聪慧,7岁即着手研读《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暇时兼学天文、地理及河洛图谶之书。年长入太学,博通五经,成为饱学之士。太学毕业后,道陵回乡讲学,教授五经,从学者达千余人,人称"大儒"。

永平二年(公元59年),张道陵以"贤良"受人荐举,经朝廷考试,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并被委任为巴郡江州(今四川重庆)县令。为令期间,他目睹朝政腐败,时局动荡,深感仕途陵恶,前程难卜,心中颇为愤懑,遂生效法先祖(留侯张良功成之后,弃官辞封,飘然而去,据传得道成仙)、告退隐居之意。大约在东汉时帝后期,张道陵谢绝了朝廷的一再挽留,辞去江州令职,退隐于洛阳北邙,开始研习黄老长生之道。三年后,得黄帝九鼎丹法,神兽白虎衔冠而至,其道术日臻成熟。

建初五年(公元80年),朝廷慕其名节,下诏征为博士,张道陵称疾不起,避使不见。和帝即位后,下诏征为太傅,封翼县侯,但他视禄位如粪土,故朝廷三诏而不就。北邙近在京都门外,俗务嘈杂,为避开朝廷使者骚扰,张道陵决定远离洛阳,出游名山秀峰,访求仙术。因蜀地民风古朴纯厚,易可教化,且境内多名山仙迹,遂于顺帝初携弟子入蜀,留住临邛鹤鸣山(一名鹄鸣山,今四州大邑县境内),潜心修道。

入蜀之初,蜀地谶纬之学和神仙方术早已十分流行,张道陵直接承袭了谶纬神学的有关内容,使之成为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同时,当地故有的民间鬼道巫术,也为道教在这个地区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肥沃丰厚的土壤。张道陵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著作道书二十四篇,用晓白明快的语言,阐明"天道"的微言奥义。二十四篇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论著,也是他组织道教的总纲领。

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张道陵自云太上老君丁上元午夜降临鹤鸣山中,亲手授以三洞(洞真、洞元、洞神)经书、金丹秘诀、三五斩妖雌雄剑及都功印,并任命他为"天师",令其实行正一盟威道术,替天行道,驱除邪难。于是自创教派,是为中国最早之道教组织。该教规定,凡人道者交米五斗,以供斋之用,故世称之为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尊奉

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基本经典。张道陵还自作《老子想尔注》，声称人君按“道意”治国，国则太平，循“道意”爱民，民即寿考；人法“道意”，便可长久；并以“佐国扶命，养育群生”为己任。

五斗米道的发展过程，也是与鬼道巫术的不断斗争过程。据传，张道陵入蜀不久，即鸣钟叩磬，揭露当地原始巫教的罪恶；同时，大力宣讲自己创作的道书，积极争取民众归附。为了把蜀民从巫教的盲目信仰中解脱出来，他一方面号召民众除污害，凿井修路，解决与百姓有直接关系的生产生活等基本问题，另一方面用他摸索出来的中医医术，为民义务治病，解除病痛。张道陵兴利除弊，为民所急的高尚行为，赢得了蜀民的广泛拥戴，“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称他为张天师，把他所创立的宗教称为“天师道”。

随着五斗米道的不断壮大，人道教民越来越多，“弟子户至教万”。如何组织人数众多的教徒，是张道陵面临的又一重大问题。经过周密的设计和实践，张道陵把天师道控制的地区划分为二十四治，即二十四教区，二十四治除北邙治（洛阳市北）外，其余俱在巴蜀地区。为约束教民，他还为各教区制定了严密的组织和较为完整的教戒。至此，张道陵已经创建了一个以鹤鸣山为中心，以老子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道教区域。“治”是五斗米道的基本组织系统。五斗米道规定，天师是整个教区的最高统治者，初入道者称鬼卒，能为道徒和病人请祷仪式者称鬼吏和奸令，信仰确立并能讲授《道德经》者为祭酒。祭酒负责主持一治教民的各项具体事务，受天师直接支配，对天师负责。各治教民在祭酒鬼吏的管束之下必须孝敬长者，礼让外人，不得兴讼斗闹，欺诈世人。每年三会之日（正月七日为上会，七月七日为中会，十月五日为下会），教民必须齐集治所，听候祭酒检查，聆听教区科律。由于五斗米道化导有方，故教化所及，民风为之大变。

道家以超脱尘俗飞升成仙为最高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早期道教史上便是服食丹药，作为道教创始人张道陵自然更不例外。张道陵在洛阳北邙得黄帝九鼎丹法后，便欲依法炼治。但合炼丹药，用度靡费，而其家素贫，营田治生已非所长，靡费合丹更属不切实际，故止而不就。此时道陵成为天师，财富渐多，遂买药炼制。多日以后，药尽丹成。张道陵吞食半剂，即觉身轻欲飘，但他不愿立即抛舍徒众，升天成仙，只是略施会形小技。天师居住，门前有一大池，他常常乘舟游戏其中。道士宾客，往来盈于庭巷，室内座上亦常见他谈笑风生，接待来者。有时两个天师同时分在两处，众宾客莫不惊诧。原来座上天师即其分形，真者在水也舟中。

据传，张道陵有弟子三千，但能得其真传、置为心腹者却只有三人，一为王长，一为赵升，再者即其爱子张衡。王长擅于天文之学，精于黄老之术，在张道陵草创五斗米道时即已倾心归附，大概是他的第一个弟子。赵升，不知是何方人士。据云，张天师吞服半剂丹药，成为“地仙”以后，鉴于身边弟子“多俗态未除”，不足付托，遂留九鼎大要，以待奇人。后来果有一人于上会之日从东方来，此人冰胎玉质，超凡脱俗，天师奇之，为考验他的向道之心，张道陵七度试之，见他不贪财色，忍辱负重，同情穷人，坚守正一，对他非常满意。这人即是赵升。七试以后，天师携带各位弟子，登临云台绝岩，岩下有一桃树，果大色红。为得大桃，天师俗自试投下，众人苦苦劝阻，唯有王长、赵升默然不语。弟子劝阻不住，天师遂望树而投，结果未落树上，失其所在。众弟子惊骇悲涕，失望而归。赵升、王长相视良久，乃相谓曰：“师者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二人俱投身绝岩，正巧落在天师身边。天师笑道：“吾知汝来，遂授二人大道要术，三日乃还。诸弟子见此情景，个个追悔莫及。

桓帝永寿元年（公元 155 年），122 岁高

龄的张道陵自知大期已至，遂于本年下会之日召集各治祭酒和骨干教徒齐集鹿治堂（今四川绵阳县），对身后之事作了周密安排。会上，天师宣布，其位由张衡继承，并规定："绍吾之位，非吾家宗亲子孙不传"，正式确立了历代天师必须在张家宗亲内部继承的传承系统。

永寿二年，123岁的张道陵在鹤鸣山中神秘地消失了。据葛洪的《神仙传》记载，张道陵将《升丹经》、《九鼎大要》等传给赵升、王长后，永寿二年遂与二弟子白日冲天而去，成了名符其实的神仙。李膺的《蜀记》则云，张道陵因年老体弱，在鹤鸣山中为巨蟒吞噬，其子张衡恐人饥笑，遂编造出乘鹤升天的神话来。孰是孰非，自不待言。

张道陵仙逝后，其子张衡继任"天师"，自此，天师代代相传，至今已传64代（64代天师张源先，现居台湾）。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道教组强，标志着中国道教的基本形成。以后，经过历代天师和道教徒众的不断完善、发展，道教遂能蔚为大观，与佛、儒二教成鼎足之势，在世界宗教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张道陵在道教史上的特殊地位，故历代受封；唐玄宗册赠他为太师，唐僖宗封他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南宋理宗册封他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静应显佑真君；元成宗也加封他为正一冲元神化静应显佑真君。

张道陵的二十四篇道书是否实有，不能妄下断言，但《老子想尔注》（全二卷）却为其著作。《老子想尔注》全称《老君道德经想尔训》，该书佚失已久，今存敦煌六朝写本《老子道经想尔注》残卷，藏于不列颠博物馆。该残卷包含了五斗米道的重要教义。

天公将军张角

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宁晋南）人。太平道创始人。

张角能够创立太平道，实得力于《太平经》的启迪。据传，张角曾遇一奇翁。老翁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见角至，示一帛书，极言神验，赐之。老翁云：此神书，要求张角用它多做善事，为民造福。同时，告诫张角不要用它惑乱百性，阴谋大逆，如此则天下大安，否则即自遭天谴。言讫，老翁飞升，张角伏地叩拜，敬爱教诲。神书何名？《太平经》也。

《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道教主要经典之一，该书早在东汉中期即已传诵。顺帝时，有琅岈人宫崇，来京师投献，言其师于吉于曲阳泉上所得，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清首朱目，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多杂巫觋杂语。朝臣以为该书妖妄不经，不屑一顾，乃收藏之。桓帝时，山东文人襄楷再进于吉神书，因他在上书中攻击宦官专权，议论桓帝无嗣，故未得信用。灵帝即位后，肯定了襄楷所上神书，太傅陈蕃等亦推举之，致使襄楷名噪一时。《后汉书·襄楷传》云："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张角从何而得，史未明言。故有上文神人授书之说。

熹平间，张角正式组织太平道，太平道崇奉"中黄太乙"，其教义、教号、教区组织以及口号和活动内容、传教方式等皆从《太平经》。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病或自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不信道。"与弟张宝、张梁同在河北一带传道，接纳徒众。其弟子是了著者八人，张角分遣八人，传于四方。

时值汉末，统治集团更加腐朽，豪强势力日益扩张，加之官吏贪残，水旱交侵，人民处境苦不堪言，极为悲惨。大量农民逃亡他乡，成为流民，正常的封建秩序已完全被破坏。流民走投无路，到处暴动。"发如韭，剪复生，头发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的歌谣，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东汉民众勇于斗争的反抗精神。现实的一切，都为太平道的

迅速传播创造了条件。八大弟子分赴各处，自称贤良师，持九节杖，以巫医相结合的方式为群众防疾治病，并向群众宣讲教义，把他们组织起来。流离失所的劳苦民众，无疑也把张角看成了自己的救星，他们扶老携幼，流移奔赴，纷纷加入太平道。短短十年间，太平道徒即达数十万，连结郡国，遍布青、徐、幽、翼、荆、兖、豫八州之地。

太平道的迅速传播，引起了东汉政府的注意。熹平五年(公元 176 年)，司徒杨赐上书汉灵帝，要求朝廷严敕刺史守令“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光和六年(公元 183 年)，侍御史刘陶又上书说“张角支党不可胜计”，进一步要求皇帝“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但朝廷内部，宦官外戚交相专权，斗争激烈异常。开明官僚士子，皆被诬为党人，禁锢不用，根本无暇顾及张角等人，更不可能采取实际的镇压行动。张角等人抓住有利时机，积极组织布置武装起义。他把适合战斗的太平道徒编为 36 方。方，犹将军号，以合 36 方之神，大方万余人，小方亦六、七千人，组成 30 多万天兵天将。张角还让道徒广泛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鼓动民众起来推翻东汉政权，建立太平大吉的黄天政权，并决定在甲子年的甲子日(即公元 184 年 3 月 5 日)举行起义。张角又派人在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二字，作为起义攻打的目标。大方马元义还多次来京师，物色宦官封胥、徐奉等人，约定里应外合，中平元年(甲子，184 年)年初，张角命马元义调动荆、扬等地道徒数万北上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集结，作为进攻京师的主力。但在预定日期的前一个月，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变，马元义在洛阳被逮，惨遭车裂，洛阳百姓和太平道徒被杀者达千人之多，灵帝还随即下令冀州官府搜捕张角等主要领袖。在危急形势下，张角派人星夜驰告各方，要求他们提前起义。于是 36 方、7 州 28 郡，同时俱发，众达数十万人。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旬日之间，天下响应，八方振动，烟焰冲天。起义者因头带黄巾为号，故称黄巾军。

黄巾军的主力分布在三个地区。张角率主力活动于冀州的广大地区，是黄巾起义的中心。张曼成自称“神上使”，领导南阳黄巾军，是南方黄巾起义的中心，颍川、汝南、陈国一线，由波才、彭脱领导，是东方黄巾军的主力。自东郡(郡治在今河南濮阳南)到江淮，还有卜已、张伯、梁仲宁、戴风等人组织的黄巾起义队伍。各方黄巾军从北、南、东三个方向对京师洛阳实行战略大包围。

黄巾军在各处攻打地方政府，杀死各级官吏，焚烧官府，摧抑豪强，使东汉地方很快陷入州郡失据的状态。东汉中央，当权宦官和豪门势力互相指责，朝政一片混乱。一些官僚借口有的宦官参加了太平道，要求斩杀掌权的中常侍；有的要求“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以便共同对付黄巾起义。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三月，灵帝下诏解除“党锢”，大赦党人。同时以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于都亭，以镇京师；在京洛周围设八关都尉(八关为函谷、广成、伊阙、大谷、圜辕、旋门、小平津、孟津)，以加强京师外围防御力量。又命左右中郎将皇甫嵩和朱隽率步骑 4 万余重点进攻颍川黄巾军，解除东方黄巾军对京师的直接威胁；北中郎将卢植率北军五校士和地方官军进攻河北黄巾军；南阳一线仍由地方官军防守。灵帝还命令官吏输纳马匹、弓矢，又动用宫中库藏和厩马，以鼓士气。

颍川一线黄巾军起义后，在召陵(河南郾城东)击败了太守赵谦的地方官军，并乘胜向京师推进。四月，波才打垮了素称有才略的朱隽，进围皇甫嵩于长社(河南长葛东北)，前锋进抵阳翟(今河南南禹州市)，直指洛阳。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军事经验，“依草为营”，被皇甫嵩钻了空子。皇甫嵩派人深夜潜出，乘

风放火，草营连烧不止，黄巾军阵势大乱，死伤惨重。在匆匆撤退之中，又被朱隽、皇甫嵩、曹操三军包围，数万人被杀。六月，波才余部在阳翟、卜已部在仓亭(山东阳谷境)、鼓脱部在西华，相继被皇甫嵩镇压，颍川黄巾对京师的直接威胁暂告解除。

张曼成的南阳黄巾军起事后，很快攻下宛城，斩杀太守褚贡，有众数万。张曼成屯驻宛城城下，与太守秦颉相持一百余天。六月，张曼成败于秦颉，死于非命。黄巾军退出城外，推赵弘为帅，经过整顿后，再次攻下南阳，众达十多万，声势复振。正当秦颉败退的时候，朱隽奉命带兵赶来，会同秦颉和荆州刺史徐缪合围南阳。八月，朱隽起土山攻城，赵弘亲临前线指挥，身冒矢石，不幸牺牲。黄巾军继推韩忠为师，继续固守。朱隽采用声东击西的战略，率五千精兵攻入南阳外城，韩忠退保内城，动摇请降。朱隽利用韩忠的求降心理，诱其出城，俘而杀之，义军多数被杀。余部在孙夏带领下突出重围，向西鄂精山(河南南召南)转移。官军乘胜追击，孙夏战死，万余人被杀。南阳黄巾军至此被消灭殆尽。

冀州黄巾军起义后，在张角兄弟的亲自领导下，击斩冀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于广阳(今北京房山县)，钼鹿附近农民还俘虏了汉安平刘续和甘陵王刘忠。此后，攻占广宗(领导河北威县东)、下曲阳(河北晋县西)，并向邺城集中，准备南下京洛。不久，卢植所部官军亦到达冀州，黄巾军初战失利，张角、张梁退保广宗，张宝固守下曲阳，前后呼应，结成壁垒。卢植“筑围凿堑，造作运梯”，三个未下广宗。东汉朝廷以东中郎将董卓代之。三个月后，卓亦军败抵罪。八月，东汉政府又急调皇甫嵩到广宗，接替董卓。正当两军准备决战的时候，张角染病暴亡；其弟张梁继任统帅。“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张梁在取得小胜以后，未免狂妄自大，滋傲轻敌，戒备逐渐松驰下来。而一向以将才自任 的皇甫嵩则积极备战，准备反败为胜。皇甫嵩潜夜勤兵，亲自布置，鸡鸣时分，率众突袭黄巾军营，张梁仓皇应战。这次战役进行得十分残酷，日出时，张梁被杀，三万部众在战斗中被杀，另有五万士兵因穷途末路而赴河自裁。皇甫嵩烧其辎重车辆三万，虏其妇子无算。张角亦被剖棺戳尸，传首京师。十一月，皇甫嵩会同钼鹿太守郭典攻占下曲阳，张宝及十万部众全部被杀。

三支黄巾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其余部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仍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有的一直战斗到献帝建安中叶。经过黄巾起义的打击，东汉政权迅速衰落，名存实亡了。

黄巾大起义是利用道教组织发动的，具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明确的纲领和具体周详的计划，是中国农民战争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张角和他的太平道虽然屡受封建统治的贬抑，被正统道教诬为“妖道”和“逆乱”，但他(它)在广大社会下层中却有极深的影响，北宋宣和年间的方腊起义即宣称以张角为教主。

上清始祖魏夫人

魏夫人(251—334 年)，名华存，字贤安，山东任城人，西晋司徒魏舒之女。早年志慕仙道，喜读老庄，三传五经无不究览。常打坐静思，服药行气，亲戚来访，一概闭门不见，屡请别居闲处，而父母不许。年二十四，适南阳刘幼彦，生有二子，长曰璞，次曰瑕。但因心期幽灵，精诚弥笃，二子稍长，便与丈夫分居，斋于别室。终因精诚勤苦，感动天帝，命神人降授《上清真经》，并传播于世，从而创上清道派，为上清始祖。

传说，魏夫人与丈夫分居，斋于别室之后数月，忽有清虚真人王褒及众真人降临夫人斋室，谓夫人曰：“子注心三清，勤苦之至，我等受扶桑大帝君之命，授汝神真之道。”遂命玉女开玉笈取《上清真经》凡 31 卷，曰：“我昔

日潜心学道，遇南极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宝经31卷，诵经习行，以成真人，位居小有洞天仙王。今日所授，即昔日之文本。"随后，清虚真人王褒起立向北，毕恭毕敬，执书而祝曰："奉太帝之命，于今良辰吉日，以褒昔精思于阳洛山所授之宝书，传与魏华存，计31卷。华存当谨守明法，修真成仙。有泄我书者，身为下鬼，族及一门。"祝罢又曰："此书当传真人，不仅我得如此，子今获之，皆太帝之命。自我之后，当有七人得之，至华存则为四矣。"于是，亲手授与夫人。随后，王褒又摘经中之节度，行事之口诀，一一传与夫人。接着，景林真人又授夫人《黄庭内景经》，令其昼夜存念，诵习万遍之后，可洞观鬼神，调和三魂五脏，以至长生久视。授书已毕，众真隐形而去，遗言他日当会于阳洛山中。

此后，其夫幼彦物故，天下饥馑，夫人广舍好施，救赈贪饥，并得真人示兆，得知中原将乱，遂携其二子渡江南下。夫人自洛阳至江南，千里迢迢，流寇横行，盗贼猖獗，而夫人所过之处，皆得神灵保佑，逢凶化吉。后来二子位立，长子璞为安成太守，次子瑕为太尉从事中郎将，夫人从此得以冥心斋静，诵修虚道，因而修真日进。晋成帝成和九年（334年），清虚王君降授夫人成药二剂，服食之后，即称疾不起，七日之后，化形而去，径入阳洛山中。

夫人在世时，曾为天师道女祭酒，领职理民，尽责尽守，所以，道陵天师亲至阳洛，授以明威章奏，传治精治鬼之法。此外，清虚王君及诸真人又数降阳洛，传夫人真经要秘。夫人谨奉师训，精思苦练于阳洛山中，前后共16年，终于修道有成，白日升天，经诣上清玉阙，太帝授以天人玉札金文，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治天台大霍山洞台中，主管下界奉道应仙之人。受赐已毕，王母及众真人龙车凤辇，送夫人至天台霍山台，安驾玉宇。从此，夫人领职受命，尽心尽力，并屡降茅山，传经布道，弘扬上清。

时琅邪王司徒公府舍人杨羲，奉道精勤，当为仙真。于是，晋兴宁三年（365年），夫人降于杨宅，劝其宗道栖真，告以清规戒律，解说方术要诀，以《上清真经》31卷授之，并命其以隶书写出，再传与丹阳许谧、许刿父子，二许又另行抄写了传习。东晋末年，战乱纷起，杨羲、二许均已故去，许刿之子许黄民因避战乱，携真经入浙东，从此《上清经》开始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信奉益众。

《上清经》的问世与传播，在道教中形成一个新的派别，即上清派。该派信奉元始天王或元始天尊为最高神，以魏夫人为开山祖师，主要传习《上清真经》、《黄庭经》等经典。在修行方法上特别重视诵经、思神、服气、咽液等，也兼习金丹、符录等术，但力戒淫色之念。上清派宣扬只要谨守经戒，幽诚上达，便可招致仙官前来接引，飞升上清，以成仙真。

上清派后世传人齐梁道士陶弘景，隐居茅山40余年，建道馆、收弟子，著经述道，弘扬上清道法，使茅山成为上清派中心，因而后世称上清派为茅山宗。茅山上清派，是道教的重要派别，唐宋时，人才辈出，历代宗师名噪一时，因此，茅山与龙虎山、阁皂山合称江南道教"三山符录"，当地百姓每年春天上茅山进香，这种风俗一直延续至今。其间也数有魏夫人灵应显化于茅山的传闻，大概是后人的附会罢了。

净明教主许逊

东吴赤乌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豫章南昌的许家大院里，主妇王氏顺利产一男婴。据王氏自云，先前她曾做一奇梦，梦见金凤口衔丽珠落于寝帐之中。醒来即觉满室芬芳，通身颤动，由是有妊。今日生此男婴，许家上下一片喜庆之气，主妇王氏更以妊娠吉兆，倍加精心育护，不久，即给孩子取名许逊。望子成龙心切的许氏夫妇当然不会想到，许逊成年

以后会舍身入道，并成为净明道的教祖。

许逊，字敬之，别号旌阳，颍阳许由之后。曾祖许琰，祖父许玉，世居许昌，都是高风亮节不愿入仕的隐君子，素来受到乡民敬重。其父许肃，汉末避黄巾之乱，举室南迁，来到南昌，后遂定居于此。许逊生来颖悟，资容秀伟，性情谦逊，与物无忤。少时好射猎，不喜读书。一日入山围猎，中一母鹿，鹿胎堕地，鹿母犹顾而舐之，未几母子毙命。许逊怆然感悟，由是折弩弃矢，刻意为学，得以博通经史，明天文、地理、律历、五行、谶纬之书。舍此而外，尤其嗜好神仙修炼之术，颇能精其奥妙。弱冠，闻知西安吴猛得至人丁义神方，乃前往师事之，尽得吴猛秘术，既而与吴君同游嵩阳，闻镇江府丹阳县黄堂靖有女师谌姆多道术，遂同往致敬，叩问妙道。谌姆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夙禀灵骨，仙名在天之人，前程自然不可限量。先时有孝悌王，讳弘康，字伯仲，自上清下降，化度人世，示陈孝道，最初降于兖州曲阜县兰公家中，谓兰公曰：'后世晋代有一位叫许逊的神仙，传吾道术，当为众仙之长'。遂留金丹宝经铜符铁券，令兰公传授于我，以待许逊。吾复受孝道明王之法，也是以孝为本。既然你终于来了，我当尽数传授。"于是择日登坛，依科明授，将铜符铁券、金丹宝经以及正一斩邪之法、三五飞步之术、各阶秘诀，一一传付于他。谌姆又对吴猛说："你过去把丁义神方传于许逊，为许逊之师，今孝道明王之道只有许君有资格继承，所以你应返师于他。"这样许逊便被推上了净明道教祖的位置。

许逊自接受孝道明王之法，日以修炼为事，思想上、行动上严格按孝道要求自己，在乡里威望大增，"乡党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义"，不久即被公举为"孝廉"。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亚政府任命他为旌阳（今四川德阳县）县令。就位之初，许逊即严厉告诫胥吏要"去贪鄙、除烦苛、脱囚挚"，并以忠孝慈仁忍慎勤俭之道导谕吏民，"吏民悦服，咸愿自亲"。民风吏治为之大变。许逊还领导旌阳民众对三江上游的水利进行开发建设，解除了长期困扰旌阳人民的水旱灾害，成为继蜀守李冰之后的又一治水功臣。蜀民感其功德，歌以颂之："人无窃盗，吏无奸欺，我君活人，病无能为。"离任时，蜀民赢粮而送者蔽于山野，有送至千里才愿归还者，有随至其家愿服劳役而不想归家者。

惠帝初，晋室内部爆发"八王之乱"，朝野上下一片棼乱，社会动荡不安。为洁身自好，许逊乃弃官东归，游于江左。东晋明帝元年（公元 322 年），王敦乱于武昌，凭高视下，欲窥建康。为制止王敦叛乱，保护晋室安全，许逊乃假为符节，求见王敦。一日，许逊与同学郭璞同候王敦，"敦蓄怒以见之"，对许逊说："昨日偶得一梦，不知吉凶，拟请先生圆之，可乎？"许逊曰："请大将军细细说来。"敦曰："我梦见自己手拿一本，上破其天，这是不是预料我禅位有望呢？"许君曰："此梦并非吉兆。"敦曰："愿闻其详。"许君曰："木上破天，是'未'字也。将军未可妄动，晋祚固未终耳。"王敦听后很不高兴，又让郭璞卜卦。卦成，郭璞曰："从卦意看来，将军举事不会成功。"又问其寿，璞曰："将军若起事，祸将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王敦大怒，又问曰："卿寿几何？"璞对曰："我寿尽今日。"因命武士执之而出。许逊亦以隐身之术逃脱。离开武昌后，许逊南出晋关，抵庐江口，乘船载往钟陵。

在这之后，许逊长期游涉江湖，修德积善，为民除害。斩蛟治水的故事，成了他恩泽后世的佳话。据传，许逊在江南遇一少年，衣着修整，仪容秀美，自称"慎郎"。言谈之间，许君已知少年非人类。少年亦恐裸露真迹，因此很快请求告去。少年去后，许君对门人说："刚才来的少年乃蛟蜃之精，江南累年苦于洪害，实蜃精所为。如不及时剪除，恐其逃至别处为患。"蜃精知道真象已被许逊识破，乃潜藏于沙洲之北，化为黄牛。许君用道眼远远观察，对其弟子施大王曰："精怪已化作

黄牛了。我当化为黑牛，仍以手巾挂臂。汝见两牛奔半，当以剑截杀。”言讫，遂化身而去。俄项，果见黑牛直奔黄牛而来，大王以剑挥砍，中其左股。黄牛负痛投入城西井中。许君所化黑牛，随后亦入井中。蜃精见井中无处藏身，又从井中逃出，直奔潭州而去，化为人形。先是，蜃精化身美貌少年，聪明俊俏，富有宝货。侦知潭州刺史贾玉，有女端丽，欲求贵婿匹配。蜃精乃广用财货，遍贿贾玉亲近，遂得与贾女结为伉俪。婚后，双双住于衙署后院。每年春夏之间，慎良常常旅游江湖，归则携带宝货无数，几年之后家资几至数十万计。贾玉之亲姻僮仆，莫不赖之而成为富豪。至是，蜃精空空而回，且云被盗所伤，举家无不叹惋。正在这时，典客来报，云有道士许敬之求见。贾公延入客室，许君谓贾公曰：“闻君有贵婿，请求一见。”贾公命其出见，慎郎畏怖，托疾潜藏。许逊厉声说道：“你这江湖害物，怎敢如此，还不快快现形。”于是蜃精化为原形蜿转堂下，许逊挥剑斩之，此后江西太平。据云，今江西分宁县梅山尚有许逊磨剑之地。斩蛟之事，当然出自古人虚构，但治水除灾却非乌有。隋唐以后，遍布江西、“不可胜计”的许逊观府、靖坛，以及规模庞大庄严的崇拜许逊的宗教活动，已经表明了江西人民对这位治水英雄的至深怀念。

许逊受孝悌之教，传孝道明王之法，张净明忠孝之本，为日后净明道的形成、壮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许逊主张道、儒兼修，要求道徒内用道、儒敦品修身，外用符录法，积功累德。他说：“净明者，无幽不烛，纤尘不染。愚智皆仰之为开度之门、升真之路”，勤修拂拭，日积月累，即能“道气坚定、神人伏役，一瞬息间可达玄理”。自言曾遇上圣传以“太上灵宝净明之法”，故崇拜太阳真君教道明王（号灵宝真人），由此成为一派教祖。凡来参学弟子，皆尊之曰道师君。

据传，许逊在世 136 年，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 374 年）八月一日，举家 42 口拨宅上升而去。唯有石函药臼各一所、车毂一具，与其所御锦帐，又从云中落于故宅，遗迹至今犹存洪州西山。

许逊飞升后，里人与其族孙简就其地立祠纪念，以其所遗诗文 120 首写于竹简之上，置于巨筒之中，令人探取，以决休咎，名之曰“圣签”。后改祠为观，因锦帷名之，曰“游帷观”。隋唐时，焚修中辍，观亦寻废。唐永淳（高宗年号，公元 682 年—683 年）中，天师胡惠超重兴建之，“明皇尤其夤奉”。宋朝太宗、真宗、仁宗皆赐御书。宋真宗还派遣中使赐以香烛、花幡、旌节、舞偶等物，改赐额玉隆，禁止占山采樵，并蠲免当地赋役租税。徽宗政和二年（公元 1112 年），遣内使程奇请道士 37 人于洪山玉隆观建道场 7 昼夜，诰封许逊为“神功妙济真君”。政和六年（1116 年），徽宗夜梦许逊真灵下降，托以修整西山遗迹，即下诏洪州改修，并改观为宫，仍如“万寿”二字。元朝成宗皇帝时，加其封号曰“至道玄应神功妙济真君”。于是世称许逊为许真君。

许逊一生颇有著述，传世有《太上灵宝净明飞仙度人经法》、《灵剑子》及《石函记》等。

浙东水仙孙恩

东晋隆安三年（399 年）十月，浙东海岛一反往日的宁静，显得嘈杂喧闹，群声鼎沸。人们紧张地忙碌着，有的有条不紊，有的略显慌乱，看来，海岛要出大事了。

海岛西部的坪场上，一支百人上下的队伍正迅速集结，他们手中那原始简陋的武器与他们那山一样强壮伟岸的身躯，似乎已经说明了什么，是的，这是一支非同寻常的队伍，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道教信徒。

简单而又庄严的誓师仪式结束后，他们出发了。他们分乘几艘战船，带着虔诚和信仰，怀着不满和仇恨，义无反顾地向着大陆驶

去。孙恩,是他们的领袖。

孙恩,字灵秀,祖籍山东琅岈(今山东胶南、诸城一带),后来举族徙居江南琅岈郡(今江苏句容北)。琅岈孙氏在江南位列庶族,累世崇奉五斗米道,是举族崇道的少数几个家族之一。自东汉于吉以来,五斗米道就在江南的会稽、吴郡一带传播。晋孝武帝时,有钱塘人杜子恭在此传教授徒。据《晋书·孙恩传》记载,子恭颇有秘术。一日,向人借一瓜刀,刀主让其归还,子恭云:"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遂得瓜刀。其秘术如此。孙氏家族南渡后,孙恩叔父孙泰师事杜子恭,子恭死,孙泰继为浙东五斗米道教主。孙泰为人狡黠,亦有小才,浙东百姓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求福庆。同时,社会上层亦有信奉其教者,"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谘议周勰等皆敬事之。会稽世子(司马)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当时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执掌中枢,专擅国政,致使国家政治败坏,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十分激烈。孙泰因卷入普室内部斗争之中,加之其影响较大,引起了东晋统治者的怀疑,遂以他故被流放广州。

孙泰到达广州后,被广州刺史王怀之暂任为玉林太守,南越亦归其管辖。时太子少傅王雅先与孙泰友善,上书孝武皇帝,以孙泰知养性之方,请求召其归还。孝武帝然之,委任孙泰为徐州主簿,不久即升为辅国将军、新安太安。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 398 年),王恭、桓玄、殷仲堪等起兵为乱,进攻司马元显。孙泰乘此机会,私合义兵数千,讨伐王恭。时天下变乱,孙泰以为晋祚将尽,乃鼓动百姓,私集徒众,聚财货钼亿计,准备起事。三吴士庶,亦多从之。朝士皆惧孙泰起兵反晋,但因他与司马元显交情甚厚,莫敢言者,后有会稽内史谢蝤上书告变,司马道子父子出于个人利益,遂诱斩了孙泰和他的 6 个儿子,泰兄之子孙恩逃于海岛(约为今浙江舟山群岛)。

孙泰的信徒,听说孙泰被杀,不肯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固执而虔诚地认为自己的教首已蝉蜕登仙,并纷纷给逃亡海岛的孙恩馈送资财。这样,孙恩就在海岛上团聚了 100 多个立志复仇、坚决反晋的同志之士。

隆安三年,司马元显了为同拥兵自重的桓玄(桓温之子,据有长江中游)、刘牢之(北府名将,据长江下游北岸)等相抗衡,决定组织一支由他直接控制的军队,于是下令征发浙东八郡"免除为客者(免除农奴身份成为佃客的人)……充兵役",一时激起浙东依附农民的普遍骚动。流亡海岛的孙恩认为时机已到,杀上虞令,远近百姓无不拥戴。遂乘胜进攻浙东重镇会稽,杀会稽内史王凝之。王凝之,书圣王羲之之子,工草隶,世奉五斗米道,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孙恩进攻会稽时,内史僚佐请求戒备,凝之不从,日日于道室稽颡跪咒。属官请求出兵讨敌,王凝之曰:"吾已请借鬼兵守诸要津,各数万,贼不足忧也。"等到孙恩进逼城下时,他才答应出兵破敌,但为时晚矣!结果兵败被杀,祸及妻子。孙恩在浙东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响应,被迫应征的八郡奴客和占有奴客的郡地主,"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孙恩的队伍迅速壮大,旬日之间,众至数十万。京畿附近的一些州县亦"处处蜂起",甚至建康城内也有孙恩党徒在暗中活动。起义形势的发展,使东晋朝廷十分惊恐,上下内外,处处戒严。孙恩军队所到之处,焚烧官府,捕杀官吏,江南地区的士族名士,或杀或逃,杳无存者,浙东八郡很快为起义军占领。孙恩坐镇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徒众为"长生人",对拒不归降的异己之徒,诛杀不贷。东晋王朝在浙东的统治土崩瓦解了。

浙东是以王、谢为首的世族大地主庄园所在地,浙东的陷落,直接损害到了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东晋统治者要派遣大军镇压,选择元帅,也自然以物色王、谢两族中人物来担此重任为适宜。北府宿将、卫将军谢琰(前宰相谢安之子)正是那时王谢两族中最有威

望的人物，被任命为会稽内史兼督吴兴、义兴军事，前去收复浙东。北府名将、南徐南兖二州刺史刘牢之亦发兵前往浙东，协助谢琰镇压。隆安三年十二月，谢琰率军攻下义兴，击杀农民军头领许允之。接着进兵吴兴，击走农民军头领丘尪，屯兵乌程，别遣高素分兵配合刘牢之，向钱塘江推进。

当初，浙东起事，八郡响应，孙恩大喜，告其部属曰："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而听说刘牢之已兵临钱塘江复曰："我割据浙东，不失作句践也。"不久，刘牢之兵过钱塘江的消息传来，孙恩乃曰："孤不羞走矣。"遂率男妇20余万口向东撤退。官军随后追击，高素攻破山阴，杀孙恩所置吴郡太守陆瓌、吴兴太守丘尪、余姚县令沈穆夫。刘牢之兵至浙东后，纵军暴掠，所过郡县"城中无复人迹，月余乃稍有还者"。百姓对此十分怨恨。孙恩退还海岛后，为防备他再次登陆，朝廷任命谢琰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率徐州文武戍守海浦。谢琰既以资望镇守浙东，议者皆以为从此无复东顾之忧。乃至会稽，既无绥抚之能，又不认真戒备，令人大失所望。诸将咸谏曰："贼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开其自新之路。"谢琰不从，且大言曰："苻坚之从百万，尚送死淮南，孙恩小贼，败死入海，何能复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杀之出也。"

隆安四年（公元400年）王朋，孙恩第二次从海岛登陆，连克余姚、上虞，进至邢浦（今浙江绍兴市北35里），为谢琰参军刘宣之所部击退。几日后，孙恩再度进至邢浦，败上党太守张虔硕。官军的失利和孙恩乘胜锐进，使浙东人情震骇。面对劲敌，众将都认为应稳妥持重，严阵以待，并要求谢琰于会稽南湖布列水军，分兵设伏，以待孙恩。但谢琰恃才傲物，拒不接受。不久，孙恩军至会稽。听到义军倾师来攻，尚未进餐的谢琰拍案而起，对诸将曰："当先灭此寇而后食也。"遂跨民而出，冲入敌阵。会稽城外，河汊纵横，孙恩早在塘路两边布下水军。谢军兵士一入敌阵，就受到孙恩水军的猛烈箭射，前后不能照应，首尾断绝，阵势大乱，谢琰帐下都督张猛见官军败局已定，遂杀之投降。谢琰，这位志大才疏不可一世的谢门名将，就这样饥肠辘辘地战死在会稽城下了。

谢琰被杀，朝廷大震。立即增派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等四处堵截。十一月，孙恩大败高雅之于余姚，雅之走山阴，东晋朝廷紧急任命刘牢之为镇北将军，都督会稽、临海、东阳、永嘉、新安五郡军事，统兵进击，屯于上虞，并分军防守诸县。孙恩见朝廷布守严密，乃退至海岛。

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二月，孙恩从浃口（今浙江镇海县东南）登陆，高雅之败绩。孙恩别遣水军进攻句章（今浙江宁波市南），为刘裕所败。三月，孙恩转攻海盐。海盐兵力单弱，刘裕以空城之法计退之。五月，孙恩率军北上，攻破沪渎（上海），大败晋军，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孙恩浮海疾进丹徒，准备一举攻下建康。时义军战士十余万，楼船千余艘，军容极盛，而建康则兵力虚弱。东晋统治者急忙下令驻守江北的军队入卫京师，远在山阴的刘牢之也派刘裕自海盐兼程赴援。孙恩得知建康已有防备，遂分兵一部进攻广陵（杨州），自率水军浮海北上，下郁洲（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生擒晋将高雅之。八月，刘裕被任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领水军追至郁洲。孙恩在郁洲、沪渎、海盐三战刘裕，三战皆败，死伤万余人，不得不从浃口远航海岛。

在这以后，由于东晋王朝加强了沿海地区的防务，孙恩给养发生了严重困难。不久，军队内部又传染疾疫，死者大半，势力由是渐弱。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三月，孙恩第四次登陆，进攻临海，为临海太守辛景所败，军队损失惨重。孙恩经受不住打击，悲观失望，遂投海而死。徒众谓其已成"水仙"，投水相殉者100余人。孙恩死后，余众由其妹夫卢

循率领,转战广州。卢循后为刘裕所败,亦投水自尽。

孙恩起义是继汉末黄巾起义后利用民间道教组织发动的以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晋王朝腐朽的门阀统治,导致了晋朝的覆灭。孙恩起义失败后,五斗米道由于自身的原始落后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上层道徒为了满足上层需求,也加紧了对民间道教组织的整顿和改造。经过这次重大变革,早期原始幼稚富有反抗精神的五斗米道逐渐发展,完备成熟,成为统治阶级所认可的新道教。因此,我们说,孙恩起义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孙恩一生著述不多,《隋书·经籍志》著录《孙恩集》五卷,已佚。

仙道葛洪

"采药仙人去不返,古池冷浸梅花月"。东晋康帝建元元年(公元 343 年),被后人称为金丹仙翁的葛洪,在广州罗浮山都虚观里安然故去。只见他双目微眠,颜色如生,身骨柔软,轻若空衣,世人皆云已尸解成仙。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世称小仙翁,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生于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 年)。葛洪先世"葛天氏"因食封葛地,遂以葛为姓。东汉初,其先祖葛浦庐起兵佐光武建汉有功,官到骠骑大将军,爵封下邳僮县侯。浦庐孝悌,后让国于盲弟葛文,自己携带家小,南渡长江,到了句容定居,以典籍自娱,子孙繁衍,至于累世。三国时,葛洪祖父葛系,学无不涉,有经国之才,后来官至辅吴将军,封寿县侯。其父葛悌,年轻时即以孝友闻于丹阳,成为士大夫的楷模,仕吴,历任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令郎、廷尉平、中护军,再拜会稽太守。入晋后,除郎中,迁大中大夫,历位大中正、肥乡令,迁邵陵太守。葛洪是葛悌的第三子,幼时极受父母宠爱,直到 13 岁尚未入学经史。

元康五年(295 年),葛悌死于邵陵太守任上,是年葛洪只有 13 岁。葛悌死后,葛家家道中落,赖以维持生计的只有数十亩土地和为数不多的积蓄。但事隔不久,又遇兵火之灾,散兵游勇把葛家财产一掠而空,先辈留下来的书籍亦损失殆尽。随着家境的变迁,葛洪的骄砣时代也宣告结束。在生活的压迫下,葛洪不得已而躬耕垄亩,并于农暇时发奋读书。在母亲和兄长督导下,他首先阅读了诸如《春秋》、《左传》等故事性较强的史类书籍。后来家中之收读完了,葛洪只好行借他处。为了寻书问义,葛洪常常徒步行走,有时甚至不远百里。他不砍柴卖钱以买纸笔,将借来的书一一抄下,以便随时诵习。随着阅读量的逐渐增大,葛洪视野渐趋开阔,15 岁时,已能作些诗赋杂文。

从 16 岁起,葛洪开始广览经、史、百家,短短几年中,即以惊人的毅力读书近万卷,开始以儒学知名。虽然如此,葛洪仍属粗而不精,大义不通。为了精治五经,广求异书,著作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葛洪遂于此时投奔到大儒郑隐门下。

郑隐,字思远,本大名儒,明五经,善律历,喜纬候,晚而好道,师事葛玄,受仙经,知丹道,于九宫、三棋、天河洛、谶记,莫不精研,成了深通丹道的道士。乃师葛玄,不是别人,正是葛洪叔祖。葛玄在东吴时非常出名,甚得吴主孙权崇信,因其仙技颇有神验,吴人称之为"葛仙公"。郑隐虽为道者,却以《礼记》、《尚书》教授学生,见之者皆肃然起敬。此时郑隐已有弟子 50 余人,皆充仆使之役,但因葛洪居末,年龄最小,又为葛玄从孙而深得郑隐垂青。郑隐所藏道书甚丰,经常命葛洪抄写,这使葛洪得以独揽了大批别人难得一见的道经,并对古人工的隐逸之士产生了向往仰慕之情,初步树立了隐逸思想。经过几年的考验,郑隐也认为葛洪是继承师道的最佳

人选。于是立坛马迹山，盟誓以后，将金丹仙术及其口诀尽数授于葛洪，并传给他一些重要仙经。

西晋惠帝太安元年（公元302年），郑隐预料江南将有兵乱，以马迹山离其甚近，非可久留，遂带入室弟子数人，负书籍仙药，北投霍山（今山西霍县东南）。葛洪以他故未能从行，只好回到故乡丹阳。

太安二年，八王之乱进一步扩大，中原地区民生日艰，流民纷纷举行起义。起义于湖北安陆的张昌，很快占领江南的部分地区。这年春，张昌遣部将石冰进攻扬州，郑隐的预言应验了。石冰占领杨州后，迅速攻下所属的丹阳、会稽、吴、宣城等九郡。

义军在江南的行为，引起了当地人士的不满。大都督顾秘积极组织力量，准备反扑。葛洪惟恐家乡失陷，乃奉顾秘之召，在家乡募集数百勇士，参加镇压石冰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葛洪表现出很高的军事指挥才能，以战功迁至伏波将军。永兴元年（公元30年），石冰战败被杀，江南事平，叙功之际，葛洪未被录用，于是投戈释甲，回归故里。永兴二年，葛洪为广其学，决定北上洛阳，搜求异书。

其时八王之乱方殷，京洛地区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市里为之成墟，葛洪去路为兵乱所阻，只好归返。恰在此时，屯兵历阳（今安徽和县）的司马越右将军陈敏又据江东为乱，葛洪陷入进退无由的境地，过去草创的子书，亦丢失大半。在颠沛流离中，葛洪饱受战乱之苦。由于愤世嫉俗，不愿尘事，他更坚定了自己隐逸山林，修道养性的信念。

葛洪由儒向道的转变，与其自身性格和当时特殊的社会现象有着极其深刻的关系。据葛洪自称，他少年时代就“体钝性驽，寡所玩好”，“期于守常，不随世变”，性格内向，终日默然，对当时在富家子弟中极为流行的斗鸡、走马、弈棋之类的博戏毫无兴趣，与其他贵宦之子相比，显得不入群俗，不合时宜。但他并不以此为意，认定的事情总是不顾社会舆论的非难，勇往直前地朝前既定目标走下去。葛洪从青少年时期就为自己确定了目标，这就是归隐山林，著作一部子书，炼制金丹，修道成仙，为达此目的，他笑看世人的误解和嘲讽，洁身独行，终有所成。葛洪一生奉行安分知足的处世哲学，并把这种哲学同修道结合起来，称其为“真知足”。他说，一个人若能达到这种境界，既可“藐然不喜流俗之誉，坦尔不惧雷同之毁，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污其纯粹”，把真知足看成是通往神仙境界的阶梯。葛洪破除了当时社会上崇尚做高官、求功名的儒教传统，提出了隐逸高于达官显宦的新价值观念。弄清了葛洪不同于世人的特殊个性，再来分析一下当时特殊的社会现实。葛洪生活在政治黑暗、内外矛盾交织、社会动荡不安的晋世，由于生活很不安定，其精神消极悲观，常常自叹“居世如此，可无恋也”。另外，司马氏政权对江南士族实行歧视政策，从吴土归附的初年算起，40年来把他们排除在经术考试之外，“视同于左衽之类”。葛洪在进取无路的条件下，立志“决不出身”，并最终舍儒归道，显然是不难理解的。在这以后，葛洪虽有几次被迫出仕，但都为时很短，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归道初衷。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镇南将军刘弘任命稽含为广州刺史，稽含与葛洪有旧，遂推荐他为参军。葛洪本不愿意为官，但觉得“利可避地于南土”，便接受了稽含的邀请，先期到广州催兵，不料稽含被仇人暗杀。原来，稽含与刘弘司马郭励有隙，临行前，有消息说刘弘准备把原定给郭励的荆州刺史职位改给稽含。郭励听后异常愤恨，以为稽含从中作梗，遂于夜间带人刺而杀之。葛洪只得羁留广州，着手《抱朴子》的写作。

葛洪在广州滞留多年，绝意仕进，隐居罗浮山，惟与南海太守鲍靓相善。鲍靓，字太玄，琅岈人，汉司徒鲍宣之后，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之书，师事左慈，得其仙术，能役使鬼神，封山镇魔。永康二年（公元301年），鲍靓

登嵩山，得古《三皇文》，后又在江东遇神仙阴长生，受尸解成仙之法。鲍靓对葛洪非常器重，于永嘉六年(公元312年)授葛洪石室《三皇文》，并将爱女鲍姑嫁给葛洪为妻。投在鲍靓座前的葛洪，已不再是郑隐门下那个“意思不专，俗情未尽，不能大有所得”的少壮了，经过打击和磨炼，葛洪此时已专注不二，潜心修道。

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314年)，葛洪同岳父鲍靓离开广州，北返故里，谢绝了官府、守将的做官邀请，一边整理多年所学，一边服食炼丹，不顾世人讥讽，坚定地保持道家清贫精神，继续磨炼意志，继续著书立说。

建兴三年，琅邪王司马睿为丞相，大事延揽人才，“收贤人君子”，葛洪被荐名琅邪王丞相府。而后匈奴刘曜陷长安，俘愍帝，琅邪王承制即位建康，改元建武，重建司马晋朝。葛洪成了东晋“百六缘”中的一员。就在这一年，葛洪完成了他的《抱朴子》的著作。

《抱朴子》分《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20卷，宣扬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的仙道学说；《外篇》50卷，论述人间得失、世事臧否的经国治世之道，属政论性著作，深受历代统治者重视。

太兴元年(公元318年)，晋元帝即皇帝位，下诏旌录吴之高德名贤，葛洪因前次破石冰有功，赐爵关中侯，食句容之邑200户。葛洪上书固辞，例不见许。

在这以后，东晋朝局多变，斗争激烈，北方士族多受重用，江南士族离仕归隐。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乱于武昌，葛洪遂退隐山林，直到咸和元年(公年326年)。

咸和初，司徒王导召葛洪为杨州主薄，后转司徒椽，再迁为谘议参军。咸和四年(329年)，葛洪以好友郭文辞世，感叹人生无常，又复归隐，在浙江上虞兰风山等地修道，带领门徒和子侄从事炼丹。这期间，奉敕修晋史的著作郎干宝以葛洪“才堪国史”，又推荐葛洪出仕，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皆固辞不就。

晋成帝咸和八年(公元333年)，葛洪自感年迈，急于炼丹自卫，听说交趾产丹砂，便请求到交趾郡的勾漏县作县令。成帝以其资高望重，不宜为令为由挽留。葛洪上书固请，终得应允。第二年，葛洪带着妻子侄儿南下广州。时广州刺史邓岳慕其为人，邀留葛洪在广州为官，并说广州丹砂与交趾无异，足可炼丹，葛洪遂留于广州，隐居罗浮山。

罗浮山，位于今广东博罗县境，峰峦迭翠，清水幽泉，是理想的修隐之所，被道家称为“第七洞天”、“第三十二泉源福地”。在罗浮山中，葛洪一方面博览道经，著书立说，一方面修道炼丹，优游闲养。

东晋康帝建元元年间，不知何事突然勾起了葛洪对先师的怀念，在给广州刺史邓岳的信中写道：“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邓岳得信，仓促往别，未至，而葛洪则坐至中午，象睡着一样死去了。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喜好神仙导养之术，崇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以长生成仙。同时又将神仙方术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道教徒要以忠孝、言顺、仁信为本，如果德行不修，但务方术，最终不可长生。葛洪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对儒、墨、名、法各家兼收并蓄。葛洪对神仙可成的论证，充实了道教理论；他对学仙修道可以不改世事俗务，特别是对儒道可以调和、互相补充的论述，使道教易于为统治阶级所容纳，从而为道教的官方化打下了基础。经过葛洪的整理改造，道教追求肉体飞升、不死成仙的基本特征得以完全形成。

葛洪继承了东汉方士左慈、从祖葛玄和其师郑隐的炼丹理论，整理了当时较为流行的各种炼丹方术，并在长期研制金丹的实验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某些物质的特性及其化学变化，写下了有名的炼丹著作，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为研究中国炼丹

史以及古化学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

葛洪对后世道教流派的影响很大。他死后不久，其地位即上升到可以与三张（张陵、张衡、张鲁）相提并论。陆修静曾得“祖述三张、弘衍二葛（葛玄、葛洪）”之褒扬；南齐明僧绍撰《正二教论》并提“张葛之徒”。后世道教很多经书都托名抱朴子，以抬高身价，足见葛洪在道教史上地位之重要。

葛洪死后，其弟子中最著者有葛望、葛世、滕升、黄野人等。葛望、葛世为其家族成员。《罗浮记》云：“正座望葛洪，旁有黄野人侍立”，似乎黄野人的知名度还在另外三人之上，据说罗浮山至今还别称“黄葛山”。

葛洪著作极多，除《抱朴子》外，尚有《玉函方》100卷（已佚）、《肘后备急方》4卷、《碑颂诗赋》、《军书檄移章表笺记》30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偏撰《兵事方伎短杂奇要》311卷，另有《神仙传》、《隐逸传》、《良吏传》各10卷。

帝王之师寇谦之

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京师平城东南的玄都坛旌旗招展，烟雾腾腾；玄都坛外，万头攒动，瞩目高坛；神坛之上，只见一“天师”，精神抖擞，大展“仙术”，忽而灵咒降神，忽而八音迎驾，忽而步虚赞颂，忽而祈请符录。一番折腾之后，终于功德圆满，一册太上老君赐予的、可以代天神役使三界：（天、地、人）官属和符录，就到了“英明圣武”的太武帝手中。这位神通广大、施展法术的“天师”，就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国师、北天师道的教主——寇谦之。

寇谦之（365—448年），字辅真，冯翊万年人。本出身士族，父兄皆为官宦，然而寇谦之自幼无心仕进，“乃倾心慕道”，从家中残存的道书、道器，以及民间流传的道术中，他找到了无穷的乐趣。他整天诵经打坐，练气服饵，虽历经数年无效，却坚持不懈。

正当山穷水尽之时，忽遇柳暗花明。一日，寇谦之到姨母家游玩，见一帮工公成公兴正佣耕力作，形貌甚奇，遂带回家中，令其开垦舍南之田。后来，在一次筹算《周髀》时，发现成公兴本是一位身怀奇学的风尘异人，他不仅长于天文、历算，而且还深解佛道，精通医术。寇谦之大为惊奇，遂拜成公兴为师。不过，他不知道，正是因为他修道精勤，“幽诚上达”，感动了上天，才派成公兴下凡，引他入山修炼。成公兴本为一仙人，因火烧仙宫，被罚下界为寇谦之之受道7年，期满升天。这样，寇谦之学道累年，终遇明师，从此，他的学道生涯发生了巨大转折。

寇谦之拜师不久，成公兴便对他说：“先生有意学道，当然与公兴隐遁。”谦之欣然从之，于是，“浩斋”三日，随成公兴出家修道。先至华山，采得仙药，食之不饥。随后即往嵩山，潜心修炼。

嵩山，古称“中岳”，位于河南登封县西北，在道教中被称为第六小洞天，其神名中天崇圣帝。山有七十二峰，巍峨挺拔，远远望去，层峦叠嶂，郁郁葱葱，真乃仙灵胜境。相传晋代道士鲍靓曾登此山，入石室，得古《三皇文》，修炼成仙。故而成公兴、寇谦之追踪前贤，来此修道。他们选定北山石室为修炼之所，不分四时，不舍昼夜，精心修道。广泛玄机。就这样，成公兴尽心传授，寇谦之敏而好学，道学大有长进。不觉已7年过去，成公兴谪降期满，尸解成仙，飞升而去。临别时，成公兴十分惋惜地说：“谦之笃志道教，潜心学术，然而尘缘未尽，七情未绝，难以成仙。不过，依你的气质学识，去当帝王之师，日后定成大器。”寇谦之牢记师训，不敢有怠，公兴虽去，而他依然“守志嵩岳，精专不懈”。与此同时，他开始广收弟子，布道施术，扩充信徒，以期弘扬道教。

寇谦之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割据

混战、动荡不安的时期。在他修道之前，中国北方是前秦的一统天下。公元383年淝水一战，前秦惨遭失败，随即土崩瓦解，北方再度陷入分裂、战乱之中。

公元386年，鲜卑拓跋部建立了北魏政权。北魏统治者一方面积极吸收汉人的先进文化，努力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另一方面励精图治，南征北战，扩大疆域，因此显得生气勃勃，大获成效，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就占领关东的大遍地区，北方汉族士大夫也都竭诚归顺，成为北魏统一中原的有力基础。为了进一步发展势力，争取民心，北魏统治者还自称是黄帝后裔，因此，对于可以强化皇权、笼络汉族地主的儒家学说极为推崇，佛道二教作为汉族地主阶级所尊崇的宗教，也为北魏统治者所重视。据《魏书·释老志》载：北魏太祖道武帝"好黄老，颇览佛经"，太宗明元帝"亦好黄老，又学佛法，而且置仙人博士、玄仙坊，煮炼百药"。

割据、战乱和苦难，给"济世度人"的宗教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而统治阶级的提倡，又为宗教传播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可以说，当时中国北方的形势，对宗教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可是，作为道教自身来说，情形并不容乐观，实际上已面临没世绝传的危机：一方面，自强陵逝世、张鲁兵败汉中以后，道教自身的情况已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它草创不久，一直存在着教义粗浅、科仪简单、组织不健全等缺陷。加上三国时期魏、吴统治者尊儒抑道，道教徒迁居僻张，群龙无首，组织涣散，科律废驰。此外，早期道教吸引人的方式，无蜚符水治病、祈福禳灾、男女房中交接等精陋低能的老一套，所以难为有知识的上层统治阶级所接受。更不合时宜的是，道教教义中一些主张平等、平均、反对不劳而获的思想，往往被劳动人民用来作为造反的思想武器。两晋以来，以道教为外衣而发动的人民起义"岁岁有之"，这就使得两晋以来的统治者在追求长生、迷恋方术的同时，又对道教怀有一种戒备心理。东晋末年孙恩起兵作乱，要求信徒"竭财产、进子女"，而且在战争中杀戮也异常残酷，使得道教大失民心；另一方面，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此时逐渐在中国扎根、兴盛发展，佛道争夺法统的斗争日益激烈。道教要想对抗佛教，维护其地位，就必须清除弊端，丰富道教思想，完善教义，因此，道教改革势在必行。

寇谦之作为一个有识之士，对当时道教面临的严峻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要登上"帝王之师"的宝座，单凭这点修道资本是不够的，因此，他就着手改革旧道教，为其走出民间、步入殿堂打下基础，同时，也为自己位登国师博取政治资金。

寇谦之对道教的改造，也未超出其前贤之故伎，即托称天神降授经书，赐予新科。寇谦之继承并发扬了这个传统，先后两次托神造经。

第一次是在北魏神瑞二年（415年），传说太上老君在仙人玉女相伴、百灵导从之下，降临嵩山，谓谦之曰："往岁嵩山山神上奏天曹，称自从天师张陵去后，地上修道之人无所师授。今有嵩山道士寇谦之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堪处师位。吾故来授汝天师之位，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又名《老君音诵诫经》）。"并谆谆告诫："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炼。"这段老君降临的故事，当然是寇谦之自己编造的神话，但通过这个神话，寇谦之便轻而易举地获得天师之位，争得道教正统。同时，借老君之口，指明了旧道弊端及道教改革的方向，为寇谦之日后的改革提供了神圣的依据，世人无可疑虑。

寇谦之第二次托神降临，是在北魏泰常八年（423年）。据说当时正是金秋时节，晴空万里，秋高气爽，寇谦之端坐石室，诵习《老君音诵诫经》。忽然，天空中云蒸霞蔚，五彩缤纷，灵光普照嵩山，只见云上端坐一位神

仙，原来老君玄孙上师李谱文降临嵩山。寇谦之不敢怠慢，赶紧上前拜谒。上师称：受老君之命，特为授汝能“劾召百神”、定“坛位礼拜、衣冠议式”的《录图真经》，并传授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让他谨慎奉持，“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寇谦之自然感激涕零，立誓凛遵。

通过这两次托神降书，寇谦之就获得了为“帝王之师”的资本，同进也获得了改革道教的神圣依据。为了向统治阶级靠拢，早日实现其“国师”的美梦，于是他就积极着手改革旧道，创立新的教规和斋议。其改革内容大抵如下：

（一）取消蜀土宅治之号，勿复承用。

“治”是五斗米道管理一片地区教民的基层组织，“治”的首领称“祭酒”，教民每年三会于“治”。后来五斗米教徒迁居各地以后，仍然保留原来的宗教组织及名称，造成了五斗米道山头林立，组织涣散，因此，寇谦之假托老君授言，宣布：“其蜀土宅治之号，勿复承用。”

（二）取消“天师”，“祭酒”之位的世袭制度。

自张陵创天师道，“天师”之位，子孙承袭，陵传衡，衡传鲁……而寇谦之由于“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所以被太上老授予天师之位，从而打破了三张祖孙世袭天师职位的惯例。此外，寇谦之还托老之言：祭酒之官，父死子系，使益荒浊。因而诫曰：“道尊德贵，惟贤是授。……诸道官祭酒，可简贤授明，未复按前父死子系，使道教不显。”这里显然是吸收了儒家“唯贤是授”的思想，从而能有效提高道官的素质。

（三）革除租米钱税。

五斗米道规定，教民须向“祭酒”交纳租米镥税。寇谦之认为，道官祭酒，取人金银财帛，贪秽入已，从而败坏教风，丧失民心。老君对此也极为不满，诫曰：“吾初立天师，岂有了一钱之法乎？吾今出新法，按而奉顺。从今后，若有道官浊心不除，不从正教，听民更从新科正法清教之师。”这样限制了道民搜利教民、危害百姓的行为，从而有助于招揽信徒，扩大影响。

（四）除去男女合气之术。

五斗米道教认为，教民只有通过“男女合气”，才能得到释罪，成为“种民”，三张亦行此术，因而淫风大行，损辱道教。寇谦之对此竭力反对，他借老君之言：“大道清虚，岂有斯事”，宣布予以废除。

（五）宣“新科之诫”，提倡礼法。

五斗米道信仰炼形可以长生久视，服饵可以成仙。寇谦之认为，靠服食饵药不能长生成仙，最多只能保证除病寿终，要想长生久视，就必须“建功斋请”、“诵诫”，以感通天神下界接引，才能飞升成仙。因而坚守老君训诫：“专以礼度为道，而加以服食闭练”，把道教传统的服饵闭练放在次要地位。

在这里，所谓“建工斋请”、“诵诫”等，都是提供斋仪式，以礼祈神降度。正因为如此，寇谦之吸取儒家礼法仪式有音乐伴奏的形式，改“直诵”道经为“乐诵”，以示重仪、倡礼度。所谓“专以礼度为首”，实际上是提供封建伦理道德，以此来制约人心，使之符合封建礼仪规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这是道教教义的一个重大变化，以前的五斗米道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民间巫觋，未免粗陋浅薄，且不能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而这里寇谦之则公开提供封建礼法，视之为修仙之要，显然易于博得封建统治阶级的赏识，有利于促进道教与统治阶级的结合。

（六）倡轮回报应之教义。

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本出自佛教，为了警训世人，寇谦之把它引入道教。宣扬前世之善恶，影响今身修行之成效；今世之善恶，又影响来世。声称：谁要是惑乱万民、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就要被太上老君打入地狱，受尽刑罚。“罪重之者，转生虫畜”。这显然是针对人民反抗封建压迫、造反

起义而制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以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试想，如果今生反逆，来世转生牛马鸡狗，受人鞭挞、屠宰，岂不悲哉！早知如此，谁还敢造次！

总之，寇谦之的改革，意义深远。经过改造之后的道教，从组织到教义以及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封建礼法制度为依据而建立的一整戒律和斋仪制度，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从而为道教从民间进入殿堂奠定了基础，故此以后的道教史称为“新天师道”。在他之后，南天师道大师陆修静、陶弘景从理论、神仙谱系等方面进一步对道教进行清理，使道教最终脱下了巫觋粗陋破蔽的外衣，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哲理、神谱、仪式等完整体系的宗教，从而影响中国的民族文化至深至远。

可惜的是，寇谦之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所迷恋的，不过是“国师”梦罢了。

寇谦之青年时代就已抱定以道教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野心，但是，当时中国北方处于“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割据之中。弱小之国，不足为恃；而一些强劲大国，对道教都不感兴趣，甚至排斥，也不是投靠的对象，所以，寇谦之隐居嵩山30余年，静观时变。而当北魏复国以后，魏初诸帝励精图治，国势日盛，并且极为推崇佛道，寇谦之看准时机，决心投靠北魏统治者，于是，加紧炮制经书，准备出山。423年，雄才大略的魏太武帝继位，北方门阀士族纷纷归顺，寇谦之也加快了步伐，于当年十月再次托神降临，授《录图真经》，受使“辅佐北方泰平真君”，这显然是为了迎合正欲入主中原的北魏统治者而有意编造的谶语。当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以后，424年，隐居嵩山30年的寇谦之便戴着“天师”桂冠，捧着天书，长袖飘飘，前往魏都平城。去实现其“国师”的美梦。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当寇谦之向太武帝毕恭毕敬地献上自己“天书”的时候，竟然受到冷遇。究其缘由，一是因为他这位突然冒出来的“天师”，名不见经传，无人知晓；二是因为他献的经书，卷帙浩繁，这位日理万机、锐志武功的年轻皇帝没有心思一一拜读，领会其中的玄机妙旨。因此，太武帝开始并未看重于他，只让他居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山野道士养了起来。而当时的朝野之士，也是“若存若亡，未全信也”。

对此冷遇，寇谦之当然心有不甘。他四处游说，寻找权贵，以求得近天子。经过多方物色。终于找到了一个得力支持者，他就是北魏著名儒学家、原左光禄大夫白马公崔浩。

崔氏之所以独异寇谦之的法术，与他的家世、思想和政治背景有关，崔浩出生于北方第一盛门，其家族自汉末以后，历代冠缨满朝，显赫无比。而崔浩及其祖、父又历仕魏初三帝，身居宰辅，倍受宠信，“政事筹策，时莫之二”。崔氏家族乃儒学世家，崔浩更以当时北方儒学正宗自诩，博览经史百家，对方术也颇有兴趣，但对佛教深恶痛绝。由于他身为汉人，竭力主张提拔汉人做官，实行汉制，因而时常遭受守旧鲜卑贵族的反对。太武帝继位之初，迫于众议，让崔浩暂时去官归第，但每遇军国政要，必问崔浩。因此，寇谦之要接近太武帝，崔浩实在是最好的阶梯。而崔浩此时正赋闲在家，也需要拉拢寇谦之，借其法术重新出山，故而二人一拍即合。于是，崔浩赶紧上书太武帝，为寇氏鼓吹，称天师的经书，“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圣主得天授命，应有天应，今清德隐仙自愿辅佐陛下，此乃上应天命吉兆，陛下岂能有悖天意！”经过崔浩这一吹捧推荐，果然使太武帝对寇谦之刮目相看，欣然准奏，立即将“天师”接到宫中，并派使节奉牺牲、玉帛祭祀嵩山，把寇谦之留在嵩山的弟子40余人，统统接到平城。寇谦之首战告捷，下一步就是如何登上“帝王这师”的宝座了。

寇谦之深知，要在太武帝身边站稳脚跟，做“帝王之师”，不学习儒学是不行的，况且要

实现“以礼度为首”改革天师道的愿望，也不可不懂儒术。可是，他自幼修道，对儒术知之甚少，若不补上这一课，就很难达到上述目的。于是，他就求助一代名儒崔浩，声称：“我行道隐居多年，不营画务。忽然接到神的谕示，让我兼修儒学，辅佐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可是，自己“学不稽古，临事暗昧”，请崔浩给予帮助。崔氏欣然应允，精心传授，寇谦之倾心学习，每听崔浩讲论古今治乱兴衰之理，“常自夜达旦，辣意敛容，无有倦意。”此外，崔浩还亲自编写历代治国之策20余篇，供寇氏参阅。这样，寇谦之在与崔浩的交往中，逐渐弥补了不懂儒学的不足，丰富了他为帝王师的资本。

为了巩固武帝对他的信任，寇谦之投其所好，积极参加北魏的军事行动。

公元425年，大夏王赫连勃勃病死，其子赫连昌继位，国内局势动荡。对此，崔浩主张举兵讨伐，而掌握兵权的太尉长孙嵩畏难不肯，双方唇枪舌箭，吵得不可开交。而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倾向于征讨，却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就请来“天师”，指点吉凶。寇谦之同崔浩本来就是一丘之貉，又探知太武帝的心思，并且从当时形式来看，大夏国治国无道，穷兵黩武，民心思乱；国君新亡，政局不稳，如乘机攻伐，可以稳操胜券。所以，寇谦之心中早有主张，于是，装模做样地做了一番法事之后，对太武帝说：“此战必克。陛下以武应天运，当以兵定九州，先武后文，以成太平真君”。太武帝听罢，大为欢欣，立即亲率铁骑18000之众，起驾西征。此战结果，虽未就此灭亡大夏，但魏军杀敌数万，获牛马10余万头，掳掠人口万余家，可谓战果辉煌，凯奏而还。太武帝因此更加看重“天师”。此后，太武帝又连几年东征西讨，寇谦之多次以“天师”身份随军。运筹谋划，皆获全胜。

从当时天下形势来看，太武帝雄才大略，国势强盛，由北魏统一北方的趋势十分明了。太武帝虽兼崇佛道，但佛教宣扬偃兵息武，戒杀生，总与太武帝的锐志武功格格不入。相反，寇谦之以道教“天师”身份，代表天意辅佐“明君”以武定天下，正合太武帝的心愿。太武帝曾多次叹道：“江山如此，全赖神祇之助”，盛赞“天师”辅佐得力。因此，公开宣布，要“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并打算授寇谦之其弟子以高官厚禄，经再三推辞后，下令对寇谦之处以方外之礼，“敕天师及门弟子并列在王公之上，不听称臣”。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至此，寇谦之追求的国师之梦终于实现了。

不仅如此，太武帝还按照寇谦之编造的“新经之制”，在京城东南修建了“重坛五层”、气势雄伟的天师道场——玄都坛，亲选大家弟子有德行者120人，令他们出家为道，做寇谦之的徒弟，以壮大道教队伍。并以定制供给道士衣食，不得缺少，违者必究，在太武帝的支持下，平城崇道之风大盛，每月一次的厨会(道教的一种求愿仪式)，参加者有数千人之多。各地的“游仙”、散道也沾了寇谦之的大光，许多人被太武帝礼聘出山，授爵拜官，荣耀非常。这是道教自形成以来，从未有过的风光。按理说，寇谦之应当满足了，可是，他却贪心不足，想进一步博得太武帝的宠幸。

公元439年，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讨，太武帝终于消灭了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统一中国北方，赢得了海内泰安、万国来朝的局面。这个局面，是太武帝英武圣明、一手缔造的，因此，太武帝此时也不免踌躇满志，洋洋自得。但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太武帝又想从此改弦更张，偃武修文。寇谦之深知太武帝的心思，于是又玩弄起托神降谕的把戏。440年，寇谦之奏明太武帝，重返嵩山，为皇帝“祈福”。回来之后，喜形于色，告诉太武帝：太上老君又降临嵩山，并谕示，当今皇帝修行敬道，功德无尚，可赐“太平真君”之号及“冠服符录”。太武帝听罢，龙颜大悦，立即下诏改当年为“太平真君元年”，敕令天下：以后百官上书，须敬称“太平真君皇帝陛下”，不得

有违。为酬谢"天师"用心良苦、辅佐有功，感谢天神助佑正式宣布定道教为国教，位在西教(佛教)之上。

寇谦之趁热打铁，442年，又奏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自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授符书，以彰圣德。"道家的"符录"，在今天看来，真是荒诞不经，一钱不值。而在当时，却是一件了不起的法宝，据说，"符"是天神的印信，"录"是天神的花名册，只要有了这两件法宝，就可以代天神役使三界官属。因此，太武帝领受了"符录"，便有了劾召百神、统御宇内的神权，这对太武帝维护其统治地位是十分有利的。于是，太武帝欣然从之，"亲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皆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而且，从此成为惯例，以后诸帝继位，都得登坛受符。

此涨彼消，道教在北魏的兴盛，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加上一些僧尼不守清规，丧风败俗，遭到太武帝的怨恨，下令禁止僧俗来往。445年，借口长安佛寺通叛谋反，下令诛杀长安沙门。次年，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禁止百姓信佛。在太武帝严厉打击下，僧侣四处逃散，佛寺焚毁，北魏的佛教顿时衰落。这就是佛教灾难史上"三武之厄"的第一厄——太武灭佛。

对于这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身为道教教主的寇谦之反而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当时道教已取得国教地位，佛教仅居其次，没有必要逼之太甚；况且，佛教的某些教义，已被他融会到自己的"新经"之中，他改革五斗米道，创立新教，实际上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思想，在理论上佛道有融合之处；再加上除太武帝而外，以太子拓跋晃为首的大部分鲜卑贵族，皆崇佛厌道，如骤然灭佛，行为过激，会引起胡汉民族纠纷，影响政局，不符合道教的长远利益。因此，寇谦之多次与执意灭佛的崔浩争辩，劝其不要火上浇油。而欲借灭佛之机打击鲜卑贵族势力的崔浩，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寇谦之无奈，只好告诫他：恃宠跋扈，恐遭杀身之祸，深为崔浩和道教的前途担忧。他深知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道理，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

寇谦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丰，不仅锋芒毕露的崔浩早已被鲜卑贵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就连比较谦恭的寇谦之及其道教，他们也时常寻机挑衅。寇谦之打着太武帝旗号修建的"静轮天宫"，因"必令其高不最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的不成"，遭到太子拓跋晃的强烈反对，称之为以无限之期，做办不到的事情，徒费财力，太武帝也觉得言之有理。而天师道后继乏人的现象更令寇谦之心灰意冷。早年的弟子，人京已久，耳濡目染，学会了一套奢侈享乐的本领，早已把道经道术抛到九霄云外。至于后来入道的大家子弟，本来就骄生惯养，不学无术，出家为道，为的是羡慕道家的排场，借机享受荣华，哪有心思去学道修行，弘扬道教。寇谦之一生精钻不懈、谨慎奉持，终于使道教在北魏大显，可是，面对他一人独撑大厦、后继无人的状况，看着工程未竟的静轮天宫，年逾八旬的寇谦之不禁感慨万千，不无悲哀地对弟子说："及谦之在，汝曹可求迁录。吾去之后，(静轮)天宫真难就！"说明他已预感到，在他死后，新天师道将会衰落。

此后不久，在尚未峻工的静轮天宫中寇谦之"仙化"而去。两年之后，崔浩被鲜卑贵族网罗罪名，下狱诛死，尽夷其族。寇谦之昔日的预言，不幸应验。寇、崔二人，是北魏道教的中流砥柱，他们一死，道教便迅速衰落了。

崔浩被诛当年，在鲜卑贵族的一致要求下，太武帝下令拆毁了修建20多年，作为北方天师道象征的静轮天宫。次年，太武帝又终止"真君"年号，改元"正平"。此后的文成帝，继位之初便解除灭佛令，弘扬佛法。至于登坛受符一事，倒未明令禁止，甚至历代皇帝登极之后，都要亲至道坛，接受"符箓"，但热

情大不如前，只是到了东魏行都邺城以后，这一存在100多年的道场法事才予以取缔。公元555年，道教在与佛教的论争中失败，北齐文宣帝下诏废道，令道士剃发为僧，于是齐境皆无道士。至此，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团便散亡了。

寇谦之一生，穷心尽智，弘扬道教，却因民族成见，弟子无能而道统不继，遗恨九泉，不能不说这是他的一大悲剧。然而，无论如何，他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北天师道虽然由盛而衰，昙花一现，但是，寇谦之对于天师道的改革，使得道教摆脱了原始宗教的粗陋浅薄的风貌，从而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承认，从民间进入殿堂，他本人也成为道教的一代宗师。在他以后，经过历代道教大师的丰富、发展，进一步完善了道教的思想体系、斋仪式等，使得道教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简寂先生陆修静

刘宋泰始七年。建康。

时已深秋，可绵绵的江南雨仍未停歇。劲厉的北风，早已卷走树桠上残存的枯黄；辽阔的江面上，只有几叶孤舟在随波逐浪。建康，离冬天很近了。但就在这冬的入口处，在清冷的淫雨中，一老年道士却用他的意志和虔诚，驱逐了人们身上早已固有的寒意。只见他黄泥涂额，口中衔壁，披发系于围栏，双手反背而缚，两脚开离三尺，俯卧地上，并不停地叩头忏谢。老者所为，乃道教斋中难度最大的以苦节为功的涂炭斋，需要连续36天才能见效。原来，刘宋皇帝尊躬不豫，老者为表达对皇帝知遇之恩的感谢，亲建此斋，为之祈请。

这位老者，就是本传的主人陆修静。

陆修静，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人，出身于江南望族吴郡陆氏，为三国东吴丞相陆凯之后。据云，陆修静生有异相，天挺灵骨，幼含稚性。少小主学儒术，笃好先儒文集，暇时亦旁涉象纬之学，并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稍长，受父命所迫而与人婚配，并过早步入仕途。陆氏虽然早涉婚宦，外混世务，但却能够内守贞朴，别床独处，为了精研玉书，常常寝食俱废。后来有感于时间易逝难得，乃脱落营务，遗弃妻子，入隐云梦山中。

在云梦修隐期间，陆修静得异人传授秘诀，已能却粒修行。为了遍访仙踪，他又决定出游名山，短短几年里，便已南至衡湘、九嶷、罗浮，西至巫峡、峨眉，收集了大量道书。元嘉末，因市药至京师建康，襟文帝闻其高名，不次召见，对其道术颇为叹服。时太后王氏亦雅信黄老，为寻道问义，而降母后之尊，对陆执门徒之礼。为报答王氏，陆修静“讲理说法，不舍晨夜”，孜孜诱劝，引导不卷。

元嘉三十年（公元453的）太子刘劭发动政变，杀文帝及宗室数人，刘骏（文帝第三子）起兵攻杀刘劭，夺取帝位，是为“太初之难”。在这之后，王室内部子杀父、弟杀兄的悲剧不断上演，刘宋朝局动荡不定。陆修静感叹时事多变，乃拂袖而去，孝武大明五年（公元461年）沿江西上，转至庐山，因慕庐山胜境，遂于庐山东南瀑布岩下建造“精庐”，隐居修道。

陆修静在庐山隐居数年，声名远播。明帝即位后，为弘扬道教，广求名士。闻先生之名，遣使聘请，先生不应。明帝屡诏固请，乃于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再至京师。明帝召见于华林园延贤馆。作为向道帝王，宋明帝亦屈帝王之尊，躬身下问，陆“标阐玄门，敷释流统，并诣希微，莫非妙范”。帝大悦，于建康北郊天印山筑崇虚馆以居之。

陆修静在崇虚馆居住10年，期间，为使“帝王禀其规，人灵宗其法”，他不顾年逾花甲，对南朝天师道进行了系统改造，为道教的正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陆修静对道教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搜集整理道教经典。陆修静早年就十分注意采访收集道教经典,他曾"高诣衡湘、九嶷,访南真(魏夫人)之遗迹;西至峨嵋、西城,寻清虚(王褒)之高躅",收获甚大。元嘉十四年(公元 437 年),陆修静即已着手刊正《灵宝经》,编撰《灵宝经目》。泰始三年从庐山入京,居崇虚馆,又得到当时由朝延收藏的杨、许手书《上清经诀》真迹。此外,相传由鲍靓所造的《大有三皇经》也为陆修静所得。于是,他总括三洞,校理卷数题目,于泰始七年(公元 471 年)奉敕编撰《三洞经书目录》,上献朝廷。据北周释甄鸾《笑道论》及唐释法琳《法苑珠林》等书记载,陆编道经目录,共著录道家经书、药方、符图 1228 卷,其中 1090 卷已行于世,尚有 138 卷犹隐天宫未出。陆编《三洞经书目录》是我国最早的道教经书总目,它首次采用了"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方法。即将道书分别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七大部类,其中三洞各部又划分为十二小类。这一分类方法在道教史上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排列区分这道经的品级高低,而且隋唐以后历代整理道书,编修《道藏》,均沿用了这一方法。

其次,整理完善了道教的斋仪式。斋,是道教举行祭祷的一种宗教仪式,用以为人祈福、消灾,为死者超度亡魂等等,同时也是道教徒自身修炼的一种方法。晋宋之际,随着佛教戒律的翻译和流传,道教斋仪式在仿效借鉴的基础上也逐渐发展起来。但是这些戒规仪式中还保留有相当的原始巫教的落后习俗,在同佛教、儒教的对抗中,往往因此受到批评和嘲讽,所以,完善斋仪式,对增加道教本身的战斗力,对推动道教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陆修静认为,"道以斋戒为立德之本,寻真之门户",不备斋,即无从论道。为此,撰写有关斋戒、仪范之书 100 余卷,除对天师传统的斋法进行修订补充外,还全面总结了当时的道教斋仪。经他编撰的《洞玄灵宝斋法》,把道教众斋法分为金箓、黄箓、明真、三元、八节、自然、洞神三皇、太一、指教等九个部分,制定了"九斋十二法"的斋体系。陆修静痛感末世学者"虽欣修斋,不解斋法;或解斋法,不识斋体;或识斋体,不达斋文;或达斋义,不得斋意"。乃融合儒、释思想,从理论上对道教斋仪作了解说,在说明斋法的意义时,陆修静指出,圣人以百姓受五欲驱使,不能自定,故创立斋法,固事息事。"禁戒以闭内寇,威仪以防外贼。礼诵役身口,乘动以反静也;思神役心念,御有以归虚也。能静能虚,则与道合。"又说:"身为杀盗淫动,故役之以礼拜;口有恶言,绮妄两舌,故课之以诵经;心有贪欲嗔恚之念,故使之心思神。用此三法,洗心净行,心行精至,斋之义也。"在说明斋法的基本思想时指出:"夫斋者,正以清虚为体,恬静为业,如对严君。"陆修静的详尽解释,把道教各种具体的威仪轨式上升为理论,为道教的斋仪轨奠定了理论基础。经过这次整理,道教斋从此俯仰有节,进退有度,"威威月斋,轨范洋洋,振扬法音,开化访物,使求揖者闻,来见者见,恢廓弘伟,难可备言。"后世撰集斋仪,大体皆以此为本。不仅如此,陆修静还是一个斋的亲自实践者。泰始七年,为宋明帝祈请的涂炭斋,他一连做了 36 日,这在当时是一般道士难以忍受的。

第三,整顿改造了道教组织,晋宋之际,随着道教经典科教体系的建立完善,以及道教朝着官方宗教方向的发展,组织松弛混乱的祭酒制度作为早期民间道教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必须对它进行整理改造。为了实现意在为王者尊奉的目的,陆修静假太上老君指令,提出整饬方案,"置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内外道士二千四百人,下千二百宫","天师立治置职,犹阳官郡县城府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编户著籍,各有所属"。每年三会之日,道师正定名籍,落死上生,"某日天官

地神咸会师治，对校文书，师民皆当清静肃然，不得饮酒食肉，喧哗言笑。会竟，民还家当以闻科禁威仪，教敕大小、务共奉行，如此道化宣流，家国太平。”陆修静又立“道科宅录”，登记道徒家庭男妇人口，由守宅之官掌管，依命籍保护教民，禳灾却祸。奉道之家，要建立靖室，置香炉、香灯、草案、书刀四物，按时祭神。如此之目的，在“使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佐时理化，助国扶命”。可见，陆修静的改造是有利于道教官方化的。

经过陆修静的不断努力，南朝天师道的规范日臻完备，为以后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元徽五年（公元477年），陆修静卒于建康，其弟子奉葬于庐山。谥曰简寂先生。诏其庐山旧居曰简寂观。北宋宣和年间，封为丹元真人。其门徒最著者有孙游岳、李果之等。南朝名道陶弘景即孙游岳之弟子。

陆修静一生著述甚丰，收入《正统道藏》的有《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洞玄灵宝五感文》，《陆先生道门科略》、《太上洞玄灵福授度仪》、《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烛愿仪》等各1卷。另有《道德经杂说》、《灵宝经目序》、《陆先生答问道义》、《陆先生黄顺之问答》、《灵宝道士自修盟真斋立成仪》《金箓斋仪》等，已佚。

山中宰相陶弘景

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夜晚，南朝大梁皇帝萧衍悄然离开京都建康，微服南行40里，来到松涛阵阵、崖陡如削的江东道家圣地茅山脚下，他望着幽静宜人、洞虚天成、蜿蜒起伏的群山，慨然叹道：“真乃养生之福境，仙神之灵墟也。”然后，舍舆徒步，孤身一人拾阶而上，当他走到中茅山积金峰西北的玉晨观时，这位真龙天子的御体有点支撑不住了——气吁喘喘，头晕眼花。正在这时，一位身着褐衣葛巾，衣带飘逸的白发道长，神情逸然地从崖顶走来，然笑道：“明主莅临敝观，贫道昨已卜知，故在此恭候圣驾。”他，就是梁帝萧衍微服夜访的“山中宰相”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君，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出生于丹阳秣陵一个累世为官的陶氏在家族。丹阳陶氏，数百年来一直是江东有名的望族，陶氏中人封侯拜相者，历代有之。陶弘景之七世祖陶睿兄弟三人，都是孙吴时代的名将，陶睿历官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封句容侯，其弟陶坑，官至三品，显赫朝野，其二弟陶璜，以其文韬武略，连任吴、晋两朝的交州刺史。陶弘景之祖陶隆，更是晋朝名将，征战沙场数十年，屡立战功，封为晋安侯。但是到陶弘景之父辈时，陶氏家族的盛世已失去了昔日的殊荣，有中衰的趋势。其父陶贞虽博学多才，誉满乡里，但生不逢时，社会动荡，人心思乱的社会氛围，使这个饱读经书的才子，入仕无途，更无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最终成一介书生。因此，陶弘景的降生，给怀才不遇、一生无大作为的陶贞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把光耀陶氏门庭的重任寄托在孩子身上。

陶弘景天资聪颖，幼有异操，尤善字画书法。自4岁习书法，不满6岁便游龙惊鸿，令士子赞叹不已。8岁读书，博闻强记，常过目不忘，9岁时，已把《礼记》、《尚书》、《周易》、《春秋》、《孝经》、《毛诗》、《论语》等儒家经典遍览无遗。胸中万卷、文笔粲粲的少年陶弘景，风采飘逸，神情孤傲，以书为友，从不交结俗人。以书香门第闻名江左的陶氏家族，虽藏书充栋。却不能满足一个10岁孩子。陶弘景10岁那年，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不得不走出门家，寻觅古籍奇书，他终于从邻居鞠氏手中得到一本“奇书”：葛洪的《神仙传》，陶弘景如获至宝，高兴异常，如痴如醉，昼夜研读，而且“一事不知，深以为耻”。书中“仙人”练气打坐、炼丹访仙、白日飞升的故事象美丽而可望的梦幻一样，萦绕在天真无邪的幼年陶弘景的心灵中，并打上深刻烙印。从此，他迷

上了道家经典。由于陶弘景天资聪慧，如之勤奋博学，15岁那年，对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方物、医术、本草、兵学等书，无不通晓，万谙熟道经。

才华横溢，字识渊博的陶弘景，为光耀门宗，不负父命，决心走“读书入仕”的道路，跻身六曹，建功立业，封侯拜相，重振陶家门庭。宋顺帝升明元年(477年)，掌握朝中军政大权的领军骠骑大将军萧道成，发动兵变，杀死宋废帝刘昱，立刘准为皇帝(宋顺帝)，自己把持朝政，顺帝形同虚设，徒为木偶，次年再废刘准自立称帝，代刘宋建立南齐王朝。南齐开国之初，萧道成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大力提拔有志之士为国家之栋梁。22岁的陶弘景认为此乃天赐良机，不可不取，毅然抛掉书囊，步入仕途。十多年间先后出任齐巴陵王、安城王、宜都王等诸王侍读。他的言谈举止、行文风格赢得诸王的赞誉，并被诸王府中的侍读，书佐、典吏奉为楷模，争相仿效。陶弘景的才华被社会承认后，给了他极大鼓舞和力量，其勃勃雄心隐隐萌动，冀盼不惑之年，官至尚书郎，然后外放出宰浙东一名县，“得遇好山好水，便抽簪高迈。”无奈，满腹经纶的陶弘景，虽有入仕之志，而无“为官之道”，他摆脱不了书斋生活的樊篱和读书人的清高傲骨，又不善于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之术，做起事来总不能如愿，动辄受掣。其耿介之性格与世格格不入。加之无能之辈嫉妒他的才华，群小以谗言相加百般陷害，使他仕途坎坷，步履维艰，一腔热血，毫无回报。36岁的陶弘景，为官十多年，才做到六品文官的奉朝请，可谓官小位微。所谓奉朝请，仅仅是一个无权虚请，主要是授给退休大臣、将军和外戚，魏晋时期则是皇帝的驸马和侍从们的加官，到南朝时，此职主要是为了安置闲散之官而设。陶弘景得授奉朝请时，朝中已有600多人得此官了。

陶弘景仕途一再受挫，其中，对其仕途影响最大的是，南齐永明十年(492)，他奉宜都王之命处理一件受贿案，在这一案件中，行贿者乃一死囚之家属，此人乃江东巨富，恃财称霸乡里，无恶不作；受贿者涉及五六位皇亲国戚和一批不肖谗臣奸官，他们依仗门阀势力，草菅人命，为非作歹，别人望之啧舌，不敢动他们一毛。宜都王想利用这件事杀杀他们的威风，把这一棘手问题交给陶弘景。陶弘景一介书生，办事认理不认人，自恃有宜都王为后援，披荆斩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案子弄了个水落石出，受贿枉法者，惩以重刑，昭示天下，百姓大快，纷纷称赞其为官清正。然而，陶弘景的努力，不自觉地当了宜都王同其政敌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案子弄清之后，陶弘景并没有受到宜都王的赞赏，反而助长了宜都王称雄诸王、睨视一切的雄心，根本不把陶弘景放在眼中。更令人发指的是，宜都王担心陶弘景露出其中的丝蛛马迹，对他百般陷害。而牵涉此案而遭刑罚的达官贵人，对他更是咬牙切齿，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陶弘景的仕途比以前更为艰难，如履薄冰，锔天踏地，终日心情悒悒。他深深体会到“仕途如虎狗可畏”，自忖“不如早退，无劳而辱”，同年5月的一天，他处理完本职的最后一件事，怀抱朝服、官印径直来到皇宫的神虎门，把他的六口朝服、品印和一封洋洋万言的辞官表一并认交，与宦海生涯和肮脏的官场分道扬镳，隐居茅山，不复出仕。

茅山在江苏省西南，原名地肺山、句曲山，这里有道家第一福地、第八洞天和第三十二小洞天，是道家中人修炼仙丹的绝好境地。相传西汉人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因慕此地神气灵通，渡江来此修道成仙，乘白鹤飞去，茅山由此而得名，汉末的左慈入山寻仙，遇三毛真君授以神丹。陶弘景隐居茅山，除寻防前人仙迹以外，主要是搜访上清派创始人杨羲、许谧在此造作的上清经书。

陶弘景罢官隐居茅山的第二年，即永明十一年，南齐王朝陷入了血雨腥风的内讧之中，这年齐武帝萧赜驾崩，明帝僭位。是帝不

施仁政而行苛政重刑，荒淫无度，诛杀大臣，尤嗜杀王室宗人，南齐王朝逆天忤道，天灾人祸随从朝政一片混乱，边疆无卫，防备空虚。北方的拓跋部伺机南侵，各地诸侯纷纷兴兵作乱，问鼎京城。齐明帝四面楚歌。雍州刺史肃衍，乘机打出"替天行道，拯救斯民"的旗号，在三陵起兵，大军征伐东昏侯萧宝卷。

陶弘景早年曾与雍州刺史萧衍交游。两人咏诗论道，切蹉治国之术，相处融洽，萧衍举兵伐齐，直抵魏阙，在新林一带与齐军相持不下。陶弘景听说之后决定助萧衍一臂之力，特派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以示拥戴，陶弘景本人亲自出马，多方运筹，四处为萧衍游说，编造萧衍上应"天运"的图谶，宣扬南齐气数已尽，必有新帝降福，为萧衍拢络人心，争取力量。陶弘景的游说和神秘谶语，使萧衍的军心大振，士气高昂，似乎是正义之师。遂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败齐军，攻人城内，杀东昏侯。"深托向晦、潜光隐曜"的陶弘景，非常关心政局的发展，他天天诚心祈祷，盼望萧衍能打得天下，统一宇内，赐他一片"东土"。公元 502 年，萧衍代齐而称帝。陶弘景闻之大喜，似乎又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齐、梁禅代，新国初立，急需国号以正名，萧衍的大批群僚，苦苦思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国号，陶弘景不失时机地援引图谶，旁征博引，以"梁"字为应运之符，敬献于朝，萧衍采纳之，立国号梁，是为梁武帝。萧衍为表彰陶弘景假道奉表和敬献吉符之功，从天监三年(504)起，每年派遣特使，携带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炼丹用品，送给陶弘景。天监十三年(514)，梁武帝又谕征民夫 2000 名，在茅山为陶弘景修建朱阳馆，其规定之宏大、建筑之豪华，其他道观望之莫及。

风雨难测，人生多乖，冠盖江左的博学才子陶弘景，在仕途上坎坷艰辛、悒悒不得志。隐居茅山，遁迹官场之外的陶弘景却能得到朝中名宦的青睐。梁朝兴国后，梁武帝萧衍怀念旧国，大加褒扬，对远离红尘的陶弘景更是"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国家每有吉凶征伐大事，无不前来咨询，以致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陶弘景以一隐居道人，成为闻名朝野的"山中宰相"，主要是政治因素使然。假如他入仕之初，就能得到象梁武帝萧衍这样的贤君赏识，对他厚礼敬之，大胆用之，他肯定会成为国之良将，君之良相。事实上，他遇到的却是乱政昏君。满腹经纶，一腔热血只好空洒云烟。如此违忤人生，实难卜定。故此成大业者，赖人谋之力和天赋之才是不够的。万事皆有缘份，万事皆有时机，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违背天性，勉强做事，成功者寡。这就是道的人生哲学。

陶弘景隐居茅山以后，服膺的上清派，是一个新兴教派，它的第一代宗师是魏华存，即道教史上的南岳妇人。魏华存，西晋司徒魏舍之女，青年时代就志慕仙道，信笃弥坚，常服药行气。婚后不久又与丈夫分室而居，斋于别寝，谨修道法。据说，在一个夜晚忽有神仙王褒及诸真人降临其室，授以《上清真经》。从此，她足不出户，潜心研习《上清真经》，修炼道术，于东晋感和九年(334)，她修道得果，成仙飞去，被授以"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妇人"。东晋兴宁年间，魏妇人的弟子杨羲诡称夫人及诸神降临，授以《上清真经》，用隶书将《上清真经》抄写后，传给许谧、许刿父子。杨、许病故后，《上清真经》才开始在江浙地区传播。《上清真经》的传播，标志着上清派的形成。大约是南齐永明初年，陶弘景从上清派传人孙游岳学道，并特蒙赏识，悉心传授。成为得到真传的入室弟子和上清派的重要传人。

陶弘景为弘扬上清派经法，于齐梁之际撰写《真诰》一书，记述上清派的早期教义，方术和历史人物。《真诰》一书，凡七篇，洋洋数十万字，其主要内容是对许、杨二人造作的上清经进行注释、诠次，补遗拾缺，增删改写，去伪存真，使之璧全。晚些时候，陶弘景又将上

清派的养生登仙之术，加以整理，撰写成24卷的《登真隐诀》。全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有关书写、佩带、吞咽“太极帝君真符”、“太极帝君宝章”等符录升仙的方法，以及按摩、导引、服气、沐浴、驱邪避鬼等方术内容。（二）张天师授给魏夫人的天师道法术，其中包括入静烧香礼拜，书符上章，请天这中降临，驱邪护身等。（三）有关养神、炼形、长生成仙等方术的具体作法，比如“养神”，要少思寡欲，自虚无为，游心虚静，万不可大悲大喜，劳神伤心。“炼形”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度，过度劳苦和放纵淫乐都不利于身心健康。

由于陶弘景的博学多才，悉心甄别整理上清派道法。撰写了《真诰》、《登真隐诀》及《本草集注》等书200余卷，基本上奠定了上清派的理论基础。同时，他又精通炼丹、医药、铸造、养生之术，从其修道受法的弟子达3000多人。其中，齐梁之际的王候公卿就有数百人。梁武帝的太子萧统、萧纲以及沈约、蒴云、任肪、谢览、谢举、江淹等名人显贵，都是陶弘景的道家弟子。到萧梁一朝，陶弘景隐居的茅山很快成为上清派的中心。此后，茅山宗正式取代了上清派，盛极一时。隋唐之际，因茅山宗得到李唐王朝的崇敬。更是名噪天下，兴旺发达。道门领袖人物和著名高道、道学家大都出自茅山宗。如陶弘景再传弟子潘师正为崇山道长，其弟子司马承祯又掌道衡山和桐伯山。茅山宗传人杜光庭即青城山首领。茅山宗俨然成为道教正宗，一直到宋元久盛不衰，传授不断。陶弘景由此被尊为茅山宗的开山祖师。

上清派理论奠定之后，陶弘景开始进行服饵炼丹的实践活动，以满足社会上谈玄论道的士大夫们追求服食丹药、生命永恒的需要，报答梁朝王公显贵对他的礼敬。据说，陶弘景为了给梁武帝炼金丹，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他曾一次又一次，满面灰垢在深山挖灶安鼎，阳燧取火。自梁天监四年至普通六年（505—525），陶弘景共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炼丹实践。其中前6次均未等开炉，就“灰飞烟灭”。公元525年，近70岁的陶弘景认真总结以前六次开鼎失败的原因，第七次开鼎。这次他终于成功了，他炼出了金丹数烂。据《华阳陶隐君内传》记载说：开鼎之时，只见“光气照烛，动心换目”，金丹滚滚，粼粼发光，陶弘景欣喜若狂，连忙取出送给梁武帝萧衍，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据说梁武帝“服之体轻”，对弘景“益敬重之”。

应该说，陶弘景在中国道教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以茅山宗为本源，精心研制的《神仙谱》——《真灵位业图》，把道家信仰的“天神地祇，鬼魅精怪，历史人物，道教领袖”等近700名神灵的名讳称号，以图谱的形式一一列出，使名目繁多的神仙座次井然有序，等级有别。

道教造神，崇奉神灵，始于五斗米道所倡导的“千精万灵，一切神祇皆所废弃，以太上大道君为最高神”的神学信仰，东晋以后，仙道葛洪为了贬抑老子，虚构了一个“元始天王”，作为道教中的最高神。延至南朝，五斗米道尊奉的“太上大道君”和葛洪创造的“元始天王”都被降为传经授道的众多神灵之一。“元始天尊”又成为道教的最高神。南朝以后，道教深受佛教的影响，神仙境界逐渐扩大，形成三位一体的“三清尊神”说。在此以后，道教神仙中发现了新旧浑然、名位难辨的众多神灵：抚长剑佩玉珥的东皇太一，龙驾帝服的龙中君，沉溺于爱情的湘水二神，天姿掩霞、容颜绝世的西王母，乃到秦汉时期的名相大将，也被列入了道教的万神殿堂。以至纷然无序，主次不分，甚至有相互矛盾者，鉴于此，陶弘景绘制《真灵位业图》，为众多神灵排列座次。

《真灵位业图》，按照从上天到地狱的次序，把700多位神灵列为7层。每一层分别有中位之神、右位之神、散仙位和女仙位之神，其中以中位之神为主神，其它为辅佐之神。第一层以“上合虚皇道君应号元始天尊”

为中位之神，凡29名；第二层以“上清高圣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为中位之神，凡104名；第三层“太极金阙帝君李弘”为中位之神，凡84名；第四层以“太清太上老君”为中位之神，凡174名；第五层以“九宫上尚张奉”为中位之神；第六层以“右禁郎定录真君茅固”为中位之神，凡173名。前六个层次的诸神，是表达“生存”天堂，而第七层则是表达了死亡的地狱，以酆都北阴大帝君为中位之神的88名鬼神系统，包括秦始皇、魏武帝、汉高祖、齐桓公、晋文公……这一层充满阴森可怕的恐怖气氛。

《真灵位业图》，“乍看似乎无聊”，实际上，这是陶弘景为维护封建统治，整理人间伦理秩序的手段，《真灵位业图》把门阀士族严密的等级制度搬到仙界，使神谱中的诸神等级与世俗世界的门阀制度相吻合。不仅证明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而且也使那些求仙修道者明白：在人间以外的鬼神世界中，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当然，陶弘景炮制《真灵位业图》，骨子里还隐藏有一种自私自利、利用神谱为本派争取人间正统的私心和偏见。比如，《真灵位业图》中，上清派的创始人魏华存、许刿、杨羲列入仅次于元始天尊的第二层中。灵宝派旧宿葛玄、徐来勤被列入第四层，位居上清、灵宝二派之下。上清派被神化为道教的正宗。尽管如此，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使漫无绪统、不相委属的神仙谱系统化，一个较为完整系统化的神仙谱基本形成了。

西华法师成玄英

“西华法师”成玄英，作为一代高道，却对长生成仙索然无趣，也不追求灵魂在彼岸世界的超升，致力注疏老子《道德经》，以两卷数十万言的宏著《老子道德经注》，释论老子“玄之又玄”一句话，成为唐代“重玄”之道的代表人物。

“玄之又玄”一句，源于《老子》首章。其古义是：幽深而又幽深，喻道深奥莫测，博大精深。道中人，利用《庄子》“无无”、“忘心”说和佛教“能所双亡”、“语观双绝”，把老子的“玄”解释为遣除“滞者”。谓前“玄”遗有、无之滞着，谓后“玄”进遣“不滞之滞”，“玄而又玄”谓之“重玄”。成玄英继承和发挥了道家的“重玄”之说，他在《道德经义疏》中释《老子》“玄之又玄为：“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轨。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成玄英就是利用“重玄”之道，进行自我精神解救的。

成玄英吸收郭象的“独化”观点，否认万物的因缘和合，因果关系的真实性，他认为世界万物的运动并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世界也不是被一条因果链条所联系，如果人们承认万物间的因果关系的话，那么，万物相续，寻赜不已，事实上又否定了第一原因和第一结果存在的真理性。以此而论，万物的因果联系是不真实的，万物亦虚幻不实，万物的运动完全是在独化过程中进行的。既然万物虚幻不实，那么，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也是虚妄不合理的；既然万物的运动是在独化过程中进行的，彼此处于孤寂独立状态，那么，无“真宰”可言。所以，人们只能自己拯救自己，对物质的追求也是水中捞月，徒劳无益。

既然万事万物都是虚幻的，那么，包括自我的身神也不是真实存在的，所谓“观察万有，悉皆空寂”。成玄英还认为精神意识的作用，就是认识自身的虚假，从而达到“物我两忘，身神为一”。所谓“身神为一”，并非“万神合一”，而是“身神同一于无”。一旦“身神同一于无”，“身心俱遣，物我双忘”，即可从各种困扰、束缚中解脱出来。这才是是修道的最高境界。

药王孙思邈

大唐贞观中,某年大旱,禾苗尽枯。农夫望天长叹,天子愁眉不展。忽有一西城胡僧,自言可降甘霖,天子允其请。胡僧乃于长安昆明池结坛祈雨。越7日,池水下降数尺,昆明龙王大惊,急忙求于孙先生,曰:"天久不雨,罪不在我。如今胡僧求雨,表面看是解万民之愁其实是要吸我脑汁。小王命在旦夕,万望先生大驾相救!"孙先生曰:"解民倒悬,是我辈份内事。听说昆明龙宫密藏仙方30首,若能让我一看,以济众生,即可救你。"龙王曰:"此方上帝有令,不许妄传。今日形势危急,小王何敢吝惜。"有顷,龙王拜方而至。孙先生曰:"你只管放心回这中,胡僧无能为矣。"自是池水上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

这位羞死胡僧智取仙方的孙先生,就是唐代著名道士、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生于西魏大统七年(公元541年)。·幼时家境贫寒,衣食 维艰,加之身体单弱,累遭风冷,常常受到病魔侵扰,与药物结下了不解之缘。7岁人学就傅,研读儒经。由于他聪慧过于常人,又孜孜好学,所以很受先生喜爱。弱冠,喜谈老庄及百家之说,亦好佛典,学问渐广。时洛州(洛阳)总管独孤信路过华原,见而奇之,曰:"此圣童了",但恨其器小识大,难以为用。后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遂隐居秦岭太白山。杨坚辅改,下诏征为国子博士,孙思邈认为,做官易致灭身覆宗之祸,使"正气日衰,邪气日盛",便托疾而辞。他常对身边的人说:"过此五十的,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为实现其助圣济人的人生理想,孙思邈在太白山中度过了一段颇不平凡的时光。

太白山位于陕西眉县南,海拔4000米,为秦岭主峰之一。山中林木繁盛,岩石参差,雾绕云盖,极富变化,动植物品种在1200种以上,是理想的采药修炼之处。在太白山中,孙思邈一方面继续精研道家经典,揣摸先达们的服食养性之术;一方面博极医源,广泛群书,潜心研究古人医方。孙思邈认为,道在身内而不在身外,一个从只要潜心静性、炼气养形,虽无师承,亦可达到修炼目的。有鉴于此,他摒绝俗务,一心向道,在总结前人修炼经验的基础上,终于成了一位奉守道教经律戒规、无师自通的道士。孙思邈主张,道士飞升成仙要建立在修德积善的基础之上,积善愈多,仙阶愈高。结合自己的医务特色,孙思邈为自己制定了"救疾济危"、"无欲无求"的救世原则,广积善德,务欲成仙。为了解药物性能,孙思邈还深入太白山、终南山、峨眉山等深山老林之中,寻访药农,多方采集,做了大量的医务笔记。后来,他在自己所著书中记载的800多种药物和几千个方剂。大部分是在太白山中得到的。

大唐武德年间,孙思邈已成为当时著名的医家。他继承传统,大胆创新。用自己高超的医术,为后世留下了许许多多"妙手回春"、"起死复生"的神话。一个又一个患者在他手下摆脱了病痛折磨。他的事迹迅速传到四面八方,人们纷纷颂扬他是功德无量的神医。

贞观十年(636年)太宗闻其盛名,下诏延请。孙思邈也认为唐太宗就是他50年前预料的圣人,遂应诏来到长安。这位盛世名君见年近百岁孙思邈面色红润,容颜甚少,不禁叹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准备给他授以爵位,并留他在京师做官,但一生以淡泊自任的孙思邈固辞不受。据说在孙思邈来京期间,以魏征为首的史馆人员正受诏编修齐梁周隋等朝历史。他们惟恐有所遗漏,所以多次造访孙思邈。孙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

在整个贞观年间,孙思邈一方面继续徒

步行医，救民水火；一方面博采众长，认真总结百家医方。同时不断创新，自树一帜，医术已达精湛程度。

永徽三年(652 年)，孙思邈探求古今，融通附会，编成了他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备急千金要方》。该书 30 卷，232 门，合方、论 5300 首，凡诊治之诀，针炙之法，以及引导、按摩等养生之术，无不周悉。在书中，孙思邈对唐代以前历代医家的医学理论和治疗经验作了总结，表述了自已独到的医学见解。他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主张医生要对病人高度负责，勿以私欲陷入于病痛之中。书中最早记载了用昆布、海藻、羊和鹿的大靥(甲状腺)等治疗由于缺碘而造成的瘿病(甲状腺肿大)的方法，记载了用多含维生素乙的杏仁、吴茱萸、蜀椒、谷皮等治疗预防胜气的方法，在这当时都是十分先进的。欧洲人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是在 1642 年，几乎比他晚了 1000 年。孙思邈对妇科和儿科特别重视，破例把它们列在卷首，主张独立设科；他还首创复方，提出了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

永徽四年(653 年)，关中地区疾疫流行，居民多其难，迫切需要良医调治。孙思邈昼夜兼行，到处诊治。一些不法僧道亦乘此机会，抛受"秘方"、"神丸"，四处骗取财物，不少人上当受骗，延误治疗，痛苦地死去。四月，唐朝政府下令全国，禁道士、女冠、僧民为人疗疾，违者重治其罪。在此禁令下，孙思邈只好隐居耀县城东的五台山。五台山海拔 1100 米，山中翠柏葱蔚，鸟语花香。整个山势高而不险，卑而不夷，山顶有五个小峰对峙相聚，顶平如台，故称五台山。后因孙思邈长期在此采药隐居，五台山又称"药王山"。

在整个唐期前期，由于唐高祖、唐太宗和唐高宗三代皇帝的积极倡导，道教一时大盛。不仅道教理论大为发展，名家辈出；而且在修炼方法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孙思邈作为这一时期的著名道士，明显具有上述两大特点。在五台山中，孙思邈一方面结合医学继续总结养生经验，一方面精心炼丹制药，继续履行济世救人的夙愿。

孙思邈认为，人若善于摄生，当可免于疾病。他说，清晨早起，略作"小劳"即可精神饱满；日中面南禅坐，吐浊纳清，亦能保持轻松。孙思邈指出，饮食有度是长寿的重要一环。他说："万病横生，年命横夭，多由饮食之患"，主张食不烦恼，食不重肉，不食生饭陈羹，并对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疏菜、水果、谷米等 150 余种食物的性质和食疗作用进行了详细研究。同时，孙思邈还把天人相通思想引进到养生学上。他说："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时五脏。天若四时有序，五行恒常，即无灾异之事；人若四时有备，五脏协调，便要健康长寿。他要求人们要做到胆大心细，智圆行方。

孙思邈继承了道教的炼丹传统。他十分重视丹药配方和原料采集，对自认有价值的东西，"虽艰远而必造，纵小道而亦求，不惮始终之劳，讵辞朝夕之倦"，因此在炼丹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提出的雄黄要用油九昼夜去毒的方法被医家奉守至今，他记载的火药配方是现存史籍中最早的。但是，孙思邈重炼丹而不服丹。他认为，以服丹为成仙之道是"神道悬邈，云迹疏绝，徒望青天，莫知升举"。他把炼丹作为制药的手段之一，其目的仍在于"救疾济危"。他炼制的"太一神精丹"，主治"客忤霍乱，腹痛胀满，尸蛀恶风，癫狂鬼语，蛊毒妖魅，温疟"，在隋末疟疾流行时大显奇效；他用精制过的雄黄治鼻息肉和哮喘病，见效快，不复发；他用几种矿石炼后配制的"诸霜雪方"，有清热、慎惊、开窍之功效，为明清温病学派的"三宝"之一。孙思邈注重内丹方术，强调精、气、神的修炼，为我国早期气功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认为，一个人如坚持每日练一两次气功，即可"身体悦泽，面色光辉，鬓毛润泽，耳目精明……气力强健，百病皆去"，百年之内不惧夭伤。

作为一名道士，孙思邈还十分注意练习

星相之术。他说:道士对"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否则,"吉凶拘忌,触途而生"。据传,他为人星相,多能应验。贞观年间,东台侍郎孙处曾率五子孙埏、孙儆、孙俊、孙侑、孙诠拜谒思貌,以求仕途吉凶。思邈曰:"俊当先贵,侑当晚达,埏最居重要。"又云:"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太子詹事卢齐卿,幼时曾请孙思邈相卜将来,孙曰:"汝后五十年,位登一方之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其时孙思邈之孙孙浦尚未出世。后来卢齐卿官至徐州刺史,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其神验如此也。

孙思邈接受了葛洪、陶弘景等人吸收儒释,充实道教的思想,积极主张三教融合。他早年精通百家之说,兼好佛教经典,对儒、释两家的思想精华颇为叹服。隐居终南时,与唐代著名高僧、南山宗的创始人道宣往来十分密切,互相参请宗旨,切磋教义,成了融合三教的积极实践者。孙思邈那种"不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都"普同一等"的高尚医德,那种救疾济危,解民倒悬的仁爱之心,显然是吸收了儒、释精华以后才逐渐培养起来的。为阐述自己三教融合的思想,孙思邈还专门写了《会三教论》。

永徽六年(655 年),孙思邈在撰写《丹经》之后,又推出了《摄生真录》1 卷、《福禄论》30 卷和《五兆算经》、《明堂经图》等书,并自注老庄,为道教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显庆二年(657 年),唐高宗李治诏令许敬宗、苏敬、许教崇等人,会同各种名医 20 余人,编撰《唐新本草》。第二节,孙思邈被召至长安,寓居鄱阳公主旧宅,编撰并审订即将成书的《唐新本草》。在编审过程中,孙思邈不仅校正了陶弘景《本草》及《名医别录》中的许多错误,而且还根据他自己的亲身实践,增加了 100 多种行之有效的药物。显庆四年(659 年)七月,图文并茂的《唐新本草》编写。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定的药典,共 53 卷,收集药物 844 种。由于孙思邈在编审过程中的突出贡献,唐高宗亲自召见了他,授以谏议大夫职,思邈以力不能任固辞。高宗遂制授承务部,让他贡献尚药局的工作。

在这次旅京期京,孙思邈以懂医知药、德高望尊得以多次从幸高宗,与京中名士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当时的名士,如宋之问、孟诜、卢照邻等,皆执师弟之礼以事之。特别是他和文坛名将卢照邻的忘年厚交更让人称道不已。

高宗初年,卢照邻以仕途受挫,心怀抑郁,不幸身染恶疾,卧病长安光德坊官舍,后闻孙思邈道术高明,遂移居鄱阳公主宅,拜师求治。两人博洽医道,纵谈古今,一见而成忘年之交。卢照邻在其《病梨赋》中写道:"时有处士孙思邈,道洽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至于推步甲乙,度量乾坦,则洛下、安期先生之俦也……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彩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在孙思邈的精心治疗下,卢照邻的恶疾奇迹般痊愈了。有感于孙思邈的深妙道法,卢照邻后来也幡然向道,成了好道之士。

咸亨四年(673 年),高宗患疾,令其随御,颇得高宗看重。上元元年(674 年),孙思邈在阅读了大量的医学道学著作,并集累了许多资料以后,准备对《千金要方》作些补充修订,便借口身患疾病,请求辞职返山。高宗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之。不久,孙思邈回到了华原五台山。他返山之后,继续著书立说,开耀元年(681 年),撰成另一部著作——《千金翼方》。该书亦 30 卷,是对《千金要方》的补充。孙思邈自为其序,"其末兼及禁术,用之亦多验"。就在这年冬天,孙思邈故于华原五台山,享年 141 岁。死后遗令薄葬,不藏明器,不奠性牢。停尸月余,颜貌如生,色润不改。举尸就廓,空衣而已,时人异之,咸谓已尸解成仙。

孙思邈一生著述其多,共约 30 余种,其

中最著者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二书历来被奉为医学圣典。北宋英宗治理三年(1066年)，林亿奉敕修订《千金要方》后，大量刊行，广泛流传。徽宗宣和四年(1124年)，郭思删《千金要方》为《千金宝要方》，刻石于华州公署，明朝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由杨胜贤木刻印行。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刻《千金宝方》、《海上方》石碑于五台山。《千金要方》一书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2年)，被日本留学生抄录回国。后定为教科书，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日本现存的宗本《千金要方》，一直被视为"国宝'，称为"东方医学圣典"。孙思邈的方剂，在历代临床上一直收到良好的效果。

孙思邈死后，人们为纪念他，在五台山立了药王祠。宋徽宗时，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明世这示把他定为"先臣"，清顺治帝奉他为"神医"。同时，遍布各地的药王祠每年还举行一定规模的纪念活动。

孙思邈，这位伟大的医药学家，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视人为神的司马承祯

神仙，在世俗之人的追求中，似乎是高不可攀的境界，不少人为成仙成神，步入空门，苦修一生，仍脱离不了尸首红尘。人之成仙可谓难矣。然而，唐睿宗时的高道司马承祯说：人即神仙，"神仙亦人"。人的禀赋本都有成仙的素质，只要"修我虚气"、"遂我自然"即可成仙。

司马承祯，字子微，自号白云子，河南温县人。少好学，不以豪门贵胄为耀，薄于为吏，年20入道，师事潘师正，传其符箓豚辟谷、导引、服食之术，颇得潘师之欣赏，独得真传，且善篆、隶，自为一体，号称"金剪刀书"。玄宗闻之，趋访山中，两人抵掌相谈，很是欢洽，玄宗直以"道兄"呼之。睿宗亦奇其才，于景云二年(711)召入宫，睿宗问以阴阳术及治国安民之术，答以"阴阳术数为异端"，"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所答很合帝意，即赐宝琴及霞纹帐。及司马承祯归天台时，卢藏用指终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沉思有顷，乃对曰："以余观之，仕宦之捷径耳。""终南捷径"一辞由此而来。唐代确有不少隐士逸客，以遁世为入仕的途径，但司马承祯却无意仕途，虔心于道，以松风为娱，以野鹤为伴，寄情于山野林壑之间。

司马祯认为，成仙就是为了长生，长生便是神仙之道的根本，要长生就必须以养气为先。人的禀赋本就有成仙的因素，即"虚气"，也就是人的"真性"。"真性"以道为本，与尘不染。因后天受外界的影响，"遂与道隔"，削弱了成仙的禀赋。如果不注意约束自己，必丧尽真性，形损神伤，成仙无望。人要成仙本不是一件难事，只须修炼"虚气"，保存"真性"，即可成功。而保存"真性"和修炼"虚气"，必须信敬"坐忘之法"。坐忘之法，源《庄子·大宗师》："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司马承祯在《坐忘记》中说："如人有闻坐忘法，信是修道之要，敬仰尊重，决定无疑者，加之勤行，是道必矣。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意思是说顺应万物大化，不存彼此之别。世俗社会的真、善、恶，以及被人们普遍遵守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和真理观，都是有损"虚气"、削弱"真性"、玷染人先天禀赋的罪恶渊薮，如能断除之，归还清虚自在人，即是所谓的神仙。

司马承祯反对繁琐方术，提倡"易简"之道，即立地成仙。司马承祯在吸收佛教的止观、禅定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易简"成仙的方法和修真步骤。他把修山的过程分为五道"渐门"：一斋戒，二安处，三存思，四坐忘，五神解。他在《天隐子》中说：何谓斋戒？曰澡身虚心。何谓安处？曰深居静室。何谓存想？曰收心复性。何谓坐忘？曰遗形忘

我。何谓神解？曰万法通神。“习此五渐之门者，至五神仙矣。”即“神仙之道，五归一门。”同时，他还把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作为修道的七条“防次”。然后把“五渐门”、“七防次”总结为三戒：一曰简缘，二曰无欲，三曰静心，如能“勤行此三成而无懈退者，则无心求道而道自至”。

司马承祯静心坐忘的修道理论和“易简成仙的主张，成为以后道教养生修真的圭臬，五代以后演变成为神台内丹道。

怪才吴筠

神仙可学乎？唐代道士吴筠答曰：“远于仙道者有七，近于仙道者亦有七，如能取‘近七’而避‘远士’，即可走上成仙之路。”

吴筠，唐代道士，字贞节或正节，华州华阴（今陕西境内）人。少通读经书史籍，善属文，其文哲理深邃，深入浅出，时而通畅如流水，时而坚涩难意会，也有人谓之怪才。年20，举进士不第，万念皆灰，愤而焚书自叹曰：苦读寒窗十余载，犹如浮云尽缥缈。遂入嵩山，拜潘师正为师学道，得上清经法，喜而读之，遂爱不释手，昼夜推研。潘师正嘉奖之曰：如能四方周游，遍访高道，兼收并蓄，以子之才必能得道成仙。吴筠纳其言，于开元（713—741）年间，南游金陵，访道茅山；转游天台，观沧海，与名人相游乐，辗转飘逸于道家圣地。其行踪传于京师，其文辞竞相传倾。唐玄宗特召之于大同殿，问以礼法，答以“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费纸札”。又问神仙修炼之事，答以“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适意”。玄宗本奉道，听吞筠言道有理，令其留于京师，以备垂询道家之事。

修道之人以清静为要，滞留在人声鼎沸、市井喧闹的京师的吴筠，终日郁郁，很是不快。况且，他一向以山水为伴，与宫观相依，岂能困囿于红尘纷呈的大都闹市。天宝(742-756)中，他其斟酌再三，决定上书皇上，要求结束京师生活，还道嵩山，继续修炼，然而皇坚持挽留，并在岳观为他别立道观，但仍不能留其心。不久，安禄山起兵，中原大乱，吴筠乘机出京，东游会稽，隐剡中，逍遥泉石，与李白、孔巢父相酬和。

吴筠主张神机可学，他认为修道成仙的关键是对性和情的治理。他在《玄纲论》中说：“性动为情，情反于道，故为化机所运，不能自恃也。”就是说，外物诱惑寂然不动的性便产生了情，情悖于道，任情则悖远于道。对于人来说，性是内在的，情是外在的。虽然情动的祸根本源于外物的诱惑，然而“我心”可以扼斥外物的旅惑。“我心不倾则外物无不正，动念有属的物无不邪，邪正之来在我心而已。”所以，全性修道要在恬淡。既不可迷醉于外物，也不能苦求心中无物。只有全民生守允才有可能成仙长生。《玄纲论》曰：“性全则形全，形全则气全，气全则神全，神全则道全，道全则神全，神在则气灵，气灵则形超，形超则性彻，性彻则反复通流，与道为一。可使有为无，可使虚为实。吾将与造物者为寿，奚死生之能累乎？”

总之，性全则自身不受伤害，与造物之彻无别，不为生死计而自然超脱。所以，吴筠在《神仙可学论》中既批评佛教“以泯灭为真实，生成为假幻”和修来世之谬，又指了但知追求名利声色，不知养身，修道者之非。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求仙七弊：(一)不知性形关系以守形全性；(二)对仙道之信心不足；(三)“强以存亡为一体，谬以道识为悟真。云形体以败散为期”；(四) 贪求名利，悦色耽声；(五)为情爱所役，有慕仙之名，无契真之实；(六)“汲汲于炉火，孜孜于草木”，务金丹而弃修性之术；(七)虽身栖道流，却心溺尘境，外邀清誉之名，内蓄奸回之术；(八)虽身栖道流，却心溺尘境，外邀清誉之名，内蓄奸回之计；只要能谨忌其七憋，惩忿欲，齐毁誉，处林岭，修

清真，以摄生为务。虚凝澹泊怡其性，吐故纳新和其神，高虚保定之，良药医辅之，表里兼济，形神俱超，便可“挥翼于丹霄之上”，成仙长生

玉玄览论“道”

玉玄览，名晖，法名玄览，号洪元先生，广汉（四川绵竹）人。据玉太霄《玄珠录·序》载：年15时，忽异常日，独处静室，不群希言。自是之后，数道人之死生，童儿之寿命，皆如言，时人谓之洞见。可见他很小对方术玄理就有很大兴趣，而且对“神仙方法丹药”很有研究。至年30余，“亦卜筮数年，云不定，弃之不为，而习弃玄性。”曾与二三乡人去茅山学道，行至半路，觉同行者概非“仙才”，而归故里。感叹“长生之道，无可共修”，于是行坐起住，唯道是务，遍研道、释二教经论，务究其源奥。年49，益州长史李李逸慕才召见，请其入仕，玄鉴坚辞不出，遂入道，居成都，士人和道士均与之谈经论道，仰慕其学。年60余，以耄耄之年因事入狱，在狱中著述不止，置若仙界桃源。武则天神功元年，奉召入京，行至济州，遽然仙逝。

王玄览受唐代神化老子及其“道”风潮的影响，企图通过对“道”的阐述，来论证神仙长生的道家理论，并把“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根，是永恒存在的。他根据老子《道德经》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把“道”分为“可道”和“常道”。

他认为，“常道”生天地，“可道”生万物，万物有生有灭，不能常在，而天地万古长青，可以常在。因此，“可道”无常，是假；“常道”才是真，是实。故此“可道为假道，常道为真道”。虽然“常道”不同于“可道”，但二者又统一于“道”，所以，二者又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他说：“不但可道可，亦是常道可；不但常道常，亦是可道常。皆是因相生，其生无所生；亦是因相灭，其灭无所灭。”既然“道”是“可道”与“常道”的统一，所以，“道”的实质，是真又不是真，是常又不是常。王玄览以此把“道”说成是超出物质世界以上而永恒存在的实体。

王玄览的修道理论，首先从道与修道者即众生的关系问题入手。在这一问题上，他遇到了与他的“常道”、“可道”相悖的逻辑难题：如果众生不是道，那么众生修得的始终是身外道，如果众生即是道，那么，不假修习，自合天理，虽各尽其能，始终不外乎道。他为解决这个逻辑难题，把“道”与“众生”的关系论证为：“道与众生，亦同亦异，亦常亦不常，何者？道与众生相因生，所以同；众生有生灭，其道无生灭，所以异。”就是说，虽然“众生禀道生”，但“众生非是道”，正因为“众生非是道”，所以“众生能得道，而必须修习道”，正因为“众生非是道”，所以“众生能得道，而必须修民产道”。王玄览认为，修道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之所以说必须，是因为人的俗情、尘念都能在修道中荡除，之所以说必须，是因为人的俗情、尘念都能在修道中荡除，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众生禀道生，人生本是道体显现出来的印迹，寻迹而求，乃知众生即是道。就是说，道与众生相因而名，互为依倚，道乃众生之道，众生乃道之众生。

王玄览根据道与众生的关系，认为修道成仙，不应外求，而应内求。因为道不在人心之外，而在人心之中具有的道性，道是万物，就是心生万物，“心之与境，常以心为主”，“心生诸法生，心灭诸法灭，若证无心定，无生亦无灭”。比如，见诸物之有则有欲，见诸物之无则无欲，此两者均在一念之中。如果排除见有见无的意念，也就不存在有物无物、有欲无欲的问题。所以说：“法若有属，有所而不属；法若无所属，无所而不属。”法本由人起，法本由人灭，起灭自由人，法本无起灭。一心一念里，并悉含古今，“十方所有物，并是一识知”。

他认为修道成仙的要旨,是要修得一个清静不变的“识体”。“识体是常是清净,识用是变是众生,众生修变求不变,修用以归体,自是变用识相死,非是清净真体死。”只要修得使道体为一,还复为道,便可以不变不死,长生久视,成仙成神。

毁佛道士赵归真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 年),武宗诏令全国僧人支:佛教“诱惑人意”,“坏法害人”。下令拆寺 4600 余所,还俗僧尼 260500 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 4 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 15 万人。又勒大秦穆,袚 3000 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会昌法难”,其实为始作俑者,乃毁佛道士赵归真。

赵归真,唐代有名的毁佛道士,宝历二年(826)任两阶道门都教授博士,文宗时曾被流放岭南。唐武宗好长生之术,“志学神仙”,登基以前即“颇好道术修摄之事”。登基不久,即召道士赵归真等 81 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此后,赵归真被授以左右阶道门教授先生,武宗以赵归真为师,学神仙之术。据说,武宗为得长生仙术,先后在关中建望仙观,在南郊筑望仙观,在龙道池造灵符应圣院。因武宗好神仙异术,“道士方术多至辇下”。道士刘玄靖、邓元起均被召入宫,修仙传道,尤以赵归真受宠有加。传说他有神法道术,能吸引万里以外之重物,会昌五年(845 年),赵归真在望仙台主持飞升仙炼,需用大量生银,诏使采取不得。赵归真斋数朝,写御书置于岩穴间,山神显灵,涌现银液,与入用之数相符。

赵归真等道士,依仗武宗的宠爱,肆意贬毁佛教,经常在武宗面前说长道短,诋毁佛徒。据《旧唐书·武宗本纪》记载,赵归真曾对武宗说:“佛生西戎,教说不生,不生者死也。化人令人涅槃,涅槃者死也。盛谈无常苦空,殊为妖怪,未涉无为长生之理”。道士们还用孔子所言“黑衣继十八子”附会,黑衣指僧人,十八子指李氏,意为僧人将代替李氏为帝,武宗信以为真,《旧唐书》记载说,“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害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由于赵归真的策划和鼓励,唐武宗决心毁佛排释。会昌五年四月,武宗下排佛令,唐曰:

(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覆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我,诱惑人意,而众闪益迷。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民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晋宋齐梁,物力凋靡,风俗绕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诏令一出,全国大规模的毁佛排释斗争迅猛展开,寺庙坏于一旦,僧民还俗无数,佛徒僧人怨声载道,无一幸免。

武宗因崇信赵归真等人的仙术道法,以致于惑于道术,吞服九转金丹,中毒暴死。唐宣宗继位后,赵归真因毁佛惑君,被活活杖死,可谓罪有应得。不过,唐武宗毁佛排释,固然与赵归真有关,但也有其政治目的。此时的皇权和僧侣在政治经济上的矛盾相当尖锐。唐武宗借赵归真毁佛主张,达到其抑制僧侣势力之目的。

传真天师杜光庭

杜光庭(850——933 年),字宾圣,号东瀛子,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一说括苍人。自幼习诵经史,工于词章,唐懿宗咸通年间,应科举不第,遂入天台山为道士。师事陶弘

景七传弟子应夷节，故杜光庭也算是茅山宗道士。唐僖宗时应诏入觐，命充麟德殿文章应制。中和元年(881年)，黄巢破长安，除僖宗避难入蜀，遂留成都不返。王建据蜀时，任户部待郎、上柱国，封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王衍继位，尊其为"传真天师"，兼崇真馆大学士。晚年移居于青城山白云溪，修持著述，直至仙逝，享年84岁。

杜光庭是唐末五代著名的道教学者，他一生著述很多，较著名的有《道德真经广圣义》，《常清静经注》、《圣异记》、《神仙感遇记》、《道教灵验记》、《天坛王屋山圣迹记》、《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墉城集仙录》、《广成集》、《道门科范大全集》等，凡200余卷，包括道经注疏、神仙传记、斋科仪等方面，著述宏博，立论精湛，对道教理论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

在唐代，由于道教被视为皇家宗教，老子被神化为最高天神，并被奉为道教始祖，老子的《道德经》便被奉为道教最崇高、最奥妙的经典，视为最根本的信仰。因而，唐代为《道德经》作注疏的人很多，杜光庭也曾作《道德真经广圣义》，阐发老庄思想，大论老子之"道"，并神化其道，以此来论说神仙长生的信仰，对前人研究《道德经》作了一次理论总结。

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杜光庭首先论证了老子之"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是永恒的存在，声称"众物之中，道无不在，秋毫之细，道亦居之。"道非有法者，不可正言其有，物皆有道也"。认为"道"泛存一万物之中而不为有，事物中必有此"道"。虽然这个"道"看不见、摸不着，却主宰着整个世界，万物之所以迁流变化，是因为道从中起作用，"万物皆由之而通"。既然道主宰万物，那么，若能自觉地遵循道的规定，便能体道悟道，与道为一而万古不灭，就能超凡人仙。

其次，杜光庭详细地辨析了道与德的关系。道和德是老子《道德经》一书中两个基本范畴，杜光庭认为："道者德之通，德者道之功。"在道与德的关系中，道为德之根本，德是证明道存在的可感知的根据。《在道德真经文圣义》中，杜光庭还从本迹、理教、境智、人法、生成、有无、因果七个方面，详细辨析了道与德的关系，这七个方面涉及道教的其本教义，是道教援引道家学说的最为系统的表现，其中有些内容如因果，并非道家学说所固定有，而是援佛入道，是对道家思想的丰富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唐代佛道融合相长的发展趋势。

再次，杜光庭阐述了道与物的关系。他认为，道以自然法则生成万物，物的存亡取决于道的存亡，"万物，道存则生，道去则死"，"道以妙无生成万物谓之自然，物之生物、形之生形谓之因缘"。但是，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关于道与物的关系又有自相矛盾之处，他说："万物自古而固存，岂待为之而后存哉?"既然万物是自古就有，那就与道外于并存的地位，不存在由道而生的问题。

为了指导道教修炼的实践，以实现其成仙证道的信仰，杜光庭也和同期的其他道学者一样，把取自佛教的"观行"作为修道成仙的门径，而且多有创见。他把观行分两种：一为目见，一为神鉴。他说："以目所见为观(音观)，以神所鉴为观(音贯)"。关天"目见"和"神鉴"的区别，他说：观者，外以目周览，内以神照微。目览则辨乎有无，神照则契乎冥寂。"他认为，目见为感知外物，困境生知；神鉴则是体道悟道，使神与虚无之道合一，以成仙证道。在《道德真经广义圣义》中，杜光庭还把"观行"分为十四种门径，他说："从初发心至于极道，舍凡证圣，故有一十四等观行之门"，宣扬只要按照这十四种观法，潜心修炼，循序渐进，就能与道为一，位登仙品。

杜光庭道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纳儒入道，将孔孟之道融入老子之道。在儒道关系中，他认为老子之道与孔孟之道是统一的，但是他坚持以老子之道为主，称道教为"本朝家族"，以老子为至尊。在《道德真经广

圣义》中，他说："仲尼谓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而达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表明了他的儒道既相契合，而道又高于儒的态度。他以儒家思想来解释道家学说，称老子的"不尚贤"，仍是不尚"矜徇夸炫之行"，老子的"绝圣弃智"，并不是绝仁义圣智，而是在于"抑浇诈聪明"，欲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见素抱朴，"臻一忠教"。这种以道为本，纳儒入道的思想，是唐代道教的一个共同特点，它既是唐王朝统治的需要，也是道教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一思想也为后世道教所沿袭。

杜光庭对于道教的最大贡献，当推其对道教斋仪式的整理，并使之规范化。杜光庭师事天台茅山宗道士应夷节，得上清大法真传，也曾受过龙虎山天师的法箓，因此深谙符箓道法。他尝谓道法科教，自汉天师及陆修静撰集以来，岁月久远，几将废坠，于是他考订真伪，条例始末，将茅山宗与龙虎宗两派的斋仪式融合为一，加以分门别类，整理成《道门科范大全集》，计 83 卷。一方面将符箓道派的斋仪式统一起来，并使之规范化；另一方面，将其表奏、词章、颂赞、咒、愿等威仪加以文饰，使之大众化。因此，杜光庭是自南朝陆修静以来，道教斋仪式的集大成者，也可以说是完成者，他所制定的道门科范，盛行于两宋之际，影响到明清，成为符箓派道士做法事的依据。

纯阳祖师吕洞宾

河中府永乐县的吕氏宅前，贫儿乞丐成群结队，他们从四面八方风闻而来，等候好心的主人吕岩分散家资。原来，这吕岩久试不第，心灰意冷，后受仙人指点，幡然向道。他谢绝亲友的好意劝阻，毅然倾其家资，散与贫民，吕岩一边散财一边吟道：

捎碎葫芦踏碎琴，飘然指袖出儒门。

太初实相纯如玉，元始真如莹如金。

丹焰冲天神莫测，剑峰人地鬼难寻。

自从一觉黄粱后，始信从前枉用心。

散毕，好翩然而去。

吕岩何人？八仙之一吕洞宾也。

吕洞宾本出书香名门，其先辈多为朝廷达宦。曾祖吕延之，做过唐浙东节度使；祖父吕渭，德宗时官至礼部侍郎；乃父吕让，历任太子右庶子、海州刺史。吕洞宾少有异志，研习儒经，不舍昼夜。弱冠，以博学通达闻于乡里。为光大先祖鸿业。吕洞宾选择了科举入仕的道路，但此路亦非坦途。唐朝晚期，政治腐败，科举不实。吕洞宾凡举数次，皆名落孙山，转眼已届惑，心中郁闷可想而知。一日洞宾百无聊赖，闲看行人，忽见一位道长朝店家径直走来。道长一边走一边咏唱：

莫厌追欢笑语频，寻思离乱可伤神。

闲来屈指从头数，得到清平有几人。

有道真仙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

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逢。

落地仕子听此绝唱，心中暗感契合。出于至诚，吕岩上前问道："弟子敢问道长大名？"道士答曰："贫道钟离权，字云房，自号正阳子。"吕洞宾延入上座，以酒相待。酒过三杯，钟离权请吕洞宾赋诗助兴，借以窥其向道诚意。吕洞宾喟然吟道：

生在儒家遇太平，悬缨重滞布衣轻。

谁能世上争名利，臣事玉皇归上请清。

钟离权听罢大喜，知其已幡然向道，乃携之同入终南山钟离隐听。为款待吕洞宾，钟离权亲自下厨备饭。黄粱刚入锅内，吕洞宾已伏在桌上昏昏入梦了。朦胧中，他赴京应试，名中甲魁，官运亨通，自州县官而京师朝官，政绩十分卓著，两娶清河大族崔氏之女，家丁兴旺，儿孙满堂，权势显赫 40 余年，最后独任宰相 10 年，执掌大政，位极人臣。忽然遭难，家产遭没，身谪边州，孑然一己，穷困至极，面容憔悴，两袖入风，立马霜雪之中，不禁仰天长叹。正当长叹之际，突然醒悟，方知大

梦一场。立在一侧的钟离权笑道:“黄粱米饭未熟,梦境就已结束。”吕洞宾大惊:“先生何以知之?”钟离权笑而不答,却乘机开悟道:“适才你梦中升降沉浮,荣辱多端,五十年来只一瞬间。富贵不足喜,贫贱何足忧!纵然这富贵好梦,贫贱是悲梦,然皆梦也。是梦就总有醒的时候。”吕岩领悟,深感仕途不足涉,官场不足恋,遂请钟离道长收他为徒。钟离权经过“十试”,乃授以延命之术,金液大丹之功。从此,吕岩改名吕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过上了“逍遥碧嶂青松下,坐看残花逐水流”的隐士生活。

关于吕洞宾的隐修生活,从其诗中即可得出大概。他有时“闲来无事玩青山,闷即街货丹药”;有时“起来旋点黄金卖,不使人间作业钱”。有时“木雕泥塑静中身,心境休沾一点尘”,“闭门清昼读书罢,扫地焚香到日晡”,靠坐禅、读书度日;有时“绿酒醉眠闲日月,句苹风定钓江湖”,“等闲倒尽十分酒,遇兴高吟一百篇”,以垂钓、饮酒、赋诗自娱。除此之外,吕洞宾不还精通剑术,《宋朝国史》称其善剑术,行走如飞。据说,吕洞宾曾遇火龙真人,传天遁剑法。他改剑术为“一断烦恼,二断色欲,三断贪嗔”。他说:“剑有道剑、法剑之别。道剑,出人无形,杀奸以去神散气之法;法剑,世俗目睹,治人以技艺。”后世传说的飞剑取人头的剑术当指“法剑”。

吕洞宾大致生活在唐末宋初的100多年里。据《宋史·陈抟传》记载,吕洞宾在宋初曾“数来抟斋中”。“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这刘仙。”时华州地方官在拜访陈抟时,还亲自见过他。清人黄宗炎的《太极图辨》,确认吕洞宾是陈抟的师友。两人同隐华山时,吕洞宾将经河上公、魏伯阳、钟离权传下的《无极图》传授给陈抟,抟又将此图刻于华山石壁上。至于宋初以后的大量吕洞宾形象,显然是宋朝妄人多窃其名以自炫的结果。

唐末宋初,是道教神仙思想的重要嬗变时期。道家外丹方术虽受重视,但内丹理论已获重大发展,道教金丹思想开始了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化。作为这一时期的著名道士,吕洞宾的丹道思想显然是二者兼而有之。在《纯阳真人浑成集》和《吕祖志·艺文志》所收载的吕洞宾诗词中,既有炼制丹药的。又有存养精神的。他在《外丹百字吟》中写道:

铅汞鼎中居,炼成无价珠。
都来两个字,了却万家书。
用铅不用铅,非铅汞不归。
会盗铅里气,定死石中朱。
大药良无头,金丹釜无耳。
不须用别药,铅汞白相制。
相制成夫妻,自然得相契。
百日火符功,鼎中有天地。
一载成大丹,功能方出世。
用铅者无数,责铅者有几。

对传统的金丹方术作了充分肯定。他在《内丹百字吟》中写道:

养气忘言守,降心为不为。
动静知宗祖,无事更寻谁。
真常须应物,应物要不迷。
不迷性自住,性住气自回。
气回丹同结,壶中配坎离。
阴阳生返复,普化一声雷。
白云朝顶上,甘露洒须弥。
自饮长生酒,逍遥谁得知。
坐听无弦曲,明通造化机。
都来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把内丹方术看成是上达青天的阶梯,可见他对内丹更为重视。吕洞宾这种内外侧重内丹的丹道思想,对南宋以后的全真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初以前,吕洞宾还只是一个乱世归隐者,民间对他尚属陌生。吕洞宾受到膜拜,形成普遍的信仰意识,大概始于北宋末年。当时已经有相当多的关于神仙吕洞宾的传说,仅《夷坚志》一书即收录了近30条。吕洞宾的信仰意识的形成,首先是道教神仙思想长

期演变的结果，其次也与吕洞宾众多的济世救人的善举密切相关。

唐宋之际道教神仙思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神仙可成的传统思想发生动摇。唐朝以前，道士们对飞升成仙一套理论深信不疑，为达此目的，他们付出了一定代价。唐代定道教为国教，采取种种措施优礼道士，所以信奉道术的皇帝大臣尤多。相应地，为寻求飞升成仙，受道士引导而服丹中毒身死的例子也特别多。皇帝中，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大臣中见于记叙的有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归登、孟简数十人，名诗人白居易亦曾习道士炼丹之法。到五代时，梁太祖、南唐烈祖亦因服丹致死。但在五代宋初，道士们已不再导引帝王行方术、求神仙，而更多的是给他们以安邦定国、以治为道的建议，道士入世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有些道士虽然也谈修养与还丹之事，但已不再象过去那们真心相信仙界实有，而是承认“神仙之道难致”，承认“大数有终”了。二是对尘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道士们不但不再以尘世为累，而且越来越关心世俗的苦难。唐宋之际的这些变化，增加了神仙的道德内容，神仙的神奇色彩减少了，人性的色彩却增加了，并最终带来了神仙意义的改变。这一改变给道教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自然而然地与儒释二教的结合，三教合一是唐宋时代宗教思想发展的总趋势，道教神仙思想的发展也和其他宗教思想一样，与这种趋势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北宋初年，在道教应奉读的经典中，就已经强调读儒书、佛书的意义和重要性。当时甚至认为，只有三教合修，才是真正的修道。所有这一切，都深深表现在吕洞宾身上，融化在正在形成的吕洞宾信仰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吕洞宾信仰的形成，正是唐宋之际神仙思想演变的结果，它标志着宋代以后道教的更新。

济世救人，积善累德，是唐宋之际道士的一贯义举，也是吕洞宾信仰形成的社会基础。唐宋之际，道士成份发生重大变化。到五代宋初，那种隐居山中，高尚其事，精究道术，精修至道，不求闻达的传统道士越来越少，甚至逐渐趋于消失。一些身怀异术，逃于形骸，和光混俗的修道者越来越多，这些修道之人隐于市厘，以其方术助善除恶，扶弱济贫，成为道教从出世转为入世内容的一部分。唐末五代的社会动乱，又给修道者的队伍增加了两类人。其中一类是仕途无望，归隐山林，到道教中寻找寄托的人，他们大多兼读儒书，习禅法，修方术，具有一定才干，这些人的入道，给道教信仰增添了新的内容。影响着道、儒、释在内容上的结合。另一类是专修道教方术，以求乱世生存自保，救助贫弱，这类人虽然并不一定都是读书人，但同时也是借助道教以度乱世。唐末五代所出现的这两类修道人物，可以找出一个把二者融于一身的代表，这就是本传主人吕洞宾。由于吕洞宾具有浓厚的入世救世思想，所以关于他的传说才能流传开来，并且形成信仰，历世不衰。

据《吕祖志》记载，钟离飞升时，洞宾再拜曰：“岩之志异于先生，必须度尽天下众生可上升未晚也。”此后便在华山麏羽谷苦修40年，弱于圆成道果。以后或隐或显，悠游四海，除恶扶善，行侠仗义。吕洞宾助济贫民、惩恶扬善的善举颇多，兹录数条：

《夷坚甲志》卷一载，后周时，汴京有一石家茶店，吕洞宾化为乞丐，每日来店求茶，石家有一女，不以为意。每日总拿好茶相待，月余无厌。洞宾曰：“我乃吕先生也，你想富贵长寿吗？”石女曰：“小女不望显贵，能有富寿足矣。”后来石女果然富裕，终寿135岁。

《夷坚志》补卷载，江陵有付氏，家境贫寒，日以志纸为业，但喜接云水之士，并塑吕翁像供奉。吕洞宾化一方巾布袍人，为其治疗眼疾，并书“利市和合”四字，付贴于壁，于是生意兴隆，家境好转。

同上书有吕洞宾出入青楼妓馆，为妓女排愁解忧的故事。安丰县有娼女曹三香，身

患绝症，贫困不堪。吕洞宾化为寒士来求宿，见娼女不贱贫贵富，便给三香治病，很快治愈，三香建吕真人祠奉之。

《吕祖志》卷二载，究州有妓院老板侯姓，初先厌恶吕洞宾吃住不愿付钱，继而发现吕洞宾手臂上有一金钗，千方百计灌醉了他，乘夜去偷金钗，结果被吕洞宾猛击一拳。

梓潼歪道娄道明，利用邪门怪术奸污良家少女数十人。吕洞宾化为乞丐前来惩治，被其驱赶，遂自纸尾倒书诗一首而去，不几天，娄道明口吐膏数斗而死。

《夷坚志》补卷第十二有“文思亲事官”的故事。云有文思院长官赵应道身患瘰伤不可疗，辞官之际对吏曰：“吾死而无怨，唯有老母无人奉养。”言讫潸然泪下。吕洞宾见其至孝，遂化为道士救之，不数日，应道恢复健康。

以上数条虽然未必尽可相信，但在思想内容上抑富济贫，嘲弄权贵，鞭挞恶邪，表扬善举，这无异给贫苦无告的下层民众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反映了他们渴望改变窘境的要求。因此，这些故事流传甚广，吕洞宾成了贫苦民摆脱苦难的救世主，为吕洞宾信仰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由于吕洞宾信仰在宋代的广泛影响，宋代形成的全真教南北二宗都把吕洞宾信仰吸收到自己的教派中来。全真教的南宗的创始人是宋初的张伯端，北宗的创始人为王重阳，这两个人物与吕洞宾本没有任何联系，但在南宋时却建立起他们与吕洞宾的师承关系。《道藏》洞真部方法类有《玉溪子丹经指要》，附《混云仙派图》，云吕洞宾传授 20 人，其中就有王重阳和刘海蟾，刘又传之张伯端。北宗七真甚至编造出“家风谁是祖，钟吕亲自传”，“我师弘道立全真，始遇纯阳得秘文”的神话。到蒙元时期，吕洞宾被奉为“全真五祖”之一。除全真教外，正一天师也同样有傍依吕洞宾信仰的倾向，上述《混元仙派图》中，述刘海蟾所传七人中就有三十代天师张虚靖。

道宗徒崇奉吕洞宾，封建统治者也以其为神，对其步步加封。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 年)七月诏“妙通真人”。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 年)，忽必烈诏曰：“大道开名，可敬元为之化；至真在宥，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宗获成基构，若稽昭代，雅慕玄风”，故封吕洞宾为“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元武宗至大三年(1301 年)再封吕洞宾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到了明朝前期，虽然朱元璋、朱棣拒不承认“帝君”封号，但他们仍是信奉道教的。嘉靖皇帝即位后，以吕洞宾“屡著灵异”，重新恢复其“纯阳孚佑帝君”之号。

吕洞宾著述甚丰。《宋史·艺文志》神仙类著录吕洞宾《建筑物真玉书》一卷。《全唐诗》有其诗四。《道藏辑要》收录其著作多种，或出于扶乱，功为后人伪托，莫能辨其真伪。

“万事回头看”的张果老

唐玄宗开元初年，人们在西京长安行人熙攘、车水马龙的大道上，经常能见到一位老者，齿落发衰，须眉尽白，然而体力强健，笑容可掬，倒骑一白色毛驴之上，来往奔走。他就是我国民间传说八仙之一的张果老。

张果老，本名张果，相传他原是天地混沌、盘古初开时的一个蝙蝠精，后来历岁久远，受天地之灵气，取日月之精华，修炼成人。然后就隐瞒身世，隐居山西中条山潜心修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历数百年，终于修道有成。修得正果，并得到真人指点，学会烧炼金丹之术，吞服后可长生不老，而且张果还善于胎息。所谓胎息，就是道家行气法的最高境界，其方法是，闭住口鼻，尽量不让口鼻呼吸外界空气，而是调动自身固有的内气，使之在体内循环，长期坚持修炼，就能达到长时闭气，完全不以口鼻呼吸外气，而只靠身体中的内气自我呼吸循环，就像胎儿在母体中不用呼吸一样。张果颇精于此道，而且胎息时，可以百

日不饮不食，却依然面不改色，体力如常。此外，世传张果还擅长点化之术，可以指鸟鸟落，指花花谢，指锁门开，如再指一下，又恢复如初。真可谓道法高深，奇妙绝伦。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转瞬又是数百年过去了，大唐帝国的浩荡皇恩布泽众生，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一派太平盛世气象。此时，张果修道已成，常倒骑一白色毛驴之上，来往于汾晋间，点化凡俗，开劫度人。相传张果所骑之驴，本为一纸驴，经点化而成为一神驴，在骑之则日行数万里，休息时以重重折叠，其薄如纸片，放置巾箱之国。而需要笔走时，用水一喷，则又变成一真驴，倒骑其上，奔跃而去。由于张果道法高深，不仅精于胎息、点化之法，而且有长生不老之术，因而成为一位闻名遐迩的神道，所居中条山道观，香火鼎盛，求道拜神之人终日不绝。此事被深居皇宫的当翰皇帝唐太宗知道，作为一个终日梦求长命百岁、皇位永固的天之骄子，也不禁欣喜异常，如获至宝，于是赶紧下诏，派朝廷重臣为钦差，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往中条山，征召张果入朝。此事早为张果卜知，但作为一个来去自由、放纵不羁之人，他当然不愿受皇帝的羁縻，因而当钦差奉旨到来之时，他在妒女庙前佯装死去。当时正值盛夏，骄阳似火，苦热难熬，不过一日，尸体就腐烂生虫，奇臭难闻，软差见状，知其已死，无奈只好扫兴而归。此后，张果又依然往来如初。至武后登极后，一方面，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不愿尊崇李氏的“祖先”及其宗教；同时由于佛教徒在其夺取帝位过程中曾助一臂之力，因此，在她统治期间，采取尊佛抑道的政策，道教及其教徒受到压制。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世间凡人，他不无希望能长生不老、永享天年，所以当她得知精于长生不老的秘术的张果还在人世的时候，也急忙下诏征辟入宫。但张果故伎重演，佯装死去，拒不奉诏，令武后也不无遗憾地叹惜，天不假年，长生无术。

唐玄宗继位之后，崇尚黄老，广征天下方士。开元二十三年(735 年)，玄宗又遗使至中条山征召张果，而他又故伎重演，不肯奉诏出山。后来使者摆上香案，叩拜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张果见其意诚，才恢复原状，奉诏入京，当张果倒骑毛驴，进入长安之时，城门大开，鼓乐齐鸣的，声振建筑物天，大街上万头攒动，争相一睹千年神道的风采。玄宗皇帝对张果崇奉备至，把他安置在东都集贤院，敬之如神。当时张果齿落发衰，玄宗对此多有疑惑，于是问他：“既然你已得道，何以齿发尽衰?”言下之意，怎么没有一点仙风道骨。张果一听，便笑道：“有无生相，有生于无，到了衰朽的年纪，道术也没有用。如果觉得这样很可耻的话，我把斑发危齿全部队掉，不如当初一样了吗?”于是当面拔去鬓发，击落牙齿，以至光头如僧，满口流血，玄宗见状，甚是惊恐，赶紧制止，劝其回去休息。一会儿，玄宗再遣使召之，但见齿发皆生，形如壮年。玄宗暗自称奇，遂留侍内殿，行不离左右。

此后，玄宗常以神仙方术之事相试，张果皆灵应相对，玄宗愈加宠信。

一日玄宗饮酒，随赐张果，张果推辞说：“山臣饮不过二升，不过臣有一弟子，可饮一斗。”玄宗闻言，颇为好奇，令召之。不一会儿，只见一小道士自殿上飞身而下，年仅十六七，眉目清秀，举止优雅，拜见皇上，言词清爽，礼貌周全，玄宗甚为满意，赐坐，张果说：“弟子常侍立于侧，不宜赐坐。”玄宗决言更为高兴，遂赐之酒，小道士也不推辞，饮及一斗。玄宗又赐之，张果上前推辞说：“不可再饮，过度必有所失。”玄宗又逼赐之，及小道士饮罢，酒忽从头顶涌出，黄冠落地，化为一磕(酒器)，玄宗及嫔御皆忍俊不禁，开怀大笑。仔细观瞧，只见一金磕在地，根本不是小道士，经验证，乃集贤院金磕。

有一次，玄宗与宦官高力士闲谈神仙方术之事，玄宗随口说道：“我听说苦堇汁酒毒性极大，人饮之必死。如果不是仙人，饮此毒酒，必败其质。”高力士为取悦玄宗，就说：“人

称张果为神仙，可召试之。”于是，召张果进宫，赐之苦酒，张果也不推辞，连饮三杯，微有醉意，环顾左右说：“此非美酒也。”遂回舍休息，不久即醒，揽镜视其齿，皆斑然焦黑，遂用铁如意击落牙齿，从衣带中取红药一贴，敷于穴窝中，而后又寝。第二天醒来，牙齿复生，灿然如玉，恢复如初，玄宗甚奇之，信其为神人，遂下招册封张果为“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并打算把奉道的玉真公主许他为妻。对此，张果戏言曰：“千岁老翁取妇得公主，甚可畏也。”竟不奉诏，玄宗无奈，只好作罢。

有一年金秋，睛空万里，秋高气爽，玄宗兴起，率文武百官到咸阳狩猎。一时间，御林园中，万马奔腾，尘埃滚滚。玄宗纵马驰骋，倘若流星，无一虚发，连获数物，不禁心花怒放，洋洋自得。正在此时，一只麋鹿急驰而去，其体大无比，形态特异，奔腾跳跃，快若流星。玄宗策马紧追，一箭中的，猎获此鹿，群臣皆呼万岁，称圣上英明。于是玄宗与众人兴高采烈，抬着猎物，摆驾回宫。适逢张果见之，大惊曰：“此仙鹿也，已满千岁。汉武帝元五年，臣曾侍从畋猎于上林园，生获此鹿，既而放之。”玄宗不信，曰：“时代之远，岂能不被狩猎者捕获?”张果答曰：“武帝放生时，在其左角下志以铜牌。”众人验之，果然发现一铜牌，长二寸许，注明元狩五年放生，至其时已852年了。

至此，玄宗与群臣皆服其灵验，信其长生，对其愈礼敬。公卿士大夫竟相拜谒，以求指点迷津，探寻方术。一时间门庭若市，应接不暇，以至无法潜心修炼，累陈老病，再加上的久行思归，因此就上奏玄宗，乞求归山，玄宗虽有不舍但也知不可强留，遂允奏。及行至恒州，不久即死，其弟子葬之于深山密林之中。玄宗闻讯，悲痛至极，立栖霞观而祀之。

后来有人不信其死，打开棺椁视之，乃一空棺。于是世传真尸解成仙，飞升而去，我国宋代以后的民间传说中，把他列为八仙之一，盛赞其除恶扬善，济世度人，关于他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

由于张果常倒毛驴，四处游荡，因而后世有人赞之曰：“举世多少人，无如这老汉。不是倒骑驴，万事回头看。”

奇仙异士叶法善

在唐代众多道士中，叶法善是颇以其神奇而著称的一位，就连他的投胎转世也充满神奇色彩。

据说，叶法善母刘氏，一日晚正酣睡帐中，冥冥之中，忽闻天鼓鸣响，阵阵声急。开眼视之，见一流星飞驰而来，及张口结舌、惊恐之余，流星已人口中，囫囵吞之，顿觉有孕，未及15日，即生一子。世人皆异之，以其为神仙化之人。只因其祖宗三代皆为得道高人，深为朝廷所依重，因而为其取名法善，字道元，希其能继祖上之业，弘扬道统，光宗耀祖。

叶法善不负众望，自幼聪慧过人，超脱不凡，习诵经书过目成诵。不曾想，叶法善7岁那年，溺于江中，家人以其已死，悲痛欲绝。谁知3年之后，叶法善又回到家中，而且毫发未损，气色如初。家人见状，惊喜异常，问其缘由，告曰：乃一青童招之而去，至一胜境阆苑，见一老者，鹤发童颜，长髯垂地，乃太上老君，谓其有仙骨灵气，故而留之，至今放还。家人听罢，无不叩道膜拜，感谢神佑。可是自从由仙府归还后，习性与前大不相同，常一人独处幽室，打坐静思，或游历山林，而且不食荤辛，专以素食为生计，更为神奇的是，他还能役使鬼神，驱灾避祸。世人甚异之，敬之如神。叶法善弱冠之年，已身长9尺，形貌殊异。他还时常游历括苍白马山，历年不缀以。一次登山，忽遇三神，招至石室，告曰：“奉太上老君秘旨，前来告汝：汝本为天神，位居太极紫薇左仙卿，只因校禄不勤，被贬谪于人

世。但只要济人佐国，积善积德，功行圆满之后，即可复任。”法善听罢，俯首称是，愿谨守训诫，但唯恐道术粗浅，无以为持，三神遂授以正一三五之法。从此，叶法善诛除精妖，扫荡凶怪，以济世利物为志。留下众多灵迹。

高宗时，征召入京，欲拜为上卿，坚辞不就，请度为道士，出入禁内。然而叶法善时刻不忘老君的训诫，立志济世佐国。他针对当时一些金丹术士哗众取宠，献媚皇上，徒费财力烧炼金丹，叶法善对此颇为不满。他认为，神丹之效虽大，但需有道之士精心烧炼，而且不可能很快就能炼成，因此，极力马阻高宗广征金丹术士，滥服丹药。高宗晚年，体弱多病，自知气数将尽，因而更为器重金丹术士，希望炼就长生法第药，以求永生。并下诏征辟四方术士凡余人，于东都凌空观设坛斋，且遣使观之，但见其中数十人自投火中，使者大惊，法善告之曰：“皆鬼魅，吾以法除之。”并乘机上奏高宗：“丹不可遽就，徒费财与日，请核真伪。”高宗闻言，也觉有理，遂遣散四方的金丹术士百余人。朝廷上下无不称法善贤德，一时间，官宦、市井弟子竟相师事之，收弟子千余人，所是金帛无数，而法善或修葺宫观，或抚恤孤贫，无一私藏。

叶法善入侍禁中，久而思归，于是上奏高宗，请归隐松阳故里，高宗允奏。凡经过之地，除妖诛怪，救人无数。四川张尉之妻，死而复生。法善路过此地，闻知此事，前往探视，乃鬼魂附体，若不除去，张氏必死。于是投符驱之，遂化为黑烟而去。时钱塘有一哈蜊，历经岁月，修炼成精，常倾没舟楫，吞食行旅，方圆百里，深受其害。法善途经此地，投符江中，使神人斩之，除害灭凶，恩泽一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武后称制后，复召入京。后中宗复位，武三思尚秉国权，叶法善明察妖祥。顺应天意，设法保护中宗、睿宗和玄宗，为武三思所忌恨，流放南海。先止于龙兴观，后人洪洲西山，养神修道，历经数载。景龙四年，括苍三神又降传老君之旨，让他佐睿宗及开元圣帝(玄宗)，不可隐逸山野，有所懈怠。未及数月，果有诏征之入京。此后，平定韦后，拥立相王睿宗，玄宗登极，叶法善皆尽心尽力，辅佐圣主，凡凶吉动静，皆预先奏闻。玄宗继位之初，吐蕃遣使进宝，函封呈上，并称：请陛下自开，无令他人知其机密。朝廷上下无人质疑，唯法善劝阴道：“此为凶函，请陛下不要找开，而令蕃使自开。”玄宗从之，及令蕃使自开，函中弩发，蕃使中箭而死，满朝震惊。玄宗因感其忠诚，遂授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寺卿，加封越国公，并景龙观住持。平时玄宗行事，不离左右，君臣相处，随和自如，因此，叶法善也常常在玄宗面前炫耀他的法术。

开元初年，纷争骤平，政通人和，因此，一年一度的元宵灯会隆重非常，举国欢庆。玄宗皇帝也兴致勃勃，移驾上阳宫观灯。自宫门到殿门，连烛不绝，洞照宫室，辉煌如画。能工巧匠，搭构灯楼39余间，高150余尺，悬以金银珠玉，微风吹拂，锵然成韵，并且用彩灯编成龙、凤、虎、豹腾跃之状，形象逼真，巧夺天工。玄宗见状大为欢喜，乃召法善同来观赏，并夸赞说：“此等绝技，真是天下无比。”而法善却不以为然，声称西凉州的灯会与之不相上下。玄宗问道：“难道你亲眼所见吗？”法善答曰：“则从凉州返回，就被陛下召来。”玄宗不信，愿一同前往观看，法善欣然应允。于是令玄宗紧闭双眼，不是随便睁开观看，否则，必受惊骇，诫之又诫。玄宗从其言，法善施展法术，于是玄宗腾空而起，顷刻便到了千里之外的凉州。举目观瞧，灯烛连绵数十里，车马来往不绝，人海如潮，玄宗连称其盛，良久乃还，及至故处，而歌舞之曲未罢。

有一年中秋，圆月普照，天地生辉。玄宗端坐亭中，把酒赏月，乐工舞女陪伴左右，而玄宗尚觉乏味，欲知月宫中仙境景象如何，法善遂邀玄宗同游月宫。玄宗历游仙境，真是耳目一新，叹为观止。月中亭台楼榭，远非自己皇宫帝苑所能比拟，而闻月中天乐，比之皇

宫乐工之曲，真乃天壤之别，因而默记所闻天乐，自作一首《霓裳羽衣曲》。自月宫返回，途径潞州上空，时月光如画，夜深人静，悄无声息，法善问玄宗此行所得，因所谓制一曲，法善欲闻之，玄宗以玉笛奏曲，曲毕，投钱于城中。不曾想，10天以后，忽有潞州使者来报：中秋之夜，有天乐临城，倾城皆闻之，而且还拾得金钱。玄宗闻言，自知其中缘由，因而对法善愈加礼敬。

由于叶法善得宠于皇帝，位至公卿，而擅长神仙方术，因而朝廷百官多有依附，过从甚密，其中不乏趣闻。有一次，燕国公张说到景龙观饮酒，未及三巡，便放下了酒杯，叶法善不解，问其故，乃说无人作陪，没有雅兴。法善遂谎言道："有一位处士，久隐山林，性情拘谨木讷，而耽于饮酒，颇善饮，即可召之。张说闻言，酒兴顿起，遂召之。但见这位处士身高不过3尺，而腰粗数围，行动笨拙。邀入座，杯盂皆尽而其面不改色。喝完酒，张说起身要走，叶法善忽然拔剑怒叱处士，说他只沉湎于酒而无高谈阔论，怠慢了客人，因以剑斩之，处士于是现出原形，变为一个酒桶。张说见状，不禁捧腹大笑，与酒桶对饮，岂能胜之，难怪自己已有醉意。

叶法善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盛唐时期，由于封建帝王的推崇，道教得到迅速发展，许多道士受到了皇帝的宠信，荣耀非常，象叶法善等人还加官进爵，位至公卿。与此同时，传入中国已千余年的佛教，也在中国扎根繁衍，颇有影响，因而，佛道二教争道统的斗争也很激烈，不仅表现在教理教义上的相互辩难，而且，和尚、道士斗法的事情也时常发生。叶法善也数有传闻。

当初，叶法善隐居四明山，静心修炼，历时数年，某年五月初一，忽有一老翁叩门求救，泣之甚哀。弟子引见，叶法善问之，乃是东海龙王也，天帝命其主八海之宝，千年一更其任，无过失者可位登仙品，其时970年矣，眼看功业垂成。岂料有一沙门，逞其幻法，住进了龙宫，昼夜念咒，已20多年了。五月初五日，其法将成，届时海水如云，卷往天空，大海将涸，而上帝镇海之宝，制灵之物，必为幻僧所取，因此，前来乞求赐丹符救助。法善应其求，于五日午时，发一丹符，飞往求之，海水巍然不动，幻僧愧恨之极，投海而死。次日，龙王率虾兵蟹将奉珍贵奇货，前来拜谢，法善推辞说："山野之中，无所适用，"因而一无所受。并顺便地对龙王说："此崖石之上，离水较远，如能辟一清泉，即为惠赐。"于是，当天晚上，风雨骤起，及至天明。一道石渠，环绕山麓，蜿蜒而去，泉水流注，终年不竭。当地百姓深受其惠，名之曰"天师泉"。

有一次，玄宗与武妃幸东都，叶法善与僧人金刚三藏随同前往。当时正在兴修宫殿，有一根方梁长数丈，粗六七尺，众工匠合力搬移，举步艰难，玄宗好奇，就说："闲得无聊，可试小法以为乐"，遂让法善试举这根方梁。法善受诏作法，方木一头离地数尺，而一头未起，玄宗就问："大师的法术何以不灵？"法善曰："三藏使众神压住一头，故不举。"时玄宗奉道，武妃崇佛，因而武妃面有得意之色，三藏也满心欢喜，玄宗心中不悦，为有意刁难三藏，命其施咒术，咒法善人瓶中。于是金铡三藏咒法"大佛真言"，一遍咒罢，法善即入瓶中。玄宗又问三藏："大师功力运用自如，你既然能把他咒入，还能把他咒出来吗？"三藏点头称是，然后诵咒数遍，法善不仅没有出来，反而消失不见了，武妃失色，三藏大惧。过了一会儿，高力士传报叶法善到，玄宗问其何往，法善自称宁王请赴宴，无法脱身，借此机会赴约去了，而不是因为三藏的诵咒。玄宗闻言大笑，武妃、三藏稍稍平静。

叶法善自隋大业丙子（617年）降谪人世，谨守训诫，济世佐国，除妖荡伪，功行圆满，自应飞升天庭。于是开元庚申（721年），忽有仙鹤数百，翔集道观上空，徘徊三百，五色端云，覆其居所。其后不久，叶法善即化仙

于景龙观，享年104岁。玄宗闻讯甚哀，诏赠光禄大大夫、越州都督，依其遗愿，归葬故里。出殡之日，文武百官皆缟衣素服，送于国门之外，诏三州助葬，供给所需，可谓隆重之极，虽死犹荣。

千年睡仙陈抟

中秋过后的华山云观台，秋风清爽，菊花飘香，朗朗歌声，随风飘动，由远而近：

臣爱睡，臣爱睡，不卧毡，不铺被。
片石枕头，蓑衣铺地。
南北任眠，东西随睡。
轰雷掣电泰山摧，万丈海水空中坠；
骊龙叫喊鬼神惊，臣当恁时正鼾睡。
闲想张良，闷思范蠡，
说甚曹操，休言刘备。
两三君子，只争些小闲气。
怎如臣，向清风岭头，白云堆里，展开眉头，
解放肚皮，且一觉睡，
管甚玉兔东升，红轮西坠。

这潇洒尘外、超凡脱俗的《睡歌》的作者，即是以绝世睡功闻名于世的千年睡仙陈抟。

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他的身世颇富戏剧性和神秘色彩。那是公元871年的一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在涡河岸边居住着一家靠打鱼养家的陈氏。这天，年过花甲的陈老汉早早起来推开房门举目四望，但见天地一色，白茫茫，一望无际。老汉望着这冰天雪地，凄然地叹了口气，决定回屋闷头睡觉，当他伸出右手关闭房门里，屋门传来了孩子们饥饿的哭声……是啊！四五个孩子全靠他打鱼养活。今天如打不到鱼，孩子们可吃什么呢？老汉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抖抖精神打起网钢，咬着牙顶着寒风朝河边走去。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两尺多厚的冰层打开个窟窿，正犯愁如何下网时，一股莫明其妙的暖流吹得河水清澈可见。老汉兴奋万分，举起网钢撒入水中，不一会儿，有一个沉重的东西被打了上来。老汉激动得来不及细看打的是什么东西就慌慌忙忙携带回家，釜下添薪，为孩子们烹食，当他把从河中出的东西放入锅中，添水煮食时，“雷电大震良久，渔人惶骇，取出掷地，衣裂儿生。”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婴就这样来到人间。陈老汉苦于足下多女无子。遂收为养子，从陈姓。这一神奇传说，说明陈抟出身低微。

至于陈抟其人生于何地，世人只有以“莫知所出”四个概括。尽管日后学者多方努力，仍没确定他的籍贯，仅仅留下三个问号：或华山、或亳州，或普州，莫衷一是。

持华山说法的依据是，西岳华山有很多关于陈抟的遗迹的传说。比如华山脚下的“希夷祠”（又称“玉泉院”）及院中的“山荪亭”，相传乃陈抟弟子贾德生为祀其师而修建的，“山荪亭”左侧“希夷洞”里面的一尊陈抟卧像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据亳州说者，大都以《太华希夷志》、《玄品录》和《宋史·陈抟传》为依据，然而，这些宋元人的著作，大都受“仙有灵根，道有夙契”的影响。他们把陈抟祖籍记到亳州的目的是想把睡仙陈抟与道教始祖老子拉为“同乡里人”。持普州说的依据，是普州境内圆觉洞后山下的“陈希夷墓”及《宋文鉴》中收存的陈抟的署名之作《易龙图序》。我们认为，华山陈抟较为切实，普州、亳州二说不足以为信。

史载，陈抟天资聪慧，有异才。年15，已通究考校诗、书、礼、教之书，尤精于《易》，慨然有拨乱济世之志。陈抟的青年时代，正是藩镇割据、战火频繁的大动乱时期。大小诸侯，为扩张地盘，穷兵黩武，把战火撒向无辜的民众。陈抟深感世乱至此，非雄才大略者不足以挽此将倾之大厦。他试图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六曹，然后以自己的济世之才，匡正邪弊，救生灵于水火。后唐长兴年间（930—993年），陈抟两度参加科举，均名落孙山。

他悲愤万分，绝望有日，竟胸中悒悒，萌生断绝尘缘之念。一场大病后，陈抟心中忽然开朗，知学儒简陋，不堪大用，他决心放弃仁途，周游四海，访寻救世济民之学。20多岁的陈抟从此离家访道，出没于京洛之间，后隐居武当山，再迁西岳华山云台观和少华石室，与隐士李琪、吕洞宾两位高人为友，服气辟谷，凡28年，咏嘲风月之清，笑傲云霞之表。”“精神高于物外，肌体浮乎云烟”。

这位自称“道门弟子”的陈抟，隐居期间，苦修精炼道家内功的同时，还潜心钻研易学。陈抟的追求不是一般求学士子和出家道人所能及的。他自持有“奇才远略”，有悟性，又善观骨相，熟悉星算，经常揽镜目识曰：“非仙而即帝”，其自任如此，并非傲物妄言，实其雄才大成之真切流露。据说，陈抟字图南，即图南自帝之念。因此，他一刻也没停止对动荡时局的细心观察和把握，千方百计地寻找图南帝的契机。为此，有意地将自己的奇行怪举流露给世人，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威望。在他隐居的武当山、华山一带很快出现了关于他的传说，或云陈抟睡觉时远远望去白骨一堆，走到峰边才知是一人熟睡。或云陈抟住所杳无人烟，只有兽迹鸟声，从来看不到人影。华川县官罗彦威曾亲眼看到过陈抟的隐居处：没有灶台也没有床铺，更没有粮油，到处都是兽迹鸟粪，很是奇怪，于是把所见所闻和民间的传说一并奏报给周世宗柴荣。周世宗是五代十国出了名的废道毁佛明君，他对道徒僧侣没一点好感，并把他们视为男不耕女不织的寄生虫，曾多次诏令废佛。然而，当周世宗柴荣接到罗彦威的富于传奇色彩的奏章后，他不禁为之心动。他要看看这个道士陈抟有多大能耐，是否真有象人们传说的那种奇才。于是周世宗柴荣传谕华川县官罗彦威，责令他想方设法把陈抟召进京城。罗彦威苦苦乞求数十天，陈抟才答应随他进京。陈抟进京后，柴荣派人把他紧紧锁在房中，又派数十名大内高手轮流昼夜监护，看他有什么动静，陈抟一进房便大大咧咧地躺在地上，不多时便鼾声大作，监护人员认为其中有诈，可能是陈抟的金蝉脱壳之计，更加小心警惕，怕他醒后溜之大吉，不敢离开寸步，列不敢稍有懈怠，一个个熬得唇干眼红，叫苦连天。一天天过去了，监护者换了有几十班，陈抟一直睡在席片上，不吃不喝也不动，鼾声如常。一个月以后，周世宗准备召他时，他还在熟睡中。

周世宗对陈抟的睡功非常佩服，连连赞其为高道名士，非虚妄怪诞之徒。而且很是虔诚地向陈抟请教询问飞仙之道和黄白之术。陈抟对周世宗的询问大不以为然，他答曰：“陛下乞四海之主，当以治国理民为急务，岂宜留意黄白事乎？”周世宗闻之很是不悦，但他言之有理，又是一片好心，使其欲发作而不能。所以万乘之尊的周世宗不仅没有降罪于冒犯龙颜的狂傲道士，反而视为朝外贤才，大加器重，拜为谏议大夫，赐号“白云先生”。陈抟当即谢过皇恩，拱手辞退，回归华山。

陈抟此次进京，他的最大收获是：探视了周王朝内部的混乱、虚伪和分崩离析的隐秘，坚定了自己图南皇帝的信心。他的心中暗想，自己山村野夫式的生活快要结束了，出头得天下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陈抟果然料事如神，时隔不久京中就传来周世宗柴荣病故的消息，朝中一片混乱，幻主无力控制朝政，佞臣奸官横行霸道。陈抟视此为天赐良机，率领追随者数百人，星夜兼程，赶赴京师图南自问。谁知后周大将赵匡胤早有二心，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在部将的拥立下，废周而自立，建立宋家天下。陈抟闻传，万分悲痛，苦心经营20年的大业因晚一步毁于一旦，一失足成千古恨，大好江山坐付人。陈抟只好率领众徒退回华山，永为道士，绝了乐称帝的念头。所谓“非仙而即帝”的陈抟，时至今日只有一个选择，称帝已不可能。

却说那靠发动兵变、僭主越位得天下的赵匡胤，虽尊为天子，却忧心如焚，食不甘味。

他担心不一定哪一天，自己的部位将也会摸仿自己"黄袍加身"，僭赵主位。赵匡胤每想至此，不寒而栗，又一筹莫展，不得已只有问计于陈抟。已不念红尘之事，决意修炼成仙的陈抟，对于赵匡胤捷足先登，夺取江山皇位的历史毫不存芥蒂，而且他坚信赵匡胤乃真龙天子，必能霸天下，从此天下大可太平。所以，他愿意帮助赵匡胤渡过难关，授计两条。其一是"怀酒释兵权"。赵匡胤以此施之，果然奏效。兵权收归皇帝，大将沉于天伦，天下遂定。其二是预卜宋王朝有"一汴二杭三闽四广"之忧。赵匡胤不解其意，再四请教，终未奉告。后人把它附会为宋王朝步步南迁之谶语，从开封迁杭州，直到广州崖山。

关于陈抟与宋王朝皇室之间的传说很多，说法多有不同。

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其弟赵匡义登基继位，是为宋太宗。然而宋太宗得位非正，且太祖死于非命，朝中骚然，多有微言，人心不服。太宗心忧之，他为了证明自己的皇位是顺天应人，奉天承运的。登基不足百日，便遣使赴华山，诏陈抟进京，帮助他粉饰太平。但是，潜心于修道、不问人间世事的陈抟，对宋太宗的黄衣使者毫无兴趣，以"轩冕浮荣绝念此，三降只乞睡千年"，表示自己无意进京。宋太宗并没有因陈抟的谢绝而善罢干休，再于984年6月差遣能说会道的葛守中携带诏书御诗赶赴华山。其御诗云："三度宣卿不赴朝，关河千里莫辞劳。凿山选玉终须得，点铁成金未见烧。柴袍绰绰宜披体，金印累累可挂腰。朕赖先生相辅佐，何忧万姓辍歌谣。"陈抟对太宗的引诱手段嗤之以鼻，答之以四句诗："调和四气凭烧药，修炼千方只要安。黄阁高爵无意恋，闲居佳境胜为官。"还是执意拒绝进京，愿终生为草泽愚人。葛守中怕请不到陈抟，无法交皇差，绞尽脑汁，死缠硬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对陈抟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命怎敢推辞，诏旨岂能抗拒！观他"暂离仙洞去，可应帝王宣"。事已至此，陈抟自知不应帝宣，终无宁日，遂答应进京。他的老师麻衣道者，担心陈抟此次进京，踏入红尘后，会惹出什么麻烦，临行时赠诗一首："独坐茅庵迥出尘，亦无衣钵日随身。逢人不话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告诫他要做"人间无事人"。

陈抟在葛守中带领下，头戴华阳巾，身服道袍，离开华山来到人声鼎沸的京都汴京，在皇宫延英殿与宋太宗相见。宋太宗每每以甜言快语夸耀自己的文治武功，自诩什么，"朕自即位以来克服八方，威临万国，遐迩悉归皇化。"同时，也称赞陈抟为山中宰相，国中奇才。然后，亲自带领陈抟登高远眺，游览街市。太宗总是以荣华富贵、功各利禄引诱陈抟出山做官。一日，太宗与陈抟在城楼之上对棋，见一富豪人家日上三竿才起床。太宗灵机一动，吟诗一首：人人未起朕先起，朝来万事攒心里，可慕东京富豪民，睡至日高犹未起。以示富豪人家，有钱有势，不必为烦事操劳，大可终日高枕酣睡。陈抟见太宗诗中有诗，也不甘示弱，作诗对答曰："昨夜三更梦里惊，一声钟响万人行。多应又是金朝阙，臣自无官睡到明。"太宗听罢心中一亮，暗想陈抟终于开窍要做官了，马上拜他为谏议大夫。殊不知，太宗误会了陈抟的诗意。陈抟的原意是说：他无官一身轻，不为俗务缠绕，大可大睡终日。

宋太宗见陈抟唯以睡觉为念，山中为乐，无出将入相之意，便如实相告说：朕召先生来，以整朝纲，安社稷、济人民相期。希望能献济世安民之术。陈抟下山时，其师明告"逢人不话人间事"，他恪守师训，不愿参与朝政事。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如不说个一二三，宋太宗绝不会放他回山，陈抟心生一计，在宰相宋琪面前大吹宋太宗：有天人之表，为仁圣之主。声明皇上龙颜秀，博达古今。宋琪把陈抟的话告于太宗，太宗当然很高兴。谁知陈抟此计不成，反而更加引起大家的极

大兴趣，坚决要请他赐教。陈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献上“远近轻重”四字。远者，远招贤士；近进，近去佞臣。轻者，轻赋万民；重者，重赏三军。太宗以为陈抟所言，为历朝帝王济世安民、永固皇位的精华，如获仙人真言，对陈抟大加奖励。下诏册为希夷先生。其诏有云：陈抟，一代高人，累朝逋客。慕我隆平之化，来修觐谒之仪。不有嘉名，何彰贞范，宜赐号希夷先生。并诏令华州地方官员修缮陈抟隐所云台观。

此后，宋太宗对陈抟钦佩有加，常宴于宫中与之密语。每遇大事，辄请教于他。据《邵氏闻见前录》记载，宋太宗立王储一事，陈抟帮了他的大忙。宋太宗欲立寿王（真宗）为储，又怕诸王不服，请陈抟抵诸王宫殿，给诸位王子看相。陈抟知道太宗意在寿王，他走到南街寿王府，没进入府中，就折回头，告于太宗曰：“王门厮役皆知，何必见王。”太宗在陈抟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皇位继承，陈抟由此也名震朝野，海内贤人闻风而慕之。

陈抟作为道中奇人，以“善睡”闻名于当世，有“睡仙”之称。他隐居华山期间，“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在云台观修炼时更是“多半门独卧，经累月至百余日不起”。据陈抟的研究者认为：陈抟的睡法有固定的姿式，一般分左侧式或右侧式。左侧式是：弯曲左胳膊，以垫面部，把左耳放在大拇指和食指的分开处，直伸腰。左腿亦弯曲，且接触腹部，然后将右腿伸直放在左脚之侧。用手心贴放在肚脐轮上，右侧式如同左侧式，只是把左手换为右手。陈抟有崇拜者金砺目睹过陈抟安睡时姿势总是：平伸仰卧，面色红莹，呼吸不声息，十分安祥。当然，也有人说陈睡觉时，鼾声成“华胥调”，合“混沌谱”。可见，陈抟之睡和一般世人和睡非一概念。他自己认为，睡觉分世俗之睡与至人之睡。

世俗之人沉湎于宦海情场之中，追逐的是妻妾禄位，钱财官爵，以致名利声色汩其神识，即使在睡梦境中，也无法片刻安守，所谓“困倦而卧”，欲睡而不能，即为世俗之睡。而奉道修炼，脱离世俗杂念有德功夫之人的睡，才叫至人之睡。陈抟的睡可称为“至人之睡”。他的睡，实际上是道教内丹派的一种独特功夫，名叫“蛰龙法”，或“胎息法”。这种功夫，绝对摒弃世间一切杂念，以奉道修炼为唯一之念，即使在睡熟时也不能停止修炼。陈抟的修炼“蛰龙法”就是“借睡炼养，成其大丹”，经常处于似睡非睡状态。或侧卧片石之上，或行于鼎沸人群，一旦进入炼养境地，呼吸无声，数日不食不饮，“金门牢而不可开，土户闭而不可启，苍龙守乎青宫，素虎伏于西室，真气运炼于丹地，神水循于五内。”达到“六脉俱无，闭气胎息”的静寂世界。外人不知还以为真是睡了，其实在炼功。

陈抟的“睡”并非真睡，他是借助睡达到修炼的目的。陈抟之老友吕洞宾对他的睡作过精辟论述，他曾说：“抟非欲长睡而不醒也，意在隐于睡并资修炼内养，非真睡也。”陈抟自己也说：“至人本无梦，其梦乃游仙。真人亦无睡，睡则浮云烟。”

睡仙陈抟，“借睡修炼”，开内丹道家的独特睡功，很流行于世，成为千古不变仙家睡功。张三丰的睡丹决、罗春浦的先天睡功、虚静天师的睡功以及小搭桥卧功法、大搭桥卧功法，都是从陈抟的睡功中演绎出来的。

陈抟在道教内炼养理论方面作出的贡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束奇葩，他一生“好学《易经》，手不释卷”。精研易学玄机。务穷宇宙之奥秘，致力于养生之道，道创《无极图》，开创以图式解析《易》理的先河。他假《易》理而论仙道，系统地阐述了内丹大道。

关于《无极图》的源流和含义，清代学人黄宗炎在其《太极图说辩》中记述道：此图本名《极图》，陈图南刻于华山石壁，列此名位。创自河上公，魏伯阳得之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吕洞宾后与图南同隐华山，因此授陈。陈又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皆

以授钟放，放以授穆修。个以《先天图》授周茂叔，乃方士修炼之术。其义自下而上，其明逆成丹之法。就其图而述之，其最下一“○”名为玄牝之门。玄即神谷也，牝指窃也，谷者虚也。在修炼之家，以玄牝谷神为人峰命门两肾间隙之间，气由此而生，是为祖气。凡人五官百骸之运用知觉，皆根于此。于是提其祖气，上升为稍上一“○”，名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有形之精，化为微艺之气，炼依希呼吸之气，化为出无有人之神，便贯通于五脏六腑而为中(三五至精图)，名为五气朝元。行之而得也，则水火交媾，而为又其上之○，名为取坎填离，乃成圣胎。又使复还于元始，而为最上之一“○”，名为炼神还虚，复归无极，而功用至矣。盖始于得窃，次于炼已，次于和合，次于得药，终于脱胎，诚仙真求长生之民术也。

陈抟发明的《元极图》，根据“逆以成丹”的原理，分为得窃、炼已、和合、得药、脱胎五个人阶段和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复归无的四段功夫。“逆以成丹”的“逆”，主要是指“水火”之逆。水性本润下，火性本炎上，如逆其水性，使水向上不卑湿；逆其火性，使火向下而不燥烈，温养和燠于肾阴。如此一来，“滋养之至持续而不已，温养之至坚固而不败”。即可谓炼养成丹，修炼得法。陈抟在《无极图》中展示的炼养理论和方法，不仅包含有老子“复归于无极”，“归根日静，静日复命”的思想，而且对魏伯阳模拟自然的丹道理论和钟吕金丹道的内丹修养方法，也进行了整理和吸收，把内丹炼修方法明确地划分为五个阶段，使其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从而发展了丹鼎派中最神秘的内丹道，受到道徒的崇敬和奉仰，尊其为“陈抟老祖”。

陈抟以《无极图》传钟放、穆修，几经辗转，至周敦颐斤中，被改造成阐释理学奥秘的《太极图》，创立了较为完备的宇宙起源说，同时，陈抟又以《先天图》授邵雍，邵雍将其“心法”推演扩大，建立一套象数体系，陈抟由此成为宋代易学体系的开山鼻祖。

紫阳道人张伯端

刀笔随身四十年，
是非非是万千千。
一家温饱千家怨，
半世功名百世愆。
紫绶金章今已矣，
芒鞋竹杖任悠然。
有人问我蓬莱路，
云在青山月在天。

这首出自紫阳道人的感事诗，以平缓无奇自然托出的和调，展示了主人顿然自悟后伤感无奈、愤世嫉而又超然自视的复杂心境，读来回味绵长，发人深思。

紫阳道人张伯端，字叔平，一名用成(诚)，浙江天台人。生于北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少时聪慧好学，精三教曲籍，通刑法、书籍、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年长为府史，精明干练，颇得有司重看。后因一事刺激，遂发道之心。原来，平叔有嗜鱼之癖，午间在衙办事，家人送膳，必有鱼味。偶有一日，吏友将其饭中之鱼藏匿梁间，平叔不知，疑为侍婢所窃，归来责打拷问，侍婢自白无由，又不堪忍辱，乃投缳梁上，自绝人间。平叔对此甚感歉疚。后数日，有小虫自梁间落下，验之，鱼烂出虫也。至此，平叔方才大悟，不禁渭然叹曰：“积椟盈箱，其中类窃鱼事不知凡几！”愤然慨叹之余，纵火将所署案卷全部焚烧。因此触犯科条，按火烧文书律成岭南。

治平中(1064—1067年)龙图阁学士陆诜镇桂林，陆诜以其贤能，引置帐下，掌管机要。熙宁十二(1069年)，随陆诜到成都，遇青城丈人，得金液还丹之道，遂改名用成(诚)，号紫阳山人。熙宁八年(1075年)，因念世之慕仙修道者十之八九，而达乎真要者

未闻一二，为阐扬真人内丹妙决，写成律诗九九 81 句，号《悟真篇》。其中七言四句韵 16 道，以表二八之数；绝句 64 首，按《周易》诸卦；五言诗一首，以象太乙。续添西江月 12 首，以周岁律。

《悟真篇》是道教内丹丹法主要经典，它以诗词形式总结了北宋以前的内丹方术，在道教史上是一部承先启后重要著作，与魏伯阳的《参同契》一样，并为道家正宗。

晚唐以来，道教进一步吸取儒、释两家的思想充实自己，三教融合成为文化思想发展的总趋势。在《悟真篇》里，张伯端上承钟(离)吕(纯阳)派内丹之说，并顺应时代思潮倡导三教归一。他说："教虽三分，道乃归一"。又说，佛教以"空寂"为宗，若能顿悟圆通，则可直达彼岸，如果习漏未尽，就要继续循于有生；道教以"炼养"为真，若能得其妙决枢要，就可立即身列圣位，如果未明本性，只好继续停留于幻形；孔子也有关乎性命之辞，只所以略而未详，是因为他要正人伦，施仁义礼乐之教，故于无为之道未偿显言。既然三教同道，故而主攻以"性命双修"的钟吕派内丹为中心，撮合三教精要。

《悟真篇》成后，张伯端又觉其中惟谈养命固形之术，于本源真觉之性有所未尽，遂研读佛经禅语，作诗曲杂言 32 首，附于《悟真篇》后，欲以诸佛经妙用广其神通，以真如觉性遣其妄幻，以达到"归于究竟宁寂之本源"。

过此后不久，陆诜死于四川成都，张伯端辗转于秦陇，以其所著的《悟真篇》授予马处厚，对他说："生平所学，尽在是矣，愿公流布，当有因书会意者。"神宗元丰五年(1082 年)，平叔病故，享年 96 岁。

《正统道藏》除收入《悟真篇》外，题名为张伯端所著的还有《玉清金司华秘文金宝炼丹决》3 卷和《金丹四百字》1 卷。《悟真篇》及其"三教合一"思想，对道教的影响甚大。南宋以后，张紫阳被奉为南宗祖师，列南五祖之首，称紫阳真人。弟子中最为著名者为石泰，再传弟子中以白玉蟾影响最大。

惊世骇俗的白玉蟾

南宋道士白玉蟾，自幼放荡，浪游天涯，时而蓬发赤足，时而青巾野服，或狂走，或兀坐，或镇日酣睡，或长夜独坐，或哭或笑，状如疯癫，可谓惊世骇俗。

白玉蟾，本名葛长庚，字白晦、白叟，号海琼子、海南翁、琼山道人、武夷散人。福建闽清人，出身高门，幼年入塾，曾举童子科，因任侠杀人，亡命武夷，出家入道。师陈楠，学内丹，且相从云游。陈楠死后，盘桓于罗浮、武夷、龙虎、天台诸山间，形踪无恒，出入莫测。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 年)，先后为守宗在兴州玉隆万寿宫和九宫山瑞庆宫建醮。嘉定十五年(1222 年)，赴临安伏上阙书，不仅没得到皇上诏见，还因其醉酒放荡被逐出京城，此后隐居著述，隔绝人间红尘。

白玉蟾是张伯端以后颇有影响的内丹理论家，以精、气、神为内丹修炼核心，且以神为主，"神即性也，气即命也。"其丹法分炼形、炼气、炼神三关。三关修炼，以"忘"字为要决：初关炼形，要在忘形养气；中关炼气，要在忘气养神；上关炼神，要忘神虚养。其具体炼法分为 19 决：一采药，收拾身心，敛藏神气；三结丹，凝气聚神，念念不动；三烹炼，玉符保神，金液炼形；四同济，忘形绝念；五武火，奋迅精神，驱除杂念；六文火，专气致柔，含光默默，温温不绝，绵绵若存；七沐浴，洗心涤虑；八丹砂，有无交入，隐显相符；九过关，胎仙成就；十分胎，犹如"鸡能抱卵心听，蝉到成形壳自分"；十一温养，知白守黑，神明自来；十二防危，戒曰："一意外驰，火候差失；"十三工夫，要"朝收暮采，日炼时烹"；十四交媾，念念相续，打成一片；十五大还，对景无心，昼夜如一；十六圣胎，必须蜇其神于外，藏其气于内；十七九轻，"火候足时，婴儿自视"；十八换

鼎,称"子又生孙,千百亿化";十九太极,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即为最高功果。十九决修炼过程,以凝神聚气入手,自始至终坚实静定无为,忘形绝念,以调心为要诀,不拘年月时辰,卦爻斤两,不同于钟吕的内丹炼法,是受佛教禅法影响的结果。

白玉蟾的内丹理论,受禅法影响是很大的,有人说他"禅宗死了"。比如,白玉蟾在《修仙惑感论》中说,成仙之道有三等:上士可以学天仙之道,学成后可以变化飞升。方法是:以身为铅,以心为汞,以定为水,以慧为火,身心合一,定慧合一,片刻间即能"凝结十月之胎"而成大道。中士可以学水仙之道,学成后可以出入隐显。方法是,以气为铅,以精为汞,以子为水,以午为火,一百天后可以混合神、气、子、午,三年后可成道。世俗之人,若能学地仙之道,学成后可保身体健康,延年益寿。方法是:以精为铅,以血为汞,以肾为水,以心为火,一年内可以融结精血肾心,九所方可成功。

白玉蟾把成仙之道分为三等,而且把禅宗式的"顿悟成佛"说成是"天仙之道",而道家的内丹理论反而从次,可是其内丹理论,几乎被禅宗哲理所代替了。

神霄天使林灵素

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的一天中午,温柔的阳光洒在隆冬时节的大地上,饱受冬雪之寒的人们非常珍惜这难得的阳光,纷纷走出家门,接受沐浴。东京汴梁城的大街小巷都堆满了懒洋洋的人们。在通往皇宫的大道上,忽然一阵骚乱,皇太子赵桓外出回宫,人们不由得东躲西藏,以示回避。然而,迎面走来一大队人马,气势汹汹,耀武扬威,见太子御驾,不仅不回避,反而快马加鞭,横冲直撞,把太子御驾猛然挤到路边。年轻气盛的皇太子,蒙此羞辱,气急败坏,大骂"妖道"、"孽障"……

被皇太子痛骂的这大队人马的主人,便是神霄天使林灵素。朝野上下也只有他,才敢对当朝皇太子如此无礼。

林灵素,原本一僧徒,因不堪忍受佛门戒规和师傅责骂,愤而改佛入道。此人善于装神弄鬼,欺世盗名。他是在鬼神魔妖的陪伴下来到人间的。道家史籍的讯功说:林灵素的母亲刘氏一日夜归,酣睡中恍惚有红云覆身,感而有孕。怀胎两年之后,梦一神人,绿衣玉带,目喷金光,手执朱笔,高叫要来借宿。次日,阴云猝起,惊雷三声,便生下他来。林灵素有神护佑,自然是天资聪颖,博闻强记,读史颂诗更是过目不忘,常为人之瞠目。然而,天神误中投胎,苦得他生而家贫,父亲早亡,母子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更可悲的是,林灵素出生于王安石变法失败、"青苗法"被的年代。刘氏任务为一个农家妇女,无依无靠怎能抵挡着灾荒的威胁。她越来越感到养活一个孩子,有些力不从心。然而,母子连心,况且,林灵素已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白白饿死,岂不作孽!她一狠心,决定把儿子送到温州永嘉县附近的一座寺院中当小和尚,以免一死。

林灵素削发为僧,投佛门,最大的收获是生活有了保障,一日三餐绝无问题,偶尔还能在山下的酒楼中偷喝一壶水酒。5年以后,林灵素已长成人,身材修长,也称得上健壮,再也不象以前那样蔫头耷耳,瘫坐一团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林灵素的内心世界里也增添了不少新鲜的内容和欲望。他已不满足在树墙绿树之中,伴随着晨钟暮鼓和袅袅香烟,饱食终日的生活。他对外面的花花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向往和羡慕。渐渐地,林灵素已经不再把佛门五戒放在眼里,什么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样样俱全,特别是饮酒。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受到师兄的责骂。慢慢地,被骂声和白眼所包围,他在佛门已经无立足之地了。一个凄凉萧杀的夜晚,

林灵素收拾了行装，悄然离开了高墙深院的佛门，怀着怨恨，走滚滚红尘的人间世界。

现实生活打碎了林灵素的美梦。自从他离开寺院的两年中，受尽了饥饿、寒冷和无家可归的折磨。流浪生活将要消尽他人生的旅程时，一个姓赵的道士出现在他的面前。林灵素望着赵道士优厚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待遇，心中很激动，他决心弃佛入道，重新做人，开始追求潇洒飘逸的道家之风。赵道士见这个青年人，灵敏聪慧，颇有仙骨道风，又心诚意虔，遂收他为徒。林灵素一阵兴奋，两人师徒相称，云游四方。然而，林灵素天生命硬，刚一出生就死了父亲，跟随赵道士不到两年，心善行慈赵道士，因为收他为徒，就在一家客栈里登仙远游。林灵素实遭丧师之痛，很是悲哀。但是，他很快转悲为喜。因为，他从师傅赵道士遗物中发现了被道中之人视为生命的秘籍——《神霄天坛玉书》。

《神霄天坛玉书》，为道家绝籍，凡 3 册 19 篇，书中大部分内容是记载民间幻术，在设坛、驱鬼、兴云致雨等道事活动中的具体运用方法。谁拥有这本秘籍，谁就会比其他道士技高一筹。林灵素如获至宝，万分高兴，为了报答师傅赐书，花了 25 贯铜钱，埋葬了赵道士的灵尸，打起“温洲道士”牌子，携带《神霄天坛玉书》，往汴京城走去。

林灵素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政和三年(1113 年)十一月初到达汴京，正好赶上宋徽宗在南效祭天。

原来，昏聩无能、崇道信邪的宋徽宗昨晚梦见了太上老君。梦中太上老君对他说：“汝以宿命，当兴吾教。”第二天早朝时，徽宗晓谕群臣，全朝出动，到南效祭天。宰相蔡京的长子蔡攸为执绥官。君臣数十人，加上武将、卫士和侍人，浩浩荡荡从皇宫出发，当御车行至南薰门时，徽宗忽然令卫士停驾，询问群臣，“朕见玉津园东有楼台数重的，尔等是否看到?”群臣面面相觑，莫名其妙，纷纷耷下头。拱手奏道：“臣下愚钝，未曾见到。”执绥官蔡攸奏曰：“臣看得十分清楚，这是仙境，楼阁均在云雾中，距地面数丈高。”顷之，徽宗又问：“见人物否?”攸奏曰：“有道流童子，手持幡节盖，相继出人云间，衣服眉毛，历历可识。”徽宗大叫：“太上老君已莅汴京。”边说连走出御车，献牲焚香，面对南天叩首不已。一个自欺欺人“天神降临”之怪事，被朝野上下大加渲染，徽宗深信太上老君降临，亲作《天真降临示见录》，颁行全国，诏令京师广建迎真馆，迎接天神降临。

林巡素从“天神降临”的闹剧中，受到鼓舞，他心中暗想，当今皇上如此崇信道教，而且又如此浅陋。凭手中的《神霄天坛玉书》，略施小技，就可以把当今皇上糊得神魂颠倒，围着自己团团转。想到此，他按捺不住内心兴奋、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夜奔皇城，拜访主管全国道教事务的左街道录院长徐常知。林灵素凭借他的机警和三寸不烂之舌，在徐常知面前云里雾里大吹一通，自称他早年跟赵升学道，颇得真传，自诩善于道符，能呼风唤雨，驱邪去灾，求富祈灵，身怀“五雷之法”绝技。他还在徐常知面前献争宠。这位左衔道录，乃泉州道人，精通儒术，为人圆滑，颇得徽宗宠信，与宰相蔡京内外勾结，共同策划迷惑徽宗。徽宗也多次请他寻访高道。林灵素的一番表露，徐常知大喜过望，立即答应向皇上举荐，令他在太乙宫候用。

林灵素住在太乙宫，既欣欣自喜，又坐卧不安。因为 10 天、20 天过去了，仍没得到皇上录用他的佳音。等来的除了惆怅就是渺茫。他有点悲观失望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林灵素早早就脱衣上床，门口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他心中一征，翻身下床，上前开门，徐常知一头撞在他怀里，细声细语絮叨不停。原来，皇上昨日又梦见两黄盔金甲的神仙，脚踏青云，直奔寝宫，将他带到一个青衣神人面前，但见此境楼阁重叠，云雾缭绕，仙乐阵阵，隐约可见“神霄府”三字。徽宗一觉醒来，很感蹊跷，询问大臣，均无言以对。徐常知急忙

上奏,说:太乙宫有一温州道士林灵素,此人常言神霄事,并有《神霄诗》一首。

侍内卫士查访了林灵素按徐常知授意写好的《神霄诗》,回禀皇上说确有其事,并双手呈上从壁上抄来的《神霄诗》。皇上看罢立即传旨,宣林灵素上殿。

徽宗问其知何术,林灵素对:"臣上知天堂,中知人间,下知地府。所有的事,我无有不知者。"

徽宗对他的胡诌妄语,大喜不已,继而又荒唐地问:"朕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林灵素一时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回答,干脆将谬就谬脱口而出,说:"往年上朝玉帝,臣与陛下曾相见,故而面熟。"

谁知林灵素的回答,使徽宗大喜过望,连忙问:"卿所骑青牛哪去了?"林灵素答曰:"已牧外国!"

原来,徽宗把一年前梦游天宫时遇到骑青牛的道士,当成林灵素,林灵素又索性以假充真。他知道皇上已钻进了他的迷魂圈,他索性来一个趁热打铁,利用徽宗急于神化自己的心理,大吹起来。他说:天有九霄,神霄最高,神霄设有神霄府。皇上即是那神霄府中的神霄玉清王,号长生大帝君,是上帝的长子,统管一切雷神,主宰天上、人间、地府的一切祸福。为拯救人间苦难,才下降为主。神霄府暂由皇上的弟弟青华帝君代理。当朝宰相蔡京、五黼,枢密使童贯,都是神霄府的仙伯、仙吏、甚至连徽宗的宠妃刘氏都成了九华玉真安妃。自己是神霄府的仙卿,皆奉玉帝之命,下凡辅佐徽宗治理朝政……说得神乎其神。

徽宗已信道多年,宠信道中多人,又有太上老君降临之鹰谶语,但独思未有一个压服群下者。林灵素投其所好,把天堂的玉帝搬到人间,使玉帝与人主,仙吏与人臣合而为一,即神化了宋王朝的统治权,又增加了内部的稳固力,更巧妙的是,林灵素在其中仅仅充当了联络天人之间的不起眼的仙卿小吏。所以,他的说教,无一人看出破绽,心悦诚服,统统接受。林灵素这下子帮了徽宗的大忙,为他找到一个治国安民,抑制臣下的有力武器。徽宗为奖励他的劳绩,赐字"灵素",赐号"通真达灵先生",并下令在皇宫附近兴修上清宝录宫以居之。随后赐与金牌、万岁藤杖和"金门羽客"称号,准其出入皇宫。

政和七年(1117年)二月,徽宗在林灵素的导演下,自称青华帝君夜降宣和殿,授他"帝诰"、"天书"、"云篆"等物,遂命道士2000余名集于上清宝录宫,听林灵素公此事,道士们虽大表怀疑,但反对进寥寥,只有一老道士冲上讲坛,大骂林灵素胡言乱语,坛下一片哄笑。同年四月,徽宗再次诏道录院,宣称:朕乃上帝长子,大霄帝君。睹中华被金狄之教,焚指炼臂,舍身以求正觉,朕甚悯焉。遂哀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下正道。帝允所请,令弟弟青华帝君权朕大霄之府。朕夙昔惊惧,尚虑我教所订未周,卿等可上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群臣及道录,一齐上表章于上天,请以上帝的名义册封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据史载,神霄玉清王,是仅仅次于昊天玉皇上帝的尊神,既然徽宗是神霄玉清王下降人间,当然也是天上、人间、地府的主宰,集天神、教主、人君于一身。林灵素别出新裁,以神仙下凡来神化皇权和帝王的造神欺世行为,极大地满足了徽宗的神欲。

重和元年(1118年)四月,林灵素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势力,唆使徽宗诏令天下各府州县,仿照儒学的形式设立道学,由林灵素主持"正一黄录青科仪",编排三界圣位,校正丹经予书,册定道史、经、灵坛等。凡入道之道徒,必须在所在州县道学中学习经书,每年考试一次,根据成绩可分别授以元士、高士、大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名号,从元士到志士凡10品。道士还可通举考为贡士,到京师太学学习;参加大比或殿试合格者,称为有道之士,授以道官道职。当时徽宗曾设有道官26等、道职8

等。林灵素、张虚自授位最高。另外，道士和官吏一样有固定的俸禄和服饰。

林灵素为进一步提拔私人，排斥异已，通过徽宗先后封了800多名朝臣和官吏为“仙伯”、“仙吏”。对于不服自己，或怀疑“神霄说”者严惩不贷。

林灵素早年与僧人结怨，一直耿耿于怀，遂借徽守崇道之好，怂使其排斥贬抑佛教。宣和元年(1119年)，徽宗郑重诏告群臣，自先王之泽竭而胡教始行于中国，虽其言不同，要其归与道为一般，虽不可废，而犹为中国礼义害，故不可不革。下令“改佛陀为大觉金仙，其余佛教诸神改为仙人、大士、僧人，尼姑改称德士、女德”。把僧人的管辖机构僧录司改为德士司，隶属“道德院”，把佛教降为道教的从属。并要求要德士(和尚)象道士一样蓄发戴冠。林灵素抑佛扬道的作法，也招惹不少麻 烦。关于和尚蓄发的诏令颁布第二天，皇太子赵桓亲自出马，率领十多名和尚，公开与林灵素“斗法”。林灵素虽有皇上作后盾，但在此次“斗法”中，仍以尴尬局面收场，锐气大挫。

经过十几年苦心经营，宣和元年以后，林灵素已道盾徒盈门，党羽两万余众。自己更是广邸厚禄，锦衣玉食，臣下为他所凌，连皇亲国戚也怕他三分。林灵素每出门，必高马轻骑，仙乐导前，武士殿后，如御驾出京，其权位显赫，无一出其右者。汴京城的人根本分不清谁是林灵素，谁是宋徽宗，干脆称他们为“道家两府”。

当林灵素目空一切，飞扬跋扈之时，灾难从四面八方向他悄悄围拢而来。

林灵素的胡言乱语和丑陋行为。不仅开罪于佛门、儒家，就是一部分正直道士也深以为耻。比如，林灵素每遇初七，都要给朝中大臣和乡里百姓讲《神霄玉清经》。一次，他正口惹悬河，大放厥词时，有一老道士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以庸俗之语辱没老君之言”，紧接着是太学博士王俊义大声责道：我的先师孔圣人与老聃同德比义，相师为友，我岂能摧眉折腰听妖道胡言。林灵素的骗局一点点被揭穿，听他讲话的人越来越少。

其次是以蔡京为首的一班权贵，他们眼看着林灵素势倾朝野，皇上为他左右，遂有自危之感，他们与皇太子一起告御状，说他“妖惑圣听，毁谤大臣”，应杀勿赦。

对林灵素打击最大的是他的道术，一而再，再而三在皇上面前失灵。

公元1118年秋，黄河上游大雨磅沱，数十日不止，洪水泛滥，民房倒塌，大水吞噬着黄沙，卷着黄龙奔腾而下，地势低洼地汴京城外黄沙滚滚，一片浑黄。京师面临灭顶之祸，朝廷内外一片骚然。宋徽宗惊恐不安之余，一边征召民工搞洪救灾，一边派内侍敦请“真仙”林灵素，降捉“黄魔”。林灵素非常清楚，黄河泛滥乃自然规律，汴京受害历年有之。但他还是趾高气扬地走城墙设坛请神，指手划脚，投符舞剑一昼夜。林灵素望着汹涌澎湃的黄水，无可奈何地摊倒在城头上，后被徒儿们抬回府中。当他向皇上奉报时，却诡称：此水灾乃天意，无法降服，轩皇太子不敬神霄教，玉帝以此惩戒。只有皇上当机立断废掉太子，黄水自可不降而服。徽宗对这套嫁祸与人的把戏颇不以为然，悻悻而去。

不久，宫中宫女纷纷报告，说宫出现件“怪事”，每一黄昏，有一黄衣老妇，携一个十余岁的男孩，乘车而出。徽宗闻报不敢怠慢，诏请林灵素到宫中驱邪镇妖。林灵素不知中计，装模作样，在宫中设坛书符，驱赶邪妖，煞是骇人。4天以后，筋疲力竭的林灵素，拖着的疲惫的身体向皇上回报时，一群宫女同时跑来禀与皇上，说宫中黄衣老妖不见了，但又有四五个模样怪异的大汉，手持刀斧在宫中游动……林灵素站在旁边听完宫女的叙说，亦无语可言，立即瘫倒，面色苍白，奄奄一息。

几天后，威风扫地的林灵素，带着贴身弟子，灰溜溜地离开京城，成为受人监视的落魄道士。精神的打击和环境的突变，伴随他走

完了人生旅程的最后一段，在惨淡的月光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全真教主王重阳

王重阳，金代著名道士，道教全教创始人。原名中孚，字允卿，后改名世雄，字威德，入道后再改名吉，字知明，号重阳子，自号王三或王疯子。陕西咸阳大魏村人，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出生于一介“家业丰富，累世豪门”的庶族地主家庭。王重阳，自幼美须髯，目长于口，形质魁伟，任气好侠。长入府学，习儒术，因其聪慧明智，勤奋有加，儒家经典习无不精，尤以善属文兼擅骑射闻于乡里，人皆佩服之。

金天眷(1138—1140年)初年，王重阳应武举之考，名中武，遂为小吏。他伏义疏财，施道 于桑梓，胸怀家万卷经纶，服膺兴汉复宋之宏志，欲大展宏图，济世救民。

然而，南宋王朝内部腐败，国库空虚，政局紊乱，内无贤相，外无良将。金兵袭来，城下结盟，拱手献地，苟且偷生。如此山河易主，国破家亡，复宋无望，报国无门。47岁的王重阳郁郁无所为，“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悒悒然，心灰意冷。王重阳哀国之不幸，愤而辞官归田，闲居山野，不久又遭家财被盗之厄，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王重阳遭两次不幸，心力怏怏，郁闷烦燥，大有痛不欲生之感。经常疯言疯语，游荡待市，行迹无恒，如市井流民。

王重阳为解除烦恼，到40里外的刘庄访友。长途跋涉一整天，使他颇感困顿劳累，回家途中遇见一家客栈，便在里面坐下，想喝二两酒解乏，即唤店小二拿酒上菜。但是，时隔许久仍无一人出来应酬。王重阳靠在椅子上耐心等待，不知不觉中他浑沌入睡了。他刚闭上叟睛，随着一阵轻风吹来，两位仙人长袍博带，满面红润，手持秘籍，飘然而至。这两位白发丈余、恬静淡然的仙人，轻轻进入客栈，唤着王重阳的名字，然后两手合在胸前，双目微闭，口中念道：“今日金犯境，铁蹄南下，中原大地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灾难无已，此乃天数。非人谋之。我等授你金丹口决，你当苦心修炼，传教四言，晓喻众生，数年以后，必然卓然有成，即可成仙归真，免除人间凶气……”倏然间，两位仙人潜身遁去。王重阳一觉醒来，见客栈中空寂无人，很感蹊跷，便寻仙迹夺门而出，追而不及，呼而不应。他满腹疑虑回到店中，在室内正中的小方桌上，一个金光灿灿、粼粼耀眼东西映入眼帘，走近一看，王重阳不觉大吃一惊，原来是一本修炼真决。他急切地拿起这本小书仔细看了一遍，顿觉心静神明，万事淡泊，凡俗之事飘飘远离，人间天堂，长生飞仙之事梦游神萦，驱而不散。此所谓“遇仙悟道”。

王重阳遇仙悟道以后，大感仙境之有序，人间之纷杂，他决定摆脱人间红尘，追求仙道，遂辞妻离子，孑然出家，隐居在终南山，虽然妻子捶胸顿足、号陶大哭而不为动容。他在终南的南时村掘地为隧，封高数尺，书榜额曰“活死人墓”。从此以后，王重阳一年四季，寒暑易节，出入于茔地墓穴，似幽灵鬼魂，“内则潜修金丹，外则佯狂装疯”，村童子之恐疑为鬼怪，老叟亦视其为疯癫怪异之徒，均以“王疯子”呼之。久而久之因“活死人墓”地处不毛之地，人烟稀少，既无衣无褐，卒岁度日，又无从授教，布施道民。王重阳欲迁居他处，择木而栖，于大定丁亥(1167年)自焚其居，大火熊熊，路人争相赴救，而其主人王重阳形若无事，婆娑起舞，哂于火边，作歌以讽世，让人难以理解，见者无不摇首而去。

火后，王重阳迁归刘蒋村结庐而居，修行传道，经常口中念念有词，多系荒诞不经之语。比如，他经常朗朗咏颂什么“酆都路，定是个凌迟处，便安排好了镬汤、刀山、剑树……鬼使勾名持黑薄，设推辞与他去。早掉下这尸骸，不籍妻儿与女，地狱中长受苦”。

还有什么。“恋恩亲,恩生害,死难逃,气不来身卧荒郊,改头换面,轮回贩骨几千遭。世华非坚,如石火,火灾难逃”云云。村民对此不知所云,不寒而栗,闻之掩鼻而疾走,没有人理会他。天长日久,自持悟道成仙的王重阳,对此境况大惑不解,怨恨村民缺乏悟气,俗气太重,仅以传道,不足以启其蒙,悟其性,可谓朽木不可雕也。他决定离乡出游,择善施教。金大定七年(1167 年)他再次一把火烧了自己的一间茅舍小屋,仅携铁罐一枚,东走潼关,沿路乞讨,到山东半岛去了。

同年四月,王重阳抵达山东,时值齐鲁大地,春意盎然,百花争艳。儒家圣地,施礼重教,社会秩序井然有致,世民们安居乐业,讲信修睦,一派太平景象,与关西地区的萧条、紊乱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王重阳见之大喜,兴奋、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似乎有了用武之地和大展宏图的机会。在传教的过程中他这次特别注意吸取在家乡传教失败的教训,充分发挥“以诗歌曲词劝诱士人,以神奇诡异惊世骇俗”的特长,随机而施教,加之他卓越的宗教宣传才干,宵旰奔走,循循善诱,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大有成效了。从王重阳受习道者遍布齐鲁大地,达到高潮时日日盈门,应接不暇。虔诚的学道之徒慕王重阳之名气,千里迢迢,艰辛跋涉,相望于路途,络绎不绝。王重阳由此而威名远扬,声誉鹊起,齐鲁大地几乎无人不知,他每到一处,总是倍受欢迎,奉若神明,崇敬有加。王重阳见时机已经成熟,正式打出“全真”旗号,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登洲(今蓬莱)、莱州(今掖县)等地创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等 5 个群众性的的社团组织。齐鲁大地的苦难民众、中下层绅士和地方官吏潮水般地涌向了“全真庵”,都拜倒在王重阳的脚下。他终于成功了,全真道在山东半岛风行一时,席卷齐鲁大地,此所谓“全真之风起于西,而兴于东”。此时的王重阳也非初到山东半岛之时了,奉行有教无类,他开始分类施教,有意选拔奇才异志者,作为他的高足,于是门槛高筑,平庸之辈望而却步。经过严格筛选的“全真七子”终于汇聚在王重阳门下,共同弘扬全真精神,光大全真教义。他们分别是马(丹阳)、谭(长真)、刘(长生)、丘(长春)、王(玉阳)、郝(广宁)、孙(清净散人)。据王重阳弟子回忆说:有谭伯玉者,患大风病;病入膏肓,乞为弟,王重阳即以涤面余水赐之,盥毕,眉发俨然如旧,顿亲全真之道。先生训名处端,号长真子。又有登州的栖霞县丘哥者,幼亡父母,未尝读书受理,先生使掌文翰,自后日记千余言,亦善吟咏,训名处机。

王重阳被奉为全真祖师后,关于他的神奇传说,更是纷杂离奇、不胫而走。据载,大约大定八年(1168 年)三月,官府令百姓在昆仑山之岭上采石为用,不意有一巨石受触,千丈飞落,滚滚而下,众人皆悚傈不知所措,唯独王重阳不慌不忙,赶到崖下面对东方大喝一声,巨石戛然而止。众人以为奇,他却大不以为然,行同无事一样。次年四月,王重阳至登州,游蓬莱,下阁观海,忽发飓风,遮天蔽日,房倒树拔,乱石飞走。人们亲眼看见他被大风卷入海中。惊讶间,他又从水中跃出,安然无恙,唯遗失簪冠而已。还传他餐瓦吃石,成一身两头,坐于庵中。有人夸他目秀,他即示以病眸;有人赞他无漏,他竟在州衙前大小便。凡此怪异,人不可测。

那么,王重阳宣传的全真道何以能吸引如此众多的信徒呢?原来,全真道是以儒、道、释三教融为一体的“性命之道”。“全真之意,为全其本真也”,即要保全作为人们性命之根本的精、气、神而不受玷污,以全真教的李道纯的解释最为详尽,最为服人了,他说:

> 所谓全真,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气、全神,方谓之全真。才有欠缺,便不以全也,才有点污,便不以真也。全精可以保身,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安定则无欲,故全精也。全气可以养心,欲全其气,先

要心清净，清净则无念，故气全也。全神可以返虚，欲全其神，先要意诚，意诚则心身合而返虚也。是故精气神为三元药物，身心意为的三元至要。学神仙法，不必为多，但验精气神三宝丹头，三宝会于中宫，金丹成矣。

可见，“全真”追求的是无欲、无念和意诚。把全精、全气、全神，返虚成丹，长生不老作为最高境界。

王重阳初创全真道时，就强调“三教圆融”。即“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他认为道家的清净无为，释家的禅宗，儒家的真实无妄，三者都能使人精神上超凡脱俗，可殊途同归。他把儒、道、释三教之学，追根到底统一于“道德性命之学”。所以，他力主全真通融汇三教，他创立的五个教团，前面都冠以“三教”之名，凡入教者，必先读《道德经》、《清静经》、《般若心经》。王重阳所说的传道“不妄语”，即系指对儒、道、释三家经典尚未的悟通以前，就不能传授丹道秘决和修仙之法。他还特别把《般若心经》和《清静经》作为性功修炼的指南。并利用诗词的形式，表达自己“三教圆通”的主张。比如，“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异，妙玄通后更无加。”儒门释户道相同，三教从来一祖风，悟彻便令右出人，晓明应许觉塞宏”。“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不差。识心见性全真觉，知汞通铅结善芽”。

由于魏晋以来道教宣扬的肉体长生，飞升成仙之说。经不过实践的检验，唐宋之际，不少崇道成嗜的皇王贵子死于成仙之术。肉体成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大大下降。所以，王重阳的全真道极力反对传统道教的外丹烧炼和符箓驱鬼之术的，而在“钟吕内丹说”的基础上，摄取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涅磐、佛性说，使长生成仙精致化，摆脱了肉体成仙的俗套，而把精神修炼作为成仙境界。王重阳的全真道义，虽吸收了钟吕丹派的精华，但是在内丹理论方面，融摄禅宗理论，从而超出了钟吕内丹派，创立了“本来真性唤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的炼丹方法。所谓“本来真性”为金丹，即是以人体的自身为炼丹炉鼎，以体内之精、气、神为药物，通过意念的引导，使药物在人体内循环烹炼，阴阳和合，最后使精、气、神在人体丹田中凝结成金丹，即可长生不老，飞升成仙。在具体修炼方法上，坚持“修仙必先修道”，修仙即命功，修道即性功，性功是命功的前提和基本。命功的成败取决于性功，性功不成，命功万难成，即使有成，亦不免终于一毁。经此法修炼，就是先收心降念，明心见性，使心定念寂，然后静坐调息，依次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此即全真道的“先性后命”观。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王重阳所倡导的传道不别门户，遇佛言佛，遇儒言儒，遇道言道；宣扬三教一家，三教平等，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得到。自魏晋南北朝到宋元两朝，道教一直是儒、释、道三家中实力最小、人数最少的一家。根据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的统计说：北宋以后，全国的僧尼总人数一直是道士女冠人数的 10 倍左右。元代的道士势力不及佛教的十分之一。即使就是在道教鼎盛之时的唐代，全国道士女冠总人数还是不及僧尼人数的二十分之一。王重阳宣扬三教一家和三教平等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提高道教在三教中的地位和影响，以此避免儒、释二家对道教的排斥和兼并。所谓的“三教一家”，其实不过是王重阳的传教策略而已。全真道在山东地区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很注意传道策略，注意利用人们的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比如，他在山东半岛吸收的“全真七子”，多系出身豪门的庶户地主知识分子。他们成为王重阳的嫡传弟子以后，利用自己家族在地方的势力和影响，大力发展全真道团，劝民人教，如有不从者，施以强迫。据说在马钰的家乡方园几百里内，信仰全真道的教徒占当地百姓总人数的五分之四还多。除全真道以外的其他

教派在他的家乡根本不可能存在。“全真七子”以及他们的家族势力，对于弘扬全真道教义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王重阳“化行山东”，虽然仅仅3年时间，因得到“全真七子”的奔走游说，使全真道在儒家圣蔚然成风，其教徒之多，影响之大，在丹鼎派道教中，实属空前。王重阳3年传教，基本上奠定了全真派的理论基础，但他认为自己应该回到家乡，重新施教于乡里，以期在关西地区传播、扩大全真道。金大定九年(1169年)，他率领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四大弟子离开山东，西归关中。不幸地是，王重阳因年岁已高，经不得长途跋涉和风餐露宿之苦，行至开封时，染病到在一家客栈中竟不能起。次年正月初，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弥留之中的王重阳把四位高足唤到自己的病榻前，将弘扬全真道的使命交给他们，自己却带着未见“教风一家”的遗憾离开了人间，终年58岁。

道师西游仙逝，弟子们悲恸万分。大弟子马钰以其道高一筹而嗣教。遵先师之遗教，于大定十二年(1173年)偕众师弟护灵柩加回归先师故籍陕西咸阳，葬于终南山。金章宗为昭示其教之功，赐王重阳之墓庵名为灵虚观，元太宗再加封为重阳万寿宫，全真道徒称为祖庵。

“全真七子”尽孝庐墓三年后，他们为光大师门，弘扬全真精神，制定了一个宏大的传教计划：马钰留居终南山，谭处端、刘处玄东出潼关，入主河南，丘处机因“乐秦陇之风”而西入皤溪。陕、冀、鲁、豫等，都有王重阳的弟子在此修炼、传教。

马钰作为全真道第二代教主，基本上保持了王重阳的全真精神，提倡“清节苦行”，“以无为为主”，大量吸收下层民众和中小地主入教。因此，全真教在关中地区很快传播、发展起来。但是时隔不久，时局遽变，中原易主，对全真道的继续传播极为不利。金人初入中原，民心未服，江山未固，反抗之事此起彼伏，金廷防不胜防，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防止旁门左道、“异端邪说”侵扰他的江山社稷，对民间宗教活动防范甚严。金廷曾发布命令，“遣发的道士各还本乡，守土务农”，并明文禁止民间创立寺观，全真道陟然下减，留在道中的也失去了活动场所，只能在野市井中修炼，“以异迹畸形惊感世人”，别无所为。

刘处玄和丘处机掌教时，为摆脱全真道在社会上的被动地位，改变了“以无为为主”的教义，力主“无为有为相半”或“有为十之九，无为十之一”。此时的全真道为生存的需要，特别注意在社会上层中传播，使社会上层接受和承认甚至利用他们的主张。经过刘处玄和丘处机的苦心经营，全真道在社会上的地位大有提高，而且受到金政权的青睐。金大定二十七(1187年)，金世宗为求养生之术，曾软召全真道徒王处一入京晋见，讲授长生不老之术，次年再召全真道掌门人丘处机入京。金廷的一再征召，表明全真道已受到金政权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全真道士的身价、地位。大约在1219年全真道臻于极盛。这一年，尚在西域征战的蒙古大汗成叶思汗遣使征召丘处机。丘处机审机度势，以70高龄，率弟子跋涉数万里，西赴大雪山应召。劝说成吉思汗“内固精神，外修阴德”。丘处机修身之术和治国之方，使成吉思汗大为钦佩，尊其为“仙翁”。元代统一后，全真道在蒙古的政权的庇荫之下，大兴宫观，广收门徒，盛大至极。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封王重阳为“开化真群”，封王重阳的七大弟子为“七大真人”。至元三年(1310年)元武宗再加封王重阳为”辅极君”。全真道历代掌教者和著名高道，都得到元朝王室的册封或赐真人称号，其贵胜堪称道派之冠。

全真道臻于极盛之后，其修炼方法也有所改进，除继续奉行“先性后命”观外，不主张“以性兼命”的丹法。即只要坚持修炼或直接炼神还虚，就可以自然了命。全真高道李道

纯,在总结全真道义的基础上,加以概括,把"直接修性而自然了命"之法概括"夙有根器,生而知之者宜修的最上一乘顿法"。其修炼要决是:以太虚为鼎,太极为炉,清净为开基,无为为丹田,性命为汞铅,定慧为水火,窒欲惩忿火水交,性情合一为金木并,洗心涤虑为沐浴,存诚定意为固济,如此,"六根清净,方寸澄澈",便是真丹。

王重阳一生虽然只度过过58年春秋,但他提倡的"全真精神",在中国道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大放光芒,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一朵奇葩。

王重阳宣扬的"全真精神"就是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已利人"为宗旨,号召全真道徒"克已忍辱,清修自苦",保持"自放草泽,安贫守苦"的精神。全真道徒只要能做到剪除念想、不茹荤腥、清修数年、积动累行、内而修已、外而济世,必能超凡脱俗,进入仙圣之境。

全真精神还主张不要妻室,出家住观,视功名富贵为空中浮云,财产妻妾为身外之物。把人间说成是众苦难熬的火宅和无边无际的苦海,功告世人清淡人生,学道炼丹,追求仙界真乐,脱离人间苦海。

全真精神受佛教"众生皆有佛性"说的影响很大,认为"凡有七窍进,都可以成真"。据载,有一70老叟,两鬓白发,问王重阳:72岁修可行乎?"王重阳答曰:"便如百岁未得迟,只要心中换过时。"就是说,只要保持"全真精神"无论男妇老幼,都能长生成仙,达到极真。

长春真人丘处机

公元1221年。

在沙碛翻滚,黄尘如云的茫茫漠北,广袤无垠的戈壁滩上,忽深忽浅,东扭西斜的脚印在延伸……在迷茫之中,一队疲惫不堪的行人,敝衣蓝缕,步履蹒跚,在一位白发长者率领下,艰辛地前进着。从冰天雪地走向春暖花开;从高山岭走向深壑大谷;从死尸狼籍的古战场走到了精灵古怪出没的邪妖洞。只有那呼啸的阴风,可怖的嚎声,散乱的兵器。那里没有人烟,没有水草,没有牛羊。

这群奇奇怪怪、吃力地跋涉着的行人,既不是出征边寨、抗击夷人侵扰的军队,也不是万里贸易的行商,而是的启城东海,历经数十国,跋涉数万里,专程到西域雪山晋代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全弟子。那位白发长者,便是成吉思汗封为万乘国师的仙翁丘处机。

一代国师,姓丘名处机,字通密,道号长春子,山东登州栖霞人。其祖父业农,世称"善门",少而聪悟,敏而勤学,且天生神福,眉宇闲旷,举措详雅。然而真人生而有难,年少时即孤,四海乞游,无以为家。19岁出家,人昆仑山学道。时全真教主王重阳在宁海传道,漫游昆仑山,与丘处机邂后相遇,王重阳后来对弟子回忆他初见丘处时的情景时说:遇之大惊,但见此人,眉清目秀,相貌堂堂,四周常有灵气环照,粼粼有光,所谓神灵仙兆,遂收为弟 子。"训名处机,与之论道,亦颇多惊世骇俗妙语,特送《金鳞》诗一首:"细密金鳞戏碧流,能寻香饵会吞钩,被予缓缓收纶线,拽入蓬莱永自由"。以示器重。从此,丘处机拜王重阳为师,在山东半岛东西奔走,跟随师傅勤勤修业,辛辛布道,悟感颇深。

金大定九年(1139年)冬,王重阳东游中原,仙逝大梁(开封),丘处机与刘处玄、谭处端、马钰诸弟子护师灵柩归葬故里。尽孝庐墓3年后,为弘扬全真教义,诸弟子分散传教,丘处机因"乐秦陇之风",西人蟠溪(今宝鸡市虢镇),遵师遗教穴居修道6年,再迁龙门山隐居修炼7年有余。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凡13年如一日,清修苦炼,孜孜勤勉。行则一蓑一笠,居则肋未沾席,"散发披襟远市朝,持峭行不屈于俗"。如此苦修,终得"道果",在修真体上,丘处机达到了"妙合虚无,理通率奥"的博深道境仙界。同时,他以"清

修自苦,自放草泽”的“全真精神”惊世骇俗,博得赞誉,远近而闻之,无不钦佩,从学求道者不绝于途。有诗云:“休休道者方归去,赫赫王侯又到来,自愧心中无道术,空教处迹播尘埃”。丘处机因道术远播,使自己的茅草小屋门庭若市,黎民百姓、达官高人纷纷上门问道。

金宣宗贞佑二年(1224年)秋,山东宁海、登州一带的贫苦百姓,因不堪金兵我铁蹄蹂躏,愤而举兵造反,杨安儿树起反金大旗,招兵买马,老幼影从,旬日之间波及数州县,大有燎原之势。金宣宗钦令附马都尉统兵弹压,征战数月,损兵折将,死伤惨重,仍无安抚一人,义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金兵束手就擒徒唤奈何。丘处机奉命出山,招抚义军,他以教化训导为旨,不动干戈,不带兵甲,每到之处设坛论道,劝良从善,以孤身独人,传檄四乡八里,道之年至,莫不钦服,义军纷纷趋迎聆听,杨安儿亦上门询访。一经丘处机劝导,义军心服口服,为道义所驱,“皆投戈拜命,甘心降服”,二州遂安。由此,丘处机声威煊赫,名噪遐迩,宋、金、辽三方均视其有安民治国之仙术,如赖其辅弼必称霸天下,济大事,成大业。于是争相的接纳,重金高官相许者自不在话下。先是宋宁宗、金宣宗遣使携厚礼,聘请且丘处机出山辅政,共图霸业,被他婉言谢绝。他认为宋、金两朝之主,胸中无道,鲜能寡德,外无力御敌卫国,内不足安民修生,朝中上下,腐败相因,晦气弥漫,违道而行,气数将尽,无辅助之必要。他虽隐烟霞洞,时刻都在观察天下政局的变化,他将待价而沽,择主而事。

却说那戎马倥偬,撕杀征战数十年的蒙古大汗铁木真,正指挥着千军万马西征西域。一天,他无意中在一清澈见底的湖边勒马垂首,看见自己被风吹动着的一头蓬乱白发,心中一阵凄然,衰老正向他逼,他感到十分悲哀和遗憾,经自己一手创下的江山,尚未巩固,自己却垂垂老矣。从此铁木真无心战事,四处打听长生之术。在他身边有一个叫刘温的谋士原本是中原士子对中原仙道之术、养生之道很了解,不失时机地向铁木真介绍说:“中原有一高道丘处机,身藏长生之法,今已300多岁,仍耳聪目明,身体健康。”

铁木真听了刘温的介绍,喜出望外:“嘻!世上还有如此高深之道术,实乃我之大幸”,言下神色欣然。他自千军万马都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小小一个道人,何虑请不到?铁木真憧憬着即将到来的长生福音。

兴定三年(1219年),成吉思汗自西域乃蛮国遗臣刘仲禄、札八儿为宣差使,东归中原,持诏的敦请丘处机西行。刘仲禄手持谕旨,颈悬虎头金牌,上刻“如联亲行,便宜笔事”。另遣身怀绝技。武功高强的卫士20名,从中护送。他行一行怀着虔诚之心,经燕京,过中山,历真定,昼夜奔走,风餐露宿,不敢稍有懈怠。历时一年才来到丘处机的隐居处宁海东莱,传旨请教。刘仲禄向丘处机传禀成吉思汗的谕旨中说:

> 闻先生真体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究理,久栖岩谷,藏身隐形,坐致有道之士,云集仙迳,真可胜数,自干戈而后,伏知先生犹隐旧境,朕心仰怀不已,奈何山川悬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特差刘仲禄轻骑素车,谨邀先生暂屈仙步……

当然,在谕旨中,成吉思汗还称自己“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说自己征西域,灭金朝乃替天行道,“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等恭廉谦堂皇的语言,加之刘仲禄软硬兼施,给丘处机晓以利害,迫使他最终答应明年元宵节后启程前往。

公元1220年正月十八日,丘处机作完正月十五上元节的三天事,即率18高徒,从掖县出发,开始万里西行,到雪山流沙谒见明主成吉思汗。据说丘处机启程之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全真弟子和地方官吏、僧侣、道士排成长队欢送处机一行登途。忽然晴朗的天

空中,飘起朵朵白云,倏然间又变成十只白鹤,从西北方向悠悠而至,在空中鸣叫数声,然后朝东北方向飞去。第二天又有数十只白鹤鸣叫着从西南飞来,中午以后,成千上万只白鹤从四面八方朝丘处机的旧居聚集,层层叠叠的白鹤似白云朵朵,遮盖了太阳,大地一片阴凉。空中的白鹤或高高飞翔,或绕圈盘旋,只有一只老鹤飞得特别低,几乎撞着屋脊,加上声声惨叫,看上去很是伤心,很是留恋,不愿远飞他方。众人见此,咸以为奇,纷纷含泪挽留丘处机,劝其打消西行之念,丘处机只有不停地向大家拱手作揖,连声叹道:而今天下兵革大起,战云纷叠,百姓遭难,生民遭劫。吾辈当以弭兵息革,济世救民为本,岂敢苟全生命,无所作为?贫道此次西行,晋见圣武皇帝成吉思汗是为了劝说皇上息兵弭战,与民生息,“欲罢干戈致太平”。

丘处机师徒一行,在刘仲禄的精兵骁骑护卫下,从莱州起程北上,经潍阳、青州、常山至燕京,然后西出居庸关,经宣化、野狐岭、翠屏口、盖里泊,到达贝尔湖北,折而西行,经呼伦湖,翻过“松括森森,千去蔽日”的长松岭,和“车帐千百”的窝尔朵,来到金山东侧的科布多。此地“高峰如削,松柏随茂”。丘处机轻装简从,继续西行。他们越过“其山高大,深谷长坂”的阿尔泰山,在一个冰天雪地,寒气凛凛的隆冬来到准葛尔盆 地东侧的戈壁滩死域白骨甸。首先是一座奇形怪状的高山阻住了他们的去路,但见此山红、黄、蓝、白、黑五色杂呈,方圆200余里草木不生,亦无人烟,地面被层层黑石子覆盖无遗。经太阳照晒,热气滚滚,看上去如火光跳跃,黑石飞走,很是骇人。越过黑石戈壁,再往上走便是100里长的大沙漠。

走在前面的刘仲禄,勒兵住脚,下马施礼,双拳一抱,很是谦疚地回首望着已经疲备不堪的丘处机说,前面是白骨甸,这是一段最难走的路,这里滴水没有,寸草不生,广袤的沙漠无边无际,而且常有鬼魔出没其间,我们怎么办才好呢?

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丘处机慢慢问道:“白骨甸是什么地方?”

刘仲禄对曰:据传,白骨甸乃是一古战场,这里白天光照炽热,阴风习习,遍地黑色怪石夹杂着砂粒,风吹飞动,呼呼作响,似船只行走在惊涛巨浪间。更让人心悸胆寒的是,这里尸遍地,骷髅堆丘,大天白日之下亦常有鬼妖怪自我作祟捣乱。无论是白天黑夜,均无法越过这块险地。据传说,白骨甸是一块死地,无论何人一旦进人这里,就十有九死,难以生还。前不久就有一支乃蛮军队,两万人马因没人白骨甸,全军覆没,惨不忍睹。刘仲禄建议说,我们必须在夜间,温度下降,阴风稍息时走过白骨甸,而且还必须在马脸上涂上鲜血,妖怪一见的到血,就四处躲藏,无法伤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幸免一死。

丘处机听罢,神情大不以为然,他欣欣笑着说:邪精鬼怪,乃阴暗卑劣之精灵所,遇正人君子,浩然正气者,必远而疾走。古书中早有记载,难道你们不曾知晓嘛!刘仲禄愧然对曰:恕在下无知,请大师指教。丘处机若有所思,自言自语道:“自古中原为华夏文明之摇篮,边陲之民只会争战沙场,掠地屠城,亟待启蒙开化,灌输道经。”言之声音极低,一会儿他转过头对刘仲禄说:壮士勿多虑,我等出家之人扶正御邪,岂能为鬼怪之事犯愁!他选择一外凹地,设坛作道,施展法术,顷刻间,砂砾荒漠刈绿水汪汪、清馨四溢的绿洲,骷髅死尸荡然无存,借皎洁月光远远望去,前面水清草绿,平坦无垠,丘处机一地踏着挂满露珠的小草,轻松愉快地走出白骨甸,安然无恙。

出了白骨甸,无人不佩服丘处机的道法神灵,大家正欲聚食小憩,忽然南边有一道白光,似银霞从天边射出,照得大家眼花缭乱,不知东南西北。谁也说不出是什么东西,很快紧张起来。人们以为真的有哪家怪物显灵,每人心中捏一把汗,刚才的高兴劲全没

人。丘处机思索片刻，沉着地告诉大家，诸位不要惊慌，前面并没有什么鬼怪，这道白光是阴山覆盖的白雪折射而成。第二天，从打柴的樵夫口中打听到，果然前面有座阴山，常年积雪。此时丘处机心潮澎湃，诗兴大发，欣然赋诗云："高如云气白如纱，远望那知是眼花。渐见山头堆玉屑，远见日脚射银霞。"

五天以后，丘处机一行翻过5400米的阴山，经过高昌国，进入吐鲁蕃盆地。再经"冰山环之倒影水中"的天池海，眼下是一望无际的混交林。此地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环绕，六七百里，再穿过"两壁千仞辣竦立，石壁如铁"的铁门关，便是雪海茫茫，寒气逼人的雪山。经过两年多的长途跋涉，丘处机以七旬老叟，顶风寒，冒暑热，涉流沙，跋戈壁，行程万里，历尽艰险，终于踏着五尺深的积雪来到成吉思汗的行宫。

成雷思汗访道心切，早已在他的军队和固定区内明颁谕令，凡真人所到之处，必须严加保卫，派兵护送，且要速速启程，不得私令讲道，违者必重罚。丘处机一行到达邪未思干城时，成吉思汗的卫队就已恭候多时了。

公元1222年4月5日中午，劝人行善、好生恶杀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与征战一生、杀人如麻的成吉思汗，在雪山之阳的一个华丽行宫里相会了。

成吉思汗在行宫设下的大帐，以上宾之礼隆重欢迎"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跨涉于砂碛"的丘处机。成吉思汗与丘处机初次会见，鞠躬拱手，行主客之礼，非君臣之礼。

首先是成吉思汗兴致勃勃地慰劳说："宋、金征召，真人不赴，今跋涉万里来到行宫，辛苦万端，朕欣喜极矣。"

丘处机答道："山野奉诏而来，诚禹天意。"

两人寒暄之后，主客人座，转入正题。成吉思汗急切、虔诚而直截了当地问："真人远道而来，有什么长生不老的药给朕。"

丘处机谦然道："山野有延生保命之道，无长生不老之药。"

翌日，成吉思汗特在行宫中设下酒宴，率文武众臣为丘处机洗尘。酒过三巡，成吉思汗站起身来，举起酒怀，走到丘处机面前大声道："今日得以与真人相遇，实乃朕之大幸，奉敬真人水酒一怀，请万勿推辞。"丘处机对答道："皇上奉天承命，视民如赤子，贫道早有拜谒之心矣。"

于是宴席上一片欢腾，群臣大悦，举怀共饮，高呼皇上万岁，真人神明。

是夜，成吉思汗源近臣两名，带旨赴丘机处询问，是否每天都与皇上同吃住。丘处机说："我辈乃修道之人，最喜欢清静。"皇上得知后，再传圣旨，诏曰："真人喜欢清静，无论如何都不得打扰，更不能惊动他，违者杀勿赦。"并明令，对丘处机"机翁"相称。

元太祖十七年(1222年)10月26日，成吉思汗在雪山南麓一个风景优雅、恬淡清静的帷账之内，设下道坛，燃起松明火把，屏退左右侍女。帐内是烛光辉煌，无一动静，成吉思汗第一次问道于丘处机，乞讨"长生不老之药"。

丘处机对曰：万物起源于"道"，"道"是生天育地，宇宙之内日月星辰，鬼神人的堵阳"道"的派生物。根本不存在"肉体长生"飞升成仙。所谓"长生不老之药"纯系子虚。然而，如能从世俗中解脱出来，彻底去掉声、色、味、情等杂念，以清静为娱，以恬淡为美，勤于修道，行善施德，自可保健防病，延年益寿。

成吉思汗问及长生久视之道，丘处机以八字相告，即"去奢屏欲，固精守神"。

丘处机说：欲求长生，延年益寿的关键是戒绝色情。因为男阳属火，女阴属水，阴能克阳，水能克火。贪色纵欲，追欢逐乐必是耗精损神，以致阴盛阳衰，沉沦死鬼。所以，出家修道之人，以清静为要，凡迷惑人心、不健康的音乐不听，美容女色不能看，珍馐美味不能尝。如是即可延年益寿。一般之人修行之道如此，皇上是上天派来骄子，天上是有星宿

的。上天治天下一言不发，借皇上之身行事，借皇上之口言事。然而，上至帝王，下及百姓，虽有的尊卑贵贱不同，但生命是同样可贵，皇下如要长生，也应和百姓一样，不要贪声好色。一般百姓娶一个妻子，尚且有损身体，何况天子三宫六院，嫔妃成群。所以皇上应珍惜每个一个夜晚和每一次活动。皇上如能一月静寝，不行房事，必觉精神清爽，筋骨强健。古人有言："服药千朝，不如独卧一宿"。成吉思汗闻之折服不已，欣然从之。

成吉思汗问及的治国之术，丘处机以"外修阴德"告之，即敬天爱民，恤众保民，禁掳止杀。劝成吉思汗停止杀戳，与民生息，建议大汗差遣精明能干的官员，到中原地区恢复生产，治愈战争创伤。从而占领兴王这地，创建霸业。

成吉思汗恭敬、严肃的听完丘处机传授的"修身之术，治国之方"后，十分高兴。这个要征服世界的一代天骄，居然地一道士面前，表现出温顺谦让的神情，可见其道术威力之大。不仅如此，成吉思汗还决心服从仙命，勤恳修道，保境安民，期盼飞升成仙。即命耶律阿要海把丘处机所传之道，以蒙文详细记载，编为《玄风庆会录》，严令"勿泄于外"。

1223年春，丘处机第三次步进成吉思汗帐内，请求东归中原。成吉思汗挽留再三，不得已，才命了阿里鲜为宣差使，派甲士千人护送神仙东归。丘处机因归心似箭，思归心切，忧郁成疾，不吃不喝，面容憔悴。弟子们束手无策，不知好何是好。只有尹志平里清楚，他对诸位师兄们说："抓紧赶路，待到汉地，尊师之病不治而愈矣。大家齐心协力，马不停蹄，护卫师傅东归，当他们到达汉地第一站云中府。丘处机的病果然痊愈，饮食正常，精神振奋，只用4个月时间，就回到久别的内地中原，第二年春，应邀主持燕京天长观(今白云观)。

丘处机回燕京以后，成吉思汗有旨西来："尽免全真教徒赋役"；"丘神仙至汉地，凡朕所有城池，其所欲居者居之。"并赐给虎符、玺书，命他掌管天下道教。从此。全真教与蒙古贵族吉结下了不解之缘。丘片机及其全真教在蒙古政权保护下，广收门徒，开坛说戒，建立教会。京中官绅名儒的争相接纳。全真教冠盖各道之首：教门四辟，道侣云集，臻于极盛。如时人所言："国朝隆兴，长春真人起应召之后，玄风大振，化洽诸方，学徒所在，随立宫观，往古今来，未有如此之盛也。"

公元1225年7月的，80岁仙翁丘处机，带着万乘国师的殊荣，安祥的离开人间。

玄教宗师张留孙

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自京师而南走来一队送殡的队伍，幡旗招展，号角齐鸣，数百人身着素服，执绋而行。自京师至江南，行程数千里，所过郡县，文武百官迎送致奠，恭顺虔诚；平民百姓，不约而集，争相一睹此盛景况。这个殁世之人并非什么王公将相，乃是侍阙黄冠、玄教大宗师，人称"神仙宰相"的张留孙。

张留孙(1248——1321年)，字师汉，是信州贵溪(今属江西)人。他幼年从其伯父张闻诗学道于龙虎山上清宫，后来以其所学游历于江淮，遇到一道人，称其日后当作神仙宰相，劝其精勤于道。此后留孙又师事于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道学大进。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召天师张宗演赴阙入觐，张留孙随行。元世祖与语，对答称旨，深合上意，遂留侍阙下，从此便开始了他一生中飞黄腾达的时期。

张留孙入侍不久，世宗亲祠幄殿，太子侍奉于侧。忽然，狂风大作，暴雨骤至，众人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时留孙侍于殿下，见此情景，遂祈寿求福，风雨乃止，世祖甚喜，众皆称服。后来，世祖又幸日月山，随行的昭睿顺圣皇后得疾甚危，急召留孙请祷，既而，若有神

人的献梦于后，皇后遂愈。于是，上大喜，命为天师，留孙固辞不敢当，乃号之“上卿”，铸宝剑，镂其文曰：“上元赐张上卿”，敕两都各建的崇真宫（后改称崇真万寿宫），令留孙居之掌祠事，并赐由良田、栗园若干顷，高弟门人皆给馆传车马。至元十五年（1278 年）加授“玄教宗师、道教都提点”，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士，佩银印。其后，隆遇有加，比于近臣，或奉命祀名大山川，或奉旨访求隐逸，又相继受命为武宗、仁宗取名，更在至元 28 年（1291 年），以卜筮解除了世祖任用完泽为相的疑虑，参与朝政机要，足见世祖对其宠遇之隆厚，信任之非常。

张留孙侍帝阙 40 余年，历侍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等朝，恩宠日盛，信任不衰，“朝廷有大谋议，必见谘问”。由于政治上处遇日隆，历代皇帝给他的头衔与权力也逐渐加码：成宗大德年间，授“玄孝大宗师同知集贤院教士”，追封其三代魏国公；大德 10 年，加“特授上请”；武宗继位升“大真人集贤院大学士”；即仁宗继位，谕近臣曰：“累朝旧德仅于彰上卿尔”随加封其为“开府夷同三思、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并刻玉印赐之。至此，其头衔之崇高，地位之显赫，虽历代天师亦无以过之，至于其他道派首领就更难忘于其项背了。延佑四年（1317 年），张留孙 70 寿辰之时，仁宗为他大举庆祝，“赐宴崇真宫，内外有司各以其职共聚，宰相百官咸于焉。”并命画工画其像，坐赞文，以镇崇真宫，至至元年（1321 年），张留孙逝世，初立之英宗皇帝降旨厚葬之，并以其遗愿，归葬故里。“自京师至其乡，水路数千里，所过郡县迎送致奠，不约而集；比葬，四方吊问之使交织。自王公以下，治丧治客，未有若此盛者。”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 年），追赠其为“道祖神应真君”。

入京朝觐直至逝世，40 余年间，张留孙历事五帝，朝夕从驾，所受之隆遇、恩宠无以复加，显耀至极。纵观道教史上诸多祖师、名道，皆无可与之比拟。这一方面反映了元代道教的鼎盛，以至统治者也需借助其力量，笼络人心，加强统治。在元代道教兴盛，教派分化繁衍过程中，特别张留孙利用元室宠信而建立的龙虎宗支派——玄教，异军突起，规模庞大，大大加强了龙虎宗的力量，从而促成了龙虎宗主领江南三山符箓，三派膈流为正一道，奠定了元代正一、全真两派南北对峙的格局。

早在张留孙入侍朝阙、任江淮荆襄道教都提点时，他就陆续从龙虎山征调道士到两京崇真宫，或委任以京师道职，或派至江南各地掌教务，这批出身龙虎宗、先后聚集到张留孙周围、成为其弟子的人很多，其中堪称高徒者 75 人，他们作为骨干担负着京师及江南广大地区各级道教组织的宫观的领导职，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庞大的道教别派。

张留孙所建立的玄教，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相当完备严密的组织领导体系。其最高首领是玄教大宗，居大都崇真万寿宫，负全面统领玄教之责，其副手为玄教嗣师，辅助大宗师掌教。大都崇真万寿宫设提点一职，协助大宗师处理日常事务。在大宗师之下，设江淮荆襄都提点一职，作大宗师指挥各路道教的直接助手。以上是玄教的最高领导机构，但担任上述职务的人不多，仅有吴全节、夏文泳笑五、六人而已。在玄教大宗师之下设立的各级地方组织，系根据元代的行政区划而地设置的。在行省一级设都提点，以管理该省的道教事务；行省之下的路设道录、道制；路之下的州设道正；最基层是宫观，设主持、提举。除两都崇真万寿宫而外，张留孙的许多弟子管理各地宫观，这些宫观遍布今苏、浙、湘、粤、赣等地区。由此可见，当时玄教势力强大。而玄教所散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这与元世祖开始封张留孙掌江淮荆襄道教的初衷是有出笔记的。这种玄教大宗师坐镇北方两都崇真万寿宫，而教事主要活动于南方的状况，一方面是由于江南特别

是苏赣等省，是符箓三宗老根据地，在那里它们有深厚的基础和广泛的影响，作为龙虎宗支派的玄教在那里生根、繁衍的土壤；另一方面，由于全真道在北方的兴盛、发展，使得玄教在北方无法染指，因而很少有教事活动，于是就形成了有元一代，正一（玄教为一支）、全真南北分治的局面。

张留孙所建立的玄教，散布地区既广，兴盛时间也较长，有元一代皆呈上升趋势，自第一任掌教张留孙起，直至元亡，五移师位。张留孙掌教44年，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逝世，弟子吴全节嗣教。全节掌教25年，于至正六年（1346年）传教于夏文泳。文泳掌教4年，于至正九年（1348）去世，传位于张德隆。德隆掌教5年，传教于第五任大宗师于有兴，于有兴掌教直至元亡。继元之后的明王朝，对道教也相当尊崇敬奉，但只崇奉应其承受命而得天下的正一道，只承认天师后嗣，而对其他道派多有抑制，也不再承认玄教大宗师，因而，张留孙所创之玄教迅速解体。

玄教大宗理由在其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制度：其一，除第一任掌教大宗师终身留孙为元室直接任命外，其后继任的大宗师，皆由前任荐举，再由皇帝降"玺书"加以任命。其二，历代大宗师继任，都须以张留孙遗留的大宗师玉印和宝剑相承传，作为凭信。大宗师印原为仁宗所赐，宝剑则是世祖所赐。历代大宗师既然由皇帝任命，手中持有象征教权的玉印和宝剑又为皇帝所赐表明他们的权力直接来自皇帝，而不是正一天师，所以，玄教虽为龙虎宗支派，但对龙虎宗天师有很大的独立性，事实上，玄教只听命于大都崇真万寿宫，而不是龙虎山上的天师府。只因为皆出身龙虎宗，众多玄教统领来自龙虎山，历代天师又受命管理江南道教，因而，某些外部事务必须商请于天师，玄教与龙虎宗的联系仅此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玄教首领地位显赫非常，玄教之卓立于元代，并非以其道教理论见称，而是以它政治上的尊宠显贵，思想上的儒化而闻名于世，所以元代以后，教派解体，从此便销声匿迹。

尽管如此，玄教在道教发展史上仍有着相当的地位和作用。玄教的产生时代，正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其间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尊奉，儒释道三家融合相长，从而促进了道教的更新变革，主要表现在教理日趋完备，教派繁衍，各教派之间离分融合，异常活跃，而张留孙所创立的玄教正是在这种适时的气候下，因时而起，声势浩大。玄教组织的发展，大大增强了龙虎的力量，为正一道的形成、江南各派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玄教大宗师长期居于大都崇真万寿宫，有如江南道教首领——因代天师在京的常驻代表。因为，因代天师虽受命统领江南道教，但天师除被召入觐外，常年的居于龙虎山，所以，江南道派的不少事务，往往是由玄教大宗师出面解决。玄教大宗师入侍朝阙，朝夕从驾，对于沟通元室与江南道教的关系，沟通各道派的关系，加强江南各派的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张留孙师徒，还利用元室的尊宠，维护道统，弘扬道教，促进道教在儒释的夹缝中生存、发展。

至元十八年（1281年），由于奸相桑哥怂恿挑拨，佛道二氏争头激烈，当论及《化胡经》真伪时，有人上奏世祖："《道藏》经多淆杂，宜焚去不录。"上允其奏。张留孙闻讯大惊，速请在太子裕宗进谏，称：黄老之言，治国有不要可废者。上始悔悟，集群臣论定所当存者，天下复崇其教。值此道教经典即将被焚的紧要关头，张留孙筹谋疏通，才使道经大部幸免于难，从而使得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遗产得以保存。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张留孙以集贤、地翰林、国史三院同一官署，多有不便，奏请分而为二，世祖允奏，遂分时置两院，由集贤院专管儒、道，这对于道教发展无疑是有利的。因此说，玄教虽然解体，但其历史功绩

不可磨灭。通过张留孙及其后继大宗师的不懈努力,促进了有元一代道教的繁荣兴盛。

玄教嗣师吴全节

吴全节(1269——1346年),字成季,号闲闲,饶州安仁(今江西余江人)。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继玄教第二代大宗师,按掌玄教,深得元室庞信,封爵赐印,参与政要,尊荣至极,名重一时。

吴全节13岁即学道于龙虎山,空山先生雷思齐深谙《易》、《老》,全节往师之。其后达观堂李尊师延请雷思齐至山,全节与多人同受其业。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玄教大宗师、大都崇真万寿宫主持张留孙征离龙虎山道士,全节随征入京,师事留孙,助其掌祠事。至元十三十一年(1294年),成宗召见,深契之,赐古雕的玉蟠螭环,敕每岁侍从行幸,并依制供给所司庐帐、车马、衣食等。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授"冲素玄道德法师、大都崇真万寿宫提点"。大德十一年(1308年),授"玄教嗣师",赐银印,视二品。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赐七宝金冠,织金文之服,追赠其祖为昭文馆大学士,其父为饶国公的,其母饶国太夫人,并名其所居之乡曰"荣禄",里曰"具庆"。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继其师掌玄教,授"特进上卿玄大宗师、崇文纺弦道玄德真人、总摄江淮荆囊等处道教、知集贤院教事",赐玉印一,银印二。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欲告老还乡,请以弟子夏文泳嗣教,文宗不允,执意挽留。惠宗(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寿终正寝,享年78岁。

吴全节入侍帝阙60年,尊宠显贵无以复加。全节累受命祠名山河渎,实际上了也为皇帝作"调查"工作。一次祠岳归来,成宗问曰:"卿所过郡县,有善治民者乎?"对曰:"臣过洛阳,太守卢贽平易无为,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忆其人",即日拜卢贽为集贤院学士。因此观之,成宗对全节的信任可见一斑。

吴全节雅好结交士大夫,无所不倾其交,长者尤见亲而敬。而且,对其中贤德之士,全节无不以其得近天子之便,举荐说项。仁宗的继位之初,有人危言攻击翰林学士阎复,事情危急,命运叵测。全节为力为言于上,仁宗意解,敕阎复告老还乡,不治其罪。朝野上下,无不颂仁宗爱护贤者,不以小眚掩大德,其实全赖全节之力。至顺二年(1331年),全节又进地了陆九渊语录于朝,陆氏心学始为元室所重,昌行于世。因此,全节为人颇以侠义著称,《元史·释老志》称他人"推毂善类,唯恐不尽其力,至于振穷周急,又未尝以恩怨异其心,当时以为颇有侠气云。"

不仅如此,吴全节对其他教派也一并扶植,举贤荐能,不以门户之见而相排斥。泰定元年(1324年),全真道掌教缺人,全节荐汴梁朝元宫道士孙殿道主之,上用其荐。世人皆称其贤德。

全节既为道士,又好儒学,"博览群书,遍察文艺",能文能武,且有诗集传世(现已佚),与当时文人儒士相唱和。遗憾的是,吴全节虽累受封赐,尊荣至极,且颇有文才,但他在道教理论上无甚建树,因而,与其师张留孙一样,虽能教于一时,但不能遗传百世。至和6年(1346年),吴全节逝世,其徒夏文泳嗣教。

"忠孝神仙"刘玉

刘玉(1257——1308年),字颐真,号玉真子。其先鄱阳石门人,后迁南康建昌。早岁熟读经书习诵程朱。弱冠,父母继亡,居丧尽礼。家贫,力耕而食。视尘世不足为,志于神仙之学,隐居南昌西山。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忽有真人来降,告之真君许逊将有至道降授。许本为东晋道士,传说他曾游历江湖,遇上圣传《太上灵宝净明法》,曾以其道法为民除害,恩泽

一方。后来在其修道之南昌拔宅飞升，北宋时封其为“神功妙济真君”，因而后世皆称之为许真君，在道教中地位仅次于天师张道陵。许逊飞升之时曾谶记后120年，王陵之内将出弟子为800人为师，至此而应是刘玉。所以真君来降临西山刘宅，告曰：“吾昔修真之，曾遇太上，授吾其道，传以《太上灵净宝明法》，吾今日授于你，汝当不昧心君，不戕性命，忠孝存心，方便济物。”言罢而去。刘玉得此宝经，勤谨修持，开净明忠孝之道，以许逊为第一代祖师，刘玉自称第二代祖师。

其实，刘玉托神降经，乃道士玩弄的传统把戏，其目的是借神灵之佑，以其失儒学改造成道教之实。

晚唐以来，一度沉寂的儒学，在佛道二教的推动下开始振兴。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融摄佛老之学形成的新儒学，更能适合统治者巩固封建秩序的需要，因而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崇奉，以至儒学重振，迫使佛道二教向它靠拢，以求自保。宋元时期诸道派，皆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融会儒家的倾向。刘玉首创净明道，实为承袭前代儒道融合之成果，在理学思辨的指导下，改造道教的结果，堪称为儒道融合的典型。这种融合已远远超出过去那种简单模仿、抄袭或吸取个别思想的水平，而是以自己为主，采摭消化新儒学，从而组建全新的教义。

刘玉自称其教为“净明忠孝道”，盖其说以本心净明为要，而制行必以忠孝为贵。何谓“净明”，刘玉曰：“净明者，无形大道，先天之宗本也。清则净，虚而明，无上清虚之境，谓之净明。”刘玉取佛教常言心性本净本明之义，认为人心本来净明，但为后天物欲所染不净不明。刘玉说：“人之一性本自光明，上与天通，但苦多生来渐染熏习，纵忿瓷恣欲，曲昧道理，便不得为人之道。”既然如此，那么如何才能返朴归，行净明之道呢？刘玉说：“何为净？不染物；何谓明？不触物。不染不触，忠孝自得。”所谓不染不触，即要人心不为物欲所动，惩忿窒欲。这就是刘玉所说的“正心诚意”。但是，要使净明道的教义符合封建伦理规范，仅仅清心寡俗、正心诚意是不够的，因而刘玉提出，净明只在正心诚意、而忠教则是扶植纲常，把忠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真君许逊所示的“垂世八宝”：忠、孝、廉、谨、宽、裕、容、忍被视为净明道的宗教伦理信条，尤以忠孝为首，称之为“大道之本”。而且，忠孝还是人性中所本具的，“谓“忠孝者，臣子之良知良能，从具此天理，非分之事也。”对于其教徒和信教群众，刘玉提倡以孝悌为先，谓之的做人之本。他说：“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人道为之成。……若不能以孝道自牧者，就要取消他的做人资格了，甚至连天灾人祸也归咎于世人不行忠教所致，“其世间不忠不孝怨怒诸气上至天中黄八极，其气返为水旱疾疫之灾。”又曰：“子不见民之不忠，天生聚敛之臣，子之不孝，妇生败宗之孙；兵戈旱蝗，非国之罪也，君不忠不孝于上，臣民不忠不孝于下，气感而生。”显然，刘玉在这里竭力宣扬净明忠孝，无非是附会儒学的忠孝仁义思想，其目的是要把人的心念和行为拉入到封建伦理纲常中去，做封建统治者的忠臣、孝子、良民，一方面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另一方面也是道教自存之策。

净明道在力倡“忠孝”的同时，特别强调要落到实处，履行实践。刘玉说：“世儒习闻此语烂熟了，多是忽略过去，此间却务真践实。”并制有“履践三十字”曰：“惩忿窒欲，明理不昧心天，纤毫失度，即召黑暗之愆，霎顷邪言，必犯禁空之丑。”如此强调忠孝实践，维护封建纲常，实为以往任何道派所不及，自然也得到了当时不少官宦儒士的敬重。

明净道以净明忠孝为立教之本，因此宣扬修仙得道也只在净明忠孝，声称“净明之妙，不外人心中孝，出忠入孝，即是修身之经，存诚居敬，乃入道之门。”并说：“倬倬孝悌，跽主不亏，虽无大药，亦可以悟法，名列巍巍。”

就是说，只要忠孝诚敬，即使不得丹药也可以名列上仙。因此，净明道以净明忠孝的履践为上乘内丹之道，而鄙视一般内丹修炼精气之说，至于道家传统服食、金丹之术，更为净明道所不齿。和儒家思想一致，净明道也重人道，声称“欲修仙道，先修人道”，反对佛道出家离俗。刘玉认为这样做是刻意求道，乃心地不明之过，也就是动机不纯。去俗是自求烦恼，自危其身；不治身，不事亲，连起码的“忠孝”人伦都不懂，怎能飞升成仙？因此，刘玉说：“要不在参禅问道，入山修炼，贵在乎忠孝立本，方寸净明。”“忠孝为本，立本可成仙，则天下仙举可数矣，未有不忠不孝地奉宸极也。”所以入净明道者，或宦或游，听其自便，衣食住行，与世人无二致，得其道者，不在是否出家绝俗，殊形异服，关键在于方寸净明，祖师刘玉遇真君许逊之时，也是在俗之身。

刘玉融摄儒释创净明道派之时，正是中国社会儒、释、道三家经过长期斗争，走向大融合时期，三教同源之说兴盛，因此，刘玉也顺应这种三教合流的思潮，高唱三教归一。刘玉把三教同源于一致点归结于本派所倡的净明之心，并附会说：“何谓一？太上之净明，夫子之忠恕，瞿昙之大乘，同此一也。”他论三教应并立相辅，济世度人，缺一不可。针对当时理学兴盛，不可一世，理学家对释道二教多有攻讦，他辩解说：“但二氏之教若过盛，则于纲常教未免有所伤。……又二氏真人真僧，皆是人欲净尽，纯然天性，奈何如此者少，末流之弊每多，真儒于是乎出，以实理正学而振伤之。”既维护仙佛权威，让人未庸轻议，又神化攻讦释老的理学家，公开称赞周、程、陈、张，称他们为天人，让道教徒效仿他们，吹捧朱熹“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来，扶儒教一遍”，竭力调和释老与儒学的关系。

净明道如此和会儒学，盛倡同源，反映了当时儒学的强盛，以至对道教的挟迫。另一方面，对道教自身来说，也是为对付儒家攻讦的自存之策。刘玉自己也不加掩饰地说：“今净明大教之兴……每用儒家文字开化，何耶？此是教法变通处。”对儒学的过份藤援攀附，不能久持。1308年刘玉逝世，其后的几代净明大师，学渊道显，广交士大夫，名重一时，净明道因此得以盛行于世，但终为昙花一现，明代之后净明道即衰微，不复以教派存在。

金丹术士陈致虚

陈致虚（1290—？），号上阳子，生平经历不详。据载他曾“遍游夜郎、邛水、沅芷、辰阳、荆南、二鄂、长沙、庐阜、江之东西，凡授百余人。”可知他主要活动于江南地区，道徒众。陈致虚师承丹道南北二宗，初为马钰（全真北宗）的五传弟子，后来又师呈事南宗赵友钦，因此，他的丹道与南宗关系也很密切。他一生著述很多，曾注释《参同契》和《悟真编》，并著有内丹名著《金丹大要》，为元代著名的内丹理论家。

陈致虚的道教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讲丹道炼养，二是盛倡三教合一。其丹道理论无非是讲修性修命，更的则是对以往丹道理论作注，因而无甚新意。其倡三教合一，则是在融会前人的基础上，以其多丹之道合一三教。

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自东汉以降，存在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家学说相互吸引，融会相长，特别是晚唐以后，三教融合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趋势。但是，在这种“三足”之中，道教自始至终都是较弱的一支，虽然历代不少皇帝崇尚黄老，众多道士显贵非常，但无论从思想理论上，还是从组织规模上，道教都不及儒释。道教理论比之正统的儒家学说相形见绌，与佛精致的宗教哲学相比，更难忘其项背，因此的，早在魏晋时，道教就开始不断融摄儒佛。到了宋元时期，儒学复兴，在融会佛老基础上形成的新儒学，倍受统治教员的推崇，迫使佛道二氏向其靠拢；而

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的尊宠，加上在多次佛道论争中道教屡惨败，更加动摇了道教的地位，道教在儒释二氏的夹缝中生息艰难。当时，虽然三派皆倡三教同源一致，而道教主张最力，喊声最高，但是，在三教合一的基础问题上，道教中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认为三教圣人救世之心一，有的强调三教旨归同源一致，而陈致虚则认三教合于一"道"。

陈致虚在其《金丹大要》首卷中，便十分明了地说：三教一家，实无二道。其分彼我者，乃是一个盲人，鞭骑瞎马，而与人较胜负，岂不为明眼的所败?"他认为三教本来同根同本，强分三教，便是盲人瞎马而与人较胜负，实在可笑。既然三教同源，那么，关于三教合一的基础是什么？陈致虚则认为：三教合一于老子之道，他说："此道以老子为法，天为清，地以宁，三光以明，万物以荣，圣人的仙佛以修以成。噫，道果何物而若是的其大也，孔子而佛皆明此道，非别有不道也，后来乃分三教。"而三教各以其学传世，忘其本源，以致多生弊端，"儒者不明曾子子思之相授何事，却猜之为日用当行；释者不能明心见性，只得念诵顽坐；道则不究金丹窍妙，以为焚修法术，皆非道也。"究其缘由，"盖未有所授受耳"。若考究道的根本，则道即是气，"道也果何谓也，一言以定之，曰气也，故郑真人曰：道乃气之用。当的知其体道者，是气也。"不仅如此，"道之为物，通气而生气，复资气而育天地。万物未有非生气而自生者。"对于道之根本的"气"，陈致虚进一步解释说："然吾所谓气，却非天呼吸口鼻往来。要知是气之名，须究外内二道。气之在外者曰黑铅，即金丹之道也，释云佛法，儒谓仁义，道曰金丹三教大圣必用是气，而后方能成佛作仙，即是此道，非别有一路耶。气之在内者曰黑汞，即修定之道也。"既然道即是气，而且又生气资气以养育天地，是万物循环往复、生生不已的本源，所以说道是三教的根本。三教的既然同本共根，那么也就可以合而为一，三家所谓的佛法、仁义、金丹，只是同源异流，归旨一致。

陈致虚承继钟吕内丹学说，信奉金丹道，但为了申明道统源流，他宣称："老子之道即金丹大道也。"认为由东华帝君得诸老子而历代传授以至于陈致虚的"道"，就是金丹之道，金丹之道统括儒者纲常之教，释氏定慧之学，是三教的根本。他说："夫金丹之道，先明三纲五常，次则因定生慧。纲常既明，则道自纲常出，非出纲常之外而别求道也，是谓有为，故云'和其光，同其坐'也。乃至定慧圆明，是谓无为，故云'知其雄，守其雌'也。道至无为，则神仙之事备矣。"在这里，陈致虚融会儒释之意昭然。道徒修炼金丹之道，首先要合乎三纲五常，与世俗无忤，甚至神化三纲五常为"万古不易"之大道，宣称只要行合纲常，就获得了证道登仙的资格，这就给为封建朝廷效命尽忠的官僚们以升仙的优待，自然也就博得了儒士们的赏识；其次则要象佛教那样定慧圆明，清虚无为，超凡脱俗。陈致虚认为，只要做到这些，就可位登仙品。由此观之，成仙证道并非难事，修持者只要做到外以儒学纲常制约其行，内以佛学收拾心性即可，而且人人皆可成仙。陈致虚就曾经宣称：金丹之道"至简至易，一得永得，得其口决，虽至愚小人，直跻圣位。"这里显然就是模仿佛教"众生皆有佛性"之说，把成仙证道的空头支票慷慨地发放给一切人，同时，也是在元代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汉族地主参政意识的体现。

在元代全真道兴盛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即南北二宗的合并，而陈致虚就是其合并的有力推动者。全真道始创于北方，开始并无南宗北宗之分，所谓全真，反映的是就是王吉和他的七大弟子宣称钟吕得内丹之传而创立于北方的道派。在王吉创立全真之时，由于中国正处于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南宋统治的江南地区，也出现了一个与全真道相类似的道派，这一派也不讲符箓、外丹的，专讲内丹修炼，宣称祖师也为钟离权的

吕洞宾。据说钟吕丹道与北宗张伯端，张传石泰，石传薛道光，薛传陈楠，陈传白玉蟾，此五人被称为南五祖，其道派被称为南宗。入元以后，南北统一，隔绝百余年之久的南北文化开始交流融合，原来地处南北的两派道徒，相互交往传道，结果发现，二宗实同出一源，于是逐渐产生了统一合并的要求，特别是南宗，教团不大，力量较弱，未受元室重视，看到北宗道显势众，繁衍兴盛，对合并二宗更为积极，至元代中后期，南北二宗相互授意，教理融会相长，合并的条件完全成熟。陈致虚正好兼承南北二宗，因而得以融合二宗，成为其合二为一的推动者。陈致虚认为，老子之道即金丹之道，金丹之道既然同出于老子，又何分南北？因而对合并二宗尤为努力。在他的推动下，大约在元顺帝时，南北二宗正式合并。为了把原来的两家合为一家，就需将过去各自传授的系统和所尊奉的祖师加以调整，以求一致认可。经过协商，结果把过去北宗所尊奉的五祖——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吉作为共同的五祖，其下各设七真：北宗七真即王吉的七大弟子，南宗则把过去的南五祖降格，加上刘永年、彭耜，合称南七真。南北二宗合并以后，全真道的力量大为增加，遍传南北，盛大至极，其势力足与当时一统江南三山符箓的正一道相抗衡。所以说，全真道的兴盛发展，陈氏之功不可没。

正一嗣教大真张宇初

张宇初(1359——1410年)，字子睿，江西贵溪人，张陵第四十三世孙。明洪武十年(1377年)，继其父为第四十三代天师。洪武十三年(1380年)，授正一嗣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从此，便得近天子，位登教主，常奉诏祈祷打，陪祀访逸，东奔西走，显耀非常。洪武十六年，奉敕建玉吉大斋于南京紫金山地，十八年奉诏祈雨神乐宫，二十三年奉命重建龙虎大上清宫。永乐元年(1403年)，命陪祀天年；四年，奉敕编修道教书，明《正统道藏》就是在此基础上编辑刊行的。永乐六年，奉诏建荐杨玉吉大斋于朝天宫，次年，又受命传延禧法吉。此后，多次奉诏亲往武当山，寻访仙人张三丰，皆不得见。永乐八年(1410年)卒，享年51岁。

张宇初本为一符箓派道士，但他曾师事全真内丹之传的刘渊然，因而在他的道教理论中吸收了诸多全真派的思想。张宇初后来与刘渊然不协，相互攻讦诋詈，其人品颇不足称道。但他博学能文，才华出众，为张陵后嗣中较有学识的一位。其生平著述很多，流传于世的有诗文集《岘泉集》，以及《度人经通义》、《龙虎山志》等，其中最有影响者，当首推其以道教教主身份撰写的《道门十规》。《道门十规》是应明王朝清整首道教的需要、针对道教弊端而撰写的，是张宇初道教思想的集中体现。

继元而兴的明王朝，以光复汉唐宋汉族政自任，因而，在一个定程度上也继承了唐宋的思想文化传统。对于传统的道教，虽未象唐宋王朝那样演出借其外衣神化皇室的闹剧，甚至还施行过一系列的检约措施，但从其维护封建纲常的需要及鬼神崇拜的信仰出发，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唐崇道之制，特别是对嗣汉天师着意扶植利用。早在朱元璋为吴王时，张宇初之父、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即遗使上谒，和朱氏拉上关系，此后又多次入觐。朱元璋称帝以后，为了表示和元制不同，有意扶持嗣汉的正一天师，而抑制其他道派。洪武元年，张正常入朝礼贺，革其天师之号，改授正一嗣教大真人，赐银印，视二品，把天师的官禄定以为制。后来又加授掌天下道教事，历代世袭，以树立起正统道教的地位，更好地约束天下道教。正因为如此，天师道的地位大大提高，较之宋元时期呈“中兴”之势。但是，伴随着天师道的贵盛，其腐化亦愈甚。张宇初之时即显腐化之端倪，他自己在“建文

时坐不法夺印诰，成祖继位复之”。至于同时的其他道派，科律废驰，组织涣散，有德之士，多隐逸山野，清静自守；名利之徒，多贪赃枉法，逢迎媚上在，因而道风大坏。这种善状况与明王朝检约道教、利用宗教手段巩固封建统治的初衷大相径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道教教主的张宇初，秉承皇帝旨意，于永乐初作《道门十规》，以训诫道徒的口气，列述道教源流、道门经箓、坐圜守静、斋法笔持、道法传绪、住持领袖、云水参访、立观度人、金谷钱粮、宫观修葺十条，涉及教义、教规等各方面重要问题，颇有清整道教、清除积弊的气势，以竟其“辅国济民”之大业。

在《道门十规》中，张宇初竭力推行全真教风于诸道派之意灼然可见。张宇初精心构思，为修道之士成仙证道设计了一条坦途：“其初道者，须先择明师参礼，开发性地，恪守初真十戒，白祖师（白玉蟾）、冯尊师（全真道士）堂规等文，均收习身心，操持节操，”“凡行持之士，必有戒行为先”。规诫修持道法者必须先离情舍爱，远离世俗，“选择山水明秀、形全气固之地，创立庵舍，把茅盖头，聊蔽风雨，懈餐露宿，水迹云踪，……草衣木食，箪食瓢饮，乞食化衣，真功苦行，槁木死灰，乃磨励岙以为份内之事”，提倡云游四海，参访明师，本为全真道士们所践行，而张宇初力图把全真派这种刻苦俭朴之风推广于道教各派，为前所未有，这对于清整教团积弊着有一定积极意义。

不仅如此，在《道门十规》中，张宇初还对教规的具体细节作了界定，规诫宫观住持须由公议推举年耆德高、刚正方直之士担任。住持要勤俭勤勉，以精严戒行规矩为蓄众之要，不得交结权贵、干预公事、私蓄俗眷、对不遵守清规戒律的轻薄之流要依律遣断，严加惩处。针对教团的贪赃蓄私，挥霍无度，《道门十规》规定，宫观金谷田粮须“公同出纳，明白登载”，不得出卖常住的土地，各蓄私财。“如钱粮所不敷，功资于经?，或籍以题注”，但不得借募化之名结交权贵商贾，强人所为。这个清规，大多为全真派所创。

有明一代，天师虽呈“中兴”之态，但是就整个道教而言，已经日趋衰微，再加上理学的兴盛对道教的挟迫，唐宋以来儒、释、道三家鼎立、分庭抗礼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对此，作为道教教主的张宇初当然不能漠然置之，为了实现其振宗兴教之志，他除了大力推行全真教风于诸道派，以图清整道教积弊，而且他还合会理学，阐发道教的义理。张宇初对道教义理的阐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申明道统源流，上攀先秦道家；二是盛倡三教合一。

一个宗教的教祖，总是被内外人士视为该宗教的总化身，其显耀圣贤如何，对于一个宗教来说至关重要。张陵创五斗米道之初，虽上攀老子，教人诵五千文字，但实际立足于巫觋之学。魏晋时，上清、灵宝诸道派出现，所奉教祖互不一致，而置老庄之学于不顾。至南北朝时，道教诸派认同宗源于“三清”之说，但三清于史无证，神格模糊，很难取得社会广大人士的敬仰。自唐王朝着意推尊老子为道教祖以来，社会人士多视道教为先秦道家的衍流，而先秦道家的威望，则远远高于巫觋之流，可与儒释并驾齐驱。在儒学日兴、巫觋之术衰微的形势下，紧抱老子为祖宗牌位，无疑是道学自保的上策。张宇初作为一个有识之士，当然懂得这一点，因此，其《道门十规》开篇即说：道教“虽有道经师三宝之分，而始自太上授道德五千言于关令尹喜”，以老子为道教宗源，他沿袭道教关于老子历代“降迹示现”的神话，上溯道源于黄帝时的广成子：“三代以前，则黄帝问题于广成子，即太上也。乃曰生子殷末周，在文王时为柱下史，迨武王时迁藏室史，其所著道德上下经，其徒则有关、文、庄、列、亢仓、柏矩之流，其言则修齐治平、富国强兵、经世出世之术互有见矣。”张宇初认为：老子之道本以清虚为本，无为而治，因而称道教炼养之学、内丹之道皆合于至道，

而视方士之术及符道教传统的祈禳祓桧之术，皆为哗众取宠的异端，颇有否定之意。其《道门十规》批评说："自秦汉以来，方士竞出，若文成五利之以金石草木杀身取祸，遂称方术矣。外而施之，则有祈祷祠祝之事，自寇杜葛陆之徒，其说方盛，由后之师匠夸诞，奔竞声利，而世曰异端矣。然二者太上之初所未彰显。后之不究其本，不探其源，流而忘返，眩异失同，则去太上立教之本、虚无清静无为不言之妙远矣。"作为符箓派首领张宇初贬，如此否定方术、贬抑符箓祈禳之术，力倡太上之清静无为，视之为立教之本，无非是想以此表明道教与先秦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抱紧老子这块祖宗牌位，同时，欲图以先秦道家思想约束教徒，以配合明王朝对道教的检约。

宋元以后，作为道教自保之良策，倡导三教同源成为道教教义的一个共同特点。张宇初也顺应这种时代潮流，盛倡三教同源一致。他和会理学的心性之说，以心性作为三教共同之源，声称："元始道之元神也，宝珠即心也，儒曰太极，释曰圆觉，盖一理也。"从而形成了他的以心统性命而为一太极的哲学结构。对于儒之太极，他解释说："太极者，道之全体也，浑然而无所偏倚，廓然无得形似也，其性命之本欤？性本于命，理具于性，心统之之谓道，道之体曰极。"这样，既和会了理学心性之说，而又不背其性命双修、内炼为本有炼修理论，实在是聪明之举。

作为一个符箓派道士，张宇初也没有忘记其传统的斋本，祭炼之道，但他强调内炼为外炼之本，训诫道徒不得行圆光、扶乩等术，以划清道教符箓，与民间巫术的界线，力图以"辅国济民"作为道士修炼行法的准则，使道教的斋？科仪无悖于明王朝的统治规范。

由于明王朝着意扶持正一天师，所以，有明一代天师道呈"中兴"之状，介就整个道教而言，已日趋衰微。张宇初掌教之时，虽然对教理教义有所阐发，教派也有所繁衍，如永乐初，张宇初命正一道士孙碧云为武当山南岩宫住持，后来孙碧云门下形成武当本山派，属正一支派。但毕竟如强弩之末，张宇初振宗兴教之志也只好付诸东流。张宇初之后，正一道腐化愈甚，无复以符箓名世者，其它道派也少有名士出现。为了迎合世俗心理，道教多以符术巫技面目流传于民间，干世民之视听，于是道教也就更广泛地溶入世俗社会了。

武当神道张三丰

张三丰一生神奇而诡秘，恍惚迷离，谜中有谜，世人难以捉摸、忖度。就连他的名、字、号、籍贯、生于何时、死于何日都是不解之谜，遑论其传奇经历。我们只有依据零星的记载和纷纭的传说，来追寻这位神奇道人的踪迹。

张三丰自称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后裔。其祖父叫张裕贤，通晓星算之学，深知帝王气象，为追逐帝王之灵气，乃于南宋后期举家迁徙辽东懿州，在此定居。其父张居仁名中窝阔台朝科第。此人喜恬淡，无意仕途，虽有登科之进，终无居官之心，淡泊一生于山林泉石间，年 60 便悄然而逝。张三丰排行第五，年幼体弱，但聪慧灵敏，稍长入塾，博闻强记，苦修儒业。元世祖时张三丰参加朝考，希冀捞点功名，光宗耀祖。果然，他的考卷颇受当朝宰相廉希宪的赞誉。被任命为中山府博陵县令。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张三丰新官上任，意欲大展宏猷，谁知祸从天降，居官不满一年，父母双亡。张三丰修业求官，纯为显扬父母，如今两位老人双亡黄泉，张三丰心灰意冷，遂绝意仕途，潜心修道，遁入道门。然而，在史料记载中，张三丰既不是江西张天师后裔，也没当过博陵县令。原本是福建一个管犯人的狱卒。这位狱卒在明朝洪武年间，因犯罪获咎也成了犯人，在被发配到四川工卫途中，伪造官文，假借水道遁沈。从此，世人以神仙目之。至今，我们已很难确定张三丰早年的身份，是县令还是囚徒。

至于张三丰的生年，更是一桩悬案。清代学者黄宗羲在所撰《王征南墓志铭》中称他是北宋道士，《异林》亦持此说，还称其曾随太守入华山谒拜宋代名道陈传。《明史·张三丰传》记载说：张三丰于明朝初年修道武当山，声名显煊海内外；朝廷闻之四处征召。以此说来，从北宋到明初凡300年，则300多岁的张三丰尚能修炼武当绝技，似有悖人情，玄之又玄。

张三丰是中国历史上名、字、号最多的人之一。他的名字号中，能够查到文献依据者有：保和容忍三丰子、三丰居士、玄玄子、三丰、三峰、山峰、居室、君实、思廉、玄素、玄化、铉一、金一、猷、金、通疯汉人、邋遢道人。此外，他还有明朝皇帝赐给的三赐号、英宗赐他为"通微显化真人"；宪宗特封他为"韬光尚志真仙"；世宗赠封他为"清虚允妙真君"。在这如此众多的名字号中，张三丰本人最偏爱"邋遢道人"，每每以"邋遢道人"自称，世人也常以"张邋遢"呼之。当然，我们已无法考证，这20多个名字号中，哪一个是名，哪一个是字，哪一个是号；哪一个是道号，哪一个是绰号；哪一个是自封的，哪一个是别人道的；哪一个是使用在前，哪一个使用在后……然而，张三丰曾对世人泄露过自己名号众多的天机。他在《武当前提术秘诀》中称："吾之名虽多与古今人同，知之即改，于心乃安。"足见其人求新求奇，怪僻成癖。

据传，张三丰的生平事迹亦神奇怪，荒诞不经。他5岁那年突患眼疾，两眼通红，肿似铜铃，数月不消。老母心忧如焚，四处寻医访道。竟不能愈。两年以后，张三丰双目失明。一筹莫展的老母痛不欲生，不得已只好祈求神灵保佑。碧落宫的白云道长张云庵见张三丰身材魁伟，如龟似鹤，两耳垂悬，硬长的眉毛下镶嵌着一双圆大的眼睛……天生一副神仙像。其仙风道骨，使这位碧落宫的白云道长惊汉不已。认为此人非凡夫俗子可比，必能修道成仙，创一世之业，欲收为徒。遂以治好眼疾为条件，得到张母同意后收为弟子，在碧落宫调养。不到半年时间，张三丰眼疾痊愈，重见光明，跟随老道长研习道教经书。

张三丰在碧落宫入道，师事全真门，白云道长即其启蒙道师。后被丘真人点化，毅然脱尘出家，"日游名山古刹，夜习道教经书"，出没于北京、太原、西安一带。游至母南山遇火龙真人，授以秘诀，最终觉悟得道。而张三丰自称师承华山睡仙陈抟老祖。其《蛰龙吟》有云："天将睡法传图南，图南一派谁能继，邋遢道人张半仙。"据研究者认为：张三丰在《蛰龙吟》中把自己说成是睡仙陈抟的弟子，是因为他的几位老师，包括碧落宫的白云道长和终南山的火龙真人，均名轻位微，无大影响。张三丰此举，不外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

洒脱不羁，不修边幅的张三丰，善嬉谐，以云游为乐，且游处无恒，四季不辍。他云游时，无论寒暑，只一衲一蓑，或隆冬卧雪中，鼾鼾如常时；或登山行如飞，出没隐现如浮云。最引人注目、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张三丰携带的一刀一尺。或饮食，或睡觉，或行走，或坐卧，一刀一尺从不离身。张三丰"以刀开混沌，以尺挈蓬莱"，故相随而不失。他曾作《刀尺赋》解授一刀一尺的玄奥妙蕴。赋云："刀兮刀兮，妙之又妙；尺兮尺兮，要所必要。与我偕行，任他嘲笑。"歌曰："一刀一尺遍天涯，四海无家却有家。破衲补成云片片，神中笼住大丹砂。"一刀一尺虽体小量轻，在张三丰眼里却力大无边，威施天涯，玄之又玄，妙之又妙，其中之妙大约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不知是怪僻成癖，还是内功的深玄，改变了张三丰常人的心理征和生理规律。比如，他吃饭也怪，睡觉也奇。他可以三五天，甚至数月吃一顿饭，一切如常，不过，他一旦要吃饭，就大吃不已，无法控制，据说他可以连续吃两三天，且量大惊人，所谓"所啖升斗辄尽"。睡觉亦然，他可数月不眠，但是，他一旦要睡觉就不会寒暑昼夜，月余不醒。或躺在冰天雪地，

鼾声如雷，或悬于空中，睡意恬然。可见张三丰的睡功也不逊于华仙陈传，以此说来，张三丰以陈抟弟子自命也非妄言。

“阳神出游”便是张三丰利用’睡功”给世人赞成的“死而复生”的假象。

张三丰一生曾两次“阳神出游”。早在他隐修南峪山时，服气辟谷，与山野村民同苦同乐，种地耕田，一天他突然患病，且日趋严重，不久便卧床不起，病入膏肓。病痛之中，向村民请求一缸，嘱咐村民待他死后用此缸把他的尸体装好，面北朝南放在南峪山上。不几天，张三丰果然大病不起，一命归天，村民闻之既惊奇又悲痛，出于对他的崇敬，按照他生前遗嘱，把他的尸体用净水洗上一遍，放入缸中。从此，村民们失去了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可是，几年以后，人们很奇怪他在西安与他相遇，问他有何功夫，可以死而复生，张三丰笑而对曰：“老夫从未死，何谈复生，我乞求你们把我放在缸中，本为阳神出游，非真死者。”

大约在明洪武初年，张三丰再次“阳神出游”。是年，张三丰从武当山云游至宝鸡金台观时，见祥瑞彩云从北方腾腾而起，越散越大，彩云越飘越薄，飘逸高大的真武大帝在瑞云中隐隐欲出。张三丰见状，肃然止步，恭身揖手，面北而立，口中念念有词，神情木然虽痴，从者大惊诧异，莫名其妙，忙上前扶持。还没等从者走到他身边，张三丰已经闭目垂首，周身软弱，倒卧于地，奄奄一息，含糊不清地对门人杨轨山说：“我命数已尽，归天有期”。一个时辰以后，他真的登仙而游，全失知觉，惟面色逸然，红莹不变。杨轨山等众门人惊恐不知所措。在荒郊野岭以外，人迹罕至之地，师傅遽然归天，这如何是好。夕阳西下，墓色降临，深秋的西北，已冷风习习，突遭丧师之厄的众门人悲悲凄凄，很是痛心，夜幕下，他们拢起干些，燃着篝火，围坐在师傅之灵前，借火光守尸尽孝，避邪气附身。如此昼夜更迭，日复一日，师傅仍不醒人事，他们认定师傅业已归天，遂买来棺材，把尸体放入棺材准备入殓下葬。正当众门哭声嚎啕，鸣炮安葬时，棺内发出轻微的呻吟声，众人启棺一看，个个大吃一惊：但见他两颊红晕，眉目清晰，阳气上升，呼吸加快；片刻又猛地站起来，如同梦醒一样，打个呵欠，伸伸懒腰，环视四周，犹莫名其妙，问众门人：“你们都呆在这里干甚，还不快赶路？”

被吓得目瞪得口呆、魂魄四散的门人门，还以为是妖魔鬼怪附了师傅的尸体，正欲采取应争措施，忽听师傅问话，而且语调口吻一如往常，才悟出师傅并非逝，而是阳神出游，遂破啼为笑，纷纷围着师傅询问奇异的阴间世界。

张三丰坐稳身子，慢慢叙述道：我们行至金台观时，真武大帝遣使来召，让我上天议事，事毕，因天圣、天蓬、天罡、天猷四大护神失职，误把我送到武当山，所以迟至今日才回来，让众徒儿受惊啦。门人听罢，大赞师傅仙功高深，仙道有成，欢声笑语中，师徒一行继续往西天走去……

张三丰的奇行怪举，早在远乡近里广为流传，加之神秘附会，道听途说，越传越神，使张三丰名噪一时，而今，他又能死而复生，阳神出游，世人更视他为神仙，就连大明天子也被他吸引，遣使征招，敦请入朝，一睹其仙风神姿，祈灵问道。

据载，明朝有三位天子，都与张三丰有不解之缘。

《天潢玉牒》记载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之母陈后服黄冠道士的大丹始有孕，朱元璋本人又是和尚出身，对仙道、佛徒很有感情，他从兴兵讨元，到面南称孤，其间南征北战，除病解厄，登基称王，均有道士参与，神人保佑。1368 年，朱元璋登基时，龙虎山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亲往金陵朝贺，受到朱元璋的嘉奖和赏赐，已至耄耋的朱元璋，虽已称了 24 年皇帝，但仍不愿过早脱下龙袍，然而，年龄和生理的因素，使他不敢多想。当他

从大臣口得知张三丰怀有“死而复生”之绝技，尤其是传说他被宋徽宗片召，寿高200多岁。渴望“延年益寿”的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派人前往武当山诏请张三丰入朝。遗憾的是，朱元璋兴师动众，遣使不绝于途，诏书接二连三，连张三丰的影子也没见到。公元1398年，莫可奈何的朱元璋在绝望和郁闷中驾崩。

明成祖朱棣为燕王时，即对张三丰的奇才道术钦佩不已，苦于无缘相见。明成祖得天下后，为遂夙愿，登基不久即寻访这位“深藏道法，广具神通”的真仙，张三丰象对待明太祖一样，对待明成祖，避而不见。害得明成祖又派胡、纪永吉二大臣带领人马，遍历名山古刹，河海湖泊，四处寻访，十年有期，仍不见张三丰踪影。明成祖寻访不成，并没灰心，而是更为虔诚，他一边聘请名道元虚子在武当山设置道场，焚香祷告，希冀感动张三丰；一边派孙碧云手持诏香书，赶武当山敦请。诏曰：“皇帝敬奉书真仙张三丰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亲承仪范，常遣使致香奉书，遍诣名山虔请。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体合自然，神妙莫测。朕才质疏庸，德行菲菁，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谨致香奉书虔请，拱候云车凤驾，惠然贲临，以副朕拳裁仰慕之怀。”紧接着，明成祖又于永乐五年(1407年)，亲作《赐张三丰书》，御赐诗云：“若遇真仙张有道，为言貯俟长相思”。皇帝御诗果真非同一般，缄默不语，避而不见的张三丰，在御诗感召下很快露面了。不久，使者在南岩发现了张三丰留下的回敬诗，有云：“三丰隐者谁能寻，九室九涯深更深，玄猿伴我消尘虑，白鹤依人引道心。笑披皇冠趋富贵，并无一个是知音。”原来是一首讥讽诗。明成祖以真命天子之资，万乘之尊，遣使屡访一道人，竟不能如愿，到头来落得一首讥讽诗，可谓龙颜受创，伏尸百万也不足奇，然而，明成祖为政治之目的，未敢震怒，只好默默吞下苦果，绝其夙愿，另谋新途。

明成祖打着招揽真仙张三丰的旗帜，于永上年(1415年)前后，派给侍中胡偕内侍，役夫30万众，在张三丰的隐居地武当山，火兴土木，历时12年，耗资数百万武当山宫观冠盖，巍峨而起，山上山下140多里均被金壁辉煌的宫观覆盖，气势磅礴，历朝罕见，号称八宫、二观、三十六阁堂、七十二岩庙，十二祠、十二亭、三十九桥，宫观庙宇达200多间。随着大规模建筑群的落成，“遇真宫”里的张三丰铜像更是引人注目。据现今保存完好的“遇真宫”里的张三丰铜像看，这尊鎏铜像呈坐式，高1.44米，头戴斗笠，脚穿草鞋。然而，是不是张三丰的模样，恐怕连明成祖本人也不清楚，因为，张三丰从未回过这座堂皇的“遇真宫”居住，白费了明成祖的一片诚心。

明成祖大肆营建武当山，使张三丰隐遁高蹈，声望弥远，然而，不少人认为，明成祖此举并非为张三丰，而是欲以真琥大帝神化自己。却说“真武，本为“玄武”，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的合称，是我国古代崇拜的北方之神。明成祖起兵北言而得天下，遂称“真武转世”、“真武下凡”。他为巩固自己的皇权，千方百计把自己塑造成真武大帝的化身。据说，武当山主峰紫霄峰供奉的真武大帝尊像，就是按照明成祖的相貌塑造的。为了塑造一尊明成祖满意的真武神像，不知有多少人坐牢、充军、杀头、家破人亡……原因是被召进宫的画工和雕匠们，所设计的图案，没有表达明成祖的隐衷。直到永乐十五年(1417)，一位姓姬的高丽雕匠被召进宫，才结束了这种滥杀无辜的惨局。

据传，这位姓姬的高丽雕匠，非常聪明，也很幸运。他被召选进宫时，明成祖正在池中沐浴，因索图案心切，即在浴室见驾，姬匠低头禀告时，明成祖刚从水中出来的一双赤脚，水淋淋、红灿灿地映入他的眼帘。他心中暗疑：其中大有文章，然后颤颤禀告道：“真武神像，乃圣贤帝君之躯，小民从未见过，不知如何雕琢，更不敢冒犯神威，请皇上赐教，”言

廛怯怯。

明成祖跺脚骂道："难道你没有长脑袋?"

姬匠更疑，试探说："雕塑之要，明察为先，只有熟悉身体、形貌、才能雕出逼真的雕像"。

明成祖来个顺水推舟，佯装无意地说："那你不会抬头看看。"

姬匠听罢，犹如冰消雪融，彻底明白了明成祖的隐衷，他稍加琢磨，就按照明成祖出浴时的体态神情：披头散发，打着赤脚，圆脸大鼻，双目略鼓，身体魁梧。花了半年多的时间，精心铸造了一尊重达两万斤的鎏金铜像。明成祖见后，非常满意，赞不绝口，还兴一致勃勃地把自己的胡须剪下，插在神像的下巴上。武当山上118座庙观殿堂中供奉的真武神像，均是圆胖脸庞，披发跣足，人称"真武神，永乐像"。可见，明成祖亲访张三丰也罢，营建武当山也罢，其真实用意只有一个，神化自己的皇权而已。

张三丰在中国道教史上可谓一传奇式人物，他不仅是三丰教派的创始人，而且也是武当拳的开山之祖，在中华武术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所谓"少林功夫，武当绝技"，都是中华武术宝库中的魂宝。

武当绝技，即内家拳，其特点是"行如蛇，动如羽。"黄宗羲有言曰："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诮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内家，盖起于张三丰。"至于张三丰与内家拳的来历有不同的记载，据《太极拳剑推手各势详解》一书的作者南岳国师文进之记载说：一日，有鹊急鸣院中，张三丰闻之，由窗口窥见树上有一鹊，地上蟠有一长蛇，二物相斗，历久不止。每当鹊上下飞击长蛇时，蛇就蜿蜒轻身，摇首内避，不曾被击中，相持时久，鹊已精疲力竭，无可奈何而去，长蛇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洞中。张三丰由此悟通"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道理，于是模仿长蛇的动作，练出一套内家拳。当然，也有史料记载说：张三丰在北赶汴京途中的一夜晚，梦见真武神君降临，授以拳法。第二天，张三丰就利用梦中神授拳法打散了数十个彪形大汉，张三丰的拳技由此名噪一时。

张三丰创造内家拳时，虽然有梦中的灵感和动物的启示等因素存在，但是从内家拳"内以养生，外以却恶"，强调意、气、力协调统一的特点看，均与道家清静无为主张和道教"三宝"修练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其内家拳技，分太极拳、八卦拳、形意拳、五行拳、纯阳拳、混元拳、玄武棍等，据今人唐代剑等人的研究，内家拳的练法分练步和练手。练步以马步为主，凡18种步法。练手分残、推、援、夺、牵、挎、逼、吸、贴、撺、圈、插、抛、托、擦、撒、吞、吐18字。每一字为一个动作，且有四句口诀为分解动作，比如"守字"诀云"夺字猛如风迎门照架中。回身势莫夺，分推气更雄"。据说，内家拳的精妙高深之处，在于"六路拳"和"十段锦"。六路拳以练骨聚力为要，其防卫攻打功能极为神奇，"一缩形周身无缝隙，一撒臂通身皆有手"，十段锦的功能是放开骨胳，非修练有年，功底厚者，不能展示此法。

张三丰创造的内家拳，饮誉武林界，然而历史上有两个张三丰，但不知哪一个是内家拳的祖师。

史载，宋徽宗时武当山有一丹士张三丰，徽宗征召之，道梗不前。夜梦神授拳法，厥明，以单西杀贼百名，遂以绝技名于世，三丰之术，百余年后，传于陕西，而王宗为最著。到明初，武当山又有一个叫张三丰的道士，辽东懿州人，读书过目能诵，精通三教经书和武当内家拳技。根据史料，北宋时的张三丰首创内家拳之说比较可靠，明朝时的张三丰，可能是利用"张三丰"的影响，予以附会，也可能是继承和发展了武当内家拳技，闻名海内外的内家拳祖师至今仍是历史之谜。

派别林立，博大精深的内家拳，虽然都奉张三丰为祖师，但他们也很难搞清自己的祖师爷是北宋人或是明初人。

八卦都祖刘佐臣

中国的道教发展到明清时期，已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但这仅仅是指作为正宗教的道教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不可遏制民间宗教运动的狂潮。这些众多的民间宗教与土生土长的道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可以说是道教流衍或异端。在这些众多的民间宗教中，八卦教是清代前期新崛起的大教门之一。它的兴起，为清代民间宗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对清代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八卦教的创始人为河南人刘佐臣。康熙初年，刘佐臣举家迁往同东单县定居，并开始招徒纳众，传道立教。创教之初，教名五荤道，后又改为清水教、八卦教、天理教、先天教等。八卦教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刘佐臣创教之始，就以山东县为中心，"分八卦，收党徒"。所谓八卦，即《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八卦的名称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代表着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后来又被赋予了不同的方位。刘佐臣就利用了《周易》中的这种思想，将门徒按八卦方位，分成八个派别，如：离卦主南，封与河南商丘部姓；坎卦主北，卦与直隶容城张姓；震卦主东，封与山东金乡候姓。而且，清代民间宗教中流传的八卦、九宫之说，也被刘佐臣引入八卦教。在道教理论中，每一卦即为一宫，八卦即八宫，加上中央宫即为九宫，并绘制出八卦九宫图。刘佐臣据此创立"内安九宫，外立八卦"的教义，刘姓家族为教首，居于中央宫，从而形成了九宫之中，中央宫为尊，刘姓教首不立卦，其它八卦尊其为首的组织形式。这样，八卦之说，就促成了八卦教组织结构的创立与巩固，并使之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有固定教首的宗教派别。

八卦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儒、释、道三家的极大影响，特别是受到理学和道内丹派的影响，因而极力提倡内丹修炼，宣称只要参透修炼内丹的"玄机"，就可以实现内结"圣胎"，飞升成仙的愿望。这种所谓的"玄机"，"不打坐，不参禅，中当人密密言。包的紧，藏的严，才敢替祖把道传。"八卦教把内丹修炼看得非常神秘，因此，一反清代民间宗教炼养方式传授上通俗化，一般都是"直指单传"，"除了已，人不知，默默无言回天机，子午卯酉一定，合眼就是上天梯。"

在八卦教的教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日月崇拜。日月崇拜可以说是清代许多民间宗教的共同特点，八卦教继承了这个传统，并把这种崇拜加以发展。教内编有《太阳经》歌诀，把太阳人格化、神格化，自称"天上无我实难过，地上地多不收成……有人传我太阳经，合家大小得安宁；见了不传太阳经，眼前就是地狱门。"把太阳描绘成一个人类必须依存而又十分凶恶的神灵。正因为如此，崇拜太阳，成了八卦教各派的共同信仰。例如：八卦教中的离卦教，要求教徒："每日早、午、晚朝太阳吸三口气，把唾沫咽下，功夫用久，可以给人家治病下针。"八卦教中的震卦教，指太阳为圣帝，要求弟子"每日早、午、晚三次朝礼太阳，两手抱胸，合眼趺坐，口念真空等八字八十一遍，名为抱功，功成可免灾难临身"。可见，八卦教对太阳的崇拜与其内丹修炼的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在道教内丹派看来，人与宇宙混而为一，都是精华所致。人的精、气、神为人身三宝，而天上的日、月、星乃宇宙三宝，它们对应相通。人要想长生久视，成仙升天，只有取日、月、星之精华，充人体三宝，疑神化气，以结"圣胎"。不仅如此，八卦教中这种对太阳的崇拜，还与其偶象崇拜密切相关。在清代的一些民间宗教中，宗教首领为了巩固其个人及家族的地位，往往神化自己的祖师。由于太阳和月亮光被万物，普照生灵，神通广大，往往被视为教派祖师的化身。例如，普明之妻普光被比作月亮。二人死后合葬，教徒建日月塔祀之。黄天教

这种日月崇拜染及八卦教。在八卦教内，教徒奉刘佐臣为太阳，尊为圣帝老爷，向太阳的顶礼膜拜，就是向圣帝老爷刘佐臣顶礼膜拜，具体地把太阳视为创教祖师，从鸸一种崇拜太阳的固定的宗教仪式。这种宗拜太阳的仪式与修炼内丹的理论融为一体，就构成了八卦教最基本的宗教内容。

八卦教创教之初，其教义主要是宣扬清静自守，修炼内丹以成仙升天，其中也不乏对清王朝的颂扬，吹捧封建伦理道德劝诫教徒尽人臣之忠。但是，作为一个民间宗教，无疑要反映广大的民众的意愿和要求。随着教势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民生多艰的时代，带有不同目的的民众涌入教团，宗教组织急剧扩大和分化，部分教门的教义则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与抗争，甚至间有鼎革王朝、改天换地的内容，并进而走上以暴力相抗衡的道路。这实质上是激烈的社会矛盾在民间宗教领域的反映，是社会变革对民间宗教的一种改造。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民间宗教有那么密切的联系，甚至于许多农民起义就是由于宗教团体直接组织发动的。八卦教发展的历史也体现了这一点。

乾隆中叶以后，清王朝走完了繁荣兴盛的发展时期，步入多事之秋。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八卦教各派也数举义旗，成为华北地区一支重要的反清力量。

八卦教最初的大规模反抗斗争，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爆发的山东清水教徒起义。清水教与八卦教异名同教，因入教者须先饮清水三杯而得名，当时山东清水教首领是寿张县王伦。王伦善于拳棒与气功，他在寿张县设拳坛，传授弟子八卦拳法，并把这些拳法与清水教的气功融为一体，显示出超人的功效。乾隆三十九年，清当局探知王伦设坛聚众，图谋不轨，欲派兵前往镇压。王伦事前得知此讯，决定先发制人，举行起义。当年八月，起义爆发，数日之内，连克数城，并乘胜向临清进发。清政府不敢怠慢，慌忙从冀、鲁、豫三省调集八旗劲旅，携带先进武器，围堵义军。在清军先进的火器面前，清水教徒无论怎样发气练功，都无济于事，火器一发，血肉横飞，惨烈悲壮。经过一个多月的血战，终于失败，王伦自焚而死。

八卦教领导的最为著名的起义，当推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天理教(八卦教)起义。这次起义，规模盛大，遍及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在三省交界的十几个县，起义军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斗，坚持数月之久。其中，以林清为首的坎卦教长驱直入，进逼北京，并攻入紫禁城，给清朝统治者以极大的震动。

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是八卦教的分支先天教发动的，先天教原属于离卦教一支，离卦教在乾嘉时期屡次犯禁，为避免清政府的镇压，山西赵城县一带的一支离卦教改名先天教。道光十五年(1983年)，先天教首改换曹顺。曹顺是个粗通文墨、善于拳棒之人，他谎称教内之人皆为天神转世，而他自己则是如来化身，以推翻满清、救民水火相号召。是年三月，发动起义，攻占赵城。清政府闻讯，调集精兵马队，合力围剿，由于起义军力量弱小，准备不足，历战数日，即告失败。

正是由于八卦教屡次起兵造反，对抗满清，所以，清政府对其极为痛恨，急欲铲除祸根。于是，在派兵镇压的同时，对八卦教的各级组织进行严厉打击。嘉庆二十二年(1818年)，清政府彻底破获刘姓家族，尽灭其族。刘佐臣自康熙初年始立八卦教，自任教首以来，刘姓家族在一个半世纪中六传其位，至此，则断绝香火。取而代之者为李姓家族，教名也改为九宫道，然而宫、卦间的关系仍旧未变，只不过随着教势的发展，逐渐丧失其进步性，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

道教和神仙

讲求得道成仙，是中国道教的一大特征，因此有人称它为神仙道教。

神仙之说，并非源于道教，早在先秦道家著述中就已颇为流行了。《庄子》中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这些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史记·封禅书》载："渤海中有蓬莱、方壶和瀛州三神山，"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自齐威王、齐宣王开始，不断派人前往寻求不死之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派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出海，便是受了这传说的影响。东汉时期道教创立后，以得道成仙作为道徒信仰追求的目标。从此，神仙之说经宗教势力的渲染增饰和推波助澜，愈益发达完备，便作为道教的重要标志在中国深入人心，也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不注意的一个侧面了。

道教的神仙谱系

道教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神仙谱系。根宋以前的几种道教经籍《列仙传》、《神仙传》、《续仙传》、《集仙录》、《集仙传》等记载，共有神仙四百余人。南朝梁陶弘景撰《真灵位业图》，给这些神仙排列座次，共分为七阶（七个等级），每阶设一中位，由一位神仙主持；再于左边和右边分设若干席位，按插诸神，共排定四百三十多位神仙。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收录道教诸神二百三十余人，是流行中国民间而最具代表性的。

道教的神仙谱系，实际上是天神地祗人鬼和仙真的总汇。天神中间，除日月星斗雷电诸神外，以三清四御为最高。三清为居于清微天玉清境的元始天尊（即天宝君），禹余天上清境的灵宝天尊（即太上道君），以及大赤天太清境的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四御为昊天金阙至尊玉皇大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和承天效法土皇地祗。四御中最后一位掌管阴阳生育及大地山河，实际上是最大的地神。民众普遍信奉的地神则有城隍和土地。所谓人鬼多是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英烈，后被道家尊为神，如关圣帝君即关羽，还有两位门神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等。

这些天神地祗人鬼，有许多来自汉民族的古代神话传说，原属于民众的创造，经道家作了加工改造。道教诸神中，数量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仙人和真人，如赤松子、鬼谷子、张天师、许真君、陈传老祖以及人们所熟知的八仙等。他们大都是著名的道教人物，被徒众神化而进入神仙行列。其中也不乏民间神话传说中的著名形象，如尊盘古为"成立天地，化造万物"的元始天王和盘古真人，尊西王母为天下女仙之首，并说她是盘古真人与太玄圣母通气结精而生等。

道教神仙最早本来活动在山上，《释名·释长幼》称："仙，迁也，迁入山也。"后来受了佛家三十三天说的影响，才造出三十六重天

来，把神仙安排到天宫居住，但大部分仙人真人还是住在号称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的仙山洞府之中。

道教将它们收罗尽致的诸神，按中国封建统治秩序进行组合，所谓太清境有九仙，上清境有九真，玉清境有九圣，共二十七个位子，显然是仿《礼记·王制篇》中的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的结构而来。后世民间信仰的上天玉皇大帝——地方城隍、土地——家中灶神、门神——阴词判官、小鬼这个鬼神体系，更是中国封建社会组织结构的投影。

道教神仙的特征

葛洪在《抱朴子》中告诉人们："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本，更受异形，……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对俗》)这里所憧憬的不死和飞升，是道教所信奉的神仙的首要特征。要达到长生不死，就须能抗御寒温风湿五兵百毒从外部的侵害，还须从内部修养，不受忧喜毁誉之累。这样的人，自然不适宜久居尘世，所以得有一种变化飞升、出处任意的本领，以便到另一种专供神仙们逍遥的境界去生活。不死和飞升是密切相关的。

什么叫神仙？闻一多先生在《神仙考》中说得好："神仙是随灵魂不死观念逐渐具体化而产生的一种想象的或半想象的人物。"灵魂不死本是一种原始观念。中国古时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氐羌族盛行火葬，火葬习俗中便含有企求灵魂乘火上天而得到永生的意思。早在《墨子·节葬》下篇便有记载："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这种观念最先是毁弃肉体而使灵魂永生，至今藏族的天葬，一定要让鸟儿将尸体啄尽，死者亲属才高兴，否则，就意味着死者上不了天堂，就是上述原始观念的遗留。后来道家吸收这一观念，演变成灵魂和肉体可以同时得到永生。是否做得到呢？《抱朴子》中说："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论仙》)在道家看来，长生之道是可以寻求的，为此，他们作了许多实际的努力，如模仿自然界长寿动物的生活习性，发明行气导引(即气功体操)等养生之法，服食自己烧炼的丹药等。于是"长生不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便成为道教神仙说的主要标志而为人们所熟知了。

有人说，道教的这种神仙观念，反映了贵族阶级企求永远享受人间富贵生活的消极思想。长生不死的神仙生活，深深吸引着历代封建贵族，也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来烧炼九转金丹，将道教方术付诸实践。可是企求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并非贵族阶级如此，广大人民群众何尝没有这种愿望！它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欲望，在中国更为突出。中国的"五福"，不论是寿、福、康宁、攸好德、考终命、还是寿、福、贵、康宁、多子，都把寿摆在第一位，体现长寿和长生不老愿望的神仙形象便格外受人景仰。日本研究中国道教的学者说："在地球上使自己生命无限延长，这就是神仙说的立场。似乎可以认为现实的人们所具有的使天生的肉体生命无限延长并永远享受快乐的欲望，便产生了神仙说这样的特异思想。这种思想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窪德忠《道教史》第一章)我国第一部道教史的作者傅勤家将儒释道三家的生死观进行比较之后说："儒畏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谓此身根尘幻化，业不可逃，寿终有尽；道教独欲长生不死，变化飞升，其不信天命，不信业果，力抗自然，勇猛何如耶！"(《中国道教史》214 页)这些话颇有见地。

神仙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富于神通变化。这种神通或法术，如《抱朴子》中所描术

的，不仅包括能将自己化形为飞禽走兽及金木玉石，可以隐身易形，还包括变化创造出自己所需要的各种东西，乃至画地为河、撮壤成山、兴云致雨。放光万丈，自可洞悉幽暗中和地底下的奥秘。有了因风高飞的本领，可以突破山河的阻隔，便在空间取得了任意行动的自由。这些幻想出自道家著述之中，实际上是我国人民世代追求的企图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主宰世界的理想愿望的体现。在空间自由飞行，以人工兴云致雨，属于科学幻想之列，现代科学技术已将它变为现实。有些纪想虽未能实现，可是道家认为“有生最灵，莫过乎人”，相信人的能力最终可以达到“无所不作”的地步，其精神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贵族信奉的道教和下层民众信奉的道教，其区别并不在于有无神经，而在对神仙的信仰中各有所求。贵族学道主要是企求长生，以便无限享受今生的富贵荣华。他们对服食烧炼丹药这一套最感兴趣。遭受剥削压迫的下层民众则渴求神通广大的仙人们主持人间正义，济困扶危，消灾赐福；或希望向仙人学法，用无所不能的法术来武装自己，以便战胜自然界和社会上的邪恶势力，摆脱贫困不幸的命运。关于某些仙人用法力斩妖驱邪，护佑一方百姓，和关于普通人入山学道，掌握了某种法术，最后报仇雪恨的故事，在民间特别流行，就表明了下层民众神仙信仰的特点。道教在封建社会里，能够和农民起义想结合，除“均贫富”的政治主张具有号召力外，同它鼓吹的某些神秘法术，如预知天意、刀枪不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等，也有很大关系。它们虽然是幻想，却可以振奋士气，威慑敌胆，起到积极鼓舞作用。

神仙是虚妄之物，像宗教信徒那样，虔诚地相信神仙，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祸福吉凶的主宰，或者认真地企求得道成仙，不用说是迷信愚昧的表现。时至今日，在我国一些文化落后地区，这类由迷信愚昧造成的悲剧，仍时有发生。我们不可忘记对破除迷信的宣传。可是道教的神仙说世代相传，家喻户晓，已成为汉族和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一种文化心理，我们不能简单地作为封建迷信完全予以否定。

神仙说与文化

神仙说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现实世界的投影，然而它又表现出人们对许多超自然超现实的事物的大胆追求。它是某些人类基本欲望的伸张，也是人们对自己创造潜力的预测，可以说具有潜科学的价值。过去有人说中华民族重实际，缺乏想象力，仅从道教构造的神仙世界便足以打破这一论断。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神仙说曾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构造鬼神世界，同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政权结合，对广大群众进行神权统治与精神奴役。但民众也利用改造这些神仙形象，寄托自己的理想与追求，鼓舞自己反抗黑暗邪恶的斗争。

道教神仙说广泛吸取了汉民族许多古老神奇的神话传说材料，使它们得以保存和光大，这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所不为和所不及的。另一方面，道家又把自己的哲学思想融注在神仙世界里。在道家看来，“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伎也。道无形，因术以济人；人有灵，因修而会道”（《云笈七签·秘要诀法序事》）。道是虚无的，它又无处不在，贯串于天地万物之中，得其道，即可长生不老，变化通神，役使万物，主宰世界，无所不能。神仙就是得道者。各种神奇的道功道法，均可传授于人。所以普通人只要勤求明师，也可得道，“仙之可学致，如黍稷之可播种得”。他们把宇宙万物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探求贯串其中的“道”，固然是把道神秘化了，陷入了唯心主义，却接近于我们对事物本原或内部规律的求索，具有某些辩证法的因素。它强调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能洞察宇

宙间的奥秘，掌握役使万物的方术，更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精神。在道教神仙所说中所包含的自然哲学思想，很值得我们珍视。

道教神仙说给予中国文学艺术以相当深远的影响。收入道藏的许多神仙传记，如汉代刘向的《列仙传》、晋代葛洪的《神仙传》、唐末道士杜光庭的《墉城集仙录》及尔后的《续仙传》、《集仙传》等，用活泼自由的散文笔调，记叙优美的神仙故事，是具有独特风格和价值的文学作品。见于道藏之外的作品，为文学史家所注目的，则有魏晋时期的游仙诗，元代的神仙道化剧及明代的神魔小说。

神仙说的流行激发了古代许多诗人的幻想和激情，演成“游仙诗”。曹植、曹丕 、张华、郭璞等人均有代表作流传于世，读之使人有飘飘凌云之感。这些诗或写诗人与神仙同游，或不包括诗人在内，仅写仙人漫游。直到现代，毛泽东同志还用游仙体写过《蝶恋花·答李淑一》，抒写自己怀念牺牲战友的深情。

后来神仙故事被人们搬上舞台，成为戏剧的一个特殊品种。《太和正音谱》分元剧为十二种，“神仙道化剧”为其中之第一，专演道教神仙度脱和飞升的故事。《录鬼簿》所载四百本元杂剧剧目，这类戏竟占了大约十分之一。赤松子、东方朔、张天师、陈抟老祖和八仙，均为舞台上活跃人物。《八仙庆寿》等剧目流传至今，依然为民众所喜爱。

明代小说盛行，其中一类叙述神魔相斗故事，与道教关系密切。有的学者认为，《西游记》受佛家思想影响，而《封神演义》则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它们已成为流行不衰的中国古典小说名作。

道教流行民间，给予民间文学以深刻影响。许多神仙事迹，为民众所津津乐道，演成种种民间传说，其中以八仙传说流行最广。它们即有道教传说作依据，又融进民众的思想情趣。近年来不仅由民间文学工作者记录整理成文，还被艺术家搬上影视屏幕，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品。

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体裁的作品，或借神魔争斗，象征性地描写封建社会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或由神仙出来主持人间正义，赏善罚恶，表达善恶各有所报的主题；或抒发愤世嫉俗、飘逸超脱的思想情趣，其生活思想内容也是较为丰富的。但都贯串着神仙思想，以具有广阔的时空背景、大胆神奇的幻想、出人意外的巧妙构思和浪漫主义的激情为其特征，深深吸引着中国民众。神仙道教的世俗化，同这些作品的广泛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些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指出：“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有互补的两方面。中国人是讲实际的人民，具有高度的社会意识，所有的哲学流派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关心社会生活、人的关系、道德价值和政治。但是，这只是中国思想的一个方面。与此互补的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神秘主义方面。它要求最高的哲学目标超越社会和日常生活世界，达到更高层次的意识。在这个层次上，中国人的圣贤达到了和宇宙神秘统一。”(《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第 79 页)这互补的两方面，前者以儒家哲学为代表，后者以道家哲学为代表。道教神仙说就是以早期道家哲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神秘主义思想。它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上进行观察思索，富有探索奇异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渴望越脱现实，把握支配宇宙万物的隐秘力量，最大限度地享受人生欢乐，获得变化创造的自由。神仙说意味着人的思维和想象向广大空间的大胆飞跃，意味着对人的潜在能力的无限信心。经过两三千年的积淀，它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曾推动道家在科学(主要是化学)上作出过不少发现发明，即使对今天的科学探索也有不少启发。本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我们完全可以吸取其中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西王母的演变

虽然在中国人心目中，历来是“男尊女卑”，连升天作神似乎也只有男性的份儿。可偌大一个神的世界，缺乏女性，那这些神祗们也会颇感寂寞。世人很会根据现实生活来替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神祗们着想：天上的神祗中也当有些女性才是。于是，天界中出现了不少女性。但这女性升天做神仙的事由谁来管呢？人们首先想到了和凡人得道升天关系最近、居于东方大海蓬莱仙岛上的东王公。东王公是鬼神世界的“神事总管”（见《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引《仙传拾遗》），但凡鬼神世界升升降降的事，统统由他掌管。但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男女升天皆由东王公一人掌管，可能不那么方便。于是，女子得道升天的事儿，就交给了一位女神。这位女神，就是西方昆仑山上的那个与东王公权力相当的神祗——西王母。

西王母与东王公，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又一个为男，一个为女，并且两人共同掌管凡人得道升天的事，一来二去的，就有些好捕风捉影的人硬把西王母配给了东王公，使这二位真成了一对夫妻。

不过，东王公虽然是丈夫，而论资格，西王母可老得多。从辈份上说，将西王母配给东公，真有点儿“乱点鸳鸯谱”了。东王公出生在汉代，西王母却在上古神话传说中就已经神气活现了。不过，那时的西王母可不像后来传说的那么有魅力，那么浪漫。上古神话中的西王母住在昆仑山上的一个山洞里，它的相貌有些像人，却长了一口虎牙，一条豹尾，头发乱得像鸡窝，善于长啸，身边还有三只青身红头黑眼的大鸟供它驱使，为它捕食。那时的西王母主“灾厉五刑残杀之气”，即掌管灾役和刑罚（见《山海经》中《西次三经》、《海内北经》、《大荒西经》等）。实际上，西王母是个半人半兽、残暴凶猛、不知其性别的怪神。

到《穆天子传》中，西王母这种令人恐怖的形象才开始发生变化，开始成为多才多情的女神了。《穆天子传》说，周穆王巡游天下，来到西王母统辖的地盘，恭恭敬敬地捧着白圭黑璧去拜见西王母，还献上了许多锦绣丝带。西王母高兴地接受了礼物。第二天，周穆王又在瑶池之上大摆宴席款待西王母。西王母则在宴席上即兴赋诗以作酬答：“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周穆王也和了一首，西王母吟罢，感到意犹未尽，又跟着和道：“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为群，乌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宴后，周穆王登上崦嵫山顶，立下“西王母之山”的石碑而回。

这个传 说为日后西王母的形象奠定了基础。首先，西王母的身份提高了，成了所谓上帝之女，而且是一位善于吟诗作赋的天仙。但从这个西王母“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为群，乌鹊与处”的诗中，其实还是可以隐隐看到《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影子的，这也反映了神话传说在民间不断流传过程中的演化。

在汉代，西王母形象离一个美貌多姿的少女尚有较大差距。司马相如《大人赋》中西王母就还是一个“皬然白头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的白发苍苍，住在昆仑山洞穴之中的老太婆，并不惹人喜爱。然而随着西王母神通的越来越大，影响随之扩大，形象也愈来愈美。据说，西王母手中掌握着不死之药，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老，当年嫦娥偷服了丈夫的灵药，奔上月宫，而这药正是羿历尽千难万险从西王母那儿讨来的不死之药。不死之药，这本身就够诱人的了。对人生短促的感受，早已是人类认识了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之后所产生的最强烈的人生主题。特别人们在这种种瘟疫、战乱、饥荒等天灾人

祸面前所表现的渺小软弱、无能为力,更迫使人们产生了对生命的忧患与对人生享乐渴求的心理。而西王母的不死之药,正成了人们这样一种心理缺憾的补偿。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明明知道长生不老的虚妄。这样,这个有不死之药的西王母,就格外地受到人间的崇拜。在汉代,她就已经开始接受起人们的祭祀了。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

在天上众多的男神之中,忽然冒出这么个多才多情的女神,有关西王母婚嫁的传说也就不断地出现。先是把西王母嫁给那个曾与炎帝、蚩尤大动干戈的黄帝,说他们都住在昆仑山,一个男神与一个女神住在一起,岂有不成夫妻之理!道教兴起之后,为了将道教体系宣扬得更为完美,又从一种哲学的需要出发,把西王母嫁给了东王公。等到民间信奉的玉皇大帝做了天界的第一把交椅,成为万神之主,人们又把西王母献给玉皇大帝做后,称之为"王母娘娘"。西王母就这样一次次地出嫁,不知道她到底该算是谁的妻子。

作为女性形象的西王母,不仅吸引了天上诸神,连人间之主也为之动情。从周穆王拜见西王母后,人间君主与西王母交往的故事就愈传愈神了。这里既暴露了编造者对风流佳话的醉心,亦反映了帝王渴望得到女神庇护的心理。其中的《汉武帝内传》,说西王母特别垂青汉武帝,曾特地遣使早早通告汉武帝她要下凡。七月七日夜漏七刻,只见西王母乘着紫云车,来到宫殿之西,顿时青气如云,三只青鸟侍立在西王母身旁,后面还跟随着几千位神仙,光耀宫廷殿宇。西王母在两位侍女搀扶下登上殿堂:"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桂,容眸流盼,神资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金褡襹,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璚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坐卧之具),帝跪拜问寒喧毕,立,因呼帝共坐。"她还送给汉武帝大如弹丸的五枚"三千年一生实"的仙桃(见《博物志》卷八)。这段西王母会见汉武帝的佳话,实际已完全把西王母当作一宫延贵妇来描写,使这位原本应让人望之却步的女神,成了雍荣华贵,绝色风流的女子。

不过,这些大都属于民间的传说。当道教整理自己的神鬼世界,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就不能允许堂堂天界的女神向人间君主频送秋波了。他们很严肃地对西王母的身世经历进行了"正名"工作。他们说西王母本是元始天王和太元玉女的女儿,叫九光元女,号太真西王母(见葛洪《枕中书》)。她出生在神州伊川,姓候,刚生下来就会飞翔,可以结气成形,"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矣"。"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隶焉。"并说西王母所住的地方在"昆仓之圃,阆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元室,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飙车羽轮,不可到也"(《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引《西王母传》)。道教徒从出生、职能、治地等诸方面为西王母勾画出一个总体形象,使之成为了道都中的一位重要女神。

这位在道教、民间都深受人所爱戴的女神西王母,虽说早已改妆成妙龄少妇,而且掌管着女子得道升天的大权,但毕竟曾有过"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的历史。这种中国人务求"十全十美"的审美心理来说,确实成了一大缺憾。道教终于想出了一个彻底美化西王母的办法:首先不承认这"豹尾虎齿善啸"者为西王母;其次,编造出西王母的使者金方白虎之神,说它才具有豹尾虎牙的特征,而以往的说法都属讹传(见《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引《西王母传》)。这样,西王母那形象可怕的历史,就被一笔抹掉了。

作为女神,西王母同时也成为人们对母

亲崇拜的象征。她的宽厚,慈悲比起她的美丽多情来,有时更能赢得人们的崇奉。据《隋书·张季珣传》上说,隋仁寿末年,隋高祖第五子汉王扬谅起兵谋反,杨谅派遣大将刘建攻打燕赵。到井陉,张季珣的父亲张祥率兵拒守。刘建久战不下,遂用火攻城,老百姓都惊慌失措。张祥见城侧有一座西王母庙,于是亲自登城向西王母庙拜求,他流着泪说:“老百姓有什么罪过?竟遭到大火焚烧。如果西王母真有灵验的话,就请降下大雨救救百姓吧!”张祥祈祷的话音刚落,只见西王母庙上黑云腾起,须臾大雨降下,大火被扑灭了,老百姓得救了,这个故事的本意,是为了宣扬神灵也不允许贼子造反,但它寄寓的神话意识,却反映了人们对救苦救难的伟大母爱的崇拜。在人类的苦难面前,只有西王母挺身而出去扑灭大火,救助百姓。在她的慈悲里,让人感动的不仅是要惩恶扬善,更有一种庇护自己儿女的母性精神。从这个故事里,是不难体会出这一点的。正因为如此,西王母才成为与人间交往最密切、最富有人情味的一位女神。甚至她的名号也和其他天神有所不同。有人说她姓杨名回,又名婉吟;有人说她姓缑;有人说她姓何名回,字婉吟。尽管说法不同,但这些都纯然是人间的名姓,仅此也可见出人们对西王母亲切之一斑了。

八仙的来历

八仙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影响很大,在古典文学、戏曲、绘画、雕塑作品中,都留下了他们的形象。作为神话传说,其中自然有不少虚无缥缈的成分,但是这八位神仙,倒也不全是凭空虚构的,历史文献中留下了不少关于八仙记载,只是真假掺半,说法不一,令人难辨其实。

八仙中至少有五名见于北宋以前的记载,其中张果、韩湘、吕岩三人,均见于唐代史料中。

张果的事迹最早见于唐玄宗时的记载,《旧唐书·方伎传》有一篇唐玄宗《加张果封号制》,称他为恒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人,赐予他银青光禄大夫之衔,号为通玄先生。据此制文,可知张果实有其人。开元诗人李颀有一首《谒张果先生》(《全唐诗》132卷)诗,诗中说:“先生谷神者,甲子焉能计。自说轩辕师,于今几千岁。”“尝闻穆天子,更忆汉皇帝。”还有一些“餐霞断火粒”,“炼骨同蝉蜕”之类的神异之事,但全都出于张果“自说”,是他的自我吹嘘。后来这些故事流传于民间,便越传越神了。

在八仙传说中,“张果老倒骑驴”的形象十分著名,但早期传说中并没有倒骑驴的说法,有人认为“倒骑驴乃宁潘阆事”(见清人翟灏《通俗编》)。这是因为宋朝诗人潘阆游华山时,题诗有“昂头吟望倒骑驴”的句子,故诗人魏野写诗赠他说:“从此华山图籍上,更添潘阆倒骑驴。”这与张果老无关。

张果老倒骑驴的形象来源于民间传说,但经过戏曲舞台的传演,其影响更加广泛了,成为文学、绘画、雕塑中常见的艺术形象。清人金埴《不下带编》中说:“画家有《张果老倒骑驴图》,或题其上云:‘多少世间人,不如个老汉,非是倒骑驴,凡事回头看。’”可见“张果老倒骑驴”已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艺术典型了。

韩湘(韩湘子)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侄孙,韩愈著名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一诗,就是写给这位侄孙的。与他同时(稍后)的段成式撰写的《酉阳杂俎》中,便载有韩愈贬官途中遇韩湘、从牡丹花中显出这联诗句的故事,说明在当时韩湘就被传说成神仙了。

吕岩(吕洞宾)是唐末人,《全唐诗》卷八五六至八五九收有他的大量诗作;有名的岳阳楼边的三醉亭,就是后人根据他的“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一诗而建的。但

他的诗中有不少是宋人所伪作，《全唐诗》收入时没有加以甄别。

八仙中的钟离权、何仙姑，均始见于北宋时的记载。《宣和书谱》中说："神仙钟离先生，名权，不知何时人。间出接物，自谓生于汉。吕洞宾于先生执弟子礼。""自称天下都散汉。"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中则说："邢州开元寺有唐钟离权处士二诗"；《全唐诗》把他的诗收在卷860"仙"类，但清人历鹗却把他的诗收入《宋诗纪事》卷九十"道流"中。总的说来，钟离权大约与吕岩同时；关于他的一些传说，约起源于五代至北宋期间。

关于何仙姑的说法也不一致。北宋刘颁《中山诗话》云："永州何仙姑，不饮食，无漏泄，世传其神异。"北宋刘斧《青琐高议》载有何仙姑的传说两则。历鹗据此把刘斧《摭遗》中所载何仙姑《题永州故人亭》一诗，收入《宋诗纪事》卷九十四。但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外编》中，童养年辑录的《全唐诗续补遗》，却据《太平广记》、《孔氏六帖》、《舆地纪胜》及《广东通志》等书，把何仙姑列入初唐，说"仙姑，增城何泰女，生唐开耀(681—682)间"。

八仙中的其余三名，按现在一般的说法，是铁拐李、曹国舅、蓝采和。铁拐李未见史籍有何记载，大概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就现存材料看，他最早见于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岳》杂剧，剧情是宋朝郑州孔目(官名)岳寿病死后，吕洞宾救他复活，因尸已焚化，借刚死的屠夫李某尸体还魂。李是个瘸子，走路要拄拐杖，因而剧名又叫《岳孔目借李铁拐还魂》。由此看来，得道成仙的是岳寿，只不过借用李铁拐的尸体罢了，所以清代的赵翼说"铁拐无姓李"。也有人认为铁拐李是由刘跛子演化而来。刘跛子是宋代传说的得道之人，寿一百四十余岁，事见宋僧惠洪的《冷斋夜话》，但未见他与八仙的传说有何关系。

八仙中的曹国舅叫曹友；但据史书记载，宋朝仅有一个"曹国舅"叫曹佾，是宋初名将曹彬之孙，宋仁宗(赵祯)曹后之弟。《宋史·外戚传》说他"卒年七十二"，并无好神仙修炼的记载。《宋史》上说他"美仪度，通音律"，想是因此而被民间传说加工成"八彩眉象简朝绅"(《邯郸梦》)、"吹铁笛韵美声和"(《竹叶舟》)的仙人的吧？

蓝采和的事迹，最早见于南唐沈汾的《续仙传》，说他"不知何许人也，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长三尺余"，"常衣破蓝衫"，唱"踏踏歌"等等。后人因歌词中有"蓝采和"字样，傅会为其姓名；其实，据专家研究，"蓝采和"只是踏歌的泛声，有音无义，并不是人名。元无名氏《汉钟离度脱蓝采和》一剧，写的是五代时伶人许坚，艺名蓝采和，为钟离权引度成仙的故事。许坚实有其人，见宋人郑文宝《江南余载》。《全唐诗》卷七五七、卷八六一都收有他的诗，说他"有异术，常往来庐阜茅山间。李璟(南唐中主)时，以异人召，不至，后不知所终"。又说："许坚，字介石，庐江人。"并没有他是优伶的记载。这本杂剧虽一般称之为元杂剧，但究竟作于元代还是明初，尚难确定。蓝采和系许坚艺名之说，当从这本杂剧开始。是剧作者的创造，还是民间也有此一种传说？亦无材料可证。

在明代以前，八仙中的曹国舅与何仙姑的位置是不稳定的，常为别的神仙所代换。这些都留到后面再说。

清代史学家赵翼(1727——1814)，有一首题八仙图轴诗，其序云："戏本所 演八仙，不知起于何时。按，王(圻)氏《续文献通考》及胡(应麟)氏(笔丛)，俱有辨论，则前明已有之；盖演自元时也。"这只是就"戏本所演八仙"而言，而八仙之称，则起源更早。唐王勃有《八仙径》诗，杜甫有《饮中八仙歌》，这显然不是今天所说的八仙。两宋都城都曾有"八仙楼"酒家，也许是借用杜诗。但在此基础上却逐步演化出八仙的故事。据周密《武林旧事》"迎新"条记载："杂剧百戏诸艺之外，又如……八仙故事"，虽然我们不知那时杭州(武林)流行的八仙故事的内容，但推测它与后来

的传说当有着渊源关系。

要考察八仙集团的形成，比较可靠的文字资料还是元代的杂剧。现存有关八仙的元杂剧，可考知写作年代的，最早的是马致远的《黄粱梦》和《三醉岳阳楼》，后一剧第四折中还罗列了八仙的姓名：

> 这一个是汉钟离现掌着群仙箓，这一个是铁拐李发乱梳，这一个是蓝采和板撒云阳木，这一个是张果老赵州桥倒骑驴，这一个是徐神翁身背着葫芦，这一个是韩湘子、韩愈的亲侄，这一个是曹国舅、宋朝的眷属；则我是吕纯阳，爱打的简子愚鼓。

清人梁延枬在《曲话》中说："元人杂剧多演吕仙度世事，……其第四折，必于省悟之后，作列仙出场，现身指点，因将群仙名籍数说一过，此岳伯川之《铁拐李》、范子安之《竹叶舟》诸剧皆然，非独《岳阳楼》、《城南柳》两种也。"产生剧末八仙出场、现身指点这种格式的现象，说明了当时八仙故事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八仙形象很受观众的喜爱。

但是，从元杂剧中所数说的"群仙名籍"来考查，可以发现各剧中八仙的姓氏是不一致的。如：马致远的《岳阳楼》中没有何仙姑而有徐神翁；岳伯川的《铁拐李》中没有徐神翁而有一个张四郎；范子安(康)的《竹叶舟》中却没有徐神翁或张四郎而第一次出现了何仙姑；到元末明初谷子敬的《城南柳》中，却有何仙姑、徐神翁而无曹国舅。明初朱有燉的《八仙庆寿》中，也是有徐神翁而无何仙姑；朱有燉另有一个杂剧《吕洞宾花月神仙会》、里面插演了一段院本叫《长寿仙献香添寿》，其中出现了十个仙人；八仙中除何仙姑没有外，其余七仙都有，另三仙是白玉蟾、东方朔、徐神翁。实际上也就是八仙(包括徐神翁)外加两仙。

综观上面所举从元初到明初的几种杂剧，只有元初范子安《竹叶舟》中的八仙完全与明以后所传的八仙姓氏相符。到明代教坊编演本《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便继承了《竹叶舟》中八仙的全班人马(包括何仙姑)；以后汤显祖的传奇《邯郸梦》中的八仙，也是沿用《竹叶舟》中的八仙而来。由此可见，现在民间流传的这个八仙班子的形成，最早的文字根据应该是元代范子安的杂剧《竹叶舟》。

从这里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有关八仙的元杂剧中都没有何仙姑，而在《竹叶舟》中却突然出现了一个何仙姑呢？我想，也许当时民间传说的八仙中原是没有何仙姑的，这一点，现存的永乐宫纯阳殿元代壁画《八仙过海》中也是八个男仙而没有何仙姑，便是有力的物证。范子安将徐神翁换成一个女仙，可能是从舞台演出的角度来考虑的，是他的创举。因此，明代的教坊编演本及以后的戏剧家们便都沿用何仙姑代替徐神翁，而使之固定下来了。

在八仙集团的形成到固定的过程中，八仙本身还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如钟离权，因他自称"天下都有散汉"，传说中竟把"汉"字割裂开来当作朝代看，因而傅会出一个"汉钟离"来。蓝采和的形象变化更大，首先是他的出身有了变化，朱有燉(1379—1439)的杂剧《紫阳仙三度常椿寿》中，开始出现"蓝采和是乐探官员"的说法；在《瑶池会八仙庆寿》中，也说他是个"乐官"，还说要他到勾栏里去做院本。后来，汤显祖的传奇《邯郸梦·合仙》一折中，蓝采和的出身也就沿用了朱有燉的说法，称他"是个打院本乐户官身"。到了清初，甚至又由一个男仙变成女仙了。此后，这一人物在戏曲舞台上和民间传说中或男或女，是八仙中形象最不稳定的一个。他手持的道具，也由原来《续仙传》中描写的他行歌乞食用的"长三尺余"的"大拍板"，演变为曼舞轻歌用的"六扇(或八扇)云阳板"，然后又变成演剧唱曲用的"檀板"了。

到了明代中后期(大约1566年前后)，吴元泰以有关八仙的民间故事和杂剧、说话等为素材，写出了通俗小说《八仙出处东游记》，

又名叫《上洞八仙传》。从此，八仙故事的影响更加扩大了。在明、清文人的笔记、小说中关于八仙出身的记述很多，众说纷纭，但大都查无实据，这里就不必详叙了。

赵翼诗中对八仙形成过程作了这样的概括："把他多少古仙人，乱点鸳鸯集冠帔。"这一见解是十分精辟的。如前所述，所谓八仙，不过是把古代传说中一些互不相干的神仙，乱点鸳鸯、牵强傅会而成的一个"拼盘"而已。不过，赵翼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八仙；若从神话创作的角度来看，八仙故事能流传数百年之久而不衰，可见民间文艺生命力之强，它丰富的想象力，至今还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美感的享受。可以预卜，它还将继续流传下去。

吕洞宾及其信仰的形成

吕洞宾信仰在中国源远流长，影响广泛。在旧中国，人们对他的信仰往往超过了对佛教、道教等正统宗教的信仰，但对于吕洞宾是否真有其人，他的信仰是怎样形成的，后来又怎样成为道教神仙，人们却并不清楚。其实宗教只不过是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扭曲了的反映，神是人创造的。

或许是由于尚征实的史官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人造神往往皆有所出，大多是先有其人再有其神话，古代的神话传说如此，后来的神仙故事也还是如此，所以大概可以相信吕洞宾确有其人。但是关于吕洞宾其人的时代，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说他是唐太宗时人，最迟说他是唐僖宗时人，一般道教典籍都说他生在唐德宗贞元中。这些说法多不可信。

关于吕洞宾人物传说的记载很多，最早见于北宋初年，如杨亿《谈苑》就说：

> 吕洞宾者，多游人间，颇有见之者。丁谓通判饶州日，洞宾往见之，语谓曰："君状貌颇似李德裕，它日富贵，皆如之。"谓咸平初与予言其事，谓今已执政。张洎家居，忽外有一隐士通谒，乃洞宾名姓，洎倒履见之。洞宾自言吕谓之后，渭四子，温、恭、谦、让，让终海州刺史，洞宾系出海州房。让所任官，《唐书》不载。……洞宾诗什，人间多传写。（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三）

杨亿所记是生前的见闻，他和丁谓、张洎都是宋初的名臣。此外，《宋朝事实类苑》记陈抟时说："关中吕洞宾者，有剑术，年百余岁，貌如婴儿，行步轻疾，皆尝至抟斋中。"（同上，卷四十一）《宋史》陈抟传也有相同的记载。修道者多夸其年岁，年百余岁似不可信，但可知吕洞宾北宋初尚在，而且已经被传为神仙了。

根据《谈苑》所记和一些其他的材料，吕洞宾大概确出河东吕氏，为吕渭之后，是五代时一个以剑术著名的江湖术士，因兼有道术而于宋初传为神仙。

如上所述，吕洞宾大约为五代时人。然而在众多的传说中，却说他是唐代人，而且说法不一，迷离恍惚，以至我们很难搞清他的真实事迹。这些传说是如何形成的呢？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引《雅言系述》说："吕洞宾传云：'关右人，咸通初举进士不第，值巢贼为梗，携家隐居终南，学老子法'云。以此知洞宾乃唐末人。"此说是北宋末以吕洞宾为唐末人的诸多传说之一。另有《阳风土记》说他"会昌中两举进士不第"；《墨庄漫录》说他是"唐僖宗时进士"；《集仙传》则说："吕岩字洞宾，又字希圣，九江人也。"大概北宋末关于吕洞宾姓名、籍贯、时代的说法是很多的。关于吕洞宾的得道过程，传说中也是多种多样的，或两举进士不第，或三举不第；或隐华山，或隐庐山，或隐终南；或遇苦竹真人，或遇火龙真君，或遇钟离权。诸多传说中以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钟离权"条最为典型："后有唐进士吕绍先屡举不第，纵游天下，首于庐山遇火龙真人传剑法，后于长安道中遇真人。……真人临去，谓绍先曰：

'尔即到此，从吾奉道，今子当名嵒字洞宾。'”他大概综合了宋代流传的几种不同的说法。

《能改斋漫录》卷十八又说：

> 吕洞宾尝自传，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举进士不第，因游华山，遇钟离传金丹大药之方，复遇苦行真人，方能驱使鬼神，再遇钟离，尽获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灶，第二度赵仙姑。……吾惟是风清月白，神仙聚会之时，常游两浙、汴京、谯郡，尝著白筋角带，右眼下有一痣，如人间使者筋头大。世传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闻哂之。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色欲，是吾之剑也。……

根据一些史料，可推知此碑约出现于宋徽宗时或更晚，是好道者所为。综合上述情况，基本可以认为：大致在北宋中期出现了以吕洞宾为吕渭之孙的传说，使吕洞宾成了唐代人；各种传说又纷纷对吕洞宾为唐代人之说加以解释，这样就在北宋后期出现了有关吕洞宾来历的许多不同说法。上引"自传"对吕洞宾的籍贯、时代、履历、传授、弟子、形象、行为、说教，都做了总结，语气中颇有匡谬正误的意思，所以在这个自传碑出现以后，关于吕洞宾的传说就逐渐统一起来，对于吕洞宾唐代人的说法也固定下来。

唐宋人好神怪之说，所传神仙之众，不可胜记，然多限于一时一事，唯吕洞宾自宋初以降，历朝显化，屡现灵异，传为故事，详载诸书。何以吕洞宾的神仙故事能如此流传，形成信仰，而且久盛不衰呢？寻其原因，大概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深刻的社会根源，二是吕洞宾传说和信仰的广泛的人民性。

吕洞宾的传说和信仰，都出现和形成于北宋。北宋一代，社会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此起彼伏。到了徽宗时，大地主官僚对土地的掠夺变本加厉，财政上入不敷出，官俸、粮饷、岁币、军备、皇室的奢豪，各种开支都由劳动人民负担，人民生活的苦状可以想见。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激化，使社会上的部分人都只好遁入空门、寻求宗教上的精神慰藉。这大概就是北宋时期宗教气氛日益高涨的社会原因。

然而北宋时期，佛教和道教都日益趋于腐化堕落，社会上的奢靡颓风亦渗入其中。神宗之后出售度牒，以至售紫衣和大师衣号，使僧侣道士的数量竟达百万以上。《宋会要》"道释"云：

> 尚书省言，近年僧徒猥侈，寺院填溢，冗滥奸蠹，其势日甚。诸州每年经试，其就试者率不过三四十人，经业往往不通，州郡姑息，惟务足额，盖给降度牒，许人进纳，官中旧价百二十贯，民间止卖三十千，稍能营图，便行披剃。

度牒之蔽，导致了宗教教团的极大混乱。大量没有文化，不懂修行戒律，甚至市进无赖，嚣顽不法之徒通过买度牒混入教团，使一些寺观竟成了作恶巢穴。

由于佛、道两教的腐败和堕落为人民所唾弃，从而失掉了广大民众的信仰基础。广大民众为了弥补精神上的空虚，不得不另寻出路，于是，民间的各种信仰也就从此兴盛起来。吕洞宾信仰就是其中之一。

宋代关于吕洞宾的神仙故事，多在民间流传，传说中的吕洞宾，或为道士，或为贫人，或为乞丐，或为匠人，或为卖药老翁，和他打交道的，也多是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大体说来，吕洞宾的传说故事有以下几类：

第一，救助贫人。如"傅道人"的故事（《夷坚志》补卷第十二）讲的是江陵傅氏家贫，以鬻纸为业，但喜欢结交道士，并塑吕翁像供奉，吕洞宾化做一方巾布袍人为其医眼疾，并书"利市和合"四字付贴于壁，自此生意日隆。又如"曹三香"的故事（《夷坚志》补卷第十二），吕化为一个贫寒的书生为娼女治恶疾。

另有一些宣传善待穷人的。如"石氏女"

的故事(《夷坚甲志》卷一)讲的是石氏女开茶店,吕化为一病癞丐者索饮,女敬而与之,后来终于富贵长寿。

贫苦无告的人民得不物质的解放,只能以精神上的满足来麻醉自己,这样的故事正是穷苦人民希望有人救助,改变自己苦难处境的愿望的反映。

第二,惩戒恶人。吕洞宾传说中,有许多是讽刺和打击官僚、地主、商贾、仗势欺人的看门人的。如"神霄宫商人"(《夷坚乙志》卷十九),说吕洞宾化为一商人至神霄宫,"语阍者:'我欲见知宫",时道教尊重,出入门皆有厉禁,阍者索姓白名及刺谒,此人不与,纷争良久,捽阍于地,殴之,径入户。"这里反映了人们对道教的藐视态度,以及对道士骄横的愤慨。又如"吕元圭"(《夷坚志》补卷第十二),对一个小官吏的横暴进行揭露和诅咒。"华亭道人"(同上),讽刺了一个商人的贪得无厌。这些都是符合社会下层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

第三,封建道德说教。孝敬父母,与人为善,诚实无欺,始终是劳动人民的道德要求,在封建社会中更是如此。吕洞宾的传说故事中,也包含了这类说教。如《庚溪诗话》中,记阆中一杨姓士人,家贫而事亲耆,吕洞宾化为回道士至其家,点小石为金赠之,并题诗于壁:"杨君真悫士,孝行动穹壤,上帝怜其勤,七夕遣回往……。"又如"文思亲事官"(同上),记赵某患瘰疬不可疗,吕洞宾因其"濒死念母,一言起孝",化为道士救之。其他故事中,吕洞宾化为贫道士、寒士、丐者,优游出没于人世间,报善罚恶,不一而足。这些故事都和老百姓的道德要求相一致,所以为他们所津津乐道。

后代所传的吕洞宾传说中,都谈到他要"度尽天下众生方上升未晚也"(《吕祖志》)卷一,真人本传)。自己修成神仙,但不愿上升仙界,要度尽天下众生,使所有的人都成仙,这对于那些希望"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的人民当然具有绝大的吸引力。所以说,吕洞宾的传说有着广泛的人民性和较深的社会基础,这在北宋征剑无度,剥削严苛,百姓生计断绝,生活痛苦的社会中,总还可以给受压迫的人民带来一点渺茫的希望,所以吕洞宾信仰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必然性。

北宋初吕洞宾既已传为神仙,大约在仁宗时,就有人开始将他绘像供奉,并偶有为之立祠造像者。据《夷坚志》记载,吕洞宾信仰多挂其图形或塑其像于这中供养,信奉者多为商贩市民。大概在北宋末南宋初吕洞宾信仰就已经十分普遍了。

金代中国北方兴起的全真教,最初并没有把钟离权、吕洞宾做为自己的祖师。金真教的创始人王喆,一直以会通儒、释、道三教来标榜其宗旨,直到他死前一、二年,还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平等会"等宗教组织。由于此时的全真教具有很强的民间宗教的性质,它把宋代遗民组织起来,形成了对金朝统治者的威胁,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猜忌,终于在王喆死后二十年,金明昌元年(1190)年,遭到章宗的明令禁止。虽说这个禁令没有对全真教起太大的作用,但必竟是一个警告,所以全真教为了有所依傍,借用当时钟离权、吕洞宾信仰的普遍影响,开始在传承上祖述钟、吕、以成为道教正宗,于是渐渐得到了统治者的承认。后来由于丘处机会见成吉思汗,全真教得到元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全真教达到了历史上的全盛时期。随着全真教的极盛,被作为全真教教主的吕洞宾信仰,其影响也就更为深远了。

财神的来历

大凡从旧中国过来的人,没有谁不知道赵公元帅赵公明的。即便现在,喜欢翻翻旧小说或者看过《封神演义》的人,大概也会记

得那位玄坛真君。所谓赵公明、玄坛真君，就是中国古代诸神中重要的一位——财神爷。

自从有了私有制，有了商品，发财的念头就在人们的心中悄悄埋下了根。但是，在民风淳朴，以节俭为尚的封建理想社会模式里，发财的念头又是不大光彩似的，颇为人所鄙薄。中国人历来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君子是应该自甘淡泊、安于贫困的；所以，一直到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财神爷才开始在中国出现。

不过，赵公明这个神界人物，并不是迟至明代才被创造出来，他的前身，是一位人们躲之唯恐不及的冥神、瘟神。晋代干宝《搜神记》说，有一位散骑侍郎王佑临终前正与老母辞诀，忽听有人来访，此人声称今年国家有大事，上天派三位将军到人间征兵，自己是赵公明将军的属下，见王祐屋室高大，故前来招兵买马。王祐见是冥界来招，想到自己一死，老母无人照顾，心中十分感伤。这位鬼官得知便到赵公明那里为他求情，又替王祐治了病。后来，那位鬼官说过要召的其他人，一个个都死了，王祐这才想起当初流传的妖书说："上帝派遣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率数鬼到世间取人。"这就是说，赵公明在晋代便出现了，不过，这时的赵公明和财神一点儿也不沾边，只不过是上帝手下的一员大将，专司冥间职事，是勾取人命的。陶弘景《真诰》一书中也说他"司土下冢中事"。

到隋唐时期，赵公明的权力又增大一些，成为"瘟神"。据说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六月，人们在天空中看见五位力士，身披五色袍，手中各持一、两件器物。隋文帝问太史张居仁这是什么神，主什么灾福。张奏曰："这是五方力士，在天为五鬼，在地为五瘟。这五瘟是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士贵，总管中瘟史文业。这几位神一出现，就要发生瘟疫了。"果然这一年瘟疫流行，死了很多人。于是，隋文帝便为五神立祠，并封他们为将军，这赵公明便是五神之一。隋唐两代人们深受五神之害，故每年五月五日都要祭祀他们，祈求他们别来人间作祟(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自此，赵公明头上就有了名正言顺的将军头衔。

赵公明的形象在明代以前，都是作为死神与瘟神在道教中以及民间流传着的。即使在明代，他的本来面目也并没有彻底改变，如《列仙全传》中就说他为八部鬼帅之一，专行下痢，虐毒啸祸，暴杀万民，祸害人间。到了明代，赵公明开始逐渐摆脱他那令人厌恶，恐惧的面目。《历代神仙通鉴》卷九说，张天师在灵奇山上炼九天神丹，一天，来了位铁面虬髯，身着皂幞、手执金鞭、骑着黑虎的神人，自称"赵公明愿意永远为您守护丹炉"。自此，赵公明便摇身一变，不再当什么死神、瘟神了，而换上了涂改一新的光辉历史：说赵公明原是终南山人，秦时避世修行于山中，功成之后被玉帝降旨召为"神霄副帅"，他头戴铁冠，手执铁鞭，面色黝黑，一脸大胡须，身跨老虎。赵公明的职责也颇多，他上奉天门之令，策役三界，巡察五方，提点九州，为直殿大将军，兼北极侍御史。当初张天师修炼仙丹时，龙神曾奏请玉帝，请求派一位威猛神吏为天师守护仙炉，于是，玉帝便委派赵公明前去充担重任，封他为"正一玄坛元帅"。这就是赵公明又称作赵玄坛、赵公元帅的来历了。后来，张天师升天做了"正一真人三天法师"，赵公明便永镇龙虎名山，专管人间那些趋善、谢功、谢过之人以及顽冥不化的人。在他的手下，还有许许多多神将。经过这一番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赵公明成了能驱雷役电、呼风唤雪，制止瘟疫、治病消灾的善神，谁有冤枉不平之事，他可为之主持公道；谁想做买卖求财，他能帮忙赢利调合，等等。于是，赵公明有了"财神"的头衔(见《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

在赵公明成为财神的初期，知名度并不高，他是靠了明代通俗小说《封神演义》的大肆渲染描绘，才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的。

在《封神演义》中，赵公明原本是峨嵋山罗浮洞中的一位仙人，被商纣王太师闻仲请去助商抗周。赵公明法力无边，曾把姜子牙打得死去活来，后姜子牙在岐山设起一坛，束了个稻草人，上书赵公明三字，焚符念咒，到了第二十一日，姜子牙取来桑弓桃箭，先射草人左目，再射右目，又射心窝一箭，终将赵公明射杀。姜子牙灭商后，在封神台上封神，也封给赵公明一个神位：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他的职责是率领部下四位正神，迎祥纳福，追逃捕亡。赵公明手下的四位正神是：招宝天尊曹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赵公明的职守为“迎祥纳福”，他的部下为“招宝”、“纳珍”、“招财”、“利市”。赵公明成了名副其实的财神，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古代人们信奉的财神最有名的就是赵公元帅，然而财神不唯赵公明一个，还有所谓“五显神”、“五通神”、“五圣神”、“五路神”、“五盗将军”、“利市仙官”、“金元六总管”、“金元七总管”等等，他们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受到不同的信奉与崇拜。有意思的是，这些神与赵公明的名目有异，受人信奉的程度也大有差别，但他们在成为财神之前，差不多全是一帮凶神恶鬼，就是说，他们都有相似的演讲历史。为什么财神都是由凶神发展而来，这是偶然的巧合吗？看来不是，这恐怕多少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财”、“利”的轻视与蔑视，所以就连造神，也觉得正儿八经的神是不会去干什么发财赚钱之类卑琐的事的，因而只好挑选那些有劣迹的神去充当了。

赵公明以及其他的几位财神，做神的历史都挺长，但真正成为财神，却全是在明代，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明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在这时，中国千百年的封建大厦面临着新的经济因素的强烈冲击，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迅速地撕毁了封建尊卑等级社会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引起社会风气等一系列变化，“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金令司天，钱神卓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二引《歙县风土论》），真正是一种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纷乱局面。在这样一场泥沙俱下的时代洪流里，“君子讳言利，君子不言钱”、“小人喻于利”、以经商为耻等传统观念动摇了。言利在明代终于不再为人耻笑，并形成了社会风气变化的一个标志。这种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所带来的现象，就是财神爷出现在明代的真正原因，也是更深层的原因。这一点，从财神爷出现的地区也可以得到印证。财神爷在神州大地上出现的情况很不平衡，它主要出现在商业经济最发达的南方沿海地区和大都市，而在民风依然古朴纯厚的黄土高原则并不流行。

财神的诞生即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反映了在封建经济的强大压力下，商人处境的艰难和内心的怯懦。商人就要讲发财，然而，这种发财，尽管是正当的合理的发财，在当时也是得不到保护的，更何况经商本身就带有极大的冒险性，所以他们只有求助于神灵，创造出一位属于自己的财神。就这样，赵公明等具有很大法力、又十分残暴的神，就经过一番改头换面坐上了财神的宝座。

历 史 故 事

老 子 说 经

老子是个神奇人物,三言两语说不清楚。道家学者称他为老子,或者直呼其名,叫他李耳、李聃、藏家史;

道教信徒称他为老君、太上老君,至李唐王朝,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宋真宗还封他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学者只把他看成春秋时代的道家创始人;

信徒则把他视为混纯初开的道教祖师爷;

学者认为他是善于思辩的哲学家。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

信徒认为他是替天行道的活神仙,母吞流星而孕,72年后破腋而生,大耳朵巨人,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

总之,众说纷纭。

既然说不清,道不明,也就不再分辩。下面讲点历史与传说兼而有之的事儿。

大概是老子多少有些卓异之处吧,反正是周王朝任命他作了藏室史。这是一个管理国家档案文献的机关,身为这个类似皇家图书馆馆长的官员,老子有机会长时间泡在那里博览群书。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结晶,就收藏这个丰富的宝库里面。老子在这个宝库时勤奋探宝,不舍昼夜。照耀人类历史的思想巨星,就在这里冉冉升起来了。

这颗思想巨星,为后人初步揭示了宇宙本源:元气生成说。天下万事万物,都是从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元气中孽生出来的。这就是自然规律,就是天道。

天道既明。老子自然成了圣人。不过,学者更注意于孔子问道,信徒更热衷于老子骑牛。这里有两个故事。

老子的学问越来越深,老子的名气越来越大。泰山脚下的另一位圣人孔夫子坐不住了,他要来向老子请教。他坐了一辆马车,由贤弟子子贡驾驶,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洛邑。

马车停在了老子的家门外边,孔子在子贡的搀扶下走下车来。尽管一路劳累,可是,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老子这位大宗师,孔子又显得格外兴奋,于是毕恭毕敬地走了进去。

与老子这位哲人相比,实话说,孔夫子更象一位牧师。他关心的只是人类伦理规范,而老子思考的是宇宙变化规律。两圣相遇,难免牛头不对马嘴。

一阵寒喧之后,孔子把话题引到了仁义礼法上面。老子把身子向后一仰,叹了口气说:

“嗨,你所宣扬的那一套,其人其说,统统都是腐朽不甚的,只剩下一点鸡毛蒜皮了。

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日月不言而自明。星辰有列，人兽有别，何必用得着仁义礼法呢？我只听说，精明的商人是从不轻易显示自己的财宝的，美德的君子反而装出谦退愚蠢的样子。不是我批评你，你应该去掉身上的骄气与淫气，这些东西，只对你的身心有害。有钱的人用财物送人，有道德的人用良言赠人。我要告诉你的，也就只能是这些了。"

一番话，说得孔子张口结舌。

在回鲁国的路上，一连三日，孔子缄口不语。子贡忍不住了，便问："夫子以为老子到底如何？"

孔子慢慢地说："天上的鸟，我知道它能飞；水下的鱼，我知道它能游；山中的野兽，我知道它能跑。但是，会跑的逃不过陷阱，会游的逃不过钓钩，会飞的逃不过弓箭。至于龙呢，我就说不明白了，只知道他能乘风云而上九天。我现在见到了老子，他大概就是龙吧！"

老子看到周朝的统治一天天衰落下去，便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骑着一头青色的公牛，悄悄向西边方向走了。

青牛健步如飞，只一夜功夫，便驮着老子来到了函谷关。镇守关口的官员名叫尹喜，也是一位隐德修行的有道之士。这天清早，他突然看到一团紫气自东向西而来，状如龙蛇，心知真人降临，便亲自守住了关口。

不多时，老子骑着青牛悠哉游哉地过来了，尹喜见此人鹤发童颜，神彩飘逸，立即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把老子迎进署内。待老子坐定，尹喜口齿清晰地说道：

"真人降临，蓬荜生辉。看来，真人是打算就此隐遁了吧？果真如此，请真人传授天机，我要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老子心想，此人能认出我来，想必也不是寻常之辈，且试他一试。于是，故意讥讽道：

"小小关尹，你有何德何能，也想得我天机！"

尹喜毫不在意，神色自若地说："我也无德，我也无能。不过，君子有德而不自居，他行动起来象流水一样自然，他安静下来象镜子一样沉稳，他随机应变时就象声音的回声一样迅速。他虚怀若谷，毫无私欲。我还听说，用则和，守则失，只有庸人才患得患失呢！"

老子听完，哈哈大笑，连声说："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尹喜乘机说："此处嘈杂，俗务又多，不如陪真人找个清静的地方，听你讲经布道。"

老子连连称善，于是，二人来到秦岭脚下，结庐而居，筑台讲经。从此，朝阳中，月色下，老子谈玄说奥，侃侃而谈，滔滔不绝：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合，先后相随，恒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这些玄妙深奥的天机，老子说得头头是道，尹喜听得津津有味。老子本想说了就拉倒，后来经不住尹喜一再劝说，便把这些天来的谈话写成了5000字的韵文，交给尹喜，骑上青牛，到西方昆仑山去了。

而道教信徒们则坚持认为，老子不仅留下了这部5000字的《道德真经》，还给尹喜传授了道符，炼造了神丹，一起飞升上天，老子作了太上老君，尹喜作了无上真人。庐观说经台至今还在，《道德真经》碑仍然挺立。

徐福东渡

避秦男女渡三千，
海外蓬瀛别有天。
镜玺永传笠缝殿，
尚疑世系出神仙。

清·黄遵宪《日本杂事诗》

徐福入海不归，东至日本，历代传说如此。现在，又在中日学术界中，形成初步共识了。

个人的学术考证且不必多管，只把那当年的动人故事细说一遍。

春秋战国时代，燕齐一带(包括现在的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半岛)盛传海中仙山之说。传者传得维妙维肖，声称目睹仙山琼阁的人，成百上千。用现代科学知识解释，那就是海市蜃楼，是太阳光与空中水气的一种变化反应。可是古人不知道呀，加上当时迷信思想又重，于是就产生了海上神仙之说。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先后派人入海求仙，结果都是一无所获。

秦始皇扫平六合，统一了中国。可是，他严刑峻法，防民如贼。在供他射猎的大苑中，关押了许多无辜百姓，他们一批批地被毒打致死了，暴尸于野，无人掩埋。这时候，天上飞来了无数小鸟，每只小鸟嘴中，都衔有一枚青草。它们把青草放在死人脸上，不久，死人一个个都活了过来。于是，消息层层上报。秦始皇得知此事，便询问身边的方士，方士们请教了 500 岁的神人鬼谷先生。鬼谷先生说："东海中有十洲，叫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光生洲、凤麟洲、聚窟洲。这种青草叫祖洲不死草，也叫养神芝，一株可以救活千人。活人服之，则可以长生不老。"

秦始皇心想：吕不韦只要求我如何抑制情感，节制欲望，也不过是养生长寿，清苦得很。现在简单了，只要找到这种长生不死草，我可以长生不老了。这样，不就可以永坐江山、长保富贵了吗？于是，他立刻下令，派遣方士远出东海，寻找仙鸟、仙药。

可是，信口胡诌是容易，真正去做却很难，一批又一批的方士派出去了，有的遭遇风浪，船翻人沉；有的遭遇鲨鲸，葬身鱼腹；有的侥幸逃回，却又被皇始皇杀了头。

秦始皇亲自出马了。皇舆浩浩荡荡向东海挺进。到了目的地，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秦始皇传令，一面修造楼船，一面搜罗方士。

没多久，船造成了，人也找到了。这人便是本篇主人公——徐福。

徐福世居齐国，因为不满秦朝暴政，所以不曾入仕做官，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闲暇时候，他也看些道家神仙之书，远近也还有些名气，因此被人推荐给了官府。徐福早就听说了那些入海求仙方士们的遭遇，心里很害怕，可是又推脱不掉，只好硬着头皮去见秦始皇。

这段日子，秦始皇耽搁在齐国，每天到海边祭神，企图招致仙人，也极想看看海上仙山。可是，神仙没有出现，海市蜃楼也没有出现。因此，他变得更加暴躁，一见徐福，便命令他次日启程，务必要找到仙山、仙人、仙药。

第二天一大早，徐福带着一帮人匆匆出海了。经过十几天的簸荡，楼船来到了东海深处。可是，一连十几天，徐福什么也没有找到，头上是天，脚下是海，除了天就是海，连个岛屿的影子也没有。徐福急得直跺脚，他想：再这样飘泊下去，船上就要断水绝粮了！再不回去，就是等死了；回去吧，不是送死吗？怎么办？徐福束手无策，躺在船上，翻过来，倒过去，什么主意也没有。

第二天黎明，徐福来到船边，海风吹荡，海浪起伏，徐福的心也随之七上八下。这时，东边海面，一轮红日正喷薄欲出，朝霞映红了半边天空。徐福的心情也为之开朗起来。就在红太阳跳出水面的那一瞬间，他心中一动，一个念头闪现出来。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他召来船上所有人员，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接下来，徐福下令：

"掉转船头，回去！"

海岸上，每天都有官员守候楼船的归来。这天下午，人们远远望见楼船，立即报告了秦始皇。秦始皇马上离开行宫，赶到岸边。待楼船靠岸，徐福下得船来，向秦始皇叩道汇

报：

“陛下，小民此次出海，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一天深夜见到了仙人。仙人问：‘来者何人？’小民答：‘大秦小民徐福。’仙人又问：‘来有何事？’小民答：‘寻访十洲仙山，采长生不死之药。’仙人问：‘礼物何在？’小民答：‘临行仓促，未及采办。’仙人说：‘谅你初次不懂规矩，又不辞劳苦，权且带你到蓬莱仙山一游。不过，要采仙药，下次用礼品来换。’于是，小民便到了仙山。只见山上琼楼玉宇，金碧辉煌。其中一殿，高50丈，广100丈，全用不死草作成，号称灵芝宫。小民本来疲惫已极，可是，一进灵芝宫，吸进那清香的气味，顿时神清目爽，体力倍增……

秦始皇早已心花怒放，不待徐福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行了，行了，你快说，仙人要什么礼品？”

徐福答道：“仙人要童男三千、童女三千，其他各色工匠、五谷杂粮、诸子百家之书，凡是人间日用之物，无所不包，多多益善。仙人答应兑换一万株长生不死草。”

秦始皇喜不自禁，立即下令犒赏徐福一行，又派遣文武百官分赴各地，选求金童玉女以及其他仙人所需之物。徐福等人则乘着空闲，回到家里，把父母妻儿接到身边，准备随船入海。

一个月后，万事俱备。不想，临行前又出了一件大事，险些儿打破了徐福的如意算盘。

原来，秦始皇求仙心切，意然提出要亲自出海，到海外十洲去周游考察一番。徐福死命劝阻，把海上的风波之险描绘得阴森恐怖，什么飓风呀，鲨鱼呀、暗礁呀，……吓得秦始皇只好作罢，徐福这才松了一口气。

到了那一天，十艘高大结实的崭新楼船，迎着风浪，扬帆起航了。船头，徐福领着家人，面对大陆，齐刷刷地跪下，三跪九拜，热泪长流。他心里默念着：“别了，祖国！别了，故乡！”

船头直指太阳升起的方向，疾速前进。驶至大海深处，徐福下令停航，命令船靠拢，然后放开喉咙，大声宣布：

“乡亲们！皇上残暴，鱼肉百姓，为了寻求海上仙山，他不知耗费了多少财力，不知滥杀了多少无辜！徐福这次出海，并不是去找什么长生不死药的，这些神仙之说，统统都是鬼话！大家既然上了船，就必须同舟共济。回去是死路一条，咱们要自求活路！我相信，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只要认准一个方向，总会有块立足之地的！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士农工商，应有尽有，我们可以去创造一个崭新的生活天地！”

众人一听，无不欢呼雀跃，立即响应：

“我们听你的！”

“我们要走得越远越好！”

“好！”徐福兴奋地喊道：“现在，每船推举一个头领，负责各船的指挥。女人们分两组，一组烧火做饭，一组照顾小孩；男人们分两组，一组掌舵划船，一组寻找陆地。”就这样，徐福率领十艘楼船，在海上不知航行了多少个昼夜，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一个孤岛。于是，大家欣喜若狂地奔上岸去，在那里安营扎寨，男耕女织，繁衍生息。

据说，他们就是今天的日本人的祖先。现在，日本有很多徐福祠，新宫熊归山上，还有徐福的墓呢，每年，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要前去祭拜这位勇敢、聪明的航海家。

蓬莱岩下已荒莱，
漠漠平畴土一堆。
二千年后吾游此，
不见仙人采药回。

清·黎庶昌《凭吊新宫徐福墓》

秦始皇之死

由于求仙不成，所以秦始皇十分暴躁，稍不如他的意，他就要杀人。他身边的方士卢生、候生，整日生活在恐怖之中。

一天，卢生对侯生说："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我俩侍奉皇上，是个朝不保夕的苦差事啊！真不知道哪天惹恼了他，咱们的脑袋就得搬家了！"

侯生一听，满面愁容："那你说怎么办？"

卢生说："办法倒有，但你得听我的，一起行动。"

侯生一口答应："行，你点子多，我听你的！"

卢生便如此这般地向侯生耳语了好一阵子。

过了几天，卢生找个机会，对秦始皇说："陛下年年求仙，次次不成，以臣愚见，肯定是有什么事得罪了神仙，因此处处遇到麻烦。是不是神仙喜欢安静，不爱吵闹呢？要不然，他们怎么总是生活在天外，出没在夜间呢？"说到这里，他故意停了下来，观察秦始皇的反应。

秦始皇沉思片刻，说道："有道理。你说下去。"

卢生见状，接着说："今后，陛下最好是独居一处，不令外人得知。每日静心等待，这样，神仙肯定会被陛下的诚心所感动，一个接一个地来会见陛下的。"

秦始皇马上同意，不过，他又怕寂寞孤单，便这样说："总住在一个地方，太枯躁，还是把朕的所有行宫统统连接起来，朕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往来移动，外人也看不见了。"

此言一出，举国上下，征用役夫，调用财力，很快便把咸阳周围几百里内的270座行宫，用连绵不断的走廊连为一体。工程结束，卢生、侯生一起去见秦始皇，说道："神仙只与尊贵的人交往，臣等凡庸之辈，无缘拜见仙人，也应当居于别处。陛下若有什么事，臣等召之即来。"

秦始皇把手一挥，说："去吧！"

就这样，卢生、侯生便象处处樊笼的小鸟，一旦逃出，便头也不回地远走高飞了。

秦始皇得知消息，恨得咬牙切齿，大骂："仙人请不来，仙药找不到，卢生、侯生竟敢逃之夭夭！可见这些可恶的方士都在戏弄于朕。来人！把城里的方士给我统统活埋了！"

第二天，咸阳城外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坑，460多个方士，还有一些别的书生，一齐遭到活埋。

卢生、侯生无比悲愤，于是合计了一个报复秦始皇的办法。在这方面，方士们不愁没有拿手好戏。

当时，卢生、侯生逃命的地方，正好落下了一块陨石，他们就在陨石上刻了几个字：

"始皇帝死而地分。"

这条咒语很快传到了朝廷。秦始皇大发雷霆，立即派人追查。卢生、侯生早已转移，秦始皇没有查到造谣者，便把陨石降落点附近的村庄血末了一遍。还不解恨，他又命人把陨石放进大火中烧得粉碎。他生平最忌讳死，所以才追求长生不老的仙药。现在，仙药求不到，咒语却自天而降，他怎能不愤怒呢？想来想去，他想出一个避邪的办法：从此以后，不再称"朕"，而自称"真人"，又命令博士们写了许多仙真人诗，传令乐工谱曲歌唱，企图借以驱除不祥。

过了不久，卢生、侯生又把一块玉璧丢到大路上。玉璧被行人捡到，又在上面看到一行字：

"今年祖龙死。"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又让秦始皇听到了。这次，他没有发怒，而是吓得脸色苍白，半天没说出一个字。过了许久，他才喃喃自语："鬼神只讲当年事。现在是秋天了，想个办法，或者可以躲过去呢。"

他身边的那些方士，跑的跑了，杀的杀了，他只好去求助于巫师。

城里的巫师早让卢生串通好了，秦始皇一连问了好几卦，卦上都说："游徒四海，避祸远灾。"

于是，秦始皇带着惊恐，带着祈求，满腹心事地离开了咸阳。他首先来到了云梦(今

湖北安陆)，祭拜虞舜。然后，他顺长江一路漂流，到了海褚(今安徽桐城)，经过丹阳(今江苏江宁)，到达铁塘(今杭州)。稍事休息，又赶渡浙江。当时，正赶上浙江潮汛，江水滔滔，声如雷鸣。秦始皇吓得双腿发抖，说什么也不敢渡江，只好顺着江岸，向西走了百余里地，才挑了一处平缓的江面渡过。

秦始皇这一路马不停蹄，四处奔走，心中又总是想着陨石上的咒语和玉璧上的谶言，加上这一吓，他就生出一身病来。生了病，又不敢停下来休息，生怕与卦言有冲突，引出不祥之事。就这样，带病上路，在江乘(今句容)渡海北上。船行海上，神志虚弱的秦始皇又作了一个恶梦，梦见自己与一个满身杀气的海神作战，被杀得大败。醒来之后，他的病势更重。到了河北平乡，秦始皇终于一命呜呼了。当时正是夏天，随从秘不发丧，尸体烂在车中，臭不可闻。

秦始皇误信方士，最终死在方士手下。一代霸主，落得如此下场。

张良与黄石公

张良字子房，本是韩国人，世代宦事韩王。秦始皇灭六国，张良一家只好避居江南。

张家那时血气方刚，立志为韩王报仇，他的弟弟去世了，他也顾不上安葬，尽出所有家产，暗中购求杀手，准备刺杀秦始皇。功夫不负苦心人，张良后来在江北一带找到了一位大力士，又为力士特地锻造了一付120斤的大铁椎。

不久，秦始皇东游，张良与大力士在博浪沙抛出铁椎。铁椎划出一条长长的孤线，流星赶月般地向皇舆击去。可惜，铁椎投偏一点，只是击偏了一点，只是击中了秦始皇的副车。秦始皇大怒，立即下令追捕刺客。张良只好改名换姓，逃亡到了下邳(今江苏睢宁)。

在下邳，张良遇到了一位异人，从此，便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这个原来只知单枪匹马冒险行刺的忠烈之士，由此成为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家。

一个风雪弥漫的黄昏，张良独自经过下邳的那座木桥。来到桥中间，他忽然看见一个老人斜坐桥边，头戴旧乌巾，身穿黄单衣，一动不动。张良心想：“这么冷的天气，老人家还不冻出病来?”于是走过去，轻轻叫道：“老人家，您怎么独自一人坐在这里?”

老人眼睛半睁半闭，古怪地一笑，脚一抖，把只烂布鞋弹到了桥底下。张良还没反应过来，老人不紧不慢地发话了：

“小子！下去捡起来!”

张良不解其故，只好踩着厚厚的积雪，跑到桥下，把鞋子捡了上来。

放下鞋子，张良正要离开，老人又开口了：“给我穿上呀!”

说着把脚丫子伸到了张良胸前。这时，张良越发感到奇怪，心里嘀咕：“这老头到底是什么人呢?”尽管如此，他还是跪下身子，神色恭敬地为老人穿好了鞋。老人站起身，拔脚就走。张良木然地站在桥上，不知所措。

老人走出里把路，复又折回，摸着张良冻得通红的脸，慈祥地笑道：“好，你这个孩子很不错，可以造就。五天以后的清早，你在这里来，我要传给你一些东西。”

张良心里十分惊奇，便答应了下来。

第五天早上，张良来到桥上，但老人早已坐到了那里。一见张良，他便发脾气了：“与长者相会而姗姗来迟，太不应该！你走吧，五天之后再来!”

五天过去了，张良又赶到桥上，可是，老人又比他早到，照旧生气，照旧扔给他那句话。

又是五天过去了，这天凌晨，张良气喘吁吁赶到桥边，一看老人还没来，心中好不高兴。他刚想坐下喘口气，背后传来朗朗的笑声：

"哈哈,精神可嘉,造化不坏呀!"

笑声未停,老人已出现在桥上。张良定眼望去,只见老人今天一身紫袍,气宇轩昂,神采奕奕,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于是,他毕恭毕敬地跪下,给老人行礼。老人亲热地扶起张良,从宽大的袍袖中摸出一卷黄绫,递给张良,说道:

"好好把这部书读通,日后一定会成为帝王之师的!"

张良展开书卷,上书四个大字:《太公兵法》,便郑重地放进怀中。

老人又说话了:"好了,我们就此分手吧!30年后,必有一见。谷城山下的那块大黄石头,就是我了。"

说完,忽然不见人影。张良心里一阵难受,含着眼泪回家去了。从此,他一心钻研《太公兵法》,朝吟夜诵,潜思默想。10年之后,张良已把兵书烂熟于心,成了当时独一无二的军事家。

也就在这时,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四方响应。沛县的刘邦也乘势拉起了队伍,张良便带着人马投奔了刘邦。这样,这位年轻的军师,运筹于帷幄之中,决战于千里之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辅佐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汉家天下。汉高祖登基,推许张良功居第一,位居司徒,受封留侯,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丞相。

可是,没过几年,张良忽然要抛弃一切荣华富贵,进山修道去了。他对高祖说:"臣根据《太公兵法》,以三寸之舌,为帝王之师,位列侯,封万户,作为一介布衣,这已经是达到顶峰了。从军之初,也只为韩国报仇。现在,暴秦已灭,张良该知足了。臣已决计舍弃人世的事情,追随仙人赤松子,学辟谷导引之术,以求长生不老。"

高祖十分奇怪,连忙问道:"你这是怎么了,放着高官厚禄不要,修的哪门子道呀?"

这样,张良执意要走,高祖坚决不放,最后,张良只好直说了。他缓缓问道:"齐王韩信、大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他们如今都在哪里?"

高祖答道:"不是因为谋反,被朕杀了吗?"

张良说:"想当年,楚汉交战,终日撕杀,这三王身不离甲,马不离鞍,冲锋陷阵,浴血沙场。到头来,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叫人寒心啊!"

高祖不乐意了:"他们要造反,犯上作乱,你难道不知道?"

张良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苦笑着说:"臣知道。古人说过,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下,子奔他乡。还是常言说得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功狗烹啊!黄金铸印不是福,官场本是是非场。为臣还是抽身引退的好。从今以后,张良只求过一种避身远害、无拘无束的平淡生活。30年前,黄石公与臣有约在先。天意不可违啊!"

高祖理屈词穷,只好听之任之。张良辞别京城,直奔谷城山而去。到了那里,一切都如黄石公所言,张良揖拜,挥泪离去。

从此,张良便散诞江湖,萋息林泉,避谷炼气,世人都说他成仙了。

安 期 生

安期生是传说中的一个著名人物。历代口耳相传,把他神化成了仙人:居于海上蓬莱仙山,出没于风浪之中,往来于陆海之间,装疯卖傻,随身总带着一筐枣子,其大如瓜,要么索价高得吓人,要么白白相送。要是有谁吃了他的枣子,便可长生不老,永葆青春。据说,秦始皇东游时,曾与安期生谈了三天三夜,临走,留下一句话:"几年后,到蓬莱山来找我。"

汉武帝即位后不久,长安城中出现了一位方士,名叫李少君,自称怀有"祠灶谷道却老方",是仙人安期生所赠。今来京城,要献

给当今新天子。

当时，武帝对方术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并不怎么热衷。一日朝会，大臣中有个马屁精向武帝上奏了李少君献方之事。武帝笑到："却老？朕年纪轻轻，却个什么老？不理他！"

马屁精说："陛下现在年轻，可是，岁月流逝，青春不常。陛下是绝世英明之主，四海之内，皆盼陛下青春永驻，保佑国家呢！再说，见见这个方士，看看究竟如何？如果并不灵验，那把他赶走就是了；如果灵验呢，那不是天下的喜事吗？"

当天，李少君被带进宫中，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求仙闹剧开始了。

李少君吹嘘说："这个仙方的关键，就是祠祀灶神。祠灶之后，就可把丹砂炼成黄金。用这种黄金当饭吃，就可以延年益寿。年寿越长，道心越深。道心深厚，就可以飞到蓬莱仙山。小民就是在蓬莱看到了仙人安期生，得到了一枚大枣，回家后煮了三天三夜，把它吃了！今生今世，小民必将长生不老了！"

武帝见他说得煞有介事，不觉跃跃欲试。于是，在宫中设下祭坛，武帝亲自祭祀灶神。同时，他又派两拨人马，一拨去炼黄金，一拨去找仙人。

事过不久，自诩长生不老的李少君，却突然一命呜呼了。按说，武帝应该迷途知返了吧，可是他这时已中毒很深，反倒认为这是李少君成仙而去，是安期生的大枣发生了作用，因而进一步加紧了求仙活动。

皇上对安期生坚信不疑，这对那帮方士不啻是天大的福音。因此，一批批贪婪之辈，为博得一官半职，便如过江之鲫，成群结队地涌入长安，个个都说自己能找到安期生。

刚刚死了一个李少君，转眼又来了一个李少翁。李少翁不同于李少君，他是直接入宫求见，而且大言不惭，声称自己能使死人复现。正好武帝上月死了一位爱妃，日夜思念不已，便决定一试。李少翁让武帝详细描绘爱妃的音容笑貌，武帝不知是计，便打开记忆的闸门，历历陈述二人的恩爱情谊，说到动情处，不觉潸然泪下。而李少翁却催眠般地哼哼唧唧：

"说下去……再说下去……贵妃快要来了……马上就要来了……"

武帝早已陷入无穷无尽的思念之中，不知不觉中，爱妃的身影似乎恍然闪现在眼前。武帝惊喜地叫道："看见了！看见了！先生的方术真神啊！"

这样，李少翁被封为文成将军。新任将军心里清楚，死人出现，完全是活人的幻觉，所谓致幻术，不过就是催眠术而已。正在他得意之际，武帝却急着要他去找安期生。李少翁本来就是想入宫享清福的，自己就是海边人，几时见过什么海上仙人呢？他当然不愿意离开京城，便谎称心诚则灵，长安同样可以招致仙人。于是，武帝马上命令修筑甘泉宫，宫中敬奉着安期生的牌位，日夜祈祷，把个皇宫搞得乌烟瘴气。

半年过去，李少翁坐享富贵，只觉得光阴似箭，而武帝求仙不至，却是度日如年。李少翁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怂恿武帝修建柏梁台。武帝把他奉若神明，早已言听计从，又把柏梁台修起来了。这柏梁台高数十丈，台中起一殿，为了修这座殿堂，砍伐了终南山几乎所有的香柏。等到殿成，香气传出10里之外。殿前还树起了一座20丈高的铜盘，用来承接雨露。

武帝每天顶礼膜拜，苦苦等待，又是半年过去，照样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武帝火了，大骂李少翁，把他斩了。

杀了李少翁，自有后来人。反正有人不怕死。在李少翁的故乡山东，又有一个栾大，不远千里赶来。一见武帝，他便语惊四座："受安期生派遣，特来拜见陛下。"

武帝大惊，问道："什么时候？他派你来干什么？"

奕大说："三个月前，小民独自出海，看到

一个白胡子老人，浮在海面，拿着一个大枣，只顾自己吃。小民想讨口刺吃，他不肯，说小民穿着破烂，身份低贱。小民语吾皇尊贵，也爱仙人。他说他就是安期生，早已知道陛下求见心诚，但要相见，必须指派一位法术精深的方士，作为国家的使者，拥有权威，才能与他相见。

说完，为了证明自己就是那个法术精深的方士，还主动表演了斗棋的戏法：棋子在棋盘上你碰我，我碰你，声音甚是好听。这些棋子，不过就是掺和了大量的磁石粉，所以互相吸引，但武帝又给轻易蒙过，马上任命栾大为通神使者，接二连三地封他为乐通侯、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还怕不够亲热，武帝又把公主嫁给了栾大，赏赐黄金万两，其余僮仆、车马，不可胜数。

两个月后，栾大在武帝的一再催促下，十分不情愿地离开了长安，没精打采地回到了山东。望着茫茫大海，这个从前的穷光蛋、而今的皇帝特使，到哪里去见什么安期生呢？他只好掉头上了泰山，在山顶胡乱祭拜祷告一番，然后急忙赶回长安，想继续做他的富贵梦。

武帝威严地坐在御座上，一脸杀气。栾大见状大惊，但马上装出一副欢喜的样子，对武帝说："臣在蓬莱见到仙师了，仙师非常高兴，认为臣的地位已经高贵，便给了臣一枚大枣吃，哎呀，可好吃了……"

"哈哈哈哈！"不等栾大说完，武帝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笑，然后骂道："骗子！快收起你的把戏！你哪里到了什么蓬莱岛，你是上了南天门！欺君之罪，罪该万死！"武帝说完，上来两个武士，把栾大架了出去，一刀砍了。

原来，武帝一再受骗，这次便派了一个武士，暗中跟踪栾大，这才揭穿了栾大的骗局。

从此，武帝再也不敢相信方士。不过，这个空缸很快又让一帮官吏占领了。河南太守报告河南出现了仙人脚印，青州刺史报告青州发现了仙人足迹……武帝便风尘仆仆赶赴河南、青州……结果连个安期生的影子也没见到。几个脚印，也不知道是仙的，还是鬼的。

武帝回到长安，垂头丧气，又十分不甘心，于是拿天下百姓出气。他动用了数十万的役夫，修筑了建章宫、泰液池。建章宫千门相属，泰液池假山林立，各自取名蓬莱、方丈、瀛洲，模仿传说中的仙境，聊以过瘾。

巫蛊之祸

自古以来，君王好道，百姓遭殃。

话说这汉武帝自打迷上了神仙之事，便对仙道之说益发深信不疑。这种近于愚狂的迷信，终于导致了"巫蛊之祸"，使皇室、国家百姓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这巫蛊之术是古代的一种诅咒厌胜之术。打个比方说，张三与李四有仇，张三便把一个木偶人埋进土中，好象这木偶人就是李四，然后张三常常来祭祀，口中发出对李四的诅咒之词，咒他病，咒他死。或者，王五生了一场重病，想活命，于是也拿了一个木偶人放在赵六的屋后，然后日夜诅咒，希望把病转移到赵六身上去。这种事情，当然荒诞不经，发生在一般小民百姓之间，还无损于大局；可是，一旦引入政治斗争中，那就不是儿戏之事了。不幸的是，由于武帝好道，宫中皇室成员及满朝文武大臣，也大多数受其影响，使得巫蛊之术在京城大为流行。这就为后来的巫蛊之祸埋下了种子。

武帝当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他身边的一个爱妃便建议他也试用巫蛊之术，武帝竟然也同意了。他本来是想借此消灾度厄，没想到，反倒做了一个梦：成千上万的木偶人，手持棍棒，大肆向自己围攻。武帝大叫一声，惊醒过来。他便派人去召宠臣江充进宫。

江充是个十足的小人，平日仗着皇帝的

宠幸，张扬跋扈，看着谁不顺眼，就立即奏他一本，闹得朝野上下，鸡犬不宁。很多人都跑到卫太子那儿去诉苦。太子生性仁恕，待人宽厚，便派人传过话来，叫江充不妨宽容一点，国家还是安定一些为好。可江充目中无人，哪里听得进去。太子的家使违反禁令，江充便扣留了太子家的马车，向武帝邀功讨好，连太子求情也没有用。

江充进得宫来，听武帝说起梦中的情形，便在一边低头沉思起来：皇上一天天老了，身子又多病，怕是不行了，我该给自己准备一条后路了。明摆着的是，在那些皇子中间，卫太子最贤，很得人心，一旦皇上驾崩，卫太子即位，等着自己的，不是死路一条吗？想到这里，汗如雨下。

武帝见状，忙问："爱卿为何不出声？又为何满头大汗？"

江充一惊，急中生智，便答道："愚臣不敢讲。"

武帝心中着急，连声催促："只管讲，直言无妨。"

江充故作神秘地说："愚臣以为，皇上龙体欠安，实因有人巫蛊作祟。"

武帝大怒，追问："何人作祟？"

江充答道："近年京中巫蛊风行，依臣愚见，此人就在咱们京中。"

武帝厉声说到："朕命你为治巫使者，限期为10日，抓获罪犯！"

江充领旨，马上率领一群匈奴巫师，先在皇城以外装模作样地挖掘木偶，挖到木偶不抓人，连累了几万无辜者。这中间，有方士，有巫师，更有江充平日的仇人。一晃9天过去了，武帝的病还是没有好，而且，由于急火攻心，病势反而更重了。武帝把江充召进宫中，骂道："你说有人作祟，到底谁是真正的作祟者？明日抓不到罪犯，灭你九族！"

江充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说道："小臣知罪。臣连日出入宫中，见到处都有蛊气，可见陛下中毒很深，再若不除，那皇上的病可就要……"

武帝怕死，见江充把话挑明，一拍椅子，喝道："大胆！胡说！该死！"

江充连连磕头："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武帝气得连连咳嗽："蛊气既在皇宫，你就进宫搜查嘛！"

江充煞有介事地说："陛下圣明，只是进宫搜查，多有不便。微臣不敢！"

武帝站起身来说："有何不敢？你是依圣旨行事，谁也不要害怕！"

江充等的就是这句话！为了制造声势，他决定先从皇帝御座下开始搜查，武帝竟也赞成。于是，一场闹剧开始了。一个皇帝，一帮大臣，一群胡巫，推倒御座龙椅，就在座下挖了起来。挖了一阵子，江充这才赶到后妃们的居室，又是翻箱倒柜，又是掘地三尺。到了傍晚，江充率人闯入太子宫，轻而易举地挖出六枚木偶，那木偶人身上，钉满了钢针！

当时太子不在宫中，闻讯赶回，江充刚刚离去。太子又惊又怕，不知所措，倒是太子太傅石德显得冷静，他说："这一定是江充事先谋划好了的！"太子急得跺脚，叹道："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不行，我要找皇上去讲清楚，不是我干的！"

石德连忙拦住太子，急切地说："您这不是自投罗网吗？皇上迷于仙道，惑于巫蛊，现在年老志昏，才做出这等事来。如今江充又找到了证据，您还讲得清楚吗？不如先下手为强！您假称皇上诏令，杀了江充再说！"

太子心一横，跳上快马，率领卫队飞也追地追了上去。江充正坐在车上暗自得意，猛然听得后面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心知有变，赶紧吩咐手下人应战，但是这些人哪里是太子卫队的敌手，一阵厮杀之后，江充被带到了太子面前。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太子厉声喝道："奸贼！为何如此苦苦相逼！"

江充知道自己活不成了，于是骂道："怪

老子谋事不周，落到你的手上！要杀就杀！杀了老子，你也活不成！”

太子愤怒已极，抽出宝剑，一下捅进了江充的心脏。其他匈奴巫师，也大多遭到砍杀。于是长安一片混乱，纷纷传言太子谋反。

消息传到甘泉宫，正在养病的武帝简直不敢相信。他说：“太子素来温和，怎肯加害寡人？这一定是江充搞错了，太子年青，一时冲动。”说着，他叫过一个侍臣，让他去叫太子，以便平息事变。

侍臣领旨，走到半路，心里直打鼓：谁知太子是真反还是假反，他连江充都敢杀，我又何苦去送死？于是退回甘泉宫，撒了个弥天大谎：

“哎呀！陛下，不好了！太子是真的要反了！不是臣跑得快，这条命就没有了！”

武帝一听，怒不可遏，立即下诏，命令丞相刘屈氂发兵10万，攻打太子宫。这样，一场激战便在皇城展开。两军对垒，血战5天，死者数万。最后，太子败绩，退出户县，在大兵的围追堵截中，绝望自杀。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一齐遇害，他的母亲卫皇后，也被迫自尽。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第二年，丞相刘屈氂，外带一个贰师将军李广利，双双被人指控为诅咒武帝。武帝连太子都不相信了，何惜一个丞相，一个将军？于是，堂堂丞相被要斩于长安东市，其夫人同日枭首。李广利正在边境与匈奴浴血奋战，朝廷把他的九族一并收捕。李将军闻变，阵前投敌，7万大军一个没回。

好在这年秋天，也许是天意厌乱吧，事情出现了戏居性的变化。田千秋，一位负责守卫高祖陵庙的官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一个白胡子老头向自己诉说太子之冤。次日，田千秋便上书武帝。武帝得奏，大为感寤，立即召见田千秋，相对唏嘘，哽咽道：“父子之间，旁人是很难说清楚的。只有您才敢为太子辩白，这是高祖的神灵派你来的啊！您就作朕的辅佐大臣吧！”当即下诏，为太子平反昭雪，不久，又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乘机进言：

“陛下，依臣愚见，巫蛊之术，祸国殃民，方士巫师，妖言惑众，望一律取沙撤遣。”

武帝这时也悔悟了，感慨万千：“我真蠢哪！被人害苦了！生老病死，皆有天定，哪里是巫蛊之术所能改变的呢？我醒悟得太晚了！”

三年之后，武帝因病去世，享年70岁。

曹操与魔术大师

东汉末年，庐江有个左慈，字元放，学通五经，兼善星纬，本来是个很有前途的青年学者。可是，连年内战，白骨遍野，民不聊生，左慈书生报国的愿望破灭了，愤而叹道：“值此衰运之际，高官者危，财多者死。身前荣华富贵，死后委沟填壑，实在不值得羡慕！”于是，他转而修习道术，专攻术数变化之道。

左慈散诞江湖，云游名山大川。这一年，来到天柱山。天柱山古木参天，奇峰入云。到了八月十五中秋夜，月色如银，山峦一片清爽。左慈一番呼吸吐纳之后，登觉神明朗澈，双目熠熠生辉。正要转身回房，忽见一巨石之旁，隐约有洞，便拨开草丛，侧身而入，果然是个山洞。洞内杳无一人，石台上，放着三轴竹卷。左慈过去，拂去厚厚的尘土，拿出洞来，就着月光一看，脱口叫道：“啊，《九丹金液经》！”一时激动得手都发抖了。

原来，这《九丹金液经》是道教秘笈，久已失传。平时，方术之徒口耳相传，或者只言片语，不知所云，或者以讹传讹，适得其反。学道之人，莫不以亲眼目睹为幸。左慈无意之间，得此天书，难怪如此欣喜了。

从此，他便按照书中指示，早晚修习。10年之后，左慈成了一个万能的魔术大师：他能呼风唤雨，役使鬼神，千变万化，不可胜纪。

左慈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

魏王曹操平生最恨方术之士。在他看来,方士文不能治国,武不能杀敌,只靠着一点旁门左道愚弄百姓、蛊惑君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造反叛乱之事,每每与他们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远的有陈胜吴广,近的有黄巾张角,都是靠了妖言惑众,这才煽动百姓起来犯上作乱的。因此,他对方士的态度,既不同于秦始皇,也不同于汉武帝。为了防止这些人"挟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他采取了集中收容的手段,把方士客客气气地迎进洛阳,严严实实地监视起来。放在眼皮底下,置于指掌之中,谁还敢兴风作浪?比起历史上的那些佞道昏君来,曹操确实老谋深算,技高一筹。

左慈当然也给送到了魏王府上。

初次见面,曹操把左慈仔细审视了一番:突出的额头,细细的眼睛,枯黄的胡须,焦干的嘴皮,中等的个头,从头到尾反映不出丝毫的异人模样。足足三分钟,曹操一言不发。左慈见状,闭上眼睛,养起神来。

这可激怒了曹操。刺董卓、剿黄巾、平吕布、战袁绍,赫赫的盖世英雄,竟受到一介草民的如此轻视,当时一怒,曹操就想把左慈推出去斩了。可是,曹操毕竟是曹操,天下还没平安,正是用人之际,老远把他接来,转眼把他杀了,让天下人如何看待,曹操才不干这种蠢事呢!于是,曹操换上一付笑容,好酒好菜款待左慈。

过了几天,曹操对左慈说:"听说先生身怀异术,可以不吃不喝。请为我一试。"说完,命人把左慈关进一间屋子。

过了100天,曹操心想:左慈早该饿死了吧!因此命人打开房门。谁知左慈仍然活着,容颜不改。

这下,曹操反而更加坚定了除掉左慈的决心,妖术如此深厚,这还了得?

当天,曹操摆上丰盛的酒宴,表彰左慈高深的道术。

席间,曹操对左慈说:"今日高兴,山珍海味都有了,可惜就是少了一条吴淞江的鲈鱼。"

左慈离开座位,来到客厅中间,叫人取过一只铜盘,装上水,然后手持一根筷子,朝水中一捅,眨眼钓上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鲈鱼来。

曹操不信,连说:"看花了眼,看花了眼,再来一遍!"

左慈笑笑,放慢动作,再次表演。曹操双眼紧紧盯住铜盘。盘内清澈见底,左慈将筷子插入,立即水波层层泛开。待抽出筷子,又是一条生鲜可爱的鲈鱼跃上桌面。

曹操拍手叫绝,连连称赞。可是,一待席散人去,他马上紧锁眉头,苦思计策。

第二天,左慈不请自入,揖拜礼毕,左慈说:"大王盛情款待,左慈没齿不忘。今日辞别,将远离人世,高蹈远举。"

曹操哪里肯放,自然热情挽留。

左慈正色说:"没想到区区薄技,竟招致杀身之祸!"

曹操故作惊讶:"先生何出此言?"

左慈颜色稍为缓和一点,恳切地说:"山人闲散惯了,不乐荣华,求明公放行!"

曹操作出恋恋难舍的姿态,握住左慈的手,象要流泪的样子:"先生志行高洁,我也不便久留。只是不知今日分手,何日才能重逢?"

左慈再次揖拜,转身要走。曹操大叫一声:"且慢!"

左慈缓缓回头:"何事?"

曹操掩饰地说:"无他,再喝一杯。"

当时天气寒冷,曹操命人温酒。左慈摆摆手,取过铜汤勺,插下酒中,快速搅动起来。不一会,杯中热气腾腾,而铜钓却象研墨一样地给搅融了。

左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一抬手,将杯子抛上房梁。曹操仰头望去,只见酒杯吸住梁木,纹丝不动。曹操心中暗自称奇,回头再看左慈,早已无影无踪。

曹操大怒，立即传令，全城戒严，通缉左慈。

左慈神出鬼没，在洛阳城里与曹操捉起了迷藏。他一会儿出现在酒楼，旁若无人地饮酒。等到军士得到消息，前往捉拿，他却又出现在城楼，得意洋洋地唱歌。他一会儿变个老太婆，驼背弯腰，口中自报姓名："我是左慈。"一会儿变个少女，亭亭玉立，嘴里自报家门："庐江左慈就是我。"如此这般，几乎每个洛阳人都变成了左慈。

曹操气得没法，便叫人敲锣打鼓，沿街吆喝："左慈先生，快请出来，您的道术，天下第一！"

左慈早已远走高飞了。

三朝元老向上帝自首

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元老，位极人臣。

沈约73岁了，多少有些人老志昏，梁武帝过去视沈约为左右手，现在却有些嫌他多事了。沈约却浑然不觉，这天，散朝之后，沈约留下来，走近武帝，为死去的亲家说情，想为亲家争个好的追谥。没想到武帝拉下脸，带着怒气斥道："张稷并非良吏，多次遭到朕的谴责。您说这话，还象个忠臣吗？"说完，拂袖而去。沈约猛然受到申斥，吓得怔了半天，连武帝离座也没发觉，一个劲地傻坐在那里。

沈约两眼直呆呆地回到府中，下台阶时，一脚踏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这一下一摔，沈约就病倒了。

半夜，万籁俱静之际，沈约突然看见一个鬼影向自己奔来。沈约吓得毛骨悚然，定眼一看，更是大惊失色。这鬼不是别人，而是被害致死的少年天子齐和帝。沈约拔腿就跑，和帝紧追不舍。沈约毕竟上了年纪，和帝则报仇心切，猛跑几步，一把抓住沈约举剑便刺。

沈约"扑通"一声跪下，鸡啄米似地磕头不已，口中哀求："陛下饶命！陛下饶命！"

和帝怒火满腔，骂道："无耻奴才！朝廷待你恩重如山，你为何恩将仇报，置朕于死地？"

沈约无言以对，只是一口一个"饶命"。

和帝托起沈约下巴，喝道："今天朕不杀你，且割下你的烂舌头，看你还能胡说八道不！伸出舌头！"

沈约咬紧牙关，死也不肯张口。

和帝冷笑一声，用剑抵住沈约的喉咙，厉声说道："奴才，要命还是要舌头？"

沈约万般无奈，只好伸出舌头。

和帝一手捏住沈约的舌尖，一手持剑，银光一闪，舌头已落入手心。

沈约一声惨叫，从梦中惊醒过来。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双惊恐的眼睛死死地盯住房门，生怕鬼影再次闯入。

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沈约出生于江东豪门，世代累居高位。只是由于连年战乱，到了沈约出生时，他的家境已是十分贫寒。但他聪明过人，刻苦读书，从早到晚，手不释卷。他母亲怕他累坏了身子，到了夜里，便将灯盏中的桐油倒出，迫命儿子睡觉休息。于是，沈约便白天看书，夜晚背诵。这样，十年寒窗下来，他已是博通群籍，满腹诗书。常言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沈约的文章，天下无敌，凭着这枝笔，他很快进入了仕途。不久，又成了齐太子的座上客，官运更加亨通。吏部郎、黄门郎、五兵尚书、征虏将军、东河太守、清河太守、太子家令……官帽子左一顶、右一顶地直飞过来。

但是，齐朝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外有北魏入侵，内有宗室作乱，下有百姓造反。雍州刺史萧衍，乘机率兵攻入首都建康（今南京）。沈约急于投靠新主子，便极力怂恿萧衍夺位称帝，花言巧语说得萧衍动了心。当晚，沈约又串通大司马咨议参军范云，信誓旦旦地约定明日一同入见萧衍，可是，第二天一大

早，他却独自去找萧衍，把范云关在门外，与萧衍密谋篡位计策。

中兴二年(502)年三月，15岁的齐和帝让位于萧衍，这就是本文开篇斥骂沈约的梁武帝。沈、范二人加官进爵，不在话下，一个月后，梁武帝不知怎么处置和帝，问范，范不作声，问沈，沈竟暗示武帝下狠心，以免后患。结果是和帝被迫自杀。

这就是和帝向沈约索命的原因。

沈约信奉天师道，是个虔诚的信徒，现在为了活命，他当然要求助于上帝了。清早起床，他就叫来道士，祈求消灾祛祸。

道士手持九节杖，喝令沈约跪下，又取过一碗符水，示意沈约喝下。然后关上门窗，吩咐沈约自首其一生过失。

沈约闭目思过，向上帝一一坦白平生所犯之错。可是，说来说去，他总是回避齐梁禅代一节。他知道，别的过失好说，这一件事，却是天理难容，万万不能承认的。

道士推门进来，手持三官手书。这三官手书，就是一式三份的自首书，上写自首者姓名、生辰八字以及一生罪过。按照规矩，一份丢在山上，告之于民；一份埋进土中，告之于地，一份沉于河中，告之于水。

沈约双手颤抖地接过三官手书，然后，五体投地，口中结结巴巴地说："自……首者沈约、约奏上天曹，请……请，请为陈……禅……禅代、代之事，不是我、我的主意……我是我的主意……"

道士站在一旁扮作鬼吏，听完了沈约的自首，接过三官手书，转身走了出去。留下沈约一个人，关在室内，烧香叩拜，继续自首。

梁武帝听说沈约病了，不得不派出亲信前来探问，毕竟是三朝老臣、开国元勋，不好不装装样子。

使者来到沈府，里面空无一人，只有内室香烟缭绕，便走过去探个究竟。进屋之后，沈约毫无察觉，还跪在地上，拜一次，说一声：

"禅代之事，不是我的主意。"

使者一听，悄悄退出，赶回宫中，向武帝报告了此事。武帝龙颜大怒，骂道："昏老头！老昏了头！禅代之事，不是你的主意，难道是朕的主意吗？禅代又怎么了？难道不应该吗？齐朝无德，朕承天受命，难道错了吗？"

当即武帝又叫使者赶往沈家。使者来回奔波，也怀着一肚子的怨气，闯进内室，看到沈约还在自首，怒气更不打一处来，大吼一声：

"听旨！"

沈约一个激灵掉过身子，糊里糊涂地问："听什么旨？"

使者又好气又好笑："圣旨！你也不用向上帝自首了，你看，你必须向皇上请罪了！"

沈约明白过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关天起不来了。

没多久，沈约一命呜呼。天师道没能挽救它的这个信徒，也不知是道法不灵呢，还是道徒不诚，反正这个三朝元老，在做完自首之后，最终还是死了。

寇谦之与西天高僧

北魏时期，道教中又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名字叫做寇谦之。

寇谦之祖籍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后来迁居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自称是汉朝雍奴侯寇恂的第十三代孙。但他不爱作官，专爱仙道，尤其钟爱家世祖传的天师道。

天师道创自汉朝张陵，也就是张道陵，道陵自称老君授法，任为天师，故称天师道。天师道在汉魏风行一时，到了寇谦之这会儿，人们已渐渐对它失去兴趣，而纷纷信仰佛教了。

谦之却始终不渝地奉行祖传家教，不过，尽管他修道精勤，但却仍然进展甚微，收获不大。他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十分着急，但又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这时，有人送上门来。

有一天，寇谦之去看望姨母，走到门口，一个新来的仆人正在劈柴。这人光着膀子，长得五大三粗，红脸膛，蓝眼睛，连腮胡。谦之想："傻个儿，不赖，是个出力气的好手！"汉子见谦之一个劲打量，也回过头来，报以神秘的一笑。

临走，谦之央求姨母把仆人转让给自己。

主仆二人回到家里，第二天，谦之便打发仆人去垦荒，自己也坐在田头，靠着梨树，铺开筹码，作起历史算术来。

中国古代谈天文者，有三家学派，一为盖天学派，二为宣夜学派，三为浑天学派。盖天说认为天圆如盖，地方如盘，日月星辰只在天盖上运动；宣夜说近似乎现代的日夜说，宣却暄，白天的意思；浑天说认为天如蛋壳，地如蛋黄，天转地不转。一般地说，儒家多持浑天说，楚人多持宣夜说，天师道奉行盖天说。但是，谦之用周髀推算盖天，遇到了麻烦。

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交错，运行各有规律，用旧的盖天说推算，却是矛盾重出。谦之算了一天，太阳也都落山了，还是算不准。谦之又急又恼，又不甘心失败，便坐在那里抓耳挠腮。这时，仆人过来了。他站在旁边，两眼瞄着算码，一言不发。

谦之火了，斥道："干活儿去！傻看什么！"

仆人转身走了。过了半个时辰，他又来了。谦之恼羞成怒，把算筹一摔，骂了起来："该死的！只管干活。你看得懂吗？"

没想到，仆人淡淡答道："不太懂，稍知一二。"

谦之报以鄙笑，讽刺道："你懂？那我这些年不是白活了？真看不出！"

仆人不恼不怒，反而笑嘻嘻地说："试试看嘛！我来讲，您摆筹子。"

说着，他便自顾自地讲起来。谦之起初不屑动手，后来听出一点点门道，便照着仆人讲的去摆，仆人越讲越精妙，谦之越摆越惊奇。约摸一个时辰，七星图算出来了！"

这时，谦之明白眼前这个人决非寻常之辈，于是整齐衣帽，恭恭敬敬地向"仆人"行礼："先生必是神人。如果不嫌弃，请收下小生作个役使随从！"

"仆人"连连还礼，口中只说："颠倒了！您是我的主人，我才是您的仆人。"

谦之又要分辩，"仆人"笑道："您要是实在不同意，那我们就师生相待，您是先生，我是弟子。您别争了，要不，我就只好走了。"

谦之见他态度坚决，只好答应下来。当晚，二人月下坐谈，这位来历不明的"仆人"，只说叫成公兴，对自己的身世便不肯多说了。

从此，他们便时时在一起切磋盖天学说。相比之下，谦之觉得自己的那一套，显得非常陈旧、费解，而成公兴介绍的盖天说，则非常科学、实用。于是，谦之更加谦虚地请教，成公兴也毫无保留地传授。

待到一部《九章要术》烂熟于心，谦之又提出修道成仙之事。成公兴笑道："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什么仙人。不过，你要成仙，我可带你到华山去。"

谦之一听，几乎拔腿就想走。成公兴笑道："呃，这哪儿成啊！按照你们的规矩，你还得香汤沐浴，清斋三日吧？"

三天之后，寇谦之与成公兴上了华山。这华山奇险峻峭，高入云端。他们一直上了华山第一峰，成公兴领寇谦之进了一个大山洞。洞有三进，第一进是个四方大坪，第二进有石桌石凳，成公兴让寇谦之住了，自己住第三进。从此，采药、讲经，成了他们的日常功课。

一晃七年过去，成公兴对寇谦之说："你要成仙，我去给你找个人，只看他肯不肯度化你了。"

到了午后，有一个怪人，送来一碗怪药，叫寇谦之吃了。谦之一看，里面尽是一些毒虫烂作一堆，臭不可闻。谦之说什么也不肯吃，把来人赶走了。

傍晚，成公兴回来，一脸高深莫测的神

情。对谦之说:“吃了那碗药,你或者就能长生不老了!”

谦之听了,好不后悔。没想到,成公兴的另一番话,更是吓人:“我明天就要走了。我死后,自然有人来接。”

第二天早上,谦之去见成公兴,成公兴已坐化了。没多久,进来两个小和尚,一个手托法服,一个手持金钵、锡杖。他们为成公兴穿上法服,把他背下山去了。

到了这个时候,寇谦之才知道自己的这位“仆人”、“弟子”,原来是个高僧。

老君显圣

老君姓李,唐朝天子姓李,老君便特别乐意在唐朝显圣。

人们也许要问,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距唐朝有一千几百,怎么显圣啊?

对了,显圣无疑是荒诞不经的,但随之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是基本真实的。时间、地点、人物,见诸载籍,班班可考。正史、杂史、道流经典,皆有详细记箓。若不相信,请往下看:

唐朝武德二年(619 年)。晋州浮山县羊角山。

山下住着一个樵夫,叫吉善行。

那天清早,吉善行正在山上打柴。这里山深林密,百鸟丛集。一阵清风吹过,林中出现了一位银须闪烁的老人,他朝善行朗声叫道:

“后生!歇息片刻!”

善行蓦地转过身来,只见老人慈眉善目,精神矍铄,一脸笑容,让人感到特别亲切。善行放下柴刀,问道:

“道人是何方人氏?何故到此?小生不曾见过的。”

老人微微一笑,说道:“后生,你且听说:我便是当年骑牛过函谷,写下《道德经》的太上老君……

不等老君说完,吉普行惊叫一声,结结巴巴地说:“什么什么?你就是太、太上老、老君?”

老君见状,哈哈大笑,答道:“对!姓李名耳字伯阳,不相信吗?”

吉善行说:“您怎么让我相信呢?”

老君捻着长长的白胡子,点点头,赞许地说:“嗯,是个诚实的人。那我告诉你,我是唐朝天子的祖先,李渊是我们老李家的后代。我当年上了昆仑山,超升上仙,所以活到现在,既然我们李家的后代当了皇帝,我不能不显圣来看一看了。”

吉善行摸着后脑勺,又迟疑地问:“那又凭什么让皇上相信您的话呢?”

老君不慌不忙,一字一句答道:“亳州曲仁里,是我出生的地方,那里有一株枯死了的老桧树,现在又重新复活了。这就是我显圣的证明。而且,你告诉你们皇上,枯桧再生,兆示李家的王业永世不衰。说听明白了吗?”

善行连连点头:“明白,明白。”

老君又说:“李渊既是我们李家的后代,就必须崇奉道教,宣扬道教,道教至高至上,将保佑天下安定,江山永固。”

言毕,老君隐身不见了。

吉善行飞奔下山,立即报告了刺史贺孝义。贺孝义带上吉善行,星夜赶赴长安,入宫颤报高祖李渊。

与此同时,亳州曲仁里,果真有一株千年老桧,一夜之间,死而复生。昨天还是枯干朽枝,今天便已枝叶葱郁,直指蓝天。新生的树叶散发着浓郁的香气,人们从树下走过,一个个都如醉如痴。于是亳州刺史又将此事上奏朝廷。

高祖可不象吉善行那样谨慎,他压根儿就不想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他想的是,有人总认为我家出于番胡,这下好了,老君显圣了!我是老君的后代!从今以后,用道教笼络人心,治理天下,那该省下多少事啊!

于是，高祖降旨，命令通事舍人柳宪在羊角山大兴土木，修建兴唐观；任命吉善行为朝散大夫；将浮山县改为神仙县，封羊角山为龙角山。一时间，朝野上下，热闹非凡。

武德七年(624年)，高祖亲临终南山，参拜老子庙，遥祭兴唐观。归途之上得一龟，龟背刻着四句话：

天下安，

子孙兴。

千万年。

千万叶。

高祖大悦。回到京城，他便亲临国学，宣布道教为本朝第一教，儒、佛皆居其后。

乾封元年(666年)，高宗谒亳州老君庙，为老君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

天宝二年(743年)，玄宗作升仙宫，加号玄元皇帝曰“大圣祖”；

天宝八年(749年)，玄宗谒太清宫，加号玄元皇帝曰“圣祖大道玄元皇帝”；

天宝十三年(754年)，加号玄元皇帝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

……一直捧到天上，好在老君本是天仙，也无所谓“高处不胜寒”了。

李 白 入 道

大唐天宝三年(744年)十月，诗仙李白在齐州(今山东济南)正式受箓入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已“名在方士格”了。

名闻海内的大诗人，长安城里的大红人，怎么一下子从西京跑到东海，而且还竟然做了什么道士呢？

说来话长。

李白的家乡四川昌明，历来道教兴盛。县里有座紫云山，是个道教胜地。邻近绵竹，还出了一位大道士王玄览。推而广之，峨眉山的王仙卿、青成山的赵仙甫，都是名闻四方的著名道士。李白从小生活在这么一个仙风弥漫的环境中，不能不对道教产生浓厚的兴趣。

到了15岁，李白已是饱览道书，仙游四海，“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可说是行者李白的真实写照。只要听说哪里出了个有名的女道人，李白总是不远万里，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地赶去拜访。有次，他听人说起嵩山有个焦炼师，道术精妙，十分了得，于是立即动身上了嵩山。可是，36座高峰寻遍，也不见焦炼师的影子。人虽没有找着，但李白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脑海中与焦炼师神仙了一番：“八极恣游憩，九垓长周旋。下飘的颍水，舞鹤来伊川。还归东山上，独拂秋霞眠。萝月挂朝镜，松风鸣夜弦……愿同西王母，下顾东方朔。紫书倘可传，铭骨誓相学。”又有一次，他听说泰山有仙人，又风尘仆仆登上泰顶，闭上眼睛，在想象中遨游了一番：“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银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玉女四五人，飘遥下九垓。”“仙人游碧峰，处处笙歌发。寂静娱清辉，玉真连翠微。想象鸾凤舞，飘飘龙虎衣。天扪抱匏瓜，恍惚不忆归。”

要说起李白寻仙访道的事儿，那可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是，李白尽管爱道，可他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更爱功名，总希望做出一番匡扶社稷、名垂青史的伟业来。他想，而今天子圣明，国家昌盛，天下太平，再凭着自己的一片报国之心，凭着自己的一身治国之术，唐尧盛世，不就指日可待了吗？于是，怀着幸福的憧憬，天真的李白冒失地闯入了长安。这一年，正是开元十八年(730年)。

可是，到了长安，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首都却对他理也不理。长安，这个李白原以为就此可以施展身手的政治中心，似乎更象一个花天酒地的游乐中心。歌台舞榭、勾栏瓦舍，比比皆是。皇宫巍峨，威严冷峻，常人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想进去，没门儿！

于是，李白不得不放下了架子，开始奔走于各权贵之间，指望被哪个公卿看中，把自己

推荐给皇上，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心愿。可是，李白又一次失望了。偌大一个京都，谁在乎一个布衣书生呢？

李白只好满怀激愤地回到家乡。“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归去来！”

10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朝廷送来文书，宣李白进京。原来，李白的道友元丹丘近来受到玉真公主器重，元丹丘便乘着讲经论道的机会，向公主推荐李白。公主是当今皇上的掌上明珠，于是，李白得以轻而易举地奉诏赴阙。

李白雄心勃勃，一路上都在考虑国家大计。可是到了长安，朝廷又似乎把他忘了。好容易奉旨进宫，叩见礼毕，李白正待上献国策，玄宗却连打几个呵欠，赏了李白一个翰林待诏的官儿。便叫他退下了。从此，李白倒是吃穿不愁，坐吃坐喝，可是，就是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安邦之才。

朝廷压根儿就没想让这个大诗人去参与国家大事！皇帝需要的是一个文学弄臣，高兴了让他写几首诗，助助兴，开开心。这样李白违心地写了一连串宫中行乐诗。

冬去春来，兴庆宫的芍药开了。这芍药是洛阳贡献的名贵品种，煞是娇艳。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出来赏花。玄宗一时兴起，说道：

“对妃子，赏名花，不可无诗。李翰林呢？叫他来献诗！”李白领旨，三步并作两步跑来，嘴里还在喘粗气，玄宗命令：“快快献上新诗！”

李白随口吟出《清平调》三道：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

李白吟毕，举杯畅饮，玄宗乐不可支，命李龟年领梨园弟子纵声歌唱，贵妃也亮开嗓门一起合唱，玄宗手舞足蹈，亲自吹笛伴奏。

这种身份，这种生活，这种快乐，在那些势利小人看来，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可是，李白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有为之士，这种压抑、苦闷、被人玩耍、供人使唤的生活，简直比地狱还难熬。

一天，李白好容易抽个空当，逃出翰林院，与饮中八仙张旭、贺知章等人在酒肆中狂饮，李白喝得烂醉。忽然，几个宦官闯进来，一路高叫：“李学士奉诏！”李白翻着白眼，朗声吟诵起来：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小臣本是酒中仙。

玄宗自然不高兴，可是玉真公主却深深地爱上了才气飘逸的诗仙，情愿嫁给李白。李白闻讯后，哭笑不得：奉诏进京，不是陪皇帝吃喝玩乐，就是作公主入赘附马，我李白是这种人吗？于是，一气之下，上书朝廷，请求还山。玄宗朱笔一挥：“恩准赐金还山。”

这样，便有了本文开篇的那一幕。

李白入道，特地从北海请来了天师高如贵。高天师站在高高的祭坛上，披发仗剑，踏罡布斗。李白身着道袍，头戴云巾，双手反绑，围着坛边团团转。口中念念有词，向道君忏悔自己一生的过失：

“我太天真，太幼稚，一心妄想功成名就，成天幻想救苦救难，我看不清朝廷的腐败，我看不清官府的黑暗……”

七天七夜，李白忍饥挨饿，就这么一边走一边念，硬是挺了过来。

高天师停止作法，李白也停止转悠。天师训示真言：“凡道士者，大道为父，神明为母，虚无为师，自然为友……延尔冰雪之容，延尔金石之寿……”

最后，高天师取过白绢朱文的道箓，亲自佩在李白臂上。

从此，李白名隶紫府，品登仙箓，采石炼丹，散诞江湖，得意之际，引吭高歌：

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
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
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径。
巨鳌莫戴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

终南捷径

“终南捷径”这个词儿，源于唐朝。说起它，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它的当事人，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卢藏用。

卢藏用的父亲卢敬是个精明干炼的人，担任过许多州、县的长史、典史一类的职务，治理政事很有一套，当时号称“才吏”。可是才吏，才吏，尽管有才，终究只是个吏。古代官吏的界限是很分明的：六部堂官自然是官，州、县正职也是官；可是郎中、别驾、从事、长史之类，属于僚佐，那就是吏了；官有印，吏无印，再小的官也有印，再大的吏却无印；官是朝廷任命，叫命官；吏为官所调用，叫属吏。卢敬一生不得为官，受尽屈辱，深知看人眼色行事的滋味。于是一再告诫儿子，要么做官，要么为民，千万不要做那倒八辈子血霉的什么吏不吏的。这一点，在儿子的名字上也体现了出来：藏用，不得志就藏，得志就用。

藏用在父亲的激励下，发愤苦读，头悬梁，锥刺股，背书背得口舌生疮，写字写得指肘起茧，20岁时，一举中第。可是雁塔题名、曲江流觞的仪式完成不久，一瓢冷水泼了过来，各处州县一时无缺，若到达官贵人家走走门子，或者还能捞个属吏什么的当当。藏用哪里肯当属吏，一咬牙：“不用则藏，回家去！”脚一跺，出了长安。

走在路上，藏用越想越伤心，越想越渺茫：不用则藏，不用则藏，这一藏谁知要藏到什么时候啊！此生此世，还有出头之日吗？自己学富五车，诗书满腹，十年寒窗，图的并不是藏而是用啊！这一负气回去，有何面目见父老乡亲啊！……想着想着，一屁股坐了下来。

脚一停下来，思绪也好象停了下来，藏用只觉得脑子里像是一片空白，空荡荡的。就这么傻坐了半个时辰，藏用看看天色不早，又站起来朝前走去。

脚步一动，思维又随之动了起来：路都是人走出来的，要想当官，未必只有一条路？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捷径？……对，捷径，捷径……可是又有什么捷径呢？上马杀敌？军功起家？不行，现在边境安宁，兵旅不兴，犯不着书生从戎。那么，攀龙附凤？找个好泰山？不行，这付穷酸相，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呀，天无绝人之路嘛，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对呀，访仙学道去！

人们也许不明白，访仙学道又与做官有什么关系？这在唐代关系可大了。道教是大唐国教，老君是皇帝祖先，自从李唐开国以来，道士的地位是一步登天，简直是炙手可热。一时间，出入宫禁的道士，几乎比公卿还多。事实上，如果哪个公卿不表现出自己对道教的尊敬，那么，他的官也就做到头了；如果他再对道教表示一些亲热、迷恋，那么，他的前程必须更加远大。

而卢藏用正是及时看到了这一点。

当晚，他随便找了个客店歇下，第二天一早，他便掉头向长安南面的终南山走去。

终南山林木葱郁，清幽爽人，当然，这么宜人的所在，是少不了道教的。只见五里一小观，十里一大观，做起道场来，鼓乐齐鸣，互相呼应，煞是有趣。卢藏用便在这里安顿下来，今日访道，明日练气，后日炼丹，一副清高避世、超凡绝俗的样子。

第一年，因为乍从功名场中退出，卢藏用倒也觉得山林自有山林之趣，练气、辟谷也还有些新鲜之感，日子也不知不觉过得比较舒坦。

第二年，因为归心道教，不慕势利，卢藏用竟然淡淡有了一些名气，与道士、文士的周

旋应酬也慢慢多了起来。卢藏用与道士谈道，与文士论诗，与善奕者对奕，与解琴者弹琴，日子也不觉得怎么乏味。

第三年，卢藏用有点坐不住了，他心想：藏用藏用，不能总藏不用呀！人生一世，功名还是要的呀！当日上山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学什么道，成什么仙的呀！这名声也传出去了，怎么就是不见朝廷征聘呢？莫非主上冷落道教了吗？不象呀，这终南山中，还是很气派、很热闹的啊！这么想着想着，渐渐便冷淡了往日的那些道友、文友、棋友以至琴友们。道友、文友、棋友、琴友们也慢慢看出了他的心思，于是也都避他而去，私下里送他一个“随驾隐士”的名号，讥刺他不能静心道门，热衷名利。卢藏用被朋友们晾在一边，朝廷又似乎没听说过这个人，因此在山中度日如年，每日只能靠卜筮、占卦推算自己的前程。是个上签，高兴几天，可是高兴之后又是捻；得个下签，又是几天不高兴，心里堵得慌。一来二去，他也懒得卜、懒得占了，于是又去这与字，草书、篆书、隶收、楷书，轮着写、轮着练。

就在卢藏用心灰意冷，百无聊赖，下决心真的回故乡去“藏”的时候，朝廷的诏书下来了，授职左拾遗。这拾遗虽说是个谏官，并非卢藏用所期望的掌印官，可是，也毕竟身处朝廷，可以随时向皇帝进言，而且，这山中修道的日子也实在捱不下去了，于是，他便下山就职了。

没多久，卢藏用参加县令科举，得甲科，被朝廷任命为济阳县令，终于成了一名正式的掌印官。此后，藏用便一用再用，终于大用，累擢中书舍人、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尚书右丞，官位日隆，权势日重，为人亦颇骄纵，士人侧目。

这时，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应诏从王屋山赴京，逗留一月，受到睿宗以及文武百官的热情接待。后来，卢藏用陪同承祯出京，将别，卢藏用手指着终南山，对承祯说：“此山大有佳处，何必老远跑到王屋山去呢？”

承祯本来就不满藏用的为人，一听这话，心中老大不高兴，便立即反唇相讥：“在我看来，这可是一个当官的最好捷径！”

卢藏用大惭而退。

女道士之死

唐朝咸通九年（868 年），正是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的时候。

东市刑场，一片肃杀之气。刑场四周，被几千名围观者堵得水泄不通。

突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死刑犯被押过来了。

刽子手甩去上衣，举起了酒碗，一饮而尽。

囚车进场，人们看清了囚犯：一位尽管憔悴却依然美丽得叫人惊奇的年轻女子。

她叫鱼玄机，名噪京都的女道士。

鱼玄机，字幼徽，小名蕙兰，出生于长安城一户小康人家。蕙兰自幼聪颖过人，活泼可爱。6 岁启蒙后，耽爱诗句。10 岁能诗，京师叹为咏絮之才。长到 16 岁，她已是一位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大姑娘了。她的美貌，她的才气，不知倾倒了多少人。可是，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如此一位才貌盖世的女子，只落得个为人作妾的命运。

蕙兰的丈夫李亿，字子安，在朝廷作补阙，是个无足轻重的谏官。婚后，他们相亲相爱，情意甚洽。蕙兰生性温柔多情，一次，子安远行，蕙兰春闺寂寞，忍不住拿起笔来，在彩笺上挥手写了一首情诗，题目就叫《春情寄子安》：

如松匪石盟长生，比翼连襟会肯迟。
虽恨独行冬至日，终期相见月圆时。
别君何物堪持赠，泪花晴光一首诗。

几个月后，子安归来，蕙兰喜不自禁，扑上前去，孩子似地叫了起来：“你可回来了！

真是想死我了！我说是怎么了。今日喜时闻喜鹊，昨宵灯下拜灯花，果然是喜从天降！”

蕙兰就是这么一个天真、纯洁、感情丰富的姑娘。可是，子安的夫人却是个妒妇，她见蕙兰才貌双全，各方面都胜过自己，便大发淫威，三天两头撒泼吵闹，嚷着要赶走蕙兰。蕙兰尽管善良，但不懦弱，她还有刚烈、好强的一面。为了家庭、为了丈夫，她强忍着心中的痛苦，毅然抽身退出，离开了这个家。

临别，她满怀幽愤，也满怀留恋，留下了一首凄婉动人的诀别诗：

醉别千卮不浣愁，离肠百结解无由。
蕙兰消歇归春圃，杨柳东西绊客舟。
聚散已悲云不定，恩情须学水长流。
有花时节知难遇，未肯恹恹醉玉楼。

在那个时候，被夫家休弃的妇女，大体只有两条路走：一是沉沦青楼为妓女，二是遁入宫观作道姑。作妓女，出卖色相，但可以享受豪华生活；作道姑，青灯凄苦，但可以获得精神自由。蕙兰毅然选择了后者。这样，长安城咸宜观里，出现了一位女道士，道号玄机。

初入道门，玄机倒并不在乎粗茶淡饭的清苦生活，而是摆脱不掉对子安的思念，在一首《感怀寄人》的诗中，玄机还表现了自己对前夫的一片痴情：

恨寄朱弦上，含情意不任。
灼灼桃兼李，无妨园士寻。
月色苔阶净，歌声竹院深。
门前红叶地，不扫待知音。

狠心的子安没有回音。玄机又一次遭受感情上的创伤。昔日的青春情怀，终于消逝了。从此，玄机心如古井，每日只是丛篁作伴，片石为俦。她写道：

落叶纷纷暮雨和，朱弦独抚自清歌。
放情休恨无心友，养性空抛苦海波。
长者车间门外有，道家书卷枕前多。
布衣终作云霄客，绿水青山时一过。

不久，这种平静的生活又被打破了。

尽管身为道士，但玄机仍然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妙龄女子，而且正是作为道士，玄机比一般女人有更多的机会出入社交场合，因而也惹来许多的麻烦。起初，一些轻薄公子，自命风雅，纷纷舞文弄墨，向玄机献上诗来。有个胡公子，诗中竟然夹带有挑逗、狎戏之词，玄机秉性高洁，又不避权贵，于是作诗回击：

何事玉郎搜藻思，忽将琼韵叩柴关。
不用多情欲相见，松萝高处是前山。

刚刚打发走那些风流哥儿，又有市井无赖找上门来。有个屠夫，叫陈二，他不象文士那样羞羞答答，而是开口就是借银子。玄机不信邪，竟然一口回绝。

正当玄机困于群小，自叹“茫茫九陌无知已”、“年年灯前欲白头”时，一位英俊潇洒、博学多才的刘郎出现在她身边。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诗家才子。咸宜观里，少男少女一见倾心，一见钟情。

这位纯真、直率，而且美丽动人的女道士，重新燃起了青春之火。玄机似乎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她爱得那么纯真热烈，爱得那么一往情深。她与心上人草上打毬，说出了“无滞碍时从拨弄，有遮拦处任钩留”的双关情话；她与心上人灯下斗诗，袒露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的火热情怀。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春节过后，邻院赵道姑邀玄机一同去城外拜访焦道姑。玄机已与刘郎约好午后相会，便想推脱不去。可赵道姑硬是连拉带扯把她拉上了车。玄机便交待女僮绿翘，教她请刘郎稍候。玄机本想速去速回，可焦道姑热情挽留，玄机便多喝了几杯酒，到了晚上才赶回来。

进了内室，绿翘来报：“刘郎久候不至，走人了。”

玄机一听恍然若失，片刻，她说：“我找他去！”

绿翘面露鄙夷之色：“炼师也该省省心了，你的刘郎回家去了，他说他在长安呆腻了，要回家看望父母去了！”

玄机又是伤心又是气，便责备绿翘："我是怎么跟你交待的？你怎么不留住他？你是干什么的！"

绿翘本来看不惯玄机的自由开放，便顶撞说："我是干什么的？我只是个道僮，只管观里的道务，谁管你的儿女私情！"

玄机气得粉腮转白，喊道："儿女私情怎么了？儿女私情怎么了！"

绿翘也不示弱："既入道门，就要超凡脱俗，可是你，只想着投桃报李！"

玄机一听，两行泪水夺眶而出："投挑报李也只一个，还叫你给拆散了！"

绿翘冷笑道："今年只是一个，谁知明年又是几个！"

玄机再也忍不住了，嚷道："好啊，你竟敢凭白侮辱我的人格！"

说着就向绿翘扑去，借着一股酒力，竟把绿翘推倒在地。绿翘脚下一滑，自己绊倒了花架，花盆猛地掉下，正好砸在自己的头上，顿时鲜血直流。

玄机一见鲜血，酒也吓醒了，马上跪下去，抱起绿翘，一边哭，一边急切地叫道："好妹妹，好妹妹！你醒醒，你醒醒呀！"可是绿翘已经说不出话了。玄机放声大哭："好妹妹，是我杀了你，是我杀了你啊！"

正在这时，房门猛地被人踹开，陈二、胡公子一阵风似地闯进来，嘴中大叫："出人命了！鱼玄机杀人了！"

原来，陈二、胡公子这帮无耻之徒，自从被玄机碰了一鼻子灰，仍不死心，三天两头总在观外转悠，只想占点便宜。这天晚上听到观内吵闹之声，就跑进来看热闹，正好听到玄机的哭喊，便破门而入，当下就把玄机押到官府去了。

官府中，并不乏陈二、胡公子这般垂涎玄机而遭到嘲笑、遭到拒绝的各色小人。这样，玄机竟以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饱受了半年的狱中折磨，玄机已经变得形容憔悴，遍体鳞伤了。但是，她仍然尽可能笔直地挺立在囚车上，眉宇间仍是那么清秀，一双明眸仍是那么清澈，神态仍是那么娴静，气度仍是那么高雅。

下了囚车，玄机抬起头来，凝视着铅灰般的天空，一言不发。而后，她回过头来，久久眺望着城南的大小雁塔，雁塔下面，是她儿时嬉闹的地方。现在是看不见了，而且马上就要永远地看不见了。两行凄清的泪水，缓缓地从瘦削的面颊上滑过，无声地洒落在这块即将用鲜血染红的刑场上。

刽子手高高地举起了屠刀。

解放肚皮　且一觉睡

五代末年，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有个陈抟秀才，读书十分勤奋，经史百家，治乱兴衰，莫不认真探究。可是，他总是过不了科举这一关。进士考不上，空怀济世壮志，慢慢地，他由失望变得激愤，由激愤变得消沉，一气之下，抛弃家庭，抛弃理想，上了武当山，在九室岩隐居，作了道士。渐渐名声大著，人称老祖。

这老祖有两手绝活儿，非旁人可比。一是精于《易经》，创立先天易学，传《无极图》于石壁之上，推算祸福，无不灵验；一是善于睡觉。这是他在邛州天师观向道士何昌一学来的锁鼻术，也就是一种神奇的蛰龙法，经过呼吸吐纳的自我调节，可以长睡不醒。而他的好朋友吕洞宾则认为："陈抟哪里是睡啊！他是在修炼内功，不是真人，谁做得到啊！只有他，才是真得睡仙三昧哟！"老祖自己也说："至人本无梦，其梦乃游仙；真人亦无睡；睡则浮云烟。炉中长存药，壶中别有天。欲知睡梦里，天下第一玄。"

于是，便引出一场故事来。

当时，五代十国。各种称帝，天下纷纷不宁。老祖一个百日觉睡醒来，又开始摆弄八卦。摆着、摆着，他忽然瞪大了眼睛，一动不

动地盯住卦图，半晌，自言自语道："天地之道，一阴一阳。天下大乱，终归大治。看来，这江山要归新人坐了。"说着，环顾天空，俯视群山，慢慢地，他的目光停留在中原大地。在那里，紫气萦绕，团团簇拥，历久不散。老祖以拳击掌，暗自说道："这是帝王之气，当有真命天子出世！看来，还须咱下山走一趟！"

老祖下山干什么去呢？老祖下山摆了一个算卦的摊儿，为将来的新天子指点

卦摊儿摆开，旗上写着两句话：

传圣人清高道业，算君子暗昧前程。

第一天，无人问津。

第二天，问津无人。

第三来，来了一主一仆两个人。老祖一见，双眼闪亮，赶紧招呼："请坐，请坐！"

仆人问过卦，老祖沉思片刻，对主人喝道："丙丁戊已庚，乾元享利贞。一字连珠格，三重坐禄星。您若不相信，罚我十锭金。"

主人微微点头，仆人便又催着老祖往下说。老祖一捋胡须，压低嗓门，又哼了起来："到这戍字上主冠带，水成形，火长生，避乖龙大小运今年并，若交得丙辰一运大峥嵘。您是南方赤帝子，上应北极紫微星。"

主人这才开口："先生大概就是陈抟老祖吧？"

老祖答道："贫道扶摇子，拜见圣……"

"上"字还没出口，仆人赶忙止住，老祖会意，又对主人说："这天下形势，中原为先。江山理王气，草木动威灵。贫道昨见中原王气腾升，陛下应当在汴梁建都，占住这块龙兴宝地。"

一阵密谋之后，各自分手。

没多久，这位问卦的主人发动"陈桥兵变"，果然黄袍加身，君临天下。他，便是宋太祖赵匡胤。那位仆人，就是后来权倾一时的王继恩。

老祖回到山上，醒时炼丹，醉后酩睡，没事儿时，拿个破镜子，左右端详，一本正经地自吹自擂："这是富相啊！非仙即帝！"得意时哼几句诗："万事若在手，百年聊称情。他时南面去，记得此岩名。"总之，山中岁月，好不自在。

但是，有人找上门来了。

原来，赵匡胤为酬谢陈抟的算卦指路之恩，也为了招揽这位预知前途的百事通，钦命王继恩前来迎接老祖下山，去往京城，作朝廷的特别顾问。老祖是人中之龙，当然一百个不愿意，谁去跟那些凡夫俗子、势利小人为伍呀！但是，王继恩既然带着圣旨，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连接带扯地把老祖带到了京城汴梁。

宋老祖一见老祖，也顾不得皇帝尊严，跳下龙椅，一把拉住老祖的手，问长问短，好不亲热，当下就给老祖封了一个嘉号，叫"希夷先生"，同时，又赐与鹤氅、金冠、碧玉圭，特许老祖着道士装参与政事。

老祖不是自许"非仙即帝"吗？现在既为帝师，太祖又恳切求救，他就把自己的南面之术展示一二。他显得不耐烦地说：

"哎呀，治国治民，小事一桩，成仙都有法，理民还不是小菜一碟？叫下面的人拿纸笔来！"

说着，抓过笔，胡乱涂了四个字："远近轻重。"

太祖笑道："天书，天书！还求希夷先生稍加解释。"

老祖撇撇嘴，说："远嘛，远招贤士；近嘛，近去佞臣；轻嘛，轻赋万民；重嘛，重赏三军。"

太祖拊掌上悦，连连称是。

可是，没多久，老祖不干了，跑到太祖那儿发牢骚："不舒服，不舒服！我本来是闲云野鹤懒散惯了的，可现在倒好，朝觐啊，听政啊，罗里罗嗦的事不知道有多少！再不，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这个官、那个官，三天两头上门请教道术。想得道，想成仙，热衷名利、贪图富贵、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人，也想得道，也想成仙？真是叫人笑掉大牙……"

太祖见老祖这样生气，忙打断他的话：

"息怒,息怒,有话好说嘛!"

老祖不理睬,继续发脾气:"酒也喝不醉,觉也睡不足,整日无精打采,还要为这些世俗琐事耗费心血和元气。真是气煞人,真是笑煞人!贫道早已灰心名利,怎么又跑下山来招惹是非呢?不行,不行,归来去兮!"

太祖还是笑,说:"慢慢就会习惯的嘛!"

老祖本来已经平静,一听这话,火气又冲上来了:"习惯?我干嘛要习惯?红尘中的鸡虫得失,黄阁上的蝇头利禄,还让我习惯,好笑!"

太祖沉不住气了,拉下脸说:"我给你高官厚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怎么不好?"

老祖也不示弱,顶嘴回击:"我自有高山流水,做不完的蝴蝶仙梦,岂不更好?"

太祖提高了声音:"这里有山珍海味,雕梁画栋,怎么不好?"

老祖也提高了声音:"我自有灵丹妙药,鸟语花香,岂不更好?"

太祖气得大拍龙椅:"这里有黄金成山,美女如云,难道不好?"

老祖气得直戳拐杖:"我自有石枕上的清风,脚底下的白云,岂不更好?"

左右大臣闻讯,都来劝解,可是老祖始终不肯松口,只是说:"我只会睡,我只想睡,除此之外,一无所求!"

最后,太祖没了办法,只好大摆三天宴席,文武百官都来送行,恭恭敬敬把老祖送回了武当山。

从此,老祖便在山上过着茅舍土炕、瓦缸野菜的简陋生活。怎么舒服怎么着,哪样高兴哪样来。走到哪里,便睡到哪里,反正是幕天席地,倒头便睡,直睡得松枯石烂,斗转星移。

臣爱睡,臣爱睡,
不卧毡,不盖被。
片石枕头,蓑衣铺地,
震雷掣电鬼神惊,
臣当其时正鼾睡。
闲思张良,闷想范蠡,
说甚孟德,休言刘备。
三四君子,只是争些闲气。
怎如臣,向青山顶上,白云堆里,
展开眉头,解放肚皮,
且一觉睡!
管甚玉兔东升,红轮西坠!

——陈抟《对御歌》

宋真宗天书封禅

宋真宗伪造天书,借此"天瑞"举行封禅大典。它的起因,还是从著名的澶渊之盟说起。

北宋景德四年(1004年),辽国萧太后、圣宗耶律隆绪集中几乎所有的兵力,大举南侵。这时的辽国,已经完成政治经济的封建化进程,国力大振,君贤民强;而北宋政府却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在这之前,鉴于辽国日益强盛,觊觎中原,宋军也曾主动进攻两次。第一次在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军攻至北京城外高梁河,两方激战,宋军败北;第二次在雍熙三年(986年),宋军三路分进,辽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宋军著名将领杨继业兵败被俘,绝食而死。这一次,却是辽军主动进击了。宋朝屡败之余,早已胆怯三分,加上宰相王钦若等人贪生怕死,纷纷主张迁都退让,便使宋朝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当时,只有一位忠臣寇准力主抗战。真宗也觉得迁都有损国格,于是委任寇准负责全面指挥军事行动。寇准深知士气低落,决难取胜,因此极力动员真宗亲自出征。真宗不便固辞,便同寇准一起北进,迎击辽军。两军战于澶渊(今河南清丰、濮阳一带)。刚一交战,辽国大将萧挞览便中宋国伏弩而死,辽军士气大挫,不久主动提出议和。宋军本可乘胜追击,但是真宗不愿久战,只希望敌军能够尽快撤退,竟然同意议和。辽军一看宋人软弱

可欺，又提出割地要求。真宗不愿割地，主动提出赔款。这样，作为战胜国的宋朝居然每年必须向辽方贡献白银 10 万两，细绢 20 万匹。如果不是寇准大力抗争，那么，赔款的数字还要大得多。在这个基础上，两国结盟，成为兄弟之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自古以来，只有边疆地区向中原之主称臣纳贡，这一次，一个泱泱大国的天子亲自出征，却与一个小小的辽国订立城下之盟，一时间，舆论哗然。

这时候，当初主张迁都的王钦若乘机跳出来了。

王钦若早年流浪四川，曾遇见一位道士，举止怪诞。那道士告诉他，今后定可官至宰相。从此，他便开始留心道教。五花八门的书，什么都看；三教九流的人，哪个都交。天长日久，他自己也几乎成了一个道士。后来作官，便经常找些灵芝啊、甘露啊，说成是主上圣明，才能招致这些吉祥之物，花言巧语地进贡朝廷，以此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终于作了宰相。这样，他对道教更是深信不疑。辽兵南下，他就是听信道士之言，说是“战必败，凶无穷”，因此才极力鼓噪迁都。后来寇准主战，又把真宗争取了过去，他便视寇准为眼中钉、肉中刺。现在举国上下都以和议为耻，他便觉得时机已到，可以一箭双雕：一来报复对手，二来重新争取皇上的宠信。

这天退朝之后，王钦若独自留下来，向真宗挑唆：“澶渊之役，国人皆以为耻，陛下却反以为寇准有功于社稷，臣实在不解。”

真宗反问道：“我方不是顶住了敌军，保住了国土吗？寇准指挥有方，当然有功。怎么不可理解？”

王钦若故作激愤地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寇准一再坚持陛下亲征，结果却害得陛下以万乘之贵而屈为城下之盟。这样的奇耻大辱，都是由他一人引起，罪不可赦！”

真宗一听，果然怏怏不乐，便说：“朕知道了，以后对他的话，朕少听一些就是了。”

第一个目的达到，王钦若又着手第二件事。他不露声色地说：“匹夫匹妇也知报仇雪恨，难道我大军就这么忍气吞声吗？”

真宗火了，大声说：“那你说怎么办？”

王钦若知道真宗怯战，便故意将他一军：“杀到辽国，活捉辽主！”

真宗一听，不作声了。王钦若乘机端出自己的如意算盘：“陛下如果哀叹民生，不愿用武，那么，臣建议我朝迅速举行封禅大典。这样，既可以夸示四海，威镇四夷，又可以洗刷前耻，挽回民心！”

真宗迟疑地说：“无缘无故，怎么好封禅？”

原来，封禅是古代一种非常隆重的祭祀仪式，一国之主，亲至泰山，封土建禅(坛)，祭拜天地。秦皇、汉武以下，历代沿袭。可是，有一条规矩，必须有嘉祥之瑞，才能举行封禅典礼。

王钦若早已谋划好了，马上答道：“陛下肯定是因为国家没有天瑞，所以不便封禅。可是自古以来，一切天瑞，几乎都是人为的。《河图》、《洛书》，果真定有其事吗？这都不过是圣人凭借神道用以宣施教化罢了！”要天瑞还不容易？自己编一个就是了。只要陛下深信不疑，谁还敢说个‘不’字？”

一番话，说得真宗动心了。

过了一段日子，真宗朝会，煞有介事地对群臣说：“近来啊，朕总是做一个同样的梦。一个神仙总对朕说：‘春天做个道场，天书三篇为赏！”朕不敢相信。又不敢不信。只道是天机不可泄漏，便在城内做了一个道场。今天得到报告，果真有天书降临。”

说完，便带领群臣去迎接天书。他们来到承天门，望天拜谢，将天书迎进道场。王钦若上前，展开两丈有余的黄帛，取出一轴，将封口处的一行大字展示给众人看。

“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

君臣一见最末一字，纷纷跪下叩首，向真

宗表示祝贺。原来，真宗叫赵恒。“付于恒”，不就是付于真宗吗？王钦若见状，又打开卷轴，现出天书三篇，名曰《大中祥符》。

这下可不得了了，天书降临，举国同庆：奏告天地，大赦天下，加官文武，改元中有祥符……当然，所有这一切，王钦若必定拉辽国使臣到场参观。

既然有了天书，当然就有资格进行封禅了。于是，文武百官，僧道百姓，成群结队，成千上万地前来诣阙请愿，其神色之虔诚，态度之坚决，连真宗等人也没有料到。可是，虽然他急不可耐，恨不得一步跨到泰山，但又不得不摆出一副谦让的姿态，再三推让，再三拒绝，翻来复去地表示：“寡人无德，怎能轻议封禅呢？实在是不能批准你们的请求！”

于是，王钦若又制造了一篇天书，这次不偏不倚，正好降在宫中，从而全国上下，再一次掀起了请求封禅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真宗才装出一付听天由命的样子，答应前往泰山封禅。

就在皇舆浩浩荡荡开赴泰山的途中，一路上，不断有新的祥瑞之事奏报上来：什么山出醴泉呀、天降甘露呀……最奇特的是，天书第三次降临，而且就直接出现在泰山半腰的一棵老松树上，此外，在山顶玉女池，又捞出了一尊石雕神像……

这次封禅典礼，简直是隆重极了：高高的祭台上，中央供着上帝的牌位，左右两边，宋太祖、宋太宗配享。祭礼官万分虔诚地捧上天书，置于上帝之前。真宗亲自祭拜，然后，大臣宣读玉册文、玉牒文……最后，王钦若率群臣山呼万岁。

天书一连三次降临，真宗身上蒙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臣民们也暂时淡忘了澶渊之盟的记忆。封禅大典的举行，又展示了宋朝作为上国的风威，辽国的君臣多少也收敛了一些嚣张的气焰。从此以后，辽军再也没有南侵，直到真宗去世。这次天书封禅，总算起到了一点点作用了。

被俘虏的教主道君皇帝

北宋徽宗皇帝赵佶，是个臭名昭著的佞道昏君。

追溯起来，有两件事促使徽宗崇奉道教。第一件，道士郭天信预言赵佶“当履天位”，后来登极，他便对道士格外垂青；第二件，哲宗孟皇后误将钢针吸入喉中，御医束手无策，皇后命在旦夕，是茅山宗师刘混康将钢针取出，皇后转危为安。自此以后，徽宗对道术便是深信不疑。

即位之后，徽宗便亲自掀起了尊奉道教的高潮。

首先，他一次次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方术精妙的道士。徐守信、王老志、王仔昔、张虚白、王文卿、林灵噩……一个个走出洞府奔赴汴京。

其次，他亲自颁赐道号，一时间，什么“观妙先生”、“通玄冲妙先生”、“通真达灵先生”、“洞微先生”、“通妙先生”……数不清的“先生”满天飞。

第三，他下诏品秩道士，即依照政府官吏的品秩，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天下郡县官长与各部监司，必须尊敬道士，以客礼相见。

第四，他规定各级各部门设立道学、道举，也就是使道教象儒教一样成为官学，各地推举优秀道士进京大考，按成绩高低，低次授予元士、高士、大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等称号，分别授予相应的官职。

其他诸如编道藏、修道观、祀道君之类，不胜枚举，不一而足。

常言道：“上有所好，下必有盛行焉。皇帝如此偏爱道教，群臣便蜂涌而起。首先便有蔡京、蔡攸父子投其所好，四处搜罗道士，进献朝廷，又通过道士装神弄鬼取信贴近徽

宗的后妃、宦官，很快便受到了徽宗的重用，位登宰相。此外，又有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功、李彦等与蔡京臭味相投，朋比为奸，时人号为“六贼”。“六贼”掌权，便诬陷司马光等100多人为“奸党”，把他们赶出权要部门，然后，便肆无忌惮地利用道教蛊惑徽宗，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徽宗一味沉湎于道教，日思夜想，有一天竟然梦见了太上老君，老君托付他振兴道教。第二天，徽宗喜形于色，绘声绘色地向臣下讲述了这个异梦。自然，君臣称颂，大拍马屁。

过了几天，徽宗便到南郊祭天，行至南薰门，徽宗以手指天，叫道：“我怎么觉得空中有好多楼台宫殿呀？”

其他人赶紧朝天上搜寻，半天无人回答，还是蔡攸反应快，连忙附和：“是呀，小臣也看见了！”

群臣回过神来，争先恐后地嚷道：“臣也看见了！啊，多么壮丽辉煌！”

徽宗以手遮目，又问：“楼台上是不是还有人呀？”

蔡攸又说：“有，有！有童子数人，手持幡盖，轮流出现，衣服、眉毛，臣都看得一清二楚！”

徽宗回宫，亲自写了一篇《天真降临示现记》，布告全国，好让天下百姓都知道皇上的神圣。

蔡攸拍马屁有功，不久又加官晋爵，更加不可一世。

这情景，道士林灵噩一一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吃醋啊！他好不后悔，痛心疾道地反思：装神弄鬼，咱是行家呀！怎么叫那姓蔡的小子争了先着呢？他们得宠了，我们这些道徒怎么办？不行，得赶紧想个法子，不然，就得卷铺盖滚蛋了！

林灵噩根本不是一个正经道士。早年他在佛门为僧，因为不守教规，常常受到师傅鞭打。他实在吃不消了，竟改换门庭，摇身一变，蓄起头发，作了道士。这人别的本事没有，只有一样，胆子忒大，反正吹牛皮不犯法。当他第一次晋见徽宗时，便口出狂言，吹嘘“上知天上，中识人间，下知地府”。徽宗已被骗子骗惯了，一切假话，在他那里畅通无阻。听了林道士的大吹大擂，还着力表扬了他一番。

一连几天，林灵噩苦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策，于是立即进宫。

见到徽宗，林灵噩故作神秘地说：“陛下，昨夜三更，老君向贫道托梦，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大言欺世，这是他的惯伎。徽宗果然中计，忙问：“什么事？快讲！”

林灵噩上前一步，满脸堆笑地说：“老君说了，天有九霄，神霄最高。神霄府有个神霄玉清王，名叫长生大帝君，是上帝的长子，为了救苦救难，暂时来到人间，作了大宋皇帝……”

叫到这里，徽宗跳了起来：“那么说，就是我！”

林灵噩继续说：“对，就是陛下！老君说他曾经给陛下托过梦。老君还说，蔡京、童贯他们本都是神霄府的仙伯、仙吏，刘贵妃本是神霄府的九华玉真安妃。至于贫道，也是仙卿，本名诸慧，受上帝派遣，辅佐陛下！”

徽宗高兴得连姓名都忘了。为了感谢林道士，徽宗亲自为他改名林灵素。

没多久，徽宗下诏：“朕乃昊天上帝之元子，为在霄帝君，悯中华惑于佛教，遂哀求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从今以后，天下百姓皆须诣道观受我神霄秘箓。卿等可以上书，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天子圣旨，谁敢不从？

林灵素被封为“金门羽客”，从此出入宫禁，与宰相平起平坐。没几天，因为与皇太子争道，被贬斥回家。

北边的金人见到大宋江山把持在这帮昏君佞臣之中，乘机挥兵南下。这些年，宋朝一味兴修道宫，国力顿减，军事松弛。外兵入

侵，当然不堪一击，于是节节败退。

教主道君皇帝连连求助于神霄道术，可是金兵仍象潮水般地涌来。教主见大势已去，只好宣道士王文卿进宫，向上帝乞求指示，上帝问答四个字："革则无悔。"于是，教主匆匆传位天太子，带上蔡京、童贯向南方逃跑了。

新任钦宗皇帝的兵部尚书也是个道教崇拜狂。他手握重兵，偏偏不用，却迷信道士郭京。郭京拍着胸口保证："只要我一作六甲法术，金兵主师立即俯首就擒！"说完打开城门，正要作法，金兵呼啸而至，郭京丢下首教，只身逃走。

徽宗、钦宗双双被俘。这个被俘虏的教主道君皇帝，就这么穿着紫色道袍，戴着逍遥云巾，被金兵作为战利品押走了。

张三丰与武当内家功夫

武当功夫名闻天下，它的创始人，是明朝初年的大道士张邋遢。

邋遢本名三丰，道号玄玄子，为人不修边幅，整天邋里邋遢，人称张邋遢。

三丰其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也是一个富于修养的出家人。一般人常把他混同于那种跑江湖、混饭吃的末流道士，实则不然。

三丰年轻是时，刻苦好学，什么书都读，儒、释、道，有什么看什么。他又生得聪明，读书过目成诵。天长日久，便已精通三教，融会贯通。在他看来，天下只有正邪二教，儒、释、道皆为正教，其他违背自然法则的异说才是邪教。只要真心修道、成圣、成佛、成仙，都是必然结果。

由于三丰于教派不持门户之见，对道德修养又有很多独到见解，因此，他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当然，三丰后来还是入了道。正因为他入了道，碰巧又姓张，人们便盛传他是汉代天师张道陵的后代。见过他的人，又四处传颂，说张天师这个后裔不是凡人，身姿魅伟，圆眼睛，方耳朵，美髯齐胸。不论严寒酷署，身总是穿着一衲一蓑。要么就是几个月不吃不喝，要么就是吃他三天三夜。

总之，人们对三丰，说什么的都有。三丰从来不关心外间评说，说张邋遢也好，说张天师也好，一概付之淡淡一笑，依旧我行我素，随心所欲。

三丰是辽东人，却跑到陕西宝鸡修道。在金石观静心修炼了三年，然后进入蜀中。在道教第九洞天青成山又修炼了九年，然后折回荆楚，在武当山定居下来。

武当山气势险峻，有上十八盘、下十八盘等险关，有三十六涧、七十二峰等险境，宫观林立，道徒众多。三丰到此，谢绝尘务，一心悟道。

三丰人在山中，名声在外。朱元璋，先前的穷和尚，而今的明太祖，特派宫中使者，入山迎接三丰进京。三丰不屑于以方术杂伎迎合帝王，一口回绝。过了十几年，明成祖朱棣移都北京，仍然器重三丰，屡屡遣使拜访，三丰干脆避而不见。成祖是真心钦佩三丰，亲自给三丰写信，热情邀请。信是这样写的：

皇帝敬奉书真仙张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亲承仪范，尝遣使致香奉书，遍诣名山虔请。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体合自然，神妙莫测。朕才质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谨致香奉书虔请，敬候云车风驾惠然贲临，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怀。

三丰也确实坚贞，抱定一个死理：既入道门，则不谄权门。结果使者只在岸石上见到了三丰的一首明志诗：

三丰隐者谁能寻，九室云崖深更深。
玄猿伴我消尘虑，白鹤依人引道心。
笑披皇冠趋富贵，并无一个是知音。

真是个天子不能屈。明成祖却因此更加

崇敬三丰。

三丰就是这么一个人,清静无为。

这种清静无为的修养,却使他无意间创立了武当内家功夫。

那阵子,三丰正在山上温习《道德经》。洋洋5000言,三丰似乎只看到了一个意思:虚静。虚即不有,静则无为。由此推衍,拙胜于巧,静胜于躁,虚胜于盈,柔胜于刚……归纳起来,便是无为而无不为。

于是,一连数日,三丰心里默念"清静"、"柔弱",考虑怎样把5000言的主旨更好地运用到处世摄生之中。

当时正是初夏天气,藏于深山老林的道观,空气清幽,甚是宜人。三丰这天正在窗边沉思,突然,庭中传来几声急促的鹊叫。三丰抬头看去,只见梧桐树上,栖着一只喜鹊,双眼下视,正张牙舞爪地跃跃欲试。三丰再往地上一看,只见地上蜷着一条长蛇,蛇头昂起,盯着喜鹊,身子却一动不动。蛇鹊相视片刻,喜鹊猛地扇动翅膀,朝长蛇扑了下来。蛇头灵巧地一摆,躲过喜鹊袭击,而喜鹊用力过猛,一下子冲到地上,蛇却见机而动,闪电般地向鹊身袭去。喜鹊赶紧跳过一边,随即又飞上树枝。长蛇仍然蟠踞地面,昂首以待。

三丰起初只是觉得好奇,这时似乎发现了什么奥秘,便伏在窗口,屏住呼吸,饶有兴致地观看这场蛇鹊之战来。

树上,喜鹊仍在用力鸣叫,翅膀不停地扑动,似乎想以气势镇住长蛇;而蛇则以逸待劳,以静制动,鹊不近身,便不主动出击,喜鹊叫了一阵子,再次扑下来,动作更凶猛,蛇则蜿蜒摇摆,轻身闪避,瞅准机会,竟咬了喜鹊一口,喜鹊哀叫,掉头反击,蛇却早已躲在一边。喜鹊受伤,再次飞上树梢。喘口气,喜鹊第三次飞下来,摆出一副不要命的架势,嘴中不停地叫,翅膀不停地扑,双爪不停地抓,缠住长蛇拚命。长蛇不急不忙,总是招架躲避,等到喜鹊精力衰竭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口咬住了鹊头。喜鹊顿时一命呜呼。

看到这里,三丰以拳击掌,脱口叫道:"好!好一个以静制动,以柔克刚!"

当即,三丰来到庭中,模仿长蛇"静如处子、动若蛟龙"之势,一招一式地练了起来。三丰本来道性深厚,5000言已烂熟于心,便运用老子虚静柔弱的原理,吸取长蛇尚意不尚力的经验,拳术、剑术顿时出神入化,成为天下绝技。

张三丰一生清虚自守,没想练就了天下第一的武当功夫。

后世的人,根据少林主搏、武当主守的特点,把少林称为外家拳,把武当称为内家拳。

内家拳流传至今,风靡天下。

这一切,都是三丰始料不及的。不过,就是预料到了,他也必定懒得管。

雍正大帝怒斩道士

康熙帝的四阿哥雍亲王胤真要尽手腕,终于登上了帝位,这便是清世宗雍正皇帝。

雍正帝每日生活在政治斗争的中心,给折腾得心力交瘁,天长日久,终于生出一场大病来。

这病来得很猛,御医个个束手无策。雍正缠绵病榻,不禁想起一个人来。

这人是位身怀绝技的老道。二十多年前,雍亲王的心腹戴铎被派往福建,路经武夷山,禁不住游兴大发,便轻车简从上了山顶。绝顶处,松风阵阵,云雾飘飘,热衷功名的戴铎竟一时产生了出世之想。这当儿,一位采药的老道也来到了山顶。道人一见戴铎身着官服,扭头就走。戴铎追上去,问老道所采何药,所医何病?又问老道擅长何术,问自己前程何如?老道急于脱身,只说采无名之药,治未病之病,贫道一无所长,大人前程无量。戴铎听得有趣,正待进一步探究,老道却打开酒葫芦,连喝几口,打个呃,口中传出浓烈的酒药气味,把戴铎的眼泪都呛出来了。戴铎下

得山来，便给雍正亲王上了一个书启，把老道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雍亲王当时正觊觎帝位，很想找一个身怀异术的相面先生为自己掐算前程，一听说戴铎的奇遇，便赶紧回信，指示戴铎速上武夷山，然后又如此这般地密嘱了一番。戴铎便二上武夷，花了老大功夫，好容易找到了老道。他先是七扯八拉地瞎聊了一通，然后便转弯抹角地问起雍亲王的八字。老道一听，脸色刷地一沉下来，厉声说："国家大事，山野小民不敢多嘴！"说完起身就走，戴铎冷笑道："四周都是雍亲王派来的亲兵，你今日不说实话，量你也插翅难飞！"就这么僵持了半个时辰，老道终于开了口，吐出三个字来："万字命。"戴铎不解，老道恨恨地斥道："蠢才！你的主子心中有数！"戴铎恍然大悟，丢下老道，飞也似地跑下山，命人火速将密信送往北京。雍亲王得信，欣喜若狂：万字命，不就是万岁爷的命吗！几年之后，雍亲王真的成了雍正帝。

现在，雍正帝见病势沉重，只好再求助于道家方术之士，只是苦于不知那位武夷老道的姓名，而且，他也不便说出当年那段争储夺嫡的往事，更何况，聪明绝顶的老道，自知犯了杀头之罪，还不早就远走高飞、隐身埋名了吗？雍正考虑再三，强打精神，勉支病体，给四方疆臣下了一道密谕，嘱留心察访医术高明、道性深厚的出家之人，倘若访得，一面奏闻，一边送京。雍正求医心切，一口气写了九份。

浙江总督李卫接奉密谕，立即命人四处延访，没多久，找到了一个很有名气的道士，据说是有起死回生之术，医道高明得不得了，人称活神仙，简直是扁鹊再世，华佗重生。李卫听了，好不高兴，心想："只要治好皇上的病，我就不愁没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于是，一面向朝廷奏报，一面将道士请进府中，待为上宾，殷勤款待。

雍正得奏，反问侍臣："贾士芳？是不是那个白云观的贾士芳？不要，不要！"

侍臣回答："奏子上没写。不过，既然是浙江所荐，想必不是白云观的那个贾道士吧？"

雍正一听，便沉吟不语。

侍臣进一步说："奏子上说，贾道士医术精深，所活无数，陛下试试也无妨。"

雍正苦笑道："病急乱投医。那就让他来吧，不管假道士、真道士，能治病就是好道士。"

雍正为什么不喜欢白云观的那个贾道士呢？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

前几年，京西白云观有个道士贾士芳，此人并不潜心修道，反而追逐声名。仗着白云观处于全真道第一宫观的地位，为自己捞取声誉。每年春节前后，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特别是正月十九的"燕九节"，更是车马络绎，游人如云。相传，这一天是长春真人丘处机的生日，四方百姓都来烧香礼拜，进山门时摸摸小石猴，到老律堂摸摸大铜骡，以求祛病免灾，讨个吉利。贾道士便利用世人的这种心理，装神弄鬼，为人们治病。这样，名气一天天大了起来。怡亲王允祥为了讨好皇兄，便把贾道士推荐给了雍正。

贾道士奉旨入宫，好不快活，自以为了不得了。雍正一见，便断定此人浮华不实，不是那种涵养深厚、宠辱不惊的真道士，便冷冷地把他打发走了。贾道士乘兴而来，扫兴而归，自知再难以在京城立足，便知趣地离开了白云观。

真是无巧不成书，李卫总督府中奉若神明的这个活神仙，正是当年白云观的那个贾士芳。这些年来，贾道士浪迹中原，四方求师，倒也真还学了一些本事，他生性灵巧，一学就通，加上自吹自擂，人们便把他看成神医了。最后，发展到"二进宫"的戏剧性一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

有了第一次进宫的教训，贾道士这次处处显得小心谨慎。也许是天意的安排，雍正帝这次生的病，正对贾道士的路子，几副药下

来，雍正病情大减，没多久，病完全好了。于是，雍正帝对贾道士赞口不绝，恩赏有加。

贾道士从一个不受欢迎的妄人，成了一个最受宠信的神人。整日间，贾道士就生活在皇上的褒奖状、公卿的吹捧之中，不知不觉间，他又开始趾高气扬，自命不凡起来。

一天，贾道士照例入宫，为雍正检查身体。适逢雍正这几天心情不好，一见贾士芳，便不耐烦地打发他退下。可是，贾道士不识趣，反而故弄玄虚地说："陛下气色欠佳，不可忽视，千万，千万！"

雍正帝板起面孔，斥道："你看朕哪点气色不佳？"

贾道士凑上来，装模作样地打量了一遍，答道："陛下病体初愈，元气未复，还须贫道用心调理……"

雍正把手一挥，打断了贾道士的絮叨："那你就再开几剂药好了！"

贾道士也许是鬼迷心窍，说道："今天不开药方，只需按摩，便可手到病除。不是贫道自吹，我这手上功夫，没人能比！"

这样，雍正只好耐着性子让贾道士开始按摩。贾道士便在雍正身上，这里捏捏，那里捶捶，足足折腾了半个时辰。雍正帝已是忍无可忍，而贾道士却兴致正浓，他一边按摩，一边叽哩咕噜念起经咒来："……天地听我主持，神鬼听我驱使……"

谁知道，雍正帝纵身跃起，指着跌倒在地的贾道士骂道："朕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还不过是上天之子，也还要敬奉鬼神，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妄自尊大，竟然说天地鬼神都要听你摆布，你该当何罪！来人，拉下去！

一个月后，刽子手的鬼头刀一挥，贾士芳的头颅落到了地上。

第一洞天

道教里有个特殊的词儿，叫"洞天福地"。什么叫洞天福地呢？说白了，就是神仙境界。唐宋大道士杜光庭，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广成子，作过一段奇妙的描绘：

乾坤既开，清浊始分。融则为江河，结则为山岳。它们各自配对星辰、洞天，由大圣之君、上真之主主宰。至于那些灵宫秒府，玉宇金台，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们或者是阴阳所成，凝云虚构，或者是瑶池贯注，碧波荡漾。那里有神风飞龙，有天马仙鹤。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一一蕴涵其中。洞天福地，就是天地之枢纽，阴阳之机轴。时而漂泊于海上，时而回环于天中。它们或者为细流所萦绕，或者为洪涛所阻隔，或者为日光所不照，或者为人迹所不及。《龟山玉经》上说：宇宙之间，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皆有真人居住、仙王管理。

总之，要把这洞天福地一一描绘，哪怕是一年 360 天也说不完。这里，单把这第一大洞天王屋山说一说。

王屋山位于洛阳以北 100 多里，南望黄河，西接昆仑，东连沧海。气势雄壮，岗峦起伏，高耸云霄，倚悬星晨。《龟山玉经》云：周回万里，为山水之源。上有天坛，为清虚小有洞天之所。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地方，而且，它也不同于一般的洞天福地。上古时代，一场关系人类命运的大决战，最终还是在这里得到解决的。

话说远古以前，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生人类，人类拥立黄帝，作为四方主宰。可是，常常有臣民起来造反，南方的蚩尤就是其中的一个。蚩尤是炎帝的后代，长着人的身子、牛的蹄子，有四只眼睛六只手，铜头铁额，毛发如戟。他吃石头、吃铁片，又善于制造各种兵器，更擅长呼风唤雨，驱妖驭怪。他发动了南方的苗民，浩浩荡荡向中原杀过来。

黄帝仓促迎战，第一个回合，便败下阵来。第二天，黄帝派应龙督战。应龙上阵，行云布雨。蚩尤则变幻多方，生出漫天大雾，直

杀得应龙人仰马翻，丢盔弃甲。第三天，黄帝派出爱女旱魃。旱魃一出现，顿时烈日当空，把大地烤得通红。可是蚩尤请来夸父族的队伍，个个能征善战：他们都是追日英雄的后代，当然不怕太阳了。于是，黄帝又失败离。

在这阪泉之野，黄帝九战九不胜。

黄帝没法子，只好求助于西王母。首先，他清斋三日、香沐三日，然后来到了王屋山。他登上山顶，来到琼林台。这台上上有一级、高二丈，下有二级，高三丈，四方壁立，恰好一个天造地设的祭坛。于是他选定此处，上告皇天。三天过去，终于感动了九天玄女王母娘娘。娘娘浮现空中，降授九鼎神丹经阴符策。黄帝稽首拜谢，回去后即运用神策布战，与蚩尤战于涿鹿。九天九夜，血流成河，最后，蚩尤被黄帝活捉 。黄帝砍下蚩尤的头，抛在大荒之中。

从此，黄帝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天下才渐渐安定下来。

到了八月十五日，黄帝横渡黄河，再次登临天坛，祝香祭拜。不一会，西方天空传来阵阵香气，黄帝抬头望去，只见空中千骑万乘，皆穿五彩羽衣，手持珠幢锦伞、霓旌绛节，翩然而至。其中一只青鸟，飞到黄帝面前，声音清澈地说："阿母降矣！"

话音刚落，王母娘娘来到眼前。娘娘头戴金冠，身穿金黄羽衣。黄帝纳头便拜，千谢万谢，献上酒食。娘娘笑道："天仙不饥不渴，不食人间烟火。今后如若供奉上界神仙，只须择吉日、筑道场、设净席、布香灯花果而已。"语毕，冲天而去，天乐嘹亮，响彻云霄。

从此，这里草木葱郁，山泉甘甜，天地灵气，尽萃于此，成为三十六洞天神仙集会之地。后世道徒，更是把这里视为道教圣地。每到八月十五日，四方道士云集于上经，考校功行仙籍，得道者，即可进入洞天。

据说，有个虔心修炼的道士，就在这个神仙境界中畅游了一次。

当然，那是一个八月十五的朝会之日。经过考评，这道士名列第一。到了五更之初，天气清明，道士神明澄朗，忽闻岩际传出仙钟乐声。俄顷，岩下飞出天鸡数只，一声接一声啼鸣报晓。道士随着天鸡，拾阶而下，来到一处悬崖上。天鸡俯身冲下，道士也觉气血充沛，临崖而立，俯身万仞，丝毫不惊，纵身一跃，落在一个石座上。座右有一巨石，高数十丈，中间有个洞。道士探身进去，侧身穿过一段石梯，忽见天日明朗，别是一个世界。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瑰丽、那么秀美，言语难以描绘。道士便信步漫游，来到一付葛藤织就的天梯前，攀援而上。来到峰顶，黄河、嵩山、昆仑山，尽入眼底，仙风拂襟，白鹤环舞，道士只觉心旷神怡，飘飘欲仙。

道士盘桓多时，转身向别处游去。走仙人桥，来到踩云洞。只见青溪万仞，碧涧千门。又听烟萝嘶风，溪水淙淙。道士顺着溪水走下去，来到一处悬崖下。崖上，一道瀑布从天而落，道士叹道："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话音未落，瀑布里面传出莺歌般的声音："谁在说话呀？"

道士闻声而入，猛见洞中重重叠叠，尽是金玉之殿，金童玉女，穿梭往来，日月辉映，星辰列布。道士脱口赞道："此真王者之居也！"

金童玉女，闻声止步，一齐朝道士俯首行这礼。人群中，转出一位长者，朗声笑道：

您真是得道之人啊！此处正是西王母之宫，故称王屋山。您此番仙游，也是道缘所至。出去之后，慎勿轻传。"

道士从洞天中走出，赋诗一首：

王屋天坛福地玄，清虚小有洞天仙。
无穷胜境于人物，有感神通今古传。

凤凰来仪

春秋时代，有个名叫萧史的英俊潇洒的青年，得到了仙人的指引，名登仙籍，来到了

天国。天国风物，奇妙无比，可是，萧史却常常望着下界出神。

一位仙姑善解人意，有一天，她悄悄问道："你好象总有心事？"

萧史脸红了，支支唔唔："嗯——哦——不，没有。"

仙姑轻轻地笑了，说："有心事不要憋着，说出来，大家帮你解决嘛！"

萧史这才不好意思地说："飞升之前，来不及通知她，否则，可以把她带来的。"

仙姑笑得更加粲然，问道："她是谁呀？"

萧史更加害羞，答道："她叫弄玉，是秦穆公的女儿。"

仙姑微微点头，又问："弄玉姑娘今年芳龄几何？"

"今年，今年……12岁。"

"嗨，人家才12岁，你呀，单相思！"

萧史辩白道："她很喜欢我的！"

仙姑直摇头，说："12岁的女孩，今天喜欢你，明天就讨厌你了。"

萧史急了，大声说："不会的，她不是那种人！"

这时，仙姑掩嘴笑了起来："看把你急的，我是和你闹着玩呢！不过，可以看出，你是真心的。难得啊！"说着脸上现出一片阴云。

萧史没有在意，继续说："我要把弄玉接上来，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仙姑叹了一口气，缓缓说："倒底还年轻。你说接她上来，就能接她上来？仙缘不到，也是枉然啊！"

萧史央求道："好姐姐，帮我想个法子！"

仙姑沉吟片刻，答道："好吧，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去为你说说情吧。"

第二天，仙姑找到萧史，一脸笑意："好了，玉皇大帝特批，放你回人间度假三年，度弄玉成仙……"

不等仙姑说完，萧史一跳老高："啊，太好了，我这就走。"

仙姑双手拦住："这就走？你打算怎么度她成仙？"

萧史搔头头发，说："咦，这倒没有想过。"

仙姑嗔道："不成仙，如何上得来。楞头青！来吧，告诉你，你不是擅长吹箫吗？你就教她吹箫。等到她学会了，你们可以合奏的时候，看能不能引来凤凰。引来凤凰，你就可以和她乘着凤凰飞升到这里来了。"

萧史辞别天庭，重下凡间。第二天一早即去拜见秦穆公。

穆公一见，惊奇地问道："你一走五年，到哪里去了？"

这下轮到萧史吃惊了，五年？怎么会有五年？但他随即明白了，仙凡不同时，不足为怪，俺掩饰道："到昆仑山上玩了一玩。"

穆公走到萧史身边，亲切地说："你走后，弄玉想你想得好苦啊！这孩子懂事了。及笄以后，谁也不嫁，一直痴情地等着你呢。"

萧史听了，热血沸腾，久久说不出话来。

秦穆公慈祥地笑了，乐呵呵地说："好！看得出，你也是爱得很深的。我作主，今晚成亲！"

从此，小两口整日厮守，百般恩爱，如胶似膝。

蜜月过后，萧史便开始教娇妻吹箫。箫史取出二十三管洞箫，自己先演奏起来。洞箫刚一沾唇，那奇妙无比的乐声如从唇吻中轻快地流了出来。那乐曲，清亮而欢快。

一曲终了，白鹤、孔雀从四面八方云集过来。

弄玉高兴得跳了起来，一边拍手，一边央求："好哥哥，你快教我，你快教我嘛！"

弄玉不仅长得漂亮，人也聪明伶俐，遇事又爱动脑子，不出一月，便学得象模象样了。

穆公大为欣喜，又下令为他们修了一座凤凰台。每天，当朝阳冉冉升起，梧桐叶上嘀嗒嘀嗒地掉下露珠时，萧史、弄玉便开始练习吹箫了。

一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

第三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春风和煦，春花烂漫，春山如笑。凤凰台上，更是一派春意。

这天清晨，红日刚刚涌出地平线，萧史、弄玉便各执一箫，一唱一和，开始吹奏起来。晨风中，箫声和鸣，时而如高山流水，时而似九天行云。

一曲吹罢，白鹤起舞；
二典吹罢，古松增翠；
三曲吹罢，和风拂煦；
四曲吹罢，祥云四起；
五曲吹罢，太阳生辉；
六曲吹罢，江河汹涌；
七曲吹罢，山岳回鸣；
八曲吹罢，蛟龙翻腾；
九曲吹罢，凤凰来仪。

萧史、弄玉放下洞箫，四目相对，久久凝视。

直到一双凤凰分别落在他们夫妻二人肩上，萧史、弄玉才如梦方醒，然后猛地扑到对方怀里，万分激动。

"我成仙了！"

"对！你成仙了！我们都成仙了！"

凤凰台上，成千上万的凤凰扑动翅膀，冲天而起，这声音，象一阵风，象一阵雷，滚滚流动。

最后，萧史、弄玉满怀深情地看了凤凰台一眼，双双骑上凤凰。凤凰也解人意，驮着他们，缓缓起飞，一圈、二圈、三圈，围着秦宫绕了九圈，这才昂起了头，直插云霄。

骊山神女

秦始皇定都咸阳，过起了荒淫奢侈的生活，方圆几百里内，到处都修起了金碧辉煌的行宫。

咸阳以东80里外，有座骊山，雄浑端庄。山上住着一位神女，容貌绝艳，气度非凡。秦始皇得知消息，便马上征用徭役，在骊山修了一座行宫。为了行走方便，他又别出心裁，设计了一种"立交桥"，从咸阳到骊山，架起了一座笔直的栈道；人行桥上，车马走在桥下。一旦皇舆启驾，阁声登登，车声辚辚，马蹄踏踏，煞是壮观。走到桥上，秦始皇便生出一种恍然若梦，飘飘欲仙的感觉。

皇舆来到行宫，秦始皇顾不上休息，便吩咐使臣："有请神女！"

使者登上山顶，求见神女。片刻，一位青衣小姑出来答道："神女清静惯了，多谢秦主盛情。"

使者赶下山来，禀报此事。秦始皇一听，龙颜大怒："朕扫除六国，统一天下，威震四海，难道连一个神女都请不动？再去，叫她非来不可！"

使者又匆匆赶上山去。这时，小姑连门也没出，只在房里冷冷答道："井水不犯河水，何若一再逼迫？"

使者想来硬的，抬起腿来，向大门踢去。谁知那门竟如磐石般坚固，使者一脚过去，弹回来时，腿脚已断成好几节。

使者连滚带爬下得山来，一进行宫，便"哎哟哎哟"诉起苦来。秦始皇这个暴君，哪里受得了这般轻视，一时性起，抽出宝剑，一刀捅了使者，便带领卫兵杀上山来。

来到神女门口，秦始皇命卫士攻门。可那薄薄一块门板，任你怎么碰，任你怎么撞，就是纹丝不动。秦始皇气得嗷嗷叫，又叫卫士从墙上翻进去。可是，那土墙却"忽啦"一声朝空中窜出数丈。秦始皇气得七窍生烟，又叫卫士搭人梯。可是，500名卫士还没攀上10个，底下的人就被踩扁了。

这时，里面传出小姑调皮的声音："怎么样，没法子吧？"

秦始皇何曾受过这样的窝囊气，便跳起来，破口大骂。

里面又传出小姑的声音："什么臭皇帝！滚回去！否则，休怪你姑奶奶不客气！"

秦始皇还赖着不走，突然，一群天兵天将自天而下，吓得秦始皇抱头鼠窜，落荒而逃。

几天之后，秦始皇斋戒沐浴，恭恭敬敬来到神女门前下跪认罪。小姑懒得开门，连声说道："凡夫俗子，又来干什么？"

秦始皇答道："烦仙姑开门，我要向神女请罪。"

小姑一听，没好气地说："哦，只向神女请罪，那我呢？"

秦始皇赶紧赔不是，忙说："得罪，我先向仙姑赔礼道歉。"

小姑笑了，说："今天不算，明儿再来吧。"

秦始皇只好退下。

第二天，秦始皇又上山来，小姑把门打开一条缝，玩皮地说："今天只要向我认错，回去吧，明天再向神女赔罪吧。"

第三天，下起了倾盆大雨，秦始皇一心想求得神女的宽恕，便顶风冒雨，一步一滑地赶上山来。

门开处，一位超凡脱俗的二八姝丽含笑而立。秦始皇后宫三千，见过的绝代佳人不计其数。可是，与眼前这位少女一比，那简直有天壤之别。当下，秦始皇倒头便拜："叩见神女！"

少女嘻嘻笑道："认错人了，我是神女的侍女眉娘。"

秦始皇尴尬地笑着，随眉娘进了内室。只见白玉为床，黄金为几，地上铺着五彩锦绣，墙上插着名花异草，空气中弥漫着阵阵幽香。到了这时，秦始皇才知道自己平日挥金如土，追求豪华，追求气派，那是多么的俗不可耐。

眉娘拉开一幅帷幔，露出一个洞口，脆生生地叫道："哎，快上来看看吧，那愣小子来了！"

秦始皇贵为万乘之主，几时被人叫作"愣小子"，正待发作，忽见洞口几缕紫气冉冉上升，随即，一阵清风拂过，眼前已立着一位盖世无双的年轻女子。

秦始皇只觉眼前一亮，顿时头晕目眩，几乎站都站不稳了：这女子实在太美了，那眼神、那气度、那风姿、那体态、那一举一动，简直就是梦，就是诗！一时间，秦始皇忘记了所有的一切，瞪着两只牛大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只顾着看。

眉娘"扑哧"一笑，推了秦始皇一把，嗔道："傻小子，讲点礼貌！"

秦始皇随声应道："是，讲礼貌，讲点礼貌……"

眉娘笑弯了腰，一边喘气，一边说："那你干什么来了？"

秦始皇木木地说："来——讲点礼貌。"

神女再也忍不住了，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眉娘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过了一会儿，神女恢复了常态，缓缓坐下轻声细语地训导起来："你南征北战，混一宇内，结束了战乱，结束了分裂，当然是有功的。可是，你太残暴了，你太奢侈了，你太荒淫了。作为一国之主，你应该体恤你的子民，让他们过几天轻松一点的日子。你也知道江山来之不易，想让你的子子孙孙二世、三世、二十世、三十世地传下去，可是，你把百姓压得太苦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你要与民休息，清静自守，无为而治。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可是，这一番款款叮咛，完全是对牛弹琴。这暴君杀人如麻，只崇拜强权，哪里听得讲这些柔弱自守的话？相反地，这婉转的口吻，这关切的语气，这房中一切女性化的陈设，竟使得他萌发了可耻的邪念。慢慢地，他又恢复了一个皇帝的威严。在他眼里看来，神女化成了皇后，眉娘化成了宫女……突然，他猛地向神女扑过去，一把搂住神女。

神女一惊，刷地站起来，一把推开秦始皇，厉声喝道："放肆！"

秦始皇从地上爬起来，又向神女闯过去，被眉娘一把揪住，动弹不得。

神女凛然肃立，盯着这个无赖，一言不发。良久，她吐出一口唾沫，唾了秦始皇一

脸，然后掉头下了地洞。

眉娘把秦始皇推出房子，咬牙切齿地说：“再见吧！有你受的！”

秦始皇回到行宫，脸上便生起疮来。他万分惊恐，立即叫来御医。可是，一切药物都用过了，毫无效果。昔日不可一世的君主，成了一个满头溃疡的癞子。

过了两个月，善良的神女一指戳开地上的岩层，让洞中涌出热气腾腾的温泉，托眉娘捎话，叫他用温泉洗头。这时，秦始皇的癞头才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这口温泉，到今仍在。

“老子就不认这个皇帝”

道家提倡出世思想，学都者也大多数淡于热利，不慕富贵，往往孤傲清高，视王者如粪土。

下面要讲的，就是卫叔卿笑傲汉武帝的一段故事。

中山郡（今河北定县）有位老人，名叫卫叔卿，一生服食云母，不食五谷。九九八十一岁，卫叔卿仙道修成，作了神仙。终日逍遥，不在话下。

西汉建元元年（前140年）八月的一天，新任天子汉武帝正在宫中闲坐。此时朝会已散，进食已毕，武帝手执一书，爱看不爱看地放在膝上。忽然，有个老头乘着一片彩云，骑着一头白鹿，飘然来到大殿之中。武帝一惊，问道：

“什么人？”

老头笑嘻嘻地回答：“我便是中山卫叔卿。卫叔卿，知道吧！”

武帝见来人并不跪拜，说话又如此没个尊卑上下，便非常生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这滨，莫非王臣。什么中山外山的，朕不管你是卫叔卿还是卫伯卿，反正都是朕的臣民。你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

叔卿两眼睥睨着武帝，动了动嘴皮，想说什么。可是终于什么都没说，撇撇嘴，哼了一声，飘然而去。

武帝刚即位不久，年轻气盛，所以做出此等事来。第二天，他把此事说给一位老臣听的时候，仍旧愤愤不平。到底是老臣，毕竟见多识广，赶紧提醒武帝：“陛下！那老头不是凡人，怕是神仙呢！对了，早些年是听说过中山卫叔卿避谷成仙，臣后来忙于公务，就把这事儿慢慢忘了，忘到后脑勺去了！就是他，卫叔卿，神仙！”

武帝听了，跌足长叹：“啊呀！得罪神仙了！得罪神仙了！这可如何是好？”

老臣迷着眼睛，低头想了好半天，这才决断地说：“只有向他赔个不是了。”

武帝不干，瞪大了眼睛：“什么？给他赔不是？你昏了头了！”

老臣笑道：“臣清醒得很。卫叔卿早已成仙，过他的神仙日子，干嘛要跑到宫中来呢？一定是有什么大事。”

武帝还是不相信：“他能有什么大事？”

老臣着急了：“哎呀，仙人降临，不是大事，也是喜事啊！说明陛下英明，天下太平呀！”

武帝这才明白过来，于是，手一挥，命令老臣：“快去，快去赔不是吧！”

老臣领旨，星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赶到中山，一路寻访，找到了卫叔卿的家。但是卫家只有一个儿子，名叫度世。老臣心想：“老子跑了，还有儿子，先把他带回朝廷，交了差再说吧。”于是连请带押地把度世领到了京城。

武帝一见度世，非常客气，面带笑容，问道：“卫公子，令尊大人下凡，可曾回过家？”

度世答道：“父亲少好仙道，孜孜不倦，只靠云母为生。十年前已成仙遁去，就一直没有回来过。只听说他这儿下凡，那儿下凡，就是不下凡到家里走一趟。”说着说着，这个大汉子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武帝心想：“看来这人说的是实话。”于是

和蔼地问道："卫公子，令尊大人成仙之前，最喜欢什么地方？"

度世脱口答道："华山！西岳华山！"

武帝咧开嘴笑了，对老臣说："辛苦你再跑一趟，和卫公子上华山去恭请卫仙人。"

老臣只好带上度世，高一脚、低一脚地上了华山。华山那个险哪，没法说。老臣累得要死不活的，暗自伤神："嗨，自由不当差，当差不自由，我这么大年纪了，整日奔波，何苦来！命啊！"

一连找了三天，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度世心里犯嘀咕了："按说，我找不到我父亲，父亲应该看得到我呀，我是凡人，他是仙人哪！会不会是因为我带了外人，父亲才避而不见的啊？"

到了半夜，等老臣睡熟，度世悄悄溜走了。到了一座山顶，度世突然看见父亲正与另外几个人围在一块石头上嬉戏。在他们的头顶上，有一片紫色的云霞。度世远远地看着，不敢打扰。直到太阳升起的时候，众人散去，他才跑上前去。

卫叔卿问道："你在山上转了几天了，有什么事吗？"

度世回答："皇上很后悔，说他得罪了您，叫我前来，给你陪礼道歉，请您再回宫中谈一谈。"

卫叔卿不听还罢，一听火气又上来了："毛孩子，作了个皇帝，以为很了不起！赔礼道歉，让你来陪礼道歉？"

度世连忙插话："还有个大臣作使者，在山下。"

卫叔卿脸都气红了："大臣又怎么样？就是刘彻自己来，我也照样不理睬！现在捎一句话，就想让我下山？痴心妄想！没门！"

度世吓得不敢作声。卫叔卿又学着武帝的样子，说："他还神气得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洞天福地就不是你的'王土'，神仙真人就不是你的'王臣'！我就不认你这个皇帝！"

度世看父亲的脾气发得差不多了，就说："您要真不去，也就算了。不过，您上次又跑去干什么呢？"

卫叔卿不想儿子问出这样的话，很尴尬，只好自我解嘲："嗨，凡心未尽呗！我是看到下界近来多灾，想教给他消实之法。这样，他的皇位还可以多坐几年。可是他，妄自尊大，把我气跑了。不过，气跑了也好，要不，还耽误了与中黄太一诸位神仙讨论天元九五之经呢！"

沉默了一会儿，卫叔卿慈祥地看着儿子，终于说道："度世，度世，我先把你度了吧！过些年，国家要乱，你赶快回去，我有一方仙药，埋在衣柜底下，你把它吃了，也可成仙。哼，老子不作他汉武帝的臣民，连老子的儿子也不作你臣民！"

度世下山，路上被老臣堵住。老臣也厌弃了富贵，恳切要求成仙，二人便潜回中山，吃了仙药，顿时身轻如药，御风而去。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这是一个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故事。

汉高祖有个儿子叫刘长，封厉王；厉王有个儿子，叫刘安，封淮南王。淮南王不同于一般的公子哥儿，他对声色犬马之事毫无兴趣，一门心事只沉迷于方术变化之道。他的王府中，供养着好几千方士、道徒，其中真伪混杂，鱼龙不分。淮南王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何尝不知道门客中杂有滥竽充数之辈呢？但是，他要的就是折节下士、招揽贤才这个名声。他想：真要赶走几个不学无术之徒，那还不容易？使个眼色就够了。但天下的人不明底细，还认为我刘安逐客，那么，谁还会上门啊？我又不是养不起！于是，他每日与诸方士游宴谈乐，讲道说法。因此，他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天下挟异术、怀奇才的人士，从四

面八方爬山越岭，竟相投奔淮南王府。

一天，王府门前来了八位老人，个个须发皓白，看上去少说也有八、九十岁了。他们七嘴八舌地对门卒说：

“我们是来投奔贤王的。”

“快让我们去见贤王吧！”

“啊，好阔气的王府呀！名不虚传！”

门卒心想：这都是哪里来的一些乡里老儿，土里土气的，因此，微微露出不屑之色，说：“我们老爷要招揽的人士，上要明长生不老之道，中要怀博物精义之才，下要具打鼎搏虎之勇。”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又加重语气说：“可是，先生们都已进入垂暮之年，能说您几位明长生不老之术吗！还有，明摆着的，哪位先生现在还有举鼎之力、斗虎之勇呢？恕我冒昧，你们中间也很难说有谁修习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吧。三者皆无，怕是不能放你们进去了。”

八公一听，一齐摇了摇头，又一齐笑了起来。其中一位开口道：“我等久闻淮南王礼贤下士，竭诚纳才，是当今第一的贤王。我等虽已年老，不合要求，但只求一见，于王府又有何损呢？如果您一定认为只有年轻人才是俊才，老家伙都是庸人，那么，您再看，我们不是很年轻吗？”

话音刚落，八公眨眼已变成了八童，个个满头青丝，面如桃花，顶多也就是十四、五岁的样子。门卒大惊失色，连连后退，赶紧去报告淮南王。

淮南王一听，慌得连鞋子也没穿好，三步并作两步跑了出来，恭恭敬敬将来客迎上了思仙台。这思仙台本是为迎接有道之士而设的，平日只有极其尊贵的客人到来，他才在这里见客。台上建有一阁，阁中金碧辉煌，异香满室。淮南王招待八童入座，然后亲执弟子之礼，长跪叩道：

“刘安不才，羁于世务，沉于流俗，早就想求道寻仙，洗涤红尘中的渣滓。今天，八位道君光临寒舍，乃是三生有幸，万望垂怜指教，千万勿辞！”

八公这才还原为八公，一个个脸上都现出慈神的神态，其中一位和蔼地说：“闻道有先后，我等只是早学了几年，多少会一点杂技，知贤王慕道志坚，故来相会。怎么样，老哥儿们，我们都来为贤王助助兴，如何？”

其他老人应声附和：“好呀，好呀！您先请吧！”

于是，老人便开始作法：画地为江河，顿现江水滔滔；撮土为山岳，立见群山森林。片刻，他停止作法，脸不红，气不喘，笑着对其他人说：“哥儿几个，轮着上吧！”

一公应声而起，弹指之间，不知所在，转眼一看，环列上周：

一公冲天而起，悬于空中；

一公刀枪不入，水火不进；

一公摇身千变，为所欲为；

一公呼风唤雨，召虎捉龙；

一公煎泥成金，点铅为银；

一公只手遮日，天昏地暗；

这下，把个淮南王看得眼花缭乱，喜得心花怒放，连连向八公施礼，然后传令，为八公举行欢迎宴会。

次日，淮南王急不可待地请求八公传授异术。八公却说：“所谓异术，都是末技。雕虫小技，不足多羡。贤王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要静心修道，先固根本。至于方术，那是功到自然成的事儿。”说着，八公各出一书，授与淮南王，然后隐身不见了。

从此，淮南王便与门客日夜研习仙书，一年之后，写成《淮南中书》，谈成仙入道这术，共 20 多万言。

尽管淮南王一再强调保密，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八公之事，神仙之书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汉武帝的耳中。按辈份，武帝管淮南王叫叔叔，两人性情颇为相似，关系也较融洽。近年来，武帝也渐渐爱上了仙道之学，听了八公的消息，便将淮南王召进宫中，开口就问：

"您的仙术修炼得怎么样了?"

淮南王假装糊涂:"臣何时修炼过什么仙术呢?"

武帝不悦,追问道:"就是八公所传之术哪!你不是从他们那得到了八本仙书,而且,你和门客不是还写了一本书吗?朕于仙道这事,慕之颇深,你为何这般吝啬?"

淮南王心想:不好,瞒不住了!怎么办?皇上是一国之主,他要学仙,国家怎么办?于是他矢口否认:"臣平日服膺道家,身边也确实是有一些方术之士,闲暇之时,谈些方外之事,聊以消遣。不过,八公之事,纯属外间谣传,决无其事。陛下富于春秋,当以国事为重,以江山社稷宗庙为重,不必学臣的样子。"

武帝哪里听得进去,本想发作,但对方说的句句在理,只好强压怒火,怏怏不乐地打发淮南王走了。

淮南王出宫,暗自思量:皇上年轻,最易意气用事,万一他纠缠不放,事情就不好办了……对了,有办法了!当晚,他便召集门客,让大家突出合编一本书,越快越好。

果然不出所料,书刚编成,武帝又派人来索要仙书。淮南王便把这本新书取书《淮南鸿烈》呈了上去。武帝得书,高兴得不得了,如获至宝。可是,待他把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压根儿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里面尽是一些阴阳五行、天道自然等儒、法、杂家之说,而主旨归于治国治民。武帝知道自己被耍了,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没多久,他便给淮南王罗织了一个谋反的罪名,把淮南王看守起来。

这时,八公又出现了,淮南王好不惊奇。八公说:"贤王升天的机会来了,这是天意,也是贤王专心修道的造化。"

淮南王不解,问道:"弟子有何造化?"

八公答曰:"贤王对皇上保守秘密,拒不交出仙书,这就是你对社稷和百姓的一片至诚之心,不是得道之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呀!"

说话的工夫,八公已调好了仙药,说:"吃了这药,白日可升天。"

淮南王吃了几口,顿觉神清气爽,体态轻盈。八公说声"起!"只听得"嗖嗖嗖"几声,淮南王与八公冲天而起,御风而去。众门客吓得目瞪口呆,又听得鸡鸡天上,狗吠云中,追随淮南王去了,原来,淮南王没有把药吃完,叫家里的鸡和狗吃了。

这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西王母传道

自从汉武帝沉迷于神仙之道,便荒为国家大事,常年累月地祈祷名山大川,一心只想成仙。

元封元年(前 110 年)春三月,汉武帝正在承华殿与东方朔聊天,内容不外乎长生修炼之事。忽然,一位青衣女子翩然而至。

武帝愕然问道:"什么人?"

女子长得十分俊俏,煞是可人,她笑吟吟地答道:"我是墉宫玉女,受王母娘娘派遣,从昆仑山来。"

武帝一听,喜不自禁,立即走下宝座,向玉女揖拜。东方朔呢,老熟人般地朝玉女扬了扬手。乘武帝跪拜的时候,玉女也连连报以亲昵的微笑。

一转眼,玉女又庄重地对武帝说:"听说你不爱江山,只求成仙,王母娘娘很高兴。从今天开始,斋戒沐浴,不管人间俗事,到七月七日,娘娘要到你这儿来。"说完,人就没影儿了。

武帝使劲地揉眼睛,似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实,又问东方朔。东方朔懒洋洋地答道:"没错儿,陛下,刚才来的是西王母紫兰宫的王子登,跑来跑去,常干这种差事。"

武帝不信,说:"又瞎编了!"

东方朔连忙掩饰:"道听途说,道听途说而已。"

当晚，武帝斋戒沐浴，转移到延灵台中居住，一切政事，统统交付三公。

日子很快过去了。到了七月七日，皇宫中张灯结彩，喜气扬扬。宫殿内外，一律铺设绵绣地毯，摆上各种珍果、美酒。夜幕降临，武帝斥退左右，盛服立于殿前。

这时候，宫里边一片寂静，只有武帝的心中急得“嘭嘭”作响。

约摸二更光景，西南天空突然涌起一片白云，径直朝皇宫飞来。随即传来箫鼓之声，人马交响。西王母驾九色斑龙，乘紫云之辇，走在中间，数百万天兵天将环卫左右，簇拥而至。到了皇宫顶上，西王母在50名天仙的陪伴下，缓缓降落。天兵天将悄然隐去。

西王母走下銮，众仙列成两行，夹道肃立。西王母由两位小美人伴侍，来到殿前。武帝恭恭敬敬地将其迎入殿中。

西王母头戴太真晨婴之冠，足穿玄谲凤文之履，胸佩凤纹之绶，腰挂分影之剑，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丹唇外朗，皓齿肉鲜，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环资艳逸，仪静体闲。

武帝三跪九拜，将西王母迎入座中。西王母凝视片刻，叫武帝坐在自己右边。武帝不敢与之平起平坐，恭让着坐到了对面，以示臣服。

西王母缓缓问道：“你很喜欢道教？”

武帝闻声而起：“十分十分喜欢！”

西王母抬起纤纤秀手，示意道：“不要太拘于礼节了，坐下说。我再问你，你有哪些道性？道教的宗旨是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喜欢道教？”

对于前两句，武帝支支唔唔的一个字也答不上来，但对第三个问题，倒是毫不费劲，说道：“学道可以成仙呀，可以长生不老呀！”

西王母大度地一笑，说：“你呀，这个样子也想成仙？我听人说，你有五恶呢！”

武帝一惊，忙问：“谁说的？”

西王母仍然不紧不慢地说：“自然有人向我报告。你性暴、性淫、性奢、性酷、性贼。暴则使人气奔而攻神，神扰则气竭；淫则使人精漏而魂疲，精竭而魂消；奢则使人真离而魄秽，灵失则命逝；酷则使人丧仁而自攻，仁失则眼乱；贼则使人心斗而口干，内战则外绝。此五恶，皆是杀身之刀锯，伐命之斧斤。你五恶具备，还说好道，还想成仙？”

武帝吓得双腿发抖，结结巴巴地说：“小子生性凶顽，面墙不学，不得上仙指引，因此滋生五恶。愿娘娘指点迷津，小子将永远铭记娘娘的恩德！”

西王母淡淡一笑，说道：“你是一国之主，教育你一个，就可以感化千千万万的愚顽之辈。说不上什么恩德。不过，只要你从今往后，戒除五恶，归于柔顺，体恤百姓，清静自守，无为而治，那么，长生之道，将不求而自来。”

说完，侍女端上天厨：奇珍异果，芳华百味，玉液琼浆。顿时，空中弥漫着说不出的香味。武帝享尽人间美味无数，但与眼前这些仙品一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于是口水直流，狼吞虎咽起来。

片刻，侍女手捧玉盘，置于几上。盘中装着七颗仙桃，形状酷似鸭蛋，一律青色。西王母吃了两颗，武帝吃了四颗。还剩一颗，西王母拿在手中，朝身后喊道：“东方朔，别躲躲闪闪、偷偷摸摸的了！给你留了一颗呢。”

东方朔不知从哪里闪出，双手接过，笑嘻嘻地说：“多谢娘娘，不客气了！”

西王母开心地笑了，转身又对武帝说：“我这仙桃三千年才结一次果，可东方朔已经偷了我三次仙桃了，馋猫！”

武帝这才知道东方朔的底细，心里叹道：“天天求神仙，没想到身边就有一个。”

西王母又开口了，说：“东方朔，仙桃不能白吃，你表演一个节目吧！”

东方朔故意逗趣，“说道：“嗨，吃了别人的嘴软，我嘴软了，还是闭嘴最好。”

殿下仙群中，玉女王子登尖起嗓子叫起来：“没那么便宜！吃了就想抹嘴巴开溜，没

门儿!”

东方朔朝玉女做个怪脸,回击道:“你的长舌头还没缩进去一点啊!”

武帝有趣,不觉又摆出君王命令臣子的架子,催促道:“别罗嗦了! 快一点!”

东方朔一口答应道:“臣领旨!”于是载歌载舞,极尽滑稽之相:

海外有十洲哟!
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哟!
流洲光生洲凤麟洲祖洲聚窟洲哟!

海外有三岛哟!
昆仑哟!
蓬莱哟!
方丈哟!

十洲三岛有仙人哟!
仙人种了不死草哟!
……

东方既白,众仙散去,武帝还宛在梦中,东方朔歪睡在一边。

魏伯阳炼丹

魏伯阳炼丹,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相传,魏伯阳本是汉末富豪子弟,他的兄弟都是腰缠万贯,姬妾成群,每天花天酒地,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是,魏伯阳却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他想:人生在世,过一天少一天,离死越来越近,离生越来越远,即使做了皇帝,可是,一旦死去,便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修道成仙,长生不死,这才是最有用的。因此,朝廷多次给他高官厚禄,他总是不肯接受。他不屑于接受。

魏伯阳独居一室,对外面的冠服、车马不闻不问。置若罔闻。他静心研究道家秘笈,边读书,边实践。十年之后,形魄大变:面如桃花,宛如少女;肌肤晶莹,恰似冰雪。这时,他又动了另外一个心思:炼造仙丹,济世度人!

第二天,魏伯阳便收拾行装,只身入山。走出村外,一条白狗尾随而至,挥之不去。伯阳笑道:“这狗看来也有灵性,那好吧,给我作个伴吧!”伯阳健步如飞,白狗穷追不舍,待到日午,便已来到大山深处。只见山深林密,涧清雾白,一块光滑如镜的巨石,横卧在山涧之中,将溪水一分为二,鬼斧神工般地拖出两条瀑布,风景煞是可人。伯阳当即看中了这块宝地。

一天,伯阳正支炉炼丹,忽然,不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定睛一看,只见三个牧童。牧童上前行礼,说道:

“真人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伯阳笑道:“我几时收了你们做弟子?”

牧童笑道:“心诚便是弟子。”

伯阳笑得更厉害了,说:“罢,罢,就收下你们吧!”

七年过去了,金丹炼成了。伯阳有心试探三位弟子的诚心,便对他们说:“神丹虽已炼成,只是还要试一试它的功效。你们说怎么办?”

大弟子说:“让狗先吃! 狗要白日飞升了,我们就跟着吃;狗要死了,这丹就万万不能吃了!”

伯阳连忙夸奖:“还是我的大弟子聪明!”

说着,取出一粒紫色的仙丹,塞入白狗嘴中。只见白狗两眼一翻,四脚一蹬,死了!”

二弟子吓得直哆嗦,连声说:“死了,死了!

伯阳哭丧着脸,一屁股坐到地上,哼哼唧唧地哭了起来:“哎呀! 我好苦啊! 炼了七年,只怕炼不成。现在炼出来了,即又吃不得。看起来,我们得罪上天了!”

弟子们说道:“真人快想个办法吧!”

伯阳捂住脸,边哭边说:“我抛弃高官厚禄,抛弃万贯家产,跑到这深山老林里来,只图炼出仙丹,也好成仙。现在炼不出仙丹,我

也不想回去了。反正死活都一样了，我吃了它吧！”手一抬，仙丹已落入嘴中，随即身子一倒，也死了！

大弟子说：“炼丹是图长生，吃了反倒送命，这是何苦来？不行，我要回去！”

二弟子说：“是啊，回去还能活个几十年，既使不能长寿，也不至于现在就死了！我也回去！”

三弟子却留了下来，他说：“师傅不是凡人，服丹而死，也许是有意试我们的呢？”捡起一粒丹来就要吃，又一想：“要是真死了呢？”于是把药又放下。过了片刻，又对自己说：“死就死吧，与师傅作伴去！”

犹豫再三，终于把丹塞进口中。丹一入喉，人就死了。

这时，伯阳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吐出自己嘴中的丹药，分别送进三弟子和白狗口里。一眨眼，三弟子和白狗便复活了。原来，伯阳有一种毒丹，服用这种毒丹，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如果在不当吃的时候吃了，人会暂时麻醉，失去知觉，甚至连呼吸都会停止。他就是用这种毒丹给弟子们制造了一场生死考验。

他感慨地对三弟子说：“你平日不声不响，关键时候，就看出你的道心深厚了！难得呀！”

说着，取出真丹，和弟子、白狗分着吃了。顿时，人和狗一起飞上了九霄。

后来，魏伯阳结合炼丹的经验，著有《参与契》三卷，借爻象而论炼丹之旨。后世俗儒不知神仙之事，曲为解释，大失伯阳本意。不过，这是后话了。

爱是不能忘记的

隋朝初年，有个名叫杜子春的怪人，沉迷道书，一心只想白日飞升，有时走火入魔，便把娇妻幼子丢在一边，不闻不问。

华山云谷峰有个老道士，功夫深，道术高，每每听人说起杜子春，觉得此人诚心慕道，便有意收为弟子，因此传过话来，招其入山。

杜子春得意，乐得一蹦三尺高，当下就准备盘缠，恨不得一步飞到华山。这些年来，杜子春毁家修道，家底子早就掏空了，可查，为了做套新的道士服，他竟然开始变卖家产，简直是不顾老婆孩子的死活了！一家大小失去依靠，便苦苦哀求，但他只是充耳不闻，完全是一付铁石心肠，第二天便头也不回地出发了。

一个月后，杜子春风尘仆仆赶到华山脚下，老道亲自迎接这个远客。走到半山腰，老道站住了，他要开始审查了。

老道问：“你想学道？”

杜子春答：“是的，我想学道。”

老道问：“你真想学道？”

杜子春答：“是的，我真想学道。”

老道问：“你学道干什么？”

杜子春答：“我学道求登仙！”

老道问：“学道很苦、很苦，你怕不怕？”

杜子春答：“只要能成仙，什么都不怕！”

……

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杜子春都是满口应承，对答如流。老道不动声色，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学道之人，要根除七情六欲，你，做得到吗？”

杜子春自豪地大声回答：“完全做得到！弟子早已抛妻别子，七情六欲，斩截都尽！”

老道满意地笑了，于是二人继续赶路。到了傍晚，来到一处清幽的山冲。杜子春抬眼看去，只见彩霞满天，白鹤翱翔。山脚有一道观，墙上爬满了青苔，看上去显得更加神秘。正堂上摆着一个大药炉，高八九尺，炉中紫焰闪烁，室内香烟袅绕。这情景，在杜子春看来，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温馨，是那么的神圣，那么的动人。

二人入室，东向坐定。老道从葫芦中倒

出三颗紫砂，又从怀中取出酒筒，吩咐子春服下。杜子春神色激动，眼中饱含幸福的泪水，把丹砂缓缓送入口中，口味片刻，这才用酒送入喉咙。丹砂顺着食道流进肚里，泪水顺着腮帮流到膝上。

老道语气严峻，一脸严肃地说："从现在开始，我要作法了。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不许作声，不要理睬！只要你静下心来，那么，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千万，千万！切记，切记！"

说完，老道就不见了。

不一会儿，杜子春忽听以一阵呐喊，立见千军万马杀向前来。当中一位将军，长得一丈多高，全身披着铁甲，挥舞宝剑，寒光闪闪。他对杜子春喝道："你是何人？竟敢挡道！"子春视若罔闻，众怒，刀枪交下。子春岿然不动，毫发无损。于是众人退下。

接着，一群毒蛇猛兽咆哮而来。老虎张着血盆大口，蟒蛇吐着两条长剑，直逼子春。子春怒目相视，于是野兽散去。

这时，传来一声炸雷，眨眼这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地动山摇。顷刻，大雨倾盆，山洪爆发，呼啸而至。子春一丝不动，洪水悄然退下。

杜子春连过三关，心中好不得意。正在这时，一阵悦耳动听的歌声传来，子春定眼一看，两位妙龄女子翩然而至。少女天生丽质，眼角眉梢都是情，而且轻歌曼舞，百般挑逗。子春只是端坐不动，默不作声。少女收起千种风情，含怨而去。

随即跳上几百只癞蛤蟆，黑压压一大片，挤作一堆。那情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子春平日最厌恶这东西，一只两只就够他受的。这会上来这么多，他心里一阵恶心，马上想到老道的交待，于是只当不见。这样一来，癞蛤蟆倏忽不见。

沉默了一会儿，传来一阵哭声。子春一看，原来是自己死去的父母来到面前。他们拉着子春的手，问长问短。子春十分感动，只是不敢作声，一转眼，父母不见了。

突然，一阵阴气逼来，一群小鬼拥出阎罗。群魔乱舞，阴森恐怖。阎罗狞笑道："不怕你不说话。带上来！"子春抬头，猛地看到娇妻幼子被五花大绑地推上来。众小鬼挥刀便砍。子春见状，失声叫道：

"住手！"

话音未落，众鬼消失，老婆孩了也都不见。子春正在惊奇，身后传来老道的叹息声：

"哎呀，你呀你，喜怒哀乐都已忘掉，偏偏还有一个'爱"字忘不了呀！你要是刚才不开口，我的神丹就炼成了，你就可以白日飞升了！"

杜子春沉思片刻，坦然笑道："多谢先生指点迷津。看来，神仙虽好，最终也不是凡人所能期望的。如果让我一人成仙，而对妻子儿女见死不救，那么，我情愿拥有这份爱心。"

于是，杜子春连夜下山，日夜兼程，赶回家中，从此，他抛弃神仙幻想，踏踏实实做人，恩恩爱爱过日子。

黄　梁　梦

说起来，那是唐玄宗时候的事情了。

有个姓卢的秀才，困于科举，屡试不中，身上银两花得干干净净。无奈，只好仓皇辞别这惹人爱也叫人恨的长安城，骑了一头小毛驴，一步一步朝故乡走去。

那一天，卢秀才来到邯郸城外，看看天色已晚，便走进了一家小客店。

俗话说，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卢秀才一个落第文人，骑的不是高头大马，背的不是尚方宝剑，进得店来，先觉得矮了三分。

他向老板娘点头哈腰，陪着笑脸说：

"烦店主备上饭菜。"

老板娘看他这副穷酸相，懒洋洋地说：

"黄梁饭凑合着吃一餐吧，好歹也算填饱肚子。酒菜就免了吧！"

说完，屁股一扭，进厨房去了。

卢秀才挑了个干净的凳子坐下，这时，门口又走进一位道士。卢秀才抬眼看去，道士衣衫褴褛，满脸灰尘，便善意地朝道士笑了笑，算是打过招呼。道士大大咧咧地挨着秀才坐下来，两人便你一言我一语，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秀才想起伤心事，不觉叹了一口气，满腹牢骚地说："唉！男子汉，大丈夫，自应得意舒坦，但是，看看你我二人这副模样，窝囊不窝囊！"

道士不解，问道："咦？怎么说的？你看这里炊烟缭绕，鸡犬之声相闻，你我二人，尽兴聊天，没病没灾，无忧无虑，这不是很舒坦吗？这还不舒坦，还有什么叫舒坦啊？"

秀才说："跟你说不清！你想想，夫子曰：'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古往今来，概不例外。读书人，自当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列鼎而食，选声而听，这才叫做舒坦呢！"

说着，一连打了几个呵欠。道士见状，就从背囊中取出了一个青瓷枕头，递给卢秀才，说："困了吧？那就先打个瞌睡迷糊一下吧。"

秀才枕上枕头，便慢慢变得迷迷糊糊，只觉得枕头越变越大，就身不由已地钻了进去。嗬，里面别是一番天地，山水如画，景色宜人。卢秀才便一路游山玩水，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竟然回到了自己家中。一回家，好运便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来，连门板也挡不住。

崔家有位千金小姐，风姿绰约，模样俊俏，平时谁都看不上，这下忽然爱上了外出归来的卢秀才，于是，她就成了秀才的妻子。崔家是个名门贵族，陪嫁的财宝装了几十车。这下子，卢秀才可神气了。穷秀才只要有银子，收拾打扮，完全是一付贵公子的模样儿呢！

第二年，凭着岳父与礼部侍郎的老关系，卢秀才轻而易举地考中了进士。接下来，凭着礼部侍郎与吏部侍郎的老关系，卢公子又顺利通过了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授官秘书郎。然后，凭着一层又一层的关系，换句话说，凭着关系的关系，他由郎中、侍郎……层层上升，一直做到了宰相。

卢宰相为官清廉，关心民瘼，兴修水利，整顿吏治，广招贤才，惩罚贪官污吏。天下无人不知卢相国的贤明，人们为他立碑，百姓为他歌唱。

后来，边境受到了外人侵略，什么将军、元师，什么节度使、招讨使，一个个都对付不了，灰溜溜地败下了阵来。羽书告急，皇上大怒，这时，卢相国自告奋勇，带兵迎敌，斩杀数万，收复了失地900里。凯旋之日，皇上亲自迎接。朝廷大摆宴席，庆贺三日。

文武全才的卢相国，越来越得民心，越来越得宠信。当然，奸臣嫉妒了，于是设地陷害。隔二差三地，总有人到皇帝那里去告状，诬告他勾结边防将领，准备造反，自己好做皇帝。起初皇上不信，可是，人口铄金哪，曾子杀人，不信也得信哪。终于有一天，皇上大怒，派人将卢相国抓了起来，关进死牢。卢相国心里直后悔，每日唉声叹气，自言自语："唉！何苦来！本来可以依着几亩薄地，填饱肚皮就是。为什么偏要做官啊？这下倒好，头都保不住了？现在要想象当年那样，穿破衣，骑蹇驴，在邯郸城外吃黄粱，也是想不到了！苦啊！命啊！"

后来，幸亏有人给说情，卢相国这才减去了死罪，但还是充军到了外地。虎落平川遭犬欺，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他不知吃了多少苦，不知受了多少罪。过了三年，皇上又忽然为他平反，官复原职，又加封燕国公，权位比以前更加显赫。

他的五个儿子也一个个长大成人，自然也都一个个进士及第，一个个官居显要，一个个娶妻生子。自然，五房媳妇也都是大家闺秀，亲亲公不是尚书就是将军。再过几年，孙辈十几个又都长大了。

他的财产一年比一年多，他的家业一年

比一年大，山珍海味吃腻了，绫罗绸缎穿厌了。美女、珍宝，简直多得没法说。

这时候，他也老了。一辈子功成名就，荣华富贵，封妻荫子，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想得到的，他都得到了。当然，不想得到的，比如坐牢、充军，他也得到了。

然后，有一天，两腿一伸，他就死了。

脚下碰倒了椅子，卢秀才从青瓷枕头上惊醒过来。他睁睛一看，自己仍然趴在客店饭桌上，对面是那个古怪道士。厨房里，老板娘的黄梁饭还没烧熟。

道士只管望着卢秀才发笑，一言不发，半晌，秀才一拍桌子。霍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终于明白了！终于明白了！什么宠辱之道呀，什么穷达之运啊，什么得失之理罗，什么死生之情哪，通通都是身外之事，通通都是虚的，恰似这黄梁一梦啊！”

道士连连点头，笑得合不拢嘴：“醒了就好！醒了就好！跳出是非名利场，萧然做个局外人，这才是最大的舒坦哪！”

秀才对道士深深一揖，说道：“感谢先生指点迷津，度化小生。从今以后，小生愿随先生静心修道，哪怕是草衣木食，露宿风餐，也强似那枕中的繁华，梦中的虚幻！”

说完，道士、秀才相视一笑，翩然离去，两碗黄梁米饭，放在桌上，直冒热气。

这正是：

梦中富贵梦中贫，梦里欢娱梦里嗔。
热闹一场无一事，谁个不是梦中人？

南柯太守

盛唐时期，东南一带流传着一个南柯太守的故事。

有个游侠之士，复姓淳于，单名一个棼字，江南人。他自小精通武艺，后来从军，骁勇善战，积功升为裨将。但他为人不拘细节，借酒使性，终于得罪了主帅，好端端地把个官儿丢了。因而丧魂落魄，流落扬州。

过了一些日子，淳于棼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武士周弁，一个是书生田子华。三人气味相投，终日饮酒为乐。反正是轮流坐桩，轮流作东，在醉乡中打发岁月。

这天，淳于棼买了几斤下酒菜，招来周、田二人，在庭院南边的大槐树下划拳猜掌地喝起酒来。从早上喝到正午，三个人都烂醉如泥。淳于棼又是吐来又是哭，还一边发牢骚：

“想我淳于棼，空有一身本领，功不成，名未就，家徒四壁，空守着这一株老槐树，好闷气啊！……”

说着，就晕头晕脑地靠着槐树睡着了。

不一会儿，淳于棼恍恍惚惚看见两个紫衣使者来到面前，下跪行礼，说：“小臣受槐安国王派遣，特来迎接附马大人入宫。”淳于棼好不奇怪：“什么槐安国？没听说过啊？国王请我作甚？懒得去！”心里这么想，人却不由自主地站起来，随来便登上油车，钻入槐树根下的蚂蚁洞中。

淳于棼常听人说什么“别有洞天”，他只是不信，这下，可以让他真正看到了别有洞天的景象了：崇山峻岭，古树参天，鲜花香草，漫山遍野，和风拂面，叫人心旷神怡。车行数里，一座城楼忽现眼前。淳于棼抬头看去，城门上镂着四个金字：

大槐安国

城上下，肃立着两列军士，又有一位黄衣宦官，早已恭候多时。淳丁棼入城，一位将军策马奔来，一路传呼：“国王传旨，驸马爷下榻东华馆！”于是，一行人来到一座深宅大院前，只见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又听丝竹钟声，阵阵传来。淳于棼受宠若惊，却又异常兴奋。大伙儿步入厅堂，一位丞相迎上前来，宾主各行礼毕，丞相说：“国王器重先生，欲以公主许配，明天是吉日，就此举行婚礼。”淳于棼听了，当然更加欣喜，心里还忍不住胡思乱想：

"驸马爷！我要当驸马爷了！公主，公主不知好看不好看？……一定是国色天香了！……"

第二天早上，一队乐工舞女吹吹打打来到东华馆。淳于棼一身新郎装扮，由众人伴入皇宫。正中王位上，自然坐的是国王，王后居旁，文武百官列于殿下。这气氛，既威严，又隆重；新郎官呢，既紧张，又兴奋。淳于棼叩见国王、王后，一如君臣相见之仪。正在这时，鼓乐齐鸣，众宫女拥出公主，当下拜过天地，然后新郎新娘被送进洞房，自然是热闹非凡，不在话下。

公主果真生得花容月貌，且又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有不会。驸马爷呢，武官出身，当然是十八般兵器，样样拿手。小两口互相倾心，情爱日隆。每日游宴畅饮，酒酣之际，淳于棼月下击剑，公主花间起舞，众歌女伴唱。到了夜半，皓月当空，庭中流光溢彩，淳于棼便恍如置身仙境，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这样舒舒服服过了一年，淳于棼又想满足官瘾，便向国王奏了一表，吹嘘自己是如何的能干，简直是文武全才，举世无双。国王自然十分欣赏，立即传下诏来："前南柯太守昏庸无能，淳于棼才堪治国，着即前往接替。南柯为国之大郡，土地丰饶，人物豪盛。今有贤才治理，朕可高枕无忧了！"

次日，淳于棼便带着公主及文武随从走马上任了。反正郡中也没有什么大事，淳于棼便倚仗着驸马的威势，倒也把南柯管理得象那么回事。后来，境外檀萝国发起侵略，国王又命令淳于棼率兵迎剿。他是久经沙场的骁将，自然马到成功，大获全胜。这下，人们对他更是赞不绝口了。

一晃20多年过去了。淳于棼位极人臣，自然引起国王的猜忌，怕他功高震主，便想方设法削弱他的权力。不久，扫帚星见于南方，国王又想，淳于棼正是南柯太守，于是更加疑神疑鬼。恰在这时，公主又一病不起，淳于棼念平日恩爱，好不伤心！可是，一等治丧完毕，国王就传下旨来：

"南柯太守连年勤于国事，又遭公主之丧，急需休息。今免其太守职务，以示恩眷。"

淳于棼十分恼怒，急忙入宫上奏："臣为国驱驰几十年，陛下何苦如此相逼？臣实在不甘心！"

国王冷冷地说："你离家多年，该回去看一看了！"

淳于棼不解，忙问："什么离家多年？我回哪儿去？这儿不就是我的家吗？"

国王讥笑道："你本在人间，这槐安国才不是你的家呢！你可真是白白地享有富贵荣华，简直是乐不思蜀了！"

淳于棼还要分辩，国王不耐烦了，喝令："叉出去！"

禁卫军闻声上前，把淳于棼推出宫外，淳于棼一个趔趄，摔了个狗吃屎。

淳于棼只觉得脑袋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睁开眼睛一看，自己仍然坐在槐树根上，周弁、田子华睡倒一旁，桌上杯盘狼藉，一切还是入睡前的样子。只有一样不同，便是日已西沉。

淳于棼揉揉眼皮，想了半天，突然一拍脑门，失声叫道："梦中倏忽，便是一生，咄咄怪事啊！"走过去，推醒周、田二位，把梦中的一切详细讲了出来。三人大惑不解。淳于棼想了想，拿来斧头大锹，三人一齐动手，挖开树下的蚂蚁穴，一个黑森森的土洞展现在眼前。

淳于棼点上油灯，三人步入洞中，转个弯。他们看见了几条蚁粪，大体象城廓、台殿。左边有无数蚂蚁，往来穿梭。右边有块紫土，两只大蚂蚁匍匐在上面，紫土周围，又有几十只蚂蚁整齐排列。淳于棼恍然大悟："啊，这就一定是槐安国了！那两只大蚂蚁，必是国王和王后了！"再往前走，又见几块蚁粪，状若楼墙，群蚁一见淳于棼，纷纷朝拜。淳于棼叹道："这里就是我的南柯郡吧！"此外，当年笙歌饮宴之所，跃马金戈之地，一一

皆可寻到依稀痕迹。

淳于棼在洞中盘桓良久，然后同周、田二位爬出洞来。他追想梦中景，不禁悲从中来，仰天长叹，感慨万分：

“真的是浮生若梦啊！笑我淳于棼，南柯一梦，贵极禄位，权倾一时，可是到头来，不过是蚂蚁国里见分晓。可悲，可叹！是啊，世事纷纭，一如蚂蚁，功名利禄，都是虚幻。人生苦短，不如求仙！”

当下，淳于棼别过周、田二位朋友，径往茅山修道去了。从此，他绝意功名，潜心道门，后来，不知所终，也有人说他已升了仙的。

这正是：

不须看尽鱼龙戏，浮世纷纷蚁子群。

宰相与神仙

李林甫是唐朝一个很坏的宰相，在他死后，人们根据他生前的种种劣迹，附会了这么一个故事：

李林甫年轻时，不爱读书，游手好闲，整日戏耍。父母也无可奈何，只当养了一个败家子，从来不指望这个不肖子会有什么出息。

这一阵子，他又迷上了斗蟋蟀，每天跑到城墙跟下去玩。蟋蟀斗累了，他也玩累了，就走到槐荫底下，直挺挺地躺下，四仰八叉地闭目养神。

一天中午，李林甫正在树下打嗑睡，迎面走来一位道士。这道士瘦骨嶙嶙，眼球突出，歪着嘴巴呲着牙，一副令人恶心的样子。他一直走到李林甫身边，用脚拨了拨李林甫。李林甫鼾声如雷，纹丝不动，道士把脚一跺，震得李林甫跳了起来。

道士说：“相公，挺在这里睡觉，也是一种乐趣吗？”

李林甫被人无故搅醒了美梦，又见来人奇形怪状，便没好气地说：“关你屁事！”

道士掉头就走，边走边摇头。

第二天，李林甫照旧来玩蟋蟀，玩累了，照旧四仰八叉地打呼噜。怪道士照旧也出现了，照旧用脚拨，用脚跺，照旧问那句话。

李林甫怒不可遏，挥拳便打。道士左闪右闪，轻巧得象一只蝴蝶。李林甫懒是懒，可并不笨，几个回合之后，他觉出了异样，马上住手，纳头便拜。

道士装糊涂：“相公，何事要拜？”

林甫说：“求真人赐教！”

道士兜圈子：“相公要得到什么？”

李林甫答道：“求真人指点前程！”

道士还是卖关子：“只怕天机不可泄潜心啊！”

李林甫便长跪不起，信誓旦旦，保证不泄漏天机。过了一个时辰，道士见要得差不多了，就换上一副正经的模样，认真地说：“相公不象寻常之辈，要点小聪明，可做大宰相；作个老实人，将来可成仙。二者不可得兼，你挑一样吧！”

李林甫想了想，反问道：“为什么不可兼得呢？”

道士笑了笑，幽默地回答：“因为爱要小聪明的人和大老实人是背道而驰的。”

要小聪明，李林甫可以无师自通；大老实人怎么个老实法，他却想象不出，于是问道：“要怎么做，才算大老实人呢？”

道士盯着李林甫，慢慢答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出生入死，救国救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老实人到头不吃亏。”

李林甫抓耳挠腮想了半天，汗都急出来了，最后说：“真人容弟子想一想！”

道士爽快地说：“这是你自己的前途，当然要好好想一想！三天为期。”

这三天，李林甫饭茶不香，彻底难眠。两个声音在耳朵里面互相争吵。一个声音说：“成仙吧！成仙多好！神仙日子谁不想过！”另一个声音说：“九死一生，艰苦备尝，犯得着吗？”前面那个声音又说：“机不可失，时不再

来，仙人引路，这可是千载难逢啊!”后面那个声音则主产:“求仙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图个快活！当宰相，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人世间不还是很快活吗?”三天下来，李林甫整个儿瘦了一圈。

第三天晚上，他们又如约见面了。李林甫说:“弟子只求生前，不管身后。”

道士愤然骂道:“真是一个稀泥巴糊不上壁的家伙!”

李林甫挨了骂，脸涨得通红，嚅嚅道:“要不然，还是做个老实人吧?”

道士斜眼鄙视，冷冷地说:“拉倒吧！你的仙缘尽了!”

李林甫痛哭流涕，连连嗑头:“我一定脱胎换骨，重新作人！我能吃苦……”

道士拍拍衣上的尘土，宽容地笑了笑，安慰李林甫:“算了！别伤心了！你只要为官清廉，爱民如子，忠心报国，天帝也许还会再给你一个机会的。”说完，撇下李林甫，走了。

李林甫本是李唐王朝的宗室子弟，他又擅长要小聪明，一个劲地巴结外戚武氏，10年之后，一个宰相的职位果真让他抓到手了。

李林甫为相之后，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且，他为人口蜜腹剑，国人皆曰可杀。

忽然有一天，相府门外来了一个丑老道，声称要见李相国，直往里边闯。俗话说:宰相家奴七品官。平日来访李林甫的官儿，对门卒都是客客气气的，从没见过这种叫化子般的丑老道，于是，门卒打起了官腔:“何处老道，不懂规矩？走开，要不抓你去见官!”

老道嘿嘿笑道:“多谢，你太客气了！我就是来打官的。有你带路，省得我瞎转。”

门卒遭到戏弄，挥拳便打。老道左闪右闪，象蝴蝶般灵巧。门卒打累了，只好去通服。

李林甫一听，顿时脸色苍白，呆若木鸡。半晌，他无可奈何地说:“有请！备宴!”

李林甫朝报相见，老道一见，忍不住揶揄道:“俗气不是？故人相见，何劳相爷如此隆重?”

李林甫想起这些年来的胡作非为，吓得汗如雨下。老道摇摇头，苦笑道:“相爷不必紧张，我不是来惩罚你的。你想当官，又不当个好官。你看你这一桌酒食，就是百姓一年的口粮啊!”

李林甫结结巴巴地说:“弟子知罪，望真人饶恕!”

老道勉强换上一副笑容，说:“知错就改，改了就好。我早就对你说过，只要你做个好官，还会有成仙的机会的。一年为期，只要你幡然悔悟，从此多做好事，我自然会来接你。你若不思悔改……嗨!”说到这里，径自走了。

第二天，李林甫一反常态，谦恭下士，刻意为善，倒也真做了几天好官。众人见了，无不奇怪，李林甫自己也觉得拐扭。再过几天，故态复萌，依然故我。这样，别人倒觉得顺眼，他自己也很自在。

这一切，老道在暗中都看到了，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说:“枉废了我一片心机啊！罢了罢了！宰相是宰相，神仙是神仙，真个是二者不可得兼哪!”

八 仙 过 海

三月初三，是王母娘娘的生日。每逢这一天，王母娘娘都要请来各界神仙，在瑶池举行热闹非凡的蟠桃盛会。

这一年，又是三月三，下八洞神仙结伴而来，兴致勃勃地赶赴蟠桃会，王母的玉液琼浆灌得他们酩酊大醉，日落时分，他们才踉踉跄跄往回赶。

下八洞神仙形影不离，可要说起他们的成分，那可真是五花八门: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文庄粗野，样样齐全。老有张果老，少有蓝采和、韩湘子，贵有曹国舅，女有何仙姑，钟离权是将军世家，吕洞宾为风流书生，还有个

李铁拐，又黑又瘦，又丑又瘸。

可是，你可别小看了这八仙。李铁拐的原身是个相貌堂堂的美男子，当年修道砀山，元神出壳，后来借尸还魂，虽然变得黑脸蓬头，凸眼跛足，可是他功行圆满，被玉帝封为上仙。铁拐李在民间则被奉为药仙，他的狗皮膏药，包治百病。张果老堪称魔术大师，据说是混沌初分时一只白蝙蝠精所变。他有一只白毛驴，常常倒骑着到处闲逛，日行数万里。更奇妙的是，这驴可以象纸片一样折起来收进书箱中，要骑的时候，对着纸片喷口水，它又成了真驴。至于吕洞宾，更是集剑仙、酒仙、诗仙、色仙于一身。他的雌雄二剑，可以斩蛟劈虎；他酒量奇大，自谓"指洞庭为酒，渴时豪饮，将君山作枕，醉后高眠"；他的风流韵事更是不胜枚举。其他如蓝采和、何仙姑等人，也都是道性深厚、法术高超的赫赫大仙。

这当儿，八仙来到东海边，只见白浪排空，卷起千堆雪，景象煞是壮观。何仙姑和韩湘子到底年轻，早已嘻嘻哈哈地跳进水中互相追逐起来。

吕洞宾则一屁股坐到海滩下，打着饱嗝，喷着酒气说："王母娘娘好不懂事，我好心为她祝寿，她竟然当着众仙的面，骂我酒色财气，真是老糊涂了！"

张果老笑着说："你呀，活该！"

吕洞宾涨红了脸，一跳八丈高："扫兴！扫兴！一个刁老婆子，一个糟老头子！不和你们玩了，咱到海上去遨游一番！"

蓝采和随声响应，马上召唤韩湘子和何仙姑。倒是钟离权老成持重，他劝阻说："龙王最近不搭理咱，今日的蟠桃会也没参加，咱们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

铁拐李把拐杖一戳，怪目圆睁，说道："他不搭理咱，咱也不理会他。这东海难道是他一个人的？我今日偏要到海上高兴高兴！洞宾兄弟，我陪你去！"说完，将龙头拐杖掷向浪涛之中，然后纵身一跃，跳上拐杖。刹那间，拐杖变成龙舟，昂首驶入大海深处。

吕洞宾连声叫道："好样的，李大哥！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嘴里说着，从腰间解下金黄色的宝葫芦，拧下盖子，一阵摇荡，葫芦中冒出一朵形似莲花座的彩云。洞宾翻身上去，悠哉游哉，眨眼不见踪影。

何仙姑将背上的花蓝放入水中，花蓝便象一条彩船迎风破浪而去，仙姑立于船头，听任海水冲荡，十分快乐。

蓝彩和简直是个冲浪行家，只见他弓身站在玉板上，迎着浪头，左冲右突，时而跃上浪峰，时而跌入谷底，惊涛骇浪之中，竟如闲庭信步。不一会儿，海上还传来了他的歌声：

踏歌蓝采和，
世界能几何？
红颜一春树，
流年一掷梭。
古人混混去不返，
今人纷纷来更多。
朝骑鸾凤到碧落，
暮见桑田生白波。
长景明晖在空际，
金银宫阙高嵯峨。

韩湘子与众不同，他只管吹笛，笛声激越清彻，悠扬宛转。这美妙的乐声在大海之间回荡，所到之处，海浪竟让出了一条通道，韩湘子便在这条通道中穿行。

张果老不紧不慢地取出纸驴，喷上一口水，叫声"得儿——嘟！"眨眼间他已倒骑在一头活蹦乱跳的小白驴身上。毛驴撒开四蹄，跃向大海。果老手捧渔鼓，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嘴里还东一句西一句地唱着。

曹国舅坐在一只巨大的龟背上，两手各执一块竹板，噼噼叭叭地敲着，任海龟出入水面，时紧时慢，尾随众仙在海上畅荡。

钟离权摇了摇头上的两只大丫髻，无可奈何地摸了摸坦露着的大肚皮，然后把乐鼓投进水中，以鼓为船，箭也似地追了上去。

却说龙王在龙宫饮酒作乐，忽听得一阵

喧闹声，赶忙吩咐夜叉去探个究竟。不一会儿，夜叉惊慌失措地来报：“禀报王爷，是八仙，八仙来了！”

龙王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把酒杯一摔，骂道：“这些个烂八仙，招摇撞骗，吹牛拍马，你们去普度众生好了，你们去瑶池祝寿好了！酒足饭饱，跑我这儿逞威风来了！小的们，去给我把这帮狗男女统统赶去！”

龙子立即率领虾兵蟹将冲出龙宫，蹿上海面，对八仙发动了突然袭击。八仙猝不及防，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混战中，龙子抢走了蓝采和的玉板。

这玉板是采和的护身之宝，一理被龙子抢去后，顿时怒火冲天，当即潜入海底。要与龙子决战。吕洞宾等人见状，也纷纷操起家伙，追至龙宫。铁拐李一拐撞开宫门，蓝采和一马当先冲了进去。一时间，刀光剑影，杀声四起。八仙各显神功，把那些虾兵蟹将杀得屁滚尿流，激战中，吕洞宾一剑击中了龙子右臂，龙子惨叫着逃往龙王殿中。龙王一见爱子受伤，气得嗷嗷直叫，于是亲自披挂上阵。钟离权、韩湘子、吕洞宾、蓝采和四人，将龙王团团围住，左右进攻。龙王寡不敌众，渐渐招架不住。正在这时，铁拐李、何仙姑、曹国舅、张国老绕到后园，在龙宫四处放起火来。龙王见龙宫已陷人一片火海。琼楼玉宇即将化为灰烬，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乖乖投降认输，然后，亲自将玉板归还蓝采和，嘴里不住地赔礼道歉。当晚，龙王在龙宫设宴，招待八仙。

次日，八仙再显神通，沿原路返回陆地，又开始云游四方。

陈季卿悟道竹叶舟

唐朝有个陈季卿，本是江南人，自幼苦读，诗书满腹。自从别了老母娇妻，进京赶考，满以为可以高中进士，图取功名富贵，但是，由于没有后台，自己又不会钻营，因此，十年过去，次次都没有考中。身上的盘缠早已用尽，只好流落长安街头，靠代人抄书，勉强糊口。

转眼已是冬天，大雪积尺，季卿饥寒交迫，无奈，只好去找一肝龙寺的惠长老。不巧，长老外出化缘，庙中空无一人。季卿一身雪花，冻得瑟瑟发抖。正在犯愁，忽见墙角走出一个人来。

来人是个道士，丰神秀骨，标格不凡。提起他的名字，那可是妇孺皆知。他便是道号纯阳子的吕洞宾。他也是个读书人出身，深知书生的理想与痛苦，每当遇见那些穷途末路的没用书生，他都一视同仁地给予帮助。这一路上飞苍梧，过洞庭，入潼关，不知点化了多少落第文人。

一看陈季卿这副失魂落魄的穷书生模样，吕洞宾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于是开口问道：“秀才在此何干？”

季卿答道：“赶考不中，访亲不遇，冻馁不堪。劳道长相问，也不隐瞒了。”

洞宾听不下去，心中十分难受。过了一会儿，他爽朗地一笑，从背后取出一个葫芦，倒出几烂药丹，又取下药壶，一并递给季卿：“秀才喝口酒，吃点丹，暂时充充饥。”

季卿谢过，接了酒和药，囫囵吞下，顿时觉得有说不出的舒服，方才的饥寒之苦，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

洞宾长长吁了一口气，又在庙中生起火来。季卿漫无目的地踱着步子，转到东壁，借着火光，他看见墙上挂着一幅寰瀛图，便凑上前去，仔细察看。图上、长江、淮河、西子湖，历历在目。季卿想：“离家十年，也不知家里怎么样了。要是能回去看一看，该有多好啊！”奇怪，这念头只在心里，那边吕洞宾却答话了：“秀才，这有何难？贫道一帆清风，即可送你回家！”

季卿转身看去，只见吕洞宾从地上拣起一片竹叶，手指翻动几下，折出一只竹叶船，

抬手一扬，竹叶船就飞到了图中的渭水之上。这时，季卿已是恍恍惚惚，身不由己地跨上了竹味船。随即船下波涛翻腾，只听吕洞宾叫道："季才，看住船头，坐好了！"

这一叶小舟便飞也似地向东飘去。

水面上，月冷风清，云浮烟寒。季卿下在寂寞之际，云端出现了四位仙人。他们是：足履烟波、身入八荒的列御寇，伴赤松子、居神仙洞的张子房，乘浮槎、入天都的张骞，携明皇、游西凉的叶靖禅。四人翩然而至，在船舱随意坐了，并不理睬陈季卿，只顾自己说话。

先是叶靖禅开口："昨日东周今日秦，咸阳灯火洛阳尘。百年一枕沧浪梦，笑煞昆仑山上人。你们说，这天底上小小的一索寰土，今日你争，明日我夺，兄弟成仇，父子反目，这都图的是什么哟！"

列子笑了，接口说："不管人家图什么，我只管我自己。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沧海桑田，我也不知看了多少遍了！人世繁华，都是过眼云烟，只剩下一堆粪土，只有我还秘养得精神似水，颜色如玉。我也不吃什么玄精云母，我也不采什么茯苓桂子，我也不佩什么宝箓灵符，只要把这肚子里的心猿意马牢牢拴住，明月清风中，闲谈《黄庭经》，哪管他星移斗转，海枯石烂呢！"

季卿肃立一边，恭恭敬敬地听着，只觉得字字是金玉，句句是药石。正在体味，他忽然感到船一晃，家园出现在眼前。

看到季卿，母亲妻儿一齐扑上来，一家人悲喜交加，抱头痛哭。这当儿，张骞又说话了："我看哪，这科举是天下最一毒药，而这毒药又偏偏挂在功名利禄的钓钩上，苦海茫茫，多少读书人争先恐后地咬钩啊！看这陈呆子，学那凿壁偷光的匡衡，学那映雪读书的孙康，非要丢下一家老小不可，去寻那不着边际的功名，可悲啊！"

季卿神志不清地让家人拥进屋里，耳边又清晰地听得张子房说话了："我是有过功名的，宦海风波，仕途险恶，我看的多了。有了功名又怎么样？该杀头时还得杀头，该株连时还得株连。身居高位，有时还没有平头百姓自在呢！"

季卿是服了仙丹的，家人听不到仙人的谈话，他却一句不漏地听了进去。家人说了些什么他似乎都不知道，但仙人在船上的歌吟，他却听得十分真切：

快挣脱了金枷连玉锁，
早抛弃了燕侣共莺俦。
准备下蓑笠、纶杆、钓钩，
蟠溪侧岸，渭水河头，
趁烟波，渔父散诞优游，
宽袍大袖，兀那阆苑瀛洲。
早去休，
休生受。
管什么龙争虎斗，
鸟飞兔走，
只我这麻袍草履，傲杀肥马轻裘！

这时，季卿似已清醒，冲出门来，大叫一声，跳上竹叶船。四仙人早已杳无踪影。竹叶船箭也似地溯江而上，不一会儿，停在青龙寺东壁的寰瀛图上。

洞宾拥炉而坐，支肘而眠，季卿下船，上前行礼，恭恭敬敬地说道："多谢道长指点迷津，度弟子长生之路！"

洞宾打个呵欠，笑嘻嘻地说："贫道做个梦的工夫，哪能指点什么迷津啊？"季卿答道："弟子从前在苦海中煎熬，现在，我把这红尘看破了，什么功名，不过是石上的火星！什么荣华，不过是水中的浮泡！弟子愿随师父学道，远离这肮脏世界，做个快乐神仙！"

吕洞宾哈哈大笑，驾起祥云，师徒二人向终南山飞去。

文铢改过自新

唐末大道士广成子杜光庭写了很多道教劝世文，劝人为善，度人长生。在《道教灵验

记》中，他给人们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从前，长安城里有个富贵人家，家有万贯，可是，美中不足，年过半百，膝下无子。后来，求神拜佛，好容易生了个儿子。老来得子，便把孩子看成比什么都金贵，又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就叫文铢。

文铢从小受到父母百般溺爱，养成了好逸恶劳、为所欲为的坏脾气，长到18岁，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长安恶少。

父母为了让他学好，不惜巨资，给他在城外选择了一个幽静的山村，盖起了一片小别墅。别墅里僮仆成群，给他供奉丰衣美食。但是，老父母给他提出一个要求：读书。

文铢散闲惯了，哪里能安心读书？看得两行字，不是昏昏欲睡，就是打骂下人。日子久了，不仅看书看不进，他对睡觉、打人也失去了兴趣。

随即，他对另外的事情发生了兴趣：打鸟、打兔子、钓鱼、捕野猪……凡是山上所有一切动物，能打则打，能捕则捕，从早到晚，一年四季，好不快活。两年下来，书没翻过几卷，兽皮倒挂了一屋子。猎枪坏了再修，渔网烂了再补，陷井少了再添。别墅四周，几乎成了他的私人狩猎场。

父母也是垂垂老矣，根本无奈他何，只后悔当初娇生惯养，到如今自食苦果。

一天，后花园里忽然出现了一位胖道士。这胖道士慈眉善目，肥头大耳，他拦住文铢，连声惊叹："哎呀，哎呀！你的头发怎么长得这么难看？"

文铢忙问："怎么难看？"

胖道士说："你自己看，你自己看，这还象个人头吗？"

说着便把文铢拉到井边。文铢朝井下探头一看，大叫一声，晕了过去。

胖道士在井台上悠然地坐了下来。

过了一阵子，文铢苏醒过来，战战兢兢地说："我怎么长成了一个兔子头啊？"

胖道士说："谁说你是兔子头啊？你再看看，到底是什么？"

文铢扒到井边，慢慢朝下一看，又是一声惊叫，再次晕了过去。

胖道士盘腿而坐，依旧是那么悠然。

又过了一阵，文铢再次清醒过来，便一头拜倒在道士脚下，连连嗑头："神仙救命！神仙饶命！"

胖道士扶起文铢，说："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来，再参观参观你的尊容。"

文铢慌忙后退，死活不再看。胖道士把手一挥，文铢便一个跟头栽到了井边。胖道士按住文铢的头，井中便出现了一个个血淋淋的猴头、猪头、羊头、狗头、鱼头、鹊头、猫头鹰头……走马灯似的，依次变换。

文铢已是吓得面如死灰，嘴角抽搐，不住哀求："我该死，我该死！求神仙饶我一次！"

胖道士正襟危坐，一字一顿地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草木禽兽，都是上帝所生。你滥杀无辜，是违返了天道。这是上天对你的报应。你在井中看到的，每变一头，都是一条生命的冤孽。总计起来，你要一条条地偿命，日积月累，你一辈子也抵偿不尽。自今以后，你就是个死人了。千年万年，你永远也没有恢复人头的那一天。"

文铢听完，放声哀号。三天三夜，茶水不进，口称改过，长跪不起。

也不道士使了什么法术，园中仆人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

到了第四天，胖道士扶起了文铢，又问道："你是真心悔改了吗？"

文铢答道："老天有眼，文铢再不改恶从善天打雷轰！"

胖道士说："我奉太上老君之命，遍历人间，普救众生，人称救苦真人。你也算是个有道缘的人，再不挽救，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说着，双手一拌，变出一副道袍，递给文铢："从此以后，你必然终身修道，广积阴功，广济一切禽兽之命，才能免除从前的罪过。

言毕，胖道士纵身一跃，离地八丈，立于

金莲花座上。只见他左手托着琼碗,右手抓着柳枝,头戴金冠,脚穿风履,身高三丈,浑身闪着五色光芒,天上的祥云,地上的紫气,浑为一体,好不壮观。良久,救苦真人才渐渐隐于空中。

从此,文铢便砸烂猎枪,烧毁渔网,填平陷井,辞别父母,摒退僮仆,以别墅为道观,供老君于堂前。白天云游四周,劝人惜生,夜晚端坐堂前,焚香忏悔。

30年后,救苦真人再次降临,授以成仙秘诀,文铢乃得道而去。

留下这所道观,后人叫做文铢宫。

不知过了多少年,几个和尚来到文铢宫,指手划脚,大喊大叫:"既然是我佛文铢圣迹所在,为什么会有道士功德?这肯定是那帮恶道,坏我佛名!"

说着,他们抬起一根木头,朝老君像撞去。撞了半天,精疲力竭,老君纹丝不动,毫发无损。这当口,几个和尚却口耳流血,一命归天了。

重阳子与七朵金莲

辽金时期,咸阳有户富贵人家,姓王,一连生了五个女儿,当家的便斋戒沐浴,跪在老君像前,祷告了三天三夜,祈求神明保佑,生个儿子,传宗接代。不久,夫人怀孕了。可这一孕就是24个月,一个胖小子才降临人间,父母以其久孕,取名久卿。

这小子长大后,生得一副怪模样:骨架庞大,眼大于口,发过于肚,声如洪钟,脸如秀玉。早年学文,得罪了考官,进士落榜,于是改习武功,终于中了武举。

一天,久卿正在甘河桥上行走,忽然,从西南昆仑山方向飞来两个白毛道士,一个是烟霞态度,一个是霄汉精神。久卿不觉惊起,赶上前去,俯道揖拜:"凡夫俗子王久卿,今日得睹仙容。实乃三生有幸!"

一个道士哈哈大笑:"彼此,彼此,君本非凡人,只是误落尘网而已。"

久卿又惊又喜,半信半疑:"这是真的?"

另一道士答道:"岂能骗你。我二人游历秦中,一路年见,满目疮痍,众生尽是凶顽,得道惟君一人。今日相逢,贤弟可以顿抛俗海,猛悟浮嚣,好餐霞于碧峤之前,堪炼气于松峰之下。斡旋造化,反复阴阳,灿列宿于九鼎之中,聚万化于一壶之内。千朝功满,名挂仙都。贤弟不要迟疑了!"

久卿"扑通"一声跪下,说道:"弟子愿求仙人点化!"

道士取下拐杖上的葫芦,倒出一烂金丹,抛给久卿。久卿纵身跃起,一个"九天揽月"抓在手心,然后轻轻送入喉中。顿时,只觉得遍身尘垢,为之一扫;膏肓之间,清流环流。

这时,另一道士又发话了:"仅有仙丹是不够的。这里是《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100卷,传与贤弟,待到心领神会,付之一炬可也。"

久卿郑重接过,说道:"既蒙引度,尚求恩赦道名。"

道士想了一想,说:"名吉,字知明,号重阳子。"

言毕,两位道士拄杖一跃,腾空而起,手腕一甩,变出七朵金莲,然后乘风而去。半天云中,传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来:

"速往东海,丘刘潭中,有一俊马,擒之可也。"

于是,重阳子辞别家人,往东海走去。经过甘河,桥下忽然转出一位道士,声称口渴,重阳子便取下酒壶,递给道士。道士仰天一笑,把酒全都倒进河中。重阳子正在吃惊,那道士又说道:"我是东海龙王,我们算是见过面了,来日欢迎你到龙宫作客。"说完不见。

重阳子走下桥去,在河边舀了一壶水。一路上,他就靠这壶水,粒米不进。那水味道极香,总喝总有。久卿好不快活,口中唱道:

重阳饮水知多少,因此通玄妙。

白麻衲袄布青巾，好模好样真个好。

精神不须镜子前来照，

事事心头了。

梦中识破梦中身，便是逍遥。

重阳子还在途中，东海岸边宁海县内，有个叫做马从义的年轻人，做了一个异样的梦。

马家是个积善之家，家财万贯，人称“马半州”，用以形容他家的富足。17年前，马家的夫人梦何仙姑赐与仙药，醒来便觉怀有身孕。马从义从小乐善好施，人又生得一副福相，曾有道士为他相面，赞曰：“身体堂堂，面圆年长。眉修目俊，鼻直口方。相好具足，顶有神光。”这年秋天，马从义梦一只丹顶鹤从天而降，立在自己肩头，赶也赶不走。醒来时，不仅肩上留有鹤趾印迹，枕边还发现了两片羽毛。

当天上午，马从义与朋友聚饮遇仙亭，酒酣之后，互相联句为诗。轮到从义，从义脱口而出：“醉中却有那人扶。”此句一出，不仅同席莫名其妙，就连他自己也不知所云。

席散，众人歪歪倒倒正要离开亭子，重阳子赶到了。重阳子尽管旅途劳顿，但依然标格不俗，众人一见，纷纷问道：“客从何来？”

重阳子答道：“来自长安，扶醉人归。”

众人一听，酒也醒了，立即推出马从义来。从义浑然不觉，斜眼看着重阳子，问道：“道人名灶道士，可知何者为道？”

重阳子随声答道：“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时。此即为道。”

从底一听，跳上重阳子肩头，转眨没了人影。

如此这般，不出三月，重阳子已在尘世中先后收得马从义、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六位高足。一天，师徒一行来到一位孙姓人家。

孙家有个16岁的姑娘，长得甚是标致，鹅蛋脸，桃花腮，柳叶眉，樱桃嘴。别看姑娘长得秀气，可是个性却是特别：不信道不信佛，平日看见僧道，从来没个好脸。这天猛地看见这么多道人，便心生一计，一反常态，热情款待。到了半夜，孙姑娘悄悄起来，把这师徒七人全都锁到了屋里面。然后，洋洋自得地说：“什么臭男人，叫你们辟谷去吧，姑奶奶叫你们饿上十天八天，看你们还神气不？”

头十天，房里笑声不绝。

第二个十天，房里传出了鼾声。

第三个十天，房里竟传出了歌声。

…………

第九个十天，房里鸦鹊无声。

孙姑娘见状，起初还很得意，过了一天，慌了神了，急忙打开房门，只见重阳子等人埋头看书，颜色如常，呼吸自如。

孙姑娘这才心悦诚服，甘心成为重阳门下的第七名弟子。

七名弟子，马从义最贤，年又居长，重阳子便立他为大弟子，赐名丹阳子，以下依次是：长真子谭处端、长生子刘处玄、长春子丘处机、王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清静散人孙不二。

赐号这完毕，天上飘来七朵金莲。重阳子一见，才知当年那两位道士所暗示的一切。于是，自己驾起一片白云，命弟子跳上金莲，向天空升去。

此后，重阳子创立全真教，成为道教的主要流派，七位弟子即成为全真北七真，这都是后话了。

我心即是道场

元朝时候，江南水乡有户小康人家，姓吴，小两口恩爱逾常，可是，结婚三年，一直没个孩子。

一天夜里，吴妻梦见一位麻衣道士疯疯颠颠地朝自己走来。那道士手中托着一只玉蛤蟆，笑嘻嘻地说：

“服了我的玉蟾蜍，保你生个神仙客。”

吴妻开始还很犹豫，但经不住道士苦苦

相逼，而且，她又是求子心切，便接过哈蟆，一口吞了进去。

不久，吴妻便觉得自己怀孕了，小两口好不高兴。过了10个月，吴妻的肚子鼓得老高老高，但是胎儿就是不出来。

直到两年过去，孩子才“哇哇”地哭叫着降临人世。小家伙一出生，便现出一副丰神秀骨的模样，吴氏夫妻好不高兴，就给孩子取了一个单名：秀。

吴秀一天天长大了，一转眼，成了一个风流俊俏的美少年。

忽然有一天，吴妻梦中出现的那位麻衣道士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吴氏夫妇一见，脸色顿时变得惨白惨白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宝贝儿子将要远走高飞了。

道士好象一眼洞明了他们的心事，朗声说道：“你们放心，秀儿还是你们的秀儿。我不过只是来领他去天台山悟几天道，一年之后，保证送他回来。”

于是，吴秀与父母挥泪相别，随道士到了天台山。

天台山景色清秀，林木茂密，鸟语花香，气候宜人。吴秀进得山来，顿时觉得神明清朗，浑身尘污为之一扫而光，不禁脱口而出：

“好个神仙世界！”

道士淡然一笑，说道：“你本不是凡种，理当超升上仙。不过，你生长人间16年，怕是早已世俗化了。”

吴秀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山水奇观，不觉得留连忘返，一时间把父母也抛到了一边。他整日里央求道士，早传法术，以求得道成仙。

道士耐心地向他解释：“得道须有道性，成仙须有仙缘。你仙缘早在，只看你的道性了。但你俗心太重，还得勤加修炼……”

吴秀急不可捺地打断道士的话，说：“弟愿长随真人学道！”

道士闭上眼睛，微微摇头：“你急于成仙，就是名心太重的表现啊！功到自然成，心急吃不了热饽饽嘛。再说，道岂可学得到吗？所谓学道，都是浅人之见。真要学道，哪里不可以学呢？呆在家里，抱本《道德经》、《阴符经》什么的，那不也是学吗？道，要靠修炼、靠领悟！好了，贫道要说的都说了，你自个儿去修炼吧！”

说完，道士隐身不见了。

吴秀独自呆在山里，茫然不知所措，糊里糊涂过了三天。

第四天，麻衣道士翩然而至。吴秀一见，便一个劲地诉起苦来：“真人叫我修炼，可是，修炼修炼，真人一不告诉我修，二不告诉我炼，如何得道呢？”

道士一听，怔住了，不解地问：“你说什么？怎么才叫修，怎么才叫炼，你要怎样才算修炼？”

吴秀更来劲了，似乎理直气壮地说：“修习道术叫修，炼化丹药叫炼。不修不炼，将来一无道术，二无丹药，怎么能算得道，怎么才可升仙呢！”

道士听完，哑然失笑，半晌，道士才缓缓说道：“算了，我们暂时不讲什么道不道了，本来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就在这江南一带，过过游山玩水的日子，如何？”

从此，天台山、天目山、雁荡山、括苍山、庐山、黄山带，时时出现了这师徒二人的身影；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巢湖、西子湖，处处留下了这师徒二人的足迹。他们见山便登山，遇水便游水，登山只说山，游水只说水。一年光景，转眼消逝。

道士这才问道：“一年已过，有何收获？”

吴秀神清气爽地答道：“弟子似乎已经得道。”

道士不动声色，继续追问：“何者为道？”

秀才不假思索地应道：“与山水合德谓之道。”

道士喜笑颜开，乐不可支：“这才是得道之言啊！可以了，一年期满，我要如约把你送

回去了。”

路上，道士又故意问：“既已得道，何不更术成仙?”

吴秀淡淡回答：“斤斤于道，则不得道；忘心于道，则道自来。侧道皆有自然，可以置之不顾，顺乎自然即可。我命在我，不在于天。”

道士听了，开怀大笑，连声说道：

“我心即是道场，道场在我心中。”

崂 山 道 士

清初文学家蒲松龄是个故事大王。他在《聊斋志异》中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在我们山东淄川县，有个王七，是个世代富裕的大户人家子弟。王七坐享富贵，一不愁吃，二不愁穿，日子消闲得没法子打发。于是，忽然有一天，他心血来潮，竟然生出了访道求仙的念头。听人说崂山住着很多很多成仙得道的人，便辞别妻子，背了一大包道教典籍上了崂山。

崂山地处黄海之滨，景色秀丽，气势磅礴，兼有山、海、林、泉之胜。自古以来，这里便是道教胜地，被人称为“神仙之宅，灵异之府”。太清宫、上清宫、太平宫、华楼宫、潮音瀑、明霞洞、龙潭瀑……一处处名胜古迹，星罗棋布，比比皆是。

王七来到直插云霄的崂顶，一眼看到一座爬满青藤的古道观，便径直闯了进去。

观内很幽静，只有一位老道坐在蒲团上打坐，白白的头发垂于胸前，象是王七刚才见过的瀑布一样。王七顿时肃然起敬，立即趴在地上，向老道叩头行礼。老道缓缓还礼，便与王七聊起天来。王七本来就敬畏老道的仙风道骨，这时，又听了老道玄妙高深的谈话，更加叹服。因此，他便请求留在观内，做老道的徒弟。

老道说：“你来游山玩水即可，何必要入道呢？道门清苦，看上去，你是个富家子弟，怕是娇懒惯了，吃不了这里的苦哟!”

王七信誓旦旦地回答：“弟子能吃苦，真的不怕苦!”

老道轻轻摸着白发，笑着说：“那就试试看吧。”

傍晚，观里的其他道士都回来了，王七便与这些师兄一一施礼见过。

第二天清晨，太阳刚刚冒出海面，老道便叫醒王七，递过一把大斧头，吩咐他随师兄们去打柴。王七便老老实实地照办了。一晃一个月过去，每天早出晚归，打柴不止。王七在家坐吃坐喝，几时吃过这种苦，细皮嫩肉的手，打出了厚厚的茧子，心里便一个劲地后悔，暗暗产生了回家的想法。

一天晚上，王七砍柴回来，看见观里来了两位陌生的客人，正与老道喝酒。当时已经天黑，观里还没点灯。老道便用剪刀剪了一个月亮贴在墙上，片刻，这个纸月亮便发出明亮的光彩，跟真月亮一样照亮了整个道观，引得其他师兄也都聚拢来了。

只听其中一位客人说：“如此良宵，岂可独饮，来，大家一起分享!”说完就从桌上拎起小酒壶，叫众人取来杯、碗，一一斟上，嘴里还不停地说：“满上、满上，一醉方休!”

王七在家里山珍海味都吃厌了，哪里看得上这种寡酒。正想离开，忽然觉得奇怪：小小一壶酒总倒总有，七、八十个人喝了一碗又一碗，竟然还没倒完。这才恍然大悟：啊，来客并非等闲之辈。

这时，另一位客人说话了：“承蒙主人招来明月，不过，毕竟太寂寞了一点，干嘛不叫嫦娥来助助兴呢?”说着，从桌上拿起一只筷子，一挥手，投到了纸月亮上面。顿时，一位绝代佳人便从上面走了下来。一开始，不过一尺高，等到落地，眨眼变得与真人一样大小了。她长得细细的腰肢，丰润的面容，笑吟吟地跳起了霓裳羽衣舞。舞罢，神情一变，又唱了一首凄婉的歌：

神仙哟，神仙哟！
你们回到了人间哟，
把我留在了广寒宫哟！

一曲末了，嫦娥离地而起，飘然落在桌上。王七惊讶地张圆了嘴，正想说话，又见嫦娥已变成一只筷子。

半夜，客人们起身告辞，对老道说："今夜真是尽兴，只是喝多了一点。老朋友，送我们一下好吗?"

老道答道："理当相送。"说着，三人便挪入了纸月亮之中。纸月亮随即飘动起来。

王七等人目送三人远去，三人坐在月亮，还在一个劲地喝酒，王七站在地上，连他们的胡子、眉毛都看得一清二楚。

随着纸月亮冉冉上升，观内又渐渐暗了下去。王七点上灯，却看见老道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客人早已不见，桌上还残留着碗筷和果肴。道士扬起脸来，朝大家问道："酒都喝好了吗?"众人齐声答道："喝好了！"老道把手一挥："那么，快点睡觉，天明还要砍柴呢！"

王七便又暂时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可是，这日复一日的劳作让他实在受不了。又熬了一个月，他便找到老道，说："弟子大老远地爬山涉水跑来，是来学道的。可是两个月过去了，您总叫我打柴、打柴，什么道术也没有传授一点，我想下山算了。"

老道笑了，说："当初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呀，吃不了这份苦。行啊，明天你就回家去吧。"

王七央求道："打了几十天的柴草，您总得传我一点法术啊，要不，这苦不白吃了?"

老道问："那你想学什么呢?"

王七答："您走起路来，连厚厚的墙壁也挡不住，您就教我穿墙术吧！"

道士点点头，便教了王七一个口诀，叫他自己念一遍，然后，手指朝墙一指，喝道："进去！"王七抬起眼皮，望着坚硬的墙壁，试都不敢试。老道说："别怕，低下头，闯就是了，心里只当没这墙一样。"于是，王七后退几步，低下头，猛地朝墙跑去。身后传来老道叫声："好！"王七回头一看，嘿，竟真的穿墙而过了。

第二天上午，老道把王七送出观门，递给他一包银子，叮嘱说："回去以后，坚持洁身修行，否则，就不灵了。"

王七回到家里，便向老婆大吹牛皮："我得道了！我学到了穿墙术！嘿，穿墙而过，你信不信?"

他老婆说什么也不相信，非要他试一试不可。王七便摆出一付十足的派头，后退三步，低下头，拔腿朝墙上闯过去。只听得"嗵"的一声，人已倒在墙边，"哎哟、哎哟"地叫了起来。他老婆急忙跑过看，一看，王七额头上已撞出了一个鸡蛋大的疙瘩。王七在老婆的搀扶下，费劲地站起来，不服气地说："再来一次！"于是，口中念念有词，又是一头闯去。这下，头破血流。

王七血流满面，疼痛难忍，旁边，老婆又连声嘲笑，于是恼羞成怒，破口大骂：

"什么老道！简直是个老骗子！"

画　皮

故事发生在清朝。

山西太原，有个姓王的秀才，一天清早，正在路上行走，忽然遇到一个年轻的女郎，抱着一个花布包袱，也在赶路，象是很疲倦的样子。王秀才便快步迎上去，走近一看，原来是个十五、六岁的小美人，心里顿生怜爱之意，便问道："这么大清早的，你怎么孤身一人在这里?"

美人满面愁容地说："行道之人，萍水相逢，也解救不了我的忧愁，何必劳神打听。"

王秀才又说："你到底有什么愁苦?说出来，我一定帮你解决。"

美人悲凄凄地说："父母爱财，把我卖给人家做妾。大老婆嫉妒，一天到晚打我，我实在受不了，今天就逃了出来。"

王秀才本有妻室，但实在喜爱这个姑娘，便说："那你打算到哪里去呢？"

美人说："现在只管逃命，哪里都行。"

王秀才乘机说："那么，请到我家去吧。"

美人一听，很高兴，便把包袱交给王秀才，随他回了家。王秀才把她藏进书房，又听从美人的吩咐，对外严格保密。到了夜里，两人俩同居了。

过了几天，事情叫王秀才的妻子发现了，妻子怕惹出事来，想打发那美人走，但王秀才捡来的便宜，哪里舍得抛弃？整天只是同那美人厮混在一起。

有一天，王秀才偶然碰见一位老道。老道凝视片刻，问道："秀才近来可曾遇见什么异样的东西吗？"

秀才答道："没有啊！"

老道肯定地说："你浑身上下被一股邪气缠绕，一定是被什么怪物缠住了！"

王秀才不悦，懒得理睬，径自走了。

老道摇摇头，也走了。

走到路上，王秀才有点怀疑美人的来历了，可是转念一想，明明一个绝代佳丽，怎么会是怪物？这老道只是故意吓人混饭吃罢了。

回到书房，王秀才发现里面反锁，感到奇怪，便趴在门缝一看，顿时吓得魂都没了：里面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正跪在床边画一张人皮！画完，扔掉彩笔，拎起画皮，双手一轮抡，披在身上，立即便变成了一个美丽姑娘。王秀才屏住呼吸，悄悄爬了出来，撒开脚丫，四处寻找刚才那位老道。

到了傍晚，王秀才终于在城外找到了老道，于是"扑通"一声跪下，哀求老道驱鬼救命。老道说："只怪你自己守身不谨！不过，这妖怪也可怜，刚刚找了一个替身，我也不忍心杀了她。我帮你赶走她吧！"说着，解下手中的拂尘，交给王秀才，郑重地说："你把这个挂到书房，妖怪就会逃走的。事成之后，你到青帝庙中还我拂尘。"

王秀才赶回家中，战战兢兢地把拂尘挂到书房门口，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逃回自己的卧室。

美人见王秀才没有同寝，准备去探究一下。打开门，看见拂尘，连连后退，过后，咬牙切齿地骂道："该死的老道，要你管什么闲事！难道我就这么善罢甘休吗？到了嘴边的肥肉，还能讲客气吗？"说着，她猛扑上去，一把扯下拂尘，摔在地上，随即撞开卧室，直奔床上，撕开王秀才的肚皮，掏出他的心脏，捧在手上跑了出去。王妻吓得大喊大叫，张灯一看，秀才被撕得血肉模糊，早已断了气。

隔壁的二弟听到哭喊声，披衣赶了过来，一见哥哥已死，马上跑到青帝庙告诉了老道。老道大怒，骂道："我本来还可怜她，谁知她竟这么猖狂！"立即赶到王家，可是妖怪早已无影无踪。

老道审视良久，舒了口气，说："幸亏还没走远。"

二弟问："她在哪里？"

老道说："就在隔壁你的家中。"

二弟大惊。老道说："我先留在这里，你偷偷回去，看有什么生人来过没有。"

不一会，二弟过来报告："刚才来了一个老婆婆，要到我家做仆人，我妻子收下了。"

老道兴奋地说："就是她！"

接着，老道冲入二弟院中，厉声叫道："孽鬼！还我拂尘！"

房里，老婆婆惊慌失措，正要夺路逃跑，老道一剑挥去，人皮"哗啦"一声滑了下来，现出恶鬼原形，躺在地上鬼喊鬼叫。老道赶上一步，砍下鬼头，那尸身便化作一股青烟。老道赶紧解下腰间的葫芦，拔去塞子，投入烟中，那烟便统统收进了葫芦里面。老道盖上塞子，依旧挂在腰间，转身又去捡那画皮，"哗哗哗"象卷纸一样地把它卷了起来。

王妻闻声过来，跪在地上恳求老道救活秀才。老道说："秀才贪色，罪有应得，救他干什么？"可是，经不住王妻一再哀求，便叹了口

气说："难得你一片真心，秀才不知足，还要沾花惹草，真是不长眼。秀才生肖属什么？"

二弟答道："属鸡。"

老道吩咐："杀只公鸡，把鸡心放进秀才胸膛，一天之后，或者可以起死复生。"

说完，手持画皮，昂然离去。

名山圣迹

丰 都 城

由重庆坐船沿长江顺流而下,过“榨菜之乡”涪陵,东行百余里,便到了丰都。丰都古名平都,曾是先秦时期巴国的别都,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初置平都县,隋代改称丰都,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

丰都城位于长江北岸,江水经城南而折向东北流,风景秀雅,物产富饶,街市繁荣,一派生机。谁能想到,这里曾被称作“鬼城”,流传过大量怪诞离奇的宗教故事,遗留了不少人造的“仙踪鬼迹”,并屡见于文献记载。

丰都得“鬼城”之号,直接与道教有关。东汉后期,我国的原始道教已经出现,其中的一个支派叫五斗米道,为张道陵所草创,先在蜀郡流播,接着传入巴郡、汉中地区。又经其徒张修、其孙张鲁的完善发展,建立政教合一的组织,势力大振,教徒更多。后来形成天师道正一派,并成为宗教正宗。丰都在汉代属巴郡,是早期道教的一个传习中心,所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平都有天师冶。”张道陵设“二十四治”之说虽系后人记载,但丰都之为天师道的一个宗教传习中心,当是可信的。

五斗米道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它继承了秦汉方士的神仙思想和炼丹术,从西南氐羌系统的少数民族那里撷取了巫术;把先秦道家著作《老子》奉为经典,又把儒家的诚信仁孝之类的伦理观念视为教徒的行为规范。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和轮回说,对后世道教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五斗米道到天师道的演变看,可以说是神仙人鬼混同,巫道儒佛杂糅。丰都之称“鬼城”,即与上述源流中包含的各种“鬼”的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到平都山去探访一下那里的“仙踪鬼迹”,便可略知其详了。

平都山又叫名山,矗立在丰都城东北的长江之滨。它“西连岷岭千秋雪,东接巫山十二峰。”登顶远眺,苍山叠翠,长江如练,山水相映,美若仙境。曾有不少迁客骚人、羽士名流到此游览题吟。宋代诗人苏东坡就曾写诗赞叹:“足蹑平都古洞天,此身不觉到云间。抬眸四顾乾坤阔,日月星辰任我攀。”

但是,在道教的经典里,这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却成了“总真群仙之府”,“阴真鬼帝之庭”,是道教的“七十二福地”之一,也是“阴曹地府”的所在地。南朝道书《度人经》曾描绘过平都山景象:其上是“玉京”,系群仙都会;其下即“鬼庭”,为众鬼所居。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这里就不但“仙气”飘飘,而且“鬼影”憧憧了。后来,平都山的“鬼气”越来越浓,自唐以降,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径称丰都为“鬼城”的也愈来愈多了。考察一下平都山现存主要道教建筑的制度沿革,便可与文献相印证。

自唐初始建第一座道观——仙都观以来,平都山上下先后出现各类寺庙四十多处,

至今尚存道教建筑十余座。地处山腰的寥阳殿,据说是进入地府的第一站。殿外现存石拱桥三座,为明朝蜀献王所建。此桥明代以前即有,名通仙桥,意为走过它便可得道成仙。明代却改称“奈何桥”,道士们常在桥面涂上桐油、蛋清,使桥面光滑如镜,难以行走。并宣称:人死之后,其鬼魂必过此桥。生前作恶者,会跌下桥去;生前为善者,能顺利通过,再次投生变人。仙桥变成了鬼桥。

经寥阳殿登上山头,即到阎罗殿。此殿始建于明代,清康熙三年(1664)重修。殿内光线昏暗,塑像林立。这里的主神是威行赏罚的十殿阎罗王,还有按察善恶的“六曹”、“判官”,勾魂追命的无常、恶鬼,十八重地狱的种种惨景。这些大小不一,神态各异的彩塑,是近年重新制作的。彩塑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佛道杂糅的特点。阎罗之名,源于古印度,梵文作:Yamarāja,全译为“阎梦罗阇”,“阎罗”是其简译。它是古代印度的一位神祇,意为“幽冥界之王”。到了唐末,中国佛教将阎罗一变为十,并分别加上了中国化的王号,后来才被道教采用,只不过略施道教色彩,说十殿阎罗王就是张天师手下专司捉拿孽鬼的“十大鬼帅”。地狱也是舶来品,本是梵文 Naraka 的意译,亦源于古印度,后为佛教所用,也被道教吸收。于是,一大批中国化的外国鬼神涌上了平都山。

走出“鬼气”冲天的阎王殿,紧接着便是“神气”十足的天子殿,现存建筑是清代遗物,颇有气派。门楼雄伟,飞檐四出,门楼两侧各有一重檐式角楼。门楣上方大书“天子殿”三字,门外墙面绘有以道教故事为题材的壁画。正殿大门上高挂“乾坤一气”匾额,匾下悬宝镜一面,大有明察秋毫、人妖立辨的意味。门前二柱,各盘云龙,形象生动。殿内正中的金身塑像,便是道教幽冥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天尊阴真鬼帝。鬼帝头戴王冠,脚穿方履,身着衮袍,腰围玉带,秉圭端坐,二目圆睁,表情极为威严。头顶高悬“善恶昭彰”匾额,两旁侍立着手操硃笔、算盘、生死簿的四大判官。整个大殿的气氛十分森严。颇为有趣的是,殿后配祀着一位漂亮的“天子娘娘”,传说她是“肉身成圣”,其塑像具有弹性。殿侧耳房是鬼帝夫妻俩的卧室,床榻被帐俱全,颇带人间烟火味。

那么,这位坐镇丰都的鬼帝究竟是谁呢?道教著作中各说不一,但鬼帝是人这一点却是公认的。对比之下,以鬼帝为张衡的说法比较合乎殿中情况。张衡为张道陵之子,张鲁之父,被天师道尊为第二代天师,并被神化为鬼帝。《三国志》载,张衡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孀居后曾和割据益州的刘焉有过暖昧关系。她“妻以夫贵”,也被神化了。可见道教还把真人变成鬼神。

值得注意的是,现存的天子殿是建造在仙都观的旧址上的。仙都观是平都山的第一座道观,始建于唐初,宋改名景德,又名白鹤观。观中长期供奉的对象,并非鬼帝,而是道教神仙王方平和阴长生,号称“二仙”。据东晋葛洪《神仙传》说,“二仙”都是汉代著名的炼丹方士,阴长生在平都山东“白日飞升”,后世道流把王方平也附会到平都山,说他在此“羽化登仙”。方士本为道教的源头之一,炼丹术又是道士特有的看家本领,因此“二仙”早就被纳入道统。《神仙传》已经让王方平去“主天曹”,“一日之中,与天上相反覆者十数过,地上五岳生死之事,皆先来告王君”忙得不可开交。紧接着,南朝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又赠给他一顶“西域西极总真君”的桂冠,成了道教的仙官;而南朝道书《上清天关三经图》则封他为“平都主筭”(suàn,即算或算筹)官,又当上道教的鬼官。唐初在王、阴成仙了道的平都山头修建仙都观时,他们便理所当然地登上殿堂,坐享信徒的香火了。但在佛教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说的影响下,本以追求长生为宗旨的道教,兼而修求来世,导致“鬼势”大振,“仙风”日下。到了明代,终使天子殿代替了仙都观,鬼帝取代了二仙。平都

山上的“鬼”更多了。

但“二仙”的资格毕竟很老，又是平都山的土著，尽管被挤出原来的香火宝地，总还要给他们另觅安身之所。于是，在天子殿后平都山头的绝顶处修建了凌虚阁，亦就是现存的明代建筑二仙楼。楼中有四尺高的二仙铜像和石刻棋盘、炼丹石炉。这里没有阎罗殿那种恐怖的“鬼气”，也没有天子殿那类森严的“神气”，而是飘散着一股轻松的“仙气”。这在平都山上是仅见的。

在二仙楼东侧，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山洞，旧志称它为五云洞，传说是阴长生的炼丹井，因时有五色云气从中升起，故而得名，原是平都山上的一处“仙踪”。到了明代，有人将洞口山石凿成炉状，指认它就是通往阴曹地府的入口。过去善男信女到此朝拜，都要烧纸钱投入洞中，地风瑟瑟，纸钱飞旋，被称为“群鬼争钱”，是平都奇观之一。现在洞口之上覆有一座亭式建筑，中间玲珑宝顶高耸，成辐状排列的每条屋脊上都装饰着一条行龙，首外尾内，跃跃欲飞。正面两门相依，门上各悬一匾，分别赫然大书“鬼城”、“地府”字样。“仙踪”又变成了“鬼迹”。而且地下茫茫，更有数不清的“鬼”了。

说到这里，丰都之被称作“鬼城”的原因已不难理解。但还须进一步追溯。如前所述，天师道的前身五斗米道，与氐羌等少数民族及其所信奉的巫教有密切关系。西南地区的氐羌系统的少数民族，和“鬼”有密切关系。《山海经·海内北经》说有一个“鬼国”，“人面而一目”。同书《大荒西经》又说：“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威性，少昊之子，食黍。”威、鬼系一音之转，威即是鬼。所谓一目，指双目之外，额上尚纵立一目。属氐羌系统的古代蜀族，正是以“纵目人”之名见诸史册的。这纵目并非真眼，当是刻画点染而成。确认为蜀地古羌人后裔的马尔康嘉戎人，有的至今仍有用艾香在额上炙疤的习俗，此即纵目遗风。可见从族源上氐羌系民族与“鬼国”、“鬼姓”之族有关。氐羌族所信奉的巫教亦称“鬼道”。由于五斗米道吸取了巫术，信徒中又有大量氐羌族人，因此史籍或径称五斗米道为“鬼道”，称道中巫师为“鬼吏”，称初学道的信徒为“鬼卒”、“鬼兵”。可见五斗米道从一开始就和“鬼”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这里的鬼实际上是人。南朝《度人经》在说到坐镇丰都的鬼帝及其部属时说：“惟此鬼神，实与人等，并皆胎生”，他们“还来人间，与人婚宦商贩生业，一与人同”。这曲折地反映了五斗米道时期鬼实为人的历史真实。平都山头天子殿中的鬼帝之家，不也微弱地透露出了一点人鬼同体、结婚生子的消息么？从这个意义理解，“鬼城”即是“鬼道”所治、“鬼吏”、“鬼卒”所居的地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理出这样一条线索：汉魏之际，丰都是“鬼道”传习中心之一，即可能出“鬼城”之类的传闻，但这时鬼即是人；东晋南北朝时期，在道教典籍中，丰都是仙鬼同居，纯属宗教迷信，“鬼城”之类的传说日多，但无更多实物；唐宋时代，宫观林立，已是仙鬼一体，“鬼城”之称正式见诸文献记载；明清以降，道观涌入各色鬼众，仙踪多成鬼迹，“鬼城”之名因之大噪；建国后，“鬼城”终成历史陈迹。丰都平都山上的仙踪鬼迹看似荒唐可笑，但它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道教的发生、发展史，它遗留下来的建筑、雕塑、壁画，更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永　乐　宫

中国的庙宇有寺观之分，奉祀佛教神的称寺，奉祀道教神的叫观。永乐宫是道教北宗——全真教的一处著名宫观。

永乐宫原位于山西省永济县永乐镇。相传这里是八仙之一吕嵒（字洞宾、号纯阳）的故里。唐代人为了纪念他，将他的故居改为祠。宋、金时代改祠为观。元世祖中统三年

(1262)，观被火焚毁，在原址上重建后改称大纯阳万寿宫，因地处永乐镇，故亦称永乐宫。由于工程规模浩大，宫内的建筑和壁画先后历时一个多世纪才全部完工，距今已有六百多年。

五十年代后期，国家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按照施工设计，永乐宫正处于水库的蓄水区，为了保存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自 1959 年开始，由文化部组织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师生、专家、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经过缜密的筹划和精心的施工，用了四年时间，将这座雄伟壮观、结构复杂的古建筑群，和四座大殿内的八百多平方米的精美壁画全部拆下，安全转移新址。重建后的永乐宫建筑保持了原来的格局，壁画也完好无损，不露痕迹，完全按原样复原。

永名宫的新址，位于山西省芮城以北五华里的古魏城。它北枕中条山岭，南望秦岭诸峰，宫前有碧波如镜的南湖，拔地而起的宋代古塔，西北有唐代修建的五龙寺，寺内清泉五眼，其一流入宫内，清如碧玉。其环境之优美，较旧址尤佳。

永乐宫的建筑结构和形制，基本上继承了宋代的建筑传统。但只在中轴线上安置一排殿宇，不设东西配殿，却是打破传统布局的设计。永乐宫的建筑面积原为八万六千八百八十平方米。但六百多年以来有不少已毁坏，现存建筑尚有五进，即：宫门、无极门（也叫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除宫门外，都是元代原来的建筑。这五座建筑排列在宫内一条五百米长的中轴线上。

最南面的是宫门，进宫门顺着一条长达八十米竹柏排列两旁的甬道前进，由礓礤(jiāng chá)台阶（即斜坡式台阶）到两米高的台基上便是无极门。宫门与无极门之间的两侧建有碑廊，里面陈列着三十块古碑，碑文记载着永乐宫的修建经过及壁画内容。无极门的正中悬有“无极之门”方匾一块，是元代原物。台基的四块角石及三扇门的砧台上，都雕刻着剔地突起的石狮，质细工精，姿态各异。

穿过无极门，沿着砖砌甬路北行九十米就是三清殿。三清殿是永乐宫诸殿中规模最大的主殿，建在高大宽敞的台基上，殿顶用黄蓝相间的琉璃浮雕组成五条屋脊，屋脊上的鸱兽高达三米，姿态生动，润泽美观。屋顶前坡用蓝色琉璃瓦组成三个菱形图案；殿檐周匝镶着琉璃瓦边，与殿内外的雕塑、彩绘相互辉映，真是气魄豪迈，金碧辉煌。殿前的月台两侧有石狮一对，左右对峙，将三清殿衬托得更加雄伟。

纯阳殿在三清殿的北面，两殿相距三十三米，建在与三清殿同一高度的台基上。规模仅小于三清殿；殿顶上的一对鸱兽各高二点三米，姿态威猛。殿内外梁架全部彩绘，笔法浑厚流畅，正是宋、元时代的风格。

中轴线上最后是重阳殿，殿的格局与三清、纯阳二殿相同，只是规模略小。

永乐宫的建筑规模宏大，布局疏朗，各殿飞檐凌空，斗栱重叠交错，平棊藻井结构精巧，是现存较完整的元代建筑之一。宫内的殿宇不仅外观壮丽，墙体内部的构筑方式也极为独特。拆迁时发现四座大殿的墙壁，绘有壁画部分的是土坯墙，其它部分则是砖墙，土墙与砖墙之间隔着麦秸束和木板，用以防潮防碱，土坯墙的四边及背后用砖包砌。土墙正面抹有多层粗、细砂和粘土调成的灰浆，最外层除细砂粘土之外还加入麻纸浆，这样制成的壁墙，坚固如石，毫无龟裂痕迹。显示了当时劳动人民为壁画能够永久保存的精心设计和创造精神。

永乐宫艺术价值最高的是它精美的壁画，总面积达八百七十三平方米，分画在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内，壁画内容丰富，技艺精湛，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珍贵遗产。

各殿的壁画以三清殿最为精美，据殿内壁画作者题记记载，壁画完成于元代泰定二年(1325)，面积共 403.34 平方米，分布在殿

内四壁和神龛周围，画中有神像二百八十六个，按对称的仪仗形式排列。全画以南墙两侧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先导，神龛背面的三十二天帝君为后卫；东、西、北三壁及神龛的左右侧壁上分别画着八位主神，围绕这八位主神的有雷公、电母、八卦星君、各方星宿及龙、虎、蛇、猴等神君。此外，还有生有两头四臂的天蓬元帅，三头六臂的天猷元帅，披发戎装的黑煞将军，气象清穆的真武元帅，威武骠悍的天丁力士和端庄美丽的玉女。这些人物有的对话，有的倾听，有的顾盼，有的沉思，神态表情不同，性格形象不一，所有这些，作者只用了简练的线条，就表现得各尽其妙。

从源流和风格上看，三清殿壁画很像宋代道教壁画名手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例如画中帝君和圣母的脸型都丰满端凝；武将个个虎背熊腰，气魄豪迈有力；仙伯、真人、金童、玉女等像，男貌温文儒雅，女容俏丽清秀；衣纹的刻画又都精致流畅。所不同的只是《朝元仙仗图》画的是行进中的神仙行列，而三清殿壁画中的诸神正处于朝拜的静止状态，一个是动中求静，一个是静中有动。

纯阳殿壁画完成于至正十八年(1358)，比三清殿晚三十余年，画的风格也不一样。全殿壁画画的是吕纯阳的一生经历，题为《纯阳帝君神游显化图》，全图由五十二幅连环壁画组成。壁画的内容包罗万象，可以说是一幅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缩影。画中绘有宫殿、园林、山野、村舍、街市、茶肆、旅店、私塾、医馆、道观……以及活动在这些地方的各类型人物，如帝王、大臣、农民、渔人、樵夫、教师、学童、道士等等。画中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富有时代和地方色彩，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

纯阳殿壁画的构图十分巧妙，作者采用山靠山，树连树，房接房，路通路的方式将五十二幅连环图组织在一幅有整体感的大构图里，毫无生硬的感觉。譬如一幅画里的远山，恰好是另一幅里的近景，一片分隔两画的绿树，既是这幅画中的景，又是另一幅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远望宛如一幅巨型青绿山水画。

纯阳殿中央神龛的背面有一幅面积近十六平方米的人物画，画的是道教神仙钟离权与吕洞宾谈道的情景。笔法挺健，色彩和谐，气韵生动。作者将画中人物安排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之中，那里有苍松、山石、飞瀑、奇花异卉，钟离权美髯袒胸，背松倚坐，双目炯炯有神，正在恳切地向吕洞宾说道；吕端坐石上，俯首凝神，静听教诲，神情恭谨。这幅画下笔奔放，墨色淋漓。作者以极洗炼的线条刻画出人物的性格、情态和内心活动。画的设色清雅古朴，看去十分调和。

重阳殿壁画的布局和构图与纯阳殿大体相似。由四十九幅连续性画面组成，各幅之间用山、石、云、树相连，粗看上去是满壁的青绿山水，细看却是金代道士王重阳的画传。

重阳殿壁画笔法简练遒劲，尤其是画中之马，极为出色，每匹马的姿态、体质各不相同，但都栩栩如生，能于形似中得筋力，于筋力中传精神。是全殿壁画的精华。这个殿的壁画损坏较严重，几乎达三分之一，题有作者姓名和作画年代的墙面已毁，但从壁画风格可以判定仍是元代作品。

永乐宫旧址永乐镇在唐、宋时代就是山西省南部名镇，隔黄河南望山东大道，西面的潼关是通往唐代都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门户，东面有古城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当时这一地区是壁画名手辈出的地方，像唐代著名的壁画大师吴道子，宋代的道教壁画名家武宗元、王拙等都曾活动于这一带。除此之外，这里还荟集着许多画史上不曾留名的民间画师，他们在技法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壁画的优秀传统，所以他们的作品技法纯熟、真实、生动而富有创造性。

永乐宫壁画继承了唐、宋绘画的优秀传统，又具有元代壁画的特色，它的规模和艺术成就在中国现存的同类题材壁画中可谓首屈一指。

白　云　观

在北京西便门外的闹市中，有一片清幽之地，这便是著名的道教全真第一丛林——白云观。

金元时期中国道教大致可分为全真派与正一派两大派别。全真派的始祖是王重阳，金大定七年(1167)，他在山东宁海(今牟平)的全真庵中讲道，集儒、释、道为一体，创始全真派的雏形。以后，他的弟子丘处机继承并发展了他的学说，正式创立的全真道。全真道主张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为"真功"；"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功行俱全，故谓全真。

以往道教不要求道士出家，长期以来也没有道徒群居的道观，没有佛教那样的"丛林"制度("丛林"，本指佛教僧众聚居的处所，后泛指寺院)。王重阳吸收了佛教的一些组织形式、规章制度，修建了宫观，并要求弟子们出家修行、受戒。建立起全真道的一整套丛林制度。

道教丛林制度的建立，对道教宫观建筑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白云观便是现存的一个较宏大较完整的道教丛林。

白云观建于唐开元年间，是唐太宗为奉祀老子而建造的，当时叫天长观。白云观内至今仍存有一座老子石刻像，据说是唐代的遗物。金正隆五年(1160)，契丹族南下，天长观遭兵火焚烧殆尽。大定十四年(1174)重建，以后几经修葺，先后改称"十方大天长观"、"太极宫"，接纳四方云游道士。元代，改称"长春宫"，元太祖诏"天下出家人皆隶焉……"，从此，参谒者云集。明初，以处顺堂(丘祖殿)为中心扩建，更名为"白云观"，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白云观今日的主体建筑，基本上是清代白云观第七代方丈王常同重修时的规模。

白云观的建筑格局是以八卦方位布局的，以子午线为中轴，座北朝南形成中路，东西两路互相对称，形成一个建筑群。

白云观的主要殿堂座落在中路，其建筑风格与中国的宫殿建筑十分相似。这是因为道教的神仙信仰是从中国民间的神仙崇拜发展而来的，它的建筑风格也就吸收了中国早期神庙、明堂的特点，而宫殿也是由神庙、神社等古代祭祀场所逐渐演变形成的缘故。另外，道教还认为人间的一切都是天上的反映，所以天上诸神的住所应与人间帝王所居的宫殿相似。这样，道教宫观也就与人间帝王、天上诸神的宫殿大致相同了。可见，任何宗教都是现实社会的折射，都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

道教是多神教，它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讲究上下尊卑。这在道教宫观建筑中也有所反映。白云观中路殿堂，无论是外观还是殿内陈设、殿前的院落都较东西两路的高大、华贵、宽阔。如果说中路的建筑类似于宫廷中的正殿，充满刻板、肃穆的气氛，那么，东西两路的建筑较接近于民间的四合院，更富有人间烟火味。这些都与它们所奉祀的神明的身份相吻合。中路奉祀的是道教中的尊神，如玉皇大帝、三清四御、全真道的教祖、北七真人、丘处机等，东西路供奉的多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如八仙等。

白云观中路的主要建筑大致分为五进，有灵官殿、玉皇殿、七真殿、丘祖殿、三清阁和四御殿。灵官殿在山门的北面。道观的山门一般有三个门洞，这是因为道教将诸神分为三界，即天神、地祇、人鬼，山门的三个门洞就象征着"三界"。走入山门，便是跳出"三界"。王灵官是山门的护法神，专司人间天上纠察之职。

白云观的中心建筑是丘祖殿。丘处机与白云观的关系最为密切。元太祖曾封他为国师，赐其居"太极宫"，并以其字"长春子"易宫名为"长春宫"，令他掌管天下道教，自此，白

云观成为当时全国的道教中心。丘处机八十七岁时去世，死后，就安葬在丘祖殿下。

观内的老律堂也叫七真殿，供奉着王重阳及其七大弟子——马钰、谭处机、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人称“北七真人”。殿内悬挂的匾额为康熙皇帝御笔——“琅简直庭”，“琅简”即玉皇的诏敕，“真庭”是为奉祀真人的祖庭。老律堂是观内道士的主要宗教活动场所，也是全真龙门派历代律师传戒之地。

中路最北端是一双层建筑，上层叫三清阁，下层是四御殿。四御是天上神界的四位大帝，位在三清之下，管辖天庭神界诸事。四御殿内设有经坛和各种做道场用的法器、经书，每逢重要诞节，都在此做隆重的道场。四御殿东边有一小门，里面叫“抱元洞府”，是道士修炼之处；西边叫“会仙福地”，是众生与神仙相会的场所。三清阁供奉着三位尊神。三清之首是玉清元始天尊，也叫天宝君；其次是上清灵宝天尊，亦称太上道君；居第三位的是太清道德天尊，一般称之为太上老君或尊称为老子，他著的《道德经》一书是道教的主要经典。道教中有“一气化三清”之说，相传三清都是元始天尊的化身。三清阁东有一藏书楼，藏有明刻道藏五千余册。其中明赐经碑仍完好无损。

白云观东路的殿堂，因神像早已毁坏，已辟为寮房，现为道士的生活区和中国道教协会所在地。

尽管白云观的中路建筑宏阔，供奉的神明也都是道教中的“正神”，但实际上受老百姓香火最多的，还是西路殿堂里供奉的民间传说中的诸位仙人。西路主要殿堂有祠堂、八仙殿、吕祖殿、元君殿、元辰殿等。

元君殿也叫子孙堂，奉礼着碧霞元君的塑像。碧霞元君相传是东岳大帝的女儿，她的职责是照察人间善恶。在其两旁分别供奉着送子娘娘、催生娘娘、眼光娘娘和天花娘娘。这里曾吸引了不少“善男信女”，为了求医、求嗣、保佑子女平安，到这里来烧香许愿，祈求神明的保佑。

元辰殿也叫六十甲子堂，以往，每年正月初七、八日这里最热闹。元辰殿奉祀的是道教中的六十位星宿神，即六十甲子日值日的六十位神。这些神的名字都是用天干、地支循环相配而命名的。过去人们迷信地认为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星宿，故而以自己的生辰、属相为根据来此寻找、礼拜自己的本命神，以求命运顺达，平安无事。六十甲子堂始建于金代，清代时重修，易名为元辰殿，现在殿内陈设的六十甲子塑像是近年重塑的。

白云观的整体建筑风格体现了道教的入世思想，除有殿堂外，还有亭、台、楼、阁、假山、回廊、殿堂森森，树木匝地，廊腰曼回，确是十分清静典雅。白云观的后花园——云集园，素有“小蓬莱”之称。

白云观内还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玉皇殿内的百寿幡，相传是慈禧过六十大寿时所用之物，后赐给白云观。丘祖殿内的“大瘿钵”，相传是宋代遗物。它上宽下窄，用一棵完整的大树瘤剖开挖空制成，下面还有一个汉白玉石座为托。乾隆皇帝将它赐给白云观，道士们便用他募化。遇灾年观内断炊，还可抬着它从正阳门入宫，由宫内供给食物。这只“大瘿钵”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植物中的珍宝。

观内祠堂的墙壁上，嵌有元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所书的《道德经》、《阴符经》石刻，可以称得上是古代书法的珍品。

白云观的石猴和铜骡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关于白云观的石猴，老北京有这样的传说，“神仙本无踪，只留石猴在观中”，这石猴便成了神仙的化身，过去还流传这样的典故：“三猴不见面，铁打白云观，有门无人走，倒坐南极殿。”观内有三只石猴，其中一只雕刻在山门的石壁上，只有手掌大小，形象活泼可爱，其它两只在它处。来白云观的游客走至

山门,都要用手抚摸这只石猴,讨个吉利。

白云观的铜骡,其实是一只非马、非驴、非骡的四不象,伫立在老律堂门前。据说这是清康熙皇帝为了纪念他下江南时的坐骑,令人铸造的。老北京传说这只铜骡有祛病免灾之功,头疼触其头,腹痛摸其腹,便可痊愈。当然现在人们是不会相信这些的了,但在昔日盆穷落后的中国,人们把它做为寄托和安慰也是可以理解的。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与中国的民间风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云观作为全真道第一丛林,在民间的影响更为广泛。过去,每年春节前后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特别是正月十九日的“燕九节”吸引了众多的信徒、游人。相传“燕九节胜会”的由来,与丘处机有很大关系。据载,正月十九日是丘处机的生日,在他生前,每逢此日,道教徒便为他祝寿,渐渐形成了庙会。所以正月十九日也是白云观最为热闹的一天。其实,十八日晚上,白云观已经是热闹非常了。据说,丘处机死后,在每年正月十八日夜,都要变成士绅、游人。乞丐等重返观中,有幸与他相逢的便可逢凶化吉、祛病延年。于是,这天晚上前来烧香礼拜、碰运气的人便络绎不绝。就连皇帝有时也派人在十八日夜送来酒席。孔尚任曾做诗描述人们求仙的迫切心情:“春宵过了春灯灭,剩有燕京烟九节,才走星桥又步云,真仙不遇心如结。”十九那天,庙会达到高潮,《帝京岁时纪胜》记载道:“车马喧阗,游人络绎,或轻裘缓带簇雕鞍,较射锦城濠畔;或凤管鸾箫敲玉版,高歌紫阳村头。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归许多烂醉之神仙矣。”隆重的燕九节胜会一直沿续了七百多年,直到解放后才逐渐被人们淡忘。

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白云观,几经修葺,形成今日之规模。现在,她不但是道教信徒们的宗教活动场所,还是人们了解祖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

道教与文化

蓬莱仙山

上古神话中的“神”和后来传说中的“仙”，虽被人们想象为遨游天地，来去自如，但也有一个歇脚的聚集之地。例如中国神话中的昆仑，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大概都因为大山高耸、幽深莫测，符合于“神”的超凡身份，所以便成为众神的集中活动之地。神话之后出现了仙话。仙和山的关系更为密切。《说文》：“仚（按：即“仙”字），人在山上貌，从人山。”《释名》“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按：仙古字作僊，遷也），迁入山也。故制字人傍山也。”得道成仙，必须隐进深山，长期修炼，吐纳导引，服食养生，方能达到“老而不死”。因此随着“仙”的形象出现，在与昆仑相对方向的东部，又有了一个仙人的居住集散之所，那就是渤海之中的“三神山”，也有说是“五神山”的，分别见于《史记·封禅书》和《列子·汤问》：

> ……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
>
> 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为无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

其中蓬莱和瀛洲是共有的，所以古有“蓬瀛”之称，《拾遗记》载：“历蓬瀛而超碧海。”而蓬莱之说似更为古老。《山海经·海内北经》即载：“蓬莱山在海中。”《楚辞·天问》之一问谓：“鳌戴山抃，何以安之?”王逸注引《列仙传》，说明这里问的大龟背着它而戏舞于沧海之中的，就是蓬莱山。后世流传的仙话亦往往多称蓬莱。因此蓬莱可以视为“仙山”的代称。唐高宗时东内称蓬莱宫，宫后有蓬莱池；宋治平中在山东省蓬莱县北丹崖山上建蓬莱阁，其取名都体现了这一意思。因此所谓蓬莱仙话，指的是以蓬莱为中心、为标志的关于仙人的系列传说故事。

蓬莱等仙山之所以出现在渤海之中，是有历史、地理原因的。战国中世以来，燕齐一带神仙观念和方术盛行，当时的统治者热衷于求仙活动。《史记·封禅书》说：“（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燕齐濒临海域，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对于渴望求仙的人们来说，很容易被附会成仙山。古人已曾有悟于此。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三“海市蜃楼”条云：“玉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终无有验。……后游山东莱州，见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汉武俱为所惑者，乃此耳。’此言甚确。”但是在仙道之说炽盛的年代里，人们对于“老而不死”的仙人们聚集的仙境心向往之，仙山于是被披上了神奇瑰丽的外衣，气势十分壮观，较之《山海经》中仅提及其在海中的情况大不相同。《史记·封禅书》说：“三神山，上有不死之药，……其物禽兽皆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

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列子·汤问》述五神山，更详细而有趣：“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海内十洲记》分别叙及三神山，说蓬莱周围环绕着黑色的圆海，“无风而洪波万丈”；方丈“专是群 龙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宫”；瀛洲“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为醴泉，饮之数升辄醉，令人长生。”仙山固然美而奇，最重要的还是这上头有着种种使人不老不死的药、草、果、水。缥缈的仙境，寄托着人们在仙道思想影响下对于纷扰、短促的人生的超脱心理，随着道教的盛行又带上了宗教的色彩。但是追求长生乃是人的普遍愿望，其中也包含着一种积极的热爱生活的精神。

蓬莱仙山说的兴盛和扩布远在昆仑神山之后，二者之间既有史的区别又有史的联系。古籍载录中的一些细节明显透露出这一信息。《天问》在“鳌戴山抃，何以安之”之下，接着就问道：“释舟陵行，何以迁之？”这就又关涉到以下的故事。《列子·汤问》载：“龙伯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经他们这么一闹，“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以亿计”。这“龙伯”是古神话中的巨人，他们身高力大，敢于侵犯仙山，而仙人拿他们没办法，终于是天帝出来惩罚了他们，“侵减龙伯之国使埫，侵小龙伯之民使短”。《列子·汤问》并记当初五神山因为无根连著，故随海浪上下翻腾，仙圣们受不了，就诉之于天帝以求助。天帝于是“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这个为稳定五神山作出贡献的禺强也是古神话中的角色，“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山海经·海外北经》），他身为水神，因此可以役使灵龟，叫它们去把仙山驮稳当了。仙山既受神的侵扰，又受神的护佑，相形之下，它的神圣性和庄严性确实不如神山。可见仙话初起之时，由于上古神话的余势尚在，神的威力尚深入人心，所以仙话还往往受到神话的制约。

凡人到不了仙山，连至高至尊的国君派人去求仙也达不到目的，居住和来往于仙山的，是人中修炼出来的超脱尘世人的“仙人”。长生不死和神通广大是他们的两大特点。《神仙传·彭祖传》具体描述了仙人的神通变化：“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而人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仙人们还被按照得道的深浅，分成不同的品级，有分为三等的，也有分为九等的。三分法由晋代神仙道教的代表著作《抱朴子》提出，说：“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仙作为中华民族的独创形象，颇能迎合各阶层人们的生活情趣和心理愿望，因此关于仙的故事长期盛传不衰，扩布面极为广泛，其在古文献中载录之多，与各类传说比较显得很突出。从汉代到清末，载录仙话的集子数以百计。仙话不仅是志怪小说的重要内容，也是诗歌、戏剧创作的重要题材来源。其影响之深远，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蓬莱仙系是一个为数众多的群体。汉刘向所著的第一本关于仙人的专著《列仙传》，就载有“七十余人”（《神仙传序》），今本为七十人。晋葛洪著《神仙传》，今传版本一种为九十二人（刊于《龙威秘书》、《说库》等），一种为八十四人（《四库全书》）本）；而据唐人梁肃《神仙传论》云：“予尝览葛洪所记……《神仙传》凡一百九十人。”此仅二书所载，可见一斑。那么多的仙人，从其来历和身份看，一般有以下三类。

一是神仙家、方士修炼而成。《史记·封

禅书》载："宋毋忌、正伯侨、充尚(《汉书·郊祀志》作元尚)、羡门子高、最后(仙名，王念孙《读书杂志》谓即《文选·高唐赋》所说的"聚谷")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宋毋忌等人，就都是"为方仙道"的，因此达到"形解销化"(把灵魂从肉体中解放出去)，永生而成仙。传统观念中求仙还必须修德。《抱朴子》曰："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不修而但务方术，终不得长生也。"求仙必须做好事，而炼丹采药又是修炼济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传说中多有推崇仙人救死扶伤的故事。《列仙传》记琅邪阜乡人安期生，"卖药海边，时人皆言千岁公"，赞誉他的药治病有成效。秦始皇接见他，赐金璧数万，但他"出于阜乡亭，皆置去"，留下话说"复千岁来求我于蓬莱山下"。始皇派遣数人入海，未至蓬莱山辄风波而还，"立祠阜乡亭海边十处"，这实际上也表现了广大群众对他的纪念。《列仙传》又记一负局先生，说他"语似燕代间人，因磨镜辄问主人，得有无疾苦者，若有辄出紫丸赤药与之，莫不愈。数十年后大疫，每列户与药，愈者万计，不取一钱。后上吴山绝崖，世世悬药与人，曰吾欲还蓬莱山为汝曹下神水崖头，一旦有水白色从石间来，下服之，多所愈，立祠十余处"。他们医术高超，医德高尚，造福人群，不计报酬，可以说是人民群众理想中的仙人形象。这两个仙人都与蓬莱有关系，其中安期生与蓬莱的关系更密切。《史记·封禅书》记方士李少君对汉武帝陈说："臣常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汉武帝就派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二是从神转化而来，如盘古、黄帝、西王母。盘古是神话中的创世神，开壁天地，化生万物。道教接过去尊为"元始天王"。据葛洪《枕中记》：在二仪未分，天地日月未具时，已有盘古真人游于其中。后与太元圣母通气结精，生东王公与西王母。后又生地皇，地皇生人皇。原始人类解释天地万物形成的不自觉的艺术想象，被彻底宗教化了。黄帝原是部落征战神话中的胜利者，他"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他又是天上神国的组织者，自任"中央天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淮南子·天文篇》)。战国秦汉时代，仙家思想渗入，《史记·封禅书》记有关传说云：黄帝在征战的同时即学神仙，百余岁得与神通。又采首山之铜，铸荆山宝鼎，"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之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这场面真够热闹的，人们争先恐后，反映了求仙的强烈愿望。西王母的仙化过程，其形象和职司都有很大的变化。据《山海经》载，西王母原住"昆仑之丘"的玉山，"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形象凶恶可怖，职掌的是人间的瘟疫和刑罚。在《淮南子》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可见她主掌不死之药，成为长生不死的象征神。到了《墉城集仙录》里，又一跃而为掌管女仙名籍的仙界女领袖，《汉武帝内传》中描述她凌空驾云而行，雍容华贵，群仙数千簇拥，气派非凡。以上三例，可见宗教对于神话的利用；也显示了仙话对神话的承继与变革。三是一些历史人物，如老子、吕尚、介子推、范蠡、东方朔等。老子作为道家创始人，被尊为"太上真人"，住在"唯飞仙能到其处"的蓬莱山上的"九天真王宫"里(据《海 内十洲记》)。这些历史人物各有其不凡的事迹传说，因此被奉为仙人。

唐宋元明期间，道教仙术继续发展并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唐高宗以老子为李氏祖先，上"太上玄元皇帝"尊号。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由于承袭和现实的因素，仙话盛传不衰，出现了群体性的八仙传说，唐以后各代文籍均有载录。唐代已有《八仙图》和《八仙传》，元杂剧

也敷演八仙故事,但究竟是哪八仙,尚有游移。明吴元泰著《八仙出处东游记》,确定八位神仙是:李铁拐、钟离权、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明代青花瓷瓶上以西王母为中心的八仙祝寿图,画的就是以上八个仙人。他们各有自己得道成仙的故事,但往往有彼此超度的关系。民间传扬他们的故事,既渲染他们的神通法术,也表彰他们为民造福、替民除害。有的故事情趣横生,反映了仙与人之间亲近的关系。如赵州桥上的七八个驴蹄印,相传就是张果老牵驴驮上日月过桥时压出来的。因为赵州桥的建成轰动远近,连蓬莱岛上的仙人也听说了,所以就来试试这桥的承受力。通过人、仙之际的较量,热情歌颂了造桥工匠的创造。被文人、戏剧家采为创作题材的,更多是"八仙过海"和"八仙庆寿"的故事。八仙过海的故事最早见于元明之际无名氏杂剧《争玉板八仙过海》。说的是三月十五日蓬莱仙岛牡丹盛开之时,白云仙长邀请众仙前来观赏。八仙宴后回程,各自拿出灵物,渡越东海。东海龙王之子抢走蓝采和的玉板,激怒八仙,大闹龙宫,终获全胜。在山东,以演唱八仙过海故事为主要剧目,竟形成了蓝关戏、八仙戏、渔鼓戏等剧种,可见影响之深。八仙庆寿剧目富于喜庆气氛,因而成为贵族富人"庆寿佐樽之设",清代并成为御前应承戏中的剧目。

综上所述,蓬莱仙话勃起于神话之后。神山仙山东西对峙,神话仙话各成系统。然而超现实的想象本质相通,所以二者藕断丝连,其间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但神话中的"神"出于"天生",仙话中的"仙"却可修炼而成,这既配合了宗教劝世之旨,又迎合了人们乐于长生之心,因此能较长地适应历史变化,在千多年中盛传不绝。群仙形象体现了民族文化心态,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创造。群仙形象也大量进入古代文学创作,在形成文学的民族风貌方面起了作用。因此,要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都不能不了解仙话。

道教与古代科技

道教形成以前,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已经有了高度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科学著作。道教形成以后,我国古代自然科学也主要是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发展的:国家设有专门的天文学研究机构,并通过科举考试招揽天文历算人才;国家设有太医局或太医院,一些知识分子可通过考试担任医官。国家的科学机构以外,是民间的科学活动。一些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抱着对国家的忠诚、对生产的关心、对人民的同情,经年累月,历尽艰辛,从事科学活动,涌现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写出了影响深远的科学著作。比如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沈括的《梦溪笔谈》等等。上述种种,基本与道教无关。

与道教有关的,主要是古代化学(炼丹术)和人体科学(主要是气功)。在道教中,前者属"外丹",后者称"内丹"。

道教的核心是追求长生不死,追求长生不死最初是个科学问题,不是宗教问题。

人的正常死亡,至今还主要是由于得病。人们想:如果不得病,是否就可以不死?战国秦汉时代,我国古代医学已有高度发展。医药可以治病,那么,有没有一种"好药",可治一切病,甚至使人根本不得病,因而长生不死呢?

最早寻求不死药的,据战国时代文献载,是燕王和荆(楚)王。不死药的效果,很快就知。人们想,人间的药大约不行,于是想到了神仙。

认为自然界有神,是远古就有的传说。人生生死死,但传说却长期不变。神在人们思想中的长期稳定使人们把神当作在实际上是永远存在、长生不死的。这些神,有许多成了后来的神仙。

神仙不死,他们一定有不死的办法,有不

死药。所以秦皇、汉武才不惜工本，大规模地寻仙祀神，以求得到不死药。在这里，科学由于自己的目标太高（长生不死），无法实现，而去向神学求援了。

秦皇、汉武也失败了，失败引起了更大的反对，但仍然有人坚持下去，他们认为，要想长生，求神不行，应该别辟门路，寻找新药。

最初的不死药大约是草木药（也许还有动物药），因为治病用的就是草木药。今天认为，药能治病，是因为药杀死了病菌等等。但在古人看来，服药，就是把药物的性质转移到了自己身上，比如有人吃了九牛二虎，就有九牛二虎之力。但草木药，放久了就干枯朽败，下锅可以煮烂，架火可以烧焦，自己不能不死，如何能让人不死？要让人不死，药物本身就应有不死的性质。这样的药，只能是一些性质比较稳定的矿物，主要是黄金。后来又有水银。水银来自丹砂，水银一炼又成为丹砂，变来变去，水银自己似乎没变。而神仙就是会变来变去，但自身仍然存在。比如孙悟空不论变成什么，孙悟空还是孙悟空。所以人们后来把丹砂和水银看作最好的不死药。水银以外是铅。因为铅和其他物质一起，可以炼成一种像黄金一样的物质。人们认为，这炼成的金更宝贵。铅是主要原料，当然受到重视。道士们常常讲到铅汞（水银），原因就是这里。

铅和汞都有剧毒，由此炼出来的金丹效果如何，不问可知。于是有人又说，自然界的铅汞不是真铅汞，真铅汞在人自身，只有“冶炼”人身自有的真铅汞，才能成丹，才能长生。“冶炼”的办法，是气功。这样炼出的丹叫“内丹”，与此相对，用自然界药物炼出的叫“外丹”。

“内丹”一词出现较晚，但作为一种养生方法，战国时代就有了。服药求长生，是借助外物的力量；用内丹来养生，是调动自身的功能。调动自身功能的办法也很多：熊经鸟伸，呼吸吐纳，对着日月呼吸，叫作餐日月之精华；早晚叩齿咽唾液，叫作饮玉液琼浆（神话中的玉液琼浆原来就是人的唾液）；还有房中术等等，但主要是气功。

战国秦汉时代，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人体由三部分组成：形、气、神。形是形体，神不仅指精神，还指人体器官的功能。人死是怎么回事呢？古人说，是神离开了形体。有时候，人还活着，只是某个器官不管用，比如瘫痪，古人说，那是这些器官的神跑了。如果神不离开形体，人就可不死。体育锻炼，可使人体功能正常，于是也被作为长生手段。人们知道，有关生死的，主要是头和内脏，四肢缺一两个也死不了人，所以作为锻炼内脏手段的气功就逐渐排斥了其他手段。

内丹和外丹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初期道教，外丹势力强大，唐末以后，由于外丹的屡次失败，内丹才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早期的炼丹家们并不向鬼神乞求，反而排斥鬼神。魏伯阳说，有些人天天祭神，甚至梦里也不忘记，自认为一定要长生，结果却夭折而死。葛洪说，祭祀的丰盛如果能使人不死，那么富人就一定可以长生了。他也不相信求神可以治病。他甚至要求国家把那些用求神来治病的巫婆神汉统统杀掉，不管他们罪行轻重。

这说明，求长生，本身是个科学问题。人们错了，但也是科学本身的错误。科学在这里追求的目标太高，高到了荒唐的程度，但是，谁敢说自己就不办荒唐事呢？况且，直到至今，谁又能说清，人究竟能活多久呢？

科学追求的目标太高，科学的手段又无法实现这个目标，秦皇、汉武已经因此而向鬼神屈膝了，后来的炼丹家们，由于屡次失败，也被迫向鬼神屈膝了。

葛洪炼丹，已开始向鬼神求援，后来的道士则更甚。求助鬼神的手段五花八门，比如说，祷告、禳祭、佩符、念咒，来乞求或强迫鬼神替自己服务，而且每一手段都有一套繁琐的程式。甚至炼丹的时间、地点，丹炉的形

状，都有种种讲究，还加上必须积德行善等等内容，以求得到鬼神的庇护。这一切，完全是宗教内容。在我们局外人的眼里，只见那神秘主义的重峦叠嶂。如果道士们偶尔搞出点什么东西，比如火药，有人就说那是神秘主义对科学的贡献。而且，神秘主义还把科学技术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比如火药发明了，却直到很晚才应用于实际。

至于气功，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作气功前，必须祷告，拜祝，求神保佑。在古人看来，气功健身，就是保留住"神"，使它不离开形体。道教则把这说明人体功能的"神"人格化，说人的每一器官似乎都有一个神在管理着，并指出了神的名字、形象、衣着及活动情况。这样，体育和健康的关系成了人和神的交通，体育锻炼就有变为祀神活动的危险。

道教用一套神秘主义的东西帮助一些人坚定了求长生的信心，他们不仅保存，而且发展了古代的化学成就。丹药虽然不能使人长生，但有些确实可以治病。这些，都是道教对科学的贡献。道教保存并发展了气功，他们在修炼中确实积累了一些实际体验，也是宝贵的科学遗产。一些道士对医术深有研究，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如葛洪、孙思邈等。不少道士还通天文历算，据说祖冲之就可能是道家信徒。不过，道教徒的贡献不是这些学科的主流，而且有些科学活动仅是以个人身份进行的，与他们的信仰无关。

道教与气功

中华气功之道，渊源极为久远。据传早在商周以前，就有赤松子、彭祖等以气功养生名世，尤其是彭祖以"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庄子·刻意》)之术，寿至八百，成为养生延寿的代表人物。周朝王子乔，据传以气功养生而登仙。战国秦汉，各种气功相当发达。《老子》、《庄子》、《黄帝内经》等，论述了抱一、守静、专气、心斋、坐忘、内守真气等炼养之道。战国中期所镌"行气玉佩铭"，扼要描述了内气在身中运行的轨迹；屈原《远游》，王船山释为内炼之谈，可谓后世内丹说的先声。气功不但被作为养生延命之术，而且被宗教化，当作能通往长生不死的"仙道"，不断有人专事于此。直至北宋末，专行炼养学仙者尚未有其教团。近代道教学家陈撄宁主张把中华传统"仙学"与道教分开，自不无一定理由。

道教教团酝酿之初，就继承采摭了秦汉炼养成仙说，从此道教一直把宗教化的气功作为炼养成仙的主要途径，中华传统气功从此主要在道教中发展，从而也被道教进一步宗教化，掺杂进不少糟粕。"气功"一语，即出道书，六朝隋唐的《中山玉匮服气经》、《延陵君修养大略》等道书，以"气功"专指"服气"一类炼养术。当今气功界以"气功"泛指自我调控身心而有内气效应的各种炼养术，包括印度瑜珈、佛教禅功、道教炼养术等，严格说来这种称号并不十分确切。但在尚无更确当的名称之前，只能姑仍其旧，将道教各种炼养术也纳入气功一类。

近二千年来，无数道教徒怀着长生成仙的宗教热忱，竭其毕生精力多方探索、矻矻修炼，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大量气功实践经验，开辟了多种功法门类，创立了系统的气功理论，写下了大量气功著述，形成了体系庞大、包罗宏富的道教气功学。道教气功学，可称作中国传统气功学的集大成者，它堪与印度瑜珈学、佛教禅学比肩并立，为世界古代气功学的三大家。道教气功学长期以来广泛流传，对儒佛二家及民间诸派气功，中医、武术、书画等都深有影响。今天国内流行的气功，以渊源于道教者为最多。《道藏》内外数千卷道书中，气功专著及含气功内容者不下二千卷，它们是我国传统气功学遗产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官私史籍、文人笔记及道史仙传中还有不少道教徒修炼实践的记载，今天看来

也是研究古代气功实践史及人体生命科学的宝贵史料。

道教徒抱着长生成仙的宗教信仰练功，再加上时代认识水平的局限，他们不可能科学地探索、认识气功，往往夸大气功功效，按其信仰的需求而把它宗教化。道教气功文献中，气功和宗教往往混熔在一起，把气功的内核包裹在层层宗教外衣之下。道教徒所崇拜的不少“神仙”，如钟离权、吕洞宾、张三丰之流，今天看来也多是一些气功有素、延寿却老并表现出“神功异能”的历史人物。

道教气功门类甚多，即有守一、存思、行气、内丹等静功，又有导引、按摩等动功。道教诸派各时期所主张的功法互有不同。总的看来，道教气功学为其长生成仙的宗教信仰服务，被以长生成仙为旨的练功实效所推动，功法在不断发展，理论在不断深化。道教气功学的发展史，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后汉末至西晋末，为道教气功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道教各种炼养功皆已创立，尤以守一、内丹为最系统。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参合《老子》、汉《易》系统论述内外丹修炼，被尊为“万古丹经之祖”。原始道典《太平经》详细叙述了守一等炼养之道，描述了修守一者由守元气虚无而渐见种种光明等幻象，及身心怡悦的主观感受。《太平经》以合炼精气神三者为一、宝精惜气啬神为养寿之要，这一思想后来一直被奉为道教炼养学的宗要。该经还叙述了存思符箓、八卦以还精治病之法。传为张陵或张鲁撰的《老子想尔注》，宣扬“积精成神，神成仙寿”；《河上公老子注》也以“固守其精”为养身之要。与气功炼养密切相关的房中卫生术，也为五斗米道所传授推行。

东晋到唐末，为道教气功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道教上清派最为兴盛，该派所主张的存思、服气，在社会上影响最大。传为魏华存所出的《黄庭经》盛传于士大夫间，该经宣称人身各部位皆有神主掌，尤以上中下三丹田之神，为全身诸神之军，令人主要存思三丹田中之神，积精累气而臻成真。又说身中哪一部位有病时，存思该部位或主该部位脏腑之神，便能治愈。上清派编造了大量经咒符图，其修炼方法是把存思神、诵咒诀祝词及吐纳、导引、按摩、咽津等结合起来，他们所谓“存思神”不仅存思自身中神，而且存思日月、五方气及众多的天神、仙真。这种从形式到旨归都渗透了宗教内容的存思之道，表面看来颇为怪异，其实从其客观作用来看也多属气功修炼，并有一定的治病健身之效。葛洪《抱朴子内篇》除宣扬守三丹田中之神（“守真一”）外，还主张一种以调息闭气为门的“行炁”功，据传其从祖葛玄行炁功夫极深、能盛夏不势、入水不濡。行炁功由上清派发展，与导引、按摩等结合起来，集为“服气”之道。服气一称食气，具有辟谷休粮的含义，服气者或者希图通过长期调息行气而逐渐达到能不饮不食、不饥不渴，或则于练行气功时兼辟谷休粮而服饵草木金石之类的药物，道书中留下服饵药物的方子有成百种之多。服气功至唐代趋于成熟，多趋向服内元气。《幻真先生服内元气诀》等所述服气过程分调气、淘气、咽气、行气、散气、委气、炼气、闭气等诸节，强调吞咽者必须是自己丹田气海中升上来的元气，服咽入腹后还要以意领气，沿任督二脉运转，谓之“行气”。服气之始，先行导引、按摩、叩齿、咽津。孙思邈的《存神炼气铭》则以意守脐部丹田为长生之门。这类功法的继续发展，便走向内丹。

这一阶段道教不仅以服气、存思等为养生延寿、成仙登真之径，而且还很现实地用这些方法来治病。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孙思邈《摄养枕中方》、司马承祯《服气精义论》等，具体阐述了用六字气、存思日月、存思脏腑及火、导引、按摩、运气等自疗各种疾病的方法。《摄养枕中方》等还介绍了服气功深者“布气”（发放内气）为别人治病之法，及远距离发气

治病的“遥禁法”。道教气功医道，在这一时期最为发达。隋朝巢元方等所辑医方《诸病源候论》所列导引吐纳治病方千余条，其中多数皆来自道教。

唐末以后为道教气功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道教诸派在炼养方面渐趋归内丹一途。内丹之说虽早已出现，但总的看来，这在前一阶段被外丹与服气功所掩，影响、发展都不大。服气存思及外丹服炼盛行数百年之久，实验结果证明外丹成仙说为伪谬，服气、存思等虽不无祛疾轻身乃至延龄及百岁之效，但终不能达到道教徒所期长生成仙的目的，于是便渐渐冷落，内丹说遂代之而起。服气、存思一类炼养术，理论上相当粗糙，而内丹则有其相当玄深的理论根据，它从道教传统的“人身一小天地”的天人合一论哲学观出发，外究天地万物生成之源，比附于人体生命现象，以人生具有的精气神“三宝”为内炼的药材，声称逆天地——生命生成之序炼精气神返本归元，“与道合真”，便可结丹长生。内丹学又引《周易》卦象、河图洛书、中医经络说等描述高深静定中内气运行的轨迹，它几乎搜集了当时所有学说组织理论体系，其长生成仙之说较前大大深化，具有更大的宗教吸引力。

唐末以后内丹学的发展又可分为前后二期，前期从唐末至北宋中期，以传统内丹的渐兴为特点，有钟离权、崔希范、吕洞宾、施肩吾、彭晓、刘海蟾、陈抟等内丹大家活跃于世。北宋中期以后为后期，这一时期内丹学深受禅宗影响，朝道禅交融的方向发展，从修炼次第上，可分为南宗、北宗。南宗以张伯端为代表，主张先命后性，北宗(全真道)以王重阳为代表，主张先性后命。后来两派合流，其内丹学说的发展一直延续至晚清。

内丹以祛疾健身为初效，以延年永寿为中效，以“阳神”飞升为最高目标，具体修持从意守丹田或降情摄念入手，是一种见效较快、弊端较少的静功。它虽然终以求成仙证真为旨归，以唯心哲学为依据，但理论、方法最为完备、成熟，可谓集道教传统炼养术之大成，尤对高深静定中的身心反应及掌握要点阐述最为周详，在现代气功界仍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道 教 与 文 学

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儒、道、释三家的思想，都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创作、理论的不同方面，起过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其文体系统的创立，风格、流派的形成，审美规律的发展，思想倾向的流变，理论体系的演进，都要到儒、道、释三家思想的发展、变化、斗争、融合中去寻找内在的思想动因。

所谓儒、道、释三家中的"道"，完整地说，应当包括"道家"与"道教"这两大部分。"道家"是一个学派，"道教"是一种宗教，二者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但是，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不仅使它们在各自发展的历程中，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共同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尽管二者对文学的影响，有先、有后，有分、有合，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深层的、有表面的诸种区别，但它们的基本倾向却是一致的。道家与道教虽然不是一回事。但道家思想，特别是其宇宙观、人生观、方法论，始终是道教宗教哲学的理论基础。唐宋以后，甚至可以说主要是道教理论家继承发展了道家的哲学。虽然有的是向朴素唯物主义方向发展，而更多的是向唯心主义方向发展；但无论如何，"道"作为与儒、释并列的三家或三教中的一教，既不能单指作为学派的道家，也不能单指作为宗教的道教。二者相关而又相异，因而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很难截然分开的。

道家、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谈文学本体论、审美认识论、审美现象论和艺术想象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文学本体论 文学本体论是关于文学的本原、本性、本质的理论，或者它是对文学的本原、本性、本质作出的最高的哲学概括。在中国古人对文学艺术现象的认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儒、道两家。儒家主要是从政治、风俗、道德、伦理的角度，具体论述了"诗"、"乐"等文学艺术现象的社会价值和政、教作用。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可以说很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艺社会学，文艺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而没有对文艺现象作出更高的哲学概括。道家则与儒家不同。他们首先提出了哲学本体论，以"道"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逻辑起点，对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本原、本性、本质作出了总体概括。所谓"道家"，所谓"道教"，之所以以"道"命名，就是因为他们共同认为"道"是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本体。尽管道家和道教学者之间，对"道"究竟是物质性实体，还是精神性实体的看法并不一样，但道家、道教的哲学本体论却为文学理论家的文学本体论的建立奠定了哲学基础，提供了论证方法。

《淮南子·原道训》中，较早地具体指出："天无形者，物之太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声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可见，一切文学艺术现象和构成文艺的诸要素，都是"道"的产物，其本原、本性、本质都是"道"。扬雄，一般被认为是儒家学者，但他不仅接受了道家的哲学本体论，而且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循道""而体自然"。文学理论家刘勰信奉佛教，但他论文学现象，实际上却应用的是道家——玄学的哲学本体论。所以在《文心雕龙》中开宗明义第一篇《原道》，把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五经六艺，诗赋杂文，都称为"道之文也"。《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第一则，据说采自王昌龄《诗格》，文中明确指出："夫文字起于皇道……一生名，名生教，然后名教生焉。以名教为宗，则文章起于皇道，兴乎国风耳。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这种在道、玄、儒融汇调合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学本体论，很有唐代三教并用，三教融合的时代特色。到了司空图撰写《诗品》，则直接运用了王弼在《老子注》中提出的"体"、"用"一对哲学范畴，来揭示"雄浑""冲淡""豪放""悲慨"等诗歌创作与鉴赏中审美现象的本原、本性、本质，从而把前人已有的文学本体论升华为美学本体论。中国古代在道家——道教哲学本体论影响下提出的文学——美学的本体论至此算是基本完成了。宋代的理论家在哲学本体论方面，吸取了道家、道教的某些观点，但在文学——美学本体论方面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但是明代王学一派的哲学家中，却有人接受了道家的自然之道，自然人性理论。例如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就把"心"称之为"体"、"本性"、"天性之体"、"良知之体"，也就是素朴的合乎自然之道的自然人性。在泰州学派的影响下，有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也吸取了道家的自然之道——自然人性理论，把"真心"、"本心"、"童心"作为文学的"本体"。李贽的"童心说"，就是以自然人性为文学本体的文学本体论。如果说在李贽以前，在道家哲学影响下提出的各种文学本体论，程度不同地带有唯心主义色彩；那么，到了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那里，则把文学——美学本体论完全建筑在"絪缊生化"的素朴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之上，从而把中国古代的文学本体推上前所未及的高峰。虽然王夫之的哲学——美学本体论与一切道家、道教学者的哲学本体论根本不同，但仍然不难发现，其中吸取了道家——道教哲学理论中的某些带有素朴唯物主义因素的思想材料。

审美认识论　按照道家——道教的哲学本体论的观点来看，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之间的一切有生无生的万事万物，都是"道生"的，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本原。而不同事物的不同本质，不同本性，即作为哲学范畴的"德"，都是"得"自于"道"，是"道"的一部分，或者说是"道"之存在的个别形态。因此，人对万物的正确认识，既不依靠实践活动，也不借助知识积累，而是得之于"道"的素朴人性与得之于"道"各种物性之间的自然契合。《老子》教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又说，"多闻数穷，不如守中"，"故恒无欲，以观其妙"。这就是说，人要保持住得之于"道"的素朴人性，对万事万物，都采取静观默察的态度。《庄子》中也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明见无值，辨不若默；道不可闻，闻不若塞；此之谓大得"。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本质，都是超感官的绝对存在；因此靠感官获得的知识，用言辞表达的认识，都是不全面、不真实的知识，不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真正把握。只有在静观默察中，以素朴人性与诸物本性自然契合，才能本质地把握事物。道家的这种认识论，被人们称为"妙悟"或"神秘的直觉"。虽然它不是对人的认识活动、思维规律的科学总结，但也确实从理论上概括了人在认识活动中经常发生的一种

思维现象。特别是人在审美活动、艺术创作中的思维特点与道家认识论所揭示的规律非常接近。因此，在中国古代，有些文学理论家便把道家揭示的认识规律，直接当作人的审美活动的规律，而提出了一种超感官、超言象的审美认识论。人对外物的审美把握，不是凭借感官去把握外物的声、色、形、象，而是在静观默察中以主体的素朴人性去"妙机"、"直契"美的本体。一般说来，声、色、形、象是构成事物的美的要素，人们把握事物之美，总要先以感官去把握声、色、形、象，进而深入地把握事物美的本质。审美活动总是由表及里，由外及内，由形式到内容，由现象到本质不断升华。但道家认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单凭感官去把握声、色、形、象，是把握不着美的本质的。只有"素处以默"，才能"妙机其微"。(孙联奎《诗品臆说》:"机者，触也，契也，心通造化，自然妙契。")只有"超以象外"，才能"得其环中"。"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二十四诗品》)不过，这种审美认识论，也并非绝对排斥感官作用和感官经验，也并不否认声、色、形、象诸因素构成的形式之美的审美价值，而是极力反对人们把审美活动局限于感官活动，论审美经验只重视感观经验，把追求形式之美当作审美活动的主要、甚至唯一的目标。用这种理论指导诗歌创作，则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依这种理论鉴赏作品，须得"言外之意"，"象外之象"。话说得虽然有点玄虚，但却高度抽象地揭示了人的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过去，人们给它加上"唯美主义"、"神秘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恶谥，是不公平的。

审美现象论　在道家、道教思想影响下，不仅产生了以自然之道、素朴人性为本性的文学本体论，以素朴人性与自然物性相契合的审美认识论，进而又引申出了崇尚自然、含蓄、冲淡、质朴的审美现象论；并且进一步，在阳刚、阴柔两大审美范畴之上，确立了"自然"或"素朴"这样一个最高的审美范畴。老子教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说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就是说素朴是最美的，破坏了素朴，人为地雕饰是不美的。《庄子》中主张"法天贵真"，赞美"天籁"，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其论美虽然不绝对排斥雕琢，但主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此后，《淮南子》重"自然"；王充《论衡》重"真美"；刘勰"标自然为宗"；钟嵘倡"自然英旨"；皎然更是推崇"真于性情"，"风流自然"；司空图《诗品》中，"冲淡"、"高古"、"典雅"、"自然"、"含蓄"、"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实境"、"超诣"诸品中论列的审美现象，基本上都可以归入素朴之美的范畴。甚至论"纤秾"取"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状"悲慨"以"大风卷水，林木为摧"。可见华美、壮美也无不要求合乎自然。至于苏轼论诗推崇"天成"、"自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汤显祖借杜丽娘之口唱出"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都是明显地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文学家的审美观。即使一些论诗恪守儒家观点的人，如张戒等，也强调"自然"、"天成"。甚至近代的王国维，他虽然完全接受了叔本华、康德的美学理论，但依然认为"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元曲之佳处，"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艺术想象　在儒、道、释三家中，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艺术想象的发展，影响最深最久的是道家与道教。当代文艺理论界，有这样一种看法：文学艺术的本质就是创造性想象的感性显现。作为定义，这也许并不全面，但至少它可以提高人们对艺术创作中创造性想象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而我们也不妨借它来说明道家、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巨大贡献尤在于推动了中国古人创造性想象的丰富、发展。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又有两者：一是《庄子》之文的典范作用，二是道教的神仙思想和创造神仙系统的思维方法。《庄子》之文是以极其丰富的创造性想象

为基本特征的。正如其书《天下篇》里所概括的那样:“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可以说集中概括地指出了文学创作中创造性想象的诸要素:夸张、虚构、想象以及物化为语言文字的特殊方法。至于说:“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简直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特别是志怪——神魔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艺术原则。至于道教的神仙思想和它创造的神仙系统,是从中国上古原始宗教中继承发展而来的,这无疑是宗教迷信。但是,道教创造神仙系统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规律同艺术思维非常接近。首先,道教的神仙,绝大部分是典型化、理想化了的真实的人。他们有姓、有名,并有一部得道成仙的生活史,就连作为“道”的化身的最高神“元始天尊”,也并不总是住在“大罗天”上的“玄都玉京”,而是历代都现身于人世,成为有姓名的活人,老子就是其一。第二,道教的神仙大部分都是形神、灵肉共得永恒,与造物者同游,处生死之外的真实的人。他们靠吐纳导引,服食养生的方法长期修炼成仙,所以有形、有质,有情、有欲。第三,道教创造的神仙系统,等级森严,层次繁多,分工细密,有与世俗同样的伦理关系,有与世俗同样的矛盾斗争,甚至也不乏污浊、黑暗;实际上天界就是典型化了的人世。第四,道教的天界具有无限的广阔性,永远不会以仙满为患,随时欢迎一切得道者飞升而来;因而人们就可以根据需要不断地创造神仙,源源不绝地把活人输往天国。总之,神与人有同一本体,仙与凡无绝对分界。这就不仅给文学家进行创造性想象以充分的启示,而且为文学家物化思想情感从事创造性想象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郭璞“游仙”之作,挹“浮丘”,友“洪崖”,“飡霞倒景,饵玉玄都”,“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李白诗中“蹑太清”,“朝玉京”,往往是为了反衬现实的苦难;而神交列仙,梦游洞天的自由自在,也是他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在创造性的想象中得到了升华。至于中国古代的小说创作,从“志怪”到“神魔”的大量作品中,虽然有一些直接地表现了道教的宗教意识,个别的甚至是赤裸裸地进行宗教迷信的宣传;但是,其中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优秀作品中的神仙鬼怪,矛盾斗争,都是为现实写照,都是作者以创造性想象制成的物化思想情感的载体。虽然这些创造性想象的发生,不能忽视佛教的作用;但道教的神仙思想和道教创造神仙的思维方法,应当说起了主导的作用。像唐人小说中,《虬髯客传》一类的由道士创作的作品自不必说。即便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处处渗透着佛教影响,不仅人物又是直接取自佛教传说的作品中,其创造性的艺术想象,还是以道教的作用为主导的。《西游记》是以取经故事为主线,但一切神、魔、人、鬼都活动在道教观念中的天上、人间、幽冥三界。书中塑造的艺术形象,也大部分出自神仙系统,神魔斗争的方式方法以及由此构成的情节场面,也无不染有浓重的中国固有的巫觋、方士的法术色彩。特别是主人公孙悟空的形象的塑造,可以说几乎全是以道教思想为基础而作的创造性想象。就连“西方妙相”菩提祖师半夜三更传授给孙悟空的修炼秘诀中,也大讲“精、气、神”谨守勿泄,还有什么玉兔、金乌、龟蛇盘结、五行相用等等,从思想到语言都是道教的东西。至于猪八戒讲“九传还丹”,沙和尚谈“明堂肾水”,女妖们挖空心思摄取唐僧的“元阳”以求长生,等等,更没有多少佛教的气味了。当然归根结底《西游记》的作者既非语道,亦非谈佛,只是用创造性的想象为现实人生留影,并寄寓其思想情感。所以在创造性的想象中,不妨“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但他使用的素材、方法还是主要得自中国固有的巫术、神仙、道教。概括言之,离开道家与道教,就无法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特别是志怪、神魔以及某些剑

侠小说中富有浪漫色彩的创造性想象的民族形式、民族特点；而这一切又决不能贴上"消极浪漫主义"标签，给予全盘否定的。

释道精神与古典诗歌理想

杜甫说：诗是吾家事。实际上，作为中国人，何妨说：诗是吾国事。要探究中国民族的精神趋向，要把握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都少不了要研究古典诗歌艺术。尤其是对古典诗歌理想的阐发，可以使我们对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传统的哲学思想精神作出动态的考察。当然，这种阐发本身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课题，本文不可能作到全面而透辟，只能简要地理出个端绪来。

古典诗歌的理论自觉，应该说，是始于汉代的《毛诗序》。前此孔子的言论，虽多有涉于诗者，其大旨却在政教。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世人议论已多。至于汉儒之论诗，虽依然为政教观念所囿，毕竟是专意于论诗了。不过，需要指出，汉儒对诗歌特质的认识，还渗透着初民文化的精神，如"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的观念，实则正缘于"最古之礼，专重祭祀"，且祭祀必以诗歌媚神的上古文化精神，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进而衍为咏叹歌舞的观念，也正基于对祭祀时媚神歌舞之生动形态的概括。其实，这也难怪，无论孔子还是汉儒，所谓论诗，都是专对《诗经》而言的。问题的实质在于，首先，汉儒将诗人"感于物而后动"的个体情感导向了与媚神活动——实际上是由图腾与禁忌发展为社会仪礼规范——有关的群体意识，同时，又使这种群体意识成为与政教有关的道德自觉。显而易见，这种诗歌观念体现着对诗歌本体价值的异化，它虽然也肯定诗歌之"发乎情"的先赋特质，但终于让它消泯在对社会功用的自觉之中了。因此，只有具备反异化精神的道家思想才能使诗歌观念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中国思想史上的儒、道关系，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仅仅以儒、道互补来总结概括，便有点言不尽意。应该指出，所谓互补，乃是一种逆向追求中的价值发现。儒家精神在于肯定现有文明，道家精神在于弃绝现有文明，似乎水火不相容，实质上，儒家是以肯定现有文明秩序为个体生活之目的的方式肯定着人体人格，道家是以认定保持个性真实必须弃绝现有文明秩序的方式肯定着个体人格，于是，以道化儒，相逆而相成，便有了对独立的个体情感之真实的肯定。从哲学思想上讲，以道化儒的具体形态是所谓"内圣外王"。这样一来，儒家体用不二的精神势必面临着分析之势，个体本体已不必以社会伦理规范为其存在之目的。对于古典诗歌来说，则不复于"厚人伦，美教化"的政教功用上实现自身的价值，创作主体亦不必"发乎情，止乎礼义"，而是正面地去肯定诗缘情的本体特质。古诗十九首已发出"涤荡放情志"的呼声，到陆机则公开扬起"诗缘情而绮靡"的大旗，从创作实践的追求到诗学理论的探讨，古典诗歌之演进的必然正体现着以道化儒的文化思想之演进的必然。

道家之"道"在"无为"，"上德无为而无不为"。落实在社会政治上，这是"君人南面之术"，势必导致无法为法、"非法法也"的阴谋政治。但影响到诗歌艺术，却给诗的灵感提供了自由翱翔的无限空间。儒家所遵从的周文化，非常强调"敬德"、"明德"，《大戴礼·盛德》云："礼度者，德法也。""德"存于"礼"，故诗歌之"发乎情，止乎礼义"便正是以诗"明德"，《周易》亦言圣人观物取象旨在"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些，都正是诗歌创作之"比德"规范的思想基础。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便是类情以明德，发展为"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遂成了"比德"的艺术程式。道家以"无为"之精神夺儒家"明德"之魂魄，于是"德"即非德，"比德"规范缘此而进行为不比之比的自由境界

古典诗歌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已渐由讲求“比兴”转而为“独标兴体,而“兴”的审美特质已在“文已尽而意无穷”,绝非类情明德的精神了。唯因如此,古典诗歌才能缘情而作,无所依傍,依真而发,无所比附,真正去“穷情写物”。

其实,当我们考察魏晋前后的思想文化形态时,应同时注意到诸家思想的多元融汇和每家思想的多向演化。比如,在发生以道化儒、出儒入道这种现象的同时,道家思想本身又与佛家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关系。而就道家思想与佛家思想的融汇而言,也绝不是简单的合一,而是一种在彼此的击撞冲突中寻找契合点的矛盾统一运动。在汉末人的眼中,浮屠之学与黄老之言一般无二,所谓“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实际上,这是以道视佛的阶段。魏晋哲人一方面以道化儒,一方面也以道化佛,但儒家与佛家的精神本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化儒之道与化佛之道必然有所区别。当时,王弼、何晏与向秀、郭象皆本乎道家而立说,但王、何之精神在贵无,而向、郭之精神在崇有,如果说向、郭之学在于“明内圣外王之道”,那么,王、何之说便易为佛家所用。东晋道安正是以王、何的贵无论去宣扬般若说的,应该说,这已经是援道入佛了。道家万有归无的思想,本就潜在着歧义,人格本体与宇宙本体的混同,是其哲学上的致命点,所长在此,所短亦在此,当人们将强调宇宙本体虚静而一的思想落实到对人格本体的自觉时,便很容易蹈入佛家无念无知湛怀息机的宗教式心境,而如果将对宇宙万物多样互殊之现象的把握同对人格本体的自觉相统一时,又可能使个体人格的独立价值得到认可。说透了,王、何之学与向、郭之学的分歧,乃是道家思想内在矛盾的外观,“王既着眼在本体,故恒谈宇宙之贞一,向、郭既着眼在自生,故多明万物之互殊”(汤用彤《魏晋玄学流派略论》),在中外思想文化的击撞与融汇中,道家思想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佛家思想在演化中的分化,从而使体现于古典诗歌之中的释道精神也绝非一种单纯的状态。

众所周知,西晋之前,世间还很少真正皈依佛教者,但东晋以降,情形便两样了。士林中的高蹈之风助长了人们超尘脱俗的精神追求,援道入佛使“无为”之说与般若精义妙相契合,从而又给人们一种理论上的导引。于是,那种永恒的宁静和无所滞碍的空灵境界,便成为诗人心灵的趋向处,对“意境”美的追求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境”乃是佛家妙语,其实质在于“即色”,亦即感觉的真实,岂不闻佛家道:“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但契合于道家本无之义的佛家精神,在于超越感觉的真实而去把握永恒虚寂的涅槃境界,这就意味着,其所执著者并非日常之境,而是“妙绝常境”的“真境”、“无为境”。体现在古典诗歌中,便是于“物境”“情境”之外别求“意境”。

参照王昌龄“诗有三境”之说,我们知道,“意境”作为一种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其精神在于对“真”意的追求。庄子认为,“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佛说以为,“若能空虚其怀,冥心真境”,顾恺之面对虎丘,道,“含真藏古,体虚穷玄”,陶渊明见南山夕色,亦曰,“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一句话,以去情息念的虚空心境外契于“云无心以出岫”般的无目的性的自然存在,从而以清虚淡远的格调展现出一种自然而空灵的诗歌世界,是谓诗中“真境”,而此中便有无可言传之“真意”。如王维《辋川绝句》那样,所有被后世神韵派推为“清远”之品者,便是能得“意境”之美的作品。这类作品的审美特征,在于具有味外之味,钟嵘论诗,以“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的五言诗为众作之有滋味者,但是,写物之“物境”与穷情之“情境”只是常境,故而欲求意境之味就必须超乎味外。

在这里,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在于,有关

意境说的言论，多出于沙门诗僧或奉佛之士，多见于文人与僧徒交往的文字。这就说明，古典诗歌之追求意境之美，是与佛学精神深入人们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从而也就提醒我们，当古典诗歌超越了“自勉以役其德”的精神束缚之后，又高蹈而至于对虚寂无为之精神本体的艺术把握，也就是说，体现在古典诗歌中的哲学思想精神，在出儒入道之际，便出现了借道以入佛的倾向。

古典诗歌之于审美理想的追求，到以禅喻诗而进入新的境界。禅学，是中国化了的佛学，它更多地体现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气质，的确，我们与其说道家之庄子的精神为审美，倒不如说禅宗的精神为审美，因为恰恰是禅宗将庄子思想中具有审美意义的内容吸收并发扬了。

当然，禅宗的形成有着很复杂的原因，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不过，其中极重要的一项，正在于玄学思辨对道家思想的分析和因此而引发出的不同阐释。前面已经说过，魏晋玄学虽共衍道家之说，但有着贵无说与崇有说的区别，不同于贵无论者之执著于宇宙本之贞一，崇有论者是执著于万物自生之互殊的，其论《逍遥游》曰：“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物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郭象《庄子·逍遥游注》）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世间人个性万殊，若都欲为大鹏之游，势必万有归一，不能保持其个体之独立，所以，只有自以其逍遥为逍遥者，才能是具有独立个性的逍遥精神。不必于个体之外去追求什么逍遥。禅宗的精神要旨也正在这里。禅宗大师在解答何处识佛的问题时说：“大似骑牛觅牛”，寻到天边，还在身边，归结于一理，还得“放于自得”“物任其性”。唯因如此，禅宗的要领便在唯执“现量”，何谓“现量”？就是对现前实境的感觉的真实。同样是释道合一的精神，同样是以领悟虚寂无为之道为精神生活之目的，但或者专以虚寂无为为念，致使心人此念而恒守虚静，而唯居清远；或者在自得之中求无为，亦即以无不为为无为，以无不有为虚空，于是就能心各自适而生动活泼；禅宗的精神正在后者。禅宗的精神既然有如此灵妙的一面，也就难怪古人要说，以禅喻诗，莫此亲切了。

以禅喻诗的关键在“妙悟”。“悟”者，个体感性经验的某种神秘飞跃，那么，“妙悟”的妙处又何在呢？《大珠禅师语录》云：“顿者，顿除妄念；悟者，悟无所得。”妙就妙在以无所得之悟为第一义之悟，为透彻之悟。严羽以禅论诗有“不落言筌”“不涉理路”之说，因为一落言筌，便要解说，一涉理路，便要推衍，而解说推衍必然导致某种既定的心得意念，这便是悟有所得，其虽属悟而实大不妙了。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理想境界，首先是诗人悟有所得却并不解说推衍，其次是读者共其所悟而又不待诗人之解说推衍，而这种可使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自然契合的中介，便是具有神宗所谓“现量”之特质的诗歌形象世界，即一种诗化了的现实的感觉真实。如苏轼诗《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作者于此，本有借自然界的风雨变幻来彻悟“人生不信长轗轲”之哲理的意思，但诗中所写，却纯是当日所见所历而已。又如皇甫松《浪淘沙》小令：“滩头细草接疏林，浪恶罾船半欲沉。宿鹭眠鸥非旧浦，去年沙嘴是江心。”汤评云：“桑田沧海，一语破尽。”其实，词中何曾道破？不过摹写实境而已，所以，与其说“一语破尽”，倒不如说“顿然可悟”更恰当。诗人作诗，多在抒写一时感触，而理想之品，便是以“初无定景”之景与“初非想得”之情构成完全个性化的艺术直觉世界，如温庭筠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如贾岛诗“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皆实写“身之所历，目之所见”，但旅途的清苦与野行的孤寂却自在言外。

古人将这种诗歌的理想境界概括为：“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

外。"与此相关，又有"兴象""兴趣"之义。超越了"比兴"规范的"兴"的特质，一在于"有感之辞也"，二在于"文已尽而意无穷"，唯因如此，"兴象"恰如禅宗之所谓"现量"，而"兴趣"也正合禅宗之所谓"妙悟"。对于自始就讲"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的中国古典诗歌来说，这种理想不正是其本体特质的自然而合理的演进结果吗！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古典诗歌的演进历程是在儒、道、释三家彼此击撞、参融的复杂运动中完成的，而它之所以臻于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一种审美理想，更是同在这复杂运动中融成的释、道精神密不可分。需要强调的是，释道精神与古典诗歌理想的关系，是一种文化演进中的动态联系，因此，割断历史长流的静态考察，很难穷其渊源而究其本体。

道教与唐代文学

至少，从东汉末年起，对生命的忧患就时时萦绕在人们心头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它令人忧郁，令人痛苦，令人沉思。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种感慨成了文人士大夫们咏叹的基调。唐王朝建立以来，富裕风流的生活和繁荣昌盛的社会虽然在现实中给了人们以生活的热情与进取的信心，却没有消除人们心灵深处对生命短暂的忧郁，反而更增添了人们对"生"的几分渴望，对"死"的几分恐惧。李白《拟古》一诗说得极明白：

> 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金丹宁误俗，昧者难精讨，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饮酒入玉堂，藏身以为宝。

因此，讲长生不死神仙之术的道教便大受人们青睐，而迅速兴盛起来了。

和佛教以生为苦，以死为解脱正好相反，道教是以生为乐，以长寿为大乐，以成仙永生为极乐的，这正好吻合人们的第一欲求——生存；和佛教实行禁欲、苦行相反，道教是主张人要活得自在、活得舒服的，这又正好吻合了人们的第二欲求——享受；既能生存，又能享乐，道教还能让人超尘脱俗，高雅飘逸，赢得清名，这种日子是神仙日子，这就吻合了人们的第三欲求——精神满足。道教打出了长生不死做神仙的招牌，因此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尽管道教那里有种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斋醮仪式，有种种严酷的清规戒律，有很难学会的金丹炼制术，有吃下去十分危险的丹药，甚至还要经过许多可怕的考验，但毕竟挡不住飞升成仙、长生极乐的诱惑，特别是当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感到痛苦和压抑的时候，那种求仙访道的热情就更难以克制。所以，很多文人士大夫都信奉道教，如王勃便"常学仙经，博涉道记"(《游山庙序》)，常常叹息"流俗非我乡，何当释尘昧"，梦见自己成了仙人(《忽梦游仙》)；卢照邻则"学道于东门山精舍"，还到处乞讨银两和药石为炼丹(《与洛阳名流朝士乞药值书》)，陈子昂也在那篇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中说自己"常愿事仙灵，驰驱翠虬驾……永随众仙逝，三山游玉京"，并"临霞永慨，抚膺叹息，常谓烟驾不逢，羽人常往。"(《别中岳二三真人序》)而著名的李白，更是"清斋三千日，裂帛写道经"(《游泰山》六首)，连做梦都想着羽化飞升——"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一直到中晚唐，文人学道之风依然长盛不衰，刘长卿《寄许尊师》说：

> 独上云梯入翠微，蒙蒙烟雨映岩扉。世人知在中峰里，遥礼青山恨不归。

韦应物《饵黄精》说：

> ……自怀物外心，岂与俗士论，终期脱印绶，永与天壤存。

李端《长安书事寄卢纶》说：

……勿以朱颜好，而忘白发侵，终期入灵洞，相与炼黄金。

就连白居易，也曾炼铅烧汞，学制金丹（参见《西溪丛语》卷下所举白居易炼丹诸诗）。

“若许随师去尘网，愿陪鸾鹤向三山”（王起《赠毛仙翁》），“愁是独寻归路去，人间步步是尘埃”（赵嘏《早出洞仙观》），“使我浮生尘鞅脱，相从应得一盘桓”（牟融《赠羽士》）。这是一种对尘世充满眷念，又对尘世感到失望的矛盾心理的折光。在这种心理氛围中，道教那种既能免除生老寿夭之苦，又能安享尘世之乐，既能满足心中情欲，又能活得高雅脱俗的生活情趣弥漫开来，形成了文人士大夫生活理念的一个侧面。他们隐逸学道，受箓炼丹（如李颀、李白、顾况），其实都是在这种生活理念支配下的行为。

并不能简单地把它归之为一种消极的人生情趣。这种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是复杂的，也许，正是这种厌倦与失望的灰暗色调中，掩盖的却是活泼泼、火辣辣的追求；也许，正是这心灵中充满了过多的美好理想，才显示出了这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和人对自然与社会的反抗。所以，它虽然表现了道教给人们带来的消极情绪，但又在道教给人们构筑的虚幻世界里表现了人的自然的、正当的、却受到了压抑的人生理想——生存、爱情与事业的自由境界！因为只有在这个世界里，人才是自由的：时间凝固了，人成了永恒，既可以“三见沧海变桑田”，也可以一枕黄粱之间度百年；空间变化了，“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泄”，大千世界化为芥子，也可以蚁穴缘槐为大国，一芥子化为大千世界，人可以飞来飞去，朝发扶桑，夕宿昆仑，与神仙抚膝相谈，“明星玉女备洒扫，麻姑搔背指爪轻”，飘然挥手凌紫霞，从风从体登鸾车”；人的情感冲决了一切罗网，想爱就爱，想恨就恨，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这虚幻世界乃是现实世界的反衬，既然现实世界限制了人的那么多自由，那么，只有在虚幻世界中去寻找解脱。所以，从社会角度来说，道教的影响可能消弥了人的活力，窒息了人的进取热情，造成了人的灰色的人生情趣，使人们沉醉于一种虚假的心理满足中，但从文学角度来说，它却带来了积极的批判精神，丰富的想象力，浪漫的审美理想以及色彩绚丽、神奇谲诡的意象。

作为一个宗教，在道教那里，有象征生存与死亡的神鬼谱系。神仙长生不死，超越现世，悠哉游哉，自由无羁，生活在美丽的仙境。这里有三岛十洲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有居于天心的玉京山，有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王母、玉女和种种仙人，有光碧之堂、琼华之室、奇花异草，它们能令世人长生不老，青春永驻；而鬼魅精怪则丑恶可怖，或“晦夜出行，状如炎火”（《抱扑子》佚文），或“有身无头，赤毛无衣，有耳无目（《道要灵祇鬼神品经》），它们能令世人死亡或疾病。而道士的职责，就是引导人们飞升仙境、交接仙人，寻得永恒的生存、美好的享受而避免可怕的痛苦的磨难与死亡，这需要靠各种仪式（如斋、醮）和方法（如符咒、炼丹）。因此，在道教这里，就有着三组彼此相关联的特殊的意象，一是有关神仙与仙境的意象，它们象征着生存、享乐、美好；二是有关鬼魅精怪的意象，它们象征着死亡、苦难、丑恶；三是有关道士及各种法术的意象，它们象征的是超越人间的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拯救人类。这三组意象与听者读者信奉者即俗人构成了一个以道士及法术为中心的意象结构，没有道士及法术，俗人们就不能摆脱死亡、苦难与丑恶的鬼魅精怪的纠缠，没有道士与法术，人们也不能通向生存、享乐与美好的神仙世界。因此，这只是一个宗教性的意象结构，它的功能只能是劝诱人们匍伏在道教的脚下，做一个忠实的信奉者。

道教的意象与文学的意象恰好发生了契合。道教搜罗整理与创造了这些意象来劝诱人们信仰道教，而文学家们却正好借用这些意象来编织文学之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唐代文学中，凡是那些以瑰丽、神奇色彩见长的诗歌与小说中，都有道教的意象在熠熠生辉。“三岛”、“瑶台”、“阆苑”、“明星玉女”、“飞龙”、“鸾驾”、“王乔”、“丁令威”，人是飞翔自由的仙人，露是五色之露，楼台是琼玉瑶台，花是万年之花、草是不死之草，“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李商隐《无题》），这是一种意象；鬼魅、狐精、幽圹、坟茔，阴风惨惨，阴森幽暗，“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桂叶刷风坠桂子，青狸哭血寒狐死”（李贺《神弦曲》），“鬼神知妙欲收响，阴风切切四面来”（顾况《刘禅奴弹琵琶歌》），这又是一种意象；《枕中记》里道士吕翁“得神仙术”，能令人梦中参悟，《长恨歌传》中临邛道士能令人生死相会，《薛昭传》中申天师能以绛雪丹令人复生，《太平广记》卷十“王苞”条中道士叶净能能以符除妖，这又是一种意象，这些意象是多么神奇而新颖！

然而，当这种意象进入文学领域中的时候，它就开始转化为具有人性美的文学意象而不再是宗教意象了。因为它不再由道士讲述而由俗人——过去的听者——讲述，因为它不再表达宗教情感而表达俗人——过去的接受者——的情感，因此它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取代道士成了结构的中心，人的情感如同一种渗透力极强的色彩，使这些意象换了一种色调，在这种换了色调的意象中，人们倾诉着自己的爱情与理想。例如在爱情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神仙与仙境既是美好的理想世界的象征，也是充满了人间的情感的象征，顾况《梁广画花歌》中的“上元夫人最小女”，不再是一个远离尘世、冷漠高傲的仙人形象，而是一个“凝嚬掩笑心相许”，天真烂漫、情窦初开的少女；王翰《赋得明星玉女坛送廉察尉华阴》中的玉女，“含情迟伫惜韶年，愿侍君边复中旋”，却被仙凡悬隔，不能如愿，只能是一个满心痛苦的女郎形象，《玄怪录》“崔书生”一则中，西王母第三女玉巵娘子在封建婆婆的歧视下，不得不被迫与崔生含泪分离；在这里，神仙消褪了它的神性而具有了人间的情感。而鬼魁精怪，也不再是死亡、苦难与丑恶的象征，《灵怪集》“许至雍”一则中，鬼魁与丈夫相会时泣泪成血；《李章武传》中，王氏子妇的鬼魂对旧日情意眷念缠绵；《任氏传》中，狐精任氏对爱情忠贞不渝；这里的鬼魁精怪又与人有什么区别！自从《古镜记》中所记的狐精鹦鹉对着宝镜在生命垂危时说出了“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之后，鬼魁精怪也逐渐失去了鬼性而具有了人间的情感。

当然，在唐代文学中，道教所提供的意象并不仅仅用于爱情题材，更多的，则是用来表现人们所向往的自由境界。人们生活在自然与社会的双重牢笼之中，人的自然生理条件，决定了人不能超越时空，逃避死亡；现实社会的物质条件，使人不能随心所欲；世俗的观念，使人的精神受到压抑；封建伦理纲常，又扼杀了人的感情。因此，只有在想象的虚幻世界中，人才能获得自由。李白《元丹丘歌》说：

> 朝饮颖川之清流，暮还嵩岭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我知尔游乐无穷。

这是诗人对生命自由的追求。李商隐《玉山》诗说：

> 玉山高与阆风齐，玉水清沏不贮泥，何处更求回日驭，此中兼有上天梯，珠容百斛龙休睡，桐拂千寻凤要栖，闻道神仙有才子，赤箫吹罢好相随。

这是诗人借用虚幻仙境在表达对自由爱情的向往。李贺《天上谣》说：

> 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

这是诗人对美好、神奇、恬情的世界的憧憬。当然，这种自由、美好境界是虚幻的，它是人

们的梦想，但这梦，却是那么美好，美好得令人不忍去戳穿它，宁可在这梦中沉睡，而道教所提供的许许多多神奇的意象，又正是文学家们构筑这个梦所需要的素材。

道教不仅提供了神奇谲诡，色彩绚丽的意象，也给唐代文学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力。

人们都知道，在屈原时代，楚地的巫风便影响了文学，使中国古典文学中有了富于想象力的楚辞。而道教，正保存了楚文化的巫觋因子，并以它构成了自身的基本构架。所以，在道教中，不仅有神仙、精怪等意象，还有着种种沟通人神、人鬼的巫术。其中，“存想思神”就是其中的一种。

所谓“存想思神”，就是在斋醮、符咒、行气、炼丹时想象神灵的形象。人们可以想象周围有紫气环绕，可以想象有神人降临，可以想象自己飞升天空，可以想象仙女翩翩起舞，据道教说，这种想象不仅要想得奇妙，而且要想得虔诚，真正进入幻觉，“不可以空静寂然无音响，趋拜而退也”（《云笈七签》卷四十五）。而道教的斋醮仪式上，星灯闪烁，烟雾缭绕，道教的法术中，诡秘奇幻，变化莫测，道教的壁画仙姿绰约，瑞气浮升，道教的音乐钟磬齐奏，笙竽和鸣，更令人“临目内思，驰心有诣“（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序》），令人“灵气相感，不由正衿（《异苑》）。置身在这种气氛中的人，怎能不精血沸腾、心动神摇，怎么能不想到昆仑、方丈、瀛洲、蓬莱，想到玉皇、老君、玉女、仙人，想到自己上天入地、周游九霄、腾云驾雾，出将入相、入了富贵温柔之乡！尤其是服下那种以水银、硫磺、白矾、黄金等为主炮制的丹药之后，人们就更容易在药力刺激下进入到一种近乎幻觉的想象境界。

然而正是这种近乎幻觉式的想象，使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有了绚丽神奇的色彩。唐代笃信道教的诗人中，如李白，在诗中就常常写下那种近乎迷狂的幻觉，他常常幻想自己“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上云乐》），幻想自己登上天空“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古风》十九），常常把俗世歌舞想象为鸾歌凤舞，把小妓家僮想象为玉女金童，把酒楼想象为蓬莱宫阙，把自己想象为神仙，“或欲把芙蓉而蹑太清，或欲挟两龙而凌倒景，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揖卫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欲餐金光于安期生”（《韵语阳秋》卷十一）；而曾真正当了道士自号“华阳真逸”的顾况，也曾把苔藓想象为“白云飞山壁”、“飞雨岩前滴”、“腾虎欲咆哮”、“懒龙遭霹雳”，所以皇甫湜在《顾况集序》中称他的诗“往往出天心，穿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常人所能及”。至于被称为“鬼才”的李贺，在他的诗中就更显示出了这种惊人的想象力，诗人时而遥立于九天之上，俯看尘世，“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梦天》），时而伫立于大地之上，仰望星空，“青霓扣额呼宫神，鸿龙玉狗开天门”（《绿章封事》），所以杜牧才在《李长吉歌诗叙》中说：“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而这种上天入地、超越时空，“出天心穿月胁”、“鲸呿鳌掷”的诗歌，正是唐代道教与文学联姻的产物，神奇瑰丽的意象与超越时空的想象力结合的产物。

道教与《红楼梦》

《红楼梦》不是佛书和丹书，但佛、道二教对于该书的影响却是深刻的，这说明了历史上宗教与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说，并不会降低《红楼梦》的价值，一者这是历史事实，二者宗教对文学的作用有两重性，要作具体分析。以往红学论著谈《红楼梦》与佛教的多，谈该书与道教的关系者较少。本文专就“红楼道影”问题，做些粗略分析，看一看道教对于作者创作活动有多大影响和作者对于道教持何种态度。

道教对《红楼梦》的影响，可以分成三层论述：“一、作为主题思想的一部分；二、作为

艺术构思的手段；三、作为内容和情节。先看道教对《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影响。关于《红楼梦》全书的纲要在哪里的问题，历来诸说不一：有的说是第一回作者交待此书来历，有的说是第四回的护官符，有的说是第五回的红楼梦十二曲。各人的眼光不同，所以引起的认识效应也各异，这大概是文学名著欣赏中常有的情况。我则认为第一回中的“好了歌”及其解注起了提示全书主题的作用，它与第五回的红楼新曲互相补充，相得益彰，都是极关紧要的文字。“好了歌”是跛足道人所唱，其解注是刚悟道的甄士隐所作，都是道教中人物。内中佛教气息很浓，可以看作是佛教化的道教，但“好了歌”念道神仙，毕竟还是道教。疯跛道人用“好了歌”点化甄士隐，度他出世，这也是道教的典型做法。“好了歌”的言词是：“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歌词嘲讽了世人俗见的荒谬可笑，指出人们所热心追求的功名、金银、姣妻和多子多孙都不可恃，不是求而不得，就是得之复失，人一闭眼，万事皆休。“好了歌”给人们的世间求福之情兜头一飘凉水，先把你浇得心灰意冷，然后告诉你“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只有了结世事，出家修道，才能得到永生的好处。“好了歌”的宗教悲观论色调很强烈，它反映了作者的傲俗厌世情绪，给《红楼梦》全书罩上一层悲剧云雾。不过，“好了歌”的“看破”之言，也并非毫无合理成分，人的一生为什么一定要去追求功名和财色，然后把自己的生命活力消磨在物欲享受之中呢？能不能有所看破和超越？这是值得深思的。作者并没有希企得道成仙，但他借助于对俗见的某种越越感，才看清了名利场中的卑污，用生花之妙笔把一群追名逐利的小人，刻画得入木三分。甄士隐的解注就更深入一步，其中“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等数句，相当生动地揭示了封建上层社会风云变幻、起伏难测的动态。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是一座充满杀机的格斗场。在位者一时骄奢淫逸、志满意得，他的对手却正在窥测时机，以求取而代之，所以总是危机四伏、祸福相邻。当一批晦气的旧权贵败亡下去，又会有一批新权贵加入这人生的厮杀行列，开始又一场新的权力角逐。由于作者能看透封建政治的黑暗和残酷，所以才能以生动的笔触，展示一个“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内部的明争暗斗和腐朽颓堕，这种内在的痼疾必然要导致邦族走向分崩离析和最后的灭亡，这是《红楼梦》全书的基本线索。第五回也很重要，红楼梦十二支曲与金陵十二钗册判词互为补充，暗示了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是佛道纠结的产物，里面反复称说因缘命定、冤冤相报、天数难违，把宝玉、黛玉的恋爱说成是“风月之债”、“木石前盟”，把宝玉、宝钗的婚姻说成是“金玉良缘”，皆由前定。后来的故事就是按照这种宿命论的框架发展的。第六十六回写柳湘莲遭尤三姐自刎变故，生趣俱息，遇一跏腿道士，问：“此系何方？仙师仙名法号？”道士笑道：“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足而已。”柳湘莲听了，不觉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剑，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便随道士，不知往哪里去了。作者很欣赏这位道士的高妙，第六十七回开头说他能用“数句冷言打破迷关”，度柳湘莲而去，意在告诉读者：人生如旅途，世间只能暂时歇歇脚，并无安身立命处，真正的归宿在于出家修道。柳湘莲是作者给予深切同情的男性公民中仅次于贾宝玉的人物，而有如此结局，可见道教的出世观对于作者思想有多么深刻的影响。总括起来，

曹雪芹由于极其厌恶世上的丑恶行为而与佛道的出世思想发生共鸣,他在思想上对于道教的度世理想是向往的,对于道行较深、远离富贵的道教人物是敬佩的,他的这种心态在《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中留下了鲜明的印痕。

其次看道教对《红楼梦》艺术构思和写作方法的影响。书中借用道教仙话和由道教诱发出来的丰富想像力进行艺术构思,使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故事是以女娲炼石补天之时,弃置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灵性已通,幻形入世的神话形式开始的,一下子把读者带进洪荒的时代、飘渺的仙境,然后再由远及近、由虚而实地转入人间的悲欢离合,书的起手便气度不凡。又以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的离奇故事,引出"还泪之说",为尔后宝玉黛玉的相爱和黛玉性好愁哭埋下伏线。第五回作者又用美丽的辞藻和奇思异想,构造出一个美妙无比的天国——太虚幻境,那里"居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窗玉作宫","仙花馥郁,异草芬芳",住着警幻仙姑和众多仙子。作者借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的情节,驰骋其联翩浮想,表达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交待出十二金钗的来历,预示了全书和主要人物的发展线索和终结;同时,天上人间、虚虚实实、出神入化 ,使故事起伏跌宕,妙趣横生,产生极大的艺术魅力。第七十八回"痴公子杜撰芙蓉诔",写宝玉将晴雯当作芙蓉之神,以仙话为悼文,寄托无穷哀思,相当生动地描绘了宝主同情弱者的性格。全书以道教仙话开头,又以道教仙话结尾,其间一僧一道飘然而来,忽然而逝,时显时隐,形成若明若暗的另一条线索,贯穿始末。这种带有道教色彩的艺术虚构,由于不受实人实事的限制,可以任情去描写,将真事真意隐在背后,用假语村言泻尽作者对世态时政的不满,此等用意,须细细体会。此外,书中诗词大量使用道教典故也是一大特色。儒家入诗太俗,佛学入诗太玄,而道教仙话入诗却是中国古诗早已形成的浪漫主义传统。写诗如要脱俗超逸必须借入神仙。形容某人脱俗,必谓道风仙骨;形容某处优美,必谓蓬莱仙境。道教的神仙理想代表了人间最美好的追求,既超拔非凡,又无固定图式,可以任人想像发挥,于是大受文人的青睐。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无一不借重神仙,《红楼梦》也是如此。

再次看《红楼梦》对道教人物和活动的描写。道教在漫长岁月里已经成为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上层道教又特别成为封建贵族生活的组成部分。清初道教虽然不如明后期那样受皇室恩宠,却依然在全社会有广泛影响,这种影响还有向民间进一步扩散的趋势。作为深刻反映封建社会后期社会面貌的伟大作品《红楼梦》,不能不写到道教,这是自然的,问题在于作者描写道教的立场和态度。看来《红楼梦》作者比较欣赏道教出世哲学和清修德高者,欣赏较高层次的道教文化,而对于一般道教活动和一般道士则有很大的保留,或者客观描述,或者给予揭露,使我们对于清初道教社会活动,有很生动具体的感受。书中描写了道教为社会提供宗教服务的情况。第十三回,宁府秦可卿死,停灵期间,请 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亡魂;另设坛请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然后另请五十众高僧、五十众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通过这些描写可知当时僧道联合为贵族丧事服务,规模相当宏大,费日持久,花销也一定很多,这大概是僧众道士们的重要经济来源。中国富人的心理,不去细辨佛道教义之异,只要对死者有好处,不管什么教门都可请来助丧,僧道兼用可以起双保险的作用,又能使丧礼的场面更隆重,以显示其高贵阔绰。第一百零二回,尤氏生病,贾蓉请毛半仙占卦。大观园不宁,贾赦请道士到园中作法事驱邪逐妖,择吉日,起坛场,上供三清圣像,旁设二十八宿并马、

赵、温、周四大将，下排三十六天将图像。道纪司派四十九位道众净坛。三法官擂法鼓，法师们披法衣，拜表请圣。念《洞元经》，祭七星旗，举打妖鞭，洒法水，击牌令，收妖于瓶罐，加封书符。这番法事好不热闹，为者虚张声势，观者将信将疑，虽然真假未知，但由此去了人们对鬼怪的疑心，大观园便复趋安宁。这一回是高鹗续写的，他与曹雪芹一样也不信打醮作法之一套，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道教活动的 知识。

《红楼梦》写了几个人间道士的形象，都是暴露和批判的对象。一 个是清虚观张法官，他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曾御封“大幻仙人”，掌管道箓司印，今封“终了真人”，王公贵族称他为“神仙”，是个有职有权的官方道教上层代表人物。这个人深受朝廷器重，与贵族家庭关系甚密，能说会道，惯于阿谀逢迎，将手下众道士的金玉法器敛取三五十件，孝敬贾母，又会保媒拉纤。这哪里是出家之人，分明是披着法衣的俗气十足的政客、官僚。这一类道士是极少数。一个是天齐庙里的道士王一贴，他比起张法官来是等而下之的人物，除了香火钱外，还要靠卖药为生，故不甚富足。此人油嘴滑舌，江湖术士气味很重，自己也承认，不仅妒妇方是胡诌的，“连膏药也是假的。我有真药，我还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这里来混?”这是个靠宗教混饭吃的道士，这样的道士恐怕不在少数。一个是道姑马道婆，这又是等而下之的人物，走家串户，讨些小惠小利过活，根本不懂得道经玄机，却满口菩萨因果，专会那魇魔邪术，干一些骗钱害人的勾当。这样的道姑与巫婆神汉一类迷信职业者绝无两样，民间到处可见到。还有一个是宁府的贾敬，贵族中好道修行的典型。此人一味好道，想作神仙，抛弃官职不袭，只爱烧丹炼汞，常年住在城外玄真观修炼，手下有一批道士服侍，终于因吞金服砂，烧胀而死，死时肚中坚硬如铁，面唇烧得紫绛皱裂，人们却说他“功行圆满，升仙去了”。这是一个修炼外丹的牺牲品，为了长生而得速死，大家当作笑料，连他的孙子贾蓉在丧礼中对他也是“假敬”，热孝在身竟跑去和两个姨娘调情 。作者在写上述道教人物时采用冷嘲热讽的态度，把他们形容得卑俗、世故、愚蠢可憎。第一百一十八回袭人对宝玉说：“至于神仙那一层更是谎话，谁见过有走到凡间来的神仙呢!”这可以代表曹雪芹和高鹗的共同认识。看来《红楼梦》作者所追求的并不是长生，而是超俗无累的一种环境和精神境界，这是道教最能吸引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的地方。这样，我们透过《红楼梦》的形象化描写，看到了清初道教的复杂性格和多层次结构，有道教的信仰和哲理，有道教的寺观和道士，有道教的仪轨和活动，有道教对社会文化生活和民间习俗的渗透，符箓与清修、道教与佛教、意识形态与有形活动交错并存，这才是现实生活中道教的较为真实的整体面貌。《红楼梦》所写的道教，虽然不能作为史料看待，但它来源于生活，深刻反映了生活，往往比那些带有宗教偏见、支离破碎的史料更具有典型意义，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世人眼中的道教，一个经过进步文学家审度批判过的道教，这对于我们今日全面深入研究道教，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

道教与《封神演义》

聂绀弩在抗战时期写的一篇杂文里，曾经谈到《封神演义》这本小说在民间的深远影响，他提到乡村庙宇中供奉的神像，不少是《封神演义》中的人物。佛、道两教中无案可查而在《封神演义》中有的火灵圣母、多宝道人之类，常常出现在某一土地庙的偏殿上；至于农村里起房造屋，“破土”时贴一张“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条子，直到近年我在旅途中还偶有所见，那出典便是《封神演义》第十六回姜尚“压星收妖”的故事。

历史文化反思是当前的热门议题，但人们的议论大抵集中在研究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对民族精神素质的影响，这诚然是大题目，可是更直接、更深广地塑造民族心态的，恐怕还要推在广大人民中长期流传的通俗文学。鲁迅多次说过中国社会有《三国》、《水浒》气，孔夫子之类倒是下层人民所敬而远之的。就“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一点来说，也许圣经贤传、佛经道藏的力量都比不上有如《封神演义》这类小说的形象教育。

《封神演义》成书的具体年代难以考定，今存的最早刻本有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明万历(1573－1620)金阊舒载阳本，鲁迅断为隆庆(1567－1572)、万历间，即十六世纪后叶写定，大概是没有错的。明朝自成化(1465－1487)以后，特别是嘉靖(1522－1566)、万历两朝皇帝，都崇信道士羽客的妖妄之说，这股风气从上层蔓延到民间，“明小说之两大主潮”(鲁迅语)之一的神魔小说的崛起，显然是和这一风尚下的社会精神状态密切相关的。中国最初的长篇小说是宋元人说话艺术中的讲史，历史小说是早期长篇小说的唯一品种。那些历史小说中也夹有神魔鬼怪的超人间现象的情节，但只起次要的、渲染性的作用。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宋人讲史话本《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元人的五种“全相平话”都是如此。最早将神魔故事从历史故事中独立出来的是元人的《西游记平话》(现仅残存《梦斩泾河龙》的段落，在《永乐大典》卷13139的“龙”字韵中；更早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还属于“变文”性质，未具备小说的规模)，亦即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的前身，若以艺术的完美程度说，百回本《西游记》才使神魔小说这一品种臻于成熟，确立了神魔小说在长篇小说中的独立地位。紧接着就要数《封神演义》较为优秀，而其影响之广，也几乎可与《西游记》相提并论。

《封神演义》的作者有两说，一是号“钟山逸叟”的许仲琳，这是有书为证的，上面提到的舒载阳万历初刻本卷二的首页上，题有“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字样，从“钟山”两字，可推定许仲琳当是今江苏南京人，或寓居南京也说不定。另一说是明代道士陆西星所作，但研究家虽然找出了陆西星与此书关系的不少线索，到底还没有版本上的直接证据，不能像许仲琳这样确凿。

《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之间的关系和两书的孰先孰后，也有过争议。引起争议之点有三：一是从回目上看，《封神演义》是单句题，《西游记》是对偶句题；早期的平话都是单句题，有人据此推断，单句题的《封神演义》应成书在《西游记》之前。这个论据不坚实，明清有些分明成书于《西游记》以后的长篇小说，用单句题的也不少。二是从小说中的诗词韵语来看，两书有不少是雷同的，例如《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太白金星召上天宫时对天堂景色的那段赋体描写，和《封神演义》第十二回哪吒到天宫门口的那段文字，彼此一字不差，其他雷同的还有不少；究竟是谁抄谁也一直有争论，但从比勘这些诗词与情节的联系来审察，应该说《封神演义》是袭用《西游记》的原词，这点近年来已有研究者作了可信服的论证。三是《西游记》中的有些情节，似乎援引了《封神演义》中的故事，最惹眼的是《西游记》中“无底洞”故事，孙悟空去请托塔天王李靖降白鼠精，李靖和哪吒言语龃龉时，提到过去李靖曾有惧怕哪吒的因缘，但叙述中不道其祥；而这个故事，正出于《封神演义》第十四回《哪吒现莲花化身》。因此人们认为《西游记》所以不详叙因由，乃是已有《封神演义》叙明在先无庸重复之故。其实这也未足为据，《封神演义》成书以前，哪吒出世一类的神魔故事传说，在民间先已流行，民间艺人也广为传播，以至《西游记》作者认为已是众所周知的老话，无须再加分说，正如福、禄、寿三星的故事，民间久已熟谂，《西游记》无需再细表来历一样。

神魔小说既系从历史小说分化而出，因

此所有的神魔小说都借一点历史事件作因由。《封神演义》的前身是元代的《武王伐纣平话》，演商周废兴的历史。但正和出于《三国志平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汰除了民间荒诞的传说，大大向历史记载发展，成了比较“标准”的历史小说相反，《封神演义》则以大量超人间的荒诞情节的内容，把本来还是以人间故事的历史传说为主的《平话》改造成了仅仅托体于历史因由的神魔小说。《平话》只是四万字左右的仅具梗概的作品，虽然很多是虚构的人物和事件，但故事是立足于人间的，神异情节的比重不大；《封神演义》扩充成了七十万言的百回大书，神仙魔法和教派之间的争斗成了小说的主轴，神与人之间的隔阂被取消了，成了神人混合的世界，超人间的现象包容了人间现象，共同体现着小说作者“正邪相争、邪不胜正”的思想。

除了通过神魔斗争宣扬正克邪、顺胜逆的思想外，小说在“三教混同”的观点中偏崇道教的倾向也极堪注意。释道之争中自来就隐伏着旧时代民族排外斗争的曲折意愿，其中彼此争夺宗教信徒的努力最堪玩味。例如，观世音菩萨是印度佛教传来的最能征服人心的救世尊者，特别是南宋以后固定为女身以后，更是深入闺阂，为妇孺所虔信，成了不仅可敬而且可亲的心灵上的导师。道教徒曾千方百计地找一个道教神来取代或分享观音的权威，比如吕洞宾就曾以其民间影响较广而成了道教抗衡观音的候选人；但吕仙是男性，进闺房就无能为力。于是，想出了九天玄女、梨山老母等道教女神，可是都比赛不过观音菩萨，《封神演义》异想天开地把她复归男身，名他为慈航道人，并成了元始天尊的玉虚宫十二弟子之一，连带把文殊、普贤两尊菩萨也一起拉过来成了元始天尊的弟子，即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师侄。又如燃灯佛（据《智度论》旧名锭光佛）原是释教的一尊佛，《封神演义》也把他拉入道教，称为燃灯道人；虽然师承不明，但比老子、元始天尊要晚一辈。至于西方教主，则根本没有提什么释迦如来，当家的只有一个接引道人（也是“道人”!），用同化法把佛教神网罗了过来，辈分上虽似乎是老子、元始天尊的同辈，可是比起老子们的师父鸿钧道人来也就晚了一辈。对这些西方神祇也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把他们当作客卿，用来帮助元始天尊共同完成兴周灭纣的事业。这种三教混同、道教作主的作法是十分有趣的。

道教内部又分三派，除了太上老君这派和元始天尊掌教的阐教没有分野以外，有以收罗狐群狗党的通天教主掌教的截教。截教的门徒都自称是“炼气士”，这恐怕和明代道士中得势的丹鼎派排斥吐纳派的教派斗争不无联系。这种教派门户之争的描写对后来神魔小说乃至较后的剑侠小说都有影响，如昆仑派与崆峒派之争、武当派与少林派之争，都袭用和师承《封神演义》的故伎。书中的五行遁法、法宝斗赛等程式也为后来的神魔小说以及历史演义中神魔因素的情节所习用，如演薛家将故事的《征东》、《征西》，演狄青故事的《五虎平南》、《五虎平西》等演义中梨中老母、黄禅老祖辈的本领，也无非是斗法宝来降服对方，与《封神演义》同一路数。

《封神演义》强调天命与定数，历史和人物的命运是天数安排定的，成汤气数已尽，这才决定了纣王的无道；促成他的无道也是代表上天意旨的女娲娘娘派遣狐狸精化为妲己给他的迷惑；商周战争是由于神仙要开杀戒的劫数，哪个该亡，死于何地，死于何人之手也是上天早有安排的。因此，所有的人物，包括法力无边的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在内，都是天命预定的棋谱上的一枚棋子。这个宏观定局就决定了人物命运实现的道路，而作为实现命运的人物的性格也就不得不陷于模型化，出场的百十个人物除了妲己、哪吒、杨戬、土行孙、申公豹、云霄娘娘等少数人还有些个性给读者以较明朗的印象外，其余大都是一些类型化的符号人物。作者唯一能腾挪变化

的余地，便只是驰骋其想象力于奇幻的情节。小说的得以广传和产生颇大的影响，也就由于它天花乱坠的情节所带来的娱乐价值。乃至它所宣扬的定命论和封建伦理的消极思想也在吸引人的情节下相形减色，使它成了一部不很有害而很有趣的小说。

除了奇幻有趣的情节以外，《封神演义》也有刻画人情颇为真实动人的精采片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哪吒出世以及他和父亲李靖争斗的故事（第十二至十四回），云霄娘娘由拒绝下山到终于摆设黄河阵的故事（第四十八至五十回），广成子三谒碧游宫的故事（第七十二至七十三回），杨戬智擒余元的故事（第七十五回）。哪吒的故事刻画了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刚强鲁莽的小勇士的形象，云霄娘娘的故事表述了坚守理智的人物如何在情感和周围舆论逼迫下不得不屈服的心理变化，广成子三进碧游宫的故事描写通天教主在群小包围下改变初衷而倒行逆施的过程。杨戬两度擒获余元的故事写出了除后患于顷刻的人物的机智。这些故事都合乎情理，合乎人物感情变化和事件发展和逻辑，丰腴的形象具有颇富诗意的人生经验的基础，是作者才华迸发的部分，将它们抽取出来，可以和任何中国古典小说的杰作媲美。

道教与“道情”

道情是现今还在流行着的一种古老的曲艺形式，其初是道士们布道、化缘时所唱的宣传教义的歌曲，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抒情、叙事的民间说唱。因用渔鼓伴奏，故一名“渔鼓”；又因本为道士所唱，故又称“黄冠体”。“道情”一名的涵义，明初人朱权作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他说：“道家所唱者，……寄傲宇宙之间，慨古感今，有乐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太和正音谱》）这与元代燕南芝庵《唱论》中“三教所唱，各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的说法是一致的，和道情歌词宣扬离尘绝俗思想的实际情况也是相符的。道情的体制，有单纯韵文和韵散相间的两类。若只着眼于韵文，又分乐曲、诗赞两体。乐曲体为遵循着一定格律的长短句，诗赞体则以七言和十言句式为主。

唱道情用的乐器是渔鼓和简板。渔鼓以二至三尺长的竹筒为体，在一端蒙上猪或羊的护心薄皮为鼓面。简板又称“简子”，系两根上端稍向外折曲的长竹片；短的二尺左右，长的可至四五尺。演唱者以左臂抱鼓，左手执简板夹击发声；右手指击鼓面。

当代学者考证道情渊源，一般都上溯到唐代。有人明确指出，道情源出于唐代的道教音乐。其实唐代的道曲早已失传，早期道情的曲调亦不可闻，它们在音乐上的关系究竟如何，在无文献可征的情况下，实在是谁也说不清的。李家瑞先生在《北平俗曲略》中，援引南唐沈汾《续仙传》关于蓝采和行乞唱歌的记述，作为唐末已有道情的实证。并说他“唱时手持大拍板，至三尺多长，必是现在唱道情所用简子之类”。细玩蓝采和所唱《踏踏歌》词意，确有离尘绝俗的味道，但指实为道情却不免臆测之嫌。又，仅以拍板过大，长度与简板巧合，便认定是“简子之类”，亦欠妥当。须知这“三尺多长”的拍板，乃是蓝采和为招徕看客而特制的招幌；同时也是异人的一种畸行，并不足论。顺便交代一句，唐代的拍板是以两手分执其下端合击的，故虽大至三尺，也是拿得动的。

在唐代以道曲唱道歌的情况或可存在，但严格意义上的道情，即打着渔鼓、简板抒唱“乐道徜徉之情”的一种说唱形式，却不曾在唐代出现过。根据可掌握的材料，以渔鼓、简板伴奏的道情是在南宋初期的几十年间产生的。

渔鼓的出现是有具体年代可考的。南宋江万里《宣政杂录》“通同部”条云：“靖康初，民间以竹径二寸、长五尺许，冒皮于首，鼓成节奏，取其声似曰‘通同部’。又谓制作之法

曰:‘漫上不漫下。’通衢用以为戏云。”(《说郛》卷二十六)文中 所谓“通同部”就是渔鼓。“通”、“同”、“部”是三个象声字。“通”、“同”象手击鼓面复迅疾抬起时发出的清脆之响,“部”则象手击下后顺势按住鼓面而形成的沉闷之音;若按今天的书写习惯则可作“通通噗”。引文明确指出,“通同部”出现于“靖康初”。靖康为宋钦宗赵桓的年号,只使用了两年北宋便灭亡了。“通同部”既起自民间,是“通衢用以为戏”的土乐器,可见原非道士所创。那么,道士们借来为道情伴奏,或当在靖康之后,即进入南宋时期了。

“通同部”一名为“渔鼓”所取代,其具体时间已无法考证。在元杂剧中“渔鼓”一般写作“愚鼓”。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杂剧曲文对“愚鼓”一称的意义作了解释。剧中人吕洞宾唱道:“赤紧的简子唤做‘惜气’,但行处愚鼓相随。‘愚’是不省的,‘鼓’(瞽)是没眼的。”说明“愚鼓”有以超凡入仙之说警醒世人、指示光明之意。“愚鼓”是道士们为通同部取的新名,后来遂讹“愚”作“渔”。

“道情”的名称及简板的使用,首见于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书中卷七记述了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宫中唱道情的情况:“后苑小厮儿三十人,打息气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张抡所撰鼓子词。’”这里小厮儿打的“息气”也就是简板。前引《岳阳楼》曲文“赤紧的简子唤做“惜气”,但行处愚鼓相随”,可见简板又称作“惜气”,亦即“息气”。“惜气”与“息气”在意义上复有关联,都有在过门击简板时可止息停歌、节省气力之意。但近来有些著作将“息气”指为“渔鼓”,不知何据。

在《武林旧事》卷四、卷六中还提到了乾道、淳熙年间两位唱道情的专业艺人。一为名隶教坊乐部的张守道,是俗人;一为在瓦子勾栏里作场时叶道,是道流。

从《武林旧事》的记载可以知道,至迟在南宋乾、淳年间就已经有了打着简板演唱的道情,而且当时已有了相当的发展。这表现为它已由一种道士布道、乞讨的形式,演进为一种民间娱乐性质的伎艺;不但在瓦子勾栏里演出,而且进入了官属的教坊乐部,乃至深入到了宫廷。若从出现渔鼓的靖康年间算起,到这个时候大约有五十年左右的样子;道情的产生不会超出这个时间范围。

从一些资料分析,南宋初的道情是乐曲体而非诗赞体的。它在道士手中,有可能是用当时的道曲唱的,而传入民间以后,则改用了世上流行的词调和小曲。前面提到的乾、淳间唱道情的叶道,在《武林旧事》卷六中是被列入“唱耍令”一类的艺人名单中的。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说:“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而在吴自牧《梦粱录·妓乐》转引《都城纪胜》的文字中,这段话则作“唱令曲小词,须是声音软美,与叫果子、唱耍令不犯腔一同也”。可知耍令又可称作“耍曲”,并和“唱令曲小词”的嘌唱“为一体”。道情既属于耍令一类,自然也应是唱“令曲小词”的,且同样须“声音软美”。这种由短小的词和曲子组成的以声腔优美取胜的道情,一般说是不宜铺叙故事的,大约以抒情写景、歌咏人物为内容。在清初,王夫之有以[鹧鸪天]、[渔家傲]词调写的二十六首《愚鼓词》,郑燮有以[耍孩儿]曲牌写的十首《道情》,当是远绍着早期道情“唱令曲小词”的传统的。

前引记淳熙时宫中唱道情的文字中有一句话:“太上云:‘此是张抡所撰鼓子词。’”能够作为初期道情可以唱词调的例证。鼓子词是用词调唱的,一篇只能用一个牌子,短则只唱一两遍,最长也不过十一二番。今存宋代鼓子词作品所用词牌,如〔点绛辰〕、〔渔家傲〕、〔采桑子〕、〔蝶恋花〕、〔减字木兰花〕等,都是短调。高宗(“太上”)的话意思是:小厮儿所唱道情是借用移植了张抡写的鼓子词的现成词句。设若道情不能唱词调,这就不可能办到。但是道情和鼓子词还不是一种东西。

那么,南宋时有没有诗赞体的道情呢?

我们只能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南宋有一种叫作“陶真”的民间说唱十分盛行，其唱词是七言的诗赞体，完全有可能影响到道情。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但有一点可能肯定，南宋如有诗赞体道情，也必然出现于乐曲体道情之后。

到了元代，无论是乐曲体还是诗赞体道情，便都能找到实例了。范子安《陈季卿误上竹叶舟》杂剧第四折，“列御寇引张子房、葛仙翁执愚鼓、简板上“说：“我等无事，暂到长街市上，唱些道情曲儿，也好警醒世人咱。”接着便唱了由〔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胜葫芦〕等四支曲子组成的道情。这是乐曲体道情的一例。在《岳阳楼》杂剧第三折，正末扮吕洞宾持愚鼓、简子唱了一段道情，便全是诗赞的句式。如开头的几句：

> 披蓑衣戴箬笠怕寻道伴，将简子挟愚鼓闲看中原。打一回歇一回清人耳目，念一回唱一回润俺喉咽。……

像这种“攒十字”的十字句他一连气唱了二十六句，然后以七言四句结束。从“念一回唱一回润俺喉咽”一句来看，元代的道情已不全是纯歌唱的了，也出现了韵散相间、有说有唱的形式。这是长篇叙事道情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元代并没有这类作品留传下来。

明、清两代，道情发展的轮廓比较清晰。特别是入清以后，道情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繁盛的趋势。它所流行的地区在不断地扩大，并和各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先后形成了几十个地方品种。其中分布于北方地区的基本上是乐曲体的，而诗赞体的则流行于南方。其中既有文人的仿制，也有民间的创作。

明、清文人道情都是抒情性质的。传世作品中较早的有由明入清的文学家归庄的《万古愁曲》。作者借评论历代史事，抒发亡国之痛和稳居不仕的情怀，写得酣畅淋漓，极嬉笑怒骂之能事。稍晚一些的则有康、乾间徐大椿的《洄溪道情》和郑燮的《道情》十首；而以后者艺术成就最高，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道情》第一首为：

> 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远，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

它以平易而又雅丽的语言，写出了这位渔翁在山青水绿之中自遣自歌、独来独往的闲适情态，优美的景色和人物恬淡的心境交融在一起，诗情画意，盎然纸上。以上三种文人创作都是乐曲体的。

明、清民间道情基本上都是叙事作品。成书于隆庆、万历间的长篇小说《金瓶梅》第六十四回，写艺人在酒筵上“打起渔鼓”唱道情，先“唱了一套《韩文公雪拥蓝关》”，然后是《李白好贪杯》；这两种显然都是演述故事的。明末刊本《庄子叹骷髅南北词曲》是留传下来的叙事道情作品中最早的一种。它名为“南北词曲”，实际上是以七言诗赞为主体的。在与之同时的话本集《醒世恒言》中有唱这段故事的描写：“那瞽者说一回，唱一回，正叹到骷髅皮生肉长，复命还阳，在地下直跳将起来，……瞽者就住了鼓、简。”(《李道人独步云门》)入清以后，道情唱本刊刻传抄得更多。如仅是述韩愈、韩湘子故事的就有《韩湘子九度文公道情》、《蓝关道曲》、《新订考据真实湘子全传》等多种。同时，这时的道情在题材上也有所扩大，一些古典文学名著也被改编成道情演唱。嘉庆间人写的《画舫余谭》记有当时京师道情艺人“挟渔鼓，诣诸姬家”说唱《西游记》的情况。道情在四川的一支——四川竹琴，曾改编了《三国志演义》，有光绪年间刊本。

时至今日，道情仍活跃在祖国的大地上。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所附《中国现代曲艺曲种表》，现在流行于各地区的道情有二十七种之多，分布于华北、华东、华南、西北、中原及西南的十三个省份。可见道情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今天仍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道教神仙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又叫九天、玄女、九天娘娘，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后为道教所信奉，成为女仙中著名的一位，在民间颇有影响。《水浒传》中，即载有此女仙事。

在《水浒传》第四十二回中，宋江被梁山好汉们打劫了江州法场救上山后，又下山去接老父和弟弟，不料被官兵发现，慌忙中逃往道村玄女庙。官兵寻到庙中，玄女显灵，吹起一阵怪风，飞沙走石，罩下一阵黑云，官兵们惊恐逃走。玄女派两个青衣仙女请宋江相见，授予三卷天书，并命其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又道："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只可与天机星(指军师吴用)同观，其他皆不可见。功成之后，便可焚之，勿留在世。"

宋江谨受命，从此坚定了造反的决心，不再三心二意。后来晁天王殒命，宋江代之而为梁山泊义军领袖。

到第八十八回时，宋江人马已归顺了朝廷，奉命领兵征辽。辽军摆设"太乙混天象阵"，十分厉害，攻打了几次，宋军损兵折将，宋江无计可施。宋公明烦闷，寒夜困倦，梦二仙女引其拜见九天玄女。玄女当面授以破阵之法，宋江即以此法破阵，大败辽军。

书中的九天玄女是位颇谙军事的女神仙，但她的模样却像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后妃：

当绾九龙飞凤髻，身穿金缕绛绡衣。
兰田玉带曳长裙，白玉圭璋擎彩袖
脸如芝萼，天然眉目映云环。
唇似樱桃，自在规模端雪体。
犹如王母宴蟠桃，却似嫦娥居月殿。
正大仙容描不就，威严形像画难成。

玄女九天玄女这一女仙，并非是《水浒传》作者凭空编造，而源于远古的神话传说。不过，最初的玄女并不像《水浒传》中那么漂亮，而是一个鸟身子上长着个人脑袋的怪物！



九天仙女授天书(《水浒全传》四十二回)

《诗经·商颂·玄鸟》说：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这是殷商后代祭祀自己祖先的诗歌。是说天帝命令玄鸟生下契来，建立了强大的商

朝。玄鸟就是商人的始祖。《史记·殷本纪》也记载了这种传说：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妇，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吕氏春秋·音初》亦载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发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謚謚，二女爱而争搏之，复以玉筐，少选，发面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返。

东汉高诱对此注道："帝，天也。天命降卵有娀氏，吞而生契。"契，读作屑(xiè)，亦作偰、卨。传说中商的始祖，帝喾之子，母亲叫简狄。曾经助禹治水有功，被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居于商(今河南商丘南)，一说居于蕃(今山东滕县)。传说商族与玄鸟有血缘关系，当是与商族崇拜玄鸟图腾密切相关。

这个玄鸟后又化身为玄女，并被编入黄帝神话中，成为黄帝之师。早在隋朝之前，就有一部《黄帝问玄女兵法》，详载玄女助黄帝战胜蚩尤事：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天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遂得战法焉。

此时的玄女，虽尚未脱离鸟形，但到底进了一步，成了一位救助危险、传授后法的半人半禽女神了。

还有一种说法，九天玄女是由"天女魃"衍化而来。根据是《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魃，雨止，遂杀蚩尤。"

这一天女魃是由黄帝为专门对付蚩尤所请的风伯雨师的，原来大约属于旱魃之神，后来变成了人身鸟首的玄女。

黄帝战蚩尤是我国最著名的神话传说之一。蚩尤一般被认为是"贪虐"、"暴"、十分凶残的恶神。他长得十分可怕，《述异记》记载



说："兽身人语，铜兴铁额，食沙石子"，或曰"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而作为华夏祖始的黄帝却代表进步势力，故黄帝克蚩尤是正义战胜邪恶。帮助黄帝取胜，则是顺乎天意、天命，所以玄女成了天廷中掌管天书秘录，专门传授救世英豪兵法，以裁决人世劫运的大神了。

西王母成了诸女仙之王以后，"女子登仙得道者咸所隶焉"(《集仙传》)，玄女自然也成为王母娘娘驾下的一位女仙。道士们则把玄女鸟奉王母命授黄帝天书的传说，进一步加工，玄女已不再是"人首鸟身"，而由半人半禽"进化"为人了。至于所授天书，一言"道"一言"法"，一言"术"，所谓"天机之书"，大概就是《水浒传》中九天玄女送给宋江"天书三卷"的来历。

在宋代张君房编撰的《七笈七签》中，玄女已是九天玄女，并且彻底人神化，成为地道的女神仙："九天玄女者，黄帝之师圣母元君

弟子也”，黄帝“战蚩尤于涿鹿，帝师不胜”，“居数日，大雾冥冥，昼晦，玄女降焉。乘丹凤，御景云，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曰：‘吾以太上之教，有疑可问也。’……玄女即授帝六甲六壬兵信之符、灵宝五符策使鬼神之书”，“帝遂率诸侯再战，……遂灭蚩尤于绝辔之野。“(《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四)

这时的九天玄女已完全脱离了动物痕迹，成为一位传授天书兵法，扶助应命英雄的上界女仙了。

玄女鸟被道教改造、仙化为九天玄女以后，常被古代小说家所用，充当授予小说主角(多是造反英雄)天书兵法的角色。



玄女娘娘

《大宋宣和遗事》。宋元间无名氏编撰。这部讲史小说中，有一部分是讲梁山泊好汉聚义故事。前文所引《水浒全传》中的九天玄女授宋江天书事，即源于此“亨集”中“九天玄女授天书”。宋江得天书指示，便反上发梁山泺。

《三遂平妖传》(四十回本)。《三遂平妖传》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将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元末明初罗贯中著)增订而成。二十回本无玄女、天书内容，四十回本加入了有关情节。

第一回述周敬王时吴、越交兵，九天玄女化作处女助越伐吴，于下山途中收白猿为徒。后玉帝命白猿掌管九天秘书，白猿盗天书“如意册”，将册中道法刻于白云洞石壁。第二回写盗书事发，玉帝命其守护白云洞天书，平日浓雾十里护洞，每年仅端午日白猿上朝天廷时收雾。以后写北宋王则与圣姑姑、胡永儿、蛋子和尚等起兵造反的经过。蛋子和尚在白云洞摹得天书，圣姑辨识，知是“如意宝册”，共议练法(第十一、十二回)。最后乱事被平定，是得力于九天玄女。玄女收去了圣姑的神刀，擒住了圣姑，文彦博等才能大破贝州城(第四十回)

《女仙外史》。清代吕熊撰。全书一百回。写明代农民起义领袖唐赛儿起兵勤王，对抗燕王朱棣的靖难军，以谋求惠帝朱允炆复位之事。唐赛儿实有其人。但书中所演故事，故纯属虚构，小说还摘取一些神话传说，吸收了释、道、魔三家的许多神明，九天玄女即其一。

第七、八两回，写专为辅佑唐赛儿的下凡仙女鲍姑，带赛儿到神仙曼尼处取得天书七卷、宝剑一匣。但天书剑匣都是一块整玉，须请玄女娘娘下降，方能开得。玄女下降后，轻轻一分，玉匣即开。玄女对唐赛儿讲了道教天书三笈的具体内容，并称“黄帝得传下笈，以平蚩尤；姜子牙仅得半传，遂著《阴符》；黄石公、诸葛、青田诸人所得，不过十之二三，皆已足为帝一王之师矣。”赛儿掌“杀劫”，本应得下笈，“因南海大士特启上帝，所以得赐上笈。”唐赛儿习得天书秘法后，乃兴兵造反与明成祖朱棣对抗。

唐赛儿得"天书"(或称"妖书")宝剑事,不少明人笔记有载,有的史书也记有这种传说。如明·祝允明《野记》卷二:"永乐中,山东民妇唐赛儿夫死,唐墓祭回,经山麓,见石罅露出石匣角,唐发现之,中藏宝剑妖书。唐取书究习,遂通晓诸术。剑亦神物,唐能用之。"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九:"一云赛儿至故夫林三墓所,发土得一石匣,中有兵书宝剑,赛儿秘之,固以叛后终逸去,盖神人所佑助云。"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三:"初,唐赛儿夫死,赛儿祭墓,固经山麓,见石罅露出石匣角,发之得妖书、宝剑,遂通晓诸术。剑亦神物,惟赛儿能用之。"

以上所载唐赛儿于山中得"天赐"兵书宝剑的"仙迹"不过是"佛母"(赛儿自称"佛母")自己或其门徒所编造,到了小说家笔下,则又安到了九天玄女的身上。

《薛仁贵征东》(《说唐薛家府传》)。清代无名氏撰。全书六卷四十二回。是以薛仁贵跨海征高丽的史实与民间传说杂揉交织而写成的一部书,在民间广有影响。书中第十一回写薛仁贵随张士贵大军东征,途中忽遇地裂成窟。薛仁贵被派下洞探索,发现窟中原来别有洞天。他在地道中放了被玄女娘娘锁住的青龙,后在仙童的指引下见到了玄女娘娘。玄女将五件宝物(白虎鞭、水火袍、震天弓、穿云箭及无字天书)赐给薛仁贵。说到天书,玄女道:"这一本书曰无字天书,不可被人看见,凡有疑难之事,即排香案,拜告天书,上露字迹,就知明白。此五件异宝你拿到,高丽就能平服。"薛仁贵得玄女娘娘护佑,最终征东成功。

北京过去有三座专祀玄女的庙宇,叫九天娘娘庙、玄女庙。在北方和南方的不少地区都有玄女庙。

宁　封　子

在四川灌县青城山麓丈人峰下,有一座著名的道观建福宫。建福宫原叫"丈人观",殿内有一位折髯飘洒,峨冠博带的神像。这位主神就是五岳丈人宁封子。

宁封子是传说中黄帝的陶正,也就是当时专门管理制造陶器诸事的官儿。宁封很会烧制陶器,而且技艺超群。相传,有一天他正在烧陶,有个人路过这里,愿意帮助烧烧火,宁封高兴地答应了。这位不速之客出手不凡,他烧的火能出现五色烟,制出的陶器不知比宁封高出多少倍。宁封拜这位奇人为师,得到了真传。有时兴起,竟能跳进火窑里,随着烟气上下升腾。后来蚩尤作乱,黄帝打不过蚩尤,便来找宁封子。宁封送给黄帝一部仙书《龙跷经》,黄帝得以御云龙以游八极。终于打败了蚩尤,于是拜宁封为"五岳丈人",让他管领川岳百神。



宁封的来历另有一说。四川灌县青城山建福宫后面有座山,叫"丈人山",是轩辕黄帝问道于宁封丈人的地方,宁封因封于此山,故

名“宁封”。当时天地初开，洪水泛滥，百姓们只好住在山上的洞穴里。每天到山下取水，便用潮湿的泥土做成盆状器皿，用来盛水。但这种器皿很不结实，极易碎裂。

有一次，宁封在洞中烧烤野兽，他忽然发现火坑底部的硬泥块，十分结实坚硬，眼睛一亮，悟出了道理。宁封烧出了第一批陶器，成了制陶专家，被黄帝封为陶正。一天，宁封在窑中架火烧陶，他爬上窑顶去添柴，不料窑顶忽然坍塌，宁封不幸葬身火海。人们急忙跑出来，看见宁封的形像，随着烟气上升，于是大家都说宁封火化后成仙了。从此，宁封便成了陶神，又叫“宁封子”、“宁封真人”。

宁封子的祖庙建福宫始建于唐代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今建筑为清末重修。前有亭楼映衬，后有丹台翠林掩覆，很是幽静。由石级梯道穿过外山门，即见内山门，门额题“建福宫”3个大字，两侧楹联为：

一楼和气看山笑；
半榻禅心印月明。

庙宇由山门、回廊、正殿及厢房组成。正殿即供奉宁封子神像，侧壁有清代壁画。后殿内供奉太上老君、东华帝君(东王公)和王重阳神像，板壁刻有张三丰祖师诗，楹柱上悬挂著名的394字青城山长联。

八　仙

中国的八仙是最受人们欢迎的神仙群体之一，八仙传说可以与孟姜女、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所谓“中国四大传说”相媲美。

八仙的产生与定型，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

“八仙”一词，可追溯至东汉三国。牟融《理惑论》说：“王乔、赤松、八仙之录，神书百七十卷。”但此“八仙”并无实指，似泛指列仙。又有所谓“淮南八仙”，是指汉代淮南王刘安的八个门客，即苏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八人，世称“八公”，他们都是《淮南子》的作者。淝水之战时，“草木皆兵”的八公山，即因八公和刘安曾登此山得名。魏晋以来，《神仙传》、《录民记》等道家著作以刘安好方伎，遂附会八公为“八仙”，当然他们皆非仙人。

晋代还有“蜀中八仙”，指容成公、李耳、董仲舒、张道陵、庄君平、李八百、范长生、尔朱先生。晋·谯秀《蜀纪》称八人均在蜀得道成仙。



八仙酌酒炼丹

唐代也有“八仙”，为“酒中八仙”，即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八人皆好饮酒赋诗，杜甫曾作《饮中八仙歌》咏其事。

今天人们熟知的道教八仙，是指李铁拐、钟离权、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他们的传说故事先后见于唐宋文人的记载，但他们凑成一个班子是在元朝，而且班子的人选也不是一下就定好的。元代马致远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就没有何仙姑，而多了个徐神翁。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岳》中，何仙姑还是缺席，却又多了个张四郎。明代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中的八仙。缺少张果老、何仙姑，却多了风僧寺、玄虚子。明代的《列仙全传》又用刘海蟾顶替了张果老。一直到明代吴元泰写了《八仙出处东游记》，才确定了以上八位，并沿用至今。这正显示了民间造神的随意性。

八仙这一组神的组合并不因他们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显得不伦不类，相反，倒使人觉得合情合理，十分圆满。每逢迎神赛会和祝福拜寿，八仙必是不可缺少的角色，直到今天，北京白云观春节民俗庙会中，还有巨大的八仙卡通人在庙前欢迎人山人海的游客。中国的各路神仙多达数百，为何独独八仙如此光彩？这不能不说八仙迎合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理需要，满足了全民喜庆娱乐的需要。八仙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文庄粗野……，社会各色人等，均可找到自己亲近的“知音”。何仙姑最终取代了徐神翁或张四郎，为女性在八仙中取得一席之地，也可说明这一问题。

八仙形象五花八门，丰富多姿，与道貌岸然、正襟危坐的一些神仙大不相同，他们本身就是一台热闹好看的戏。明代王世贞在《题八仙像后》即指出：“以是八公者，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为各据一端作滑稽观耶?”故而八仙在民间大出风头，极受欢迎。

“八仙过海”传说的流布，更使他们名声大噪。

元明时无名氏杂剧《争玉板八仙过海》，最早表现了这个传说：蓬莱仙岛牡丹盛开，白云仙长宴请八仙、五圣——齐天、通天、搅海、潘江、移山五位大圣，观赏牡丹。宴罢回程，吕洞宾等各拿出自己宝贝，大显神通，渡越东海。东海龙王之子摩揭、龙毒抢了蓝采和的玉板，并把他拉下海去。另七仙大怒，一场厮杀斩了摩揭，伤了龙毒。四海龙王齐来参战，不敌，又求救于水、天、地三官助战。“五圣”来助八仙，大获全胜。如来佛出面，将八仙、四海龙王、三官、五圣请到灵山，让他们和解消仇。

《东游记》的第四十六回至第五十六回即写八仙过海闹龙宫事，情节大体相同。“八仙过海”肯定了八仙的造反行动，赞扬了他们超群的本领和团结精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成为富有积极意义、人们常爱使用的俗语和典故。

由于八仙闹海事，旧时渔民还有一种禁忌：凡驶船出海，船上决不能坐七男一女，否则就会在海里出事。大概怕引起龙王爷的误会，以为来了“新八仙”，便要大打一通，这七男一女怎能抵挡的了？还有的说，这一女就成了“何仙姑”，龙王爷或太子就会来抢亲。有的地区，甚至禁止妇女下海，说什么“妇女乘船船要翻，妇女下海海要荒。”这一迷信陋习，还流传于日本沿海地区，更有甚者，有的地方连梦见女人下船，都认为很不吉利。

就像佛教最初有四大罗汉，而后发展为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乃至五百罗汉一样，八仙出现以后，有人感到还不够热闹，于是又凑出了另外两组八仙，成为上、中、下八仙。

元代已有“上八仙”的说法，即指李铁拐、吕洞宾这组八仙。但到了清代，一般将此八仙列为“中八仙”，而增出上、下八仙。最早排出下仙的是明代无名氏杂剧《贺升平群仙庆寿》，下八仙的名目是：王乔、陈戚子、徐神翁、

刘伶、陈抟、毕卓、任风子、刘海蟾。这几位其实是一伙乌合之众,任风子是个屠户被仙人点化,这是个戏曲人物;刘伶和毕卓则是晋代有名的"酒葫芦"——以能喝酒名扬四海。

上、下八仙的组成有更大的随意性。除上一种外,《何仙姑宝卷》中的下八仙是:广成子、鬼谷子、孙膑、刘海、和合二仙、李八百、麻姑。《八仙上寿宝卷》的下八仙则是:张仙、刘伯温、诸葛亮、苗光裕、徐茂公、鲁宁秀、牛郎、织女。在鼓词《孙悟空大闹蟠桃会》中的下八仙又是:罗圣主、张仙、鲁班、张千、李万、和合二仙、刘海、刘伶、杜康。

与这三组相对应的上八仙则是:福星、禄星、寿星、张仙、东方朔、陈抟、彭祖、骊山老母;寿星、王母、观音、斗姆、黎山老母、圣母娘、金刀娘(原文缺一);东方朔、李大仙、王禅、五敖、毛遂、白猿、二郎神。



李铁拐

李 铁 拐

李铁拐(或铁拐李)是传说中的八仙之首。有关他的姓名和年代,众说纷纭,根本无法统一。他的姓名就有七个之多,而他所处的年代,也有六七种说法。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长淮有徂神氏,亦善修炼之学。出驾六蜚(飞)羊,头弯一角,肋排六翅,其行若电。巡行天下,人民从其化。治世三百岁,亦隐而不现。"

这位"其行若电"的古徂神氏,赤松子曾对仙人宛丘说,其"善导出元神之术,更姓名曰李凝阳,惜未得真道。"这个李凝阳,就是从老子修行而得道的铁拐李先生。按此说法,所谓"古徂神氏"即铁拐李的前身,与赤松子同时,赤松子是传说中的仙人,神农时代的雨师。徂神氏——铁拐李也就被说成为远古时代人了。

徂神氏更名为李凝阳后,从老子学道而成仙,为铁拐李,老子乃春秋时人,如此,铁拐李又成了春秋时人。

《续文献通考》:"李铁拐,或云隋时峡人,名洪水,小字拐儿,又名铁拐。常行丐于市,人皆贱之。后以铁杖掷空,作为龙,乘龙而去。"

此说较前边所引诸书的说法稍中靠一些。大概隋朝时候有个要饭的李洪水,常拄一铁拐杖,行为怪诞,被视为异人。后道徒编出了一些仙迹,将其神话。

明·吴元泰所撰《八仙出处东游记》述李铁拐出处谓:铁拐姓李,名玄,铁拐乃其后假身别名也。李玄慕老子之名,往投华山向老子求道。大体与《历代神仙鉴》的说法相似。

清人黄斐默《集说诠真》引《通考全书》,谓李铁拐姓李名孔目,有足疾,西王母点化他升仙,授以铁拐,前往京师度汉大将军钟离权。把李铁拐说成是汉代人。同书又引《事物会原》,谓李铁拐名李元中,唐玄宗开元、代宗大历间人,学道于终南山。

元人岳百川写了一部杂剧《吕洞宾度铁



拐李岳》，在戏里铁拐李又叫做李岳，李岳是何时人不详。

李铁拐的仙号，其实就是他的绰号，源于其尊容：黑脸蓬头，金箍束乱发，卷须巨眼，跛右一足，铁拐拄跛足。传说他的这副容貌，并非其本容，他的改头换面是得道的结果。

《列仙全传》等说他本来长得十分魁梧，是一位相貌堂堂的伟丈夫，他在砀山洞中修行时，欲拜老子和宛丘仙人为师，前去修行，临行时对徒弟道："我欲从游华山，倘游魂七日不返，你就把我尸壳焚化。"据说他的魂藏于肝，魄藏于肺，元神出游时魂一起去，只把魄留下守着尸壳。于是李先生的元神赴华山从老子游，徒弟日夜看守师父的躯壳。不料到了第六日，弟子家里来人报信，老娘病危，徒弟坐卧不安，又坚守到第二天中午，见师父元魂还未归，无奈烧了师父的尸壳，回家尽孝道去了。不久李先生的元神赶回洞府，失其尸壳，真是丧魂落魄，也似孤鬼游魂。他忽然发现林中有一饿殍，灵机一动，心想："即此可矣！"马上从其囟门而入，站起以后，才觉得不大对劲儿，他忙从葫芦里倒出老子所赠仙丹，葫芦忽然起道金光，光中映出一人："黑脸蓬头，卷须巨眼，跛右一足，形极丑恶。"正在惊讶，身后忽然有人鼓掌道："青脊茅檐，毁窗折柱，此室陋甚，何堪寄寓！"回头一看，正是师父老子。

李先生一看改头换面得来的尊容实在不像样子，有些不高兴，忙要把元魂跳出，老子急止曰："道行不在于外貌，你这副模样蛮好。我有金箍束乱发，铁拐拄汝跛足，只须功夫充满，便是异相真仙！于是依言结束，以手扪两眼如环，遂自号"李孔目"——通俗的说法即"李大眼"(但此号并未流行)。这就是"世称为铁拐李先生"的来历。此说载于《历代神仙通鉴》卷五、《列仙全传》卷一、《潜确类书》等书，《八仙出处东游记》的第五回《杨徒守尸误化》、第六回《铁拐托魂饿莩》亦演说此事。

元人岳百川写的杂剧《吕洞宾度铁拐李





岳》,虽与以上传说不同但也借用了“借尸还魂”之法。剧情如下:有个郑州孔目岳寿把持着衙门大权,吕洞宾来度化他修道,被他吊起。大官韩琦私访路过此地,放了吕洞宾,自己却被岳寿吊起。岳孔目手下人乘机对韩琦敲诈,后来知道了韩琦的真正身份,岳寿惊吓得了重病。韩琦阅案卷,发现岳寿是个人材,派人去安慰他,但岳寿已惊恐而死。岳寿到了阴司,阎王要将他严惩,吕洞宾来救,收他为弟子,但其尸身已被焚化,于是将其魂附于应死的李屠户身上,李屠是个瘸子,岳寿得以借体还生。岳寿思念旧家,逃回岳家。岳寿与家里人相认后,李家人前来争夺。两家相持不下,争到官府,韩琦也无法断案,吕洞宾出现,度化岳寿成仙而去。

此剧共有四折,故事来源似出民间传说,岳寿姓岳,李屠姓李,故还魂后取名李岳,剧名便称《吕洞宾度铁拐李岳》,简名《铁拐李岳》,剧中情节与前引诸书很不相同,只是借尸还魂的说法如出一辙。李铁拐元魂出窍、躯壳被焚的传说很可能借用了宋代一个无名道士的故事。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一记载了这一传说:

> 有道人于山间结庵,炼丹将成。忽一日入定,语童子曰:“我去后,或十日、五日即还。谨勿轻动我屋子。”后数日,忽有扣门者,童子语以师出未还。其人曰:“我知汝师死久矣。今已为冥司所录,不可归。留之无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为魔,遂举而焚之。道者旅归,已无及。

李铁拐的事迹多见于元明杂剧及明清小说中,如前边提到的《吕洞宾度铁拐李岳》,明代贾仲明还写了《铁拐李度金童玉女》,剧演王母娘娘办蟠桃会时,金童玉女一念思凡,被罚下人间配为夫妻。王母复命铁拐李度脱他二人归真。此外不少八仙戏如《八仙过海》、《群仙庆寿蟠桃会》等,亦有李铁拐故事。小说则有《东游记》、《八仙全书》、《八仙得道传》等,其中以《东游记》流传最广,影响



最大。

《东游记》，又名《上洞八仙传》、《八仙出外东游记》，明代吴元泰编著，作者的编著水平不大高明，如第二回《老君道教源流》，根本不像小说，倒是一篇道教源流宣传材料。好在本书保留了许多民间传说，把这些故事拼凑结合而成。许多八仙流传故事都能在书中找到。书中第一回至第十回主要写李铁拐得道事迹，前六回写李玄修真求道，往华山寻老君、宛邱仙人投师，徒弟为其守尸壳。李玄游魂七日未归，徒弟母亲病重，为尽孝道而将李尸焚化。李玄只好托魂饿殍，而为李铁拐。后几回说他用仙丹救活徒弟之母，复归老君之所，与仙童相戏，放走了老君青牛。青牛下凡，冒充国王，淫秽后宫。李铁拐因放走青牛，被贬下凡立功赎罪。李乃化身一老翁，隐名埋姓，背一葫芦，施药于人间，病者救之，无不立验。并在市头悬一壶，乃罢市，即跳入壶中，市人没人能见。李铁拐功行圆满，复归老君所谢罪，被玉帝封为上仙，于是乘云琼岛，跨鹤瑶天。每降凡间，就到贫苦百姓中去。

吕洞宾淫嫦名妓白牡丹，李铁拐看不惯，就与何仙姑、蓝采和合谋，用计使白牡丹泄了吕洞宾之真阳。吕洞宾鬼迷心窍，帮助辽国萧太后攻打宋朝，铁拐得知大怒，把吕洞宾一顿臭骂。其余七仙合力助宋，大败辽国，并将吕洞宾收伏，洞宾请罪，众人才和好如初。最后十回演八仙过海，大闹龙宫事。赵景深先生认为此书之前可能有《八仙宝卷》，《东游记》是根据《八仙宝卷》改编的。

李铁拐在民间影响很大，但主要是与其他七仙作为一个群体——八仙出现的。大概是因为传说他身背的大葫芦里，有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过去民间特别是医药行把他作为狗皮膏药的发明者和祖师爷。卖狗皮膏药这一行业敬的药仙就是铁拐李。

传说彰德府(今河南安阳)有一家做膏药的王掌柜，乐善好施，不管贫富，只要生了疮，



就给人治，名声不错。一天，王掌柜带了一些膏药去赶庙会，半路碰上一个瘸腿乞丐，浑身破破烂烂，直冒臭气。乞丐见了王掌柜，伸开瘸腿，腿上长了个小疔疮，请王掌柜给治治。王掌柜一看，取出一贴膏药贴在小疮上，说道："明天准好。"

第二天，王掌柜又碰上了瘸腿乞丐，忙问："好了吗?"乞丐说："不好，疼得更厉害了。"王掌柜揭开膏药一看，果然疮更大了，就说："我给你换一贴药力大的，再不好，你到我家找我。"于是给乞丐又换了一贴。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王掌柜要出门，刚迈出大门，就见那个瘸腿乞丐在门边等着呢。没等王掌柜开口，瘸子就大骂起来："你真坑人！彰德府的膏药——净是假货!"王掌柜揭开一看，不得了，腿疮变得碗口大了。王掌柜挺过意不去："我再给你配贴好膏药。"说着扶起乞丐走进家去。刚一进院，一条大黄狗扑了过来，咬住了乞丐的腿，王掌柜一着急，抄起乞丐手中的木棍，一棍将狗打死。乞丐笑

了:“今天有狗肉吃了。”

王掌柜跑到后院,找出几味名贵药材,给乞丐配好了一贴膏药。过来一看,乞丐正吃着烤肉,旁边摊着几块狗皮。乞丐接过配好的药,往腿上一按,又拿起一块狗皮,也捂到了上面。功夫不大,乞丐把狗皮膏一揭,碗口大的脓疮不见了,真是奇迹。王掌柜接过狗皮膏,感慨万分,这时瘸腿乞丐忽然不见了,他这才明白是拐仙——铁拐李前来传授仙方。



从此,彰德府的狗皮膏药出了名,治个腰酸腿疼、生疮长疔十分灵验。以后狗皮膏药传到了全国各地。不过,因为铁拐李曾说过卖膏药的坏话,所以至今留下了个话把儿:人们常把那些专靠说大话、说假话过日子的人,叫做“卖狗皮膏药的”!

汉 钟 离

有关汉钟离的仙话颇为不少,据《历代神仙通鉴》卷九、《列仙全传》卷三等,其主要故事大体如下。



钟离权

汉钟离,即汉代钟离子,姓钟离名权。京兆咸阳(今属陕西)人。钟离权字寂道,号和谷子,又号王阳子,又号云房先生。其父钟离章是东汉大将,以征北胡有功,封燕台侯。其兄钟离简为中郎将。《历代神仙通鉴》和《列仙全传》为其编造了武将世家,将其打扮为“将门虎子”,完全是道教宣传的需要。钟离章与钟离简纯属子虚乌有,历史上根本不存在。

钟离权的诞生笼罩着一派仙气,大白天就有一巨人,大踏步进入其母内室,自云“是上古黄神氏,当托生于此”,顿时“见异光数丈如烈火”!这位大仙一降生,就像3岁小儿一般大,天生一副神相:“顶圆额广,耳厚眉长,目深鼻耸,口方颊大,唇脸如丹,乳远臂长”,更怪的是,此儿昼夜不声不响不哭不吃,第七天突然说了一句话,语惊四座:“身游紫府,名书玉京。”“紫府”与“玉京”是玉帝的宫城,这就是说他是在玉皇大帝的仙班中挂了号的。

因其“自幼知识轻重”，心里像是有杆秤，于是父亲给他起名曰“权”，“权”者，秤砣也。

这位“秤砣 ”长成后，俊目美髯，身长八尺，真是一表人材，不久在朝廷里当了谏议大夫。当时吐蕃造反，钟离权奉诏出征。权臣梁冀怕他得了头功，给了他两万老弱残兵。被敌人夜间劫营，全军覆没。他只身逃入山谷。在林中迷路，遇一胡僧，将他带至一小村庄，道：“此是东华先生住处，将军珍重。”揖别而去。

不久，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问道：“来者是汉大将军钟离权吧？你何不寄宿山僧之所？”权大惊，知遇异人，乃回心问道。这位东华先生叫王玄甫，是位上仙，传他长生真诀、金丹火候及青龙剑法。后又遇华阳真人，传其太乙刀圭、火符内丹、洞晓玄玄之道。最后在崆峒紫金四皓峰得玉匣秘诀，成了真仙。玉帝封其为“太极左宫真人”。



此后，钟离权或隐或现，历魏到晋，又做了边关大将。改名为“金重见”，“金”、“重”，“钟”(鍾)也，意为我钟离权又重来。这位三军统帅打扮甚为古怪：“丫头坦腹，手摇棕扇自若，赤面伟体，龙睛虬髯。”所谓“丫头”，即其头上梳有两只大丫髻。这位浪荡将军委实不是当统帅的材料，又被人打得大败。这回算是死了心，跑到终南山隐居去了，从此决不再当什么将军。直到唐朝，他才又出来，度化了吕洞宾。

《八仙出处东游记》第十一回至第十八回全叙汉钟离事迹。书中所述钟离权来历与以上诸书略同，但说是李铁拐度化了钟离权。后面又编演了钟离权与吕洞宾斗法，助杨家将大破辽军天门阵事，最后则是八仙过海闹龙宫。



唐代确有个钟离权，《全唐诗》中收有他的三首绝句，并有其小传云：

咸阳(今属陕西)人。遇老人授仙

诀，又遇华阳真人、上仙王玄甫，传道入崆峒山，自号云房先生。后仙去。

他留世的诗为《题长安酒肆绝句》，诗中倒有些"仙味"：

其一

坐臣常携酒一壶，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

其二

得道真仙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苍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其三

莫厌追欢笑语频，寻思离乱好伤神。闲来屈指从头数，得到清平有几人。



看来这位唐代钟离权是个道士，而且是个酒不离口、放浪形骸的狂道人。他自称"天下都散汉"（见《事物原会》）即天下第一个闲散之人。《全唐诗》成书于清代康熙年间，其小传中"仙去"的说法，当时吸收了历代一些民间传说。

这位钟离权据说宋朝还露过面，并被载入正史。《宋史·陈抟传》谓：陈尧咨不敢造次，悄悄问陈抟："这位是谁？"陈老道说："钟离子也。"陈抟生于唐末，是五代、宋初的著名道士。此事被载于正史，当会有一定根据。又《宋史·王老志传》亦载：一天孝子王老志碰到一个叫花子，叫花子自称是"钟离先生"，给了王老志几粒"仙丹"，老志吃了以后，变成了狂癫，抛弃了妻儿老小，不知去向。王老志后来成了奸相蔡京的门客。这个王老志遇见钟离先生之类，像是他招摇撞骗的谎言。



至于一些书中把钟离权说成是汉代人，也是一种误传。一是将他与汉初的大将钟离昧相混淆。钟离昧原是项羽手下大将，项羽失败后，钟离昧投奔了好友韩信。刘邦发现后，韩信为洗清自己，逼着钟离昧自杀了。清人胡鸣玉所撰《订讹杂录》已辨其非："汉钟离权，唐人。今误为汉将钟离昧，非。"二是钟离权成仙后，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后人遂

以“汉”字属下，讹为“汉钟离”其实“天下都散汉钟离权”中“天下都散汉”，意为天下第一闲散不羁之人，或天下闲散放浪人的头儿。



钟离权

钟离权借着道教的吹捧，名声益大，地位益高，全真道将其奉为道派祖师。全真教与正一道为元以后道教的南北两大派。全真教的创始人是金世宗时的王重阳。全真道为尊崇其道统源远流长，又立几位神仙为道派祖师，凡有第一祖王玄甫（号东华帝君、紫府少阳君）、第二祖钟离权（汉钟离）、第三祖吕岩（吕洞宾）、第四祖刘操（刘海蟾）、第五祖王重阳，合称“北五祖”。

张　果　老

赵州桥什么人儿修？
玉石栏杆什么人儿留？
什么人骑驴桥上走？
什么人推车轧了一道沟？
赵州桥呀鲁班爷修，
玉石栏杆圣人留；
张果老骑驴桥上走，
柴荣推车轧了一道沟。



张果老

这是旧时十分流行的民间小戏《小放牛》中，村姑与牧童问答的一段唱词。这里面有个传说故事，鲁班修了座赵州桥（其实是隋朝著名工匠李春所造），张果老想试试石桥坚固与否，就约上仙人柴荣，他倒骑着驴，驴背的褡裢里放着“太阳”和“月亮”，柴荣的独轮车里载的是“五岳名山”。两人一上桥，把桥身压得直晃动，紧要关头，鲁班跳到桥下，用双手把桥托住。两人带着日月和五岳大山顺利通过了石桥。如今桥面上有几处圆坑，人们说这是当年张果老的驴蹄子印；还有一条沟痕，说是柴荣的车道印。《小放牛》唱遍了全国，张果老的大名也就传遍了全国。

张果老在历史上倒是实有其人。他是唐代道士，叫张果，“老”字是人们对他的尊称，也是因他模样长得老，显是岁数大。神仙没有一个说自己岁数小的。唐初他就说得到长

生秘术,“自言数百岁矣”。等到唐明皇的使臣去请他入朝,他又吹嘘:“我生尧丙子岁位侍中。”从尧时到李隆基时,足有三千来年!其实,尧是远古代传说中的炎黄联盟首领,当时是根本没有侍中这一官职的。此事到了当时被明皇十分尊宠的道士叶法善(一说叶静能)口里,就更邪乎了,张果老被说成是“混沌初分白蝙蝠精”所变。“混沌”,是道教的说法,指世界还未开辟以前的状态。《三五历纪》说,“未有天地之时,混沌如鸡子(卵),盘古生其中万把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从盘古开天地到天地形成又经过了一万八千岁。这一过程,《枕中书》说得更长,要经过“四劫”。“劫”是借用佛教的说法,一劫有 43 亿 2 千万年,或 43 万 2 千年,四劫合起来就是个人的数字,叶老道编造张果老是混沌初分时白蝙蝠精所化,那他的岁数也是个惊人的数字。所以张果大名的后面加个“老”字,是当之无愧的。当然,张果年岁的无稽之谈。

张果老的轶事载于《旧唐书》、《明皇录》、《新唐书·方伎传》等史书中。明代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第二十回、二十一回专述其事,明末凌蒙初所撰《初刻拍案惊奇》卷七,对张果老事迹亦有详述。其“仙迹”主要如下。

张果,自称是帝尧时代的侍中,至唐初,隐居恒州中条山。此山在山西省永济县东南,山狭而长,东是太行,西为华岳,此山居中,故名“中条”。张果得宛丘、铁拐诸仙道法,往来汾晋间,长生不老。

张果出入常乘一匹白驴,每倒骑之,日行数万里。更有趣的是,到了所在,住了脚,便把这驴似纸一般折叠起来,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噀之,便又成了真驴。

唐太宗、高宗闻其名召之,皆不去。后武则天召之,乃出山,但半道佯死也未去成。至唐玄宗时,派使臣裴晤去中条山请他。裴晤一见张果齿落发白,是个不起眼的糟老头子。有点看不起他,态度傲慢。张果老不动声色,当时来了个气绝身死。吓得裴晤赶紧焚香诵念天子求道之意。一会儿张果老渐渐醒了,裴晤不敢相逼,驰还奏之。玄宗愈加奇异,认为裴晤办事不中用,又命中书舍人徐峤带玺书迎之。



张果老见唐明皇

张果进宫,玄宗见了,也有些疑惑,问道:“先生得道者也,何故齿发衰朽如此?”张果道:“我是齿落发稀时得的道。只好这副样子,今陛下见问,不如把齿发尽去了更好。”说罢,把头上的疏发薅个净光,又将几个残缺不全的牙齿敲掉,满口血出。玄宗一见大惊:

"先生何故如此？且去歇息。"过了一会儿，张果摇摇摆摆走了出来，面貌虽是先前的，但"青鬓皓齿，愈于壮年"。玄宗大喜，留下于内殿赐酒。饮过数杯，张果辞道："老臣量浅，饮不过二升。我有一弟子可饮一斗！"玄宗令召之，张果念念有词，只见从殿檐飞下一小道士，十六七岁，长得很精神。玄宗赐他酒喝，饮到一斗，还不推辞。张果辞道："不可更赐，过度必有所失，致龙颜一笑耳。"玄宗又固赐之饮，只见酒从顶上涌出。冠子落地，化为金榼。玄宗及众妃吃了一惊，接着哄笑起来。再一看，小道士不见了，地上的金榼原来是集贤院的，此榼只能盛酒一斗。

一日玄宗出城打猎，擒得一只大鹿，要烹宰之。张果见了道："此仙鹿也，已满千岁，本是汉武帝上林之鹿，"玄宗道："如何得知？"张果说："武帝舍放时，以铜牌系于左角上。"玄宗使人验看，果有一块两寸铜牌，但上面文字已凋落，张果说此鹿已历852年，玄宗与群臣十分佩服。

当是有个邢和璞，善知人夭寿，还有个师夜光，善视鬼。玄宗叫邢和璞推算张果生死，邢和璞根本算不出，又让张果悄悄坐在屋内，命师夜光来看，师夜光根本看不见他。玄宗知其是个神人，授他"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元先生"。玄宗有个好道的女儿，叫玉真公主，玄宗有心把公主下嫁张果，结成仙姻仙眷，女儿跟他学道，可以双修成仙。

这一天张果与两个官员闲谈，突然笑着对二人道：

> 娶妇得公主，平地升公府。人以为可喜，我以为可畏！

二人听得没头没脑，不解其意。这时中官突然传旨："玉真公主欲降(下嫁)先生。"张果哈哈大笑，坚辞不受，他对当附马毫无兴趣。

当时玄宗崇信道士叶静能(一说叶法善)，此人多奇术。玄宗问："果老何人？"叶道士答曰："臣知之，然臣言罢即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方能活。"玄宗许之。叶道士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孔流血，扑倒在地。玄宗急至张果面前，免冠跣足，替叶静能求情。张果道："这小子多嘴多舌，不治治他会泄露天机"。玄宗哀恳久之，张果老以水噀其面，叶道士即时复活。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张果老见好就收，恳辞还山，玄宗诏可，并赐帛300匹，侍从二人。走到恒山薄吾县，张果忽暴卒。弟子葬之。后发棺，空棺而已，或言尸解。所谓"尸解"，是道教的说法，指遗弃肉体(尸骸)而仙去。有了这种理论，便可堂皇地把道士的死亡说成是"成仙"而去，这种说法也避免了道士吹嘘的"白日飞升"一类神话经不起考验的危险。李隆基听说张果尸解，便下令在当地建栖霞观以祀之。



综上所述，张果不过是唐玄宗时一老朽之江湖术士，识辨千年仙鹿、使叶法善七窍流血又使其复生之类，大概是他与内侍、道士们

串通起来，哄骗“圣上”的把戏，这类骗局史不绝书，并不新奇。只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圣明天子”常被蒙在鼓里。其他仙迹则是道教凭借民间传说，张大其词，为了宣传的需要加以夸饰的。有些还是将他人事迹附会在张果身上，如倒骑驴之说，本是宋代诗人潘阆的典故。

潘阆是北宋进士，为人狂放不羁，自号“逍遥子”，为标榜自己不同凡俗，常倒骑着驴满处闲逛。后受案子牵连，逃入中条山。于是这种玩世不恭的奇态，被安到了张果老的身上，并家喻户晓。至今还有两句歇后语：张果老倒骑驴——往后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张　果

后人还专门给张果老题诗一首：

举世多少人，无如这老汉；

不是倒骑驴，万事回头看。

传说宣玄宗要把玉真公主下嫁张果老时，他敲打着渔鼓简板唱道：“娶妇得公主，平地升公府。人以为可喜，我以为可畏。”唱完大笑不止，然后掏出纸驴，吹气成形，倒骑驴



背走了。此后张果老云游四方，敲打着渔鼓简板，在民间传唱道情，劝化世人。以后有人学着他的样，唱起道情来。人们便将张果老说成唱道情的祖师爷了。所谓道情，源于唐代的道曲，以道教故事为题材，宣扬出世思想。后用简板和渔鼓伴奏，故又称“渔鼓”。明清流传甚广，题材也更广泛，在各地同民间歌谣结合而发展成多种曲艺。如陕北道情、义乌道情、湖北渔鼓、山东渔鼓、四川竹琴等。

如今在民间还流传着一种用物品代替八仙人物的说法，叫做“暗八仙”，指的是葫芦、掌扇、花蓝、道情筒、莲花、指尘（或宝剑）、笛子和尺板八样东西。其中的道情筒就是暗指张果老。

何　仙　姑

广州郊区有个增城县，此地有些名气

——地以仙显，增城人引以自豪的是，他们家乡出了个家喻户晓的女神仙——何仙姑。

何仙姑的履历比较简单。



何仙姑

她的籍贯有二说，一是广州增城县人氏，一为湖南永州(零陵)人氏。《续通考》说，“何仙姑，广州增城人，何泰之女也。”增城当地的传说更为具体，说她是增城县小楼区新桂乡人，原名何秀姑，生于唐武后某年农历三月初七，中宗时八月初八升仙。父亲何泰是做豆腐的，何仙姑是位“豆腐西施”，帮助父亲卖过豆腐。今天新桂乡还有何泰的坟墓，但不知是真是假。认为何仙姑是湖南永州人的见于宋人曾慥《集仙传》、刘贡父《中山诗话》、魏泰《东轩笔录》等。

同所有神仙出生时伴有祥异一样，何仙姑的出生也不同寻常，《历代神仙通鉴》卷十四称：“何女生而紫云绕室，顶有六毫。”有人认为其“顶有六毫”令人费解，“是头发中有六根特别突出的长发呢，还是头上光秃秃的只有六根细毛？而这‘顶有六毫’又有什么值得神奇的呢？不得而知。”

何仙姑的得道经过，《续通考》云：

> (何仙姑)年十五，梦神人教食云母粉，可得轻身，因饵之，誓不嫁。往来山顶，其得如飞。每朝出，暮则持山果归遗其母。后遂辟谷，言语异常。武后遣使召至阙，中路失之。景龙中白日飞升。

《集仙传》则说她十三岁时入山采药，遇纯阳仙师，赐之一桃，道：“食此尽，他日当飞升。”自是不饥不渴，洞知人事休咎，后尸解。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则谓何仙姑放牧野中，得仙人赐枣而食之遂绝粒，能前知人事。

总之，何姑娘尚是少女时，就得吕岩等仙人赐以仙桃或仙枣，从此便能“洞知人事休咎”，“能逆知祸福”，于是“乡人神之”，为构楼以居”，“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谒之以问休咎”，这样一来“何仙姑”的名字就叫开了。此后，何仙姑即以女仙身份干起女巫职业来。

何仙姑为人占卜休咎，预测祸福，有几件突出的。宋·李昌龄《乐善录》载：

> 何仙姑在世间时，一主溥忽得天书，字不可识。以问仙姑，姑曰：“天书方：主簿受金十两，折禄五年。”

这是何仙姑做了件好事，假借天命警告受贿的贪官。宋·曾敏行《独醒杂志》亦载：

> 狄武襄征南侬出永州，以兵事问之。对曰：“公必不见贼，贼败且走。”初未之信。武襄至邕境之归仁铺，先锋与贼战，贼大败，智高遁走入大理国。其言有证类如此。阁中有遗像，尝往观之。

狄武襄即北宋名将、枢密使狄青。狄青征广源州蛮侬智高并大获全胜，历史确有其事，但是否预先请何仙姑占卜，则不得而知。但曾敏行亲眼见过“阁中有遗像”，何仙姑被十分尊贵地供奉在阁中。史称狄青熟谙兵法，用兵如神。狄元帅亲见仙姑卜问事虽不一定实有，但其虔信何仙姑却无疑，可见何仙姑在当时影响之大。

何仙姑到底是谁的弟子也有不同说法。



何仙姑



明·陈仁锡的《潜确类书》说何仙姑为吕岩所度,《东游记》第十回、第二十回则谓何仙姑为李铁拐、蓝采和二人所同度。有趣的是,广东增城有个何仙姑,而福建、浙江、安徽、湖南、广西等地也都有各自的“何仙姑”,她们的“仙迹”也有些相似,大多是吃了异道人的仙桃而成仙。在《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中载有许多。看来各地为了给梓里加些光彩,都硬认了何仙姑这位“乡亲”。但似乎各地“冒牌”的仙姑并未得到合法地位,只有广州增城的何仙姑才是“正牌”。

除增城县城内建有何仙姑庙以外,在其家乡小楼还建有一座何仙姑家庙,此庙至今尚存,大门两侧写有一副楹联:

千年履迹遗丹井,

百代衣冠拜古祠。

“履迹遗丹井”是传说何仙姑父母给她找了个婆家,并择定了良辰吉日。何仙姑不肯嫁人,便悄悄从家门口的水井里“问仙”去了。去时只穿了一只鞋,另一只绣鞋遗留在井台上。

传说阴历三月初七是何仙姑诞日,届时乡里要唱大戏,小则三五晚,多则几个月。附近数十里的人们从初六下午,就来此请“仙汤”喝。所谓“仙汤”,就是仙姑家前的“问仙井”中的井水,说是喝了可包治百病。庙中的道士感到“仙汤”味道不够,便别出心裁以井水加红枣冰糖熬煮,制造出味道甘美的“仙汤”,分发给求汤的人们。自然,“仙汤”不能白请,要献上可观的供品和钱粮。初七正日子,要用三牲致祭,还请来道士打醮、诵经,做水陆道场。村里还要唱大戏,放烟火,热闹非凡。

蓝 采 和

蓝采和的原型是个有点才气的流浪汉,他的事迹在《续仙传》、《南唐书》、《确潜类书》

等书中均有记载。据南唐·沈汾《续仙传》云：

蓝采和，不知何许人也。常衣破蓝衫，六䤩黑木腰带，阔三寸余。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则衫内加絮，冬则卧于雪中，气出如蒸。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长三尺余，带醉踏歌，老少皆随看之。机捷谐谑，人问应声答之，笑皆绝倒，似狂非狂，行则振靴。……

歌辞极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测但以钱与之，以长绳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顾。或见贫人即与之，或与酒家。周游天下。人有为儿童时至，及斑白见之，颜状如故。

后踏歌于濠梁，酒楼乘醉，有云鹤笙箫声。忽然轻举于云中，掷下靴衫腰带板拍，冉冉而去。



蓝采和

蓝采和的这套行状，颇类布袋和尚契此和济颠僧。不同的是，他还是位流行歌手，歌不离口。最有名的是那首"踏歌"：

踏歌蓝采和，
世界能几何？
红颜一春树，
流年一掷梭，
古人混混去不返，
今人纷纷来更多。
朝骑鸾凤到碧落，
暮见桑田生白波。
长景明晖在空际，
金银宫阙高嵯峨！

《东游记》第十九回《采和持板踏歌》载其歌词十二首。但上引踏歌，据宋代陆游《南唐书》和龙兖《江南野录》称，此歌为南唐隐士陈陶所作。故这首踏歌的著作权到底归谁，尚无定论。

蓝采和的姓名亦有些问题。陆游、龙兖，及元杂剧《蓝采和锁心猿意马》、明末清初的《蓝采和长安闹剧》等，皆说蓝采和原名陈陶。元杂剧《汉钟离度脱蓝采和》（简称《蓝采和》）则说蓝采和是艺名，原名许坚。他在勾栏里唱杂剧，中有"雪拥蓝关马不前"一本，年50岁做寿。因失误官身，为官府扣打四十大捧，后为钟离权所引度成仙。许坚实有其人，字介石，庐江人。《全唐诗》收有其诗。金代文学家元好问曾有诗《题蓝采和像》云："自惊白鬓似潘安，人笑蓝衫似采和。"则认为蓝采和决非姓蓝，是因其常着蓝衫，故名。

《东游记》说蓝采和"乃赤脚大仙之降生"，更属无稽之谈。清人又将其名曲解为"蓝采荷"，进而附会为一女仙，有些民间小戏中，蓝采和是一身小旦打扮，尤为可笑。

看来，蓝采和原来不过是个玩世不恭，行为怪僻，好唱好谑的行乞道士而已。

吕洞宾

吕洞宾是八仙中影响最大，传说故事最多的一位。道教全真道奉其为北五祖之一，通称"吕祖"。元代封其为纯阳孚佑帝君。吕

洞宾在八仙中虽只排在第六位，但其名气远在其他七位之上，专祀吕洞宾的吕祖庙、吕祖祠，遍布全国各地，在许多道观中亦多设吕祖殿或吕祖阁。另外七仙则无此殊荣。



吕洞宾

吕洞宾的传说既多且杂，单他的姓名与籍贯就有许多说法。

有说他姓吕名岩字洞宾，号纯阳子，唐蒲州永乐县人。有说他名吕岩，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人。有说吕岩字洞宾，一字希云，九江人。还有说他是京兆（今陕西西安一带）人。明代天启年间，民间流传《吕仙自叙传》，对吕洞宾的得名做了如下解释：

> “吕仙本唐宗室，避武后之祸，挟妻而遁，因易吕姓。以山居多岩，字洞宾。妻又死，号纯阳子。”

据《武当山志》，吕洞宾本唐宗胄父亲姓李，母姓吕，因武后歼唐子孙，乃从母姓。其实，吕洞宾本来就是个被民间神化的一个道士。所谓“吕仙自叙”为后人附会。

明人邓志谟在其所撰《吕仙飞剑记》中，对吕仙名号之来历，解释为：其诞生时乃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四月初四日巳时，因其“掌心之文，有一山三口之异，乃取名岩表字洞宾；以此生年月日时，并属其四皆是阳数，因号为纯阳子”。吕洞宾的身世也是众说纷纭。《唐诗鼓吹》注，称他于唐懿宗咸通年间及第，做过两任县令，碰上黄巢造反，全家搬到终南山，修行得道，不知去向。但更多的说法是，他幼年即通晓典故百家，可考了20多年，三举进士不第，直到46岁（一说64岁），又去赴试，在长安酒肆遇云房先生钟离权，被点化而得道。他被道教奉为尊神之后，有人便将他与唐宗室攀上了亲，并称其曾祖吕延之做过浙东康使，祖父吕渭是礼部侍郎，父亲吕让为太子右庶子和海州刺史。他的出生也很神异：《历代神仙通鉴》卷十四说，其母王夫人于贞观丙午四月十四日巳时，“天乐浮空，一白鸿似鹤，自天入怀而生”。

洞宾既长，生就一副仙貌。《列仙全传》卷六说他：

> 生而金形木质，道骨仙丰，鹤顶龟背，虎体龙腮，凤眼朝天，双眉入鬓，颈修颧露，额阔身圆，鼻梁耸直，面色白黄，左眉角一黑子，足下纹起如龟。……身长八尺二寸，喜顶华阳巾，衣黄峣衫，系大皂绦。状类张子房。

不过吕洞宾的画像和塑像并不完全如此，常为一清秀道士模样，他戴的头巾十分有名，顶有寸帛折叠，如竹简垂于后，世称“纯阳巾”，即以吕纯阳而得名。《水浒传》中的军师吴用最爱戴这种纯阳巾。

吕洞宾传说故事中最有名的有黄粱梦、云房十试吕洞宾、吕洞宾三戏白牡丹、飞剑斩黄龙等。吕洞宾的这些传说除载于宋明笔记、神仙传记以外，更主要的是通过戏剧小说，广泛流传，造成影响。吕洞宾传说从宋代开始盛行，至元明出现了大量吕仙戏，著名者有《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吕洞宾度铁拐李岳》、《吕洞宾三度城南柳》、《吕洞宾桃柳升仙

梦》、《吕洞宾花月神仙会》、《吕洞宾戏白牡丹》、《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吕洞宾九度国一禅师》等。专门敷演吕洞宾仙迹的小说也很不少，除《上洞八仙传》(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九回专叙吕洞宾事)外，尚有明·邓志谟的《吕仙飞剑记》，清·汪象旭的《吕祖全传》、《吕祖全传后卷》，清·无垢道人的《八仙得道》等。吕洞宾的传说故事大体如下：

洞宾从小饱读诗书，一肚子学问，但屡试不第。纯阳子有如此学识，为何不第？此所谓“仙文不入俗人眼，非是朱衣不点头”。64岁时，已是一老翁，又去赴试。在长安一酒肆中遇一道士，偶书三绝于壁。洞宾惊奇道士状貌奇古，诗意飘逸，因揖问姓氏。羽士道：“吾钟离权，云房其字也。君可吟一绝，予欲观子之志。”洞宾即授笔题诗一道：

生在儒家遇太平，悬缨垂带布衣轻。
谁能世上争名利，臣事玉皇归上清。



钟离子度吕洞宾

钟离子见了不胜之喜，遂与纯阳子同憩肆中。钟离子执炊煮黄粱，洞宾于店中昏睡。梦以举子赴京，状元及第，始自节署，擢台谏、翰苑、秘阁，及指挥使，无不备历。两娶富贵家女，生子婚嫁早毕，孙甥云绕，簪笏满门，又独相十年，权势显赫，荣耀无比。忽被重罪，投没家资，妻孥流于岭表。孑然一身，立风雪中，方兴长叹，忽然梦觉，炊尚未熟。云房先生笑吟道：

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

“华胥”为古代传说中的国名，《列子·黄帝》称黄帝昼寝，梦游于华胥氏之国，故后用为梦境的代称。此句见《列仙传》引《云房先生谣》。《列仙传》成书于东汉或魏晋，有些仙家事迹为后人所补，但也可见吕洞宾“黄粱一梦”的传说流传较早。“黄粱梦”最著名者，要属唐·沈既济之《枕中记》，写卢生在邯郸客店中遇道士吕翁，昼寝入梦，历尽荣华富贵。梦醒，小米饭尚未煮熟。这就是著名典故“一枕黄粱”的出处。

钟离子以黄粱梦破除了吕岩功名利禄之心，吕岩感悟慨叹，乃拜钟离为师，求度世之术。钟离骗他道：“骨节未完，志行未足，要想成仙，今世难成，要等几辈子才成。”钟离子想考验他是否真心学道，于是安排了“十试洞宾”的把戏。

洞宾一日从外归，忽见家人皆病死。洞宾毫不悲伤，买好了棺材要埋，须臾死者又都活了。他也无所谓。于是第一试通过。一天他去卖货，说好了价钱，可买主又反悔了，只给了一半价钱，洞宾并不争论，笑呵呵地同意了。这是二试。大年初一洞宾出门，遇一乞丐求施，洞宾马上拿来钱物给他，可乞丐索要没完没了，还出口伤人，洞宾倒满脸堆笑向他赔罪。此为三试。第四试：洞宾牧羊山中，遇一饿虎扑羊，洞宾以身挡之救下羊群，老虎扭头跑了。五试：洞宾山中读书，忽然来了一个漂亮姑娘，调弄百端，夜逼同寝，洞宾始终坐怀不乱。姑娘闹腾了三天，没辙走了。六试：洞宾一日从外归，家中被偷个净光。他并不气恼，乃躬耕自给。忽锄地挖出几十锭金银，洞宾赶紧用土埋上，分文不取。七试：一次洞



于是钟离又传其上真秘诀。



宾买回一堆铜器,回家一看,全是金器,马上退还给卖主。八试:有个狂道士卖药,说什么服者立死,来世可以得道。人们听了,哪个敢买?洞宾却买了服之,全然无恙。九试:河水泛滥,洞宾与众人坐在船中,忽风涛波涌,众皆危惧,独洞宾端坐不动,生死置之度外。最后一试:一日洞宾独坐室中,忽然来了无数狰狞鬼怪,有的要打他,有的要杀他,洞宾毫无所惧。又有一群夜叉押着一个血肉淋漓的死囚,前来找洞宾索命:"你前世杀了我,今世要偿我命。"吕岩道:"杀人偿命,理所当然。"于是拿刀欲自尽偿之。突然空中大喝一声,鬼怪全无,一人抚掌大笑而降,原来正是云房先生钟离权。

钟离子对吕岩的表现极为满意,道:"吾今授你黄白之术,济世利物,使三千功满,八百圆行,再来度你。"所谓黄白之术,即炼丹之法,以白汞为母,朱砂为父,黑铅为子,用一日月炉,一秀文武火,七回九转,炼得丹药而成。

后吕岩遇火龙真人,得其雌雄二剑,此剑"一断烦恼,二断色欲,三断贪嗔",真人并授其遁天剑法。洞宾携剑游于江淮,斩蛟杀虎,为民除害,并称"削平浮世不平事"。吕岩作为民间传说中的一位大仙,很有自己的个性,其一即"剑仙"形象。他弃儒学道,仗剑云游,处扶弱济贫,锄暴安良,在民间传为美谈。吕洞宾的许多传说都与剑有关,"斩蛟劈虎"、"招蛇化剑",以及"飞剑斩黄龙"等都很有名。吕洞宾的诗中也有"家居北斗星杓下,剑挂南天月角头","剑术已成君把去,有蛟龙处斩蛟龙","夜深鹤透秋空碧,万里西风一剑寒"之类的句子。

除"剑仙"形象外,吕岩的"酒仙"特征也很突出。好喝贪杯是他的一大爱好,他宣称"鹤为车驾酒为粮",他常"指洞庭为酒,渴时浩饮;君山作枕,醉后高眠",吕岩还高唱出"无名无利任优游,遇酒逢歌且唱酬","行即

高歌醉即吟”的诗句，简直是一幅“酒中仙人”的自画像。





吕岩“化水为酒”的故事流传很广，《东游记》第二十九回，说他游于岳阳之间，以卖油为名，遇一老妪买油，从不求添，并以酒谢洞宾。吕岩欲度之，见其家有井，乃以米数粒投井中，谓妪曰：“卖此可以致富。”老妪回视井中皆酒也，卖了一年，大富。一日吕岩又至其家，老妪不在，问其子卖酒如何？其子曰：“好则好矣，但苦于猪无酒糟耳。”洞宾叹道：“人心贪得无厌，已致于此。”乃取其米而行。井中又复为水矣。后来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的故事流传开后，更使纯阳子“醉”名远扬了。澧州（今湖南澧县）有一仙明洲，据说即因吕仙而得名。明·袁中道《澧游记略》说：“仙明洲一名仙眠洲。相传吕道人醉岳阳，飞渡洞庭，于此地籍草酣眠，故洲得其名。”

吕洞宾还是位“诗仙”。《全唐诗》载有其诗 249 首，词 30 首。虽有些真伪难辨，但想来成“仙”前的吕道士肯定是个诗人。

吕洞宾的诗作有一些是炼丹的歌诀和宣扬修真养性思想的，这很符合他道士的身份。有一些表现其超凡脱俗的情操 。如“物外烟霞为伴侣”，“草衣木食轻王侯”之类。还有不少诗作表现他“削除不平”的志向，充满了剑侠的豪气：“眉因拍剑留星电，衣为眠云惹碧岚”，“两轮日月凭他载，九个山河一担担”，“偶因博戏飞神剑，摧却终南第一峰”！

除“剑仙”、“醉仙”和“诗仙”雅号外，吕岩还有个不大光彩的称号：“色仙”。吕岩虽经“十试”严峻考验，而得师父钟离子所传上真秘诀，及火龙真人天遁剑法，功成圆满，已升入仙班成了神仙，但其于“酒”、“色”二事上却从不放过。这位“花神仙”在诸仙中是很突出的，就连他的师父也批评他：“饮酒恋花，二者并用，铁拐诸友笑汝为仙家酒色之徒，非虚语也。”王母娘娘过生日时，也对前来祝寿的众仙说：“这么多仙，谁来给我做寿都可以，就是

不让吕洞宾来，他贪图酒、色、财、气。”《吕纯阳祖师全传》后卷收有吕岩“市尘混迹”诸事，其中兖州妓馆、广陵妓馆、东都妓馆等，都留有纯阳子的“仙迹”。看来吕仙爱在妓中厮混，最有名的“桃色事件”当首推“吕纯阳三戏白牡丹”。

三戏白牡丹之事载于《东游记》、《吕滚飞剑记》、《醒世恒言》卷二十一等，元明杂剧也有《吕洞宾戏白牡丹》。《东游记》谓白牡丹乃洛阳第一名妓，长得国色天香，吕岩一见心神荡漾，于是化为风流秀才登门拜访，两人一拍即合，鱼水相投，各呈风流，“自夜达旦，两相采战”，吕岩本是纯阳，“连宿数晚，云雨多端，并不走泄”，白牡丹大奇之，以为遇此异人，当尽力奉承，“不怕彼不降也”。白牡丹使出浑身解数，曲尽春意，但“竟不能得其一泄”。此事被铁拐李、何仙姑与张果知晓，三人商量个坏主意，将一绝招暗中告诉白牡丹。次日牡丹与洞宾云雨，至其恣意之时，“以手指其两胁，洞宾忽然惊觉，不及提防，一泄其精”。《吕仙飞剑记》则说是黄龙禅师教给牡丹这一绝招儿。纯阳子丢了元阳至宝，吃了大亏，恼得他飞剑斩禅师，不料黄龙禅师法力极大，将其二剑收去，吕岩只得拜服。黄龙禅师将雄剑留下护法，只把雌剑还吕岩，并命他佩在背上，叫做“洞宾背剑”。

清人《八仙得道》的作者无垢道人是道教信徒，在书中力辩吕岩无三戏白牡丹事，而是“三试”白牡丹。其实，吕岩对自己的好色倒直认不讳，并有一套理论根据。在《东游记》第三十一回中他对钟离子道：“嗜欲之心，人皆有之，而遇美色，犹为难禁。弟子虽已脱胎换骨，遇此绝世佳人，不能自持，不免迷恋。”采补本为道家修养法之一，所谓“采日月之精华，夺天地之大气，心思意想，望结丹砂，以补不足之胎息”（《仙术秘库》）。后有些道士把“采补”用于男女交合之术，称“采阴补阳”，成为左道旁门。“采阴补阳”被个别道士所利用和宣传，成为旧时一些人纵欲淫乐的理想理



论。有人称此举为度人之法。白牡丹得了其精至宝，便可长生不死。后来白牡丹果然“亦仙去”。这套“度人法”，也被后世一些奸邪会道门利用，成为骗奸、淫戏妇女的拿手好戏。

吕洞宾集“剑仙”、“酒仙”、“色仙”于一身，成了一位充满人情味的大仙，受到人们的喜爱。吕纯阳不仅在道教中地位很高，被奉为纯阳祖师、吕祖，也颇得帝王们的青睐，被封为纯阳帝君；而且，他在民间影响极大，超过了另外七仙和其他仙人。吕岩曾发大誓愿：“必须度尽天下众生，方愿上升也。”这完全是一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男菩萨形象，可与佛门观世音相媲美，正如《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所言：

> 故佛道中惟观自在，仙道中惟纯阳子，神道中惟伏魔帝（关帝），此三圣愿力宏大，欲普渡三千世界，拔尽一切苦恼，以是故祥云宝马，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而关圣者，为人捍患御灾，灵迹尤著。

这也是全国各地遍布吕祖庙的重要原因。

过去有些道观借吕洞宾济度众生的誓愿,便在庙内设立灵签、药方,伪托"吕祖药方",用以哄钱。如山西晋祠中的吕祖阁内,悬药方于两壁,其灵签八筒,供于神案。凡登阁求方者,照签检取。这神案上的八个签筒,包括药方签筒六:内科一、外科一、男科一、妇科一、幼科一、目科一,还有问事签筒二。当年来此"问病求方者,终岁屦相接"。

几乎所有大城市都有宏伟的吕祖庙,但最著名者要属山西芮城之永乐宫。此宫原名"大纯阳万寿宫"。宫殿规模宏伟,布局疏朗,殿堂巍峨,气势壮观。此宫在芮城西永乐镇上,传为吕洞宾之诞生地。吕死后,乡人将其故居改为"吕公祠",后扩充为道观。至元时,道教全真派首领邱处机极受元帝宠幸,纯阳祖师吕洞宾也大走红运。此观敕令升为道宫,并开始扩建。永乐宫全部建筑及殿内壁画,前后营建了110余年,几与元朝相始终。

永乐宫元代道教壁画总面积1000平方米,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珍品,三清殿内壁画是有290多个人物的《朝元图》,纯阳殿内壁画则为吕洞宾神化故事——《纯阳帝君仙游显化图》,从其降生起到成仙度人共计52幅。其中钟离权度吕洞宾一幅,景色秀丽,画面开阔,师徒侧身对坐,钟离开怀畅饮,吕岩俯首沉思,师徒形态十分生动。该殿壁画作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至今已600余年。

或说吕岩故家岳阳,或说其得道于岳阳,故洞庭湖畔岳阳市留有不少吕仙遗迹。这里有专祀吕岩"真像"的吕公庵,有其"招蛇化剑"的折鹤池,城南度柳的"吕公洞",还有其亲题的"诗壁",亲作石刻《自纪》等。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亦与吕岩有关,主楼之右有座"三醉亭",即因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的传说故事而得名。

据《宋史·陈抟传》载,吕岩为"关西逸人,有剑术,年百余岁,步履轻捷,顷刻数百里,数来抟斋中。"看来,这位大名鼎鼎的纯阳祖师的原型,应是一位会剑术,有点法术,云游四方的老道。后人不断加以附会,为其编织了丰富多彩的众多仙话,终而成为诸仙中之卓著者。

韩 湘 子

韩湘子,本名韩湘,是唐代大文学家、刑部侍郎韩愈的侄孙。据《唐书·宰相世系表》,韩湘乃韩愈侄老成之子,为韩愈侄孙,登长庆三年(公元823年)进士,官大理丞,但史书上从未记载过韩湘任何学道成仙事。韩愈曾给侄孙韩湘写过三首诗,即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首和《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诗中亦未叙及韩湘有何道术。相反,有个叫姚合的曾有《答韩湘诗》,其中几句云:"子在名场中,屡战还屡北。""昨闻过春闱,名系吏部籍。三十登高科,前途浩难测。"清代学者



韩湘子

俞樾在《茶香室丛钞》卷十四中所言：

韩湘“固功名之士，世传为仙，非其实也”。

据说韩愈倒是有个学道的族侄。这位侄子是位少年，韩愈让他到学校里读书，但他折腾得别人无法念书，韩愈就把他送入庙中读书。没几天，寺主前来告状，说他轻狂不好好念书。韩愈十分生气，斥责他道：“市井小民都要有一技之长来谋生，你为此胡闹，将来能干什么？”其侄道：“我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父想要此花开成青、紫、黄、赤，凭您吩咐。”于是他用物遮起牡丹丛，不让人窥视，七日后，这株紫牡丹开成了白红绿三色牡丹，最奇的是花朵上有紫色字迹，成一联诗：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韩愈大为惊异，其侄辞归江淮，竟不愿仕。

韩愈的这位好道、会点魔术的侄子，自然不是侄孙韩湘，不过这位侄子似乎也并非子虚乌有。韩愈曾写过一首《徐州赠族侄》诗：“击门者谁子？问言乃吾宗。自云有奇术，探妙知天工。”大概就是写给这位使牡丹变颜色的侄子的。但后人把这位族侄事安在了侄孙韩湘身上，并尊之为“韩湘子”。

在宋·刘斧的《青琐高议前集》卷九中，韩湘子的“奇术”比《酉阳杂俎》更进了一步。韩愈勉之学，湘乃笑而作诗言志，诗曰：“青山云水窟，此地是吾家。……一壶藏造化，三尺斩妖邪。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有人能学我，同共看仙葩。”“逡巡酒”是指逡巡间便可酿成美酒，“顷刻花”指一眨眼便可开花。韩愈不大相信：“你能有此造化之功吗？”韩湘遂撮土盖上一盆，一会儿说：“花已开矣。”拿开盆只见碧花两朵，叶间有小金字，乃诗一联：“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见了不解其意。

后来韩愈上表谏阻佞佛的唐宪宗迎“佛



骨”进京，宪宗大怒，将他贬到荒远的潮州去做刺史。途中有一人冒雪而来。原来正是韩湘，对韩愈道：“您还记得当年花上的句子吗？说的就是今日事也。”韩愈一打听这里地名，正叫“蓝关”，于是嗟叹再三，方信湘之不诬也。韩愈对韩湘道：“我为你凑成一首完整诗吧。”遂赋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俗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异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此即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写得很不错。显然，韩湘子的诗谶和雪拥蓝关的故事是根据韩愈的诗而编演出来的。元人据此编写了《韩湘子引渡升仙会》、《韩退之雪拥蓝关记》等杂剧。

明末杨尔曾撰有《韩湘子全传》，凡三十回，20万言。书叙汉丞相安抚之女灵灵有才貌，汉帝欲将其赐婚皇侄，安抚坚辞不允。汉



帝大怒，将其罢职发配。灵灵郁郁而死，投生为白鹤。白鹤受钟离权、吕岩点化，投生为昌黎县韩会之子，乳名湘子，幼丧父母，由叔父韩愈抚养。湘子长大，又得钟、吕二仙传授修行之术。韩愈怒斥之，因遁至终南山修道，得成正果，为八仙之一。

韩湘子屡次化形，度其叔，但韩愈始终不悟。韩愈官至礼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被贬至潮阳，路经蓝关，雪拥不前，湘子出而点化，护送至任。潮阳有鳄鱼为患，韩愈作《祭鳄鱼文》驱之，湘子施法相助，鳄鱼遁去。唐宪宗闻之，了解韩愈之冤，欲召回复职。韩愈伪死不赴，遂入卓韦山学道。后成正果。

韩愈谏迎佛骨，被贬潮阳，雪拥蓝关，驱鳄鱼文等史实有证。其余则为宗教宣传。

除戏剧小说外，弹词《韩祖成仙传》，道情《九度文公》，以及宝卷《蓝关宝卷》等。皆曾流传一时。

曹 国 舅

曹国舅是八仙中出现最晚的一人，材料也最少，颇有凑数之嫌。



曹国舅

曹国舅的身世有三种说法。

一说其系宋仁宗曹皇后的长弟，名景休。据《历代神仙史》卷四《宋仙列传》云：

> （景休）天资纯善，不喜富贵，酷慕清虚。……国舅有弟骄纵不法，后罔逃国宪。国舅深以为耻，遂隐迹山岩，精思元理，野服葛巾，经旬不食。一日遇钟离、纯阳二祖，问曰：“闻子修养，所养何物？”对曰：“养道。”曰：“道何在？”曹举手指天。曰：“天何在？”曹引手指心。二祖笑谓曰：“心即天，天即道。子亲见本来面目矣。”遂授以还真秘术，引入仙班，有仙传、文集传于世。

《神仙通鉴》说的更具体些。曹景休弟名景植，恃势妄为，曾不法杀人，包拯案之，

伏罪。景林深以为耻，遂隐迹山间，矢志修道。

但上引曹景休之事根本靠不住，因为历史上并无曹景休其人。《东游记·国舅学道登仙》所叙，与以上略同，但称其名为曹友。曹友也是虚拟人物。

一说曹国舅系宋仁宗朝之大国舅，名讳不详。据明无名氏所撰《龙图神断公案》卷七《狮儿巷》：曹国舅乃宋仁宗之大国舅。时有广东潮阳县秀才袁文正，携妻张氏往京城赴试。二国舅贪恋张氏姿色，邀袁生夫妇入府，绞死袁生，逼迫张氏。张氏不从，监幽深房。

袁生魂诉包公，包公准究。时大国舅虑此事被包公严办，乃告知二国舅，务将张氏置于死地，以绝后患。于是二国舅投张氏于井。张氏逃逸，太白金星化作老人引之出。张氏途遇大国舅，误以为包公，投呈诉冤。大国舅接呈大惊，罪以冲道，令铁鞭击之。疑张死，弃尸僻巷。

张氏醒后，往诉包公。包公问清真情，诈病，赚大国舅来府问疾。包公令张氏出诉，遂将大国舅长枷监禁。又作假书骗二国舅来府，令张氏面诉冤情，又将二国舅枷入牢中。曹皇后暨仁宗亲来劝释，包公不从，令将二国舅押赴法场处决。仁宗颁诏大赦天下罪犯。包公领诏，令开大国舅长枷。

大国舅获释，自谓死中复生，遂入山修行，得遇真人点化，引入仙班。

与此题材相同的，还有传奇《袁文正还魂记》、《雪香园》，词话《断曹国舅公案传》等。这一传说故事，倒较符合一般皇亲国戚的本来面目，二国舅是个地地道道的花花公子、混世魔王，大国舅也是个邪恶之徒。就是这么个可恶的家伙，只要能改过迁善，竟也能加入八仙之列，始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不谬。

一说曹国舅即宋朝的曹佾。历史上确有其人，为宋初名将、鲁国公曹彬之孙，其姐即宋仁宗赵祯的皇后。曹皇后是历史上能干的皇后之一，史称其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中种谷亲蚕。还能写一手好字，善飞白书。一次宫内突发兵变，曹后当机立断，组织近侍相拒，布置井井有条，迅速平定叛乱，救了仁宗。可谓智勇双全，不愧将门之女。神宗即位，成为太皇太后，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成为保守派的后台。



曹国舅

其弟国舅曹佾，字公伯。性情和易，通音律，善于弈射，喜作诗，多才多艺。靠着曹后的权势，做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高官，后封济阳郡王。曹佾是个很会明哲保身的人物，在当时政治动荡的时代，他却安然无恙，一帆风顺。曹佾的诀窍是一出朝门，从来不谈国事。神宗曾对大臣们说："曹王虽用近亲贵，而端拱寡过，真纯臣也！"这位"纯臣"靠着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逍哉悠哉地活了 72 岁，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岁数，曹佾可谓福、

禄、寿三全了。但其并无任何成仙事。正如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四中所言：

曹国舅，相传为曹太后之弟。按《宋史》慈圣光献太后(即曹太后)弟曹佾，年七十二而卒未尝有成仙之事。此外又别无国戚而学仙者，则亦传闻之妄也。



曹国舅是如何进入八仙之列的确有些莫名其妙。在后来的八仙形象中，曹国舅不是葛巾野服，一身隐士打扮，而是身着红官袍，头戴纱帽，脸上涂着豆腐块，一副小丑县官模样。八仙故事普及以后，民间的庙会扮了他们来娱神，贵人们的筵宴上扮了他们来祝寿，八仙的形象服饰也就与戏剧上挂上了钩，戏曲中生旦净末丑的行当也挪到了八仙身上。这样扮起来让人觉得五花八门，热闹非凡。高跷会上，如只有才子佳人、绿林好汉，使人总会感到缺点什么，于是在其中必得夹上一个花花公子的小丑，跳来跳去，做出种种滑稽表演，显得气氛十分活跃。所以有人指出，或许八仙中的曹国舅就是承担这种使命而登场的。

黄 大 仙

我国东南一带过去普遍敬祀一位区域性显神，这就是赤松黄大仙。旧时，黄大仙庙遍布东南广大地区，并流入东南亚地区乃至美国。如今大陆上的黄大仙信仰虽已衰微，但香港的黄大仙却更加走运，极受崇拜，是当地第一大神。去黄大仙庙观光，不需向人打听，只查一下九龙黄大仙区即可。政区竟以大仙命名，可见其名气之大！

有黄大仙区，必有黄大仙站，乘汽车或地铁在黄大仙站下车，只需十来分钟，就可到黄大仙庙。庙前有一大石门坊，石坊正中题有四个大字：金华分迹。金华即浙江金华县，金华是黄大仙的“仙乡”，金华的赤松观，则是黄大仙的“祖庙”。“金华分迹”，意谓此地的黄大仙庙是金华祖庙派生出来的“分庙”。此庙是典型道观，石门坊两边分别醒目地题有“丹炼”、“回春”等字，使人联想起道教的绝招儿——烧丹炼汞、长生不老。庙门横匾上写着“赤松黄仙祠”，庙内主殿金瓦红柱，彩饰辉煌。殿内供黄大仙像。

这位大仙何许人也？对其来历有一些不同说法。比较一致的说法，黄大仙是晋代道士黄初平。黄初平是浙江金华人，他“叱石成羊”的法术，十分有名。据《金华府志》卷二十二《仙释》载：

晋，皇(黄)初平，兰溪人。牧羊遇道士，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兄初起寻之四十余年，一日逢道士，引入山相见。问羊安在？初平曰：“在山之江。”初起视之，但见白石。初平叱之，石皆成羊。初起遂绝粒，服松柏、茯苓，亦得仙。后还乡，其族尽亡，乃复去。初平别号赤松子云。

《历代神仙通鉴》卷六亦载黄初平、黄初

起兄弟得道成仙事，只是把时间提前了六七百年，说他俩是东周时晋国人。事迹则与上引相同。并说“（黄）初平归淮阴黄石山，改名黄石公”。《神仙通鉴》把黄大仙附会为黄石公，并未造成多大影响。



黄大仙叱石成羊

黄石公是个历史传说人物，后被道教尊为神仙。又叫圯上老人，一天他见张良游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北），故落履于圯（桥）下，令张良取履，伸足令穿之。张良皆如命，老人谓“孺子可教也”。于是授张良《太公兵法》。说13年后，见我于济北谷城下，黄石即我。张良熟读兵法，助刘邦夺得天下。13年后果于谷城山下见黄石，取而宝祠之。此事载于《史记·留侯世家》”

黄初平因别号赤松子，故有些黄大仙庙称“赤松黄大仙祠”。黄初平入金华山石室中修行得道，其兄黄初起从弟修道，亦得仙。故有人认为黄大仙是指黄初平弟兄二人。金华北山早于晋代即建有最早的黄大仙祠——赤松观。当初这座道观十分宏伟：“宫殿，亭宇，廊庑，碑碣，诰敕，御墨及名公巨卿题跋，为江南道观之冠”（《金华县志》），时过境迁，号称江南道观之冠的赤松观早已荡然无存，成为历史遗迹。

因黄大仙又号赤松子，故有人认为其即神农时的赤松子。其实，神农时的赤松子是传说中的仙人，是主行霖雨的雨师，与黄大仙是两码事。还有一种说法，黄大仙是广东东莞人，是东晋著名道士葛洪的得道弟子黄野人。但黄野人的“仙迹”要比黄初平逊色多了。

黄大仙信仰之盛，如今首推港澳。香港黄大仙祠终日香火缭绕，进香朝拜求签者有如潮涌，热闹非凡。进香者所求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求福、求子、求财、求工作、求良缘，乃至求医问药，无所不有。有趣的是，庙前街巷也成为极富特色的迷信闹市。这里一是卖风车的多。这种风车与大陆春节所卖风车不同，除纸做风轮以外，上面还有神像、关刀、八卦、小旗等道教饰物，俗称“转运风车”。说是持此风车进庙求神，即能走运，使厄运转为福运。所以进香者无不破费，买一风车，欣然入庙。风车摊主生财有道，财源茂盛，他们确是靠此时来运转。成本微薄，盈利颇丰，风车摊贩竟有数百上千，一路排来花花绿绿，煞是热闹。另一多是相摊多，算卦的相士靠着黄大仙的“灵应”也占光不少，而且多以黄大仙的徒子徒孙自诩，在卦摊上持起“黄半仙”“黄也仙”、“黄小仙”、“松仙馆”之类的大字招牌。

刘 海 蟾

在民间诸神中，刘海的知名度颇高。“刘海戏金蟾”的故事流传很广，地方戏曲如湖南花鼓戏中即有《刘海戏蟾》、《刘海砍樵》剧目，民间年画中以此为题材的吉祥画，更是比比

皆是。



刘海蟾

刘海在历史上实有其人。是五代宋初时道士。本名刘操，字昭远，又字宗成。又叫刘哲，字元英。燕山（今北京）人。曾为辽朝进士。后事燕主刘宗光为丞相。平昔“好谈性命，钦崇黄老”。一天，有个道士自称正阳子来见，刘操待以宾礼，道士为其演“清静无为之宗，金液还丹之要”。后索鸡蛋十枚，金钱十文，以一钱间隔一蛋高高叠起，若浮图伏（即叠成塔状）。刘操惊叫起来：“太危险了！”道士对他说：“居荣禄，履忧患，丞相之危更甚于此！”刘操顿时恍然大悟。这个正阳子据说就是钟离权，特意前来点化他的。

后梁太祖朱温于开平三年（公元 909 年）封刘守光为燕王。过了两年，即乾化元年（公元 911 年），刘守光僭称燕帝。刘操谏之不听，遂托疾挂印而去，并改名刘玄英，道号“海蟾子”。遍游访道，后遇吕纯阳传授秘法，乃修真得成仙道，遁迹于终南山、太华山之间。道教全真道奉其为北五祖之一。全真道为金代道士王重阳所创，为标榜其道统源远流长，故又尊王玄甫（东华帝君）、钟离权、吕岩（吕洞宾）、刘操（刘海蟾）四人为祖师，合称“北五祖”。元时，世祖忽必烈封刘海蟾为“明悟弘道真君”，至元武宗时，又加封为“明悟弘道纯佑帝君。

刘海蟾曾作长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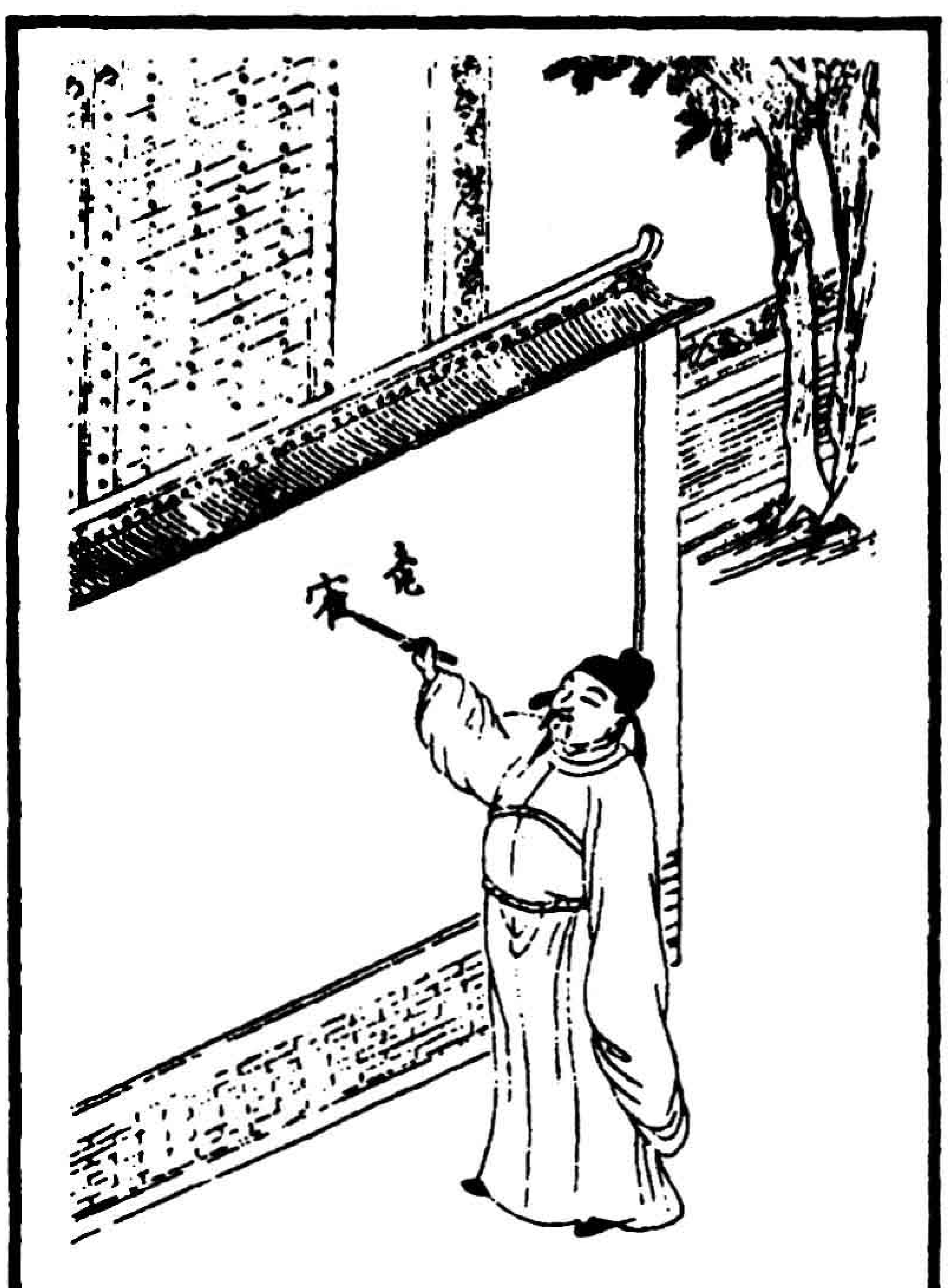
醉骑白驴来，倒提铜尾柄。
引个碧眼奴，担着独胡瘿。
自志尘世事，家住葛洪井。
不读黄庭经，岂烧龙虎鼎。
独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请。
俗携霹雳琴，去上昆仑顶。
吴牛买十角，溪田耕半顷。
种黍酿白醪，便是神仙境。
醉卧古松阴，亲立白云岭。
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

追求的完全是一种悠闲恬淡、无忧无虑、自得其乐的生活。

刘海出家后，改名玄英，道号海蟾子。人多呼其刘海蟾，这个名字就越来越响亮，他的本名刘操（或刘哲）倒渐渐无人知晓了。后来又将刘海蟾拆开，称其名为刘海，剩下的“蟾”字，为“蟾蜍”之“蟾”，渐而又讹为“刘海戏蟾”了。正如清人瞿灏《通俗编》卷一中所说：“刘元英（刘操）号海蟾子。……海蟾二字号，今俗呼刘海，更言刘海戏蟾，舛谬之甚。”刘海戏金蟾的说法广泛流传，清时更有人编出刘海显化人间戏金蟾的“仙迹”。

清人孟籁甫在《丰暇笔谈》中说，苏州有个商人贝宏文，世居阊门外南濠，行善乐施。康熙年间，有个不相识的男子自称阿保，找上门来要当佣人。贝宏文答应了。阿保干活很卖力气，给他工钱，坚辞不受，有时一连几天不吃饭也不饿，贝家很惊异。他刷洗尿壶时，竟能翻其里洗刷，刷完再翻过来。陶瓷东西在他手里，像羊肚似的柔软。贝家更惊奇了。





元宵节时，阿保抱着小主人去看灯，半夜未归，家里人十分着急。直到三鼓始归，主人责怪他，阿保说："这儿的灯不热闹，我带小主人去了一趟福建省城，那里的灯才漂亮呐！主人何必着急呢？"贝家人哪里肯信？不料，小主人从怀中掏出一把鲜荔枝，让父母尝尝。大家才知道阿保是个仙人。

又过数月，阿保"汲井得三足大蟾蜍，以彩绳数尺系之，负诸肩上，喜跃告人曰：'此物逃去，期年不能得，今寻得之矣。'于是，乡里传述，以为刘海蟾在贝家，争往看之，至拥挤不得行。"此时，人们只见"负蟾者举手谢主人，从庭中冉冉乘空而去"。

刘海所戏金蟾为三条腿的蟾蜍，被认为是灵物。俗话说："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故三条腿蛤蟆被看成难得的稀罕之物。

清初，刘海戏蟾的吉祥画已十分流行。褚人获在《坚瓠五集》中说："今画蓬头跣足嘻笑之人，持三足蟾弄之，曰此刘海戏蟾图也。直到刘海为名，举世无知其名者。"

其实，刘海戏蟾图明代已有。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云：

> 黄越石携来四仙古像，……一为海蟾子哆口逢发，一蟾玉色者戏踞其顶。手执一桃，连花叶，鲜活如生。

有意思的是，刘海16岁登第，50岁至相位，出家后应为一白发老人，而且相貌清癯，不修边幅。但在民间版画中，刘海被彻底地返老还童了，他成了个丰满可爱的胖小子模样，并且成双成对，穿红披绿，笑逐颜开，两手各提一串金钱，画面再配以三足金蟾、喜蛛、荷花、梅花，象征着欢天喜地、生活富裕。

民间还流传着"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俗语，故又有"刘海戏金钱"的说法。宋代柳永词《巫山一段云》有句云："贪看海蟾狂戏，不道九关齐闭。"即指刘海戏金钱之戏。此说源于前边提到的正阳子"以一钱间一卵高叠"成浮图之状的故事。于是，刘海又被视



刘海戏金蟾

为钓钱撒财之神，过年时人们常张贴此类画，以取吉利。在传统年画《福字图》中，刘海戏金蟾与和合二仙、天官、财神、麒麟送子、状元及第等合绘在一起，充满了吉祥、喜庆的气氛，很受人们欢迎。

因传说刘海曾从钟离权、吕洞宾学道成仙，故有把其列为八仙之一的，但后世流行的八仙中没有刘海。

麻　　姑

希望长寿，长命百岁，乃至长生不老，是人们最大的欲望之一。于是，斋醮祈祷，吃砂服丹，参星拜斗，辟谷导引，各种求长生的方法，五花八门，应运而生。同时，人们造出了几位长寿的偶像。除了传说中的彭祖以外，还有家喻户晓、专管长寿的南极仙翁（寿星），另外民间还有一位漂亮的女寿星——麻姑。

麻姑神像、“麻姑献寿”，是民俗年画中重要的题材之一。但麻姑的来历，却众说纷纭。

晋代的葛洪在《神仙传》里说，有个东海人叫王远，字方平，举孝廉后当上了中散大



夫。他精通“天文图谶河洛之要”，以后弃官入山修道，成了著名仙人。他有个妹妹叫麻姑，是个漂亮姑娘，年岁看似十八九，“顶上作髻，余发散垂至腰”。穿着文彩绣衣，光耀夺目，世间没有。不过，手长得不太漂亮，“手爪似鸟”。王远有个徒弟叫蔡经，虽学道十余年，但凡心未死，一见麻姑的尖手，心里忽发奇想：我脊背大痒时，要是叫麻姑挠痒痒，太妙了。不料，这个念头马上让王远和麻姑二位仙人知道，他挨了一顿鞭责。不过这倒成了后代文人常用的典故。如唐·杜牧的《读韩杜集》有句曰：“杜诗韩笔悉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

麻姑的本事并无惊人之处，只是《闻奇录》称其“生时有道术，能屐行水上”，就是能穿着木屐在水面上行走。还有就是掷米成丹砂。

《太平清话》说麻姑姓黎，字琼仙，是“唐放出宫人也”。《列仙全传》说她是宋代政和年间人，修道于牟州东南姑余山，被册封为真人。相传麻姑修道是在江西南城县城西的麻姑山。道教宣称神仙所住的名山仙境有十大





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等。麻姑山即为三十六洞天之第二十八洞天，全称叫“麻姑山丹霞宛陵洞天”。此洞府又为七十二福地之第十福地。晋朝的大道士葛洪就曾在此炼丹。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曾撰写了《麻姑仙坛记》碑，至今犹存。文中详述麻姑仙话和麻姑山风景名胜，此碑帖素有“天下第二书”之誉，成为书法楷模。因记中有“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之语，故颜真卿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化石地质意义之人。麻姑山共有三十六峰，十三甘泉，五大潭洞，山多怪石，风景奇丽。

麻姑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是北朝十六国后赵时麻秋之女。麻秋是历史上有名的残暴将军。当过后赵暴君石虎的征东将军。当时民间夜晚如有小儿啼哭，母亲就拿这个恶魔来吓唬孩子：“麻胡(指麻秋，他是胡人)来了！”这一招儿很灵，“啼声遂绝”。麻秋曾驱赶民夫服役，“筑城严酷，昼夜不止，惟至鸡鸣少息”。麻姑十分同情这些民夫，常常学鸡叫，她一叫，群鸡全叫，能早点收工。后来让麻胡知道了，要找女儿算帐，麻姑赶紧逃走，“入仙姑洞学道”，后于城北石桥“飞升”，百姓们叫此桥为“望仙桥”。外，在“鬼城”丰都，有“仙姑岩”、“麻姑洞”，传说是麻姑住过和修炼的地方。

以上诸说，以葛洪《神仙传》最早，流行也较广。

至于麻姑何以成为女寿仙，一是麻姑曾自云：“已见东海三为桑田”，说她已看见东海三次变为陆地。这就是“沧海桑田”这一典故的由来。沧海变成一次桑田，时间不知千万万年，她已见过三次沧桑的变化，该有多大岁数？虽说她长得像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可实际年龄是无法计算的。麻姑长寿当之无愧。二是传说三月初三王母娘娘诞辰时，开设蟠桃会，上中下八洞神仙齐至祝寿。百花、牡丹、芍药、海棠四位仙子采花，特邀麻姑同往。麻姑乃在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献于王母，欢宴歌舞。这就是麻姑献寿的来历。于

是麻姑成为民间流行的女寿仙。

麻姑形象多为一美丽仙女模样，或腾云，伴以飞鹤；或骑鹿，伴以青松；也有直身托盘作贡献状。手中或盘中，一般为仙桃、美酒、佛手等。麻姑像的传世之作不少，其中以清代任熊的《麻姑献寿图》和《麻姑掷米图》最为著名。赠送麻姑像，是用于妇女作寿。男人作寿，则送南极仙翁像。

妈 祖

天妃（又称天后）实有其人，她原名叫林默。祖籍福建莆田湄州屿，是个海岛。林默的生卒年，据一些史书的记载，也很不相同。她的生年竟有六种说法，卒年也有四种。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卒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只活了27岁，所谓“室居未三十而卒。”



天妃林默的祖辈可追溯到唐代。唐宪宗时，莆田有个林牧，有九个儿子，据说都做了刺使，人称“九牧林氏”（刺使又称“州牧”）。林默是林牧的十世孙女。林默的父亲林愿，做过兵马使（也有说做都巡检），林默在家最小，是个“老闺女”。为什么叫“默”呢？据说，她出生后一个多月，从来没有啼哭过，因此父亲给她取名“林默”。《莆田县志》说，林默出生时“地变紫，有祥光异香”。《三教搜神大全》说，林默母“尝梦南海观音与以优钵花，吞之，已而孕，十四月始免娩身，得妃（林默）”，“诞之日，异香闻里许，经旬不散”。总之，林默的出生伴随着无比的吉祥。

大概林默天生是个当“神”的材料。刚刚1周岁，尚在襁褓中，见诸神像，即“手作欲拜状”。5岁能诵《观音经》，11岁“能婆娑按节乐神”。小林默似乎与神佛有不解之缘。林默长大后，即“通悟秘法，预知休咎；乡民以病告，辄愈”。一次，林愿与四子分乘五船去福州办事。林默与母亲呆在家中。夜晚林默忽然手脚乱动。母亲赶忙推醒她，问女儿是否做了恶梦。林默睁开眼睛道：“不好，爸爸他们的船遇上了风暴。”母亲大惊失色。林默埋怨母亲道：“我两手各拉一条船，两脚又挂上了两只，嘴里还叼着一只，本来没事了，可您一喊，我嘴一张，叼着的那只船给刮跑了。”说完哭了起来：“我大哥性命难保了。”

几天后，父兄弟们回来，哭诉海上遭遇风暴事，大哥的船已沉没海中；并说风作之时，见一女子牵五条桅索而行，渡波涛若平地。全家这才明白，林默当时瞑目而睡，“乃出元神救弟兄也”。此事越传越神，林默名声大震。

林姑娘长大后，誓不嫁人，经常乘船渡海，云游岛屿间。凭着她一身好水性和一颗菩萨心，在海上多次救护遇难渔民和商人，被人们呼为神女、龙女。她的海上救难行善事迹，在蒲田地区广泛流传。

在一千年前的一个暴雨天林默奋不顾身，在海上抢救遇险船民，因风浪太大，林默不幸被台风卷去。人们不愿承认林默遇难而死，认为她已“升化”——变成了女神。有人

编造说，林默升化时，闻空中乐声，氤氲有绛云若乘，自天而下，神（林默）乘之上升。后来还有人见她"常衣朱衣，飞翻海上"。于是莆田百姓修了个祠堂，纪念神女林默。

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给事中路允迪奉旨出使高丽。他率领八艘大船航行在渤海之上，忽遇大风暴，一下刮沉了七艘。路允迪惊恐万分，赶坚闭目祷告："神女下凡，保我平安！神女下凡，保我平安！"说也怪，路允迪忽然觉得船一下平稳了，他睁眼一看，果然有位穿红衣的神女站在船樯上。靠了神女的保佑，路允迪独船驶向高丽，完成了出使任务。徽宗听说此事，亲赐林默祠一块题为"顺济"的匾额。

以后，神女的"灵应"越来越多。宋绍兴年间，江口海寇猖獗，神女"驾风一扫而去"，后屡有助剿海寇事。淳熙年间，"岁屡旱灾，随祷（神）随应"。神女不但保佑商船渔民，助剿海寇，还有捍御水旱疫疠之灾等"法力"。因此，神女的影响越来越广，香火由最初的莆田地区，逐渐扩展到从南到北，沿海一带的极广大区域。

神女的"灵迹"也得到从宋至清历代帝王的褒奖。帝王们在七八百年间对其册封多达40次，封号累计竟有五六十字：如辅国护圣、护国庇民、灵惠助顺、妙灵昭应、宏仁普济、昭灵显佑、广济明著等。林默的地位，由最初的林姑娘而为夫人、为妃、为天妃、圣妃，直高升至天后！祭礼也由民间祭祀而逐渐升为朝廷派大臣祀祭，并载入国家祀典。

应该指出的是，天妃的显赫，与古代航海事业的发达，有极大关系。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属沿海城市。南方各沿海城镇经常通过海运，把粮食和物资运往临安。元朝南粮北运，史称"漕运"，多走海路。古语道："天下至计，莫于食；天下至险，莫于海。"在当时条件下，海运非常危险，"天有不测风云"，安全没有保障。船工葬身鱼腹，十分普遍，正如《直沽谣》所唱："北风吹儿堕黑水，始知渤溟皆墓田"！朝廷为了安定民心，百姓们也要找到一位海上保护神，于是，天妃娘娘成为最佳人选。这样，与漕运、通商和渔业有关的许多沿海城镇如直沽（天津）、扬州、南京、平江、周泾、泉州、福州、兴化等，都纷纷修建了天妃宫。

明代航海事业极为发达，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是举世闻名的壮举。郑和多次宣称在海上屡得"天妃神显灵应，默伽佑相"。因此，永乐帝命令在湄洲、长乐、太仓、南京以及京师北京建天妃庙宇。永乐帝还亲自写了《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宫碑》碑文，盛赞天妃"功德"。

以后随着海外发展的繁荣，天妃也漂洋过海，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安下了家，受到人们的供奉。

有意思的是，天妃这位海神娘娘后来又多了个帮助妇女生儿育女、保护孩童的"功能"。天妃也成为众多子孙娘娘中重要的一员。



如天津小直沽天妃宫，是天津16座天妃宫中年代最久、规模最大的一座。一般称作西庙，俗称"娘娘宫"。娘娘宫大殿正中供奉着天后圣母。天后塑像方面大脸，头戴凤冠，

身穿黄袍，十分富态。天后左右侍立着众多娘娘，其中有眼光娘娘——治眼病，耳光娘娘——治耳病，斑疹娘娘——治疹子，千子娘娘、百子娘娘、子孙娘娘——送子，还有乳母娘娘等。后面则是泰山娘娘(碧霞元君)，前面还有四位宫女侍从。再前边是手持令旗的报事灵童和挑水哥哥，他们是报告疫情和挑水浇“花”的——浇灭“天花痘”。旧时妇女不懂科学，迷信神鬼。结婚后，先是盼望着早点生儿育女，有了儿女以后又怕染上各种疾病，尤其最怕出天花。天花流行起来不得了，要死好多孩子。可有了天妃为首的诸位送子护子的娘娘们以后，妇女们则有了主心骨，有了靠山，常来这里给娘娘们烧香上供，祈求祷告。

在九龙，有一座名叫“大庙”的天后宫十分有名。与其他天后庙不同的是，庙内设有天后娘娘的寝室，室内设有龙床，每逢农历三月二十三神诞日，婚后尚未生育的信女们，常来这里拜娘娘。求子心切的女士们只要肯掏腰包，给庙内一些“好处费”，就获准去摸摸龙床，然后会得到一声祝福：“早生贵子！”

元明时代，每逢粮船安全抵达港口城镇，人们就要到天妃宫答谢神灵，迎神赛会。这种酬神活动逐渐衍变成庙会，这就是有名的“娘娘会”。天后宫每年正月、三月、五月有庙会，八月、九月还有宗教活动，各地大同小异。

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天妃的生日，这天要举行隆重的道场活动，人们也来此进香求佑。清代又增加了“出会”活动，即在天妃诞辰之前，将天后、眼光、子孙、斑疹、送生等五位娘娘的神像，用木辇抬着沿街游行，接受人们的香火，所谓“出巡散福”是也。一路上还要表演各种民间技艺：如法鼓会、大乐会、中幡会、高跷会、五虎杠箱会、拾不闲会、庆寿八仙会等。届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如庆寿八仙会、除八仙外，还有个老寿星。唱完祝词后，老寿星把手捧的大寿桃盒，猛然打开，顿时群鸟飞出，煞是好看，名曰“百鸟朝凤”，引得人们齐声喝彩。这一天，有许多人从百里之遥坐着香船前来赶会，船头上还要挂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天后宫进香”五个大字。

在天津，天妃沿街出巡散福以后，还要送到她的娘家——闽粤会馆天后殿里住上两天(后来改送如意庵)，然后再“接驾回宫”。可笑的是，光绪二十年(1894)，人们高高兴兴地把天后送到了如意庵。不料庵内人多拥挤，不小心香火烧着了幔帐，引起大火。纷乱中，有人竟将天后的头窃走——过去传闻天后娘娘的头中藏有许多珠宝。县官知道后慌了神，急派捕快追缉，并重金悬赏，但毫无下落。最后只好给娘娘又配了个楠木头。

有一年，乾隆皇帝路过天津，正赶上天后娘娘过生日。乾隆看了表演，大加褒扬，特“恩赐”管事人几件黄马褂，又赏了几面会旗。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恩宠，此后，娘娘会就改称“皇会”了。清代诗人崔旭曾写过一首《咏皇会》诗，描写了当时迎神走会的盛况：

逐队幢幢百戏催，笙歌铙鼓响春雷；
盈街填巷人如堵，万盏明灯看驾来。

迎神会一直办到民国时候，最后一次是在民国25年(1936年)。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此后，人们再也没有心思办“皇会”了。

我国澳门有句俗话：“先有妈阁，后有澳门。”这“妈阁”就是妈祖庙，即天妃庙。

妈祖庙始建于明代成化年间，距今已五百余年，当时澳门地区不过是个荒凉的海湾。妈祖庙位于澳门半岛的西南端，背山面海，依山而筑。建庙之初，形制十分简朴。

有趣的是，这座古庙与澳门的外文名称有直接关系。葡萄牙殖民者于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借口曝晒水渍货物，强行上岸租占。葡人初登澳门，不知这里地名(当时叫“蚝镜”或“壕境”)，但知道这座妈阁庙，遂以庙名称呼该地为“妈阁”、“妈港”。英文写作MACAO。MACAO即为“妈阁”的音译。

澳门之名，起于其地有“亚妈”一神祠，盖

以神祠之名名其地者也。有"亚妈海门"之意,此祠迄今犹存。

日人藤田丰八著《葡萄牙侵占澳门考》亦称:

> 西方之 MACAO,因其地有天后宫,即亚妈宫,故名。

我国学者陈沂著《澳门》亦如是说:

> 葡人初入中国,寄碇澳口,是处有大庙宇,名曰妈阁,葡人误会此庙为地名,故以初到所见者以名其地。

葡文的澳门名称,与英文稍异作 MACAU,此为简称。全称的意思为"妈港神圣之市",也与妈阁庙有关。一说澳门西方最早的名称为"Amacao,是"阿妈澳"的音译。"阿妈"与前文提到的"亚妈",皆是"娘妈"意,即"妈祖"、"天后",也是由妈祖阁来的。

香港的得名有多种说法。其中一说,是源于"红香炉"。传说很久以前从海上飘来一个红香炉,泊于这里的天后庙前。百姓们认为是天后显灵,便将红香炉供奉起来。岛上有个山也叫做"红香炉山"。以后就把这里叫做"红香炉港",简称"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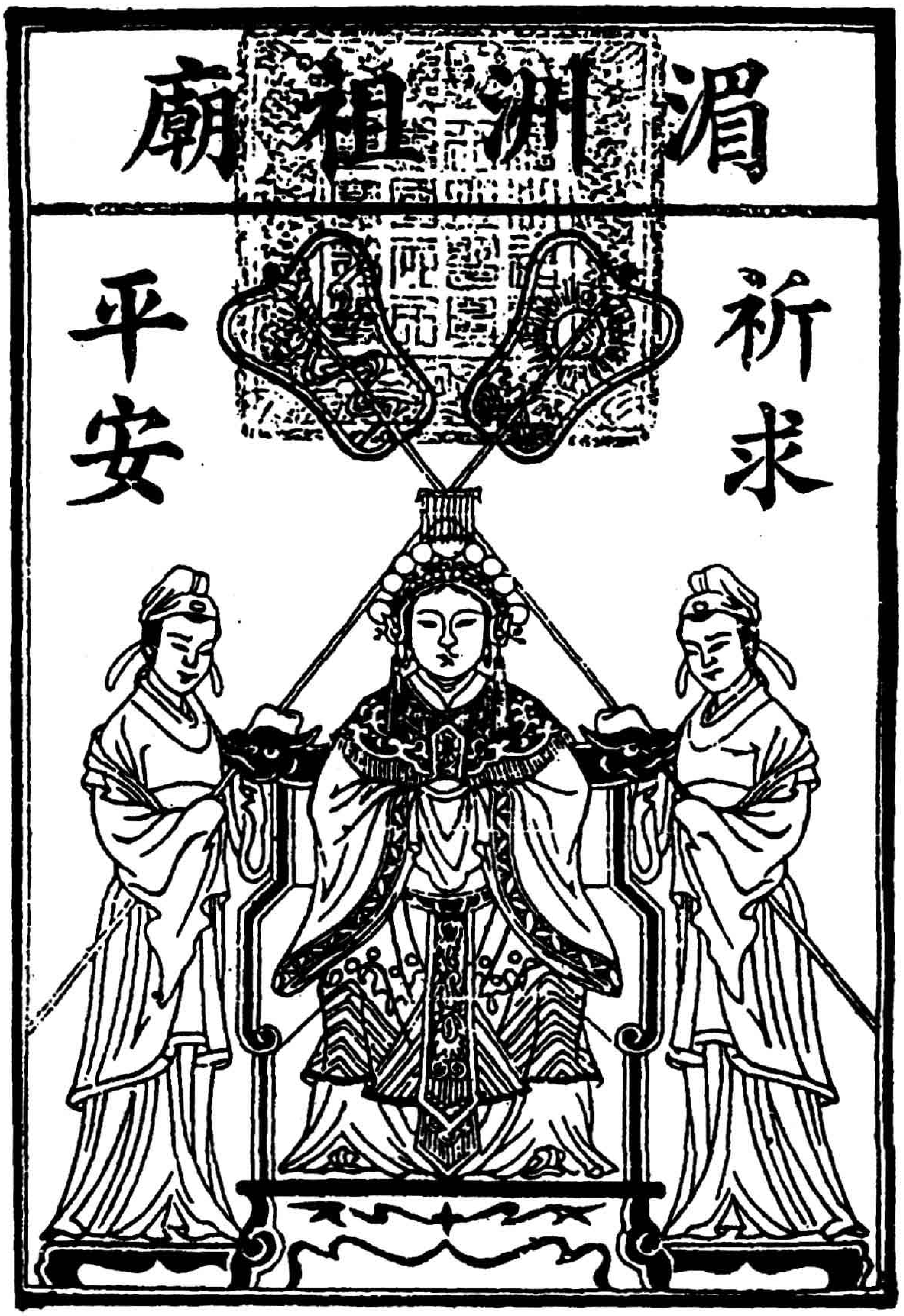
香港是个宗教信仰自由泛滥的地方,世界各教"荟萃一堂"。不过,庙宇也有个三六九等。若论起庙宇之多,分布之广,香客之众,场面之盛,恐怕当推天妃庙为首。被香港同胞称作"娘妈的女神",深得人们爱戴。这也难怪,可不,香港自古就是我国的渔港,渔民们成年累月在惊涛骇浪中生活、挣命,除了迷信神灵,寻找精神支柱,别无他法。于是香港数百个岛屿,差不多有人烟的地方,都建造了大大小小的天后庙。香港最古老的天后庙,要数九龙佛堂门的天后宫了。

据考证,此庙建于北宋。当时福建的航商林长胜,带领全家迁居九龙彭蒲围(今大勘村附近)。途中遇到风暴,他的两个孙子在佛堂门附近不幸舟覆。两人落水后,紧抱天后神位不放,后来漂浮到东龙岛登陆。林家认为这是天后保佑,方得以生还,遂出资在佛堂门修建天妃大庙,以酬报"神恩"。数百年间,此庙一直由林氏后人管理,直至本世纪 30 年代方移交当地政府。

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许多福建人漂洋过海到台湾定居。天妃也被请到了台湾。台湾人民还流传着这种说法:林姑娘在宋太宗雍熙年间"升化"那一年(987 年),从福建渡海来到了台湾。于是台湾各地纷纷建立起天后宫——在当地称朝天宫或妈祖庙。林默最初被称作"通贤灵女",后又被尊为"天圣母",俗称"妈祖"。"妈祖"是福建方言,意思跟北方的"奶奶"差不多。妈祖庙亦即奶奶庙、娘娘庙。

妈祖在台湾极受崇拜,《陔余丛考》说,"台湾往来,神迹尤著。土人呼神为妈祖。倘遇风浪危急,呼妈祖,则神披发而来,其效立应;若呼天妃,则神必冠帔而至,恐稽时刻。"由于妈祖"神迹尤著",台湾的妈祖庙、天妃宫竟多达五六百座!而且至今兴盛不衰。如北港镇的朝天宫,香火极盛,每年前来烧香保平安的达 100 万人以上!

不仅在台湾,而且在东南亚各地湾埠,甚至日本、欧美一些地区,如美国檀香山、法国巴黎等地,只要是海上能通航的华人聚居地,几乎都建有不同风格的天后宫。如日本一些港口城市的庙宇中,即有妈祖堂。清朝时期,中国船员们一到长崎等地,便把船上的小妈祖像奉安于某一庙内。出发时再"请"回到船上。人们把奉安妈祖像于寺中的仪式称为"奉天妃"。只长崎一市,奉安妈祖像的寺庙即有三座,日人称之为"唐三寺"。在长崎锻冶屋町的崇福寺妈祖堂内,至今尚有奉安妈祖像的棚,称为"天妃棚"。到了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日,各地侨胞往往组织进香团,欢聚一堂,张灯结彩,舞龙耍狮,踩跷演戏,热闹非凡,以此来纪念先贤,团结同乡,联络感情,代代相传。"妈祖"成为中华民族向海外发展的一种象征。外国人则把妈祖称为"中国的女海神"。妈祖信仰实际上早已冲破了国界,被誉为国际性的航海女神。



张　天　师

张道陵（公元 34 年——156 年）一名张陵，东汉人。他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实际创立者。张道陵没被神化前的经历并不奇特。他是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曾入太学，通达五经。汉明帝时，当过巴郡江州（今四川重庆）令。后听说蜀地人纯厚，易教化，且多名山，便入鹤鸣山（今西川大邑境内）修道。著道书 24 篇，自称“太清玄元”，创立早期道教，凡入道者要交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教人悔过奉道，用符水咒法治病。为病人请祷之法为：

> 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

百姓对其视如神明，竞共事之。拜他为师的成千累万。张道陵遂建二十四治（道教



组织)，立祭酒(头目)以领道民。魏晋以后，道徒尊张道陵为“天师”，五斗米道也被称为“天师道”，成为道教正宗。天师的名位，也由其后人世代承袭，历代嗣位天师的，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全国道教领袖。金元以降，北方出现了道教另一大派全真道，天师道改称“正一道”，盛行于南方。

张道陵既为道教祖师爷，逐渐被神化，而由人成神。一些道书便编撰了不少张天师的仙话。《汉天师家传》、《历代神仙通鉴》、《列仙全传》等书中说，张道陵乃汉初留侯张良的九世孙，母亲夜梦神人自北斗魁星降临，以蘅微香草送她，说道：“我奉上帝命降到你家。”遂感而孕，后生了张道陵。张道陵 7 岁时遇仙人河上公，给他一部《道德经》，张道陵读后即通晓其义。长大后，相貌很是不凡，身长九尺二寸，庞眉广额，朱顶绿睛，目有三角。精通五经、天文地理、河图洛书谶纬之学的奥秘，成为一代大儒。皇帝召其进京为官，坚辞不去。入蜀，隐居于鹤鸣山，与弟子炼龙虎大丹。第一年红光照室，第二年有青龙白虎绕护丹鼎，第三年龙虎丹成。当时张道陵已 60 开外，吃了丹后如 30 来岁青壮年，行走如奔马。后太上老君送他经书、符箓秘诀一千余卷，雌雄剑两把，都功印一颗，并冠衣、方裙、朱履，命其翦除八部鬼神、六天魔王。



天师奉老君诰命，布 3 万 6 千龙虎神兵，一场恶战，终于灭了众鬼魔，元始天尊封其为“正一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天师。”凡升天者，都要先参拜这位三天大法师，然后才能去灵霄宝殿朝拜玉皇大帝。

由于张天师被赋予了降妖伏魔、驱凶避邪的功能，所以民间将其作为一种镇宅保护神。过去流行一种“天师镇宅”的年画很受世俗欢迎。

因正一道信奉《正一经》，崇拜鬼神，画符念咒，祈福禳灾，驱鬼除妖，故旧时民间有“请张天师驱邪捉鬼”之俗。

张天师虽是道教的实际创始人，但道教却抬出老子(太上老君)作为教祖，以后又发展到三清(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在神仙世界里还出现了以玉皇大

帝为首的各路高级神明，这样一来，张天师在道教诸神中的地位日渐低落，在《西游记》中他只不过是护卫灵霄宝殿的张、葛、许、丘四天师之一。



张天师在民间的影响不小，在各地众多道观中也有不少香火，他的祖庭在江西贵溪县龙虎山上清宫。据传此处最初为张道陵炼丹修道之草堂。张道陵入蜀创立早期道教，百年后他的第四代孙张盛张天师（张道陵后代世世有一子承袭“天师”名号，一律统称张天师）于晋初将传道中心迁还龙虎山，并在张道陵所筑元坛旧址建传箓坛。

经历代经营，龙虎山建成了拥有十大道宫、81座道观、36座道院，号称“仙都灵会”的庞大道教胜地。世称道教第32福地。传箓坛也成为历代张天师传经布道的场所——上清宫。上清宫是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古老道宫之一。在建筑布局上，以三清殿、玉皇殿为中心，分八门四方，为周天、八卦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之象征。上清宫具有独特的建筑布局和古典艺术风格，在道教建筑中名气很大。

上清宫下二里的天师府（全称“嗣汉天师府”）为历代张天师的起居之所。历代帝王推崇其道，官其子孙，修建府第。天师府多达500余间，楼房殿阁，龙柱金壁，宏大瑰丽，形似皇宫。其中天师住房和养生殿，面积900多平方米，设有头门、二门、三门、仪门、前厅、正厅、大庭院、三省堂等。

三茅真君

过去有不少三茅真君庙，多在南方。庙中供祀的是三位茅姓神仙，即茅盈、茅固和茅衷三兄弟，其中以老大茅盈最为知名。三茅真君庙的祖庭，在江苏茅山。



茅山在江苏句容县境内，是我国道教名山，被誉为道教第一福地、第八洞天。两千年

前的西汉初年，咸阳（今属陕西）出了个高人叫茅盈，据说他出生时，红霞蔽天，三日不散，因此得名。茅盈饱学不仕，酷爱采药炼丹，修真养性。18岁时入北岳恒山修炼，悟道三十载，后来到江东句曲山（今江苏茅山）华阳洞隐居。修道同时常常采药为百姓疗治沉疴顽症，药到病除。

31年后，49岁的茅盈兴冲冲地回到家乡，老爷子一见，勃然大怒："你这个不孝的孽子，不侍奉双亲，一跑就是30年，还回来干嘛！"说着举起拐杖要打。茅盈赶紧跪在地上劝阻道："请父亲息怒，孩儿如今已有了道行，千万打不得。"老父哪里肯信，举杖便打，谁知拐杖还没有碰到儿子身体便折成数段，如飞石强矢，竟把墙壁穿成一些大窟窿。父亲大惊，不由得消了气。又问儿子："你说得了道，能让死人复活吗？"茅盈说："有罪而死的不可让他复生，暴病夭亡的另当别论。"正巧村里有个才死了几天的少年，茅盈还真让他起死回生了。这一下轰动了乡里，夭亡者的家人都请茅盈施术还生，茅盈果然道行不浅，真个是救死扶伤，药到病除。人们对他佩服得不得了。人人称他"茅神仙"。

茅盈的两个弟弟也很出息，茅固做了武威太守，茅衷做了西河太守。他们出巡时，随从仪仗前呼后拥，十分威风，茅盈见了觉得好笑，就对两个弟弟说："明年四月初三我要上天去做神仙，希望你们这两位官老爷去送送我。"据说到了那一天，有一群仙官和金童玉女从天而降，把茅盈迎上彩车，簇拥着升空而去。

两个弟弟见了，无比羡慕，也想作神仙，便辞官而去。最终寻到了哥哥，茅盈向他们传道，两人也羽化成仙。哥儿仨住进了江苏句曲山。

茅家兄弟常常不辞劳苦到深山采集药材，然后制成丸散膏丹济世救人。不管是酷暑风雨，还是冰雪严寒，他们随请随到，而且不取分文。修道讲究自己延年益寿，追求个



人的实惠，像茅家三兄弟的所作所为，意在他人，可钦可佩。

茅盈三兄弟仙逝后，百姓们为感谢他们生前的恩德，建庙供祀这三位善人，并把句曲山改为"茅山"，以为永久纪念。后人称茅盈哥儿三人分别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道经谓太上老君封三茅分别为司命真君、定箓真君和保生真君，合称"三茅真君"。他们也成为道教茅山派的祖师爷。茅山派主修《上清经》，以符咒劾召鬼神，兼修辟谷道引炼丹术。后世有一些著名道士都是此派门徒。茅山与龙虎山、阁皂山同为道教三大符箓派，元朝时归入了正一道。

茅山的主要宫观有崇禧、元符、九霄等三宫及乾元、玉晨五观，宫内主殿供奉三茅真君圣像。三位真君并肩而坐，和颜悦色，一派平和祥瑞。



许 真 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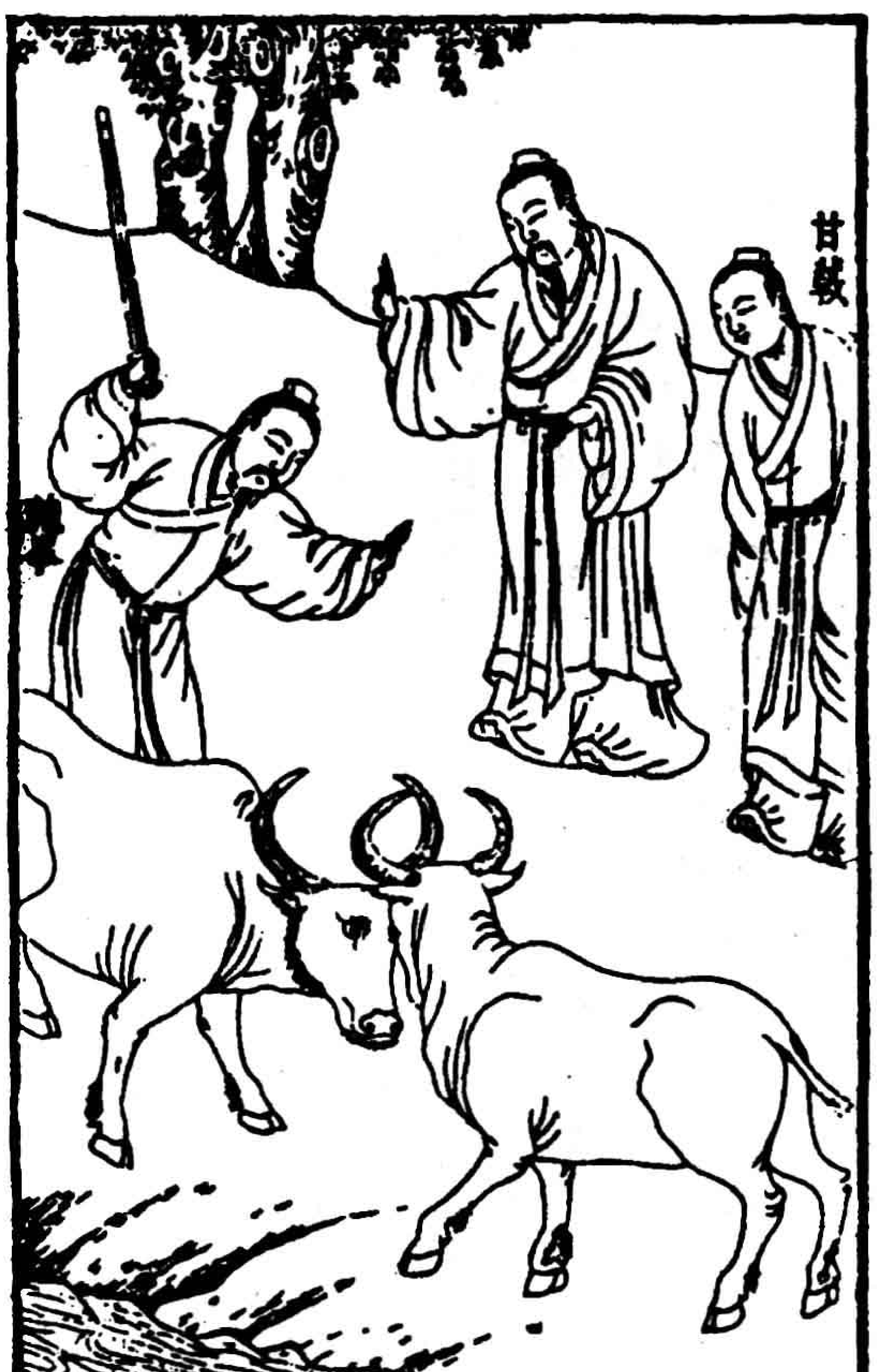
在《西游记》中，描绘了一个极其庞大纷繁、五花八门的神佛魔怪世界。诸神怪大多是在民间广有影响的。其中护卫玉帝灵霄宝殿的是道教著名的四天师，即张、葛、许、丘四大天师。“张”，是张道陵；“葛”，是葛洪；“许”，是许逊许旌阳；“丘”，是丘处机。这四位都是实有其人，而且皆是中国古代极有名气的道士。

许逊（239 年——374 年）是东晋著名道士，活了 135 岁。不要说当时，即使 1600 年后的今天，这也是了不起的岁数。许逊，字敬之，当南（今属河南）人。后迁到南昌。

许逊喜欢打猎，一天他进山射鹿，射中了一只母鹿，母鹿腹中胎堕地，母鹿伤心地舐其子，不久即死去。许逊见了很难过，怆然感悟，折弓弃矢，此后不再打猎，专心读书。他博通经史，明天文、地理、五行、谶纬之书，尤

好神仙修炼之术。听说吴猛有道术，便去投拜，学得了三清秘法。

晋太康元年(280年)，许逊举孝廉当上了旌阳县(今四川德阳县，一说湖北枝江县)县令，故世称许旌阳。许逊为官清廉，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传说当地有一年闹饥荒，百姓无力纳租，许逊便以灵丹点瓦砾成金，叫人埋于县衙后菜园，然后派交不出租的百姓来干活，百姓锄地得金，用以纳租。又一年瘟疫流行，许逊“以所得神方拯救之，符咒所及，发时而愈”邻县疾民相继而至，每日数以千计，许逊遂立竹江中，倒入符水，使疾民竹下饮之，皆愈。许逊看到晋室将乱，于是弃官而走，与名士吴猛到各处游历。蜀民感其德化，所到尽立许逊生祠，家供其像。



晋明帝太守二年(公元324年)，镇东大将军王敦造反，许逊与吴猛去见他，打算劝他不要轻举妄动。王敦见了他两人，道：“我做了一个梦，用一根大木捅破了天，这是不是预兆我可以称帝啦?”许逊说：“这可不是好梦”。王敦说：“我想听听是怎么回事?”吴猛答道：“‘木’上破‘天’，是个‘未’字。将军未可妄动。”王敦听后大怒，想加罪于二人，许逊与吴猛便用隐身术逃走了。后来，王敦果然举兵造反，但未成功，死于军中。

许逊最突出的业绩是除蛟斩蛇，为民除害。当时南方许多地方，江河为患，人们认为是水中蛟魅为害。蛟，又叫蛟龙，古代传说中的动物，民间传说认为它能吃人，并能发洪水。其实是鳄鱼一类的动物。晋代周处除三害，其中之一即为蛟。李冰、赵昱等人都是古代传说中除蛟的好汉。

据明·徐道《历代神仙通鉴》卷十一、卷十二谓，当时豫章(江西南昌)一带常发生大水灾，是因一条孽龙兴风作浪造成的。于是许逊便带弟子甘戟、施岑来到豫章，这一天，他们在城里遇到一位衣冠楚楚的美少年，礼貌勤恪，应对敏捷，他走后，许逊对弟子说：“这家伙就是那条孽龙变成的，故意来试探，非剪除不可。”老龙知自己已被识破，便躲到郡城江边，化作一只黄牛躲在沙滩上。许逊追踪而来，剪纸变化成一只黑牛与黄牛搏斗，并让施岑持剑助黑牛一战。二牛斗酣之时，施岑一剑击中黄牛左股，黄牛复伤而逃，又化为人形。许逊等穷追不舍，终至将其除掉。

水患是古代一大自然灾害，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人们企盼着能有翦灭水妖，消除水患的英雄或神仙出现，许逊生前大约做过一些“周行江湖，殄灭毒害”的善事，所以有关他除蛟的传说流传很多。

许逊斩蛟后，为彻底消除其害，遂在南昌南井镇铸铁为柱，下施八索，勾锁铁穴，镇住蛟龙。并祝告曰：“铁柱若歪，其蛟再兴，吾当复出。铁柱若正，其妖永除。”后人在此建祠，又叫铁柱宫。

许逊最后的绝活儿是全家举宅飞升。道

教传说，许旌阳 135 岁时，他带领“仙眷四十二口，同时向日拔宅升天，鸡犬亦随”。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有个仆人叫许大，与妻子去买米没有在家，闻许逊等飞升，即赶车奔来。赶到时，许逊等已升到半空，许大哀泣求从行，许逊告之缘份不到，授他地仙之术。(《列仙全传》卷四)看来，许逊家的鸡犬比许大还有福气，宋代封其为“神功妙济真君”，世称许真君。

许逊飞升后，相传其历代屡显神通，最著名的是明朝正德年间。许真君 135 岁升仙之时预言道：“吾去后一千一百四十五年间，豫章之境当出地仙八百余人，大阐吾教。”这一年是东晋宁康二年（公元 374 年），到明正德十四（公元 1519 年）即 1145 年后，这里的宁珠宸濠造反，他亲去玉隆宫卜问，许真君降箕笔云：

三三两两两三三，杀尽江南一檐耽；
荷叶败时黄菊绽，大明依旧镇江山。

后来宁王果然兵败被杀，“诸灵验不可尽述”。

许真君的祖庭为江西南昌西山玉隆万寿宫。初为“许仙祠”，南北朝时改祠为“游帷观”，宋代升观为宫，扩建为 6 大殿、5 阁、12 小殿、7 楼、3 廊 7 门庞大宫观，宋徽宗曾亲书“玉隆万寿宫”匾额。后屡毁屡建，今存山门、前三殿、中三殿、后三殿、文昌宫、逍遥津、戏台等。宫内尚留有三棵参天晋柏，其中正殿前右侧一株，传为许逊手植。宫内建筑金碧辉煌，气势宏伟。万寿宫的主殿为高明殿，殿名因传说许逊升天后被玉帝封为“高明大使”而得名。殿内阔五间，深三间，四周围廊，重檐彩壁，覆盖黄绿相间的琉璃彩瓦，入口处建有牌坊式门楼，宽敞崇宏，十分壮观。殿内大柱红漆描金龙，中央为一座大神龛，龛内供许真君像，抱笏端坐，头后有八卦头光。左右金童玉女侍立，前又有一小像抱笏而坐，白脸黑髯，也是许真君像。龛外左右有两个高大立像，是著名道士吴猛、郭璞像。东西两壁有十二真人坐像。除供奉许真君神像外，还有关帝、周仓、关平等神像。宫内还有珍贵壁画，描绘了许真君自四川返回江西途中为民兴利除害的种种传说故事。

在南昌还有一处著名的万寿宫，坐落在翠花街西、棋盘街东。宫左有井，与江水相消长，中有铁柱，即所谓许逊所铸镇伏蛟螭之害的“镇龙柱”。此宫又名“铁柱观”、“妙济万寿宫”。殿宇建筑也很宏伟壮丽。

葛 仙 翁

葛洪（公元 284 年——364 年），字稚川，江苏句容人，生于江南士臣豪族家庭。葛洪年轻时以儒学名噪一时，兼具文才武略。20 岁时在吴兴太守顾秘的部下作将兵都尉，因作战有功，被封为伏波将军。葛洪志向不在高官厚禄，专好神仙导养之法，尤其喜好研究



道教经典。葛洪的伯祖父，是三国时的“仙公”葛玄。葛玄是三国著名道士和炼丹左慈的门徒。左慈道术奇绝，曾把曹操戏弄了一番。葛玄的道行也很高超，据说有一天他和几位好友吃饭，客人们让他露一手，葛玄就咳嗽一声，口里的米饭立刻变成了几百只蜜蜂，飞集在客人身上，葛玄又一张嘴，蜜蜂便全部飞回口中，变回了饭粒。葛玄也是个炼丹专家，他在荆门军紫盖山炼丹时，天寒地冻，光赤着双脚。两个屈姓农家姑娘见了，顿生恻隐之心，就做了一双鞋送给他。等她们送去时，葛仙公已飘然离去，丹炉的底部还是热的。姐俩拨开灰烬得到一粒仙丹，各自分吃了半粒，从此不饥不渴，精神旺盛。

葛洪出身炼丹世家，他为了学得祖上炼丹秘术，特意拜葛玄的高足郑隐为师，得其真传。后来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鲍靓精于道术，会占卜。他见葛洪是个人才，将来必成大器，便把自己的绝招倾囊相授，还把女儿鲍姑许配给他，鲍姑成了丈夫的得力助手。

葛洪四十几岁时，辞了官职，别了家小，带着一名老仆周游江南。他在临安(今杭州)看到宝石山以西山岭，风景奇丽，盛产红色碧石，是潜居静息和炼丹的绝好地方，便在此结庐修炼，静心参道。人们便以名其姓称此山为“葛岭”。葛洪在葛岭一边修道炼丹，一边采药为百姓治病，他还开避山路，以利行人通行。这一切给当地人民带来不少好处，人们称其为“葛仙翁”。以后百姓修了葛仙祠来供祀他，后来扩建为抱朴道院。

葛洪晚年听说交趾出丹砂，便来到广州，滞留在罗浮山中。罗浮山被誉为道教第七洞天和第三十一福地。葛洪在此炼丹采药，著书立说，开创了岭南道教圣地。葛仙翁在此活到81岁仙逝，后人在他结庐炼丹处修建了著名的冲虚古观。观中有葛洪炼丹取水用的“长生井”。据现代科学化验，井水中有14种益于人体的微量元素。过去传说饮用此水，可保长生，所以曾经“一斗米换一斗水”。罗浮山冲虚观内供有葛洪及其夫人鲍仙姑的塑像。

葛洪在中国道教史上最大的功绩是炼丹术上的成果，他35岁时完成的著作《抱朴子》(七十卷)奠定了他在道教史上的地位。

此书是葛洪的代表作，以其号“抱朴子”命名。“抱朴”意为持守本真，不为外物所诱惑。《老子》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是说人们应外表单纯，内心淳朴，去掉私心，清心寡欲。葛洪的一生就是这样做的，其号“抱朴子”(抱朴之士)当之无愧。

《抱朴子》分为两部分，《内篇》二十卷，讲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避祸的仙道学说。《内篇》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们的理论，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又继承了东汉魏伯阳的炼丹理论，集魏晋炼丹术之大成，所举仙经神符，多至282种。在其神仙学理论中蕴含着道教哲学思想。《外篇》五十卷，论述人世得失、世事臧否的经国治世之术。外篇阐发其社会政治思想，反映了葛洪内道而外儒的主张，他把神仙道教与封建纲常紧密地结合起来。



大小鼎炉图图说

葛洪宣扬神仙是存在的，凡人可通过修炼而成为神仙，可以长生不老。最重要的途径是服食金丹。他在《抱朴子·金丹》中说：

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神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销，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

但服食金丹并不像葛洪所说的那样，“能令人不老不死”，倒有不少嗜服金丹者提前结束了生命，中毒而死。烧炼金丹常用的砷、汞、铅及其化合物大多是有毒的，因此必然发生慢性中毒和急性中毒猝死（信徒们美其名曰“白日飞升”）现象。不过，少量服食金丹对一些人来说也可能有些效验。丹砂等药物本身具有一定的健脑、安神、强身等药理作用；服用一些矿物药可补充人体矿物质的缺乏，一些微量元素进入人体后也会获得健身祛病的奇效；服用少量砷剂和汞剂后可引起毛细血管舒张，从而起到刺激神经的作用。但这些效验因人而异，而且是有限的。

葛洪从小体弱多病，体质很差，为此他青年时曾习武强身，他的一身武艺后来在与农民军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抱朴子·外篇·自叙》）。为了强身，也与他后来学医学道直接相关。葛洪最终以 81 岁高龄辞世，他的长寿主要并非大吃“仙丹”（金丹），而是得益于他清心寡欲的处世哲学，他高深的中医学识、内丹气功修炼及房中养生。

葛洪对人世的功名富贵看得很淡，他 40 岁时参加镇压流民起义的战争，以战功升至伏波将军，后还被晋元帝赐爵关中侯，但葛洪不想当官，激流勇退，离仕归隐。他认为：“祸莫大于无足，福无厚乎知止。”（《抱朴子·外篇·知止》）“乐天知命，何忧何虑，安时处顺，何怨何忧。”（《抱朴子·外篇·名实》）他还以道教神仙的观点论说神仙与荣华富贵的格格不入：“仙人殊趣异路，以富贵为不幸，以荣华为秽污，以厚玩为尘壤，以声誉为朝露。”葛洪贫而乐道，怡然自得，有着愉快健康的心绪，这是他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葛洪对内丹气功也很有研究，无疑，这对他的长寿也有重要作用。这位抱朴子还讲究房中养生。他曾写过《玉房秘术》一卷、《葛氏房中秘术》一卷，可惜已失传。但在《抱朴子·内篇·遐览》中收载了不少房中术著作，如《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等。葛洪认为正常的性生活是必要的，否则“幽闭怨旷”，性欲得不到满足，会“多病不寿”，但他反对放纵情欲，肆意淫乐会“损年命”，只有和谐的性生活才能“令人老有美色”，安享天年。（《微旨篇》、《释滞篇》）

葛洪去世后，渐被仙话，在《西游记》中他成为玉皇大帝驾前四大天师之一，在民间流传着葛仙翁施法除妖的一些故事（见郑土有、陈晓勤编《中国仙话》），甚至有些地区把葛洪当成地方主要神祇来敬奉。

浙东的镇海、鄞县、奉化、象山及舟山群岛一带，自唐代以来，民间一直信仰葛仙翁，说他能驱魔、禳邪、医病、祛灾。葛洪像塑在宁波市镇海郧隘乡的灵峰山巅灵峰寺仙翁殿中，仙像着道袍，白袜黑履，捋袖握笔，肃穆端坐。像旁有一石井名“丹井”。

世传葛洪为采药、炼丹，遍游四方，路经于此。当时乡间瘟疫流行，葛洪遂在此结茅而居，广为群众治病，十分灵验，人称“葛仙翁灵丹妙药”。这里的香期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初十，进香者达数十万之众，当地流行着“上靠葛仙翁，下靠娘娘宫”的俗语，可见其影响之大。

二 徐真君

北京旧皇城以西有一条街叫“灵境胡同”。这是一条以庙得名的街道，当初这里有座著名道观“灵境宫”，原名为“洪恩灵济宫”。

灵济宫建于明朝永乐年间，570 余年前，这座永乐皇帝敕建的道观，“雄伟轩敞，不下宫掖”，列为“京师九庙”之一。此庙为官方所

祭，据《明史·礼志》载，逢正旦、冬至、圣节等日，朝廷要派礼部高级官员致祭。

灵济宫所祀神明为二徐真君，即徐知证、徐知谔兄弟。“二徐”实有其人，他俩是五代时南唐的两位藩王。他们成“神”经过十分简单。据《明大政纂要》卷十五载：

> 初，其父（徐）温事吴杨行密。及温没，养子徐知诰代杨氏有国，封知证为江王，知谔为饶王。尝帅兵入闽靖群盗，闽人德之，为立生祠于闽县之鳌峰，累著灵应。宋高宗敕赐额“灵济宫”。

徐温生有六子，但其养子徐知诰（后自称李唐后代改名李昪，史称烈祖）建立南唐时，只有徐知证、知谔哥儿俩活着。知证是第五子，封江王，卒年 43。知谔第六子，封饶王，35 而卒。历史上的二徐并无所谓“尝帅兵入闽靖群盗”之功德。《蟫窠别志》对此考证翔实，认为当时“前后遣将攻闽者具载于史，未尝有知证、知谔领兵之事，则所云屯兵金鳌峰下者，妄也。”结论是：二徐非但未尝有功于闽，反而人品低劣，尤其徐知谔更是个“好珍异物，所蓄不可计”，穷极享乐一生的“狎昵小人”。徐知谔常对人讲：“人生七十为大限，吾生长王家，穷极欢乐，一日可敌世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这位醉生梦死的花花太岁，一天要当两天享受，吃、喝、淫、乐，样样加倍，还能活得长？最终果如其言，35 而亡，但这位加倍享乐的藩王，认为等于活了 70 岁。他是心满意足，寿终正寝的。

再者，二徐亦无任何信奉道教之举，既无师承，又无弟子，与道教全不相干。正如明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卷四中所言“二王皆不至闽及燕，亦不闻雅言道术”，只是“其殁也，则为神明”。看来，二徐之成为道教神明，全在于人为“制造”。周在浚《南唐书注》卷八记有后人编造的二人成神的神话：

> 二人（指二徐）尝平闽，闽人爱戴，相率建生祠山北，图像奉人。一日谓众曰：不忍汝违，来岁当别。及期相继化去。未几，神降于人，言并奉上帝列职斗官，以佑下土。于是闽人立灵济庙祀人。

二位当时的神称是“九天金阙大仙真人”和“九天玉阙上仙真人”。二徐后来虽受过宋高宗的重视，但他的大走宏运，还是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对二徐可谓推崇备至，先是封二徐为金阙真人，后升格为真君，二徐的父母也封为真君、仙妃。然后，下令将闽地灵济宫拓址重建，还将二徐神像从万里之遥的福州闽县请到京城，并为其大造宫观。二徐一跃而为官方礼祀之高级神仙。任何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的，朱棣竭力抬举、神化二徐，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朱棣是个“篡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不久，这位太祖第四子即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变，经过四年战争（1399——1403年），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了帝位，是为成祖。朱棣雄武大略，颇具权术，为保住帝位和巩固统治，可谓不择手段。在武力镇压反对派的同时，朱棣强化思想统治，利用宗教即为其一。

朱棣迁都北京后，即将众多神魔仙佛亦“请”至北京，在京城大建寺观。著名者有灵济宫、真武庙（显佑宫）、灵官庙（显灵宫）、关帝庙、正觉寺（五塔寺）等，并重修了天宁寺、都城隍庙，甚至在宫内专建钦安殿，奉祀真武大帝。朱棣在“圣谕”中，连篇累牍宣称自己“靖难”继统，得到佛祖、道神等“神明相协”、“翊卫辅助”，为自己称帝正名，大造“君权神授”舆论。有时，宗教的欺哄与迷惑作用，是任何武力或法律所远远不及的。推崇二徐不过是朱棣大量宗教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朱棣宣称“常梦二神人言南处海滨，来辅家国”，“上（指成祖）异之。明日适有礼官言闽中灵济二真君事，正符所梦，遂专使函香迎请神像至北京，而于宫城之西南作洪恩灵济宫以奉祀事”。

永乐帝崇尚二徐，还有一重要原因，即迷信灵济宫的“仙丹”。朱棣在《御制洪恩灵济

宫碑文》中自称：

> 朕躬弗豫，用药百计。罔底于效。神（指二徐）默运精灵，翊卫朕躬，顷刻弗违，屡显明徽。施以灵符，天医妙药，使殆而复安，仆而复起，有回生之功，恩惠博矣、盛矣。

明人黄瑜的《双槐岁钞》对此亦有详载：

> 入国朝，灵应尤著。有道士曾辰孙者，扶鸾则二神（二徐）降之。文皇帝（即朱棣）遣人祷祠辄应。间有疾问神，神降鸾书药味，如其法服之，每奏奇效。辰孙大被宠赉。

朱棣宣扬二徐翊卫国家，保佑“朕躬”，即把自己打扮成得神明辅佐之“真龙天子”也。

至于朱棣所吹嘘的二徐真君“神降”灵丹妙药，其“奇效”到底如何呢？对此，《明史·方伎传》中亦有载：

> 庙祝诡为仙方以进，药性多热，服之则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袁）忠彻一日入侍，进谏曰：“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帝怒曰：“仙药不服，服凡药耶？”

袁忠彻是当时名气极大的术士，颇被宠信，但朱棣对其劝告根本听不进去，迷信仙丹已至顽固不化程度。所谓“仙丹”多朱砂、汞化物等，朱棣大吃这些“化合物”，似与其晚年的身体垮下去，有相当关系。朱棣虽为帝王，但与历史上不少皇帝一样干出这类蠢事。

朱棣推崇二徐，二位的封号各长达32字。朱棣并在京城敕建洪恩灵济宫，此宫观极为宏伟。据《宛署杂记》，此宫内前后二大殿，后殿左右有无极、通灵二殿，前殿东西列威灵、高玄等四殿，殿前为大阐威门，前列碑亭四座，钟鼓楼二座，再前为天枢总门，最前为山门。观内有法堂、道房等350余间。山外尚有二座大牌坊。宫观周围缭以坚垣，长83丈5尺，广57丈8尺，共占地80亩。真可谓“雄雄轩敞，不下宫掖”！明嘉靖年间，大学士徐阶等曾在灵济宫内讲学，听讲学徒竟至千余，灵济宫之宏大，可以想见。

这一切也影响了后世帝王。成化年间，明宪宗又将二徐加封为金阙、玉阙上帝，二徐的父母也升格为圣帝、元君，并派重臣致祭。至崇祯帝朱由检时，国家已不可收拾，内忧外患之际，朱由检还命真人羽士在灵济宫大搞“章醮之举”。但二徐之类的神明们并未能挽救明王朝的覆灭，数年后，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城。随着明朝的灭亡，二徐真君及洪恩灵济宫也一落千丈，终至荡然无迹。

陈　　抟

五代宋初，道门出了一位了不起的“活神仙”，被道徒们尊为“老祖”，这位“老祖”就是自号“扶摇子”的陈抟。“老祖”是道徒们对道教祖师的尊称，道教史上获此美称者屈指可数，只有教老祖李老君、纯阳老祖吕洞宾以及陈抟老祖这么有限的几位，可见陈抟在道教



史上的影响和地位。

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生于唐朝末年。由于其出身低微，所以有关他的籍贯、家世，乃至生卒年，史无定论。《宋史》说他是亳州真源(今安徽亳县)人。一说他是河南鹿邑人，一说普州崇龛(今四川安乐县)人。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称陈抟享年 118 岁，而庞觉的《希夷先生传》则认为陈抟活了 190 来岁。

有关陈抟的家世，没有留下什么可靠的资料，陈抟自己也从未谈及，只在《群谈采余》中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 陈图南，莫知所出。有渔翁举网，竿物甚巨，裹以紫衣，如肉珠状。携以返家，溉釜热薪，将煮食之。俄而，雷电绕室大震，渔人惶骇，取出掷地，衣裂儿生，乃从渔人姓陈。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陈抟“生而不能言”，直到四五岁时才会说话，并且聪明过人。他少年时代便开始攻读经史百家之书，“一见成诵，悉无遗忘，颇以诗名”(《宋史·隐逸传上》)。他像封建时代所有读书人一样，想通过科考踏入仕途，跻身官场。但不料在后唐长兴二年(931 年)的科考中名落孙山，陈抟一下清醒了，认为自己过去所学的东西只不过“足以记姓名而已”，决心弃家修道，浪迹天涯。

陈抟抛弃家业，只揣了家里的一只石铛出走。他在山水间游历时，遇到了高士孙君仿和麞皮处士，他们谈论《周易》和老庄之道十分投机，一连七天七夜不停息。经两人指点，陈抟到湖北武当山修道。

在武当陈抟学习了道家内丹气功，“服气辟谷历 20 余年，但日饮酒数杯”。这 20 余年间他修炼得有很深的内练功夫，并对《易经》极有研究，他善于观相看骨，预言未来，“其应有如蓍龟”，颇为灵验。

陈抟虽出身低微，入仕无途，被迫隐居，寄情山水，但其内心深处却并未出世，而是胸怀大志，有很大的政治抱负，或者说有很大的“野心”。他曾“揽镜自照曰：‘非仙而即帝’”(《太华希夷志》)就是说陈抟自信自己将来不是当神仙，就是当皇帝！他在《隐武当山诗》中说得也很明确：

> 万事若在手，百年聊称情。
> 他时南面去，记得此名山。

他在华山结交的都是当时的高道异人，有钟离子、吕洞宾、李八百、麻衣道者、白麻先生、女真毛女、李琪、谭峭等。《宋史·陈抟传》载：

> 华阳隐士李琪，自言唐开元中郎官，已数百岁，人罕见者。……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

《太华希夷志》载：

> 陈尧佐知华州，一日谒(陈)希夷先生，坐室与语。少顷，有一道士风资英爽，自如点漆，真神仙中人也。径入坐次，希夷急避尊位。略话数语，皆方外之事。须臾，豹囊中取枣一枚与尧佐，(尧佐)却而不受。希夷起，接啖之。不久，辞去，送于观外。复会坐，尧佐曰：“此何人？”希夷曰：“即洞宾(吕岩)也。”尧佐悔愕不语。

宋·陈葆光《三洞群仙录》载：

> 毛女字正美，隐华山，形体生毛。自言秦时官人，后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叶，遂不饥寒，身轻如飞。陈抟常与游，华山樵人多见之。

《太华希夷志》又载：

> (陈希夷)先生忽谓弟子贾德升曰：“今日有佳客至，当速见报。”少顷，一人衣短褐青巾，扣门，贾未及报，其人忽尔而去。先生遽出，追之一里余，遇老人衣鹿皮，因问曰：“前去远否？”老人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动则八百里。”又悟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也。

陈抟的这些师友都是方外之士，他们匿迹山林，潜心学问，修道练功，身怀绝技，形成一个水平高超的华山道教文化学术圈，陈抟

在这个文化圈中造诣日深，终于成为道门一代大师。



兰(篮)以避乱。先生遇之即吟曰："莫道当今无天子，却将天子担上挑。"



陈希夷

陈抟的名气越来越大，引起了最高当局的注意，周世宗柴荣特派人将陈抟请至宫中，留止禁中月余，询问黄白炼养之术，陈抟不是以技干世、钓取功名之人，遂从容答道："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政治为念，奈何留意于黄白之事乎？"柴荣听了并没有不高兴，任命陈抟为谏议大夫，陈抟哪有什么心思当谏议大夫？固辞不受，又做他的隐士去了。

周世宗柴荣死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而代之，是为宋太祖。陈抟很兴奋，据说：

> 陈抟常乘白骡，以恶少年数百，欲入汴州，中途闻太祖登极，大笑坠骡曰："天下于是定矣。"遂入华山为道士，葺云台观居之。

赵匡胤当皇帝似乎是在陈抟预料之中，有关这方面的传说很多。

初兵乱时，(宋)太祖之母挑太祖、太宗于

赵匡胤长大成人后，陈抟游长安，与其弟赵匡义、好友赵普相遇。陈抟十分高兴，相邀入酒肆畅饮，赵普无意中坐在了上座，陈抟不客气地说道："你乃紫微帝垣一小星，怎能居主座！"让他移于下席。四人尽兴而罢。

后来赵匡胤"事周为殿前都检点，(陈)抟常见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

《太华希夷志》说陈抟"明《易》深造玄妙之理，视人之祸福、物之休咎，其应有如蓍龟"，称他是一位高明的相士。陈抟是位大学问家，与江湖术士有天壤之别，赵匡胤年轻时即很有胆略，很有器量，英武过人，自然气度不凡，如陈抟果真见过他，当然能看出其与众不同，只是上引一些传闻有些神化这位老祖了。

陈抟与宋太祖、太宗的关系很不一般。《画墁录》等史籍称，太祖赵匡胤为巩固自己地位采取的"杯酒释兵权"的高招儿，可能就是陈抟的主意。太宗赵匡义继位后，多次请

陈抟入朝，派宰相宋琪向其请教养生之术，陈抟答道："我是山野之人，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真圣上乃仁圣之主，君臣当协力同德，兴化致治，勤行修炼，无出于此！"陈抟虽自称"山野之人"，但实际上是个在野的政治家，在治国安邦上有着清醒和卓越的见解。元·张辂《太华希夷志》载：

先生入朝，坚持还山，帝(太宗)恳求济世安民之术，先生不免，索纸笔书四字："远、近、轻、重。"帝不谕其意。先生解之曰："远者，远招贤士；近者，近去佞臣；轻者，轻赋万民；重者，重赏三军。"帝听罢，大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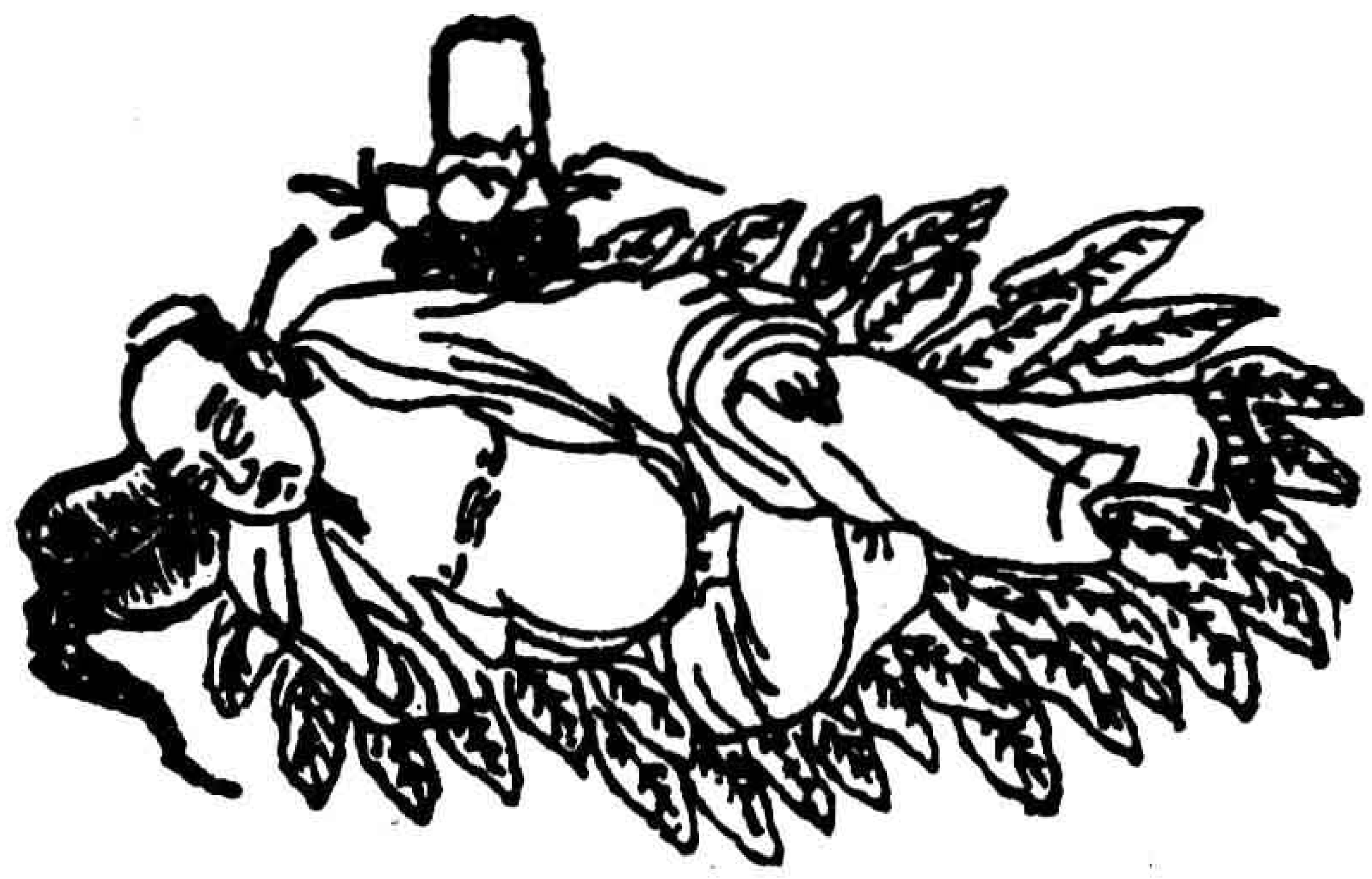
陈抟虽算不上"山中宰相"，但他的政治见解是高明的，对宋初朝廷的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太宗对其很钦佩，特赐号"希夷先生"。

陈抟作为一位高道，大学问家，他的学术贡献主要在易学、老学和内丹学三个方面。在内丹修炼上，他成就了著名的睡功，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睡仙"。

陈抟曾写过一首著名的《睡歌》：

臣爱睡，臣爱睡，
不卧毡，不盖被。
片石枕头，蓑衣覆地。
南北任眠，东西随睡。
轰雷掣电泰山摧，
万丈海水空里坠，
骊龙叫喊鬼神惊，
臣当凭时正鼾睡。
闲想张良，闷思范蠡，
说甚曹操，休言刘备。
两三个君子，
只争些小闲气。
争似臣，向清风，
岭头白云堆里，
展放眉头，解开肚皮，
打一觉睡！
更管甚，红轮西坠。

陈抟的"睡"是一种高明的修炼，与常人



的睡眠毫不相干，是一种形似睡眠——采取了睡姿，实为道家内丹的一种功法。

陈抟的"睡"确实睡出了水平。或说陈抟"多闭门独卧，经累月到百余日不起"(《谈苑》)，或说陈抟之睡，短则月余，长则数年(《贵耳集》)。陈抟"睡"名远扬，周世宗柴荣曾把陈抟请至宫中，检验他的睡功，他果然熟睡一月有余(《坚瓠续集》)。这种睡法，世间多么嗜睡的人也很难做到。所以，他的道友、著名神仙吕洞宾说："(陈)抟非欲长睡不醒也，意在隐于睡，并资修炼内养，非真睡也。"

吕洞宾一语道破天机，陈抟的"嗜睡"是一种高深的内丹修炼功夫，即"胎息"。道书《养真经》称：

止有一息，腹中旋转；不出不入，名曰胎息。

《抱朴子·释滞》称：

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人有胞胎之中。

《胎息经·胎息铭》对此有详解：

三十六咽，一咽为先。吐惟细细，纳惟绵绵。坐卧亦尔，行立坦然。戒于喧杂，忌以腥膻。假名胎息，实曰内丹。非只治病，决定延年。久久行之，名列上仙。

道家认为修炼内丹者，练功达到高深境界时，呼吸异常微弱，口鼻中出入气已无感觉，仅丹田内有极其微弱的起伏。此时丹田内已结"胎"(内丹)，后天之口鼻呼吸已停止，气息仅靠丹田内之微弱起伏维持，类似胎儿在母体内之脐带呼吸。修炼胎息功法，可祛

病延年，光彩照人。

东汉有个王真修炼胎息功法，他活了100来岁，可显得很年轻，像是50来岁的人。《后汉书·王真传》载："(王真)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李贤对此注云：

> 《汉武内传》曰：王真，字叔经，上党人，习闭气而吞之，名曰胎息；习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王)真行之，断谷二百余日，肉色光美，力并数人。

陈抟修炼的胎息功法，《武当福地总真集》说是神龙传授，自然是神话。但龙其实是蛇的变异，蛇有冬眠的习性，或许一些道人从中得到了某些启发，也是可能的。陈抟的功法当然得于人传。据宋文同《丹渊集》说，陈抟曾从师于西蜀高道何昌一学"锁鼻术"，《吕祖全书》、《匣记》等书又称陈抟从吕洞宾、刘海蟾那里学得了"蛰龙法"。陈抟集众家之长，创立了高超的睡功。



不论陈抟的睡功被人们说得多么高深、多么神妙，其实说穿了，除了难度很大的胎息功夫很难达到外，最关键的、最难做到的还是"睡心"。陈抟对此发表了许多见解，他认为常人之睡是：

> 汲汲唯患衣食之不丰，饥而食，倦而卧，鼾声闻于四远，一夕辄数觉者。名利声色汩其神识，酒醴膏羶昏其心志。
>
> 银河斜转夜将阑，枕上人心算未闲。堪叹市廛名利者，多应牵役梦魂间。
>
> 世人妄妄不息，情欲交织，心被万缘所染，神无一刻宁静，茫茫乎昼亦梦也，夜亦梦也，寤亦梦也，寐亦梦也。

世俗之人整天沉溺于名利声色之中，没有一刻清净踏实，怎能睡得安稳？而陈抟则不同了：

> 时人尽道臣憨痴，臣自憨痴无烦恼。
>
> 调和四气凭烧药，修炼千方只要安。
>
> 黄阁高官无意恋，闲居佳境胜为官。
>
> 轩冕浮荣绝念虑，三峰只乞睡千年。

所以，不解决迷恋名利声色的问题，是无法修炼睡功的，不仅睡功，无论什么功也练不成。

有关陈抟的睡功，明·周靖《赤凤髓》中作了记载：日间或夜半子时安静时，端身正坐，叩齿36通，以唤集身上诸神。然后宽松衣带侧卧，闭口垂帘(眼睑)，舌抵上腭。并膝，收一足，一手掐剑诀，掩生门(脐眼)，一手掐剑诀，曲肱而枕之。("剑诀"，即"剑指"，食指、中指伸直并拢，无名指、小指屈向掌心，拇指压在无名指和小指上。)眼对鼻，鼻对生门(脐眼)，合齿，开天门，闭地户(即闭口用鼻呼吸)，心目内观，坎离(水火)会合，内日月交精也。功法如鹿之运督，鹤之养胎，龟之喘息。陈抟还有一些其它睡式，兹不赘述。陈抟睡时，"出入无息，面色红莹"(《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得以"蜕老而婴，动如神人"(《丹渊集》)。

陈抟作为一代高士，睡得悠然，睡得安稳，也睡得清醒，在远大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他下功夫修炼睡功，同时一心研究易学，取得了很高成就。

《宋史·陈抟传》载："抟好读《易》，手不释卷。"《玄品录》称："图南（陈抟）淹通群经，尤精《易》学。"

陈抟鄙弃符箓小数而深究易理象数，创立"先天易学"，开创了宋明以来易学研究的规模与传统，成为宋代易学的开山鼻祖。陈抟的易学得之于当时易学大家麻衣道者，《太极先天图》则得之于吕洞宾。陈抟曾写过一篇《龙图序》，认为龙图的象数是一连串有次序的排列组合，是天意对圣人的启示，龙图（即"河图"，是儒家关于《周易》卦形来源的传说）是沟通天人的"桥梁"，天意以龙马负图启示圣人，圣人依龙图象数探求天意。

陈抟发现了《河图》九宫十五（即此图九宫，纵横倒正回合交错，随意数之，皆得十五）排列的秘密，始著诀传世。至于《太极先天图》，其中秘诀只在道教内部少数人中流传，直至陈抟将其在华山勒石刻图，传诀后人，其中真义才逐渐明瞭。陈抟依《先天图》而作《无极图》，此图共有五圈，自下而上，以明"逆则成丹"之法。最下圈为玄牝之门，玄牝为谷神，牝者窍也，谷者虚也，指人身命门两肾空隙之处，气之所由以生，是为祖气。提祖气上升为稍上一圈，名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使之贯彻于五脏六腑，而为中层之左木火、右金水、中土相联络之一圈，名为五气朝元。又其上之中分黑白而相间杂之一圈，名为取坎填离，乃成圣胎。又使复还于无始而为最上一圈，名为炼神还虚，复归无极。无极图实际上是一张内炼程序图，共分为得窍、炼己、和合、得药、脱胎五大阶段。首先要纯化自己的精神意念，进入一个虚静状态。静极之后，体内真机才会萌动，内炼无形，炁生有窍，玄牝一窍即为意念所集之所。意静无形迹，入于混沌，故称"无极"。炁动有作为，有生于无，进入第二圈，称为"太极"。大道根源于此，无中生有，炼精化炁，炼炁化神。五脏六腑之气得到炼化，"五气朝元，凝结中宫"。命宫真阳之气达于性宫，"取坎填离"，久而久之，精满炁足神旺，"炼神还虚，复归无极"。通过此番逆修，遏止了人类生命自然地走向尽头，从而回归到自然之始，"蜕老而婴，动如神人"。

陈抟的《无极图》几经辗转，到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手中，将由下而上的"成丹之法"改为由上而下的宇宙万物化生之《太极图》，变"道"为"儒"，为理学的形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合理而相当完备的宇宙起源学说。

陈抟是把"无极"（指物质性的气）作为哲学最高范畴的第一人，并与"太极"并列使用，来说明宇宙的本原。其学说直接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形成，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成为道士中少有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

王 重 阳

南宋初年，北方是金朝统治的地区。当时战争频仍，人民生活极其痛苦，加上异族的压迫和统治，汉族百姓需要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和慰藉，于是北方的一个道教新道派——全真道应运而生。全真道曾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乃至人们的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中国道教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开山鼻祖即重阳王嚞（音哲）。

王嚞（公元1112年——1170年）又叫王重阳，是金代著名道士。王重阳本名中孚，为咸阳（今属陕西）望族，长得气宇不凡，眼大于口，须过于腹，声如洪钟，面如白玉，才思敏捷，膂力过人，武艺高强，"置家事俱不问，放旷自适"（《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金莲正宗记》卷二）。他早年即精通经史，曾应礼部试，未第。又去考武举，中了甲科。但他当了多年吏员之类的小官，就再也升不上去了。他作为一个小官吏，对人民的痛苦生活是同情的。

有一年，王重阳家乡闹了灾荒，他祖父拿了些余粮救济灾民，但远处的饥民得不到粮食，便前来抢粮。王家财产被抢一空。地方

官带兵抓住了带头的饥民，准备处死。王重阳就对地方官和祖父说："乡民因饥荒才抢粮食活命，我不忍心看见他们为此而死。"要求把人放了。乡亲们因此对王重阳十分敬仰。王重阳从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深感人生的无常、短促和苦痛。他感叹自身价值没有实现，他终于辞官解印，抛弃妻儿，遁入玄门。自此他改名王嚞，号重阳子。"重阳"意为去掉一切阴气而免于生死之轮回，他在追求个人的精神解脱。王重阳蓬头垢面，放浪形骸，自称"王害风"——王疯子，过起了"神修"的生活。



据说，一次他在甘河镇酒醉，遇到两位异人，教给他修真的口诀。原来这两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吕洞宾和钟离权变化的，后来他又见到了吕仙翁，吕洞宾对他说："你马上到东海去投谭捉马。"

此后，王重阳来到终南山刘将村（今陕西户县祖庵镇），自己造了间茅庵，垒起几尺高的封土，下面挖了一丈深的墓穴，自称居处为"活死人墓"，在此穴居修行。王重阳在墓上立了一块牌子，上写"王害风灵位"。他还在墓的四角各种一棵海棠树，人问其故，答曰："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金莲正宗仙源像传》）

王重阳出身于名门大族，家业殷富，但时逢战乱，社会动荡，他文不能入仕，武不能安邦，内心十分苦闷，于是佯狂装癫，放浪形骸，自称"王害风"、"活死人"，做出了世俗所不能理解的怪异举止。其实这正是王重阳对残酷现实的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反思，一种反抗。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和对人生的感悟，当他觉得无力解救这个社会时，便转向了解救自身。他所作《悟真歌》中谈到了这种体验：

"不修家业不修身，只凭望他空富贵。
浮云之财随手过，妻男怨恨天来大。"
"静虑澄思省己身，悟来便把妻儿掉。"
"家财荡尽愈无愁，怕与儿孙作马牛。"
"前头路险是轮回，旧业难消等闲失。"
"须知未老闻强健，弃穴建坟云水游。
云水施兮别有乐，无虑无思无做作。
一枕清风宿世因，一轮明月前生约。"

但王重阳又很自信，相信自己能独创一派，大行天下，将来必"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果然，他死后七位高足（北七真）大倡其教，使得全真道传遍南北，盛大至极，成为后期道教中最大的道派之一。

据说有一天，王重阳携酒一壶立于路旁，有个道士呼叫他道："害风，害风，拿你酒来。"王重阳听了便把酒壶递过去，道士一饮而尽，又叫他用空壶去甘河中取水来饮。王嚞汲来一尝，其味极佳，竟是仙家佳酿。那道士问道："你知我是何人？吾刘海蟾也。"说完大笑而去。

王嚞得遇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几位高道未必实有其事，但为表明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道统源远流长，特抬出王玄甫（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为祖师，加上王重阳，为全真道"北五祖"。

过了三年穴居生活，王重阳填死了“活死人墓”，迁至终南刘蒋村，盖了个茅庵居住。四年后，他一把火烧了“茅庵”，在火边又唱又舞，告别乡邻道：“我到东海（山东一带）捉马去。”从此，开始了创教收徒的生涯。

王重阳56岁时烧庵离陕，开始东游。过北邙山上清宫时，题诗于壁云：

> 丘谭王风捉马刘，昆仑顶上打玉珠。
> 你还般在寰海内，赢得三千八百筹。
> （《七真年谱》）

诗中提到的几个姓氏是王重阳陆续收纳的几位大弟子。王嚞曾收有不少弟子，但最出息的只有七个，即丹阳真人马钰、长真真人谭处端、长生真人刘处玄、长春真人丘处机、玉阳真人王处一、广宁真人郝大通、清净真人孙不二。此七人史称“北七真”。王重阳度化七位高足，不过一二年间事，在度化最后一位弟子刘处玄后不过半年，即仙逝。



王重阳第一个度化的大弟子是马钰，山东宁海州（今山东牟平）人。马家为地方大族，号称“马半州”。马钰（原名马从义，字宜甫）长得相貌堂堂，为人重义轻财，很有人缘。一天，他与友人畅饮，酒酣题诗，末句云：“醉中却有那人扶。”几日后，一个道人来见他，马钰问：“从何方而来？”道人说：“从终南来，特来扶醉人。”众人听了很惊异。马钰递瓜给道人，道人先吃瓜蒂，马钰怪问其故，答道：“甜自苦中来。”又问其姓名，答曰：“王害风。”马钰又问：“何名为道？”道人说：“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马钰知遇异人，便请至家中，以师礼待之。马钰又告诉王重阳曾梦见一只仙鹤从家中南园地中涌出，遂建了庵堂，请王嚞居住。王重阳便命名此庵为“全真堂”。全真教的名字由此而始。以后马钰抛充了万贯家财，与妻子一起皈依全真，双双成了王重阳的弟子。此时改名为马钰，号丹阳子，妻子道名孙不二，又叫孙仙姑，号清净散人。

不久，又有一位宁海人谭玉投到王重阳门下。谭玉为人慷慨重孝义，后受风瘫痪，针灸药石都没能治愈。听说王重阳有道行，便柱杖前来求治。夜晚天寒地冻，屋内无火，王重阳伸出脚，让谭玉抱在怀里，一会儿，他便汗流浃背，如在热锅里。等谭玉下床，旧疾痊愈，四体轻健，奔走如飞。谭玉遂心悦诚服，拜王重阳为师，改名谭处端，号长真子。王重阳收了马谭二人，正是仙人所预言“投谭捉马”的含义。

当地有个郝大通，厌恶仕途，精通《易》理，擅长卜卦占巫之术。一天，他正在集市上给人算命，王嚞来到他的卦摊前，背对着他坐下。郝大通说：“请先生回过头来。”王嚞说：“你为何不回头？”郝大通听了悚然惊异。王重阳起身离去，郝大通马上收了卦摊，追了上去，一直追到马丹阳南园中的全真庵，拜谒请教。王重阳授以二则隐语，大通读后顿时大通大悟，拜重阳为师。大通改名郝璘，号恬然子，又号广宁子。

此后，王重阳又陆续收了刘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

王处一(字玉阳,号伞阳子,又号玉阳子)为徒。

金世宗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王重阳召马钰、谭处端和丘处机立于榻下,对他们说:"丹阳已得道,长春已知道,吾无虑也。吾今赴师真之约耳。"(《七真年谱》)马钰等立刻醒悟,知道师父将不久于人世,王重阳又道:"吾归天之后,不要悲伤。"说完气绝而亡。众人不禁号啕痛哭,王重阳忽然又睁开眼道:"不要如此!你等是得道之人,还不悟此?"又以五篇秘诀授与马丹阳,遂溘然而逝,享年58岁。马钰等扶柩归葬陕西刘蒋村故庵,结庐守墓三年,然后四方传教,使王嚞开创的全真道盛极一时。元世祖特封王嚞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元武宗又加封为"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

后人有诗赞王重阳云:

占断终南一洞天,曾来东海领众仙。
只凭入圣超凡手,种出黄金七朵莲。

王嚞作为一介平民,一不靠官府,二不靠家势,三不靠钱财,只凭着自身的道行,竟赤手空拳打出了一个全真道的天下。这虽然有着社会和时代的原因,但其创建的全真道本身所具有的许多合理成分,从而吸引和争取了众多信徒,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

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之前的丹鼎派(又称金丹道派,炼金丹以求成仙)是以炼外丹为主的,服食金丹而求肉体飞升、长生成仙的目的。金丹术起源很早,先秦时即有术士从事这种修炼,幻想成仙。后金丹术为道教所继承,并有了重大发展。东晋著名道士葛洪,身为医学家,精通外丹术,他在著作《抱朴子·内篇》中详述炼金丹的方法,并称炼丹术乃"仙道之极"。

由于葛洪等大力提倡金丹术,将其作为道教活动的主要功德,于是以符箓消灾为特征的早期道教,开始转变为贵族化的金丹道教。

丹鼎道派把烧炼金丹搞得非常神秘,他们选择门徒和传授丹经时都十分郑重,向弟子传授丹经时,还要举行秘密仪式。所传授的丹经丹方,里面有很多隐语,所以传授时还要同时传授口诀,进行讲解,否则,得到了丹方也无法烧炼。金丹道派因其内容的神秘化以及传道方式上的神秘化,自然限制了它的传播,又因烧丹炼汞这种修炼必须得有相当的经济条件作后盾,所以丹鼎道派只能是一种上层道教、贵族道教,不可能在群众中普及,只能是皇家贵戚、王公大臣,乃至富贾豪绅"成仙"的专利,平民百姓则无法问津。

而王重阳创建的全真道则不同,他力斥传统道教宣扬的肉体长生、肉体飞升说法,认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认为成仙证真不能靠服食金丹,而在于修炼真性。所谓"真性",又叫元神、元性,指心的本性、本体。王嚞认为世间只有真性不变不动、不生不灭,而肉体是四大合成(这里借用了佛教的说法,"四大"指地、水、火、风,佛教称世界万物和人的身体均由"四大"构成),不可能长生,他在《金关玉锁诀》中说:"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所以王重阳侧重于精神和气功的修炼即内丹术上,所谓"气神相结,谓之神仙"。

王重阳的"神仙"概念已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他在《金关玉锁诀》中述及了几种神仙:养真气,长命者为地仙;打坐修行者为神仙;孝养师长父母,救一切众生,出意同天心,正直无私者为天仙。这里没有任何外丹修炼,只讲内丹修炼,不用繁琐的丹经丹诀,不用炉鼎匮等贵重设备和汞、四黄、八石等较贵重的原料,不用复杂的炼丹技术,人人可以修炼,得道"成仙"。王重阳回答一位老人询问"七十二岁修行可否"时,明确地表示:"便如百岁未得迟!"这些都显示了全真道"普济群生,遍超庶俗"的宗旨。

王重阳成仙理论的世俗化,将贵族道教转变为民众道教,还在于其成仙方法的简易性。全真道成仙悟真强调精神修炼,离尘脱

俗,“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立教十五论》)。如何达到这一境界呢？王重阳专门写了一篇《重阳立教十五论》回答了这一问题。一论至六论乃为日常生活之准则,如出家者须投庵,茅庵草舍已足,使身有所依,身安则心安;学习经书;精通药物;选择高明者为道友等。七论至十一论为内心之修炼,论述了打坐、降心、炼性等要领,丹成则身在人间而神游天上。十二论至十五论乃修道者应达到之境界,炼性为修道之根本,入圣则形寄于尘中,而心明于物外;心离三界,则神、性可居仙境,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

相对而言,内丹术要比金丹术简便一些,由于学道者文化修养差别很大,对有较高文化的学道者,王重阳教其修炼大法,而对一般平民百姓,则不但不要求他们打坐静修,甚至反对他们打坐。他对这些信徒们说;

> 诸公如要真修行,饥来吃饭,睡来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学道,只要尘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静两个字,其余都不是修行。诸公各怀聪慧,每日斋场中细细省悟,庶几不流落于他们。

这种修行方法确实简便易行,连打坐也不用了,只要做到消除杂念,心中清静就可以。这对广大普通道徒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和掌握的。当然,要真正做到内心清静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王嚞幼学儒术,熟谙儒典,后又研究过佛学,皈依道门后立主三教合一,宣称:

> “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
> “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
> (《重阳全真集》卷一)
>
> “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
> (《重阳金关玉锁诀》第十二)

全真道以道教《道德经》、佛教《心经》和儒家的《孝经》为必修经典。王嚞认为“三教圣主之意”,是要人们忘情去欲,“心虚气住”,只有“气住则神清,神清则德合道生矣”。全真家以“性命”为修炼的核心内容,“性”指心性,“命”即生命。通过修心炼性,炼气修命,使人的精神和肉体产生根本变化,脱胎换骨,返老还童,遂登仙道。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王嚞认为就是“精”、“气”、“神”三者的统一,他鉴于宋儒主“理”,禅宗主“性”道教主“命”的特点,巧妙地运用道教“精、气、神”的内丹修炼来说明“理、性、命”三者的统一,即“气神”、“性命”能“体用”如一,达到“三教圆融”的“全真”境界。

王重阳死后,其弟子马钰等七人分别在北方各地传道,影响很大。尤其是丘处机在元初受到太祖成吉思汗的礼遇,命其掌管天下道教,全国各地大建宫观,全真道达到鼎盛。元后逐渐衰落。

全真道祖庭为陕西户县祖庵镇北重阳宫。原为王重阳埋骨处,故称祖庵、祖庭。王重阳死后葬此修成道宫。马钰在宫内修建了一套大厅,亲书横额“祖庭”二字。以后改称“灵虚观”。元朝皇帝封王重阳为重阳真人后,丘处机请旨改灵虚观为“重阳宫”。元太宗又加封为“重阳万寿宫;,增建了大量楼台亭阁,遂成为关中著名道宫。

重阳宫在元代为全国72路道教的总集合点。宫内建筑多达5048间,宫内道士万余,元朝皇帝还派来3500名道兵保护道宫。如今重阳宫建筑已大部倾圮,仅留遗址及一座四合院,北门5间,正殿5间。但尚有30条通碑石,组成“祖庵碑林”,其中线刻“重阳祖师之图”、“玄门七真像”、“终南祖庭图”等为重要文物资料。

由于王重阳及其弟子北七真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们去世后,门徒们将他们的事迹记录下来,出了几种传记,重要的有元代道士秦志安编的《金莲正宗记》五卷、元·刘志玄、谢西蟾编《金莲正宗仙源像传》、元·李道廉编《七真年谱》。后人根据他们的事迹和传说又创作了一些小说,重要的有清·黄永亮著《七

真因果传》(共二十九回)、清人著《七真祖师列传》(两卷)、清·潘旭著《金莲仙史》(共二十四回)等。

全真教的祖师高道们更活跃在元代的戏剧舞台上。在元杂剧中神仙道化剧占有很大比重,明朝初年宁献王朱权在其所著《太和正音谱》中,将元杂剧按内容分为"十二科","神仙道化"被列为第一。有人作过统计,元代的神仙道化剧共有 34 种,占元杂剧总数的十六分之一,这些道教戏剧故事中正一教只有两种,而与全真教有关的作品达 26 种,占了绝大多数。全真教的领袖们五祖七真成了这些作品里的主角,敷演王重阳及北七真的主要剧目有:

马致远:《王祖师三度马丹阳》
《马丹阳三度任风子》
郑廷玉:《风月七真堂》
杨景贤:《王祖师三化外行首》
贾促明:《丘长春三度碧桃花》

其则是钟离权、吕洞宾等八仙道化剧。以上作品都是根据全真教一个传说或拼凑几个传说构置而成,神仙的身世和性格也采用全真教的说法。这些全真教神道剧内容上有个基本模式:某个凡夫俗子沉溺世俗生活,贪妻恋子,后遇一些危险,得某位神仙再三点化,终于幡然省悟,弃家修道,超凡成仙。

在中国古代,文盲占绝大多数的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从戏台上认识和了解各路神仙的,全真祖师们占领了元代戏剧的舞台,对扩大全真教尤其是八仙的影响,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丘 真 人

丘处机(公元 1148 年——1227 年)是金元时期著名道士。对于这位被元太祖成吉思汗尊称为"丘神仙"、当时声名极其显赫的丘处机的身世却有不同的说法。



据元代全真道士秦志安编写的《金莲正宗记》卷四载,丘处机"家世栖霞,最为名族",称其出身于山东登州栖霞县的名门望族。但更多的说法是丘处机出身于一个本分的农民家庭,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称其"祖父业农,世称善门"。清人黄永亮编著的《七真因果传》、清刻本《七真祖师列仙传》(不题撰人)敷演丘处机事迹甚详,皆言丘处机为普通农家子弟,父母早丧,由兄嫂照顾长成。陶宗仪是元末著名学者,见多识广,治学严谨,所著《南村辍耕录》学术价值极高,故其所记丘处机身世是比较可靠的,而丘氏门徒秦志安所记则难免有抬高祖师之嫌。

丘处机虽为农家子弟,但非同一般,少时便显出超群的气质,"敏而强记,博而高才,眉宇闲旷,举措详雅"。据说,丘处机儿时即"有相者谓其异曰当为神仙宗伯"。《金莲正宗记》对此有较详阐述:丘处机少时,一位善相者看相后对其言道:"足下有龟文,必为帝王师。"此处"足下"当指丘处机的脚掌,其脚掌

上有龟文,此为吉兆。

丘处机父母早丧,靠兄嫂拉扯成人,读了几年书,但无心于功名,一味好静,常独坐终日,似有所得意处。兄嫂屡劝他读书求功名,又欲与之议婚,但他坚辞不肯。丘处机道:"人生在世,终日争名夺利,贪妻恋子,无常一到,万事皆空。人以为世事皆真,于我视之如浮云朝露。"他十分羡慕道门生活,便去宁海崑嵛山(今山东牟平东南)隐居修行。

此时全真道祖师王重阳来山东传道,名噪一时,所到之处"人如云集"。丘处机慕名往投,俗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一见丘处机心中暗喜,知其有根器,但因其少年学道,需经磨练才成,开始并未收留他。经过多次考验才正式收他为徒,道号长春子。

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除倡导三教合一外,在修持方法上,抛弃旧道教的练丹,符箓等"奇、技小数",实行"性命双修",先修性后修命,即所谓以修炼精、气、神为内容的内丹。丘处机悟性极高,颇得其中精髓,成为王重阳七大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中佼佼者。

王祖师去世后,丘处机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护送师父灵柩,归葬终南。然后四人分头去各地传道。丘处机没有回山东老家,而西入磻溪(今宝鸡市虢镇附近)。

丘处机磻溪穴居,苦修6年,日乞一食,行则一蓑,人称之"蓑衣先生"。(《甘水仙源录》卷二)他遵照王重阳祖师的全真宗旨,苦己利人,以吸引道众。他曾赋诗言志道:

> 十年苦志忘高卧,
> 万里甘心作远游。
> 特纵孤云来此地,
> 烟霞洞府习真修。

据说,数年间丘处机经常忍饥挨饿,有"大饿二十二回,小饿无数"的说法,这位蓑衣先生不仅有挨饿的毅力,而且还用不睡眠来磨练自己,据称人在磻溪6年从不睡觉,昼夜不眠。全真道提倡驱散睡魔来修行,"全真家禁睡眠,谓之炼阴魔向上,诸人有肋不沾席数十年者"。全真道派认为:

> 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为重,多食即多睡,睡多情欲所由生……必欲制之,先减睡欲,日就月将,清明在躬,昏浊之气自将不生。

丘处机在磻溪的苦修奇举名播遐迩,引得行多信徒前来拜访求道,其中不乏达官贵人。此后,丘处机离开磻溪,往陇州龙门山隐居修道,成为全真道龙门派的创始人。王重阳死后,其七大弟子(即北七真)分别创建道派,但以龙门派影响最广,势力最大。

龙门派主张以清心寡欲为修道之本,认为一念无生却自由,心头无物即仙佛。但已改变了王重阳不入仕门,浪迹草泽的基本精神,而是配合"人主一时之好尚"为朝廷服务。因而丘处机便与当时的统治者产生了一些瓜葛。

由于丘处机等北七真的努力,全真教在金朝大定年间得到了迅猛发展,百姓纷纷归向全真。元好问在《紫徽观记》中记载了当时全真道传播的盛况:

> ……故堕窳之人,翕然从之(指全真教)。南际淮,北到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

对全真教的发展,金朝统治者世宗皇帝也很担忧,曾下诏进行限制,但收效甚微,于是他便改变手段,转为拉拢和利用。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王重阳七大弟子之一的王处一被召赴至京,金世宗亲问以养生之道。第二年,又召丘处机进京,向他请教"至道"。为便于咨询问道,世宗特在自己居住的万宁宫侧建一道观,御书门额"全真堂",供丘处机居住。这一年世宗命他主持万春节(皇帝生辰)醮事,为自己祈寿,为全国祈福。

丘处机见时机有利,便回山东兴建了宏伟的太虚观。章宗时,其宠妃李师儿为在宫

廷斗争中得到全真道的支持，特将《玄都宝藏》两部各6000余卷以皇帝的名义分别赐给丘处机所居的太虚观和王处一所居的玉虚观。

几年后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横扫山东，齐鲁大乱，反金的农民军红袄军乘乱而起。金朝无力镇压，于是就想借助宗教的力量。贞祐二年(1214)，丘处机应山东驸马都尉之请，出面招安了杨安儿、耿京的起义军。为此金宣宗赐给丘处机“自然应化弘教大师”称号，并派钦差大臣请他赴京议事，但丘处机却拒不奉诏。以后南宋朝廷慕其名，请他南下赴临安，但也被其婉绝。

心有城府的丘处机拒绝了金、宋两朝的召请，但不久却欣然答应了远在西域的蒙古成吉思汗的召请，行程数万里，历时三载，千辛万苦地拜谒了成吉思汗。

公元1219年，远在中亚地区征战的成吉思汗特派使臣刘温不远万里来到山东，邀请丘处机前往中亚。表面看，成吉思汗召请丘处机为了求长生。刘温曾向成吉思汗宣称丘处机已有300余岁，有保养长生秘术。这时成吉思汗已是60岁的老人。连年征战加上身旁嫔妃成群，元气已损，深感力不从心；而征服异族建立大蒙古帝国的功业尚未完成，健康长寿成为他拼命追求的目标。但成吉思汗召见丘长春不仅于此，还在于这位长春子宗教领袖的地位和名望。他在给丘处机的手诏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 ……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数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远游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期可矣。

成吉思汗明确表示了求贤辅治的意图，要向丘处机请教治国安民和保身之术。

对于成吉思汗的邀请，丘处机不顾自己72岁高龄、数万里之遥、恶劣的天气和道路，坚定地奉诏西行，会见成吉思汗，成为一代壮举。

丘长春此举当然也有自己的目的。首先，他力图劝戒成吉思汗不要杀戮太过，“拳拳以止杀为劝”(《元史·释老传》)。丘处机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道人，当时天下三分，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尤其是蒙古骑兵，铁蹄所到之处，城灭镇毁，生灵皆亡，残暴无比。丘处机对百姓的深重苦难极为同情，他在《愍物》一诗中写道：

> 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
> 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
> 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
> 安得大千复混沌，免教造物生精灵。

他此次西行面见成吉思汗，就是为了去“教万灵苦”，他在途中赋诗言志道：

> 十年兵火万年愁，千万中无一二留。
> 去年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
> 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
> 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

后来他与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的医官郑景贤相遇，他赠给郑医官的诗中再次表明奉诏西行的抱负：“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

丘处机率十八弟子万里跋涉，行经数十国，历尽千辛万苦，在公元1222年终于到达大雪山成吉思汗的行宫(今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西南)进谒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了丘处机十分高兴，称他为“丘神仙”，并说“天锡(赐)仙翁，以寤朕志”，对他的话语极为重视，“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还对丘处机说：“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

丘处机面对这杀人不眨眼的蒙古大汗，苦口婆心，拳拳以止杀为劝，总算打动了一点大汗的心，从历史文献来看，丘处机的劝诫对成吉思汗的屠城滥杀多少起了一些作用。

丘处机取得成吉思汗的欢心后，全真道取得了很多特权，丘长春回中原后，“使其徒

持牒召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丘处机万里西行，除了“教化”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集团外，自然也有宗教目的，即借元太祖的力量发展全真教的势力。

全真道的开创者是王嚞王重阳，而使其发扬光大显赫一时的则是丘长春丘处机。

据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载：

> 馆舍定，(丘处机)即入见，上(成吉思汗)劳之曰：“它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对曰：“山野诏而赴者，天也。”上悦，赐坐。食次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师(丘处机)曰：“有养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上嘉其诚实。

因为成吉思汗听侍臣刘温说丘长春已有300多岁，有仙药仙方，召请他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向丘长春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所以刚一见面就迫不急待地向他要长生之药。丘处机不愧为当世高道，不带半点虚妄，以实相对，显示了他正派诚实的人格，仅此一句实话就使杀人如麻的元太祖肃然起敬。同样作为一代名道，与北宋末那位招摇撞骗、祸国殃民的林灵素相比，确有天壤之别了。

成吉思汗虽未从丘处机那里得到梦寐以求的长生之药，但从他口里却得到了“养生之道”即养生术。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养生术很重视，听得满心高兴，命令手下人用蒙汉两种文字记录下来，并对左右人说：“神仙(丘处机)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长春真人西游记》今天看来，丘处机所谈内容毫不神秘，无非是清心寡欲、理身治国的道理，重点谈的是养生之道。丘处机的养生之道大体有以下几点。

人人皆可成仙

成仙证真是全真教的主旨，所以全真领袖们皆宣扬人人有道性，人人皆可成仙。曾有一位姓邢的老人询问王重阳：“七十二岁修行可否?”王重阳回答道：“便如百岁未得迟，只要心中换过时。”丘处机也认为：“凡有七窍者，皆可成真”，“畜生饿鬼，皆堪成佛”。他对成吉思汗说：“学道之人知修炼之术，去奢屏欲固精守神，唯炼乎阳，是致阴消而阳全，则升乎天而为仙”，这种成仙方法不但凡是学者之人都可做到，而且像火苗往上飞升那样轻快——“如火之炎上也”(《玄风庆会录》)。

不过，全真教所说的成仙，与魏晋隋唐道教宣扬的肉体长生，飞升成仙不同，主要是指精神上的即所谓“真性”——心的本性，全真家认为只有“真性”才不生不灭，不变不动。认为只要在心中做内省功夫，便顿见真性，超出生死，得到精神解脱，北七真之一的谭处端认为“一念不生，则脱生死。”丘处机也认为“一念无生即自由。”全真家宣称精神上真正超脱的人，就能做到“身在凡而心在圣境”，虽身居一室之内，却会“性满乾坤”。

丘处机所宣扬的全真教成仙证真的理论是很容易让广大信徒信服的，这一套也深深打动了成吉思汗。

内丹修炼，先性后命

丘处机代表的全真道的成仙的途径与魏晋隋唐外丹服炼不同，强调内丹修炼。外丹，是我国古代的炼丹术，超源很早，有两千多年历史。道士们用铅汞配制其它药物作原料，放在炉火中反复烧炼成为丹药——所谓“仙丹”或“金丹”。著名炼丹家葛洪在《抱朴子·内丹》中称，金丹为物，烧之越久，变化越妙，百炼不消，毕天不朽，人服之能令人不老不死。但因“金丹”多含毒性，服后中毒而亡者不少，唐代就有六帝和许多官僚文士、道士女冠服“仙丹”中毒而死。所以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外丹成仙说已禁不住考验，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日趋衰落，而内丹学乘势而起，逐渐取而代之。

内丹与外丹的最大区别是不借助药物，而是以人体内的“精”、“气”为药物，以人体为“炉鼎”，再运用“神”去烧炼，据称可以使精、

气、神在人体内凝聚结成“丹”(“圣胎”),此即所谓“内丹”。内丹家认为炼内丹可延生成仙。外丹主要靠药,内丹主要靠气,《通幽诀》说:“气能存生,内丹也;药能固形,外丹也。”内丹家宣称不论贵贱男女,得诀即可修炼成仙,不像外丹仅为贵族豪绅的专利品,所以有很大的群众性。

全真道的内丹学还强调先性后命,先修性后修命。即先教人收心降念,做到对境不染,明心见性,以使心安念寂,然后静坐调息,依次炼精化炁(“气”的古字,道教多指人的元气),炼炁化神,炼神还虚。丘处机在其所撰《大丹直指》中述九节丹功,三节为命术,六节为性学,对先性后命的修炼有详述。

丘处机在与成吉思汗讲道中也谈及内丹修炼,认为“神为子,气为母……气全则生,气亡则死;气盛则壮,气衰则老”,“陛下修行之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玄风庆会录》)。

道教内丹家研究、修炼内丹,以追求长生不死、成神成仙,固然是水中月、梦中花,永远不会实现,但内丹家努力探索宇宙生成,生命的本源,寻求道炼归元而成仙长生之道,力争“我命由我不由天”。有积极的一面。

内丹修炼属于道家气功,虽不能成仙,但确可治疾强身,延年益寿。据史料记载,著名内丹家都是出奇的高寿,如吕洞宾“年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宋史·陈抟传》),再如陈抟活了118岁,张无梦99岁,蓝元道172岁,张伯端96岁,石泰136岁,薛道光113岁,还有钟离权、刘海蟾等都是高寿者。丘处机与以上老前辈相比只能算小字辈,活了80岁,但他以70余岁高龄,餐风宿露,跋涉数万里,历时三年,显示了超人的体魄,难怪成吉思汗见了这位精神矍铄、鹤发童颜的老道长,不由得你他为“丘神仙”。

学道之人,首戒女色

全真教提倡的养气炼丹的修炼,是以极端的禁欲主义为基础的。而内丹修炼最初的炼精化炁,又以断绝色欲为先决条件。

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时强调戒色的重要性:“夫男阳也,属火;女阴也,属水。唯阴能消阳,水能克火,故学道之人首戒乎色。……贪婪色欲则耗乎精神,亦散其气,而散之多。”又针对成吉思汗本人告诫道:“切宜减声色,省嗜欲”,“庶人一妻,尚且损身,况乎天子多畜嫔,御宁不深损!贪欲好色,则丧精耗气,乃成衰惫。陛下宜加珍啬一宵一为,已为深损,而况恣欲乎!”并请他身体力行,亲自试一试:“夫神气同体,精髓一源。陛下试一月静寝(即不行房事),必觉精神清爽,筋骨强健。古人云:服药千朝,不如独卧一宵。”

丘处机还特别举了金世宗的例子,世宗因色欲过节(度),不胜衰惫,每朝会,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亦尝请余问修真之道,余如前说。自后身体康强,步行如故,凡在位三十年升遐(去世)”。金世宗因为听从了丘处机的劝告,戒色节欲,身体由衰变强,多活了20多年。

远离名利,恬淡为美

全真教提倡修苦行,王重阳的七大弟子即北七真皆以修苦行著称。如马钰(号丹阳子,山东大财主,后弃家学道)修道时每日仅乞食一钵面,常年赤足,夏不饮水,冬不向火。丘处机曾六年“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箪瓢不置也”。一生过着清苦的生活。

丘处机把清静恬淡作为养生之道的重要内容。他对成吉思汗说:“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余生平弃亲出家唯学此耳。……故世人爱处不爱,世人住处不住。去声色,以清静为娱;屏滋味,以恬淡为美。……人以气为主,逐物动念则元气散,若气鞠(球)之气散耳。”还说:

> 人间声色衣食,人见以为娱乐,此非真乐,本为苦耳!世人以妄为真,以苦为乐,亦悲哉!
>
> 出家学道之人恶(粗)衣恶食,不积

财，恐害身损福故也。在家修道之人，饮食居处珍玩货财亦当依分，不宜过差（悬殊）也。（《玄风庆会录》）

由于丘处机得到成吉思汗的礼遇和封赏，全真教得到自由建造宫观、广收徒众的特权，教团迅速发展，达到了鼎盛。丘长春曾满心欢喜地对门徒们说："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

丘长春东归后，住在燕京（今北京）长春宫，从此这里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成为全真派"天下第一丛林"和全真道龙门派祖庭。长春宫建于唐代，原名天长观，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此宫历代多次重修，明代改名为白云观。丘处机80岁时去世，遗蜕（遗体）便埋在观内今丘祖殿堂下面。据说明永乐皇帝亲临长春宫，欲瞻仰丘祖灵柩，忽见白云一团由墓门涌出，飘向天空而散，永乐感悟。当时有人咏诗道："风吹稻谷香千里，云护仙容亿万年。"由此改长春宫为白云观。

白云观经明清两代修缮，成为一座宏伟的道教宫殿建筑群。进入山门，分为中、东、西三路和后花园。中路为主要殿堂，供奉道教尊神及全真祖师，依次为棂星门《牌楼》、山门、灵宫殿、玉皇殿、老律堂（七真殿）、丘祖殿、四御殿、三清阁，东西两路殿堂有藏经阁、宗师殿、南极殿、丰姥阁、八仙殿、吕祖殿、元君殿、元辰殿等。后花园内游廊迂回，假山错落，清雅幽静，园内还有一座大戒台。

丘祖殿是白云观建筑群的中心，系全真龙门派后裔奉祀丘祖的祖堂。殿正中为丘长春真人彩塑像，周围墙壁原有壁画，画有丘长春西游事迹及十八宗师像，今已不存。

殿内中间还有一奇特的"瘿钵"，瘿（yǐng音影）是中医所说的生长在脖子上的一种囊装瘤子，而这件瘿钵是用树身上的树瘤做成的，上宽下狭，近似瓢形，钵体呈深棕色，为宋代古物。钵口上还嵌有一道金边，这是乾隆皇帝下旨用黄金装饰的。这件巨钵放在一座汉白玉的云水座上，能容纳5斗米，可见瘿钵之巨大。乾隆何以对此钵如此器重？原来这件古钵是其父雍正皇帝赐予长春真人的贡品，并有上谕称："庙中他日有绝粮乏食之时，道众可舁此钵从正阳门入皇宫，宫中必有赐给。"白云观道士可以直接向皇帝募化，虽然道士们不曾当真抬着巨钵招摇过市，去皇宫向皇上要"功德"，但这在当时确是白云观的一种殊荣。

乾隆帝还曾为丘祖殿题了一幅著名的对联：

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

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对丘处机作了极高的评价。

白云观藏有不少珍贵的道教文物，其中以"镇山三宝"最为著名。一是《大明正统道藏》，这部道藏为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所赐，共480函、5305卷。二是唐代老君石雕坐像，像为汉白玉雕成，已有1200余年历史。文化大革命时，观内道士将像埋于地下，直到1979年才重见天日。第三宝是刻在西路祠堂内壁上的元代赵孟頫书《道德经》和《阴符经》。

白云观作为道教圣地和道教活动中心，历来有一些重要的道教法事和民俗活动。最有名的是正月初八拜岁星和正月十九燕九节。每逢农历正月初八，许多人来到白云观的元辰殿（六十甲子殿）中祭拜岁星，向自己的本命星辰（被塑成神态各异的各种神像）焚香礼拜，祈求本命星保佑自己一年平安。这种祭拜本命星辰的习俗，又叫"顺星"。

"顺星"习俗由来已久。金朝明昌元年（1190年），金章宗的母亲瑞圣皇太后得了重病，久治不愈，后于正月初八日祈祷于丁卯元辰神，不知怎的病倒好了，于是，下命在观中修建了瑞圣殿供奉丁卯辰神，陪祀六十元辰神。从此，就有了向元辰神祭拜可受星辰保佑免灾得平安的说法，叫做"顺星"。"顺星"之"顺"就是平安顺利之意。到了清初，瑞圣殿改名为元辰殿，民间则俗称"顺星殿"。这

一天游人如云，前来祭拜本命星君的络绎不绝。晚上观中要举行祭星大典，设坛祭拜。大殿香案上排列108盏灯，两旁列二十八宿和七星星灯。方丈率领全观道士穿戴法服，鸣鼓击钟，跪叩礼拜，诵玉枢经、北斗经、顺星诰，祈祷灾除福降，国泰民安。



丘处机分粮济饿

白云观另一重要节日是燕九节，是为了纪念丘祖丘处机的。正月十九为丘真人生日。这一天观内外人山人海，摊贩云集，人们烧香求福，杂耍游乐。明人吴宽在《燕九日诗》中写道：

京师胜曰称燕九，少年尽向城西走。
白云观前作大会，射箭击毬人马蹂。
古祠北与学宫依，箫鼓不来牲醴稀。
如何义士文履善，不及道人丘处机？

这一天前夜（十八日晚）俗传丘处机和八仙等神仙将会下降人间，变幻成各类人物，善男信女如有缘相遇，即获福无量，此即所谓“会神仙”，故十八、十九两日，游人云集，以期会仙。《燕京岁时记》载：

（白云观）每至正月，自初一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车马奔腾。至十九日为尤盛，谓之会神仙。相传十八日夜内必有仙真下降，或幻游人，或化乞丐，有缘遇之者，得以却病延年。

张　三　丰

道教从金元开始，逐渐分为正一教和全真教两大教派，一南一北，大体以江淮南北地域为界。正一教为道教符录各派的总称，崇拜鬼神，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而全真教则重于自我道德的修养和功行。至元末明初，两派又有交流融合的趋势，其中张三丰起了很大作用。





张三丰是一位了不起的道教大学问家、大武术家和大气功师，还是一位道教史上少有的大“隐仙”，他的一生充满了扑朔迷离的云雾和传奇色彩。

张三丰是个行踪不定、颇具神秘色彩的道士，所以他的名字、号、籍贯，乃至时代，竟多达20几种。比较通行的说法，这位异道人又叫张通、张全一，字君实（或君宝），号玄玄子。辽东懿州（今辽宁彰武西南）人，金末元明时道士。张三丰长得丰姿魁伟，大耳圆目，须发如戟。无论寒暑，只一衲一蓑，有时一餐能吃数斗，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因其不修边幅，破衣烂衫，人称“张邋遢”。（《明史·方伎传》）

道教传说，张三丰曾为华州太守属员，一次，他与太守去华山拜谒著名道士陈抟，陈抟请他们坐下后，又在上位摆设一个座位，像是要等候什么人。一会儿，果然来一位道士，蓝袍葛巾态度傲然。陈抟对他却十分恭敬，二人山南海北，谈天说地，十分热闹。太守见自己受到冷遇，十分不快。这时二人谈笑已毕，道人从袖中摸出三个枣子，一红、一白、一青

说:“来时仓促,没带礼物,只有三枣,我们分着吃吧。”遂自吃红枣,白枣给了陈抟,青枣给了太守。太守认为道人轻慢自己,遂将青枣给了张三丰。张三丰随即吃了,顿觉精神焕发,身轻体健。道人大笑,作礼而别,倏然不见。

太守惊问其故,陈抟道:“此道人即仙人吕洞宾。这三个枣子是仙枣,分上、中、下三种,量质而食,大人身为凡身俗骨,只能食青。修身之道,不可一步登天,只能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太守听后,为自己失此机缘而懊悔不已。

张三丰吃仙枣后,已是得道仙人,遂浪迹江湖,行踪不定。他时而到闹市嘻笑自如,为人祈福禳灾,时而到农家做些农民意想不到的好事,被人们视为“真仙”。张邋遢后来到湖北武当山,入山修炼,结庵于玉虚宫前,在古木林丘之下,炼成九转金丹。张三丰对当地人说:“此山异日将大显。”(《明史·方伎传》)

明太祖朱元璋慕其名,派人觅之不得。后明成祖朱棣屡派使臣寻访,皆不遇。永乐十年(1404年)二月,成祖朱棣还给张三丰写了亲笔信:

皇帝敬奉书真仙张三丰先生足下:

朕久仰真仙,渴思亲承仪范,尝遣使致香奉书遍诣名山虔请。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体合自然,神妙莫测。朕才质疏庸,德行亦薄,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谨致香奉书虔请,拱俟云车风驾,惠然降临,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怀!

二月初六日

这位雄武大略的“真龙天子”对一个邋里邋遢、屡请不睬、狂傲轻慢的“牛鼻子老道”如此谦恭诚恳,真可谓礼贤下士、思“仙”若渴!不过张三丰就是避而不见,他倒与蜀王朱椿、侍讲学士胡广交上了朋友,大造修复武当道场的舆论,并通过他们向成祖吹风。成祖遂命工部侍郎郭琎、隆平侯张信督夫30余万人,大营武当宫观,费以百万计。既成,赐名太岳太和山。成祖大肆营造武当山教宫观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这位篡位皇帝极力鼓吹“君权神授”,自己继统得到真武大帝保佑,故营建武当宫观以供祀之,但为取悦招揽张三丰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遇真宫为张三丰之祖庙。在武当山北麓,距“神道”山门玄岳门一公里处,史载张三丰曾在此修炼,初名“会仙馆”,成祖敕令在此建真仙殿、琉璃八字宫门、郎庑、东匝方丈、斋堂等大小殿堂屋宇近三百间,赐名“遇真宫”。遇真宫在明朝即被誉为“灵境”,真仙殿为庑殿顶式,面阁三间,进深亦三间,单檐飞展,彩栋朱墙,巍立于崇台山。殿前曾有金象、金龟、金钟、玉石、赑屃(音毕细)驮御碑等仪仗排列。殿内所供张三丰铜铸鎏金像,高一点四米,身穿道袍,头戴斗笠,脚穿草鞋,面庞丰润,风姿飘逸,别具神采。此像为明铸,是道教艺术珍品。

明成祖虽未遇到这位张邋遢,但在诏书中尊其为“老师”、“真仙”。明英宗朱祁镇则封这位行踪莫测的真仙为“通微显化真人”,明世宗朱厚熜又加封其为“清虚元妙真君”。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崇,张三丰很受世人敬奉。在真仙殿张三丰神像前,青砖平地已被信士们磕头磕出了深凹。

历代著名的高道,无不以受到皇帝的召见为殊荣,尽管有的最初藏着不见——不是不想见,而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吊吊“圣上”的胃口。张三丰则压根儿就不想见。虽说不想见,张三丰还是给朱棣回了两次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第一封信是他作的一首诗:

天机不肯轻轻泄,犹恐当今欠猛烈。
千磨万难费辛勤,吾今传与天地脉。
皇帝寻我问金丹,祖师留下长生诀。
长生之诀诀何如,道充德盛即良图。
节欲澄心澹神虑,神仙那有异功夫!

下面又抄写了吕洞宾的一首诗:“金丹重一斤,闭目静存神。只在家中取,何劳向外寻。炼成离女汞,吞尽坎男精。金丹并火候,



口口是元音。”

张三丰在第二封信中诚恳地说，“伏愿陛下，澄心治理，屏欲崇德，民福主福，民寿主寿”。又一次强调“澄心寡欲是长生！”，还在信中声明自己只有“祛欲修身之道”，并无任何“异术”。

张三丰飘泊一生，行踪不定，来无影，去无踪，是位传奇色彩极浓的人物，所以有关他的名字、他的籍贯乃至生活时代，都有许多不同说法，而关于他的身世情况也没留下什么可靠的记载。但从他留下的大量诗文和功法中，可以清楚地明了这位邋遢道人不凡的人生哲学。

张三丰的物质生活降到了最低点，一年四季，一笠一衲，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整个一个“叫化先生”。在世俗眼中，张邋遢真是苦不堪言了，但他却乐在其中，真快活，真自在，也真长寿！他只要见太祖或成祖一面，荣华富贵就全有了，但张三丰视权势如草芥，财富如粪土，拒不应召。

张三丰主张生活随意，无拘无束。甚至连道门的戒律也可以不管，只求逍遥自在。这反映在他的许多诗作中。

快快快，红尘外。
闲闲闲，白云间。
妙妙妙，松崖一声啸。
来来来，蓬莱岛花开。

（《云水后集·快快吟》）

快活，悠闲，自鸣得意，自得其乐。

野步安闲真福地，
山居快活即壶天。

（《云水后集·静中乐》）

洞中藏得小天地，
睡到盘陀石上温。

（《云水后集·与梦九》）

无忧无虑，随遇而安。

无根树，花正青。
花酒神仙古到今。
烟花寨，酒肉林，
不断荤腥不犯淫。
犯淫丧失长生宝，
酒肉穿肠道在心。
打开门，说与君，
无酒无花道不成。

要当神仙也当“花酒神仙”，不但酒肉不戒，可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且在色上也不必太拘泥，见色不色，心中无烟花，方是高手。吕洞宾《敲爻歌》云：“酒是良朋花是伴，花街柳巷觅真人，真人只在花街玩。”(张三丰对夫妻男女情爱是肯定的，但反对淫乱，曾作《戒淫篇》、《戒淫文》警世人。)

不参禅，不礼拜，不打坐，懒受戒；
遇酒吃几杯，遇肉啖几块；
顽石当枕头，青天作被盖；
不觉睡到日头红，无恐无惊无怖骇。
从今打破是非门，翻身跳出红尘外。
拍手打掌笑呵呵，自在自在真自在！

（《玄要篇上·后了道歌》）

清茗清香清道心，清斋清夜鼓清琴。
人能避浊谈清静，跳入云山不可寻。
（《云水三集·清吟》）

笑呵呵，复高歌，
风流醉舞书烟波。
披渔蓑，走岩阿，
日暮江山乐事多。
我在斜阳村外过，
何人知我醉婆娑！

真是一幅幅酒肉神仙、自在隐仙的活画像。

如何才能活得轻松自在？张三丰做出了解答：淡泊名利，清心寡欲，随遇而安，在尘出尘。

首要的是抛开功名利禄：

功名无大小，总要及时进退。何以能知其时？凡于功名中平心一想，曰吾之功名不过止于是也，即止之，便可得其时也。抑或有不尽头处，然宁不及，毋求太过。……故知进退者，乃能称为哲人。
（《水石闲谈·闲谈》）

人能看得破，撇得开，自然不羡人富，不羡人贵，求吾安命之理，守我修真之道。人竞嚣嚣，我独默默，人皆烦恼，我独清凉，又安问人之达与不达、穷与不穷，为旁观者之不平也哉！
（《水石闲谈·闲谈》）

六七百年前这位哲人的至理名言，今天读来，还是这样的发聋振聩！

湖北武当山以其雄伟气势，自古以来便被推崇为“太岳”、“天下名山”，成为道教胜地，周之尹喜、汉之阴长生、晋之谢允、唐之吕洞宾、宋之陈抟、元之张宗清等高道都曾在此修炼。唐时，这里开始修建道观，宋元都有增建，但元末时，道观大部分毁于乱。至明时，成祖大规模营建武当山宫观建筑群，使这里成为名震海内的道教名山。前文已述，明成祖振兴武当与仰慕张三丰直接相关。

武当山是张三丰传道修炼的大本营，他入武当山后，并未公开自立门派，而是以游方高道的身份收徒受道。弟子们原本各有师承，所承道派也不相同，但皆以张三丰为祖师。明朝永乐以后，武当道士即将张三丰奉为武当派的祖师了。武当山道教中以张三丰为开山祖师的道派多达17个，有邋遢派、三丰派、三丰自然派、三丰清微派、三丰祖师自新派、三丰祖师蓬莱派等。这些道派一直到清末民初还在流行。

张三丰所创武当道有自己独特之处，一是突出崇祀真武大帝，以真武大帝为祖师。二是重修内丹。武当道属道教清修派，重修内丹，并主张先人道，而后仙道。所谓“内丹”，为道教炼丹一种，与“外丹”相对。“外丹”是指在炉鼎中烧炼矿石药物，以制“长生不死”的丹药——“金丹”。后道士将此方术加以扩充，又将人体拟作炉鼎，以体内的“精”、“气”为药物，运用“神”去烧炼，据称可使精、气、神凝聚结成“圣胎”，此即所谓“内丹”。三是习练武当内家拳技。四是教义上主张三教合一。

不少书籍记载，武当内家拳为张邋遢张三丰所创。其实这里面有个误会。考武当内家拳祖师，乃北宋徽宗时张三峰，张三峰又作张三丰。传说他夜梦真武大帝授拳法，而创武当派内家拳。其法以御敌为主，非困不发，纯用内功，故称“内家拳”。明末黄宗羲在《王征南墓志铭》中说：“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内家，盖起于张三丰。”

宋代技击家张三峰（张三丰）创立武当内家拳技三百余年后，元末明初武当山又出了一位著名的道士，亦叫张三丰，但他是前者内家拳技继承者和发扬者。张三丰在发展武当内家拳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先哲们在两千年前探讨天地起源时，就提出万物一体，世界万化皆由“阴”、“阳”二气和合而成的观点，认为千变万物皆以“乾”、“坤”为祖。张三丰继承了这一观点，

他的名字“三丰”从字形看，大约就与“乾”(☰代表天)“坤”(☷代表地)有关。他在一首修炼诗中写道：“修真大道乾坤祖，采取阴阳造化功。”他在《太极拳论》中，即将内家拳法与阴阳、八卦、五行等哲理结合起来，并进而与医学中的金、木、水、火、土即人体内的心、肝、脾、肺、肾结合起来：

十三势者，掤、攦、挤、按、采、挒、肘、靠，此八卦也。进步、退步、左顾、右盼、中定，此五行也。掤攦挤按，即坎离震兑四方定也；采挒肘靠，即乾坤艮巽四斜角也。进退顾盼定，即金木水火土也。

张三丰还特别强调习炼内家拳，要以养心定性、聚气敛神为主，要修身养性，抛弃功名杂念。他认为养神养气之贵重，世上凡金凡玉虽百两不换一分，修功者何必与世人争利息乎？随遇而安，则心平气和，神气冲淡。涵养中大有学问，和平处有真性情。诸子需要容人之所不能容，忍人之所不能忍，则心修愈静，性天愈纯。还说：须要死心踏地做功夫，俗事以“莫管他”三字为主，则万念冰消。(以上见《张三丰全集·水石闲谈》)张三丰最向往追求的生活则是：

吾极爱此金秋之气，至清至肃，安得提一壶酒、一张琴、一枝笛，登陟乎高峰之顶，笑玩大地山河，烟蒙蒙，云淡淡，看日暖暖之村墟，波渺渺之长川。彼时笛声起林梢，琴声发乎石上，酒气通乎红泉碧嶂之间，山禽自鸣，空翠洒落，真快事也！(《水石闲谈》)

如此旷达潇洒，真活神仙也！难怪张邋遢懒得理睬太祖成祖这些皇帝老儿！

同少林拳一样，内家拳不外传，武当道士历来均在教内秘密传授内家拳技。至今仍保持这种传统。武当道士习拳练武主要是为了健身御疾、抵抗野兽和保护道观。

张三丰所创武当道，后来逐渐并入了全真道。后人辑有《张三丰全集》(其中有一些为托名之作)收入《道藏辑要》。



元　帅

道教在作道场祈禳时，常伴有一重要方术——“请神”，即请有关神明“降临”，帮助请者“驱魔降妖”。请神的法术，在明清小说中多有反映。如《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九回说到西门庆为小儿子寄名，去玉皇庙打醮时，就有“请神”的仪式，在众多的神灵中，其中有“马、赵、温、关四大元帅”。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十三回里，张天师和敌手斗法时，更是动不动就请神，他请神的情景写得倒细致、有趣：(张天师)自家披着发，仗着剑，蹑着罡，步着斗，捻着诀，念着咒，踮踏了一会。却又取出那个令牌来，拿在手里，连敲三下，喝声道：“一击天门开，二击地户裂，三击马、赵、温、关赴坛！”敲了三下令牌，急忙里把个飞符烧了两道，猛听得半空中划喇喇一声响，响处

吊下了四位天神："同是一样儿的长，长有三十六丈；同是一样儿的大，大有一十八围。"

说得活灵活现，煞有其事。这马、赵、温、关四元帅，到底是何许人也？

我们看看《三宝太监西洋记》中对这儿位的描绘，即可明了。



赵元帅



马元帅

第一位马元帅，生得白白的，白如雪：

一称元帅二华光，眉生三眼照天堂。

头戴××攒顶帽，五金砖在袖儿藏。

第二位赵元帅生得黑黑的，黑如铁：

铁作幞头连雾长，乌油袍袖峭寒生。

喷花玉带腰间满，竹节钢鞭手内擎。

坐下斑斓一猛虎，四个鬼左右相跟。

第三位温元帅我们最后说，先看第四位关元帅，生得赤赤的，赤如血：

凤翅绿巾星火裂，三绺髭须脑后撇。

卧蚕一皱肝胆寒，凤眼圆睁神鬼怯。

青龙刀摆半天昏，跨赤兔坛前谩谒。

很清楚，马元帅就是灵官马元帅、马天君，又叫华光天王、华光大帝；赵元帅是赵公明，又叫赵玄坛；关元帅即关圣帝君关羽，又叫关帝、关公。

温元帅生得青青的，青如靛：

蓝靛包巾光满目，翡翠佛袍花一簇。

朱砂发粱遍通红，青脸獠牙形太毒。

祥云霭霭离天宫，狠狠牙妖精尽伏。

据明代学者宋濂《温忠靖公庙碑》和《三教搜神大全》卷五，这位温元帅是泰山神，为东岳大帝的部将。他姓温，名琼，浙江温州人。父亲温望，曾中科第，但年老无嗣，与妻张道辉夜祷于上帝。一天晚上，张氏梦一巨神手擎火珠自天而降，云："我乃天火之精，玉帝之将，欲降胎为神。"张氏觉得赤光被体，因而有妊。于后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 142 年)诞生(一说是唐武则天长安二年即公元 702 年)。生时左胁有篆书符文 24 字，右胁有 16 字。对家人说梦见神人送给玉环，因而名之曰"琼"，字小玉。温琼"幼而神明，7 岁学步天星，10 岁通儒，经传子史天文等书靡所不通，19 岁科第不中，26 岁明经射策亦不中。"温琼拊几感叹道："吾生不能致君泽民，死当为泰山神，以除天下恶厉耳。郁抑间，忽见苍



周元帅



温元帅

龙堕珠于前，拾而含之，流于腹。于是温琼瞬间变幻，“面青，发赤，兰身狰猛，握简，游衍坐立，英毅勇猛”。他并显金盟玉字曰：“有能行吾法，诵吾偈者，慈惠民物，以伐妖精，治病驱邪，吾当显应，斯言不忘！”

东岳大帝闻其勇猛，召为佑岳之神。玉帝又封他为“亢金大神”，并赐玉环一只，琼花一朵、金牌一面，上有“无拘霄汉”四字，这是出入天门的特级“通行证”。五岳众神将中，只有温琼有此殊荣。以后36代张天师及蜀中叶天师用其符召之法，为人除灾，十分灵应。宋代，温琼被封为翊昭武将军正佑侯、正福显应威烈忠靖王。

《北游记》第十九回中，有个威灵瘟元帅，形象、法宝及武器，皆与温琼相同，只是姓名及出身有些不同。这个瘟元帅姓雷名琼，成神前是个很有牺牲精神的平民——卖豆腐的。说是班竹村人人作恶，玉帝大怒，派瘟神使者去灭班竹村。使者把药交给了土地爷，让他放在井中，瘟死全村人。全村只有卖豆



温　琼

腐的雷琼是善人，有玉帝的“特赦令”，可免一

死，土地爷把内幕偷偷告诉了雷琼，雷琼不愿自己独生，心想：不如用我一死，救了全村。于是，他把土地爷的毒药抢在手里，一气吞下，即对瘟死在地，四肢青黑。雷琼舍己救人的精神，使玉帝大为感动，就封他为“威灵瘟元帅”——盖为遭瘟而死。并赐他琼花一朵，金牌一面，上有四字“无拘霄汉”，出人天门无忌。后派他做了真武大帝的部将，在降妖时得了两件宝器：玉环和铁筒。

温琼的庙宇，有的叫广灵庙，有的叫温将军庙，最有名的为温州忠靖王庙(温在宋时曾被封为忠靖王)，俗称元帅庙。在每年阴历五日，温琼“诞辰”之日，人们要抬着他的神像在街上游行，用来驱赶疫疠。

在《北游记》中，马、赵、温、关四元帅都被真武网罗门下，成为其手下36员天将之中的第四位。到了清代，又有了“马、赵、温、周四大将”的说法

《红楼梦》第一〇二回写大观园冷落以后，闹起鬼来，贾赦请道士来园中作法事驱邪逐妖，坛场上中间供着三清圣像，两旁即设有二十八宿及马、赵、温、周四大将神像。马、赵、温已经述及，这周元帅又是一“莫名其妙”。在众多谈仙说怪的书中，并未见其名号。唯能提供一点线索的是《北游记》第十三回，根据他与马、赵、温三元帅的关系、地位，这个“周”当是风轮周元帅广泽大王，生得赤发獠牙，用着风轮，手提大刀，见人有好物美色，即用风吹入洞内享用。他的绝招是念动真言，风轮中便狂风大作，可把对手吹到33天之外。后真武帝将其降服，玉帝封他为风轮元帅，随真武行道。

在民间，道士为人家作法祈祷时，有请神仪式，即口念一个个神名号，有时多达百十个。其中即有马、赵、温、关、周几位名号，周的名号是“雷门主令风轮周大元帅”。

此外，还有岳、赵、温、康四大元帅的说法。岳，即岳飞、岳武穆王，死后世人祀之为神。第四位康元帅是“仁圣康元帅”康席。据《北游记》，他本为西安府黑公林一妖，在仁圣兴妖作怪，杀人越货。后被妙乐天尊降服，玉帝封其为“仁圣康元帅”，手执金斧，助真武降魔。《三教搜神大全》则谓其生而慈善，不伤蝼蚁，“四方谓之能仁，声闻天下”，故有“仁圣”之誉。这与《北游记》的说法截然相反。他与温琼一样，都在东岳十太保之列。

因佛教有四大天王(四大金刚)，威风凛凛，无人不晓，给佛门增添了不少光彩。这也引得道门十分羡慕，道教也必得增加四大元帅的编制，给道门“风光风光”。但道教不如佛教“严谨”，故四大元帅(四大将)有了几种说法，好在民众并不在乎，更不会深究，让他们尽管并存。这也反映了道教这一多神教的特点。

关圣帝君

一说关公、关羽，或者关云长，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关羽是如何由人而成“神”的呢？旧时他的香火又如何呢？

北京是明清两朝的国都，而关帝崇拜在明清乃至民国，是兴盛时期，因此北京颇具代表性。旧时北京哪种庙宇最多呢？正是关帝庙。据《京师乾隆地图》所载，当时城内专祀关帝和以祀关帝为中心的庙宇加起来，竟达116座，几占北京城内全部庙宇总和的二分之一，为京城庙宇之冠。仅次于关帝庙的是供奉观音菩萨的观音庵、观音寺、白衣庵、白衣观等，有108座。其次是土地庙与真武庙，各有四五十座。再次是火神庙、地藏庵、五圣庙、天仙庵、三官庙、龙王庙、玉皇庙等，各有二三十座。

北京的关帝庙，如果加上郊区、县的数字，当会超过200个。真可谓“关庙遍北京”了。前明王朝甚至在宫中宝善门、思善门、乾清门、仁德门、平台之西及皇城各门，皆供关圣之像(《酌中志》)。京城九门的月城内，亦



皆有关庙。清朝甚至在“万园之园”的圆明圆中，也要建造几座关帝庙，可见其影响之大。

关老爷的香火为何如此之盛？关羽如何由将军而高升为“帝君”、“大帝”的？这里边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

关羽字云长，河东解良人（今山西运城解州）。

陈寿《三国志》对关羽生平有详载：东汉末年，关羽亡命奔涿郡。当时刘备在乡里招兵买马，他与张飞往投，誓共生死，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后世传为佳话：“桃园三结义”。官渡之战前，曹操分兵东征，大败刘备，关羽被俘。曹操封其为偏将军、汉寿亭侯。以后挂印封金，仍投奔刘备，被派镇守荆州。刘备为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率众攻曹军。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后孙权派将袭荆州，他因骄傲轻敌，兵败被杀。死后谥为“壮缪侯”。

其实，自魏至唐，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并不大。从宋以后才大走宏运，青云直上。关羽庙这才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宋哲宗封其为“显烈王”，宋徽宗封其为“义勇武安王”。元代加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特别是元末著名长篇讲史小说《三国演义》的产生，使得关羽名声大震，在民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历史上地位并不很重要的关羽，在小说中被描绘得极为完美，俨然为勇武和忠义的化身。关羽的美誉不但在刘关张三兄弟之首，甚至跃居历代名将之上，成为“古今第一将”。正如湖北当阳关陵的一副对联所云：

汉朝忠义无双士；
千古英雄第一人。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明神宗加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甚至让陆秀夫、张世杰（二人为南宋末大臣，抗元兵败殉国）为其左右丞相，岳飞为元帅，尉迟恭为伽蓝（护法神）。清代顺治皇帝更甚，对关羽的封号竟长达26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关羽由一员武将而升为“王”，升为“帝”，以至“大帝”。其名义上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人间的帝王。



由于帝王们的推崇,关羽的地位无比显赫,不但成为民间供奉的神明,而且成为国家祭祀的高级神祇,还充当了皇家的保护神。佛、道二家也争相把关羽拉进自己的教门,以壮声势。

佛教有天台宗隋朝智颤大师在当阳玉泉山建立精舍,关羽请求受戒,寺成后关羽为该寺伽蓝(寺庙护法神)的说法。这种说法宋代开始流行,以后各寺院争将关羽列为本寺护法神。如著名的杭州灵隐寺中十八伽蓝神之旁,就加了个关羽神像。山西交城万卦山著名的天宁寺中,在大雄宝殿旁就建有关帝庙,另一侧为观音殿。意味着关帝与观音可平起平坐。有趣的是,北京最著名的喇嘛庙——雍和宫的西跨院中,也有座宏伟的"关帝殿",殿内正中即供奉着一尊精美的关羽铜铸坐像。中国本土的道教,更把关羽奉为"荡魔真君"、"伏魔大帝",甚至附会其前身为雷首山泽中之老龙,又制造了种种"神迹",以张大其灵验。于是,关公成了儒、释、道共同尊崇的"超级"偶像。这在我国民间神祇中是独一无二的。

明清时代,关羽极显,有"武王"、"武圣人"之尊,俨然与"文王"、"文圣人"孔子并肩而立。由于关帝被说成具有司命禄,佑笠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乃至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等"全能"法力;所以,民间各行各业,妇孺老幼,对"万能之神"关帝的顶礼膜拜,是远远超过孔老夫子的。再者,关羽是一位义气千秋、忠贞不二、见义勇为的英雄好汉。《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旧时江湖义气的楷模,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再从统治阶级方面来说,用集忠、孝、节、义于一身的关羽,来"教化"亿万臣民,是强化封建统治的再好不过的"灵丹妙药"了。以上这些,就是为何过去关庙数量最多、遍及天下的主要原因所在。

关帝庙数量大,名称不一,种类各异。可分专祀和合祀两大类。

专祀关羽的庙宇:

关帝庙　关圣庙　关王庙　关圣帝君老爷庙　这些是常用的庙名。因为关羽曾被封为王、帝、关圣帝君,故名。老爷庙是民间的俗称,特别是农村,常爱把关帝称作"关老爷",所以关庙就称"老爷庙",既尊崇又挺亲节。有些庙历史悠久,名气又大,逐渐成为所在街巷的地名。如北京过去就有关帝庙街(今崇外南羊市口街)、关帝圣境胡同(今崇外薛家湾胡同)、关王庙(今广外滨河巷)、关王庙街(今西厅胡同)、老爷庙胡同(今西城勤劳胡同)等。

伏魔庙　伏魔庵　因明神宗曾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故名。据《乾隆京城全图》,当时京城有伏魔庙(庵)25座。

白马关帝庙　又名汉寿亭侯庙,在地安门以西。明永乐年间,成祖特赐龙凤黄旗一面,揭竿竖之,以彰威灵。清代乾隆时,又将



门殿全部换成黄瓦。明清皆派官致祭。此庙何以有“白马”之名？有二说。其一曰“昔慕容氏都燕罗城，有白马前导，因以为祠”（《宸垣识略》）。另一说法：“明英宗梦见帝乘白马，故名”（同上）。因《三国演义》中关羽骑的是有名的赤兔马，故白马关帝庙十分著名。

双关帝庙 庙内关羽、岳飞合祀。“双关帝”者谓何？民间说法，岳飞乃忠义神武之关羽转世，故能精忠报国，两人合祀称“双关帝庙”。

高庙 关帝高庙 由于此处关帝庙高于四周而得名。北京曾有多处。

白庙 红庙 此为俗称。指庙宇围墙而言。关帝庙多为红墙，称“红庙”；少数为白墙，称“白庙”。据说白庙若涂上红色，即有灾祸。

倒座关帝庙 关羽被封为关圣帝君，享有帝王之尊，庙宇可用黄色琉璃瓦，一般建置为坐北向南。但北京西单安福胡同内的关庙却坐南向北，与众不同，故称“倒座”。庙门曾有石额曰“古刹倒座关帝庙”。

关帝庙的名目尚有一些俗称。

关羽与其他神明合祀的庙宇有：

武庙 又称关岳庙。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下令在鼓楼西建关岳庙，关羽、岳飞合祀。

三义庙 合祀刘备、关羽、张飞。

五虎庙 合祀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西蜀五虎上将。

姚斌关帝庙 取材姚斌盗马故事。殿内关帝像正坐，怒视姚斌。姚斌袒衣赤足，系发于柱，勇悍不屈之色可掬。其余诸将皆仰视帝指而属意姚斌。马顾关羽若长鸣仰诉之态。

七圣庙 关羽与赵公明、土地爷、天仙圣母、二郎神、财神爷、火神爷合祀。也有的是关羽与龙王、药王、土地、财神、雷神、青苗神合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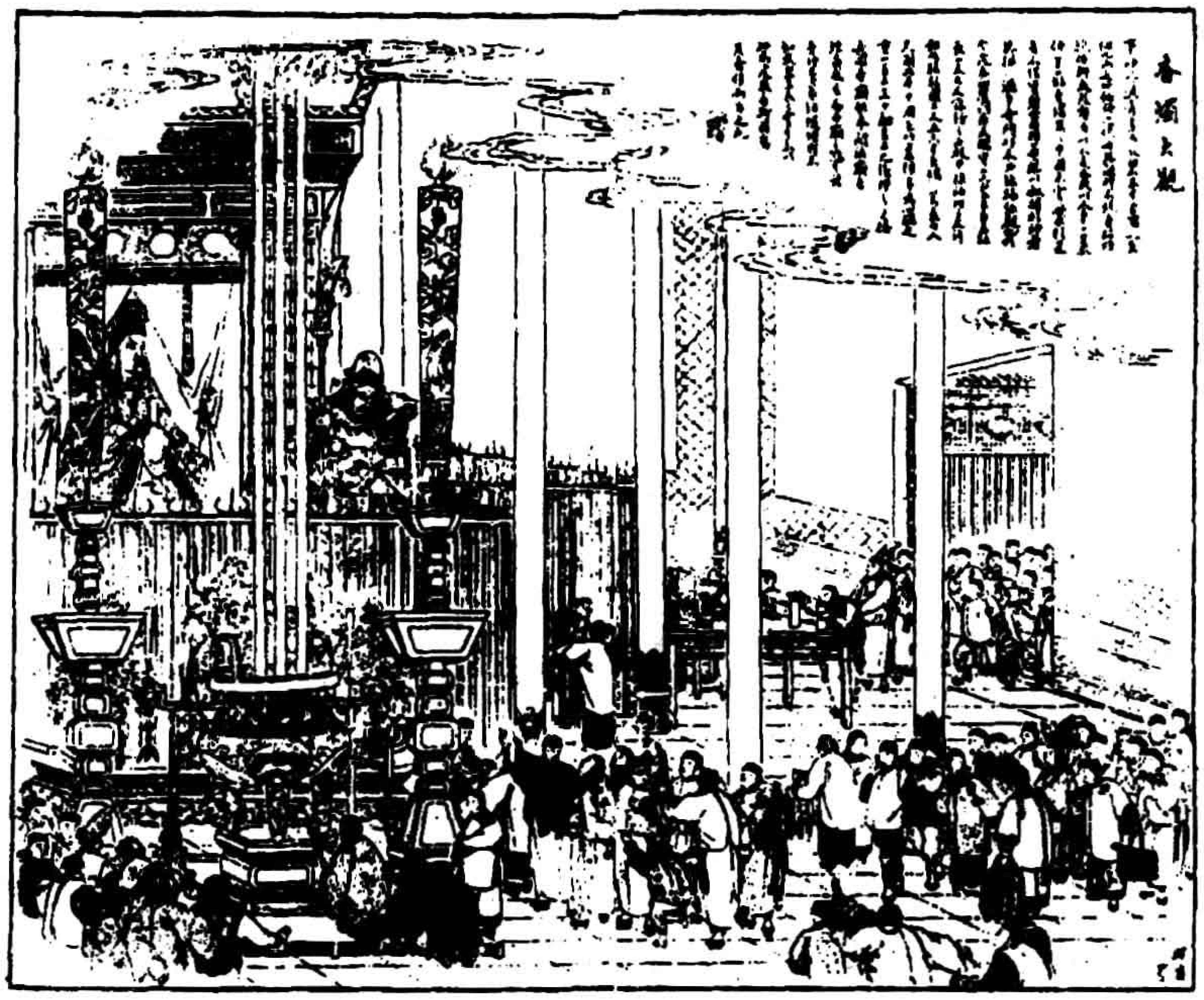
虽说全国的关庙多如毛，但论起气派大，名声响，称得起“关庙之最”的，应当首推关爷家乡的一座。山西运城县解州西关的关帝庙是全国规模最大、最为壮观，也是保存最完好的“关庙之最”。此庙占地近30亩，中心建筑春秋楼宽7间，进深5间，高达30米。楼内关羽彩塑坐像，极为逼真传神。庙内建筑满是黄、绿、蓝三彩琉璃饰和瓦件，富丽堂皇，十分壮观。庙内有一副著名的对联：

三教尽皈衣，正直聪明，心似日悬天上；

九州隆享祀，英灵昭格，神如水在地中。

此联为秦潼泉所作。秦氏何许人？清乾隆时状元、南宋第一大奸臣秦桧之后人也。

关老爷誉满全国以后，很快占领了戏剧舞台。有关关羽的剧目多达数十种，成为独特的“关公戏”，关公戏作为一种专门行当，有自己独特的唱腔和服装道具。关公戏在清代还有特殊规定。



关帝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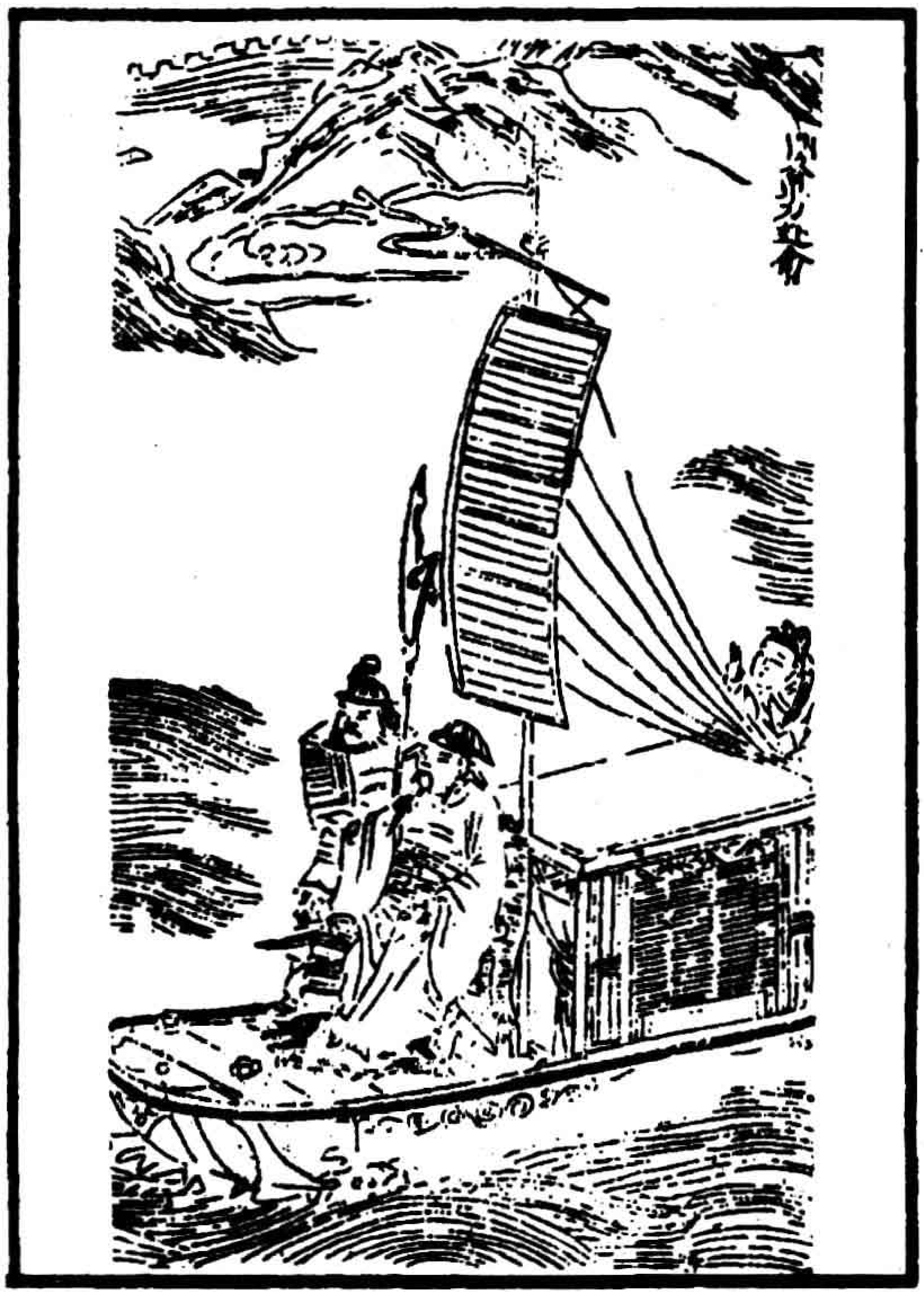


清代对孔子、关公这两位文武圣人，极为尊重。孔、关二人的名字皆避讳，羽字虽不能严重避，但要将笔画少写两笔。清末朝廷曾下令禁演关公戏，因违禁，官府非要把班主程长庚带走不可。后经很多人说好话，才将别人带走了事。此后，各戏班再不敢演关公戏了。后来禁令稍松，三庆班演全本《三国演义》，又上了关公戏。但通名时仍不许称“关羽”二字，只称“关”字，本人则称“关某”，别人都称“关公”。

据说戏班在宫里给西太后演关公戏时，只要关羽上场，皇上和慈禧全都离座，假装散步，然后再坐下。《走麦城》是绝对不许演的。扮演关公的演员，演前一周需要净身，不准有房事，在台后要供关公神位，焚香礼拜，这些规矩是其他戏根本没有的。

旧时求签迷信十分盛行，人们常去庙中在神佛面前抽签来占卜吉凶。关庙中用来占卜的专用签称“关帝签”。北京名气最大的“关帝签”要属正阳门月城内的关庙了。

这座庙规模并不大，很小，但庙小神灵大，遐迩闻名。明代帝王对此庙十分重视，连



庙中的关帝雕像也是宫内移来的。此处地势极好，处于市中心，开庙时人山人海，烧香求福者络绎不绝，求“关帝签”来占卜吉凶的，更是热闹非凡。正如《都门竹枝词》里唱的：“灵签第一推关庙，更去前门洞里求”。

近代社会的许多帮会，如哥老会、青红(洪)帮等尤敬祀关帝。一些重大活动，都要求签问卜。关帝崇拜，在台湾和香港至今兴盛不衰。

关羽在台湾，备受尊崇。除了享有大陆上的全部尊号以外，还有“伽蓝爷”、“恩主爷”、“恩主公”等称呼。台湾并不是很大，但关庙倒有 160 余座，而且还在不断地建造规模宏伟的新关庙。如新竹县普天宫新塑的关羽神像，连台座竟高达十四五丈！“爱乌及屋”，为关羽扛大刀的周仓也沾了光。周仓原本不过是关羽的警卫侍从，一般他只有侍立一旁，听候差遣的份儿；可在台湾，周仓也高升为正神，各地建了不少周仓庙，与关老爷同享香火，大陆也有一些周仓庙。

阴历五月十二日是关帝的生辰，届时，港台各大关庙皆举行盛大祭典，隆重无比。在电子时代的发达社会中，人们依然争相虔诚地在关羽面前，上香叩头，顶礼膜拜，祈望“恩主爷”降恩降福。更多的人在求签问卜，祈求关老爷的“神示”。这一奇特现象，是耐人寻味的。

灵官马元帅

在道教诸神中，有几位三眼神将，都非常厉害。如二郎神杨戬、玉枢火府天将王灵官，都十分了得。此外，还有一位有名的“三只眼”，即“灵官马元帅”。俗话说：“马王爷三只眼。”至今还常听有人向对手示威道：“叫你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可见马王爷的厉害。这“马王爷”就是灵官马元帅的俗称。



马元帅

灵官马元帅又叫“三眼灵光”、“三眼灵耀”、“华光天王”、“花酒马灵官”、“马天君”

等。

《三教搜神源流大全》卷五有一篇“灵官马元帅”称，他本是如来身边的至妙吉祥。因为毁了“焦火鬼坟”，违反了佛家慈悲为怀的教义，罚他下凡。于是以五团火花托胎于一马姓家，生下后三只眼，母亲就叫他“三眼灵光”。马灵光生下三天就会打架，为除水孽杀了东海龙王，很像哪吒闹海。为报仇，偷走紫微大帝的金枪而被杀。灵光又“寄灵”于火魔王公主为儿，出生后，左手有个“灵”字，右手有个“耀”字，故又名“灵耀”，开始了第二次“显灵”。他拜妙乐天尊为师，学得“风雷龙蛇首或鬼安民之术”，并得三角金砖。他神通广大，收500火鸦，降乌龙大王，斩扬子江龙。玉帝让他掌管南天事，并赐琼花宴。宴上金龙太子惹恼了灵耀，火烧南天门，大败天将，又下海大闹龙宫。后被追得走投无路，只好投胎于鬼子母。鬼子母有500个儿子，中国民间常把她称为“送子观音”、“送子娘娘”。（详见拙著《中国佛教诸神》中“鬼子母”一字）马王爷第三次“出世”后，为救母亲，入地狱，步灵后，过酆都，入鬼洞，战哪吒，窃仙桃，又像是孙猴子闹三界。不料，他又与齐天大圣大打一通，后来如来佛为他俩和解。玉帝看他是个将才，让他当了真武帝的部将。世间百姓对他极为虔诚，凡有“妻财子禄之祝，百叩百应”。

灵官马元帅的以上事迹，并不见于《佛经》、《道藏》。据近人叶德辉考证，《三教搜神大全》应为元版《搜神广记》之异名。就是说，马王爷的故事至迟于元代就已在民间流行。到了明代更编为杂剧广泛演唱，故明人沈德符说：“华光（即灵官马元帅）显圣、目连入冥、大圣收魔之属，则太妖诞”。明人余象斗根据《三教搜神大全》的内容，编了一部《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简称《华光天王传》），又名《南游记》。此书收入《四游记》中。余象斗把一篇500来字的履历表，演为一部四卷十八回近5万字的小说，增加了许多情节。妙祥因烧死独火鬼，被如来贬去马耳山娘娘腹中抽胎，并赐他第二只眼，所谓“天眼挪门，可见三界”。出生即为三眼灵光，为报父仇，杀死龙王。偷紫微大帝金枪被困而死。复投胎炎玄天王家而为“三眼灵耀”。大闹琼花会后，自号“华光天王”。（《三教搜神大会》叙灵官马元帅三次“显圣”后，无此名号。）此后主要敷演华光救母故事，闹天宫、闹人间、闹地狱，终于皈依佛教。于是华光永镇中界，万民求男生男、求女生女，买卖一本万利，读书人金榜题名，“感显应验，永受祭享”。

华光救母的故事，大概受了流传广泛的目连救母（详见拙著《中国佛教诸神》中“目连”一节）的影响，但情节更为热闹。有趣的是，书中还专有一回，讲“华光与铁扇公主成亲”事。

“花酒马灵官”的名目出于《北游记》（又作《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全传》）。真武大帝收伏华光之时，喝道：“来者何人！不得无礼！”华光答道：“某乃在此名胜，好酒贪花，号作花酒马灵官是也。”但书中（包括《华光天王传》）并未写他“好酒贪花”的风流韵事，即他与铁扇公主成亲之事，亦是二人有“宿世之缘”故。总之，“花酒马灵官”并不像个“花花太岁”，名不符实也。

一些城隍庙中祀华光大帝，南方亦有许多主祀华光的华光庙。旧时，民间也有供奉华光大帝牌位的（与其他神合祀）。照《华光天王传》和《北游记》的说法，华光乃“火星”，是“火之精、火之灵、火之阳”，玉帝曾封他为“火部兵马大元帅”之职，法宝除金砖外，尚有“风龙降火龙数条”及“火丹”，只有真武帝用北方壬癸之水，才将其制服。所以民间又视其为火神。道教把他的“神诞”（生日）定为阴历九月二十八，可他八月初一就由天上下凡，如果八月初一这天下雨，那么一年的火灾就会少。因此，旧时南方旧历八九月间，街街巷巷，都要作“华光醮”，三四天不等。打醮的目的，是为了免除火灾，届时每家预备腊烛、冥

钱、火炭、鸡毛，以及柴米油盐等，捆成一堆，放在门口。打醮的最后一天，五更时分，有一班人打着明锣从门口经过，把这些东西放在大筐内，再放进一只纸糊的大纸船里烧掉，叫做“送火灾”。打醮的日子，张灯结彩，迎神赛会，街坊邻众，齐往参拜，在娱神的迷信气氛中，倒也洋溢着娱人的欢乐情绪。

宋人鲁应认为马灵官(华光)即佛教中的“华光如来”。华光如来，即释迦如来的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详见拙著《中国佛教诸神》中如来十大弟子一节)，舍利弗与三眼灵光、灵耀、花酒马灵官是没有关系，有的学者又认为华光即王灵官，似嫌证据不足。

元明杂剧中即有《华光显圣》，演华光事。元末杨讷写了《西游记》杂剧，共六本 24 折。此剧与小说《西游记》有异同。观音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奏明玉帝。玉帝派十大保官保护唐僧沿途无事。华光天王即为十大保官之一。第二本即演华光事。



华　光

萨　真　人

萨真人，历史上实有其人。真人是对“修真得道”或“成仙”之人的称谓，也用来称呼著名道士。萨真人姓萨名守坚，是西蜀人。年轻时学过医，不过医术低劣，是个庸医，曾经开错了药，药死了人。于是弃医学道。当时是北宋末年，萨守坚听说江南第三十代天师张虚静及林灵素、王侍宸三位最有道行，就前往投奔。走到陕西境内，已是囊空如洗，分文皆无。正在发愁，只见来了三个老道，问他何所往，萨守坚如实相告。一老道摇摇头说：“天师已羽化矣。”所谓“羽化”，是指道士去世。道士避讳“死亡”字样，道士死，美其名曰“羽化”或“仙化”。再问林灵素何在，答道：“亦化矣。”又问王侍宸，答道：“亦化矣。”萨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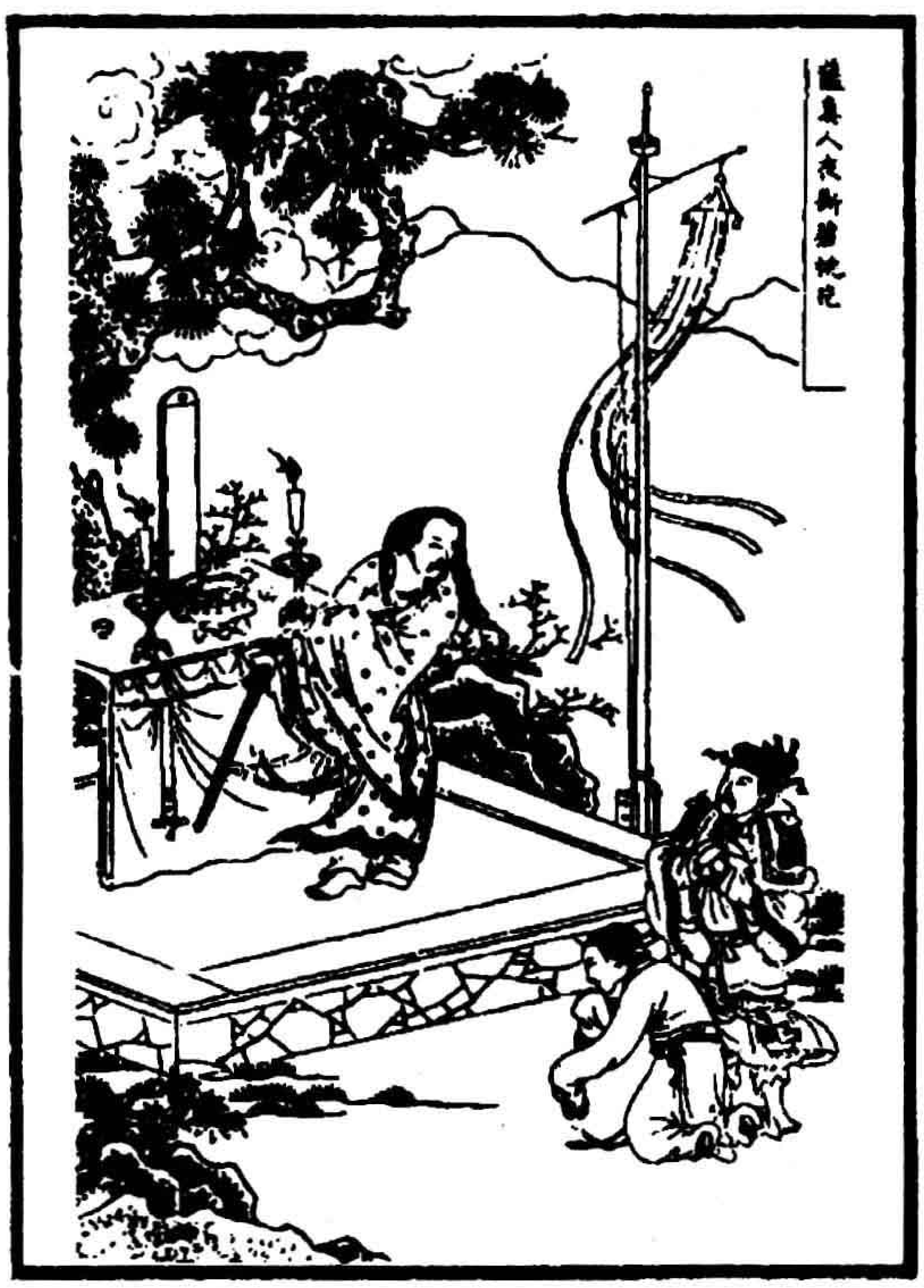


萨守坚

坚听了大失所望。

此时，一老道对他说："如今新天师道行也很高明，我跟他是好朋友，我给你写封信，你可去拜访他。我看你身无分文，授你咒枣之术。咒一枣可取七文，一天咒十枣，就能得七十文，足够一天的花销了。"另一道人曰："我有一雷法，也传你吧。"于是萨守坚学得了秘法。第三个老道给了他一把棕扇，对他说："遇有病者，一扇就会痊愈。"

于是萨守坚每天共咒百余枣，止留七十文作为日用，其余六七百文全都施舍给穷人。等到了信州，去天师家投书，全家见书大哭，原来所捎之书正是张虚静天师的亲笔信。信中说："吾与王侍宸、林天师遇萨君，各赐一法授之矣，可为参录奏名。"萨守坚这才知道，路遇的三位道士正是自己要投奔的三位高道。此后，萨守坚大显道法，遐迩闻名。后被玉帝封为"天枢领位真人"。



萨真人的神仙故事，在元代即已流行。当时有杂剧《萨真人白日飞升》和《萨真人夜断碧桃花》。前剧已佚。《萨真人夜断碧桃花》今尚存。戏演张道南与徐碧桃系未婚夫妻，两人某日在园中偶遇相谈，被碧桃父——知县徐端撞见，徐端怒责其女，碧桃一气身亡，葬于园中。后张道南举第，做了本地知县，赴任至园，适逢碧桃盛开，追思旧游，忆碧桃不已，是夜忽见女，赠以词，由此得疾。徐端派嬷嬷去看他，并答应将次女玉兰许给他。张道南的父亲请萨守坚真人设坛，提来徐碧桃的鬼魂，查明她阳寿未终，又和张道南有姻缘之分，并查出玉兰阳寿已尽。于是令碧桃借玉兰尸还魂。玉兰果暴亡，苏醒后，则自称碧桃，叙前事历历。萨守坚乃道其详。两家遂再合姻缘。

明人邓志谟还撰写了小说《萨真人咒枣记》，二卷十四回。书中所叙萨守坚事，兼采宋元人记载并多里巷之谈。小说述萨守坚入衙为吏，为医误药，三神仙授法，见张天师，收王恶(即王灵官)，往酆都，游地狱等事。不过，萨真人在世俗中的名气和地位，远不如他的徒弟王灵官。

王 灵 官

据《列仙全传》卷八说：王灵官本名王善，是湘阴城隍庙的城隍。萨真人得道后，路过湘阴，就住进了城隍庙。几天后，当地太守梦见城隍告之曰："有个姓萨的住在庙里，闹得我挺不方便，请替我把他赶走。"天一亮，太守带人来到庙里，马上把萨真人轰走了。萨真人怀恨在心，走不多远，见有人抬着一口猪到庙里还愿，他拿出一把香交给他们，说："还完愿，替我烧烧香。"这些人如约办理，不料忽然来了一阵雷火，把城隍庙烧了个精光。萨真人出于报复心理，用法术把人家的"家"全毁了，闹得城隍老爷没地方安身，看来萨真人也



王灵官

是个肚量狭小之人。还有一种说法,《三教搜神大全》卷二称,萨真人路过此处时,见人用童男童女活祭本处庙神,大怒道:“此等邪神,即焚其庙!”说罢,雷火飞空,立焚此庙,人莫能救。

此后萨真人云游四方,遍行救济。十数年后,来到龙兴府,正在江边洗手时,水中冒出一员神将,方脸膛,黄巾金甲,左手拽袖,右手执鞭,对真人说道:“我是先天大将火车灵官王,久值灵霄殿,奉玉帝之命庙食湘阴,以惩此方恶业。自真人烧我庙后,我便偷偷相随十二年,伺机报仇。不想真人功行高,又将供职天廷,我愿为部将奉行法旨。”这里,又把王灵官说成本是玉帝的御前大将了。还说他司天上、人间纠察之职。《明史·礼志》说的还算有些接近事实:“宋徽宗时,尝从萨守坚传符法”,又说“灵官受法萨守坚,萨复受法于林灵素,而林乃一诗弈道士耳。”就是说,王灵官是宋徽宗时人,是宋朝著名道士林灵素的再传弟子。

王灵官的走运,归功于明朝永乐时的一个道士周思得。永乐年间,杭州道士周思得来京,“以王元帅法显京师”。元帅者,世称灵官,二十六天将中,他居第一位。周思得在北京“行灵官法,知祸福先,文皇帝(朱棣)数试之,无爽也”。以至“招弭祓除,神鬼示魁 ,逆时雨,远罪疾”,无所不能。朱棣大喜,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将庙及祖师殿,以祀萨真人和王灵官。宣德年间,明宣宗改庙为观,称“火德观”,并封萨真人为崇恩真君、王灵官为隆恩真君,又在观内建崇恩殿、隆恩殿。成化年间,明宪宗进一步改观为宫,称“显灵宫”。四季为二神更换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复换新袍服,珠玉锦绮,所费不措。而且规定,每年万寿圣节(皇帝生日)、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现之日,皆遣官致祭。此时是王灵官最红火的时候。

有意思的是,永乐时,有个世传的灵官藤像被明成祖朱棣得到,藤像分量很轻,朱棣就把它放在寝宫,“崇礼朝夕,如对宾客”。朱棣雄武有大略,征战一生。每次征战,都要带上灵官藤像,作为军中保护神。第五次出征漠北,打到金川河时,突然藤像重得抬不动了。成祖祷告,答曰:“上帝有界,止此也。”不久,朱棣果然重病,不能前行,终于病死返京徐中。把偶然巧合,附会为神明的“灵验”,在稗史笔记中不胜枚举。藤像作答,实属荒唐,但从中我们倒可看到灵官信仰的深远。

后起的道教为扩大影响,争夺信徒,就要与颇有实力的佛教相抗衡,其中之一就是同佛教一样,造出众多冗杂的神明。只要佛教设置了何种职掌的佛神,道教也必安排相应的道神。佛教有个重要的护法神韦驮,被派到寺庙去镇守佛殿,道教便把灵官作为重要的护法神将,去镇守道观山门。佛教的经书最后一面,必有一韦驮像;道教的经典最后一面,也准刻一灵官图。

灵官一般安置在山门后的灵官殿内,有的山门殿即是灵官殿。灵官殿相当于佛庙的

天王殿。王灵官的形象也不尽相同，大多威武凶恶：红脸膛，额上还有一眼，三目圆睁，锯齿獠牙，虬须怒张，披甲执鞭，确有镇妖压魔气魄。也有些灵官像威武而不凶恶。灵官造像以北京白云观、天津娘娘宫、武汉长春观、苏州玄妙观以及武当山元和观等处最有名。天津娘娘宫前殿（灵宫殿）的王灵官像个火神爷，红脸，三目怒视，顶盔贯甲，左手持风火轮，右手拿单锏。因他是保护海神娘娘的，人们就叫他“镇海神”，还给他挂了一副对联：

三江六河主；

五湖四海神。

有趣的是，湖北道教胜地武当山中，还有“五百灵官”之说。在天乙真庆宫（又叫南岩石殿）内，环列着五百尊铜铸饰金的灵官像，各高尺许，神态各异。据《太和山志·圣迹》载：净乐国王太子（即后来的真武帝）在武当山修炼时，国王思念太子，令大臣率百众，至南岩“传启王命，部众忽僵仆不能举，同声告曰：愿从太子学道。”于是俱隐山中，太子成仙后，五百众皆登仙道。后人造五百灵官像供祀。当然，这与佛教五百罗汉之说虽各有不同，却颇有类似之处。

由于王灵官曾被封为“玉枢火府天将”，人们又把他看成火神，有的灵官像就是一副火神爷模样，故有的火神庙也供灵官。

耐人寻味的是，灵官本为道教的神仙，是专门守护道观大门的。可有时却被佛教拉去，充当寺院的门官儿。如佛教胜地九华山金地藏（地藏王）肉身宝殿对面，即有一座灵官殿，原有王、马、赵三灵官，即王灵官王善、马灵官华光、赵灵官赵公明，现存王、马灵官，赵灵官在文革期间被毁。此外，在灵官殿后正天门以及甘露寺、祇园寺等处，均有灵官塑像。原来，事出有因。九华山灵官塑像的出现，是在金元之际。当时全真道的创立者王重阳，立主儒、释、道三教合一。他宣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又谓“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所以，道家之神给佛家看门，倒也相安无事，没有引起什么纠葛。在庙观中，佛中有道，道中有佛，二教融合的事例，并不少见。

灵官塑像无观不在，有的灵官像两侧，还悬有一副联语：

三眼能观天下事；

一鞭惊醒世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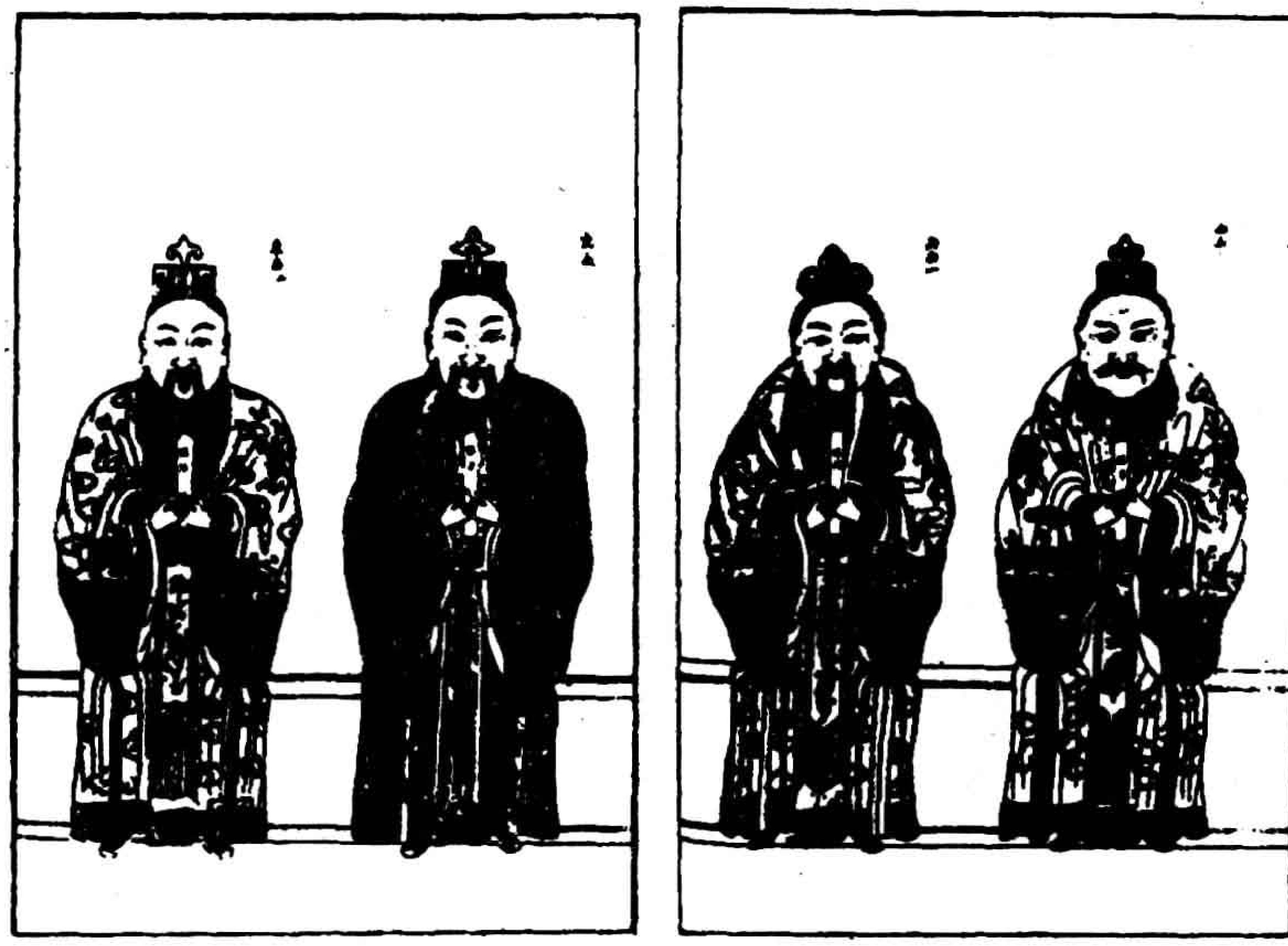
王灵官，道教一般说是宋徽宗时的王善，但也有说唐太宗时人王恶。据《三教搜神大全》卷四，说他有“膂力，性刚暴质直”，曾焚烧一江湖古庙，忽怪风大作，适值萨真人赶到，遂作法反风而灭妖。玉帝封他为豁洛王元帅，赐金印，掌监察之职。看来，此神是由王灵官附会衍生而来。在明代小说《萨真人咒枣记》和《北游记》中，皆作王恶。

旧时昆曲、京剧正式节目开场时，都要加演一种不唱不说的舞蹈节目，即“跳加官”。“加官”多脸戴面具，打扮成天官模样，这是跳天官，还有的是跳财神、跳灵官。跳天官是为了“赐福”和“升官”，跳财神当然为了“发财”，而跳灵官则为了“驱邪”。过去清朝统治者就很信这一套，宫廷中演戏时，照例要先演“跳加官（灵官）”：

> 龙虎山只灵官一人，当门接引，三只眼，红须红袍，左手挽袂，右手持杵。宫内演戏，则用灵官十人，选名角十人跳之；形象须袍，皆仿龙虎山灵官状。据《升平署志》所载，有全班出而跳灵官者。清亡，不复跳灵官矣。

四值功曹

四值功曹，是道教所信奉的值年、值月、值日、值时的四位小神。“功曹”本为人间的官吏名称。在汉朝是州郡长官的帮手，在功曹、功曹史。主要工作是考查记录功劳，掌管功劳簿。北齐以后叫功曹参军。到了唐朝，在府的还叫功曹参军，在州的则叫司功参军。



四值功曹

道教在编织神仙天廷世界时，也给玉帝等大神配备了这一记功官。

《西游记》谓，孙悟空大闹蟠桃会，反出天宫后，玉帝大怒，即派四天王，协同李天王并哪吒太子，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星辰、五方揭谛、四值功曹等，布下了一十八架天罗地网下界，来捉那妖猴。不过这场恶战四值功曹倒落了个轻闲，天兵天将被齐天大圣打得大败，哪有什么功劳可记？后来还是请来了二郎神，才拿住了孙猴子。

四值功曹除了是记功官，还作守护神将。他们和护教伽蓝、六丁六甲、五方揭谛等，奉菩萨法旨，暗中保护唐僧。每当唐僧遭难，孙悟空又不在身边时，他们就成了唐僧的保镖。此外，他们又充当传令官。如第三十二回《平顶山功曹传令　莲花洞木母逢灾》，就是值日功曹变了樵夫给唐僧师徒通风报信，让他们事先做个准备。四值功曹中以值日功曹最累，因为他每天值日当班司事，又叫当值功曹。古典小说中，写法师、道长作法请神时，动不动就是：“值日功曹何在？”还得随叫随到，怎能不累？

功曹本为书吏，道士们自然不会让他们闲着。他们宣称，凡是人间“上达天廷”的表文，焚烧后就是由四值功曹“呈送”的。如《金瓶梅》第三十九回，写西门庆在玉皇庙打醮，道观铺设许多文书符命，其中一道就是请功曹符使等神“捧奏三天门运递关文”。第六十六回，黄真人炼度荐亡时，斋坛上“金童扬烟，玉女散花，执幢捧节。监坛神将，三界符使，四直(值)功曹，城隍社令，土地祇迎，无不毕陈”。《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后大办丧事，僧道念经作法的宣坛上有榜文也书写着“恭请诸伽蓝、揭谛、功曹等神，圣恩普锡(赐)，神威远镇”等语。

《金瓶梅》和《红楼梦》是明清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道教和世俗对四值功曹的信奉，于此可见一斑。

六 丁 六 甲

六丁六甲与二十八宿、四值功曹、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等，都是道教中常说的神将群。道士斋醮作法时，常用符箓召请他们“祈禳驱鬼”。道经中即有《灵宝六丁秘法》和《上

清六甲祈祷秘法》。早在汉代，就有方士用六丁之法“占梦”。《后汉书·梁节王传》即载梁节王“数有恶梦，从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梦。”他役使六丁的方法是，先斋戒，然后其神至，“可使致远方物，乃知吉凶也”。后来衍变为六丁六甲。





六丁六甲是合称，包括十二位神。即六丁：丁卯、丁巳、丁未、丁酉、丁亥、丁丑；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天上九霄雷霆玉经》说：“六丁玉女，六甲将军。”《续文献通考》说的更为明确：“丁卯等六丁，阴神玉女也。甲子等六甲，阳神玉男也。”道书上宣称，六丁六甲能“行风雷，制鬼神”。

六丁与六甲，名称全取于干支，应是值日神演化组合而成。这十二神最初是真武手下大将。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就谈到他亲眼见过抚州紫府真武殿“像旁设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为女子像”。据《真武本传妙经》记，六甲神将的名讳是：甲子水将李文思、

甲戌土将李守通、甲申金将李守全,甲午火将李守左、甲辰风将李守进、甲寅木将李守迁。但这些名字与《三才图会》和《老君六甲符图》所记不同。后者所记名讳如下:

甲子神将王文卿,甲戌神将展子江,甲申神将扈文长,

甲午神将韦玉卿,甲辰神将孟非卿,甲寅神将明文章。

丁卯神将司马卿,丁丑神将赵子任,丁亥神将张文通,

丁酉神将臧文公,丁未神将石叔通,丁巳神将崔石卿。

六丁的大名,看起来实在不大像女性。六丁六甲虽为真武部将,可还得听玉帝调遣,所以他们常和二十八宿等,成群搭伙地到各处平息"叛乱"。可这12位神将,除了性别之外,很难让人记住她们和他们的名字,这是一群没有什么个性的"乌合之神"。

作为宗教艺术品来说,六丁六甲神像也有塑得好的。武当山元和观内,有6尊精美的六甲神像,均为铜铸鎏金,各高6尺许,总重量有1万多斤。六甲的神态各异,造型巧绝,为明代所铸,具有很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

道教还有一种六甲符箓,用来"除恶驱鬼"。《云笈七签》卷十四称:

若辟除恶鬼者,书六甲、六乙符持行,并呼甲寅,神鬼皆散走。

在旧小说和戏曲中,有"六甲天书"的说法。所谓"六甲天书",是道教编撰的据称可以驱遣鬼神、呼风唤雨的法术秘书。著名讲史小说《三国演义》第一〇一回写诸葛亮与司马懿在陇上相持,孔明装神迷惑魏军,司马懿传令众军曰:"孔明善会八门遁甲,能驱六丁六甲之神。此·乃六甲天书内'缩地'之法也。众军不可追之。"小说虽依据历史写成,但诸葛孔明已被小说家神化,他的一些"法术",是后人强加的。

六 十 元 辰

北京白云观中,有一座元辰殿。元者,善也。所谓"元辰",是指吉利时日。这座元辰殿又称"六十甲子殿",供奉六十甲子神。

此殿建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至今已有800年历史。金时此殿原名称"瑞圣殿",这是金章宗为自己生母所建,为了奉祀太后本命之神。

中国古代传统的记时方法,是天干地支法。用十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申、酉、戌、亥,循环相配,由甲子起至癸亥止,共得六十,用此计年,六十年为一周,称"六十甲子"。道教吸收民间流行的"本命"说法,提出"本命星"、"本命年"、"本命日"的理论。凡本人的出生年在六十甲子干支之年,叫本命元辰,也叫本命年。如某人出生于辛巳年,那么辛巳即其本命元辰、本命年。本人的出生日在六十甲子的干支日,叫本命日。如某人生出于辛巳年丙子日,那他的本命年是辛巳,本命日是丙子。道教把六十甲子星宿化,神化,六十甲子成为六十尊元辰星宿神。并把他们附会上人名,将其塑为文、武、长、幼,形态各异的60位神仙模样。如甲子太岁金辨大将军,面目清癯,五绺长髯,奇特的是二目中各长出一支小手,手心中各托有一目,身穿长袍。乙丑太岁陈材大将军,是位年轻公子模样,身着铠甲、手执长枪。

元辰殿中,中央为三目四首臂斗姆女神,斗姆两旁为"左辅"、"右弼"二神,周围即六十元辰像。旧时习俗,礼拜本命元辰之星宿神,乞求本命星保佑自己吉祥如意,一生顺利,这叫"求顺星"。

祈禳北斗、本命星,以求延寿,在古代十分盛行。《三国演义》第一百〇三回,就谈到五丈原诸葛亮禳星之事。孔明在帐中设下香

花祭物，地上分布 7 盏大灯，外布 49 盏小灯，内安本命灯一盏。孔明在帐中披发仗剑，踏罡步斗，祈禳北斗，若七日内本命灯不灭，即可增寿一纪（十二年）。不料，大将魏延夜闯入帐中报告军情，将本命灯扑灭。诸葛亮弃剑叹道："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孔明禳星并不一定实有其事，但古人礼拜顺星却很普遍。

"本命"迷信习俗一直流传至今，民间还有把"本命年"叫做"槛儿年"的，度过本命年如同迈过一道槛儿一样。如生于龙年（戊辰年，1928 年，1940 年，1952 年，1964 年等）在龙年时要加倍小心，谨慎从事，有的还要一整年系上红裤带，以"驱凶避邪"。

六十元辰在南方同样受到信奉，过去广州金花庙中，即有六十元辰，称"当年太岁至德尊神"。

青龙　白虎

一些道观的山门内，一左一右有两位威武的神将塑像，左边是青龙神，叫孟章神君；右边是白虎神，叫监兵神君。他俩的职责是守卫道观山门，就像佛庙山门中的"哼哈二将"一样。



青　龙



白　虎

道教本有以青龙、白虎（还有朱雀、玄武）为护卫神的说法，而青龙、白虎的名目，则来源于古人对星辰的崇拜。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了"二十八宿"和"四象"的说法。（详见真武大帝一节）其中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古人把它们想象为龙的形象，因位于东方，按阴阳五行给五方配五色之说，东方色青，故称"青龙"。青龙与白虎、朱雀（朱鸟）、玄武合称"四象"，又称四方四神。这四方之神，在当时已被广泛用于军队阵列，以为保护神。军队行军的时候，"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礼记·曲礼上》），在旌旗上画上这四兽，用来标明前后左右之军阵，并可鼓舞士气，战无不胜。前人论及其作用时说："如鸟之翔，如龟蛇之毒，龙腾虎奋，无能敌此四物。"（《十三经注疏·礼记曲礼上》）。

道教兴起后，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作

为护卫神，以壮威仪。《抱扑子·杂应》中述老子《太上老君》形象时称。“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着实威风。以后，四象被人格化，还给起了名字。青龙叫“孟章神君”，白虎名“监名神君”，朱雀称“陵光神君”，玄武为“执明神君”。

后来，玄武(即真武)在同伴中脱颖而出，一步登天，跃居“大帝”高位而独显。老子出巡时，左右护卫的青龙、白虎出息不大，只当了道观的守门官，有时也给老子庙把守大门。宋朝时，岳阳地区的老子祠内，就有青龙、白虎二神像，替老子看门。

青龙、白虎二神君塑像，最精美者当首推武当山紫霄宫、五龙宫内的四尊。像高丈余，着铠持械，威严肃穆，神态鲜明，栩栩如生，是元代著名宗教雕塑家刘元一派的传世佳作，弥足珍贵。



白虎神君

金童 玉女 周公 桃花女

古人有诗云:"金童擎紫药,玉女献青莲。"这金童玉女,据道教的说法,凡是神仙所住洞天福地,皆有得道的童男童女来伺候他们,叫金童玉女。玉女本来是指仙女,后来仙人的侍女也叫玉女。据《汉武帝内传》说,汉武帝一次闲居承华殿,忽见一女子,穿着青衣。武帝大吃一惊,宫中女子从来没有这种打扮的,忙问她是谁?青衣女子回答说:"我墉宫玉女王子登也,为西王母所使。"这是王母娘娘的侍女,来替她传递消息的。金童玉女的职责主要是替主子通报传达、端茶递水,相当于"小听差"。



桃花女

神仙们虽说生活得逍遥自在,可还是不能没有人伺候,而且听差的越多越好——这当然得与级别挂钩。高级天神如三清之一的太上道君,身旁有金童玉女各30万人侍卫,共60万人听差的。真不知他怎么使唤!据《高上玉皇本行集经》,头号天神元始天尊竟有灵童玉女9千万人!元始与太上道君相比,可谓大巫小巫之别了。



玉 女

北方真武大帝的身旁,常塑有一金童、一玉女,二人捧册端宝。他俩的身份是听差加秘书。据《真武本传妙经》说,金童、玉女是分掌威仪,书记三界中善恶功过的小神,权力还不小。这两位,在南方又俗称周公、桃花。

有趣的是,金童、玉女大量出现在宋元以来的大量戏剧中,成为神仙戏的重要角色。宋元时,即有南戏《金童玉女》传奇。元代贾仲明有《铁拐李度金童玉女》杂剧,戏演王母举办蟠桃会,金童玉女一念思凡,被谪下人

间,配为夫妇。后命铁拐李度脱二人归真。这是一出神仙道化剧。

明初刘兑写了《金童玉女娇红记》,剧演金童玉女思凡,被贬下人间。金童叫申纯,玉女叫王娇娘,二人偶然相遇,互相爱慕,后几遇挫折,都得了相思病。跳神婆说二人是前生注定夫妻,故得以成亲。仙女董双成到来,说明二人是金童玉女下凡,业缘已满,理当升天。

影响很广的神话戏《张生煮海》(元代李好古作),书生张羽与龙女琼莲最终成婚,他二人也被说成是上界金童玉女临凡。后东华仙人来,接了二人归位。

至于金童玉女又是周公、桃花女的说法,源于元明戏曲和小说。桃花女故事在民间流传久远,元代已有《桃花女破法嫁周公》杂剧,此戏又名《智赚桃花女》、《破阴阳八卦桃花女》。戏的剧情是:算命人周公开业 30 年,从无差错,某日有石婆婆算命,周公说她儿子石留柱在外必遭横死,石婆婆回家途中遇到桃花女,桃花教禳解之法,救了石留柱。石婆婆找周公退卦钱,说他的卦不灵。周公又给仆人彭祖算命,断定他必死。彭祖路遇桃花女,桃花亦教他禳解之法,彭祖便依法祭拜北斗七星,得以延长寿命。彭祖见周公,周公知其不死原因,顿生妒意,请彭祖媒,娶桃花女为儿媳。

桃花女进门后,周公费尽心思要害死她,但都被她破掉, 反而差点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周公再次害桃花,又被她破了法,使周公一家死而复生。在周公复生后,真武大帝出场,说明周公与桃花女是金童玉女转世。业缘已满,应复归天位。《桃女花》的戏曲一直流传,直到近代有些剧种还有这一题材的剧目。

桃花女故事,也被吸收入小说中。如明代吴承恩所撰《西游记》中,第三十五回写孙悟空斗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时,有把银角大王装在宝葫芦里,口中不断向“桃花女先生”祝告的情节,。在明末小说《七曜平妖传》中,写徐洪儒乜巢儿学法事,也提及“桃花女”。清代道光年间,出现了无名氏编撰的《桃花女阴阳斗传》,共十六回。后又有《桃花女斗法奇书》、《桃花女阴阳斗异传奇》。小说博采世代里巷传说,突出了桃花女向“人之死生大数”舍命抗争的形象,在神魔小说中别具一格。

书中还叙述了桃花与周公真武的瓜葛。真武玄天上帝在雪山修道时,用戒刀剖腹洗肠,昏迷过去,把戒刀弃了。后戒刀修炼成一个阳体,刀鞘修练成一个阴体。数百年后,王母诏刀鞘上天,管理桃花,即成桃花仙子。戒刀做了太上老君的童子后私自下凡,投胎商朝周姓诸侯,名周乾,后袭父职,人称周公。此时桃园仙子奉玉帝命下凡,做了任太公的女儿叫桃花女。书中详述了二人斗法事,最后被真武玄天上帝改为周、桃二元帅。

小说中有不少内容,再现了古代婚嫁习俗,颇有民俗学价值。如花轿上绣八洞神仙,花轿要用杂色绸结成。空的宝瓶一对,内放五谷熨斗一个。花轿一到门,要男方家一人提着熨斗,绕轿三周,方才进门。大门二门要马鞍一个,方斗一个,新人下轿跨过马鞍,然后才拜天地。从大门到内堂要铺上彩毡,新人下轿,脚不能沾泥土。父亲要抱女儿上轿,并念道:“夫妻百年和好,子孙昌盛,福寿绵长,百无禁忌。”花轿走到男方大门时,女方家人取出柳弓一把,桃箭一枝,搭好箭,高声念道:“柳木弓,桃木箭! 射左扇时,射右扇。丧门、吊客影无踪,一切凶神不见面!”念完,照定门上正中一箭! 后世有些地区每逢不吉时年,大门上皆挂上柳弓、桃箭,来源于此。桃花女所用镇破凶神恶煞的方法、器物,有些日后竟成了风俗,传至今日。

另外,此后的京戏、弹词等扮演的桃花女节目,多受此书影响。

千里眼　顺风耳

中国民间故事中，有个著名的“十兄弟”故事。故事讲的是，有个妇女一共生了10个儿子，依次叫顺风耳、千里眼、大力士、钢头、铁骨、长腿、大头、大足、大嘴、大眼，各有独特本领。一天哥儿10个正在地里干活，顺风耳忽然听到哭声，忙叫千里眼站起瞭望，才知是



妈祖　千里眼　顺风耳

秦始皇为修长城，役使民工，民工又累又饥，痛苦号哭。大力士闻听奋起代役，半日完工。秦始皇怕他作乱，想要杀害他。于是钢头前往替代，刀砍不入，倒损坏大刀数十把。再用棍打，铁骨来替，折断了数十根大棍。又要扔入大海，长腿来替，水仅没过小腿。长腿兴高采烈地捉起鱼来，一会儿捕到几十斤，正发愁没处放，幸亏大头赶来，盛在大头戴的草帽

里,才装了半帽子。一起带着鱼返回家中,要炖鱼可缺柴禾。大足马上从脚上挑出一刺,足有一棵树粗。鱼炖好后,大嘴喉急,尝了一口,一食而尽,还不够填牙缝的。大眼一下气哭了,泪浪滔滔,汇成江河,推倒长城,连秦始皇一起卷入海中。

这个民间故事流传久远,因与秦始皇修长城有关,产生时代不会很晚。元明几部小说中出现的千里眼、顺风耳,大概与这个民间故事传说有一定关系。在元代讲史小说《武王伐纣平话》和《南游记》里,则进一步把千里眼和顺风耳二位小神,落实到了两位古人身上:师旷和离娄,并被称作"聪明二大王"。

师旷实有其人,是春秋时期的著名音乐家。代表作品有《白雪》、《玄默》。他是晋国的乐师,双目失明,但精于弹琴,而且辨音水平超群。晋平公曾铸大乐钟,乐工们听到都信为音律准确,只有师旷不以为然。后来证实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看来他的听力十分高超。另外,他还能预知吉凶。师旷从太子晋的声音、面色,知道他"不寿",三年后太子晋果真夭亡了。师旷又预言晋平公"人来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将死矣"。到了来月八日,晋平公果然死了。当然,其中迷信色彩不少。如此看来,师旷倒有些像是后世"瞎子算命"的祖师爷。

离娄是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又叫"离朱"。传说他是黄帝时候人,有一次黄帝丢了一颗黑色的明珠,叫离娄来找,离娄一眼就把明珠找到了。离娄能在百步以外,看见"秋毫之末"——秋后鸟兽刚长的细的毛尖!离类的眼力已超过了现在的高倍望远镜,被古人视为"千里眼",当之无愧。而师旷以其超人的听力被视为"顺风耳",也是理所当然了。

到了《封神演义》里,千里眼、顺风耳又被说成是神荼、郁垒,显得莫名其妙,毫无道理。神荼、郁垒已是公认的门神,(详见《中国民间俗神》中门神一节),与眼力和听力是不相干的。影响最大的还是《西游记》,孙悟空闹东海、搅地府后,事达天廷,玉帝询问"妖猴"来历,班中闪出千里眼、顺风耳,将"妖猴"的来历奏明。此时的千里眼、顺风耳,充当着玉帝的得力耳目,是个不大光彩的角色。千里眼、顺风耳还被道教拉去,做了护卫神。在天后宫前殿两侧就塑有二位神像。千里眼四肢裸露,散披衣裤,右手持叉,左手搭凉棚作远视状。顺风耳也是四肢裸露,袒胸露肚,略披袍褂,左手握住一条红蛇,蛇身缠绕手臂,右手持一方天画戟,侧耳作听音状。他们两旁又各有一神像,亦为武士模样,一名"加恶",一名"加善"。这四神是仿照佛教的四大金刚而设置的,叫"四大海神"。不过这是硬拼凑起来的,不像四大金刚,有一套"理论根据"。

雷神　雷王

雷与风、云、雨、雪同属气象中的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均发生在天上,古人当时无法认识这些自然现象的成因,对其充满神秘感与畏惧感,于是将其神化,以为皆是天上神灵所为。

原始人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不明白为何一时红日当空,万里无云,和风拂面;一时又乌云滚滚,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而这些自然现象又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太阳带来了光明与温暖,雨水可使草木繁茂,果实累累,雷电暴雨则会造成灾难和死亡。他们对变化莫测、庞大而神秘之自然界的规律和现象,无法理解,更无法支配,认为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的命运,这种力量就是神,即"自然神"。如雷神、雨神、风神、太阳神等等。

最初,古人是按照动物的形象来创造雷神的。这是因为最初原始人的生活,要依赖动物,来满足生活上的需要,而且当时原始人并未把自己与动物完全区别开来,甚至认为动物比人更高明,它们有不少高超地功能,是

人无法与之比拟的；因而自然产生了动物崇拜。我国古代著名神话典籍《山海经》，收神454种，动物神即占大半。故最初的雷神被塑造成动物神，也毫不为奇。



雷　　公

《山海经·海内东经》中即有雷兽的说法，并说黄帝用雷兽之骨击鼓，“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郭璞注云：“雷兽即雷神也。”在《山海经·海内东经》中，对雷神又作了具体的描绘：

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

由于打雷发生在天上，古人将雷神与天上的龙联系在一起，又因打雷要发出隆隆之声，于是又将雷神的肚子想象成一面大鼓。



雷　　公

以为雷声出自天鼓——天神所击巨鼓，我们不能不佩服远古人们的丰富想象力。

以后，雷神的模样又有很大变化。有说是“豕首鳞身”的（《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一）；有说“色如丹，目如镜，毛角长3尺许，状如六畜，头如猕猴的”（《搜神记》）；有说其“形如奇鬼，长仅3尺许，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帻，如世间幞头，乃肉为之，与额相连”（《夷坚丙 志》卷七）；元代还有所谓“雷公旗”者，所画雷神“大道鬼形，白拥顶，朱犊鼻，黄带，右手持斧，左手持凿，运连鼓于火中”（《铸鼎余 闻》卷一）；还有谓其“若力士之容，……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集说诠真》）。

综上所述，雷神的身形或为龙，或如六畜，或为力士；其脸形或为人头，或如猪头，或像鬼形，或是猴头，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到了明清，雷神的形象逐渐统一，其标准像为：

> 今俗所塑之雷神，状若力士，裸胸袒腹，背插两翅，额具三目，脸赤如猴，下额长而锐，足如鹰鹯，而爪更厉，左手执楔，右手持槌，作欲击状。自顶至傍，环悬连鼓五个，左足盘蹑一鼓，称曰雷公江天君。

雷神最突出者，是猴脸和尖嘴，俗称“雷公脸”、“雷公嘴”。所以《西游记》中，高老庄的高太公将孙行者当成了“雷公”，孙悟空还被人谑称为“雷公脸”、“雷公嘴”。

《封神演义》中有个著名的雷震子，即是典型的雷公形象。周文王姬昌行至燕山时，正遇雷雨，他道：“雷过生光，将星出现。”果然捡得一小儿，收为义子，起名雷震子，并交与终南山云中子学艺。雷震子艺成，吃了两枚仙杏，两肋生出一对肉翅，“鼻子高了，面如青靛，发似朱砂，眼睛暴湛，牙齿横生，出于唇外，身躯长有二丈。”飞腾之时，起于半天，脚登天，头望下，二翅招展，空中俱有风雷之声。

如同许多自然神一样，雷神形象的演变也经历了一个由兽形到半人半兽形，再到人形的发展过程。雷神的人形化以雷州雷王、闻仲及雷部诸神为著。

雷州，即今广东省雷州半岛，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治所在雷城，今称海康。雷州地处热带，属海洋性气候，“四时如夏，气候蒸郁，故雷易发生”（《梦溪笔谈》）。雷州即因多雷而得名。唐宋时，此地常发现黎人先民的石斧、石楔等石器遗物，以为雷神所坠雷斧、雷楔，故当地颇重雷神之祀，雷州雷神庙著称于世。此庙雷神极其排场：

> 雷神端冕而绯，左右列侍天将，一辅髦捧圆物，色垩，为神之始，盖卵也。堂庑两侧又有雷神十二躯，以应十二方位，及雷公、电母、风伯、雷师像。

此庙正中大雷神头戴冠冕，身着红袍，两侧列侍天将、小雷神等数十躯，俨然帝王。这位雷神确实是个雷王——宋元时被封为“威德昭显王”。这位雷王据说是有来历的，他的出世倒也哪吒十分相似。

传说南朝陈宣帝太建初年，雷州有个猎户叫陈铁，陈铁无子，以打猎为生。他养有一

条九耳犬，甚灵。凡要出猎，就卜之狗耳朵。一只耳动，则将捕获一兽；动的耳朵多，就会捕获三四只兽，最不济也能猎得两只。

这一天，他准备出猎，一卜，狗的九只耳朵全动。这是从未有过的吉兆，陈铁大喜，满以为会大获丰收。他兴致勃勃来到野外走到一片丛棘时，九耳犬围绕狂叫不去。陈铁觉得奇怪，进入丛棘，发现一巨大肉球，直径有一尺多。陈铁没心思再打猎，抱着大肉球回了家。突然，屋外雷雨大作，肉球开裂，从中蹦出一小儿，手上有字，左曰"雷"，右曰"州"。此后常有仙人入室哺乳。陈铁给他起名叫"陈文玉"。乡亲们称他小名为"雷种"，把他当成神。

陈文玉长大后，当了雷州刺史，在任时多行善政，为民造福，死后有灵，乡人立祀之，以为雷神，"阴雨则有电光、吼声自庙而出。"宋、元累封王爵，"其庙曰显震，其神早威德昭显王"。每年乡人以麻布造雷鼓雷车献于庙中。



雷　王

雷州已造出了个雷王，雷王下管一些普通折雷神、雷公及电雨风雹诸神，地位已很高了。但道教仍觉不够用，又衍出一位诸雷神之总司令——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或真王），地位又在雷州雷王之上。天尊，是道教对最高级的天神的敬称。如道教最高神三清，称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玉皇大帝称玉皇大天尊。雷声普化天尊，即总领雷部众神之统帅。这位雷神大天尊，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帝（轩辕氏）。

我国传说中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黄帝为五帝之首，本为历史传说人物，道教将其不断神化，而尊为神。他的最初神职却是雷神。《重修纬书集成·河图帝纪通》说，"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轩辕于青邱"，认为"黄帝以雷精起"，是说黄帝诞于雷电。黄帝既为雷之骄子，他的职掌当然会与雷雨有关。《重修纬书集成·春秋合诚图》谓："轩辕，主雷雨之神也。"又以星象说法，加以附会："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如龙之体，主雷寸之神。"（《大象列星图》）

以后，道教又把黄帝封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真王（天尊）"，说他住在神霄玉府，行雷之时，十分有趣：

> 真王之前有雷鼓三十六面，三十六神司之。凡行雷之时，真王亲击本部雷鼓一下，即时雷公雷师兴发雷声也。……三十六雷，皆当时铺相有功之臣。

道都称雷声普化天尊总司五雷，五雷为天雷、水雷、地雷、神雷、社雷、，或曰天雷、地雷、水雷、神雷、妖雷。天雷，箕星掌之；地雷，房星掌之；水雷，奎星掌之；神雷，鬼星掌之；妖雷，娄星掌之；道都又有所谓"五雷天心正法"的方术，说是得雷公雷篆，依此法行之，可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宋代著名道士林灵素自称精通"五雷法"，他搞过呼风唤雨一类的名堂，招摇过市。

上引《历代神仙通鉴》谈到，在雷城左右有玉枢、玉府五雷使院，有雷院鼓 36 面，36 神司之。这是把众多雷公组织了起来，有如官府，称为雷部。《封神演义》姜子牙封神时，将闻太师闻仲封为雷公部部长——九天应元雷神普公天尊，属下有 24 员雷公"催云助雨

护法”。这24位天君还包括内电神和助风神，其中以邓、辛、张、陶、庞、刘、苟、毕八位最有名。所谓有名，是说常在一些神魔小说中出现。如《西游记》第八十九回，离孙悟空因大竺国凤仙郡久旱不雨，特去天廷雷府找九天应元天尊“告借雷部官将相助相助。”天尊道：“既如此，差邓、辛、张、陶、帅领闪电娘子，即随大圣下降观仙郡声雷。

邓、辛、张、陶与闪电娘娘来到凤仙郡上空调弄，雷声隆隆，闪电渐沥，风云际会，甘雨滂沱，下了一场好大雨。这邓、辛、张、陶、宠、刘、苟、毕八天君，没有声雷行雨公差时，还得帮助增长天王把守南天门。这八大天君虽被《搜神大全》、《封神演义》等作者安上了姓名，其实也是随意点染。

雷部诸神在民间影响不小，著名的山西永乐宫元代壁画中，就有雷部诸神的形象，十分威武。在元明杂剧《太乙仙夜断桃符记》中，有一段请神的情节，即包括众雷神。

俗话说：“迅雷不及掩耳。”暴雨之时，雷电迅疾，常能击折树木，焚毁房屋，击死人畜。于是人们附会雷神能代天执行刑罚，击杀有罪之人，并认为其善天辨别善恶，惩罚坏人，是主持正义之神。

至今民间诅咒仇人，还常说：“遭雷劈”、“天打五雷轰”。清代洪门天地会对雷神也是敬奉的，在他们的《请神祝文》中，雷公雷母亦是在所请诸神之中，并在文中对洪门内“奸心反骨，不仁不义，忘誓背盟着”，发出了“死男绝女，五雷诛击，五路分尸，永世不昌不吉”的严酷诅咒。天地会中的《把守二门诗》和《把守乾坤诗》中，亦有“忠肝义胆洪门进，奸心反骨五雷焚”，“忠心义气为兄弟，奸心必定五雷焚”的誓语。可见民间秘密组织对雷神五雷轰顶一套的推崇。

对雷神的崇拜，虽与求雨有关，但这一功能龙王的权威更大，在求雨活动中，雷公不过是龙王属下的小神。古人对雷神的崇拜，更主要的是将其视为正义之神。其实，如同钟馗信仰一样，这不过是表达了人们的一种祈求和愿望，希冀有超越人间的正义之神能“为民作主”，然而历史有几个恶人曾被天打五雷轰，遭了天报？所以，这不过是百姓们可怜巴巴的一种精神寄托而已。但这种说法却流传了下来，人们还爱把一些正直敢干的人，称作雷神爷。

民间以农历六月廿四为雷公生日，称“雷公诞”。过去在这一天，农民常要祭雷公，因雷雨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祭品用三牲、菜肴、米馍等物。祭毕，家人亲友便大吃大喝一顿，尽情享用祭品。祭祀雷公也有全村合办的，届时大伙凑“份子”，请和尚老道念经，还要唱大戏，十分热闹。

过去南方有些地区，还盛行拜雷公为“干爹”的风俗，以期得到雷神爷的保佑。用一银牌，上面打有“雷公电母”字样，放在祭品之上。祭神焚化金纸后，将银牌在香炉上或纸灰上，绕上几绕，表示“通知”了雷公，再给小孩带上。算是成了雷公的“干儿子”。

雷神信仰在我国各民族中十分普遍，有的称“雷祖”（侗族）、“雷公鬼”（黎族）、傣族、瑶族、布依族、拉祜族、赫哲族等民族皆信奉雷神。

闪电娘娘（金光圣母）

雷神最初为兽形神，是无所谓雌雄的。以后逐渐人神化。为力士状，成男性神，俗称雷公。公者，男性也。中国古人既把崇拜物加以神化，又好把诸神世俗代，道教和民间中的不少神仙被配成了对儿，组成了神仙“家庭”。如玉帝和玉母，龙王和龙母，灶王爷和灶王奶等等即是。

雷公也如是。宋人徐铉在其所撰《稽神录》卷一中，记载了一村姑被雷神所娶事，并称雷神“亲族甚众，婚姻之礼，一同人间”南宋洪迈也记有“雷母”（雷媪）事，雷母形象为：



电　母

发茁然,赤色甚短,两足但三指,大略皆如人形。良久,云气斗暗,震电交烁,遂去不见。

雷公很丑陋,雷母自然也不能太漂亮,上述雷母完全是个怪物。打雷时,常与闪电相伴,二者形影不离。最初的雷神是兼司雷、电二职的,以后雷公逐渐男性化,电神便自然演变为雷公的配偶神,成为电母——闪电娘娘了,雷母则被取而代之。

电母之称,早在唐代即已出现。唐·崔致远的《补安南录异图记》,就有"然后使电母雷公,凿外域朝天之路"的说法。宋代苏轼在《次韵章传道喜雨》中,亦有"麾驾雷公呵电母"的诗句。

著名的元杂剧《柳毅传书》第二折,就有雷公、电母出场,并以配偶形式出现的。泾河老龙上场云:"今有钱塘火龙与俺小龙斗胜,未知胜败,我使的雷公、电母看去了,这早晚敢来报捷也。"然后正旦改扮电母两手持镜上场云:"这一场厮杀非同小可也。"接着向泾河老龙报告了战斗情况。"两手持镜"是代表闪电的,这也是石人颇为滑稽的想象力,以为闪电的亮光,有如镜子反射日光,所谓"两手运光"。这种形象成为闪电娘娘的标准像。《元史·舆服志》载,元代军中即有"电母旗",上面形象为:"画神人为女人形,纁衣朱裳白裤,两手运光。"

电母这一形象作为雷神的助手,在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中都曾出现。《封神演义》还将电母(闪电神)说成是金光圣母。明·余象斗所著《北游记》卷四,又把电神说成叫朱佩娘,雷神给了她雷电镜二面,雷神打人时,电母"先放电光,照得明白。"

电母作为雷神配偶或属神,每与其他气象神合祀。如兰州著名的道观金天观,进入正门,即为雷坛,正中供奉雷祖,左右分列十大雷神,雷公、电母、风伯、雨师侍立其下。

风　伯

风伯是民间对风神的习惯称呼,风神又称风师,箕伯。

我国地域广大,古代各族对风神的信仰也有所不同。有些地方是把风神与神鸟联系在一起的。这大概是有的民族看到鸟翅搏打可以生风,并且还能利用风力飞翔,于是把风神幻想成某种神秘的鸟类。我国古人想象的著名的风鸟,就是这种幻想的产物。殷契时的"凤"字即当"风"字使用,凤,风没有分别成两个字,而凤字的象形文字,完全是一幅鸟的素描画。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的称"凤",雌的叫"凰",据说它长得模样为:"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这大概是殷人风神迷信,在象形文字上的反映。在商周时代的古文里,都是把"凤"字作为"风"字来使用的,这也大抵是借"凤鸟乘风,歌舞升平","凤凰朝兮,风雨顺兮"之意。所以,神鸟凤凰与风,与风调雨顺是有关

系的。

《山海经》里，把北方的风神称为鵷，也是鸟类。

风源除来自神鸟的翅膀，有些民族还认为风起于山谷和洞穴。《山海经·南次三经》说，令丘山之南有个大山谷叫“中谷”，条风从那里刮出来，“条风”就是东北风。还说旄山尾之南有个大山谷叫“育遗谷”，凯风从那里刮出，“凯风”是南风。这两个山谷成了风源，具有了起风的神性，当人们对这两种风力有某种要求时，就会把这两个山谷当做风神来崇拜。

风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但它与雨雪冰雹不同，形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于是古人凭借各种想象，把风神的实体归之于其他有形的实体，如前面谈到的凤鸟，山谷等。古人有时又看到风吹云动，星辰、月亮会时隐时现，于是又将风神与某个星体联系起来，此即古代星宿崇拜。

早在《书经》中就有“星有好风”的说法（《尚书·洪范》）。唐·孔颖达认为此星是“箕星”，箕星为十二八宿中东方苍龙七宿之一。《春秋纬》说：“月离于箕风沙场，故知风师其也。”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对此进一步解释道：

> 风师者，箕星也。箕主簸扬，能致风气。

同时的学者蔡邕也认为：

> 风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风。

箕星又称箕斗、斗宿，共有星4颗，即人马座的υ、γ、ε、η四星，古人将其想象在簸箕形，故附会此星“主簸扬，能致风气”，好象簸箕搧动，定能生风。以星宿为风神。代表着中原地区人们的信仰，南方则以怪兽“飞廉”为风神。屈原在《离骚》中云：“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诗中的“望舒”又称“纤阿”，是为月神驾车之驭者。“飞廉”，即风神。王逸注云：“飞廉，风伯也。”飞廉，传说是一种奇特的怪兽：

> 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

唐宋以后，风神逐渐人格代，并有了“封姨”、“方天君”这类的名字，其实都是“风”字之音转化，虽民间有女性风母的说法，但男性的风伯流行广泛，影响最大，其典型形象为：

> 今俗塑风伯象，白须老翁，左手持轮，右手执箑（shà，音煞，扇子）若扇轮状，称曰：风伯方天君。

最初由于大风吹毁墙屋，刮坏庄稼，给人们带来损失，初民是将风神视为恶神、凶神的。殷契中即记载不少殷人怕遭风害，祈求风停而献祭的记录。当时祭风神要杀狗。《尔雅·释天》中说：“祭风日磔。”郭璞对此注道：“今俗当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风。”在《淮南万毕术》中记载着：“黑犬皮毛烧灰，扬之以止风。”可见杀狗祭风神的迷信，在汉代十分流行。

不过，风神又有其作为善神的一面。古人认为风神为天帝的属神，受命于天意刮风或息风；又因其飞跑神速，而成为天帝的信使。《龙鱼河图》说：“风者，天之使也。”风神又被认为与雷神、雨神等合作，而有养育万物成长的功能，正如《风俗通义·祀典》所说：“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养成万物，有功于人，王者祀以报功也”。这是风神表现为善神的一面。

雨　师

我国远古初民一般都有崇拜风、云、雷、雨的情况，尤其是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由于天气自然变化对农业的收成影响极大，而当时又缺乏抵御这些天灾的能力，限于认识能力，不可能对自然现象作出科学解释，只好认为冥冥之中有神灵主宰一切，故而虔诚地礼拜风云雷雨诸神，祈求诸神保佑。而在众多气象神中，尤以雨神崇拜为最。因为雨水与古代人类社会生活最为密切相关。远古采集植物食料，狩猎活动都与雨情有重要关系，特别

是当时的农业收成好坏，雨情要起决定性作用。（时至今日，我国还有许多地区要“靠天气吃饭”。）所以殷商时常有天旱求雨和阴雨求晴的祭祀。这些载于大量的殷契中。



雨 师

如同风神被附会为箕星一样，雨神也被说成是某一星体。

《尚书·洪范》云“星有好风，星有好雨。”孔颖达解释说：“箕星好风，毕星好雨。”东汉·蔡邕的《独断》也认为：“雨师神，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雨。”

西周及春秋列国皆将祭雨师列为国家祀典。《周礼·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鹳风（风）师 、雨师”。“槱”是聚集木柴，当时祭祀风神箕宿、雨神毕宿，要架起大柴堆来焚烧。秦国还专门修建了国家级的雨师庙。《汉书·郊祀志上》载：“（秦时）雍有二十八宿，风伯、雨师之属，百有余庙。”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月离于毕，俾滂沱矣”的说法（《诗·小雅·渐渐之后》）。“离”在此读（丽），当“落人”讲。汉代毛亨《传》曰：“月离阴星则雨。”阴星即毕星，“月儿投入毕星”，是指天象，有雨的征兆。这两句诗是说：月亮靠近了毕星，大雨就会滂沱降落。



赤松子

毕宿是二十八宿之一，为西方白虎七宿之第五宿。共有星八颗在金牛座。古人以其形状像毕网而命名为“毕”。古人认为“其象在天，能兴雨。”

在一些地区，雨神则被说成叫屏翳（或萍翳、荓翳，）见《楚辞·天问》中“荓号起雨”注和《山海经·海外东经》。还被说成叫玄冥，见《风俗通义·祀典》。但这些名目的形象是十分模糊的，雨神形象最为鲜明的，一为鸟神商羊，一为仙人赤松子。

据《三都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雨师神，商羊是也。商羊神鸟，一足，能大能小，吸则溟渤可枯，雨师之神也。

传说，早在春秋时期，商羊神鸟就能预示大雨。一次，齐国飞来一群一足鸟，集于宫朝，飞至殿前，舒翅而跳。齐候十分惊异派使臣去鲁国，向孔子请都。孔子说："此鸟名商羊，水祥也。昔有童儿屈其一足，振迅两眉而跳，且作歌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如今齐国出现此鸟，应急告百姓趋治沟渠，修筑提防，将有大水为灾。"后来，果然下了大雨，水溢泛诸国，只有齐国因有准备没受什么损失。

传说中的商羊虽也号称雨师，但其并不能兴风作雨，主降雨之职。它主要是给人们传达降雨的信息。比较而言，赤松子似乎比商羊更名符其实。

赤松子是传说中的仙人，又作"赤诵子"。《列仙传》等书说他是神农时代的雨师，服"水玉"（又叫水精，即水晶）而登仙。赤松子主要事迹如下：

（神农时）川竭山崩，皆成砂碛，连天亦几时不雨，禾黍各处枯槁。有一野人，形容古怪，言语颠狂，上披草领，下系皮裙，蓬头跣足，指甲长如利爪，遍身黄毛覆盖，手执柳枝，狂歌跳舞，曰："予号曰赤松子，留王屋修炼多岁，始随赤真人南游衡岳。真人常化赤爸神首飞龙，往来其间，予亦化一赤虬，追慑于后。朝谒元始众圣，因予能随风雨上下，即命为雨师，主行霖雨。"

赤松子被描绘为一颠狂野人，能化为一条赤龙，随风雨上下，后被道教最高神元始天尊封为雨师，主行霖雨。赤松子化龙行雨的说法很重要，龙王降雨成为后世十分流行的说法，龙王也完全取代了其他雨神的职能。不过，雨师的位子也并未取消，成为龙王的属神。雨师常与雷公、电母、风伯等合祀，其典型形象为：

乌髯壮汉，左手执盂，内盛一龙，右手若洒水状。

这位雨师既不是商羊，也不是赤松子，而是什么陈天君。这陈天君当然与雷公江君、电母秀天君，风伯方天君一样，不过是发事者虚拟的名目而已。至于"天君"则是道教对神仙们的一种尊重称谓。

雨神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外，还有龙蛇、蛤蟆、金鱼神、水母娘娘，以及陈鸾凤、李定国等。

龙是我国古代最受崇拜的神灵，为四灵（龙、凤、麟、龟）之首，很早就被赋予了上天人水、腾云驾雾、生风作良、兴云布雨的神性和功能。

最早把龙称作雨师的，大约是在魏晋时期，晋·葛洪《抱朴子·登涉》说："山中辰日有自称雨师者，龙也。"由于龙的地位日益提高，后来已不是专职的雨师，成为掌管云雷电诸神和广大水族世界的"王"即龙王了。

蛤蜡（青蛙）被视为雨神起源很早。西汉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求雨篇》中即说，天旱时取五只青蛙放于方池中，进酒祝天，再拜请雨。西汉焦赣《易林·大过》中载：

蛤蟆群坐，以天请雨，应时辄下，得其愿所。

蛤蟆被奉为雨神，主要是它有预告雨水的功能。

金鱼神被当作雨神，是关中地区的民间信仰。传说如当地久旱不雨，人们祭祀上天，玉帝便派金鱼下凡，金鱼带着泉水涌出，即会兴雨除旱。

水母娘娘本为水神，山东一些地区把水母娘娘当作雨神来祭拜。

至于雨师陈鸾凤，则源于民间传说。陈鸾凤是广东海康人，不畏鬼神。当地有一风俗，不能黄鱼猪肉一起吃，否则会被雷公劈死。陈鸾凤不信这一套，招来大雷雨，他持刀砍断了雷公左股。从此，他走到哪里，人们便请陈鸾凤吃黄鱼猪肉，大雷雨便跟踪而来。有陈鸾凤保护，人们只得雨利，不受雷害。他

死后,便被奉为雨师。每逢旱情,即用黄鱼、猪肉祭祀这位陈雨师。由于陈鸾凤不信邪,冒死为乡里做了大好事,算得上一位好汉。

李定国也是一位好汉。他是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的大将,张死后,李定国率部转入云南大理,军纪严明,受到百姓欢迎。一年大旱,李为民祈雨于龙王庙,但久未有应,李大怒,上表责龙王,令其速降雨,否则定毁其庙。龙王惊恐,帮助李定国得到水灌溉当地农田。玉帝怒龙王私助李定国,将其囚禁,另派母猪龙司雨。母猪龙断了水脉,大理又遭大旱,李定国杀死母猪龙,死后化为神,代龙王行云布雨,搭救苍生。民感其德,奉为雨神。这个传说显示了群众对有功德于民的历史人物的景仰。

由于雨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太密切了,所以过去天旱时,广大农村都有向雨师、龙王乞求降雨的风俗。这种风俗流行于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祭祀的对象、仪式和方法,因族因时因地而异,一般要举行一定的祭祀仪式,由法师或巫师主持。求雨的风俗起源甚早,西汉刘向等著《淮南子》载:"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汤是商朝第一代国王,生活在公元前 17 世纪初,距今已有 3700 年了。

求雨祈祷的神明有玉皇大帝、雷公、风伯雨师、龙王等。祭祀方式多样:有以牺牲供献神明的;有以人祷求雨;有抬神像游乡以娱神;有以惩旱魃的象征性表演来求雨的;有扎泥龙、草龙舞之以求雨;有在门口插柳枝的;还有捕捉蛇、鱼、蛙等动物作祈雨物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天津求雨之风俗》载:

天津农人遇天旱之时,有求雨之举。求雨者,或抬关壮缪(关公)之偶像出送,或抬龙王之偶像出送,前引以仪仗多件,锣鼓喧天聒耳,有如赛会一般。另有一人,身披绿纸制成之龟壳,以墨粉涂面,口中喃喃有语。其余随从之人颇多,大都头戴一柳圈,手持一柳枝,亦不知何所取意。每到一外,该处之人皆须放鞭炮,陈列供口迎接。有街市之外,门口皆行柳枝,用黄纸书"大雨时行"四大字悬之,亦有书"大雨如注",或"大雨倾盆",或"天降大雨"者。

旧时各地求雨仪式都十分隆重,"有如赛会一般"。多以三日为期,至期不雨,候三日仍不雨,继续设坛再祷。如果"雨既降,则宰牲祭神,或演戏唱戏,名曰'谢神',城乡同"(《(辽宁)凤城县志》)。

天旱无雨时要向龙王雨神等求雨,但雨水太多了也不成,会发生洪涝灾害,这时又要要求龙王雨师等止雨了,平时则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雨神作为自然神后被道教吸收,成为与雷部诸神密切相关的道教神。道教方术中有所谓"五雷法"(又称"五雷天心正法"),谓得雷公墨篆,依法行之,可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故道教用雷法以祈雨。《道藏》正一部中收有一部大型道法汇编《道法会元》,共二百六十八卷,内容庞杂,以雷法为主。其中有专门的祷雨之法如《太级雷坛祭四维神法》等。与民间的求雨不同,道士祈雨有专门的仪轨,在《西游记》第四十五回《三清观大圣留名井车迟国猴王湿法》中,有孙悟空与虎力大仙设坛场斗法求雨的情节,坛场的布置和祈雨的过程叙述得十分详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道门祈雨的情景。



清代捉蛙祈雨(《点石斋画报》)



清代民间赛灯求雨(《点石斋画报》)

洪　帮

洪 门 起 源

洪家、洪门和洪帮、红帮

清朝初年有一个民间秘密结社，“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称之为天地会。天地会会员们对内互相称为洪家兄弟、洪家、洪门。而天地会对内为何称洪家、洪门，历来说法不一。一说是为了纪念康熙十二年起义的朱洪英；一说是与朱洪竹有关，朱洪竹是天地会传说中的始祖所拥戴的幼主朱明皇室后裔；一说天地会是由乾隆年间的洪二和尚创始的，成员入会后一律改姓洪；一说天地会是由五位和尚所创，这五位和尚的法名中皆有洪字。也有学者认为：天地会的创始人是明末遗老，他们暗中结成了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取明太祖洪武年号中的“洪”字，自称“洪门”。虽众说纷纭，但多数学者承认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天地会的传说，都直接或间接与朱明王朝有关，因而较多的人认为天地会自称“洪家”的“洪”字具有怀念朱明王朝的含意。

天地会及其各种支派统属于洪门。洪门又称洪帮，而洪帮之“洪”以后又与“红”字通用，称“红帮”，这也与朱明王朝有关。“红乃朱也”，朱、红二字字义相通，“红”代表朱洪武。此外“红”还有历史渊源方面的含意，明太祖朱元璋早年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郭子兴的部将，其军队头缠红巾称红巾军。有人认为洪帮为纪念明太祖朱元璋起义时所带之红巾，而自称“红帮”。天地会文件中有包头诗云：“红巾一条在手中，包在头上访英雄”。

洪 门 的 起 源

洪门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虽经史学界多年的考证，仍然没有统一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康熙甲寅年(1674)创立的，其主要根据为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反清复明根苗第一》的记载。同意这一创立时间的学者，在创始人、创始地点等问题上又有意见分歧。

有人认为洪门应是雍正甲寅年(1734)创立的，主要根据是萧一山氏在伦敦博物馆发现的许多天地会文件，特别是其中的《西鲁序》和《西鲁叙事》。同意这一说法的学者，认为洪门创始人为五位和尚。但对于这五位和尚的经历及首创天地会的地点之考证，又各持异议。有人认为洪门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首创。其主要根据为故宫有关天地会的档案资料。又有人认为洪门起源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其史料根据主要是清朝官修史书《清实录》、《饮定平定台湾纪略》等。还有人认为洪门创始的时间不晚于康熙元年(1661)，创始人为起兵抗清，随后驻兵和开发台湾的郑成功，其继承者为陈近南。洪门的发源地为

福建一带。持此说法者的主要依据是洪门《海底》多由福建漳州一带传出，而这正是郑成功父子从事抗清斗争及其家族分布的地带。

又有人认为：天地会既为秘密结社，在当时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不可能像近代政党那样，举行正式的成立大会。当时天地会的组织建立的情况，很可能像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那样，各地先后自建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互相补充后，才逐渐形成具有共同特色的反清组织。因此，统称为洪门或天地会的组织，实质上支派繁衍、名目纷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仅嘉庆年间变换天地会名称的就有小刀会、百子会、阴盘阳盘会、添弟会、洪莲会、龙华会、三点会、串子会、江湖串子会、仁义会、双刀会、仁义双刀会、父母会、阳盘教、忠义会、担子会、情义会等近二十种。

支　派

洪门的支派很多，主要派别如下：

1. 天地会

天地会祭五祖歌词称："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三拜日为兄，四拜月为嫂，五拜五祖，六拜万云龙大哥，七拜陈近南先生，八拜兄弟和顺"。因其拜天、地为父、母，所以名为天地会。

2. 三点会

天地会三点革命诗歌称："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势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所谓"三点"，即"洪"字左边的"三点水"。天地会宗旨是"暗藏三点革命，誓灭清朝，扶回大明江山"。可见三点会也是天地会的别名。

3. 三合会

萧一山的《天地会起源考》，以"三合"本意"三河"，以天地会初起时于三河相会，传说洪门烈女郭秀英、郑玉兰在三河合流处，为避免被清军俘虏，投河而死。洪门对联有"三河合水万年流"，这"三河合水"简称"三合"，故取名三合会。也可理解为天地会之别名。

4. 哥老会

有人考证"哥老"原名"角脑"，即"龙头"，"龙头"即"铜头"，后转为"啯噜"、"咽噜"、"哥老"。但据档案史料查证，哥老会原为仁义会，为天地会的分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兴起后，开始改名为哥老会，主要在清军营中活动，太平天国失败后，逐渐深入民间。该名称最早出现于清代官方文书上在同治四年(1865)。由于它是天地会分支，所以也属于洪门。

5. 添刀会

以会员人人带刀而得名，每添一会员就增加一把刀。又名千刀会，系洪门天地会支派。与该会性质相近者还有浙江的钩刀会；川、闽粤省的双刀会；闽、粤、赣等省的铁尺会；赣省的天罡会（又称铁义会）；闽南小刀会；湘、赣棒棒会、靶子会。

6. 红布会（太平帮、长生帮）、红钱会、金钱会、边钱会

分别以红布条、银硃涂抹钱文，以铜钱为记号。属于洪门的支派。

7. 汉留、汉流、汉刘

汉留之"留"与"流"、"刘"，虽音同字不同，但都包含了民族精神。"汉留"，汉族之遗留的意思，有反清复明的含意。"汉流"，汉人之流，非满人之流的意思。"汉刘"，崇敬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所以也称汉刘。三者中以"汉留"名称较普遍。

8. 袍哥

袍哥是汉留的别名，其名称来源于《汉留史》所引用诗经中的句子："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意为穿同样衣服的弟兄，又称"同袍"。俗名"海皮"，哥老会也称为袍哥。

9. 江湖会

哥老会在清代咸丰以前，是以江湖会的

名称在民间活动的，为天地会的支派。当江湖会中分出哥老会之后，原有的江湖会仍旧存在。鄂北地区洪门于1900年以后，各山头逐渐采用了江湖会的名称。辛亥革命时老河口起义是江湖会领导的。

10. 仁义会

哥老会在嘉庆年间又叫仁义会，是天地会的分支。以后在哥老会活动期间，原有的仁义会也继续存在并有活动，有时也和哥老会的名称通用。

11. 社会、公社

明代复社于崇祯五年(1632)在苏州虎丘开会，合诸社为一，为清代秘密社会所继承，所以四川等地称洪门为社会。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初二日，川中各山堂代表于江油县统驭乡开会，改革山堂名义与宗旨，到会者四十八县，报名上香者(入会者)三千八百六十余人。将洪门山堂改为公社名称，名为广益公社。

广益公社社规纲要云："因见山堂内容不纯，后乃改山为公，但无社字，改码头为公口"。

12. 海皮、袍皮闹

海皮，其实为"海弼"，海是广的意思，弼是互助的意思，海还有洪门海底的意思，即深奥莫测，为秘密会社的神秘色彩。袍哥自称海弼，而外人称其为海皮。

民间以袍哥下层人物衣冠不整，行为欠端，多起哄闹事，而取名为"袍皮闹"，含有贬意。

此外，尚有清水会、匕首会、金线会、双刀会、小刀会、致公堂……等，大都属于洪门的支派。

历 史 传 说

始祖与前五祖

相传创立洪门之始祖为殷洪盛。

殷洪盛又名洪英，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明朝崇祯四年(1631)，“辛未进士，为人贤明练达，慷慨好义”。崇祯十四年(1641)，他率领门人南下，投奔史可法麾下。他与当时名人顾炎武、黄宗羲、傅青主、王夫之等都有交往。他有五位最得意的门生，即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胡得帝、李式开五人。清兵入关攻入北京后，明朝遗臣痛感亡国之恨，力图光复明朝。相传史可法令殷洪盛赴北京游说吴三桂，要吴倒戈反清，吴不听从。殷洪盛逃出北京南返途中，“遍访志士顾炎武、王夫之、傅青主、黄宗羲诸人，议创‘汉留’组织，以为‘反清复明’的企图”。当殷洪盛得到史可法在扬州殉难的消息后，乃转到安徽芜湖，投靠明朝将领黄得功，参赞军务。后来因黄战败自刎，部众分散，殷洪盛遂招抚、集合二万余人，抗拒清兵，屡战屡败，而于清顺治二年即崇祯十八年(1645)五月十三日死于三汊河(即安徽无为、含山、巢县三县交界处，距芜湖西南六十余里)。其门徒蔡德英等五人，誓死继承其遗志，为社稷效命。五人投奔潞王，不料潞王投降了清廷，五人就投奔了台湾郑成功。

相传，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占领台湾，依旧抱复国之志，日夜招兵买马，卧薪尝胆。当他得知永历帝和太子遇难之后，十分悲痛。这年九月间，他和部下将领及士兵共同结为兄弟，宣誓复明灭清，歃血为盟，并以驻兵的金台山为会盟地点，开山立堂，称之为“金台山明远堂”，这便成为郑成功创立洪门组织的起点。

洪门秘籍的《金台山开山令》如下：

明远堂愚兄大令下，满堂哥弟听根芽。令出开山非戏耍，犹如金殿领黄麻。只为满清兴人马，无端抢我大中华。扬州十日遭残杀，嘉定三屠更可嗟。把我人民当牛马，视同奴隶毫不差。马蹄袖又加马褂，凉帽缀成马缨花。本藩闻言喉气哑，率同豪杰奔天涯。权借台湾来住扎，金台山上饱风沙。今日结成香一把，胜似同胞共一家。万众一心往前杀，声摇山岳起龙蛇。不怕满虏军威大，舍死忘生推倒他。还我河山才了罢，补天有术效神娲。人生总要归泉下，为国捐躯始足夸。战死沙场终有价，将军马上听琵琶。争回疆土功劳大，流芳千古永无涯。奋我精神秣我马，勇往直前莫呼嗟。大从兄弟情不假，请进香堂把誓发。

“郑成功为了要发扬复明大志”，必须深入大陆活动，“于是派了他的部将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李式开、胡德帝等五人向中国(大陆)推进，这五个人是洪门始祖洪英(殷洪盛)的门徒，后来便称为洪门前五祖。”

少林和尚征西鲁

蔡德英等五人到达福建蒲田县九连山少林寺(即南少林),投拜于智通长老门下。智通出家前原为明朝大臣,因明末朝政腐败而急流勇退,到福建少林寺落发为僧,后来为少林寺方丈。满人入主中原后,智通怀有光复明朝之志,当其得知蔡等五人的来历后,劝五人受戒为僧,以便于掩护其反清复明的活动。于是五人受戒为僧,并从此在少林寺练习武艺。

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秉承清廷意旨劝郑成功投降,为郑成功拒绝而遭到满门抄斩时,郑成功之兄郑书丹在广东经商,得免于难。郑书丹之子郑君达得知蔡德英等五人奉郑成功之命到闽省活动,借少林寺为立足点,于是携带其妻郭秀英、妹郑玉兰、两子郑道德、郑道芳,千里迢迢来到少林寺,求得与蔡德英等五人合作,誓杀鞑子,以报国仇家恨。

智通长老接纳郑君达一家在少林寺内居住,郑君达每天同众和尚一起练习武艺,准备等待机会反清复明。

康熙十一年(1672),西鲁(有的抄本说是西藏)和清兵发生战争,清兵屡次被西鲁打败,“清廷惊惧惶急,悬榜招贤”,广求将才。智通长老对郑君达及蔡德英等五人建议趁机应征入清营,以报效朝廷为掩护,俟机倒戈反清。众人都认为此计甚妙。于是由郑君达、蔡德英等和少林寺和尚百余人揭黄榜应募。

郑君达、蔡德英和一百多个和尚浩浩荡荡向西鲁进发,“遇敌迎击,百战百胜,西鲁国王屈服,亲至阵前‘求和’,未及三月,寺僧凯旋归来,清廷大加赏赐,加官晋爵”。清廷授予郑君达以总兵要职,蔡德英和其他和尚不愿为官,仍旧回到少林寺,锻炼武艺。当时清廷重赏金银绢帛,加赐“玉僧”名号,赐对联三副:英雄居第一,豪杰定无双;不用文章朝圣主,全凭武艺见君王;出门朝见君王面,入寺方知古佛心。

少林寺和尚中有位马福仪,武功居第七位,但六根未除,对相貌俊美的郭秀英、郑玉兰诱奸未遂,事为智通方丈及众僧所知,将其赶出山门。马福仪衔恨将少林寺僧反清复明的打算向清廷官吏陈文耀、张近秋二人告密。陈、张二人启奏清廷:“西鲁叛乱为少林寺僧人轻易征服,将来少林寺僧人如有异志,则危及社稷也。”于是,清廷派兵三千人,携带硝磺燃料及易燃物品,由陈、张二人率领,以马福仪为向导,深夜包围少林寺,纵火焚烧,霎时间火光冲天,少林寺尽付一炬,僧人仅十八人逃出寺外,其余皆葬身火海。蔡德英、马超兴、方大成、胡德帝、李式开等五人恰在此十八人之中。蔡德英等十八人突围后,马福仪率清兵紧追不放,蔡德英以袖箭将马福仪射死。蔡等且战且走,到达黄泉村时,已有十三人战死;仅剩下蔡德英、马超兴、方大成、胡德帝、李式开五人,此时忽然浓雾弥漫,使五人便于隐蔽,追兵迷失方向,五人逃到沙湾口始得喘息。后辈尊称蔡德英等五人为洪门前五祖。因马福仪属于负义小人,以其武功居第七位,以后洪门有以七为戒的传统。

五僧逃难遇义士

蔡、方、马、李、胡五人继续逃跑,清兵又追赶上来,突然五人被一条大河拦住去路,正在万分危急之时,船户谢邦恒恰巧摇船而来,将五人救过河去。这位谢邦恒乃是明室遗老之后,隐居于此,后为洪门五义之一。蔡等五人刚渡过河,瞬时昏天黑地,飞沙走石,清兵只得退走。谢邦恒将蔡等五人邀请到家中作客,并介绍了勇士吴士佑、方惠成、张敬之、杨天佑、林大江等与蔡德英等相见。吴士佑等五人得知蔡德英等的来历后,十分钦佩,便都入了洪门,成为以后洪门的中五祖。

吴士佑等五人跟随蔡德英等五人投奔惠州宝珠寺。清兵追踪到宝珠寺。蔡德英、吴士佑等十人得到了寺僧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五人的援救,这吴、洪、姚、李、林五人为洪门后五祖。

蔡、吴等人逃向乌龙山,追兵又到,遇到原史可法部将吴烈之子吴廷贵在山上砍柴,以樵斧将追赶蔡德英等人的清军将领陈文耀劈死,蔡等得救。这位吴廷贵后为洪门五义之一。

五僧与二圣相会

蔡德英等转向江西赣州的阎王庙,守庙者为南明唐王部将黄昌成与其妻钟玉英(又名文君),被他们留住半月。又转向湖北襄阳的丁山,遇到郑君达妻郭秀英、妹郑玉兰、子道德和道芳,得知郑君达早已被陈文耀杀害,葬于丁山,遂同往君达墓致祭。此时在湖北做官的张近秋探知五僧及郑妻等人下落,领兵前来缉拿,各人相率逃散,惟郭秀英奋勇当前,挥剑迎击,斩杀甚众,清兵不支溃退,郭秀英嘱二子潜逃,遂与郑玉兰"投三合河而死,由船户谢邦恒得尸葬于河畔,并立碑志之。"

蔡德英等五僧逃到欧家庙,又与宝珠寺僧吴天佑等会合,准备前去解救郭秀英,途中遭遇张近秋,众僧奋勇冲杀,将张近秋杀死。至此,陈文耀、张近秋先后毙命,蔡等五僧初步为少林寺僧人报仇雪恨。

五僧转到万云山的万云寺,遇到方丈万云龙。万云龙原名吴德超,浙江台州人,原为潞王部将,起义失败后逃至此地,与陈近南相会并结义,以图反清复明,共举大事。

陈近南原名陈永华,湖北人,明翰林院学士。清兵入关后,参加扬州救国组织(即明社)。郑成功在南京从钱谦益学礼时,彼此相识,曾游说郑成功脱离郑芝龙,使之雄踞海外转战十八年。郑成功死后,郑氏子弟互讧,陈便离开台湾,前往云南游说吴三桂起兵反清,未能奏效,遂寄迹江湖,于雍正十二年(1673),在四川的雅州,以洪门的支派汉留组织开立精忠山。后又回到湖北,在白鹤洞研究道教,自称白鹤道人,与万云龙交往,万云龙与陈近南被称为洪门二圣,二圣得遇蔡德英等五僧,共同会商举义事宜。

奇遇暗记,群英结义

蔡德英等五僧,有一天在河畔发现一只白石香炉,炉底刻有"反氵肖复氵日"四字,并注明计重五十二斤十三两,他们将此香炉带给陈近南观看,陈认识炉底为"汉留"文字,含意为"反清复明",所注重量为暗记,五十二斤十三两,即"五湖,南北二京,十三省"之意。当时,众人认为是"天赐预兆,清室将亡",喜出望外,于是各人分途招集各地的志士,不久即有一千余人来聚集。这时有位朱洪竹,"少年英俊,仪表非凡",众人认为他有帝王之像。据说他是崇祯帝之孙、太子妃李氏之子,众人认为他是明朝的正统,一致拥戴他为盟主。

康熙十三年(1674)七月二十五日丑时,在红花亭聚会,由陈近南主香,同盟结义,以先来者为兄,后来者为弟。结盟者以朱洪竹之"洪"字为姓,并拆"洪"字为"三八二十一",为会中暗记。传说此乃"洪门"之由来。

天祐洪与三合军

红花亭结盟后,陈近南奉朱洪竹之令整顿军旅,发号施令。统率洪家军由湖北襄阳进发,势如破竹。将抵武昌,为清将于成龙所败,朱洪竹在乱军中失踪。陈近南被迫退守襄阳,三个多月内无力进军,遂分散部众,到各地开山立堂,秘密发展组织。并留诗一首:"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

与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于是万云龙往广东、广西,开太乙山,永茂堂,珠江水,两广香。胡大常往苏浙一带,开万历山,洪顺堂,苏浙水,万年香。洪启胜往甘肃新疆边界,开云梦山,忠义堂,五湖聚众水,西岳一炉香。焦天成往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开九龙山,同庆堂,重庆龙珠山,扫清复汉香。朱天顺往湖南、湖北一带,开天宝山,湖广堂,洞庭长江水,五岳得真香。陈近南督勉部属四处活动,自己不久即逝世于白鹤洞中。陈近南逝世后,部众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重集于惠州高溪庙,再图大举。陈近南临终时,因万云龙等相继战死,遂将洪门事务委托予宝珠寺后五祖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主持。康熙五十二年,后五祖又相继逝世,仅余先锋苏洪光。苏洪光率众与清后转战,清廷悬赏缉拿苏洪光,不仅未能得逞,洪门反而日益发展。雍正元年(1723),苏洪光病逝。众人因群龙无首,不知所措,忽然见苏洪光又苏醒过来,自称崇祯宦官王承恩,随驾缢死煤山,忠魂不散。遇达摩传谕,令其借尸还阳,以便领导众人实现“反清复明”的心愿,继“洪门”未竟的事业。这种借重于鬼神,耸人听闻,是为了便于号召群众,组织力量。当时大家听了这一借尸还魂的述说,惊喜交加,遂公推苏洪光为首领,改名天祐洪,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日为兄弟,月为姊妹,定名天地会,又名三合会、三点会。其军队称为三合军,取天时、地利、人和之义。进一步推广组织,另组会社,尊达摩为祖师,招收门徒弟子。以仁、义、礼、智、信五旗相号召。表面上投效清廷,督边粮运,实际上为了广布势力,于船工之中,刺探秘密,称为粮帮。他们平时穿清朝衣冠,但设香堂焚香拜祖时,掷清朝帽子于地,剥去清朝衣服扔在一旁,并将发辫盘于颈上,以示阳奉阴违之意。

天祐洪到各地广纳贤豪,自称三合军大元帅,统率三合军攻打清兵,连战皆捷,迭克名城,震荡湘、鄂、粤、桂、闽、浙、赣七省。有明朝总兵周于吉之侄名豪(又名玉英),率领韩龙、韩虎、李昌国等,先后来会。以史可法之侄史鉴明为军师,女侠关玉英为女军统领。兵发襄阳时,祭万云龙、郑君达、陈近南墓。尊朱洪竹为先皇,大举入四川。清廷川督王春美派遣心腹符四、田七诈降作为内应。天祐洪未察觉其阴谋诡计,对他们深加信任,当时部队以排为单位编制,以符四为会中四排,田七为七排,并任命他们为三合军副军帅。当大军抵达重庆与清兵交战时,符四、田七为清军内应,致使三合军因内变而惨败。天祐洪中流矢,退驻白虎山。女军统领关玉英拿获田七,以其心肝致祭先烈。符四化名邱荣新,也被擒获,处以一百单八刀死刑。从此,会中以符四、田七为戒,忌用四、七两排。并且认为知识分子容易动摇,以后严禁知识分子入会,同时也严拒官僚入会。从此,洪门以下层社会秘密结社进行活动,便于隐蔽潜伏。并修改会章,定三十六步半官阶,及十条、十款、五伦、八德、三纲、五常、三十六条、二十一则、十八律例;建木杨城制度,即制立木斗,上书“木杨城”三字;会盟立誓,须立三十六誓以明心迹。

这时,天祐洪伤势加剧,全部军务交苏洪宇与林烈主持。不久,天祐洪逝世,洪门中尊其为威宗。

苏洪宇刺死王春美

苏洪宇与林烈遵照天祐洪遗愿,统率三合军转战数县,又被清兵包围,关玉英率兵来助苏、林突围时英勇战死。

苏洪宇等对于镇压洪门起义军的川督王春美恨之入骨,立誓要杀死王春美为洪门弟兄报仇雪恨。而王春美因进剿三合军有功,调任粤督,移驻广东。苏洪宇得知王春美到了广东,便将洪门事务委托林烈一人主持,运用飞行术赶到广东,准备入督署刺杀王春美。

临行前，林烈再三劝阻，但苏洪宇决心不变。

林烈便在各地秘密活动，发展组织。不久，人们传说粤督王春美给人刺杀，而刺客也当场受擒。审问时，知道刺客便是苏洪宇。清吏问苏洪宇为什么要行刺？苏洪宇直言不讳说是为洪门死难兄弟报仇。苏洪宇英勇不屈，壮烈牺牲。林烈等得知后，沉痛悼念苏洪宇并决心继承他的遗志，为洪门事业而努力。由于清廷对洪门严加防范，洪门的活动十分困难，遂将部众遣散。会中志士秉承洪门精神，分头向海外南洋各埠及内地各省发展组织，开山立堂。但由雍正到乾隆末年，洪门在国内处于中落时期，各地的活动都遭到清廷的镇压，只有海外各地组织得到发展。直到嘉庆十五年(1810)之后，由于清廷更加腐败，农民日益破产，游民增多，社会动荡，洪门在国内的活动又振兴起来。

五月十三日，是关帝诞生日，福建范松如在这一天开人义山；嘉庆十九年，贵州林怀开筑青山；嘉庆二十三年，四川方安澜开蓬莱山；嘉庆二十四年，四川郭禹钦开华严山；道光五年，云南胡林章开广金山。此后，洪门进入复兴时期，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连绵不断。

上述这些来自洪门会内部的代代相传的传说，大多比较混乱、粗陋，都缺乏史实根据，但却反映了洪门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中含有很大成份的以汉族为正统的大汉族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他们的“反清复明”虽在客观上对于反对清朝封建统治有积极意义，但其主观上不是反对封建制度，而是反对满族统治。

海　　底

1. 郑成功与金台山

洪门以郑成功为传说中的创始人之一，奉为洪门的武宗，并有以下所述的“海底”之说法。

郑成功(1624—1662)，福建南安人，名森，又名福松，号大木，字明俨。为郑芝龙长子。明天启四年(1624)七月，生于日本，其母为日本田川氏。成功少年时期治学勤奋，且爱好武术。

唐王聿键在郑芝龙、郑成功支持下，于顺治二年在福州即帝位，改元隆武，继承南明王朝。隆武帝赐郑成功国姓“朱”。改名成功。封为御营中军都督。清兵南下，隆武帝知郑芝龙有异心，召见郑成功，垂询如何应战，在郑成功建议下，御驾亲征，不幸被俘身死。清兵进袭泉州，郑成功之母恐被辱，自缢而死，成功闻讯号泣不已，国仇家恨，悲愤万分。

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不听从郑成功关于坚决抗清的劝告，向清廷投降，郑成功与父断绝关系。为了维护明朝，坚持抗清，郑成功集合友好义士九十余人，乘船入海，至南澳募兵数千，泊于厦门鼓浪屿，设明太祖神位，团结部属，在金门、厦门一带厉兵秣马，军队不断扩充，在闽浙沿海同清兵作战数十次，战绩辉煌。郑成功治军纪律严明，受到民众的欢迎。随后打通闽浙交通，对清兵发动攻势，对海外日本、吕宋、暹罗、交趾各国友好通商，以充实军需。清廷对郑成功作战屡次受挫，改以招安之计，为郑成功坚决拒绝。永历十年(1656)，郑成功攻福州，克舟山等地。当时隆武帝朱聿键死后，桂王朱由榔(原封永明王)在广东肇庆即位，年号永历。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永历十三年，郑成功率兵大举北征，大军由舟山出发，入长江，取镇江，克芜湖。但围攻南京久攻不下，军事上一再失误，坐失良机，功亏一篑。

顺治十七年(1660)，南明永历帝已被迫逃入缅甸，西南反清复明基地丧失，东南沿海金、厦一隅孤立无援，难以立足。于是郑成功决心东向开拓台湾。以便作为长期抗清的基地。

郑成功的同乡何斌通荷兰语，常来往于台湾与福建，向郑成功献了秘密测绘的台湾

海岸港口地图。郑成功于是召集部属讨论东征,收取台湾。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三月一日,郑成功誓师东征,四月间攻入台岛,次年一月,荷兰人全部被打败,荷人占台凡三十八年,至此时彻底结束了在台的统治。

郑成功为了反清复明大业,在台励精图治,休兵息民,发展农业。兵士实行屯田自给,以减轻人民养兵的负担。

康熙元年(1662)夏,郑成功患病,五月初八日病危,于六月十八日逝世。传说郑成功生前开金台山明远堂,为反清复明而誓盟,与所部官兵结为兄弟,为组织洪门的起点。郑成功逝世后,遗著《金台山实录》和结盟兄弟之花名册传于其儿子郑经(又名经立)。郑经仍用南明永历年号以台湾为基地,曾率兵攻克闽、粤八郡,继承郑成功图复中原、赶走清王朝之志。不幸于康熙十九年兵败厦门,忧愤而死,其次子郑克塽嗣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提督施琅率兵攻取台湾,克塽抗敌失败,见大势已去,决心一死报国。拔剑自刎而死(注:根据史实,郑克塽是投降清朝的),台湾遂被清朝平定。当郑克塽自刎之时,为了防止先人遗物被清兵抄获,而将金台册的一切案卷文件、花名册、印信等,装入一铁匣密封后沉入厦门附近海底。

施琅得胜后曾悬赏缉查洪门成员,因花名册已装入铁匣沉入海底,洪门名单无从得到,洪门兄弟幸免于难。相传这个铁匣子于一百六十年后为福建渔民打捞起来。

2. 海底巧捞铁匣子

福建厦门附近有一渔民叫陈寿亭,妻子早亡,只有一子名兆官,父子二人相依为命。陈寿亭自幼练就一身好水性,能潜入海底打捞。有一天,陈寿亭打捞到一只铁匣子,见铁匣子密封很紧,希望里面有金银珠宝。于是搬到家中,以铁锤、铁钻用力撬开。只见内藏金银珠宝少许,小玉印一方,印文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书一册名《金台山实录》。陈寿亭将珠宝兑换使用,玉印售于邻人,得五两银子,将那些书籍胡乱放在水缸旁边的破桌上。

3. 义士奇获传家宝

道光十五年(1835),云南大理有位帮会人物名郭永泰,以贩卖药材为生。这年春天,他贩卖药材来到福建,路过陈寿亭家,此时陈寿亭已死,其子陈兆官继承父业仍以打鱼为生。郭永泰在陈家歇脚,向陈兆官要水喝,兆官给他一个木瓢,叫他自己到水缸里取水喝。郭在水缸边的破桌上发现了那本《金台山实录》,上面还盖有"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因为郑成功生前曾派人到云南一带联络志士进行反清活动,郭曾辗转听得郑成功开金台山的秘密,所以马上向陈兆官问明了《金台山实录》的来历,以十两银子向陈兆官买下来。又打听到玉印的下落,也以十两银子买了下来。

道光二十八年(1848),郭永泰在四川开尽忠山,一切香堂礼节,发给会员的证书,都是照《金台山实录》中记载的洪门组织章程的样子。会员证书上皆盖有"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至太平天国时期,其印遗失,其书尚存。洪门称这本书为《海底》,这"海底"二字是双关语,即含有它是从海底取出之意,更含有洪门秘传深奥难测之意。

以上传说主要来自洪门内部,大都缺乏史料根据。但既然洪门内部代代广为流传,却也反映了洪门的一些思想文化现象。洪门所以杜撰出自己的一些创始者,主要在于以这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忠臣,烈士作为精神支柱,作为维系会众的精神武器。

三把半香

洪门内部没有一个不知道三把半香这句话的。各地、各支派洪门之间联系的暗号、礼节、手式、茶壶阵等等,也都离不开三把半香。

三把半香成为洪门兄弟们共同尊崇的道德规范和江湖义气的信条。

三把半香包含了四个历史传说，这四个传说中的历史人物成为洪门崇拜的江湖义气的好榜样。

第一把香为纪念羊角哀和左伯桃，这把香称仁义香。第二把香为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这把香称忠义香。第三把香纪念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这把香称侠义香。半把香为纪念秦叔宝和单雄信，这半把香称有仁无义香。

1. 二鬼战荆轲

二鬼战荆轲的故事即关于羊角哀与左伯桃的传说。

春秋时期，楚元王重礼喜招贤纳士，天下人才闻风而来。西羌积石山有位贤士，姓左名伯桃，童年时父母双亡，勤奋读书，艰苦求学，成为旷世奇才。因看不惯诸侯恃强称霸，直到年近半百，仍不肯出来做官，后来听说楚元王礼贤下士，慕仁崇义，于是背上一袋书，投奔楚国而来。途中结识了羊角哀。二人交谈中心心相印，十分投机，相见恨晚，于是结拜为兄弟。

羊角哀学识同样渊博，才能出众，在左伯桃劝告下，愿同左伯桃一起去楚国。二人晓行夜宿，行程千里，所带干粮将要吃光，偏又遇到大雪齐膝。左伯桃考虑到这点干粮若供一人受用，还可到得楚国，否则两人都将会饿死。他自认为自己的学问与才能远不如羊角哀，决心以牺牲自己来成全羊角哀的功名。于是设法使羊角哀暂时离开时，将自己衣服脱下，决心将自己冻死，要羊角哀把自己的衣服穿上，把干粮带走，速去楚国发挥才干。

羊角哀到了楚国，经上大夫裴仲荐于楚元王。羊角哀向元王上疏献上治国的十大良策，元王大喜，拜羊角哀为中大夫，赐黄金百两，绸缎百匹。羊角哀弃官不做，要回去安葬左伯桃的尸体。以香汤沐浴。选择一块好地妥为安葬，并决心为左伯桃守墓三年。

不料左伯桃的坟和荆轲的墓相距很近。荆轲因刺秦王未成身死后，阴魂不散，与左伯桃在阴间发生冲突。夜间羊角哀梦见左伯桃遍体鳞伤，前来诉说荆轲凶猛，自己斗不过荆轲。羊角哀惊醒后，提剑到左伯桃坟前自刎而死。羊角哀到阴间之后，帮助左伯桃与荆轲激战，结果战胜了荆轲，荆轲之坟在雷雨中爆开。

此事被楚元王知道后，为左伯桃、羊角哀修建一座忠义祠，并树碑立传以记其事，后世香火不断。这一神话般的传说标榜“义气”，是洪门的第一把香。

2. 桃园三结义

东汉末年，朝政日衰，中山靖王之后，景帝玄孙刘备，与关羽、张飞三人在桃园结拜为异姓兄弟，对天盟誓，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誓必振兴汉朝社稷。

刘备、张飞于小沛、徐州同曹操作战失败，关羽孤军守下邳，不久关羽在下邳城外中曹操之计，前有重兵阻挡，后无退路，被围困于一座土山上。曹操爱关羽的武艺与才能，派遣与关羽有旧交的张辽前往土山劝降，张辽向关羽分析了只有暂且投靠曹操才有利于刘备、张飞，有利于匡扶汉室，有利于保护刘备托付的二位夫人的安全。关羽听从了张辽的劝告，有条件的暂时的投靠了曹操。曹操为了收服关羽的心，利用挟天子之便，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并铸一大印相送。生活上关怀备至，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赐金，下马赐银，并赠美女十名及名贵衣袍。尤其是将赤兔追风马赠送关羽。

可是关羽却始终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当关羽打听到刘备下落后，便写一信向曹操辞射，将累次所受金银一一封置库中，悬汉寿亭侯印于堂上，请二位嫂夫人上车，骑上赤兔马，手提青龙刀，保护二位皇嫂而去。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历尽难关，终于找到了刘备。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率兵进

攻襄樊与曹操作战。曹操联络东吴孙权，请东吴方面出兵切断关羽的后路。当关羽失去荆州走保麦城时，遭东吴伏兵袭击，人马跌入陷坑，被东吴将领潘璋部下马忠擒获。与其子关平二人壮烈捐躯。不久曹操病死，刘备将东吴视为主要敌人。建安二十六年，刘备称昭烈帝，改元章武，以桃园结义的“誓同生死”为重，力排众人劝阻，决心为二弟报仇，誓师伐吴。

张飞出兵为二哥关羽报仇万分激愤、心切，鞭笞部属人员，为部属暗杀，并拿着张飞的头投降东吴。刘备因二位仁弟惨死，痛不欲生，决心倾力报仇。

刘备出师后，势如破竹，连连告捷，潘璋、马忠，一一被活捉处死。东吴方面看到形势急，速将杀害张飞而投奔来的范疆、张达囚禁起来，献给刘备，并愿以交还荆州求和停战，但刘备不肯罢休。东吴被迫以陆逊为大将，起倾国之师，与蜀汉决战，汉军驻于彝陵，因天气炎热，扎营于树林茂密处。陆逊乘机用火攻，造成火烧连营七百里之惨剧，刘备一败涂地，忧愤而死于白帝城。

其实刘关张之惨败惨死与战略失策，处理问题失去理智有关，从历史学与军事学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但洪门从儒家传统伦理观念出发，崇拜刘、关、张三人的义气，效法三人不负桃园誓言的精神。这就是洪门的第二把香。

3.《水浒》一百零八将

第三把香是纪念《水浒》一百单八将的故事。

宋代徽宗时，奸臣当道，皇帝懦弱无能。官府横征暴敛，百姓难以为生，山东梁山泊上有宋江为首的一百单八位好汉聚义。这一百单八人虽各有不同的出身，各有自己的性格和武艺特长，但大家在忠义堂前结拜为异姓兄弟姐妹，能够捐弃私仇，团结一心，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干出一番除暴济贫、震动朝野的英雄事迹，这也正是洪门弟兄所要效法的忠义精神，所以成为洪门的第三把香的标志。

4.秦琼哭回半把香

在三把香之外，尚有半把香，是纪念秦琼与单雄信的传说。

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秦琼(叔宝)，押了十三名江洋大盗前往潞州，因半途中死了一名，没有得到刺史蔡某的批票回文，秦琼路费用尽，只得卖马当饷。幸遇好汉单雄信，此人武艺超群，仗义疏财。秦琼得到他的大力资助，渡过了困难。秦琼长期流落他乡，家境贫困，无力维持家中人的生计，单雄信屡次派人送钱给秦琼家中，并安慰秦母秦妻。后来秦琼为唐王李渊的部将，而单雄信因其兄被李渊杀害，誓不与李合作，乃与反对李渊的窦建德、王世充等合作，因而秦琼和单雄信这两位挚友各事其主。

公元618年李渊登皇帝位，年号武德。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打败了窦建德、王世充，单雄信等人也被活捉。秦琼与拜把兄弟徐懋功、程知节等向秦王李世民苦苦哀求保释单雄信，但李世民知道单雄信决不会向他妥协，所以拒不同意。单雄信也表示决不向李世民屈服，声称兄仇不报不可算人。

单雄信临刑的前夜，秦琼、徐懋功、程知节等轮流把盏劝酒，单雄信大碗豪饮。秦、徐、程眼看救不了好友，仰面大哭起来。秦琼搬来火盆，用刀割了股上的肉炙了给单雄信下酒，以表心意。

单雄信被杀后，秦琼为之安葬，痛哭不止。因秦琼未能像羊角哀那样“舍命陪君子”所以洪门中说：“秦琼哭回半把香”。

上述洪门三把半香的传说，主要在于借重江湖义气为精神支柱，加强帮内团结，特别是防止帮内兄弟受敌人收买。而这些传说故事本身带有某些封建迷信色彩的落后性，反映出洪门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以崇尚义气代替政治纲领，这是洪门在反清斗争中屡遭挫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洪门为了普及宣传崇尚义气，将三把半

香的故事编为歌词，便于会内背颂。歌词如下：

头把香是仗义香。周朝时有二大贤，羊角哀与左伯桃，二人结拜生死交。角哀求官楚国去，伯桃冻死空柳中，角哀受爵返齐国，金旗金表祭伯桃。道旁有个荆轲墓，欺他孤魂苦零凋。角哀舍命全仁义，留下美名万古标。

二把香是仁义香。汉朝时有刘关张，桃园结拜义气重，三人同心一炉香，乌牛白马祭天地，剿灭黄巾共苦劳。千里单骑保皇嫂，张飞喝断当阳桥。四弟子龙威飞将，长板坡前逞英豪，赤心保兄西川坐，诸葛先生妙算高。

三把香是忠义香。宋朝水浒梁山岗，众人结拜同生死，高扯替天行道旗，一百八将等招安，俱是天罡地煞将，天罡地煞结拜香。

半把香是威风香，隋炀无道乱朝纲，此香本来不算香，弟兄结拜在瓦岗。混世魔王三年正，气数已满各一方。大众英雄保唐王，惟有雄信保世充，唐王既把世充灭，雄信舍死不投降。受刑吃剑心坚硬，罗成背盟乱箭亡。虽说瓦岗威不大，秦琼哭回半把香。

以上所谓歌词只不过是粗、浅、俗、陋的顺口溜，封建正统观念浓厚。

汉留的传说

汉留两字顾名思义，是汉族遗留，又含有留存汉家天下之意。汉留又称汉刘、汉流。汉流其实是洪帮的支派，又混同为洪门的别名。以下有关汉留的传说，很少能为确凿史料证实，仅为民间流传的说法，本来就有杂乱无章的特点，笔者尽力梳理，仍有个别处与别的传说交叉以至稍有矛盾之感。但是，这些传说中是鱼龙混杂的故事，对于了解洪门文化思想及文化思想背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弯帽根”与“换袍”

传说郑成功部将陈近南——洪门称为宣宗，探知吴三桂蓄有异志，拟与吴联合灭清。因而赴四川雅州，并开精忠山，预在四川潜伏健儿，以便举事。不料结果大失所望，原来吴三桂完全为个人权利而对清廷不满，并非为民族利益。陈近南只好在建昌待时养晦，这时有位四牌（排）的方宾良，绰号“弯帽根”，见利忘义，向建昌镇台告发了陈近南，建昌镇台马赓武率领亲兵500人，包围了陈近南住所。幸亏陈近南精通武术，易服逃至湖广白鹤洞出家，后称白鹤道人，因此，洪帮忌用四排（此说与别的说法稍有差别），对叛徒都称为“弯帽根”。

嘉庆十九年（1814），贵州林怀明开筑青山，其子林涛，任侠尚义，汉留群众希望林涛入盟，但因碍于生父在堂，父子不可同堂，否则称为潜越。为了吸收林涛入盟，汉留添设了“换袍”仪式，经换袍后，即改变为同袍之意，父子可以同堂，根据这一规则，祖孙亦可以同堂。但同时又规定，换袍入堂的后辈，从记名之日起，须呼大伯盟叔三年，始能在盟内称哥道弟。这种入盟的后辈称为矮举，矮举记名，须从小老么开始，小老么尚未达到正式品级，系记名矮举，在品级上属于半步。后来边省各处尚有“子孙要换袍，先请问林涛”之谚。据说矮举换袍为洪门组织级别上设有半步的开始。

2. 查如龙的惨祸

如前所述传说洪门（汉留）的始祖洪英，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明进士，在洪门文宗史可法幕下任事后，奉史命至燕京游说吴三桂复明，三桂不允，于是遍访王船山、傅青主、黄黎洲、顾亭林诸志士，共商灭清计划。便由王船山作史论，黄黎洲作《明夷待访录》，宣传尊华攘夷思想，但诸志士仅作文字宣传，无实际力量。幸而顾亭林、傅青主两人，忽然获得一巨款，在陕西各地创办汇票号和当铺等，藉此从经济上接济反清斗争。这笔巨款与李闯王有关。闯王李自成本是陕西米脂县人，他当“流寇”期间，将积累的金钱，归藏故乡，及至

清兵入京，逼其西走，又与其部下，将从北京取得的财物，运往故乡。可是当他的先驱部队到达陕西时，后续部队被清兵截断，转入湖广的罗公山，而自成本身以后下落不明，因而解到陕西的金银珠宝，被前来陕西讲学的顾亭林、傅青主与地方人士，乘闯兵不备而截取，共得金银八百余万两。就用这笔巨款开设汇号当铺，为地方谋福利，亦成为支援反清活动经费。此后，凡在边省各地经营汇票与当铺者，多为山西、陕西人，至民国期间各当铺与汇票号，当被人称为"当光棍"，似与江湖上称的洪帮"光棍"有关。

上述事例，为汉留史上传说的明朝遗老，在清朝统治下仍忠于明朝的故事。而在这批明朝遗老中，却出现了查如龙惨祸。

查如龙为下江人（长江上游称中下游人为下江人），明弘光朝时，曾任部郎，明亡后，流落江湖，一意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在康熙初年，伪造各督抚提镇的书札、官封、印信、花押、图章等，十分逼真。书中多有联络声气，共图大举的含意。并均具有报章章稿，汇为一册，携往滇南，寓于山寺僧舍中。秘造血书一封，上平西王（吴三桂），内容是说："天下督抚提镇以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为盟津之会，王乃汉人，必能排满，当年之事，王系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枢纽在王，王若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响应，此诚千古一时之机会"。书成之后，令一童前往王府，上呈此书。查如龙故意欲将此事泄露于世，以达到胁迫平西王骑虎难下之势。可是这位送信的童子到王府时，眼花缭乱，未能找到门路，仍把原书携回。后来查如龙因假银一事，在曲靖府败露，曲靖知府李索祖与吴三桂本有宿仇，得到了上吴三桂的书札后，甚是欢喜，但因那书稿中牵涉到很多疆臣，因而将其焚灭，单以上平西王的血书，申呈于督抚闻于朝。闻氏令千总董三纲将查如龙解往京师，如龙临出发时，大呼吴三桂的名字道："我死不足惜，尔灭九族，亦不远矣。"到京后，查如龙被凌迟处死。但从这一事件发生后，清廷疑吴三桂叛变愈深，终于酿成了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吴三桂的叛变。洪门传说中认为，如果吴三桂早日响应查如龙的请求，当时义旗一举，"不难四海景从，……一误误国，再误误人，三误误己，三桂真是全无心肝的人了。"

3. 江湖"十三惊"

汉留飘泊江湖，在从事的各种谋生职业方面，既有公开的一面，又有秘密活动的一面。其中又不乏流氓、骗子活动。这里的"惊"是惊疑的意思。其中又有男女之别，男子九惊，女子四惊，合为十三惊。

惊生意。凡属江湖上算命、推流年、敲三才板的，称为"子平惊"；算命代卜课推数的，称为"三元惊"；算命代看相的，称为"柳子惊"；算命提雀笼的，称为"嘴子惊"；算命弹三弦的，称为"幌幌惊"；瞎子算命拉胡琴的，称为"默弦惊"；测字的，称为"朵朵惊"；看相的，称为"盘盘惊"；摸骨相的，称为"手扪惊"。以上为男子九惊。至于女子的四惊是：女子下乡抽花书的，称为"花花惊"；抽花书代观水碗并看香头，称为"帕帕惊"；抽花书代拴魂烧胎的，称为"带带惊"；抽花书代卖丸药的，称为"奶奶惊"。这就是女子四惊。总称为"惊生意"。

培生意。培是培补之意。凡是江湖上卖补品的设摊卖药的都称为"四平摊子"，而在四平摊子中又分为文四平与武四平，内四平，外四平，根根棚，马马棚。所谓"文四平"，即设摊卖膏丹丸散，并临时看病的；"武四平"，是设棚厂，摆刀叉以及用种种武器吸引人们，卖跌打药的。"内四平"，即设摊摆列各种补药，及卖药酒等药品饮料的；"外四平"，是用炙功，按摩，神水，符咒等治病的。"根根棚"，是在空地或空場上扯着棚子卖梗子药如芳香、白芷、人参、洋参、何首乌等的，这是指根子上生出来的植物药品。"马马棚"，或称"马马霜"，是假冒各种药品，骗人钱财的，钱一骗到手，马上就走。以上这些卖药的统称"培生

意。”

飘生意。飘放的意思，江湖上又称“飘叶子”，这种飘叶子又分为有资本与无资本的两种。如裁许多字条，上面写着俚俗的字谜，专到茶社酒馆中向顾客索钱的，这是不费资本的“飘叶子”。至于略花费些资本的飘叶子，是用一种宣纸，在上面画了画，或写了字，落上送给对象的款，然后向送给对象索钱。或者是探听到某位财主有某种嗜好或爱好，就有针对性的将某种吃的或玩的，送上门去，开始不谈价钱，可以暂放在财主处，等到财主已吃了或玩得有损坏后，即索要原物，借此敲诈勒索。

猜生意。猜字为猜想测度之意，这类生意多含赌博性质，如“摇宝”、“开宝”、“花宝”、“估标”、“诗谜”等等，均属于猜生意，以各种形式设谜局，引人来猜，猜中是较少的，多数情况下，使人猜不中，有人在屡猜不中情况下，出于气愤情绪，倾囊为止，诸如彩票、奖券之类，也属于这种性质。凡设局引人猜测或碰“运气”的，统称“猜生意”。

此外，还有如：“风门”，即在江湖上以多种看风使舵方式行骗，往往利用美人计行骗。“火门”，即是“火候”之意。也往往利用美人计或发财的诱惑使人上当。

以上是旧时代洪帮中广大下层人员在江湖上从事的职业，也只能理解为部分帮会人员从事的职业。

组 织 制 度

元 始 山 堂

传说自少林五僧与陈近南创立洪门会后，起兵反抗清廷失败，乃转为隐蔽活动，积蓄力量，开始在各地秘密发展组织。

洪门内部相传其组织系统是仿照《水浒传》梁山忠义堂的组织加以改进而形成的。其组织的秘密名称一律规定为："某某山、某某水、某某堂、某某香。这种山、堂、水、香的秘密名称，称为四柱。除四柱外，还各规定内、外口号。

传说有万云龙带彪字印信到两广开立太乙山，水为珠江水，堂为永茂堂，香为两广香，内口号为"龙希"，外口号为"彪"。胡大常带彪字印信到苏浙一带开立万历山，水为苏浙水，堂为洪顺堂，香为万年香，内口号为"常希"，外口号为"彪"。洪启胜带彪字印信往甘肃新疆边境，开立云梦山，水为江湖水，堂为忠义堂，香为西岳一炉香，内口号为"胜希"，外口号为"彪"。焦天成带彪字印信往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开立九龙山，水为香庆龙珠水，堂为同庆堂，香为扫清复汉香，内口号为"成希"，外口号为"彪"。朱天顺带彪字印信往湖南湖北一带开立天宝山，水为洞庭长江水，堂为湖广堂，香为五湖德真香，内口号为"顺希"，外口号为"彪"。

三十六部半职位

洪门历史悠久，组织系统随着其历史的演进，逐步严密起来，在清朝道光后期，洪门天地会内已经形成了一套职衔名称。但当时职称还较简单，首领人物仅有洪棍、白扇、草鞋三个衔，先锋这一职衔还未列入领袖人物之列。其领袖人物中的职衔名称都是隐语暗号，洪棍相当于元帅，纸扇或白扇相当于军师，草鞋相当于通信联络的首领，因为他要走动通信联络，所以以草鞋为代号。本来洪棍又作红棍是龙头的代号，但后来演变为在会内执掌刑罚者。白扇又称先生、三哥。以后在哥老会和其他洪门支派中，组织系统的职务分工逐步发展到三十六个半职衔名称。三十六部(步)半职位，形成了一套组织结构，同时也是晋级阶梯，有功劳者才能够晋级。每一部位(又称步位)各有专职，分工合作，秩序井然。三十六部半职位，即三十六个官职加上制皇这半部官职。制皇为前任山主，恐碍现任山主权力，规定其不得参与机要，是个可有可无的职位，所以称为半部。他虽然没有实权，但在山堂中的地位极其显贵，相当于太上皇。

洪门组织按排编制，排又称行，几排又称为行几。

有关洪门组织系统的各种抄本中的记载

略有差别，有的十分繁琐，在此删繁就简，并略加解释。

行一有制皇、龙头、坐堂、陪堂、盟证、香长、管堂、刑堂、执堂、礼堂、护剑、护印、心腹、新一，共十三位半大爷。

行二有圣贤，一位二爷。

行三有桓侯、披红、插花，共三位当家三爷。

行五有红旗、黑旗、蓝旗、执法、青刚，共五位管事五爷。

行六有花冠（巡风）、镇山、巡山，共三位六爷。

行八有白旗、八德，共二位八爷。

行九有九江、江口、检口、守口、斗口，共五位九爷。

行十有大、小么满、铜章、铁印，共四位么爷。

共三十六部半官位。

因为少林寺僧人马福仪武功居第七位，又因天祐洪时的符四、田七二人占四、七行步位，他们三人都是洪门的叛徒，故以四、七为忌。此后四、七行步位都以女子入洪门者任之。这也反映了洪门中妇女地位低下。女士行四，金凤前山。行七，银凤后山。

三十六部半职位的职责简述如下：

龙头——统辖全权的山主。

副龙头——统辖全权之副山主。

坐堂——辅助龙头办理全山事务，权力极大，仅次于正、副龙头。

陪堂——辅助坐堂办理公口上一切事务。坐堂处理公务，须陪堂签署始能生效。

盟证——盟誓之证人。非元老不得担任。

香长——主香之长。开香堂的主祭者，非元老不能任该职。有的山头以龙头兼任。

管堂——管理全山之事。

刑事——处理刑事。如有本山堂哥弟争执事，经营堂处理后，凡违法者经刑堂定谳后才能执行。刑堂命令传出后，由外八堂遵照执行。

执堂——统计本山人数，类似兵部，管军事组织训练。

礼堂——按洪门礼仪，负责教育大家。

护剑、护印——为龙头近身之掌剑、掌印者。

心腹——亦称新服、新福、刑副，有特别资格，于洪门有伟大功绩者才可充任。如地方上声望隆重之绅士，在会内有实力地位者，或在物质上大力资助会内者。

圣贤——桃园结义时，关圣居于老二的位子，洪门开山立堂必行迎圣典礼。圣贤行伴圣、送圣及迎圣之职。

桓侯——又称当家。桃园结义，桓侯居三。督管钱粮出纳事务，为当家三爷之第一级。

披红——管理局部钱粮之收支，或管理各码头粮台会计。为当家三爷之第二级。

插花——管理催、督、护粮等事务。

红旗——大管事。专管外务，包括各方交际及联络各码头等职责。能弹劾内八堂大爷，约束外八堂兄弟，有发号司令召集弟兄之特权。为管事之第一级。

黑旗——在管事中负责内务，负责检查新会员的出身和个人历史情况，防止“身家不清”者混入会内。为管事中之第二级。

蓝旗——负责平时巡查本山堂内一切事务，及迎风接驾等事宜，佐理各大管事职务。为管事中之第三级。

执法——为惩戒官。凡属哥弟有违犯香规及一切不法情事，轻者由执法呈明龙头大哥，照例执行。重者由全堂议处，举行刑堂大令执刑。

青刚——又称帮办，协助红旗、黑旗、蓝旗、执法的职责。检查会员是否身家清白。为管事中之第四级。

花冠——又称巡风，负有严防奸细，保护山头之责。为六排中之第一级。

镇山——为花冠的助手。负有开山堂时

巡风瞭哨的职责。平时巡查外码头来客,通风报信,为全山耳目。

巡山——又称巡查,为花冠的助手。负责山内外防守巡查之责。

白旗——又名纲纪,护掌十八本律书,管记功过,为八排中之第一级。

八德——管金鼓旗帜及军用品制造,如会内兄弟有过错,负责找保人讲情。为八排第二级。九江——又称九排。管挂牌,凡开山堂,栽培新进,或办提升,职名确定后,五排之上者高挂金牌,五排之下者,高挂银牌。如属于降级即挂蓝牌。此外兼管承办筵席等。为九排第一级。

江口、检口、守口、斗口(堵口)——负责盘查外来人员防守要隘关口。为九排第二、三、四、五级。

大老么——又称辕门,或称大满,专管内八堂收发传达之责。为十排第一级。

铜章——管发铜质腰牌。为十排第二级。

铁印——管家看登记来宾腰牌号码,复查用印。为十排第三级。

小老么——亦称小满,管迎送招待宾客及一切杂务。为十排第四级。

以上所列洪门三十六部半职位反映出洪门组织制度上等级森严,分工具体,官职庞杂,是中国封建制度的一个缩影,也是官僚体制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封建性的官僚体制缩影中,以龙头大哥为首,龙头大哥有至高的权力,各级官职根据职位高低,享有不同的特权。这种封建等级制,缺乏权力上的制衡,于是形成龙头大哥的专制独裁。这是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缩影。

内八堂和外八堂

洪门按照组织内部与外部事务的分工,有内八堂与外八堂。

内八堂有:正龙头(即山主,或称正龙头大爷)、副龙头(即副山主,或称副龙头大爷)、坐堂(或称左相大爷)、陪堂(或称右相大爷)、管堂(或称京内总督大爷)、执堂(或称尚书大爷)、刑堂(或称西阁大爷)、礼堂(或称东阁大爷)、盟证(或称中堂大爷)、香长(或称总制大爷,系临时推派)。

外八堂有:心腹(或称京内军师,又称心腹大爷)、圣贤(或称京外军师,又称二爷)、桓侯(或称京外总督粮饷,或称行贴三江总督营务处,又称当家老三)、红旗(或称督管粮台)、蓝旗(传报山堂,或称帮办管事)、黑旗(侍候坐堂,或称管事五爷)、红旗、蓝旗、黑旗(又总称管事老五)、巡风(或称巡营查哨,又称老六),白旗(或称老八)、江口(或称老九)、么满(又称老么)。

堂口字号与五堂尊称

堂口字号有:仁(西北堂),义(东北堂),礼(状元堂),智(四喜堂),信(五福堂)。

洪门五堂为:坐、陪、刑、执、礼,其尊称次序为:彪、彪、彪、彪、彪五字和彪、彪、彪、彪、彪五字,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其尊称如下:

坐堂——彪彪公,

陪堂——彪彪侯,

刑堂——彪彪伯,

执堂——彪彪子,

礼堂——彪彪男。

从以上内八堂、外八堂的名称,堂口字号及五堂尊称中,可见洪门组织内部不仅职位繁多、等级多、层次多,而且每一职位又有许多繁琐的名称。这种情况反映了民间下层社会组织的秘密性与落后性。

禁　　条

洪门会起源于民间秘密结社，最初就具有互助性，为了保持其内部团结互助，很重视会内的纪律性。这种纪律性，不仅是为了会内的互相关系，也是为了保持秘密的非法的活动方式所必需的。洪门会运用许多禁条、誓词来加强内聚力。由于洪门早年的秘密活动方式，这些禁条、誓词大多口头相传，缺乏原始文献记载，后人著述中所记载的大都经历了代代相传，难免在相传中起变化。随着历史条件的演变和各地洪门组织环境的差别，洪门的许多禁条、誓词，十分杂乱，在内容、格式、条文顺序、文字表达方式上，各有差别，总的反映出这些洪门会众的文化水平不高。从思想内容来看，其中既接受了传统文化中一些民族性美德，也承袭了封建性的糟粕。以下列举一些较有代表性的禁条。

1. 十禁例

一禁，自入洪门之后，不得领花红（官府的人）捉拿兄弟。如有不依者，定然洗身（杀头），不许兄弟取保。

二禁，自入洪门之后，不得奸淫义嫂义妹。如有不依者，定然斩首，决不徇情。

三禁，自入洪门之后，不得私传馆底教习外人。如有不依者，先取顺风（割耳）一对，另行重责。

四禁，自入洪门之后，不得与兄弟斗气伤害手足，不得臭言恶语辱兄弟。如有不依者，重责。

五禁，自入洪门之后，不得酒后横凶，斗事喧哗，藐视香主父母等长辈。如有不依者，重责。

六禁，自入洪门之后，兄弟托带财物须要送到询交，不得私吞藏匿。如有不依者，重责。

吉禁（洪门禁用七，以吉代七），自入洪门之后，不得私行捡银肥己自用。如有不依者，被兄弟查出重责。

八禁，自入洪门之后，与兄弟赊借财物须要有借有还，不得拖延。如有不依者，重责。

九禁，自入洪门之后，不得恃强欺弱，须要富贫一体，不得藐视贫弱。如有不依者，重责。

十禁，自入洪门之后，身为执长者，倘兄弟有事须要酌议，应行则行，不得推委，借事躲避。如有不依者，定然革职另行重罚。

以上这十条禁例，除了一、三两条属于防范敌人破坏之外，其余八条，都属于维持会内团结的内容。

2.《十禁令歌词》

十禁大令传下来，位台哥弟听分明。
十禁大令有明文，十禁原来禁咱们。
小弟略略受教训，试看讲出行不行。
还望位台多指示，如有错误请改正。
一禁红面来视兄，二楚礼貌不周全。
三禁拖扒来反说，四禁背地巧生嗔。
五禁拐逃人妇女，六禁穿灶作游神。
七禁对兄不恭敬，八禁胡言来诳语。
九禁乌合与乱为，十禁办事不留心。
小弟十禁讲不清，还望位台海量深。
十禁讲完条例尽，海湖规则本非轻。
小弟从此知途径，汉留原是一家人。
十禁大令讲完了，忠义堂前把令交。

以上的十禁令内容，都是防止会内发生不利于团结的行为或发生不利于维持等级秩序的行为的禁条。

3. 十条三要令歌词

十条要令往下传，在园哥弟听我言。
汉留原来有十条，编成歌诀须记牢。
语言虽俗理玄妙，各要遵行才算高。
第一父母要尽孝，尊敬长上第二条。
第三不可大压小，兄宽弟让第四条。
第五乡邻要和睦，敬让谦恭第六条。
第七要把忠义抱，行仁尚义第八条。
第九上下须分晓，谨慎言行第十条。

此外还有三大要，一个色字便含包。
逢遇弟妇和兄妇，俯首潜心莫乱瞧。
见得妇女休调笑，犹如姊妹为同胞。
孀妇尼姑最紧要，奸淫妇女要三刀。
上例便为三大要，行为谨慎要记牢。
任你偷香手段妙，天网恢恢岂能逃。
人纵不知神明晓，法理人情定不饶。
若是违反不依教，无论轻重先脱袍。
轻则红棍四十下，重则按刀自己剽。
初入汉留须通晓，方是光棍称英豪。
十条三要讲完了，忠义堂前把令交。

以上的十条三要令，属于社会道德规范。它用于洪门会内部，有利于维护会内的安定团结。在三要令中，主要是戒色，以便防止在男女关系上不利于会内的团结。凡民间下层秘密结社，男女关系上的问题往往引起内讧以至火拼，所以强调这方面纪律。

4. 十款歌词

袍哥原来规矩大，在缘哥弟要详查。
还有十款更值价，范围谨守始堪夸。
汉流章法要文雅，不是山蛮野性家。
一不许前后把衣札，二不许帽子戴歪斜。
三不许敲脚把腿掛，四不许口内乱开花。
五不许当堂把架打，六不许胡扯与胡拉。
七不许谈言无上下、八不许吵闹肆喧哗。
九不许裁瓜还逗攞，十不许灭股并卡娃。
同人学得修身法，声名早著大中华。

5. 十要歌词

一要孝弟和忠信，二要久远讲交情。
三要礼义为根本，四要廉耻切实行。
五要谦和与诚信，六要仁爱并和平。
七要处世多端正，八要品节允详明。
九要视财如粪土，十要作事秉良心。
但将十要牢记定，顶天立地作完人。

以上十款、十要歌词，反映出洪门要求会员讲究礼貌，防止流氓习气和野蛮行为；洪门还提倡儒家的传统道德如忠、孝、仁、爱的道德准则。但是，这些禁条并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执行。否则是可能防止民国以后的洪帮走上流氓化的。

6. 十条十款刑律歌词

十条十款不要犯，禄位高升紫罗袍。
有人若犯十条款，条条款款定不饶。
上三排哥子犯了戒，自己挖坑自己埋。
中三排哥子犯了戒，三刀六眼洞自开。
下三排哥子犯了戒，金枪红棍两分开。
有仁有义来结拜，五湖四海一母胎。
自从盘古分开地，忠孝仁义把名传。
桃园根本义为重，异姓结拜胜同胞。

从十条十款刑律歌词中反映出洪门的刑律是很严厉的，有关刑律将在刑法部分以实例说明。

民国时期的纲常、规要

民国以来的洪门纲常、规要，反映出历史背景的变化，除了洪门原有的某些特点被继承下来之外，洪门纲常、规要受到了民国期间政治上的影响，此外，在文字表达方面也比以往通俗、明确些。试看以下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

1.《三纲五常》

三纲是：

岳武穆——遵循慈母训，精忠报国仇，杀身成仁义，忠孝传千秋。

文天祥——奉诏勤王事，矢志不瓦全，舍身而取义，丹青照万年。

孙文——赤心救人类，主义曰三民，民国赖以立，……

五常是：

仁——尧帝择婿配农夫，大舜耕田入皇都，万里洪基齐推让，史册斑斑颂唐虞。

义——孟尝好义世间稀，日用斗金不足惜，三千食客迎门里，鸡鸣狗盗一般奇。

礼——关睢载咏首国风，大礼告成是周公，男婚女嫁桃夭赋，今人盍效古人风。

智——唐朝有个徐茂公，神机妙算胜卧

龙,保主瞒天过了海,唐王驾前作国公。

信——关公放曹义气长,秉烛待旦堪钦尚,封金却印辞曹往,护嫂寻兄信字香。

洪门在民国前以至民国后的某些较落后地区所鼓吹的三纲、五常,具有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如:洪门的《五阴六阳》诗歌称:“知三纲来知五常,分开五阴合六阳。……乾坤八卦定纲常,君臣义道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这其中,三纲遵循的是封建帝制和君臣关系,五常是传统的伦理道德。民国后,洪门的以上三纲,虽然仍沿用这一名称,但其内容已经改变了。原来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社会的三种主要的道德伦理关系。而民国后洪门的“三纲”却将内容改为以岳武穆、文天祥、孙文三人为学习的楷模,学习其精忠报国,舍身取义和赤心救人类的精神。这在洪门的精神教育上是一个进步。

至于洪门的五常,在民国后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仍然是鼓吹传统的伦理道德,只是对五常的每一个字,都树立了一位古人为榜样,如:“仁”以尧、舜、虞为榜样;“义”,以孟尝君为榜样;“礼”,以周公为榜样;“智”,以徐茂公为榜样;“信”,以关羽为榜样。这其中虽有民族传统文化中可供筛选,可供批判继承的精神遗产,但其主要方面却是宣染封建意识。对于洪门来说,孟尝君的养士之风,正迎合了洪门各码头之间交往和江湖上笼络党羽的需要。徐茂公式的智,关羽式的信也迎合了洪门闯江湖的需要。

2. 五伦八德

五伦是:

一、执政者待人民博爱平等,享权利、尽义务、责任分明。

二、为父母对子孙堂前教训,为子者敬父母如爱己身。

三、为夫者对妻孥时常理论,夫雄飞妻内助,振启家声。

四、为兄弟必须要兄友弟恭,弟兄和,家道成,百事亨通。

五、为朋友必须要言而有信,患难倚,祸福共,相爱相亲。

八德是:

一、孝,孝顺父母;二、悌,兄弟和睦;

三、忠,忠心报国;四、信,一诺千金;

五、礼,循规蹈矩;六、义,见义勇为;

七、廉,不苟取与;八、耻,明辨是非。

以上洪门在民国后的五伦八德,在内容与含意上都已经有所改变。将封建社会中五伦的君臣关系,改变为要求民国政府的执政者以博爱平等对人民,而人民对国家要“享权利,尽义务”。同样,在父与子,夫与妻等关系上,也改变了原来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关系,反映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念,影响到了洪门。民国以来的洪门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改换了封建社会中五伦的具体含意,也可以说是偷换了概念,使其为吾所用。

至于八德,也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一字不改全部继承下来,赋予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含意。这也对洪门产生了影响。

3. 十规要

第一,凡入会者须守会之宗旨,合群团结,保全大局,顺天行道;拥护政府暨最高领袖,爱护国家,消灭汉奸。

第二,入会之后,兄弟和好结为手足,出入相顾,患难相扶,不得相残,成一家之亲。

第三,凡会内兄弟须要孝顺父母,不得辱骂粗言、藐视兄弟、有伤手足之情。

第四,凡是会内兄弟,须要涤身为本。凡百事若有害己者免之,有益群众者增之,是大丈夫之根本。

第五,凡兄弟者,不论老少,有能者居上。凡事有职责,竭力为之,以免误事。

第六,凡我会兄弟,不得伤残、言语相争,有害本会之基础,以和为贵。

第七，凡会内人等，礼义相对一家亲，不可听旁人之言，恐生是非有失和气，遵守本分为先。

第八，凡会内兄弟未入会之前有多少争斗事件，入会之后作为骨肉之亲不得多论。

第九，凡会内兄弟有志者立成基础团体，百事有能者，传教兄弟，以备后用。

第十，本会之基础以实力为首，凡兄弟有能教习者，有职任者用心来教之，以助社会之盛名。

以上这十规要反映出它的历史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在第一条中提出“拥护政府暨最高领袖，爱护国家，消灭汉奸”，反映出该洪门团体是附属于国民政府的，也表现出其抗日的基本立场。

除第一条之外，其余九条，都是关于加强会内团结的内容，强调了“出入相顾，患难相扶”的互助精神。其中第四条提出：“凡百事若有害己者免之，有益群众者增之，是大丈夫之根本”，说明洪门团体尚能考虑群众利益问题；第五条提出“凡兄弟者，不论老少，有能者居上”，说明洪门团体，破除了论资排辈的传统。

三十六誓

三十六誓为入洪门的每一会员必须宣读的誓词。各历史时期的三十六誓，在内容上大有差别，但在洪门内部的互相帮助和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内容方面，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1. 萧一山搜集的《三十六誓》

萧一山先生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发现的抄本《Qrietal2339》两件，都属于清朝后期咸丰年间的抄件。内容繁杂，文字粗陋，且文理多不通顺。

这两篇三十六誓，前一篇附有诗歌，后一篇注明了罚规，两篇在政治内容上略有差别。前一篇反清复明的政治内容较鲜明，其中第一誓内即有：但看清朝江山改变，……兴兵同心合胆，夺回明主江山，登基龙位”，而后一篇，仅有“俟至反清复明之日，方可施展英雄”一句。

前三十六誓中，一律以“艻”字样代表洪门会。誓词的内容要点大致有：须孝顺天地，奉敬神明，如有不依，五雷诛灭；不得私通官差以及巡船三板，捉拿艻内兄弟，如有不依，死在万刀之下；作事公平，不得恃强欺弱，霸占艻内兄弟妻妾子女，以及田地屋舍等项。如有不依，吐血而死；要信实为本，或有艻内兄弟寄妻托子，银两书信物件，不得途中自作不良，如有不依，天雷打死。此外如：即路切莫贪淫、当义气相交、廉耻须顾；命令不可失，腰屏衫仔旗色，不得父传子，兄传弟，亲戚朋友亦不得相传。如有不依者，是必吐血而亡也；天伦父母第一要孝顺，和睦乡里，伯叔、兄弟、姐妹一切等亲，不得忤逆，如有不依者，被五雷诛灭而死。

前三十六誓所附诗歌如下：

五祖流传被一张，洪家兄弟效忠良。
分开五房招义士，开州开府姓名扬。
初进洪门读誓章，夫妻永保万年长。
若系奸心来投降，蛇伤虎咬路中亡。
莫话誓章无报应，举头三尺有神明。
今晚新人来进庆，三十六誓达天庭。

后三十六誓中大部分内容与前者相同，但在文字表达方面，有所变化，如：“洪家兄弟以忠孝为先，不可伤碍父母，倘有不法之人敢伤碍父母者，百日内死在五湖，骨沉海底而亡”。这一誓与前三十六誓中的有关内容雷同，文字上略有变化，但后三十六誓的特点在于，每条誓词之后，列有罚规。如上述这条誓词之后，列有：“查出打百零八棍”。

后三十六誓内容中又加：“洪家兄弟闯出事来，有官差来捉拿，须当打救兄弟出关，不得阻挡。如有不法之人，不肯救兄弟出关，以及阻挡者，五雷打死，拖尸而亡。查出打百零

八棍”。“洪门兄弟到来相探，须以礼相待，有粥食粥，有饭食饭，不可弃嫌无菜。如有不正之人弃嫌兄弟，传说于人，臭自己弟兄名声者，死在万刀之下而亡。查出打十八棍”。“洪家兄弟犯难到尔家中取借路费，须当出力相赠，倘或家中无，便如衣服亦可持一半件与他当质作路费。如有不法之人，不肯出者，死在街头路尾而亡。查出打三十六棍”。“洪家兄弟今晚结拜回家，不可私下借卖本底。洪门律法：父不传子，子不告父，兄不教弟，弟不教兄。如有不法之人私传、私借、私卖、私教者，蛇伤虎咬而亡。查出洗身(处死)”。

纵观前后两篇三十六誓，绝大部分誓词都是有关洪门纪律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可见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洪门组织的内聚力。后三十六誓中较有特点的内容如：“洪家兄弟有两(京)十三省的书札到来招兵，须当即速通知大哥先生、四大头目。如有不法沉埋十三省洪门来往书信者，死在乱刀碎剑，分尸而亡。查出打百零八上棍”。这一条誓词反映出重视各地洪门的联络和互助。

2. 三合会的三十六誓

这一誓词启首部分称：“今夜吾人各介绍数新信徒于‘三合会’”。可见这是洪门三合会于深夜开香堂发展新会员时的誓词。誓词启首部分又称：“吾人以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为生诞时”。可知宣誓的时间是1854年(清咸丰四年)。启首部分又称：“今夜拜天为父，地为母，日为兄弟，月为姊妹；复拜始祖及五祖洪英、万云龙等，与夫洪家之全体神灵。”可见三合会与天地会一脉相承。

誓词启首部分还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话：“凡新会员，各以其范围行所任务，顺天行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如有能回复明代，报仇雪耻，建设天下太平之治者，身封王侯，子孙则历世永昌”。这段话反映出：第一，承袭了农民起义中顺天行道的通俗的、易为群众接受的口号；第二，具有“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的民间传统的天命观，但这里的顺天、逆天，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人心向背；第三，强调“回复明代，报仇雪耻”，具有强烈的反清复明意识；第四，当时正是太平天国起义的第四年，其“建设天下大平之治”的口号，与当时太平天国的影响不无关系；第五，以“回复明代”，“身封王侯”为目的，说明其严重的封建传统观念。他们所反对的仅是清朝的统治，并不反对帝、王、将、相的封建制度。他们的眼界丝毫没有超越封建主义框架。

在三十六条誓词内容中，大部分属于加强组织纪律、维护团结和提倡互助的，而独有第三十六条(即最后一条)誓词称：“士农工商，各执一艺，既入洪门，必以忠心义气为先，交结四海兄弟，日后起义，须同心协力，杀灭㳙朝(“㳙”为“清”的隐蔽字)，早保汨主回复(注：“汨”为“明”的隐蔽字)，以报五祖火烧之仇，如遇事三心二意，避不出力，死在万刀之下。”这条誓词反映出三合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准备武装起义。将反清复明的政治目标，与为洪门五祖报火烧之仇结合起来，更可看出洪门内部有关火烧少林寺等传说，是为反清复明的完结服务的。

另有日本学者平山周所著《中国秘密社会史》中所载的洪门《三十六誓》全文，与上述三合会的三十六誓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文字表述的详略方面稍有差别。

3. 抗日时期的三十六誓

抗日战争时期，洪门的三十六誓比以往大有变化。

首先，体现了抗日救国的精神。如誓词称“现是倭寇侵我国土，杀我人民，残暴兽行，此仇此恨不共戴天。我辈誓以至诚捍卫国家民族，拥护党国及军事最高领袖，以恢复中华民族山河领土，驱逐倭寇除灭汉奸，誓为争自由平等独立之真民国为目的。倘有悖盟，天诛地灭。”当时，中日民族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洪门拥护国民党军委会“最高领袖”，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这与当时洪门中投靠日本侵略者当汉奸的那部

分组织和成员，大有区别。同时，誓词中称：抗日救国“要同心协力，输助军饷，不得事外造谣诽谤。如有不遵，雷打火烧。”“倘有汉奸窃图破坏国土完整，我辈兄弟在内则效力戎行，在外则输财助饷，不得退缩。如有不遵，炮火焚身。”

其次，在处理会内外关系方面的誓词，比以往的简明、确切。如誓词称：“会场中排列仪仗及秘密训词，不得泄漏于外，不得私卖腰凭衫仔。如有不遵，大炮焚尸。”“不得串同官差拿园内（指会内。沿桃园三结义之园的含意。）兄弟，不得捏造手足逆伦之事设谋陷害，不得私领外人赏封行刺手足。如有悖盟，大炮焚尸化骨扬灰。”“所有洪门本底不得私传于园外之人，如有不遵，就地而亡。”“凡园内兄弟发财，兄有兄份，弟有弟份，不得眼红眼赤，以及偏门不得混骗洪门手足银两首饰物。如有不依，山头海角而亡。”“见园内手足与别人争斗，认准洪门牌号，须要上前，有理相帮，无理相劝。如有不遵，死在海面。”“所有园内手足均一体优待，勿存彼此之念。如有不遵，自跌而亡。”“如遇园内手足有争执事，须要聚堂声明，公判曲直，不得横行交涉，以存公理。如有不尊，烂口而亡。”这些誓词反映出，对外维护洪门的利益与保守秘密，对内维护私人财产和秉公处理会内纠纷。在对内、外关系方面，充分表现出帮会小团体利益至高无上，誓词中称：“手足有难报到，须要打点出关，以尽同盟之好。如有不遵，穿肠烂肚而亡。”“凡文武衙内行走人员，遇兄弟有案情，务宜预早通知，以便提防，不得私领花红串同官差摘食手足。如有不依，万刀之下而亡。”这两条誓词暴露出在国家机关内任职的洪门会员，营私舞弊是符合会内要求的。因此，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许多官员为了得到洪门的保护以便营私舞弊、以权谋私，而参加洪门。蒋介石深懂得帮会的内情，所以他对帮会在利用的同时又尽力控制。尽管如此，政府的经济情报常为帮会分子向公内泄露，会内首领人物得到经济情报后，靠投机发财成为常有的事。有时军事情报，也会从帮会系统泄露出去，因而各种特务机关都曾利用帮会窃取情报。

第三，有关会内互助团结方面。誓词称：“如手足有事报到，不论早晚，先查明本底。确非假冒，务宜招待，毋负手足之情，如有不遵，死于猪羊狗口。”“手足遇紧急患难求助途费，有多帮多，有少帮少，不得袖手旁观。如有不遵，死于街头街尾。”“忠信为本，义气为先，倘园内手足付托书信银两物件，须要周全送到，交该手足家，不得隐匿吞噬。如有不遵，五雷诛灭。”“自入洪门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荐举国内人才，为国为民进行会务，不得妒贤妒能。如有不遵，大炮焚尸。”“洪门有寄妻托子之意，如有手足之孤儿寡妇无人倚靠者，集众帮助，不得坐视，如有不遵，天诛地灭。”洪门的这种互助、互济的要求和规定，是其内聚力的基本方面，也是洪门历经政局变幻，仍能绵延与发展的基本原因。

4. 民国以来的“改进誓词”

洪门誓词据洪门会自称“前后相承，古今一贯”，但事实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各有差别。民国以来，各山堂都改进了誓词，形成了通行的简明的誓词，举述如下：

余誓以至诚，加入洪门，奉行五祖遗教，遵守洪门法规，服从

大哥命令，互信互助，精诚团结，复兴民族，振兴中华，如有越礼反教，愿受严惩，并敬砍红香

为证，此誓。

显然，民国后，经改进后的这种通行誓词，简化很多，已近似一般政党、社团的誓词。这不能不说明，洪门向文明迈进了一步。但仍保留了洪门的基本传统，如“奉行五祖遗教”、“服从大哥命令”，以及斩香（代替杀鸡）起誓等。在这些内容上，又与一般党团的宣誓大有区别。

以上所述洪门各个时期的各项禁条、规约、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三十六誓等，都属于

团结和加强内聚力的"约法",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江湖义气"。如:"忠信为本,义气为先"、"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出入相顾,患难相扶"……这一类誓词、规要,都体现了这种"江湖义气"和互助精神。这种江湖义气和"互助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有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十分反动的,也有的历史条件下,它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用于民族抗战,能够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它却模糊阶级意识,有时甚至不分敌我。因此,应当对"江湖义气"、"互助精神"作具体分析,不应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但洪门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正确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江湖义气"往往陷入政治上的盲目性和盲从性。

第二,伦理道德。这些禁条、规约、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三十六誓中,贯穿了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特别是"五常"的仁、义、礼、智、信,"八德"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基本上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洪门借以作为约束会内弟兄的信条。但民国以来,洪门的"三纲"已改为新的内容,把学习孙文的革命精神放入了"三纲"之中;洪门的"五伦"中,更提出了平等博爱之类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反映出民国以来,洪门已经不完全墨守封建礼教,而是具有了一定的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但在维系会内等级和秩序方面,基本上仍然遵循儒家的封建色彩浓厚的道德规范。

应指出,洪门奉行的传统道德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其中既有封建槽粕,又有传统的美德,不应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例如洪门将"信"解释为"一诺千金","信"的含意广泛,也包括讲信用,信用应属于民族传统中的美德,信用对于各项事业以及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又如"廉",不应当因封建社会中某些统治者企图以虚伪的"廉"维持反动统治,而将"廉"视为糟粕,其实"廉洁"是民族传统中的美德,人民政权更需要廉政,革命干部更需要廉洁奉公。因此,洪门的许多规约、誓词,不应简单化的一概否定或肯定,应看到其中既有封建糟粕,也有民族精华。

还应看到,洪门所提倡的信条,并非在实际活动中都能够实行。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洪门"三十六誓"中曾提出:"在城镇市埠要公买公卖,不得恃强欺弱"(见其中第26誓)。这是有利于社会秩序和有利于商业贸易的。但是,各地洪门并非都认真实行,由于洪门的封建帮派观念,在实践中往往以是否帮内弟兄论定是非,难以做到公平。

第三,迷信色彩。洪门的各种禁例、规要、誓词之类,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法制衰萎。他们不是以法制来约束会员的行为,而是靠指天起誓。如清朝后期洪门的"三十六"誓中称:"如有不依者,即被五雷打死,火烧永不得转轮",又如"死在万刀分尸,永不超生人轮"。反映出他们具有生死轮回的迷信观念,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而有的誓词之后,除了如有不依,死于"万刀分尸"、"雷打火烧"、"万箭穿身"等等之外,还规定了罚规:分别为打"三十六棍"、"一百零八棍"、"去顺风"、"洗身"等。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洪门"三十六誓"中,仍有"倘有悖盟,天诛地灭","如有不遵,皇天不佑","如有不遵,五雷诛灭"等誓词。这些都反映出洪门会在思想意识上和组织上的原始性、落后性,同时也反映出洪门所处的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性,这是科学不发达,文化落后,法制没有得到提倡的产物。

开立山堂和入会仪式

开立山堂和进、出山柬

洪门会凡内八堂中之大爷辈，经木山山主之许可，皆可开立山堂。但新开山堂的大爷必须多仁多义，有智有能，平时收兄弟甚多，有相当的名声者，才能够得到本山山主的许可和海内各山头之赞成。否则是不能开山立堂的。

开山堂之前数月，要派遣许多兄弟分别赴邻近各洪门山头邀请有声望的洪门龙头大爷参加。到会客人多，山堂才算开得体面。

举行开山仪式的地点，必须选择深山古庙，因为帮会本属非法组织，只能秘密活动。开山堂还要选择黄道吉日进行，并请近地各山头的五堂大爷及本山堂十排全部兄弟到场。

场内正中设坛供五祖及关圣神位，备有三牲祭物及红纸所书的进山柬、出山柬。也有的挂关羽夜读《春秋》图及岳飞像。两旁设十二把交椅，供龙头大爷们坐。举行告祭仪式时，全堂兄弟各就位置，诵读誓文条例，气氛十分严肃，参加这一仪式的洪门弟兄仿佛身在水浒梁山，豪情义胆油然而生。举行开山式时，大都就便广收弟兄，大办筵席。仪式过后，新山主命令聪明伶俐、谙熟洪门海底、善于交际者数人，带上山柬（即檄文）送到全国各山头请求赞成，犹如现代新建立的国家，在国际间呈递国书，取得国际间承认一般。新山堂开辟，大都能够取得各地山堂的承认。新立的山堂，获得外地山堂承认后，所收的弟兄才能够到外地跑码头，才能够得到外地山堂的招待。

进山柬本为会内兄弟昭告天地神灵的誓文，出山柬为通告各地山主的文告，但内容大同小异。民国以来，进山柬与出山柬改为一文两用，称为《开山宣言》，举例如下：

《天龙山开山宣言》

窃维外侮侵凌，人民惨遭浩劫，匹夫有责，古训昭然。仗义而起，乃志士以成仁；风从相应，正英雄之立业。某等自幼读书，粗明大义，出身军政，寄迹江湖，少受仁兄之指教，多蒙前辈之栽培，于此世变时艰，以期聊尽职志，秉承五祖之遗教，同争洪家之光荣。某等既承冒昧，点出龙头，集合龙虎兄弟、仁义英雄，开山立堂。爰本易经“乘龙御天”之意，定山名为“天龙山”；乃因浩劫当前，以义为善，故名其堂为“义善堂”；祝五祖之灵威，兆升平之永祀，馨香勿替，日月常存，故名其香为“升平香”；纵观水源，汇集四海，故名其水为“四海水”。际此春光明媚，万象更新，天气之清郎，惠风之和畅，谨选吉日，择定良辰，设五祖之圣位，虔伸祭奠；当三光之照耀，矢志同盟。互信互助，精诚团结，保存黄炎之土地，恢复汉室之山河；一心一德，众志成城，洪家之英雄崛起，四海之豪杰来归。复兴民族，振兴中华，以为职志。伏愿当道俊产，执事仁兄，予以赐教，助成义举，是为幸甚！

洪运庚辰年三月十五日，在上海西城外，上海义善会，关帝堂，英雄聚会，志士同盟，十五日酉时进香，十六日辰时圆香。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岁次庚辰，农历三月十五日酉时进山，十六日辰时出山，谨此宣言。

有的出山柬落款处署有“龙头某某某，副龙头某某某同启”字样。

开山令诗歌

1. 山门威严

《开山大令》诗称：“开山今日午时开，众家兄弟听开怀。齐到月宫旗挑起，忠义堂前把话排。九道安了生死路，那个敢进咱山来。不是能人他莫进，不是知己他莫来。身家不清早早走，己事不明早回头。冒充光棍天下有，清查包袱要人头。不是愚下言语陡，大哥将令不自由。上四排哥子犯了令，自己挖坑自己跳。中四排哥弟犯了令，自己拿刀自己剽。九十老么犯了令，四十红棍定不饶。五堂弟兄请升账，我今把令往下传。”

这首《开山令》诗歌的内容与文字都十分粗陋，但集中反映了山门威严，防范外人混入洪帮。

2. 崇尚“忠义”

洪门《开山令》的许多诗歌，常以歌颂民间流传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忠”、“义”事故为题材，以下列洪门诗歌为例：

《奉令请神》诗歌称：“天门开，地门开，奉请圣人下天台。身骑赤兔胭脂马，手拿青龙偃月刀。左关平，右周仓，圣人请到忠义堂。位台哥弟大吉祥。”

《挂刀令》诗歌称：“……关公千里保皇嫂，文远顺说假降曹。五关斩了六员将，立斩蔡阳古城壕。此刀挂在香堂内，名叫青龙偃月刀。宋江驾坐梁山寨，大开龙会一把刀。西灭王庆剿田虎，南擒方腊一把刀。此刀挂在香堂内，挂起此刀鬼神嚎。忠者到此升三级，奸者到此命难逃。”

《破土条》诗称：“焚香破土赵太祖，破土焚香义宋江，要学桃园三结义，莫学瓦岗无下场。忠义堂前来破土，英雄豪杰结朋友。……”《仪注回答》诗歌称：“……梁山一百单八将，五湖四海把名扬。……桃园兄弟来结拜，同心同意如同娘。黄巾贼子把反造，天降大任刘关张。收服黄巾功成就，后来成都为帝王。”

《十支大令》诗歌称：“忠义堂前往前站，龙兄龙弟听心间，梁山现有十支令，一支一支往下传，……犹如宋江坐梁山。”

以上反映出，洪门十分崇拜《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和《水浒传》中的宋江。洪门会员多为民间下层，文化水平较低，他们所标榜的“忠”、“义”的具体模式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许多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在他们所崇拜的“忠”、“义”中，是没有阶级观念的，上述的《破土条》诗歌中，就是把“赵太祖”与“义宋江”并列的，在《挂刀令》诗歌中甚至把镇压方腊、黄巾等农民起义的反动行为，也当作“忠”、“义”来歌颂。

3. 帝王思想

在开山堂诗中，也反映出洪门中的封建帝王思想，如《安位》诗中称：“天皇皇，地皇皇，汉室开基立帝邦。上面坐的汉高祖，下面坐的楚霸王。右军坐的韩信将，左边坐的张子房。”

又如《点烛》诗中称：“有请大哥登龙位，龙兄虎弟站两旁。”再如《红旗大令》诗称：大哥要学刘备样，他在四川称帝王。”与帝王思想相联系，洪门成员也追求高官厚禄。如《登台令》诗称：“有日国正天心顺，禄位高升坐八台。”洪门虽然曾经有反对清王朝的口号和行动，但他们在思想体系上不仅不反对封建制度，而且是维护封建帝制的。

4. 追求奢侈

在开山堂诗中还反映出洪门具有中国封

建统治阶级的讲究奢侈、排场，追求豪华的思想。例如《架紫金梁》诗中称："来在忠义堂，……上面盖的琉璃瓦，两边砌的玉砖墙。上面雕的龙盘顶，两边双凤来朝阳。有请大哥登龙位，龙兄虎弟站两旁。"《造堂令》中称："前有朱雀和白虎，多少美景内边藏。上边走兽琉璃瓦，金砖铺地放毫光。"这些正是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意识，一旦取得地位，缺乏扩大再生产的眼光，仅仅追求奢华排场，体现了农民小生产者的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封建意识。打天下是为了自己和团伙享荣华富贵的愿望。

开 香 堂

香堂也称忠义堂，为洪门一神圣庄严的处所。初入洪门者，必须经过香堂仪式的严格洗礼，其目的在于使入会者对于洪门会从精神上绝对崇拜和服从。香堂设置之庄严，礼节之隆重，皆富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给参加者以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受。此外，也是出于洪门秘密活动的需要，是提防奸细和严防叛徒的一种手段。

香堂的种类，大约有三种。

喜事香堂——收新会员或喜庆事宜。

评事香堂——评判纠纷或重要是非。

刑事香堂——对犯规者施行判罪和惩罚。

各历史时期和各地区的香堂布置和仪式多有差别，但大致都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对要求入会者审查，演变到近现代特别是民国后，要审查入会志愿书。第二步，洪门有关人员布置香堂。第三步，举行繁琐的香堂仪式。

1. 入会志愿书

凡要求参加洪门会者，必须经洪门会中人员介绍。民国以来入会手续有所变化，预先要到专事发展组织的头目处报名登记，有的要填入会志愿书（又称红单）。交上入会志愿书后，接受考查。介绍人（称为"成兄"）需查明被介绍人的情况，保证被介绍人的身家清白。入会志愿书的格式为：

立志愿书人〇〇〇（前蒙某某山某大哥栽培〇〇步位），今由〇〇〇介绍，志愿参加洪门组织，在

〇大哥领导下，服从指挥，并遵行

五祖遗教，及一切法规，绝无反悔，立此志愿书为证。

附开

年龄　籍贯　出身

经历　职业　住址（现在
永久）

立志愿书人（亲笔签署）

介绍人（亲笔签署）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立。

2. 布置之一

开香堂是洪门收徒弟（即发展会员）的仪式。一般情况下，不为志愿入会者分别举行香堂仪式，而是积有数人、数十人乃至百人以上集体举行香堂仪式。

开香堂时，山主派一头目如"坐堂"职位者，专门负责香堂工作。香堂的布置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各地区各有差别。在此先介绍一种有代表性的类型：清代洪门为反清复明的民间秘密结社，当时开香堂的地点往往选择在深山野林古庙之中。在庙堂高处正中，设一大神坛，坛中供奉关圣帝神座或刘关张三人结义神像。但也有的香堂正中神台上供有始祖郑成功（或洪英）及洪门五祖神位。有的还写有"彪、魑、魍、彪、魈"五字。有的香堂内设关帝牌位，上书"关圣帝君神位"六字。两旁案上供有有功洪门的"先烈"的灵位。香堂神坛上方最高处有一"洪"字，其下有横幅"顺天行道"与"反清复明"。关圣帝神座或三结义神像上有"忠义堂"三字，为仿效《水浒》之忠义堂。三结义神像两旁各有许多对联，如"忠心义气，共同和合"，"忠义堂前无大小，是

友无情切莫交”,“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古流,地镇南岗一派青山千载秀”等。

神坛前置一大木斗,上书“木杨城”三字,斗上竖立“三军司命”及各部旗帜。神位前及左右各置小香炉,香炉内都点燃香烛。神坛左方有“洪花亭”等字样。

香堂内供有各种祭品,如五色果、洪酒、洪钱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香堂内还放置几样具有特殊象征的东西,如:高挂一盏红灯,灯下插七星宝剑一把,还放置着一尺、一秤、一镜,还有刻画着龙凤的棍棒一对。这几样物件各有意义,“一杆秤,称公平”,“一面镜照邪正”,“一根尺量规矩”,“一盏灯照前程”。七星宝剑是用于杀尽贪官污吏的,龙凤棍棒是用于打翻满清王朝的。

香堂又可分为大香堂和简便香堂(即小香堂)两种。大香堂必须全体弟兄到齐,令杀鸡,称为“斩凤凰”,礼仪隆重。简便香堂只须成兄与二三大爷到场,以斩香代替斩凤凰。民国以后的香堂,由于不易找到合适的“哑叭窑子”(即荒山古寺),多改为在较隐蔽的私人住址开设,以喜庆祝贺为掩护,于深夜举行。

民国以来香堂布置形式略有变化,洪门各支派、各地区香堂布置也并非完全相同。如:有的坛内布置为前层忠义堂(全山会议之所),中层孝义堂(内外八堂会议之所),上层红花亭(即前辈聚义地点)。供奉顺序为左挂洪门先贤表,中挂关圣像,右设本山系统死亡弟兄牌位。两旁摆设南斗六星灯,北斗七星灯。

香案有三级:上级设斗,内盛粮米,并贮大旗一面,上书“三军司命”四字,旗杆一支,有刁斗,斗下小施书“替天行道”四字。另设十室,即红灯、红棍、草鞋、云板、数珠、袈裟、盂钵、白锭炉、阴阳镜、桃李剑。中级贡献太牢(即三牲)、果品、蔬菜。下级有香烛、茶酒、剑印、尺,算盘、剪刀、秤。桌案前孔中用黑丝线悬挂七星宝刀一把。

座位次序与旗彩:

龙头:中座。黄盖盘龙,遮阳二,大旗有彩。

香长盟证:副座。黄盖颜色与山主同,遮阳一,黄旗中央书写姓氏。

会堂:淡黄盖,遮阳一,黄旗中央书写姓氏。

陪堂:红盖有须彩,遮阳一,淡黄色旗中央书写姓氏。

刑、执、礼堂:有旗有盖,淡黄旗中央书写姓氏。

护剑、护印:在山主两边,内八堂位置上面后侧,有淡黄旗书写姓氏。

新服:末座,设在内八堂之末尾,有盖,有遮阳,淡黄旗中央书写姓氏。

圣贤:在内八堂上侧,山主左侧,有蓝盖,有遮阳,淡黄旗中央书写姓氏。

外八堂:桓侯当家、红旗管事为首。当家有盖,大旗浅黄色、中央书写姓氏。红旗有盖,大旗红色、中央书写姓氏。黑旗有盖,大旗黑色、中央书写姓氏。

共设三十六把金交椅,七十二条银板凳。

客位有老山主或老内八堂大爷,在两边月台,参与会议。

坛外布置为:设置炮手、鼓手、号手、执事等项职务。此外设有头门、二门、三门、月宫门共四道门。

头门有横匾一方,上书“道德禅院”。两旁对联为“贤僧隐古寺,英杰聚名堂”。

二门有横匾一方,上书“患难与共”。两旁对联为“有道须当敬,无情切莫交”。

三门有横匾一方,上书“普济众生”。两旁对联为“国亡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清贫”。

月宫门有横匾一方,上书“再见桃园”。

3. 布置之二

香堂布置,因时因地而有差别。再介绍与上述复杂形式的香堂有区别的另一类型的,即较简单的香堂布置。旧时代,洪帮的秘密活动时刻提防官府镇压,迫于环境,严守秘密,只能匆匆举行仪式,因而香堂陈设尽可能简化。而这种简化的陈设在今日看来仍然繁

琐。

秘室即会场沿袭传说中陈近南首次聚义地点,称“洪花亭”(红花亭)。室内供“五祖牌”、祀“关帝像”、悬“忠义堂匾”,堂中央并设各种神位,如“女军神关英”、“前五祖”、“后五祖”、“郑君达”、“万云龙”、“郑玉兰”、“郭秀英”、“朱洪英”、“朱洪竺”,以及洪家已故会员与其他相关者之神位。神座前设“高溪庙”,“九层塔”,置盛果品之器皿及香炉一座,香炉上刻“反𣳚𣳚复汨”四字。民国以来无“反清复明”之必要,有的改为其他口号。其余置“宫伞”、“七星刀”、“洪棍”、“七星剑”、“木杨城”之“木斗”等物。案上置三牲,或简化为三牲之肉各一块。缚活公鸡一只于神桌下,作为“斩凤凰”之准备。案上置有“算盘”——象征计算洪门成功日期;“洪灯”——以辨忠奸真伪;“剪刀”——剪开蔽空暗云;“桃枝”——以明昔日刘关张兄弟结义之意;“珠患”、“木鱼”——以成穹剑之形,以示系出佛门。……也如同前述大香堂布置中置有“尺”、“秤”、“镜”但解释之含意与前者稍不同。置“尺”——量兄弟之行为;置“秤”——以权正义公道;置“镜”——以照破一切忠奸善恶。

4. 离奇的仪式

开香堂的形式有多种多样,现选择二种模式叙述之。

△模式之一

新入会的会员必须由老会员介绍,保证其身家清白,介绍人称为“成兄”或“保举”。保举将要求入会者介绍给管事,由管事引保举及要求入会者进入香堂。拜见盟兄后,举行“丢海誓”,即问答仪式。命新会员跪在神位前,盟兄问:“你为什么来此?”答曰:“来入洪门。”问曰:“你是什么人引进的?”答曰:“保举人〇〇〇。”盟兄转问介绍人:“此人是你引进的吗?”答:“是。”又问新会员:“是你自愿来,还是他人劝你来的?”答:“是自愿来的。”问:“入洪门之礼都你知道吗?”答:“全仗成兄与拜兄指教。”问:“你何故要入洪门?”答:“来学忠义。”问:“进我会后,为敌人所知得杀你,犯我会中条款亦得杀你,你愿意吗?”答:“愿意,决不连累兄弟。”问答的仪式十分严肃,有时考问通宵达旦,回答问题要求准确无误,才能合格。问毕,盟兄向新入会者告戒十条十款,有的则另加三十六誓、七十二例、二十一则、十禁、十刑。然后问:“你如果违犯了条、款,应当怎样?”答:“死于刀枪之下。”盟兄令管事斩凤凰,管事立刻应声立于神位之前,将白雄鸡斩首后喊:“有如此鸡!”或以香一股截断代斩鸡,喊:“有如此香!”并将一根根香分赠予新入会者,留作纪念和鉴戒。

民国以来,洪门开香堂收徒弟时,香堂布置虽和以往大同小异,但对新入会者的问答已不像以前那样繁琐,只问明是否自愿而来即可。至于问到为何入会时,回答已不再强调“反清复明”,而是根据各历史阶段、各山堂的具体政治目标而定。如抗日战争初期,有的为立志抗日救国而开设的洪门山堂,开香堂收徒弟时就强调抗日救国的目的。民国以来洪门香堂之斩香仪式,有的不由管事来斩,而由新入会者斩。盟兄问:“所发誓言,以何为凭?”新进会者回答“以香为凭!”跪地将放在地上的香举刀斩断。这些“丢海誓”完毕,新入会者才可起立。然后进行行礼仪式,称为“丢拐子”或称“拉拐子”,又称“拉歪子”。礼毕,盟兄将新入会者向在堂各兄弟一一介绍,并由专人分发票布,称为“解宝”。解宝者需双手捧“宝”(票布),并口诵:“大哥命我解宝来。”受宝者双手接宝,回答:“多谢某哥来解宝。”新入会者受宝后,即缴纳香费。香费作为开香堂的费用,余款由盟兄收存作为“粮台”(即公积金)。

从以上洪门香堂仪式中可看出其典型的秘密组织发展会员的方式,它是把绝对服从组织纪律与绝对保密放在首位的,仪式的繁琐在于锻炼和考验新入会者的决心和意志。

△模式之二

第一，行礼之前

先派定执事，演习礼仪，布置一切。本堂弟兄来临，上五排请入议事厅，下五排请到大客厅。来宾签名，管事接入迎客阁，内八堂当事拜兄前来迎风接驾，大么侍候烟茶。

第二，行礼仪式

司礼宣布行礼开始。

○○○○年○月○日吉时○○山○○堂举行开堂典礼。执事者各执其事。

请红旗大五哥传解冤令。红旗老五传令如下：

“适才拜兄把令降，命令先设解冤堂，结仁结义美情况，少时就要进香堂，有福同享祸同当，打破老壳也能镶，有仇有恨先讲明，莫将仇恨记心旁，阴险本是小人样，光棍做事贵阳刚，说出大家来酌量，情顺理安议周祥，世仇也要了妥当，弃嫌修好代代昌。解冤大令传出帐，莫到香堂说短长”。

请执法大五哥设禁门。大五哥传令：

“从早拜兄传下令，命弟前来设禁门。禁门之内非凡品，天下英雄到此行。光棍原要讲根本，身家己事宜认真，第一要他根基正，第二品性要常敦，三要仁义多恭敬，中正和平往内迎。新人江湖须认定，山堂香水记分明，谁为龙头谁盟证，谁是香长把令申，谁是坐堂谁认印，谁是陪护礼执新，谁是保举谁引进，谁的承行谁的恩。履历从头讲清顺，然后方许入禁门。倘若假冒充光棍，荆条驱除不容情。交接办完一声请，依次而入把礼行”。说完敬一礼。

请红旗大五哥传令开月宫门：

“山堂开出多齐整，三十六道月宫门，此间本是蓬莱境，到处都是有缘人，凤尾在前开路径，龙头香长次第行，盟证坐堂和总印，后随陪护礼执新，圣贤当家管事进，六八九十么很跟，齐立香堂宜肃静，主盟令下好同遵”。

请问大五哥：月宫门贴额子否？答贴好了。

请问大五哥：月宫门贴对联否？答贴好了。

请红旗大五哥传接客令：

“欣逢吉日开黄道，群仙济济赴蟠桃，三山五岳都来到，贵客纷纷似海潮。忝作主人居东道，欢迎金驾赴西郊。礼貌荒疏休见笑，招待不恭量要高，仪不熟练望指教，莫加热笑与冷嘲。少时方手做完了，再做陪伴饮酒肴。请到香堂把茶泡，吩咐迎宾大小么”。

请正副龙头老大哥就位：

香长老大哥就位，盟证、总印、坐堂、正堂、陪堂、护堂、礼堂、执堂、新服，位台老大哥俱就位。位台来宾就位。圣贤老二哥就位。以上立于首排。

桓侯老三哥、位台老三哥俱就位。以上立于二排。

承行、执法、红旗、黑旗、帮办、位台大五哥俱就位。以上立于三排。

镇山、位台六哥、纪纲、位台八哥俱就位。挂牌、位台九哥俱就位。辕门、位台十哥俱就位。凤尾么哥、大小么哥俱就位。以上依次站立。

设忠义堂，设盥洗所，请圣贤老二哥出班盥洗。恭贴关圣神牌，贴毕请归班。左设汉流先贤表，右设荐亡碑。

请承行大五哥传令开堂：

“天开黄道日，金兰义气香，英雄齐聚会，禀开忠义堂”。

请香长老大哥出班上香，赞上香词：

“信香三炷，奉祀明堂，虔诚顶礼，万言馨香。烛腾宝焰，接引神明，祥光万丈，直达天庭”。赞毕归班。

请正副龙头老大哥率领全堂弟兄望空迎神。全体转身向外，脱帽行三鞠躬礼，静默三分钟。

神降，恭迎神驾入堂升座。复帽，全体转身向内。

请圣贤老二哥出班安神，赞安神词：

“恭迎神驾，銮卫遥临，以安以佑，鉴此微忱”。赞毕归班。

请正副龙头老大哥，率领全堂弟兄恭诣圣哲位前，行三跪九叩礼。

请盟证老大哥出班，赞三把半香：

“第一把香结同心，管鲍知交旧有名，今我弟兄来结义，胜过同胞共母生”。

“第二把香义气高，羊角哀与左柏桃，今我弟兄来结义，效他舍命也全交”。

“第三把香效桃园，大义千秋尚凛然，今我弟兄来结义，乌牛白马祭苍天”。

“三把香外半把香，梁山弟兄也留芳，虽然被逼把山上，兄宽弟敬有纲常”。赞毕归班。请来宾到迎宾阁休息。支宾大么照料烟茶。

第三，安位之后

执事者于香堂内分东西两排，安设位台老大哥、老二哥、老三哥座次。或于两排座次之后，香案两侧之前各设来宾座次。请正龙头老大哥东席首座，请副龙头老大哥西席首座，香长老大哥东席副座，盟证老大哥西席副座，坐堂老大哥东席就座，总印老大哥西席就座……。请位台(注：尊称)大五哥鹄立听差，闲职五哥以下兄弟分立两旁候差。

请红旗大五哥传安位令：

“安位拜兄曾指派，在缘哥弟听从来，梁山名号传千载，忠义堂前挣下来，三十六把金交椅，七十二座银将台，正副龙头升龙位，坐堂大爷坐虎台，香长大爷把榜拜，盟证大爷把咒堂开，总印大爷管印授，正陪堂大爷把事裁，……，恭喜各位仁兄展奇才”。

执法大五哥请青锋出库：

“拜兄传令请龙泉，此宝威俊不可干，双手捧呈龙案上，寒光闪闪镇盟坛。”

请桓侯老三哥赞剑：

“龙泉三尺放光毫，忠义堂前气象高，乱草茨荆齐斩尽，魑魅魍魉尽潜逃。”

请龙头老大哥传斩草令：

“白虎堂前传大令，黑旗管事听分明，今朝在缘结刎头，开辟山堂气象新，八方乱草齐斩尽，邪魔魍魉化灰尘，留取中央作坛镇，拈香拜把结同心。”

请黑旗大五哥斩草，执法大五哥申令：

黑旗曰：一斩东方草。执法曰：不孝除去了。

黑旗曰：二斩东南草。执法曰：不悌除去了。

黑旗曰：三斩南方草。执法曰：不忠除去了。

黑旗曰：四斩西南草。执法曰：不信除去了。

黑旗曰：五斩西方草。执法曰：不礼除去了。

黑旗曰：六斩西北草。执法曰：不义除去了。

黑旗曰：七斩北方草。执法曰：不廉除去了。

黑旗曰：八斩东北草。执法曰：不耻除去了。

黑旗曰：斩齐乱草筑盟坛。执法曰：气象雍容有万千。

黑旗曰：异日风云齐际会。执法曰：桃园而后又桃园。

请盟证老大哥设咒堂：

“异姓同胞结刎头，各人要洗各人心，倘有虚假不诚恳，神人共鉴不容情。”

请龙头老大哥开山立堂：

“×××山，×××堂，××××水，×××香”。

此即本社之山、堂、水、香“四柱”，请弟兄们牢记。并说明取此名称之意义。

请龙头老大哥传开山令：

“××堂前传令号，在缘哥弟听根苗。今逢吉日开皇道，弟兄结义赴西郊。探得名山临北道，地势巍峨气象超。四境英雄齐会哨，到来都是大英豪。开山立堂来设教，职责分明不混淆。正副龙头齐请到，十二圆觉把名标”。

“香、盟、总、坐、正都好，陪、护、礼、执、新更高。”

“恭写神牌迎圣纛，圣贤专责早挥毫。桓侯赞剑先斩草，执法管事把律操。红旗管事司令号，闲五排迎人多少。六排巡风掌律条，八排天秤怀中抱。九排挂牌众目瞧，十排辕门司禀报。支宾待客大小么，各人专责莫轻抛。倘有故违迟不到，处名缺职法难饶。开山大令齐遵照，承行传示把令消。”

请香长老大哥传巡山令：

“巡山大令往下传，红旗管事听我言，香堂之内宜肃静，禁止喧哗与笑谈。”

请红旗大五哥接巡山令：

“拜兄命我把山巡，各守香规要至诚，交头接耳把规犯，罚跪红香土地庭。”

请盟证老大哥传巡山令：

“一枝巡山令，管事听分明。进步当光棍，巡查要认真，卑贱难藏隐，英雄许进门。鱼目将珠混，法律不容情。奉令须维谨，逐一复查清。”

请黑旗大五哥接巡山令：

“巡查大令如雷吼，满堂哥弟听从头。咱们今日做方手，同心整顿旧神州。前人立法原来久，惟一驱除下九流。身家不清早些走，来历不明莫停留。冒充光棍香堂走，自讨方便把身抽。清查出来要出丑，当着人前把底掉。须知卑贱难相偶，汉流身价重金瓯。非怪愚下言语陡，君子原来恶下流。”

请龙头老大哥传张榜令：

“风云际会会英雄，弟兄结拜古今同。管事张开龙虎榜，恰如红日正升东。”

请承行大哥张榜：

“姓也香来名也香，拜兄命我把榜张。德星照世群伦仰，共与邦家作栋梁。”

请红旗大五哥传胪：

“兄弟答上一个请字，起居位台，老父兄，老恩兄，老仁兄，老拜兄，满堂哥弟，大众弟兄，今将本山当事负责、职位姓名报告如下：社长×××，副社长×××，……申登不清，上复不明，仪柱不熟，总望拜兄伙多多指示，海涵海涵。”敬一礼。

请执法大五哥传堂：

“有道是人须礼义为先，地须花果成园，弟兄结仁结义，当效古圣先贤。倘若为非作歹，管教首领难全。非事立法隆重，汉流自古皆然。今日者，位台老父兄，老恩兄，老仁兄，老拜兄，先进老盟兄，后进新兄弟，满堂哥弟，大众兄弟，齐集盟坛，拈香拜把，果真风云际会，虎啸龙吟。结义虽属社团，礼法自来严明，拜兄请升龙位，弟等奉命维虔。自古道国家序爵，乡党序齿，军中序功，同盟哥弟，讲的是三纲五堂，十条十款，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有志有能者，只要深明此义，德行无亏，少长先后可以同堂。今日同堂，今日香堂聚会，便须整顿纲常。如有祖孙父子同堂者，宜先请示请罪，有少兄换袍者，礼当四礼八拜，谢恩谢罪，方合大理，名正言顺。倘若疏忽怠慢，不自来请示请罪者，三朝一夕，或一年半载，查出底蕴，即惟该保举、承行是问，凭众议处，不许再入汉流之门。江湖规矩要紧，休怪小弟不情，申登在先，总总请罪。”敬一礼。

请总印老大哥捧印上堂，印至，进呈香案，当圣起封，赞启封词：

“有守有为，惟凭此印，当圣启封，祥光普荫。”

赞毕，请香长老大哥出席用印，请护印老大哥出席监印，请香长老大哥赞开印词：

“开印盖印，金玉满堂，在缘哥弟，富贵吉祥。”

请护印老大哥致监印词：

“盖印一颗，一路福星，由一至极，福寿骈臻。”赞毕，请二位老大哥归位。

请总印老大哥封印，致封印词：

“用印已毕，例应归封。吉星高照，万事亨通。”赞毕，收印归坐。

请龙头老大哥指示今后方针：

“汉流革命已成功，今日目标又不同，秘密工作今不用，同为建国主人翁。”

请龙头老大哥传通山令一体遵行：

“天下袍哥本一家，汉流义气最堪夸，结

成异姓同胞后，忠义建国保中华。”

请承行大哥接通山令；

“建国堂，正龙头，传出号令。

有五常，和八德，总要留心。

一任你，在政府，官居极品。

结盟后，就不论，富贵贫穷。

切不可，嫌为小，不安身份。

有工苦，和劳绩，自往上升。

又不可，先为正，后改品行。

逞横豪，欺良善。不务正经。

这种人，原不够，汉流身份。

玷辱了，弟兄们，侠义名声。

从今后，在缘中，遇了此等。

清查出，追宝札，不与同群。”

请龙头老大哥传红旗令：

“××堂前瑞气高，国旗招展趁风飘，近来远来趋此道，红旗职责须记牢，内安外攘司枢要，上分下解最勤劳，一堂济济多和好，尽知三略与六韬，谨守十条和十款，三十六章多紧要，汉流名约死生交，江湖大义须通晓，不再横行和霸道，不可犯教乱规条，一堂和善无价宝，兄宽弟敬是英豪，兄为心腹弟牙爪，兄如鹏翅弟羽毛，荟萃英雄把国保，要作擎天柱一条。”

请龙头老大哥传黑旗令：

“天开黄道良辰好，英雄结义在今朝。黑旗职责非关小，江湖律例把权操，对外有奸全斩草，对内检查穿黑袍。君子处事有正道，欺软怕硬不英豪。有过亦宜分大小，情虽可恕法难饶。轻则红棍要领教，重则安刀自己剽。上五排犯罪亲自跳，下五排犯罪插三刀。将令如山休触蹈，汉流规矩大家操。”

红旗大五哥传利害大令：

“……自古圣贤讲忠孝，何况你我是人豪。昔者孔子入太庙，每事都要问一遭。进了佛门这一教，皈依佛法少波涛。十年学士易得找，十年江湖不易操。……越礼犯教罪非小，自己挖坑自己跳。上五排自裁不准保，下五排六眼与三刀。利害二字申登了，千年不遇化冰消。”

第四，授职情形

办理提升，挨班举行，依一三五六班次，分班进位（按：进位即就职），请位台新进士（按：即新人会、社者）齐集盟坛，举行授职典礼。进位，跪。

请盟证老大哥赐把（按：把指香把子），赞把：

“捆成把子赐新香，千古流传世泽长。但愿弟兄能继志，××山色郁苍苍。”

新进士拜把，行四叩首礼后俯伏。

请明证老大哥赞把词：

“虔诚拜把结同心，上下神祇作证盟，谨守十条和十款，顶天立地作完人。”

亲进士宣誓宰香，请盟证才大哥赐香：

“×××自入桃园之后，谨守本社十条十款，学作完人，如有上不认兄下不认弟、口是心非、违犯汉流规则，照香而亡（同时自己宰香）。谨誓。”

宣誓毕，请恩、保、承、引大盟兄成全×××为×排。挂牌。九哥高挂×牌（按：五排以上金牌，六排以上银牌）。新进士起立。

请引进大五哥引进新进士向恩、承、保三大盟兄谢恩行三叩首礼。退位。新进者能三个歪子两个揖退下更善，否则退行叩头而出，表示不敢穿堂背圣，（即不敢背转屁股走出去。）

与位台拜兄请安道喜。

第五，赞刑具

有罚跪者，跪于凳，上贴红笺，称为红凳。

赞红凳：“红凳不多长，责罚莫伦常，语言不谨慎，秉性太乖张，违背汉流律，罚跪忠义堂”。

犯罪稍重者，用红棍责背。

赞红棍：“红绫缠棍，紫气飞腾，上打不义，下打不仁，喜的是忠孝节义，恨的是奸盗邪淫。”

罪稍轻者，用天平责手心。

赞天平：“汉流法律，有重有轻，重者责

棍，轻责天平，蒲鞭示辱，改过自新。”

执刑时赞曰：“……打在弟身痛兄心，过而能改是善行，吉祥莅止多安定，再犯教袍不徇情。”

第六，讲规章

所谓讲规章，就是分别请圣贤老二哥、桓侯老三哥、当家老三哥、承行大五哥 红旗大五哥以及八哥、九哥、十哥分别讲：春秋、三纲、三要、五常、五伦、八德、九章、十条、十款、十禁等。这里所讲的“春秋”内容为：“周自东迁，王纲失坠，君臣大义，久已不明，鲁国孔圣人根据鲁史，作春秋，尊周攘夷，褒善贬恶，乱臣贼子，乃有所惧，我关夫子，义结桃园，志扶汉室，讲习春秋，名垂千古，今我在缘兄弟，谨当效法圣人。”显然，在这里是要洪门兄弟效法“孔圣人”和“关圣人”，反映出洪门接受儒家的传统伦理。

第七，裁〔宰〕牲情形

请龙头大哥传裁〔宰〕牲令。并唱：“裁〔宰〕牲大令往下传，各位哥弟听我言，结拜二字非儿戏，结仁结义结金兰，昔日桃园三结义，乌牛白马祭苍天，今日无有牛和马，裁〔宰〕牲相替效先贤，承行领宝裁〔宰〕牲去，挂红酒宴摆堂前，弟兄齐饮挂红酒，有福同享祸同当。”

请承行大五哥遵令裁〔宰〕牲。并唱：“……将鸡抬一抬，宝刀请出来，今日看财后，脱衣上天台，左转左发财，右转右发财，不转更发财，……”。

请大哥制挂红福酒。……

请大五哥歃血于名单。并唱：“异姓结拜胜亲生，知人知面不知心，此血淋过名单后，患难相顾依令行，……”。

请正副龙头老大哥赐歃血酒。正龙头曰：“福酒盟心自古传。”副龙头曰：“弟兄同饮效桃园。”正龙头曰：“自从谊结同胞后。”副龙头曰：“共树勋华照大千。”

请龙头大哥传镇山令。……(略)

以上每一大令及尊令者的每一动作，都要唱一首诗歌，每一诗歌的内容大都粗陋不堪而且内容上罗嗦重复。反映了民间下层社会“俗文化”的特色。

第八，送圣

送圣也就是送神仪式。送神仪式同样十分繁琐，每一动作都要吟一首诗歌。在此一律从略不作繁琐介绍。最后，请龙头老大哥传出山令。请红旗大五哥接出山令。(同样念诗歌)。

至此，礼成。

洪　门　隐　语

洪门会在清朝被当局作为“非法”组织，严令禁止。当局一旦发现洪门的组织或活动，就会立即缉捕严惩“法办”。因此，洪门各派系为了秘密活动的需要，专用一套术语，也就是其组织内部的隐语，民间称之为“黑话”。但洪门各派别之间，及同一派别所处的不同地区之间，所用的隐语稍有差别，总的来看是大同小异。兹将一般惯用的隐语介绍如下：

会　所　用　语

会所　称“公所”，又称“红花亭”，或称“松柏林”。

秘密会所　称“三尺六”，或称“古松”。

入会　称“入圈”，又称“拜正”，或称“出世”，或称“归标”。

投拜　称“受栽培”或称“领香”。

集会　称“开台”，又称“放马”，称“开山”，或称“开香堂”

集会地　称“忠义堂”。

执事　称“办差事”，或称“站班护卫”。

洗面　称“开光”。

会员　称“香”、“洪英”，或称“豪杰”。

新会员　称“新丁”，又称“新贵人”，或称“堂”。

征求会员　称“搂堂”。

到会　称“去睇戏”，或称“赶香堂”。

蜡烛　称“古树”。

线香　称“桂枝”。

法棍　称“红棍”。

令旗　称“飘风子”。

木斗　称“木杨城”。

跪下　称“矮倒”。

杀鸡　称“斩凤凰”。

法刀　称“小宝”。

香主入位　称“登山”。

站起　称“升起”，又称“独起”。

淌血　称“流光子”。

发誓　称“宣誓”，又称“抖海式”。

条香　称“红香”。

斩香　称“砍条”。

行礼　称“拉拐子”、“丢拐子”，又称“拉歪子”。

办会员　称“办采堂”，又称“采红堂”。

香主讯问　称“坐大堂”。

作证　称“指红”。

处刑　称“执法”。

秘密文书　称“衫子”、“金不换”，又称“海底”。

印信　称“翻天子”。

会员证书　称“腰凭”，又称“八角招牌”、“八卦”、“罗汉头”、“宝”。

印版　称“天花子”。

会　员　用　语

书信　称“锦囊子”。

名片 称“荷叶子”。

通知 称“上服”，又称“上副”，或称“上付”。

姓名 称“金名玉讳”。

有劳 称“负累”。

口才 称“钳子”。

口才好 称“钳子快”。

肚腹 称“瓶子”。

肚腹好 称“瓶子满”，又称“条规熟”。

对上 称“哥子家”。

对下 称“兄弟伙”。

洪门 称“汉留”，又称“汉流”、“汉刘”，或称“海湖”、“玄家”。

同门 称“自己人”，又称“自家兄弟”。

外人 称“外马子”，又称“疯子”、“鹧鸪”、“贵四哥”。

女人 称“阴马子”。

自己山头 称“本山”、“本堂口”，又称“公口”。

自己 称“余下”。

振兴洪门 称“混光棍”，又称“耍光棍”。

破坏洪门 称“越礼反教”，又称“扰乱香规”。

在会 称“在玄”，或称“在洪”。

教训 称“戒摩”，又称“夹磨”。

骂人 称“开花”。

打人 称“斗霸”。

表示洪门 称“挂牌号”。

盘门 称“清袍袱”，又称“请袍袱”。

介绍朋友 称“拉场”。

赞许 称“捧场”，又称“架势”。

说坏话 称“打烂条”，又称“打黑字旗”。

办分会 称“背公事”，又称“背榜”、“领字号”。

释误会 称“叫粉子”。

解争端 称“叫梁子”。

遇对头 称“碰钉子”。

生事 称“找皮绊”，“造皮绊”。

助势外人 称“抱马子过关”。

欺骗人 称“瞒天过海”。

不敬兄弟 称“欺兄灭弟”。

搬是非 称“挑灯拨火”。

证明 称“指红作证”。

对上侮慢 称“红面视兄”。

睡觉 称“歪下”。

生病 称“拖罗成”。

家 称“甲子”。

道路 称“线子”。

旅行 称“游线子”。

走运道 称“红光子”，又称“红点子”。

收起来 称“捲起来”，又称“统起来”。

剃头 称“扫青”。

剃头匠 称“扫青生”。

洗澡 称“闹海”。

唱戏人 称“跳板生”。

吏卒 称“马子”，又称“湾马点子”。

和尚 称“花疤子”。

地名 称“川子”。

请会 称“盘桃子”。

拜客 称“拜码头”。

城 称“圈子”。

船 称“平子”，又称“底子”。

乘船 称“搭平子”。

梦 称“黄梁子”。

海 称“大天”。

市镇 称“混子”。

风 称“八面子”。

雨 称“摆子”。

雷 称“震天子”。

雪 称“花球子”，又称“鹅毛片”。

闪电 称“光光子”。

星斗 称“亮光子”。

马 称“跑蹄子”。

牛 称“大够子”，又称“长角子”。

羊 称“孝角子”。

龙 称“溜子”。

虎 称“巴山子”。

竹篙 称“通天子”。

服 装 用 语

明朝服装　称“袈裟”。

帽子　“称“雪盖”，又称“万笠”、“顶宫子”。

鞋子　称“踢土子”。

草鞋　称“跨弓子”。

拖鞋　称“扯八子”。

长衫　称“大篷子”，又称“扫把子”。

皮袍　称“蓑衣子”。

马褂　称“蝴蝶子”。

背心　称“穿心子”。

裤子　称“叉儿”，又称“兜把子”。

棉袄　称“八狗子”。

套裤　称“菱角”。

围巾　称“盘龙子”。

袜子　称“竿筒子”。

短褂　称“衫子”。

短袄　称“球笼子”。

围腰　称“竹筒子”。

雨鞋　称“踏水子”。

饮 食 用 语

茶叶　称“青莲心”。

饮茶　称“收青子”，又称“收黄杨子”。

烧酒　称“家和兴”。

饮酒　称“收玉子”，又称“收红花雨子”。

吸烟　称“收燻子”。

吸香烟　称“收燻条子”。

鸦片烟　称“云游子”。

吸鸦片烟　称“咬云”。

水　称“三河”。

油　称“洪顺”，又称“滑水子”。

盐　称“进兴”。

青菜　称“青苗”。

咸鱼　称“丫环”。

火　称“光明子”。

烧鹅　称“金六”。

烧鸭　称“金八”。

毛鸡　称“亚七”，又称“凤凰”。

毛鹅　称“亚六”。

毛鸭　称“亚八”，或称“琵琶子”、“扁嘴”。

鸭蛋　称“昆轮”。

猪　称“毛瓜”。

猪肉　称“白瓜”。

熟猪肉　称“金瓜”，又称“红瓜”。

牛肉　称“大菜”。

狗　称“蚊”，又称“皮条子”。

鱼　称“穿浪”，又称“摆尾”。

米　称“沙”，又称“八木子”。

谷米　称“洪沙”。

饭　称“粉子”。

煮饭　称“打沙”。

吃饭　称“收粉子”，又称“耕沙子”。

吃粥　称“打浪”。

物 件 用 语

扇子　称“摇风子”，又称“湾月”。

茶碗　称“莲蕊”。

酒盅　称“莲米子”。

饭碗　称“莲花子”。

大碗　称“大莲花子”。

调羹　称“飘婆子”。

筷　称“玉箸”，又称“篙子”。

床铺　称“戏台”。

帐子　称“灯笼”，又称“满天子”。

枕头　称“鸳鸯子”。

棉被　称“盖体子”。

垫被　称“铺体子”。

灯火　称“太公”。

酒壶　称“载子”。

新鞋 称“兵兰”。
新帽 称“万笠”。
行李 称“卷子”。
白包袱 称“象牙卷子”。
花包袱 称“牡丹卷子”。
箱子 称“肚子”。
手巾 称“柳叶子”,又称“五色丝罗”。
眼镜 称“照珠子”。
表 称“叶子”,又称“叫油子”。
金戒指 称“筋子”。
当票 称“朵子”。
钞票 称“花花子”,又称“花叶子”。
铜钱 称“芝麻”。
洋钱 称“饼子”,又称“瓜子”。
雨伞 称“开花子”。
洋伞 称“独脚”,又称“洪头”。
锁 称“匣子”。
钥匙 称“把子”。
手铐 称“划子”。
铅丝 称“黑线”,又称“线子”、“链子”。
尿桶 称“金鱼缸”。

人 体 用 语

头 称“帅拂子”,又称“张点子”。
发 称“青丝子”,又称“乌云”。
脸 称“扇面子”。
眼 称“罩子”,又称“玲珑子”。
鼻 称“气筒子”。
口 称“樱桃子”,又称“钳子”。
耳 称“顺风子”。
舌 称“口条子”。
齿 称“才条子”。
手 称“鸡爪子”。
心 称“定盘子”。
肚 称“罗汉子”。
腿 称“金刚子”。
脚 称“踢头子”。
胡须 称“巴腮子”。
胆 称“苦水子”。
屁股 称“巴篓子”。
阴囊 称“绣球子”。

职业住所用语

住宅 称“窑堂”。
饭店 称“粉子窑”,又称“伞窑子”。
旅馆 称“落马窑子”,又称“拖窑子”。
浴室 称“罗汉窑子”,又称“闹海窑子”。
烟馆 称“熏头窑子。
菜馆 称“混子酒”,又称“混子窑子”。
酒馆 称“玉子窑子”。
面馆 称“千条窑子”。
茶馆 称“黄汤窑子”。
当铺 称“富贵窑子,又称“糟子”。
栈房 称“窑堡”。
钱庄 称“水窑子”。
剃头店 称“扫青窑子”。
庙堂 称“哑叭窑子”。
衙门 称“威武窑子”。
监狱 称“书房”。

地 名 用 语

上海 称“龙海川子”。
江阴 称“重阳川子”。
镇江 称“南土川子”。
十二圩 称“流州混子”。
南京 称“宝贝川子”。
安徽 称“登山川子”。
湖北 称“巴山川子”。
武昌 称“破土川子”。
芜湖 称“洞天川子”。
黄陂 称“咪河底川子”。
汉口 称“汉口川子”。

九江 称“腊河川子”。
沙市 称“怡河混子”。
宜昌 称“城岩川子”。
兴国 称“亲寄川子”。
湖南 称“点翠川子”。
通州 称“交河川子”。

军事用语

大刀 称“大片子”。
小刀 称“小片子”，又称“小青子”。
炮 称“烘天子(轰天子)”。
大炮 称“黑狗”。
火药 称“狗粪”，又称“粉子”。
子弹 称“钉子”、“种子”。
大炮声 称“狗吠”。
手枪 称“喷筒子”，又称“牲口”。
出枪 称“出窠”。
开枪 称“开口”、“张口”。
截路 称“打鹧鸪”。
去 称“游”。
官府 称“对头”。
官差 称“风仔”。
官兵 称“猛风”。

姓氏用语

金姓 称“园河里”。
姚姓 称“拱河里”。
李姓 称“紫河里”。
周姓 称“沙河里”。
陈姓 称“烟河里”。
俞姓 称“摆河里”。
楼姓 称“望乡子”。
张姓 称“湾弓里”。
朱姓 称“顶宫里”。

交际用语

见面请教 称“参教”、“请教”。
对帮内人 称“自己人”、“自家兄弟”。
对帮外人 称“马子”、“洋盘”、“空子”。
言语不周 称“半吊子”。
拜客 称“请安问候”。
出门 称“开码头”。
有事不到 称“挂号”。
托人带信 称“上服”、“上付”。
同患难 称“同稻草铺”。
立等回信 称“双挂号”。
回信 称“回号”。
说人穷苦 称“桂花”，又称“打水仗”。
衣服 称“行头”。
换衣服 称“换季”，又称“调行头”。
当衣服 称“困槽子”。
耍光棍 称“混人”，又称“跑江湖”。
有意见 称“难过”、“多心”。
管外事 称“吃空心饭”、“混事”。
拍马屁 称“跳加官”。
年岁 称“太岁子”。

交涉用语

计划 称“割药”。
无中生有 称“装榫头”，又称“栽钉子”。
办交涉 称“上枪”、“上班”。
不怕事 称“有种气”。
约地方 称“摆地点”。
到人家 称“闯窑堂”。
显威风 称“摆华容道”。
用手面 称“看颜色”。
多带人 称“摆炮”。
与人理论 称“看他”。
说理 称“叫事”。

讲和　称“叫开”。
借端　称“起奔头”。
争吵　称“张事”。
威吓　称“放炮”。
争执　称“跷角”。
让步　称“落篷”。
解决　称“落角”。
遇对头　称“碰僵”。
说话转弯　称“兜圈子”。
下面子　称“出丑”、“坍台”。
被逼迫　称“看相”。
当场难堪　称“出挺”。
相持不下　称“逼苗头”。
无法自转　称“现相”。
负责　称“肩胛”。
回事不成　称“卸肩胛”。
从此不问　称“退排”。
倒头相帮　称“放掉头炮”。
缺理　称“吃瘪”。
拜服　称“领盆”。
事不成　称“滑边”、“走油”。
事无望　称“失匹”。
瞒人　称“偏门”。
假称无事　称“打过门”。
报复　称“翻梢”。
报仇　称“报赤壁”。
托事人　称“原主”。
讲理　称“吃讲茶”。
说坏话　称“吐臭”。
自己人　称“老朋友”，又称“脚碰脚”。
做事爽气　称“漂亮”。
出办法　称“开路”。
主使　称“撑腰”。
帮忙　称“抱腰”。
代人争执　称“掌梢”。
根本解决　称“一了百了”。
勾结　称“连党”。
凶恶　称“招凶”。
自称　称“光棍”。

钱财用语

找钱财　称“找财路”。
无端找钱　称“拆梢”。
无端讲理　称“讲斤头”。
受人酬谢　称“为情”。
包办事情　称“树上开花”。
中途参加　称“靠边”。
乘机参加　称“挨一脚”。
损失用费　称“倒窑费”。
分钱　称“劈把”。
大家分钱　称“开花”。
讨回分钱　称“殴把”。
失钱归还　称“转槽”。
示人以钱　称“现梢”。
易出钱财　称“酥桃子”。
向人借钱　称“告帮”。
取佣钱　称“脱帽子”。
外加钱　称“加交头”。
问人钱数　称“量底子”。
既去又来　称“回票”。
要钱　称“吃血”。

出事用语

防守　称“望风”。
监守　称“下卡”。
请人相助　称“调将”。
跟随　称“钉梢”。
住家　称“炉口”。
住址　称“落脚”。
出事　称“失风”。
逃走　称“避风”。
办事　称“上阵”。
负伤　称“带彩”，又称“带花”。
报告　称“放笼”。

警察　称“条子”。
探捕　称“木老”。
被捕　称“跌进”。
吃官司　称“下水”。
攀害同人　称“洒口水”。
互相为害　称“窠里犯”。
搜腰　称“洗衫”。
无法逃避　称“硬挺”。
官司解决　称“出水”。
出主张　称“出点子”。
转变　称“掉枪花”。
看事情　称“轧苗头”。
看人　称“照相”。
给人路线　称“划线头”。
使眼色　称“划玲子”。

混事用语

头脑　称“掌舵”、“舵把子”，又称“瓢把子”。
领人　称“领马子”，又称“领伏子”。
见事急转　称“识相”。
老走码头　称“老棍子”、“老光棍”，又称“老江湖”。
行为不端　称“浑水光棍”。
做事清正　称“清水光棍”。
站码头　称“站角子”。
问话答复　称“接条”。
开妓院　称“开门子”。
窃贼　称“跑腿”，又称“混事”。
撬门　称“拨扇子”。
挖洞　称“开桃子”，又称“划圈子”。
白日进门　称“白日闯”。
私进人家　称“掩门”。
早晨偷窃　称“找早清”。
由高而入　称“扒条”。
抢劫　称“拔庄子”。
大抢劫　称“洗庄子”。
绑票　称“请财神”，又称“架票”。
被绑人　称“票子”。
被绑小孩　称“肉蛋”，又称“小财神”。
早上抢劫　称“开门挡子”。
晚上抢劫　称“打灯花”。
探路　称“打眼”。
在外守候　称“望风、“望清”，又称“保水”。
带枪　称“带牲口”。
奸淫事主　称“采花”。
挖去眼睛　称“吹灯”。
打死被绑人　称“撕票”。
出钱赎人　称“赎票”。
联络一起　称“搭当”。
扒手　称“找明钱”、“靠山子”，又称“相公”。
路劫　称“路挡子”。
牵贼　称“牵猴子”。
断路(即拦路抢劫)　称“剪径”。
偷鸡　称“剪柳”。
偷菜　称“放地火”。
小偷　称“跑花香”。
用假票　称“放花叶子”。
贩卖人口　称“贩条子”，又称“吃浪家饭”。
抢帽子　称“抛顶宫”。
骗赌　称“郎中”，又称“吃乱把饭”。
在车上偷窃　称“路滚盘子”。
在船上偷窃　称“路底子”。

留尾用语

以下大都是在一句成语中利用第四个字的谐音表示隐语，将第四个字即末尾一字留住不说出，以为暗示。

茶　称“半夜巡”(查与茶谐音)。
酒　称“交冬数”(九与酒谐音)。
碗　称“莲花大”。

女人　称“金童玉”。
母　称“黎山老”。
妻　称“大夫小”。
子　称“东床半”。
婿　称“乘龙快”。
肉　称“娇皮嫩”。
篮　称“二八提”。
钱　称“刘海戏”。
辣　称“九十冬”。
有　称“无奇不”。
吃　称“皇亲国”。
气　称“酒色财”。
饿　称“忍饥受”。
打　称“细吹细”。
头　称“枣木榔”。
发　称“披头散”。
面　称“牛头马”。
鼻　称“扶墙摸”。
眼　称“荔子圆”。
耳　称“金针木”。
口　称“樱桃小”。
手　称“香橼佛”。
膀　称“绳捆索”。
肚　称“袁樵摆”。
腿　称“金华火”。
脚　称“蛇虫百”。
瓜　称“刘全进”。
刀　称“寡话劳”。
黑　称“乌儿摸”。
板　称“鱼鼓简”。
风　称“金殿装”。
店　称“贺后骂”。
亮　称“通光照”。
父　称“显财卖”。
庙　称“莫名其”。
图　称“糊里糊”。
糖　称“太子登”。

上述洪门隐语中，有些已在民间广为流行，有的与上海等地的“切口”类似，如服装，称“行头”；根据情况变化改变态度以取得对方谅解，称“识相”；老走码头的，称“老江湖”；事不成或说话出格了，称“滑边”；不负责，称“没肩胛”；丢面子，称“坍台”、“出丑”等等。洪门隐语中，有些已在上海等地青年一代中成为“切口”，如，无中生有，称“装榫头”；讲不出道理了，称“吃瘪”；主使或支持，称“撑腰”；欺骗或隐瞒，称“瞒天过海”。

洪门的“隐语”，在洪门活动中是一种“伪装术”或称“隐蔽术”，是以防范秘密泄露为目的的。洪门使用“隐语”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洪门自身的安全和便于秘密活动。洪门的“隐语”又好比洪门语言信号秘密的钥匙，洪门活动中，严防语言秘密“钥匙”落入敌人手中，因而，不向会外传授。

洪门隐语大部分比较粗俗，反映出其成员文化水平较低。但留尾用语中却利用了许多成语，又反映出民间下层社会中流传着丰富的通俗的成语，对研究民间语言学，具有参考价值。

个别术语注释

五湖——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江苏太湖，浙江鉴湖，安徽巢湖。

九江——扬子江、楚江、湘江、荆江、汉江、南江、吴江、松江、浙江、总称九江。

木阳(杨)城——木属东，阳者指当阳；意思是东虏当阳，汉族应群起而攻击之。攻打木阳城，为洪门的隆重典礼。作木阳城制度：制一斗，上书“木阳城”三字，下书“木立斗世”四字，取木字十八，立字六一，斗字十三，世字二卅，代表清顺治十八年，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十三年，乾隆(二卅)六十年，四代隐语。洪门(汉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攻打“木阳城”暗示“反清复明”的职志。凡问洪门(汉流)从何而来？必回答从昆仑而来，喻其高大。问向何处而去？必回答向“木阳城”而去，意思是

攻打木阳城取胜为结局。但洪门多数史籍中将木杨城不写为“阳”而写为“杨”，作为洪门保卫的象征。

东门三灶十八锅，西门三锅十八灶——意思是木阳城内，东门灶少于锅，西门锅少于灶，吃饭问题必然困难，由此必生内乱，其统治地位难以巩固。

五旗名称——即五个堂口的名称为：仁、义、礼、智、信。

十旗名称——即十堂人名称为：威、德、福、志、宣、松、柏、一、枝、梅。

外十个字——即十旗名称。

内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公口——全体同心谓之公，出入必由谓之口；公口也就是全体出入的总机关，为洪门机关名称。

在园——在桃园的意思，洪门结盟以桃园三结义为榜样，在园也就是参加了洪门。

苑内人——以传说中得到洪门“海底”秘传的郭永泰有林园名称为松柏苑，为开山堂时聚义的场所，也是会内密商事宜的场所。因而，苑内人即洪门会内人，即园内人。

在缘——洪门（汉流）称结盟为大结人缘，因而，在缘即在园，即参加了洪门。

光棍——光是明的意思，“棍”字析为十八昆，即十八省昆弟。光棍二字含意为大明十八省昆弟，勿忘大明江山。因而含有反清复明的意思。另一解释为，光者胆也，棍者直也，即光明正直之人。但前一解释较符合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光棍的另一含意是“贫穷如洗，只有手中之棍”，为“穷光蛋”加入秘密结社的意思。

海底——是由洪门传说中的郭永泰首先得到郑成功开精忠山明远堂的秘密传本，该密本经海底打捞出来，名为“海底”，又名“金不换”。后来洪门会内代代秘密相传的洪门起源、宗旨、家法、禁条、隐语等等统称为“海底”。鉴别江湖来客是否会内人员，需盘问一番，称为“盘海底”。学术界另一解释为，“海底”的真意在于深奥莫测。

丢歪子——洪门（汉流）“自家人”见面行礼称之。由于洪门在清代属于秘密结社，为严防外来刺客或密探、间谍，采取以武术会友以自卫，以比武形式行礼，以后虽然会内行礼未必都采取武的形式，但仍将行礼称为丢歪子或丢拐子。

丢歪子——另有一说：歪者，外也，意思是对外施礼。凡丢歪子，必斜扭身躯，歪斜屁股，俗称“作歪屁股揖”。以示甲胄在身，不便照常规行礼。清代男子也必须留发辫，丢歪子行礼时，身体斜扭，使发辫挂在前面，示意为剪去这根猪尾巴，必须反清复明。

上九流——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斗六秤七流工，八流商人九庄田。

中九流——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风鉴四卜筮，五流丹青六流画，七僧八道九琴棋。

下九流——一流打狗二卖油，三流修脚四剃头，五拈食盒六裁缝，七修八漂九吹灰。

以上这种上、中、下九流的划分，反映了洪门中浓厚的封建落后意识，将剃头、修脚、裁缝等劳动者列入下九流，将皇帝和官吏列为上九流，这种封建等级观念是十分腐朽的，民国以后，这种观念逐步淡化。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人们在观念上逐步改变了上、中、下“九流”的界限。

拜码头——帮中有一种专门在江湖上混事的人，他们不从事生产，全靠一张嘴，能顺口如流的讲江湖术语，和熟练做江湖动作，到处行走，称为跑码头。每到一处，必拜见当地码头。拜码头时，要运用江湖术语，行帮中礼节，不得随便。洪帮中有所谓文见和武见之分，文见为“盘海底”，武见还要要刀子。拜见之后，如有所请求，当地同帮兄弟，有相当的招待，招待的厚薄，按其身份和本领而定。

洪 门 家 法

洪门的家法主要指会内的纪律和刑法。洪门纪律森严，但会内弟兄不管犯了洪门的什么规章制度，都不会被开除出洪门组织。因为惟恐被开除的弟兄，一旦脱离洪门，难免泄漏洪门内部的秘密，所以家法中有各种处分以至死刑、极刑，却没有开除这一条。

刑 法

洪门的各种文献记载中对刑法的规定不一致，有的规定五种刑法称为“五刑”，即极刑、重刑、轻刑、降刑、黜刑。但也有的规定为六种刑法，即极刑、重刑、次刑、轻刑、黜刑、降刑。

极刑 “凌迟”，即以刀零割至死。

重刑 “沉水”即溺死，或“挖坑”即活埋。

次刑 “剽刀”、“三刀六眼”，“剽刀”即以刀自己割肉，“三刀六眼”，即自己挖个坑，内插三把刀，刀尖朝上，自己对着刀尖猛扑下去，三把刀，刺穿身体，造成六个洞眼。但又规定“三刀六眼”只用于一、二、三、五这上四排。

轻刑 “红棍”即打四十或八十棍，但打棍只用于五排以下者。

黜刑 “连根拔”即撤销会内一切职务。

降刑 “降级”即降一或二级。

以上刑法过于简单，各地洪门组织往往根据具体情况改变或补充一些刑法。

《十八本律书》

洪门为自治团体，原有十八本律书，民国后时代变迁，法律屡易。然为追求本源，展示原始文献面目，特照原件摘录于下：

第一本 不孝父母罪

忤逆不孝者——重刑或次刑。情节稍轻者，轻刑。情节更轻者，黜。情节再轻者，降。

第二本 不敬长上罪

不敬长上——轻刑。情节稍轻者，黜。情节更轻者，降。

第三本 殴辱尊亲属罪

殴尊亲毙命者——极刑。

殴尊亲有伤者——重刑。

殴尊亲无伤者——次刑。

第四本 殴同堂兄弟罪

殴同堂兄弟毙命者——重刑。殴同堂兄弟有伤者，次刑或轻刑。殴同堂兄弟无伤者，凭众议处。

第五本 调笑有关妇女罪

调笑有关妇女者——黜。

第六本 调笑尊亲妇女罪

调笑尊亲属妇女者——轻刑。

第七本 调笑卑亲妇女罪

调笑卑亲属妇女者——黜。

第八本 淫尊亲属妇女罪

乱及尊亲妇女者——重刑或次刑。

第九本　淫卑亲属妇女罪

乱及卑亲属妇女者——轻刑或黜。

第十本　擅造孤子罪

擅造孤子者——轻刑。情节稍轻者,黜。情节更轻者,降。

第十一本　装人卖客罪

装人卖客,致受害人家有生命危险者——重刑。无生命危险者,次刑或轻刑。

第十二本　私卖梁山罪

私卖梁山,致全体被害——极刑。受害轻者,重刑。

第十三本　受贿卖法罪

受贿卖法——次刑或轻刑。情节稍轻者,黜。情节更轻者,降。

第十四本　带线引水罪

受人财物,作带线引水者——次刑或轻刑。情节稍轻者,黜。情节更轻者,降。

第十五本　兴空灭汉留罪

兴空子,灭汉留——轻刑。情节稍轻者,黜。

第十六本　私看内财罪

私看内财,有凶暴行为者——重刑。无暴行者,轻刑。

第十七本　吞没股礼罪

擅吞礼物,吃股灭份——轻刑。情节稍轻者,黜。

第十八本　捏造黑白罪

捏造黑白毁人名誉者——次刑或轻刑。情节稍轻者,黜。情节更轻者,降。

以上洪门的《十八本律书》是洪门维持会内纪律和秩序的"法典",这《十八本律书》和以上的几种刑法相结合,反映出洪门"独立"于"国法"之外,在会内所采取的严刑峻罚。

执刑诗歌歌词

洪门对犯法者施刑时,龙头大哥为主持人,执法管事遵照大哥命令执法。请刑、施刑程序繁琐,并且几乎每一动作都要唱一首诗歌。受刑者也要唱。

施刑时,先由执法管事开口唱:"走上前来礼恭敬,弟见仁兄忙禀明,执法拜兄传口令,请兄开库前发刑。"当执法管事上前向执事当家请示时,执事当家连忙回答道:"红棍原来有根本,水浒留下库内存,开库取刑弟接令,专打江湖越礼人。"这时管事嘱咐么大送红凳,同时唱道:"适才仁兄发红棍,执事么大听分明,今有英雄越了令,送来红凳好施刑。"么大遵命,恭恭敬敬把红凳送到,同时唱道:"命令兄弟送红凳,执法堂前走一遭,还望五哥讲情份,举得高来责得轻。"么大如此讲情,是份内应做的,可是管事表示不肯,要求大哥赏示,回答道:"么大刚才讲情份,愚兄焉有不留情,只因法是众人定,大哥赏示谁不遵!"不一会儿,他又继续唱道:"扭转头来赞红凳,眼观红凳起祥云,红凳四方又四正,执法堂前重典刑(有的为'执法堂前搪莫能')。"接着管事要请领刑人上红凳,并继续传令:"依礼如规是根本,订定条款制横人。军有礼,纪律定严明。民依礼,国事定太平。父有礼,子当把孝敬。子依礼,家内五伦兴。兄有礼,弟当礼恭敬。弟依礼,同结团体不分心。贤弟做事越了令,请上红凳来领刑。"这时,领刑人心中惶悚万分,忙向管事说道:"兄弟跟大五哥讨交道,递问呈,红棍何人所兴、何人所制,出于何时,轻重长短,宽厚若干,拜兄赏示。兄弟领刑以后,江湖行走,兄弟问到,也好答复,才知贵重。"大管事急忙解答,唱道:"贤弟休盘问,红棍有根生,此树世间少,天上梭罗星,大宋梁山顶,晁盖宋公明,朝北四大寇,朝内四奸臣,果老去伐木,驾雾坠凡尘,霎时风声静,字字现分明,上有鹅毛字,满刻是篆文,众人不认识,吴用认得清,轻时如灯草,重时如黄金,忠义大堂前,吴用解分明,一百单八将,天罡地灵生,凤凰圣贤像,巧匠造成形,取名叫红棍,威镇众豪英,连把三尺六,厚有寸八分,重有十六两,四钱零五分,七十二丝宽,内有天地人,左造有八德,右造有五伦,上打无道者,

下打无义人，英雄谁拗令，犯法不容情，梁山办李虎，威令到如今，小弟请人手，耑打越教人。”

管事执刑时责打数法与众不同，因汉留切忌四、七，故数时采取双单两数，如以单数数，则一三五九不数七，如数双数，则二六八十，不数四又倒数十九八六，五三二一，又顺数一二三五，六八九十。总之避去四、七两个数。

打毕，最后还要赠言教道：“红棍打出头，恭喜贤弟挂印又封侯，英雄领刑志气在，福从今起永无灾，知恩必报知过改，谨守八则人尊爱，有请贤弟下凳来。”

从这些执刑歌词中可以看出，洪门在执行刑法时所以唱这些歌词，其目的在于教育内部弟兄。责打之后，再赠言教导，并鼓励其改正错误，似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意味。这是洪门维持组织秩序的一种办法。

文场、武场

民国前，洪门内部弟兄间如发生争执，处理办法分文场、武场两种。文场大都是在茶馆中以“吃讲茶”的方式来解决。即争执的双方和会内首领人物以及充当调解人的弟兄，都到茶馆内围坐在一起，堂倌将争执双方的茶壶嘴相对放置。争执双方各摆出道理，中间调解者遵照洪门帮规、禁令、条款之类及传统习惯上的是非标准评议双方的是非，首领人物作仲裁者。如果通过讲理，使双方矛盾取得解决，堂倌便笑嘻嘻地将双方的茶壶嘴交叉放置，表示双方已和好。

但是武场的解决形式却令人惊心动魄。武场往往在野外进行，由会内的巡风担任警卫工作。双方先要展开辩论，凡无理的一方，必须“自己挖坑自己跳，自己插刀自己剽”，即自己要按照规定挖好坑，坑底铺上红毡，插上三把尖朝上的刀，自己迎着刀尖跳下去。

相传四川万县有一洪门弟兄报告会内某人与他的妻子通奸，于是决定开武场处理这一案件。

当场审案的大哥问原告，说某某与你妻通奸，“证据何在？”原告即持利刀在自己大腿上割了一块肉，掷在众人面前说：“这就是证据。”大哥认为虽无人证物证，但能够不惜割肉之痛来申诉苦衷，当不会弄虚作假。于是大哥问被告，被告看到原告以割自己的肉来申诉，无言可答。当场议决，被告只得自己挖坑自己跳，自己插刀自己剽。但当剽下去时，插的刀倒了。大哥高呼：“刀倒了剽不进去，定有神灵，是此人冤枉！”再重新盘问原告，原告认为神灵已“显了灵”，弄虚作假隐瞒不过神仙，心中畏惧，终于坦白出诬告实情。于是改为原告自己挖坑自己跳，自己插刀自己剽，结果自剽而死。

从这一传说中可以看出，当时洪门会内审理案件过于简单化，不是依靠调查研究和人证物证，而是以自伤肉体和对神仙鬼怪的迷信代替人证物证。

“自己挖坑自己埋”

洪门《十条十款刑律歌词》中有“上三排哥子犯了戒，自己挖坑自己埋，中三排哥子犯了戒，三刀六眼洞自开”。在洪门历史传闻中，各地都有“自己挖坑自己埋”、“三刀六眼洞自开”的事例。以下列举洪门“义士”自己挖坑，自我执行“三刀六眼”的悲惨而又带点“野蛮”的场面。

故事发生在河南省朱仙镇。有一位洪门义士名叫占敖，其江湖义气名闻遐迩，人称“赛宋江”。占敖父母早亡，也无兄弟姐妹。多年修文习武，养成安邦定国之才。有诸葛武侯卧龙之志，羊(角哀)、左(伯桃)之贤，桃园之义。“万众一家，广结金兰”，江湖上多有盟兄义弟。他有位结拜弟兄姓周名定国，也

是一位“豪杰”。有一天，占敖与周定国等众兄弟一起在芝兰轩茶楼吃茶，见有一位女子，生得眉清目秀，俊美异常，随便对这位女子说了几句笑话。过了一会，待女子走近时，众位兄弟认出她是周定国的妻子，不禁大笑，说是刚才占敖所笑话的正是尊嫂。占敖一听说是周大嫂，吓得面如土色，当场对众兄弟说道：“我不能正己，焉能正人。”约定十八日，请三山五岳、水旱两帮、南北英雄来朱仙镇聚集。占敖自己在镇外挖了一个坑，坑深一丈二尺，名曰“十二时辰”。长七尺二寸，名曰“七十二重地狱”。宽三尺六寸，名曰“三十六天罡”。内安三把刀，名曰“天地人三才”。三刀六个眼，名曰“三江六码头”。上以黄沙树天(即堆积好黄沙准备掩埋)，下有红毡铺地。同众豪杰痛饮一场。自己跳下坑自杀了。后来这一事迹为皇帝得知，封占敖为利害神。洪门会组织以这一利害为戒。周定国夫妇后来亦“尽忠身故”。

这个故事说明，洪门为了团结内部，“家法”森严，严禁调戏会内成员的妻子。标榜占敖的“自己挖坑自己埋”和“三刀六眼洞自开”精神，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内部团结，这是加强内聚力的一种措施。洪门标榜的这种“江湖义气”带有流氓无产阶级的盲目性、落后性。封建皇帝为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也利用这种“义气”。洪门在占敖的传说中以皇帝的敕封为荣，这里所指的皇帝显然是清朝皇帝，这与洪门反清的宗旨是相矛盾的。

“自绑自杀”

洪门施行“自绑自杀”的事例很多，请看以下一例。

1904年，黄兴、彭希明、陈少芝、曹亚伯等为在长江中游准备起义，公推万武与刘道一前往湘潭策动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共图大业。

马福益有位结盟兄弟叫马龙标，少年英俊，办事能干，颇得马福益的宠信。因他生得漂亮，会中一个兄弟的妻子和他勾搭上了。按照洪门纪律，对于穿红鞋(又称同穿绣鞋，指与会中弟兄的妻子通奸)是犯死刑罪的。事发后，会内根据龙头马福益的命令，将马龙标交刑堂提讯，讯问明白后，判了死刑。到了执刑那天，马龙标当面托马福益照顾他的母亲，然后“慷慨”自赴刑场。那天夜晚是苦雨凄风，送他的人约六、七位。马福益依依不舍地对马龙标说：“兄弟呀，你不该生得太体面了，所以送了你的性命。”说罢就向刑场走去，马龙标在前，马福益在后，寂静无声，气氛惨然。正走时，忽听马龙标用极悲惨的声调叫了一声：“大哥，地下滑得很，前面又有一条小水沟，你留心一点啊！”大家听了都不觉泪下，尤其是马福益，声泪俱下，叫了声：“兄弟，谢谢你，祝你十八年后再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说话间，已经到了刑场。原来刑场是浩荡奔流的大江。那时马龙标高叫了一声：“各位兄弟们，一齐少陪！”说罢纵身跳入江中，只听得咚的一声水响，人已淹没于汹涌的波涛之中。马福益默祷了半晌，才率领大家返回。这一“自绑自杀”的事实，既说明洪门纪律严厉，又说明洪门的刑法是违背现代文明的法制精神的。依靠近乎野蛮的落后“家法”维护洪门的纪律，这是一定社会条件、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当时的“会党”也只有依靠这种“家法”来维持组织纪律，否则内部会因男女关系问题而经常性的引起内讧。

洪 门 暗 号

各码头联络暗号

洪门为了保持其民间秘密的活动方式，各山堂之间的联络一概使用暗号。洪门弟兄如负责联络使命或因事外出，临时需要与外码头洪门组织取得联系，都必须对本山堂的四柱——山、堂、水、香的名称，和四大盟兄——恩、承、保、荐四位大哥的姓名，牢牢记住。此外，还必须牢记各种暗号，才能走遍天下，到处取得洪门兄弟招待照顾，帮助办事。关于洪门四柱名称和四大盟兄的姓名，对洪门以外的人必须绝对保密，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妻子儿女，这是洪门的绝密暗号。它主要用于在洪门各山堂之间的联络问答。

洪门各山堂为了彼此联系，在某些城镇或地区设立码头，内部称为"方首"（一方之首的意思）。在清代，洪门山堂在某地区设立码头"方首"，必须通报全国洪门各山堂，以便联系。清末，没有全国性统一的洪门组织，联系面不大，大致一省的洪门组织相互有联系，能够互通"方首"地址，大都以茶馆酒店为联络地点，各山堂接洽工作，联系事宜，一般不用书面联系，惟恐泄密，大都仍用暗号联络。码头"方首"之间的联络，一般成员不堪胜任，必须由高层级别者如"红旗老五"主持或由"执法老五"代行，他们必须非常熟悉洪门的规章制度，以及各山堂的四柱——山、堂、水、香的特殊名称和各山堂的山主、坐堂大爷的姓名，以便盘问前来联系的洪门弟兄。

在外码头使用暗号联络的洪门弟兄，大致分为两种，其一，为组织派遣，负有使命者，组织会告诉他要联系的外码头"方首"的联络地点，以至茶馆酒店的名称字号，前往联络者易于寻找。其二，无组织交代任务的过路洪门弟兄，一旦遇到困难或缺乏路费时，因不知该地"方首"所在地点，只得到处找茶馆酒店，摆出暗号寻找。

凡是洪门弟兄到外码头联系"方首"者，进茶馆酒店时，必须以右脚向前跨门槛。如该店有当地洪门的红旗老五，必然留心来客进门时先迈哪只脚。来客坐下将两手分开扑在桌边，高声喊："请堂倌泡茶！"即使在酒店也称"泡茶"。堂倌问："先生要什么茶？"来客回答："要红茶！"（红与洪谐音），"红茶"也属于暗语。如茶馆中有当地"方首"派的红旗老五，必须以盖碗茶杯送茶来（茶叶并不一定是红茶），同时拿一双筷子给来客，来客将筷子放在茶碗左首桌上，同时将茶碗盖子仰放在筷子左首。堂倌问："先生要吃什么？"来客应答："我要吃粮。"堂倌又问"先生从哪里来？"来客答："从山里来"（由山堂来之意）。堂倌又问："先生到哪里去？"来客答："从水路回家。"（意思是从山堂水香访自家人）。此时堂倌如果是当地"方首"派来的红旗老五（有的是执法老五代理），便称呼："您哥子府上哪里？"答："家住堂头乡（香）下"，（到此来客已

暗言完了山、堂、水、香四个字)。堂倌又问:"您哥子尊姓大名? 昆仲几人?"答:"兄弟姓某名某,弟兄八人,我是长房老几,或二房老几(八人暗示洪门内外八堂,长房指内八堂,二房指外八堂,老几指担任的职位)。现在民间常说的"你算老几?"来源于帮会黑话。

此时,红旗老五从来客的动作暗号和暗语中,已初步认定来者是洪门弟兄,点心或酒菜尚不送上来,再向来客说:"您哥如要解手,便所,我可领您去。"(便所暗示可以方便谈话的地方)。来客随即跟随堂倌去"便所"。凡"方首"设立的茶馆、酒店,都预备一个便于秘密谈话的空房间。

红旗老五(即堂倌)将来客领入密室内低声问:"你宝山的四柱? 老寨主尊姓大名?"回答是山、堂、水、香的名称和山主姓名。老五如认为四柱和山主姓名对上了"布票"(凭证),便约定晚间几时请到某处找兄弟细谈。到此,双方握手,认定为"自家人",并请来客入座,招待吃喝。如在茶馆,由客人要点心多少,如数送上。如在酒店,由堂倌送上二菜一汤,酒一壶,饭随量。吃罢,来客说:"请结账!"堂倌(红旗老五)说一声:"记账了!"来客不能说:"谢谢!"这又是暗号。来客晚间遵守约定时间,去访红旗老五,细谈来此任务。如欲见"方首"、"舵把子"等大哥接洽公务,均由红旗老五领见。如因山堂公事来访,不论住多少天,本"方首"都必须招待吃、住等,临走时还要送路费。如属于私人过路者,本"方首"招待食宿三天,临走时所送的路费,可到达下一有"方首"的码头。超过三天,送过路费,不再招待。

各种暗号

1.行礼——为了与洪门自家人联络,行礼时,左右双手,各以拇指直伸,食指(即第二指)弯曲,其余三指直伸,表示"三把半香"。然后双手以直伸三指尖,稍向上附贴胸前,行鞠躬礼。如对面为自己人,即作同样回答。

2.倒茶——向人倒茶,如接茶人以右手的拇指置茶杯边,食指置茶杯底向倒茶人相迎如图一;而以左手成"三把半香"形如图二;直伸三指尖附茶杯或向下附于右手,由拇指上面起,沿手臂至肩膀之间的任何一部位,接茶人必须以自己在洪门的地位放置如图三。这样,倒茶人一看便知道接茶人为"自家人",同时根据接茶人左手"三把半香"附于右手的位置,便知其在洪门组织中的职位。

倒茶者在倒茶后,必须将茶壶嘴向自己怀面旋转。如果壶嘴对着对方,就意味着双方敌对。

3.取物——如有人以物三件请客人取时,客人如果是洪门成员,就必须取中间的一件,谓之"忠臣"(中与忠谐音相同)。

4.三法连演——"三法"为"天地人"的含意。以左右双手各成"三把半香"形状,各以其余直伸的三指尖向内按附胸以表示"天",此乃第一法;将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及中指直伸,其余二指屈曲,左手和右手同样,按附胸前,以表示"地",此乃第二法;以右手的拇指与小指直伸,余三指屈曲,成表示数码"六"的形式,左手和右手同样,按附胸前,以表示"人",此为第三法。如此三法连演,以表示"三合会"的继承者即洪门成员。

5.告急——遇有紧急情况发生,需和洪门组织联络时,如在夏季,带白纸扇,当场以白纸扇慢摇三、四次,为召集近旁的同人;若扇过头顶轻摇三次,即暗示同人与外人斗争。

6.停止斗争——同人与外人斗争,在场者以手掌向外人,手背向同人,即表示需要停止斗争。

7.嗾使斗争——双方斗争时,见对方不肯让步,在场者以两手掌向外,连呼"勿要再打了",佯为劝解,实则嗾使斗争。如发觉对方为自己人,而与其斗争者尚不知道,则将两手掌向内,连呼"勿要打",即为当场劝解。这

种手掌向外或向内，称为“阴阳法”。

8. 求援——斗争时，如自知力量不敌，向自己人求援，即以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及中指直伸，余二指屈曲，手臂伸直向前，又以左手同样手式置于右手的肱骨（即手腕与臂弯之间）为求援的表示，称为“三角法”。

9. 求援又一法——如以右手的四指屈附于手掌，拇指附于四指外，成为拳形，置于头上，此为求援第一法；以右手掌向外伸直，左手成“三把半香”形，所直伸的三指尖，向内附于胸前，此为求援第二法。

10. 路中探询——行路途中，遇到别人向自己探询，则问：“你是瞎子吗?”如答称：“我不是瞎子”，继称：“我的眼睛比你大”，即知是“自家人”。

11. 手语——洪门在有些场合，不便使用语言进行联络，则完全使用手语，即以手指动作代替语言，这就与哑巴之间以手式交谈类似，如下图：

茶 碗 阵

洪门的茶碗阵也是暗号的一种形式，由于洪门这一民间秘密结社，常以茶馆为联络地点，茶碗阵作为联络信号是比较方便的。茶碗阵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用于鉴别对方是否洪门“自家人”；其次是遇到困难或危险时，向同人求援；第三是用于山堂之间的斗法或个人之间的斗法。

茶碗阵多达数十种以至百种以上的变化。在此仅举数例。

1. 单鞭阵（求援助）

布阵——以茶满杯，将壶嘴对杯。

破阵——如能援助，即饮杯中的茶，如不能援助，即倒去杯中的茶，再倒入饮之。

2. 忠义阵（鉴别对方是否“自家人”）

布阵——不用茶壶，仅以满茶三杯，平列或分次直列、斜列，但三杯要等距离在一直线上。

破阵——取中间一杯饮之。中与“忠”谐音，表示奉行“忠义”。

3. 斗争阵

布阵——以茶壶嘴，对平列三满杯，表示要与对方斗争。

破阵——如不应请，即取当中一杯饮之；如应请，即取三杯饮之。

4. 反清阵

布阵——以左、右分置四空杯，中间置一满杯。

破阵——任取一空杯，倒茶饮之。

5. 复明阵

布阵——以四满杯，分置于四角，当中置一空杯。

破阵——取当中的空杯倒茶饮之。

6. 桃园阵

布阵——以本满杯列为“品”字形。

破阵——任取一杯饮之。

7. 五虎将军阵

布阵——以壶嘴对平列的五满杯。

破阵——将五杯依次倒入壶中，再将中间一杯倒入茶饮之。

8. 梁山阵

布阵——以上横列三满杯，中横列五满杯，下横列二满杯，再下分“八”字式，左右各列八满杯。

破阵——任一边取一杯饮之。口中颂诗：

“头顶梁山忠义本，才取木杨是豪强。三八廿一分得清，可算海湖一能人。脚踏瓦岗充英雄，仁义大哥振威风。”

这首诗虽不合韵律，语句粗俗，谈不到文学艺术价值，但对照茶碗阵的摆法，却含蓄了一些洪门暗语。

这一茶碗阵的摆法，上面比作梁山，洪门以梁山忠义精神为榜样；全阵样式比拟为木杨城，洪门常以木斗比拟作木杨城，梁山阵类似木斗状；上面八满杯，下面左右各分为八满

杯，共有二十四满杯，但洪门的“洪”字拆开来却是：“三、八、廿、一，所以不称三八二十四，而称三八廿一。

9. **梅花阵**

布阵——五满杯与壶嘴相对

破阵——中心一杯不可饮，前面的可顺手饮一杯。

颂诗：“梅花吐蕊在梦中，五虎大将合英雄。三姓桃园来结义，又收常山赵子龙。”另有诗云：“十月梅花开，四方兄弟来。复明从此日，请主坐龙台。”

10. **绝清剑阵**

布阵——九满杯摆成桃李剑阵

破阵——将剑柄一杯倒入茶壶，再斟入茶，方可饮。口中颂诗：“联盟兄弟本姓洪，四海和圆共一宗。若有奸心无义子，动开宝剑实难容。”

洪门在各地区、各派别，茶碗阵的摆法大为不同。例如：广西东兰州天地会成员姚大羔所藏《会簿》中有关茶碗阵的摆法及破阵法，就是另一种类型。如其中的“桃园阵”：

此三杯，将中杯移上，吟诗二句：“桃园结义三兄弟，刘备关张共条心。”此三杯茶，中间杯可饮。即说：“黑龙过渡收了己(几)万人”。将头尾两杯倒在中杯，可饮。

此三杯茶，将上杯移下平坐，将移杯先饮，亦是桃园之茶。

姚大羔所藏《会簿》中记载了数十例茶碗阵及多种手式暗号，与别处资料记载有差别。其他文献资料及传说材料中也各有差别，反映出洪门会事实上未形成全国统一的暗号、茶碗阵之类。这些都反映了社会经济落后，交通不发达，洪门囿于地理上阻碍，组织上较分散，未能打破地区界限形成统一的联络信号。

路 途 暗 号

洪门会为了秘密活动的需要，处处以暗语暗号与同人联络，为了鉴别行路人中的会内、会外人员，常在路上画图或摆石子作暗号。路途上常用的暗号如下：

1. **盘蛇阵**

出门到外码头行路时见路中间画着一条蛇(如图)：会内同人一看便知这是当地“方首”派人布置的，或是过路弟兄为取得与同人联络布置的盘蛇阵。如要破阵，则以脚底(鞋底)抹去蛇头。同时唱诗歌一首曰：“天高地厚访相侔，太子皆因未出头。今日义兄来劫驾，恃强欺弱有天收。”

2. **圆圈阵**

洪门弟兄如果在外码头行路时，见到路上画一大圆圈(如图)：这是洪门弟兄布下的圆圈阵。会内同人如要破阵，即向前跨入三步，并口中唱诗歌：“姑嫂相逢在路中，乃是玉莲郭秀英。三汉河旁尽忠死，缘门恭奉为三英。”

3. **五石挡路阵**

洪门成员在外码头行路，如果发现路上整齐横列着五块石头(如图一)：

这是当地洪门的五石挡路阵。来客如要破阵，应当以脚将石头踢开二块排列在后(如图二)，同时，口颂诗歌：“五员大将平天下，同心一片保国家。万人同往金兰路，誓灭胡人归大化。”

当地“方首”所派遣的弟兄如看到有人破阵并听到诗歌，必然前来搭话。

4. **三石挡路阵**

洪门弟兄在外行路，如见到路上三块石头并列横排(如图)：

这是洪门布置的三石挡路阵。同人如要破阵，则以脚将边上一块石头移向前方(如图)：同时口唱诗歌：“三条大路通京城，孔明操练百万兵。桃园结义三兄弟，同心协力破曹营。”

也可颂洪门“划船诗”：“桃花开放万里香，久闻阁下是英良。天下英雄红花会，自己莫把自己伤。”

或颂“行船诗”:“太公八十识天文,共成其事释迦尊。三三两两会一句,三八二一共一宗。”

以上可见,洪门的路途暗号,是一种较原始的、简便的联络方式,其诗歌内容,有的结合洪门五祖、三英,有的结合桃园三结义,有的结合洪门的红花亭聚会,也有的联系到“封神榜”中的姜子牙和佛教的释迦牟尼,并含蓄了“洪”字拆字的“三八廿一”。反映出洪门的“文化”来源是既杂又乱的。

民国以来,洪门上述各种暗号,大都在商品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的地区或偏僻的乡镇使用,随着都市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发达,洪门的手式和某些暗号大都不用了,熟人见面时,以举手为礼。洪门手式以及其他暗号的逐步废除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帮会组织已“合法化”,或“半合法化”,洪门的秘密活动方式逐步淡化了。

盘“梁山”与盘“海底”

旧时代,洪门成员在江湖上活动时,为了摸清对方的底细,除了隐语、暗号之外,进一步就是各种问答,其问答的内容多种多样,但往往离不开盘问“梁山”与盘问“海底”。洪门以梁山聚义的义气作为“根本”,又以“海底”作为渊源。其实“海底”从洪门传说来看,是指郑成功创立洪门的《金台山实录》等秘密章程,而从研究洪门史的学术观点来说,“海底”的含意主要在于深奥莫测,或称为深奥难测。

盘“梁山”与盘“海底”的几种形式简介如下:

1. 清袍袱问答

以下每一问句都有“请问阁下”四字,在此从略。

问:有站无站?

答:有站。

问:站东站西?

答:站西(西北老人堂口)。

问:水旱二字站哪个字?

答:站水字(因当初关帝水擒庞德)。

问:站文站武?

答:站武。

问:玄斗二字站哪个字?

答:站玄字。

问:金木水火土五字站哪个字?

答:站金字。

问:威、德、福、自、萱、松、伯、一、枝、梅(有的不是梅字改为喜字)十个字站哪个?

答:站威字。

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站哪个?

答:站(按照自己步位)某字。

问:有爱无爱?

答:承蒙你老哥的雅爱。

2. 三请教问答

问:尊姓?(一请教)。答:(自己的姓)。

问:尊姓?(再请教)。答:(拜兄的姓)。

问:尊姓?(三请教)。答:姓“洪”(此为洪家的姓)。

问:为何一人有三姓?

答:父母所生一姓;随身拜兄一姓;咱们洪家一姓。所以兄弟一人三姓。

3. 梁山根本问答

问:梁山寨上好威风,千军万马逞英雄。宋江仁义高天下,才得招安成大功。请问你老哥从哪里来?

答:我兄弟从梁山而来。

问:是水道而来,还是旱道而来?

答:水旱两道而来。

问:水道见了多少滩?旱道见了多少山?

答:波浪滔滔不见滩,雾气腾腾不见山。

问:你老哥往哪里而去?

答:往梁山而去。

问:你老哥往梁山去做什么?

答:去看我的仁义拜兄。

问:梁山有多高?周围有几里?穿城又

有几里？

答：梁山有三百六十丈高，周围八百里，穿城四百里。

……（问答内容过于繁琐，在此从略）。

但是，洪门文献资料中，各种版本的问答形式和内容各有差别，例如另一种问答形式：

请问阁下梁山有多高？多长？几关？几卡？几酒店？有何景致？

答：好说，梁山有三百六十丈高，周围八百里长，四关、四卡、四酒店，均卖一种酒。上有宛子城一座，内设五堂：一曰仁义堂，二曰忠义堂，三曰信义堂，四曰恭义堂，五曰天王堂。前有金沙滩，后有鸭嘴湖，左有梭罗树，右有荷花池；梭罗树内有光棍，荷花池内有三教九流，菱子、莲子、九节子，统归宋大哥辖管。

算梁山问：

猛然想起梁山事，当初一时记不清，梁山可有多少重？不知宽阔在其中，请问梁山几多房？多少禁律多少款？多少条例在香堂？何人栽竹桥上走？何人台下逞英雄？金炉烧的什么香？多少香炉左右排？何人赐剑扶明主？何人宝剑刀下亡？算得清来真光棍，一字错误也不成。

回答：

手持算盘算梁山，算清梁山把账还，梁山重有二斤十三两五钱四分，九厘八毫不差分，三百三十六丈高，七百二十里路宽，西洞三十六条，东西牌坊七十二款堂，单人桥上我走过，观音栽竹桥边藏，左栽杨柳右栽竹，关公栽的仁义树，结交好友扶洪英，紫金台前逞威风，左边金炉烧沉香，右边银炉烧松香，三十六根来供奉，七十二根左右傍，王母赐你一支剑，除奸削堂血淋淋，无仁无义无明主，奸党之人刀下亡，我算梁山已完了，免得仁兄扯皮绊。

4. 盘问“海底”

请问：金山银山，你老哥打坐哪座宝山？

答：好说，金山银山是你老哥的宝山，鄙草山是〇〇山。

请问：金堂银堂，你老哥是哪座名堂？

答：好说，金堂银堂是你老哥的名堂，鄙草堂是〇〇堂。

请问：金香银香，你老哥烧的哪炷宝香？

答：好说，金香银香是你老哥烧的宝香，鄙草香是〇〇香。

请问：金水银水，你老哥吃的是哪座宝水？

答：好说，金水银水是你老哥的宝水，愚下吃的〇〇水。

请问：梁山上置有三十六把金交椅，七十二条银板凳，你老哥身坐哪一把金交椅，足踏哪一条银板凳？

答：好说，愚下外十派虚站〇字，内八步虚站〇字，……（略）。

5. 五阴六阳问答

问：何谓五阴和六阳？

答：原来三纲和五常，分开五阴并六阳，地为阴来天为阳，月为阴来日为阳，母为阴来父为阳，太阳照出星斗光，瓦岗阴来梁山阳，鸡爪山只半个阳，坤为阴来乾为阳，乾坤八卦定纲常，群臣父子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五常，君为臣纲国富强，父为子纲振家邦，夫为妻纲乐安康。

这一“五阴六阳问答”中，最明确地反映出封建主义的纲常礼教，封建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对洪门有严重的影响。

6. 三根半光棍条和三根半光棍问答

(1)三根半光棍条

第一光棍本姓孙，他保唐僧去取经，筋斗十万八千里，十二金仙谁不闻；第二光棍本姓李，他去北海把澡洗，手拿一个乾坤圈，脚踏风火轮如飞；第三光棍本姓赵，打尽天下逞英豪，走关东来闯关西，后来陈桥加黄袍；半个光棍本姓洪，五湖四海访宾朋，三山五岳都走到，三八二一共一宗。

从上述“三根半光棍条”中，可看出，洪门本是民间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文化水平低，

提不出高深的文化思想见解，在它的文化思想中，大量吸收了民间文学和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洪门会将古典小说、民间文学及历史上的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故事，七拼八凑，加以歌颂。就在这“三根半光棍条”中，被歌颂的有《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封神榜》中的哪吒，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洪门传说中的始祖洪英。将孙悟空、哪吒、赵匡胤称为三光棍，而洪门始祖倒只称为“半个光棍”。其逻辑有时相当混乱。

(2)三根半光棍问答

问：请问阁下棍有几根？

答：天下有三根半。秤杆算一根，能知轻重；赶面棍算二根，能知厚薄；笛子算三根，能通七窍；骡子后楸算半根，根本稳当。

问：你阁下玩的是棍，讲的是棍，你头上剃的那样光，辫子五股混成三股，眉毛为何一粗一细，眼睛为何一大一小，鼻子为何一个窟窿出气，一个不出气，耳朵为何一个向前一个向后，这有何道理？

答：愚下玩的不成光，讲的不成棍。辫子五股混三股，昔日火烧少林寺，五股烧掉二股，余下三股，留与桃园三结义；眉毛一粗一细，咱们弟兄粗中有细；眼睛一大一小，咱们弟兄有大有小；鼻子一个出气，咱们弟兄一个鼻孔出气；耳朵一个在前一个向后，是招财童子，扭转乾坤。

这里的“三根半光棍问答”竟然与前面的“三根半光棍条”，没有任何联系。除了辫子三股“留与桃园三结义”之外，其余的问答更是杂乱无章。

7. 盘底问答

问：请问阁下在何处发烛，在哪座名山得道，拜兄头上何人？

答：兄弟在昆仑山发烛，罗浮山得道，洪始祖相传，老拜兄二人。

问：何谓插柳上山，上山插柳？

答：步步超群，是插柳上山；一步登天，连升三级，是上山插柳。

问：何谓“指日”与“红日”？

答：“指日”是东升之日；“红日”是西坠之日，又日出为东，日落为西。

8. 木阳(杨)城问答

问：哪里而来？

答：木阳城而来。

问：你可知木阳城何人所造？

答：洪祖所造。

问：你可知洪祖死在何处？埋在何方？

答：我兄弟闻听老大哥言道：死在郸成县，埋在卧龙岗。尹木山，乾山巽向。

问：你在洪祖坟前见过什么景致？

答：只见一块碑。碑上有九个大字。……“仁义过天，昔日安天下”九个大字。

问：你可知木阳城有多高，有多少垛口？

答：……三十六大垛口，七十二小垛口。

问：木阳城什么为大？

答：洪祖为大。

问：什么为多？

答：粮食为多。

问：什么为轻？

答：五色花羢为轻。

问：什么为重？

答：盾牌棍为重。

问：什么为长？

答：义气为长。

问：你在那里做什么？

答：兄弟闻听老大哥开山立堂，登台点将，在木阳城扯旗挂帅，三山五岳哥子，三教九流文士，五湖四海高人，海角天涯的能人，龙华大会群仙，我兄弟特在哥子处站班。

洪门各文献资料中，对于“木阳城”的解释是混乱的。有的是“阳”字也有的是“杨”字。又“木斗”插有旗帜，“用以参拜唐太宗李世民，此为宗教的仪式，以使后人知清朝必亡，但须洪门的同人努力。”

“木斗”(即“木杨城”所插旗帜，除中间为“三军司命”旗外，两边各插五旗，代表“前五祖”与“后五祖”，又五旗，代表“中五祖”。

上述对“木阳城”的解释，虽然与取自《金不换》的“问答”内容、角度不同，但至少并不矛盾。然而，在有的史籍中的说法却与上述解释大有矛盾。如《汉留全史》中说：“木阳城意义，木属东，阳者当阳也，即言东虏当阳，吾汉旗应群起而打倒之也。攻打木阳城，为洪门最重要典礼。”

这里明确指出木阳城为敌方的城，洪门史籍中有多处提到“攻打木杨城”，而又有多处标榜保卫木杨城。保卫木杨城诗歌为：“木杨城内有三重，花红宝珠在其中。干戈壘壘扶明主，大清世绝尽归洪。”又如：“唐王始立木杨城，云龙重修显威名，灭清四海皆宁静，尽把胡人一扫平。”又如：“木杨城内八营兵，当天结拜为朝廷。君须有义存君正，四海九洲尽归明。”这都是歌颂木杨城的。

以上洪门的盘梁山与盘海底，都属于盘问的形式，盘问的内容和形式随场合不同而不同，几乎任何场合都有盘问的问答内容。特别深入细致的盘问或故意找麻烦的盘问，称为“皮绊问答”。这些复杂、繁琐的盘问，是洪门在江湖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出洪门思想文化的一些特点。这种问答的目的，主要在于辨别对方是否会内弟兄，防止奸细冒充洪门会员，但并非仅仅为了这个目的，而是要通过这些问答，对洪门会员进行纪律教育、精神教育和道德信念的灌输。它在文化水平低的会员群众中，能够起到精神约束和加强洪门内聚力的作用。

江 湖 交 结

洪门人员在江湖上联络同党、交结洪门弟兄，除了上述办法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交结诗，择其主要者列述如下：

1. 出山交结

“日出东方一点红，秦琼跨马过山东，跨下一匹黄骠马，五湖四海访仁兄。秦通六国访伊尹，文王渭水访太公，张良背剑访韩信，刘备关张访孔明。敬德曾把白袍访，孙权自出访周郎。天上英雄访英雄，地上豪杰访豪杰，惟有兄弟无处访，今日幸得遇仁兄。义兄之恩无处寻，中心钦服喜不胜。只是兄弟交结不到，过门不清，尚望海涵海涵。”

2. 四十八句总交结诗

“手提算盘重几斤，推算木阳城内几十宗，高溪庙内三层佛，招军旗下五堆烟。旗竿之上红光现，桃李乾坤一统归，三关六将保九佛，内有洪家兄弟扶圣君。燕盘广植仙人板，白石香炉有缘因。溪汰红花白云连，天赐少林寺，又有万云龙，七星八卦不非轻，四九三召五本同。披发当头座，头戴方巾一点红，身披袈裟铁罗汉，双龙宝剑在其身，始祖本是洪殷盛，祖母金丹有名声，高溪庙内观音佛，外有关公显神灵，花溪之中逢手段，五祖命令坐当中，复转仁义礼智信，重新日月立乾坤，号江洪，内附塔，印信彪戅、彪、彪、彪。韩龙韩虎李国昌，头门披守万云龙，七盏明灯分左右，五阴六阳定分明，……桃花镜子金交椅，太平毯子一色新，钢铁桥上兄弟过，抬头一望木阳城，松柏堂前分大小，桃李树上共一宗，千年仇恨虽要报，扭转乾坤归一统，福德寺内把愿许，公义堂上起英雄，兵饷根源真悟事，原来一百零八层，若问木阳城内根源事，四十八句逢对清，可算一位好英雄。”

“请问到哪里去？”问。

“到木阳城去。”答。

“可有公文牌位？”问。

“有！”答。

“有在哪里？”问。

“左手为票，右手为牌，合掌为印，良心为凭，口为号令。”答。

“有何为证？”问。

“有诗为证。”答。

“何诗？”问。

“五祖赐我天下同，文凭藏在我心中，位台若问根源事，三八二一共一宗。”答。

3. 送行交结

"我与大哥来送行,恭祝大哥赶路程,旱路得财宝,水路遇顺风,孔明台上祭东风,刘备古城遇关公,你哥哥好比得胭脂马,人是猛虎马是龙。"

4. 赞刀

"此刀不是平凡刀,老君炉内炼宝刀,炼了七七四十有九天,一共炼成三把刀。一把刀,关公青龙偃月刀;二把刀,杨戬救母刀;三把刀,赐与咱们兄弟曹。我兄弟一不斩猪,二不斩羊,赐与兄弟斩凤凰,有仁有义刀下过,无仁无义刀下亡。"

5. 大小通用

"你老哥不看一山看二山,不看芙蓉看牡丹,你老哥格外海涵海涵。"

这是关于大小通用的帮中术语。只要是入帮的人,都应掌握这两句通用术语。

6. 洋烟开火

(洋烟即鸦片烟,招待客人的装烟者照规矩故意缺最后一道通孔手续,以检验客人是否洪帮自己人。)

"周郎设计用火攻,孔明台上借东风,子龙惯使长枪技,关公得令会华容,非是兄弟见识浅,如何阳关路不通。"

装烟者听到客人诗词无误,立即接过烟枪,口中唱道:"……子龙施展长枪技,杀开大路破曹兵"。完成最后通孔手续,客人就火吸烟。

7. 红旗安会

"天皇皇,地皇皇,此处立的公义堂,上面坐的刘皇叔,下面坐的关云长,左边坐的张将军,右边坐的诸葛亮。关平周仓提刀印,站在两厢不离身。坐堂大爷当头坐,陪堂盟监在两边,礼堂执堂坐两位,佐台盟兄入三堂,少坐一时把令下,提身调将公议堂。"

以上交结诗歌仅仅是洪门大量拜码头或梁山大典交结诗歌中的数例。旧时代,洪门为保秘密活动不被官府侦知,各码头间互相联络时,在互不相识时,为了严防对方假冒洪家兄弟,即以诗歌形式盘诘,如果对方对答如流,词句无误,礼节无差,即可证明是洪家人,应给以热情招待,彼此以家人相视。

上述诗歌特点:第一,俗、粗、浅、陋,反映出文化水平较低;第二,许多内容来自民间文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等等以及民间的传说;第三,多有词句内容上的重复,仅求得大致压韵,有时文理不通。

这些也正是民间"俗"文化的特色。在歌词中,提到关公、五祖、刘关张、秦琼等较多,尤其崇拜关公,关公成为各类民间下层秘密结社共同崇拜的神,在这一点上,从文化史角度看,属于民间下层的神缘文化。

凭证、旗帜

洪门会在清代进行秘密活动,最担心自己的组织情况被官府侦知,为了防止泄密和防止奸细混入会内,除了使用隐语、暗号之外,还使用"凭证"、"旗帜"。洪门会的凭证不同于当今许多合法团体的证件。洪门的凭证仅供会内成员识别真伪,故意使外人看不懂,以便隐瞒其真实性质。早期洪门会中的凭证,为了不被外人识破底细,故意伪照宗教中惯用的形式,伪装成"合法"的宗教团体的凭证。在字句上故意弄些颠三倒四的句子,使会外的"空子"(洪门对会外人的称呼)看不懂。

早期洪门的"凭证"为了收藏携带方便,常用布制成,故又称"票布"。当甲地会员赴乙地组织中联系工作时,甲地会员为证实自己的真实身份,以消除乙处组织对自己的怀疑或误会,在运用暗号和盘梁山、盘海底问答之后,亮出"凭证"作为证据。乙处组织在接到凭证之后,惟恐被官府搜去,往往看后立即烧掉,绝不"存档"保存。

早期洪门凭证多种多样,采取八卦样式的较多。其中有些凭证十分复杂、繁琐。后

来,随着工商业和贸易的发达,洪门凭证多以某某公司的入股书的样式为掩护,其隐蔽方式更为巧妙。

以上《凭证》上的文字解释如下:

第一幅(腰凭之一)为七言诗四句:

"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

自此传得众兄弟,后来相认团圆时。"

中间插有"瓢"、"飄"、"日"、"月"四字,"家后"二字未知何意。飘"日"是"复明"的含意。

第二幅(腰凭之二)与前者诗句相同,所不同处为左上角"漶"字系"忠、心、义、气"拼成的。右上角"䙴"字,系"千、变、万、化"拼成的。

洪门的旗帜,也是一种暗号的形式,它有隐蔽含蓄的意义。洪门旗帜多式多样,如图一、二、三。

洪门天地会《插旗诗》如下:

福建乌旗第一枝,甘肃起义始开基。"彪"字金兰传四海,一九江山谁敢欺!广东红旗第二枝,高溪分开两胡时,"寿"字根机成九四,四九变化自相依。云南赤旗第三枝,四川起义灭胡儿,合成"洪"字为暗记,君臣自有太平时。湖广白旗第四枝,广西贵州共此旗;"和"字结拜来起义,恢复江山主登基。浙江绿旗第五枝,山东兄弟暗扶持;"同"祭此旗来起义,复转明朝团圆时。

这首《插旗诗》反映出洪门分别在各地举行起义,其政治目的是"反清复明"。

以下旗帜之一、之二、之三是将洪门的许多旗帜中,选择的三种类型。其中第一旗,系遍游天下的通旗,第二旗系"军令",第三旗系"将令",周围有"川"、"大"、"丁"、"首"四字,系"顺、天、行、道"四字的减笔,即"川"为"顺"的偏旁,"大"为"天"字少一横,"丁"为"行"字的一部分,首为"道"字的一部分。共三十四旗,在此仅选三旗样式。

从洪门天地会的旗帜和《插旗诗》中,可看出,洪门的旗帜与洪门起源及其首领分头赴各地发展组织的传说是一致的。学术界有人认为洪门早期仅是互助团体,是否有"反清复明"的政治要求,还有待于发掘史料,进一步考证。而《插旗诗》中却明确有"四川起义灭胡儿","复转明朝团圆时"诗句,但据学术界多种史料查证,洪门天地会"盟书"和"会簿"中出现"反清复明"口号,是嘉庆以后的史料。由此,可以推断,这些洪门凭证、旗帜及《插旗诗》等大约都是嘉庆以后的产物。

文字的奥秘

洪门因属于当时"非法"的民间秘密结社,各种活动都十分秘密,稍不留心,为官府侦知,就要被逮捕、杀头、绞刑甚至株连亲族。因此会内使用的文字也以特殊形式加以创造,也成为保密的暗号。如字去偏旁,或改偏旁,减省笔画,或变换形体,或代用名字,数字合编,或拆字为句,或以数目字码为暗记,兹举例如下:

1. 去偏旁字

"川大丁首"为"顺天行道"。"川大车日"为"顺天转明"。

2. 改偏旁字

"反汌汌复汨"为"反清复明"。"彪寿合和同"为"彩寿合和同"。

3. 减省笔划字

"关井足王"为"关开路现"。

4. 变换形体字

"飄兴瓢旺"为"天兴地旺"。"龙虎龟蛇㕯"为"龙虎龟蛇会"。"滲渀浤溌"为"参太宏化"。

5. 代用名字

"兴孙唐气碧"为"天日月云星"。

6. 数字合编字

"䖏"为"结万为记"。"泇"、"咋"、"湦"为"洪顺堂"。"龕"为"金兰郡"。"稖"为共同和合"。"䵻"或"漶"为"忠心义气"。"闳"

为“一片丹心”。“爝”为“顺天行道”。“𢖍”为“反清复明”。

7. 拆字为句

“三八二十一”为“洪”字。“三六”为“天”字。“七二”为“地”字。以“三六”与“七二”的合数“一百八”代“会”字。取“天有三十六宫，地有七十二魔”之意。

“金兰结义”四字，拆编诗句为：人王头上两堆沙，东门上面草生花。丝线穿针十一口，羊羔美酒是我家。

8. 数目字码暗记

“三六”为“新会员”，“七二”为“各头目”，“一百八”为“大总理”即“总首领”。

“双”为“洪”字。“88”为“英”字，“炆”为“通”字，“㕛文”为“大哥”，“炆”为“香主”，“火川”为“白扇”，“刈”为“先锋”，“x = 1”为“红棍”，“x – 8”为“草鞋”。

附至今沿用文字

“彪彪彪彪彪”为“先圣”的官爵，即所谓“公侯伯子男”，洪门以为“五路先锋”，或称为“五路统帅”。

洪门的文字，如上所举的种种暗记，反映了洪门会众多属下层社会人员，文化水平低，也只能创造一些低层次的暗号；同时也反映出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即当时没有密电码，他们没有更好的保密办法来传递信息。这些文字暗号中也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有些如符咒术语，会员相信其能够避恶驱邪。适应广大会员的文化心态。

洪门第一次大规模起义

林爽文起义是洪门天地会在台湾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是天地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从林爽文起义的档案史料中，并未发现与郑成功在台湾开金台山明远堂创立洪门的传说有任何联系，也未发现有台湾洪门天地会与郑成功的关系。相反的是，发现台湾洪门天地会来源于福建，在福建的创始人是洪二和尚和一位姓朱的。第一位将天地会传入台湾的人是福建漳州平和县人严烟。据严烟被清政府逮捕后所供，他以卖布为生。乾隆四十七年(1782)，同村有位行医的陈彪，系广东人，劝人入天地会，严烟随同入了会。于乾隆四十八年，到达台湾，在漳化地区开设布铺，也时常介绍别人入天地会。凡入会者，通过香堂仪式，“在刀剑下鸣誓”。“遇有事情，同教之人大家出力，公同帮助”。“相约见人伸三指，并有洪字暗号，口称五点二十一，便是同教之人。”凡入会者“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既然有这么多好处，所以“愿入这会者甚多。”会内密传暗号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据严烟称“这就是天地会的根由。”又据严烟称：“同会所称洪二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的总称。”会内相传，天地会创始人为朱、李二家，最早起会地点在四川。但当时清政府根据严烟供词中提到的人物四处追捕查办，结果查出林应伟收藏会簿，内有“顺天”、“李朱洪”、“五点二十一”以及“祖万大哥”等句。据清政府缉捕的与天地会有牵连的许多人供词追查，洪二和尚万提喜系福建漳浦人，为天地会创始者之一。万提喜死于乾隆五十三年，清政府当局“刨验骨殖属实”。向台湾传播天地会的严烟，为万提喜所创福建地区天地会的后辈之一。

林爽文起义发生于“康雍乾盛世”的乾隆年间，这正是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受剥削压迫加重，社会主要矛盾——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趋于尖锐的时期。当时的台湾也与大陆情况相似，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日益贫困，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雇农，更加遭到残酷剥削。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无业游民，无业游民增多，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另一方面，统治集团奢侈腐化普遍成风，文官贪赃，武官克饷，这种吏治腐败的风气，转移到社会经济上，就更加重了人民生活的苦难。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富者日见其富，贫者日见其贫”。

这一时期，台湾出现了许多独霸一方的大地主；同时在台的大小官员，也争先抢占土地。由于地主豪绅与官府勾结，大量隐瞒土地，结果重赋大多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形成“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田去赋存的情况很多。清政府在台湾征收的田赋，比内地重一倍。租赋之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广大农民不堪忍受。这就成为林爽文领导的

以天地会为核心的大起义的主要原因。

这次起义有其导火线。天地会经严烟等人传向台湾之后，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清政府当局长期来并没有注意到天地会的存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七月间，诸罗县九芎林地方发生的部分天地会员与雷公会的一次械斗，使清政府察觉到天地会的存在，由此引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大规模起义。从此清政府认识到天地会的势力不可低估，开始把天地会视为洪水猛兽。

原来，台湾诸罗县的九芎林地方有位捐款买到州官职位的杨文麟，他有一位义子杨光勋(又名功懋)，又有一位亲生儿子杨妈世(又名功宽)。杨光勋与杨妈世争夺财产，杨文麟溺爱妈世，将光勋分居于数里外的石溜班。每年给予一定的钱和粮食，但光勋不敷花用，父子兄弟之间时常因争夺财产而吵闹。乾隆五十一年六月间，光勋纠集一帮人，潜入文麟卧室搬取财物，被妈世发觉，率领一帮人将光勋一伙赶跑。光勋更加忿恨，于是想结会树党，到秋收时节到妈世田中抢割稻谷。遂约了好友何庆为他主谋，组织了添弟会。妈世听到消息后，也以结会树党相对抗，约了潘吉为他主谋，组织起雷公会。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等得知杨氏兄弟结会图谋相斗的消息，即派遣有关人员前往缉捕。……杨光勋等侦知添弟会重要成员张烈被捕，即纠集数十人，各执刀棍，前往放火劫囚，夺走张烈，并杀死把总陈和人官兵。之后柴大纪等带领兵役驰往诸罗，会同督饬文武官员分路查拿，在诸罗及彰化县境内陆续拿获添弟会劫囚首从要犯杨光勋等，雷公会伙犯潘吉等，计八十九名，分别处死或充军。添弟会与天地会本是统一的。张烈、赖荣、叶省、蔡福、张圆等天地会主要骨干及其他会众则纷纷逃向彰化县大里杙。大家推举林爽文为首领，发动起义。

大里杙是台湾彰化县东二十里的一个村庄，纵横各有五里，“四面有溪水、毛竹，大树丛密，可容万人，离生番(台湾高山族)界有二十多里”。该村庄有肥沃田地百里，粮食丰富，不求外援。天地会成员逃到这里，拥护林爽文率领大家建立根据地，举兵对抗官府。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平和县。父林劝，因贫不聊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挈妻子来到台湾，在彰化当雇工，住在大里杙庄。林爽文兄弟四人，林爽文为老大，其弟为林勇、林跃兴、林垒。林爽文成年后，在台湾充当过彰化县役，但主要以赶车谋生。他为人慷慨，不吝钱文，交结一些青年穷朋友，凡有人坐牢，林爽文总要解囊相助，乡人受到感动。严烟于乾隆四十九年在彰化溪底阿密里庄遇见林爽文，林爽文经严介绍入会。由于林爽文平日在群众中威信较高，所以入天地会后，很快成为头目。

天地会群众在大里杙推举林爽文为大哥，充当总头目，以大里杙为根据地，建立起领导机构。以林泮、陈奉先、王芬、刘升、刘礼生、严烟、董喜等为领导机构的核心人员。又以陈泮、李乞(即李七)、张圆、阮和、蔡福、叶省、赖达、何有志等为羽翼。又以林琴、林水返、林领、林绕等，经理粮储或制造器械。此外还有杨轩、高文麟、杨振国等数十人充当各种头目。短期内，大里杙聚集了数千会众。随即筹集粮草银钱等军需物资。联络和发动高山族人民。

同时，南路的天地会首领庄大田，也与大里杙遥相呼应准备起义。庄大田，原籍福建平和县，乾隆七年(1742)随其父庄二到台，居住于诸罗县，其父死后，迁居于凤山笃加港。他勤于耕种，为小康之家，加入天地会后，与林爽文联系密切，成为莫逆之交。当南路得知北路的林爽文起事后，随即推举庄大田为首领，以庄大韭、庄大麦、庄锡舍、王抗郎、简天德、许光来、李惠等为领导核心人员，举行了起义。

林爽文起义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二十七日，起义在彰化爆发后，以数千之众连战告捷，利用雷雨掩护，攻克了彰化城。占

领彰化后立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建号“顺天”,林爽文被推为大盟主、盟主大元帅。设立机构,分封官职,以杨振国为副元帅,高文麟为管海口总爷,王芬为大将军,陈泮、何有志为左右都督,陈奉先为军师,侯老为谋士,刘贤士为海防同知,林光为理番同知,刘四为彰化知县,林与为先锋,林仓负责支放军粮,杨轩负责军务。林爽文开仓放粮,打开监狱,放出“犯人”,并出榜安民,榜文中称“诛杀贪官,以安百姓”。随后,分兵南北进击。南路攻诸罗,北路攻淡水。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清军不战而溃。起义军攻占诸罗与淡水后,林爽文又连发安民告示,宣布“今据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以救吾民,特兴义兵,当天盟誓,不仁不义,亡于万刀之下。”这时南路天地会首领庄大田等在凤山树起“顺天”大旗,广招部众,起兵攻克凤山县城。庄太田自称南路辅国大元帅,其下设有副元帅、将军、先锋等职。庄大田转战南路,连续攻克许多县城。南北起义军于一月之内席卷台岛。起义军南北两路合攻府城。

起义军以扬长避短,利用夜战、雨天突然袭击,起义军在爬山越岭涉水越河等方面远优于清军。起义军迅速取胜的原因主要在于:人民尤其是农民受剥削压迫深重,对清政府不满,而天地会组织在当时宣传和组织群众反抗清政府方面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起义初期,起义军占优势地位。

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军,一方面不断从大陆大力调遣军队援台;另一方面在台湾各地大肆招募乡勇、“义民”,建立地主武装对抗起义军。在招募乡勇、“义民”武装方面,进展颇为顺利,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利用了民间存在的地区间、宗族间械斗的恶习。在林爽文起义前,台湾曾发生过漳州籍与泉州籍的民众间的大械,由于粤东与漳州地区在语言及习俗上相近,粤东籍的民众也卷入械斗,帮助漳州籍者。清政府利用了民间械斗的无限度的报复心理,招募了大量的地主武装对抗起义军。

起义军方面也作了一番调整和准备,在战略上:起义军在清军援师大批渡台前,林爽文当机立断,“舍城而争险要之地”,对于截击和牵制敌军主力,起了一定的作用。起义军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并控制了许多交通要道。这些战略部署是比较正确的。

在战术上:起义军注意扬长避短,例如昼伏夜起,冒雨进攻,并且在情报方面优于清军。

在策略上:起义军比较注意争取敌占区群众和瓦解敌军。通过阵前喊话宣传以乱敌军军心。通过文告争取民众。但起义军在战略和策略上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战略上兵力过于分散,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各个击破;策略上,未能从群众切身利益(主要是物质利益)方面争取群众,更没有提出解决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的政策和口号。

这一阶段,历时十一个月(自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底至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击溃清军援师数万,杀死杀伤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营官百余人,打退了清军数十次的反扑,坚守了大部分地区。可见,起义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成绩是主要的。

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的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海坛镇总兵郝壮猷等一一被打败。乾隆帝发出谕旨:以黄仕简、任承恩“调度失宜”、“贻误军机”,解刑部治罪;将郝壮猷于军前正法。又诏湖广总督李侍尧调任闽浙,湖广总督常青渡海督师,常青又派福州将军恒瑞等统兵渡海支援。仍然被起义军打败,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乾隆帝又愤而解除了常青、恒瑞的职务,以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嘉勇侯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拣派曾经战阵的巴图鲁、侍卫一百余人,征调十万大兵,米粮百万余石援台。从此,清政府在军事力量上占了优势,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清政府方面,吸取了前阶段军事失利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三项决策,第一,厚集兵力,征调各兵不下十余万。第二,充分拨运军饷弹

药。第三,确定了集中力量先平台湾北路后平南路的作战方针。

清政府援军渡台后第一步先集中力量解了诸罗之围。诸罗解围后,曾在大里杙展开一场激战。林爽文率数万部众迎敌,未能取胜。此后集集埔战役成为决定性一仗。集集埔为内山隘口,前有大溪天险,四周崇山峻岭,林深竹茂,路径丛杂。福康安等乃督广西、贵州、四川屯练兵增援。屯练兵泅水而过,攀援而上,推倒石垒,拥入墙内,枪炮齐放。起义军奋勇抗击,因众寡悬殊,抵抗不住,牺牲惨重。从此,起义军的战斗力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又对起义军内部进行了分化,引诱杜敷等将领投降,破坏起义军的后方。

至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底,清政府拉拢台湾少数民族,袭击林爽文的后方。同时清兵由隘口“分路进山,连夜追赶”。27日,在狮子头社地方,山沟内,起义军“尸横遍地,数里不绝”,而河内淹毙的也很多。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四日,起义军大盟主、大元帅林爽文、都督何有志等在老衢崎被俘。

清军平定北路之后,又集中兵力向南路起义军围攻。2月5日,南路起义军首领庄大田等及其家属部众共八百余人被俘。庄大田于押解途中病死。林爽文等于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十日,被清政府在北京菜市口凌迟处死。一场轰轰烈烈的天地会领导的农民战争,宣告失败。

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它历时一年零四个月,控制了台湾岛平原地带的绝大部分,建立了政治机构,创立了年号。清政府为镇压这次起义,耗费的军费竟达全年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动用了全国七、八个省的军队。可见这次起义对清政府的统治起了重大的震撼作用。但另一方面,天地会创立后至少已活动二十多年,波及到南方广大地区,而清政府第一次发现天地会的组织并认识到天地会潜在力量,是从镇压林爽文开始的。虽然这次起义并没有提出推翻清政府,夺取国家政权的政纲或口号,仅提出反贪官污吏的斗争目标,但清政府却将这次起义定为叛乱的性质。在镇压林爽文起义过程中,乾隆皇帝对天地会组织采取了斩尽杀绝的政策。在镇压了这次起义后,清政府修改了《大清律》,规定了对天地会“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这就是说,凡参加天地会者,一旦被捕,必处以杀头或绞刑。这虽然是针对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台湾彰化县的林爽文余部张标、谢志等人于乾隆五十五年发动复兴天地会的活动而订的,但却通用于镇压全国各地的天地会活动。这样一来,各地天地会活动遭到沉重打击。这便成为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天地会活动虽然此起彼伏,但规模都不大,活动都比较分散的主要原因。以至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为了对付清政府的查拿而不断改换名称,出现了如三点会、三合会、小刀会、仁义会、双刀会……。

林爽文起义发生于乾隆“盛世”,这与起义口号仅提出反对贪官污吏,没有能够以推翻清朝统治为政治纲领,是分不开的。此后,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统治走向衰落,政治更加腐败,于是天地会文件中才出现了“反清复明”的口号。从林爽文起义的大量史料中可看到以往史学界许多有关论著中认为天地会一贯“反清复明”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就以林爽文起义来看,并未发现其“反清复明”的纲领口号。

洪门与太平天国

有位洪大全，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一说湖南兴宁县人)。原名焦大，又改名焦亮。生于清道光二年。早年聚众创立天地会，活动于两广地带。道光三十年十二月，洪大全与以后成为太平天国天王的洪秀全相会并结拜为兄弟，因以洪秀全为弟，故名大全。这时洪秀全已为举行金田起义发布了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会会员到桂平县金田村集中编队，积极准备起义。次年一月，洪秀全领导了金田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三月间，洪秀全在广西武宣东乡，被部属推举为天王，并分封五军主将。此时，洪大全被封为天德军师。洪大全以诸葛亮自居，故改名焦亮。太平军攻克永安后，洪大全又被晋封为天德王。为了宣传恢复明朝衣冠，将“天德”画像广播于众。而后来出现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洪秀全像”(无胡须者)，其实是洪大全像。太平天国创营制，定官制，整军律，秀全“事无巨细，必决于大全而后行”。由于洪大全是以天地会首领的身份与洪秀全合作的，天地会在嘉庆之后政治上提出了“反清复明”主张。太平军初起时，军中分为“复明派”和“耶教派”，洪秀全是总首领，而洪大全为“复明派”的首领，以天地会等组织为其支持者。洪大全所定的官制、礼制以及一切政治、军事，十之八九取法于周代，这是由于“复明派”推行的是反满复古的主张。大全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秀全。洪秀全在制造符命，制作“朝天朝主图”时，多次利用“三八二十一”等天地会的暗号，这与洪大全为首的天地会的影响有关。太平天国以假想的天德皇帝为总首领，在天德皇帝之下，太平王洪秀全代表上帝会，天德军师洪大全代表天地会，名义上地位平等，但由于洪大全没有军队，所以没有掌握实权。”太平军于永安突围时，洪大全被清军俘虏，于1852年被清政府杀害。

有关天地会首领洪大全与太平天国的关系问题，学术争论颇多。其中有人认为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完全是清方捏造出来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认为洪大全被俘后的供状是清钦差大臣赛尚阿等伪造的。认为“天地会并没有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里面也没有一个代表天地会势力的人物参加”；“太平天国始终都是主动地争取天地会加入”，“完全没有如同有些人所说自洪大全被俘后太平天国就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参加”。指出天地会文献证明“天德”乃天地会起义所用的年号，“天德皇帝”乃天地会起义假托的皇帝，当时并非实有其人，洪大全死后天地会尚以“天德皇帝”作号召。罗尔纲考证了洪大全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囚犯，真姓名叫焦亮。但认为焦亮是天地会系统招军堂的山堂领袖。又有学者经深入研究，认为洪大全并非太平天国的“渠魁”。他很可能是活动于广东、广西、湖南一带的天地会首领，有条件自称为天德王。在当时天地会中，自称元帅、军师，稍后称王或其他名号的，不是个别现象。在太平军永安突围的

紧急情况下，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洪大全“故着囚服，以自别贼党而冀幸脱”是可能的。数年后，罗尔纲经进一步研究，指出：焦亮（1823—1852）即洪大全，湖南兴宁人。湘、粤、桂天地会起事时，他加入天地会，开招军堂。在永安投太平军，洪秀全留备顾问。因不赞同太平天国建制封王、反孔改历及用天父天兄之“妖言”教育军民，谏而不纳，出永安时为太平军所拘。太平军突围时，焦被清军俘获，解送北京杀害。

尽管有关洪大全的说法有很大差别，但却反映了洪门天地会的领袖人物参加了太平军起义。

洪秀全利用了基督教的宗教色彩创立了拜上帝会。它与宗教色彩不浓而民族主义色彩极浓的天地会似乎大相径庭，其实他们本属“一家人”。拜上帝会初名天帝会，为天地会的一派。洪秀全初年诏檄，自称是宏光皇帝之七世孙，与天地会同奉洪英为祖宗。天地会员证上有“太平”、“二房在广东红旗洪太岁”等字样，亦是洪秀全与天地会关系密切的旁证。洪秀全拜天为父，这是天地会本来就有的。然而洪秀全的天父天兄之说是他所独创的，天地会没有这种说法，这正是以后洪秀全与天地会的分歧。起初洪秀全为团结天地会会员而避免天父天兄之说时，大批天地会会员参加了太平军。以后天地会员发现信仰上有分歧，就逐渐脱离太平军，投入湘军中去了。天地会本来也是将洪秀全及其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视为“一家人”的，其中的一个重要证据即是咸丰年间的洪门《三十六誓》的抄本中，在誓词后面抄有洪秀全的来历。这一抄本为洪门会成员流传于会内的秘传“文件”，将洪秀全的经历放在誓词后面，显然是将洪秀全当作洪门英雄人物或领袖人物看待的。台湾学者则认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系承袭了天地会势力，拜上帝会亦由天地会改名而来，在倒满兴汉的号召下，各地会党遂同时蜂起响应，为太平天国作前驱。太平军既克武汉，洪秀全等不循汉水以趋汉中，而却沿江东下，定都南京，即因天地会的根据地主要在南方；其后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伐，其失败的关键固然是由于孤军深入，后援不继，而北方缺乏会党的接应，为太平军作前驱，亦为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在“反清”的共同宗旨下，彼此呼应合作，但洪秀全不同意“复明”。由于彼此意见分歧，致使对天地会之举义响应者，不积极援助，任其被消灭。厦门小刀会及上海小刀会起事后未得到太平军之援助，即是显著的例子。各地会党旋起旋灭，使太平军失去同盟军，遂间接导致太平军的覆亡，这也是太平天国早期的一个重大失策。

太平军起义前夕，天地会的组织和活动已遍及南方各地，其中如三点会、三合会、添弟会、添刀会、双刀会、钩刀会、棒棒会、靶子会等，名称虽繁多，但基本上都属于洪门系统。这些洪门的支派为太平军起事后奠定了得以迅猛发展的有利条件，“太平军初起时众不过两万，短期内竟能奠都南京，各地会党的响应实为主要原因。”在太平天国的酝酿发动期间，两广和湘、赣、闽等地的天地会不断发动大小规模不等的起义，分散了清朝统治的力量，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酝酿和发动起了掩护和配合的作用。由于天地会的斗争吸引了清政府的视线，拜上帝会得以顺利地发展，直到 1851 年，清政府才发现洪秀全等人的秘密活动。

有关三合会的传说中称：洪秀全与冯云山曾经“同投朱九涛的门下，列为弟子行”，朱九涛领导的起义，属于三合会起义，朱自称太平王。说朱九涛创立上帝会，朱死后，会众推洪秀全主持会务云云，虽查无实据，在朱起义与死的时间上也与洪秀全的活动，都不一致，在史实上矛盾百出，但朱九涛起义自称“太平王”是有史实为证的，朱的太平王，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难道毫无关系吗？这一问题仍是值得研究的。三合会的传说中云：“世人多

以洪秀全为三合会的首领，而呼太平军为三合军，实则，太平军与三合军，不过稍有一点关系而已。”洪门史籍中又认为：三合会与太平天国的教义上有分歧，前者奉道教佛教，后者所奉的教类于基督教。因而，二者合作上是有障碍的。洪秀全曾向人宣称：三合会的目的在于覆清得明，创始时代提出如此口号是正当的，而目前来说，满清还我旧有山河，必当建立新朝，“今以复明为言，岂可得到人心，至于我们的上帝教，完全仰赖上帝的威力的援助，……在上帝援助之下，推翻满清的朝廷，建立新的国家。所以，古时的孙膑、吴起、韩信、孔明等的名将，在我教是不怎样需要的，至于三合会，虽说灭清，却历二百余年之久，还未做过灭清的工作，更遑论完成灭清的事业，所以，我认为三合会的价值，不及我们的上帝会。”洪秀全确实批评过三合会的“反清复明”的宗旨，在初创时果然不错，如今已不适用了。我们仍然要“反清”，却无必要“复明”，应当开创新朝。此外，洪秀全对三合会落后的入会仪式及三十六誓等等，也颇为憎恶。后来洪秀全命令：凡三合会成员，必须放弃原有三合会的旧习，接受太平天国的纪律，才可纳入太平天国队伍。

但是，另一方面，太平天国既然要发展力量，就要争取群众，既然要争取群众，当时反抗清朝，并遍及南方各地的三合会群众，就不可避免地会卷入太平天国队伍中去。

太平军抵武汉之前，武昌城内的天地会组织即贴出布告，号召人民响应太平军。太平军沿江东下时，沿途得到天地会的响应和支援。太平军抵达南京之前，南京的天地会已贴出诏书，欢迎太平军到来。

洪门天地会在太平军起事前后，即充当了太平军的前驱，又充当了太平军的后援力量。

太平天国从拜上帝会时期就主动争取天地会分子加入，如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率众参加了金田起义，在太平军攻占永安的战斗中，他利用与当地会党首领何洪基旧部的关系，配合作战并发展队伍，邀约“艇匪”任文炳进攻梧州、藤县、平南、桂平等地。属于洪门天地会支派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后，罗大纲负责天京（南京）与上海小刀会的联络工作，并准备接应小刀会。罗大纲还曾联络粤北、湘南等地的天地会力量支援太平天国西征。总之，天地会首领罗大纲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后，在促进天地会系统的反清武装与太平天国合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又如秦日纳率龙山矿工千余人参加金田起义，大都是天地会成员。罗大纲的这一行动，影响到此后天地会成员纷纷参加太平军的局面。太平军在湘南吸收的天地会人员达五万之众，相当于太平军进入湖南的十倍。太平军抵武汉时队伍已发展到五十万人，抵达南京时已发展为百万雄师。

小刀会系洪门天地会的一个支派，其宗旨原为“反清复明”，其活动地区分布很广。上海小刀会是由广东、福建小刀会承袭下来的。

上海小刀会起义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上海开埠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下，上海的棉纺业和航运业受到很大打击。社会矛盾激化。小刀会起义前夕，上海聚集了大批无业游民、粮船水手、手工业工人，纷纷结党建会，主要有宁波帮、福建帮、南京帮、江北帮、百龙党、蓝线党、小刀会、双刀会等等，名目繁多。上海小刀会是闽、粤的五个党和宁波、上海各党联合组成的。其主要成员是破产农民、手工业工人、航运水手、无业游民和一部分工商业主。小刀会对外用“义兴公司”为代号。原小刀会的刘丽川外，还有陈阿林、百龙党的潘起亮，罗汉党的徐耀，天地会的周立春，兴安会馆的董事李仙云，嘉应公所的董事李少卿和上海商董徐渭仁等，都是它的领导人员。

小刀会成员每人身藏小刀一柄，作为秘密标志。他们还派遣成员打入清军内部。

1853 年 9 月 7 日，小刀会发动起义，占领上海县城。起义当天，建立了革命政权，根

据洪门天地会“反清复明”的传统,称“大明国”。刘丽川被推为第一首领,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为奉天承运平胡大都督,陈阿林和林阿福为左右元帅。下设四大将军:飞虎将军潘起亮,招讨将军徐耀,扫北将军蔡永良,征东将军陈汉宾。在城内多处设指挥部。

起义军建立政权后,张贴布告,痛斥贪官污吏残害庶民,宣布起义的目的是“剿灭贪官,以除残暴”。起义军没收了道台官署的四十万两库银,以充军用和赈济贫民,并宣布豁免地方赋税钱粮三年。起义军保护和鼓励正当的商业贸易,打击奸商和高利贷商人,命令奸商不得抬高粮价。起义军纪律严明,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在外交关系上,革命政权采取独立自主政策,主张在平等条件下,与外国商人进行军火和粮食贸易。

在军事上,起义军从9月9日至16日,发动进攻,从上海和嘉定两路出击,攻克宝山、南汇、川沙、青浦四县,并乘胜追击,向太仓进攻,13日攻占太仓城。在清军进攻下,起义军寡不敌众,从攻势转为守势,22日嘉定失守,25日至27日南汇、川沙也相继失陷。清军逐步对上海县城合围。

上海小刀会起义不久,外国侵略者趁机攫取了上海海关,实际上已站在清政府一边。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勾结,以1854年4月4日泥城之战为转折点,至同年7月11日,租界工商局成立,中外反动派完成了反革命勾结。11月22日,英、美、法三国协议建筑界墙,则是外国侵略者公开干涉起义军的开始。由于他们联合经济封锁,起义军弹尽粮绝,最终失败。

上海小刀会起义是洪门天地会支派武装起义中光辉的一页。它坚持了一年又五个月之久,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它对清朝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洪门本来就是重视武装斗争的,但如同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建立起政权的事例,则是少有的。

有关上海小刀会的学术研究问题有以下说法:

一是“小刀会”和“上海小刀会”的起源问题。

小刀会起源于1742年,发源地在福建漳浦县(即洪二和尚万提喜创立洪门天地会的地方),1782年台湾才有小刀会名称。而与上海小刀会关系密切的福建小刀会则是1849年至1850年由天地会改名的,系小刀会的第二代。上海小刀会(包括以后与“天地会”等合并的“小刀会”)是小刀会的第三代。由天地会“改立”的小刀会很快从福建传入上海,1851年7月上海小刀会就已经组织和发动了上海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不能因为广东人刘丽川为首的“天地会”和“小刀会”及其他会党联合起来,又称“小刀会”,就认为“小刀会”发源于广东。

二是太平天国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态度问题。太平天国派人联络刘丽川,当是争取刘丽川。其时太平军陆路受阻于向荣,水路罗大纲的皮篷小船又敌不过久已到上海的清军水师,因此未能具备东援刘丽川的条件。另一种意见认为:上海小刀会是无限向往和拥护太平天国、积极主动争取参加太平天国的。不同意罗尔纲的“太平天国曾经主动地争取刘丽川小刀会的加入,曾经进行过企图赴援刘丽川的准备工作”之说法。认为“太平天国绝对没有派人在上海联络刘丽川”,太平天国对刘丽川的态度是准许“投降”、“率众来归”,所谓罗大纲造船六百只准备与刘会师也只是“清方风闻之信”。太平天国未积极争取和援助刘丽川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现当今之大局,知真主为天王”的自满情绪,一方面可能是鉴于小刀会没有放弃天地会的传统。太平天国这种不积极争取团结天地会的做法,产生了严重的恶果。

鸦片战争后,洪门天地会起义遍及福建

全省，此伏彼起，连年不断。在太平天国时期，咸丰三年(1853)闽南小刀会的起义是福建天地会许多支派起义中规模较大的一次。闽南小刀会又称双刀会，其最初首领为海澄县人华侨江源、江发兄弟，二人被捕刑毙于狱中后，同安人黄德美、黄位被推为起义领导人。

闽南小刀会的建立和起义，是清政府迫害华侨，剥削压迫广大人民的必然结果。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一贯仇视华侨和靠航海贸易为生的贩洋者。而华侨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在国外直接身受殖民主义的奴役，对亡国惨祸有较深刻的体会，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回国后又遭受清政府反动统治的蹂躏，因此对家乡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能够积极参加，踊跃向前。在社会矛盾尖锐化，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情况下，归国华侨就把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传回家乡，组织起闽南小刀会。小刀会成立后，会内实行互助互济，深受群众欢迎，“不数日间，入会者已近数万人”，活动范围遍于闽南。

闽南小刀会是在清政府厚集兵力围攻，又断绝厦门粮食来源的形势下失败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本身的缺点，如仍以“反清复明”的旧口号相号召，打出了“汉大明皇帝”的旗号，缺乏号召力；起义领导者胸无大志，缺乏学识和能力，未能作出全局性长远规划，以图积极进取，只限于困守孤城。未能联络各方力量牵制敌军，也未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机构和交战团体。在这些方面仍体现出会党的散漫性，政治上的落后性。也有人认为历史条件的局限和敌人的强大，是这次起义失败的客观原因；政治纲领不明确、内部不团结、对反动派没有坚决镇压、对外国侵略者认识不足、军事上被动保守，则是起义失败的主观原因。但是，这次起义震撼了清朝在福建的反动统治，支援了太平天国，推动了全省人民起义的发展，促进了上海小刀会起义，使闽南人民一度免受清政府的赋税剥削，这些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宁波双刀会是天地会的支派，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民间秘密结社，最初起于清乾隆年间，发源于福建漳浦县。1853 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宁波双刀会积极准备响应，为当局侦知遭到镇压。后来，双刀会在洪世贤领导下，以鄞县姜山为据点，发动起义，进攻宁波。1854 年 3 月被清军镇压。

浙南金钱会于 1858—1861 年举行了较大规模的起义。曾两次攻温州，占平阳，围瑞安，分兵攻福鼎，在清军围攻下失败。

浙南金钱会属于洪门天地会系统。平阳的金钱会退入浙闽山区后，又改称红布会，继续活动。

浙南平阳金钱会首领共有八人，分作八卦，其初用康熙钱十六文，系以辫绶，藏于衣襟内，作为凭证。以后不再用康熙钱，而是会内以铜铸造不作货币，专门作为凭证的金钱，正面铸“金钱义记”四字，以“金”字中“人”字铸成“八”字为记号。所铸金钱并不统一，有的金钱反面铸有“天”字，又有的铸成“地”字，显然说明该会属于洪门天地会支派。金钱之外还有红贴与票布。这种金钱与红贴、票布都是入会的凭证。

福建红钱会也是天地会的一个支派，以“红钱”为标志而得名，主要分布在闽北、闽中一带山区。1853 年 5 月底，林俊领导的红钱会和永春黑钱会首领陈湖联合，揭竿起义，攻克德化县城。起义军在永安、沙县和泉州等地活动，纪律严明，深得群众拥护。1854 年夏，林俊应仙游乌白旗起义军之请，到界尾共同抗击清军。失败后，林到南安、永春交界的云峰山建立新根据地。1856 年初又失败，红钱会起义军化整为零潜入乡勇队伍，以后参加了宁化尖刀会、福安八卦会起义。1857、1858 年太平军两次入闽作战时，红钱会积极响应和配合。林俊率部北上与第二次入闽的太平军合师途中，遭地主武装袭击而牺牲。

红钱会的斗争对太平天国是个有力的支援。

1854—1855年是天地会在广东一带最活跃的时期。陈开、李文茂分别在佛山、佛岭市发动红巾军起义，进攻广州；粤北起义军十余万人围攻韶州府城；粤西起义军曾攻克肇庆；粤东起义军先后围攻惠州、潮州府城。1855年红巾军被叶名琛勾结外国侵略者击退后，陈开、李文茂部又在广西浔州建立大成国，坚持斗争达十年之久。陈金钉部红巾军十余万人，留在广东坚持斗争也达八年之久。周春、陈荣部和翟火姑部分别转战湘浙，改名花旗军，先后于1855年底、1856年6月加入石达开部太平军。广东天地会的这些起义，有组织、有纪律、有纲领，既反封建压迫，也反外国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广东天地会也具有破坏性、分散性和宗派性的一面，它的游民阶层的特性也的确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广东天地会起义和太平天国各自牵制清军力量，在客观上互为友军，互相支援，但在他们直接相会后却又出现了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加入太平军的花旗军彼此始终互相猜疑。广东天地会起义军本身的主要弱点为：第一，起义的纲领口号比较模糊，缺乏措施，未能满足广大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第二，分散行动，自立门户，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第三，起义领导人大多缺乏远大的抱负。但其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广东天地会红巾军中由何六领导的一支相当突出。何六是广东天地会洪义堂首领，1854年首先在东莞起义，为红巾军的东路大元帅，曾参加围攻广州。多次进行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战争。1855年2月10日，以红巾军统领水陆兵马众大元帅的名义，致书各国领事，谴责其干涉中国内政。在红巾军的领袖中，何六特别主动地争取与太平军联合。何六牺牲后，其部下的一部分红巾军和太平军西征军会合。

关于红巾军在广西建立的大成国。红巾军在广东起义遭到清政府镇压后，遂转入广西。1855年5月，包围浔州府城，激战九十多天，于9月间攻克浔州，建立大成国，定年号“洪德”、改浔州城名为秀京。陈开、李文茂、梁培友、区润、梁昌等人为大成国的领导核心。大成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废除封建剥削，发展农工商业；严禁商贾囤积居奇，严禁赌博、高利贷和贩卖鸦片，并提出所有地方官吏惟贤能是用。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侵略。贵县、武宣、横县、平南、容县等地起义军也参加了大成国。大成国以桂平为中心向外发展，起义烽火燃遍广西各地。由于敌人的反扑和起义军领导集团内部不团结，1861年8月起义军在平南、浔州战败，秀京沦陷，起义军领袖陈开被俘就义。但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荣国公范亚音部以及姚新昌、黄德三、黄德四等部仍坚持斗争，直到1865年年底黄德三、黄德四相继阵亡，大成国的战斗才最后失败。大成国失败的原因在于：第一，地主阶级、外国侵略势力和反动商人对清军联合支持。第二，起义军内部流氓无产者的涣散。第三，领导核心是具有封建色彩和宗派性的落后组织天地会，其首领宗派思想严重，缺乏政治远见。大成国的斗争对清朝统治崩溃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升平天国。在南方各省天地会起义中，还有一支具有特点的起义军，建立了升平天国。升平天国的领导人为朱洪英，湖南东安人，(一说耒阳人)。1852年在南宁领导起义，转入桂北，招集小股起义队伍，会合广义、洪顺、从文、顺义各堂，扩充至万余人。不久，与另一支天地会起义军胡有禄部会合，转战桂北及湘、粤交界地区。1853年9月，占领灌阳，于次年建立“升平天国”，年号“太平天德”。朱洪英称镇南王，胡有禄称定南王。1855年，清廷调湘、粤两省军队合攻义军，义军在永安突围，胡有禄遇难。朱洪英复于10月攻占灌阳，次年牺牲。余部由陈永秀率领，后又由黄金亮率领一部归入石达开部西征的

太平军。1860年,陈永秀部投奔广东会党陈金刚,“升平天国”全部瓦解。

以上可见,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期间,南方浙、闽、湘、粤、桂一带,不断发生洪门天地会系统的会党起义,虽然有的攻占府城,建立政权,有的坚持十多年斗争,对于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清朝政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始终未能发展到如同太平天国那样的规模。原因之一在于领导人的政治、文化水平和纲领、制度,都比不上太平天国。

哥老会的兴起

哥老会起源

太平天国失败后，天地会的活动很少出现，而在两湖地区及长江上游等地哥老会却活跃起来。似乎哥老会以及哥老会系统的民间秘密结社继承并取代了天地会的活动。陶成章在其《教会源流考》中指出：太平天国失败后“三点三合之势衰，而哥老之势转盛。”有关哥老会的起源问题，学术界说法不一。故宫清代档案部所藏的《上谕档》、《军机处录副奏折》、《刑部档案》以及《宫中朱批奏折》等清代档案，提供了有关哥老会起源问题的史料。有的学者根据这些史料认为：哥老会在清代咸丰年间以前，是以江湖会的名称在民间活动的。在嘉庆年间，又称为仁义会，而仁义会是天地会的分支。因而哥老会本属洪门天地会的支派。大约在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后，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仁义会，江湖会的一些组织，开始变名为哥老会，并把重点放在清军营中，以清方勇丁及一些下级军官为重点发展对象，进行有组织的秘密活动，以实行推翻清王朝的政治主张。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随着清军营伍的裁撤，哥老会的组织随着被遣散勇丁返乡务农，逐渐深入民间，许多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参加进去，组织获得很大的发展。哥老会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清代官方文书中是在同治四年，但估计在咸丰十年以前，它的活动就已经引起清官方的注意。在哥老会活动期间，原有的一些江湖会、仁义会等组织也继续存在并进行活动，但它们有时也使用哥老会这一名号。哥老会有时也用江湖会或仁义会的名称进行活动。随着清政府对哥老会的残酷镇压，哥老会不断隐蔽自己，于是又有许多化名，其中主要有：洪门、在园会、洪江会、老教会、英雄会等。江湖会和仁义会既然都是天地会的支派，哥老会当然也源出于天地会。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而哥老会，这就是哥老会的源流。

湘军遣散与哥老会的发展

清朝的许多封疆大吏奏称，哥老会“起自军营”虽然不够确切，但哥老会的蔓延与发展却与清朝军营，特别与湘军有密切关系。

湘军制度是经常遣散、招募的。民间的哥老会成员伺机应募混入湘军。由于湘军中将领对士兵的剥削压迫十分残酷，克扣军饷吸兵血的情况越到后来越严重。本来哥老会是民间下层社会互助性的结社，在湘军中士兵为了对付长官的压迫剥削，就成为哥老会得以秘密发展的好机会。哥老会在军中先以患难相助，祸福同当的江湖义气播下思想感情的种子。等到士兵感到受欺骗、被剥削的时候，他们就暗中结合那些士兵，秘密组织和

发展哥老会。湘军将领鲍超原是四川人,后来流落到湖南,由于四川原是哥老会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鲍超的军营有很多哥老会成员。经过各军营间的串连交往,到同治初年,湘军中普遍成立了哥老会。哥老会在湘军中得以发展的原因,除了官兵之间的矛盾尖锐迫使士兵以哥老会的秘密结社办法团结互助外,还因为士兵们担心一旦被遣散离开军营后,生活上没有出路,加入哥老会后,既可互相周济衣食,又可避免遭到抢劫。

到清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八日,湘军中的新仁、依仁两营,就发生了哥老会夺取粮台的事。清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定下立即遣散军队的决策,但因欠饷太多,只得分批遣散。于是军队起来索饷而发生兵变的事不断出现。清同治四年三月,鲍超部奉命开往四川作战,待到武昌附近六十里的金口,军中的哥老会分子歃血为盟,鼓噪索取欠饷,由黄矮子、欧阳辉领导,登岸起义,攻入咸宁县,经江西、湖南、入广东,在兴宁加入太平军。12 月驻防湖北的成大吉部在麻城宋埠起义,将成大吉打伤,迎接太平军从河南商城入湖北。其他驻防安徽休宁、徽州、石埭、湖北汉阳的部队,都有暴动索饷,闭城索饷的事件。

本来曾国藩创办湘军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由于哥老会盛行于湘军,使湘军走向了曾国藩愿望的反面,曾国藩不得不遣散湘军。而湘军的遣散造成哥老会更大的发展与更快的在各地蔓延,形成了反抗清朝统治的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

当时被解散回到家乡的湘军士兵,没有职业可干,用完得到的欠饷后,又无法生活了。那些得到保举而无缺可补的官员同样受欺骗,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保举,无法兑现。于是,被遣散的湘军下级军官和被遣散的士兵结合起来,在哥老会领导下,于清同治六年(1867)夏首先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发动起义。曾国藩虽然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镇压哥老会起义,但哥老会起义却此伏彼起。几乎年年在湖南一带起义。其中如同治九年(1870)十月发生湘潭之役,同治十年(1871)四月发生益阳之役。哥老会势力愈来愈盛,迅速发展到长江流域,到光绪十七年(1891),哥老会便把长江上下三千里联为一气,一处起义,处处响应。二十年后,辛亥革命中,哥老会就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盟,共同推翻了清政府。曾经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回过清朝国运的湘军,后来急剧转化成清王朝的掘墓人,这正符合历史的辩证法。

史籍中另有一说:太平天国趋于失败时,太平天国的李秀成及其弟李世贤等知大仇未复,而大势已去,痛心疾首,预料到湘勇嗣后必为清政府所器重;“日后能有左右中国之势力者,必为湘勇无疑”,于是暗中派遣福建江西之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从中引导湘军反抗清政府。同时又避去洪门的“三点”“三合”的名称,这就更便于在湘军中的秘密活动。“因会党首领有老大哥之别号,故遂易其名曰哥老会。于是湘营中哥老会之势大盛,且凡湘军所到之处,无不有哥老会之传布也。”哥老会因而成为清政府的一大巨患。这一说法也是值得重视的,这也可能是湘军所到的某些地区,传播哥老会的原因之一。

哥老会不仅流行于湘军营中,同时也流行于其他军营,随后又经过其他军营散布于民间,其情况与湖南一带相似。

山西的哥老会起于清咸丰初年,后来山西绿营和豫军中的遣散归乡者成了其主要成分。哥老会在发展过程中,注意了纪律性问题,规定对乡里、亲友的保护政策,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于是“入会者相继不绝”。

1882—1891 年,安徽哥老会力量得到发展壮大,其特点如同天地会,例如:第一,山堂各有名称,组织复杂,如天宝山、玉龙山、福寿山、忠义堂、金龙山、中华山报国堂、大雄山忠义堂、太平山、紫肖小银河水集义堂等。第二,首领普遍称为龙头。第三,散发会员证布

票。第四，会内组织完备，有龙头、副龙头，内、外八堂等名目。

1891年哥老会曾发动了长江下游以安徽为中心的大起义。1900年，秦力山联络安徽会党在大通发动自立军起义。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

陕西地区的哥老会的发展与左宗棠的军队有关。同治年间，左宗棠进军新疆，其部下有不少哥老会成员留在陕西，成为哥老会在陕西发展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分布地区多在陕南，少数在关中及陕北。大都在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船夫和无业游民中发展会员。

民国前，哥老会在宁夏已有很大发展。左宗棠所率领的湘军镇压了马化龙起义后，湘军官兵在宁夏各地落户，湘军中原有的哥老会散入民间，随之在宁夏发展起来。

李丰密购军火案

哥老会虽然由来已久，但由于采取秘密活动方式，长期未被清朝当局所注意，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李丰秘密购置军火案发生，哥老会的活动才使当局震惊，也为世人所瞩目。

李丰之父李昭寿，本是淮北的一个无赖。后来投靠在太平军忠王李秀成麾下，很受李秀成信任，成为谋士，也有的史籍中称“李昭寿是洪门中人，学识甚广”。李秀成在天长县一役，被清兵击败后，“昭寿孤军不敌，倒戈以降，钦差大臣胜保大喜，奏奖三品顶戴，赐名世忠。”不料李昭寿虽然投降了清朝，却暗中和洪门通情报，后被清廷发觉，将李昭寿拘捕，严刑拷打，“李昭寿直认是洪门中人不讳，并且在公堂上破口大骂清廷的腐败。”结果被清廷斩首。

李昭寿的儿子李丰，立誓为父报仇，遂在安徽加入哥老会，入会后，往江苏镇江拜访哥老会首领关熙明，向关熙明表述对形势的看法和推翻清政府的决心。李丰认为清廷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起义后，兵力衰落，国库空虚，朝政更加腐败，哥老会应乘此机会举行暴动。关熙明表示赞同。二人商定购买军火事宜，李丰毁家捐助白银六万两，作购买军火之用。关熙明又在会中动员大家捐助了一些款项。托镇江税关洋人弥逊代购军火，弥逊又介绍了关上的六位洋人，接洽运输办法。弥逊自己请假赴香港，和军火商订购枪械弹药。不料这批军火运到镇江时，竟被清廷探知，将军火抄出。弥逊、关熙明和李丰一一被捕，弥逊交上海英国领事馆查办，监禁了九个月，解送回国。“李丰于狱中自杀，其妻妾及婢，亦同时自杀”，关熙明被处以死刑，与李丰尸一同枭首。

此案发生后，沿江各地哥老会同志，十分痛恨清廷，要为关熙明、李丰报仇。而限于实力，不能对清廷大规模作战，只得在各地进行局部的、长期的斗争。由于李丰案引起的对洋人的愤恨，借杀洋人来打击清廷。于是哥老会杀洋人，毁洋房之类事件不断发生，“沙市之日本领事馆税关招商局怡和洋行等房屋，俱为灰烬，而破坏外人财产之责任，乃转在清国官吏及旁观之人。”长江流域的洋人领事馆、教堂、海关，太古、日清等洋行，时常遭到烧杀，大都是哥老会所为。

清廷为外事纠纷而恐慌，于是出赏格缉捕哥老会人员。捉到哥老会的主持人便可封官，告发哥老会的会员也可得到奖金。

光绪十八年(1892)，清廷在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醴陵捕获哥老会会员四人，二人已被杀，另二人正在审问时，便有一千多个哥老会会员蜂起劫狱，和清兵一场混战，救出二人，逃往五台山中。

光绪二十三年(1897)，日本进步人士平山周偕同哥老会重要分子毕永年、林述唐，到湖南和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等会晤，向他们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

理想和事迹，计划在长江沿岸联合哥老会各头目，组织英雄会。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形成了哥老会与孙中山的联合。哥老会与革命党人联合，才开始了哥老会历史性的转变。

龙 华 会

哥老会属于洪门支派，而哥老会系统又有许多支派。如处州王金宝领导的双龙会；衢州刘家福领导的九龙会；浦江林亦勇领导的千人会；严州濮振声领导的白布会等也都不同程度上参加或支援了辛亥革命。在十多年斗争中，都遭到清政府的残暴镇压而瓦解。

又如绍兴竺绍唐领导的平阳党；嵊县裘文高领导的乌带党；又如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白旗会、红旗会、黑旗会、八旗会等，都参加过反洋教斗争，以后在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启发教育下，认识到反对清政府斗争的重要性。革命党人陶成章、沈英、张恭等，在杭州举行会议，提议从事革命实际工作，招集福建、江苏、江西、安徽、浙江五省的会党头目开大会，将上述等会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战线的大团体，定名为"龙华会"。

龙华会又称龙华山，俗称九龙党，为哥老会系统的终南会的支派之一。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至1901年间成立，以沈荣卿为会主，张恭、周华昌为副会主。本部设于金华，浙东许多地区设有分部。会众达三万余人(一说二万多人)。遍及浙中。会员以农民为主，也有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与游民参加。

1. 十条《会规》

宣统元年(1909)，陶成章主持下为龙华会制定了十条《会规》。文字十分通俗。

第一条，阐明"宗旨"，解释说：是打定什么主意。"宗旨"，"就是报复我们兄弟家祖上的大仇，和历来的种种虐待我们的新仇，赶去了满洲鞑子，收回了大明江山，并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显然，在解释宗旨中，提出了千百年来农民盼望的大家有田地的主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的主张。提出了"不生出贫富的阶级"的平均主义理想。

第二条，"命名"，解释说："就是所做的事体的名目。我们兄弟家所做赶去皇家的事件，并非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还要众兄弟们同心协力。所以，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山名叫做'一统龙华山'，堂名就叫做'汉族同登普渡堂'。"这里所说的革命协会，是龙华会的又一名称。

第三条的"职官"，解释说："职官"，"就是职位官衔，现在我们最要紧的事件，第一件，就是练兵，所以，我们所设立的官职，第一部分，就是军政省分作内外二府，内府呢？就叫做'枢密府'，所管的事件，就是筹划军饷，购买枪炮等大事。但因内府职官与外府不同，凭票另给，所以，详细的职衔，不载在这个上面。外务府呢？就是叫做'都督府'，都督府共有五个，第一叫做'中军都督府'；第二个叫做'前军都督府'；第三个叫做'后军都督府'；第四个叫做'左军都督府'；第五个叫做'右军都督府'。这五个都督府中，每府设一个'大都督'，又有一个'右都督'，一个'左都督'。都督以下还有统制使，军政使三等。第一等叫做正军政使，第二等叫做副军政使，第三等叫做协军政使，军政使以下的官，还有巡察使，有正巡察使，副巡察使二等；还有正副介士，随多随少并无一定的限额。五个都督，正缺以外的大都督，左右都督等，都加寄衔两个字在上面，权柄位置，亦是一式一样的，以上新设立的官职，乃是取法于大明大唐的，并不是杜撰出来的，现在所授的什么官什么职，将来也就是什么官什么职了。"

第四条的"对照"，解释说：对照，"就是拿新官职与旧官职比一比，因为现在所设的官职同洪家潘家的旧官职是一式一样的。现在

的五大都督府，就是以前的五堂；左右都督，就是以前的龙头；统制使，就是以前的当家；正军政使，就是以前的红旗正管事；副军政使，就是以前的红旗副管事；协军政使，就是以前不管事的红旗；正巡察使，就是以前的巡风；副巡察使，就是以前的蓝旗管事；正介士，就是以前的大九；副介士，亦是大九。圣贤，总么满，并大满、小满，大么、小么，小八牌等官，一齐裁去不设。所有口号、暗号，各家名教一切等，一仍其旧，内中单有黄令改作师令，红令改作特令，蓝令改作军令。”

以上这条，主要是说明，华龙会沿用了洪门官职，只是名称有变化。其实龙华会官职与洪门哥老会对照，并非仅是名称改变，而是更加突出了军事特点，意味着龙华会是要发动武装斗争的。

第五条的“权限”，解释所谓权限“就是各人守各人的本分”，譬如大都督的权柄是大的，所有自己手下的兄弟，都需听其命令。但是欲举义旗的时候，必须要同枢密府商量妥当，然后可以举行。若使自己盲动，枢密府是不答应的，并且不帮助他军火，不做他的军师，左右都督相帮大都督行事，倘若左右都督上面没有大都督时，他的权柄是和大都督一样。统制使、军政使、巡察使，都应服从大都督和左右都督的命令，受了大都督和左右都督的委任状后，各行职责内的事。正副介士都要服从统治使、军政使的命令。

第六条为“陟黜”，解释：陟就是升迁，黜就是革职。有功劳者可升级，如副介士有功劳可升为正介士。一级级均可按功升职，而大都督有功劳时，往上没有更高的职位了，“便在枢密府功劳簿上，注定他的姓名，将来等到新朝廷成立以后，还要封侯封王。”若帮内弟兄中有人犯罪就要革职，“若本来是大都督，一革就是左右都督了。副介士犯了罪，没有更低的官职了”，“就受罚，或跪或杖等不一。”“若不从命，就斥革出会，重罪则劈，若犯了十条戒约，无论都督或正副介士，一体治罪（十戒条附载在凭约上）。”但升官革职也都要有凭据，要看功劳大小，罪过轻重。由枢密府议定后，然后执行（刑罚正副介士，由大都督决定，枢密府不过问，由军政司执行）。

以上这条内容中有关“等到新朝廷成立以后，还要封侯封王”的表述，即完全暴露出这一组织有一定的封建性。他们的政治目标仅是反满，并不反封建，企图恢复明朝的封建制度，以取代清朝的封建制度。可见龙华会虽提出了公有土地以及均贫富的主张，但并未提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进步的政治、经济主张。

第七条，“追卹”，解释：凡是殉职的会内兄弟，本会都要抚恤其家属，“如有子女三个人以上者，每月给洋三元。……如有五人以上者，每月给洋五元，等他的长子到十八岁为止。如果无子有女，则给至嫁人为止。此费由大都督与左右都督给予，若大都督与左右都督无钱时，告诉枢密府给予；不过这是要经过切实查明的，不得滥领滥给的。”查明了他出力的功绩，记人枢密府功劳簿，“等到新朝廷成立之后，论他功劳的大小，还要封他的祖宗，荫他的妻子，使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做官食禄”。“还要铸一个铜像，宣扬他的忠义的名誉”，另外还照洪门传统为他安排超度仪式。

以上在抚恤制度条文中，反映出龙华会基本上照历代封建王朝的办法，在思想意识、观念形态方面，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

第八条“追罚”，解释：追罚就是“假如在我们兄弟中，有坏了良心，出首会中秘密事件，我们是一定要劈死他的”，如果一时捉不到他，也要将他的罪恶登记在枢密府的罪人簿子中，“等到把鞑子皇家赶去以后，各省各府各县严行查办，务必拿到处以极刑而后已。并且还要罪及妻子，重者满门诛戮，轻者妻女为娼，儿子为奴，世世代代，受罚无穷。还要铸他的石像，跪在人人往来的大路上，使人人把尿撒在其上，同西湖上的秦桧一样，并且还

要行文阴间，告诉岳爷爷，沦入地狱，万劫不得翻身。……列位要晓得，鞑子皇家的命运，已经要完了，大家务必勉为忠义，不作恶人才好。”

以上这一条的内容中却反映了龙华会对叛徒十分仇恨，又反映出龙华会承袭了唐代、明代对待叛变者的刑罚。

第九条，“入会”，解释说：“凡入我们这个革命协会的时候，大都督，左右都督，均写志愿书一张，交给介绍人，从介绍人交给军政府收藏，然后由军政府枢密府发下委任状，给予大都督或左右都督，然后由大都督或左右都督发下委任状，给予统制使，军政使，巡察使”。正介士，副介士，亦写志愿书一纸，交给自己的统制使，或军政使，然而因为没有具体任务，所以不发给委任状。

以上这第九条表述得不够明确。既然这一条是“入会”，就应讲清入会的条件、程序、规则，而这些均未讲清楚。

第十条，“称呼”，“正副介士对大都督，称做老大哥，对左右都督称大哥，对统制使，军政使，巡察使，称二哥，对自己平辈兄弟，彼此都称老三。统制使，军政使，巡察使，对大都督也称老大哥，对左右都督也称大哥，对自己平辈兄弟，彼此都称老二，对正副介士，叫三弟。左右都督对大都督，也称做老大哥，对自己平辈兄弟，都称大哥，对统制使、军政使、巡察使，称做二弟，对正副介士称三弟。大都督对自己平辈兄弟，都称老大，对左右都督称做老弟台，对统制使、军政使、巡察使，都称二弟，对正副介士都称三弟。大都督左右都督，对枢密府管事，都称老哥；枢密府管事人对大都督左右都督，也都称二哥。”见面礼节，各会各教，都仍其旧；内中单有枢密府中的人，和大都督左右都督相见之时，彼此拱手为礼；拱手之时，左手掌在外，右手掌在内，因为是平等的，所以拱手到胸乳为止，不必过高，也不可过低。书信往来的称呼，也如上述。

以上这一条有关龙华会的“称呼”，既不同于洪帮传统的称呼，又与洪帮的传统称呼有密切关系。

2. 檄文

龙华会之檄文是一篇十分通俗的政治宣传文件，从中反映出该会一系列的主张。原文之主要内容及笔者评议于下：

檄文首先指出：“怎样叫做革命?”回答是：“革命就是造反”，引证了《易经》上说过的“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指出：后来的皇帝害怕人家夺了他的位子，才把革命称为“大逆不道”。檄文中引用孔子学生问孔子治理国家的道理，孔子指出应效法三代的制度，又指出，普通人也有资格做皇帝。檄文中说孔子最恨异族统治中国。“至于孟夫子说的话更多了，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檄文中以通俗文字阐述了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一系列造反者的英雄事迹，如张良在搏浪沙以铁锤击秦始皇，又如：“陈涉的一把斧头，刘邦的三尺剑，便都等不得始皇的肉冷就都起来了。那陈涉虽然没有做到皇帝，然中国平民第一个造反的，就是他，而且一个种田帮工的人，生前做到楚王，打破了封建的全局，也可以心满意足了。那汉高祖刘邦的出身，不是一个亭长么？秦时的亭长，就是现在的地保，地保而做皇帝，你道他的力量，岂不比秦始皇还大吗？三国时的刘备，他虽自己说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其实，这种说话，不过拿来摆摆场面，我们大家不都是轩辕皇帝的后代吗？若说起刘备的出身，是个织草鞋卖的，至于宋朝那个赵禅郎，列位看过戏文的，就没有一个不晓得他是个光棍出身。咳！可怜！可怜！他的子孙不争气，到了后来，被杂种的四太子金兀术杀得他无地可钻，两个老皇帝，是被掳到金国去了，单剩一个小康王，泥马渡江，做了一个小朝廷，当时虽有个岳爷爷惊天动地的出来替他扫仇，只恨岳爷爷是个宋朝的臣子，被那奸臣秦桧害死了。这个时候，岳爷爷如果自己想做皇帝，怕不把江山一统，那元朝的鞑子，也不会乘势进来，来做

中国的皇帝了。列位啊！自从盘古以来，虽有五胡乱华，但一统中国的，就是元朝，这是中国第一次的亡国纪念，幸亏坐不到百年的江山，就出了一个朱洪武，把那元鞑子赶出塞外，仍旧是汉人做皇帝，我们算是再见天日。这位朱洪武的出身，列位也都晓得的，他是给人家看牛的小厮，到着没奈何时节，还到皇觉寺做过和尚，万不料到后来会做皇帝。可是那杀不尽的杂种，又乘着我们年岁饥荒，有了内乱。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的时候，几个做奸细的像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开门引贼，他又进了山海关，强占着北京城，做我们中华的皇帝了。那时我们南边，都立着明朝的亲王，论理，我们汉人，已让了北方，他也不当抢到南边来了，不料他狼子野心，得寸进尺，又带着许多丑类，把我们南边的亲王，一个一个灭了，并且到一处，屠一处城，不知死了多少忠臣义士，剩下来的，又因为要逼迫我们作那鞑子的打扮，又不知被杀了多少，当时有两句口号，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到今剃头担子上竖着的那根旗竿，就是当时因为不肯添(剃)头，拿来杀了，把头挂在这旗竿上面，做个榜样，你道可残酷不残酷，凄惨不凄惨。他既削平了南北，更想出种种极不平等，极其阴险的暴虐的制度，……近来他们又想出新鲜的法子，要想夺取我们各省的田地，凡是好的都要夺来归给他们，而那狗屁的上谕，反说是满汉平等，时价沽买。……诸位要晓得，今日的人心，为什么要比几十年前的人明白得多呢？这都是各国，交通的好处，原来外洋各国从未有异种人来做皇帝的，就是同种的人如果暴虐百姓，也就要起来革命，我们如今与外国来往的多了，再把孔夫子孟夫子的说话印证起来，这个道理就明白了。而如我们革命成功，外国人那一个不来称赞我们；虽然也有口口声声在拍着满洲人马屁的外国人，同着几个昧心忘理的中国人，竟然想望满洲立宪。……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是基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将来天下各国，定然还要革命，……革命成功以后，或是因于万不得已，暂时设立一个总统，由大家公举，举出之后，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不定，但却不能传子传孙，或者是市民政体，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也可，这是要看那时候我国国民的程度而定。但无论如何，皇帝是不能永远让他霸占的。"

檄文中的上述内容着重宣传了皇帝不是天生的，历史上有不少平民百姓成为皇帝，既然如此，平民百姓也是可以把皇帝推翻的。檄文中更加宣传反对满洲人骑在汉人头上做皇帝。

檄文中反对君主立宪，但是却把共和立宪与君主立宪相提并论，均在反对之列。檄文中主张革命成功后"可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大家公举，总统不得世袭"；檄文中又认为革命成功后"或实行市民政体，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也可。"反映出领导龙华会的这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受到西方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对于革命成功后的政治体制，尚未形成较成熟的设计，仅有些不成熟不稳定的设想。

檄文接下去一段文字是说革命成功后所理想的社会，解除了平民百姓的痛苦，"因为到那时候，也没有独拥田地的大财主，也没有贫无立锥的苦百姓，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就大家饥了不愁无饭，寒了不愁无衣，于是乎可以太太平平，永远不用再造反、再革命了。这才是我中华民国的万岁。"檄文中把革命后给人民带来的幸福想象得十分具体。接着檄文为了宣传废除帝制和反对世袭制度，列举尧舜虞选贤任能的事迹，又引用孔子所说的关于皇位当由大众共举的话即："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使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壮有所归。"从这一檄文中可看出，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洪门会党，也要借重在中国文化史上深

人人心的孔子学说来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

檄文中对“外国人”，尚未形成明确的反帝思想，只是反对支持清朝的外国人。檄文中称：“在革命的时节，我们立定了两个主意，满洲人是我仇人，各国人是我朋友，万万不可误会的。”檄文最后部分称该檄文也是“现在所定的章程”因而以往许多人所称《龙华会章程》也将檄文包括在内。

纵观上述龙华会章程有如下特点：

(1)从总体上反映出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洪门会党联合并从而领导洪门会党的章程，其实章程的前部分称为《十条会规》，后面部分称为《檄文》、《约章五条》、《入会仪式》、《入会规则与次序》等。在该章程中出现的该团体名称为“革命协会”，该洪帮的山名为“龙华山”，所以后人称其为龙华会。

(2)以上该会檄文与十条会规，虽然文字都是十分通俗，但在革命成功，建立政权的形式上，却有不一致的主张，在会规第六条中提到“将来等到新朝廷成立，还要封侯封王”，而在檄文中却说，革命成功后，“可暂设总统，不能传子传孙；或者是市民政体，或者竟定为无政府”。封王封侯是旧式洪门会党的政见，而设总统，或无政府，是受到海外政治思潮影响的革命党人的政见。前后不一致，正反映了这一团体的复杂性。

(3)国内洪帮团体(海外洪门例外)有上述“檄文”中的政治认识，已属于政治思想上的飞跃。所不足之处在于仅侧重于反满，虽有反对封建帝制的主张，但反对封建制度的认识较薄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认识更为薄弱。

(4)能够将会规、檄文运用十分通俗的文字进行宣传，反映出该团体具有发动群众的观念。

3. 约章五条

龙华会除上述十条会规、檄文外，还有约章五条附于章程后。五条全文如下：

第一条：“凡在枢密府的人，如大指挥，左指挥，右指挥，懂得内地情形的，可以带领都督府座堂的职衔；又在都督府的人，如大都督左右都督，懂得外边情形的，可以带领枢密府座堂的职衔。枢密府座堂，就是大指挥，及左右指挥，都督府的座堂，就是大都督及左右都督。

第二条：“凡在枢密府各部的司员，得都督府座堂差委者，亦可以做得统制使，军政使，巡察使等职，又在都督府属下的司员，得枢密府座堂差委者，亦可以做得枢密府联络部长，侦察部长，副部长及交通使大使、副使，报信使大使、副使等职。

第三条：“凡在都督府的，带有枢密府的职衔者，然后可以直接写信于枢密府商量事情，若尚没有枢密府兼衔的，必定要有枢密人员介绍书为凭，枢密这一边也照这个样子的办法。”

第四条：“凡枢密府人员，同都督府人员往来，彼此多以图章为记号，图章是一处有(与)一处不同的。这图章从枢密府发出，如若信中没有图章，这个信是不生效力的。若图章遗失，必定要告诉枢密府，由枢密府再给一个图章，而以前的图章就是再寻到了，那么就要作废。倘然差人往来用铜牌为记，与图章是同等效力的。”

第五条：“枢密府所做的工作完备以后，则指定一处最重要的地方，先举起了义旗，然后再派人通知各属，让大家一齐响应，使鞑子皇家防不胜防，这样，自然而然一举即成了。倘若这事是那一个最先响应，那么便居首功，至于不约定起义的原因，是因为恐怕把秘密传出了，给官方知道，所以临时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进行那个必要工作。”

4. 入会仪式、规则、程序

龙华会的入会仪式比较特殊，主要程序如下：凡入会者举行仪式，选择岳庙或其他较清洁处，设立公案，供奉岳飞神位，在岳飞神

位左方列杨再兴神位，右方列牛皋神位，在杨与牛神位下，分别列王、施等从属人员神位。公案排列三牲，酒一壶，杯五个，神位前缚在桌下一活鸡。

由主盟人先向神位行四跪四拜礼，再以针刺臂滴血于岳神前的杯内，再坐于公案左方。然后入会人，也仿照同样仪式，坐于公案右方。然后，盟证人（就是香长）重行进跪神前，行四跪四拜礼，起来时再上香，同时宣读进会的祭文，祭文内容为："千载有公，继武羲轩，气吞胡虏，威被八挺，觉罗不灭，公目不眠，黄农遗胄，都四亿千，凭藉公灵，逐彼腥膻，国命可复，配公配天，尚飨！"读毕将祭文在神前燃化。然后行刑执法者进跪行四跪四拜礼，起来的时候将预先缚好的雄鸡抓起，叫一声主盟人的姓名，这时主盟人必答曰："有！"再以同样方法，也叫一声新入会者的姓名，复叫一声盟证人的姓名，被叫到者都答一声"有！"然后新入会者走到神前发誓：

第一誓：诚言入会，不敢反悔，如有反悔，天诛地灭。

第二誓：入会以后，协力同心，不敢畏避，如有畏避，雷击火烧。

第三誓：会中秘密，不敢漏泄，如有漏泄，身受千刀。

第四誓：祭祖起义，闻命必到，如有不到，命尽立殇。

第五誓：兄弟同心，如同手足，如有外心，身心五刑。

誓毕，执法行刑者，左手持鸡，右手握刀，高叫曰："岳爷爷英灵鉴者，我等协力同心，誓杀鞑子，报我祖宗的大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若要不照这句话的，难逃夭殛，如若不信，请看此鸡"，说到将完的时候，把右手所握的刀，向左手的鸡头顶上，用力一劈，鸡头便应手落地，就把那流出的鸡血，滴入列在神前的五个酒杯中，至是，所有的监盟人，主盟人，及执法行刑人，一律走到神前，同时下拜，再行四跪四叩之礼。行礼既毕，乃将滴血的酒，四人分饮，而在中间的一杯，则由主盟人和入会人分饮。饮毕将神位焚化，送神散胙，再将前执法行刑之鸡，烹而共食。

上述誓词与鸡血酒仪式类似以往洪门传统的入会仪式，略有变化。

至于入会之规则、程序大致如下：

主盟人。入会人（新加入会者）。盟证人（又称香长，为执香者）。执法行刑人（相当于洪帮、哥老会中的红旗）。以上各职由会中兄弟担任。

入会主要规则与次序如下：

（一）写入会志愿书交给介绍人。

（二）择黄道吉日，举行入会仪式。

（三）行入会礼式后，隔一到三日，发委任状。

（四）发下委任状后，知会军政省本部或支部。

（五）军政省得介绍的知会后，发下图章和铜牌。

（六）凡属内府的人，都照此项规则入会。外府的人，如大都督左右都督招收兄弟加入自己的部下时则照各会各教各党的固有的规矩，如若大都督左右都督本不是会党或教党中的人，在招收兄弟加入自己的部下时，也照以上的新规则，如介士以上，统制使以下的兄弟，本非会党教党中的人，来入会时，也照以上新规则。

（七）以上官名、职衔，为便于读者明了，再列表如下：

新中国军政省，内府、枢密府。

（一）总司令——大指挥；

（二）司令副理——左指挥；

（三）司令协理——右指挥；

甲、参谋部

乙、运输部

丙、侦探部

以上都没有部长和副部长等官职。

丁、交通司，以上设大使副使等官。

戊、报信司，外府，都督府，共分左、中、右、前、后五部，都有如下官衔：

大都督、左都督、右都督。

甲、统制使;该官职无定额,而以第一、第二、第三、……字样相区别。职位相同。

乙、军政使。

(一)军政使;(二)副军政使;(三)协军政使。以上亦无定额,如数量多,即以第一、第二……字样相区别,官职相同。

丙、巡察使。

(一)巡察使;(二)副巡察使。以上亦无定额,以第一、第二……字样相区别。

丁、介士曹

(一)正介士;(二)副介士。以上也以第一、第二……字样相区别。

以上是龙华会的组织系统,看来该会是个军政组织的缩影。又据龙华会自称:"现在我们的同志,凡22行省内,以及新疆、蒙古、满洲等地方,都是有的,但因中国的地方广大,所不得(不)分头办事。而以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五省为一大部,但这五省的地方,也不是小的,所以尚须要分开来办理,现在我们将这五省的地方分为十路,每省二路。

第一,江苏省,江南路,江北路。

第二,江西省,江左路,江右路。

第三,安徽省,皖南路,皖北路。

第四,浙江省,浙北路,浙西路。

第五,福建省,八闽上路,八闽下路。

"以上十路,凡相接近的地方,如果都督拥力比较大的,可以兼管。"

龙华会自称22个行省内都有他们的"同志",这显然是夸张的说法,其实该会会员主要涉及地区为苏、浙、皖、赣、闽地区。他们在这里又称会内人员为"同志",这与洪门传统称弟兄相比较,更反映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参加并领导了该会。

三合会的起兵

三合会为洪门天地会的分支,一说当天地会遭清政府镇压难以开展活动时,改名以三合会名称继续活动。三合为传说中洪门三河的谐音,三合又含有洪字的三点之义。三合会内部仍有自称天地会者。凡三点会、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等,均为三合会的支派。

三合会以福建、广东、广西为基地,洪门史籍,有的将台湾林爽文起义列为属于三合会的反清战争,又称太平军兴起与三合会提供的群众基础有关云云。在南方各地三合会的斗争此伏彼起。

嘉庆十四年(1809),三合会支派的清水会会员胡炳耀等17人在江西崇义无端被清政府逮捕,冠以叛乱煽惑等罪,处以死刑。激起三合会进一步开展秘密反清活动。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广东三合会聚集千余人起义,不断遭清政府镇压,但仍不断斗争。到1827年曾起兵进攻清政府在广东的官吏,又遭挫败。江西三合会组织较严密,势力较强大,与官府抗争,多有获胜,迫使官府免去某些虐政。

道光七年(1832),在三合会的影响与策动下,两广、湖南的徭族起兵反抗清政府。清政府派兵征徭的同时,残暴屠杀三合会众,无辜遇难者达二千余人。如此残害无辜,迫使三合会与徭族联合抗击清兵。徭族利用夜幕,采取田单火牛阵的故智,在羊角上燃上火炬,将羊群驱向清军,清军向羊群进击,徭族乘机突袭清军背后,大败清军,徭族声势大振。不料清政府采取向徭族行贿方式,使徭族向山中退却,造成三合会孤军奋战局面,遭到惨败。

三合会的反清斗争虽然多次惨败,但清政府始终达不到消灭三合会的目的。三合会的秘密活动连绵不断,蔓延的地区日益广阔。道光之后,三合会在南方各地势力有相当发展。据洪门史籍称,闽南、上海小刀会属于三合会支派,这两次武装反清战争,本书另有专题叙述。

咸丰二年(1852),三合会乘太平军北上

节节获胜之机，在两广等地先后蜂起。咸丰四年(1854)广东各州和广西全省，都有三合会员纷纷起义，并占领广东的肇庆、佛山、东莞等地，已形成了包围省城之势，珠江一带完全成了三合会的天下。三合会所揭旗帜，仍是“反清复明”，统率人员大都由能力强者担任，军纪远胜过清军，因而到处受群众欢迎，在群众支持下屡次打败清军。同时对外国人也积极联络，承担保护责任，只要外国人不帮助清军与三合会为敌，决不敌视外国人。但是，列强诸国实际上处处袒护清军，给三合会设置障碍，并利用三合会对外国人友好的政策，列强对运饷广东的清军，一律允许其悬挂外国旗帜，得以安然通过三合军的炮台与军舰之间。当时若无外国侵略者大力帮助清军，不仅广东省，而且整个南方一带，皆可为三合军占领。

1854年11月，广东三富商与三合军为敌，自费备置舰队，运输清兵至佛山与三合军作战，结果三合军获胜，俘获清军将弁45人，而在俘获者中，遇有英、美两国的军队，即行释放，可见三合军对外政策上对外人是十分宽厚的。然而，外国侵略者仍然不思悔改，继续帮助清军。三合军缴获这一舰队后，严加训练，成为水上劲旅，其后在珠江之战中，三合军以这支舰队攻破清军兵舰44艘之多。

三合军终于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来自外国侵略者帮助清军镇压三合军。此外，就三合会本身来说，未重视保护与发展工商业，遭到中外工商业者的敌对。再者，三合会内部各首领间未能紧密团结。在英国人支持清军镇压三合军的形势下，三合军溃败，仅有其中一位首领人物率领会众大半退往广西，其余八千人加入太平军。

1855年，清军对广东三合会成员及广大村民大肆屠杀，“人头滚滚，积成山阜”，“只要清军一到，千万生灵，就断送在他们之手，而且除了斩腰之外，有的还用活剥方法处死，真是神号鬼哭，惨不忍睹。”

清政府广东当局，残暴镇压三合会，但南方各地仍然时时有三合会暴动。当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大军自湖南进入广西又转向广东，复入广西期间，三合军配合太平军攻击清军，并有大批三合军加入石达开部。两广地区的三合会首领人物陈政受清政府收买，竟然暗杀了三合会大首领陈清康，使清军进攻三合军获胜，三合会众又遭残暴屠杀，有些三合会员携家属逃向海外，成为此后海外洪门的主要渊源之一。

同治、光绪年间，两广三合会仍多次武装起事。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惠州府的宁山，有三合军三千人抗官起事，另有石工四百人编为一队应援三合军，后为清军击败，溃散。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合会头领李立亭、洪振年等在广西南宁一带集众起事，连陷各城，席卷全省。仅桂林、梧州二城未为三合军占领，清军见三合军势大，大半向三合军投降。三合军占领广西大部达十个月之久。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合会头领郑弼臣等，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联合，在广东惠州举行武装起义，部队发展到二三万人，但因外绝运输弹药之途径，清援军大增，势不可支而解散。

以上所述洪门三合会的活动概况，可以看出：三合会是南方民间下层顽强反抗清政府的一支社会力量，但由于其仅有落后于时代的“反清复明”的宗旨，未能发动和团结广大劳苦群众，尤其是未有发动农民的纲领与政策；缺乏近代化政党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与先进的意识，其屡次起事屡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三合会斗争史上，最有历史意义的是它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能够成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同盟军。1908年以前，孙中山在南方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大都是依靠洪门会党，主要是三合会与哥老会发动的。本书另列篇幅阐述。

洪门与辛亥革命

孙中山与洪门

在美洲的华侨洪门团体的总称为致公堂。致公堂总部设于旧金山，而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圣路易斯、费城等数十城市，都设有分堂。檀香山、菲律宾、澳大利亚也有致公堂团体，华侨集中之地皆有致公堂会员。华侨列名洪门会籍者，占总数的十分之八、九。

海外洪门形成的历史由来已久。其中一部分是明末清初和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到海外的反清志士及其部众、眷属。如明末清初率领四百余人跑到柬埔寨的莫玖；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往香港的太平天国左天将瑛王洪全福；远去海外的辅王杨辅清（杨秀清之弟）；遁逃婆罗洲的洪日升（洪秀全侄孙）；避居爪哇岛的福建海澄县等地小刀会二元帅黄志信等，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在清朝两百多年的长期统治中不断有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人士出海远遁。这些海外的洪门人士，在世界各地“开山立堂”，念念不忘“反清复明”的宗旨。道光二十九年（1849）和咸丰三年（1853 年），新加坡洪门首领陈正成先后两次潜回福建厦门发动反对清朝政府的武装起义。

海外洪门中也有的是在国内难以维持生计，赴海外谋生的华侨，以及 19 世纪起，作为“猪仔”、“苦力”被贩运或欺骗到世界各地去的“契约华工”。当时清政府对他们漠不关心，他们备受当地政府的压迫欺侮，处境十分痛苦，他们为了自身生存而不得不团结互助，以团结一致的力量对抗当地对他们的压迫，因此，洪门应运而发展兴盛。

海外洪门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史学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1770 年广东梅县石堡人洪门大哥罗方伯等人，在国内犯罪，受当局通缉，遂率天地会会众出国，到现今的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部山口佯挖金矿，以洪门名义，建立起兰芳公司（1777—1884 年），其后称兰芳共和国，推选总长，管理政务，且领有万劳、邦戛等根据地，存在了百余年，才被荷兰人占领。南洋沙劳越矿，多为洪门会党，以石龙门为中心，也常起而与当地官吏作斗争。1857 年，天地会乘沙劳越政府不安定之机，曾率众一举推翻其统治，后英人率土人大举反攻，天地会失利。

1786 年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失败后，大批天地会成员逃到海外。据英国人纽波尔调查，新加坡天地会成立于 1825 年之前。美国的第一个天地会是 1853 年在旧金山成立的。加拿大的第一个天地会组织是 1863 年 3 月 21 日在百驾委路（Barkerville）成立的，当时称为“洪顺堂”，后改名“致公堂”，由广东开平人黄深贵创办，黄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这又看出海外洪门与太平天国的关系。英国的第一个“致公堂”出现在利物浦，时间与美洲各国相差不远。日本天地会

组织主要有“忠和堂”，约成立于1903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尤列到日本后帮助整顿。革命党人陈少白任该堂顾问时，倡议改名为“中和堂”。1904年，骆观明、梁慕光、张积民等在日本横滨发起组织“三合会”，革命党人冯自由、刘道一、秋瑾等都是在日本加入天地会的。秋瑾还被封为“白扇子”。

洪门在海外对外称义兴公司，美洲洪门多称致公堂，其分支为秉公堂、协胜堂、萃胜堂、安良堂等，势力很盛。1899年，梁启超在国安会馆入洪门，在檀香山发展保皇会，接着，康(有为)、梁(启超)在加拿大、美国迅速发展起保皇会。1901年，欧榘甲运动金山大埠致公堂创立《大同日报》，鼓吹改良政治。康有为还诈称奉光绪帝密诏以向华侨骗款，后因分赃不均，发生内讧，华侨始有觉悟。

19世纪初，美国属地檀香山的洪门组织十分发达，以香山为主组成“国安会馆”，以客家人为主组成“和安全馆”，以四邑人为主组成“致公堂”。孙中山于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1896年去旧金山活动，拟发展会员、扩大力量，但因孙中山尚未加入洪门，缺乏社会基础，仅发展了6名会员。当时世界各地，凡有华人车辙马迹，就几乎都有洪门会、堂。如美洲各地的致公堂、秉公堂、萃华堂、瑞端堂和东南亚一带的广义兴、潮州义兴、福建义兴等，山堂林立，名目繁多。1903年仅旧金山一地就有26个山堂。

这些海外洪门组织以“联卫共济，手足互助，患难相顾”为堂规，这是当时海外华侨惟一可以帮助自身对付各种逆境，互助互济，生存自卫的团体。失业的弟兄可以在堂内食宿；缺乏资本时，洪门兄弟可筹款相助；吃了官司时，堂倌代为保释、交涉；遇有红白喜事，会堂协助张罗；遭人欺压时，会堂作后盾；送骸骨故里，堂里接济费用等项。于是各地华侨，特别是小商小贩和劳苦大众，纷纷加入各种洪门堂口。1907年美洲华侨二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二人，“名列洪门会会籍者占十分之八、九。”

这些海外洪门组织，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支援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而革命党人中与海外洪门密切联系的代表人物首推孙中山。

孙中山是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人。出生于珠江口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他自睹水盗、清兵入村抢劫，贫苦农民受官府欺压，心中忿忿不平。就以他自己家来说，他祖上数代前，曾变卖田地，变卖时按一般习惯用白契转手，而未花钱给官府改作红契。后来家境败落，一贫如洗，但在官府的粮册上孙家仍是田主，不得不每年按册交纳赋税及向征税官吏行贿。这些社会黑暗、政府腐败现象，已引起了他的愤恨。而他家乡一带正是洪门帮会活跃地区。“翠亨村附近一带乡村如石门坑、信福隆、峨嵋、大象埔、山门等，都设有三合会的武馆。孙中山常和村塾同学杨帝贺、孙梅生等，偷偷跑去观看三合会员练习技击。回到家里，便仿效起来，舞弄拳棒。”

孙中山十二岁之后，长期生活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这些地方的天地会、三合会的活动，对孙中山的早期反清思想大有影响。孙中山与洪门的联系，最初约在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中法战争期间，孙中山正在香港英国当局所办的中央书院(1889年改名为维多利书院)就学。当时在香港英商船厂的中国工人，拒绝修理法国战舰，举行罢工，码头、驳艇、旅店等业工人群起响应，使孙中山深受鼓舞。他认为这些足以“证明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1886年，广东惠州宁山地方“有三合军三千，抗官起事”。这些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促进了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思想，并使之开始了联络洪门的工作。1886年，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学堂就读，同学中即有洪门成员。据孙中山所说：在同学中结识了郑士良，“其为人豪侠仗义，广交游，

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孙中山一见到此人,就认为是个奇才,稍熟悉后,则与郑谈论革命,郑对于孙所说的革命道理心悦诚服,并告诉孙,他加入了洪门,"如他日有事",可为孙"罗致会党以听指挥"。

会党为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结社的总称。其实是以洪门天地会与哥老会为主。这些民间秘密结社,长期来既缺乏先进阶级的思想武器,也缺乏先进的组织形式,他们虽有强烈的反抗性和巨大的潜力,但斗争成效甚微,总是呈此伏彼起的小规模分散状态。他们中具有文化知识的先进的首领如郑士良等人,认识到,需要争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先进的思想来武装自己,也需要接受如同孙中山这样的先进的革命志士的领导。郑士良曾向孙中山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

孙中山在这期间所交往的多属洪门人士,除郑士良外,还有尤列、陈少白、杨鹤龄等,孙、尤、陈、杨四人,宣传革命言论,被人们称为"四大寇"。

1888年郑士良辍学回家乡归善,于淡水墟开同生药房,"专从事联络三合会党,为举事之预备。"1893年冬,尤列提供广雅书局扩风轩为秘密聚会所,孙中山就曾在这里邀集郑士良等人召开兴中会筹备会,并于会中提出"驱逐鞑虏,恢复华夏"的宗旨。为以后兴中会的成立作了准备。这也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初与洪门合作并领导洪门反抗清政府的政治纲领的最初的表达。

孙中山在未成立兴中会之前,在香港九龙准备开"大陆山",邀请海内外洪门代表前来集议,洪门人士认为孙中山在洪门中还缺乏资望,未给予切实的支持,孙中山成立"大陆山"的计划落空了。为了利用洪门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伙同毕永年、平山周等人,从广州赴湖南邀请洪门李华棠大哥游长江各省,并请其在上海主持联络会众。

1894年10月,孙中山在郑观应帮助下,从上海经日本赴檀香山,向当地华侨宣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11月24日,孙中山借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寓所召集赞成反清革命主张的侨胞二十多人开会,正式建立了兴中会。二十余名华侨革命志士高举右手,跟着孙中山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宣告诞生了。誓词中的"驱除鞑虏",是要推翻满清贵族的反动统治;"恢复中国"就是要拯救中国的民族危机,恢复以汉族为主体的"堂堂华夏";"创立合众政府",是要在推翻清政府之后,以建立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国。这比洪门的"反清复明"宗旨要进步得多,这是适应历史发展趋向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纲领。至于誓词中的"倘有贰心,神明鉴察",正反映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造洪门时又受到了洪门的影响,这种"倘有贰心,神明鉴察"正是继承了洪门"三十六誓"中的形式。

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在这一章程基础上,经修订补充,于次年2月21日,又订立了《香港兴中会章程》。在这两个章程中指出了列强侵略中国和清政府腐败无能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宣布"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

章程中还发出了"联结四方贤才志士,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力为推广,晓谕愚蒙"。这也就是要广泛联络爱国志士,"群策群力"共同救国。章程中还规定了拟举办一系列"利国益民"的实事。

兴中会的纲领和章程中反映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比洪门系统的民间秘密结社的政治目光远大、政治视角宽广。

兴中会后,洪门三合会、哥老会……之类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结社,被

统称为会党，兴中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会党的桥梁，也是联络会党的总司令部。同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系农民的“桥梁”。从此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并依靠会党发动武装起义的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与会党的联合中，既吸收了会党口号中“反清”的合理成份，又扬弃了其“复明”的陈旧观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剔除了会党的种族复仇主义的落后观念，而吸取了其反抗民族压迫的要求，同时也吸取了会党的平等互济思想以作为自己的民权主义的思想营养。

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使会党得到改造，同时洪门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搭起了联系群众的桥梁，使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下层群众中取得革命力量源泉。

1895 年 2 月，孙中山在会党人士郑士良、朱贵全、丘四等人的帮助下，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会。兴中会香港总会的会员中，会党分子占百分之三十。更加说明了兴中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合作并领导会党的“司令部”。

孙中山在兴中会中吸收了大批会党（主要是洪门）成员。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依靠会党首领郑士良等联络广东沿海的三合会，为了通过联络会党联合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而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内设立农学会。洪门三合会加入农学会的甚多，可分为顺德、香山、北江三路。顺德一路由陈锦胜统率；香山一路由李纪杞与侯艾泉统率；北江一路由刘裕统率；另有龙眼洞一路，由一位姓麦的人士统率。3 月 6 日，兴中会香港总部决定于广州举行起义。潮汕方面吴子林率领的三合会群众也准备响应广州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口号为“除暴安良”，意思是推翻清朝暴政，解救百姓出水火。这次广州起义计划，因失密而失败。

1899 年秋，孙中山为了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派陈少白回香港组织机关，联络会党，创办兴中会机关报。随后又派史坚如与兴中会会员毕永年等，偕日本人平山周到长江、湘江一带联络哥老会。两湖哥老会龙头大哥李云彪、张尧卿、杨鸿均、辜鸿恩、辜天佑、季堃山、师襄等，与闽粤三合会大佬曾捷夫、林海山、曾仪卿等，均约集于香港，于孙中山所创的《中国日报》馆集会，经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于次年春 3 月举行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联合大会，参加者除上述各会党领袖外，兴中会的参加者有史坚如、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毕永年等，为议定武装起义大计，决定三方面合并统称兴中会名称。后曾改为“兴汉会”。议定纲领三则，会员歃血为盟，公举孙中山为总会长。当时，孙中山还在日本，总会长的大印交由日本人宫崎寅藏携带到日本呈交给孙中山。但兴汉会是一个缺乏稳固信仰的松懈联盟，并且也暴露出会党组织在政治上的不稳定性。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头目，很快就惑于重利，转投保皇派。仅珠江流域的三合会经过郑士良的工作，坚定地拥护民主革命。

1900 年，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主要是依靠洪门三合会。7 月间，孙中山为了拟订惠州起义计划，亲自由日本乘船到达香港，在香港附近海域的轮船上召集同志举行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这时，除了长江会党与福建、两广会党与兴中会合并的有利条件外，又正值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政府正在内外交困。孙中山选择了这一发动起义的有利时机。孙中山的指挥总部设在船上，三合会成员邓耀担任孙的警卫人员，洪门领袖人物郑士良为前敌指挥，会党首领黄福充任起义军的先锋。黄耀廷等率会党志士二百余人前来参加起义。10 月 6 日，惠州起义爆发，黄福率八十余人猛扑沙湾，斩敌四十，夺枪四十，擒敌三十余，首战告捷。起义军声势大振，与清军激战，连战告捷。至平新、梁

化等地，三合会志士江维善、梁慕先又率众来参加起义军，因此，义军所至，声势越来越大。据孙中山事后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起义发动时，史坚如奉命入广州，招集同志响应起义。……郑士良奉命亲率已集合于三洲田的队伍，攻击新安、深圳之清兵，尽夺其械。“随而转战于龙冈、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处，所向皆捷，清兵无敢挡其锋者”。遂占领新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之地，以等待孙中山与干部人员到来，及接济武器。……郑士良连战月余，弹药已尽，而集合的队伍足有万余人，渴望干部、军官及武器十分迫切，而忽得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义士山田良政报告消息，得知整个形势已十分不利，遂立即解散，率其原有数百人间道赴香港。郑士良在惠州苦战和史坚如在广州的响应，皆不得当，“遂决意自行用炸药攻毁两广总督德寿之署而歼之。炸发不中，而史坚如被擒遇害”。这是继陆皓东后的为共和殉难的第二健将。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却开始了孙中山领导会党工作的新阶段。孙中山在这次起义中看到义旗所举，从者如云，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二万人，这对孙中山是个很大的鼓舞，使他看到下层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同时也初步看到了会党散漫性的缺点。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并没有灰心，而是进一步联络会党进行斗争。此后，孙中山发动了八次武装起义，其中主要骨干如许雪秋、邓子琼、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都是会党领袖人物。他们协助孙中山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每次武装起义都有会党参加，有的以会党为主体。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发动新军为主要工作之前，是以发动会党为主要工作的历史阶段，虽然都失败了，也为推翻清政府作出了贡献。即使以后的第九次武装起义，虽然已由发动会党转为策动新军为主，但联络会党的工作并未中断，仍联络会党配合新军。至于第十次起义，即3月29日的广州之役，虽然有广泛的阶层参加，但会党人物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

孙中山在联络会党、发动和领导会党进行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注重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引导会党。由于会党的首领人物在组织内部有绝对权威，孙不得不将主要力量用在联络会党的首领人物身上。为了联络感情和取得密切合作，孙中山有时也不得不对会党的政治思想意识和落后的习惯势力作一定的让步。由于会党的成份往往以游民和其他下层群众为主，不是纯粹的农民组织，又加以孙中山仅注意发动会党的武装起义，忽视了联络广大农民，尤其未能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入手，发动起广大农民，因而，多次武装起义未能收到更大的成效，也未能在国内广大农村中形成强大的革命影响，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软弱性的一种表现。也是辛亥革命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孙中山于檀香山准备再次赴美洲宣传革命时，深感美洲华侨较檀香山多，且力量巨大，但如果不亲自加入洪门，就无法利用美洲华侨的人力、财力。因此，听从舅父杨文纳的建议，请洪门前辈叔父钟水养（又名钟国柱）介绍，于1904年1月11日，加入檀香山洪门致公堂组织“国安会馆”。这一天同时拜盟者有六十余人。正当孙中山到国安会馆举行入会仪式时，这个国安会馆（即同兴公司）中有列名保皇会籍的分子，竟提议阻止孙中山入洪门，幸得到钟水养仗义执言说：“洪门宗旨，在于反清复明，招贤纳士，孙逸仙先生所倡导的革命目的与洪门宗旨相符，何以拒绝而不许加入？”反对者才哑口无言，孙中山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遂得以加入洪门，由主盟人某大佬封为“洪棍”。洪门称元帅为洪棍；另一说法是“棍”即先锋，故洪门中人皆称孙中山为孙大哥。当时孙中山加入洪门的会员名册，现仍保存于檀香山。兹节录如下：

天运甲寅癸卯年吉月十一月念五念四

日，在会馆大放洪门招贤纳士

归邑　高华　领票　林璋　保

香邑　邝林　领票　郑裕文　保

香邑　黄信　领票　陈佩　保

香邑　程天恩　领票　梁福　保

香邑　梁泽袍　领票　古福三　保

香邑　梁正　陈保　保

太岁大吉大昌　五祖　保

香邑　程显　甘连贵　保

香邑　孙逸仙　领票　钟国柱　保

香邑　林先　陈保　保

1904年3月11日，孙中山抵达旧金山，这时檀香山的保皇党人，因怀恨孙中山，探悉其赴美日期，密报旧金山的保皇党设法阻止孙中山入境。当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时，担任税关翻译的保皇党人，向美国税关长官控告孙中山入境护照系伪造。孙中山因此一到旧金山即遭移民局扣留。幸而孙中山由檀香山启程时，檀香山洪门曾电告旧金山洪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电云孙大哥某月某日由檀香山启程，某日至旧金山，请派员前往迎接等语。黄三德届时前往接船，未见孙到，心起疑惑，前往查询，得知孙中山受人陷害，困于码头木屋，于是与《中西日报》社长伍盘照等，延聘律师向当局解释，致公堂英文书记兼《大同日报》总理唐琼昌等以五百美元保出孙中山，并雇请律师向首都华盛顿当局申诉，才使孙中山脱难。孙中山与美洲洪门这一初次相会之日，也正是得到美洲洪门援救之时。

孙中山留美期间，洪门致公堂对孙礼遇倍至，彼此亲如兄弟。孙中山也相机对他们宣传洪门的历史与革命的宗旨及革命的前途。美洲致公堂负责人经孙中山的宣传，才明白洪门致公堂创立的历史过程，对洪门的宗旨才有了正确的认识。美洲洪门致公堂遂开欢迎大会欢迎孙中山，并对保皇党陷害孙中山的勾当，表示极大的愤怒。

美洲华侨十之八九加入了致公堂，总部设于三藩市，各埠设有分堂，总堂与分堂缺乏联络，主张常不统一，又加上保皇党人从中破坏，几乎忘掉了反清复明的本来宗旨。基于这种情况，孙中山与黄三德大佬往各埠演说洪门宗旨，议论中国时事，并建议举行洪门总注册。孙中山亲手代致公堂拟定新章程。新章程将反清复明范围更为扩大，使洪门成为一个革命团体。新章程分纲领、权限、专责、保卫、薪俸、进款、支款、办法八章，下署“金山大埠致公堂订”。第一章纲领部分提出：“本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整的纲领。这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注入了洪门致公堂新章。这是孙中山改造洪门并依靠洪门的突出表现。

孙中山预计，通过洪门致公堂总注册，可以解决革命经费问题。当时美洲华侨七万人左右。如每人征收注册费美金三元，即可得款二十一万美元，足可充作国内发动起义的经费。为了争取各埠致公堂赞助总注册，孙中山由黄三德陪同前往各埠宣传，受到了各地分堂的欢迎。在纽约有雷月池、黄溪记，在波士顿有梅宗炯，罗省有杨廷光、吕统积，在山之古有谭淦明，在纽柯连有陈秋谱等均表示赞助。但华侨中不少人因父母妻子在国内，而对于捐款在国内起事有顾虑。结果注册费未能达到理想。不久，孙中山将美洲的革命工作交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办理，自己赴欧洲活动。

孙中山在美洲的重订致公堂新章要义，对美洲华侨革命工作，关系重大。

《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要点如下：

“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联盟结义，声应气求，民族主义赖之而昌，秘密结社因之日盛。早已遍布于十八省以及五洲各国，凡人所到之地，莫不有之，而尤以美国为隆盛。盖居于平等自由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结合联盟，皆无所禁，

此洪门之发达，固其宜矣。惟是向章太旧，每多不合时宜；维持乏人，间有未惬众意。故有散漫四方，未能联络一气，以成一极强极大之团体，诚为憾事。近且有些背盟负义赴入歧途、倒戈相向者，则更为痛恨也。若不亟图振作，发奋有为，则洪门大义必将沦隳矣！有心人忧之，于是谋议改良，力图进步，重订新章，选举贤能，以整顿堂务，而维系人心。夫力分则弱，力合则强，众志可以成城，此合群团体之可贵也。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万余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故平时则消息少通，有事则呼应不灵。以此之故，为外人所轻藐、所欺凌者，所在多有，此改良章程、维持堂务所宜急也。”

这两段话说明了改订新章是为了使洪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也是为了更好的加强洪门的团结统一。

新章又指出：

“语有之曰：‘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若无同志以相维护，相赒恤，一旦遇事，孤掌难鸣，束手无策，此时此境，情何以堪！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一也。本堂人数既为美洲华人社会之冠，则本堂之功业亦当驾乎群众，方足副本堂之名誉也。乃向皆泄泄沓沓，无大可为者，此又何也？以徒有可为之资，而未有可为之法，故虽欲振作而无由也。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本堂请同黄三德大佬往游各埠，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各埠同人始如大梦初觉，因知中国前途，吾堂实有其责。先生更代订立章程，指示办法，以为津导。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时而兴矣！”

这些话说明了洪门“联合大群，团集大力”的必要。而孙中山先生游美及关于洪门宗旨的演说，大大启发了洪门会众的觉悟，洪门欢迎孙先生帮助改订章程和指示办法。

《改订新章要义》中在论述了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时指出：

“今之时代，不争竞则无以生存，此安南印度之所以灭也；惟争竞独立，此美国、日本之所以兴也。当此清运已终之时，正汉人光复之候。近来各省革命风潮日涨，革命志士日多，则天意人心之所向，吾堂以顺天行道为念，今当应时而作，不可失此千载一时之机也。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二也。”“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铁路也，矿务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本堂洞悉其隐，不肯附和，遂大触彼党之忌，今值本堂举行联络之初，彼便百端诬谤，含血喷人。盖恐本堂联络一成，则彼党自然瓦解；而其所奉为君父之满贼，亦必然覆灭，则彼汉奸满奴之职，无主可供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凡吾汉族同胞，非食其肉，寝其皮，无以伸此公愤，而挫兹败类也。本堂虽疲驽，亦必当仁不让，不使此谬种流传，遗害于汉族也。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三也。”

这些内容反映出在反清的政治目标上，洪门的民族主义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是基本一致的。

重订新章的《纲领》部分的条款共有十七条。其中规定：“本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可见新章中的

宗旨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纲领是一致的。其中也规定了"凡新进堂友须遵守洪门香主陈近南遗训,行礼入闱。"这又反映出保留了洪门的传统。条款中又有:"所有堂友无论新旧,其有才德出众者,皆能受众公举,以当本堂各职"。这就改变了以往洪门中依照三十六部半的等级排列的封建等级制和落后的人事制度,而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形式,进行"受众公举"。

新章废除了龙头大哥的终身制以及"三十六部半"的晋升制,规定:"总理协理以四年为一任,管理银核数一年为任,议员由初举时执筹,分作三班,第一班一年为一任,满期照数选入补充,或再留任;第二班两年为一任,满期选补,第三班三年为一任,满期补充。如是议员之中,常有三分之二为熟手之人。""判事员为长久之任,若非失职及自行告退,不得易人。判事陪审员分两班:第一班为一任,满任由总理择人充补;第二班每年为一任,满期择人充补如之"。这些规定体现了组织制度上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原则,取代了以往的小生产者和游民的封建性的原则。

此外,《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中还规定了权限、专责、保卫、薪俸、进款、支款、办法等项。都具体反映出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致公堂的领导与改造精神。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多次武装起义所用经费,其中包括购买军火的费用,主要是靠海外华侨的捐助。在这些捐助中,又主要依靠了洪门致公堂的努力。自1895年至1911年4月发动的十次武装起义中,所捐款额约百万元以上,其中,1907年至1908年第二至第八次起义,就捐助了六十余万元。

1910年夏,孙中山经日本到达南洋,10月间,在槟榔屿召开会议,邀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商讨大计。这时新军同志逃来南洋的很多,孙中山依靠会党支援对其生活费用予以接济,并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要振奋精神,继续斗争。10月12日于槟榔屿再开秘密会议,参加者除黄兴、赵声、胡汉民外,南洋各地会党黄金广、吴世荣、熊王珊、林世安、李孝章、邓泽如等,也踊跃出席。为了筹集巨款,孙中山作了动员,于是"一夕之间,则醵资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到各埠分头劝募,数日之内,已达五六万元,而远地更所不计"。有了这些经济力量,于是才策划了在广州发动大规模起义。议定由黄兴、赵声、胡汉民回香港组织革命统筹部,孙中山随即赴欧美致力筹款。此时孙中山曾致书与美洲致公堂同志,请其为武装起义筹款。原函为:

"前函所云需十万元,乃能布置周到而实收成功之效者,非待十万到齐而后发。刻下已开始陆续布置、在需款矣!此次之动,乃因日俄协约,时势甚急,岌岌不可终日;而内地革命风潮亦已普及,军心民心,皆同归向,……决意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虎一搏。有十万元,为事前之布置,固起;无之,亦必冒险而起也。"

美洲致公堂接到孙中山的信后,立即筹款募捐,当时以加拿大华侨最为积极,当时冯自由正在加拿大,乃约集热心于革命事业的华侨青年出力支持,冯后来函请孙中山赴加拿大一行。孙中山于1911年1月2日到达温哥华,即与致公堂大佬陈文锡、书记许昌平及各职员发起洪门筹饷局,别名国民救济会,事务所附设大汉报。众人推举刘儒堃为会长,岑发琛为副会长兼司库,马廷远、陈文锡、冯自由为监督,陈榛如为中文书记,黄希纯为英文书记,积极展开筹饷工作。为了急需筹款起见,当地洪门将致公堂现有楼房向银行抵押。当时加拿大致公堂在维多利埠。总堂盟长马延远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首先将公产抵押,借款筹饷,各地致公堂多相继抵押公产,借款筹饷。维城致公总堂公产抵押于银行,筹得港币三万元。温哥华致公堂公产,抵押港币一万元。都郎度(多仑多)致公堂亦将公产抵押得港币二万元。孙中山偕谭义大佬(加拿大东部致公堂盟长)、李汝大佬

(加拿大中部致公堂盟长)由加拿大西部起,途经各埠而至加拿大东部,沿途向各致公堂演讲,宣传革命,共筹得港币三万余元。连前共筹得港币八万余元,汇往香港。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之役,用款共约十六万元,而加拿大致公堂所汇之款约占半数。

香港统筹部收到这些捐款后,曾由黄兴、赵声、胡汉民联名致函维多利致公堂申谢。原函云:

> 致公堂同志列位仁兄大鉴:前日收到尊处汇来军费三万元,当即电复温哥华转达,想已收悉。此间诸事俱已着实进行规划,以两粤为主,而江湘鄂亦均为布置,经济问题,自得尊处巨款后,亦已解决过半,若美洲旧金山埠等皆能实力相助,则成功必矣。
>
> 尊处同志闻系先变产业以急应军需,热度之高,询为海外所未有,同人等不胜感服,内足以振作战士之气,而他埠同志闻风而起者,亦当踊跃倍于寻常矣。不审中山君此时尚在英属否?各埠致公堂情义相通,尊处以大力为倡,想必已有电函转告,便皆倾力赞助,事甚迫,于现时多得一分之经济,不止有百十分之效力也。专此奉报,即颂义安!

当时,冯自由任职于温哥华《大汉报》,奉孙中山之命发动劝募革命军饷,非常卖力,当时香港统筹部主持人黄兴等曾联名致函冯氏申谢,原函云:

> 自由我兄大鉴:连接手书两通,敬悉。自前次收到维多利致公堂款三万元后,即具公函作复,并请转寄一函向维埠致谢,想俱收览,昨午得来电,知温哥华又汇到一万元,以加拿大一属而筹得如许巨款,兄赞助之力,必不及此,佩感何似。弟兴、声、汉民顿首。二月十二日。

1911年,孙中山第六次赴美洲,在古巴、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先后成立同盟会分会。孙中山推动了美洲洪门致公堂与同盟会的联合,组成洪门筹饷局,筹款四十余万元。

6月间,孙中山抵旧金山。他总结以往革命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致公堂与同盟会不能密切合作。他倡议旧金山致公总堂与同盟会实行组织联合,即命令同盟会会员一个个加入致公总堂,实行“堂内合作”,以便于合作筹款。

孙中山倡议致公堂与同盟会实行组织联合的设想早已有之,在他1905年1月在欧洲留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时,曾主张使留学生加入会党,从而改变会党的组织成份,结果留学生意见不一致,欧洲缺乏美洲那样的海外洪门的社会基础,孙的愿望未能实现。同年10月,孙抵西贡,为统一当地革命组织,促使当地分散的洪门团体加入了同盟会,形成了“会内联合”方式的组织上的联合。但孙中山倡议旧金山实行“堂内合作”时,同盟会员认为参加洪门的手续烦琐,不愿加入。孙中山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大同日报》司理唐琼昌商议合作方法,由致公堂开特别会,删除繁文缛节,简化入会仪式,优待同盟会员加入。获得黄、唐赞同,遂由双方各在《大同日报》与《少年中国报》刊登联合布告,以示宣告合作。

《同盟会与致公堂联合布告》

> 洪门为中国提倡排满革命之元祖,而人称致公总堂之改良新章,更与本会三民主义相合,原可互相提携,共图进取。惟洪门内含有秘密性质,而本会会员尚多未入洪门者,故不免窒碍。今得孙总理驾抵金山,主张联合,而致公总堂开特别会,以招纳本会会员之未加入洪门者。本会集议全体赞成,特此布告各埠会员一体遵照,以成大群,合大力,而共图光复之大业,是为厚望。天运辛亥年五月二十二日,三藩市中国同盟会启。

《致公总堂布告》

孙文大哥痛祖国沉沦，抱革命真理，遍游五洲，驾抵金门，与众义兄聚集，倡议与同盟会联合，结大团体，匡扶革命事业。同盟会员热心祖国，全体公议，其未进洪门者一律入闱，联成一气。本总堂叔父大佬义兄备极欢迎，开特别招贤之礼，以示优遇，尽释从前门户之分别，翼赞将来光复之伟业，扫虏廷专制恶毒，复汉家自由幸福，仰我洪门人士一体知悉。须知招纳天下英才，乃本总堂之主义，特此布告，是为厚望。天运辛亥五月二十二日，美洲大埠致公总堂启。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海外华侨的捐款活动更加积极。经孙中山提议，美国、加拿大各地同盟会和致公堂联合设立“洪门筹饷局”，在半年中筹集十四万四千一百三十元四角一分。并由孙中山拟订洪门筹饷局缘起章程及革命军筹饷约章若干款。

洪门筹饷局对外的名称为“国民救济局”，办事处设于旧金山波士波福街三十八号致公堂三楼，局中职员由致公堂和同盟会推举黄三德为监督，朱三进、罗敦怡为总办，李是男为会计，其他职员也由两团体各推十余人担任。该局成立于1911年6月26日。经孙中山提议先电汇香港一万元予黄兴领导的革命统筹部。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杨笃生在英国愤而自杀，赵声不幸突然逝世(赵认为胡汉民之弟胡毅生在起义中违反军纪，应按纪律处死，但胡汉民袒庇其弟，未能处分。有一天晚上，赵声在胡汉民家中食粥，回寓后，腹中剧痛，旋即毙命。赵声之死为历史疑案)。黄兴则悲愤填膺，准备采取暗杀手段以为烈士报仇。因此，这一万元电汇黄兴处，拟作为暗杀机关的经费。两个月后，清政府的将军凤山被炸死于广州，正是这个机关策动的。孙中山还令洪门筹饷局印刷一种中华民国金币券。

1911年9月间，芝加哥同盟会建议购买飞机作为军用。经筹款局核准，至10月初，购买寇缔司式飞机六架，于11月12日运到上海，孙中山派人迎接。袁世凯听到革命党人已有飞机的消息后，乘机迫清帝退位，“声称倘不即议共和，行将轰炸皇城”。“故飞机队对促成共和，其功不少”。

孙中山于11月13日(即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由沪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十月间，洪门筹饷局办理结束，三个月内，共计筹美金十四万四千元。中南美洲致公堂均有捐款，尤以墨西哥致公堂为多。筹饷局结束后，海外洪门在武汉首义的振奋下，仍有大量捐助，“有一人捐几百元者，有一人捐几千元者，甚至一人捐几万元者。”

孙中山在他所写的《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中，特别写了一段他对洪门的认识。

孙中山认为：洪门为明朝遗老所创立，起源于康熙时代。在康熙之前，明朝的忠臣烈士为反清复明而斗争，誓不臣服于清朝，舍生赴义，但屡次斗争，都失败了。到了康熙年间，清朝势力已强盛，而明朝的忠臣烈士也死亡殆尽。少数明朝遗老看到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计划将民族主义的根苗流传给后代，因而组成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团体，以待后人起来抗清。这原是洪门创立的本意。但是，为了防止清朝政府察觉，这一活动只能绝对秘密的进行。因为清政府的爪牙是官吏，而官吏的耳目又是士绅，因此，他们认为凡是士大夫之类的人士都需要严加防范，秘密团体杜绝知识分子加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长期潜伏于清朝专制政府下蔓延滋长。这只是立会的条件，那么通过怎样的途径与办法才能够使洪门会创立、存在而不断发展呢？这就必须遵照符合群众心理的措施，来传播民族国家的思想。所以洪门拜会，举行一系列仪式。传布民族主义思想时，则以打抱不平，复仇的事例来引导，这是最容易激发常人感情的。其口号、暗语，则以下层社会粗俗的语言来表达，这是最容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避

而远之的。为了加强团体内部的团结，在团体内部互相爱护，“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这是最符合江湖间旅客、无业游民的需要的。而这些都是为其最终目的服务的，其最终目的是传播民族主义，以实现“反清复明”之目的。洪门在国内和国外的团体，因其环境不同，在结社目的上有所差别，国内的会党常与官吏发生矛盾冲突，所以他们不忘其与清政府处于反对地位，对于“反清复明”的口头语，尚能够了解其含意；而海外的会党，大都处于别国自由政府之下，其结会的需要不在于反清复明，而仅仅在于“手足患难之联络”的互助目的，政治意味完全消失了，所以他们大都不明白“反清复明”口头语的意义。当孙中山本人在美洲宣传革命的初期，海外洪门人士也不明白孙中山的政治宗旨，孙反而问他们“反清复明”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大都回答不出。后由在美洲的革命同志鼓吹革命多年，而洪门之众才知道他们的组织“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

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而风气闭塞、听到革命就害怕，这和别处的华侨并无多大区别。革命党同人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的，经数年努力，而接受革命思想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比例尚不及百分之一。向海外华侨宣传革命，其困难就更可想而知了。国内的人，听到革命排满的言论不以为怪的，只有会党中的人员，因为这与他们反清复明的宗旨是一致的。然而，会党群众大都文化知识浅薄，团体散漫，没有力量凭借，他们只能响应革命，“而不能用为原动力”。

从上述孙中山对洪门的看法上可见，孙中山认为洪门本来具有“反清复明”的政治宗旨，但海外洪门与国内洪门因环境不同，在性质上已有区别。海外洪门从其实际需要出发，不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并且世代相传中，早已忘掉了“反清复明”这一政治宗旨，而成为华侨中的同甘共苦的互助团体，它的生命力在于团结互助。而国内洪门因面临清政府的压迫，除了互助性之外，还有“反清复明”的政治要求。

但海外洪门由于接触到资本主义近代文明，民主主义思想有一定基础，经过革命宣传，他们出于爱国热情，积极反对清政府的封建专制与腐败，能够热情支持革命。国内的洪门，虽能够基于其“反清复明”政治目的中“反清”的要求，能够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并具有相当的战斗性及反抗性，但，他们是以游民小生产者为基础的，孙中山认为他们“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这是从与会党联合的革命实践中得到的可贵的认识。然而，孙中山尚未认识到广大农民群众可作为“原动力”，未曾致力于发动农民，这是政治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与国内会党的合作，只能算是松散的联盟，难以克服会党的散漫性。国内会党也没有全面的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逃亡日本，袁世恺于 11 月下旬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也被取消议员资格，革命党人在国内已无法合法活动；同时，国民党内互相不团结，有的完全丧失斗志，声称今后不谈革命，或称十年后再说；更有此无耻之徒卖身投靠袁世凯。孙中山在日本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他把失败原因归结为国民党品类不纯，在斗争的关键时刻，许多党员不听指挥。因此，他认为，继续开展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比国民党纯洁的、有信仰的、有纪律的新的革命党。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 1914 年 7 月在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任总理，“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孙中山力图清除积弊，重新建党以发挥领导反袁的战斗作用，这是正确的，但，为了纠正“党员有类于散沙”、无法

统一指挥的弊病，要入党者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还要在誓约上加盖指模，这就效法了洪门帮会组织的封建家长制。

中华革命党成立不久，孙中山于 7 月 29 日发出致南洋各埠洪门同志函，孙中山在函中强调了革命党员服从党魁的重要性，指出“此次组织革命党事，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条件。凡入党各员，无论其前隶何党，无论其党籍之新旧，必须其宣誓服从，毫无疑义而后可。”孙中山信中又说：“望诸同志固结团体，振起精神，再做革命工作，爱党爱国，洪门之责任也，亦弟之厚望也。”同年 11 月，孙中山又发出《各埠洪门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通告》，通告中阐明了反袁斗争和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意义，在肯定洪门革命历史的基础上，指出“种族革命无妨多立秘密机关，以为分头并进之活动；政治革命则仗义执言，非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足以耸国民之视听，而避外邻之干涉。今日无论各种团体，均已一体改并，万流汇源，实此意也。”这也就是说，以往洪门的秘密结社状态，能够适合反抗清政府的种族革命的需要，但目前反袁的政治斗争，需要统一的革命组织，否则就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接着他以洪门成员的身份，也以中华革命党领袖身份，要求各埠洪门“全部填写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各埠洪门的对外联络名义，仍然可一律照旧，但“其内部则一律按照总章、通则，改组中华革命党支部，以免消息隔阂，而收指臂相助之妙用”。孙中山要求洪门同志“极力提倡国家主义，而破除门户各立之微嫌”。孙中山最后说：“倘天佑民国，完全之目的能达，则洪门之名誉事功将来益垂无穷矣。”

显然，孙中山此时将洪门看作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同时也认为洪门原有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政治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而要求将洪门改组为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华革命党的支部。这在洪门历史上是一页具有重要意义的记录。

秋瑾与洪门

秋瑾由李自平（冯自由之妻）介绍，在日本横滨加入了洪门三合会（又称三点会）。

秋瑾（1875—1907）原名闺瑾，乳名玉姑，字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为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1907 年被清政府逮捕，壮烈牺牲。早在 1893 年秋瑾随其父入湖南。1896 年嫁于湘潭富豪子弟王廷钧。1903 年，王廷钧捐纳为户部主事，秋瑾随王进京。在京期间，阅读新书报，关心国事。1904 年夏，秋瑾自费赴日留学，进了中国留学生会馆办的日语补习所补习日语。同年秋季，资产阶级革命家、湖南衡山人刘道一（字炳生）来到同是湖南留日学生王时泽的住所，邀集同志参加一个“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的秘密组织。两三日后，冯自由与大家约定某日晚饭后，在横滨华人聚居的一条街上的一家广东商店中举行入会仪式。入会者共计十一人，其中有秋瑾、刘道一、龚宝铨、王时泽等。首先由冯自由向大家交代宣誓的问答语，让大家在宣誓时依样回答。随即由梁慕光主持宣誓仪式。“他手执钢刀一把，架在宣誓人颈上，由各人依次宣誓。”梁问：“你来做什么？”宣誓者回答：“我来当兵吃粮。”问：“你忠心不忠心？”答：“忠心”。问：“如果不忠心，怎么办？”答：“上山逢虎咬，出外遇强人。”全体宣誓毕，梁与冯自由横牵一幅六七尺长的白布，上书斗大的“翻清复明”四字，命各人俯身鱼贯从布下穿过，以示忠于主义。又在室内烧一堆火，命各人从火上跳过去，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然后分别刺血，宰了一只大雄鸡，共饮雄鸡血酒。冯、梁两人当场宣布这个团体叫做“三合会”（取合天、合地、合人之意）。随后又向新入会者交代了一些规矩，如见面时手势和问答语，进门要先跨右脚，握手时要捏紧对方的无名指，等等。最

后，每人交纳入会费十日元。当场有人被封为“洪棍”，秋瑾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刘道一被封为“草鞋”（俗称将军），这是“洪门三及第”。这一史实说明秋瑾曾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洪门，而当时的入会仪式是比较简单的。与此一致的记载是，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三集中，以及徐双韵在《记秋瑾》文中，也都证实了秋瑾在日本横滨留学时加入洪门的事实。秋瑾加入洪门，与她准备发动会党进行革命活动是分不开的，她回国后在浙江和洪门系统的各派联络，发动了武装起义，都与她加入洪门、被洪门视为自家人有关。

1905年秋瑾回国，经徐锡麟介绍在上海加入光复会。7月再赴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初又回国，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后与陈伯平等以锐进学社为名，运动长江一带和浙江地区的会党，作起义准备。1907年秋瑾在绍兴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堂工作，后为该校督办。秋瑾等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组织“光复军”。将“光复”职员分为十六级，以七绝诗一首为表记。诗曰：“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即从黄字起排到使字，共十六级，推徐锡麟等五人为黄字辈，即首领，秋瑾自居于祸字辈，为协领，源字辈为分统，以洪门首领担任。溯字辈为参谋，也以洪门红旗等担任。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职。

秋瑾将洪门各部编制为八个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八军记号。与诸同志议定，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应，等待杭州清兵攻击金、处时，即以绍兴义军渡江袭击杭州，入军学界为内应。若攻不下杭州，则返回绍兴，入金华经处州出江西以通向安庆。因有人告密，秋瑾急忙派人赴安庆通知徐锡麟，徐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恩铭，自己也被捕壮烈牺牲。清廷大为震惊，随即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派人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7月15日凌晨，就义于绍兴轩亭口下。

浙江洪门所开设的山堂称为九龙山，具有“反清复明”的含意。浙江省并没有地理意义上的九龙山，九龙山原在安徽凤阳。传说明太祖朱元璋的父母讨饭到安徽凤阳，其父病死，家中买不起棺材，只得以席子卷上尸体抬到城西南山掩埋。兄弟两人抬着尸体走到半途中，遇到狂风暴雨，无法行走，只得将尸体安置于山坡下，暂时找个地方避雨。暴雨通宵，次日天明时风雨停息，只见尸体已被风雨冲下的山土掩没，自然地形成了一座坟堆。据风水家的迷信说法，所埋葬的地点正是东南西北九条山脉结穴之处，为九龙戏珠的风水宝地。这座小土山以后被称为九龙山。浙江洪门开九龙山，是为了取纪念明朝的含意。

九龙山初创时，会员多为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政治目标不够明确，组织状况也较为落后，在接受了光复会的领导与帮助后，才得以发展壮大。

光复会成立于1904年11月，总部先后设在上海新闸路仁和里、三马路保安里。蔡元培任会长，但实际上是陶成章起主导作用。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十六字为入会誓词。积极宣传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了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的要求。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反清手段。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虽有许多光复会会员加入了同盟会，但仍保持了光复会的独立活动。1905年秋瑾经光复会员徐锡麟介绍，曾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6年秋瑾协助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联络浙江会党，他们在浙江地区原有会党组织中发展力量，在会党原有基础上略加变通，将他们吸收为光复会员。这期间帮助了九龙山整顿组织和明确政治目标。从此，九龙山发展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一支革命力量。

辛亥革命前夕，九龙山与光复会合并，在光复会的领导与帮助下，政治认识提高，在杭州的浙江陆军学校及新军、警察中发展组织，

并通过多种关系打入清政府衙门中活动。其力量伸展到社会各阶层,其活动方式包括宣传革命、筹款、运输、侦察、联络、组织兵员粮秣等,曾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

洪门九龙山在辛亥杭州光复之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11 年 11 月 4 日,杭州之役中,九龙山会众成为主力军,九龙山义士与陆军小学堂的学生包围了杭州城。经过与清军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攻克了杭州城。随后,秋瑾的挚友王金发率九龙山会众攻取了绍兴,成立了绍兴府属军政分府,九龙山领袖张伯歧在杭州任浙江军政府直属敢死团团长。附近地区洪门会众纷纷响应起义,洪门成为当时革命武装的重要支柱。

以后浙督朱瑞根据袁世凯的指使,残暴地镇压了浙江洪门,洪门领袖人物有的英勇牺牲,有的转入国民党。

共进会与武昌起义

资产阶级革命派于 1907 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是一个洪门成员众多、具有秘密结社传统色彩的革命组织。该会主要成员中有不少洪门系统的首领人物,如张伯祥、邓文翚、孙武、张振武、焦达峰等人都是哥老会、三合会、孝友会等首领。该地公推哥老会首领张伯祥为会长,以后又由哥老会首领邓文翚继任会长。该会采用烧香、结盟等民间秘密结社的传统的入会仪式,并按照洪门山堂的"四柱"订立为"中华山"、"光复堂"、"兴汉水"、"报国香"。每字各系一诗。该会的主要任务是策动长江流域的武装起义。根据东京共进会决议的革命运动方略和多头进展的方针,会员回国各归本省秘密活动。于是在东京推定了各省的负责人。湖北共进会大力进行了争取新军的工作,设立了吸收新军士兵加入革命团体的地下机构,以武汉为发动武装起义的基地。1911 年 5 月间,共进会商定与革命团体文学社联合行动,七月间两个团体实行合并,组成起义领导机构,于十月十日领导发动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前后,大多数地区的会党,已不再固守山堂的组织形式,而以个人身份参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这种变化与革命党人对会党的改造是分不开的。而在发动和改造会党过程中,共进会的贡献最大。例如著名会党首领出身的共进会员刘玉堂在汉口河街开设的新大方客栈,为联络同志,掩护党人,传达情报,招纳志士的秘密机关。刘玉堂于武昌起义发动后,被军务部长孙武任命为陆防稽查长。他率领兄弟们捕拿清军密探,分赴四乡收集溃兵丢弃的枪械,动员人力向前线运输弹药装备,介绍和选送弟兄投军,维护地方治安和市面秩序,至青岛提取食盐以解武汉军民淡食之苦,等等,都直接支援了汉口和汉阳前线。同时,文学社社员、新军队官刘化欧与会党代表王春发,在敌后武胜关一带进行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杀敌,有力地支援了武昌民军。

川陕等地哥老会

在四川,辛亥革命前,哥老会已遍及城乡各地,以至沿途场镇,都有"公口"、"码头"、"各省汉留之盛,莫过于四川,及保路事起","仁字公口至三百七十四道之多,……故民间有'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之谣。"可见,哥老会在四川是一支拥有广大群众的社会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同盟会非常重视联络和领导哥老会的工作。同盟会当时的方针是"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合哥老适时起义。"为了联络和领导哥老会,很多革命党人参加了哥老会,如吴玉章、熊克武等。许多哥老会首领经过革命党人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如川东北的张百祥、李绍伊等,川南的余

竟成等。川西南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朗如、高照林、王天杰等在革命党人龙鸣剑帮助下,参加了同盟会。重庆哥老会首领况春发、田得胜等人也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以川西地区来说,参加同盟会者竟达“七百余人”,川南也相当多。四川同盟会与哥老会的这种组织上的交叉关系,为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准备了条件。

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哥老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川西地区有哥老会积极参加的各路同志军的兴起,鼓舞了各地实行武装起义。川西南著名的哥老会首领侯宝斋于1904年即召集各哥老会首领数千人成立“九成团体”,1911年7月,集会于新津王爷庙准备起义。大家公推秦载赓为川东一带同志军首领,侯宝斋主持川南的起义。同年8月,各路哥老会首领集会于资中县罗泉井开“攒堂大会”,具体布置武装起义,并一致决定改同志会为同志军。哥老会成为同志军的主力军。由于哥老会普遍参加同志军,武装起义席卷了全川,在川清军及鄂军,都被同志军分割于各地,终于被各个击破。其次,同志军兴起后,依靠哥老会组织筹办了军需。哥老会首领带头捐助,有的变卖财产充军饷,有的“出家财招兵”。另外,在军事情报方面,哥老会发挥了探听敌情、传递消息、承办交涉方面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在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对革命作出了贡献,而四川哥老会组织较其他省普遍,革命党人和哥老会结合得也较密切,在全川各地武装起义中,哥老会是同志军的组织、领导者,也是积极参加者。哥老会在川发挥的革命作用特别突出。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加入哥老会,另组山堂,联络具有许多哥老会成员的新军等途径发展革命力量。清末陕西哥老会组织有李汉章的太白山、提笼山;马秉乾的秦凤山;马文伯的定军山、琥珀山;高志清的贺兰山;张云山的通统山等。与同盟会员井勿幕等加入哥老会的同时,哥老会首领张云山、陈得贵、玉荣镇等也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7月,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新军的头目和少数非新军的哥老会头目在西安大雁塔举行结盟,为起义打下了基础。1911年8、9月间,又以张云山的通统山为基础,组成了同盟会和哥老会共同参加的秘密组织“同盟堂”,进一步为起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西安在辛亥革命中的光复,主要依靠了哥老会的力量。农历九月初一,起义爆发,起义军迅速占领了除满城外的西安城,许多营队的军事指挥权落在哥老会的各级“舵把子”手中。西安光复后,军政府为了加强军事力量,进一步与清军作战,首先整编了哥老会头目率领的没有正规建制的队伍,成立了六个标。同盟会掌握政治和财政经济,而军事上主要依靠哥老会的力量。

在抵抗清军的战斗中,哥老会弟兄们作战英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越轨行为”,如争权夺利、干涉地方行政,甚至扰乱社会治安。哥老会首领与同盟会也产生了些矛盾。另一方面,同盟会对陕西哥老会也缺乏正确的政策,没有也不可能对哥老会落后的一面进行改造,相反的是在西安等地光复后,马上抛弃了哥老会并加以屠杀。如哥老会首领万炳南、邹子良、马开臣等先后被革命党人张凤翙杀害。1912年,张投靠袁世凯后,哥老会更加受到镇压。

尽管陕西哥老会在起义后,暴露出它的严重缺点和落后面,但它对于响应辛亥革命,举行武装起义,起了西安光复的主力军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辛亥革命前夕,统辖宁夏东部、陕北、绥西哥老会的是“贺兰山山堂”,领袖高士秀;宁夏平原、河套地区则是西全山、虎威山(或作虎形山)、中华山、铁血山等山堂势力范围,著名领袖有刘华堂、刘照藜等;宁夏南部地区有金龙山、西梁山(或作西凉山)等山堂。贺兰山与陕西的通统山、太白山、秦凤山为同一系

统,与同盟会员张凤翙有联系。哥老会本来进行自发性的抗官围城、抗税斗争。1910年,陕西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井勿幕、钱鼎等与哥老会各堂口坐堂大爷张云山、李汉章等共三十余人在西安结盟后,于1911年8、9月间,同盟会员刘先质等到宁夏发展哥老会头目及各界人士入会,成立宁夏革命同盟支部,陕西来宁夏的同盟会员也加入了哥老会。西安光复后,11月14日,宁夏革命党与会党在岳武庙会议决定各地哥老会众于次日起义,起义后迅速取得胜利。11月21日,宁夏革命同盟支部召开扩大善后会议,组成以旧官僚孙庭寿为首的宁夏军政府。后因反动势力反攻,宁夏革命失败。但哥老会在宁夏革命中却有突出的表现。它与革命党联合并接受了革命党的领导,具有良好的纪律;其会众包括了回、汉、满、蒙各民族,打破了民族隔阂。

在宁夏起义中,平罗哥老会的起义最为突出,他们起义后打开临狱、武库、仓库,并以三家当铺的质衣解决民军御寒问题。次日,设立了军指挥部,以蒲春山为首,旗号"顺南"。农历初三日举行祭旗式。为协助宁夏民军攻打满营,平罗民军飞檄各哥老会组织人马,向商会绅富募军饷,赶制武器,由宝丰哥老会首领哈明率队伍向宁夏进发。交战多日,因甘肃清军援宁,宁夏哥老会与民军同时战败。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代表人物

马福益,原名福一,又名乾。祖籍湘潭,1866年(清同治五年),出生于醴陵西乡瓦子坪。马姓为湘潭大族,自马家堰沿河至朱亭,数十里间都是这一宗族的"姓地",族中地主、富商甚多。但马福益家世代贫寒。其父大良,佃同族某户的田地耕种。后被迫退佃,经醴陵一刘姓亲戚介绍,转佃醴陵西乡瓦子坪傅某地主的田为生,全家遂移居于此。十余年相安无事,从此马福益一家遂改为醴陵籍。故醴陵县志称其为"醴陵西乡瓦子坪人"。马福益成年后,与父亲、兄弟分家,携带妻子迁居附近的渌口,本人则到渌口对河湘潭县属的雷打石石灰窑做工。

马福益少年时上过几年学,粗通文墨,能写普通书信及作简短文稿。成年后,体格魁梧,且有胆略,多阅历,善辨论,性格明快。遇乡中有争论及不平事,常挺身而出,进行干预和调解,处理问题果断、公平,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为生活所迫,曾入清军当营弁,管理伙食,不久即被革退返乡。马福益还在瓦子坪时,就已经加入了哥老会,担任小头目。迁居渌口后,与当地会党首领联系密切。渌口赌窑很多,流氓、地痞、盗贼群集,作案累累,商民惶惶不安。商民以市内治安为虑,因知马福益为人正直,且在哥老会中有一定影响,乃由商会会长马某以同族关系,约福益密商,请其协助维持市内治安。马福益答应其委托。某日,马福益在市内最大酒馆湘江阁宴请各路会党头目协商搞好市内治安问题。共同订立了五条秘密条规:一、赌博者不得做假行诈;二、不得行凶打架;三、遇有争端,由众公平处理,不得徇私袒护;四、禁止抢劫和拐骗;五、离市二十里内不准盗窃,违者不得再行在市区居住。这些条规实行后,渌口市面治安果然迅速好转,马福益的威望也越来越高。于是,他着手开堂放票,招收门徒,雷打石石灰窑工人和渌口市民加入的很多,势力逐渐扩大,会员遍布醴陵、湘潭、浏阳,以至江西、湖北等省,徒众发展至万人之多。

马福益的影响不断扩大,他领导的哥老会辗转散放票布,发展组织,并与贵州天地会首领袁坤山、广西天地会首领陆亚发取得联系,声势日盛。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时,马福益所部哥老会曾准备起义,由于起义先期事泄失败,未及举事。

马福益于湘潭聚集矿工数千人为其心腹,"更于萍乡矿夫之中,择剽悍者数千人编为羽翼,蓄财购械,势力渐成,军器渐整,遂于三年前(甲辰)召集大会于浏阳益迹市,部下来者达二万余人,咸愿出死力,誓以恢复祖国。"

马福益与革命党人刘揆一、刘道一兄弟早有交往。刘氏兄弟的父亲刘鹏远,为湘潭县侦捕盗贼的快班头,马福益所部哥老会的活动常得到他的掩护。刘氏兄弟将马福益所部哥老会作为发动革命的主要力量。

马福益所参加的哥老会属于洪帮,在全国没有总指挥部,由各首领自行开堂放票,招收门徒。马福益所开的山堂的"四注"(即"山、堂、水、香")为:"昆仑山"、"忠义堂"、"去如水"、"来如香"。

湘潭的雷打石产石灰石,有二十几个石灰厂,其中以马家河黄姓所设的窑居多,窑工大都加入了哥老会;流氓、地痞、盗贼也混入窑工之中,以致地方秩序受扰乱。黄姓及各厂主聘请马福益为各厂总工头,并在每厂设一位分工头,其下再设若干工头,每一工头统窑工若干人;厂主与窑工之间的相互要求事项,通过各工头办理,于是仅二、三个月之间,使矿山秩序井然,流氓盗贼无隙可乘,居民得以安居乐业,于是马福益更受到人们的爱戴。

1904年前后,革命党著名的领袖人物黄兴为了加强革命力量,积极主张联络会党,于是,马福益为首的哥老会便成为黄兴要联络的主要对象之一。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廑午,号杞园,别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早年就读于西湖书院,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萌发反清思想。1902年被派赴日考察学务,注重于学习军事。后往返中日两国,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组织华兴会,任会长。该会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口号。计划由湖南发难,取得根据地,谋求各省响应,以达"直捣幽燕"的目的。早在1903年5月,黄兴从日本回国前夕,与哥老会关系密切的革命党人刘揆一,就曾向黄兴建议,应利用马福益的哥老会作为武装起义的基本队伍,黄兴同意这一意见。当华兴会成立后,黄兴深感到发动武装起义的基本力量过于单薄,于是积极采纳了刘揆一关于联络马福益的建议。华兴会会内同志也赞成黄兴联络哥老会的主张,于是决定在华兴会之外,另组织"同仇会",为专门联络会党的组织。"同仇会"实际上成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

黄兴与刘揆一商讨了争取马福益的办法,决定由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偕同华兴会会员万武,先到马福益处探访,为黄兴与马福益会晤进行准备。刘道一早年加入了哥老会,熟悉会内规矩,也懂得哥老会的隐语。

刘道一与万武带上黄兴致马福益的亲笔信,由长沙出发赴湘潭雷打石与马福益会见。这是刘道一与马福益的初次见面。当时,马福益约三十多岁,为哥老会在这一地区惟一的正龙头大爷,看了黄兴的信之后,因不了解黄兴是何许人,对刘、万二人"深表轻慢"。刘道一不亢不卑,晓以革命大义,向马尖锐指出:"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门遗训,担起灭清复明的责任呢?还是开开山,拜拜台,收点党徒,集点金钱,头上插个草标,出卖人头呢?还是集点力量,使官兵疲于奔命,莫奈我何?然后再受官厅的招抚,别开一条门径,去做满清的奴才呢?我们闻大哥之名久矣,知道大哥是个汉子,又是替老百姓打抱不平的英雄,所以我们黄先生才特地派兄弟们来,同马大哥谈。"马福益听了这番话,不觉为之动情,肃然起敬道:"听了先生一番言语,令我茅塞顿开,……先生来意我大概晓得了一些,最好是告诉我将来要我如何进行的办法。如果有用得着的我时候,无不惟命是从。"吃饭时,刘道一又侃侃而谈,向马福益宣传了华兴会的政治主张:"第一是为图强,请看我们今日之中国,还成国家吗?推其缘故,都是满洲人弄成的,所以非革他的命不可;第二是满洲人的心

中，认为我辈是他的家奴，情愿将国家送给外国人，不愿还给原有的主人。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又非实行种族革命不可。……若能得到马大哥的赞助，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有一大半把握了。”由于马福益本来就有反满的思想基础，很容易接受这番种族革命的道理。马福益欣然表示同意与革命党人联合起来干革命。刘道一向马福益说明了华兴会之外还成立了同仇会，并转告马福益，黄兴将亲自前来拜访。

刘道一、万武返回长沙向黄兴复命后，黄兴偕刘揆一乘雪夜步行三十里至雷打石附近的茶园铺，在一个岩洞中与马福益相见。沿途都有哥老会保卫。三人在山洞中席地而坐，烤着火共议反清大计。计划于当年11月16日(旧历十月初十)西太后七十生辰时，在长沙发难起义，外分五路响应。马福益手下的哥老会会员加入起义队伍，以军学界人士指挥。并决定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为总指挥，马福益为副总指挥兼五路督办。

马福益以往遭清军追捕时，曾受到刘揆一的搭救，与刘早有交往。黄兴决定同仇会仿照日本的“将佐尉军制”编制，由黄兴任大将兼同仇会会长，刘揆一任中将，掌管军事，由马福益任少将，专掌哥老会事务。

不久，即在雷打石附近的五龙山某寺举行正式开堂。数日后黄兴将白马一匹，并备酒、肉、布匹若干赠送马福益。马点收礼物时，发现肉中夹有手枪及子弹，布中夹有长枪及子弹，因而十分高兴。同年9月23日(旧历八月十四日)，趁浏阳普迹市例开牛马交易大会之机，黄兴命刘揆一、陈天华、徐佛苏、陈福同等与马福益在这里秘密相会，为马福益隆重举行授予少将军衔的仪式，并赠送长枪二十枝、手枪四十枝、马四十匹，此后“哥老会相继入(同仇)会者，不下十万人。”根据黄兴的意见，进行正规军事训练。

同仇会计议各路军队布置均已就绪，等待大批军械运到，即如期起义。不料华兴会员中有个武备学校的朱某，误泄机密。同时，又有哥老会员何少卿、郭鹤卿两人在湘潭县城一家酒馆里边喝酒边高谈阔论，说道：“万寿节快到了，我们快要动手了。”恰被清政府的密探听到，当即逮捕了这两人，随即从其住处搜出证件。经严刑拷问，二人供出了准备起义的机密。湖南巡抚陆元鼎慌忙下令“按名捕索”。在哥老会的掩护下，黄兴、刘揆一改装逃往上海，马福益逃往广西。起义未及发动而遭镇压。

1905年春，马福益返回湖南，化名陈佑衡，准备以洪门为根据地，召集哥老会会员，重新部署起义。他派人往上海和刘道一取得联系，希望黄兴资助饷械并派人指挥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得到消息后，复刘道一表示赞成马福益的计划，并请其转告马福益。

马福益正在积极筹备武装起义时，湖南巡抚端方派人缉捕马福益。4月12日(旧历三月初八日)，马福益不幸在萍乡车站被清军逮捕。以刀洞穿肩背，锁上铁链，解至长沙。经残酷刑讯，马福益英勇不屈，4月20日(旧历三月十六日)壮烈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

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为马福益开了追悼大会。国内马的旧部属矢志为马复仇，一年后发动了萍浏醴大起义。

从马福益与华兴联合反清的事迹中，反映出哥老会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帮助和领导下，进一步明确了政治目标。马福益是一位优秀的哥老会领袖人物，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不敢充分发动群众，也没有能力领导哥老会彻底克服自身的落后性、散漫性，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哥老会起义大都遭到失败，并非偶然。但是，马福益英勇反抗清朝政府的革命精神，以及马福益领导的哥老会的斗争，在辛亥革命史上仍有重要的意义。它激励革命党人和哥老会为主体的劳苦群众，终于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焦达峰(1886—1911)，湖南省浏阳人，字大鹏，笔名达峰樵子。祖父焦添龄同情太平

天国革命。父焦舜以开明绅士著称，曾加入南学会，并支持焦达峰入会党。达峰四岁读书，1903年十六岁时高小毕业参加哥老会系统的洪福会。次年赴长沙，入东文讲习所，参加华兴会专门联络哥老会的组织——同仇会。华兴会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加入同盟会，任联络部长，负责联络会党。1906年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任浏阳会党铁血军总司令李金奇的联络参谋，起义失败后，再度赴日本，与宁调元等组织四正学会。1907年入东斌步兵学校，同年与张百祥等发起成立“共进会”，任交通部长。1909年，焦达峰与孙武等人在武汉联络会党，组织五镇军队，夏季，暴动失败，焦回到长沙，设立共进会机关，统一湖南会党，并组织属洪江会系统的“四正社”。所谓“四正”，就是心正、身正、名正、旗正。焦达峰早在参加萍、浏、醴起义时，即认识了洪江会（属哥老会）的“龙头大哥”，1909年秋在浏阳的普集市开山堂，称为中华山光复堂，前来参加的有湘阴、平江、萍乡、万载、长沙、醴陵、浏阳等县“龙头大哥”三十多人。经许多“龙头”抬举，焦达峰作为“穿靴上山”一步登天的“龙头大哥”。本来洪门系统的哥老会规定，入会后至少应从老五做起，一步步升迁，越级升到龙头称为“穿靴上山”。经这次开山堂升任“龙头大哥”后，焦达峰短期内即可调动十多万哥老会人员声援革命。同时通过会党联络新军和巡防营。1911年3月，谭人凤到长沙，招集革命党人部署响应广东起义，焦达峰分工为联络会党，后因新军活动被清方侦知而受破坏。5月，西湖共进会负责人开会决定同时发难。10月10日，武昌起义。焦达峰与其革命团体配合，部署湖南起义，成立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领导起义。因清方戒备，焦达峰、陈作新决定将起义日期提前，于10月22日以新军力量占领长沙，宣布湖南独立，焦任都督，陈为副都督。随即调兵增援武汉，并编练各县民军，组织第二批援鄂队伍。立宪派阴谋夺取政权。成立参议院，又分设军政、民政两部，使都督府失去实权。立宪派趁焦达峰调大批起义军援鄂之际，于30日，唆使军官梅馨发动政变，杀害了焦达峰。

焦达峰的特点是肯听取别人的意见，善于联系群众，为人直爽，对于名利二字非常淡泊。焦做了十天都督，未用过都督府一文钱。

革命党人联络的部分山堂

曾大力支持中国辛亥革命的日本著名学者平山周，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周游中国，与洪门各山堂多有来往，对中国秘密社会史特别是三合法、哥老会具有深入的了解。他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洪门在“中国十八省中，约有山堂数十个，其组织虽相同，然各地自为统属，绝少联络运动，又无总括之大本部。自近时革命党员投其中，全国名山，始谋合一。”当时革命党人联络的部分洪门山堂如下：

所在地	山名	正龙头	所在地	山名	正龙头
湖南	金龙山	杨鸿钧	甘肃	西凉山	贺桂林
甘肃	虎形山	杨鸿钧	四川	峨眉山	颜鼎章
湖南	泰华山	萧松山	广东	天宝山	萧朝举

所在地	山名	正龙头	所在地	山名	正龙头
山海关	宝华山	萧松山	江苏	东梁山	李云龙
湖南	锦华山	刘传福	浙江	终南山	何步鸿
湖南	楚金山	陈尧	浙江	飞虎山	刘家福
湖南	金凤山	胡佐臣	浙江	万云山	王金宝
湖南	天台山	胡云			

民国以来的洪门

民国初年的涣散

洪门各支派奉行“反清复明”宗旨，曾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领导，参加了辛亥革命。但是洪门组织很少有单独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的。即使个别地区属于洪门支派的会党团体单独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地方政权之后，也很快遭到镇压而失败。

清政府被推翻后，洪门系统各帮派失去了反清的政治目标。他们基于小生产者和游民的思想意识，具有浓厚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目光，当他们的首领人物因参加辛亥革命而在辛亥革命后取得一定的权位时，就立刻以权谋私，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转变为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破坏政治安定的因素。例如在长沙起义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进出焦达峰都督府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安置，都督忙于应接，几至无暇治事。“他们以为起义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没有想到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建设问题。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天下了。’他们就是这样庸俗地看待革命的。因此各地的流氓、痞棍就乘机假冒会党之名，破坏社会秩序，为人诟病。”浙江洪门系统的支派乌带党领袖王金发，于辛亥革命后督绍兴期间，同样是为所欲为、任人惟亲，手下的一批人为非作歹，为当地民众所不满。其政敌乘机攻击，不仅造成了王为首的一帮人大权旁落，而且致使王死于敌人的阴谋诡计。贵州地区光复后，洪门系统的支派哥老会，因参加辛亥革命有功，于辛亥革命后，其组织大发展，他们在省城“明目张胆占领民房衙署，以立公口(即哥老会的组织机构)。在城外各地，各公口之间为争夺地盘，械斗时有发生。”“公口盛行，秩序紊乱，人心恐怖”，确是革命政权失去人民拥护的一大原因。其他各地如四川、陕西等地，也都有类似情况。这说明帮会这种下层社会的民间结社，其基本成员是游民、小生产者，其思想意识是十分落后的，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为革命党人所利用，成为革命动力之一；但随着清政府被推翻，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政治目标，他们以封建意识看待革命的胜利，只注意谁打天下谁坐天下，根本不懂得革命后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如何进行经济、文化、民主、法制等方面的建设。历史事实说明，这些文化知识低下、意识落后的民间下层社会的结社，能够成为破坏旧政权的重要动力，却不能成为建设新政权和发展经济、文化的动力。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在民国初年试图对一些会党组织进行改造。例如民国元年7月1日，由洪帮、青帮和公口三家联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由应夔丞任会长。宣布“三家合而为一，成一大团体，自

应协同共济，振作精神，启沃固有之良能，研求旧遗道德为切要，不可稍存私利之心，破坏团体。”针对帮会当时破坏社会治安的错误，明确指出：“深望同胞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随后设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总机关，发布通告，要求各省成立支部。显然，革命党人试图将帮会联合起来改组成为近代的政党组织。但是，事与愿违。江浙会党纷纷打起“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旗号，扰乱社会秩序，因此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浙督朱瑞遂在浙江全境查禁共进会，并照会江苏一体查禁。于是江苏都督程德全也对国民共进会实行了严厉镇压、取缔的措施。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案情真相很快被揭露，原来是袁世凯通过洪述祖收买了应夔丞，应指使刺客武士英刺杀了宋教仁。应被捕归案后，国民共进会因失去首领而完全瓦解了。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未能担负起教育、改造会党的历史任务，它在利用会党发动革命，取得部分政权后，对会党的落后性、散漫性、盲动性、破坏性，未能进行积极教育改造，而是着重于镇压。当革命党人反袁斗争失败后，袁世凯因会党曾经是革命党人的同盟者，也对会党采取残暴镇压的措施。因而，民国初年，会党因遭到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两方面的镇压而一落千丈，以至在有些地方销声匿迹，乃转入秘密活动。

惟有革命党人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期间，大力支持了会党活动，中华国民共进会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在上海成立的。当革命党人镇压会党期间，陈其美仍然支持青、洪帮的活动。为以后上海帮会势力有突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上　海　的　洪　帮

辛亥革命期间及民国初年，国内的洪门团体有：大陆山（孙中山开立）、大洪山、通洞山、西陆山、春宝山、栖霞山、太极山、民国山、九华山、谷云山、大同山、同登山、龙会山、桐柏山、九龙山、天寿山、天目山、飞龙山、十龙山、景阳山、武当山、鑫华山、五圣山、中华山、群英山、大龙山、夏华山、天龙山、五行山、复办复明山（停顿后又恢复的组织）、复办泰华山等。此外，以会、社等为名的洪门团体有：义兴会、同兴会、复兴会、民兴社、正诚社、侠谊社、正谊社、信谊社、安信怀公社、洪兴协会、致公堂（在国内的组织）等。

洪门团体遍布国内各地，尤其是长江流域各省及福建、广东、广西最为集中。

民国以来，各地洪门人员纷纷迁居上海，洪门团体也随之设立于上海。有的洪门组织全部由外地搬入上海，有的沿用原来在外地的组织名称，在上海另组机构或另拉山头，因而上海洪门组织林立。上海洪门组织由于来自五湖四海，地方帮派色彩浓厚，以后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人员五方杂处，洪门组织也逐步打破了地方界限。

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原来以山堂为名的帮会组织，改用会、社名称，以现代化社团名目出现，向国民政府机关立案，取得了合法地位，许多帮会不再是原来的民间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而是以公开或半公开形式开展活动。

抗日战争前，上海洪门组织约有四十多个。在抗日战争期间，一部分洪门组织参加抗日活动，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力量，他们大都转到大后方去活动；而另一部分洪门组织为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政权所利用，被人们视为汉奸洪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利用过的那批洪门组织销声匿迹，曾参加过抗日活动的洪门组织大为活跃，原有的洪门团体也各自恢复活动。

洪门组织大致如下表：

山名	负责人	山名	负责人
五圣山	白海潜、张子廉等	聚胜和体育会	不详
侠谊社	郑子良	五祖祠	致公堂在沪组织
终南山	白玉山	福寿山	王铁民
十龙山	石振江、龙清泉	鑫华山	兰少亭
江湖联合会	石振江、龙清泉	大龙山	周镇坤
天寿山	姚庚白	大华山	不详
长白山	张树声	民兴社	汪禹丞
楚荆山	李文辉、李栖云	兴中山	杨虎、程壮
正诚社	王知本	民国山	不详
五行山	汪禹丞、徐逸民	复兴山	不详
峪云山	徐朗西	瑯琊山	不详
大洪山	王铁民	复明山	不详
新胜和体育会	不详	洪顺互助会	杨文道

洪门团体在上海影响较大的为五圣山、五行山及广帮洪门。有关五圣山、五行山将在本书内专题介绍，此处仅简介广帮洪门。

广帮洪门集中于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一带，人数较多，成份较杂。一部分是继承了三合会、小刀会的传统，但民国以来多数走向流氓化，从事贩卖鸦片、拐卖人口、开设赌场、妓院等活动。各组织之间时因利害冲突而发生械斗、惨杀事件。

广帮洪门，有的以现代化会社命名，如侠谊社、洪顺互相会；有的以体育会命名，如新胜和体育会、聚胜和体育会等。1945 年抗战胜利后，郑子良为首的侠谊社在逸园跑狗场开过一次复员大会，到会者达四五千之众，其势力范围早已扩大到旧法租界等处。广帮洪门中也有不少工商业界人士。抗战前和抗战期间，如洪顺互助会的杨文道等人曾于“九·一八”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判徒刑十年，抗战后出狱，继续从事洪门活动，并在虹口区中州支路洪顺互助会会址创办了洪顺小学。

除广帮洪门外，还有湖南帮的楚荆山、四川帮的民兴社等也都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为了统一上海的洪门组织，洪门五圣山的首领向海潜等人曾于 1935 年发起成立“洪兴协会”，含意为“同心协力，复兴洪门”，上海三十多个洪门团体，各推代表五人作为“洪兴协会”的会员，在老西门关帝庙举行成立大会，选举理事、候补理事三十多人，监事、候补监事二十多人，其中有汪禹丞、向海潜、程壮、姜豪、张子廉、王知本、郑子良、毛云、陈培德、白玉山、石振江、王铁民、龙清泉等，并推汪禹丞、向海潜为理事长。

洪兴协会成立后，会址暂设于浦东大楼五行山的会所内，经费无来源，以收取会费应付日常开支。洪兴协会成立后，每月举行理、监理会一次，各团体派代表参加，通过交流情况，联络感情，消除隔阂，加强了洪门各团体

之间联系，帮派之间的争斗大为减少。抗日战期间，洪兴协会停止了活动，抗战胜利后又在上海恢复活动，其领袖人物汪禹丞已病故，公推向海潜为理事长，原有理监事大部分仍当选，会址设在威海卫路正诚社内。

此外，抗战胜利后上海洪门新开的山头还有：世界大同山（山主陈国屏为国民党特务）、万寿山（山主张先道）、太平山（山主田西园，军人出身）、益社（山主范绍增，为袍哥军阀）等。这些山主的政治面目和政治态度各不相同。

四　川　袍　哥

“袍哥就是汉流”，而汉流又是洪门的另一名称，因此袍哥属于洪门。哥老会在四川通称为袍哥。它在组织上分为仁、义、礼、智、信五堂，与洪门天地会相同，组织内部职位名称，以及开香堂仪式等等，与洪门略同。

辛亥革命后，随着民风民俗社会道德的变化，袍哥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信条，也逐渐失去作用。“在袍哥兄弟伙中占百分之九十的人，把清规戒律，都抛得一干二净，一切坏事，无所不为”。袍哥中多数头目成为包庇作恶、坐地分赃的赃主。野心较大的大爷，则利用袍哥势力，暗收枪弹，组织武装队伍，在偏僻地区，霸占要口，征收货税，贩运食盐和烟土。有的甚至盘踞一县至几县，称霸一方，如陈兰亭、魏楷（辅臣）、邓国璋、杨春芳、汤子漠、郑启和、龚谓清、范绍增等都是靠袍哥势力起家的军阀。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的四川袍哥，在民国后，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除了混迹于盗匪流氓为非作歹者外，有不少组织为军阀所利用，成为军阀扩张势力和混战的工具。四川军阀熊克武、刘湘、杨森、潘文华、刘存厚、田颂尧、邓锡侯等都利用过袍哥队伍，同时，袍哥活动也为军阀混战推波助澜。

四川袍哥与军阀勾结的渊源起于辛亥成都起义。当时尹昌衡杀清廷总督赵尔丰，利用保路同志军袍哥队伍为支柱，成立四川军政府。从此，四川各地袍哥纷纷渗入军队。民国初年，川军编为五个师，袍哥除编入正规军外，大部分编为地方团队，被遣散回乡者，以后又成为兵源。

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为同盟会员，当初为了发动袍哥而参加了袍哥，该师官兵多为袍哥成员。熊克武的这支队伍以后加入护国军，在川南、川东收编了大批袍哥，组成招讨军。

熊克武任重庆镇守使兼第五师师长期间，属下九旅十八团，全团军官都是袍哥。熊克武任川督期间，属下第六师余际唐部系由全川江防军改编而成。江防军四个区司令杨春芳、陈兰亭、范吉祥、刘鹏程，都是川东袍哥队伍，后编为第六师的四个团，第一军第八混成旅郑英部和独立师周燮卿部，亦系袍哥队伍。

革命党人，著名的师长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谤、黄复生，族长郑启和等，都是由袍哥起家，在护国、靖国各役中，都收编了袍哥队伍。

川军其他各部，都有许多师、旅是袍哥队伍。袍哥组织和力量，也借重于军队得以迅速发展。

袍哥在川军中大发展的主要原因与川军连年混战有关。军阀借助袍哥关系招募游民解决兵源问题，而落草抢劫的袍哥，也往往按其势力大小分别于招安后，委任其为司令、队长等。总之，四川军阀扩大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利用袍哥扩充军队。川军人数最多时达三、四十万，袍哥队伍约占五分之一。

四川袍哥在社会活动中，很注重“江湖义气”。有钱的袍哥，对穷困者，要有些周济，出手越大越被称颂为讲“义气”。遇上外地袍哥闯了祸，跑来避风头时，要尽力掩护营救。遇有困难危险事情临头时，要挺身而出，为弟兄分忧解难。凡是这方面突出者，被称为“嗨得开”，名声大振。一张名片可通行八方，方圆

数百里吃得开。

四川袍哥的“豪侠仁义”事件，不胜枚举，以下略述一、二例：

例一：1902年，重庆袍哥大爷唐廉江，同袍哥弟兄况春发、田得胜、廖敬之、沙国清、董云卿等，在陕西街虬蜡庙巷口，偶然遇到洋教堂司铎无理殴打中国人。地方官员奉承洋人，不但不秉公处理，反而责打中国人二百大板，激起了围观民众的公愤。唐廉江挺身上前大呼打抱不平，于是民众将洋人和地方官痛打一顿。事后教堂的洋神父逼迫重庆府县捉拿袍哥头子和打洋人者严办。

廖敬之为了营救唐廉江出险，自行跑到巴县衙门自首，让唐廉江避往日本留学。廖敬之则被判无期徒刑，押回原籍遂宁执行。遂宁袍哥码头认为这是遂宁袍哥的莫大光荣，大办筵席，在监狱中送廖敬之出山，由“幺大”一步登天升为行一大爷，并在监狱中成立一道公口，掌旗执事。

数年后，唐廉江由日本返蜀，专程赴成都设法营救廖敬之，并到遂宁狱中拜望廖敬之，被县官查获，关押三个月才释放。遂宁袍哥码头又代为具保，盛宴饯行，认为重庆袍哥最重义气。

例二：有位仁字袍哥大爷吕兰生，在重庆鸡街口家中设有赌场，聚赌抽头，赌客输赢运用筹码，到期结账，由吕兰生负责收付，很讲信用。有位绸缎商号的店员前来打牌，输了银钱百余元，尽力付讫。第二次又输四、五百元，无力交付，被东家得知后将其开除。此人走投无路，求救于吕兰生。

吕兰生亲往见其东家，声明这位店员所欠赌债由他本人代偿，当面撕毁债据，并保证通知全城赌场，今后不让该店员参加赌博。吕兰生要求东家准许该店员复职，给予生活出路。东家感动允诺，该店员更是感激涕零。此事为袍哥的义举，传为美谈。

但袍哥的江湖义气有时是非不分，坏人坏事有时也能借助“江湖义气”得到保护。

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获得四川丰富的资源和广大市场，除了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四川资财和迫使中国政府镇压民众反侵略斗争之外，也利用四川袍哥的组织关系进行侵略活动。

法商异新洋行大班斐洋人（重庆人称其为“老洋人”），致力于联络袍哥码头，包席请客，与袍哥拉关系。斐洋人的儿子斐利比蒂、孙子河斯达，也都与袍哥拉关系。特别突出的是洋行推销员希腊人巴巴达，竟然跻身于袍哥组织，并以袍哥的身份到处拜访码头。民国初年，美商永明保险公司大班开普，经翻译人员胡文钦引进，也加入仁家袍哥，见袍哥人员也以袍哥礼仪相待。

由于洋人与袍哥联络并加入袍哥组织，洋人便通过袍哥关系代办收购原料物资，推销洋货商品，出现了一批专做洋货生意的袍哥买办。

民国后的军阀混战时期，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袍哥进行军火走私。大批军火由上海运往长江中、上游各地，同时也进行鸦片、吗啡运销。袍哥军阀更是借助于外国商轮或兵舰掩护运输，进行鸦片、吗啡和军火走私。

袍哥军阀邓国璋的大批吗啡，正是托法国兵舰“柏林”号由重庆运到上海的。袍哥大爷唐绍武专营军火，与德商洋行勾结，往来于重庆、上海，凭借洋人与军阀的关系，正式取得了国民政府的护照，大批军火，由太古、怡和、日清各公司轮船以及英、法兵舰运输。

袍哥与洋行、外轮的勾结、最初多靠洋人袍哥巴巴达牵线搭桥。巴巴达是一位希腊游民，少年时游荡海外。法帝国主义侵入云南后，巴巴达曾在滇越铁路进行走私活动，逐步深入中国内地。他了解到四川各地袍哥组织势力兴盛，便设法找到袍哥人物孙鲍某引进，参加了仁字袍哥的“进同社”，步位为三排。他又到重庆经重庆仁字大爷邱绍芝超拔出山，升为大爷。巴巴达最初仅推销钟表、日用百货、装饰品等，请袍哥李炳南充当助手。凭

藉袍哥关系的协助，在长江上游各地推销货物，获得厚利。他有一次在内江打麻哥(注：即打麻将)，一夜输银千余元，次日抬了几箱钟表偿还赌债，返回重庆结账时，仍有盈余，可见赚钱之多。

巴巴达为了畅销洋货，曾以小型电影机流动放映电影，招徕顾客，这是电影机最早在四川出现的原因。刘湘驻军重庆期间，巴巴达与袍哥师长范绍增、陈兰亭等结识，过从甚密，曾在重庆开设华洋旅馆、西餐厅、酒吧餐厅等，招徕外国军舰的船员水手，并为其接洽走私买卖，介绍妓女玩乐。华洋旅馆成为军阀、买办、袍哥与洋员水兵相勾结的中心，进行了许多罪恶交易。

巴巴达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谙熟中国生活方式，嗜赌如命。与袍哥商人等交往时，调笑戏谑，十分随便。巴巴达娶了一位重庆女子为妻，系袍哥李炳南的姨妹，生二子五女。重庆解放后，于 1951 年 5 月，携全家返回希腊。在蜀地活动达四十多年。

1933 年，刘湘任四川省主席期间，兼“剿匪”总司令，统率邓锡侯、孙震、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存厚等六路川军，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为敌。刘湘为了维护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任用袍哥大爷冷开泰为情报处长，选择精干的袍哥分子设立情报处，组织情报网。大力发挥袍哥组织的活动特点，搜集各种情报，这支情报队伍被四川人称为“土特务”。

1934 年，刘湘因惧怕长征中的红军进入四川，亲赴南京向蒋介石求援，随身保卫工作即由冷开泰指挥袍哥情报人员担任。

蒋介石早就想控制四川，乘刘湘求救兵之机派驾国光率参谋团到重庆，上官云相率六个师进驻万县，康泽的别动队也由江西调入四川，随后蒋介石的“武汉行营”迁到重庆。

康泽指挥的别动队是一支特务组织，它入川的目的既是为了反共反人民，也是为了帮助蒋介石控制四川。别动队入川后，首先和袍哥的活动发生了冲突。

别动队员以查拿共产党，查禁烟毒为名，到处搜查，甚嚣尘上。刘湘部宪兵司令李根固的谍查队长、重庆义字袍哥大爷李少周，原是冷开泰的情报人员，因私卖吗啡，被别动队查出实据，将其逮捕，报经“行营”处理，予以枪毙。同时又将许多鸦片贩子及烟客扣押关禁，其中也有些袍哥成员。

川军将领多有吸食鸦片者，别动队在川北前线各部队防区活动时，往往与川军将领冲突。南部县驻军李家钰部的袍哥队伍旅长陈绍堂是位瘾君子，别动队员侦知后，闯入旅部。陈正在对着烟灯过瘾，别动队员登堂直入将其烟盘烟灯抢走。陈绍堂和他属下官兵异常激愤，随即联络地方袍哥暗杀别动队员。

蒋介石与刘湘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别动队转而注重搜集刘湘及其部队的政治军事劣迹情报，上报重庆行营，采取措施，向刘湘施加压力。

刘湘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令冷开泰的情报队着重搜集别动队在各地贪赃枉法、制造纠纷、引起军队和民众反对的情报，由刘湘上报给蒋介石，后来竟公然请求调走或解散别动队。

别动队依靠行营及中央的势力，借故逮捕情报队员。情报队员则依靠川军和地方袍哥势力，伺机暗杀别动队员。

中央特务与“土特务”的斗争愈演愈激烈，后来发展到李注东旅派人在成都行刺康泽事件，三枪未中，仅将与康泽同车的副官打死。康泽见情况于己不利事后未敢深究。

其时，蒋介石鉴于刘湘及川军各部力量庞大，袍哥势力又根深蒂固，对刘湘及袍哥为基础的“土特务”莫可奈何，不得不采取怀柔和笼络手段。别动队只得退避三舍。康泽鉴于袍哥势力难对付，也采取了些收买拉拢利用袍哥的手段。经过一番活动，先后投靠他的袍哥大爷有刘伯龙、戴绍章、王会云等。但因各地袍哥组织与别动队的关系十分紧张，

积怨难消，刘伯龙等因投靠康泽，受到袍哥各码头的鄙视，也难以为康泽发挥作用。

抗日战争开始后，刘湘病死于汉口，冷开泰的情报处宣告结束。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重庆后，军统中统特务入川，也都采取利用和控制袍哥的办法，于是重庆袍哥组织更为发展。

新疆哥老会

哥老会随左宗棠所率的湘军于光绪初年传入新疆。最初，会员多系下级军官和士兵，有多年征战中，有些下级官佐晋升为高级军官，所以高级军官中也有哥老会成员或首领。年长日久，哥老会蔓延到政府机关职员以及民间下层各界中。因清政府禁会党，哥老会长期秘密活动。哥老会在新疆的组织结构，各步位名称以及各种仪式仍与关内洪门系统的各会社较一致。

迪化（即乌鲁木齐）曾发生刘先俊联络当地哥老会密谋起义事件。刘系湖南人，曾留学日本学陆军，宣统三年袁大化任新疆巡抚时，刘前来投效，袁未予重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新疆后，刘先俊即运动军队及民间的哥老会起义。但由于刘先俊过于轻敌，缺乏周密的准备，遂遭到袁大化镇压而失败。被缴械的起义者分别遣往焉耆、库车、阿克苏等地补充军队缺额。这样就为此后新疆各地哥老会起事传播了种子。

民国元年四五月间，哥老会在阿克苏、库车等地发生杀地方官的事件。阿克苏总镇查春华（安徽人）是哥老会中人。5月4日，库车县知事毛英畏在游击署内被会党用刀砍杀。随后，会党往县署劫狱，抢去钱财。查春华委任谭长谷接任库车游击之职。谭是哥老会首领。查春华呈报，库车血案系营中司书钟国柱勾结营兵游勇所为，事后钟等被捕“正法”。实际“首犯”却是库车巡防哨长陈福魁和马队都司陈昆林等。阿克苏总镇查春华袒护了哥老会，并重用哥老会首领谭长谷。谭长谷曾在库车开立山堂，建立码头，并擅理词讼，设立财局，苛索民财。库车成了以谭长谷为首的哥老会中心。当时南疆到处发生哥老会杀地方官的事件，威胁到“新疆王”杨增新的统治。杨明知查、谭互相勾结，但鞭长莫及，只得暂时容忍羁縻。直到民国二年（1913）冬，杨在新疆的大局稳定，才委任回族新教首领马绍武为库车县知事，带领回族部队赴任。同时调谭长谷回省城。民国三年（1914）五月，杨增亲派管带马存德带队，递解谭长谷回湖南衡州原籍。密令马途中将谭暗杀了。查春华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遂离开新疆，途经俄境返回湖南原籍。

民国五年（1916），发生轮台会党萧秋舫等杀轮台县知事李华嵩案。

焉耆参将吴首怀也是哥老会中人。轮台血案后，吴被逐回原籍。

在阿克苏发生哥老会杀官事件的同时，喀什也发生类似事件。民国元年四月，迪化袁大化电请北京政府任命喀什道袁鸿佑为新疆督军，袁鸿佑奉命后，即令剪发易服。5月7日深夜，喀什哥老会联合提标会党，乘民心混乱之机，以边永福、魏得喜等为首率众直入疏附喀什道署刺死袁鸿佑夫妇，同时被杀的有参将汤殿恒和疏附县知事张秉铎，革职官吏张舒锷等人。事后经省方报告北京政府，奉令查缉凶犯，但驻疏勒的喀什提督焦大聚也是哥老会中人，他多方庇护哥老会，借口事变是袁鸿佑勒令人民剪发易服所激起的，如操之过急，恐生意外，请维持现状。焦大聚将发难的会党编为治安左右两营，委边永福、魏得喜各任营管带。喀什哥老会加给袁鸿佑的罪名是剪发易服，如此说来，哥老会这次杀官，是在维护清朝制度了。这与辛亥革命前后新疆以及其他地区哥老会起义的政治目的恰恰相反，哥老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不可能维护清制，其实这次事件具有盲目性，离开

了哥老会的宗旨。

自民国元年四月起，焉耆、阿克苏、喀什、库车、轮台、巴楚连同东路巴里坤，先后发生戕官案共八起，文武官吏及眷属被杀者 15 人。戕官事件使地方官惊慌不安，各城市地方官为保全生命财产，对哥老会供应财物、粮食等，竭力讨好哥老会。于是哥老会明目张胆地开山立堂，吸收会众，散发会票，聚众滋事，勒索钱财，吃喝嫖赌，为所欲为。

杨增新于民国元年任新疆都督兼民政长之后，起初因自已统治地位未稳，对哥老会不敢大肆镇压，多采取羁縻政策。但自哥老会首领谭长谷、边永福先后调离库车、喀什后，以及哥老会中人武官查春华和焦大聚去职后，杨增新开始对哥老会采取大张旗鼓的镇压政策，杨曾电令莎车一带和北疆各县雷厉风行地查缉哥老会，对阿克苏等处戕官在逃的首恶和查拿法办的当地会党，都分别枪决、解散或遣送回籍。同时通令全疆和迭次张贴告示，严禁会党开山立堂，其已入会者令其自行焚毁会票，改过自新；其能自首并报告会中重要情况者，免究给奖。各地文武查办会党有功者，优加奖励，办理不力者论罪。在如此严加查禁之下，民国三年一月还在迪化查获肃州会党杨生华一名，搜出会票一百余张，盖有印章的传牌一张，牌上第一行有“洪命双金花分部肃州后续统通山主韩”字样。另有红绫传单一张，内开有肃州山主韩应中等以下会党各头目的姓名。杨生华系奉山主之命出关联络开山立党、吸收会员和密谋暴动的。杨生华被捕后遂被枪毙。杨增新致电肃州地方官拿获韩应中，同时饬知东路各处查办被杨生华吸收的会员。自民国三年后，新疆共枪杀会党约二百人以上，哥老会在新疆的势力至民国四年已趋于瓦解。民国七年(1918)又有精河所属博尔塔拉接连俄境地方发生杨进财等开山立堂事件，他们联络俄境华侨“红胡子”(以抢劫为生的匪徒)闹事。杨增新据报后，派童明才带队前往，逮捕会首多人一律枪决，余众解散。此后在新疆未发现哥老会再有大规模的活动。哥老会的小规模活动转入更秘密状态，在社会上未起大的影响。

总之，哥老会在新疆除辛亥革命时期曾响应辛亥革命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之外，以后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这是在杨增新镇压下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

规模庞大的五圣山

反袁斗争失败后，逃亡于日本的革命党人曾酝酿在国内重建洪门组织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2 年前后，洪门中几位参加了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集聚于上海，打算以上海为基地，重整洪门，东山再起。于是 1923 年 4 月在上海建立了五圣山。这个山头取名“五圣”，并非地理上真有五圣山，而是意在纪念洪门的前五祖、中五祖、后五祖。另一个含义是，开始结义时，只有国民党员五弟兄，所以以五圣为名。结义的宗旨是反对北洋军阀。这五人是朱卓文、梅光培、明德(字润身)、向海潜(字松坡)、张子廉。

五圣山分五堂：第一个称仁文堂，以朱卓文为堂主。第二个称义衡堂，以梅光培为堂主。第三个称礼德堂，以明德为堂主。第四个称智松堂，以向海潜为堂主。第五个称信廉堂，以张子廉为堂主。五圣山成立后，随着组织的发展，内八堂的大爷及心腹有背榜下山自行设社的，分别开设了许多分山。

各山堂的发展及活动情况大致如下：

1. 仁文堂

堂主朱卓文系广东人，在香港及两广方面发展弟兄，拥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朱卓文死后，继起无人，此堂无形消失。

2. 义衡堂

堂主梅光培也是广东人，与仁文堂同时在香港和两广发展，堂众达数千人之多。当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时，曾组织义勇军抗日，

带病坚持抗日。1947年有人提议由李福林继任堂主，但未经本堂弟兄通过。

3. **智松堂**

堂主向海潜，湖北大冶人。“早年曾参加兴中会、华兴会，隶黄兴部下，在洪门中之根基较深。”在辛亥革命时曾任鄂军民军司令。其后投靠张宗昌部充任团长，但得不到重用，失意而去。据传向海潜进洪门是在徐朗西榜下，后来脱离独立。1923年在上海开立山堂时，以反对北洋军阀为目标。他的势力在长江流域，上溯四川，下至江浙，均有发展，吸收不少国民党军政分子，商家也不少。上海各大寺院的住持或当家和尚大多站在他的山头，如静安寺的持松，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向海潜对进山的弟兄，没有公开名册，只有他自己知道，堂内兄弟集合聚宴碰头时，经他介绍才互相认识。他反对蒋介石，蒋令戴笠派高级亲信特务徐亮（为彬）进了他的堂，把他紧紧控制。他反对杜月笙，但是他很贫寒，又染上了鸦片烟瘾，要靠徐亮、杜月笙给他些生活费，为此，他不敢公开反蒋反杜。早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向海潜就曾多方拉拢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与吴铁城、商震、钱大钧、杨虎城、谭延闿、居正、王正廷、郑毓秀、刘纪文、李济深等均常有接触，或函电往来。”这些人中既有亲蒋的，也有反蒋的。他曾在经济上得到了吴铁城等人的接济。后来李济深也入了他的山门，被聘为五圣山会办，尊为客卿，地位在山主与副山主之间，这是洪门中未有过的先例。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的大批难民向内地撤退，在李济深的支持下，由五圣山洪门弟兄沿途负责护送，沿珠江西走至梧州，然后转到南宁、桂林，历经艰难，将老弱妇孺等两万余人送达安全地带。这显然是五圣山在抗日战争时期做的一件好事。抗日战争时期，向海潜曾企图以洪门弟兄为基础，组织抗日武装，他懂得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但是蒋介石坚决阻止他掌握武装。他所派遣的一位姓王的洪门弟兄在湖南组织游击队时，即被蒋指使薛岳抓去枪毙了。蒋介石还下令通缉向海潜，向急忙逃往桂林，托庇于李济深帷幕之中。

1941年，向海潜派洪门弟兄由上海经浙江转运棉纱及其他物资到桂林，充作五圣山“粮台”之用，实际上是做走私生意。

向海潜在桂林隐蔽期间，多方托人活动，经樊崧甫、吴铁城等人向蒋介石疏通，才取消了通缉令。但蒋介石对向海潜仍不放心，要他住到重庆去，给以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一个常务委员的空衔，实际上等于软禁在重庆。

1946年，向海潜回到上海，办理洪门复员事项，改组洪兴协会，仍任理事长。在九个常务理事中，五圣山首领占了四个，即向海潜、张子廉、樊崧甫、毛云，但实际权力抓在上海市社会局派来的王知本手中，名义上算是发展新经济、实际上啥事都没做。

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成立后，以向海潜任傀儡董事长，徐亮为总干事把持会务。后由徐聘章士钊为秘书长向浙江发展，被浙江省参议会所拒绝。徐亮盗用王晓籁、樊崧甫等浙江人名义电逝疏通，乃获许成立，乱收社员为特务作外围。后被蒋军驻浙部队总司令刘建绪以扰乱治安控告于蒋介石，蒋介石勒令新社会建设协会解散。

向海潜为便于自己的控制，由毛云疏通上海市社会局，获准创立上海市协社，自任理事长，以五圣山五堂堂主为常务理事，成为一个联络感情、生活上互相帮助的团体，绝不过问国家政治。在樊崧甫的建议下，向海潜表示愿与李济深合作。此后智松堂盟友如杭州的汪云山等参加了民革地下工作。上海解放前夕，向海替被国民党特务押上飞机，送往香港。上海解放后，向海潜派王智圣到上海，表示拥护人民政府，后在港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失去了行动自由。1949年以后，智松堂无形中瓦解。

4. **礼德堂**

堂主明德，湖北人，在郑州陇海路所办学

校任教，他发展组织以陇海路工作人员为基础，并涉及到工商、文教各界。陇海路局的副局长（如吴士恩）、工程师、段长、副段长、站长、副站长大都是其结盟兄弟，不论哪方面派来的局长，遇事都要和他商量。他对全路各方面拥有许多实权，俨然是陇海铁路线的一霸。抗战时期，他与汪伪许昌绥靖主任李西峰暗中向重庆国民政府输诚。1944 年，明德赴重庆，戴笠曾拨步枪八千枝给他组织部队。随后戴笠忽然改变态度，电胡宗南将枪截回。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委为副总指挥，却又被戴笠指使别动纵队司令刘慕德夜袭逮捕活埋。

1946 年 1 月，五圣山首领向海潜、张子廉、樊崧甫、毛云、樊光、邵爽秋想乘政党解禁机会，将帮会改为公开的政党。经张子廉介绍，礼德堂内八堂执事大爷欢迎樊崧甫代理堂主，而樊崧甫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区军风纪第五巡察团主任委员，礼德堂因群龙无首，积极列名具函表示拥护其为堂主。

樊崧甫原系九龙山的红旗老五。1940 年，樊越山过岭转入五圣山智松堂，部位升为执堂，随即又升为信廉堂座堂。由于樊在军界地位较高，帮会中人士热衷于拉拢他，以利用他的名声。樊崧甫于抗战胜利后筹组洪门政党一再受挫，1949 年被蒋介石逮捕入狱。解放后，樊崧甫通知礼德堂成员接受共产党领导，从此停止了洪门的活动。

5. 信廉堂

堂主为张子廉，浙江抗州人，少年时在上海制造局当机械工人，后返杭州自营机器修理店，参加了光复会。辛亥光复杭州之役，陈其美令蒋介石率敢死队攻打杭州的清军，当时得到张子廉暗中协助。张窃取了清军旗营火炮的主要机件，使炮弹发射不出，敢死队趁机攻破巡抚衙门，杭州得以光复。张子廉后来在上海经营三友实业社，转创三星绵织厂，五四运动时，他建立了路段商会联合会，与官方控制的总商会对抗，号召工人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他的文化水平低，又缺乏领袖人物的素质。他也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曾加入杜月笙的恒社，受到杜的控制。

抗日时期的分化

五行山为抗日而成立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步步加紧侵略华北，中国民众意识到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在上海的洪门五圣山成员徐逸民、范文藻、杨宝璜、邱汉平、韦敬周、崔锡麟等人，认为应当发扬洪门先祖列宗“反清复明”的精神，创立一个新的洪门山堂，团结文武英雄志士，反抗日本的侵略，收复东北失地。于是从 1934 年冬季起开始筹备，其筹备经费大多是徐逸民私人解囊。

这几位筹备人，大都是美国留学生。其中韦敬周是财政部造布厂厂长，杨宝璜是英国怡和公司上海海洋轮船部经理，徐逸民是著名外科专家，范文藻是上海著名建筑工程师，邱汉平是有名的大律师，崔锡麟是新闻界人士。他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

他们新创立的山堂定名为“五行山”，取意于用金木水火土的物质力量来消灭日本侵略者，收复东北。他们拥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年逾七十的洪门老前辈汪禹丞担任“五行山”山主，徐逸民等六人分别任副山主和内八堂等职。又请汉口的洪门前辈山主白玉山任副山主，以便于指导洪门规章制度，并利于邀约邻省邻县各山头堂口的弟兄来沪参加“五行山”成立大会。公推崔锡麟拟订“五行山”的山、堂、水、香、名称，并起草出山柬檄文，以便分发三山五岳的洪门袍哥，藉以联络号召。

“五行山”的山、堂、水、香的四柱名称为：五行山、卫国堂、保家水、团结香。山柬檄文要点为：

呜呼！九·一八、一二·八，我大好河山竟被日寇侵略，东北沦陷，沪江喋血，倭奴小鬼，

俨同野兽，鲸吞我土地，劫掠我财富，杀害我同胞，奸淫我妇女。我无辜小民，白骨如山，血流成河。……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石达开有言："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虏；相率中原豪杰，还有河山。"我洪门哥弟皆炎黄之子孙，不能坐以待毙，爰创立"五行山"，高举义旗，联合中原之豪杰，聚合天下之英雄，誓扫东夷，还我河山。为此呼吁三山五岳之袍哥，协力同心，浴血奋战，灭此朝食，痛饮黄龙。谨此柬告。

"五行山"成立大会定于 1935 年农历二月二日，民间称这天为"龙抬头"的日子。会前，徐逸民又托黄金荣向巡捕房打招呼请予保护。租界巡捕房中的巡捕多数是青、洪帮成员，只要打个招呼，他们就不来干扰。

成立大会前，还专门订做了六套明代服装，方巾帽子，圆领长袍，一律黄色，是专为正山主和五位副山主开山时准备的。

农历二月二日夜九时，洪门弟兄来到寺庙，巡捕房担任警卫工作的四位便衣巡捕，也正是洪门弟兄。

深夜来临时，由汪禹丞老大哥宣布大会开始。黄华大哥担任司仪，一切照事先规定的程序进行。在宣布开会之前，神台上已供奉了彪、罡、飑、彪、飑五祖之神位，墙上贴着"五行山"成立大会顺序单，内容有：

第一，净面净手，由预定的山主、副山主及内八堂大哥挨次进行。当司仪宣布净面时，山主第一个净面，这时司仪口念"金盆打水亮镗镗，照见汉家日月长，反清复明来净面"，此时山主将毛巾在水面反复一次，接着司仪再念"恭迎五祖鉴忠肠。"于是以下各人挨次净面。

第二，燃烛焚香。由当家三爷燃烛并念燃烛诗："高烧红烛照山堂，洪门义气万年长，中华儿女心如火，民族前途放异光。"焚香诗由当家三爷焚香时宣读："五祖堂前万载香，同心合力定家邦，凯歌高唱班师日，痛饮黄龙喜更狂。"

第三，全体哥弟朝拜五祖，行三跪九叩首礼。

第四，拥护汪禹丞老拜兄荣任"五行山"山主。

第五，拥护徐逸民、杨宝璜、范文藻、韦敬周、白玉山五位大哥荣任"五行山"副山主。

在宣布正副山主后，管家三爷即将预制的明朝服装黄袍、方巾给正副山主穿戴齐全。

第六，全体哥弟向正副山主行祝贺礼，即向五祖神位行跪拜礼，一跪三叩首，正副山主立神台前作揖还礼。

第七，请山主封内外八堂各位大哥勋位。在封内外八堂哥弟前，汪山主指定徐逸民，杨宝璜、范文藻、韦敬周四位大哥为今晚被封内外八堂勋位之大哥，担任恩、承、保、荐四大盟兄（湖南洪门称恩、盟、拜、证四大盟兄。洪门有的山主自兼坐堂，统称恩兄，有单独设坐堂者，皆以坐堂为本山堂恩兄）。

司仪传令称：奉汪老山主命令：

封副山主徐逸民大哥兼本山坐堂大爷。

封副山主杨玉璜大哥兼本山陪堂大爷。

封副山主范文藻大哥兼本山文堂大爷，加封崔叔仙大哥为文堂大爷。

封副山主白玉山大哥兼本山武堂大哥并兼礼堂大爷。

封副山主韦敬周大哥和韦颂冠大哥为本山堂粮堂大爷。

封邱汉平大哥为本山刑堂大爷。

封梁其田等大哥为本山堂心腹大爷。

第九，全体哥弟向内八堂各位大哥行祝贺礼，向五祖神位行跪拜礼，一跪三叩首。正副山主和内八堂各位大哥立神台前作揖还礼。

第十，请山主封本山外八堂各位哥弟的勋位，由司仪传令称：奉汪老山主命令：

封某某等为"五行山"三哥担任当家三爷。

封某某等为"五行山"五哥担任红旗五爷。

封某某等为“五行山”六哥担任□□六爷。

封某某等为“五行山”八哥担任□□八爷。

封某某等为“五行山”九哥担任□□九爷。

封某某等为“五行山”十哥担任执法么爷。

第十一，全体山主、内外八堂兄弟行礼，向五祖报喜，行跪拜礼，一跪三叩首。

第十二，请山主宣读本山头的山、堂、水、香名称。山主宣读本山头是“五行山、卫国堂、保家水、团结香”，并说明山、堂、水、香是本山头最秘密的组织暗号，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只作串连暗号。

第十三，请坐堂大爷宣读《五行山出山柬》檄文。

第十四，请刑堂大爷宣讲洪门纪律十条十款如下。

十条：一、打倒日本小鬼。
　　二、继续反清复汉。
　　三、收复东三省。
　　四、消灭满洲国。
　　五、反对投降卖国。
　　六、铲除一切汉奸。
　　七、反对外国侵略。
　　八、不做外国奴隶。
　　九、义气团结，互相帮助。
　　十、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十款：一、不准杀无辜。
　　二、不准奸盗偷窃。
　　三、不准营私舞弊。
　　四、不准扶强欺弱。
　　五、不准出卖山堂。
　　六、不准屈服投敌。
　　七、不准私通敌伪。
　　八、不准泄漏秘密。
　　九、不准卖友求荣。
　　十、不准私立山堂。

按照洪门五祖纪律，如有违犯本山十条、十款者，“光棍犯法，自绑自杀。”

从洪门“五行山”的十条、十款中可以看出它明显地具有抗日救国的性质，同时它在纪律方面继承了洪门的传统的江湖义气。

第十五，歃血同盟，由红旗五哥左手缚着雄鸡，口中念道，杀尽倭奴还我血，同心合力复河山。右手举起钢刀斩断鸡头，将鸡血流入一大型瓦盆中，把鸡血与白酒搅和，由山主汪大哥领头排队，由五哥舀起一碗血酒，各人挨次饮一口血酒，表示万众一心消灭日寇，恢复东北三省，痛饮黄龙。

第十六，全山哥弟宣誓，由坐堂除逸民大哥领读誓词。誓词曰：义气团结，誓灭倭奴，如有违背本山纪律，甘愿自裁，此誓。

第十七，请副山主白玉山大哥讲洪门简史，讲全国洪门组织，讲洪门串连暗号、码头接待规矩等等。

第十八，坐堂徐逸民大哥宣布明天下午六时在某某餐馆酒会，共庆本山胜利成立。

第十九，全山兄弟团拜，庆贺“五行山”成立大会胜利完成。由山主、副山主、内外八堂全体哥弟分班列队向五祖神位行跪拜礼，一跪三叩首，以示庆贺。

第二十，恭送五祖，仍由山主、副山主、内外八堂全体哥弟分班列队向五祖神位行跪拜礼，一跪三叩首。最后由汪禹丞山主捧着五祖神位放在纸马上焚化，送祖回天，以免留下五祖遗迹被人利用。焚纸马送祖时，山主口念：“五祖神前盟誓愿，洪门义气万年长，今日送祖回宫阙，全仗灵感复旧邦。”

大会结束时已是次日早晨红日东升之际。

洪门“五行山”的成立与仪式具有典型性，反映了洪门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在香堂程序方面也比清朝时期洪门仪式有所简化。

陌华山有志抗日

“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冯玉祥将军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上海抗战。冯

的旧部王修身(字蒂民,早年任冯玉祥卫队旅旅长)任三十二师师长,率全师人马在上海大场附近与日军浴血奋战。王修身得到了洪门“皕华山”与“五行山”的大力支援。洪门“五行山”首领人物崔锡麟任三十二师驻沪办事处处长,专门进行抗日募捐工作,曾为抗日部队募捐了大量军需物资,计有大小汽车、大量石油、军用电气器材和无线电器材,以及军用服装和大量罐头食品。在一个多月内,经由崔锡麟等交副官处押送前方的军用物资有二十多卡车。

洪门“太华山”在武汉也为抗日募捐了大量军用物资,并帮助抗日部队转运大批医疗器械。

上海沦陷后,一部分洪门人士在上海秘密进行抗日活动。1940年4月(农历三月十五日)在上海义善会关帝堂举行了“天龙山”开山仪式并发表了《宣言》,以“复兴民族,振兴中华”为职志。

1939年,洪门“皕华山”在重庆山王庙成立,其宗旨为“反对日本异族,还我河山”,继承了“反清复明”的传统精神。

“皕华山”的山、堂、水、香四柱为:“皕华山”、“抗日堂”、“四海水”、“义气香”。

“皕华山”举行成立大会时,约请了青、洪两帮在重庆的上层人物近百人参加。其中大多数是军政人员,如孙桐萱(军长)、张汶(字景贤,副师长)、蒋锄欧(字诉心,铁道铁甲车总司令)、钱公南(交通部技正)、壮智焕(经济部司长)等人。其中有两位朝鲜人参加,一名李青天,一名李范奭,他们二人于杭战胜利后分别担任南朝鲜李承晚政府的陆军总司令和国务总理。

洪门“皕华山”的出山诗是:

(1)

东夷日寇逞猖狂,犯我河山夺我疆。
关外沦为新傀儡,南京屠杀血汪洋。
强抢财物伤人命,奸淫妇女剖胸膛。
黄帝子孙齐努力,誓把倭奴一扫光。

(2)

大好河山遭掠夺,中华儿女忾同仇。
妻离子散抛园宅,国破家亡泪横流。
愿献此身驱日寇,拼将一死救神州。
今朝歃血同盟后,不灭倭奴誓不休。

出山诗表达了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和抗日救国精神,这是值得称赞的。

“皕华山”开山立堂的程序节目及十条十款等,一律沿袭了“五行山”的那一套。

“皕华山”拥洪门上层人物韦作民为山主兼坐堂大爷,蒋锄欧、崔叔仙为副山主兼陪堂大爷。山主以下的内八堂不称大爷,都称大哥,反映出一定的开明色彩。

洪门“皕华山”成立后,联络了在重庆的洪门仁字号堂口的老舵把子田得胜、“长白山”山主张树声、“五行山”山主向海潜、“太华山”山主杨庆山等人,由韦作民设宴聚会,讨论组织全国统一性的洪门组织,以图共同抗日救国。同时也企图借此扩张洪门的势力影响,争取政治权力。他们的活动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发现后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担心洪门组织联合起来有可能被“异党”利用。同时认为四川袍哥组织遍地林立,势力强大,是一种有危险性的势力。为了控制帮会势力特别是四川各县的袍哥组织,蒋介石指使戴笠拉杜月笙出面组织全国青洪帮大联合。为此,杜月笙在四川加入了洪门,组织了一个由蒋介石控制的“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这一帮会大联合的组织具有两面性,即有抗日的一面,又有对付国内民主运动的一面。

为虎作伥的败类

三、四十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各种社会势力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态度方面也发生了变化。面临民族矛盾的尖锐化,洪门中一部分组织采取了抗日的立场和态度,而另一部分组织却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充当了汉奸。就同一组织而言,每个成员对待日

本侵华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都应当作具体分析。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汉奸政权很重视利用青洪帮这支社会力量，推行其反动政策。中华洪门联合会就是日伪御用的汉奸洪门组织。

中华洪门联合会自 1942 年 11 月开始筹备，于 1943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国际饭店成立筹委会。此后每星期五下午在上海国际饭店十二楼举行常会。

筹委会的首领人物为：李炳青、高汉声、许凤翔、周伯甘、周拂尘。陈亚夫、项佛时、李凯臣、张长生、白玉山等。他们大都是各山堂的龙头大哥，如李炳青为“终南山”的大龙头，号称“洪门巨头”；许凤翔为“五龙山”龙头兼“玉圣山”代理龙头；白玉山为“终南山”龙头、汉口洪兴正义会会长；张长生、陈亚夫分别为“复华山”、“大华山”的龙头；周拂尘为上海洪门联合组织“洪兴协会”的评议；周伯甘为“五伦山”龙头。其中李凯臣任汪伪交通航运局长，周拂尘任汪伪财政部侦缉处队长，项佛时任汪伪监察委员，周伯甘为汪伪政府的边疆委员。这一筹委会在组织成员上就具有汉奸性质。

中华洪门联合会于 1943 年冬季正式成立。它以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政权为靠山，妄图联络全国帮会，统一全国洪门，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其成立大会《宣言》声称，中华洪门联合会的重要工作与命令是“要使洪门组织健全化明朗化，把狭义的民族思想转变到国父的大亚洲主义方面。同时要把洪门固有的道理观念恢复起来，着重于五伦八德的实践，征集优秀会员，结成强有力的阵线，准备担任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一切使命”。这里所说的把狭义的民族思想转变到国父的大亚洲主义方面，实际上是歪曲孙中山先生早年所说的大亚洲主义的愿意，抽掉了孙中山先生原话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具体内容，是要洪门成员放弃爱国的意识，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宣言》还鼓吹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战争顺利进展”，标榜汪伪政府卖国的“中日同盟条约”，并厚颜无耻地说要“动员我们洪门所有的雄厚潜在实力，在汪主席领导之下，内而对于国家民族期有伟大的贡献，外而协助友邦盟国，本同甘共苦，互相提携的精神意志，努力本位工作，俾有裨于东亚新秩序的树立与共荣圈的结成。”汪精卫已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而这批洪门首领人物则又充当汪精卫的走狗，公然鼓吹日本帝国主义的“东亚新秩序”与“东亚共荣圈”。

这一洪门联合组织的工作“标的”和“使命”又概括为：“协助政府完成全面和平运动”，“努力遵行及实践新国民运动”，“以整个力量完遂大东亚圣战”。其汉奸嘴脸暴露无遗。

中华洪门联合会筹委会成立后，曾组织了多种活动，其中如：1943 年春，在上海市四十家影剧院放映银幕广告，散发数万份《告同胞暨哥弟书》。5 月 16 日起举行宣传周，利用日伪的广播电台举行广播演讲，为日寇鼓吹“大亚洲主义”和中日“共存共荣”，胡说“没有日本，中国就无法生存”。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船津辰一朗也来为中华洪门联合会打气、撑腰，以“中华洪门联合会光明的建立”为题目，在电台广播演讲。

当 1943 年 12 月，中华洪门联合会正式成立时，受到了汪伪政府当局的重视，伪司法院院长温宗尧亲为题词：“蔚为大观”；伪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亲为题词：“见义勇为”；伪部长任援道题：“兴复中华，保卫东亚”；伪秘书长赵尊嶽题：“众志成城”；伪部长彭年题：“会友辅仁”；伪局长卢英题：“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同德同心，协力和平”。

中华洪门联合会由于汉奸嘴脸昭然若揭，在帮会和洪门中十分孤立，参加这一联合会的大都是该会发起人所控制的那些山头中的一部分人，许多具有爱国心的帮会或洪门组织对这一联合会采取了抵制态度。

中华洪门联合会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特别是在法西斯侵略者德、日、意面临失败的形势下出笼的。这批民族败类和政治投机分子只看到眼前的势利,根本看不清世界形势。他们扮演的这场丑剧既反映了政治品质恶劣,又反映了他们的愚昧和盲目。他们的行为是对洪门爱国传统的背叛。1945 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无条件投降,中华洪门联合会也就成了日伪的殉葬品。

黄埔军官入洪门

以往很少见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军人参加帮会,因为蒋介石"最忌讳他的学生和部下去拜别人当老头子。"但也有例外情况,当蒋介石看到帮会活动能为他利用时,他不仅指使军统、中统参加并控制帮会,也准许黄埔军官打入帮会。抗日战争时期,洪帮头子杨庆山在重庆以他的"忠义堂"名义,捐献飞机十几架,得到蒋介石的特别嘉奖。从此杨与国民党上层拉上了关系,与"党国要人"交往甚密。国民党上层人士也拜杨为大哥并正式参加洪帮。1939 年,汤恩伯部下的军长王仲廉、副军长李铣及其他一些将领都正式参加了洪帮,拜在杨的山堂下。这些人都是黄埔第一期学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们说:"在军队中发展红帮组织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并说是老头子(指蒋介石)同意的。据他们说蒋介石重视帮会的原因在于青洪帮成员中,"九流十三教都有,各方面的消息都很灵通,可以作为政府耳目,得到一些重要的情报。"

杨庆山派遣洪帮中的红旗老五王文治到湖北恩施,帮助汤恩伯手下的李铣收徒弟,并传授洪门的各种隐语、帮规、礼仪等。1940 年夏季,在湖北恩施先后正式开过三次香堂。第一次是经李铣动员所辖的六个团团长、中校团副、少校团副、各团营长正式参加洪帮。六位团长都被封为内八堂的礼堂,在洪门中步位较高。第二次开香堂时,六个团的全体官员都正式参加了洪帮,拜副军长李铣为大哥。李借此使全体军官对他效忠。

李品仙利用洪帮反共

1939 年 11 月,李品仙被任命为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这对安徽省政府已迁移到"立煌县"(现金寨县)。李品仙从湖北老河口前来就职时,带来一位名叫欧阳长松的湖南人,是湖南洪门的龙头大哥,也是李品仙的老部下。李想利用欧阳发展洪帮作为党羽。路过鄂东时,欧阳介绍黄安洪帮头子王贵和和李品仙相见。李称王为"大哥"。王随李到了立煌县。李封王为豫皖鄂边区党政分会上校专员。这位洪帮头子便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官。不久,王即与大流氓倪荣仙勾结,创立了洪门"大别山祖堂",在大别山一带发展洪门组织。

李品仙遵照蒋介石的指示,要在安徽阻止、破坏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李就职后即利用王贵和为首的洪帮势力于 1940 年 2 月制造了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动委会"人员的惨案,严重打击了安徽的抗日动员工作。此后,李品仙更加重用王贵和,任命王充当党政军总办公厅的视察组副组长。在李品仙支持下,王贵和计划在大别山地区发展一百个山堂,并企图使他手下的一千多人变成一支武装力量。但是,由于大别山地区的人民过去受过工农红军的教育,对于王贵和发展洪帮破坏抗日工作,进行抵制,王活动了三年,也仅成立了七个山堂。王感到大别山地区发展洪帮阻力大,便到大别山外围地区发展组织,企图吸收巢湖盗匪为基干力量,然后伸入日伪地区组织山堂。但由于在三河地区与青帮势力发生了冲突,遭到当地青帮头子张斗山的反对。张斗山通过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委员的张义纯,沉重打击了王贵和的活动,促使大别山洪帮活动销声匿迹。

胡宗南纵容下的洪帮

抗日战争时期,陕西省国术馆副馆长郑汝平,由于教胡宗南练太极拳,取得胡宗南的

默许，组织洪帮“西华山”。郑汝平是借助于李海帆在洪门的资历开山堂的。李海帆幼年时即加入洪帮，由老幺一步步升到内八堂大爷，他对洪门的仪注（规章）、条子（隐语）十分熟悉。郑汝平在李海帆的大力帮助下，“一步登天”，打出“西华山”的招牌，自封山主。在西安发展组织盛极一时。常于夜间在北大街通济坊大楼摆设香堂，广收门徒。“西华山”的“四柱”为西华山、忠信堂、泾渭水、义气香。

郑汝平开山堂，号称五千之众，除本市外，陇海铁路由郑州至宝鸡段，沿线从站长到打旗、挂钩的铁路工人，大都是西华山的弟兄。由段长以上至路局处长、课长，都是“五圣山”的哥弟。五圣山是由上海发展过去的老山头。

在西安解放前数月，郑汝平到汉中曾纠集洪帮千余人，组成“忠义军”，妄图追随胡宗南反扑西安。汉中解放时，郑汝平率部缴械投诚，被押送宁夏劳教数年。后回到江苏沛县原籍病故。

军统特务控制帮会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政权迁到四川后，见四川袍哥组织力量强大，决定加以控制利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警察总队副总队长徐亮出面，联络本地袍哥及外来的青、洪帮，组织一个在军统特务控制下的统一的帮会机构。这一决定原出于蒋介石的授意。

这一统一的帮会机构名称为“人民动员委员会”，于1941年夏在重庆莲花池江苏同乡会礼堂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袍哥代表有田得胜、谭备三、冯什竹、唐绍武、石孝先、何占云等，青帮代表有张树声、韦作民，洪门代表有杨虎、杨庆山、程壮等。另有各帮会骨干分子数百人到会。”推杜月笙为名义首领，大会由军统头子徐亮主持，宣布“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宗旨为“联合全国帮会，抗战建国”，要求大家“服从三民主义，拥护蒋总裁”云云。并声称：“戴先生（指戴笠）是代表总裁领导大家的。”其组织章程为：委员会内部设书记、常务委员、委员及办事人员。

并设办事处，由书记主持一切会务；设指导委员会、设计委员会，聘各帮会骨干分子参加工作。委员会采取秘密组织方式，不挂牌子，不用委员会名义公开对外活动，而用各帮会名义对外活动。办事处秘密设在重庆戴家巷37号。

第一任书记为军统特务蒲风鸣，原系云阳袍哥，他死后由特务金玉波（洪门）接替。当金随戴笠乘飞机失事摔死后，由军统特务严守三（洪门）继任。

常务委员中有徐亮、张树声、杜月笙、杨虎、杨庆山等。委员有田得胜、冯什竹、韦作民、唐绍武、石孝先、程壮、蒋相臣等人。指导委员、设计委员更有一批人。

该组织成立后，曾于1942年藉蒋介石五十六岁生日祝寿为名，发动各帮会募款，捐献飞机协助抗战。1943年初，宣称共捐款购飞机十八架，其实是旧飞机十八架油漆一新，编为“忠义”号。

军统利用“人民动员委员会”控制帮会，与中统发生了争夺。当时，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为中统头子方治，他也想控制袍哥组织。曾于1943年动员田得胜、冯什竹等袍哥大爷率各堂袍哥集体加入国民党。此事被“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军统头子洪帮成员金玉波得知，立即阻挠，使田得胜等人不敢遵照中统指使行事。1944年，方治又令田得胜等率袍哥山堂组织“文化列车”，游行街头，又遭到了军统的阻挠，方治未能如愿。抗战胜利后。因金玉波与戴笠同机丧命，加以抗战胜利，原以动员抗战为名的“人民动员委员会”名称业已过时，遂自行销声匿迹。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回南京后，于1947年春，又在上海成立了由特务控制的“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并在各地成立分会。中统与军统继续争夺对帮会的利用、控制。

幻想参政组建政党

抗战胜利后，各地洪门团体幻想中国实现多党政治，幻想通过议会民主参政，于是纷纷组建政党。先后出现了中国民生共进党、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华社会建设党、民主社会协进会、中国民主合众党等等。各洪门政党的基本面貌及其政治主张如下。

中国民生共进党的夭折

1945年初秋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委会军风纪第二巡察团中将主任委员、洪帮首领人物樊崧甫决心冒风险组织洪门政党。1946年1月，樊崧甫乘到重庆述职之机，与军界洪帮人物樊光等共同协商，拟建立中国民生共进党。

樊崧甫在《中央日报》发表《对于协商会议前途之展望》一文，促进蒋介石开放政权。但是，这些发起人各顾自身利益，畏首畏尾，怕得罪蒋介石，推樊崧甫出面。而樊崧甫系现役军人，受军纪约束，不敢放手干，就鼓动国民党中央委员方觉慧(字子樵)脱离国民党来领导帮会成立新政党。但方觉慧认为帮会界的成分过于复杂，不敢承担这一任务。不久，樊崧甫以国民党"军风纪视察团主任"的身份进驻西安，声称得到孔祥熙的同意，以青洪两帮为骨干联合其他帮会组成政党，定名为"民生共进党"。1946年3月，该党在西安初步组成筹委会，其宗旨为："团结青、洪、汉、礼、白各帮会及回教教胞，努力工商业之发展，以为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打倒国民党之贪官污吏，反对共产党之武力攫取政权"。该党命名的含义，除了改进民生外，主要还在于继承民国以来帮会组建全国性党派、会社的传统，其中如民元青洪帮为主体组建的中华国民共进会，该会遭袁凯压迫而解散。此外，北伐前、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上海帮会首领(青帮大字辈人物)在上海设立"共进社"等。总之，注重帮会传统是该党的一大特色。该党在筹委会成立后的成立宣言全文如下：

中国民生共进党成立宣言

(1946年3月)

中国民生共进党，由青、洪、汉、礼、白各帮会及回教同志为基础所组成。此六大支系，在近三百年来对于中华国家民族有悠久奋斗之光荣历史，值兹抗战胜利，暴力崩溃，世界提倡和平，我国宪肇始之时，同人等为生存演进，决议作进一步之民生建设，公开为政党之组，秉承"唯中哲学"三纲五常八德之祖训，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以建民国，以臻大同。敬布宣言，伏维公鉴。

中国民生共进党制定了总章，共分十一章五十八条。内容较详细，基本上参照了民国以来国内各资产阶级党派的章程，基本上属于旧民主主义的政党章程与格式。

中国民生共进党制定了政治纲要共计十条。其中第二条为："本党人生观，依据我中华五千年历史，以惟中哲学为基础，取人我互助，不相侵犯为原则，不采唯心唯物二大极端理论。"第四条："政治方式以全民意见为基准，治权竞争以民心向背决定。"第五条："经济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生产多，消费少为原则，排除剥削与掠夺。"第七条："武备只求维护生存，反对外争及内争。"第十条："在法律面前，人我平等，男女平等，种族平等，宗教平等，职业平等。"

从中国民生共进党的政治纲领中可看出，该党企图走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其哲学理论是"唯中哲学"，其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主张，也都以"中间派"面貌现场，较明显地表现出脱离实际的特点。

樊崧甫自称曾奉蒋介石电召到南京面呈该党党纲政策，并与各地帮会首领杜月笙、张子廉、杨啸天等联络，于1946年9月7日在上海设立中央总部，地址设峨嵋路144弄7

号。该党内的主要山头有五圣(武胜)山,负责人为樊崧甫和张子廉;喜马拉雅山,负责人张兰亭;西华山负责人郑汝平;民众山负责人张师珏;复兴民国山负责人罗海沉;金鼎山负责人刘海亭;中华山负责人候雅轩;遍统山大别山负责人张伯英;万寿山负责人李孔裕等。组织原则为民主集权制。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大会闭幕后,即为中央理监事会(理监事以省为分配单位,每省理事三人,候补理事二人,监事一人,半年开理监事联席会一次)。中央理事会设总书记、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调查部、经济部、文化部及设计委员会等单位。各省代表大会闭幕后(每年举行一次),大会为省理临事会。其总书记以下,仿照中央组织,分设处、组、股。县代表大会每半年举行一次,闭幕后为县理事会;由常务理事一人兼总书记,以下分设干事若干人。区代表大会三个月举行一次,闭幕后为区理监事会,设常务理事兼总书记一人,及干事若干人。区党部以下设区分部。党员入党条件:第一,须为青、洪、汉、礼、白及回教教胞;第二,须经党员二人以上的介绍,及各级党部理监事会许可;第三,须接受党纲,实行决议,遵守党纪,履行党员之一切义务。

中国民生共进党以西北、河南和上海为活动基地。该党初期主要在西北活动。陕西省负责人为张子翔、刘海亭、王月波、何家成、马青苑等三十一人。河南负责人为贾成林、陈琪、高晴岚、赵良卿、马效良、尚滋干等二十一人,赵良卿任主任委员。陕西省支部对外活动,以"汉威社"名义为掩护,由张兰亭任社长,社下设组长,每小组六人。陕西各县公开组织分部,已成立者计有宝鸡、同官、宜川、宜君、黄陵、洛川、白河、凤县三原等地。又成立青洪帮调整委员会,调整青洪帮所有法师,及山、主之系统;规定收徒、结盟应先呈报,经考核准许,方可入党。陕西省支部为筹集活动经费,组建"伍轮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除由该党中央供给外,并征求党员入股。河南省支部设于郑州,筹备处主任委员赵良卿,以军委会少将高参名义,大肆活动,尽量拉拢青、洪帮入党,并开山收徒。该地区发展党员成份十分复杂,曾被敌伪利用的"先天妙道会"的徒众也多被拉入党。

该党为统一西北之组织及行动,特联合河北、山西、绥远、陕西各省支部,各推代表三人,在西安市总工会该党办事处,开会筹备组织西北执行部。西北执行部决定设理事九人,监事三人,总书记一人。马彦翀、叶新甫、李秀珊等代表陕西,侯伯猷代表山西,李广恒等代表绥远,高延年等代表河北。该党中央特派员杲海烂、马青苑为当然理事,其余理监事由各省支部代表推选。

蒋介石起初并非直接禁止樊崧甫组建帮会政党,而是通过国民党陕西党部主任委员张守钧告诉樊崧甫,"中央欲将戴笠的军统人员安置在民生共进党里",樊向张表示"不同意"。

中国民生共进党在西北地区和河南发展很快,在广收洪门弟兄的同时,不断扩张"筹备会"。当军风纪巡察团调驻郑州后,樊崧甫即在河南各地发展组织,利用陇海铁路和京汉铁路两线的洪门关系,在西安成立同德运输企业公司,在郑州成立五伦企业运输公司为民生共进党开辟经费来源。正当民生共进党筹委会兴高采烈时,国民党中统和军统一到反对樊崧甫的组党活动。同时南京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致电陕西省党部主任王宗山,制止樊崧甫"以帮会组党"。随后,中国民生共进党的秘书长李非凡被胡宗南逮捕,永远不知下落。随后,蒋介石以军委名义密电刘峙、胡宗南,令刘、胡将西北民盟和民生共进党强行取消,勒令其停止活动。西北方面组党工作就此告终。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军委委员会撤销,改组为国防部,各军风纪巡察团亦奉令结束。樊崧甫经南京到达上

海,与从美洲来的洪门致公党首领司徒美堂合作,筹办洪门政党。名称尚未确定。司徒美堂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遭蒋疑忌。受到蒋介石所派特务的摆弄与挟制,无法开展工作,樊崧甫只得单独行动。这时洪门领袖人物向海潜召集五圣山各堂首领开会,终南山山主韦以黻(字作民)也来参加。智松堂主向海潜自封为总堂主,提议以毛云代理仁文堂堂主,义衡堂堂主留给李济深或李福林,礼德堂堂主由韦以黻兼、以樊崧甫为副堂主。会后不久韦以黻病故,又公推樊崧甫继任,并兼管终南山事务。樊在沪杭两地开香堂数次,收了上千洪门弟兄,"仍以促进民德发展民生为目标,在政治上走中间路线。"仍积极组党。

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徐亮来上海,以重金和国大代表为诱饵,拉拢洪门首领,以阻止洪门成立政党。为了抵制洪门成立政党,蒋介石又指使徐亮等人组织"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笼络了众多帮会由特务控制,这使洪门组织政党更加困难。

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成立后,司徒美堂曾积极创办民治党,而樊崧甫与张子廉合作筹备民生共进党。这两个政党的政治人才和财政经济条件都不佳。尤其是樊崧甫创办的民生共进党,得不到左右两方面人士的欢迎。因樊崧甫是国民党军官,以往与蒋介石关系密切,被左翼人士看作是受命于蒋的。而樊原是国民党员,今脱离国民党别树一帜,被右翼分子视为反党行为。而"民生共进党"简称为"民共党",竟然又被认为是从属于中共的。

1947年春,以孙科为背景的自由党林东海等到沪,拉拢民治党、民生共进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组织中间政党联盟,受到蒋介石控制的报界的攻击。1948年,樊崧甫由邵爽秋介绍,答应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京沪地下工作人员王葆真合作,樊崧甫的组建政党活动就此终止。1949年初,蒋介石要樊崧甫担任京沪杭警备副司令,遭樊拒绝,怀疑樊在政治上有异变,令特务头子毛森逮捕樊入狱,直到上海解放。樊出狱后,成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人士。

在樊崧甫领导洪门组建政党过程中,上海洪门派别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组党与组社之争。

洪门五圣山几位堂主曾在组建洪门政党还是会社问题上发生争执。礼德常主樊崧甫曾在国民党军界任要职,因受陈诚排挤,对国民党不满,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力求以洪门为基础,组建政党,在政治上另谋出路。而智松堂主向海潜虽然也与蒋介石有矛盾,但由于抽鸦片,在经济上依赖杜月笙和国民党方面接济,不敢得罪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比樊崧甫要软弱得多。1947年4月,向海潜在上海祝寿,设寿堂于静安寺内,贺客盈门,除洪门弟兄外,上海国民党军政警宪的要人几乎都到了,居正、孙科等党国显要也送上了寿屏、寿联,"蒋介石也送来一封厚礼。"可见当局是拉拢向的。因此,当樊崧甫积极筹组"中国民生共进党"时,向海潜反对组党,主张组社。

当蒋介石指示徐亮以"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统一对帮会的控制时,樊崧甫极力主张组织政党,徐亮主张组织会社。争论的实质在于国民党要控制帮会而帮会势力反对控制。樊所主张组建的政党是脱离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在政治上求独立的政党,这当然是当局所不许可的。会上樊、向之间争论激烈,向声称:"决定组会不组党,谁反对,以家法制裁。"而樊愤然抗议,并指出:"老大不仁,莫怪兄弟不义,各干各的,谁敢卖友求荣。"洪门首领人物覃振与樊的意见一致。

其实,向海潜在难言之隐,他也亟欲为洪门在政治上争取一个公开独立的地位。杜月笙曾将蒋介石反对洪门组织政党的意思暗示过向,况且"自军统特务徐亮打入洪门之后,不仅智松堂,而且整个五圣山的活动,都在军统严密监视控制之中,很难有自由施展之余地。"

1948年，樊崧甫在上海协社一次会议中，建议用洪门几个领导人的名义，对时局发表一个声明，呼吁国共两党停战言和，向海潜公开反对。最后樊又提出与李济深暗中联络，向默许了。有人曾问向，为何不同意呼吁停战言和，向说："他们只图个人发展，不考虑我和洪门弟兄的安全，发表了这样的声明，我们还能存在吗？"可见向海潜内心并不反对将洪门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由于不能摆脱对"蒋家王朝"的依附，为了个人的安全，不敢组党，也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要求。向海潜仿效杜月笙组织"恒社"的形式，组织了一个"上海市协社"。

中国洪门民治党成立前后

海外洪门在辛亥革命期间为辛亥革命筹饷作出过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日救国出钱出力，名标史籍。但是抗战后，在政治上发生了分化，有的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也有的被国民党"中统"利用。

海外洪门组织分为四种："一为'致公堂'；二为'金兰公所'；三为'达权社'；四为'洪顺堂'。""民国以来活动最力者乃致公堂。"

1923年10月10日，在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倡议下，于美国旧金山举行全球洪门代表大会，将致公总堂改组为民治党，由美洲华侨领袖人物陈竞存、唐篑赓任第一届正副总理。陈、唐逝世后，改选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为主席，继续负责领导，但由于组织不够健全，且缺乏基本政纲和有关章程，组织上也较分散，多年来无显著发展。

抗战胜利前后，在国内外民主潮流推进下，国内新党派相继产生，海外洪门热情参加国内的政治活动，力图组建现代化政党，在国内参政。1945年3月，在纽约举行全美洲洪门代表大会，宣布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总部设在上海，仍由司徒美堂任主席，海外各地多设有总支部及分部。该党之宗旨为："统一海内外洪门组织，团结社会劳动群众，促进民主政治，安定世界和平"。对国是的主张是："以省为地方自治单位，反对一党专政，武力统一与地方割据；在民主联合政府未成立前，美国应停止训练与装备国军；东北各省区地方政府，应改为联合政府，并尽速筹备地方普选，建立由下而上的地方自治政府。"显然，该党当时能表示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并响应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其政治态度的进步性比较明显。

在司徒美堂组织"中国洪门民治党"之前，上海广帮洪门首领杨文道与华北地区帮会首领张书城、段剑青，上海帮会首领吴纪舜（博士）、陈亦康（商人）等三十余人协议举行"全球洪门恳亲大会"，争取"青洪合流"，同时电请在美国的司徒美堂等人，欢迎他们归国参加恳亲大会。但因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反对"青洪合流"，遂中止此议。

当司徒美堂等人回国召集"洪门恳亲会"，准备成立统一的洪门政党时，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陈果夫、陈立夫派大批特务混入洪门内部。本来军统通过杜月笙控制帮会，自戴笠坠机摔死之后，军统失去了对帮会的控制作用，遂由中统控制了洪门。当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国民党中统头子陈立夫声称，解决中共问题"应当施用外科手术"，他们拼凑御用的"民主党派"，伪装民主。

中国洪门民治党成立前，先于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贵州路湖社举行了"中国洪门恳亲大会"，到会者三百余人，主席团成员为杜月笙、向海潜、赵昱、徐朗西、郑子良、司徒美堂、杨虎、韦作民、杨庆山、张书城、程壮、张子廉、陈其芬、杨文道、杨天孚。但杜月笙与司徒美堂两人称病未参加开幕式，司徒后期到会。

恳亲大会代表名单中有：美国吕超然，加拿大谢志如，檀香山张鹏一，澳洲赵文藻，古巴朱家兆，秘鲁蔡杰则，巴拿马吴克泮，印度

何劲洲，非洲麦璧，香港王志圣、洪少植，澳门陈文川，上海郑子良、张子廉、程壮、石振江、杨啸天、徐逸民、杨文道，以及西北、山东、河北、重庆、南京、华北、河南等地区的代表。来宾中有洪深、姬觉弥、祝平、赵祖康等。大会工作人员有秘书长姜豪、总务组长陈瑞华、登记组长高仁绂、交际组长陈培德、宣传组长葛肇基、警卫组长王铁民。

洪门恳亲会的开会仪式，具有浓厚的帮会气氛。礼堂门前的对联是“义气待兄弟；忠心报国家”。场内正中高悬绿、白、紫、红、黑的洪门五色旗帜，象征仁、义、礼、智、信五德。巨幅横额上书“洪门是我们的家庭，要情同骨肉，亲如兄弟”、“我们要行侠仗义，除暴安良”。

主席团主席程壮致开会词，赵昱报告了洪门的历史，杨于孚报告了美洲洪门的情况。主席团成员郑子良发言中反映出海外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回国后受到冷落的情景。秘书长姜豪报告提案为建立洪门先烈祠一座；筹备光洪中学；上海设立洪门总通信处二处；海外为华山路四七六号致公总堂(五祖祠)；国内为威海卫路二〇七号洪兴协会。临时动议有二，一为用大会名义向蒋介石致敬；二为用娱乐方式筹募洪门福利基金。警卫组长王铁民是“军统”分子，在会上提出“不受分化”案，是针对“中统”的分化洪门而提出的。此次会上“中统”人数居多数，“军统”自戴笠死后在帮会中的势力已是一蹶不振。

这个恳亲大会后来又搬到丽都花园举行，至8月2日闭幕。会前“中统”并没有安排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的议程。会议进行过程中，“中统”布置好力量，再以多数表决的形式决定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虽然表示坚决反对，然因人少势单，无济于事。大会还决定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种机构，主席、副主席、六部、一处、四委员会的人选。主席司徒美堂，副主席赵昱、朱家兆，宣传部长骆介子，组织部长杨天孚，生产部长黄守中，社会运动部长甘纶，训练部长高仁绂，(尚缺一部)。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陶履中，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志如，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家兆，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建中，秘书处处长吕超然(一说是姜豪)。不久机构与人选改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取消主席制，由司徒美堂、赵昱、朱家兆三人担任执行委员。各部人选是秘书长陶履中，组织部长张书城、联络部长吕维九，宣传部长骆介子，财政部长任荣野。工作委员会一律取消。

会议讨论了“堂”与“党”的问题。有人主张“堂”内对政治有兴趣者可组党，堂党应分立，不可混合为一。有人主张“堂”、“党”一家，堂即党，党即堂。两种意见争论相当激烈。关于组党的目的，也是议题之一，有主张组党协助国民党，拥护国民政府者；有倾向中共及民盟，意图推翻国民政府者。当时因意见分歧，讨论无结果。暂且因国内政局不定，讨论意见不作决定。

起初，司徒美堂坚决主张组党，而且认为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司徒美堂等酝酿组建中国洪门民治党，希望参加多党制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另有一部分洪门致公党分子，则加入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改组之为民主社会党”。后来，司徒美堂发现自己为代表的美洲洪门受排挤，于是表示抵制民治党。

在中国洪门民治党成立之前，于1946年8月即拟订了《中国洪门民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该宣言要点如下：

> “本党旷观国际大势之所趋，国内事实环境之需要，认为我国今日所应创建与革命者，从政治而言：必须提早完成地方自治，颁布宪法，以实现民主政治，建立文官制度，规定政务官任职期限，至改善公务员待遇，奖励廉洁，严惩贪污，以增加政治效能。从军事方面言：应实行征兵制，并将现有全国军队整编为国防

军，所有国防军官兵一律宣誓，永不参加任何党派战争及永不干涉国家行政。从外交方面言：必须保持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赞助其他国家独立自主之运动；并拥护联合国机构，及保障与国际和平有关之一切公约，以维持世界永久和平。从经济方面言：在提高国民生活，充实国防需要之计划生产原则下，尽量发展国营事业，保障民营事业。又为免致贫富悬殊激起社会变乱，彻［彻］底举办全国财产总登记，并确定私人土地资产最高限额，使用种种方法，增进农业生产，以发展农村经济，励行保护关税，防止外货倾销，以保障民族工业，在不防害国家主权原则下，利用外资及国外技术人才，以开发富源，侨胞人力资力之用以开发祖国者，尤予以鼓励；并推行各种合作事业，以利生产运销分配而制止中间人剥削垄断，渐渐达到社会财富之均衡。从文化教育言：吾人认为须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以培养国民道德，提高科学之研究，以改进国民生活；实施义务教育，工读教育及各种补习教育，以期教育之普及；提倡举办各项文化事业，奖励文化界人士进修，以求本位文化之发扬；奖励科学发明，及外文译著，并与各国交换大学教授及学生，以期国际文化之沟通。最后，从社会方面言：吾人认为应从速制定国民共同遵守之礼仪，革除社会恶习，养成良好风气；并推行社会保险，实施劳工保护，及举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以达到人心及社会之安定。”

“本党之组织，从其数百年奋斗之历史言，固以洪门志士为其重心，但以‘复兴民族安定国家’之政治主张言，则此伟大使命，艰巨责任，非仅限于洪门人士单独肩负与完成者，因此全国同胞，青年志士，凡对本党宣言政纲及对国是之主张表示同情拥护并愿努力以求实现者，一律欢迎其入党为本党党员。再，本党对于关内各党派亦皆表示至诚友好之态度，盖吾人之政治主张，容未一致，所采取途径，未必尽同；但保障吾人国家之生存及民族之生命之延续，则为共同之目标，殆无疑义。故今后与各党间相互为援，共同努力，以求此最高目标之实现，乃必然之事，亦必然之势，本党对此特郑重而表示之。”

以上从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可看出该党的主要政治主张可归纳为几点：

1. 主张“民主政治，建立文官制度”，“奖励廉洁，严惩贪污”，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有针对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推行军阀政治，吏治腐败的意义；

2.“不参加任何党派战争”，在当时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含意；

3.“必须保持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在当时有针对国民政府对外尤其向美国出卖主权的意义；

4.“确定私人土地及资产最高限额”，“励行保护关税，防止外货倾销，以保民族工业，在不妨害国家主权原则下，利用外资及国外技术人才，以开发富源，侨胞人才资力之用以开发祖国者，尤予以鼓励；并推行各种合作事业……渐达到社会财富之均衡。”这些经济主张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张，和孙中山的经济主张比较一致。

5.“提高科学之研究，以改进国民生活；实施义务教育，工读教育……”。反映出较进步的教育思想。

6.“革除社会恶习，养成良好风气”，“实施劳动保护，及举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从社会改良来说，也属于进步的主张。

综上所述，中国洪门民治党宣言中的政治主张，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些主张是行不通的，但在当时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下，这些关于民

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是具有进步性的。

该党在拟订出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同时拟订了《中国洪门民治党政纲》，分为：总纲、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教、社会七个部分。该政纲基本上是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具体化。

此后，中国洪门民治党逐步受到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干扰，具有进步主张的司徒美堂等人受到排挤，不久即挤掉了来自美洲的洪门人士。

1946年9月1日，民治党正式宣告成立，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了《对时局之五项主张》，内容为：

(一)民主政府要以民意为依归，现在人民公意所要求者为和平统一，因此本党主张国内军事冲突即应停止，在和平统一原则下从速解决一切政治、军事问题。

(二)改组政府，为过渡时期办法，其目的在依各党派协调，解除人民痛苦，本党对此甚表赞同，惟各党务须推选贤能人士，参加中枢组织，切实革新政治，不应垄断名额分配问题，延阻和平实现，加重国家危机。

(三)关于军队整编，应由各党派推选代表组织整编委员会，依照既定整军方案，切实执行，以期达军队国家化之目的。

(四)现有争执区可划分若干“新政治实验区”，由政府选派无武力之政党人士合组“新政实验委员会”，暂行负责治理，一俟宪法颁布，各级民选政府成立，此项临时治理权仍应移交于民选之地方政府。

(五)任何党派均应顾到国家民族利益，尤其保持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本党不同意将任何内争问题交联合国讨论，或要国际间作直接间接之干预。

以上五项政治主张反映出“中国洪门民治党”的活动虽受“中统”阻挠和破坏，但却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反对独裁，主张多党制，是以“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出现的，在军队等问题上暴露出民治党倾向国民党的主张。反映出“中统”虽然企图从中控制民治党，但此时民治党尚未完全受“中统”摆布，仍有自己洪门“中间势力”的一些政治要求。

从该党以上的宣言和政纲中所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尚看不出受“中统”控制的迹象。

此后，“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致海外洪门各团体通电，要求海外各洪门团体戮力同心，统一步骤，实现“民治党”之决策。一时间，美洲各地和菲律宾的洪门报刊都刊载了在上海召开的恳亲大会及“民治党”成立的消息，转载了《对时局之五项主张》和领导机构人选名单，大部分拍来贺电，有的洪门侨报还特为发表社论。绝大部分的海外致公堂或致公党都改称“民治党”。

国民党“中统”乘洪门恳亲大会之机，混入洪门，又通过参加“民治党”实现了涉足美洲致公堂的阴谋。

国民党当局对于中国洪门民治党的活动相当注意，采取了拉拢一部分人从中分化的手法。

从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5月至10月间所搜集的有关中国洪门民治党组织活动状况如下：

其一，赵昱在南洋的活动：

中国洪门民治党内部分为二派，一派以司徒美堂为首，其力量在美洲；另一派以赵昱为首，其力量在南洋一带。国民党当局为了防止中国洪门民治党成为不利于国民党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政治力量，从中拉拢收买赵昱为首的一派，排挤打击司徒美堂为首的一派。赵昱别字寿彭，曾任致公党总理。自司徒与赵合作改致公党为民治党后，不设主席，“由九位常务委员执行党务常委。其中隶于

司徒美堂派者有：朱家兆（古巴代表）、杨天孚（又名健夫，美国代表兼组织部长，燕京大学毕业）；朱今石（加拿大代表）。属于赵昱派者有：张书城（浙江衢县人该党秘书长）、任荣野（河南人）、高仁绂（陆军中将山东人）。赵昱授命张书城收买杨天孚、朱今石等，以谋孤立司徒美堂，朱家兆旋即同情赵派”，司徒美堂受排挤。

赵昱赴香港联络各堂洪门负责人。赵昱访国民党驻港机关及港府各机关。李济深、蔡廷锴、黄精一等曾作赵的工作，希望赵与他们一同走爱国、民主道路，但为赵拒绝。赵在香港积极筹组港澳总支部，准备向香港当局正式呈请备案。该总支部全体委员均已内定，其中有刘宝钧、黄适缘二人被国民党当局称为“奸伪分子”。“该党港澳方面约有党员十万。”

在赵昱筹划下，中国洪门民治党港澳总支部正式成立。由熊少豪任主委，黄沧海任副主委，刘锦灿任主任秘书，陈伟涛任总务科长，叶碧珊任组织科长，另于港澳各区分设支部。总支部设于香港于诺道中一三四号，公开挂牌。赵昱一度赴澳门活动，被澳门当局以扰乱治安罪驱逐出境。

赵昱于 1947 年 6 月中旬乘美琪将军号邮船赴菲律宾，寓于马尼拉苑伦街侨商杜泽生处。赵到菲律宾活动的目的主要是筹募大批经费。洪门在菲律宾的组织有：中国洪门青年团、青年尚武国术社、洪光学校、侨商公报、抗日锄奸义勇军同志总会、秉公社、竹林协议团、协和社等。均与该党采取联络。赵昱预定在菲岛作一个月之逗留，于捐款集有成数后，再行转往

南洋各埠活动。

其二，洪门民治党内部分化：

中国洪门民治党成立前，内部即有意见分歧，有主张党（原名致公党）堂（致公堂）合一者，有主张党堂并立者。“迨该党成立后，即有洪门人士张子廉、王知本、郑和本等另组‘洪兴协会’，许君武、林有民等另组‘洪门民治建国会’，声明民治党不足以代表全体洪门，陈其尤等在香港仍称致公党，表示不合作。该党虽承认司徒美堂为领袖，但又表示中央宜采理事制，由常务理事共同负责，且不承认司徒美堂为主席。”

该党存在着多方面的纠纷。

港澳总支部发生纠纷：赵昱前次赴香港时，曾委任执监委员六十一人，此后该党中央按照编制重新委任执监委三十四人，候补十六人，遂引起施伦佐及熊少豪二派之正面分裂。该部举行新执监委员就职时，施等拒不参加，认为现在新任之委任状系由该党中央驻会委员高天绂一人所署委，而司徒美堂及赵昱均未签署，真相不明。现施等拟进行另组“整理委员会”，并电催司徒美堂、赵昱等来港。港澳总支部业已就职之执监委员计有：熊少豪（主委）、黄沧海（副主委）、叶碧珊、陈直中、刘宝钧（有政见分歧者）、黄晓山、宋约云、曾玉波、彭天雄、林维德、钟懋将、陈绮云、赵善灿。纠纷原因：(1)赵昱前委任之执监委员及各部主任被该党中央推翻重新委任，遂引起大部分党员反对。(2)该党执监委员分为三派，即朱家兆派，司徒美堂派，赵昱派。三派中赵派约二十余人，占最多数。赵派与司徒派曾一度合作抵抗朱派。(3)主委熊少豪在洪门资历短浅，且把持党务，也是引起内部纠纷的原因之一。

港澳总支部中的反对派在施伦佐领导下，已组成执监委员整理委员会，并在大中华酒店五楼七号房设办事处，提出排除跨党分子及出卖该党者的口号，声称必要时将另行组织新民治党。该党整理委员会推定刘锦东、施伦佐、梁创仲、区标、赵礼东、刘锦灿、梁国权、林飞熊、张海若、陈传涛等为常委，杨大枢、杨馥、黄启林、谢佐基等为委员，并推定施伦佐、赵礼东为该会对外发言人。

洪门民治党港澳总支部的主干人物是熊少豪（主任委员）和黄沧海，他们的支持者是

美洲方面的朱家兆。由赵昱支持的反对派施伦佐，虽曾登报公开否认熊少豪领导下的港澳总支部，可是反对派在香港的洪门弟兄群中，缺乏号召力，结果无法阻止熊少豪的活动。

熊少豪，本来是青帮人物，在香港置有产业，手头相当阔绰；黄沧海，在香港洪门弟兄群中亦颇有钱财。因此，他们的活动较有经济力量，同时他们还得到朱家兆领导下的美洲洪门在财力等方面的支持。

熊少豪这一派，在香港洪门中不能完全取得控制地位，党员不过六七百人，洪门弟兄们只知道凭藉帮会组织找生活，不关心组织党派或参加什么政党的活动；更因港澳帮会中人都离不开警界的庇护他们怕参加政党活动引起政府当局的注意。该部支部联络各方，委员中也有民盟人士以及其他党派分子。

香港政府对于洪门民治党港澳总支部的组织，虽然不曾阻挠，但予以严密监视，尤其对于作为民治党党员的洪门分子监视更为严密。洪门帮会中人，不管是否民治党党员，只要参加帮会的械斗或有其他违法行为，警方断不放松。该总支部第一区党部（设于湾仔轩尼诗道四八八七号三楼），自成立后，因所属党员“连胜”。（黑社会堂口）分子与“冬”字头分子争地盘利益，酝酿斗殴，为警察当局到该部搜查，捕去十九人。查该部负责人张若海，现参加施伦佐之反对派，该部已无形中与熊少豪主持之港澳总支部脱节。洪门民治党的美洲等地的首领人物尚不知港澳总支部发生内讧，美洲洪门捐汇的二千元美金，为熊少豪截收。熊少豪接到美洲洪门代表会来电称：将拨十万元美金在港办报，另拨五十万美金建筑大厦，作招待华侨及洪门分子之用。熊少豪回电致谢，并拟筹办《民治月报》为宣传喉舌，已派冯啸天、李子诵等负责筹办，将来该报亦由冯、李二人主持。

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央常务委员兼粤港菲特派员赵昱，在港登报启事谓：该党中执会秘书处推翻其本人所委之港澳总支部职员，而另行委派，此举未经常会通过，其委任状亦未经驻会委员三人之签署，为不合法，当属无效。又革除施伦佐党籍事，并未经中常会之通过，亦未经驻会委员三人之签署，亦属无效（该会驻会委员为赵昱、司徒美堂、朱家兆、黄守中、高仁绂五人，凡有关文件经驻会委员三人签署始为有效）。惟熊少豪派主持之港澳总支部，为使社会人士注意，造成既成事实，以对抗改组计，于10月12日，在香港大同酒家举行正式成立大会，事前发出请柬甚多，到会者有蔡廷锴、何香凝、余兆麒、潘公弼、徐季良、卫文纬、沈慧英、陈公哲、马叙朝、王志圣、黄翠薇（港府政治部主任）、张沛松（民社党港澳总支部代表）及该党中委钟仲芍及党员约二百人，礼堂中分挂国旗及该党五色党旗，中悬“义气团结”、“忠诚救国”、“义侠除奸”三大信条，由熊少豪主席阐述该党工作及主张，并强调今后愿与各友党合作，为民主政治而努力。后由副主委黄沧海致谢词，并分发开幕特刊。是日并未请来宾演讲。反对派施伦佐对熊少豪所领导的港澳总支部认为非法，表示反对到底。

其三，司徒美堂退出中国洪门民治党：

国民党控制下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开幕前，司徒美堂曾对“国大”抱有幻想，代表洪门民治党要求国民政府给国大代表一百席，遭拒绝，司徒美堂遂对“国大”表示消极。洪门民治党的另一领袖赵昱，排挤司徒美堂扩展个人势力，曾代表该党参加“中间党派联盟”，司徒美堂表示反对。随后，司徒美堂正式宣布脱党。于9月6日在上海大西洋莱社公开招待记者，发表脱党声明如下：

“去岁自美返国后，鉴于国内时局动乱，乃有集合海外洪门同志组党，以发扬洪门传统精神，而协助政府安定人心之志。惟民治党成立一年来，徒见多数党内分子致力于党派之纷争，而未能从事于国家生产建设事业之努力，舍本逐末，

实违初衷。个人意见既不同于众，脱党亦不致影响党之前途，近复经华北华南及海外洪门同志李梅林、魏大可、王慕祈、张逊之、陈铁吾、张辅邦、王志圣等二百余人通电赞成，乃毅然宣布脱党。今后将竭力教育，以实现不争之为争的建设本志。”

司徒美堂退出中国洪门民治党后，该党由赵昱继续领导，又经过改组，活动中心移往华南及海外。

当司徒美堂宣布退出该党时，该党重要分子谭护等五十余人通电挽留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退出中国洪门民治党后，该党内部并没有平静，而是在国民党“中统”挑拨下继续发生纠纷。

国民党“中统”竭力插手该党在海外的活动。该党本来想在国内参政，力图在国民党政权下争取到一定的席位，结果其政治目的基本落空。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了蒋介石是反对帮会以独立的政治态度在国内组党的。

两个哥老会政党

哥老会属于洪帮的支派，在抗战胜利后组建政党，力图在中国推行多党制政治的风潮中，哥老会也在某些地区组建起政党，其中有中华社会建设党、民主社会协进会等。这两个哥老会政党的概况和章程如下：

中华社会建设党。

该党系四川哥老会首领冷开泰、邓叔才所组织，总部设于成都。并设有“汉华社”、“生活互助社”等外围组织。该党自称以“阐扬民生主义”为宗旨。在其党纲中声称：“本互助之精神，以求共同解决人生经济问题。最终目的在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并订立《党章》及《行动纲领》。其发展组织，曾以“汉华企业公司”名义，在川西各地大量吸收成员。党员以一次缴纳党费多少而分为甲、乙、丙、丁、戊五个等级。党费最高五万元，最低一万元。该党利用哥老会扩展党务，欢迎四川各县及西康哥老会人员参加；并联络社会人士，以充实力量。当时，该党还以“大同学术研究社”名义，发行《大同日报》、《大同画刊》；并组织大同出版社，以扩大宣传。该党党章如下：

中华社会建设党党章

甲、权力机关：

（一）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闭幕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其职权。

（二）全省党员代表大会，闭幕时省执行委员会代行职权。

（三）全县市党员代表大会，闭幕时由县市执行委员会代行职权。

（四）小组党员大会闭幕时，由小组执行委员会书记代行其职权。

（五）全区党员代表大会，闭幕时由区执行委员会代行其职权。

（六）各级组织中，并设立监察委员会，分别执行监察任务。

乙、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委员十一人至二十四人，中央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七人至十九人，均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之。

丙、省执行委员会设委员七人至十七人，省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五人至七人，均由县（市）代表大会选出之。

丁、区执行委员会设委员三人至五人，区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三人，均由区党员代表大会选出之。

戊、小组设执行委员一人。

已、各级监察委员之任期与执行委员同。

庚、其选法及各级党部委员之任期另有规定。

上述中华社会建设党党章属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化类型的政党的章程。它反映出哥老会在组织制度上的进步。

中华社会建设党也制订了行动纲领，共

分六大部分。对该党纲领进行如下介绍与分析：

中华社会建设党行动纲领

甲、争取民族自主，一切内政外交均应争取自主，接受国际援助，应不妨害民族自我之最高利益。

乙、开放国家政权，次第实施普选，并广延有名望之在野社会人士，及各专家，共襄政事，以求达到真正民主政治之途径。

以上这两条内容，一是争取民族独立自主，一是争取真正的民主政治。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属旧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相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有其落后性，但是，由哥老会建立的这种小党派，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对于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丙、力主经济平等：如地权平均，劳资利益平均，公教人员待遇等事，以求社会主义实利之发扬。

丁、彻底改革教育：(1)义务教育之扩大与发展；(2)强迫教育之实施；(3)扫除全部文盲。

戊、扩大物资建设：在交通工矿农业垦殖国际贸易等部门之分头扩大发展，其节目如后：(1)建设铁路（五十万公里计划规定）；(2)建设公路（各省县乡镇构成公路网）；(3)建设各种纤维工业工厂（棉花丝织之类）；(4)建设重工业工厂；(5)建设各种原力工业工厂；(6)建设各都市公民住宅；(7)建设各都市县公用事业。

己、加紧救济工作：(1)救济婴儿；(2)救济鳏寡孤独；(3)救济老弱残废；(4)救济天灾人祸之难民；(5)救济失业；(6)救济贫苦病人。

以上纲领中的四条，关于力主经济平等、彻底改革教育、扩大物资建设、加紧救济工作，发展轻重工业的主张相当突出。在经济落后，广大人民贫苦的中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旧时代的哥老会主要方面是在社会秩序、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起破坏作用，有些地区的哥老会的活动类似土匪，但是，从《中华社会建设党党章》和《中华社会建设党行动纲领》中所看到的，哥老会迎合时代潮流，随着时代的进步，自身进步了。从组织上，完全放弃了“三十六步半”的封建等级制的形态，改变龙头大哥专制的封建家长制为党员各级代表大会制，并设各级监察委员。从政治上争取民族独立与政治民主。从经济上主张多方面开展现代化建设，并重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等。虽然这一哥老会组建的政党的纲领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它却反映出哥老会中的一种现代化的进步趋向。

民主社会协进会。

该组织也是哥老会的党派之一，为成都哥老会首领方茂山、马昆山、李侯亭等所组织，以彭焕章的公馆为办公地点，并于太平街浓化茶社内办理入会登记手续。该会宣称以民主立场，根据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从事社会改进工作，期于迅速达成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之目的。该会曾印发缘起及章程分发宣传。该会在仁寿等县均有活动。

该会章程如下：

民主社会协进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名称：本会定名为民主社会协进会。

第二条：宗旨：本会以民主立场，根据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从事实际努力，推动社会改进工作，期于迅速达成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之目的。

第三条:会址:本会总会暂设成都,得由决议改适当地点。

第四条:关于民族方面者:

(一)依据民族主义,发扬社会团体固有之优点,及适合现在需要之民族文化。

(二)灌输各国民主制度下养成之公民道德。

(三)矫正旧有习惯之劣点,改革环境熏染之恶习。

(四)注重生活指导及互助。

(五)以社会力量扶助陷于穷困之特殊天才。

(六)推行民族保健运动,发扬拳术及有关卫生之及其他国技。

(七)以社会表示鼓励急公好义之行为及乐于社会服务之精神。

(八)注重社会交际,化除社会隔阂。

(九)协助妇女运动青年运动之正当发展,及儿童保育工作。

(十)加强社会联系及民族联系。

(十一)实现民族平等广大原则。

(十二)进行其他有益民族之工作。

第五条:关于民权方面者:

(一)培养运用四权之基本问题能力,及优良方式,灌输民治精神。

(二)以社会力量依法保障会员之基本自由,使获得正当之运用。

(三)提倡社会正义使其普及。

(四)造成选贤与能之风尚。

(五)发扬社会公意,表现社会制裁之公正效用。

(六)推行各项自治工作,树立法治规模。

(七)奖励民众参加政治工作,促进民众对于社会之责任。

(八)补助及监视公务人员之行动,俾能展其所长去其所短。

(九)造成健全舆论。

(十)介绍并普及民治基本知识及有关学说。

(十一)化除党同伐异气习提倡合作精神。

(十二)拥护和平统一国策,努力民主建设基本工作。

第六条:关于民生方面者:

(一)促进资劳合作,尊重劳工利益。

(二)扶助生产事业,并指引群众参加其规模生产事业。

(三)谋求农工商之和谐,发展增进其互助互利精神。

(四)推广各种合作运动,及合作事业俾有时效。

(五)扶助出口事业,增加其便利,俾能获有利之机。

(六)促进地方性之物质建设。

(七)保持旧有社会信用之效能,增加金融活动。

(八)促进交通运输之便利及安全。

(九)以社会互助工作,保障平民职业之发展,并增进工作效能。

(十)促成劳工保险制度之有效施行。

(十一)联络各种职业团体,保障各种职业之合法利益。

(十二)以社会力量,推广地方公共事业。

(十三)推广合理生活,促进经济繁荣。

(十四)辅助平民改进生产技能,增加时代应具之经济常识及民生要义。

(十五)培养企业所需之功能。

(十六)促经济民生之基本条件。

(十七)进行其他有关民生之工作。

第七条:关于社会方面者:

(一)提倡社会福利事业。

(二)增高社会文化水准。

(三)辅(助)社会救济工作。

(四)促进平民教育,及成人补习学校。

(五)普及社会正当娱乐。

(六)参加地方公益机构及工作。

(七)注重仲裁工作,减少民间纠纷。

(八)提倡自卫精神,保障地方安宁秩序。

(九)注重童、女工之工作情形,助其改善待遇及生活。

(十)助济异乡遭遇困苦患难之人士。

(十一)以适当方法,表扬社会善举及其他美德,增进社会友谊及良好风尚。

(十二)举办社会调查,建议社会改良改革事项。

(十三)于可能范围内,推进社会运动,研究社会问题。

(十四)交换社会信托工作。

(十五)进行其他有关社会工作事项。

(注:原件缺第八至第十四条及第二、三章)。

第四章　组织

第十五条:本会组织基础分为地域单位、职业单位、事业单位及工作单位四种。

第十六条:本会组织系统,以组为基本,组以下设若干分组,五组以上得成立支会。各支会构成分会,分会隶属于总会,不能成立支会之组,直属分会或总会;未便构成分会之支会直属于总会。

第十七条:本会各级组织以理监事为主脑,主席临时推定。总会设理事七十五人,互推常务理事二十三人,监事三十九人,互推常务监事十一人。分会设理事二十一人,互推常务理事九人,监事十三人,互推常务监事五人。支会设理事十五人,互推常务理事五人,监事七人,互推党务监事三人。理事会设总书记一人,干事长三人,书记干事若干人。各组设组长一人,干事若干人。支会以上得设名誉理事及顾问会。

第十八条:本会各级组织另订立。

以上《民主社会协进会章程》的总则和组织两大部分共十八条。其总则部分,分为民族、民权、民生、社会四方面。正如其宗旨中所说的,是“以民主立场,根据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以期迅速达成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之目的。”实质上是要在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原则下,进行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良,并未超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

“民主社会协进会”这一哥老会组建的党派团体,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为宗旨,虽然是行不通的,但是,前面所述的哥老会的“中华社会建设党”相类似,都反映出哥老会随着时代进步,自身有进步。它所提出的“实现民族平等广大原则”、“培养运用四权之基本问题能力及优良方式,灌输民治精神”、“拥护和平统一国策,努力民主建设基本工作”、“促进资劳合作,尊重劳工利益”、“提倡社会福利事业”等项,都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政治、经济中的实际问题,但将这些主张与旧时代哥老会的“三十六誓”中所反映的封建专制政治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民间下层秘密结社的政治、经济主张相对照,就明显地看到哥老会的政治主张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已经不再局限于游民、小生产者的结盟互助的观念,而是跨入了现代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意识。

“民主社会协进会”在组织上是分为以地域、职业、事业及工作四种单位。组织系统是在总会下设分会、下设支会、下设小组。各级

组织均“以理监事为主脑,主席临时推定。”这种组织模式,基本上采纳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哥老会所组建的党派团体的组织结构,完全放弃了旧时代的“三十六步半”的封建等级制,说明哥老会意识到必须以自身的变化适应时代的进化。

其实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任何一种社会团体、政党等组织,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后,必须相应地进行自身的改造、变化,否则必然要被历史淘汰。

中国民主合众党和铁血党

中国民主合众党。

中国民主合众党的前身为“中国宏济社”,首领为在香港行医的“李大夫”。该党为一部分洪门人士相结合的组织,以有饭大家吃及扶弱济贫为号召。其经费来源,依靠标会抽息,以十人为一会,每月各出百元,以利率最高者得标,抽利息百分之七十五作为党费,已在港吸收党员一百五六十人。该党的政纲及组织条文如下:

中国民主合众党政纲及组织

甲、党的政见。

一、目前拥护中国国民政府,推行宪政。

二、维护世界和平,郑重邦交,加强各民族之联系。

三、谋求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人民真正的自由,及世界各民族真正的平等。

四、实行人民社会化,国家民主化,民族大同化,打破疆域界限、种族界限。

五、反对流血主义,反对专权主义,反对同室操戈,反对军队私有。

六、绝对谋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五十者衣帛食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黎民不饥不寒。

七、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八、实行工厂、矿产、铁路交通等一切公有。

九、反对经济财政官僚化。

十、提高人民智识,扫除文盲,广设小中大等〔学〕义教,推行科学教育。

十一、发展机器事业。

十二、以最短期间,建设新中国为真正的文明国,农工商学一切机器化,一切科学化。

十三、提倡人民的德治精神,提高人民的人权地位。

十四、技术人才学识分子,道德耆老,实行国家给养,并予资助。

十五、保障合义的私人资产,接受资本主义,调济人民及国家的一切需要。

十六、反对操纵居奇行为。

乙、党的组织

一、本党系中国应运而生之政党,即现时中国之进步的党。

二、本党的建国大纲及组织纲要,须待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厘定。

三、本党的代表大会以伦敦、纽约、上海为适当的地址,当临时决议通知之。

四、入党手续,必须本党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再由本党小组会议通过转经本党最高委员会审查而厘定,发给入党证明书。

上列中国民主合众党政纲及组织规定条文中反映出以下几点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有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1. 追求资产阶级政治民主,主张“国家民主化,民族大同化”,反对一切战争,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同室操戈,反对军队私有。”这些针对蒋介石当时的内战、独裁政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该党又以一种“中间势力”的姿态出现,企图走“中间路线”。

2. 提出“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

行工厂、矿产、铁路交通等一切公有”，“反对经济财政官僚化”。这些问题在当时是针对中国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的，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3. 主张“提高人民智识，扫除文盲”，广设义务教育，“推行科学教育”，“发展机器事业”。这些主张在落后的旧中国，皆有一定进步意义。

4.“以最短期间，建设新中国为真正的文明国，农工商学一切机器化，一切科学化。”这些愿望是好的，但不可能在“最短期间”实现，也不可能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实现。

5. 主张以“接受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事与愿违。

该党的组织章程要等待该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才能制定。

该党虽然是洪门人士的集合体，但其政治思想的认识水平，远超出了旧时代的洪门。

铁血党。

铁血党，为苏北帮会分子所组织，首先出现于高邮，自称组党目的：为改善人类生活。该党以“改善人类全体生活促进会”名义，对外活动。

铁血党以改善人类全体生活促进会名义发表了征求会员启事，全文如下：

挚爱的朋友们：我们都是时代的健儿，可是，惭愧得很，应该知道的我们无从知道，不应知道的却时时刻刻在[刺]激我们的思想。同样，应该做的事我们无法着手做，不应做的事偏偏有人要强迫我们做。是的，我们不能否认自己有缺点，有过失，但在事实上，很多不是补救缺点或纠正过失的事，相反的是促使我们缺点更大过失更深的作为。难道这类的情感我们也要接受吗？难道我们还不自觉地与那般自命中理的人去犯同样的错误吗？我们希望政府党团先进及社会贤达，本着正义的态度来超拔，来栽培。结果，什么人也不可靠。甚至有犯上述同样错误的危险。我们处在这样极端复杂而矛盾的生活状态(环境)之下，难道我们就此自甘废弃度时光吗？我们有我们的热情，我们爱国家，爱民族，爱世界全人类，爱宇宙间顺应自然而滋生的事物。我们愿意和他(它)们发生共同进化的密切关系，培养伟大的创造力，孕育万世不朽的新生命。因此，我们要根本消灭倚赖心，我们要从此自觉自助自动自强自立自治。于是，早想与正在苦闷中的青年朋友密切联络，相互策勉，可惜时机不许，直到而今才决定了一个“铁血党改善人类全体生活促进会”这样的目标，并订于五月五日在江苏高邮北门外民族路五三号正式成立办事处，专司会员登记、通讯、组织、宣传事宜。希望英勇有为的好学青年热烈参加(入会志愿者及会员登记表函索即寄)，负起我们做人的责任。除分寄党政机关其有根据监督指导外，特此通告周知。并祝

前程远大！

从以上该党的这篇启事来看，其宗旨不明确，该党的有关资料，仅有这样一个启事，未制订出党章和党纲。这篇征求会员启事中所反映出来的该党的政治认识水平不高，未能摆脱帮会团体的民间下层社会结社的低层次的特点。

该党声称要“改善人类全体生活”，口气不小，而如何改善？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有什么计划？这些都不明确。作为一篇征求会员启事，未能申明自己的宗旨也未能申明自己的组织状况及组织原则。这篇启事中的语无伦次，言不成章及逻辑混乱，概念含糊的特点，近似痴人说梦，无法与上述几个洪门哥老会所组成的政党的党章党纲相比。这一事实说明了洪门以及有关帮会的思想文化水平发展不平衡，这是中国社会史中的实际状况。

中间党派联盟

中间党派联盟的概况。

中间党派联盟是由三个党联盟组成的，这三个党中的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国民生共进党都是洪门政党，而另一个中国国民自由党，虽然不是洪门组建的政党但其中也有部分洪门人士。

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国民生共进党、中国国民自由党为联合发起组织“中间党联盟”，于1947年6月21日下午2时在上海西藏路大新公司五层楼酒家，招待各报记者。由民治党杨大孚、民生共进党樊崧甫、国民自由党林东海等，分别报告此次发起组织“中间党联盟”之经过及其主旨；并宣布联盟的共同纲领，最后并表示尚有其他政党，也准备参加该联盟，采取一致行动。

民治党总部设于上海市华山路四七六号。民生共进党总部设于上海市虹口峨眉路一一四弄五号(办公处)。这两个党的创始人分别为司徒美堂和樊崧甫，本书前面已介绍过，在此不重述。而联盟者之一的中国国民自由党，“原名中国自由党，1938年元旦成立于长沙，1946年元旦，在重庆改组。”该党创始人林东海，早年在加拿大留学时即追随孙中山致力于革命工作，回国后从事教育、外交等工作二十余年。抗日战争时期主张“唤起民众”开展全面抗日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和官僚政治，主张“铲除一切特权，使每个人在民主的法律之前真正平等。”主张在国际上中国要有独立自主地位，在国内“政治与经济的民主”。抗战期间，该党西南支部藉帮会力量发展组织，这与抗战胜利后与洪门政党联盟不无历史渊源关系。

中间党派联盟，顾名思义，是以“中间势力”的姿态出现的，自称在抗战胜利后党争剧烈的现实政局中，“系依民意为准绳，不偏不倚”，“遵循政党政治的常轨”联合的中间党，“共同促进政党政治的实现。政党政治是各以政纲政策，争取人民的信仰与拥护，而参与政权是受人民的付托，而为人民服务。政党无所争，所争惟国家人民的利益”云。

该联盟成立后，为扩展阵容，决定继续欢迎国内各党派参加，樊崧甫、高仁绂、张书城、任荣野、杨健夫等分别与具有洪门会党历史渊源的光复会、中和党、国民自强社、忠义党以及中国宗教徒和平建国大同盟接洽，林东海负责在南京向政府各方接洽。该盟规定各党参加联盟后，仍有独立性，互相合作，以壮声势。盟内所需经费，由参加之各党平均负担，每月二十万元，不受任何方面之津贴。向外宣传该盟可以负起第三方面之任务，调处国共之争端，向政府表示，愿于政府改组时予该盟各党参加之机会。该盟在南京召集会议，参加联盟的各党首领人物均出席。决议：(1)创办周报，加强宣传；(2)规定每月最后之星期日举行联席会议一次，各党可派代表六至七人参加；(3)准备继承民主同盟之任务，负起第三方面之责任，继续从事和平运动。该盟集合各小党组合而成，以“中间”为号召，表面上宣称以第三方面从事和平运动，同时又要求参加政府，实际上是争取参政机会。

《中间党联盟宣言》要点如下：

宣称：“我们的目的，即在联合这样的中间党，共同促进政党政治的实现。”认为国家“要有秩序，有进步，就应该统一、民主，尤其应该立刻实现和平。”

该党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顺从民意，放弃战争；拿出诚心，解决问题，大家共纳政治活动于政党政治的常轨。不满意现状，尽可用政治方式解决一切，改善一切；绝不可以战争方式，摧毁国家仅余的元气，断绝人民一息的生机。国家祸福，政治功罪，都系此一念。”

该盟制定了共同纲领，其中要点为：为求国家秩序“必须实现和平统一。”为求政治进步，“必须实现多党的政党政治。”在安定民生方面“必须采取切中时弊的有效措施，并确立适合国情的经济制度。”在国际方面“必须建

立平等，互惠，友好的国际关系”。

该盟提出了对时局的主张，共分四部分，要点如下：

(1)“主张国共双方，为顾全国人民的利益，应在和平统一之原则下，立即无条件停战。”

(2)“主张政府为昭天下人以共信，应有还政于民的信心，彻底开放政权。……建立一个综合多方面人民意见利益的多党政治。”

(3)为反对官吏贪污、官僚资本作祟，“主张立刻举办现任官吏及曾任官吏的财产总登记，并严订实施办法。”

(4)“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国际干涉。”

上述该盟对时局的主张中，有关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反对官吏贪污、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等方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中间党联盟”所主张的走国共两党间的“中间路线”，是根本行不通的。“中间党联盟”的大多数成员，作为“中间势力”或称“中间力量”或称“中间派”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中，共产党应当争取、团结的力量，而对其所采取的“中间路线”则采取批评态度。也就是说，“中间力量”与“中间路线”是两个概念，共产党的政策是争取中间力量，批评、否定“中间路线”。对于洪门成员为主的“中间党联盟”，中国共产党同样是争取、团结这支“中间力量”，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而对于“中间党联盟”的“不偏不倚”的“中间”政治路线，是否定的。

流氓特务的末日活动

恶贯杭城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地区的青帮势力大发展，青帮与日伪勾结，形成危害地方的黑社会势力。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青帮头子有的被杀，被关，有的逃亡远匿。当青帮势力消沉之后，洪帮势力乘虚而入。1946年，洪门五圣山首领张子廉、向海潜都主张在杭州建立“码头”。为此，向海潜对当时浙江国民党党、政、军，金融界一些头面人物，竭尽拉拢联络之能事，彼此间投帖拜客，设宴招待。向海潜还在下城七宝寺内大摆香堂，亲自主持收了一批弟兄。杭州八大丛林的方丈和尚，如净慈寺的钦亮、灵隐寺的弘妙、昭庆寺的弘法、六和塔的妙乘等，都收入洪门五圣山。当夜七宝寺外，车水马龙，途为之塞，警察局专门派警察来警卫。

杭州的洪门“码头”建立后，张子廉请了一位军统特务陈庆尚(字炳如)充任“码头官”，向海潜不同意。后来趁陈庆尚进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之机，向海潜改派了曾广澍为“码头官”，又称“掌旗大哥”，并加派郑国琛、蒋诚(即蒋成言)、汪日昌、许友夏、康健、杨必勇等协助曾广澍办理“粮台”事务。这些人有的是特务，有的是国民党军官。

曾广澍，湖南湘西人，在国民党军队中曾充任八十三军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在杭州经商，与许友夏合伙开设西子汽车公司。1946年加入洪门，当时出了一大笔香金，奉敬给向海潜。向起初封曾广澍为心腹大爷，杭州建码头时，即派他为杭州码头官，同时提升为内八堂的执堂大爷。

陈庆尚，浙江永康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参加蓝衣社，是个职业特务，曾任军统局江西站站长。在杭州加入洪门，后为五圣山内八堂的执堂大爷。

郑国琛，浙江瑞安县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后伙同曾扩情、刘诛尧、邓文仪、贺衷寒、康泽等组织蓝衣社。1943年在重庆加入洪门。被向海潜封为智松堂内八堂的“陪堂大爷”。1947年任杭州市在乡军官会总干事，利用职权，将大批地痞流氓甚至汉奸，冒充退役军人，吸收入会。五圣山在杭州建立“码头”后，他就以这批人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杭州洪门分子复杂而作恶多端，这便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蒋诚(字成言)，浙江东阳县人，曾入黄埔

军校第三期，中途离校，后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曾任浙江省常备团团长、浙江省交通管理处视察、浙江省政府浙东行署科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弃政经商。1947 年在上海加入洪门，被封为内八堂的礼堂大爷。

汪日昌，湖北人，与向海潜是同乡。汪伪时期在浙西游击部队充团、旅长，在太湖一带当土匪。1947 年入洪门，其步位是内八堂的刑堂大爷。

许友夏，湖南人，在国民党部队中的最后职务是八十三军军需处长。1947 年加入洪门，在洪门的步位是内八堂的刑堂大爷。

杨必勇，湖南芷江人，职业特务。曾任军统金兰特别站站长。抗战胜利后，从十二军官总队转业，任杭州市政府视察，兼任保密局浙江站直属通讯员。1947 年，由曾广澍介绍入洪门，其步位是心腹。

康健，湖南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历任团长、副官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从十二军官总队转业，任浙江省政府视察。1946 年入洪门，其步位是心腹。

以上可以看出，洪门五圣山在杭州“码头”主要成员是些国民党军官、军统特务、土匪，他们所组成的“码头”，只能是一个恶势力集团。

杭州码头建立后，组织上大力扩张，一年内即达六千余人。先以杭州为中心，进一步扩张至郊外塘栖及嘉兴，均设有大小“码头”。

1947 年 5 月，洪门在杭州成立杭州市协社。该社成立时，特在西湖饭店大厅举行典礼和庆祝大会。张子廉、樊崧甫等都到场祝贺。参加大会的来宾有国民党党、政、军界头子，“如杭州市市长周象贤，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王云沛，杭州市警察局局长沈溥，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强，《东南日报》副社长刘湘女，退役军人陶广，国大代表吴孝姑（十二军官总队总队长周建陶之妻），社会名流马文车、吕公望，金融界金润泉、张范园（中央银行杭州分行经理张忍甫之子）等等。西湖饭店上上下下都挤得水泄不通，大门外也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军警机关也出动一批人来维持秩序。洪门五圣山在杭州对外的招牌，就这样挂起来了。”

洪门在浙江省，除杭州以外，各县也稍有活动，主要有建德、缙云、昌化等地。这些地方的活动，多与国民党军、政界有联系。

1947 年，国民党杭州市长周象贤曾利用樊崧甫洪门首领兼军界上层人物的身份，推举其任浙江在乡军官会评议会主任，以约束浙江省的退役军人。

樊崧甫每次到杭州，都要开香堂收弟兄，先后七次收弟兄千余人。第十二军官总队队长柏天民也加入了洪门。

当时加入洪门者，各有不同的目的。如杭州市警察局局长沈溥，是北平警高派的首脑，想借洪门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想利用洪门搞情报，以配合其特务活动，于是加入了洪门。杭州的国民党宪兵十三团团长黄公霸也想借洪门势力拉拢上层，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当时杭州“五毒”（即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军官总队、青年军、新闻记者）中的一些人，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势力，纷纷加入洪门。也有金融界、工商界的人物，想借重洪门势力搞投机生意，而加入洪门。一般老百姓中，也有为借重洪门的“保护”作用，而加入洪门者。所以杭州码头建立后，“拼凑了六、七千人，对外号称万人”。

杭州解放前夕，洪门五圣山杭州“码头”的一批军统特务、流氓地痞、太湖土匪、国民党退役军官，曾扮演了一幕冒牌革命武装的丑剧。他们冒充地下革命武装，贴出迎接解放军的布告和“安民告示”。还向杭州市商会勒索派款。他们自封为“司令”、“队长”，准备大搞劫收。当解放军到达杭州后，查明了他们的真面目，对他们作了应有的处置。

南宁复办“大洪门”

大洪山原是光绪中叶湖北襄阳人李肖白

创建的，属于哥老会系统的山堂。原宗旨为“推翻清朝”。在两湖地区有相当发展。武昌起义前，湖北的新军有不少人参加大洪山。大洪山的堂名为抱冰堂，直到40年代，武昌蛇山上仍遗留着一座抱冰堂房屋建筑。老龙头李肖白于抗战前八十岁高龄寿终正寝，临终前并没有指定大洪山的继承人。李肖白逝世后，大洪山的活动中断了多年。

参加过大洪山的熊社曦于1947年初筹备复办大洪山，请军统局越桂边区站站长何崇校任副龙头。在此之前，军统为了控制帮会，已在上海组织了“新社会建设事业协会”筹办处，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竞选，这一组织后来在各地设立分会，意图在于控制和利用帮会进行特务活动。于是军统局批准了何崇校在大洪山的任职。洪门“大洪山”于1947年4月2日经熊社曦、何崇校等人的活动，复办于广西南宁。传说大洪山老山主李肖白有一掌门宝剑，继承人应以此剑为凭证。熊、何密谋设法弄到了这把“镇山宝剑”，宣称受命于李老山主，“复兴大洪山”。

复兴“大洪山”的开山仪式是在洪门“礼堂大爷”周家琪家中举行的。清末洪门因反清秘密活动，香堂仪式称为“做戏”，是为了掩护秘密活动，后来“做戏”成了开山堂或开香堂仪式的代名词。这次“做戏”是熊、何二人配合下进行的。

何崇校本来虽参加过洪门，但步位只是六排，根基太浅，熊社曦早年在洪门中较有根基，他需要依靠何崇校的军统势力的支持，而何也需要依靠熊在洪门中的旧影响，准备利用洪门搜集情报。

复办“大洪山”“做戏”时，宣布了熊社曦为正山主，何崇校为副山主，由何主持这场“戏”。“大洪山”复办时下分三个分堂。第一个分堂堂主为南宁的邓笃初，他曾充任过桂军的团长；第二个分堂堂主为广西百色的卢明轩，此人在百色掌握汽车运输业，暗中贩运鸦片；第三个分堂堂主为广西贵县的周俊，此人曾任桂军某师副官处长。当何崇校宣布“授旗”时，三位分堂堂主走上香台，行礼如仪，接过旗绕场一周。“做戏”之后，照例举行了宴会。

复办的这个“大洪山”已经背离了原来的大洪山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性质，而成为受军统控制的帮会组织。

“大洪山”复办后一年中，除了上述开山仪式上已成立的三个分堂外，又在梧州、龙州、归州、靖西、广东小董、钦州、云南剥隘、贵州兴义等地都建立了分堂。

“大洪山”复办后，在南宁等地半公开活动，规模不断扩大，会员猛增。新会员一律交纳“香规钱”，各人按自己的地位和经济条件“自愿”交纳，数目下不保底，上不封顶。

但是，“大洪山”的好景不长，面临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对帮会加强了控制。特别是桂系广西当局深恐帮会发展会影响他们的统治，出告示严禁在职军政人员参加帮会，否则严惩。为此，“大洪山”改为由与桂系有一定关系的广西人邓笃初主持，熊社曦、何崇校等外籍头目，“退居二线”，并离开广西。这种情况反映出桂系与蒋介石操纵的军统的矛盾，也间接反映出蒋、桂之间的矛盾。

何崇校离开广西后前往澳门，他在澳门读了些进步报刊，开阔了眼界，加以在军统中“不得志”，已无心再利用帮会搜集情报等活动。他向“大洪山”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只能将大洪山办成一个互助团体，筹一些基金，为总堂打下经济基础，注意同堂兄弟的福利事业；第二，不要让“大洪山”卷入政治漩涡，要提防一些政治派系，包括军统的人员攘夺大洪山的领导权；第三，大洪山的发展前途，应是海外而不是国内，先在国外打下基础，万一不能在国内立足，将来可以跑到海外去，留有回旋余地。

1948年8月，主管大洪山的邓笃初死去，继由十一人“护山委员会”主持大洪山事务，该组织没有与“新社会建设事业协会”桂

林筹办处进行联系。熊社曦带家眷赴武汉，何崇校也因受桂系排挤在广西无法立足，移向广州。

当时越南正进行内战，越南国民党头子阮海臣及其同伙，被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武装打得溃不成军，逃到中国境内。当时中国国民党已自顾不暇，不能对越南国民党提供援助，越南国民党为了取得生活出路和立足点，积极参加大洪山，这正适应了大洪山向海外发展的长期战略，着眼于在越南建立分堂。从此大洪山加入了越南人。

大洪山在广州的分堂由李日全为堂主，该堂的字号是个“格”字，通常被称为“格字号”。“格字号”开堂仪式十分隆重。香堂地点设在大德路海军联谊社的大礼堂。参加者除李日全在广州的长江分会的全班人马和一批新入会的昆仲之外，还邀请了广东洪门忠义会会长葛肇煌等人，达四、五百人之众。“格字号”开堂的隆重仪式影响到香港的洪门组织。香港洪门三合会“四和”成员莫郁芳前来联系，要求在香港设立大洪山分堂。这就更加符合大洪山向海外发展的愿望，香港分堂很快建立了。泰国华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在曼谷建立了大洪山组织，他们却以国内的大洪山为“正统”，接受了旗帜和印记，称为曼谷的分堂。

1949年春，面临着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何崇校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遂以大洪山正副山主名义发出内部通告，再次重申大洪山只能成为江湖上的互助组织，不能介入目前的政治斗争，但文件为中统扣留未曾散发。熊社曦却盲目追随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重整旗鼓，负隅顽抗。随后熊、何二人分道扬镳。何逃亡至澳门。

广西解放前后，广东小董和广西南宁、百色的大洪山骨干分子对抗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很快就被镇压。熊社曦等大洪山头目潜伏下来，也一一落入人民法网。大洪山在大陆遂被消灭。

1950年3月1日，何崇校受到了人民政府政策的感召，在其妻写信劝告下回到广州，接受了人民政府对他的处理和改造。

特务化的洪帮

军统特务于抗日战争时期除了通过“人民动员委员会”控制帮会外，还于抗战胜利后派大批特务人员参加到帮会中，使某些帮会特务化。其中最典型的是在四川，军统特务大批参加洪门“武圣山”，参加创办（袍哥组织）“正诚社”、“融志社”等。“武圣山”原与上海的洪门“五圣山”有关。原“五圣山”的首领张子廉于抗战胜利后在四川活动，与军统特务头子罗国熙以及杨森的亲信夏炯交往密切，罗、夏都是仁字袍哥，又结交了范绍增部的旅长廖开孝，廖为礼字袍哥。罗、夏曾在上海参加过向海潜为首领的“五圣山”。在川的张子廉主张由川籍的罗、夏组织“武圣山”。由于袍哥本属洪门系统，组织与礼仪大致相同，彼此可以交叉参加，于是许多仁、义、礼各堂袍哥转入武圣山，使武圣山得以迅速发展。

1948年末，正当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国民党在政治上愈加腐败、经济上愈加危机、军事上面临困境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其即将崩溃的统治，加强了特务活动。四川武圣山就在此时于泸县举行开山立堂大典。军统特务头子罗国熙主持这一典礼，各县及重庆市的反动袍哥头子前往参加。武圣山内绝大部分是稽查处的特务和杨森的军官。

在罗、夏等特务头子指挥下，武圣山执行军统和重庆市政府的指示，到处打击进步人士，专与进步力量为敌。1949年春，在“蒋家王朝”覆灭前夕，夏炯、廖开孝等暗中指挥武圣山分子以武力镇压进步学生的民主运动。重庆解放时，“夏炯率一部分武圣山分子逃向川西，后来在懋功地区被捕获解回成都镇压。”罗国熙在泸县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将武圣山分子变为武装特务。解放初，曾纠合川南地主袍哥的土匪武装，与人民解放军为敌，被人民解放军剿灭。罗等被镇压。

军统特务组织的“正诚社”，全部以军统人员为骨干。总社长周迅予，副总社长贺鳌。参加该社的袍哥，绝大多数是稽查处、警察局、侦缉队和刑警队系统的人员，并有重庆仁、义、礼各堂袍哥与军统有关系的特务分子。正诚社的活动与军统的活动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在军统局命令下，经常夜间出动逮捕共产党员，迫害进步人士。他们奉军统局命令，曾封闭《新华日报》馆、接收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平时依仗军统势力无恶不作，危害人民。解放后，少数正诚社分子随军统逃向台湾，大多数先后被捕，依法受到杀、关或管教劳改。

军统特务组织的“融志社”，由曾成武任社长，寇忠大、李如德任副社长。这三人都是特务头子唐毅手下的干将，有“三凶”之称。他们原来都是袍哥分子，组社后，大量吸收军统下层特务分子入社。该社配合军经稽查处人员，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由于该社社员尽是下层特务和警察，在民间作恶多端，到处敲诈勒索，民众畏如蛇蝎。融志社的“舵把子”曾成武、寇忠大之流，也完全抛弃了袍哥的“江湖义气”，一意横行霸道。他们对戏

院等场所敲诈，戏院稍有不慎即遭捣毁。1947年，曾成武因争女人与当时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发生纠纷，孙将曾逮捕，以抢劫罪名送法院，拟将曾处死。警察局长唐毅袒护曾，迫使孙将曾释放，曾后因恶贯满盈，在成都被人打死。解放后，融社骨干分子纷纷被捕伏法。

典型人物

传奇人物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1868—1955）原名羡意，字基赞。因他排行五，洪门人士多称其为五叔，而洪门内以叔辈为尊称。他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中股乡（现名牛路里）破产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寡母历经艰辛将其扶养成人。少年读过四年私塾，因贫苦辍学，到新会县一家小作坊当学徒。因受人欺侮而习武自卫。十四岁时赴美国。十七岁时读了《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揭露清统治罪行的书籍，遂加入洪门致公堂，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为了维持生计，在旧金山加阑街八0八号中国杂碎馆“会仙楼”当厨工，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月薪美金十二元。当时美国常有流氓欺侮华侨，喝酒吃饭不付账，还要打碎碗盘桌椅，动辄打骂华人，华侨们无处申诉，只得忍气吞声。司徒美堂因少年时曾习武，体格健壮，勇武骠悍，好打抱不平，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莫能近身。见有流氓捣乱，三拳两脚将其打翻在地，如抓鸡一般扔到街上。二十岁时，因与流氓格斗时将流氓打成重伤致死，而入狱，几乎被判为绞刑，幸得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款营救，十个月后得以出狱。

出狱后失业，以给洋人管家当“男褓姆”谋生。1894年春，他在美国军舰“保鲁磨”号上当厨工，随舰游弋南北美洲和欧洲各地，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交结了许多“三教九流”的人物。离开军舰后，在波斯顿以贩卖肉类瓜类的小生意谋生。1894年冬，他感到洪门致公堂组织涣散，成份复杂，缺乏统一指挥，为了发挥洪门的组织作用，立志要在致公堂的系统内另立山头，别树一帜，乃与阮本万、李圣策等人共商，集合堂内少年气盛、敢作敢为之辈，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口号，集结了一批洪门兄弟，组织逐步发展，司徒美堂被拥为“大佬”，从此奠定了他在洪门中的基业。安良堂的组织比致公堂严密，所举办的互济事业也多，它具有较雄厚的经济力量，有武器、有房屋地产，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并聘请美国著名律师为法律顾问。

1904年，孙中山在美洲联络洪门进行革命活动期间，司徒美堂在波斯顿认识了孙中山并任孙的保卫人员兼厨师。他从孙中山的教导中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同时在孙中山的帮助下，使他掌握的洪门组织带上了革命色彩。1905年，他又到纽约组织“安良堂”，大力支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除波斯顿、纽约外，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积彩、必珠卜、哥伦比亚、哈佛……等三十一个城市，先后成立了安良分堂或安良支堂，入堂人数剧增。

安良堂内，供奉着反清复明的“始祖”洪英，“五祖”、“武宗”郑成功，“文宗”史可法，“军师”陈近南等的神位，设有长明灯。为新入堂者举行的入堂仪式，类似国内的洪门的传统仪式。安良堂的各项规则、信条、纪律基本上继承了国内民间秘密结社的特点，例如神秘性、秘密活动方式、宗派性等等。只是由于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关系，其封建色彩相当淡薄。

司徒美堂有一副侠义心肠，又能对华侨社会的人事动态、姓名籍贯都记得清楚，遂以其品德和才能博得洪门兄弟的拥护。洪门致公堂与安良堂两个洪门组织互相协助、互壮声势，“从本世纪初叶到五十年代，司徒美堂、阮本万、李圣策等人交替轮换被选为致公堂‘总监督’和安良堂‘总理’；其余如陈光耀、李礽俊、江昌缨、陈益迪……等，也分别掌握各地安良堂领导权，或担任致公堂的办事人员，数十年而不变。华侨社团的大小活动（小而至排难解纷，大而至抗日募捐各项爱国活动），他们都有所涉及。司徒美堂还被选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集堂决议，有时甚至成为当地华侨所必须遵守的规矩，有些事情，他们赞成，而凡事顺利；他们反对，则障碍丛生。”司徒美堂善于交际各方人士，在美国商界、政界、警方、法律界都有交际，“罗斯福（即富兰克林·罗斯富一笔者注）在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前，也充当美堂和‘安良堂’的法律顾问十多年之久，至直到当了总统才解了聘约。”美国地方官员也有加入“安良堂”者。

司徒美堂在制止海外洪门“堂斗”，团结华侨各团体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堂斗”在美国东、西部华侨团体之间持续了三十多年，即各“堂”之间互相残杀，造成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惨剧。

“堂斗”与华侨“堂口”成立的社会背景有关。早期到美洲各地的华侨大多是在国内较贫困的劳苦人民，以及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向海外的反抗清朝的志士。他们到美洲后，多受美国等国的流氓、官员、警探的欺凌，清朝钦差也勾结外国官员、警探欺压华侨。华侨为了生存自卫，纷纷成立互助互济的团体，这些团体具有“帮会组织”的性质称为“堂口”。它有别于华侨中上层所组织的商会、会馆或公所。据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所述，在美国的堂口为数众多，计有致公堂、秉公堂、瑞端堂、协英堂、合胜堂、萃胜堂、保良堂、保安堂、秉安堂、群贤堂、昭义堂、保善社、西安社、松石山房、华亭山房、竹林山房、聚良堂、安益堂、俊美堂、协善堂、敦睦堂、安平公所、洋文政务司二十六个，但缺安良堂。据司徒美堂说的，与上述情况稍有出入：除致公堂和安良堂外，旧金山计有秉公堂、萃胜堂、协胜堂、安益堂、合胜堂、瑞端堂、聚良堂、竹林山房、协英堂、华亭山房等十二个外，还有属于南海、番禺、顺德（三邑）的秉安堂、松石堂、西安堂等三个；属于香山籍的俊英堂一个。合计为十六个，已比前减少。但总堂之外，分堂均有增加。如秉公堂有二十六个分支机构，协胜堂有十六个分支机构，合英堂和英端堂，各有八、九个分支机构。除了洪门帮会组织外，还有姓氏组织、同乡会组织、行业组织。有些堂员则四种身份兼而有之。可见美国华侨团体、洪门会堂的复杂性。

各堂口中最大的是致公堂，最盛时期达八、九万人；其次是后起之秀的安良堂，达二

万余人，因司徒美堂的关系，安良堂堂员一般均为致公堂堂员。这些堂口形成一种海外华人团结互助的社会力量。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当局和中国当局派到海外的反动势力勾结，

敌视这些堂口，他们利用洪门团体与海外同乡团体中传统封建性、宗派性、保守性与政治上的盲动性、冒险性，加以挑拨离间，收买内奸，混入堂中，掌握大权，转而利用堂口压迫华侨。于是引起许多堂口之间不断争斗，以至互相残杀、复仇，美帝国主义和中国海内外反动势力坐收渔利，逐步削弱和控制堂口。每次引起堂斗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保皇派与革命派的矛盾引发的；有的是美国移民局对华侨敲诈勒索挑拨堂口之间的关系引起的；也有的是参加了某一堂口的华侨充当美国移民局的“狗腿子”欺压同胞而遭到另一堂口以斧头劈死，“暴尸唐人街”，引起了两堂口之间一场惨酷的堂斗。堂斗之前，美国流氓来兜售手枪，三八左轮每支三十美元。堂斗时，美警冷眼旁观，肆意施展“以华制华”、“以华乱华”的阴谋。二十世纪初，“大小堂斗不下六、七十次，在美东纽约一带死的有二百余人，美西旧金山一带死的有一百多人。也有被美国警察捉去‘问吊’（绞刑）的”。

在各堂口堂斗频繁的年代，司徒美堂几乎是生活于“枪林弹雨”之中，不得安宁。“因此在‘堂斗’期间，美堂也常怀两支手枪，以备同暗杀的凶手实行‘驳斗’。辛亥革命期间，美堂等美洲洪门领袖人物，支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加强了洪门堂口的团结，堂斗减少。辛亥革命后，旧金山的岗州公所主席李宝湛，经过奔走联络各侨团，共同洽谈之后，于是召开了一个“和睦团结会议”，由各堂签立了和约，并联合大摆“和头酒宴”。席间同胞揭露了敌人、坏人挑拨堂斗的阴谋和事实，与会同胞互相回忆谈论堂斗往事，觉悟提高，“有人竟至抱头痛哭。”由此之后，堂斗遂基本上停息下来。“直到‘九一八’事件爆发后，当地华侨感到国势垂危，于是共同发展和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美堂担任该会的常务委员，他发动华侨捐款支援抗战，出力很多。他还与宋庆龄女士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了密切接触，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主力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见陈其瑷写的《司徒美堂先生生平事略》一文），这时，极大多数侨胞都能做到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就更进一步平息了‘堂斗’了。”

以上从“堂斗”激烈，到平息“堂斗”的过程，是海外洪门、华侨团体政治觉悟的提高过程。“堂斗”是落后的政治、文化意识被敌人、坏人利用所致，而辛亥革命期间，侨居美国的洪门及华侨团体在支援辛亥革命的前提下，减少了“堂斗”；抗日战争到来后，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停息了“堂斗”。可见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到海外洪门的状况，而司徒美堂在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期间，他的革命和爱国态度及其在海外洪门团体中的重要地位，对于平息“堂斗”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徒美堂及其领导的海外洪门团体一贯支持国内的爱国运动和进步活动。从清朝政府经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司徒美堂及其所领导、影响下的海外洪门团体致公堂、安良堂一贯反对中国的反动腐败专制独裁的政治，支持进步、民主运动。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陶行知及抗日救国名将蔡廷锴、杨虎城等旅美期间，均受到司徒美堂领导的洪门组织的保护，国民党特务也不敢捣乱。

1933 年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在蒋介石的大力镇压下失败，抗日将领蔡廷锴流亡美国。司徒美堂事先已收到陈铭枢将军由香港来电，请美堂保护来美的蔡廷锴将军，免遭国民党特务暗害。蔡廷锴作为十九路军军长，领导一二八淞沪抗战，誉满中外，深得华侨敬佩。在司徒美堂发动下，华侨热烈欢迎蔡廷锴来美。“蔡抵纽约之日，侨团、洪门的群众，带着鲜花，舞着广东土特产的狮子到码头，迎

接的汽车也有百多辆,还有少数美国人抱着崇敬英雄的热忱,参加到码头迎接的队伍,极一时之盛。当蔡将军离船上岸时,华侨群众欢迎队伍,热烈高呼:'向蔡将军致敬!'于是献花的,赠金钥匙的,赠小宝剑和纪念戒指的,使蔡应接不暇。美堂等与蔡将军握手,接上汽车,其余汽车护送,侨众舞着狮子随后,还有美国侦探部派来'保护'的十多架机器脚踏车跟着迎接队伍回到'纽约安良堂'。美堂等以盛筵款待蔡将军。"

蔡廷锴抵美后,在美国的蒋介石的特务声称要对蔡行刺,美国密探还多次对蔡纠缠问讯。美堂除加强保卫工作外,还在《纽约五洲公报》登出严正声明:"谁敢动蔡将军一根毫毛,就当场把凶手捣成肉酱……"。随后,美堂陪同蔡廷锴遍游美国各大城市,确保了蔡的安全。

与张学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在释放蒋介石之后,被蒋逼迫出国。当杨抵美时,美堂发动侨团群众热烈欢迎,设盛宴款待。杨向美堂讲述了西安事变的原因和经过,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态度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美堂对这位英雄豪迈、热爱祖国的好将领,印象深刻,极表崇敬。"当美堂得知蒋介石派出大批特务跟随杨,伺机对杨下毒手后,极为愤慨,立即吩咐"安良堂"的兄弟加意保护杨将军,直到送杨下船去伦敦,美堂向杨珍重道别。杨到伦敦后,来信向美堂致谢,此后再未能见面。

上述,司徒美堂热情招待和保护两位爱国将领,既反映出他对抗日救国的赤胆忠心,也反映出他对抗日英雄人物的崇敬;既说明了他有力量保护抗日志士的安全,又说明了他仍然保持并发扬了洪门传统的江湖义气。

司徒美堂先后六次回国,每次回国都促进了他政治认识提高并显示了他的爱国精神。

1941年冬季他第四次回国时,先回到香港,正值蒋介石迫害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当他在海外得知皖南事变时,曾向蒋介石发出通电:"反对分裂,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坚持抗战"。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态度有所了解。这次到香港后,恰巧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日本控制下逼美堂当"维持会长",美堂坚持爱国立场,在爱国洪门兄弟帮助下,化装逃出香港,于1942年辗转抵达重庆。途中他看到了国民党抓壮丁的暴行;国民党特务剖开小孩腹腔,挖出肚肠,藏进鸦片、吗啡进行毒品贩运的罪恶;到达重庆后,又得知1936年蒋介石所号召的"献机祝寿"(为蒋祝寿为名,捐献飞机)运动是一场骗局,美洲华侨捐的巨款并没有购飞机用于抗日,而是中饱了私囊。又了解到美洲华侨将血汗换来的美金,寄托中国银行转给国内侨眷做战时生活费。但是国民党当局有关官员层层炒卖,侨眷收到侨汇要到半年以至一二年后,"害得许多侨眷全家饿死"。

美堂于抗战时期,逃出香港后,曾手拄木杖,步行三百里到达东江抗日游击区,经曲江、桂林抵重庆。蒋介石以"国府委员"为诱饵,企图拉美堂入国民党,遭到美堂拒绝。1942年经印度飞返美国。嗣后周游南美十余国宣传抗日救国,广交各地洪门人士,名声更为扩大。

1945年初,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抗日战争也面临胜利,司徒美堂拟组织华侨政党回国参政,为此拟将致公堂改为"致公党",于是3月12日在美国纽约召开了"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南北美洲九国的致公堂组织均派代表出席。会议结果,洪门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美洲的致公党与以后国内成立的致公党为两个不同的组织)。司徒美堂被选为该党全美总部主席,古巴的朱家兆、加拿大的陈宜显、墨西哥的甄显炽被选为副主席,并设组织、宣传、联络、财务各部,大会还通过了党纲和时局宣言,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

洪门报纸、美国《五洲公报》,加拿大《大汉公报》、《洪钟时报》,古巴《开明公报》、《民声日报》,秘鲁《公言报》等,又联合其他爱国华侨报纸,发出《十报宣言》,号召“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各国致公堂改组为致公党。但这种改组仅限于名称上的改变,其宗旨及组织结构等,皆无变化。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抱有返回祖国参政的意愿。致公党决议:各地派出代表,由司徒美堂率领回到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之前,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均复电欢迎,惟蒋介石不予答复。

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领海外洪门致公党十位代表从纽约来到上海。

美洲致公堂不仅对辛亥革命有巨大贡献,而且出钱出力支援了祖国抗日战争,但这次回国后却受到蒋介石的冷遇。1946年6月21日,司徒美堂在吴铁城陪同下见到了蒋介石,与蒋话不投机。6月23日又到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7月25日,出席了中共代表陆定一和上海民主人士马叙伦、黄炎培、陶行知、郭沫若、沙千里、梁漱溟、沈志远、张云山、孙宝毅等在来喜饭店举行的欢迎茶会。陶行知早年在美国就与司徒美堂建立了友谊。当日早晨,陶行知因愤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而患脑溢血突然逝世,半天之差,未能与司徒美堂相见,使司徒深感遗憾。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自到美堂寓所谈过两次话,并邀请他到解放区参观。

原先在上海的赵昱自称“代表五洲洪门”,倒向国民党中统一边,对抗司徒美堂。上海的青帮大亨杜月笙也惟恐司徒美堂与他争夺帮会的领导地位,也对抗司徒美堂。上海的广帮洪门想借重司徒美堂的盛名“青洪合流”,组成统一的帮会团体,平分上海码头。军统则想借重司徒堂的势力与中统对抗。

在各种势力包围中的司徒美堂,穷于应付。本来在抗战时期,司徒美堂受蒋介石委托在美洲宣慰华侨,用了三万美金的巨款,这时在辛亥革命人物朱兆桑之子朱树楠的怂恿下,向蒋介石讨债,蒋令吴铁城来应付。吴表示因司徒美堂在美不听指挥,自行组党,国民党已安排梅友卓为国民党中委,夺取了安良堂总理之职,等于推翻了司徒美堂。这样一来,双方关系很紧张。吴铁城向司徒美堂表示:“政府的钱不能给异党去用。”又说:“你们组党,可到美洲去搞,为什么要回来?!”司徒美堂闻言,拍案大怒。要用手杖打吴铁城,后由众人劝开,悻悻而去。

在上海召开的“中华洪门恳亲大会”决定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于1946年9月1日正式成立。在上海华山路五祖祠正式办公。党内事务由张书城、陶履中、吕维九三人把持,司徒美堂被搁置一旁。此时司徒美堂看清了成立“民治党”是政治骗局,于1946年9月间对各报记者发表谈话:“本人主张联合各党派和爱好和平的人民,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然后再以经济从事于建设。我们并不是任何党派的尾巴,我们愿以人民的意志为行动。”此后蒋介石对司徒美堂采取拉拢的政策。南京政府召开“国大”期间,没有给“民治党”代表名额,只给司徒美堂本人一个名额和特别费美金三千元,司徒美堂拒绝接受。国民党当局见拉拢不成,就实行威胁,司徒美堂更不肯屈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司徒美堂对美洲华侨有一定的影响,请司徒美堂到美国大使馆吃饭,进行劝解。司徒雷登声称以“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司徒美堂这位“半个美国人”。这两位司徒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谈话。司徒雷登自称其虽属美国人,但在中国住了五十年,父母的山坟也在杭州,他爱中国,了解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一定要协助把中国建设好。司徒雷登还吹嘘他办燕京大学的功劳,说要老死在中国。司徒美堂回答司徒雷登说:我虽然在美国住了六十多年,可是并不怎样爱美国,所以不是“半个美

国人”，而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华侨到美国也只是当小贩，做厨子，没有办什么“教育”，在国内和国外都受人欺侮。美国人在中国开学堂办医院，并没有使华侨对美国人较为亲热一点。美国今天许多人失业失学，没有房子住，没有面包吃，美国政府应该花点精神办好他们自己的事情再说。如果美国人真诚援助中国，很感激。但是美国兵开到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掀起中国的内战，这不是援助，这样下去，中国未亡于日本而要亡于美国。

这场谈话结果，司徒美堂未被说服，仍然拒当国大代表，并关照朱家兆、谢志如、杨天孚等九位美洲洪门代表先行离沪返美，他一人继续顶着。

1946年8月，国民党政府以“妨碍市容”为名，禁止上海摊贩设摊谋生，逮捕了继续营业的摊贩六七百人。11月30日，上海摊贩三百人汇集黄浦区警察局前请愿游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取缔令，要求释放被捕摊贩，遭到反动军警的野蛮镇压，当场被打死七人，受伤被捕多人。12月1日，摊贩继续斗争，又被打死十余人，受伤者达百余人，被捕二百余人。激起了上海摊贩的更大反抗，参加斗争的人数增至五千多人。上海各界人士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声援摊贩斗争。这时司徒美堂坚决支持摊贩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斗争，并对当局镇压摊贩提出严正抗议，司徒美堂的抗议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司徒美堂于1947年离沪赴香港，并返回离别了数十年的故乡广东开平，蒋介石一直派特务监视着司徒美堂的行动。

1948年8月12日，司徒美堂在香港建国酒店七楼的航空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声明：中国为四亿五千万人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本人即将返美参加洪门恳亲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目的。

司徒美堂于记者招待会后分别拜访了李济深、蔡廷锴、陈其瑗、陈其尤、陈滨生等洪门人士。随后以“出席在加拿大召开之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为理由，向南京政府要了出国赴美的护照，于10月26日，自港乘飞机经沪返美，10月30日安抵纽约。返美前夕中共人士为之设宴饯行，司徒美堂即席亲自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表示愿于将来回国参加新政协。返美后，香港各报刊登了《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其内容为：

美堂于1946年春自美返国，适逢当时之政治协商会议，为之大慰。奈因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生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决议，发动剿民内战，美堂乃愤而赴港，视蒋介石如寇仇。窃思谋国之道，旨在和平，剿民内战，元气大伤。今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惟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陈其尤同志等所继续组织之中国致公党，民国二十年在港组中央党部时，美堂已亲自出席，加以签字赞同。今能彻底整理，奋发前进，揭民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当随处呼吁洪门弟兄，予以声援，俾将洪门忠诚救国之精神发扬光大。美堂复郑重声明：

> 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
>
> 司徒美堂(签字、盖章)
>
> 1948年10月8日

美洲洪门内部情况复杂，特别是当致公堂改为民治党后，国民党中统特务分子渗入民治党，造成内部四分五裂。司徒美堂返美后，对洪门的领导与作用受到削弱。司徒美堂在进步华侨青年的支持下，到美国西部各

城市唐人街去访问演讲，报告了祖国的政治形势，也解释了民治党组党失败的原因，并登报发表《致美洲全体洪门人士书》，声明中除总结了为祖国实行民政治而斗争的经验教训外，还指出"美洲洪人当务之急者三事"一为促进洪门团结，二为实行彻底革命(支持解放战争，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对派)，三为支持祖国建设。

1949年1月，毛泽东致函邀请司徒美堂来解放区参加会议，原件如下：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10月23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调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人民政协开幕前夕，司徒美堂被推为美洲华侨代表，于1949年8月9日乘飞机离开美国，8月13日抵香港，9月初到达北京，

他拒绝曾追随"中统"排挤他的某些人的"拥戴"，不与这些人来往。他对于当年在上海的一批"民治党"当权人物深恶痛绝。1949年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调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从此定居北京，有时也赴全国各地参观游览。1951年4月27日，他在广东省鹤县(今高鹤县)农村参观土改时，又收到毛泽东给他的信，信中说："4月14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了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6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

司徒美堂定居北京北池子筒子河边宁静的四合院中，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进行多种社会活动，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度过了幸福的晚年生活，1955年5月病逝于北京，安葬于八宝山烈士公墓。

司徒美堂的一生反映出海外洪门领袖人物的坎坷经历，而他晚年回到新中国参加祖国建设，又成为爱国洪门领袖人物较典型的美好的归宿。

袍哥军阀范绍增

范绍增(1894—1978)原名舜典，号海廷，四川大竹县清河场人，农民家庭出身。少年时曾进私塾读过书。但当地赌风极盛，范绍增自幼不爱读书，嗜赌成癖，经其祖父教育，屡教不改。十三岁时即投奔袍哥头目张作林门下，加入袍哥组织。张作林从事反清革命活动，靠赌场聚钱购买枪支，并持枪抢劫，积累基金。四川保路运动期间，张作林等袍哥首领随同以袍哥为基本队伍的保路同志军举起反抗清政府的革命旗帜，范绍增被卷入革命潮流，摇旗呐喊。

民国三年，范绍增随张作林部队上牛头山充当张部管事。1913年，随张部揭起讨袁旗帜，活动于四川大竹、渠县一带。1915年袁世凯派陈宧督川期间，北洋军三个旅入川"清剿土匪"，张作林、范绍增将队伍分散隐蔽。1916年，重整队伍响应护国军讨袁。张作林原为同盟会员，袍哥礼字号山堂的"舵把子"。张牺牲后，范绍增被公推为礼字号袍哥首领，率部继续反袁，为革命党人领导的四川靖国军颜德基部收编，为第五团的营长，后升为第五团团长。同年，讨袁战事结束，熊克武为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1917年和1918年熊又在护法运动中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和四川督军。熊为了统一川境，联合刘湘部打败颜德基部，范团改编为熊部第六师余际唐部的二十一团，范仍任团长。范利用袍哥关系将广安的郑启和师周绍轩团拉过

来编为第六师第二十二团。余际唐的第六师所部四个团都是袍哥队伍,余不放心,排挤袍哥,范离开了第六师到熊克武部杨春芳旅的一个营部作客。杨旅也是袍哥队伍,与范建立了交情。

范在当团长时,从经济上周济过家乡乡亲,家乡人对范颇有好感,特别是又有袍哥关系,所以以后范的队伍的骨干力量是家乡子弟兵和袍哥组织,这便是范维系部队的基础。

1920年,范绍增在万县召集手下弟兄商议出路,决定不在熊部干了。在范的朋友罗君彤策划下,袭击了盘踞于奉节的唐式遵部,获得许多枪械。从而到长江南岸集结起一、二千人,活动于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不久,范部编为杨春芳独立旅的独立团长。杨、范等攻打熊克武部,帮助了杨森。杨春芳,范绍增被杨森分别委任为第四师师长和第四师第八旅旅长。此后,在熊克武与杨森混战中,范又因战功,被杨森委任为新成立的第九混成旅旅长,该旅拥有新枪,编制也大。

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后,要统一四川,但三年后,刘湘联络四川各地军阀并取得黔军袁铭支持,起兵反对杨森,杨战败由范绍增护送出川。1926年,杨森又由湖北返回万县。同年杨森投靠蒋介石,被蒋委任为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杨森奉蒋介石命令,率范绍增等部进攻武汉革命政府军。被武汉革命军打败,范绍增受伤。杨森以蒋介石为靠山,排斥异己,计划暗杀对他有功的范绍增,范得到讯息后连夜逃走。范在长寿联络川军各派共同计划讨伐杨森。讨杨联军以赖心辉为总司令,以刘湘为后台,与已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联系,借口杨森庇护北洋军阀吴佩孚为讨杨的理由,1928年5月战事爆发后,杨森的第二十军军长和川鄂边防军总司令等职被撤免。任命郭汝栋为二十军军长,范绍增为川鄂边防军总司令。但战争结果,联军战败,范绍增遂依附刘湘。

1928年冬,杨森联络川境其他军阀进攻刘湘,被刘各个击破。在这次作战中,范绍增为刘湘出了大力,把谢德堪部打垮,占领大竹、邻水两县,取得了刘对范的信任。经这次战争,刘湘几乎抢夺到杨的全部地盘,杨被迫龟缩在渠县、广安两县。刘湘当上了四川省主席,大肆扩充军队,并打败了川南的刘文辉,刘退居雅安。范绍增经过讨杨胜利后,由三个旅七个团,扩编为四个旅十二个团。刘湘将范部编为第二十一军第四师。

1931年,刘文辉拉拢范绍增,赠送给范五十万元,刘、范的来往为刘湘得知,范只得向刘湘说明刘文辉赠送了五十万元,问刘湘如何处理,刘湘回答:“你拿到上海去玩,假都不必请。”于是范绍增带了一部分钱赴沪,并在重庆上清寺修建了豪华的范庄。

范绍增到沪后,由于袍哥头目的身份,受到上海青帮首领人物杨虎、杜月笙的盛大欢迎。款待范吃喝玩乐,无微不至。范离沪返川后,杜又花巨款买下妓女黄白英乘飞机送到范处。新闻界诩之为:千里蝴蝶飞,万金送美人。

范绍增与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是1925年前后开始来往的。杜常介绍自己徒弟们到四川找范绍增,要范帮助他们在范的防区内收购鸦片烟。范每次接到杜的介绍信,总是尽力帮助。

1928年后,范绍增在刘湘部下当川军第四师师长时,杜月笙还介绍他的同门兄弟、吗啡大王陈坤元到范绍增的防区邻水县来开设一座吗啡工厂,由范绍增给予保护。当时在鸦片烟出产地设厂制造吗啡,所获的暴利比从四川运鸦片到上海要大十几倍。

1929年,范绍增第一次去上海和杜月笙见面时,杜月笙除了对范热情欢迎外,还和范换帖结拜兄弟,并陪范在上海尽情玩乐,极力显示他在上海的特殊势力。以后范绍增几乎每年都要抽时间到上海玩玩,范每次到上海,杜月笙都尽范的所好来招待范。

1933年,蒋介石调四川部队去湖北进行

反共战争。范绍增率部队两旅，进犯洪湖革命根据地时，被贺龙指挥的严英所属部队在老河口、新沟嘴地带痛歼，被俘千余人，范绍增负重伤，仅以身免。范所骑的马、雨衣等都被红军缴获。范绍增到汉口养伤时，蒋介石派人携巨款慰劳，积极拉拢范为其反共内战效力。当杜月笙得到范绍增在汉口养伤的消息时，立即派徒弟张松涛赶到汉口，接范到上海就医。船到码头，杜月笙又叫顾嘉棠代表他前来迎接范，送范到白渡桥公济医院，找了一个英国医生为范诊治，此后范与杜的交情更加深了。

1934年，范绍增部进攻红军川陕根据地，遭重大伤亡。1935年夏，红军突破嘉陵江。范绍增部尾追红军到川西。刘湘命令范部阻止红军北上，结果红军胜利北上。刘湘要求蒋介石对范绍增撤职查办，企图借此剥夺范的兵权，蒋介石认为刘湘的意图在于排挤亲蒋的力量，乃复电给范以“革职留任戴罪图功”处理。以后范看到刘湘加紧收买范部下的旅、团长，对范“釜底抽薪”，于是促使范进一步投靠蒋介石。

抗日战争开始后，范绍增调赴前线任十一兵团副司令，随军到汉口，当时刘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入汉口万国医院就医。戴笠嘱咐范绍增暗中监视刘湘的行动，凡与刘来往者，向戴报告。范绍增旧部团长潘寅久从刘湘的长官部参谋处长徐思平处偶然发现了刘湘令王缵绪带两个师出川占领宜昌，同即将到襄樊的韩复榘取得联络的机密，转告给范绍增，范立即报告给孔祥熙。蒋介石得到这消息后，当晚即乘火车到开封，以召开会议为名，借韩丢失山东战略要地的罪过，逮捕了韩复榘，押解到武汉处死。韩被处死后，刘湘也很快死去。人们说杀掉韩复榘，吓死了刘湘。

蒋介石因范绍增报告刘、韩勾结叛变有功，命令范新成立第八十八军，委任范为军长。孔祥熙为了酬劳范的告密，也决定拨款买机枪九百挺，赠送给范，顾祝同也送了些武器。范绍增回四川组建部队参加抗日。范召集旧部官兵、哥老会兄弟参军抗日，队伍发展很快，编了三个师的军。

军统头目康泽企图将范的一部分军队抓到手中成立“禁卫军”，范立即由顾祝同将范部调到三战区鹰潭、乐平一带。1940年初，三战区长官部突然电令范绍增将新二十一师少校副营长曾汝林押送上饶。同时又接叶挺军长电要曾到新四军去。原来曾汝林是共产党员。经范绍增与幕僚研究结果，乃备旅费将曾送走。同时复电长官部称：“曾汝林在病假中失踪”。后得叶军长复电致谢。1950年曾汝林还去重庆山洞会见罗君彤(范的亲信幕僚)、陈章文(曾在范部时的团长)表示个人谢意。

1940年冬，范部在太湖地区与日军激战，伤亡一千多人，将日军击退，博得了老百姓的慰劳。1941年范部在江西临安、新登打退日军两次进攻。范部抗日本属有功，但1942年初，蒋介石突然调升范绍增为三十二集团军副司令，实际上是抽掉了范的兵权。范绍增回到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态度比较消极，长期住在上海，与杜月笙来往密切。杜月笙的二女儿杜美霞拜范做干女儿，杜、范家眷也经常往来。范在上海原有住宅，能长期驻沪，靠着与青帮首领杜月笙等人的关系以及上海地区川军中的旧同事旧部属和袍哥等多方面的关系。范有富华银行，乃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金融界也颇为活跃，有上海“闻人”之称。

1946年，范绍增出面在上海组织“益社”，这是一个袍哥团体，它的成立得到了杨虎的大力支持，名誉理事长是杨虎，理事长是范本人。社内既有反蒋分子也有国民党特务。益社成员多为军官总队的被编余的军官，该社帮助遣运回川编余官兵，先后达万余人，博得舆论好评。又借做生意的招牌，与中

共地下工作人员伍云甫、管大同等联系，自组裕增贸易公司，运销苏北华北解放区棉花，或以现金，或以药品、纸张交换。范绍增还参加了杨虎、郭春涛组织的“民主同志联谊会”；与中共地下党的李剑华结识，掩护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的活动。

1948年，范绍增、杨虎在上海的活动触怒了蒋介石，蒋手令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立即逮捕范绍增、杨啸天。”由于高级特务泄密，范、杨求救于来沪检查身体的何应钦，始得脱险。1949年春，范绍增回到四川，协同罗君彤编组军队，准备拉些政治资本迎接解放。范看到“蒋家王朝”将要崩溃，一面组织力量迎解放，一面与中共地下党联络。他家乡一带的袍哥，大都拥护他迎接解放。当中共地下党员周绍轩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范设法救出了周。范遵照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利用国民党部队和番号组织倾向革命的武装。范通过顾祝同的关系取得国防部暂编第十八纵队的任命，限于最多成立十二个团。范追求十万人的兵团司令职位，以便扩大实力，但当局借口军费困难，限制范扩大编制。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侦知范绍增旧部与民革有联系，特别是周绍轩曾在苏、浙、皖、赣几省的军官总队中利用“益社”的工作关系进行过反蒋活动。当局认为第十八纵队“政治面貌不清”。1949年11月初，范绍增得到顾祝同的帮助，出任国防部挺进军总指挥，驻兵于自己家乡四川大竹一带。

范绍增在起义前夕，曾在思想上的动摇，主要在于感激顾祝同知遇之恩，这位袍哥出身的将军思想上有浓厚的封建传统意识并有袍哥头领的“江湖义气”，这种“江湖义气”险些使他是非不分，他一度有加入到移驻大巴山胡宗南余部的打算，但经倾向革命的部属庞佑玙等人的委婉启发，范终于坚定了起义决心。

1949年12月初，范绍增在四川渠县通电宣布起义，中共地下党已与范事先联系。范的起义在所属地区，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并将各县仓储，完全交给了解放区军政机关。1950年范部在湖北改编。范被安排在中南政委员会工作，后调任河南省体委副主任。1978年因病逝世。

范绍增本是一位由四川袍哥起家的国民党军阀，又与上海青帮首领有密切关系并参加了青帮，其经历曲折，他的经历反映了国民党军队内的派系矛盾和蒋介石的排斥异己。也反映出范绍增的洪门袍哥军阀的特色。范绍增最后弃暗投明，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新生，说明了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使三教九流的人走向正确道路。

台　岛　闹　剧

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台湾洪门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多次袭击日本侵略军，随后为保存力量而散居民间，成立金兰辛木会。1945年台湾光复后，始公开称“金兰亲睦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上洪门组织基本上已消失，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洪门组织却遍布全岛，在台北等大城市中，更是山堂林立。自1949年“洪门迁台活动后，陆续有五十余个‘山头’在全省各地活动，其中有将近四十个是公开性质，其余仍是秘密组织。”国民党当局曾扶植和利用洪门宣传“反攻大陆”，洪门的某些山堂也依靠国民党当局以求发展。1956年11月1日至3日，在台湾当局的支持下，曾举行了“中国洪门海外昆仲恳亲大会”，借以鼓吹“反攻大陆”。在这次恳亲大会的《缘起》中，宣扬洪门传统说教，将明朝大儒顾亭林、黄黎洲、朱舜水、王船山、傅青主等奉为洪门的创始者，标榜郑成功也是继明朝大儒之后的创始人。以史可法为文宗，以郑成功为武宗。以“光复故国”、“拥护固有文化”，来为国民党“反攻大

陆”打气。又以洪门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中的“光辉懋绩”相鼓吹，“呼吁同胞，协助政府”。在其《宣言》中，进一步叫喊“反共抗俄反攻复国”这个“恳亲大会”还向蒋介石发出了《上总统副总统致敬电》、《向三军将士致敬电》、《慰问大陆昆仲电》等。陈诚以台湾国民党的“副总统”名义致“大会”一“训词”，俞鸿钧以国民党“行政院长”名义致“大会”一“训词”，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厉生在“大会”闭幕式上“致词”。完全暴露出这个“中国洪门海外昆仲恳亲大会”，是依附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其“反攻大陆”的活动内容是逆历史潮流的，也是自不量力的闹腾。

台湾洪门近四十年来，暗中广泛发展组织，这些组织在政治上并非都是追随国民党当局的。他们大都仍具有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和组织上保留传统的封建性。

台湾洪门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介入政界的选举。每当选举高潮到来时，散布于全岛的洪门山堂，立即动员起“十万昆仲”，在洪门组织的指挥下，秘密策动竞选活动，成为“选战”中一支“秘密部队”。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被打跨后，盘踞台湾近四十年来，台湾岛上的各种帮会、黑社会势力猖獗，洪门在平时并不太引人注目。存在于台湾的洪门山堂约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山主从大陆逃到台湾的，山堂经整顿后有新的发展；第二种是山主未逃到台湾，由内八堂大爷在台重新整顿后复办；第三种，在台湾新建立的山堂，是土生土长的新山头；第四种，由流氓假洪门之名开立的山堂。

前两种山堂在组织结构上变化不大，但龙头大哥已失去往日的势力。后两种山堂，组织成份复杂，尤其最后一种山堂为流氓把持，以出卖大爷步位赚钱，只要捐一笔“香规钱”就可入会，甚至可直升为内八堂大爷。多数山头在经费上都有困难。这些山堂企图找到政治上的靠山，重振山门。他们在选举竞争高潮中倾向于支持执政和国民党，而对于其他党派采取排挤态度。有的山堂以金钱为目标，在“选战”中谁给钱就为谁“抬轿子”，有时不惜采用流氓暴力手段，充当打手。因此，洪门势力介入“选战”，使选举更加违背“民主”和法制。

在“选战”中发挥作用的洪门组织有：大同山、西华山、五圣山、太华山、中华山、春宝山、天目山、栖霞山、南华山、洪发山、锦宝山、九龙山、楚荆山、同德山、金台山、大陆山，等等。这些洪门组织对原来洪门的宗旨、规章各项皆作了重大修正，他们虽然感到洪门已不可能重振昔日的光彩，但想以企业化经营的改革方向，和吸收新成员，以使洪门脱胎换骨。如大同山筹组“中国洪门总会”，提出修正洪门规则，以适应时代潮流，废除三百年前设立的家法，对违反十条十款者，改以开除会籍论处。他们代表了台湾中小企业家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筹备由各山堂集资发展企业，成立“中华国粹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华山创“龙铸实业公司”，以进口药材、出口五金、清洁剂为主。五圣山由大陆转移到台湾之后，其成员吴健胜经营天阏兴业公司，以销售帝王石建筑材料闻名于建筑界。五圣山的成员涉足于工商界的各种行业，其中有游览公司、水泥公司、客栈、进出口贸易、法律会计事务所、建设公司、电子公司等。由于他们跻身于工商界，在“选战”中，他们对选情与候选人在与其自身利益关系方面十分注意，他们把支持候选人应战视作一种“投资”。

每当“选战”高潮时，洪门组织除了为自己支持的一方拉选票，搞宣传，充当“保镖”等活动外，还对竞选的对方暗中使“绊子”，进行各种破坏、干扰活动，以造成对方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洪门的介入“选战”，妨碍了选举的正常化，使本来“民主”和“法制”不正常的台岛更加混乱。

同属洪门山头但成员的成份并不相同。其中有的知识分子居多数，有的工商人士居多数，有的退伍军人掌握山头实权，也有的多

为游民、闲杂人员。

台湾洪门于八十年代初出版了不少宣传洪门的小说、电影，也有的是供洪门内部观看的纪录影片。其中大同山成员一属洪，写了一部一百五十余万字的小说《洪门兄弟》，以通俗小说的文体，描写了洪门在江湖上的活动。大华山曾投资拍摄电影《洪门兄弟》，由欧威和、马骥主演，是洪门史上第一部自己制片的洪门电影，上映时不仅受到洪门昆仲的瞩目，且卖座率很高。此后还有《洪门三柱香》、《青洪帮》等影片出现，都是反映洪门或青门内情的影片。春宝山山主胡少和曾请人将三年中开香堂活动的情景拍成录像带作为记录，供在山堂内部观看。锦宝山与蓝天影业公司合作拍摄了《洪门兄弟》影片，这是洪门兄弟自演的影片。在洪门出版、发行的杂志中，较出名的是中华山出版发行的《忠义论坛杂志》，为研讨洪门历史和宣传洪门走向现代化的刊物。

台湾洪门虽然山头林立，号称十万昆仲，但其力量未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洪门成员入会后除固定缴费外，每个月应付昆仲间的红、白帖的花费是巨大的，凡有正当职业者受不了这些应酬开支，而一些无业游民、闲杂人员以从事各种非法活动牟利，或利用选举捞取钱财，因而有正当职业者，入洪门的不多。其次，各山堂各自称雄，搞山头主义，难以团结一致。再则，有些政客利用洪门的组织力量，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坐上了“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的宝座，但一步入政界，即丢掉了原赖以起家的洪门山堂的“招牌”。这些，就使得洪门在台岛，不大可能有更大的发展。但是，洪门的组织特点和秘密活动方式，使洪门一直成为台湾不可忽视的一支社会力量，特别是在竞选时期，它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被称为“选战”中的秘密部队。

1989 年初，台湾洪门决定一改以往的秘密活动方式，向台湾当局申请登记，但当局以“洪门”帮派色彩太浓，未予核准，因此改名为“社会事业建设促进会”，才获得批准。

台湾洪门与国民党原来就有一定的关系，近年来关系更密切，国民党党政要员中，也有不少人参加洪门组织。1989 年夏季，洪门成立“社会事业建设促进会”时，台湾“考试院院长”孔德成及国民党社工会副主任陈寿昌均亲自到场致词，国民党党政要员李焕、蒋纬国、林洋港等也纷致花篮祝贺。

1989 年下半年，洪门在高雄公开成立了“洪门高雄联谊会”，“场面热闹非凡，参加聚会的洪门兄弟姊妹有三千人众。”虽然成立大会的全部拜堂仪式，仍然沿用江湖礼仪进行，“执事口念七字诀，以关公等重义之士为崇拜对象”，这一联谊会却是在公开场合以公开的方式进行的，完全丢弃了传统的秘密性质和神秘色彩。再一次说明了台湾洪门活动已得到了当局的许可。

青　帮

罗祖师

说起青帮的起源，有多种传说，且其间往往相互矛盾，漏洞百出，皆因帮会成员口头相传，缺乏原始真实记录所致。因帮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隐秘之中，最多是半公开活动状态，外界很难知晓其内幕。帮中成员又普遍不擅文字，只有少数能写几笔的帮中成员根据从不同渠道得来的传说和记录，编了不少各有特色的“秘笈”。通过这类东西再加上清廷史录，我们可粗知青帮历史的大致起源。

青帮之产生晚于洪门和白莲教，因此关于青帮的历史传说经常与后两者搅在一起。中国历史上的帮会，甚至一些农民起义，都喜欢给自己找些古代圣人作始祖，祖师越多越出名越好，以证明自己是源出正路，而非左道旁门。青帮史集甚至把自己的渊源追到当年一苇渡江、嵩山面壁九年的僧人达摩那里。经过禅宗五祖神光、僧璨、道信、弘忍、慧能而到金碧峰，这才正式和青帮接上了头。

青帮有所谓的“前三祖”和“后三祖”之说。前三祖打头的就是金祖，即金碧峰(名幼孜)，他祖居南京(那时叫应天府)，系麒麟门外金家村人氏。生于元末，是明朝初年进士，明成祖永乐年间，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因见世之无道，官场险恶，辞官隐居栖霞山紫云洞，参悟佛法，深有所得，后又去五台山拜禅宗临济派三十六传鹅头禅师，取法号“清源”，最后死于五台山紫霞洞。

前三祖的第二位的罗清，号静清，甘肃兰州人。此人传人最多，也最有神秘色彩。他道法不凡，妙算玄机，是进士出身。嘉靖年间，把持朝政的奸人严嵩，要想做官非有厚礼送他不可。一时朝纲败坏，有血气的正直之士不愿与之为伍，为避奸臣陷害纷纷自谋出路。这罗祖当年曾官至监察御史户部侍郎。因其不但读得书本，也能舞枪弄棒，曾以都督职务领兵征讨吐鲁番。一次曾陷于绝境，被番兵围困在两狼山下，粮尽三日。忽有一和尚来告，寺后石崖下有清源禅师在明成祖北征辽东时所储存的粮草，结果发现果如其言。全军饱餐后重振声威。大败番兵，番主臣服。罗清班师回朝途经五台山，访金碧峰之遗迹，承其衣钵。然后由根修引到金祖舍利塔下跪拜，成为金碧峰徒弟。后来这种在师父死后拜师的做法被称为“灵前孝祖”，青帮徒辈多有仿效。录前孝祖是有要求的，一是拜的师父要有名气，二是进行灵前孝祖的徒弟要有势力有名气，三是要经过青帮辈份较高的首领一致赞同。话说罗祖拜师后，仍去作官，为政清廉，谨慎小心，可后来仍未逃过严嵩父子之手，入狱十二年。只因万历年间边关吃紧，方才复出，并再立战功。但他已看破红尘，不愿受禄，径去栖霞山紫云洞他师父修练过的地方隐修，了此残生。

前三祖第三位是陆逵，号道元，江苏镇江丹徒人。精于武艺，曾出任江右总兵，明亡后隐居茅山。因慕罗祖师功德，并认准罗祖承接禅宗正传，故往五台山求道，拜罗祖为师，然后四海云游。他曾到新疆、甘肃回民地区，

针对回汉宗教纠纷，屡起事端，即向朝廷提出感化之策，为康熙帝赞许，授以西北宣化法师名号。他赴任西北，订“回汉约法”，规定民族之间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康熙因其功绩，曾许之以官，他因不恋尘世，乞归佛门。后被封为“靖国尊人”，其师罗清被封为“一清佛祖”。晚年陆逵在杭州武林门外宝华山讲经说法，听者甚众……青帮前三祖可说均为佛门中人，这使青帮后来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青帮后三祖的说法较复杂，但人物不外是翁岩、钱坚、潘安三位，说到三人事迹有些出入。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从张岳这个人开始。张岳是淮安人，生于清康熙年间。他自小臂力过人，武艺不凡，生得又有些气派，青年时颇有进取之志。雍正初年他随年羹尧大将军平定青海，因功升为千总，但终为一介武夫，官场混得不行，不得发达。解甲归田后，以教授拳棒为业，手下有徒弟五百多人，在当地很有势力，且人又豪爽义气，深得信任。乾隆十二年间，他的拜把兄弟林锦开设的盐局被一恶霸何义抢去。这何义也算得是当地一个蒋门神、郑屠户一类人物，决不是等闲之辈。林锦斗他不过，遂求张岳为他出气。张岳闻言大怒，心想：一个无赖抢地盘竟抢到我兄弟头上，我张岳还有何面目见父老乡亲。张岳虽武勇，毕竟官场混了多年，有些头脑。他先请林锦告知详情，知何义是本县捕快泥身金刚李得的结拜兄弟，而李得是新任孙知县的亲信，想此事私下和平了结最妥。遂一人会李得，请李劝何义还了盐局。李得说，他当初不知林锦与将军的关系。只因何义初来此地，求他帮忙占据林锦的盐局，就答应了。现在已到县衙备案，许何义开业，生米煮成熟饭，要变过来实无办法。张岳起身道：“我们一起去劝他。”他约了李得一起来到盐局门口。见里面一帮人正在大呼小叫地喝酒，张岳与李得找到何义，由李得介绍了张岳。张岳见何义是粗汉，不用拐弯抹角，马上开言道：“林锦是我兄弟，他的盐局现在你占了，他当然不情愿，但你已经占了，要你让出来也不好办。我出个主意，我和李得担保，帮你在镇上选个好位置再开一所，各自营业，互不相扰，不知尊意如何。”

何义不晓得张岳厉害，加之又喝了点酒，根本没把张岳这个老头放在眼里，二话没说，就要叫手下把张岳赶出盐局。张岳忍无可忍，只两拳便送何义上了西天。张岳原准备为双方说和，这回一时性起，打死了人，就准备好汉做事好汉当，去县里自首，可又被他的高徒翁岩当即劝住。翁岩说：“本县如此昏官，为了此事吃官司万不可行，不如找个地方避一下。”说话间官军已来到门外，别无出路，张岳带领林锦和翁岩，依仗一身武艺，趁夜杀出，逃到徐州绿林人物陈园那里。

陈园生得与宋江一般，黑矮肥胖，是个讲义气有胆识的黑道人物，平时聚众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现见来了诸位英雄，十分欢喜，马上请各位英雄作了头领。张岳本是个天地会头领，他的徒儿翁岩当然也是他的部下。来到陈园这里后，张很快又结纳了天地会的人物钱坚。几位头领商议要联合天地会，作番事业。一次翁岩与钱坚二人负命下山，在安徽安庆巧遇另一天地会道友潘清。三人一见，意气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即结下金兰之契。

有一天，三人正在闲谈，仆人跑进来急报：“有个和尚不待通报，直闯进来。”三人来到中堂，只见一僧相貌古怪，形态龙钟，一见三人，便双手合十为礼道：“恭喜三位，尔等大富大贵的机会到了。”三人莫名其妙，请和尚上坐，这才问来者何人。一听老和尚是大名远扬的罗清佛祖便一起跪拜，请高僧指点迷津。祖师说：“当今皇上悬挂黄榜，征求天下奇才押运粮米。若能肃清运河匪患，保证粮船安全进京，便有重赏。你们与白水村陈园那里的好汉多有关系，若去揭了黄榜，招安了白水村大寨，其余小盗自然不在话下。”三人还未反应过来，罗祖又说：“你们所为之事，贫

僧尽知。我知过去未来,依吾言去揭黄榜,定是富贵双全。否则死无葬身之地。”三人崇拜罗祖,不敢不信其言。遂拜罗祖为师,遵师命去揭黄榜。自此开始有了真正的青帮历史。

青帮后三祖如何揭黄榜,还有另一种说法。还是翁、钱、潘等三人。这翁岩字福亭,江苏常熟人。秀才出身,后弃文习武,在嵩山少林寺拜师学艺,为一豪侠之士。钱坚字福斋,江苏武进人,幼时从父经商,后改习拳术。为人精明,武艺高强。潘清字清宇,号德林,浙江杭州人。承继父母遗产,颇有家资。幼年读书习武,吟诗作画,无有不能,是一个文武全才,且喜交天下好汉,地方上称为“小孟尝”。传说有一天,罗祖在打坐,忽然有异样感觉,掐指一算,断定浙江方向尚有一段未了佛缘。便与陆祖腾云驾雾到杭州艮山门外一桥边落地,在那里住下,施展佛法为人治病,普渡众生。时翁岩与钱坚已是至交,形影不离。一日两人正游青龙山,忽见山下有一茅棚边人来人往,热闹非常。两人心下大异,入内一看。只见罗陆两位祖师仙风道骨,为人看病,手到病除。翁岩五体投地。罗祖知佛缘已到,召二人入内宣讲佛法。翁深为所感,跪求拜师出家。罗祖指陆祖收徒。钱坚开始不愿出家,后见到缘份如此,不能不遵天意,也拜师陆祖。四人一起又到嘉兴,收潘清为三徒弟。三人均不剃度,带发修行,随罗陆二祖去五台山参佛。一日,二祖召三人到洞中,说道:“你们还有一段尘缘未了。现朝廷正张榜招贤,护漕粮入京。你三兄弟可当此大任,从速下山揭榜。”言毕,一阵清风,二祖已无影无踪。三人只好遵师命下山揭榜。

漕运是封建时代的一种制度,即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一部分田赋,经运河运到北京,供统治者和军队所需。青帮后三祖应招护粮后,沿运粮河道的大码头,建立起完整的组织。漕运之量巨大,清代每年所运之粮超过四百万石。从事这个行业的有几十万水手和上万艘粮船。朝廷为管理如此庞大的漕运,特设立一个“漕运总督”。他是一个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角色。带的兵叫“漕标”,也称“卫军”。然后卫下设所,所下有联,联下是帮。一般是卫帮合在一起叫,如“江安卫五十二帮”;或径称帮名,如“光武六帮”等等。但这一套统治组织欺下瞒上,压榨船民,使下层水手生活濒于绝境。因此,秘密结社,保证生存是当时最可行的选择。这种结社还是利用官方旧有的粮帮结构,故一切名称不变。其中势力大,且对青帮日后发展最有影响者是所谓“安庆帮”,青帮历史的早期传说多与此帮有关。这青帮后三祖揭榜护粮后,一时间匪盗不兴,风平浪静,直到乾隆年间,其所运漕粮,从未误过钦限。漕督奏明皇上,准其开帮收徒,直受漕督节制。

翁、钱、潘三人首先联络旧有粮帮组织,组成一个“道友会”。供奉达摩为始祖,金幼孜为第一代祖师,罗清为第二代祖师,陆逵为第三代祖师。翁岩等三人又请教陆祖扩大帮众之事,陆祖以祖传二十四字的字派相授。此二十四字就是:“清静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兴礼,大通悟学。”这里面“清静道”三家已为清源、静清和道元三位祖师所用,正好三辈。真正的帮会用字是从“德”字开始。后来帮中人所称的小祖师王德降,怕徒众日多,二十四字不够用,又续订二十四字,即“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度心回,临持广泰,普门开放,光明乾坤”。实际上,解放前的上海青帮,主要是“大通悟学”四辈,青帮依此形成严密的纵向承启关系。

一切就绪,翁岩、钱坚和潘安三位决定正式立帮,定名为江淮四帮,奉罗清为祖师爷。翁、钱、潘各立一帮,将来看情况再立一帮。当下三人定了三堂、六部,并宣布了二十四字辈。钱坚对着众人把它们解释了一番:“什么叫做和三堂?就是我与潘、翁三人每人兴立一堂。若拜潘清为师,就用潘清堂票布作为入帮之证;拜翁岩为师,就用翁岩堂票布;拜我为师,就用钱坚堂票布。那六部职司也有

区别。引见部专司接待帮之人；传道部是劝导人家入帮；掌布部专管票布；用印部专司打印；司礼部执掌一切入帮典礼；监察部查究同帮兄弟有无不法的事情。那二十四字辈就相当于家谱辈份。代代相承，不能乱了顺序。”钱坚说完，陈园便在大厅上点起两支大红蜡烛，中间放了三把交椅，请翁、钱、潘三人坐下，叩了三个头，陈园于是做了江淮四帮的开山徒弟。当下，三人又各自收了几名徒弟。张岳、林锦因为资格老，没有拜人为师，做了军师。不久，陈园禀明三位师傅，也开始收徒。以后帮会发展日见强大，潘就建议趁陈园收徒之时订立帮规，以便管理，众头领都表示赞成。

到了那一天，罗祖神像前点起抱头香五支。潘清吩咐林锦做引见师，引进五个小喽罗，先向罗祖像叩了三个头，又向三位大头领各叩三个头，然后向自己师傅陈园叩三个头。完了之后，引见师林锦指挥各徒弟，一律向里直立。要每人手执一支香。潘清又请张岳做司礼。张岳随即参赞，喝一声“跪”，那五个新徒弟急忙跪在庙檐下，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执着烟香，不敢稍有声息，一会儿，又有执事人手捧一盆清水出来，自左而右，叫各徒弟各呷了一口，一一嗽口，这叫净口。净口完了之后，陈园忽地站了起来，对五个徒弟问道：“你们今天入帮，是有人教你们，还是有人逼你们，还是自己情愿？入帮并没有好处，不但要遵守十大帮规，还要严于律己，你们一定要知道，做到！”那五个徒弟齐声回答说：“我们入帮是出于自愿，甘受约束，誓守帮规，决不违背祖训。”话间刚落，张岳便高声读出了十条帮规：一不欺师灭祖，二不扰乱帮规，三不藐视前人，四不江湖乱道，五不扒灰放笼，六不引水带线，七不奸盗邪淫，八须有福同享，九须有难同当，十须仁义礼智信。张岳读完后，陈园又对徒弟们说：“入帮之后，若有违反帮规，定当家法处置，绝不饶恕。”五个徒弟又齐声答应：“徒弟牢记。”说罢，张岳将十大帮规和票布发给他们。

后来，江淮四帮又与活跃于皖东的一个道友会及活跃于浙北的嘉海卫帮合流，势力更大了，潘清提议将三帮结合起来，成立一总帮，定名为青帮（也叫清帮）。潘清很会笼络人，无论上中下三等，他都乐于结交。不出数年，他的徒弟便遍布长城以南各地。后来，翁岩、钱坚去青海、蒙古等地朝佛，去而不返，帮务实际上由潘清一人主持。因此，青帮的徒子徒孙大多持“潘清堂”票布。雍正十三年，潘清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帮务由祖师王德降接管。

又过了几十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青帮发生巨变。当起义发展到东南地区时，受战争影响，漕运停止。战后虽有短暂恢复，又因洋务运动兴起，运粮改走海道，漕运很快终结。青帮水手出身者居多，一下没了饭碗，纷纷另寻出路。苏北等地青帮，因靠近海盐产地，多以贩私盐为主，其头领成为盐枭。

青帮历史传说的另一种，涉及洪门，在此也简略一提。红（洪）帮据说历史更早于青帮。它以“反清扶汉”为其宗旨，而青帮护粮是在为清廷做事，两者应为敌人才合常理。早年洪门也确实仇视青帮，痛斥其为“投靠满清”。但青帮后期那些写历史的特别宣传青帮原为反清组织的“真相”，此说虽难有实据可考，但也不能说都是胡说八道。

青帮标榜它的反清宗旨，是以“内应”一说做文章。即将其“安清”口号和替清廷做事说成是“打入敌人内部”，以为将来举事做准备。此一说要追溯到天佑洪这个人。相传康熙五十二年，洪门后五祖相继去世。此时洪门领导人叫苏洪光，传说他曾死而复生，托名与崇祯皇帝一起吊起的王承恩，受神灵之佑，再生转世，名唤天佑洪。天佑洪领导洪门已成大势引起满朝震惊，故全力镇压，洪门活动开始困难，天佑洪想出两招要使洪门摆脱困境，一是给洪门改名为天地会、三合会等等，二是派一部分兄弟假装投靠清廷，作为内应，

发展会众,这一部分负有特殊使命的洪门兄弟成了一个单独的组织——清门。而青帮后三祖的三个人都是奉了天佑洪的密令,假意投靠清廷的。这就又接上了前面此三人揭黄榜那一茬。故帮会中人有“红花”(洪门)、“白藕”(理门)、“青荷叶”(青帮)之说,是谓三教源出一体。

盐枭巨头徐宝山

徐宝山是清末民初两淮及长江流域著名的青帮首领和盐枭头目。上海青帮的兴起，同此人有着非同小可的关系。在民国初期，上海的青帮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个是李徵武领导的湖州帮，一个是徐宝山为首的江北帮。从时间的先后看，最早进入上海经营地盘的是湖州帮，因清末漕运停止后，江北粮帮原在海盐产地，尚有盐业可作，江南粮帮无此便利只好进军当时正进入繁荣期的上海，以求生存。只是由于清末民初时运不佳，迭遭败绩，才被江北帮后来居上，不得不作了二流角色。实际上，上海青帮全盛时最有势力的队伍基本上都与江北徐宝山有渊源关系。

徐宝山是丹徒南门人，生于1866年，其父是一个竹店的老板。徐宝山少年时曾在其父所开的竹店里做生意。15岁时父亲病逝，宝山与母亲及弟弟宝珍一起度日。徐宝山生性放荡，既不愿经商，更不思务农，无人管束后愈是无所顾忌，常游食四方，结交各路豪杰。他身材高大，臂力过人，精于剑术，更擅枪法，双手发枪，百发百中，能够在黑暗中击灭香火。因此，年纪轻轻已在镇江、扬州一带帮会、盐枭中以豪侠闻名。大家都知道他为了"朋友"，不怕得罪官府，不怕触犯法律。可以"两肋插刀"，绰号"徐老虎"。

徐宝山"出道"不久，偶遇京口（今镇江市）驻防旗兵拦路奸污妇女，徐路见不平，拔刀除害。1893年，徐宝山又同顾某等联手抢劫江都县东乡仙女庙。案发后，徐潜回镇江，躲到宝盖山下，被丹徒县主簿张焕文发现擒获。后被县衙惩办，发配甘肃充军。在押解途经山东时，徐宝山瞅准机会，趁夜盗得驿站中骏马逃脱。回来后，藏匿在私盐贩子陶龙雨家中。那时的徐宝山远不像后来那样神气，整日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吃住无着。有时实在无法就睡在土地庙、麦田或芦苇丛中，最艰难的时候，甚至躺在棺材里与死人作伴。为防止官府掌握他的行踪，他想出一个很实用的办法，就是在每次睡觉前，都点着一根香缚在手上，待其烧到手指，爬起来就走。如此折腾，总算没被抓住。熬了几年，最后投奔了盐枭头目孙七。

徐宝山自从投了孙七，慢慢恢复了元气。整日价又想着做点大事，至少也能为孙七的山头立个大功，一来是个进山之礼，二来也显示一下"徐老虎"的本领。当时与孙七为敌的还有另一伙枭匪，以柏某为首领，势力很大，孙七自觉不敌，常避让之。徐宝山觉得就从柏某这里下手最为合适。因此，早已在等待时机。恰巧，这一日，徐宝山在路上与柏某的两个儿子相遇，见这两个恶棍正在掳掠妇女，怒不可遏，上去教训柏某二子，打斗中，柏匪300余人闻讯赶来将徐宝山围住，正在危难之时，孙七率众赶到。已感不支准备败走的徐宝山，陡然胆力倍增，再抖精神返身杀入敌阵，力劈柏氏二子。经此一战，"徐老虎"重新又成为江湖中声名远播的人物。各地闻其声名者纷纷来投，徐宝山开始有了培植自己

势力的资本。最后，他干脆脱离孙七，另树一帜，以武力抢了匪首朱福胜的地盘，占据十二圩和七濠口一带，初步有了自己的队伍和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由此起家。

徐在自己的队伍逐渐壮大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心满意足。与普通小匪不同的是，徐宝山是一个深谋远虑、野心很大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叫有战略眼光。使他始终忧心忡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周围的大小盐枭头目对这个暴发户颇为猜忌和敌视，大家都感到他的威胁，这种感觉的可怕之处在于四邻有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他，叫他徐宝山对所有敌人同时开战，那真是吉凶难卜；二是徐宝山的势力已在当地首屈一指，所谓树大招风，官府一旦派兵来剿，胜负也难预料。徐宝山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看出要与官军和众匪抗衡并要得到不断发展，不能简单地招兵买马，兵要招好兵，马要找骏马。他深知自己部下全是一勇之夫，只见眼前小利，并无大志。且自己的手下，组织松散，更非大队官军敌手。他们农忙时回家种田，农闲时结伙贩盐。一旦官兵大队来袭，便四散回家，官兵去后，则又啸聚如故，对官府而言，此是匪患难除。但对徐宝山的“宏伟目标”来说，则实在是个不利因素。因此，他与谋士们反复商讨，权衡利弊，深觉只有联络当时势力强大的洪门，才能利用洪门组织搞起一支层次更高的武装。

徐宝山本来应算是正宗的青帮首领，属于比“大”字辈高一辈的“礼”字辈。他听说泰州城内有个洪门首领任春山，便立即带领其心腹，秘密赶到泰州去同任结交，要与其合作，共图大业。时逢任春山正在泰州相机发展组织，以算命为公开职业，联络会众。两人一拍即合，结为异姓兄弟。结果是任春山介绍徐宝山加入洪门，徐宝山介绍任春山加入青帮。两人决定合开洪门山头，以两名字中各取一字作为山名曰之“春宝山”。两人为并列山主，徐的部下自然就成了洪门兄弟。

徐宝山此举可谓一箭三雕。首先，他实现了“整军经武”提高自己队伍素质的愿意。洪门纪律原来就较青帮严明，一经加入洪门，用洪门纪律约束队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整个队伍的组织性就得到了提高。另外，促成战斗力提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当时清政府对帮会的镇压政策，凡加入帮会者，均一律处死。但由于青帮一直标榜“安清”，官府对青帮分子一般并不深究。而洪门一直以“反满”为旗帜，清政府对其成员是务必要从严惩处。故徐一进洪门，其手下便没了退路，只有听徐的指挥冲锋陷阵，否则被开革，便只剩下死路一条。

其次，任春山同徐宝山结拜，徐的跨帮地位，使青洪两帮兄弟都聚集门下。另外洪门大旗更招引四方豪杰，加之工于心计的徐宝山善于经营，很快形成以徐宝山为中心的核心集团。这就是徐后来发达的资本。

再次，青洪联合，减少了过去相互之间的相互仇杀，避免了两败俱伤，本身也为帮会中人所欢迎。这样的“善举”当然功劳也主要记在首倡联合的徐宝山头上。同时，徐宝山还不断制定一些深得人心的新举措，以博得好感。徐宝山的方法是恩威并施，既要有宋江式的义气，又要有“大义灭亲”的决断。平时他出手大方，不为小利而伤了兄弟之情，徒众有难，无论尊卑定然全力相救，使会众均感他义气深重，可为其效犬马之劳而不悔。另一方面，他利用洪门帮规严办对帮会不忠之人，以树立自己的威信。比如，一次任春山派帮中几个小头目去几个码头接运私盐。当各处盐船集中通过关卡时，因这几个人大意，未事先与官兵联络，买通关节，结果动了真刀真枪。往常贩盐，虽也有防卫准备，但并没想真的动手，这次玩真格的，这几位当然不是对手，逃了性命也都是老天保佑，哪里还顾得上盐船。他们知道失风逃走有犯帮规，如果回去，必然要被治罪。几个人当下一合计，决定干脆流落江湖，专在长江轮船上做些偷鸡摸狗的营生混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山头上发

现这几个人迟迟不归,也无一消息,忙派人下山打探,方知其详。宝山听得,怒不可遏,定要抓这几个违反帮规者回山严办。终于,有一天几个人正在长江轮上搞他们的"生意",被下山巡风的同帮兄弟当场拿住,押解回山。

这一日,徐宝山脸色铁青,端坐堂前。他开口问道:"帮规的第三条,你们还记得吗?"几位知道今日不能善了,话已说不拢,但还答道:"第三条是临阵脱逃者斩。"徐冷笑一声道:"帮规第六条也没忘吧?"这帮规第六条是:"吞没水头者斩。这几个哪还敢说。徐怒道:"既然你们知道帮规,为何临阵脱逃,又在长江轮私做差使,吞没水头,如今已被拿来,更有何说?"因其中一人是徐故交,徐怕众人出来求情,不待众人说话,徐宝山即叫手下人动手。次日,徐将此事通告全帮兄弟,并称今后一律以帮规为准,违者按律处罚。自此以后,徐的手下见他执法严厉,不论亲疏,知其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不敢轻易搞些小动作。因此徐在帮中地位直线上升,实际上已掌握了全权。

徐宝山扩大影响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利用帮会的经济实力,努力改变盐枭的匪盗形象,形成有利的影响和群众基础。当时,徐宝山提议,把所贩私盐每船抽两包或四包,储为赈济之资。然后,用这笔资金,冬天给穷人散发衣粥,大灾年景,救灾济民。这样一来,徐在当地及苏北一带颇著声名,造成一种救世济民而又有实力的一方之主的形象,吸引了一批很有才干的人来投奔他。

盐城当时有个武秀才,叫杨瑞文,是个人物。他既精武艺,也颇有儒雅之风,粗通文墨。后来有一次结伴进省赶考,按惯例可携带免税批盐作为旅资。后当三江营缉私官兵查问时,发现其所携超过规定限度。双方冲突,杨依仗习武出身,发起狠来,一怒打死两名官兵,闯下大祸,逼上梁山,投到徐宝山门下。那时,类似情况投来的还有后面要提到的张仁奎等人。这些人比起普通青帮徒众,确实高出一截。无论是知识水平、武功、军事素养还是看问题的眼光等都是徐的老班底所不能比的。这些人既能出谋划策,本身又是独当一面的干将,不少人后来成为上海青帮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徐宝山派系进入全盛时期,徒众达数万,并拥有一支包括700多艘走私船的船队。其活动范围从江阴往西到汉口、大通、芜湖乃至江西等地的长江两岸,三江口、西马大桥、七濠、十二圩等地的两淮线也是徐部的势力范围。这时的徐宝山已是这一广大地区帮会的总头目。徐宝山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很有些政治头脑。他的眼光已超出苏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全国政局也有独到见解。比如,他在戊戌变法兴起时,曾说过"光绪皇帝太怕洋人,是个庸弱的人"这样的话。此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光绪二十六年正月间,有两个自称是康有为同党的人,到七濠口与徐密谈。声称听说徐宝山是个做大事业的英雄,所以前来相邀,如有此意,可即随他们去广东面见康有为,那边提供经费和军火。徐宝山当然不能随便行动,他不拒绝,也不急于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而是虚张声势。因此,他马上打发心腹干将郑大发随二人前去广东探听虚实。郑大发等人还在广东,徐宝山便又作出姿态。他给江苏巡抚鹿传霖寄去一封信和一纸告示。信中指责鹿坐视荣禄、西太后囚禁光绪帝,不知主忧臣辱之义。声称"仆具有天良,不忍坐视皇上罹戾太子之威,已定于秋间整我六师,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枭奸宄。"那张告示写得更是气势汹汹,自称"两江两湖兵马大元帅徐,""奉光绪皇密诏",要号召两湖两江豪杰之士,遵旨行事。并告"约于本年秋间,听候本帅军令,即率本部人马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

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此处大有文章。第一点徐宝山现为洪门山主,不提"反清"口号,开口"囚我圣皇",闭口"救我圣主",并且

全部行动是由光绪密诏而所为，俨然一副忠臣义士之形。第二点是更有深意的，徐声言的出兵日期在半年之后，这是演给朝廷看的，既是打招呼，又是要挟。

清朝的官员们有许多人已看出些苗头，当徐宝山表露“蠢蠢欲动之意”后，镇江及苏北地区士绅、官僚纷纷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力陈招抚徐宝山的必要性。光绪二十六年5月2日，张謇向刘坤一上“招抚徐老虎策”，并建议招安徐部后，专令其镇缉沿江诸匪。经刘坤一授意，当地一知名人士陈重庆约徐的代表密谈，徐接受招安，并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赦罪，二是赏官，三是收编其部下。接着，刘坤一等人举行正式仪式，招抚徐宝山，并命令他将部众编为新胜缉私营，由徐亲任管带，驻守扬州。

清廷此举实际上帮了徐宝山大忙，因为清朝官吏们不知帮会内情。因“春宝山”自创立起，一直打着洪门旗号，但实权握在徐宝山手上。洪门兄弟一直把“春宝山”认作洪门，按洪门规矩行事。由于历史上两派仇见甚深，时间一长，矛盾重又暴露出来。虽然洪门旧部仍尊任春山为首领，但头领中以蔡金标最有威望，在帮中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据说蔡与革命党有联系，思想倾向革命，有组织能力，也有一些见识。故他虽也尊徐宝山为大哥，实际上对徐内心不服，加上徐为私利、不择手段的小人作风，这样，“春宝山”已自分成两股势力：一是洪门旧人，自号“清水光棍”；另一股是徐的势力“浑水光棍”。徐宝山认为蔡是他独霸山头的主要威胁，早想除之。最后用刺杀手段杀蔡金标，接着又杀刺客以灭口，但这类事一般是包不住的，慢慢帮中人都知道了事情真相。蔡手下有一批心腹和忠于他的兄弟，当然不能放过徐宝山，要杀徐为蔡报仇。徐宝山虽已有些力量，但终日要防范势力广大的洪门徒众，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正在苦思之间，清廷的招安让他得到解脱，甚至还扩大了他的影响。

故此，徐宝山“归标”后，自然对清廷感恩戴德，甘效犬马之劳。当时任春山幸好先得到徐降清的消息，悄然离去，躲过此难后不知所终。“春宝山”之外洪门各部因徐宝山降清，并风闻徐逼杀任春山及其他种种危及洪门兄弟的行径，便严令帮众不准与徐宝山及其手下来往，并宣布永远不许再提起“春宝山”这三个字，否则以背叛洪门论处。青洪两帮有了这段事由，一下子又回到敌对状态。徐宝山也一心投靠清廷，替清王朝出力，镇压异帮，与盐枭匪盗为敌。徐宝山自小在帮会和盐枭中活动，亲历其间，当然对江淮一带地理民情、帮会内幕、匪盗行踪等了如指掌，他本人手上又握有江淮地区最大的一支土匪武装，如今反戈一击，自然比官军追剿有效得多。几年之间，连破大案，连诛巨凶。他降清不久，立的第一件大功便是设计擒住了他的旧日相好、著名女匪白寡妇。接着，又进兵剿灭当年他落魄时曾救过他的陶龙雨的亲属陶龙翔匪部。到1910年他又消灭专劫官盐船的土匪王正国部和著名匪首王狮子匪部。几年下来，盐枭、土匪遍地的江淮一带被他整治得服服贴贴，民间士绅一片赞扬之声。官府因此提升徐宝山为帮统，并作了清军统领王有宏的副手。

这时候，清政府已摇摇欲坠，全国反清浪潮不断高涨。徐宝山又开始为将来筹划。善于投机的徐宝山首先同驻守镇江的新军管带林述庆（同盟会员）拉上关系，并与驻扎在清浦的江北督练蒋雁行打招呼。辛亥革命一爆发，1911年11月3日，徐找同盟会员林述庆和李竟成谈判，经过一番交涉，李竟成发现徐宝山是他的远房亲戚，就约徐起义，徐立即答应。但称等时局稍定，不愿为官，需稍沾利益。双方条件谈妥，徐即表示愿派兵保护起义领导机关。他还利用革命之机，扩编队伍，把自己手下的队伍从1000多人一下扩到20000多人。凭这些资本，徐军被南京政府编为扬州第二军，徐充任军长。他手下的帮

会头领，成为其军中骨干。这样，徐的军队也就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颇有特色的、以帮会联系为主体的军队。

投机革命成功，使徐宝山的政治势力、社会影响和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其野心也随之膨胀。进而要过问全国政局。1912 年 3 月，南北议和，本来极力主张建都南京的徐宝山，突然又改口为袁世凯帮腔，支持建都北京，为了靠拢袁世凯，他极力迎合袁的“统一治权”的主张。4 月 19 日他致电袁世凯，称大局已定，全国统一，他徐宝山愿意率先取消扬州军政分府，以为统一倡。徐宝山的这个全国“首倡之举”，正是袁氏所求之不得的，袁自然对此深为赞许。1913 年春，袁世凯同革命党人的矛盾日益激化，冲突已不可避免。扬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发动讨袁，必先取扬州。得了扬州，便可北上进取徐州，若出师不利，尚有退守长江一路可走。故扬州不可失，失则败局立定。为此，宋教仁案发生以后，国民党人在最后关头仍极力争取徐宝山，使人劝徐反袁，但徐自恃拥兵两万，雄踞江淮，不想办不保险的事，因此对来人不予理会，照旧按他的保袁方针行事。甚至接受袁的贿赂 25 万元。为使袁相信其诚意，徐将儿子送到北京作人质，并公开表示必要时武力保袁。如此，除掉徐宝山，是国民党人的惟一选择。

主持刺杀徐宝山的据说是陈其美。当时徐本人还蒙在鼓里。有人告诉消息时，他自信手下亲随众多，本人又武艺高强，故对此一笑置之，毫不在意。他垄断两淮盐场，又经多年为官搜刮，财大气粗，到处求购古玩。当时，他派两名古董商携 5 万元巨款去沪觅购名瓷“美人霁”古瓶，该古董商二人打听到某商保存此瓶，便写信给徐。不料此信为陈其美手下截得，当即将一枚炸弹装入一精美木盒内，派人将信及木盒送到扬州。1913 年 5 月 23 日晚，东西送到，因徐睡下，便放在书桌上。次日晨，徐与其两手下同来欣赏他的“宝贝”。他的手下怕弄坏花瓶，不敢用力，徐恼了，推开他人，自己亲自下手，结果一声巨响，徐宝山双手折断，血肉模糊，待众人赶到时，徐命已归天。话说这徐宝山一死，群龙无首，军心动摇，众人推 宝山之弟宝珍继任。但帮会组织是以首领个人威望和权势来维系的，压台人物一死，便没有了当年的战斗力。另外，袁世凯也不愿让地方土皇帝过分膨胀势力。徐宝山死后，袁世凯将其队伍一再缩编。徐部在“二次革命”中最后溃散，其手下精华人物转而去上海混世界，是为江北帮大规模进入上海的开始。

湖州帮刺杀宋教仁

宋教仁案是民国初期震惊中外的一桩大案,也民青帮参与的几桩最重大的政治性行动之一。刺杀宋教仁的主使者是袁世凯,而执行的杀手是上海的著名青帮分子应桂馨和其结拜兄弟武士英。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成果后表现出的独裁野心,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觉得必须有所行动。宋教仁意欲建立"责任内阁",以约束袁世凯。当时宋教仁对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很有信心,他首先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接着领导国民党争取国会的多数席位,由于同盟会在革命中表现的政治影响,结果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得近半数票。宋教仁大有出马组阁,当国务总理的势头。袁世凯也知道,宋教仁是国民党核心人物,所以早已准备下手,欲除宋教仁。

宋教仁以理事长身份周游江中下游各省后,踌躇满志,决心登程北上一展鸿图。宋在杭州发表了竞选演说,到上海与诸位同仁协商后,就准备出发。当时有人头脑比较清醒,劝其要注意安全。宋当时心绪正佳,听不进去,哈哈一笑说道:"吾此行为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陈其美甚至已对他明言:"小心他们用暗杀手段来对付你。"宋的回答就更豪迈了:"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搞暗杀,哪里还怕他们来搞暗杀。"他不听于佑任劝告,不走海道,坚持乘火车北上。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半左右,宋教仁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佑任、吴铁城等陪同下,来到上海沪宁车站检票口。突然,宋身后窜出一条汉子向其连发三枪,转眼间刺客即逃走。枪声响过,宋大叫"我中枪矣",仆倒在前面的栏杆上。众人急上前送他去铁路医院急救。虽经多方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次日晨不幸身亡。陈其美抱尸恸哭,连呼:"此事真不甘心!"国民党人更是痛感"斯人如此死,吾党复何言"。孙中山的挽联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陈其美之不甘心,是有实际行动的。他首先与黄兴一起致函公共租界总巡捕卜罗斯,请求他们破案,并宣布若彻清全案,则赏银一万元。陈分析此案必有政治背景,指使最可能是北京方面。他通过电报局局长吴佩璜(是陈派支做情报工作的),找出北京方面与上海可疑人物往来电报,有了初步线索。

实际上,在案发的次日上午,两个四川籍学生向国民党上海总部报告,他们所住的五马路宝善街鹿野旅馆一名叫武士英的客人行踪诡秘,十分可疑。特别是最近,这个自称是无业退伍军官的人,突然暴富,扬言事成后还有千元可得。20日晚此人未回旅馆,21日晨匆匆结账离去。国民党即派人往查,结果一无所获。

直到23日下午,一自称为古董商的王阿法到工部局巡捕房报告:一星期前他售字画到小西门外应桂馨家,应出示照片说要干掉

一人,说若能办到,酬洋1000元,他未答应。现在发现各报所登宋教仁照片正与应所持照片相同,故特来报告。开始租界方面以证据不足,不同意马上逮捕应桂馨。但国民党方面一再要求,加之此案已为社会各界所注意,出些差错,不好收拾,于是与国民党特派代表一起,将正在湖北路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家中饮酒作乐的应桂馨抓获,关押在英租界捕房。

第二天,押解应桂馨去其家中搜查。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查出关键证据,当场搜出两箱文件和电报,证明应受袁世凯和赵秉钧指使,谋杀宋教仁。同时还找到一支白朗宁手枪,枪内剩下的两发子弹,验明与刺宋所用子弹属同一类型。当时在应家一下拘捕27人,其中一个黑矮的男人,神色不对,巡捕当即找人前来指认,正是刺杀宋的凶手武士英。武在证据面前完全崩溃,供认不讳,此案真相大白。这件总统杀议员的奇闻一下子轰动全国。

刺宋案是民国第一大案,此事之所以帮会卷入如此之深,与帮会的性质和帮会当时的现状有关。帮会原本是一种反社会的力量,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一点早期洪门也许是个例外。因此,帮会根据其受到危害或保护的情势,决定其暂时倾向于哪一边,故极易成为受人利用的政治工具。青帮分子在刺宋案中,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的表现,就是明证。

在辛亥革命中,帮会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曾帮助革命党进行一系列重要的军事、政治活动。但新政权建立后,在一个较稳定的时期,帮会的消极方面无法为革命党所接受,因此许多地方对帮会采取了镇压措施。这引起帮中人物的不满,认为简单是过河拆桥。这种情绪极易为袁世凯方面所利用。所以北京方面找帮会分子作杀手不是没有道理的。

刺杀宋教仁,青帮这头的联络人和主持者主要是应桂馨。他是浙江宁波人。事件发生那年他正好50岁。此人父亲是个商人,发迹以后,转而经营地产。后与洋人做生意,不久成为当地一个大富翁。应桂馨从小长在这样的人家,明白不少"作人的道理",如巧取豪夺,勾结官府,狂嫖滥赌等等。他年龄不大,在当地已颇有名气。他父亲由于经常以不正当手段夺取别人土地,害怕别人找麻烦,因此出万元,让儿子认上海县道台作了干爹。从此应桂馨更是无恶不作。

清末上海帮会最出名的人物中,数得着范高头。此人原名赵阿宝,原是个撑船的苦力。他自恃人高马大,最爱帮人打架。洋人的铁甲火轮当时很神气,在中国内河横冲直撞。有一回,一外轮在黄浦江中撞沉一艘满载驳船,外轮竟不当回事,开足马力就走。当时许多中国小船靠上去,要找外轮算账。但外轮是铁甲,马力又大,根本拦不住。正当外轮由于速度太快,就要撞上另一艘中国船时,赵大叫一声,举起碗口粗的竹篙,死命一撑,外轮船身一歪,中国船避过此难。这时外轮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撑而慌了手脚,连忙停了下来。中国船工趁机上船与洋人交涉,终于使洋人认输赔偿。此事传开后,"范高头"之名开始叫响,他的原名反而被人忘了。

范高头成名后,不再满足于靠撑船吃饭。当时沿江一带许多人都靠偷盗洋人船上的货物发财。范利用自己的名气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把小偷小摸变成整批整船的"大偷大摸"。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将给外国货轮装货卸货的中国船故意弄沉,再利用黑夜把货物捞上来,然后拿出去倒卖。当然,那时赚钱的买卖是鸦片,故运鸦片的船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后来范的生意发展到从偷鸦片,到贩鸦片,再到开烟馆卖鸦片的一个大的集团。手下有数千人,成为威震上海滩的一霸。

应桂馨与帮会搭上关系,以认识范高头开始。当时有个祥园烟馆是范所开。应整天泡在那里,因此与范结识,很快就成了范高头最得力的助手,两人一起走私贩毒,大发横

财。后来,应桂馨为扩大势力,出重金作了洪门的一个首领,又拜湖州帮李徵五为师,排"大"字辈。

时间不长,范高头在江苏海门与巡江缉私营开战,杀死丁勇被官府通缉。开始范依靠党羽掩护,躲过一段时间。后来官府用重金买通同党林得胜,设计将范拿获正法。范做下大案后,其党羽均为官府捉拿对象。应因为发财,不愿出外流亡,花钱捐了一个候补知县,投到江苏督练公所总办袁树勋门下。应很会办事,又相貌堂堂,特别难得的是他还能说几句英语,很为袁赏识。不料,应不久就暴露出一个花花公子的本来面目,使袁极为失望。那时袁为帮助他,破格委任他为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并批给5000两官银作为开办费。谁知他等钱一到,立即花天酒地,整日不务正业,待银子花完,觉得无法交待,竟一走了之。

说到应桂馨后来如何参加了革命,还有一段趣事。应桂馨从袁树勋那里跑出来之后,先到河南,最后被迫逃到乡间暂避,其父怕他再到外面胡闹,给了他5万银元,叫他在宁波办个学堂。但应这种人实在也不是办教育的料,不久有3000族人告他强夺族祠公产。正闹得不可收拾时,该校教务主任因事来上海,碰到好友陈其美谈到此事。陈其美那里正在发展革命组织,对帮会人员极为注意。陈得知应在会党中有影响,便有意结识,遂出面为之调解。应由此十分感激,一时两人相交甚密。

应跟随陈其美投入革命后,非常卖力。他利用自己身在帮会,手里有些得力干将的优势,具体参与了一些重要活动,光复上海之战中,他亲自率敢死队,攻打制造局。因此,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特委应桂馨为谍报科长。后来孙中山来上海,应直接负责接待,由于应会办事,也很机灵,孙中山印象不错,任临时大总统时,特任命应为卫队司令,并令其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尽管应桂馨已混迹官场,但多年在黑社会中养成的流氓习气一时难改。他经常为一些小事寻衅闹事,甚至动刀动枪,所以虽几次做官,但每次都官运不畅。这回又是如此,本来他已取得孙中山信任,前途有望,可时间一长,便忍不住把江湖上的那一套又拿出来。开始,他对孙中山由广东来访的亲朋故友还较客气,后来人来得多了,他时常恶语相向。孙中山对此并未深究,又因其为陈其美介绍,也不便说就让他回家,仅将其改调下关兵站任职。谁料应桂馨竟不买账,无理取闹要将他从上海带来的卫士带走。卫士的直接上司(时应已改任政府庶务长)侍从队长郭汉章不愿回上海,应桂馨竟找了几个亲信,让他们杀害郭汉章。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孙中山只好打发他回了上海。

应回到上海后竭力投机钻营,抓住新老政权交替时的机会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希望能成为与他党抗衡的政治势力。应自然要依靠帮会的力量,因为在这方面他最有根底。当时上海青帮、洪门和公口正酝酿联合建立一个政党,应积极促成,终于在1912年7月由三家联合组成了"中华民国共进会"。这是上海帮会的第一个联合政团,也是由帮会组织到公开性团体的开始。应桂馨因名声大,又号称在临时政府中任过要职,并为新团体出了一笔开办费,很自然地当上了会长。

应桂馨搞了共进会,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只是一种招兵买马的手段,他也并不是从事政治活动的料。他到处串连,扩大会众,主要兴趣就是搞暗杀。湖北张振武被黎元洪所害,张妻曾出价2万元,找杀手为夫报仇。应桂馨想干,还没得手,就被黎元洪得知,遂下令通缉。应慌忙逃回上海后,又组织了一个暗杀队。这个暗杀队被袁世凯听说了,袁打好主意,首先招呼各方,取消通缉令,然后由内阁总理赵秉均派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出面,召应桂馨北上进京。对应桂馨的接待应该说规格很高,甚至大总统袁世凯和总理

赵秉均都亲自召见了他。洪述祖是青帮“大”字辈，为人颇有心计，他说通了应桂馨后，立即与应共同南下。首先，让江苏都督程德全任命应桂馨为驻沪巡查长，给大洋5万元作经费，并答应每月再给3000元。最后谈判结果是：袁世凯、赵秉均允诺“毁宋酬勋位”，并答应以当时发行的公债350万元优惠价卖给应桂馨，使其可净得200万元。谈妥以后，应允诺尽快履行刺宋诺言。应桂馨马上物色武士英做杀手，策划杀宋，这就是刺宋案的背景。

只可惜宋教仁至死也没明白谁是杀他的凶手，仍对“大总统”抱有希望。他在医院抢救中还向黄兴口授一封给袁世凯的信，原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午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启。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被奸人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致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力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竟力保障民权，使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被刺案真相大白后，孙中山先生对当时中国形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次在陈其美家里，他说：“他(指宋教仁)实际死在袁世凯手中。今后的斗争，是官僚与民党的斗争。过去我看错了袁世凯，是我的过错。现在袁世凯想使专制死灰复燃，辜负国民付托，必须起兵反袁，将他除去。”

关于刺宋内幕还有一种说法不能不在此一提。据说当年袁世凯派洪述祖来沪时，首先是找了上海青帮湖州帮的巨头李徵五。李当时的两个高徒，一个是应桂馨，一个是张宗昌，当下李就选择了他认为最合适的应桂馨，介绍给洪述祖。同时，因李徵五已得知宋教仁与陈其美因权利之争而矛盾激化，他想到还可用刺宋一事再作一笔交易，就又跑到陈其美那里拍胸脯担保他将刺宋拥陈，代价是50万元和一支手枪。陈答应条件，很快将钱、枪送到。案发后，陈先布置手下设法取回枪支，然后将应桂馨捉拿归案。李徵五原想万一事情败露还可把陈其美推出，现在眼看就要弄到他的头上，赶紧将武士英杀了灭口。据史料载，武士英暴死狱中，死因是偶感风寒，殊为可疑。应桂馨越狱逃走，后为袁世凯雇人刺杀。从此，刺宋案证据确凿之真凶已身亡，袁大总统又无法捉拿归案，只能了结此案。几年后，李徵五为报一箭之仇，派其另一高徒刺杀了陈其美，这位高徒正是后来的大军阀张宗昌。

这种传说并无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也没有真凭实据，完全根据一些表面现象和政坛传闻，又加上陈其美也是青帮李徵五系统中的人物，与李有深交，于是此事似乎颇为可信。人们一联想到陈其美曾使人刺杀光复会巨子陶成章，就觉得此一说法也有可能。但如果我们纵观陈其美的政治生涯和其革命活动，并考察当时国民党内部矛盾的真实情况，就不能不对此说法提出疑问。

张仁奎了断风流案

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产生了一批被称为“大亨”的帮会分子。他们公开的身份是“党政要人”、“社会名流”，参与并控制社会政治生活，甚至利用帮会势力左右政局，制造经济风潮。当时无论文人政客还是工商巨子都不能不借助青帮的势力。旧上海青帮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然首推“三大亨”，即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可以说，从20年代开始，上海青帮的历史就是此三人的历史，因为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都与他们有紧密的联系，或者说他们三人就是这些事件的总导演。故本书辟专章“沪上闻人”，此不赘述。

但这个时期确实是青帮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可说是“人才辈出”，成名人物还有不少，奇闻轶事无可计数。限于篇幅，本章仅择其一二而概述之。

除“三大亨”之外，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要首推张仁奎。张的名气不在于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由他在帮中的辈份、他的历史以及他的那些“出色”的徒弟造成的。张仁奎是山东大汉，号锦湖，是上海青帮中少有的几个“大”字辈之一。来上海之前，他曾在徐宝山手下担任过扬州第二军步兵二十四旅旅长，后来还做了大官，任通海镇守使。1927年，他的部队被打垮，向北伐军投降，他本人丢了兵权，便逃到上海去做寓公。青帮的早期组织中，响马匪盗、毒贩盐枭之类人物占绝大多数，普通帮会成员多是下层贫民或农民、水手等，头领则多是所谓黑道出身。像张仁奎这样当过旅长，又曾镇守一境地方的“大人物”，在帮会中可说是凤毛麟角。所以帮会徒众心中对张仁奎的尊重远超过对“三大亨”的尊重。当各帮会头面人物之间、帮会与军人与政客集团之间发生矛盾时，几乎总是要找“张老太爷”(帮中人对他的称呼)出面调解。他的角色有点像大家族中的族长，凭德高望重解决家族内外的纠纷。

张仁奎也不是完全凭老资格吃饭的，因为在青帮中，光靠资格是不行的。要想站住脚，还得有实力。张仁奎对实力有另一番独特的看法，就是重收徒的“质量”，可能这一点是从他过去的上司徐宝山那儿学来的。张有地位，决不屑于与社会上的“小混混”以及地痞流氓之类为伍。故虽然张收徒数量可观，据说有三万人之多，但其层次也颇高，这些徒子徒孙给他撑足了门面。下面我们列举张的几位“高徒”，就可看出张之收徒的规格是很“讲究的”，大军阀韩复榘，蒋鼎文，朱绍良；大资本家、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陈光甫，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中央造币厂厂长韦敬周；大买办中国旅行社总经理陈香涛；以及政客、文人、交通部次长韦以黻，汪伪政权外交部长夏奇峰，宣传部长林柏生。军统分子淞沪警备区稽查处长陶一珊，《时事新报》总经理张竹平等等。甚至青帮大亨杜月笙也只能“屈尊”做了他的徒孙。杜月笙的师傅叫陈世昌，是青帮“通”字辈，他的老师也姓陈，为苏州大字

辈陈彪。陈彪除辈份高外，一无所有，收的徒弟都没什么大出息。早年陈世昌拜师后，自己在上海闯江湖，以制作兜售鸦片烟杆子谋生。后来在街头玩点小本钱赌博的把戏，骗些小钱糊口。后生晚辈杜月笙等出名后，师傅也叫响了。陈世昌觉得陈彪与他现在的名头不配，又改拜张仁奎为师，这样杜月笙就成了张仁奎的徒孙。

张仁奎收的徒弟看起来似乎比他更有名、更有势、更有钱，可这些人为什么会拜他作老头子呢？这里有多种原因，像军阀韩复榘这样的人，主要想利用帮会特有的内聚力控制部队，更重要的，士兵为龙头大哥打仗和为长官打其勇敢精神差别很大，所以军阀多喜与帮会结缘得到好处。当年韩复榘由葛光庭介绍准备拜张仁奎为师，有人问葛："韩将军有权有势，为什么要拜现已无权无势的张仁奎为师?"葛的回答颇有深意，他说，加人帮会很要紧。当年大帅左宗棠出兵新疆，军至平凉，忽然三军勒马不前。左忙问何故，众军答曰要暂住一日迎接大龙头。左帅治军之严，威望之高是出了名的，官兵甘冒军法，要去迎接大龙头，可见大龙头之要紧。左帅从此深知利害，很快也拜了老头子，将士们与其关系则更进一层。韩是冯玉祥的部下，连冯玉祥也玩这一套，韩有何说，等一旦拜了张老太爷为师，韩就可以自开香堂，自立门户了。

拜张仁奎为师者有各色人等，目的也不一样，有钱的多是因怕人抢劫或敲竹杠，拜张作为保护神。还有一种人财大气粗，终日在风月场中鬼混，惹出风流韵事又怕流氓敲诈，就找张作为靠山。张仁奎在上海滩出面了结了几起这类事件，一下子更提高了他的名声，青帮内外都知道张老太爷确实极有能量。下面几件事是张仁奎扬名上海滩的几件"得意之作"。

当年上海银行金融业有个极著名的大亨叫朱成章，是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国货银行是上海数得着的大银行，而上海又是当时全国乃至亚洲的金融中心，这朱总经理腰里的硬通货当然少不了。人一有钱，就容易招来麻烦。朱成章虽是混世界的大人物，知道各方土地不可轻易得罪，但财大气粗，胆子也就大了。他自认有钱，关系多、名气大，谁也不敢随便找他的麻烦。对于帮会之类，他常对手下人说，你们不要听他们瞎传，没有那么厉害。真是像传说的那样有办法，为什么不也来当当总经理，靠几个小瘪三能成什么大气候。朱成章万万没有想到日后他的命会丧在这些"小瘪三"手下。

1929 年，朱成章想建些房子出租，但找不到合适的地皮盖房。后来有人介绍他认识了静安寺主持，他就打上了庙产的主意。开始，朱成章怕不好说，找人代为传说给老和尚，希望他能让出这块宝地。谁知当家和尚竟一口应允，经过讨价还价，事情就敲定了。也是朱成章命该如此，正当他办好一切手续并向地政局登记时，半路杀出个张啸林，也看中了这块宝地。张是在别人家里的一次宴会上听说静安寺有地，位置不错，价钱也好。他马上派人去静安寺。不料当家和尚告诉来人地已卖出。张啸林觉得这块地特别理想，听说别人已买走，立即就想法子要把它弄回来。当时张啸林和黄金荣、杜月笙已结拜兄弟，在上海滩可说是路路通，没有办不到的事。他当即向寺里管事的表示，我多出点钱，只要你答应把地皮让给我，朱成章那边我去说。

出家人是有些规矩的，完全靠钱在这里不见得可行。老和尚看到张啸林很霸道，根本不想与他沾上边，就推辞说："出家之人，办事要凭良心、信义。地皮已答应给朱成章，实在不能另许他人。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张啸林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但见老和尚如此说，也不好再坚持，叙谈一会，即告辞出来。现在剩下来的办法只有直接找朱成章，叫他出个价钱把地让出来。

第二天，张啸林亲自到朱成章家里拜访，很客气地对朱说他特别喜欢朱总经理已买下

的这块地，反复说他愿意出个好价钱，决不让朱总经理白忙活一场。朱成章当时哪里想到帮会中人如何厉害，又见张啸林举止粗俗，全无“高等华人”气派，更加看他不起。但张啸林毕竟是在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家里，又确实想要这块地，忍住气没发作。朱成章心下也不想得罪黑道人物，只是以银行董事会已经商定，他个人无权私自更改为由，婉言拒绝了张的要求。张啸林虽是帮会头领，有无数不怕死的徒弟，但一直不想来硬的，因为总是公开买下来省事些，面子上也好看。没想到朱成章就是不让步。张啸林见软的不行，只好使出看家本领，桌子一拍道：“请侬朱总经理去打听打听，我姓张的在上海滩谈生意，就是阎王爷也得让我三分，你今天不卖我这个面子，好！改日有你的好果子吃。”说罢拂袖而去。

朱成章想，看这个小子能有什么大本事，只不过说几句大话出出气罢了，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朱成章已计划在静安寺破土动工，前面那些事也早已淡忘。由于工程刚开始，诸事繁多，朱成章身体有些顶不住。一天早晨起来，他略感身体不适。娇妻劝他卧床休息，同时派人去请洋医生。可朱总理事先已安排了公事，要去银行与某大人物谈一笔生意，不去不行。夫妻俩商量一阵，决定让私人护士邓小组陪同，先去医院检查一下，拿点好药，然后再去银行办事。有护士小姐陪同，凡事也有个照应。再说护士小姐也确实有些本事，虽然年龄跟朱大经理的女儿相似，但社交场上是个人物。青春少女，豆蔻年华，又会迷人，自是万种风情。虽然到朱家才几个月，但已成实际上的总经理秘书，整天与总经理形影不离，虽说还没有将朱妻取而代之，但朱家人上下很多事都要看她的眼色。这护士小姐每日给朱总经理推拿、按摩，推到什么程度，按出什么结果，连府下人心里都一清二楚。

话说朱成章的汽车从愚园路朱公馆开出后，朱大经理忽然声称他感到腹部胀痛，边捂肚子边把身子趁势靠在护士小姐身上，头也正好枕在这位小姐玉面与粉颈之间。护士小姐开始为朱成章治疗，无非是推拿按摩之类，当然效果非常之好，朱总经理已渐入梦境。

汽车里正在做着好梦，外面却有惊人的事件发生。汽车在飞速行驶间，突然路边窜出两名大汉，拦住轿车的去路。司机一见拦车的手里拿枪，就知来者不善，准备加大油门硬冲，把截车人吓退，使主人免遭绑架。绑匪知道有钱人的司机都是学过两下子的，不先治住，就无法对后面的朱成章下手。所以一见司机开车想逃，便连发数枪。不料因车速太高，歪打正着，子弹钻进了朱总经理的肚子，护士小姐一声尖叫顿时晕了过去。司机一慌，车速就慢下来了，两大汉手拉车门逼司机停下车，一边一个把浑身是血的朱成章架下车来，推推搡搡地把朱成章架到一辆事先准备好的轿车上，一溜烟儿没了踪影。

司机虽是有些武功，但还从来没见过这阵势。半晌才回过神来，连忙关了车门，调转车头，开往朱府报信。朱太太一听开始倒还能沉住气，当了这么多年总经理的夫人，总还有些见识。当下通知银行中朱的亲信来府商议对策，并叫下人将护士小姐送到医院，因护士小姐也不幸为经理大人挡了一颗子弹。朱夫人正想向警察局报案，突然客厅中电话铃声响了。朱太太刚拿起电话，就听一人粗声命令：“叫朱太太听电话。”朱太太一听就明白这是绑票的来要价了，忙应道：“我是呀，你是哪一位？”

对方传过来的声音又急又狠：“朱太太，你想明白点，如果你不打算做寡妇的话，立即准备50万来赎你先生。交钱的时间地点我们到时通知国货银行。要是你拖延时间，不肯交钱，那你就等着收尸吧！”

朱太太一听这话，腿也软了，胸口直跳，一时没了主意，一帮家人也跟着大呼小叫，乱作一团。还是朱成章的几个心腹接到朱夫人

的电话，及时赶到，急忙布置人去筹款，并派专人在银行守电话。一直到晚饭时间，银行守电话的才接到通知，叫携款前去赎人。朱家立即派车去了指定地点。到了一片荒郊野地，对方来人点验钱款后，准备上车，车已发动时，才扔下一纸条，上写“由此向南 500 米稻田中”。手下人抬着担架、医疗用品往南直奔过去，见总经理躺在地上，满身血污，早已不省人事。朱太太算松了一口气，朱太太虽说对破财也有点心痛，然而钱财身外之物总可以再赚回来，只要总经理有救，钱不在话下。但朱太太万万没想到，丈夫已经奄奄一息，真是连留遗言也没有能力了。她原来听司机说，总经理被架走尚能说话，伤并不太重，没想到人已经成了这样。大概是司机当时已吓呆了，看别人架着总经理，还以为总经理尚可以走路，故以为伤不重。实际上，事后经医院检查，朱成章虽腹部中弹，但伤不至死。只要及时抢救，原无大碍。只是张啸林手下一整天根本没有采取有效的救护措施，失血太多。以朱太太的想法，他丈夫本来伤不太重，匪徒只为要钱，肯定不愿意弄出人命，只要适当抢救，不至危及生命。谁想会是这种情形。朱成章被送往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抢救，上海医界外科专家数名亲往手术，但终因时间耽误过久，当晚便气绝身亡。

总经理一死，国货银行整个笼罩着一片不祥气氛。大小职员、经理们倒不是悲痛，而是害怕，真悲痛的也许只有朱成章的女儿和太太。手下人只是担心他们总经理手上的那张威胁的纸条，如果黑道人物真要把纸条上的话当真，他们就将小命难保。朱太太悲痛一阵之后，也开始着手接管银行业务，因人心惶惶，总经理又突然死去，银行业务已出现危机。朱太太原来并不知道张啸林与丈夫的那段过节，因为当时朱成章根本没把那当回事，所以也就没向夫人汇报。朱太太只是觉得这事可疑，不像是一般的敲诈钱财。她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专门与朱成章的那些亲信谈及此事，想看看朱家到底跟谁结了仇。别人就谈起了一个多月前张啸林要买地这件事。朱太太一听就明白了，花钱雇人一打听，果然是张啸林手下干的。

朱太太一想，招惹了这个魔头，银行别想好好办下去了。如果他一会儿绑了这个，一会儿杀了那个，谁还敢在国货银行做事，银行有多少钱经得起这样的折腾，便决心找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她的心腹中有人熟悉黑道人物，就提议说，要想把国货银行办下去，就只能采取黑吃黑的对策，也拉拢上一个黑道人物做靠山，按时进贡，张啸林的手下就不敢随便来找麻烦了。

主意有了，下面就是找谁做靠山的问题，知情者就告诉说现在上海青帮中辈份最高、影响最大的就是张仁奎“张老太爷”。拜此人为师，即可为“通”字辈，辈份较高，且身份也不低，因张为官多年，从前是大人物，故拜他最为理想。因此，国货银行的高级职员纷纷托人去找张仁奎，拜张为徒。其他金融界的大亨，因有了朱成章的前车之鉴，也纷纷投到张仁奎门下，张仁奎有了越来越多的有名徒弟，声望日高，在上海滩说话更加有份量。这样一来，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拜其为师。

1935 年春天，张的徒众在新利查饭店聚餐，很多人提议组织上海“仁社俱乐部”，以谋团结互助，并使团体有正式的社会法人地位。“仁社”是取张仁奎的一个“仁”字，且这字本身意思不错，最后张仁奎表示同意。过了些日子，张的几位徒弟张罗，在福煦路 383 号买了一所房子。此房原是孙科一帮广东同乡的俱乐部，里边的家俱一应俱全，连房子一起一同被“仁社”出价买下，共花几十两黄金，都由几位有钱的徒弟支付了。这一点体现了青帮义气互助的传统精神。“仁社”在社会局备案，并很快得到市长吴铁城批准。吴也是张仁奎的门生。可见当时青帮在上海的势力之大。“仁社”成立后，发展迅速，与黄金荣的“荣社”，杜月笙的“恒社”，鼎足而立，成为上

海帮会中最有势力的三个团体之一。

张仁奎的总经理一级的徒弟还有很多，其加入青帮的过程也与朱成章的部属们类似，总是因为自己或与己有关的别人惹了事，找到张老太爷那里要求保护，然后投帖入帮。如上海银行业第一号大亨商业银行总经理兼上海银行业公会会长陈光甫也是惹了麻烦后，投到张仁奎门下的。不过他的麻烦是风流韵事，与朱成章买卖上的事有些不同。有钱的大银行家，终日鼓捣票子，绞尽脑汁，空闲下来就总想跑到花街柳巷去鬼混。他们虽然钱财万贯，可钱只能买些虚情假意，光去风月场中寻开心，也觉得太没意思。他们想换换层次，于是办公室里就出现了花枝招展的女秘书，家里就请艳丽风流的女护士，陈老板经过严格挑选，也聘用一名私人女护士，当然声称此为贵体健康之所需。陈总经理这位护士也姓陈。陈小姐之父为一小商，为人精明，很会筹算，其女自然也聪明过人，一般男人无论如何挣扎也难离其股掌之间。自从进入陈府以后，颇有大将风度，指挥若定。陈总经理很自然地上了轨道，接受她的科学护理。她一到陈府，便按照科学方法制定一张时间表，每天要对她的病人进行两次全面检查，一会儿吃药，一会儿量血压，出现在总经理办公室和卧室的频率决不少于每十分钟一次。每天早晨陈小姐要根据气温决定总经理今天的穿着，而且是必须执行。陈总经理稍有异议，她小嘴一噘便道："将来看谁来管你！"俨然一位未来夫人的口气。陈总经理一听，哪里还能抗辩，只有言听计从。

时光如飞，转眼几个月过去了。那位整天在外打麻将、经常深夜不归的陈夫人还蒙在鼓里，这边她的地盘已被一位小姐占了。护士小姐晚上也不下班，变成全日制工作。现在轮到陈小姐"病"了，慢慢地病状在外部显露出来，陈先生可治不了这种"病"。然而不治又不行，陈大总经理整天愁眉不展，苦无良方。护士小姐到底更专业一点，为解燃眉之急，开出很有水平的两张"药方"：一是与陈总经理公开结婚，明媒正娶，并且陈必须与原妻离婚；二是传统方式——堕胎。陈总经理当然对后一药方完全赞成，而且陈小姐也答应可从此一刀两断。可是药价太高，要 10 万元，没这些钱此药决不可行。

陈总经理毕竟是个商人，凡事讲究经济效益。收入支出需得相抵才能保本。他略一盘算，深觉这桩生意亏本太大，有种在商业场上被骗了的味道。他从前有过不下数十个这种女人，总共也没花到这价钱。这个小护士一张口就要 10 万，以为我陈某人没见过世面，竟班门弄斧来敲竹杠。他决定先给女护士一笔小钱，再到公司安排了闲职，一来可继续相好，二来也花费不高，经济上划算。他想一个小护士一定好哄，给点甜头，再许上几个愿，比如将来如何如何，此事即可了结。退一步想万一那小丫头不干，闹将起来，我陈光甫这等人物找个关系反告她个乱敲竹杠，花点钱，一混也能过关。

一日中午，陈总经理把护士小姐叫到楼上卧室。他原以为陈小姐会哭哭啼啼，然后他甜言蜜语一灌，便大功告成。哪知这位平时娇滴滴的小姐，不待他把话说完，就踢翻了椅子，指着陈光甫的鼻子说道："陈大经理，你张开眼珠子看看清楚，老娘是什么人。老实告诉侬，高鑫宝是我师父。今朝你要是不痛快交出 10 万元赔偿费，看我老头子勿摆平你才怪呢！"

陈总经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比朱成章要识相。虽不知这高鑫宝是何方人士，但起码知道招徒弟的人肯定不是善主，明白这一关不是轻易过得了的。陈光甫盘算，先探探虚实再说，不能贸然行事。女护士一走，他就派人去打听高鑫宝是个什么人物。还没等手下人回报，女护士的师傅就找上门来了。高没有亲自出马，派了个小头目来到陈府。进门大咧咧地往沙发上一坐发话道："喂！陈老板，我师傅叫我传话给你，两条件你自己考

虑，三天后若不满足我师姐条件，就给你点颜色看看！”颜色当然是红色，这意思是要放点血。这陈总经理钱是不少，血可并不比别人多，如何舍得随便让别人放。他终日坐卧不安，不想对策三天后可不得了。好在有朱成章走在前面，他也听说朱的高级职员现在都是张仁奎的徒弟，猛然想起这是一条路。于是找人引见，并备了厚礼，往见张老太爷。张仁奎听了陈光甫一番述说，朗声笑道：“小事一桩，你不必担心，我去跟高鑫宝打招呼，你现在入了帮，没人再敢来找你的麻烦。”

张仁奎是个有身份的人，他一般不用恐吓的办法对付小字辈，也不是动不动就要给谁三刀六洞。张知道高鑫宝是杜月笙的同乡，又是杜手下的得力干将，如果找到杜月笙说一下，高肯定也就不能说什么了。但张仁奎干事总是有板有眼，他不能光凭一面之词，就去压服另一方。如果他总是靠权威去压人，而不是合理地解决问题，那他在帮中的形象就不会那么好。再说张仁奎也还赏识高鑫宝。虽说高是个粗人，但天不怕地不怕，敢为自己的徒弟出头，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所以张仁奎想此事最好能公平地解决，即使陈光甫过关，又使高鑫宝有面子，另外也能给陈小姐一点补偿。

张仁奎于是叫人喊高鑫宝来见他。高是通字辈，见了师叔把此事来龙去脉一讲，张就明白了事情原委。所以说服高不要再闹，他已知理在高的一方，此事由他作主解决。他叫陈亲送 10000 块钱到他家里，当面把钱转交陈小姐，并为双方说和，就这样顺利地了断了一桩风流案。

张仁奎办事公道，有风度、有气派。他从不随意向其门生要这要那，不像黄金荣他们那样以做寿为名向徒弟收礼。门生孝敬他，以“自愿”为准，有钱的就多送些，没钱的就少送些，他从不计较。蒋介石对张仁奎也很尊重。1936 年，在“八·一三”日军侵华前，蒋介石据军统密报，得悉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有反蒋的想法，但不愿武力解决，且当时蒋正与红军作战，又有日本人大举侵华的苗头，不想四面出击。蒋介石早年与青帮关系很深，因此知韩复榘和手下的几位高级军官都是张仁奎的徒弟，遂托张的门生当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和交通银行董事长、张的好友钱新之请仁奎去南京见面，商讨如何解决山东问题。张仁奎先生觉得此事与己关系重大，便决定去南京见蒋。蒋得到消息，非常高兴，派专列去上海接张，并亲自在中山陵官邸门口迎接。蒋按照青帮规矩，称张仁奎“张老太爷”。蒋介石与张谈了近三个小时，谈当时中国形势，谈解决山东问题各种方法的利弊，最后亲自请张仁奎去山东，说服韩复榘放弃反蒋意图，以免战祸，对国家和双方都有益。蒋还答应如果韩听从劝告，将为韩拨款以示诚意。张仁奎认为这样解决可行，答应去山东劝说韩复榘，蒋又派专车送张去山东。

山东将领多为张仁奎门徒，听说老太爷到来，齐集车站迎接张仁奎。韩复榘已知张的来意，但他自恃拥兵十万，又有整个山东作为依托，有力量与蒋对抗一阵。他想蒋之重兵仍在“剿共”前线，一时无力调兵山东，现在反蒋正是时机，所以在内心不赞成张仁奎的意见。然而，青帮讲究尊师重道，又不便直接反对，所以请了他手下的师长们相议此事。这些师长都是张的徒弟，对张很尊重。同时觉得张仁奎分析得有道理，一起来劝韩谨慎从事。这时，张又找韩，以利害说之。让其明白以十万之师对百万之众，以一省之物力财力对全国之政权，则必败无疑。韩见还未动作，手下干将已无信心，此事难成。只好听从张仁奎的劝告。为张仁奎山东之行的功劳，蒋介石一直十分感激。抗战开始后，蒋劝张仁奎一同西迁，张因年老未去。在敌占区他拒绝敌伪劝诱，托病不出。抗战末期，他病死上海。蒋特以重庆政府名义下令表扬。

苏北大亨发家史

人有时候真想不到哪天能碰上好运，碰上一回，也许让你终生受用无穷。说起顾竹轩这人，当年只是个拉黄包车的，没啥大出息，除力气大点，别无所长，他鼻子稍大，人称“顾大鼻子”。顾竹轩自小没过什么好日子，小小年纪就到上海混饭吃。

有一年英租界巡捕房招考华人巡捕，要求只有一项，就是要块头大。顾竹轩正合适。没多久，顾竹轩因工作卖力，被提拔当了小头头。他最恨别人欺负苏北人，遇到苏北同乡有困难，他都要拼死相助。正是由于他总是护着同乡，一次正宗上海人与他的老乡械斗，他利用职权帮忙，被人告到他的上司那里，很快他就丢了饭碗。后经同乡介绍，拉起了黄包车，当时他未曾想到日后有一天能时来运转，成为上海滩威震四方的帮会巨头。

那一年夏天，天热得出奇。顾竹轩拉了一位客人去一家剧院，放下车，就在树荫下坐着打瞌睡，听到旁边乱哄哄一群人不知在干什么，揉揉眼睛一看，见路边人行道上躺着一个老头，老头脸色很不好，看来可能是天热走远路中暑了。老人在跟周围人述说着什么，表情很绝望。顾竹轩还要拉车挣钱，没有时间多管闲事。他正准备再去剧院，突然听到老人说的是苏北话，这一下顾竹轩来了情绪，放下车跑过去看个究竟。

他拍拍老人的肩膀说：“你遇到什么事，仔细说给我们听听，看我们大家能不能帮你。”老人一听顾竹轩也是苏北口音，一下子眼泪就淌了下来。他断断续续的说起他如何千辛万苦从苏北到上海，原来老家有人在上海，答应来接他去找他大儿子顾祝同。但不知带信的人出了什么差错，下船没碰到一个熟人。他又不知道地方，也不知儿子住在哪儿，瞎摸瞎撞，钱和儿子地址装在包里，包也给人偷了。从下船到现在快一天了，饭也没吃上，请大伙帮帮忙。说着又哭起来。

顾竹轩当然知道顾祝同是谁，但开始也没当真，因为眼前这老头无论如何也难跟顾祝同拉到一起，他想可能是同名同姓。顾竹轩有点侠义心肠，他答应帮忙就得有个结果，不能撇下老人就走。他对身边几个年轻人说：“大伙帮忙把老爹爹扶到我的车上。”又转身对老人说：“老爹爹，别着急，我一定帮你找到儿子。你现在身体弱，先到我那里住下，我再帮你去打听。”

顾竹轩把车子拉得飞快，回到家就搀老人进屋坐下。他光棍一个，家里只有一张破床，两把椅子。顾竹轩赶紧去隔壁邻居要了一碗开水让老人喝。看老人精神好点了，就扶老人躺下，然后跑到外面小饭馆买了一些吃的，让老人先吃着，他自己连忙去找他的那些小兄弟，让他们分头在苏北人居住区打听有没有叫顾祝同的。顾竹轩那时已加入了青帮，拜刘登阶为师。刘登阶牌子不响，却是一个“大”字辈人物，所以顾竹轩有一帮小兄弟。两天过去了，没打听到一点眉目。老人急，顾竹轩也急。他想，如果没有一点线索瞎找，好

比大海捞针，终究不是个办法。这天下午，顾竹轩没出去拉车，在外面买了一瓶酒，又买了些熟食凉菜，摆在门外树荫下，与老人一块谈天拉家常。平时顾要挣钱，早出晚归，没有多少时间同老人聊天，这酒一喝，俩人话匣子都打开了。老人把自己的家世和儿子的情况都给顾竹轩说了，顾竹轩这才明白老人的儿子正是那个大人物顾祝同。一拍脑袋连说："糊涂，糊涂。"其实老人平时也说了不少他儿子的事，只是顾竹轩没敢往高处想，因此这耳进那耳出。明白了老人是何许人，问题就简单了。顾竹轩马上就打听到顾祝同的住址，回来后他准备了一些菜，又请老人喝酒，说他的一朋友已打听到他儿子的住处，明天他先去看看，设法找人通报进去，再回来送他过去。老人一听很高兴，也觉得这个年轻人安排有道理，因为就这样直接去，看门的不知底细，不一定会让他们进去。

第二天，顾请了一个稍有点身份的朋友，也是帮会中兄弟，他自己扮作亲随，来到顾公馆。见到顾的副官，没说什么递上一封信，请他转交顾长官。信中只简单提到顾长官父亲已到上海，现暂住同乡家中，并写了详细地址。顾竹轩有个计较，他不愿日后那人觉得他想巴结高官，迫不急待。而且在江湖上，帮别人一点小忙，就想别人报答是很不义的行为。他与朋友去送完信，就自己拉车去干活了，此后几天都一直住在另一个朋友家。

顾祝同接到信，立即派人去接他老爹来府，不在话下。第二天，老人给儿子详细谈了此次来上海经过，当然顾竹轩的名字也输进了顾长官的脑袋。顾祝同觉得此人讲义气，颇有好感，有心帮助他，老人也一再要他派人去找顾竹轩一起来府一叙。可是派人去了几次均未找到，问邻居，都说好多天未见回来，这更增加了顾祝同对他的好感。顾祝同这样的人物，平时有多少人像苍绳一样往上沾，而眼下这人不但不往上靠，反而躲，所以顾祝同更要找到顾竹轩。顾祝同派人打听，终于找到顾竹轩。由他爹带着侍卫副官亲自来请顾竹轩。顾竹轩那天坐在屋里眼皮直跳，正不知是福是祸，看见外面那么气派的一辆小汽车开到，心想大福大贵的日子要开始了。遂穿戴整齐，随车前往顾府。

到了顾家，顾竹轩于席间表现还算得体。他到上海时间不短了，已有些见识，谈吐很有分寸。顾祝同想帮他在军中谋个差事，可顾竹轩考虑自己混社会这么长时间了，受不了军中约束，想依靠顾长官支持搞点自己熟悉的行业，赚钱挣点资本，再干大事。所以当顾祝同的老爹问他将来打算时，他就说想开一个车行，做个小老板，出租黄包车。这当然是小意思，不久顾竹轩的车行就开业了，包车行也就成了日后顾竹轩干大事业的资本。现在他终于有了点身份，就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拜了青帮另一支派的有名望的首领曹焕智为师，后开香堂，广收门徒，渐渐地成了上海青帮中仅次于三大亨的、能控制各种黑道买卖的大头目。抗战胜利后，"苏北大亨"顾竹轩在上海滩的地位更是直线上升，连黄金荣和杜月笙这些人也不敢随便碰他。

顾竹轩的车行因有人支持，发展很快。他觉得光做一种生意难成大事，就是上海的所有黄包车都归了他，也算不上真正的大亨。他一直打主意要开辟另一块天地。一天下午，他去利达饭店会客，与客人同在饭店餐厅吃饭。当顾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发现桌旁多了一个女人，约二十六七岁，年轻少妇颇有风度。客人介绍说是他一个朋友的前妻，在此巧遇。顾竹轩虽认识不少女人，可这少妇的风度还是把他镇住了。倒是这位女士老练成熟，几句话把顾竹轩抬得轻飘飘，然后一声"拜拜"，少妇迈着颇艺术的步点，咯噔咯噔走了。顾竹轩待少妇一走，回过神来，忙问客人这少妇究是何人。客人当然要讨好顾老板，把此女身世描述一番。顾竹轩当晚便鼓足勇气找上门去，如此一来二去，两人成了相好。这是顾竹轩一生中第二次好运气。

这少妇是个有钱有貌有本事的人物。她对顾竹轩敢打敢冲的好汉风格很欣赏，自己又有经营产业的经验，很快使车行生意扩大到整个上海。她一直劝顾竹轩眼光放远些，要做大生意。顾也赞同，只是一时还无机会进入其他行业。

这一天，顾竹轩遇到一个朋友，此人是个巡警，专管南京路一带茶楼、戏院。两人多日未见，提议找个地方喝两杯。两人边饮边谈，顾谈了他有再干其他行业的意思，那巡警当时就说："兄弟，你别急，我帮你想个好主意。你看黄金荣他们开戏馆很来钱，你为什么不能开一个。"顾竹轩听了当即摇头道："你别说胡话了，南京路这一带是寸土万金，买地造房要好多万，我开个车行，到哪儿弄这么多钱。"他的朋友挡住他的话头，胸脯一拍说道："对朋友我决不胡说，现在丹桂斜对面有块地，是公董局圈了的，现在他们想卖。我想办法保证几千块就能买下来，你放心。"

朋友看出他是因缺钱为难，所以犹犹豫豫，就干脆径直找到顾的相好，即那个少妇，那女人完全赞成，拿出积蓄，把地买下了。不久，一座很有气派的大剧院盖了起来，顾请人给剧院起了名叫"天蟾舞台"。

戏院一开张，因为地段好，经营也不错，一下子发了财。正当顾竹轩财运亨通，准备要大干一场的时候，黄金荣派人请他去，开口就对他说："你那个天蟾舞台恐怕保不住了。"开始顾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不料黄金荣接着说道："你们剧院附近有个永安公司，对吧？他们想要你这块地方盖大楼。这公司在英国注册，公董局准备出价收这块地皮。租界是洋人作主，我们也无力帮你。"

顾竹轩一听就凉了，心想好不容易有点大搞头了，又碰上这等倒霉事。满面愁容来到他的相好那里，一迭声地说："完了，完了。"谁知他的相好样子倒满开心。她在顾竹轩额上戳了一指头开导他道："你这人可真没见过世面，地是你的，别人要买就买？"顾很沮丧地说："永安公司后台是英国总领事，我跟他们斗，还不是个输。"那位少妇很有主意，说道："理在你这一边，大不了上法庭打官司。洋人的法庭是认理不认人，就是伦敦市长没理也不一定能打赢官司。"这一下顾竹轩来了勇气，当场表示要拼老本打赢这场官司，争这口气。决心已定，俩人商议去请上海滩与洋人最有关系、又最不怕洋人的虞洽卿老先生出面为他们请几位洋律师，准备就绪后，一状告到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

领事馆这批人原是永安公司后台，当然向着公董局。几天后批文下来，说什么该地原系公董局产业，现在应由双方协议备价赎回。顾请问他的洋律师穆安素，这是什么意思。洋律师告诉他，他如果愿意接受此项裁决，公董局将赔偿他的地皮价款，但不能包括地上建筑，上面建筑由顾先生自行处理。顾竹轩一听就火了："不管地上建筑，难道我能把房子搬走？真是欺人太甚！"不过这一回倒逼得顾竹轩背水一战非得把官司打下去。穆安素是职业律师，他希望顾竹轩把官司打赢，一是可得一笔可观的酬金，再则也可提高自己的名望。因为中国人与洋人打官司，历来总是洋人胜诉，他若打赢这场官司，就开了一个先例。他告诉顾竹轩，总领事无权最终裁决，他的裁决要有大使或公使一级批示，才能生效。若公使裁决结果你仍不服，还可告到伦敦大法院，那里才是最终裁决的地方。不过他补充说："如果官司打到伦敦，将只能用外币付费，花费很大。您若决心把官司打到底，我愿意为您效劳，请您考虑一下告诉我。"

顾竹轩能在上海滩立住脚根，靠的就是一种狠劲，他已经横了心，倾家荡产也要把官司打到底。从穆安素那里出来，他直奔阿德哥虞洽卿家里请教。虞洽卿鼓励他道："竹轩，这官司到这份儿上，只能进不能退，一退连你的地皮钱也拿不着了。这次你敢把状告到北京，告到伦敦，已是租界中轰动的大事，涉及国际视听，英国人现在不能乱来。这件

事我仔细想过，你合理合法。外国人司法不受行政指挥，我帮你造舆论，这官司很大可能会赢。”

顾竹轩随即正式向北京英国公使上诉。公使早已听说了这桩案子。他觉得真要闹到伦敦去，舆论上对英国人太不利，不如派人私下调解为好，况且此事英国人不占理，闹得越大越没什么好处。他电告上海领事馆，要求他们派人与顾竹轩协商，争取劝顾谦让，给予一定的补偿。领事馆与公董局商议后，派了一个洋董事来找顾竹轩，还想强词夺理为公董局开脱。顾竹轩有了些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胆气越来越壮，他明确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一是不让，也不要任何赔偿；二是若一定要让，必须在市中心建一座三层楼的大戏院作为赔偿。此两条若不接受，就要把官司继续打下去。洋董事一看顾竹轩不好对付，就想吓唬他一下，“据我的经验，将来的裁决恐怕很难满足你的要求，我劝你还是三思而行！”顾竹轩吃软不吃硬，一听这话火就上来了，大声道：“我顾某不在乎倾家荡产，大不了再做个穷光蛋。这场官司我要打到底，决不退让！”

一下子状纸又飞到伦敦。这些天顾竹轩心里七上八下，在等待命运的裁决。因为只要一败诉，顾就一无所有，多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一连几个月过去，杳无音讯。这一天他已不抱任何希望，准备另找出路。请了帮他买地的那个巡警在家中吃饭，商议将来的去向。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是他相好的声音：“竹轩，好消息，你快到我这来。”说完就把电话放了。顾竹轩摸不着头脑，驱车来到她家，进门见他的心上人眼里含着泪，手里拿着一张纸，吓了一跳，搞不清是福是祸。这当口儿，标准的仿宋体映入他的眼帘：“顾竹轩先生，您的上诉经本院终审裁定，公董局违约拆迁不合法，应赔偿损失费 10 万元，由您另择新址，重新修建天蟾舞台。”顾竹轩一下子把他的相好抱起来，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原来他的相好出身世家，上面有人，正式通知未到，已托人搞到了裁决书的中文副本。这场前所未有的洋官司终于打赢了，顾竹轩在上海一下子家喻户晓。

顾竹轩并不总是有好运气，他也有倒霉的时候。他一生中最不露脸的一次是栽在了黄金荣手里，蹲了半年大狱。

原来在上海滩演京剧的场所，就数黄金荣的共舞台和黄金大戏院有名，黄金荣在黄楚九死后还接管了“大世界”游艺场，成为上海娱乐行业的霸主。后来杀出个顾竹轩，搞了天蟾舞台等几处戏院，都很红火，且顾竹轩占码头根本也不看黄金荣脸色，黄早就想找机会收拾这个“苏北大亨”了。

顾竹轩早年创业时，有个好朋友苏北同乡唐嘉鹏，顾与唐还多少有点亲戚关系。他们都是青帮兄弟。顾竹轩开设天蟾舞台时，唐嘉鹏为他到处奔走，出力不少。戏院建成后，顾觉得唐虽能干，但搞戏院经营不适合，仅给唐当了个稽查，唐十分不满，一气之下，又投拜到黄金荣门下为徒。唐在黄金荣手下干得卖力，他为黄金荣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绑架尹启忱的儿子。尹是苏北人，同顾竹轩家有姻亲关系，其时在上海做寓公。顾竹轩在此事发生后与唐嘉鹏矛盾更深。

唐嘉鹏因干了几件漂亮活，很得黄金荣器重，后来黄金荣委任他做了“大世界”游乐场的经理。唐当上经理后，不可一世，利益独吞，目中无人，引起了帮中其他人的嫉恨。当时黄金荣的徒弟分两帮，一帮以唐嘉鹏为首，另一帮以陈荣生为首。黄把大世界经理职位交结给唐嘉鹏，陈很恼火，就跑到老板黄金荣那里打小报告，说唐嘉鹏对师傅的儿媳妇李志清有不良企图。不料此事被唐嘉鹏听说了，一怒之下，派人将陈荣生暗杀在天蟾舞台后门。陈荣生的师弟许福保为陈荣生报仇，也将唐嘉鹏暗杀，地点也是天蟾舞台，不过这次是前门。

事情发生后，黄金荣并不为唐之死惋惜，

因唐当了经理后太得意，得罪人太多，又风闻与李志清有染，黄金荣早就想把他给撤了。黄金荣几位谋士出主意可用唐之死治一下顾竹轩，黄金荣觉得也是个机会，就通过租界巡捕房抓了顾竹轩拘留审查。理由有三点：一是唐嘉鹏死在顾竹轩的天蟾舞台门口，且两人过去矛盾很深；二是许福保杀唐前曾去找过顾竹轩；三是杀人凶手也是苏北人。开始，法院判顾竹轩入狱一年后，顾的家人和徒弟纷纷上诉，告初审判决证据不足，最后，国民党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确定无罪释放，所以顾竹轩只蹲了近半年班房，黄金荣在初审后这段时间，也觉得事情有点做得太过分，又收了顾竹轩徒弟的厚礼，在上边进行疏通，终审判决才免了顾竹轩半年牢狱之苦。

老太爷收徒开香堂

青帮的规矩不像洪门那样严格,对外也不像洪门那样防范森严。这是因为青帮早期就不是一种被严格查禁的政治组织,其帮会的基本宗旨没有很强的政治性。青帮的基本宗旨是:"义气团结,互帮互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青帮组织中有所谓"十大帮规"和"十戒条"之类,若人人真能遵守这些帮规,那真成为大善人了。实际上,青帮在早期阶段,对帮规还看得较重。后来,在上海青帮大发展时期,由于帮会成员的成分复杂,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严格执行帮规已经不可能了,大家也就看得淡了。比如黄金荣,连是否加入过青帮都没有搞清,就大收徒弟,真使人啼笑皆非。青帮历史上,有许多江湖黑话、暗语、"切口",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用帮中特有的语言相互问询。例如家中来了客人,只要来客把帽子朝上(代表船),用手绢(代表锚)往帽子上搭便知是否要求在此吃住。如果手绢全搭进帽内,这就告诉对方,不必准备吃住,坐一会就走;若将手绢一端搭在帽檐上,另一端搭在桌面上,表示"下锚",即今天不走了。

青帮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的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收徒仪式,即所谓上"香堂"。投奔青帮,有两道手续。第一步是上小香堂,拜师父做门生,算是预备考察阶段,这一阶段大约三到五年。青帮后期对考核不太看重了,自然这个阶段就大大缩短,又有些高官或文化人加入青帮都各有目的,一直就只是门生,故更无所谓考察。要做门生较简单,若你要拜某人为师,只需找该师傅两位徒弟做介绍人,由他们向师父推荐,师父同意后,就择时机搞一个小小的仪式,这就是上小香堂。在上小香堂前,要先写一个拜门帖子,帖子格式固定。大致如下:

门生×××,××岁,由××、××介绍,自愿拜在×××公麾下为徒,终身聆训,听候驱策。

帖子写好后,备上一份礼物,由介绍人领到师父家拜门。面见师父要一跪三叩首。然后入座由师父问几个问题,无非是家庭、个人背景之类。这时司仪在佛堂上燃烛焚香,拜师者要上佛堂向祖师爷行大礼,面向如来佛三跪九叩首。接着由司仪带领,向引见的师兄行大礼,仪式就算完成。最后,作为礼节,新入门的徒弟将由司仪领着去拜见师母,也是行一跪三叩的大礼。

上过小香堂的人,才刚刚入门,叫作"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这时的师父还不传授帮规海底,初入门者对帮会内部还了解不深。但只要上过小香堂,就被帮中其他人认做自家人,帮中称"家里人"。同一个师父的徒弟之间称为"同参兄弟",对帮外则称之为"空子"。

一个门生,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师父认为门生可靠,考察合格,便准许门生上大香堂,正式履行收徒仪式,这时才算是真正的青帮弟子,可以称"徒弟"了。但开大香堂正式收

徒,这入帮的第二步程序较复杂,花费也很高,不能经常举行,只是有了合适机会,并同时有一批门生正式入帮时才举行。

开香堂不是公开庆典,不论在清代还是民国时期,一般都不公开举行,总是选择较僻静之处和夜深人静之时。

开香堂招收徒弟时,必须有三个师父,一是“本门师”,也就是徒弟要拜的老头子,另一个是“引进师”,即介绍人,还有一个叫“传教师”,负责主持整个仪式,并传授帮规。上香堂有一个规定,就是上述三个师父所谓“帮口”必须有所不同,换句话说,三个师父要属于不同的帮口。帮口的涵义是这样的:早期粮帮,按归口分为三十六帮半,每帮拥有自己的船队,象征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帮名再按“江淮”、“兴武”等各由一排到十二,形成所谓“江淮四”、“兴武六”各帮口。在开香堂时,有一项仪式是三个师父分别交待自己的帮口和三代姓名籍贯,因三个师父不属同帮,故称“三帮九代”。这“三帮九代”加上“十大帮规”是徒弟们必须熟记在心的。

为了清楚说明上大香堂的过程,这里根据史料,大致描述1935年张仁奎办的一次大香堂。大约是1935年春天,张仁奎决定搞一次上大香堂的仪式。提前一个月,张的门徒已着手准备。开大香堂前十天左右,张老太爷在各省的徒弟和门生都陆续赶到上海来参加盛会。所有的门生和徒弟自然不能空着手,都备有贺礼,按通例一律送钱。按能力大小,多者千元,少的十元。这些礼物,都充做开大香堂的费用。

大香堂就在张府举行,来参加的有徒众数百人,像韩复榘、黄琪翔等外省大人物均委托同参兄弟代表送礼参加。上海青帮名人黄金荣、陈世昌、杨虎等于晚八时都来到范园张府。一般说,开香堂时,除了三位师父和投师的人外,其他人若参加,都称做“赶香堂”。来者多属于前往捧场道贺,即所谓“帮场架势”的,大多数是开香堂老头子的故交;或虽无交情,但因某种考虑特别邀请来的,也有不请自来的想拉关系的。所以,上海青帮巨头开香堂往往各色人物云集。

香堂正中悬挂着罗祖画像,供桌上从左到右依次是钱祖、翁祖、潘祖之神位,神位前供干果四包,荤素菜八件。在门外设有“陈四小祖”神位,设香炉供四菜。这陈四就是本章开头说的陈园,可以说是青帮的第一个徒弟,后来因犯帮规被革出师门,但陈园于青帮有大功,且是整个青帮的开山弟子,所以给他供一份香火,以为纪念,但因已不算青帮中人故将神位放在门外。

那次的大香堂本命师(本门师)是张仁奎,属兴武六帮;传道师樊锦臣,属嘉海卫帮;引见师高士奎,属江淮四帮。三位师父入堂之后,由二位先进山门的老资格徒弟担任香堂执行兼司仪。他们燃点五束用红纸条裹着的香烛插在桌下的香炉内,名唤五指抱头香,香的安排象征帮中兄弟抱头团结。

然后司仪口称:“请本命师张师父孝祖。”张仁奎便在翁、钱、潘三祖师神位前三跪九叩首。依次樊、高二位师父依此办理。接着三位师父到门外陈四小祖神位前行一跪三叩首大礼。

三位师父回入香堂,在香案左边就座。司仪又宣布:“各兄弟孝祖。”站在堂前的百十位徒弟一起跪下行大礼。对三位祖师大礼毕,全体原地面向门外小祖神位行大礼,然后,全体起身立于堂前。这时司仪请三位师父移坐在香案前正中位置,宣布:“各位先进老大参师,新进弟兄陪拜。”于是全体跪下,再行大礼。站起后,先进老大立于两旁,新上大香的立于正中。司仪又说:“各位新兄弟行拜师大礼。”诸新徒再行大礼。

礼毕,司仪宣布:“各位新兄弟跪下受训。”各位新兄弟又听命跪于堂前,由执事把桌下五指抱头香提起给每一位新上大香者各一支,用手执于面前受训示。三位师父每人讲几句,再由司仪每人发给一份油印的十大

帮规和三帮九代的名单。张仁奎开言道:“这是我们门里绝密之宝,要妥为保存,不得对外泄露,上不可告诉父母,下不可告诉妻女。你们只要牢记三帮九代,腰中不带柴和米,走遍天下有饭吃,这就是你们的终身饭碗,切记切记。”

仪式的最后一步是兄弟向三位师父的谢恩,再来一次三跪九叩首,再向各位先进老大行见面礼,接着各位先进老大一同向三位师父道喜,这时司仪焚纸马宣布礼毕。大伙由司仪领着,新兄弟在前,老兄弟在后,去拜见师母,全部过程结束。接下来是非正式的活动,因为时间已是午夜,司仪对大家宣布,师母已备好元宵,请大家入席团圆。第二天上午大家一起又在范园吃团圆酒,新老兄弟坐在一起亲若家人,气氛很有喜庆的味道,席间还有许多名人出席前来捧场。最后与师父一起合影留念。在这之后,新徒弟集资设宴向各位师父谢恩,至此全部大香堂正式、非正式活动就圆满结束。

青帮开香堂的仪式是很能代表旧中国帮会特色,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又集中显示了帮会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特点。

流氓大亨黄金荣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滩的名流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沪上闻人”的大亨。他们出则前呼后拥，入则保镖成群，并常以“工商巨子”自居，实乃黑社会的首领，帮会中的超级流氓。他们的出现不仅说明上海帮会力量的增强，而且也使帮会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成为反动当局的重要构件。当年，能称得上“沪上闻人”的帮会大亨首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三位各具特色，自成势力，且互相勾结，明争暗斗，他们的浮沉直接反映了上海帮会势力的兴衰。

黄金荣是上海滩资历最老的青帮“闻人”，生于186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祖籍浙江余姚。其父黄炳泉曾在苏州衙门当过捕快，后举家迁往上海，黄炳泉仍操旧业。黄金荣爬出娘胎后不久便患了天花症，病愈后落下了一脸麻皮，故被称为“麻皮金荣”。他的父母被麻皮搞得心烦意乱，恐怕破了相的黄金荣会遇上个一灾半祸的，于是就带他到城隍庙旁的算命摊去看相。相面人对黄金荣的麻脸端详了一番后，摇头晃脑地说：“你这儿子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难得一脸福相，只是皮肉单薄，加上麻皮破相，难免要多灾多难；不过，如果养大成人，倒是能成大器。”黄母听了这些，且喜且忧，忧的是这个麻儿会遇灾夭折，喜的是麻儿可能大福大贵。后来，黄炳泉听说小儿出家可以免灾，便赶紧将儿子送到一个庙中，寄名给一个和尚，并让儿子在庙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从此，黄家周围的人都称麻儿为“小和尚”。黄母为了让麻儿改变皮肉单薄的形象，便千方百计地给儿子滋补身体，顿顿鱼肉，连粥里也常加上一二匙猪油，把个“小和尚”吃得肥肥胖胖、又粗又壮，这个“小和尚”常常因吃得过多而肚子痛。为了让“小和尚”长大后能“黄金满堂、荣宗耀祖”，黄炳泉给“小和尚”取名“金荣”。

转眼间，黄金荣混到了17岁，因为吃得好，睡得着，长得结实矮胖。黄炳泉为了让儿子能有一技之长，将来能出人头地，便把黄金荣送到他姐夫的裱画店去当学徒。但是，这个被娇惯坏了的“小和尚”根本不想从事这种清苦的小生意，他要赚大钱，要出人头地，可一时又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只好常常寻衅打架以解内心的烦闷。

黄金荣最常去的地方是得意茶楼，在这里既可以听到无数的逸闻趣事，还可看到流氓相互厮杀的场面。每当他看到别人打的血肉横飞时就高兴得麻脸通红，好像自己就是那个胜利者似的。在这里，他还常看到别人大吃大喝、一掷千金，更使他幼小的心灵孕育着难以遏制的欲望。他发现，干捕快差役不错，油水很大，还可能有所升迁、受人奉承，比当个小小店员有出息多了。黄炳泉很赞成儿子的想法，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为黄金荣打点门路。经过多方奔走和请客送礼，黄金荣终于在上海府衙谋到了一个差役之职，不久又当上了捕快。他原以为进了衙门就可以终日在外游荡，吆五喝六，捞到不少油水，没想

到当上捕快要常年在外奔跑办案,常常风餐露宿,虽可仗势欺人,弄些外快,但过于辛苦,没几个月就干得泄了气。黄金荣深知,上海是个人吃人的地方,“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百姓怕官吏,官吏怕洋人”。1900年,法国为了扩充上海法租界,开始招收华人充当巡捕。黄金荣得到这一消息后,如获至宝,当即就去报名应考,结果没有考上。但黄金荣并不死心,到处托人送礼,后经向主管官员行贿,才被录取为一名三等华捕。当上了租界巡捕,黄金荣觉得自己也成了洋人,对当地居民总是横眉立目,对那些敢于抗争的中国人更是大打出手,深得洋人的欣赏,不久便领到了一张令所有巡捕羡慕的包探卡,每月凭卡可领得30多两银子。此刻的黄金荣踌躇满志,名利双收,权势炙手,决心在十里洋场一显身手。

黄炳泉一生虽只作过捕快头目,但深谙衙门真情。他告诫麻儿,要想闯出前程,除了要博取主子的欢心外,还要有自己的一帮势力,尤其是要和那些盗匪搞好关系。官与匪名为冤家,实是一家,官是匪的靠山,匪是官的升迁帮手。黄金荣平时很少肯听老父的陈词滥调,但却把这些话牢牢地记在心中,并付诸行动。

黄金荣早就听说洋泾浜郑家木桥有一群瘪三闹事生祸,搞得当地居民苦不堪言。他决定采取“黑吃黑”的手段制服这群流氓并为他所用。一日,他和外勤股打了招呼,提前埋伏在这群瘪三常常出没的地方,待他们正要动手抢劫时,外勤股的便衣突然出现,欲将这伙瘪三送到巡捕房。这时,黄金荣出面从中调解。瘪三头目知道对方乃外国捕房的便衣包探,不由得惊惧万分,连请黄氏高抬贵手。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最后敲定:这群瘪三可以为非作歹,但必须听黄金荣的指派。自此之后,黄金荣便成了他们的新首领。这个黑团伙在黄金荣的指使下对当地商店、摊位、居民及富户大肆骚扰,收取所谓“保护费”,把租界搞得鸡犬不宁,而黄金荣自己则当好人,亲手消除这种纷乱现象。比如,黄金荣每次出巡,若碰到流氓滋事必严惩不怠,那帮受到惩戒的流氓对黄服服贴贴,使旁人看了觉得黄金荣确实是个人物。一次,有个大商场准备次日开张,挂在门口的那块金字招牌在夜里突然不见了。老板一时急得团团乱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一个身着长衫的人过来对老板说;“这事只要托巡捕房黄老板出来一压,保证太平无事,原物奉还。”商场老板只好差人请黄金荣出场。结果,那些摘牌的瘪三敲锣打鼓,把招牌送了回来,并端端正正挂在商场门口。正是通过这种两面三刀的手法,黄金荣博得了附近居民的“好评”。“黄老板”俨然成了救世主。

黄金荣为了表现自己的侦缉才能高人一筹,换取法国主子的赏识,他还依靠其爪牙充当“眼线”、“耳目”帮助他破获治安案件,特别是那些社会影响较大而又直接侵犯法国人的案子。他或是利用一批惯偷惯盗去破获另一批盗贼犯下的案子;或是指使爪牙先在辖区内作案,然后由黄带人将其一网打尽;或是令其喽罗冒名自首,以欺骗舆论。

在黄金荣的办案生涯中,有两件案子对他的升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法国神甫失踪案;二是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遭劫案。

先说失踪案。法国天主教神甫自上海乘火车前往天津。不料,火车刚刚行至山东界内就被山东督军张宗昌所部截住,神甫被绑走关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这一事件一时轰动国内外。法国领事馆连连下令,限期破案。黄金荣自告奋勇,亲率几名探员潜往山东,经过多方打探,得知神甫被关在一个深山的破庙中,于是找了两个老乡作向导,一行八人,分作前后两队,随身带武器干粮和抬人长棍,按标记潜到距古庙不远处的丛林中暗伏下来,夜至三更,黄金荣率队突然闯入古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掉了看守的四名士兵,

找到了神甫，并连夜将其护送回沪。法国领事馆十分高兴，当下便赏给黄氏万元，并提升他为督察长。

另外再说遭劫案。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范尔迪携其新婚夫人到太湖游览，被湖匪看中绑走并向法领事馆勒赎。法租界当局要求黄金荣全力营救。黄金荣接案后立即召集门徒商讨营救之计，门徒高鑫宝声称他与太湖帮的老大吴世魁颇有往来，可以前往一试。次日，高鑫宝便单枪匹马亲赴太湖烟波寨拜山。吴世魁见旧友来到，非常高兴，大摆酒筵，热烈欢迎，并把范尔迪夫妇从囚牢里请出来，奉为座上宾，最后列队送高鑫宝及范尔迪夫妇下山。范尔迪夫妇有惊无险，平安归来，令法国总领事馆深感意外，也更对黄金荣另眼相看。黄金荣因此获得了“破案如神”的夸赞，被聘为法租界公董局顾问，领少将衔。

黄金荣在法捕房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在上海黑帮组织中也崭露头角，但这仍然无法满足他要成为上海滩“大亨”的欲望。他深知，要真正成为上海滩的霸主，目前这点人马和势力远远不够，必须进一步招兵买马。不过，要达到这一目的，他还有两个障碍：一是捕房里有人作梗；另外就是财力单薄。当时，捕房中最令他头痛的是徐阿东。此人心狠手辣，而且背后有帮会撑腰。不过，机会很快就来了。黄当上公董局顾问后，捕房中的所有华捕均须由黄提名升级；徐阿东本不买黄的账，但此刻却在黄的控制之下，无奈只好请黄能高抬贵手。黄当即满口答应，并约其在聚宝茶楼与黄的门徒杜月笙等见面。他声称，提名一事由杜全权负责。等徐阿东按约来到聚宝茶楼后，杜月笙担保徐的升职，同时要求徐对“白相人”(帮会流氓)多加照顾。徐只好一口应允。从此，徐在捕房中再难以和黄金荣作对。

消除了捕房中的拦路石，黄金荣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招兵买马了。当时，私贩鸦片最能赚钱，黄金荣自然不会忘掉这一财路。他一方面利用租界禁烟之机，一批又一批地没收烟土，转手倒卖；一方面采取“硬爬”的方法，以血淋淋的厮杀抢劫各地贩到上海的烟土。一次次明夺暗抢，一批批毒品赃货，使黄金荣的地下仓库堆满了金银财宝。有了财力就不乏人力，黄金荣很快便成为上海滩黑势力的巨头。由于贩烟利润奇高，帮会流氓为争夺地盘和烟源常常斗得不可开交，黄金荣虽然从中获取巨利，但毕竟仍是暗中行动，限制太多。于是，他就向法租界建议使贩烟公开化，法租界既可以从“烟土税”中捞取厚利，还可杜绝那一起起惨烈的械斗。更主要的是，黄金荣打算利用职权赚取更多的利润。经过协商，法租界考虑到自身收入的增加，于 1925 年 5 月，同意黄金荣成立“三鑫公司”负责法租界的烟土公卖并预先付给法租界当局 14 万元。后来，法租界的“土捐”、“烟枪捐”统归该公司收取，法租界则坐享其成，每月向公司收取税款，一年可向公司收得 1000 万元以上。三鑫公司在外国主子的支持下，以各种流氓头目为骨干，拥有数百名职业打手，控制了上海数万家烟馆、赌场、妓院，势力伸展到全市的每一个角落，年利润高达 5600 万元。

腰缠万贯的黄金荣一方面广置产业，满足他的私欲，一方面广收门徒，扩展他的恶势力。虽然黄金荣是个从未拜过青帮师傅的“空子”，却要以青帮名义收徒。因其权倾上海滩，青帮之中也无人敢指出他的非份之举。而且，黄金荣收徒并不按青帮已有的排行，特意编造出一套“荣记”独有的 24 字排行来。这 24 字是：文行忠信，孝悌树人，礼人廉明，正心吉祥，松柏长青，永葆德成。黄氏门徒主要是些游手好闲的白相人、为非作歹的流氓和无恶不作的帮徒，也有大量的军、警、工商、艺人等各色人物。由于门生过多，黄自己都叫不出许多门生的名字。与黄联系最为密切的约有二三十人，其中有大世界经理唐嘉鹏、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英租界捕房督察长陆

连奎、法捕房督察长金九龄、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卢英等，当然还有众所周知的杜月笙、张啸林。此外，不少正当人物为了在上海滩求生存、求发展也不得不附在黄的门下。当时，有位戏剧老生常春恒在顾竹轩天蟾舞台演出，因见卖座很盛，提出增加包银，顾不应允，常提出罢演，结果被顾的门徒活活打死。此后不久，顾又请名演员周信芳到天蟾演出，周深知顾氏手段毒辣，不敢硬性拒绝，可又不愿受顾氏苛扣，一年的演出合同期满后不肯续定，引起顾氏的不满，他声言要给周点颜色看看。周只好托人拜黄金荣为师，求其保护，顾竹轩忍气作罢。

黄金荣的声势越来越大，他的门徒也就越来越飞扬跋扈，霸人钱财。某日，黄金荣率领其徒子徒孙到聚宝茶楼吃茶，见茶楼既有雅座，又有幽室，是享乐的宝地，不由得起了觊觎之心，想把它搞到手。几天过后，聚宝茶楼刚开门营业，突然间，一大批横眉立目的家伙闯了进来。这批流氓边往楼上走边互相对骂，还未等上到楼上便早已大打出手，一时桌飞凳舞，杯盘乱飞，随后斧头、片刀、匕首、铁棍都掏将出来，直杀得惨叫声声，鲜血横飞。待到厮杀声绝时，活着的流氓早已逃之夭夭，剩下的只是六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和几个半死不活的断臂缺腿人。这种飞来横祸把个茶楼老板搞得魂飞天外，损失倒在其次，这六条人命叫这个小小的老板如何吃得消？如果再重演一次，他非得把命赔进去不可！他左思右想，觉得这个茶楼不能再经营下去了。就在这时，一个熟人建议他把茶楼卖给黄金荣，说："你若不把茶楼奉送给麻皮金荣，他早晚会把你连肉带骨吞掉。"茶楼老板觉得此言有理，只好忍痛割舍，以低廉的价格把茶楼卖给了黄金荣。

黄金荣就靠这种流氓手段，由一个贩运烟土的黑帮头领变成许多家银行、公司、工厂、舞厅、旅馆、酒楼的老板，从而成为上海滩知名的"社会闻人"。

黄金荣深知，尽管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势力，但只有与政治巨头勾结、与政治党派联结，才能鸿运长久。他的信条是：尽量与任何强大的政治势力保持关系，见风使舵。他首先看中的是直接与自身势力发展有关系的浙江军阀。为此，他设法与当时任淞沪军使的何丰林结为异姓兄弟，又与淞沪警察局长徐国梁打得火热，后又被浙江督军卢永祥聘为上校督察。浙江军阀失势后，黄又对实力日盛的奉系军阀大献殷勤。奉系头目张宗昌、毕庶澄到达上海时，黄金荣阿谀奉承，竭力讨其欢心。黄金荣在与各派政治势力交往中练就了一套随机应变的本领，对当权者曲意逢迎，对在野者也示以仁厚，以备日后之用或赢得好名声。

20年代初，孙中山先生为了使国民党人在上海便于活动，曾亲自到黄府拜访，要求黄对国民党要多加照顾，后又多次写信给黄金荣，要他联系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在人力、财力上予以帮助。黄金荣满口答应，但并不行动。不过，后来国民党人来沪活动，多少也得到黄金荣及其手下的照顾和资助。袁世凯当政时曾要求上海法捕房协助逮捕国民党分子汪精卫和陈公博。黄金荣在带领巡捕出发前早已派人去通风报信，使汪、陈二人逃脱险境。以致后来黄金荣到处吹嘘："我一生之中最讲义气、重友情，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过一些力。"不过，他一生中最得意的还是和蒋介石的结交。蒋介石原属陈英士部下，陈死后，蒋在政治上失去靠山，混迹于上海滩，与陈果夫、戴季陶合伙做投机生意，不久因投机失败而狼狈不堪。蒋决定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但债务缠身而又身无分文，最后在虞洽卿的引荐下去投靠黄金荣。自此之后，蒋的处境大为改观，在虞、黄等的资助下，重新干起炒卖股票的勾当，尽管亏蚀惨重，黄金荣却毫无怨言，不仅出面代他还清债务，还资助他大洋200元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1926年，蒋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黄金荣感到异常

荣耀。他为了保持蒋的面子，私下遣人将蒋投递于他的门生贴子送还，不再以“师父”自居，从而使蒋、黄长期保持着密切关系。黄金荣正是依靠自己编织的一张张保护网，才能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不仅未受时局变动的影响，反而一步步发展起来。

能够说明以黄金荣为首的青帮之真实面目的莫过于他们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表现了。当时，法租界为了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运动，命令黄金荣组织纠察队，以备镇压。黄遂以法捕房督察长的名义成立了一支二三千人的流氓武装，随时准备对工人运动进行镇压。蒋介石来到上海后，不仅对黄金荣礼遇有加以表先前救困之恩，而且打算借助于黄氏集团打击上海的工人运动，并派杨虎、陈群前往黄府游说。起初，黄金荣还有点犹豫，因为当时工人运动势力强大，何况还有共产党人的支持和领导。杨虎意识到黄的心态，便火上加油道：“共产党口口声声‘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现在他们占了上海，和租界对抗，把军阀赶跑，说不定几天后，就会把那些与军阀洋人有关系的统统杀掉，像黄先生这样的大亨更是难逃一死！那年共产党在上海开代表大会，你曾亲自带人去抓他们，他们会轻饶了你吗？”这几句话把黄金荣激得脸色铁青，麻皮泛红，当下便犹如王八吃秤砣了，誓与蒋介石共存亡。他大肆招兵买马，亲自出面组织了“中华共进会”，纠集地痞流氓，分发武器，充当蒋氏政权的反革命急先锋。“四·一二”政变期间，黄金荣亲自指挥数千名流氓到处袭击工人纠察队，屠杀工人群众。事件之后，黄金荣受到蒋介石的表彰，说明黄金荣已沦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

20年代中后期是黄金荣黑道生涯下跌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他的势力仍举足轻重，但已失去了上海帮会第一把交椅的位子。

黄金荣第一次跌霸是因同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争夺露兰春而发生的冲突。露兰春是名坤角，姿色艳丽、技艺超群，早已被黄金荣霸占为妾。这天，共舞台来了位不速之客，身着白纺绸衫裤，后随两名仆从。台上，露兰春正演她的拿手戏《镇潭州》，不料一时疏忽，在唱“哭板”时竟走了调，场内观众大多没有听出，听出的也未苛求。而刚刚入场的那位不速之客却毫不客气地喝了一场倒彩，登时全场噪动。出尽风头的露兰春自登台以来哪受过如此侮辱，掩面下台，正在后台为露兰春“把场”的黄金荣见状大怒，喝令爪牙马上把那个该死的“捣蛋鬼”抓来。几个凶神恶煞的爪牙横冲直撞地闯到不速之客面前，点着鼻子问道：“是你喝倒彩？”哪知这位不速之客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手里的折扇一摆，转身便走。站在前面的一个爪牙拦住去路，上去就是两耳光，并把这位不速之客连推带搡地抓到后台。黄金荣正准备好好整治整治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猛然发现此人原是认识的，顿时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你道这是何人？他是上海权势最大的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宠子卢小嘉。卢小嘉可不是一般人物，号称当年中华“四大公子”之一。四大公子都是豪门之后，第一位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第二位是奉系首脑张作霖的公子张学良，第三位是大实业家张謇的大公子张孝若，最小的一位就是卢小嘉。卢小嘉虽居“四大公子”的末位，但自以为风流倜傥，平时浪荡逍遥，依仗父亲权势，在上海滩横行无忌，从未吃过今日这样的亏。卢小嘉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眼前的黄金荣一口吞掉，但他知自己目前势孤力单，好汉不吃眼前亏，故未发作。黄金荣此时心中犹如倒了五味瓶，酸甜苦辣，难受至极。明知得罪不起卢永祥，又不愿在徒子徒孙前丢脸，过了好半天才冷冷吩咐：“让他走吧！”

卢小嘉回府后将此事哭诉于卢永祥。卢永祥闻言大怒，即命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将黄拘捕，并准备置黄于死地。黄知闯下大祸，命系于一旦，忙请地方豪绅出面说合。几经斡

旋，卢永祥答应留下黄的性命，但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赔偿人体损伤费银元10万块，二是要黄亲自写下认罪书，否则，立杀无赦。

黄金荣自然保命要紧，忍痛答应下来。这一事件虽未使黄大亨丧命，但已丢尽了面子，大大的"塌台"。此后不久，黄与原配林桂生离婚，欲强娶露兰春为妻。露兰春婉言拒绝，并下嫁给唱老生的安舒元。黄金荣无可奈何。

黄的这一系列挫折被帮会分子视为奇耻大辱，一些帮会分子纷纷指责黄是个"空子"，这恰恰戳到了他的痛处。实际上，不少青帮分子早就对黄身为"空子"却自视大辈的行为颇有微词，但在黄权势显赫之时，谁也不敢指斥他的悖谬。此刻见黄金荣台面已塌，便大加起哄，要求黄澄清是非。黄自知心虚，忙请张仁奎出面调解，又四处散布流言，说他曾在镇江入过帮。他还准备通过拉拢袁克定，以2000两银子取得"大"字辈身份。哪知此事风声走漏，"通"字辈大哗，扬言要他请100桌客，否则将兴师问罪。黄金荣被搞得焦头烂额、黔驴技穷，又托人向张仁奎交付2万元大洋，请求张仁奎收他为徒，但张仁奎退还了贴子。结果，折腾了半天，黄金荣的帮会身份仍然悬而未清。后来，虽不了了之，但黄金荣的声望已远不如前，再不敢像以往那样在帮中横行了。

蒋介石的升迁如给黄金荣注射了兴奋剂，他力图依靠蒋的力量东山再起。"四·一二"事件以后，黄虽受蒋嘉奖，但只有杜月笙得到蒋的单独召见。黄金荣、张啸林自叹弗如。不觉心存嫉妒，与杜的矛盾日益加剧。后来，张啸林主持的"共进会"活动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禁止，因而归咎于黄并断绝了与黄的来往。黄金荣更觉大势已去，意气消沉，不久辞去法捕房督察长一职，回到漕河泾黄家花园，退休闲居。

此时的杜月笙已取代黄坐上了上海滩帮会势力的第一把交椅，但杜仍伺机削弱黄门势力，表面上却对黄金荣毕恭毕敬。"九·一八"前夕，杜的门生、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陆京生秉承杜的旨意，决定煞煞黄门子弟、英美烟厂工会主席陈培德的威风，指责陈有共产党嫌疑，将其关押在牢。黄金荣只好亲自出马，直接向司令杨虎说情，陈才得以获释。陈出狱后直向黄哭诉陆的种种不是，并说陆在审讯他时一口一个"杜先生"，根本不知有"黄老太爷"。一席话把个黄金荣气得手足乱抖，当即给杜公馆打电话质问此事，杜却假装不知，连忙答应好好管教门下。为了专门对付气焰嚣张的杜党及其组织"恒社"，黄于1936年夏准许其门生秘密组织"忠信社"，由黄任会长，目的是采取各种手段搞垮杜氏"恒社"。该社起先在黄家花园聚会，每星期日以聚餐为名，密谋搞垮"恒社"之策。黄发现，杜党势力已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依靠自身密谋难以达到目的，于是又与扬虎的"兴中社"结成同盟，并订下了初步策略：第一步，拉拢"恒社"骨干分子脱离杜党，制造杜同门师生矛盾；第二步，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迹，然后由黄密告蒋介石。结果，秘密会议举行了六七次，计划制订了一个又一个，仍无法搞垮"恒社"。不久，"八·一三"战事爆发，该组织便无形中解体了。

"八·一三"战火燃起后，黄金荣表现得倒很慷慨，即令共舞台、黄金大戏院和大世界游乐场停止营业以收容难民，两天就收容了约6000多难民。黄又拨出1000万担大米供应难民。后上海守军撤退，上海遂成为孤岛，黄金荣不愿逃离，也不肯公开"下水"当汉奸，只与日伪保持密切关系，以求明哲保身。日本特务机关早已知道，黄金荣乃名贯金沪的闻人，门徒众多，让他出任市长是再合适不过了。1938年春的一天，日本特务佐藤来到黄府，邀请黄出面组织上海伪政府，黄以身染重疾推辞不见。佐藤并不罢休，再次拜访黄金荣，并身着戎装，随带众多宪兵，声称必见到黄金荣方可复命。黄金荣只好出门迎接，但

他事先已伪装瘫痪，由家人扶他出来相见。佐藤先问了问黄的病情，然后问道："你们中国人对日本皇军印象如何？"黄金荣故作有气无力地答道："皇军初来中国，彼此了解不够，日子久了，自会消除敌意。"佐藤点头称是，接着说道："本人来府造访是请阁下助皇军一臂之力，出任上海大道市市长之职，不知意下如何？"黄金荣面露难色，道："鄙人承蒙皇军关照，不胜荣幸，只是染病在身，力不从心，无法为皇军效力。"佐藤见黄身体僵硬，口中常有涎水流出而不自知，也只好作罢。不过，他要求黄金荣答应下列条件：一是黄必须全力支持伪政府并派弟子参加汉奸组织；二是黄必须负责为日军运销烟土充作军饷，黄金荣一一答应。佐藤辞行时，黄金荣拿出两件珍贵礼物相赠，一是碧绿翡翠雕成的观世音菩萨，一是纯白玉雕成的弥勒佛。

黄金荣坚辞伪市长的消息传出后，他的许多门徒感到疑惑不解，纷纷前来劝说他就任此职，以便能在他的庇佑下青云直上。黄金荣讲出了他的一番道理：在中国，作大奸大恶可享一世富贵，要做汉奸就要短命了，因为中国人最恨汉奸。为了避免担上汉奸的名份，黄还想方设法为国民党政府效力。1940年后，他多次派家人弟子同国民党方面联络，他为儿子黄源焘、门徒秦炎兴被国民党委任为特别行动队大队长、支队长之职，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地下工作者"。黄氏本人则以"年老体弱、大病缠身"为名，谢绝一切社会活动，每日下午到逍遥池浴室洗澡，有时也到其弟子组织的各种社团走走。与此同时，黄金荣又竭力与日伪方面和睦相处、曲意逢迎。他自己虽未就伪职，他的弟子则在他的授意或默许下纷纷出任伪职，他的得意门生郝鹏举当上了伪淮海省保安司令，过房儿子陶雪生出任伪淞沪铁路护路团司令，弟子李长江出任伪和平军集团军司令，而其中最为恶名昭著的要算他的得意门生卢英了。卢英在抗战前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后出任伪上海市警察局长、军委会参军长，成为显耀的"新贵"。黄金荣不仅不对他加以劝止，反而十分宠待，并以此炫耀黄门威风。从黄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活脱脱的中国式"变色龙"。

1945年日寇投降，杜月笙以"抗战英雄"身份回到上海，恢复了"恒社"的活动。黄金荣这个苟生于沦陷区的大亨显得更加暗淡无光，但他不甘于落在杜氏之后，也决定恢复已停顿8年的"忠信社"，不久改名"荣社"，以与"恒社"相抗衡。1945年11月"荣社"成立时，社员2万多人，声势浩大，但因内部骨干分子各有山头、内讧不已，致使"荣社"远不如"恒社"活跃。

尽管如此，黄金荣还想以"第一闻人"的身份横行沪上，可惜好多人已不买他的账，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也敢在"黄老虎"头上动土了。1946年秋，国际饭店为庆祝上海市长生日而大摆宴席，黄金荣自然是席上贵宾，周围的宾客对他极力奉迎，他狂妄地说："黄某承各位抬举，才撑到这个市面，不敢夸口在上海滩没人敢和我作对，但若哪一个敢敲我一次'竹杠'，我就真服了他。"众人连连称是。可是一位国民党元老对黄不大买账，冷冷地说道："你黄老板身带手枪，出入有保镖，当然没有人敢动你。"话中带刺，把黄金荣呛得直喘粗气，当下拔出手枪，离座出门，扔下满场保镖，独自乘车回府。当车开到霞飞路时，司机突然拔出手枪顶住黄的脑袋，要他把钻戒、手表摘下。这一下把黄金荣真搞懵了，他万万没想到他自己的司机会劫他。司机拿到钻戒、手表后并不离去，而是说："这次不会要你命，今晚12点，必须把20年前勒索的那尊金佛放到愚园第十八根电杆下的垃圾箱内，否则后果自负。"说完跳车离去。黄金荣气得半天没转过向来，没想到大话还没吹完就有了报应。他回府后立即召集爪牙前往愚园，把金佛放在指定位置，然后埋伏好，只等取物者来后格杀勿论。直等到夜里3点

钟,放金佛的垃圾箱里突然窜出一只狗来,嘴里叼着一个布包。众爪牙一顿乱枪,那只狗顿时一命呜呼。等一个爪牙打开布包一看,金佛早已换成了石头,石头下还压着张纸条,上写:"原物归主,前事两讫。"原来是黄当年的勒索对象的后代设计取回了金佛。爪牙们再去看那个垃圾箱,箱底有一深洞,狗就是从洞中窜出来的,取物人也是从洞中溜走的。黄金荣听到汇报后暴跳如雷,可又无奈何,吃了个哑巴亏。

1948年8月,蒋经国出任上海区经济督导,立志整顿上海经济秩序,声称要打几只大老虎。黄金荣的亲信黄振世被蒋太子聘为评价委员。黄金荣认为时机已到,决心要煞煞杜月笙的气势,长长自己的威风。他授意黄振世调查杜的各种投机活动。黄振世报知黄金荣。黄金荣大喜过望,于是邀请蒋太子赴宴,准备在席间告诉他有关杜的事情。蒋太子答应得倒挺痛快,可酒宴那天,他又派了两名属下赴宴,黄的倒杜计划成了泡影。此后不久,杜月笙次子杜维屏被蒋经国扣押,终使黄稍稍出了一口气,当时杜已风闻黄曾宴请蒋太子,认为肯定是黄老头在背后捣鬼,更加忌恨于黄。

解放前夕的上海已是风雨飘摇、人心浮动。青帮大亨或出于自保,或出于投机,或出于自愿,纷纷与中共接触。黄金荣在这方面显得比较消极,直到1949年4月解放军攻克南京后才同中共人士建立联系。当时,在北平的章士钊托人给黄带来口信,称中共中央某首长已向章士钊表示,只要黄金荣拥护共产党,不再与人民为敌,一定既往不咎,希望他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陈毅也让上海地下党转达希望黄金荣留下的意见。此时,杜月笙、金廷荪等超级大亨均已逃往香港并捎回话来,劝黄离沪赴港。黄沉思再三,还是没去香港。他说:"我已年过八十,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路上生了毛病,岂不要死在半途中。"故而坚持不动,并向解放军献上三件"礼物":一是在国民党出逃前的大屠杀中,他掩护了一批中共党员;二是向地下党交出一份国民党财产表;三是交出400多名青帮头目名单。

上海解放后,黄金荣的寡媳李志清席卷黄家贵重财物逃往香港并多次电催黄赴港。黄还是未动,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1951年5月21日,黄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的压力下,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黄金荣自白书》。《自白书》说:"我今年已84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但经过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60年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然后,他又对上海帮会分子说:"凡是我所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的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生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隐瞒。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在人民一边,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致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以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他表示:"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的懊悔、惭愧与感谢的心是真诚的,绝不是虚伪的。"自从发表《自白书》后,黄金荣闭门不出,常常独自一人沉思默想,于1953年发病身亡。

强盗书生杜月笙

“沪上闻人”之中，杜月笙最富传奇色彩，被外国报刊誉为“最有趣的人物”。他虽出于黄金荣门下，但其势力和影响在旧社会的上海滩无疑已超过了“黄老太爷”。可以说，杜月笙的名字已成为上海帮会的同义词和上海黑社会势力的象征。

杜月笙，名镛，1888 年阴历八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镇。因他生于中秋节月圆上夜，故取名为“月笙”。杜月笙自幼父母双亡，随继母张氏生活，小月笙聪明、顽皮，不仅甚受继母疼爱还得私塾老师之宠。无奈家境过于贫寒，一个妇道人家实在无法供他读书，只好忍痛辍学。从此，小月笙便以乞讨方式赡养继母。那知“屋漏偏逢连阴雨”，一日，小月笙自外乞讨归来后，只见房门大开，继母不知去了何处。事后得知，继母是被一帮贩卖人口的流氓拐骗走了。年仅 8 岁的杜月笙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亲人的抚爱，后虽为外婆收留，但外婆家也很穷，杜月笙就整天和一帮街头流浪儿混在一起。一混就是五年。这种坎坷童年经历不仅使杜月笙尝尽了人间的苦难，而且练就了一副好勇斗狠、察言观色的性格，也激起了他向上爬的欲望。

杜月笙 14 岁那年，因偷他舅父的钱财而被痛打一顿，随后被送到上海十六铺水果店当学徒。舅舅是想一来让他学点手艺好谋生，二来借以约束性格，以免再堕落下去。哪知此时的杜月笙已变得放荡不羁、难以收敛了。杜根本无心于生意经，常常和街头上的小瘪三混在一起。遇到以强凌弱的，他就打抱不平，为此他常和别人打架。他被别人打伤，从不叫一声；他打伤了别人，受伤者就找水果店老板纠缠。老板一气之下，把他从店里赶了出去。

杜月笙虽在店里没学到什么生意经，但却学会了削果皮的独特本领。他可以在谈笑之间，用很短的时间削下一圈圈均匀不断的果皮，人称“水果月笙”。被老板炒了“鱿鱼”后，杜月笙一时生计无着落，但他又不愿意整天靠扒窃过活，于是他摆了个水果摊，并代顾客削水果皮。因以贩卖莱阳梨出了名，他便得了个“莱阳梨”的绰号。当初，他非常喜欢这一诨号，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再也没有人敢当面这样叫他。不过，当年曾和他在一起混过的一些小流氓在要钱不遂意时也当面叫他“莱阳梨”。碰到如此场合，他倒也不怒，吩咐手下加点钱了事。

杜月笙比较注重江湖义气，常把卖水果得来的钱分给与他共患难的小兄弟们，加上他在这帮小流氓中处事果断，敢于出头排难解纷，也因而深得这些人的爱戴，在当地竟有了一些小名气。一次，有位锡箔商人从杭州运来一批锡箔，要在十六铺码头卸货上岸。他打算找个流氓头儿保护货物，结果找到了杜月笙。杜见得钱不少，强过暗地扒窃，便答应了商人的要求。锡箔卸上码头那天，其他帮派的流氓蜂拥而至，动手抢劫，杜月笙懂得拿人钱就得为人卖命的道理，当即出手阻拦，

双方立刻打起来。杜月笙这帮人不多，而且没见过大阵仗，不一会儿便被打得抱头鼠窜，最后只剩下杜月笙一人。他被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冒，但仍在拼命厮杀，直被打得趴在地上，无法动弹，对方才扬长而去。多亏他的姑表弟万墨林来把他抬走，否则早已暴尸街头。万墨林为他请医、煮药，尽心服侍。杜月笙对他十分感谢，含泪说道“有朝一日我交了好运，一定不会忘记你今天对我的好处。”这位小表弟说了几句安慰话，内心里却根本不相信杜月笙将来会有什么出息。

经过这一番打斗，杜月笙的“狠劲”出了名，成为流氓地界无人不晓的人物。杜月笙自己则在盘算着以后的出路。他深深感到若靠码头吃黑饭，非得找个有名望的靠山不可，否则再凶再狠也不会有立足之地。虽有找靠山的想法，可谁又会接纳小小的流氓头儿呢？杜月笙感到十分绝望。他把心事告诉了帮内叔爷、老相识黄振忆。黄振忆是黄金荣的亲信，动了恻隐之心，见帮内小辈沦落到穷途末路的地步，答应帮他，荐他到黄金荣家当差。黄金荣见他生得个头不高、清癯瘦削，手无缚鸡之力，对他不甚满意，但因是黄振忆荐来的，只好暂留府中。杜不仅好勇斗狠，而且工于心计，在流氓中有“诸葛亮”之称，尤其擅长揣摩别人心思。他深知难以巴结上黄老板，故尽心尽力去讨好黄夫人。他整天站在老板娘林桂生的房门口，轻易不离开一步，也不敢踏进房门一步。每逢丫头给林桂生送茶送饭，他总是把亲手削好的水果托丫头送进去。奴仆的忠实和殷勤打动了人人畏惧的“白相人”桂生姐那骄横的心。她开始让他收盘子钱，他总是速去速归，如数交上；让他去收她用私房钱放债的利息，他更是不漏风声，按时完成。经过一次次考验，林桂生知道这个瘦小个子是个头脑灵活、忠心耿耿的帮手。不过，林桂生是个极挑剔的女人，她不仅看杜的忠心，还要看他有没有胆量和本事，于是向黄金荣提议，让杜带人去抢新开河、陆家嘴两个新建码头，既可扩充地盘，也可借此掂出杜的斤两。霸占新开河、陆家嘴两码头的地头流氓，约有100多人，他们的头领是以凶狠著称的“独眼龙阿财”和“惠根和尚”。杜月笙起初还真有些胆怯，他早就听说过这两个人是远近闻名的地头蛇。不过，他转念一想，这是表现自己的好机会，刀山火海也得闯。第二天晚上，杜月笙带着一帮喽罗埋伏在新开河码头的暗处。等独眼龙和惠根和尚一伙人一到，杜月笙便一声吆喝，手持锋利的三角小斧，带头冲出去，惠根和尚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就被杜月笙一斧劈中，顿时脑浆崩裂，倒地毙命。新开河流氓见首领被对方劈死，都手持利刃向杜袭来。杜月笙身陷重围，越斗越狠，接连又劈倒几个，自己身上也被砍了几刀，浑身血迹斑斑。双方有的被打落水中，有的被刀劈倒，但依然喊声冲天，搏斗不止。就在这时，十六铺巡捕房的巡捕赶到，与杜月笙一起殴打新开河流氓。这群流氓见状不妙，纷纷逃窜。

经过这场械斗，杜月笙赢得了黄公馆上下的称赞，渐渐成为黄府的红人。但他并不满足于一个小角色，一边作黄金荣的“军师”、“打手”，一边暗中蓄势，准备有一天“自立门户”。因此，他充分利用黄的地位多方交结、拉拢各种关系，培植私党。征得“黄老头子”同意，网罗了顾嘉棠、叶焯三、高鑫宝、芮庆荣、杨锦堂等人组成以自己为首的“小八股党”，名义上是为黄争夺烟土生意，实乃杜氏的私人爪牙。这批人全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而且对杜忠心耿耿。其中高鑫宝常常随身携带利斧，人称“斧头党”。有一次，高鑫宝要强行与某赌场老板分成，该老板拒不答应，高二话不说，拔出斧头，顺手将赌客砍翻，扬言要“摆平赌场”，老板只好屈服。杜正是利用这一批黑手恶棍，通过几次凶狠的拼杀，从沈杏山的“大八股党”手中夺得了鸦片贸易的保护权、批发转运权。这样，不仅财源滚滚，而且树起了“小八股党”的牌

子，杜一下子名声鹊起，成为黑帮中的响当当人物。黄老板妒心遂起，杜也借机离开黄府，自立门户。

杜离开黄府时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虽有了一定势力，但目前仍没有超过黄金荣。不过，他有决心夺得黄金荣的上海第一把交椅的宝座。他与黄金荣的明显不同在于，黄氏乃流氓闯荡江湖的气派，喜欢蛮干，一副强硬作风。杜月笙则善于智取，他的所作所为无不留下这种风格。

在与帮中元老、社会名流打交道时，杜月笙吸取了黄金荣跌倒后的教训，轻易不得罪人。别人有事找他帮忙，只要他认为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总是痛快地答应下来，暂时吃些亏他也不在乎。他常说："花一文钱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他首先结交的是宋子文。宋曾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从此视上海为畏途。杜主动提出由他安排大批人马暗中保护。1933年，宋子文发行"航空奖券"，杜月笙指使金廷荪组织了大达公司，不仅为宋子文大赚金钱，自己也发了不少横财。

应当承认，杜月笙捧人的手法确实高明，他捧人捧得不露声色，使被捧之人十分高兴。有人替他总结经验，大致有"烧冷灶"、"趋势门"、"捧场面"、"行贿赂"、"讲义气"等诸般手法。他所捧过的人中最识其捧的莫过于孔祥熙了。杜深知孔是位难得的财神爷，他也了解到，孔祥熙是位爱出风头又不愿干事的主儿，必须投其所好。一次，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抵沪募捐，先找市长吴国祯，吴对此毫无兴趣。向、何二人又找到杜，杜听了后满口答应帮忙，并在几天内把这件事办得有声有色。本来他完全可以把募得的钱直接交给向、何了事，但他欲借此机会捧孔祥熙。他找到孔，先向孔述说了吴市长不肯帮忙而由他代办的事，然后请孔出面，一切具体事情由杜来办。孔当然愿意插手这种只有名利而又不干实事的事情。结果，孔既大大出了风头，杜也因此得以与孔结交。

自此之后，两人关系十分亲密，凡是出风头的事杜都尽量让给孔，自己则退居幕后，并从中得到无数赚钱的机会。

他与戴笠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时，戴笠在上海很是狼狈。杜慷慨解囊，先后借给他100银元，以致若干年后，戴笠仍不忘怀，二人结成异姓兄弟。人道戴笠残酷无情，六亲不认，但却最买杜的账。杜氏在政界的交往并不仅限于几位国民党要人，无论南北军阀、官僚政客、外国名人，只要来到上海，他都要联络应酬一番。李顿调查团到沪后，杜就曾设盛宴款待。以至于在上海，杜成了"路路通"，所谓"杜先生一句话，人人都要买他的面子"。

除了结交权贵，他也注重收买人心。即使有时某一事情缺乏实用价值，只要有利于提高他的声望，他都肯干。

一次，几个法国士兵喝醉酒后在街上胡作非为，坐黄包车不给钱。车夫争辩了几句，竟被一法国士兵当场用刀刺死。车夫家中还有一妻三子，一时衣食无靠、状告无门。上海华人报纸纷纷谴责法国人的强盗行径，而法国领事馆对此则置若罔闻，杜月笙闻讯后，异常气愤，觉得法国人欺人太甚，决定管一管，于是率人前往拜见法国驻沪领事。你道这位法领事是谁？原来是那位曾被太湖帮绑架过的范尔迪。范尔迪获释虽是由黄金荣直接出面的结果，但实际上却是杜为黄出的主意。事后，范尔迪知道真相后，对杜一直感激万分，两人交情甚笃。范尔迪见杜登门造访，自然是一番热情款待。杜月笙讲了几句客气话后，单刀直入地说："今天，杜某非为私事而是为贵国士兵杀人之事而来，还望领事先生能秉公办理，交出凶犯。"范尔迪低头沉思了半晌，作为难状："那位士兵已经回国，恐怕难以照办。我也无权把他召回。"杜月笙微微一笑："我已得到确切情况，他就在领事馆中

范尔迪知道杜机警过人，眼线很多，心知是个难斗的主儿，但又不甘心将凶手交出，便正色道："不是我不给杜先生面子，按法律，我国士兵犯法，应有我国执法机关处理。我一定将该事件调查清楚，严惩凶手。"杜见范尔迪执意推脱，也毫不相让，软中带硬地说："贵国士兵在我们中国杀人，应由我国政府处理。如果领事先生不交出凶犯，那以后恐怕我们之间很难相处了！"范尔迪深知杜在上海的势力，知道此人得罪不起，口气软了许多。两人谈判的结果，法方同意付给被害人家属4000元银洋作为抚恤金，并保证法国士兵不再滋事胡为。杜也未再坚持要法方交出凶犯。他想，人死不能复生，关键是要法方拿出钱来，保证不再生事；如果总要法方交人，恐怕也会大大地得罪洋人。杜月笙回府后，派人将4000元送给被害人家属，并又加上4000元自己的钱。杜一再嘱咐送钱人，不要讲是他向法国人要的钱。受害人一家正愁日后生计没有着落，这8000元犹如雪中送炭，可一时又不知恩人是谁。过了几日，受害人之妻几经周折，打听到恩人原来是杜月笙，忙带一家老小到杜府叩头谢恩。这件事一时被上海滩传为美谈，杜月笙的名声更响了。

除此之外，杜月笙还有许多"义举"。据说，在杜月笙极盛时，每天早晨都有不少人在杜公馆等杜起床。杜在床前放置一个装满钞票的箱子，他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向门口等候者散发钞票，直至箱内钞票发完为止。所以，上海滩的帮会分子都把杜月笙比作"及时雨宋江"或"当代春申君"、"小孟尝"等。

杜月笙有其隐忍、宽容、慷慨的一面，也有凶残、狠毒的一面。这首先表现在他的铁心反共上。他自己常说，他一生事业奠基在反共之上。正是由于在"四·一二"政变中的突出表现，他才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密谋反共策略，并请杜帮忙。杜当即答应，他先去劝说张啸林，张同意后，杜又去说服黄金荣。之后，以杜、黄、张三大亨为首纠集了一批流氓恶棍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当时，蒋密令杜必须首先将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谋害，以便使工人纠察队群龙无首。杜马上请来张啸林、顾嘉棠等密谋对策，最后决定由杜出面送给总工会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顺便带一请帖，请汪寿华当晚到杜公馆来，称有要事相商。等汪寿华一到，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立即从暗中扑出，用铁棍朝汪寿华头上猛击，汪寿华及随行人员人少势单，很快就被击昏倒地。这几个凶手七手八脚地将汪等人装进几只大麻袋，搬到大门外的车上，拉到西郊的黄地上活埋了。杜等杀害了汪寿华，就开始对工人纠察队进行血腥大屠杀。他在上海滩滥杀仍嫌不过瘾，4月下旬，杜又亲率200多名打手与杨虎、陈群一道前往宁波协助蒋鼎文清党，屠杀三天之久。回沪之后，他又命高鑫宝等杀往松江、青浦。经过此番"杰出"的反革命表演，杜博得蒋政府的青睐，乘机取代黄金荣，坐稳了上海帮会的第一把交椅。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同样也心狠手毒。有一次，听说他的大老婆与他的堂侄杜小宝有暧昧关系，立即指使其爪牙把杜小宝抓来，亲手将杜小宝双脚砍去，后来才知完全是谗言，又把杜小宝接到家中同住。不久，杜小宝得病归天，杜月笙的大老婆也因不堪虐待而死。

1931年，一家小报登了知名作家宋某一篇评论著名影星胡蝶的小品文《杂谈》，文中略略涉及杜的私生活，杜马上将宋和报纸主编抓来痛打一顿，并打断了主编手臂以示惩戒。后虽经多方周旋，二人获释，但主编神经受到极大刺激，从此疯疯癫癫，宋某不久也忧愤而死，年仅30岁。

杜月笙最初的主要财源是三鑫公司。杜曾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把握公司的实权。正是从三鑫公司的活动中，他深知毒品买卖和赌业的诱人厚利。从此，他总是千方百计地

争夺毒品买卖和赌场。不过，他也明白，在这方面以及娱乐行业，他无法与黄金荣竞争，只有向工商业发展才能广开财路。因为黄固步自封，从来不肯投资工商界。1921年，杜月笙开办了中江银行。杜办银行只是入了“干股”，即白手起家，银行主要由大英银行买办徐懋棠和另一富豪投资。中江银行很快就成为一家资金雄厚、信誉良好、获利甚丰的著名银行了。杜因此在金融界站稳了脚跟，后被吸收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董事，不久又当上了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和浦东、国信两家银行的董事长。

在金融界得手后的杜月笙又把手伸向实业界，扩大地盘。他采取的手段五花八门，充分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他先以投机方式控制了面粉业，后又觊觎全国闻名的申新纱厂。一天傍晚，杜的几名爪牙驱车来到纱厂老板荣德生的住宅，守门人刚要问话，早已被车上跳下来的人击倒捆了起来。此时荣老板正在吃晚饭，发觉外面有异，想从后门逃走。几名歹徒窜将进来，把他按倒，嘴里塞上棉布，装进麻袋，放进汽车疾驰而去。

杜月笙对这位“肉票”倒也优待，将其密藏，然后逼交赎银60万元，不得讨价还价。荣家几次请警方破案都无下落，只好按对方要求卖掉工厂的动产以赎回老板。荣德生大半生经营的血汗钱被杜氏敲去，再也无心经营工厂，卖掉厂房设备回无锡老家去了。

杜以这种流氓手段霸占了申新纱厂，又开始打纱布交易所的主意。一次，纱布交易所理事操纵市场，促使行情不断看涨，杜月笙受到一些损失。他得知内情后，认为时机已到，便让经纪人顾永园率大批打手闯到交易所大吵大闹，要求调查此事，搞得交易所一片混乱。交易所只好求救于巡捕房，巡捕房早已得到杜氏的招呼，不予置理。交易所负责人袁履登、闻兰亭被迫登门拜访杜月笙，请他出面调解。杜大摆“闻人”架子，指责袁、闻无理取闹，要他们让行情下跌，一直跌到大家都不吃亏为止。袁、闻惟惟诺诺，最后只得请杜出任交易所理事长。

航运业是个利润丰厚、影响广泛的行业，杜月笙自然馋涎欲滴。不过，航运业的骨干大达轮船公司历史悠久、实力庞大，是块硬骨头。杜耐心等待、寻求时机，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战略。30年代初期，该公司因变故迭出而处于困境之中。杜趁机大量收买大达的股票，成为公司大股东，然后又指使公司董事会内外的同党到处造舆论，要杜出任董事长。这一提议遭到了大达一批旧人的强烈反对。杜又指使一批年轻股东向上海社会局呈交要求改选大达公司董事会的报告。早已得到杜的好处的社会局指令大达召开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同时，杜又派出大批打手涌入大达码头。双方发生激烈械斗，以致惊动上海警察局封锁交通，使大达公司轮船多日无法装卸开航。董事会的强硬派只得让步，亲自上门请杜月笙出任董事长，后杜又当上了上海船公会理事长和全国轮船公会理事长。

杜月笙在实业界的频频得手，标志着他已成为上海滩的头号“闻人”。成名后的杜月笙与黄金荣不同，很是关心自己的形象。为了与各种所谓“上流人物”打交道，不得不放弃过去那种歪戴帽子、高卷袖口、拖着鞋子走路的姿态，竭力装出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说话尽量文雅，举止力求稳重。对他的手下，杜也一改以往帮会流氓身穿密排扣黑色拷绸短衫裤、翘大拇指的习惯，要求他们在一切公共场合甚至在家中重要场合都要穿长衫马褂。他念的书不多，字也写得极差，于是他就天天练习写自己的名字以便签名，以致许多局外人看了他的签名，真以为他读过几年书似的。而且，杜不愿别人像对黄金荣一样称呼自己为“老板”、“老头子”，而喜欢别人称他为“先生”。杜的这些举止连他的手下也颇不以为然，戏称他是“冷气间里出来的”，外界称他为“强盗扮的书生”。

1927—1937年是杜月笙势力发展的极

盛时期。杜身兼数职,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头衔外,他还是上海《申报》的董事长、《新闻报》的董事、《中央日报》的常务董事、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的副总会长、上海商会常务监事、证券交易所理事长、世界书局董事长等等。头衔多达100个,有时连他自己的也记不清楚。

这一时期最能说明杜的势力和影响的是1931年6月他在浦东新建的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礼。这次活动自6月8日起历时3天,筹备工作主持都皆为"沪上闻人"。总务主任是虞洽卿和黄金荣,副总务主任是张啸林,卫生主任是王晓籁、庞京周,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第一天是将杜氏宗祠的总神主牌位从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杜公馆送往新建的占地50亩的宗祠中,整个护送队伍达5000余人,由英国、印度巡捕组成的骑兵队开路。法国巡捕、安南巡捕组成的自行车队护卫两侧,殿后的是中国陆军第五师一个连的步兵。中间还有警察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军乐队、保卫团、童子军、缉私队、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护卫着蒋介石手书"孝思不匮"的金匾及何应钦、熊式辉、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新旧军阀政客送来的无数匾亭。杜氏的祖宗牌位用特制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他的儿子跟在轿后。一路鞭炮齐鸣,引得途中数万人围观,交通为之中断,不少人被挤落黄浦江中。

第二天是神主"奉安"典礼。由陆、海军及警察局西乐队等组成的联合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21响。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参军杨虎宣读国民政府贺电和蒋介石的祝词。法国、日本总领事及领事等到场致贺。

从10日到12日是三天连台好戏,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马连良等几乎所有著名京剧演员全被请来。这几天中,贺客达8万人,每餐开饭2000桌,几乎整天都在开饭。明星电影公司全体出动,将如此盛况拍成纪录电影。从各方送礼之多、堂会戏目之精彩、排场之阔绰来看,在上海都是空前的。即使后来宋子文的老娘出殡,虽有蒋介石、孔祥熙去执佛,也没有杜家宗祠落成时的排场。被上海人称作洋财神的哈同死去时,他虽为沪上最有钱的大地主,也只能望杜之项背。杜每当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得意非常。

"七·七"事变爆发后,杜月笙对抗日表现出一定的热情。他在上海大声疾呼,要那些还正在花天酒地的人不要再醉生梦死,并着手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捐献飞机"月文"、"月辉"号各一架。"八·一三"事件后,上海燃起战火,他根据戴笠的意图组织帮会抗日武装——上海别动队。同时组织抗战后援会,向工商界摊派和征募了巨额物资和资金,为数在4万元左右,全部由他支配。上海沦陷后,这笔钱大部分成了他自己的囊中物。

一日,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和关东军要员板西利八郎突然上门拜访杜月笙板西笑咪咪地说道:"杜先生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上海不能没有你。如果杜先生愿与皇军合作,一定会获得比以往更高的利益。"杜虽是一位八面玲珑的人物,但为日本人做事他是最讨厌的,又不愿公开得罪,只是笑着摇摇头。绰号为"亚洲的劳伦斯"的土肥原窥穿了杜的心思,把脸一虎,道:"我们大日本皇军是帮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你们不应与皇军为敌。如果你对抗到底,将受到惩罚。而且,你也不会逃出皇军的手掌!"宾主不欢而散。本来杜不愿离开上海,还想利用租界作保护,但发现日本人如此咄咄逼人,留在上海只能成为日本人的鹰犬。同时,蒋介石也电催上海"闻人"离沪,戴笠则亲自来沪活动,于是,杜于1937年11月26日赴港。

杜月笙到达香港后,人生地不熟,觉得十分不自在。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与日伪勾勾

搭搭的同时，又接受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指示，遥控上海徒众开展抗日工作。1938年1月，杜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分管第九救济区事务。杜在香港挂出"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及"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的牌子，帮助一些著名人士逃到香港。

当时，身为汪伪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次长的原国民党政客高崇武、陶希圣对汪精卫所作所为不满，可一时又难以逃脱。杜得悉后，决定将二人救至香港，打击一下汪精卫的气焰，并要求手下务必获得那份日汪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密约。杜门弟子先是把高崇武趁夜偷运出上海港，又掩护陶希圣搭乘美国客逃轮逃走。高崇武亲手把密约副本交给杜月笙。次日，香港《大公报》就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刊载，举世为之震惊。这份密约，内容庞杂，核心是由日本完全控制中国的一切。密约的公布，使日本人和汪精卫狼狈不堪，完全剥下了汪精卫"和运使者"的画皮。杜月笙因此也成为全国闻名的大人物。

除此之外，杜还配合戴笠在上海进行除奸活动。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傅筱庵就是杜直接收买傅的佣人杀死的，张啸林的死也与杜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系列的除奸活动引起了日伪"76号"特工总部的大肆报复，上海滩陷入腥风血雨的恐怖之中。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和黄国栋先后为"76号"捕去。杜闻讯，焦急万分。他深知，一旦万、黄泄露机密，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杜一面派人去疏通关系，营救万墨林等，一面邀"76号"头目吴世宝赴港面谈。吴世宝曾当过杜府司机，但连杜公馆的大门也不曾踏进去。他虽然凶神一般，对杜还是敬畏三分。此刻见杜亲自邀请，感到受宠若惊，一面叫人放掉万、黄，一面悄悄离沪抵港。杜月笙予以盛宴款待。席间，杜月笙对吴说，中国人不应该杀中国人，尤其是青帮兄弟更不应该互相仇杀。吴世宝一口答应。后来，双方果然不再大打出手，蒋汪的特工都暂停活动。上海的武装恶斗就这样被杜月笙轻而易举的"摆平"了，杜由此再次显示了大亨的手腕和势力。

尽管如此，杜始终觉得有寄人篱下之感。为此，他力图在大后方建立经济基地，扩充自己的经济势力。1938年，他到武汉找到孔祥熙，后又去昆明、重庆，准备重新做鸦片生意。几经奔波，他在戴笠的支持下，成立了港济公司，专门进行鸦片贸易，至于什么"赈济委员会常委"和赈济一事早已抛到了脑后。1939年，他接洽了3000多万元的定额，可拖了一年仍无法交货，心中十分焦急，忙前往重庆找戴笠，催促戴履行合同，否则他在香港再也呆不下去了。恰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日寇之手，杜侥幸未成为俘虏。但在重庆更感到处处掣肘，昔日的许多狐朋狗友也不再趋奉于他，只有孔祥熙、戴笠等少数人和他处得还可以。最使他伤心的还是蒋介石对他的冷淡。一天，孔祥熙私下告诉杜，蒋介石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杀一二个青洪帮头子压一压。孔说，他曾问蒋，别人拥护你，你为什么还要杀？蒋不置可否。杜吃惊不小，对蒋翻脸无情的作风大不以为然。后来，蒋果真借故杀了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大爷程泽润，引起几十万四川袍哥的愤恨，准备大闹一场。杜得知蒋准备大开杀戒的消息后，便出面劝阻袍哥的行动。他说，如果大家闹了起来，蒋会借口杀更多的人，因此不能莽撞。许多袍哥头子比较信任杜，也考虑到闹起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得罢休。从此，杜对蒋的看法有了明显改变。1941年，杜曾与杨虎、黄琪翔、章伯钧等密谋倒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杜在表面上仍对蒋十分忠心，为蒋干了不少事情，最主要的是他主持的上海统一委员会。这是蒋为保住上海这块阵地、加强和统一沦陷区工作而设立的。该委员会成立初得到的任务是稳住上海工商界打击汪伪汉奸，但很快夭折。此外，杜还帮助蒋

在上海沦陷区推销了几十万元的战时爱国公债。

抗战胜利后，杜以“抗战功臣”身份重返上海，一路浩浩荡荡，不减当年威风。不少人去车站迎接。此时的杜月笙大有上海帮会惟我独尊的气势。昔日三大亨中的老大黄金荣已年老体弱无力称雄，老二张啸林早已一命呜呼。作为老三的杜月笙自然有独霸天下之想。为了重振帮会，他竭力庇护一大批投靠日伪的汉奸帮会分子，为日后的东山再起蓄势。他经过多年的苦斗，得出结论，只有向政界发展才能使帮会有真正的靠山。因此，杜氏在抗战胜利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力图涉足政界。不过，蒋介石一直不愿公开重用他。而杜的野心又非常之大，一般的官职他还看不上。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杜月笙看中了上海市长一职。他想老蒋会念他昔日反共和长期为蒋卖命的功劳，一定会把职务给他。尤其是宋子文、孔祥熙等政界巨头也支持他，他更觉得上海市长一职非他莫属。可是，最终蒋却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长，为此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1946 年底，上海市参议会成立，杜又觊觎参议长之职。CC 系得知消息后，公开扬言，蒋已明确表示希望潘公展出任议长。杜哪肯服输，动员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打算使自己全票当选议长，然后“让贤”，这样既可保持老蒋的情面还可显示自己的实力。谁知投票结果公布后，选票中 1/4 是空白票，他虽获得多数，但距全票差得太远，最后职务还是给了潘公展，杜仅捞到个参议员。两次政界争雄遇挫给杜震动很大。他清楚老蒋并不想在政治上重用他。同时也表明，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杜还不是 CC 系的对手。他只好自我解嘲道：“推进社会力量、扶持经济事业以辅佐政府，乃个人生平夙愿。”

不过，杜从内心深处仍不肯就此罢休。1947 年，国民党选举行宪国民大会代表，杜决定再与 CC 进行较量。于是，他参加了上海市的“国大”竞选，以抢全市票数第一为目的。他一面要 CC 派分子吴开先领头提名，造成他靠拢 CC 的假象，一面则让恒社出面通知全体社员，让他们再转达所属组织及其有关人员都投他的票。但是，他的把戏早已给政坛老手 CC 系看穿，于是集中力量进行反击。结果，开票那天，市参议长潘公展得票最多，名列第一，在上海毫无基础的方治获得第二，他仅获得第三。这使满怀信心的杜大大地跌了价，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输得这样惨。

次年，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幕，一直未得到政治满足的杜又想进入主席团神气一番。他原以为南京方面的许多老朋友会支持他。他在选举主席团前两天摸了一下底，才发现可靠的选票少得可怜。他又气又急，气的是昔日老朋友大多已背他而去，急的是一旦进不了主席团，他感到丢脸。他连忙找到挚友、四川袍哥首领范绍增帮忙。范乃杜女儿的干父，两人私交甚密。范当即答应帮忙，杜才转忧为喜，告诉范他还差四票。范为了防备万一，给了杜六票。结果在开票时，范给的六票中只有四票投给杜，使杜刚刚够当选的票。事后杜出了一身的冷汗，对范感激万分。回到上海后，他把后来投他票的几个人好好招待了一番。

杜月笙在政治上的连连受挫既与帮会内讧日趋激烈有关，又与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人士对帮会的反感日渐强烈有关。但当时朝中有戴与杜勾结，杜在政界还算吃得开。1946 年，戴的暴亡给杜以毁灭性打击。此后，国民党高层人士逐渐削弱帮会势力，而且戴死后的“军统”秉承蒋的旨意也开始疏远杜，杜因此明显地走下坡路。

或许是预感末日即将来临，或许是故意向外界显示威风，1947 年 8 月 27 日，杜要在 60 岁生日之际大办庆典。他专门请狐朋狗友组成了所谓“祝寿委员会筹备处”，并利用一切关系进行宣传和联络。蒋为了表示祝

贺，亲笔写下“嘉乐宜年”镜框匾额并派专机送来。此外，蒋专派吴鼎昌代表祝寿，蒋纬国夫妇出席了寿典。南京政府要员宋子文、王宠惠、吴铁诚等也专程从南京赴沪祝贺，各省也都派代表参加。祝寿当天，去杜府的汽车有1000多辆，宾客达8000人以上。中央电影制片厂把这一热闹场面摄成了新闻片，在上海等地放映。不过，杜既然以“书生”自居，也就随时忘不了充当善人。他60大寿之时正值南方水灾横行，他在穷奢极欲之余提出搞祝寿赈灾的京剧义演。10天义演共得20亿元，这些钱全部存入中江银行，名义上他一文不沾，可是等他把钱取出时，米价已由30多万元一石涨至50多万元一石了。这种因钱贬值所得的巨额利润自然全部装进了杜的腰包。他捞了个名利双收。

无论如何，他的好景已过。他的60大寿似乎是一个预兆。CC派分子为了把持上海的权力，时时不忘拿他开刀。不过，他万万没想到，上海滩首行向他发难的竟是他的得意门生、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吴曾是恒社社员，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杜刚刚回到上海，他就派人到上海北站书写反杜标语，致使杜的专车临时改停西站，并在他主办的《诚报》上大肆披露杜的私事丑闻。杜又伤心又恼怒，这是30年来上海报纸第一次敢这样搞他，而且搞他的还是他的旧属。他决心报复，一面派人搜集吴的部下“劫收”的贪污劣迹，通过戴笠向南京方面告御状，一面指使手下在上海制造事端。吴遭到上下夹击，终以“办事不利”被撤职。杜仍不肯罢手，在利用报纸极尽咒骂、嘲讽吴之能事的同时，还派门徒暗杀吴，以斩尽杀绝而后快。毛人凤知悉后，赶紧派沈醉到上海制止此事，吴侥幸捡了一条性命。

这一事件过后，杜更引起了国民党一些高层人士的反感。尤其是当时身为上海经济督导员的太子蒋经国和上海警察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更是不满。他们认定杜不是个甘心受国民党政权约束的角色，决心用铁腕遏制杜权势的膨胀。1947年7月，法币贬值，物资奇缺，米价飞涨。杜的亲信管家万墨林(时任上海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上海农会理事长)囤积居奇，大发横财，引起上海人民公愤，人送绰号“米蛀虫”。宣铁吾见时机已到，决定杀鸡儆猴，下令逮捕万墨林，并向外界发表强硬谈话：“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矛头直指杜月笙。杜怎能意识不到这一点，知道硬敌不过，不敢公开出面袒护，但也极力招架，一方面大造舆论，称米价上涨是由共产党封锁造成的，与万无关；一方面亲自出马用巨款贿赂有关人员假造万的病危证明，把万保外就医。宣铁吾知道内情后，大骂杜氏“流氓”，但考虑上海帮会势力盘根错节，不可能彻底击溃，而逮捕万也只是敲山震虎，给一点颜色，因此并未深究。

经过这一番折腾，杜的勃勃雄心已减去大半，只要不让他过于难堪，他也不想惹是生非。但他的反对派却不肯放过他。1948年秋，他的三子杜维屏以“非法交易，投机倒把”的罪名被蒋经国关押，这真好似晴天霹雳，当时杜正大病缠身，一连好几天起不了床，可又不敢公开反抗，只好表示：“这孩子破坏了交易所的规章，应当查办，我决不保他。”背后却大骂蒋介石无情：“我捧老蒋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竟然连我的儿子也抓了！”接着又哀叹：“现在租界没有了，该是他要我下台的时候了。”

客观地说，这一件事纯属杜氏倒霉，因为上海的股票投机是人人皆知。蒋经国要到上海“打虎”，一时又找不到对象，恰好碰上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杜维屏(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他自恃父亲的势力，非要去撞蒋太子的枪口，在交易所外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在他看来，此乃小事一桩。没料到蒋太子偏要在这件“小事”上做大文章。不过，还算杜氏的运气不错，蒋太子碰上了硬钉

子。同年9月，孔祥熙的大少爷孔令侃和二小姐孔令俊所办的扬子公司囤积案发，蒋太子要严办这只“大老虎”，可孔少爷直飞南京，向宋美龄哭诉，宋出面调解，无效后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闻讯大怒，指责蒋经国蛮干，致使太子的“打虎”行动虎头蛇尾，自己也悄然离去。杜维屏因此只判8个月徒刑，后被保释，但杜从此威风扫地。

此刻的上海已有山雨欲来之势。而对末日的来临，身为“沪上闻人”的青帮大亨纷纷寻求出路，其中不少人与中共加强了联系。狐狸般精明的杜月笙自然不会放弃这条途径。早在抗战初期，他了解到八路军缺乏防毒面具，马上调拨上海抗战后援会募捐款1.6万元购买从荷兰进口的新式防毒面具赠给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他在避居香港后也表示要约束他的属下不妨碍共产党抗日救国活动。回到上海后，杜又与蒋介石勾结，从事反共勾当，但杜维屏被抓一事对他打击很大。此后，他虽曾参与由蒋炮制的上海“国际化”阴谋，但已丧失了早年的反革命热情，对于是否离开上海显得犹豫不决。然而，一件小小的插曲终于使他决心离沪抵港。

一天，杜府来了位不速之客，送来礼盒。杜打开一看，里面一封信赫然写着：“老杜，兄弟如今手头紧，特向你借5万元美金，明天来取。”杜未看完贴子就已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出天，当下就把贴子撕得粉碎。他一面与警察局联系，一面布置人马，准备抓住敲诈者后狠狠整一整，让他尝尝杜某人的滋味。尽管布下天罗地网，次日还是有五个人硬是来到杜公馆，他们每人身上缠满手榴弹。杜氏一看，一旦打起来，将会同归于尽，只得忍气吞声把钱拿出来。这伙人见钞票到手，道：“多谢老杜慷慨，兄弟们还得麻烦杜兄送我们一程。”到了这个份上，杜氏早已无大亨的威风，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车。车开了很远后，他们才把杜扔下，扬长而去。

杜又惊又怒，惊的是以后难免有第二次，怒的是成名以来第一次在阴沟中翻船。他越想越后怕，觉得上海确是是非之地，还是走为上策。所以，杜于1949年1月以45万美金的低价把他杜美路70号的房子卖给美国领事馆，下定了逃亡的决心。4月，蒋介石在上海会见杜月笙，威胁他说：“‘四·一二’清党，你在上海是出了大力的，还亲自派人处决了汪寿华，所以你不能留！”接着，他为蒋经国扣押杜维屏一事向杜道了歉。杜心中对留下更怀恐惧之感，于4月底便举家迁往香港。

上海解放后，章士钊亲赴香港，劝杜回沪，杜子维翰、老友杨虎也写信要他返回，他都婉言拒绝，但表示：他在香港决不从事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并要求他在上海的门徒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逝，潘汉年代表政府同意其家属在上海《新闻日报》上刊登讣告。而他本人的遗体被他的老婆和旧友顾嘉棠运往台湾，停在寄柩所内。显赫一时的杜月笙落得个凄凉下场。

汉　奸　张　啸　林

20世纪20年代后期，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结为八拜之交，并称上海滩“三大闻人”。实际上，他的实力和声势远不能与黄、杜相比，而且他还是一个短命闻人。

张啸林，1877年生于浙江慈溪，原名小林。因他从小顽皮，不受约束，又长得虎头虎脑，取乳名阿虎，到上海后改为现名，取“猛虎啸于林”之意。张本生于穷人家，父亲不幸早亡，他就整日在外游荡、寻衅打架。后因实在难以在乡里混下去，全家迁往杭州府拱宸桥。拱宸桥一带是流氓地痞出没之地，张啸林如鱼得水，很快就和当地流氓混成一团，专以打架行凶、豪赌敲诈为生。转眼间几年过去了，张觉得这样混终不是出路，他认为自己是个干大事业的，于是就硬着头皮报考了浙江武备学堂并被录取。这家学堂专门训练武官，半天练武、半天习文，还可自由自在地练枪打拳。张虽无心读书，但却写得一手好字，所以这种学堂正合张的心意，将来还可以有朝一日登台拜将。不过，他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武备学堂被撤销，他不得不重新回到杭州街头。

张啸林流浪期间，结识了一个唱滩簧的陈效岐。此人专演浪荡货角色，人称“马浪荡”。两人臭味相投，一见如故，很快就结拜为异姓兄弟。他俩常常走在花轿前，或者是跟在送殡的行列后面，吹吹打打，混口饭吃。一次，张啸林正跟着一支送殡队伍前行，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日本妇人身上。日本人以为中国人故意挑衅，三四个人抓住张啸林便打，张啸林刚要还手，被马浪荡拉住，又作揖又赔礼地才算了事。张啸林哪吃过这样的亏，等棺材到了坟地后扔下乐器，掉头就走。他一路走，一路纠集浪迹街头的流氓乞丐，还拉拢了不少平时受日本人气的工人、平民，一路浩浩荡荡，冲向日本人经商的聚集地，不分是非好坏，把几家日本商店砸了个稀巴烂，然后扬长而去。日本人怎肯罢休，告到县衙门，要求缉拿带头闹事的凶犯。张只好逃到老家慈溪躲了起来。

虽说是避祸，但张实在耐不住寂寞，整日喝得醉醺醺的，寻衅滋事。后在老家实在呆不下去了，才逃往上海闯天下。

到了上海滩，张啸林首先投拜青帮元老曹幼珊，后经曹引荐，他又拜樊瑾成为师，成为青帮兴武六帮的“通字辈”。张啸林胆大果断，凶顽异常，讲究江湖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对孤身女子不欺侮，他认为“好男不和女斗，从弱女子身上敲竹杠没有本事”。他专拣硬的碰，械斗起来，手持铁棍，上下飞舞，大有李逵入阵之势，人送外号“张大帅”——因为他常自比为奉系军阀张作霖。

当新开河码头建成后，外省船商因不堪上海稽征吏的勒索，纷纷求张啸林等青帮流氓帮忙。张手拍胸膛，满口答应，让船商到别处卸货，并说：“出了事，我顶着。”稽征吏得知张啸林暗中捣鬼，不由怒火胸中烧，决定结果他的性命。一日傍晚，张啸林正在南码头联

系事务，十余个稽征巡警涌上前来，不问情由，劈头盖脑一顿臭打，张拼命抵抗才得以逃脱，但已被打得皮开肉绽，休养了数日才得以康复。他咽不下这口气，派人打听这件事起因。当他得知率众打报的是巡警头目“金狮狗”时，发誓要报仇雪恨。可他又听说金狮狗是一个手段非常残忍的家伙，而且有官府后台。于是他就请三十六股帮流氓头子“吊眼阿定”助他一臂之力。吊眼阿定也曾吃过金狮狗的亏，当即答应帮忙。一天上午，金狮狗正独身一人巡查商船时，张啸林、吊眼阿定等十余人突然窜出来，铁棍刀棒一起上，把个金狮狗打得鬼哭狼嚎，然后这些人又把他拖到江边，抛到停泊在江边的大粪船中。金狮狗虽保住了性命，但已饱尝了大粪滋味儿，再也不敢在码头露面了。正是靠这种凶顽，张啸林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也就趁势在沪、杭一带广招门徒，发展自己的势力。

不过，张啸林和官府搭上关系却颇富戏剧性。一天，他开的旅店里来了位客人，穿着讲究，举止大方，手拿公文包，俨然官府中人。奇怪的是，这客人一住就是 20 多天，房钱却一文也不交。张啸林火气上升，准备给这位客人点颜色看看，便闯进客房，粗声粗气地说道：“朋友，白吃白住总不是个办法吧！我这里可不是救济院。”哪知这位客人并不惊慌，问道：“张老板，你难道怕我赖账吗？”张被问得有些尴尬，觉得此人有来头，便道：“先生，您错了，我只是看看先生出了什么事，我是个粗人，讲话没分寸，还请包涵。不过，我这人喜欢交朋友，您有什么难事，但说无妨。”这位客人见张如是说，倒也不客气，说：“张老板，既然如此，我也就直言相告。我的一位朋友在北京段祺瑞手下做事，我想托他谋个差事，现已有了回音，我想在上海买些礼品，可我又没那么多钱。我写信向家中要钱，至今无回信。钱一汇到，贵店的费用一文不会短少。”张啸林觉得此人进京谋官，日后必会大有前途，应该交这个朋友，于是就显出一副豪侠心肠：“先生，你需要钱，尽管开口，只要我拿得出，我必给你凑齐，以免耽搁先生的前程。”这位客人好像也并不难为情，说只有 200 元就够了。张啸林真不含糊，当即拿出二百大洋相送。

时间过了两个多月，走了的客人一点消息也没有，张啸林不免有点受骗的感觉，眼看二百大洋“放了白鸽”。过了许多天，店里来了两个身穿警服的人要面见张啸林，其中一位双手递上份公文，说：“我们是淞沪护军使衙门的副官，奉命给你送这件公文，上司一定要我等面交张老板。”张啸林犹在云里雾里，不知何时与政界有了瓜葛，心中真有些忐忑不安。他打开信封一看，原来是张“淞沪水上缉私总队长”的委任状。他一打听才知那位曾受恩惠的客人现已成为淞沪护军使的总文案，为了报恩，他送给了张这个肥缺。

张啸林意外收获，穿上了缉私队的警服，变得更加颐指气使、横行无忌，财源也滚滚而来。因为缉私队名为水上缉私，实乃上海衙门对水上船只敲竹杠的机关，尤其是对那些本小利大的鸦片贩运之船，他更是雁过拔毛，为此不惜大杀大砍，搞得许多鸦片贩子纷纷求保于张。有一次，张截住一艘鸦片船，与前来抢土的杜月笙大打出手。不打不相识。杜月笙听说这只老虎原来也是青帮兄弟，比自己大一辈，和自己一样“亨”，开始注意与之结交。双方臭味相投，很快就达成合伙走私鸦片的协议。时隔不久，黄金荣因卢小嘉之事与卢永祥发生冲突，而张啸林曾与卢永祥在浙江武备学堂是同学，关系较深，因此张亲自出面调解，卢黄之争才得以平息，黄对张也愈加信任。随后，黄、杜、张结成八拜之交，三人中以黄为长、张次之、杜居三。黄金荣把法租界华格臬路两亩地基赠与张、杜。从此，三人互相勾结，横行上海滩，成为沪上三大“闻人”。他们上可影响当局的决策，下可决定普通百姓的生死，气焰十分嚣张。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张伙

同黄、杜充当反革命打手，并亲自出马鼓气，亲率帮会流氓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但事后只有杜月笙获得蒋的召见，张妒火上升，对杜心生不满。不久，以张为首的“中华共进会”遭到法租界禁止，他又对黄大表不满，两人一度避免见面。三大亨的间隙由此出现。

不过，由于“四·一二”中的反共表演，张仍然成为国民党的大红人，声势更壮、威风更大。他托黄金荣从蒋介石那里给自己的长子张贵显买到了一个国民党内政部次长的官职。他做上海闻人，儿子在南京为官，张家俨然成了上海的显贵门第。张依靠自己的权、财、势在上海滩逞尽威风。

1929年，上海静安寺路变得日趋繁荣起来，张看中静安寺旁一片空地，想用其为公司之基，可是已被上海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租去，于是就派爪牙俞叶封去见静安寺方丈，要求买下这块地皮，方丈拒绝，俞又提出租用，方丈说已租予朱总经理，让他去找朱谈。张于是亲自出马来到朱的寓所，说他愿以高价从朱手中转租那块地皮。朱深知张的心毒手狠，心中不快却未直接拒绝，提出将吴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一块地皮租给张作为交换。张则非要静安寺那块地皮不可，朱也上了火，执意不肯，两人争执不下，张愤然离去，走时甩下一句话:“那就走着瞧吧!”

几天后，朱携护士乘车出外，刚刚出了弄堂口，一伙蒙面大汉突然冲出，向汽车连连开枪，令车停下。等车停下后，朱已中弹昏死过去，护士小姐手上也中了一弹，吓得昏了过去。两个蒙面人过来打开车门把朱拖上自己的汽车扬长而去。朱家立即报了案。案子出在英租界，英捕房根据调查怀疑是张啸林所为，可无人证物证，而张又是上海滩的显赫人物，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朱家见公办无效，只好托人面见黄、杜，黄、杜两人早知是张所为，只好敷衍了朱家一番。朱家无奈，直接求情于张啸林，而张则闭门不见。朱家转而又请青帮元老张仁奎出面。张仁奎早年曾与朱有一段交情，便一口答应下来。张啸林在张仁奎的压力下，同意放人，但要求大笔赎金。朱家只好破财免灾。结果，人是放回来了，可是朱因伤势过重，很快死去。由此可见张啸林的凶残之一斑。

30年代以后，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势力已远远超过了黄、张。张啸林更觉得难以忍受。1935年，蒋实行“法币”政策，杜事前闻讯后大捞一把，却没告诉张，气得张大骂杜氏全无交情。张的门徒见杜的力量日盛而张脾气暴躁，便纷纷改投杜门，张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张的次子张清尧从法国留学归来，张很想让老蒋栽培他一下，于是尽弃前嫌，托杜向蒋疏通。蒋在接见张公子时听说在法国读书一年要花十几万元，心想这肯定是个花花公子，便不肯重用。张大骂蒋氏无情，又抱怨杜不尽心帮忙，杜听了很不高兴。张、杜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张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大大改变。

“八·一三”后，上海沦陷，张躲到莫干山张公馆中避难。蒋劝他离沪赴港，他充耳不闻，一是不愿再与蒋合作下去;二是认为这是他独霸上海的大好时机。恰在此时，占领上海的日本人要扶植汉奸政府。他们首先收买的汉奸是傅筱庵。傅正准备成立伪“大道市政府”时被人刺杀了。日本人又急匆匆地再次物色对象。这次他们选中了张啸林，因为他是上海的“闻人”大亨，在上海势力雄厚，可以一呼百应，于是，日本人就派人到莫干山与张密谈。张看到以往三分天下的局面现已只有他自己在独撑市面，不由得野心勃起，欲将原三人势力统一起来，由他独霸上海，因而一口答应帮助日本人治理上海。

张得意扬扬地回到上海，大有上海滩惟我独尊的架势，随即他组成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专门为日本侵略者采购急需的物资，而他自己则大发国难之财，把个汉奸嘴脸表演得淋漓尽至。远在香港的杜月笙觉得张已走得太远，念其旧交，来信劝张谨慎从事，

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张对此嗤之以鼻,仍我行我素。1939年冬,张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支持下,准备成立浙江省伪政府,自任省长。国民党军统得到这一消息后,决定除去张啸林。为此,戴笠通知杜月笙,要杜“大义灭亲”,帮助行动。杜则以有手足之情为由,不忍下手。不过,杜的许多门下早已加入军统机关,大搞“铁血除奸”的恐怖活动。军统决定瞒着杜下手。杜的门生、军统特务于松乔奉命刺杀张啸林。等张的汽车开近时,于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胡乱放了几枪就赶紧溜走了。张不仅皮毛无损,而且还认出了杀手是于松乔,当下张口大骂杜的黑心无情。

这次刺杀并未给张造成多大的精神压力,张反而变本加厉地与日本特务勾结。军统吸取第一次失利的教训,决定先从张的爪牙下手,第一个目标就是张的儿女亲家俞叶封。俞是张的左膀右臂,杀掉他就等于杀去了张的一半性命。一天晚上,俞叶封像往常一样来到更新舞台为一女伶捧场,俞正得意忘形地击手拍掌、大声喝彩时,突然枪声大作,俞本能地趴在地上。枪声过后,俞睁眼一看,自己倒无任何伤害,而他身旁的老友吴某却满身枪眼,当了替死鬼。对俞的遇刺未遂引起了张的警戒,他开始想到有一天会遭到暗杀。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扩充势力为自己壮胆,张开始大肆招兵买马。也就在此时,他招到一个得意的保镖——林怀部。张与林怀部的父亲曾有私交,林枪法奇准、臂力过人,毛遂自荐替张当保镖,张自然大为高兴,哪知这却是他的索魂人。

不久,俞叶封被刺身死,张大有兔死狐悲之痛,预感到末日将至,从此足不出户,戒备重重。时间久了,这种囚犯式的生活他怎能熬得住!张终于胆子又大起来,每天晚上带着保镖外出,10名保镖分乘三部汽车为他保驾。一天晚上,当张的车队开到善钟路(今常熟路)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交叉处,突然前面亮起红灯,张的车队只好停下。就在此时,周围一片机关枪声。张的司机王文亮见状,本能地一踩油门,汽车猛地窜了出去,张才侥幸免于死在乱弹之下。

从此之后,张犹如惊弓之鸟,几乎每晚都恶梦缠绕,常常睁着眼睛到天亮。晚上睡不着,只好白天补,所以张的午睡时间特别长。1940年8月14日中午,张吃过午饭刚刚睡下,忽然外面传来阵阵吵闹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他侧耳细听,原来是保镖林怀部同司机王文亮在吵架,而且就在自己的卧室窗口下面。张大怒,穿上拖鞋。奔上阳台,连连大声呵斥,骂他们不知好歹。林怀部从腰间掏出手枪,骂道:“老子受了委屈,还用你这个老汉奸来教训,送你上西天算了!”边说边向张连发数枪,几乎每颗子弹都命中要害,一颗子弹从喉部穿入自眼部而出……正好在此作客的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出门想看个究竟,也被林怀部当场击毙。

张被杀后,林怀部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杜月笙、军统都纷纷否认与己有关,但林怀部曾是杜的亲信万墨林的密友这一线索就很值得注意。后来,万也私下承认,他与此事有关,只是杜不愿担当谋杀同门兄弟的罪名而不公开承认而已。

竹　联　帮

天下第一帮

1949年，即民国三十八年，几百万人随着国民党政府一涌而入台湾，使整个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陷于混乱状态。这些来自大陆各地、操着不同方言、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外省籍人与本地居民挤在这块弹丸之地，所受的生存压力简直难以想象。大批青少年由于失业、失学或家长的疏失而流落街头，聚众斗殴。尤其是那些刚踏入人生大门的外省籍孩子，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后，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父母因苦于生计而疏于照顾，因此常受到本地弟子及社会渣滓的殴打侮辱，受的罪也就更难想象。渐渐地，他们开始抱团成伙，依不同的居住区、出身和就读的学校而形成不同的派别，以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来渲泄心头的失落感和苦闷心情，用拳头和刀棒来维护各自人格的尊严，回敬仇敌的凌辱。

因“江南命案”而“闻达于诸侯”、“亨誉”于海外的竹联帮，便是这些少年帮会中的声名最著者。

竹联帮是竹林联盟的简称，因其组建地而得名；正式立帮的时间是1953年，当时叫中和帮，由一个叫孙德培的中学生率领，其成员也大都是台北市永和镇的中学生。刚开山时，也只是十几个人的一支小太保队伍。

孙德培个子矮小，难免会常常受到那些人高马大的同学欺侮。他的父亲就请了龙虎武师教他武术，使其练就了一身娴熟的功夫。拳头硬了的孙德培在混战中崛起，由孩子王而为一帮之主，可以说是顺理在章。他率领手下的“五虎将”，与其他少年帮派争夺地盘，向摊贩收取“保护费”，很快就成了从萤桥到秀朗与永和交界的一条条街上的霸主。刺杀江南的现场主持人陈启礼，就是这个时期拜入中和帮，开始他的黑道生涯的。

一年之后，孙德培在一场帮派火并中打死了一个叫周天送的少年，锒铛入狱。失去头领的中和帮因“五虎将”的互不买账而成分崩离析状，甚至有人投入了敌对的四海帮和万国帮。五虎将之一的潘世明于1955年率先组成万字帮，在水源地一带打天下；另一位虎将湛洲吾于1956年2月也拉出一个山头，组成三环帮，在台大、师大、泰顺街一带混世界。剩下来的帮众虽仍然奉中和帮为正宗，但常常内讧，属于强恕中学的学生与属于励行中学的帮众经常打得鼻青脸肿。结果，这竟然成了中和帮兴旺发达的契机。

1956年，以赵宁为首的几位“有识之士”，痛感于中和帮的中落，倡议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克服分裂、重振声威。这一倡议得到不少好事之徒的响应，他们于6月的一天纷纷赶到永和镇竹林路尽头的一片竹林里，结成了所谓“竹林联盟”，即竹联帮。这时候你如果恰巧路过，走进这片茂密的竹林，便会幸运地看到这一番只能在章回小说中看到的情景：

两百左右的中学生混混儿围着一罐酒席地而坐，都是一副郑重其事的模样。从中走出几个头领模样的人来到酒坛子前，把三柄

匕首一一插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

“第一刀，插中央，叛帮出卖兄弟的，千刀万剐无人葬！”

“第二刀、第三刀，刀口刀刃向外方，齐心协力对外帮！”

三刀插毕，众人依次沥血入酒。几个帮众排开一圈大海碗，斟上血酒。先是几个帮中头领，即后来的各堂堂主捧起海碗，口诵帮词：“竹叶飘飘片片生，竹棍光光根连根；狂沙万里皆竹联，傲笑江硝惟竹尊。”诵毕，仰头将血酒一口饮下。其余帮徒，效仿首领们，一一来过。

成立之初的竹联帮，约两百来人，大都是安置国民党军人及家属的“军眷区”内的中学生。为表示对身在狱中的孙德培的尊敬，规定不设立帮主。帮中设堂，各堂有“掌法”一人，主管堂中事务。帮中大事则由各堂掌法会商处决。当时设了狮、虎、豹、凤、鸭五个堂口。其中鸭堂的掌法是周榕，绰号“旱鸭子”的陈启礼便是他手下的一个小混混。这一时期，竹联帮主要在冰果店一带活动，以打群架、向摊贩和三轮车夫收保护费为主要活动内容。武斗时多以钢丝鞭、飞轮等“冷兵器”为武器，偶尔出现一、两把武士刀就称得上“现代化”的东西了。

进入 60 年代，竹联帮的势力开始强盛起来，“旱鸭子”陈启礼脱颖而出，坐上竹联帮的前排交椅。旱鸭子的飞升和竹联帮与四海帮的“世仇”有关。

四海帮的骨干分子是台湾大学的学生。1955 年 5 月，一名冯姓和一名王姓的大学生，在台湾大学校园内召集了 44 名一二年级学生，以四海蓝球队的“四海”为名，组成四海帮，成为台湾第一个最具组织规模的青少年帮派组织。四海帮的成员多为富家子弟，有些还是国民党高官之后，因而帮会的财政基础好，帮众的文化素质也高。他们以“有难同当，有福共享，打平台北”为口号，以“一条心，二不白(不白吃、不白嫖)，三结义，四海为家”为帮决，以某些帮众家的公馆为据点，活动于西门町、台湾大学、北商一带，专门找“凯子”打架斗殴。凯子就是他们看中的有钱好欺侮的富家子弟。竹联帮的陈启礼、董桂森这两个“江南命案”的首犯，在读中学时就当过他们的凯子。可以说，竹联帮帮众与四海帮的仇恨始于他们成为帮众之前。1959 年 9 月，竹联帮初定“帮规”时，第一条就是“专门对付四海”。可见，打击四海帮乃竹联帮的第一使命。

竹联与四海的打斗几乎从未止息，双方的恩怨也就越结越深，1959 年，四海联合文山、三环等几个小帮派，大举围剿竹联，迫使竹联退避三舍，含韬养晦。如果说黑道活动就是地下活动的话，这时的竹联就是处于地下的地下了。1960 年，经过一年涵养的竹联恢复活力，并在春节之夜绑架了四海一个绰号叫加贝的头目，带到中和郊野施以酷刑，剃了他全身毛发。嗣后，竹联乘胜追击，收复失去的地盘，一时间名声大噪，不可一世。1962 年 3 月 6 日，四海帮因犯案而宣布“解散”，帮中干将纷纷金盘洗手；竹联帮乘虚而入，直捣四海帮老巢，使其一蹶不振，沉寂多年。此役的头号功臣，便是陈启礼这只与四海仇恨似海、在战斗中茁壮成长、在竹联帮内羽翼渐丰的旱鸭子。

60 年代前期，竹联帮在人才方面亦有充实，一批后来成为其灵魂人物的新鲜血液加盟竹联。1964 年，在南海路帮担任“护法”之职的张安乐投身竹联，成为竹林中的一只“白狼”。此人旋即成为竹联的狗头军师，在“江南命案”查审期间曾公开在大众传媒露面，名噪于海内外华人社会；向江南射出致命一弹的“鬼见愁”吴敦，也是在 1965 年与白狼前后拜人竹联。

这一时期，对竹联邦势力膨胀贡献最大的当数另一位新进人物绰号“杨站长”的杨剑平。他率领凶狠的“竹联远征军”四面出击，横扫台北市各地大小帮派，尤其是打下了西

门町这块原属四海帮的“黄金宝地”，从经济上保障了竹联势力的进一步扩张。至 1966 年，竹联帮已有帮徒上千人。在接掌了台北市帮派的龙头地位之后，其远征军更南下台中、桃园、嘉义、台南、高雄、彰化；打拉结合、恩威并施，铁蹄所到，各帮派望风披靡，大有一统江湖之势，被当时的黑道许为“天下第一帮”。

黑道“现代化”

60年代后期，台湾经济起飞，现代经浪潮之中黑道角头帮会在组织结构、武器装备、观念意识等诸方面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最早具有现代社会组织特色的是竹联帮的世仇四海帮。前面说过，四海帮的骨干是一批大学生，成员文化素质较高。建帮伊始，他们就效法其父辈治党治军的方式治帮。帮中元老十分重视人才的吸收和训练、订有考核制度。考核分初审、复审、决审；考核的项目包括体力、智能、反应、口才、仪表等。帮众有职业化分工，分属于战斗组、社交组、经济组、内务组等。四海帮也是最早走向企业化道路的黑帮之一，他们仿效美国的黑手党，以发展企业作为帮派生存的基础。除开设赌场、舞厅等特种营业之外，还在台北复兴北路开了个期货公司，大搞买空卖空，在买进卖出的差额上做手脚。参与期货买卖的商人如发觉受骗上当要报案。他们就亮出凶器，露出黑道的本来面目。有了本钱的黑帮进一步公开化，纷纷组建营造厂、建筑公司、煤气公司等合法企业，甚至开始插手演艺界，组成影业公司和大众传播公司，以暴力为后盾，包档包秀，从歌星影星身上大赚香艳之钱，又得皮色之便，可谓双倍的实惠受用。

就在竹联帮拳打全岛之际，它也开始向它的世仇四海帮看齐，注重人才培养、组织管理与企业经营。其中发挥过关健作用的有灰鸭柳茂川、白狼张安乐、元老周榕，当然也离不了陈启礼这位竹联帮的“教父”。

1967年，柳茂川服役退伍后，靠着家中的万贯家私，从永和镇选了几十名竹联帮众，在新生北路“中兴妇孺教养院”中集训，成了竹联帮训练杀手的高等学府。这批未来的杀手每日里跑步、打球、练剑道，灌输帮派思想，传授黑道活动经验，交流临场打斗体会。柳茂川组织的这个“战斗堂”，实际上已具有一定的职业武装性质，后来竹联帮的突击队即是在此基础上组建而成。

大约在1967年底，陈启礼在赌场中结识“赌博郎中”陈仁。旱鸭子慧眼识英才，将其网罗入帮，从此两人通力合作，一个诱“凯子”入局，另一个则凭高超的作弊手段榨财，自然是财源滚滚、财星高照。早期竹联帮众靠家里零用钱接济度日的时代一去不再。

1968年，竹联帮杀手型巨头之一，绰号“杨站长”的杨剑平因打斗犯案，与几名竹联头目相继入狱；1970年7月，“赌博郎中”陈仁私吞帮中60多万元台币的基金后想抽身脱帮，并向警方请求保护。陈仁的叛帮行为迫使新近成为帮中实际上第一号人物的陈启礼不得不动用帮规，清理门户。否则既不能服众，也不足树威。旱鸭子派出张如虹等三人，在西门町闹市区找到陈仁，将其连砍三刀。竹联帮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人群中行凶杀人，震动了整个台北，成了当日各大小报的头条新闻，警方因之大力搜捕陈启礼等人。7天后，陈启礼在台南市的藏身之所被逮捕，送绿岛管制6年，作了当代最著名的知识分

子李敖的“同窗”。

竹联帮巨头纷纷落入法网，一时间元气大伤，进入不景气阶段。这时“白狼”张安乐在几位帮中头领的敦促下粉墨登场，重组竹联。张安乐是淡江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凭着学得的一些历史知识，模仿满清八旗旧制，组成了“新竹联”。新竹联制定红、白、黄、蓝、黑、灰各色旗帜、用虎、豹、龙、狮、熊、凤、狼、鸟为名立堂，确立堂口制度。每堂有堂主、护法、副堂主等人，张安乐自任总掌法，遥尊陈启礼为总堂主大哥。新竹联在其成立大会上确立了遍设赌场广开财路、吸收新人扩大基层组织两项方针大计。

张安乐意识到在工商社会之中，发展组织最有效的途径也是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是能搞到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组织才能生存壮大。暴力只是手段，暴利才是目的。因此，他在广辟财路的同时，完善了帮内财务管理体制，建立了所谓“母金提留与流动资金的分层管理制度”。其要点是，基层组织开赌场及收取的“保护费”、“抽头”，分层上缴留成，缴入总堂的称为母金，平时不得动用，专为受警方通缉的在逃帮众和抚恤入狱帮众及在打斗中死伤帮众的家属而备，也可以视财政状况的好坏而作为开设新企业的本金。

竹联帮的基本成员都是些在校或中途退学的中学生，打架虽然狠凶，常常令四海帮的大学生帮众望风而逃，其仪表风度却没法儿跟人家比。张安乐出掌新竹联后，一方面向他们灌输“国家民族”观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教他们待人接物的礼数，把他们手上的破表换成金表、布鞋换成皮鞋，让他们脱下牛仔裤、T恤衫，换上了西装领带、名牌衬衫。在张安乐的着意整顿下，这批新竹联小兄弟的帮派意识已初步成熟，其手下“鸟”、“狮”、“豹”辈的弟兄一个个沐猴而冠，为人练达起来，亦能担当独挡一面的重任了。

白狼张安乐虽然宏才大略，但资历不深，难令以周榕为首的老竹联帮众服气。这期间的竹联实际上分成了新旧两派，双方各行其是，互不买账，后来在柳茂川等人的协调下，才勉强组成松散联合。这期间发生了新竹联分子在台北街杀人为警方通缉的事件，新竹联在警方压力下被迫解散。同时，张安乐也因帮内分子的明争暗斗而心灰意懒，于1975年去美国留学深造。

在陈启礼被管训之后，竹联元老周榕成了名誉老大。周榕早在中和帮成立之初就是“五虎将”之一，排名“老幺”，竹林结盟之后，仍然位居“老幺”，是陈启礼的顶头上司。他可以说是竹联中自始至终仅存的资深头目，即使作了竹联帮教父的陈启礼，对他的所作所为也不大管束，留几分香火之情。周榕曾在国民党军队干过几年，混过少尉军衔后退役。退伍后的周榕立即与往日的竹联兄弟沆瀣一气，开赌场、办公司、插手演艺界，是竹联帮走向企业化道路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周在作期货生意时结识了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重要成员永野一郎、未户千秋等人，于是走向黑道国际大联合的道路，双方在台北敦化北路国泰金融中心买下两层楼面，办起了“香港恒升国际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这期间，竹联帮在武器装备上也逐步实现了现代化，进入“热兵器”时代。他们用已掌握的现代化武器，与“世仇”四海帮狠狠地干过几仗。先是与竹联帮交往密切的港台武打明星王羽等一干竹联兄弟，在台北民生西路杏花阁酒家，为争夺一个绰号叫“贵妃”的粉头而与四海帮人马大打出手，开枪见血，酿成所谓“杏花阁大血案”。其后，已入竹联帮的王羽在台北南京西路天厨餐厅吃饭时为四海帮头目刘伟民所派的枪手暗算，受重伤后幸免一死。不久之后，台北法庭开庭审理“天厨餐厅血案”，王羽手下竟在法庭走廊上当众砍了四海帮头目刘台生一刀，造成轰动港台各界的“法庭大血案”。

“三血案”之后，竹联帮为警方所忌讳，气

焰稍有所抑。

1976年，旱鸭子刑满获释，飞回台北。他先是有过脱离黑道，过普通人生活的念头，多次拒绝与往日弟兄来往。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方面是往日弟兄的拉，另一方面是警方与社会大众的推。于是，在白道上谋生有成的陈启礼再度下海，重整竹联帮。

在监狱这所大学校磨练成熟的陈启礼如今已是今非昔比，更上层楼。竹联帮在他出任总堂主后，势力急速扩充。到80年代初，已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天、地、至、尊、万、古、长、青、东、西、南、北”等28个堂口，每堂二三百人不等，最多者800多人，总计约有三四万人之众。其基本帮众仍是失学、逃学的中学生，称为“竹叶青”。一时间，“竹叶青”满街头，竹联帮处处有。竹联各堂口之间基本上独立活动，只维系一个联盟的形式。但陈启礼由各堂口中挑选出了一批强悍的帮众，组成所谓“竹联帮突击队”，由总堂直接指挥，专门用于需要显示武力的场合。因为组织过于庞大，各堂口之间有时也会发生争夺地盘之类的打斗事件，连陈启礼这样智勇双全、德才兼备的人有时也觉鞭长莫及，难以控制。

竹联帮各堂口以收保护费、开赌场、搞色情特种营业为重要经济来源。除控制电影院、戏院、夜总会及其他娱乐场所外，还拥有各种合法商店、公司，从事建筑、水电、桥梁、公路、铁路等工程的承包施工，并开设银行，投资金融事业，代办运输，插手营运业等等。陈启礼为扩大社会影响，还极力打入文化圈，出版报刊杂志、直至侧身于社会名流。据好吹牛的“黄鸟”陈志一透露，竹联帮实际上控制了台北市50%以上各类型生意。财大气粗后的竹联帮鸟枪换炮，除各堂口配备有先进的枪支弹药外，还有武装组织“突击队”和训练专职打手、杀手的训练营。从1982年起，在石碇山区、鹭鸶溪畔的训练基地，每三个月就有一批职业凶手学成毕业。竹联帮还拥有自己的律师，“拿法律玩玩”还不算什么，甚至插手地方选举、操纵地方政治动作。处于鼎盛期的竹联帮，更把其势力延伸到港澳和海外华人社会。这期间，赴美留学、经商的竹联骨干分子“青蛇”邓国沣“黄鸟”陈志一、“白娘”张安乐等人在美国打下了基础，其成员遍布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休士敦、费城等大城市，号称1万多人。在香港，竹联帮设了分堂——侨堂，帮众约150多人，大都栖身于娱乐圈或体育界。另外，日本、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南非等地也有竹联帮的势力。上述国家和地区与竹联帮挂钩的黑社会组织计有：日本的山口组、赤旗军；美国的华青帮；菲律宾的虎克堂，香港的十四K等。

据台湾特务机构透露，1985年前后，竹联帮主要堂口及头目如下：

总堂主：旱鸭子陈启礼

总护法：鬼见愁吴郭

执　法：陈功

总巡查：幺幺黄少岑

巡查：汪沛雷、船长林庆增、小蔷薇张启民

忠堂：堂主董桂森

孝堂：堂主花枝花继忠

仁堂：堂主项美华、副堂主冯在政

爱堂：堂主刘振南、副堂主张恕隆、汪裕弘

信堂：堂主蕃薯邱文钦

义堂：堂主大锤杨榕顺

和堂：堂主周士弘

平堂：堂主小鬼黄云龙

天堂：堂主狗仔王国庆

地堂：堂主李宗奎、副堂主张北华

至堂：堂主小佛张伟华

尊堂：堂主彭荣沪

万堂；堂主阿斌

古堂：堂主阿南陈永南、副堂主郑文斌

长堂：堂主郅长老

青堂：堂主老鼠何根成

一帆风顺的陈启礼这时已是得意忘形，不思进退之度，竟想效法青帮大亨，作杜月笙

第二。1984年8月，陈启礼从国民党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处接受刺杀美籍华人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的密任；同年10月15日，江南命案发生；同年11月13日，台湾当局为了控制局势，掩盖江南命案真象而实施所谓“一清专案”，陈启礼第一个被捕，此后，竹帮重要成员数百人相继落网。

1985年1月，潜至日本的竹联帮“冷面杀手”刘焕荣被日本警方逮捕，随之移交台湾当局。

同年9月16日，竹联帮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分支机构被美国联邦警察局破获，首要分子无一漏网。

同年9月20日，杀害江南的凶手之一董桂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被捕归案，引渡美国。

至此，横行江湖三十年的竹联帮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但有道是，百足之虫，虽死尤僵，谁也吃不准这个黑道大帮会有没有重振雄风之日，东山再起之时。

杜 月 笙 第 二

前面说过,旱鸭子陈启礼于1962年率领一帮弟兄端了四海帮的老巢。竹联帮由此兴旺发达,成为“天下第一帮”,陈启礼也因此脱颖而出,进而成为该帮的龙头老大;1984年,陈启礼受国民党利用,制造了震惊海内外的“江南命案”,导致竹联帮土崩瓦解、一蹶不振。因此,可以说竹联帮的兴衰与旱鸭子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旱鸭子从一个受人欺诈的中学生成长为名噪海内外的黑道一霸,在台湾新一代黑道帮派人物中,也可说最为典型。

陈启礼祖籍江苏太仓,本人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1949年,7岁的陈启礼随着父母一道去了台湾。

陈启礼怕父亲现在是台湾一家大报《联合报》报社的人事室主任,名叫陈钟曾。在大陆时曾任职于四川省政府,到台湾后,长期任法院推事。陈的母亲也在同一家法院的财务法庭担任书记官。有一名老话,所谓“严父慈母”,用在陈启礼头上可以说再恰当不过。母不仅慈,而且在其丈夫前还显得懦,这样一来。在一般中国家庭常见的那种“父亲手挥鞭,母亲身相护;父训于前,母哄于后”的场景,在陈家根本见不到。虽然有“棒头出孝子”之说,但出个把反叛之徒也不足为奇。

陈父可谓典型的中国旧式文人,谨守书诗传家的传统,从小就对陈启礼抱有非常高的期望,用一整套严格的礼教规范来要求他、训练他。他本人熟读典籍、书画亦佳,颇有几分才气,对于将来要担当“光宗耀祖”重任的儿子,书画琴棋,无所不教。更有甚者,陈启礼刚刚10岁的时候,就得每天清晨4点钟起床,用手推石磨为全家人磨早餐吃的豆浆,因为按陈父的逻辑,也是孔圣人的逻辑,欲成非常之志,先受非常之苦,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心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怀才不遇的父母期望儿女身上看到自己未曾取得的成功,原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的人之常情,但陈父望子成龙之心太切,其训练陈启礼的方法,似乎着着在考验儿童潜力的极限,其结果如何也就不难揣测。刚刚10岁的陈启礼,当然不能理解老父的良苦用心,小小年纪便视上学为解脱,视回家为畏途。在解脱的天地里自由地释放家庭中压抑的能量,也就成了他维持身心平衡之道。因此,他个儿虽然不大,在学校却以好勇斗狠出名,常常与同学们打得头破血流。特别是在大陆藉孩子与台湾本地孩子发生争斗时,陈启礼总是冲锋在前,每仗必打,很快就成了他那一茬大陆藉子弟中的“孩子王”。而每打一仗,必有人上家来哭诉,因为同学们吃准了法官先生家教之严,每告一状自有一顿重重的板子等着陈启礼,每挨一顿板子,陈启礼幼小的心灵就会与这个家庭、社会拉出一段距离,他开始寻求一条自我解脱的道路。

14岁的陈启礼在强恕中学时,遇到了一件改变他整个人生态度的事。有一天,他的手表和钢笔在回家的路上让一个大他几岁的少年抢了,他先是找了父亲,又找到老师和校

长，学校和家庭在解决这件事时却显得无能为力，近在身边的强徒不仅未受丝毫惩罚，被抢之物竟然也索之不得。从此之后，陈启礼对家长与社会抱有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终于破灭，得到了第一条不是来自家长和老师的人生哲理：家庭和学校并不能真正替他解决什么问题，朋友和拳头才能在困难面前显出力量。陈启礼之父后来忆及此事，曾感慨良深地说道："当时，我看到他那满是失望的眼光就明白了，这孩子以后在外面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来告诉我了。"

其实，早在 1952 年，12 岁的陈启礼就加入了中和帮，在"中和五虎将"之一的周德新、"老幺"周榕的带领下开始混江湖。为了逃避家长的监督，他每天骑车到学校，把车放到学校附近之后再到竹林中向周榕等大哥报到，然后或盟兄盟弟们比划拳脚，或与仇人对头动拳动脚。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便回学校附近取了车骑回家，俨然学后归来。久而久之，陈父当然不会被蒙在鼓里，眼见儿子越来越野，便与学校商量好，要儿子每天带一本联络薄，由上课教师签上上下课时间后带回家，缺一节课便是一顿板子。这样一来，陈启礼干脆连家也不回，由逃学而至逃家了。

陈启礼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在他 14 岁的时候，也就是他对家庭与学校彻底失望之后。他后来曾向朋友描述过当时的感受：当他从睡梦中惊醒，发现自己不是睡在家中的床上，而是躺在一栋破房的干草堆里时，心中有种难道其妙的轻松感。他感到了完完全全的解脱，完完全全的自由自在。从此之后，他便决心自己管自己的事，自己拿自己的主意。因此，陈启礼常向朋友们表示，他最恨人家说他是因为家教不严而走入歧途。不，他是因为老子管教太严了，要求太高了，这才走上了反叛之路，开始他的黑道生涯的。

1956 年，永和镇竹林大结盟之后，陈启礼与他的中和兄弟们自然转入竹联，成为鸭堂中的一员悍将。因为打起架来不要命，只知进不知退，"赢"得了"悍鸭子"的称号。又因他不会游泳，每次弟兄下河戏水他总抱膝而观，悍鸭子便成了旱鸭子关于其绰号的来历还有一说，亦与其作战勇猛有关。

陈启礼加盟竹联不久，陈父将其转入南强中学，企图把他与那帮不良少年隔离开来。但此时采取任何措施都已嫌晚，陈启礼反其道而行之，与"青蛇"邓国沣等人组织了"南强联盟"，成为竹联帮势力扩充时期的一个重要分支组织。从此，陈启礼由一个普通的帮派小喽罗成了颇有点权势的黑道小头目。

陈父的"意志训练"未在"光宗耀祖"时建功，先在帮派火并中立威。有一次，从中和帮分裂中出的三环帮一个老大因小事与陈启礼起了争执，将陈的左臂砍伤了，陈父见他整天吊着绷带养伤，一心想着伺机报仇，这时已不敢教训他了，只是担心儿子有仇必报不服输的性格，会闹出人命大事，便拉扯上陈的母亲四处跟踪陈的踪迹，想诉诸母子之情来消弥一场大祸。但任凭父母喊哑了嗓子，陈启礼吊着发炎红肿的膀子躲在酷热的竹林之中就是不出来。陈父知道儿子强烈的复仇欲和自尊心只能用软的办法，便老着脸皮打到那个三环帮老大的父母，说服他们带着儿子向陈启礼当面陪话示小，这才化解了一场怨祸。

1959 年，陈父在无可奈何之中竟出新招，把儿子亲手送到了台北市警察局的"特别保护室"，试图做最后的挽救工作。在陈启礼铁窗独处的日子里，陈父每天下班之后便来陪他，教他念《古文观止》，诵"四书五经"。然而，已开始自己写自己的人生哲学的陈启礼，当然不会把这些腐儒之论放在心上，他要在自己的人生哲学指导下走他自己的人生之路。

1960 年，陈启礼考入当时的淡江文理学院五年制专科学校，即现在的淡江大学，学的是测量专科。在积极投入黑道活动的同时，居然能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而且成绩优良，倒也能说明他天赋不低。陈父见高分成绩

单，于忐忑之中颇觉欣慰，以为浪子回头有望，然而，1962 年发生的事使他对这个聪明的儿子又一次失望了，彻底失望了。

1962 年，陈启礼率领一帮弟兄端了四海帮的老巢，由此一飞冲天，成了竹联帮最具实力的老大之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彻底地与学校割断了联系，成了一名名符其实的职业黑道头目。

1967 年，有勇有谋、智勇兼备的陈启礼成了竹联帮的头号老大，开始掌管一帮大事。这时候，他结识了一位重要人物，台北市理发公会会长、红楼剧场经理陈惠文。陈惠文早年混迹于大上海十里洋场，当过青帮的小头目，是杜月笙的再传弟子。到台湾后，陈惠文先在台北西门町落脚，广结社会下层的三教九流，一度拥有三百多名弟子，并想侍机恢复青帮组织。陈启礼与他相见恨晚，从他那里听到了不少杜月笙的黑道铁事，也学到了不少的黑道经验，尤其是用暴力控制娱乐场所的“知识”，陈启礼现炒现卖，竟是大获成功。他把自己的手下干将派到舞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充任“业务经理”、“场务经理”，真是外行领导内行，铜钿滚滚入帮。可惜好景不长，良师益友陈惠文的所作所为早为警方所忌视，在陈启礼与他相识数月之后被警方抓到一点由头，被判管训三年。

这时候，陈启礼的个人生活中出现了绯色，一个艺名“曼娜”的舞女成了他的相好，曼娜的真名已不可考。与陈启礼一样，她也是读过两年大学后中途退学的，只是陈启礼是因为要干黑道而主动弃学，她则是因为父亲盛年早逝，家中惟一能挣钱的顶梁柱垮了。她之为舞女，原也只利用业余时间挣几个钱，一来帮妈妈养活弟弟妹妹，二来为自己弄几个学费，然而，这种场合里混久了难免染上恶习，又无陈启礼边干黑道边拿高分的才能，退学就舞也可谓是迫不得已。

如今的陈启礼已开始走向成熟，在黑道生涯中打滚，陈启礼逐渐悟出了一点道理：要想在危机四伏的黑社会站稳脚跟，除了心狠手辣之外，更需要的是运筹帷幄、以智降力。尤其在现代社会中，动辄拳脚相向、凶相毕露，顶多只能成为一个逞凶于一时的流氓打手，决当不上杜月笙那样的流氓大亨。为竹联帮发展，他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常常彻夜不眠。在杜交场合，他每每显得谦谦有礼，陈父早年对他进行的“礼仪训练”又开奇葩。加之他人长得清秀，赚了大钱之后衣着入时，作了帮头之后气度不凡，的确是一般倩女梦中王子。曼娜与他一舞而情动，她作了他怀中的人儿。他作了她心中的人儿。这在丈夫夜夜换、新娘时时有的风月场中，可谓是一件颇为罕见的事儿。

自与陈启礼相识，曼娜即抽身舞场，不再接待外客，虽知陈不会认真对待，也要勉力为其尽一时之欢。一年之后，陈启礼正式娶妻生子，曼娜即杳如黄鹤，从陈启礼的生活中彻底地消失了。如果不发生意外，她如今当还在台湾某地，或为良家妇、或为寮中娼。但不管为良为娼，对于铁帷重重之中的陈启礼，也只有遥寄相思，暗忆往昔了。

1968 年，复活了的四海帮联合三环、文山等几个小帮派起而反抗，企图改变竹联帮独霸江湖的局面。竹联帮虽然捷报频传，但“杀人一千，自伤八百”，自身也陷入穷途末路。为摆脱这种不景气的状况，陈启礼广辟财路，进而谋求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他先和警界一名姓何的退休警察搭上了线，通过他认识了在中山区开餐馆的陆某。陆某受够了牛埔帮的压榨，便投入竹联帮，出资为竹联帮购买枪支弹药，帮助陈启礼迈出了武器现代化的第一步。

一块肥肉溜入竹联帮之口，牛埔帮当然感到不满，即使为着本帮在黑道中的声誉，也必须起而反击。1970 年，一场久经酝酿的帮派大火并终于在七七餐厅爆发。在这场战斗中，竹联帮亮出了四支手枪和一支卡宾枪，牛埔帮则动用土炸弹还击，成为黑社会帮派进

入热兵器交战时代的标志。

通过这一场大交兵，陈启礼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已成为现代工商社会的台湾要发展黑社会帮派势力，必须走全面现代化的路子，仅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是不够的，还要有现代化的组织分工方式、现代化的管理体制。于是，把竹联帮逐步改造成类似美国黑手党式的帮派的目标在他心目中确立了。

陈启礼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使竹联帮“按理性的原则行事”，消除原始黑帮间义气用事、无利可图的争斗，即使有了仇隙，也要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解决，不要凭藉武力逞一时之快。为此，他一方面改革帮务，一方面向往日的冤家伸出和解之手，准备和组建四海、文山、三环、牛埔五大帮派的兄弟联盟，以达共同谋利、五马分肥、共存共荣之目的。一时之间，陈启礼因讲义气、讲道理、势衷于主持公道而在台北黑社会名声鹊起、地位日重，成了黑道上名副其实的第一人。

1970 年 7 月 14 日，就在陈启礼踌躇满志、宏图大展之际，发生了“赌博郎中”陈仁卷款叛帮，陈启礼为正帮规而指使手下降其重伤的事件。旱鸭子因此事一跤跌入谷底，竹联帮也因此一度中落。

原来，陈仁之叛帮固然因为见钱眼开，也不是没有金盆洗手、为老婆孩子谋一份安稳日子过的想法，主要是受了一名索贿未成而与陈启礼翻脸相向的刑警组长的唆使。这名刑警组长曾出面为一个木材商摆平赌债，想借职业的力量压制陈启礼。陈启礼于谈判的餐桌上当场翻脸，根本不吃他那一套。说来也是陈年轻气盛，尚未完全成熟。他一脚踢翻酒席，点住木材商的鼻子威胁道：“到期还钱，一毛不能少，否则要你的好看！”又转头对那位警官大人道：“你干你的警察，我干我的流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没什么可谈的了！”

殊不知，井水固然不犯河水，河水泛滥起来则有可能淹没井水，而流氓与警察的关系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兵戎相见，绝不可能出现井水不犯河水的情形。于是，刑警组长与陈仁演出了一场双簧。陈启礼在顺境中过了一段顺风满帆的日子后不愿退让，亲自携带利斧化装成油漆工，先后多次前往汉中街华美整形医院找“赌博郎中”算账，直至怂恿张如虹等三名帮众将其杀伤。

陈仁重伤后奄奄一息，却奇迹般活了过来，于是将竹联帮核心人物及砍伤他的前后经过和盘托出，警方将以陈启礼为首的竹联骨干及酒店合股人陆、何两位老板一举成擒。

1970 年 10 月，陈启礼被提起公诉，判刑三年。也算是祸不单行，在他服刑完毕时，恰逢台湾国民党当局制订“防治青少年参加不良组织方案”，在 1977 年第一次办理“不良帮会自动解散登记”，陈启礼因之“青春二度”，被送往专门关管训政治死囚和甲级流氓的绿岛(即火烧岛)服刑，成了李敖的学年弟。李敖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一位知识分子，不仅挥笔痛骂国民党及其“大有为政府”，对那些一面向国民党当局献媚、一面又向台湾大众邀宠的党外文化人等也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为国民党所不容而于 1972 年以煽动叛乱罪被送入绿岛，又为高级小市民刑的台湾知识分子所忌恨而冠之以“文化太保”。从此后，一文一武、一假一真两个太保在风光旖旎的绿岛之上比邻而囚、同监受训，直至 1976 年，国民党政府因蒋介石逝世而大赦，一龙一蛇重入江湖。

绿岛风光美丽，祖居于此的亚美族人的古朴风俗亦令人陶醉，其为台湾之圣赫勒拿。国民党当局看中了这里四面环海，交通不便，若置犯人于此，即使逃出监狱也难逃岛外。有关绿岛监狱内的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传闻，早在台湾大众之间广为流传，即使是黑道之中杀人不眨眼的硬角色也闻之色变，视为人间地狱。若一黑道角头敢以“进绿岛”来起誓时，对其给予信任绝不会有错。

陈启礼被囚于此，受尽了人间折磨。数年之后，每当他酒醉谈起这一段往事，仍是唏

嘘不已泪洒衣襟。除了最残酷的各式刑罚，他还被逼吞吃自己的大便，甚至惨遭剥皮之苦。台湾狱政的黑暗更加扭曲了陈启礼本来不变形的灵魂，更加坚定了他彻底反社会的决心，可谓是继陈父早年所谓“意志训练”之后的又一次“意志训练”。陈启礼没有被压倒，他在一次次非人的折磨中变得更成熟、更坚强了。

五年的苦囚生活，也使陈启礼有了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他开始苦读父亲寄来的古文史书，咀嚼自己的人生经验，反思黑道生涯的点点滴滴，并与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印证检讨，终于写完了他那黑道哲学的最后一章。以后的事，就是如何适时运用了。

尚在狱中，陈启礼就迫不及待地要检验其哲学的“真理性”了。有一次，他为了试验“众口铄金”的效果，利用出庭时同乘一辆囚车的机会，把一个流氓头子的嘴堵住，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回到狱中之后，他又让人大肆造谣，说那家伙如何如何“草鸡”，如何如何下跑求饶，架子倒尽，丑态百出。有人不相信那个平时骄横霸道死硬到底的家伙会如此丢人下作，乖乖就范，陈启礼又心生一计。当晚，他和几年同伙夹在那家伙两边睡下，乘夜深人静，故作抽泣之声，再以耳语向挤得密不透风的囚犯们低语：听，那小子做梦都在撒猫尿求饶呢！果不其然，此事第二天就在狱中轰传开了。一个黑道上响当当硬梆梆的人物的名声就此毁了。

另外，监狱中的劳改生活也成了他试验管理方法、锻炼领导能力的场所。他运用黑道经验与科学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把同车间劳动的犯人按各人的体能和工作经验分成不同的几个小组，采组分工协作，按特长承包工作的流水线作业方式把整体生产联系起来，成效很是突出。几乎每次评比，陈启礼带领的职训班所做的外销纸花都超额完成任务，名列前茅。

五年的牢狱生活，虽然改变了他那锋芒毕露的外观，却没有磨去他桀傲不驯的棱角。他将锋芒深深地敛起，用仇恨的毒液磨得更加锋利。他变得老谋深算了，即使受到故意刁难，他已不再暴跳如雷。就是跳，他也是事先想好了跳的后果，觉得跳一下后果更佳才跳。

监狱真可谓是一座大学校，它代替淡江大学成了陈启礼高分毕业的惟一一所大学。在这里，陈启礼真正获得了作杜月笙第二的资格。

驰 骋 黑 白 道

1976年,“先总统蒋公”的故世为陈启礼签发了“绿岛大学”毕业证。但此后的一大段时间里,其所作所为说起来却颇令家人高兴,他似乎一夜之间改过从善,成了孩子的好父亲、妻子的好丈夫、父母的好孩子。他的名字被列入《工商企业名人录》,并获得过英国伦敦公布的“世界对社会公益事业卓有贡献者”称号。我们虽然知道他再入黑道的原因,却实在不明白他忽然改恶从善的根由,因此,叙述这一段历史时,我们只讲行为,不谈动机。

1976年的某一天,在台北市辛亥路四段的一栋小楼前,出现了一个脸色苍白、头顶早谢的三十出头的男子,浑身上下只有一双眼睛能表明他不是一个穷途末路之人。然而,面对白发苍然的双亲、木然呆视的孩子,他的眼神也很快变得黯然。

两个女儿望着这个陌生的穷汉不知所措,当她们的母亲哭着扑了上去后,方知面前的就是铁窗相隔六年之久的父亲陈启礼。

我们吃不准是否就在他拥着痛哭的妻子、望着衰老的双亲、听着女儿呼叫“爸爸”的陌生声音之时,已然决心退出江湖,脱离那种终日录仇斗勇、眦仇必报的险恶生涯。反正自他出狱之始,似乎便踏上了一条靠劳动吃饭、凭双手发家的生活之路。昔日的竹林兄弟送来几百万开办赌场的本金时,他既然拒绝,宁愿去建筑工地做监工,甚而作沿街揽活的油漆工、四处求人的小广告代理商人。

在他做临时工的这段日子里,他们家的生活水准大概属于全台北市最低的档次了。由于收入少且不稳定,吃饭的人口多,陈启礼常常不得不靠打野狗,或偷偷到寺庙的放生池钓乌龟甲鱼,为菜色满面的妻子打一点营养品。而以他这样自尊心极强的人,在干这种事时常常受到奚落甚至痛斥后,居然能忍气吞声,低眉顺眼而退,似乎确曾表明这时候的他已成为一个我们司空见惯的中国式社会顺民。

手头积赞了几个钱后,陈启礼开始小心翼翼地经起商来,他先后经营过电子工厂、不锈钢管业、重机械进出口贸易等买卖,似乎都不太成功,家庭经济状况虽有所好转,但未有太大的起色。直到他接手一家正在亏损的消防公司,经营消防及水电设备后,才开始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状况。

即使当临时工卖苦力,生活又困难,陈启礼仍坚持抽空学习各种现代科学知识,短短的三年时间,他自修完了他早年半途而废的学业,并获取东吴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大学学历。进入商界之后,他又开始自修现代工商管理及财政金融等科目,并努力使其所学运用于经营实践之中,不仅靠资本赚钱,亦靠知识赚钱。到1984年,陈启礼靠着系统的知识、黑社会的关系、不服输的个性和善于迎合新潮流的灵活头脑,已成为承安水电工程公司常务董事、台北市消防公会常务董事,几乎控制了台北市所有的水电消防工程项目。经商时期的陈启礼能伸也能屈,即使别人欠公

司几百万元账也不去追讨。逢年过节，他还给一些政府官僚上供，给警察老爷送礼。曾听一位茶店老板说过，陈启礼每次为送礼到茶行买茶叶时，总是笑嘻嘻地对伙计们说："我要给那帮贪官污吏送礼，你们拿些次茶给我，只要用上好的包装盒就行。那些酒囊饭袋懂得什么，别让他们糟蹋了好茶！"

陈启礼真正切身感到白道权势之重要是在197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陈认识了一个姓杨的人。杨某告诉他，如果他肯拿出300万元新台币行贿送礼，就可以承包到国营或公营事业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的承包几乎为国民党权贵子弟及亲信们全部垄断了。当时他的经济底子还很薄弱，但经过反复思量后，陈启礼决定孤注一掷，取出所有存款，加上东挪西借，凑足了300万。果然他就此一举成功，发了起来。

腰缠万贯的陈启礼并不以作一个安乐富翁为满足，又开始以"名"和"权"为目标，为其日后身财名裂，再沦绿岛埋下了伏笔。

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陈启礼确定的第一个步骤是办报纸。他先是接过了日渐亏损的《华美日报》，由于看不到什么起色，又与余祥生另辟疆域，创办了图文并茂的杂志《华美报道》。余祥生即原《华美日报》的独家股东兼社长，就在他这家报纸迹近倒闭之时，陈启礼向他伸出救援之手，从此，余祥生便在报业同仁中获得了"黑道新闻局长"的头衔。

名声故然重要，但应使自己不受金钱方面的损失为前提，老是赔钱办报的傻事陈启礼是不干的。他办《华美报道》，第一宗旨乃是杂志的销路，销路好才能赚，杂志才叫得响，他这个昔日的黑帮分子才能藉著名杂志的发行人身份一跃而为文化名人、社会贤达。为此，陈启礼向采编们宣称："没有耸人听闻、轰动社会的内容绝对不允许出刊。"在陈启礼一手策划下，《美华报道》创刊号果然"出手不凡"。歌星上官明莉的全裸照片赦然出现在封面，里面的内容也是香艳刺激，有色有血。诸如"亚洲羚羊"纪政的婚姻内幕、"青蛙王子"高凌风被枪击始末，还有竹联帮的老大之一、曾与陈启礼联组"南强联盟"的青蛇邓国洋如何涉及杏花阁争夺酒女"贵妃"的血案，潜逃海外后摇身一变而为华侨领袖人物的传闻，均是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地编成故事和盘托出。而国民党党外"党员"许信良在美国自杀的内幕，则完全出于陈启礼的杜撰。

经过精心谋划，陈启礼邀请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在发布《华美报道》创刊号正式面世的消息时，同时亮出了上官明莉的裸体原版照片，企图一鸣惊人。然而，在报刊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官办的时报系统因其《时报杂志》的销路受到影响而对《华美报道》大加挞伐。最后，《华美报道》被指控为与原发行旨趣，即以报道工商财经问题的旨趣不而遭到查禁，受到停刊半年的处分。

陈启礼遇挫不馁，高招叠出。他以退为进，不仅挽回败局，并藉此一举成名。一方面，他将杂志改换一下名称《美华报道》重新登记出刊，另一方面又以杂志社董事长的身份公开亮相，接受同业杂志的"访问"，向全社会吹嘘创刊动机和刊登上官明莉全裸照片的始末。这样一来，原来影响不太大的杂志反而身价倍增，销路更畅。他自己也因此与权倾一时的国民党将军王升同时成了一家很有影响的刊物《在野者论坛》的封面人物。

陈启礼业已证明，在黑道中积累的经验用于白道上的企业经营可以大赚其钱，将黑道的手法稍作修订，用于办报出刊也能大获成功。《美华报道》第一期就以报复《中国时报》老板、国民党中常委委员余纪忠为目标，集中报道了余纪忠的爱将王笃学兄弟的风流账，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陈启礼使用的手法高明之极，不留丝毫予人可乘的痕迹，余纪忠只好服输，央人出面请陈启礼酒肉一顿和解了事。

陈启礼一着得手，又花样翻新，在《美华

报道》上办了个“大亨摘星点将录”专栏，专事向财界大亨、娱乐界明星敲榨勒索，若有不肯就范者，使在“点将录”上见高低，将其发家史、床笫秘闻大曝其光。这一招既来钱又能招徕读者，乃是典型的黑道手笔。

敛财成名之后，陈启礼又向“权势”方面进行试探，利用手中杂志与国民党当局作开了交易。他偶尔也捧捧国民党方面不喜欢的人，像党外人士江鹏坚、雷渝齐等他都曾作为社会名流而大吹大捧，搞得“中央文工会”和市党部颇为紧张，常常得与他私下沟通一番，不敢轻视于他。有时候，他又在一些江湖秘闻中间插入几篇“忠党爱国”之类的文章，捧一捧国民党，讨好“中央文工会”。可以说，陈启礼办杂志成了他一生中的转折点。他因此获财获名，从一个黑道角头、奸诈商人一跃而为“文化名人”、“社会贤达”，并进一步结识权贵，与国民党上层也拉上了关系。

为了成为“文化人”，陈启礼早在办杂志之始就有心全面涉人文化界，尤其是演艺圈子。他早就看准了是个既来钱又捞名的场所，更是欲得之而心甘。《美华报道》上办起“点将录”后，机会终于来了，著名“爱国导演”刘家昌有所求而来，成了他的座上客，两人又合伙开办了一家欧帝威唱片公司。

其实，陈启礼的竹联同志早已有人捷足先登，在演艺界混得颇为不错。竹联帮第一代元老，陈启礼昔日的大哥周榕曾组织一家飞龙影业公司；竹联“大护法”吴敦一直是刘家昌的导演助手，在刘家昌的昌江影业公司任制片主任之职，制作过《圣战千秋》之类捧国民党的影片。实际上，竹联帮介入电影圈，大都是他居间策划。不过，导致陈启礼进入演艺界的关键人物，还是前面提过“三大血案”中的主要人物，港台武打电影明星王羽。

王羽可谓影视圈中天生的“江湖艺人”。在香港邵氏公司时，曾献百万元港币的晋见视而拜人“十四 K”。到美国拍片时，又以 30 万港币的“资助费”拜人“华青帮”。1970 年到台湾后，很快就与竹联帮的几名重要分子打成一片，“杏花阁血案”一役，王羽初显其空手道三段的真功夫，自此正式拜入竹联。“三大血案”之后，王羽更干出了一件大事，惊动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

1982 年 11 月，“亚太影展”在台北市东来大饭店举行，其主题礼仪曲“亚太颂”的作者刘家昌于某日应邀前来参加彩排，中途休息时，王羽忽然率领一帮竹联弟兄闯了进来，指责刘家昌派人砸了他的汽车。刘家昌不仅是港台影视圈中名人，与国民党上层权贵亦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在电影界向来是自高自大惯了的，见王羽点着鼻子叫阵，张口就甩出一句口头禅：“你他妈的……。”还没骂完，空手道三段王羽叭叭两响，当众甩了他两个耳光。素有“赵城之虎”之称的刘家昌不肯吃瘪，跳起来就要与三段拼命。当时在场的吴敦见对方人多，好歹把双方劝住了。事先，王羽请动竹联帮元老作陪，在天吉楼餐厅摆宴向刘家昌道歉，仍未平息刘家昌的怒气。于是，导致了刘家昌请陈启礼，陈启礼又通过刘家昌结识国民党权贵，黑白两道巨寇联手谋杀一名出走异乡的艺人丑剧。

为了替刘家昌出气，陈启礼一面令人在《美华报道》上抖搂王羽的劣迹，一面下令总护法吴敦遣派杀手追杀王羽。王羽在竹联帮内朋友的警告下，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陈启礼得知帮内有人通风报信，便将一向维护王羽的帮众叫来，要他们发誓不再报信，否则格杀勿论。帮内弟兄知道，“老鸭”要杀的人谁也救不了，于是纷纷表态不再帮忙。一向气盛的王羽这时也只好托人求饶，答应交付 1700 万元“罚金”和他拍制的所有电影版权为交换条件，求早鸭子放他一马。

陈启礼东山复出，以“总堂主”的身份重操竹联帮大权，是在 1980 年。与帮中弟兄重新交往，则可追溯到他经商有成之初。

从组织形态上看，如果说四海帮采取的是青帮那种拜师收徒，上下相传的发展模式，

竹联帮则是仿效洪门的横向裂殖方式，各堂口互不统属。当初竹林结盟之时，为表示对身在狱中的孙德培的尊敬而未设帮主，帮中大事往往由几个有位份的老大会商处理。但如果谁有足够的名望与实力，未尝不可行帮主之实权，陈启礼就曾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赁实力接掌帮中龙头位份。陈启礼入狱之后，竹联元老周榕、陈大伟等人都先后充任帮中名誉上的龙头大哥，但其名望与能力都不足以服众而相继退位。陈启礼经商后，曾一起混过的老兄弟常常找他叙旧，遇到问题也愿意来听听他的意见。帮内发生冲突，陈启礼以资深大哥的身份出面摆平。弟兄手头紧时，陈也往往出资周济。由于他处事公正，出手大方，深谋远虎，颇得帮中大哥们的尊重。但很长一段时间内，陈虽然未脱离黑社会的圈子，却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外界认为他又重新入主竹联。

陈启二度出山，还有一半原因与国民党当局有关。陈启礼曾为一位国民党权贵的儿子摆平过债务纠纷，这个贵胄之后希望陈启礼能把帮派组织统一起来，为其所用。当时，陈启礼以不愿再混迹于江湖为借口加以推托。结果出现了一连串怪事，一些与陈启礼关系很深的竹联帮成员在未犯案的情况下纷纷被拘捕。过去，陈启礼出面保人，警方一般不会为难，可现在他越保警方越抓。接着另一权贵弟子通过一名叫林嘉麒的人出面，希望陈启礼利用帮派力量在菲律宾搞一组织，保护他家的产业，陈启礼还是推托了。其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情报部门的要员纷纷出动，或直言无忌，或曲言相邀，其目的无非是要他重主竹联。

政府支持所辖范围的黑社会发展势力，可谓罕见罕闻，听起来令人不可思议。我们听了陈启礼于江南命案发生后留下的一盘磁带，也许疑虑顿释。陈启礼在录音中说："……在四年以前，政府方面希望我能够出来，重新组织竹联帮，把它发展到全省各乡镇地方去。这样一来，第一是可以控制台湾的黑社会，第二，如果有党外人士或者是台独分子要暴动，地方上的流氓去聚集的时候，我都可以知道，然后政府可以采取措施……"虽是陈启礼的一面之词，多少也有可信之处。陈启礼正式出任总堂主的仪式，于1980年的一个夜晚在"自由之家"举行。仪式之后，陈启礼当即宣布三条措施：(1)整顿纪律重订帮规；(2)成立"竹联突击队"；(3)重组堂口，大力吸收社会下层不良少年。而没有宣布的一条措施也许更为重要，即逐步使竹联帮的活动"公开化"，用合法的外衣掩护非法活动。在他看来，白道与黑道的惟一区别就是前都披了一件合法的外衣，竹联帮也能做到这点，而且会做得更好。为此，他把台湾许多退役军人、情报人员聘请安插到竹联帮控制的企事业机构中，与官方及大企业财团建立起共存共荣、相互利用的关系。1983年，《华美报道》杂志开业时，当时的警备总部副司令刘戈仑，台北市警察局长颜世锡等前往祝贺，与陈启礼交杯换盏。陈启礼曾十分狂妄地宣称："竹联帮旗下的'名商俱乐部'（竹联帮总堂）是警总的大本营！"这个俱乐部就是陈启礼与原在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后从台湾警总保安处上校组长一职退休的朱国良共同经营的。他手下第一堂"忠堂"堂主就是退役的国民党员，堂中弟兄十来人是退伍军人。陈本人还是国民党"花瓶"青年党的少壮派主席，陈对此颇为得意，将委任状高高挂在办公室墙上，并通令竹联帮兄弟，凡是尚未加入任何党籍者，一律加入青年党。

陈启礼重建竹联的消息在黑道传开，不少黑道人物纷纷投效门下，如三重天台帮、三环西门堂帮，以及中坜、新竹一带小帮派都先后归入竹联旗下。竹联帮原是外省籍人的帮会，现在却扩展到全省各乡镇，连许多不会说国语的本地角头，也摇身一变成了竹联分子。入帮的不良青少年更是猛增，在台北市上招摇过市的"青竹叶"，一时间如过江之鲫。

对其他帮派,陈启礼实现了入狱前未来得及实施的政策,即有仇释仇、有怨释怨,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甚至对仇深似海的四海帮,也以共存共荣为第一要务。黑道上的朋友们对陈启礼的深不可测的城府与善于应变的手腕无不又敬又畏,遇有大的纠纷,都渐渐愿请"老鸭"出面摆平、主持公道。

经过陈启礼的刻意整顿,四分五裂的竹联帮迅速强大起来,帮众从400多人膨胀至上万人,势力扩展到台湾全岛,并越洋过海至东南亚、沙特阿拉伯、日本、美国和香港。竹联堂口到1984年已扩充至20多个,台北市的地下酒家、陪酒女郎几乎全为各堂口控制。竹联帮总堂办的几家期货公司更是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为竹联帮组织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为其企业化、公开化、合法化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陈启礼高居"名商俱乐部"内豪华办公室里,一手处理帮内大事,一手摆平帮间纠纷,确乎抓住了台湾黑社会的牛耳朵。陈启礼的老婆陈怡帆曾得意地告诉朋友:"没有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算命先生坚持说我将来会嫁给一个王。当时我想,都什么年代了,哪有什么王呀?婚后有时想想,那个算命先生的话也算灵验,在台湾黑社会中,陈启礼哪一点不像一个王?"

陈启礼用黑道的经验在白道上奋斗,又用白道上的要求来修饰黑道,从1976年出狱到1984年入狱,八年之间成绩斐然,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他曾说过:"作不成人上人,也要当兽中王。"而他既作成了人上人,也当上了兽中王。

越洋杀人案

以“江南命案”而见之于报端、渲之于人口的事件，是竹联帮、尤其是陈启礼一生中干出的最为“轰轰烈烈”的大事。它震惊了整个华人社会。正直的人们，尤其正直的知识界人士，既震怒于黑白两道竟然联手谋害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文人，又惊惜于一个正直善良的英才被毁。

被害人江南，本名刘宜良，江南是其笔名。他1932年生于江苏省靖江县，是个富家子弟。1941年，其父为新四军所杀，因此，按国民党的说法，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江南从9岁起由有过功名的祖父抚养，直至1994年与国民党政府一起到台湾。

大概沾了“出身好”的光，江南于1950年进了“国防部”的政治干部训练班，两年之后又被送进干校受训。如果照此混下去，不辜负党国的栽培，前程似锦当可保证。然而，他却于1954年脱离了国民党军方的栽培，跑到台北市师范大学念英语去了。毕业后在《台湾日报》任过记者，去过香港、菲律宾等地采访，还写下了《香港纪行》、《动乱的东南亚》两本书。1967年，江南被报社派到了美国，实现了他生活于自由世界的梦想。据李敖说，“江南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如今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客座教授的陈鼓应曾宣称，江南是他所遇到的朋友中，对国民党了解得最为透彻的人。

到美国后，江南利用业余时间，在美利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2年，江南修完博士课程，准备以蒋经国生平及其政治理想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但因申请不到奖学金，经济来源没有着落，论文也就搁浅了。为了生计，江南改文从商，在华盛顿市区“郎芳购物中心”开设礼品店，1978年，江南迁至旧金山市，在渔人码头开了个瓷像店。

从商后，江南仍在继续写作，于1973年完成《蒋经国传》前四章，交由香港《南北极》月刊连载，前后刊了两后。连载完后，《南北报》，月刊社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于1975年擅自结集出版，遭到江南去信抗议。1983年初，江南写完了《蒋经国传》后几章，并改写了前面四章，遂与洛杉矶华文报《论坛报》签定合约，将《蒋经国传》改写稿交由该报连载并出版单行本，这便是造成轰动的《蒋经国传》一书的由来。

除《蒋经国传》之外，江南还写了《龙云传》的上卷，接着便写下卷。同时，他还答应把英文版的《吴国祯传》译成华文。

江南于1956年与刘冠伦在台湾结婚，生有一儿子，1959年，两人因意见不合而离异。第二任妻子叫崔蓉芝，两人于1967年结婚，也有一个儿子，叫家禾。据说崔容芝很是温顺体帖，因此夫妻二人感情甚笃，家庭生活其乐融融。

1984年10月15日清晨，崔蓉芝像往常一样，开车送完孩子上学后把车子开进了自家楼下的车库。车库的门没有锁，因为她上楼稍作整理后，便要与江南一起开车去渔人

码头自己的瓷像店开门营业。

9点20分,江南先下楼进入车房。随后就是三声枪响,崔蓉芝以为是江南不小心碰翻了什么重物。待到她下来察看,江南已倒在血泊之中,人事不省。这时候,行凶的歹徒已逃得不见踪影。半小时后来了警车和救护车,但江南的生命已无可挽救了。

据崔蓉芝回忆,那天清早她和江南都曾注意到门前有两名骑自行车的人留连忘返,但没有当回事。按当时美国警方的估计,这两个骑单车的便是凶手。因江南家在德利市一条死胡同的顶头,汽车进入易引人注意,凶手可能是乘车到巷口附近,换骑单车进来作案,再乘车逃走的。果然,警方在附近大路上找到了两辆被抛弃的自行车。

由于江南的名字在华人社会广为人知,江南之死当天就成了美国各大报的头条新闻。紧接着,包括大陆在内的整个华人社会为之震动,有关江南命案的新闻、社论连篇累牍,对其死因更是议论纷纷。其实不难猜测,一个手无四两力的穷文人怎么会成为被谋杀的对象呢?当然是笔下惹祸了,而他写的东西能惹上谁,看看内容也就一清二楚。当然是国民党,是蒋氏家族了。

然而,开枪的却是竹联帮总护法吴敦、竹联帮忠堂堂主董桂森,现场策划人是竹联帮总堂主陈启礼。就是说,堂堂国民党政府与其辖下一个黑社会帮派组织勾结在一起,合黑白两道之力杀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

按事后逐渐显露的情节,国民党与竹联帮的联系虽早,但真正计划合伙作成江南命案,则始于1984年5月的一顿家宴。中国人的买卖,从政治军事到婚姻家庭,似乎都与请吃饭有关。而这一顿饭,请者与被请者固然很重要,单是那个联系请与被请双方的引线人,就不是个马虎脚色。

引线人叫帅岳峰,出身于国民党将校之家,海军士官学校毕业。帅于1972年7月退伍后混迹于电影圈,因制作获台湾电影界最高奖——金马奖的影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而爆得大名。1984年5月,台湾电影圈里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帅岳峰所在的锦华影业公司被竹联帮所控制的昌江影业公司派人砸了。帅是制作人,理应对此事负起处理的责任。于是,他通过熟人找到陈启礼,请他出面摆平。这本来是件小事,但帅岳峰却因此结识陈启礼,随之便加盟竹联。因他神通广大,能弄到连警察也配备不上的新式武器装备,虽然入帮很晚,在竹联帮中的职位却是不低,掌管着部分堂口的军火供应。

在"江南命案"里,帅岳峰是个关键性人物,但他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到今仍然是一个谜。值得一提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加入过青帮,是杜月笙正宗的第三代弟子。而杜月笙的第一代弟子,如今大都是党国要人,他们在台北设有"恒社",并有定期聚会。同时,帅岳峰与白道也有密切关系,通过拍电影认识了不少国民党军政界要人。

1984年7月,在帅岳峰的牵引下,陈启礼往贺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导演白景瑞的乔迁之喜。白是国民党情报局局长汪希苓的密友,邀请汪氏夫妇与宴自不待言。然而,席间赫然在座的还有"蒋总统"的二公子蒋纬国将军,可见白氏身手之不凡。帅岳峰与汪苓挂上钩,白便是引路人。

帅岳峰为什么千方百计为汪希苓与陈启礼引线搭桥,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帅本来就是汪手下的谍报员,作引线人是出于汪的授意;第二种,陈自己想与国民党上层密切关系而利用手下人。现在一般人都倾向于前一种看法。1984年5月间,陈启礼以"观光"名义赴海外观察、组建竹联帮分支机构回来,曾在香根餐厅宴请帮中的头面人物。饭后,帅岳峰向陈启礼报告:"有一条线路已经和情报局长接上了,他希望我们为国家做些事。汪局长想和你面谈,你意见如何?"

自和国民党上层结交以来,陈启礼已饱

尝了甜头，如今情报局局长找上门来，岂能轻易错过？当时听了，不由两眼放光。于是，汪与陈便有了前面所提的宴上交杯、宴下换言。国民党情治系统想利用竹联帮干些他们自己不便出面干的事情，而竹联帮则企图通过与情报局的交往提高自己的地位，使帮派活动合法化。二者各有所图，自然一拍即合。经过一段时间的往来试探，双方均感满意，于是合伙投注，大赌一场。白景瑞乔迁之喜的饭局，算是一个小小的序幕。

数日之后，陈启礼与帅岳峰正式应召前往中央情报局所在永康街招待所。副局长胡仪敏开门见山，向他们布置了竹联帮“海外工作”的大政方针：

“汪局长安排你们从事敌后工作，这是很好的构想。此事以前没有做过，江局长这次也是大胆一试。希望你们本着忠党爱国的精神，好好为国家做事，发展敌后布建情事。希望竹联帮到海外发展，挑选好忠心干部，不必急在一时。慢慢做去，一二年内建立即可。”

胡副局长“宣导”完毕，接着是陈启礼汇报竹联帮在海外发展的情况。真正的召见目的，是其后的酒席之间，由局长汪希苓之口吐出：“在美国有个刘宜良，你知道吗？此人当年在蒋总统经国先生开办的政工干校学习，跑到美国之后却写了本《蒋经国传》，对领袖诬蔑丑化。他与共匪有杀父之仇，居然还秘密跑到大陆去与共匪勾结。这个叛徒……”

陈启礼当即大怒道：“这样的党国叛徒，为何不严厉制裁?”

“是呀，应该教训教训他。不然的话，这些吃党国奶水长大的人都会投向共匪了。可是，这家伙如今在美国，入了美国籍，我们出面恐怕有损党国的形象……”

陈启礼马上心领神会。汪希苓既要杀一儆百，又不愿弄脏自己的双手。经过反复思量，陈启礼决心“慷慨请战”，通过这件事使竹联帮与情报局成为一条线上拴着的两只蚂蚱，建立起祸福与共的关系。于是，陈启礼提出了接受情报局正式培训的要求。

8 月 14 日，陈启礼依约与帅岳峰一起到阳明山“松竹山庄”情报局训练中心基地，接受培训。在这里，他正式成了国防部情报局谍报员，化名为“郑泰成”，秘密代号是 730063，直属局长汪希苓指挥。帅岳峰的化名是“谢振业”。当天，二人参加只有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主管东南亚方面事务的第二处副处长陈虎门上校加上他们二人参加的特别会议。会上，陈启礼正式接受了谋杀江南的任务。为避免嫌疑，决定由陈虎门提担任陈、汪之间的联络官，即汪希苓通过陈虎门向陈启礼发命令，陈启礼亦通过陈虎门向“上面”汇报工作。

陈启礼在“松竹山庄”受训了 5 天，训练课程有密码、照相、密显、射击等科目。陈虎门一直陪同受训，并负责照料陈启礼的生活起居。其中局长曾两次前来“慰问”。

9 月 14 日，陈启礼一切准备就绪，携同太太陈怡帆、助手帅岳峰与侨居美国的竹联帮头目黄鸟陈志一搭机赴美。

到洛杉矶略事休息，便与帅岳峰及竹联帮另一名在美居住的头目灰鸭柳茂川一起到了旧金山。他们到江南开设的瓷像店探查虚实的时候，江南正好不在店中。在旧金山呆了三天后，他们返回洛杉矶。这时，帅岳峰借口自己 17 岁的女儿离家出走，先加了台湾。

这些天里，陈启礼发现，在美国华侨界，江南是个很有点名声的人，一般人都与他熟识，为避免走露风声或事后暴露身份，陈启礼决定不用在美的竹联帮分子，于是电召在台的竹联帮总护法鬼见愁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以及他自己的贴身卫士、竹联帮王牌杀手——“冷面杀手”刘焕荣。吴与董随之奉召而至，冷面杀手因从前杀人太多，名声在外，不能露面公开办理出关手续而未成行。

10 月 10 日，陈启礼选中了“双十国庆”这个黄道吉日，带着吴敦、董桂森又到了旧金山，住在一个姓宋的朋友家里，开始侦查江南

的行动规律及附近的地形。他们发现渔人码头正举行罢工，警察很多，不易下手，便决定把作案现场选在江南的家里。随之，制定了伪装晨练而潜入江南住宅行刺，得手后骑单车脱离现场，再乘小车远遁的作案计划。

10月15日上午7时，吴敦、董桂森各带一支左轮手枪，骑单车到江南住宅处，尔后潜入未关门的车库埋伏起来；陈启礼坐镇一辆小车中等候消息；另一辆工具车由俞大钧驾驶，停在江南住宅所在的巷口附近，等候吴、董二个作案归来一起逃匿。9月20日，江南下楼进了车库，当他发现车库中有人时，只是平静地看了他们一眼，便转过头去。吴敦当即从楼梯后热水器旁一跃而出，对着江南的头部，迎面一枪命中江南眉心，随即窜去了车库。董桂森见吴敦抢了头功，忙朝着江南脸部补了两枪，然后窜回街上，骑自行车到等候的接应车外，与吴敦一起弃了单车，乘俞大钧的车飞速往汇陈启礼，再分头处理作案的手枪，化妆用具等物，各自前往洛杉矶相会。

两天之后，即10月17日，陈启礼在洛杉矶打电话向负责联络的陈虎门副处长报告："生意已成交，准备返台。"这时，"江南命案"已成全美各大报及华埠各报的重大新闻。面对舆论界如此强烈的反应，情报局颇为慌乱，因此陈虎门叫他们暂缓几天返台，但随后不久，陈虎门又急促陈启礼返台，并一再申言三人同返。陈启礼以黑道上翻滚多年的经验，察觉事情有异，吴敦与董桂森也担心回台湾后有被灭口的可能，甚为踌躇。为防万一，陈启礼便将整个案件经过口述录音，并复制了几盘录音带，分别存放在美国竹联帮弟兄的手里，以备后患。

10月20日，陈启礼偕吴敦、董桂森三人乘机抵达日本东京，然后换乘国泰航班，于21日下午9时许返回台北桃园国际机场。一场越洋谋杀案降下帷幕。

江湖风波恶

杜月笙曾说：帮会好比夜壶，尿急时赶快拿来救急，尿意一去，便只能藏身最黑暗的角落。以杜月笙第二自居的陈启礼不会不知这一段名言，因此，为防止事发后国民党洗脱与竹联帮的干系，推出竹联帮当替罪羊，他留了几盘磁带后才返回台湾。他以为这样一来就使国民党失去了杀人灭口依据，或许私下还打算今后作为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筹码也未可知。

回台湾后，陈虎门上校与帅岳峰等竹联头目能陈启礼的妻子陈怡帆亲至机场迎接。在“大大”公司黄卓汉的办公室里，稍事休息的陈启礼向陈上校详细地汇报了赴美执行任务的经过。陈上校当即表示：“你们为党国立了一件大功，过两天老板会当面听取你的汇报，并给予嘉奖。”至此，不知是“荣归故里”还是“自投罗网”的三名杀人犯，总算松了一口气。

10月23日，陈启礼、帅岳峰被陈虎门接到情报局招待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设宴为其接风。席间，陈启礼汇报了赴美经过后，汪希苓示意胡仪敏，胡取出一个纸包道：“这两万元给你，你们辛苦了。”

陈启礼忙摇手推却：“钱我不能收，我本人是情报局的成员，杀敌报国乃是本人职责。”

“那给吴敦、小董两人好了。”

“他们也不会收。依我之见，局里最好派员安抚他们；他们有案在身，如能吸收进情报局，他们会为党国拼死效忠的。”

“这事由陈虎门办。”汪希苓点点头，“你把这次行动详情尽快整理出来，我好向大老板汇报。”

然而，陈启礼再度去见汪局长，却是数月之后公堂之上。

江南命案轰动全美，不少报刊文章当即指出必与台湾官方有所牵连。美国联邦调查局出动反间谍干员200多人全力侦破，数天之内便有突破。陈启礼在旧金山给陈虎门打的越洋电话，曾被美国电话公司录音，旋为联邦调查局所获；陈启礼等人在察看江南住宅时，曾被一名华裔女大学生看见，此人成了重要人证。江南命案指日可破，台湾情报局在美派有大量特工人员，对此岂有不知之理？

11月12日下午6时，陈启礼在台北市辛亥路家中被捕。当晚11点，内政部长吴伯雄在警政署召开记者会，宣布全面扫黑行动开始。这就是后来舆论所称的“一清专案”。

很明显，一清专案是专为陈启礼等人所发动的，其他黑帮分子不过是其陪衬。因此，第一波行动就是抓陈启礼。几天之内，竹联帮上至护法、堂主，下至各级头目，大都一网成擒。在台中避风的吴敦亦被诱至台北，作了笼中之鸟。董桂森见势头不对，匆忙逃之海外。

一清专案使竹联帮慌了手脚，也引起他们极度的不满，认为“狡兔死，走狗烹”。陈启礼在被捕时曾质问：“我为你们做事，你们为

什么要抓我?”《雷声》周刊发行人雷渝齐收到一个神秘电话后,江南命案与一清专案的关系开始曝光。11月24日,《雷声》刊出独家新闻:“江南是竹联帮所杀。”于是,台港各报竞相发表分析性文章,回答了陈启礼提出的问题。

一般认为,国民党派遣竹联帮分子刺杀江南,乃是一石二鸟之计。试想,以国民党之能耐,暗杀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文人并非难事,何以处心积虑地收买一个黑道头目,亲自越洋作案?按情报局的算盘,暗杀江南后,若该案不破,万事大吉;一旦东窗事发,则推出陈启礼顶罪,并乘机接收竹联帮。因此,从江南遇刺到老鸭入笼,乃是杀人灭口至抓人禁口逻辑发展,而专抓陈启礼与竹联帮首要,太过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便有所谓一清专案的出台。

国民党的一清专案的掩护下抓了陈启礼及其他重要证人,果然掌握了局势发展的主动权。当美方11月29日宣布江南命案凶手并要求引渡时,台湾当局以双方没有引渡条约为理由予以拒绝。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舆论界的分析有理。

情报局的算盘固然精妙,久历江湖的老鸭也非容易对付,他毕竟留下了磁带;而天下第一帮虽然首脑尽失,却也能量惊人,还逃出了江南命案重要证人董桂森。这样,一石二鸟变成一石三鸟,第三只鸟便是国民党自己。

竹联帮与国民党就推脱罪责、援救老鸭之间展开了激烈争斗。先是董桂森、吴敦打电话给陈虎门以公布江南命案相胁,要当局放人,而《雷声》登出的那篇文章,则是国民党先发制人的谋略,随后又诱捕了吴敦。1985年1月8日的香港《文汇报》首次暴露了陈启礼录有磁带的消息后,在美国的白狼张安乐第二天便在《中报》上予以证实,有关江南命案的一卷录音带,“目前正在有关人士手中”,问是否将交给美国警方,回答“那是肯定的”。同日,美国德利市警方也表示,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听说有陈启礼录音带之事,目前正在追查之中。

1985年1月15日,合众国际社自台北发出消息,国民党情报局代理处长陈虎门上校已经被捕,局长汪希苓中将“因故停职”,其职务暂由安全局长汪敬煦兼任。1月17日,美联社自台北报道:“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已被军方收押待审”。同日上市的美国《国际日报》引述“台北消息人士”的说法:“汪希苓和副局长胡仪敏少将目前被软禁于情报局招待所内,不准会客。”至此可以断定,国民党已被迫将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收押,从“丢卒保车”到“弃车保帅”了。

1月31日,台湾的《中国时报》公布了陈启礼录音带的主要内容。据称,陈启礼的自述包括五个部分:一、自我简介;二、刺杀江南的原因及与情报局官员的关系;三、作案的计划和准备;四、行动过程和参与者;五、制作录音带的目的。其中大部分情况已为人所知或推知,只是不及其详而已。

小小一名刘宜良,区区一个竹联帮,竟然在台岛内外造成如此之大的冲击,实为国民党始料不及。2月2日出版的《雷声》周刊报道:“突然爆发的情报局高级官员涉及江南命案的不寻常事件,为经国先生知悉后,连续数夜,即使勉强入眠,也经常惊醒,一夜之间,数度如此。”另据一位以北高官透露:“大老板(蒋经国)生气极了,在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上大发雷霆。党政首长一个个俯首危坐,噤若寒蝉,脸色发青。”台湾《前进广场》报也透露,台湾几十名“中央研究院”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他严惩真凶。

正式审判陈启礼本人是1985年3月20日,在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庭进行。这次审讯是再三拒绝美方引渡要求后进行的,而海内外舆论早就对江南命案有了定论,之所以有大量岛内外记者前往听审,乃是对国民党将如何掩饰自己涉案及对陈启礼的处置结果感到好奇。另外,当然也希望陈启礼会突然抖

出一些出人意料的黑内幕来。

陈启礼和吴敦在法庭上只是反复强调汪希苓指派他们行刺的事实。陈说，汪希苓要他去杀江南，而他只叫吴敦、董桂森去教训江南。吴敦也说，陈启礼只要他们教训江南，而开枪是出于意外，因为江南曾与他纠缠。

4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宣判陈启礼、吴敦两人无期徒刑，罪名是共同杀人。判决书拒绝了陈启礼供词中杀江南为情报局汪希苓所命令的说法，而说陈启礼是想邀功于汪希苓而主动请战。对于陈自供"只想让江南躺一个星期"的供词，亦裁定不能成立。根据台湾法律，无期徒刑在执行十年后，若犯人表现良好可假释出狱。就是说，陈、吴二人十年后便可复出江湖。

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军事法庭亦开庭审理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涉嫌江南命案。汪等三个均否认汪曾指示陈刺杀江南，只说是教训江南，而且说只是"以后有机会教训"。对三人的判决在4月19日。汪等三人分别以共同杀人和帮助杀人被判有罪。汪判无期；胡与陈被判二年半管训。判决书认为，汪是出于私怨而利用职务之便指使他人行凶的，从而刷洗了国民党手上的斑斑血迹。

陈启礼从被捕之日起就已预感不妙，也曾勉力挣扎，以图打乱当局的玩弄法律的步骤。首先，他在首次审讯前二天出版的第44期《美华报道》上发表了两份书面自白，一份自白称自己杀江南是"制裁判逆，杀敌报国"，所以无罪，另一份自白则把自己打扮成早已脱离竹联帮的"自新"分子，甚至还为社会"消弭了不少铤而走险的事，造成了许多人自新的机会"，因此有功。在法庭对质时，面对汪希苓的矢口否认，陈怒目圆睁："白景瑞当时亲口说，如果运用竹联在美的兄弟教训一个人，简直是小事一桩。现在却一口否认，实在令人费解。"又叫道："我去白景瑞家吃那顿饭，就是他们设计安排的！"

另一次发怒是在4月2日的庭审辩论时，面对帅岳峰否认他知情江南命案，陈声色俱厉地问："你四十多岁才进竹联帮，很不寻常！四十岁进竹联，没几个月就去自首，你笔录上说，你四月去自首，而警方要求自首是七、八、九月才开始的。你自首不去向治安单位自首，却去向主管大陆工作情报局自首求助，我怀疑你是不是也是双重间谍！"帅直被问得汗流浃背，张口结舌。最后是审判长出面制止陈的追问，救了帅一把。

在法庭的最后辩白中，陈启礼大概已经完全感到绝望，谈起自己当年被囚绿岛，整日里赁窗呆看海水，不由悲从中来，洒下几滴"英雄"泪，想当杜月笙第二却被国民党玩弄于股掌之中，不仅自己受罪，亦给杜月笙丢脸。

9月12日清晨，陈启礼被一辆警车悄悄从台北看守所送往龟山监狱，关入叫"和一舍"的牢房区。同被关在这里的还有吴敦及著名党外反对派人士林正杰、施性忠等人。为了防止被谋杀，陈启礼专门养了一盆花，每天吃饭时要将一些饭菜汤洒在花上，看是否有毒。他后来还托人带进一双银筷子，用它检验饭菜是否有毒。平时放风时，他与吴敦打打羽毛球，共同活动一下。每周他可以对外通信一封，收受亲友寄来的物品。定期会见亲友，即使是父母、妻子、儿女，探视也要经过荧光屏或玻璃屏风进行，而且有人在旁监听录音。很显然，陈对当局来说，虽在囚笼之中，仍是危险人物。

陈启礼有着良好的家世，本人天赋甚高，性格沉稳，从不在朋友、妻女前粗语相向。他对自己的孩子很有耐心，还在办公室放了一个糖盒，让偶尔来玩的儿子有糖可吃。他的第一个妻子齐淮莉曾参加了菲律宾选美大赛，是个名噪一时的女人，因受不了陈专心帮务而离异，带着两个女儿定居美国。与第二任妻子陈怡帆相恋时，每天上班前都要到她家中为其烧牛奶；下班后，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到她的住处检查门窗，以确保她的安全。陈

怡帆的父母常常夸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

如今，刘宜良墓木高拱，其死因仍是疑雾重重。台湾当局经历了一阵慌乱后，已在时间老人的帮助下脱出身来。我们不禁要问，陈启礼是否还在坚持他的“杀敌报国”之说？吴敦和董桂森早已对江南之死感到忏悔，董看到报载“江南的母亲是饿死的，所以他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中国尽快富强”之时，曾热泪滚滚道：“谁不希望中国富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却杀死了一个希望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的同胞！”据说陈启礼在狱中习画自娱，国画造诣已颇具功底，其父甚至为他在台北市举办过个人画展，陈似乎真成了一名“文化人”了。以一个“文化人”的良心，是应该为廓清江南命案疑雾尽力的，也理该为江南之死深深忏悔的！另一方面，台湾最后一位政治强人蒋经国已于 1988 年 1 月去世，强人政治时代已一去不再，台湾当局是否应该理性从事，主动出面澄清江南迷雾，以谢国人？

竹 联 点 将 台

忠堂堂主董桂森，国民党军人之后。其父一生为党国尽忠，死后其灵位得供台北“忠烈祠”之中。董的大哥和妹夫都是国民党军官学校毕业生，是现役军人。

董桂森祖籍四川，有着一副四川人的短小身材。他从小生长于军眷村，初中毕业后，继承父业进了士官学校。士校毕业后在金门等地服役近十年，并加入了国民党。但军队似不能用其所长，干了十年只混上个上士士官长，于是退役不干，在社会上另谋发展。

董桂森从2万多元台币的退伍金中抽出1万元送给寡母，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辆货车，开始干送货员、外务员的工作。好不容易积下一些钱，便和几个朋友跑到台北市合伙开了一家印刷厂。小本经营，自然需要倍加努力，方能在资金雄厚的同业们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生意开始好转后，董桂森还是毫不松懈，仍然吃大苦流大汗，一心想的是先苦后甜，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公司，当个公司老板，虽不能光宗耀祖，也对得父母的养育之恩了。他是个孝顺的儿子，深知父亲早丧，寡母养育兄妹三个着实吃尽了苦头。如今大哥与妹夫都是军官，只有他在军中混不出名堂，因此希望在社会上作为一番。

然而社会上着实太复杂了，同业竞争也不讲究什么商业规范。董桂森一着不慎，工厂被骗破产了。在其事业有成之际突遭如此重击，董桂森只觉前途一片黯淡，深深感到商场如战场，而且不如战场来得公正。社会上的司法制度一如军队，对没有势力的人毫无保障作用。他平时不仅要给警察老爷们送红包以免除骚扰，一旦出了事，钱被骗找到司法机关求个公道，也同样需要钱来开路，否则“有理无钱莫进来”。黑暗的社会在董桂森心中投下的黑暗阴影，再也无从抹去了。

1978年，董桂森穷困潦倒之时，通过从前军中的一位老长官结识了竹联帮执法陈功，并在陈功开办的兰沁咖啡店当小弟。1980年，陈功转到新生东路开了一家银禧餐厅，董桂森也跟着转了过去。恰在此时，陈启礼准备二度出山，正在网罗人才，在与陈功的几次接触过程中，发现了董桂森。

董桂森个子虽不大，但十年军旅生涯却使他变得异常强健。他肤色棕红，胸肌结实，头发浓黑，声音宏亮，一身刺青。一支半自动步枪在他手里可以变成全自动枪使。由于他具备训练有素的军人气质和一定的组织能力，很快为陈启礼所器重，收为心腹，并一手栽培他当了竹联帮最大堂口忠堂的堂主。自此之后，董桂森戾气大增、除陈启礼和白狼张安乐之外，连竹联元老也不放在眼里。

有一次，忠堂几个小弟在外饮酒，碰到几个竹林元老喝醉了要威风，要他们当众下跪掌嘴，受辱的弟兄报告了董桂森。董火冒三丈：“他娘的，打狗还得看主人，这口气非出不可！”一面打电话要总堂执法陈功开堂执法，一面磨拳擦掌，准备开战。

惹事的大哥绰号猴子，请了人解释，却又

不肯认错。董更是恼怒，联络了天堂、和堂的弟兄，将猴子等人开在中山北路的几家餐厅砸了个稀烂，并“俘虏”了店中的“新军”。

这一仗打出了威风，也为老鸭陈启礼挣了面子，董桂森从此名声大震，忠堂在董桂森的领导下愈见兴旺。可好景不长，竹联帮的兴盛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们开始三天两头地来找麻烦。一帮流氓小混混也常打着忠堂的旗号到饭店、餐厅收保护费，弄得管区警察动不动就找他去问话。1981 年 3 月，警方从他家里查到一件他朋友的防弹衣，以“共同犯公共危险罪”判了他 8 个月管训。出牢不久，恰逢台湾警方开始第三次“不良帮派自首登记”，董桂森几次想去自首，但考虑到大哥和妹夫是现役军官，不能有一个流氓小弟或大哥，结果选择了出走美国的道路。在美国，董桂森整天住在白狼大哥家里，直到陈启礼召唤，才犯下刺杀江南之罪。

陈启礼被捕之后，董桂森在一位黑道上称为卓大姐的女人的帮助下逃出台湾，亡命菲律宾。其间，台湾当局曾唆使一名叫刘伟民的黑道头目去菲律宾追杀他，结果为冷面杀手刘焕荣所救。其后，董桂森与刘焕荣、齐瑞生一道去了泰国，准备赴美汇合白狼张安乐和黄鸟陈志一，为营救老鸭出力，因为他现在是惟一还能自由说话的江南命案当事人了。不曾想白狼送给他的路费让一个泰国朋友在赛马场输掉了，只好再回菲律宾。

几经周折，董桂森辗转到了巴西。这一段时间的逃亡生活，大概是他一生最为艰难的。在巴西的时间，他有一段日子是靠捉鸽子活过来的。就在他准备经巴拉圭前往美国汇合黄鸟时，在里约热内卢的旅馆失手被擒。在巴西监狱中，董桂森吃尽了苦头，越狱不成曾想过自杀，据说是靠了“营救老鸭”的念头支撑，这才忍辱活了下来。

1986 年 4 月 16 日，巴西法庭作出判决，将董桂森引渡赴美。对他的判决是 1988 年作出的。美国以一级谋杀罪判处董桂森有期徒刑 27 年。

白狼张安乐，1949 年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均是大学教师；自幼聪明过人，进中学后，开始加入不良少年的帮派活动。他那时年纪虽然不大，却是泡妞、打架，无所不为，成为学校里一名著名的太保，并一度成为南海路帮的护法。

16 岁那年，张安乐在台北永和镇杀伤了一名便衣宪警，被捕入狱一年，成了“有前科的人”，如此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本来，一个人在其成年之初那段心理不稳定的时期，干出些荒唐事也不为怪，随着各方面的成熟，也会走上正常人的道路。比如第一个上太空的中国人王赣俊也曾于 60 年代初干过竹联帮，后来去了美国，终于学有所成，成为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张安乐出狱后，成日踯躅于台北街头，看到往日的朋友抓的抓，关的关，不由万分感叹。他原本是个刚愎自用而又多愁善感之人，如今有了前科，遭人白眼，心中的滋味，外人也难体会。为此，他动拳头的时候就更多了。父亲先后把儿子转到建国中学夜间部、基隆一中和台北师大附中就读，但这个性格刚硬的儿子总是不能成为训导员眼中的好学生，张安乐于入狱前已从南海路帮过底的竹联帮，出狱后基本上与竹联帮失去了联系。大概他此时在家长劝说下熄灭了帮派念头，可他不肯让人的个性、好讲道理的脾气不改，又怎么能让“大人们”满意，从而取得进入正常社会的入场券呢？

1967 年，张安乐考上淡江文理学院历史系，成了一名大学生。台湾的大学，汇集着各种思想，也组合着各种小团体。各大学生团体因政治取向和志趣而辩论，因辩论而动拳头的事时有发生，成为一时的时尚。以张安乐之巧舌如簧、铁拳如锤，他在淡大的名气很快就大了起来，甚至有人给他起了个“地下训导长”的雅号。

正是张安乐的硬汉派作风，再一次把他引进了竹联帮，成了陈启礼的莫逆之交。

张安乐的名字响起来之后，有个叫斧头的流氓很不服气，便纠集了一帮弟兄前来寻衅。当时张安乐正在屋中读书，见对方人多，便不予理睬。后来外面的叫骂更凶了，还砸进来一块大石头，人单势孤的张安乐已再无选择余地，当即一手持土枪，一手持扁钻冲了出去。趁着对方不及反应，他举手向着人群上方轰了一枪，然后一扁钻刺伤了斧头。众流氓被白狼的气势彻底压倒，竟然没有反击。

陈启礼知斧头心有不甘，欲聚众报复后，领了一帮竹联弟兄找到斧头的上司烧饼，双方达成了协议后，陈把白狼带回了台北。在淡江大学的张安乐同伙不明真相，又与斧头的弟兄们干上了。事情越发不可收拾，最后还是靠陈启礼出面摆平。经此一事，张安乐深为陈启礼的义气所折服，加上两人有着共同的出身经历、相似的智力水平，一致的人生志趣，很快便结为莫逆。1968 年 4 月，张安乐二度加盟竹联帮。

当时竹联帮因杀手型头目杨剑平等人被捕而陷于不景气阶段，张安乐便以淡大 63 名太保和太妹为骨干，成立了新竹联，又称为淡竹。这个组织存在不过一年，因一名帮众在臣龙街杀伤人命而被警方强行解散。存在时间虽不长，但张安乐组织帮派的方法，管理帮会的措施却成了竹联帮的宝贵经验。日后陈启礼二度出掌竹联，许多革新帮务的措施皆源出于此。

淡竹解散后，张安乐又开始专志于学，并很快沉入爱河。恋爱虽无结果，大学却顺顺当当毕业了，随后又考上了研究生。这期间，他所至爱的老父过世，算是少了一道与黑道交往的感情障碍，但他似乎已彻底脱离了竹联帮，又安安稳稳地读完了研究生，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

张安乐再返竹联是在 1972 年。陈启礼于 1970 年入狱后，陈大伟、周榕等人都曾以元老身份出掌竹联，但他们心胸不广，领导无方，把竹联帮搞得四分五裂。当时，帮中新一代有识之士力主请张安乐出山，重振江湖第一大帮的威风。张安乐经不起老友们一再恳请，也是感于陈启礼的义气，觉得陈入狱后不能眼看着陈的基业毁于一旦，于是决定出山。

这时的张安乐已有一整套关于现代社会与现代帮派的成熟看法，出山之后踌躇满志，准备大革大改，使竹联帮彻底成为一个类似黑手党的组织，即以企业为基地、以盈利为目的、以暴力为手段的现代化黑社会组织。他的努力成效显然，但也引发了帮中老一辈的忌恨。经过多次帮内的明争暗斗，张安乐又多愁善感起来，遂生退避江湖之念。

1974 年 6 月的一晚，竹联弟兄在长桥餐厅聚会。酒过三巡，两位帮众起了争执。当一个拔出扁钻向对方刺出时，白狼及时出手，抓住了扁钻。鲜红的血液从指缝间淌了出来，席间一时间沉默了。张安乐看了看众位弟兄，长叹一声，扬长而去。

随后，张安乐不愿再与竹联弟兄往来，整日里在家读书课子。但他的妻子李青是个颇具“大姐头”风范的女子，对道上的弟兄极为照顾。她不但为弟兄们洗衣烧饭，还掏腰包给零花钱。因此，张虽有心摆脱帮务，帮务却不肯摆脱张安乐。

1975 年，张安乐通过托福考试，把手下的势力交给康宁后，赴美求学去了。

两年后回台省亲，因其妻李青窝藏一名警方追捕的三光帮分子而受牵连，被判了 6 个月刑。亏他的同学寄来了他在美国的优异成绩单，加上留学生的招牌，很快被保释出来了。但这样一来，也就又与保释他的昔日弟兄们拉上了关系。据说，张安乐就是在这个时候萌发在美国组建竹联帮分堂的念头的。

1979 年，张安乐去美国继续读书；1981 年返台与李青离婚；1983 年与珍妮斯·杰克逊结婚，获得了永久居留权。

张安乐在美期间勤奋好学，若有王赣俊的生活条件，可能也会学业有成，无奈生活迫人，只得弃学从业，到处找零活干。一次，向

过去的朋友柳茂川告贷遭拒绝，二人便有了隔阂。1982年回台湾时，陈启礼已东山复出，陈对白狼道：“你有抱负有什么用？有理想没有经济后盾，你凭什么实现理想？”柳与陈是竹联帮中让他佩服的人，如今一个遇难不助，一个劝他经济自救，顿觉自己拼命苦读太不现实。

弃学后，张安乐在洛杉矶遇到了黄鸟陈志一，二人合伙开餐馆，果然生意兴隆。二人又都有在美国组建竹联的理想，因此合作愉快。

江南命案后，张安乐多次在电视、记者会等公开场合露出，成了援救陈启礼最热心的竹联分子。而他的所作所为令美国警方不快，结果以餐厅有死老鼠为由，吊销了他的执照。他虽然多次受到警方和台方的骚扰，仍决心全力搭救陈启礼，还为此写了遗书。然而，凭一腔义气是斗不过两个政府的。1985年5月，张安乐因涉嫌绑架而被捕。

张安乐智力超群，正义感很强。只是在白道上求不到正义，这才求诸黑道；感受到黑道上的凉薄之后，又想返身白道。因此，他一直徘徊于黑白道之间，只是感于义气，才成了狱中之囚。当一切趋于平静之后，张在狱中又作何感想呢？

冷面杀手刘焕荣，又号神经刘，1957年出生于台中市北屯区陆光八村的一个军眷区里，是家中的老幺。像陈启礼等人一样，刘也由一个受人欺侮的外省籍子弟逐渐成了不良少年。上台中商工职校后，他加入了小梅花帮。1974年，刘与小兄弟们在收保护费时为警察所困。突围中，刘伤了一个警察的脚部，当晚被抓进警局吊打一顿，然后被判刑4个月。

刘焕荣出狱后一心想改过从善，但令人惊心的是，社会的确没有给他丝毫机会，不仅到处遭白眼，而且警方还时时威吓他，似乎不进黑道就不放过他。于是，刘只有走黑道一途。

1979年，刘焕荣因赌债纠纷杀了第一个人，从此开弓没有回头箭，从被动干黑道变成主动闯江湖的硬手，很快获得了“神经刘”的绰号。竹联帮忠堂堂主董桂森慧眼识英才，千方百计将他罗织进堂，封为执事。

刘焕荣进了竹联后，并未获得他万分仰慕的陈启礼的信任，刘急于表现，遂起“要出头，杀老大”之心。再说，他不愿默默无闻地在黑道混，于是决心走职业杀手之路。

刘焕荣杀的第一个老大是台湾黑道很有名气的大树林帮帮主杨伯峰，获酬金40万元。因为此事，刘焕荣一夜成名，且开了为求成名而杀老大的新风尚，竹联帮总堂主陈启礼也不再有疑，将其收为贴身待卫。

杀杨伯峰3个月之后，即1983年9月，刘焕荣再爆冷门，于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枪杀了有“九命怪猫”之称的大湖帮帮主廖龙辉。从此，刘焕荣成了黑道上闻名丧胆的人物，竹联帮也因拥有这样一名王牌杀手而名声更彰。每遇到难题，陈启礼只要动用刘焕荣，莫不迎刃而解。同时，刘也成了黑白两道追杀、寻捕的目标，开始过起难见阳光的逃亡生活来。

1984年春节时期，台湾黑道发生了一起诈赌大案。受诈者肖家训不甘心两亿元台币有去无回，便通过一位警官请陈启礼出面摆平。陈因一时没有找到诈赌的黑道分子而无所作为，肖某病急乱投医，又找了松联帮老大吴仕杰、四海帮老大杨南光等人调停，答应事成之后，各以500万元相酬。此时，其他帮派也知道了这一肥票，人人都欲分一杯羹。经过一番交易，终于达成协议：以2300万元一次偿还，在纪德旺师律事务所交割。到了交割时间，纪德旺事务所人头晃动，角头云集。当肖某的代表入场时，众角头暗叫不妙，陪同他的竟是冷面杀手刘焕荣！原来陈启礼觉得这件事没能由自己解决有失面子，这才在关键时刻拿出了“秘密武器”。

看着刘焕荣俨然以保护人的面目出场，

与会群魔知道碰上了难缠的鬼了。一位角头和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缓缓说:“阿荣仔,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他心想在座诸位都是有头脸的人物,刘焕荣这个后起之秀还能不给面子?谁知刘焕荣道:“凭什么?这事我管定了!这是我竹联帮面子的问题,我非得给陈大哥挣回这个面子不可!”

律师见证,交割已毕。众人待富商的代表走后,盯住被刘焕荣坐在屁股下的800万现款和桌上1500万的支票,问:“怎么分?”

“这样分!”刘焕荣一脚踢翻座椅,左手握着一颗手榴弹,右手拔枪,大喝一声。

一时间,众人全楞了。俗话说,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刘焕荣不辱使命,凭一支枪、一颗手榴弹镇住黑道群雄,不仅为竹联帮挣够了面子,也使自己的名声更响了。而他干职业杀手的价码也随着名望看涨,一个月后杀一山帮老大张德忆,也得了80万元酬劳。

当初杀杨伯峰,刘受台南另一个黑道老大游国麟所雇,如今刘的枪口在无人所雇的情况下指向了游国麟。刘与游本是哥们儿,但游颇不识时务。自刘名声鹊起之后,连董桂森这个昔日栽培过他的人也有意躲着他,以免一个不小心开罪了这个因遭追杀而变得疑神疑鬼的职业杀手。游国麟倒好,仍以刘的朋友自居,可谓自辟死路。1984年6月21日晚,游从刘之邀到了台北大安区一家宾馆。刘显得格外热情:“今日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其他。兄弟我做东叫你逍遥一夜,以尽地主之谊。”酒足饭饱之后,刘又换了个地方,为游叫了三个陪酒女郎。游摸摸这个的乳房又捏捏那个的大腿,还说不满意。刘按住性子唤来鸨儿,厉声道:“你再给我们搞这些肥膘瘦骨的,老子砸了你的台子!”鸨儿战战兢兢的去了,果然领来四个上等货,令游国麟胃口大开。

在游辟屋做乐时,同来的竹联帮天堂堂主王国庆不耐烦了:“不是讲好杀掉他吗?怎么对他那么好,连叫四个小组?”刘语出如冰:“让他死个痛快,也算我刘焕荣对得起朋友了!”

游国麟逍遥一夜后,被刘焕荣带到忠堂开设的荔坊餐厅。任他百般哀求,刘还是砍了他四肢,然后用布袋装了,开车拉到一处山崖,对其脑袋开了一枪。半年后,登山者在坪林山区发现一具白骨,又怎知原是一个横行台南的黑道大亨级人物?

江南命案后,竹联帮头目几乎一网成擒。刘是台湾警方近年来每年公布一次的十大枪击要犯榜上的状元公,一直在逃之中,这一次也未能让警方如愿。但岛内是无论如何呆不下去了,刘于是亡命菲律宾、泰国,最后到了日本。在菲律宾曾协助齐瑞生杀陈正昌、陈南光兄弟两家九口人。到日本后,他展示了人性的另一面,一个被迫走上职业杀手之路的人对人世温情的深沉感。那是在东京新宿的一个酒吧里,刘焕荣豪饮之时被旁桌一个女孩子的哭声打动。“喂,台湾人吗?”刘瑞着酒杯走过去。这女子是台湾来的“淘金者”,如今为黑道挟持卖春挣钱,金是淘了,却落不到自己手里。刘焕荣向来不近女色,的确是出于同情,这才过去搭话。攀谈起来才知,其老公大大有名,乃是台湾十大枪击要犯排行榜上的探花,绰号珍珠呆的梁国恺。梁在与警方激战一夜后弹尽自杀,其情人竟然落到如此地步,刘不由有物伤其类之感。他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放到这个叫小支的女子前,醉晃晃地离开了酒店。

第二天去那家酒店时,小支的姐姐大支已等在那里。刘应邀去了她们姐妹的住处,三人交杯换盏间,谈的都是童年趣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很快便相知。刘焕荣于流亡之中平生第一次为了一个女人而陶醉了。1986年1月26日,刘与大支于温柔之乡中被急促的打门声惊醒。刘焕荣轻轻推开紧拥着他的大支:“该来的总是跑不掉的。”这样,刘焕荣因黑道“朋友”的出卖而落入日本警方

之手，一个月后被引渡至台湾。

刘的回台是江南命案后的最大新闻。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刘说："我不希望我家人以后来看我出庭，他们增加我心里的负担……""我恨自己，我恨社会！""不错，我是黑的，不能见光，更极少出现公共场所。但我没有神经病！"

1986年5月，刘焕荣被判处极刑。在走向死刑台时，刘回首自己的职业杀手生涯，不无忏悔地说："我杀的人都是该杀的黑道老大，只是除了陈正昌、陈南光兄弟，我感到很难过。"

香港黑社会

香港黑社会人物常以“洪门人马”自居，其实不然。中国大陆解放前的洪门组织，确实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香港自开埠以来，大陆洪门组织的头脑也由内地辗转抵港，进行活动。然而，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大陆洪门组织已经由“反清复明”的政治组织蜕变为走私贩毒、作奸犯科、欺凌弱小的猖恶势力。而香港更是落入英国殖民者的股掌之中，再加之社会环境、风气习俗的潜移，所以，尽管香港黑社会组织有些表面上因袭“洪门”之名，但是其早已丧失原来洪门组织初期的革命性质，从一开始就定型为香港的黑社会组织。

组织演变

香港黑社会组织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香港今日英国殖民地的版图格局，是经由中英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港岛、1860年《北京条约》强租九龙、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借新界三个历史文件而最终形成的。香港开埠以来，其重要国际地位当数贸易、交通方面了。在本世纪初，香港的出卖劳力者，多数以搬运货物为业，另外还有一些小商小贩等等，几乎都栖居、活动于上环三角码头及湾仔两地。然而，你来我往，长期相处，摩擦与纠纷时有发生，当时的香港政府又管理不善，除非爆出命案，否则一概不问不理，因此，一度情势十分混乱。

当时，一东莞藉小贩由广州至港谋生。以前曾加入广州的黑社会组织“洪胜会”。现在，耳闻目睹此地劳力者聚众斗殴、互相残害，于是发起组织“洪胜会”，以欲解释纠葛。接着，其他行业也纷纷以行业或地区为限，一时间建立起了十多个堂口。不料，这样反而使原来属于个人之间、少数人之间的纠纷酿成堂口之间的争执，发生近十次大械斗，问题日趋严重。香港政府命令警察部门密切监视各堂口活动，并责成其缉凶归案。于是，这些组织便转为秘密活动。直至宣统元年(1909)，在十多个堂口中的“勇义堂”内，有一名绰号为“黑骨仁”的头目发起联合所有堂口和平相处的协议，万一出现纠纷摩擦，则用“讲数”方式解决。如若非打不可，也需指定时间地点，决一雌雄，但却不可泄密给官府。这些协议得到各堂口赞同。于是，在同年端午节，召开了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洪门大会”。大会发起人黑骨仁，原为大陆洪门组织的一支“天宝山”、“碧血堂”中职位不低的“红旗五哥”，所以便把这个堂口联合组织冠之以“洪门”二字，而黑骨仁则被列为香港洪门的“开山祖师”。并且，根据黑骨仁的提议，各堂口名称之前，一律加上“和”字，是取“和为贵”之意，此乃当时所谓的“和”字头黑社会。

在香港，还有一个比“和”字头更早的秘密组织“福与兴”，又名“义兴公司”。但是，由于它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替当时中国大陆某一个洪门山头筹措经费，因此，只能说它是中国大陆某一洪门山头的海外筹款部门。香港

“义兴公司”向侨胞募捐经费,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该公司成员的固定募捐;另一种是向社会各界的临时募捐。估计“义兴公司”的筹款活动在“和”字头组织诞生之时已经停止。否则,就难以解释宣统元年成立“洪门大会”并无“义兴公司”参与之事。至于后来“福与兴”变成潮帮三大黑社会组织中最有势力的一派,则又另当别论。

自民国初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香港黑社会组织人数最多、经费最足、规模最大的,当推“和安乐”。“和安乐”在未加上“和”字头之前,称为“安乐堂”,初期成员大多数为茶楼酒馆、街边熟食摊点从业人员。初期的第一辈“开山祖师”缺乏才略,其会员未见多大进展。民国十年(1921)左右,出现了一名“组织天才”,几年内,会员由300多人发展至3000多人,扩大地盘,调整组织,一切会务有声有色,令其他黑社会组织瞠目结舌。此“天才”名叫温贵,习文练武不成,却有指挥、组织之策。在“和安乐”与“和胜堂”冲突之中,他设计瓦解敌方,一举击溃对方主力,使整个油麻地区(当时九龙最繁盛地区)完全处于“和安乐”控制之下。于是,他自己也一举成名,由一个普通会员跃升要职——“白纸扇”。继之,温贵更加施展“抱负”,其一,是划分“和安乐”为十条线,线之下又分为若干堆,堆之下又有若干小头目联络普通会员,遍布九龙、香港、新界,从而形成由上至下的组织系统;其二,不论会员在业或者失业,一律交纳会费六毫,以此积聚钱财发放高利贷,一时间声势大振,别的堂口的会员纷纷“过底”。在香港历史中出现过两次与黑社会有关的大灾害,一次是日军入侵九龙时,“胜利友”大施烧杀抢掠,另一次是1956年的黑社会大暴动,“和安乐”均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是最近十多年来,才渐渐被“十四K”压了下去。

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是一次轰动中外的群众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和中华民族气概的充分展现。然而,香港的黑社会却在这次运动之中混水摸鱼,窃取不少利益,组织也随之壮大。当时,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大致有:“和”字头的“和安乐”、“和胜和”、“和利和”、“和洪胜”、“和群英”、“和合图”、“和勇义”、“和联胜”、“和合群”、“和合义”……等等;非“和”字头的“福与兴”、“同新和”、“同新义”、“单义”、“联义社”、“联英社”、“新同乐”……等等;还有外来组织统称“粤东”,来自澳门的统称“马交仔”;另外,还有以社会团体之名、为非作歹之实的组织,如“青年社”,“三圣体育会”、“西河体育会”等等。各个组织的人数少则数十人、数百人,多则数千人。几乎都是各据一方,欺凌弱小。而堂口与堂口之间,自然也为了争权夺利不时互相火并。那么,香港黑社会人物究竟是如何发“罢工财”的呢?当时,五卅惨案殃及大陆各地,而港督史塔斯密而不宣,但香港各界同胞早已通过其他渠道得知此讯,无不热血沸腾,纷纷声援大陆民众,反击香港政府。首先罢工的是香港海员工会,继而,包括电车公司员工在内的各行各业工人、店员,甚至政府雇员、外商雇员、皇仁书院学生、各界商人也纷纷响应,罢工、罢课、罢市使整个香港陷于瘫痪,一部分老弱妇孺纷纷离港。香港政府见状,便调动英军,荷枪实弹,整日巡逻。致使一般市民不敢外出,甚至取水、购物也不能。这时,黑社会人物便蠢蠢而动。湾仔区“单义”人马首先出动,代为挑水,代价每担一元(当时一元钱几乎可购上白米50斤,相当于现在的70——80元),而后其他各区的黑社会人物纷起效尤。以至强行勒索,入室盗窃,更有甚者,不管你是否需要,自动送上门,水到收银,否则就叫人皮开肉绽。所谓代客购物,更含诡计,歹徒们趁军警忙于镇压罢工、疏于治安之机,闯入店主回乡而仅有几人看守的店铺强取豪夺,呼啸而来,满载而去。然后,将抢来之物送至购物者家庭,收取货款,还要加一笔服务费。当时工人失业现象极为普遍,黑社会敞开大门,招兵买马,历时一年多的罢工行动,

每个黑社会组织较之以前“大大壮大”!

30年代初到1941年底香港沦入日军铁蹄之下止，这一时期是香港黑社会的黄金岁月，其主要原因是：黑社会人物和警方已经开始挂钩，使黑社会组织得以逐渐半公开化；警方侦缉手段落后，每遇大案，都要借重黑社会人物作线人，方能破案。这样，黑社会人物的地位大增；当时的市民较之今日比较保守，因而使黑社会人物的活动几乎未受什么阻碍；香港政府未有反黑的机构，法律上也未有惩罚的条款，因而黑社会活动没有什么顾忌；当时的黑社会帮规比较严格，也更讲究义气，组织内外如遇纠纷，尚能通过“讲数”求得解决，因而局面大致还较为“稳定”。基于上述原因，黑社会组织在十年之内得到了“空前发展”，犯罪活动非常活跃，非常普遍，只是方式、方法以及技巧上仍较为陈旧，尚不能引起大的轰动而已。主要罪行除了包庇黄、赌、毒及老千行以外，还有扒、窃、撬、诱、拐、卦、劫等等，有些人居然能选其中一业而终一生，可见，它的收入程度如何了。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圣诞前夕，整个香港落于日军铁蹄之下。此后的三年零八个月，日本占领军对香港实行军事管制，香港居民苦不堪言。但是，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却为虎作伥，充当走狗。若观下列种种恶行，便可一目了然。其一，在九龙陷落之前，以及香港被围之际，港、九两地均曾受到黑社会人物的打、抢、烧、杀，而沦陷之后，又替日军残害我无辜同胞；其二，香港沦陷后，黑社会组织“福与兴”的一名红棍林满勾结日军宪兵部的中尉军官久宫传一郎(中国名：李志廷)，在上环街市附近开设近十家赌场，庄家财源滚滚，其他黑人物也纷纷挂钩牵线，在西环、湾仔、九龙的油麻地、官涌地区，开设赌档；其三，沦陷期间为日军效力最大的黑社会组织，诸如“和安乐”、“和洪胜”、“和利和”、“同新和”以及“福义兴”等等，竟然为了50元军票奖金，出卖潜伏的抗日分子，为了一两烟土，用三个同胞的生命去换取；其四，更有甚者，黑社会人物居然协助日军在湾仔及油麻两地，建立慰安所，任由强盗蹂躏我姐妹同胞，其卑鄙行径，令人发指。

战后，香港又回复了英国殖民地的地位。遵照国际法庭指示，处理了诸如林满之类的汉奸罪犯之首领，其余黑社会人物则躲过风头，相安无事；不久，便蠢蠢欲动，重新活跃起来。最先恢复活动的黑社会组织，首推“和安乐”，其次是“福与兴”。一年之内所恢复或新兴的拥有会员500名以上的黑社会组织，大致有“和安乐”、“和胜和”、“和利和”、“和洪胜”、“和义堂”、“和胜堂”、“和勇义”、“和合图”、“和义和”等和字头的；另外还有非和字头的，如“同新和”、“联英社”、“单义”、“粤东”等等，属于潮州帮的则有“福与兴”、“新义安”等等；战前有一些组织，或被吞并，或渐消失，成为了历史陈迹，至于“十四K”、“敬义”、“马交仔”及青帮等组织，五年后陆续崛起。

此时黑社会组织的活动，除了一些例行罪恶，如盗窃、抢劫、街头骗局及街头赌摊之外，最普遍的莫如收规及包庇娼妓了。所谓收规，即是黑社会人物向市场、街头摊贩索纳“保护费”，否则，就藉端闹事，毁坏货物与生财工具，纵火焚烧摊点设施等等。此乃一条生财之路，于是战后黑社会组织厮杀争夺，无不为此。经过一番拼杀，强者生存，划分了各堂口控制地区。九龙方面：“和安乐”控制旺角地区；“和胜和”控制深北河街以北地区；“和胜义”控制佐敦道以北油麻地地区，“联英社”控制官涌以至尖沙咀地区；“福与兴”控制土瓜湾以迄九龙城地区。香港方面：“单义”控制湾仔地区；“和合图”控制中环地区；“和胜堂”控制西营盘以迄薄扶林地区；“新义安”控制铜锣湾以迄筲箕湾地区；“同新和”控制湾仔部分及西环部分地区。当然，这种控制是随着力量升降而变化的。

尽管战后黑社会组织在短期内重新设坛立舵，但其阵势远非战前。会员人数虽有所

增加，但组织指挥未见得得心应手，以致除了“和乐安”、“福与兴”等较为健全的单位，仍然留有“海底”（亦名会员花名册）之外，其他连会员人数都不甚了了。至于会员的忠诚程度则更难以与战前相提并论了。战前的黑社会人物，绝大多数都能做到“打死不报官，刑死不招供；公司有令谕，誓死要服从”的诫条，但战后黑社会人物一旦被警方逮捕，或招供同党，或作线人，堂口首脑也很少有呼云唤雨的无比驱策力了。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战后黑社会组织——“十四 K”在香港的崛起。1949 年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攻势已备，南京上海回归人民之日在望，而华南两广地区蒋部惶惶不可终日。在军统头子毛人凤密令下，其部下加紧联络两广各地洪门组织，以日后加以利用，图卷土重来。于是，由葛绍煌在广州再设“洪发山”，重建“内人堂”，时间为 1949 年 4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地点乃广州市西关宝华路十四号。今天的“十四 K”组织，则是由“洪发山”蜕变而来的。广州解放前夕，葛携各堂“香主”等至港，后又转留台湾。但其手下之众在港组成“十四 K”，并自恃为“洪门”源宗，以国民党为靠山，与原来的香港黑社会各组织判若仇敌，时发火并。到了 60 年代初期，手下已达 8 万名（包括未经正式手续者）左右。到了 70 年代初期，其组织竟然拓展至欧美、东南亚各国和日本。至于台湾、澳门或由“十四 K”操纵黑社会的组织，势大压人。鉴于其崛起的特殊背景，“十四 K”与台湾特务机构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连香港政府也在 1956 年黑社会大暴动之后作如是说。

60 年代初期，又有两个组织在港成立。它们是粤帮的“同乐”和湖帮的“义群”。“同乐”是由离开东南亚国家侨居地而获留港的部分华侨青年组成，后来成分也愈来愈复杂，有刑满释放者，有街头摊贩等等，但人数不多，难以与其他组织对抗。另一黑社会组织“义群”，原来是由一群小巴司机为了应付衙门的苛捐杂税而组成，初属“福义兴”、“新义安”人马。他们组成“义群”之后，又推出收租佬直接与衙门贪污分子联系，以免受多重剥削。此乃明智之举，别开生面。衙门方面只要金钱到手，对这个组织的存在也就默许了。其后，它也就堂而皇之地生存、发展起来了。

组 织 结 构

据统计，直至 1978 年，在香港仍然有组织、有活动的黑社会组织及其人数，大致如下：

“十四 K”：香主为陈仲英、欧标（继任），二路元帅为陈×华，人数约 5 万人（澳门除外）。

“和记”：香主为黄老润，二路主帅为黑鬼棠（绰号）。下属有 13 个和字头组织：

“和安乐”：3 万人。

“和胜和”：1.7 万人。

“和胜堂”：5500 人。

“和义堂”：5000 人。

“和勇义”：1500 人。

“和合图”：8000 人。

“和利和”：4000 人。

“和胜义”：4000 人。

“和洪胜”：1000 人。

“和群乐”：500 人。

“和群英”：500 人。

“和一平”：700 人。

“和二平”：400 人。

“四大”：香主为沙皮×（绰号），二路元帅为靓坤（绰号）。下属有：

“单义”：1 万人。

“同新和”：5000 人。

“同乐”：700 人。

“同义”：500 人。

“联英社”：7000 人。

“联群社”：1000 人。

“联义社”：500 人。

“联群英”：1000 人。

“马交仔”：1000 人。

“潮帮”：香主为能十，二路元帅为老虎仔（绰号）。下属有：

“福义兴”：2 万人。

“新义安”：1.5 万人。

“敬义”：3000 人。

“义群”：1000 人。

总之，上述这些有组织系统的黑社会人数共约 19 万人。而且，组织不定形的松散人数不计在此内。

香港黑社会组织人数似乎众多，但绝非想象的那样指挥得力、整肃有致，当然，也并不是处于瘫痪状态。基本状况是：第一，具有约束、指挥力量，但较之以前大为逊色了。比如，在战前，如不服从大阿哥命令者，会遭家法处置。而今日，除利益冲突之外，即使大阿哥陷入重围，也无手下拼命相救。第二，早已丧失了“打死不报警、刑死不招供”的严明堂规。在战前，黑社会组织之间发生械斗时有伤死，损失惨重。但是也有宁肯寻机报仇，而不报警执法的。而今日，一旦被捕，原来威风凛凛的黑道人物，也无不叩首求饶。

现在的香港黑社会组织与旧时的中国帮会性质已经迥然有别，但是其组织形式仍然前后因袭，未曾改变。

香港黑社会组织中，职司等级分明。这点与大陆以前的洪门帮规大同小异。主要职

司等级如下：

香主：又名四八九。

二路元帅：又名四三八。

红棍：又名四二六或十二底。

白纸扇：又名四一五或十底。

草鞋：又名四三二或九底。

四九：即最底层的普通会员。

在这些职司等级中，香主职位为每个字头的最高掌权人，也称大陆元帅。如“十四K”、“和记”、“四大”、“潮帮”，其下属有众多堂口。但这四个黑社会组织中，每个只能选一名香主，以统辖下属各堂口组织。可见，香主的地位和权力是不可小视的。二路元帅则与之不同，每个堂口均有一名或多名二路元帅。平时如非坐馆，则有职无权，也有多人爱戴的退任坐馆，后被推举为二路元帅的。红棍则为黑社会堂口的打手领班，被推为坐馆者，必具红棍资格。白纸扇乃各堂的军师，每一堂口的内部事务一般由坐馆和揸数处量，而揸数一职非白纸扇不可。一旦遇有对外事务时，白纸扇则“运筹帷幄”，为决一雌雄出谋划策。草鞋乃黑社会组织中的最低职位，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各方联络。剩下的就是四九，也就是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群众。但或有十年以上会龄，如蒙坐馆、揸数提报，也可参加会务谋划或招收门生。

香港黑社会组织等级的升迁制度也是确定的。其一，四九可以升职为草鞋、白纸扇或红棍，但仅能升一项职位，并非按级递升。而且升职之后，几乎是终身任职，曾经坐馆或揸数才可以升任二路元帅或香主。其二，如果某一正式入会的新会员，对堂口有特殊功绩，可以在坐馆保荐之下，不经四九阶段，直接升为鞋、扇、棍，因此被称之为“平地一声雷”。其三，接收临时会员。按照黑社会传统规矩，入会时须经一系列手续、仪式。如：大开香堂时千斤重誓、拜过五祖、初习诗词暗语、列名海底等等。这样，才是正式会员；如只是由某一职员收为门生，口头传授初级诗词暗语便成为会员的，只能称作临时会员，便可称之为挂蓝灯龙。其四，不管是否正式会员，入会者必须向自己的大哥献毛诗（利是红包）一封，其数目须带六字。大哥则须将半数归公，作为堂口经费。但今日，由于堂口办事处不固定，办事员也难见其人，大哥便乐得坐享其“钱”了。而且，入会的规矩是“无事三十六，有事三百六”，即有意加入某一堂口以求避灾躲难的，还得加倍交纳。其五，黑社会会员也有“过底”之允。即由黑组织甲转到黑组织乙，在新旧双方的拜兄同意之下，便进行“过底”仪式。从此，与原堂口脱离一切干系。如遇纠葛，则必须为新堂口效力，不得陈仓暗渡。

从前的洪门组织，与现在香港的黑社会组织的组织目的完全不同了，前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后者则完全蜕变为为非作歹、抢劫民众的恶猖了。然而，由于两者于当朝当政所不屑，贬为非法，因而，在谁敌谁友难以识别之时，便均采用暗语联络，进行活动。香港黑社会组织的暗语基本上因袭了原洪门组织，但由于粤语音韵与普通话有些区别，又加上使用暗语者的即兴创作，所以，现有暗语也就五花八门，说怪不怪了。

香港黑社会人物惯用暗语（又称背语），据有关人士记载，大致有如下几类：

日用品类：披（衫）、横角（裤）、踩街（鞋）、底横（内裤）、线超（眼镜）、金枝（火柴）、雀（香烟）、盔（帽）、孔明（灯）、飘（船）、莲花（碗）、千张（纸）、毛诗（利是）、锚花（匙羹）、耍花（筷子）、大瓦（被）、轮（电话）、蛋（手表）、黄指（戒指）、青（刀）等等。

食品类：毛瓜（猪）、大菜（牛）、摆尾（鱼）、砂（米）、耕砂（食饭）、班莲（饮茶）、青莲（茶叶）、摆横（吸鸦片）、啤灰（吸白粉）、减灰（戒白粉）、玩波仔（吸红丸）、耕罕（吃药）等等。

人称类：老亲或羊牯（非黑社会人物）、花腰（警察）、本（探员）、天牌（父亲）、地牌（母亲）、倏女（女朋友）、倏仔（男朋友）、吉佬（女

人)、柳记(狱警)、老表(同门手足)、灰斗(外国人)、金手指(警方线人)、老道(吸毒者)、擘口仔(戏子)、老记(记者)、老伏(律师)、大爷(即老千们专用,所指被骗对象)等等。

其他还有:爆江(流血)、受把(坐牢)、一碌(一年)、抹(判案)、过江(渡海)、挂枝(香港)、马交(澳门)、大圈(广州)、开片(打架)、超(看)、爆冷格(入无人之屋行窃)、爆热格(入有人之屋行窃)、墨漆(衣盗)、文雀(扒手)、高买(窃取店铺货物)、跳流罕(卖假药)、咬老软(靠女人吃饭)、熬老亲(暂有正当职业)、陀地(本地)、一斤(一百元)、一栋(一千元)、一简(犯案一次)、狗咬(枪伤)、入册(入狱)、出册(出狱)等等。

另外,香港黑社会组织,还有彼此之间问答的诗词(民称黑话),以揣心迹。比如:经大哥正式收进会门的,必会传授一些普通回答的诗词加手势,此乃"过野",否则,若遇上内部人物问及时,答非所云,便要换拳头了。因此,要熟谙此道。当遇到别的黑人物盘问时,若问:你是贵公司(或格什)的?就答:我是老歪(因发"和"字的音时口略微歪斜)的。又问:谁是你的大佬(收已为门生的大哥),谁是你的顶爷(开香堂时的坛主)?答:×××是我的大佬,×××是我的顶爷。然后,问者要求答者交出宝、印。宝乃以左手握拳单独竖起中指;印乃以右手的拇指、食指及无名指并在一起。一般是先宝后印。如果答者不服,便可正容回驳:你何德何能,要我交宝交印?若见问者方面人多势众,便只有惟命是从了。至此,如若双方愿意和解,便无事了。若有心挑衅,便会继续盘问风、流、宝、印四首诗词了。

风诗云:

说我是风不是风,五色彩旗在斗中。

左边龙虎龟蛇会,右边彪寿合和同。

流诗云:

说我是流不是流,三河合水万年流。

五湖会合三河水,铁锁沉蛟会出头。

宝诗云:

一湾过了又一湾,我家原住五指山。

一心找寻姑嫂庙,左右排来第三间。

印诗云:

若问印头头二四,排成三角订佳期。

结义金兰为表记,同心合力主登基。

到此或止,或继续盘问过五关。所谓"过五关",乃是右手从肩到掌的五个部分的名称,即:高溪庙、龙岗、长沙湾、二极桥、姑嫂坟。如当被问及时,答者便需以左手姆指和食指作圈状,其余三指伸指,然后将左手搭右手由肩至掌于五个部分,并念出名称。"过五关"中的每关,都有诗一首,但一般盘问多数不需再提诗句,在此也不过详赘述。

总之,要想成为正统的黑社会人物,不仅要熟暗语,精诗词,而且要会手势以及"过五关"。

香港黑社会的组织系统,可谓简而全。每一大组织,如上面提到的"十四 K"、"和记"、"四大"和"湖帮"等等,均设有香主一名。下属各堂口均设有坐馆一名,揸数一名,另外还有具叔父资格的执事者若干名。这些人等的职责乃是代表本堂与外界交涉,管理内部属员晋职或解释纠葛。坐馆必须具有红绲资格,揸数多数自白纸扇任职,尊称先生。

黑社会组织上述头目的产生方式,美曰"选举",任期一般为三年。但是,至于如何选举,则令人啼笑皆非。选香主时,下属各堂口的坐馆和原任香主共聚共饮,酒足饭饱之际,某人提议本届香主名单,若无人反对,便大功告成,当选者如不在场,由卸任香主告知;如有异议,再提再议,直至通过为止。有时由卸任香主介绍推荐下任,事后口头通知于下属会员。坐馆与揸数的产生亦与之相似。坐馆召集堂口中名人,介绍下届坐馆、揸数情况,由到会者通过;如果大家认为原任德高望重,也可连任这两个职务。1956 年 10 月前,香港黑社会组织新旧两任交替,还举行隆重仪式庆贺一番,后因禁止非法组织集会,便无此

举了,时一两次仪式也难以引起什么轰动了。

香港黑社会组织中的香主与坐馆等头面人物,其地位还是令普通会员仰目相看的。但是,时至今日,被称之为“新血”者的,绝大多数是目无规矩的青少年,什么帮习道义,与他何干?所以,头面人物也奈何不得,只好顺其自然,从而内部指挥效能日趋削弱。

骇人罪行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在大举侵占了中国大陆的同时,于1941年12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东南亚一带也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香港岛未能幸免。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军队空炸启德机场、金钟兵房以及太古船坞,步兵在炮火掩护下由深圳向新界挺进,海军也协同作战。到了9日午时,已近九龙市区,港岛危在旦夕。可是,恰在家园倾覆之前,香港黑社会组织头目及其门徒,却密谋蠢动发财,极尽烧杀劫掠之罪恶。

9日下午,大约有660名左右粗壮大汉,在软州街的一幢楼房天台上聚会,一名削瘦烟容的中年登高疾呼:"各位手足,我们发财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所有花腰都跑到对江去对付架仔了。我们要把握机会,及时出动。各堂口要齐心合力,互相支持,提防羊牯们的反抗。至于我们内部划分地盘,待稍后各堂口再行商议。各位现在如有什么意见赶快提出来,以免延误发财的时间,……。"此乃何许人也?他是"和安乐"的白纸扇梁棠,虽有鸦片烟瘾,但却粗通笔墨,诡计多端。集会中,有"和安乐"、也有"和洪圣"、"和群英"、"和利和",还有"和勇义"的人。另外,广州陷落后来港的粤东帮也有两人参加。这些人七嘴八舌,各显高见,或提议抢银行,或提议掠民宅,或提议劫金铺、公司,……。结果,无一人能说服众人,吵成一团。最后还是粤东帮两人之一,绰号四眼球的,讲出了一番颇能服人的道理。所云如下:"虽兵荒马乱,羊牯对于财物还是非常重视的。如果轻敌,或者力量分散,遭遇反抗必伤无疑。"随之,还亮出左臂一处伤痕以示佐记。原来这是当年在广州西关一家世宅抢劫时落下的"光荣"伤疤。众人听罢,纷纷计教锦囊妙计。于是四眼球得意地说出计策。他以为,一是要集中力量,至少100人为一股;二是要有足够的武器;三是未行之前,必须先划分地盘,免得自相残杀。众人表示赞同,先把地盘划分出来。各堂口推选一人,以抽签方式获得所分地盘。结果,"和安乐"得旺角区,"和洪圣"与"和群英"得深水涉区,"和利和"与"和勇义"得油麻地区,"粤东"帮由于人手少未参加抽签,地盘划分停当,又规定白布缠绕左臂作为识别标志。胜利二字作为口号,故这伙人等后来被称之为"胜利友"。事毕,已是黄昏时分,各路人马便四头奔走联络,集合本堂口帮兄,准备大发国难财了。

历数黑帮罪恶,说来令人发指。首先,"和利和"、"和勇义"两个堂口,共约出动250人,在上海街找到两家刀剪店,破门而入,各自找寻适用的架撑——武器,如西瓜刀、牛肉刀和大菜刀。然后,分成五组,进行活动。言明:单独发现财物,归个人所有,集体发现的则见者都有份。而且还商定:不伤人、不劫色。但在抢劫时,就顾不得许多了。如在上海街附近榕树头的某号4楼,三名匪徒轮奸一名年仅13岁的少女,致使其跳楼自尽

9日、10日，各区警署人员不知何故，无人出勤巡逻，当然若干警员被调往前线协助英军行动为明人所见之外。这样，“胜利友”得以横行肆虐。9日整晚，黑帮奸、杀、烧、掠，无恶不作，深水涉、旺角、油麻地三个地区，早已混乱至极，惨不忍睹。上海街的金铺集中地，则为重点抢掠目标。其中有一金铺未能疏散，铺主拒绝交出金柜钥匙，被抢劫者乱刀砍死。5位店员因不知店主钥匙所藏，也被逐一砍死。最后的死者乃是一名18岁少年，苦苦求饶，言父母双亡，还有一祖母靠他侍奉，也未能幸免。至于其他的银铺商户及一般居民，其财产损失，或被杀被烧的，简直不计其数。

10日早晨，黑社会人物已将上述地区洗劫一空，便向南继续发展。起初因南面多数为外籍居民栖息地，因不知底细，不敢贸然动手。可现在，各区已被洗劫殆尽，九龙城区也早被湖帮的福义兴反复洗劫，何况日军已进入九龙市区，再不动手就坐失良机了。于是孤注一掷，向尖沙咀拓展新地盘。这时，许多黑社会以外的地痞无赖或胆大之徒，也纷纷趁火加入打劫行列，和安乐主力率先捣毁九龙粮仓大门，人群蜂拥而入，掠劫大米、砂糖、棉纱、布匹、罐头和洋酒等等。留守员工或伤或死，多达十人。随后，黑社会人物袭击黄埔船坞，原以为会有所得，不料全是机械或钢铁材料，恼羞成怒，一把火烧毁了整座船坞。

接着，匪徒们又向红勘三约的居民点进发。战前的红勘、土瓜湾一带，家道足者甚少。尽管如此，匪徒们仍想水中捞油。他们先把各户人家赶到街中排列成行，点然一堆易燃物品，然后逼迫居民交出财物。如若不从，就把居民推入火堆活活烧死。据一位目击者张老太太回忆，她自己的一位同胞兄长，就是这样惨死的。还有一位老妇人，为抢回匪徒抛进火中的一领棉絮，扑上前去，歹徒却一把将她推进火堆，可怜老人就这样活活烧死了。

下午，匪徒们烧钉抢掠，前进到九龙城道北帝街附近时，与正在该区烧杀的潮帮人物遭遇，狼虎相斗，大打出手，一场恶战下来，死伤不计其数。晚上，匪徒又回军尖沙咀，这个时候，抢劫的已不仅是所有的黑社会人物了，还有不少地痞无赖。甚至他们的家属，也肩挑手提，大包小裹，趁乱发财。他们都用白布缠左臂，手持锐器，破门而入，喝令屋主蹲下，拳打脚踢。然所胡乱翻腾，寻找值钱的物什。金钱自然不肯放过，甚至连眼镜、发饰等物也要抢去。临走时，乒乒乓乓乱砸一通，扬长而去。洗劫尖沙咀之后，部分匪徒又回军角地区，以为还有“漏网之鱼”，再度扫荡。

港岛警察与九龙警察比较起来，尚能就地维持秩序，故而还未促成大乱之势。但是，九龙方面抢劫消息传来，港岛方面的黑社会组织——“和合图、“单义”两股堂口，也按捺不住，聚众过江。“单义”的一名红绲想出妙计，英军由九龙撤至港岛的铜锣湾及北角，并在此集结以对付日军。而上环以至西环部署甚少，因而有些往来于港、九两地之间的居民。暗想：何不渡海到九龙去发财？于是，11日上午，他率领两帮人等约60余名，胁迫8只小船艇，由上环码头渡海到九龙山东街码头登陆，先到钦州街跟“水房”的梁棠联系，梁棠以为这个顺水人情还是做得的，既然自己已经捷足先登，就让他们再搜刮一次吧，且浙出手下协助。于是，再度洗劫又开始了。由于商店堂铺早已被抢劫，这回的目标主要是住户。但是这些住户都是小户人家，平时仅可温饱，省吃俭用也许有几个钱，这时也已补贴家用，哪还有什么节余呢？因而，这帮人物所到之处，抢到的也只是新旧衣服、米油盐茶，甚至日用品也照拿不误。结果，使一些人家衣食无着。这是匪徒在九龙的最后一次搜刮。因为日军在12日黄昏已经攻下市区了。

也就是在这最后一次搜刮中，出乎意料地遭到了一次抵抗。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在今日的大角咀一带，原来是修船工人居住的

棚屋集中地，因为破破烂烂，初时的洗劫者不屑一顾。但是工人们仍然提高警惕，由青壮男子组成自卫队保护妇孺，准备一旦万一发事也好反击。恰巧，最后一拨匪徒路经此地，一念之差，总觉得还有些油水可捞，于是呼啸而上。不料，木屋顿开，一下子冲出数十名手执铁具的大汉，挡住来路，恶战一场。这帮乌合之众哪是工人们的对手，一下子倒下了十多个。12月12日，日军侵占九龙，九龙居民进入更黑暗更悲惨的时代。

1956年在香港发生的黑社会组织双十大暴动，是由台湾特务一手策划的。自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每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国民党政府是把它作为中华民国国庆日看待的），都以机票、食宿引诱海外同胞赴台观光，港澳地区也对亲蒋社团补助聚餐费、花牌费，并印制大量的青天白日旗，令这些社团四处张贴，以壮门面。继之，亲蒋报纸刊物，大加渲染，讨好蒋家政府。当时香港的涉置区，包括黄大仙、石峡屋和李郑屋村三处，每年10月10日，都是亲蒋人马活动的重点区，张贴标语、挂旗等。1956年10月10日也不例外。早在8日，李郑屋村涉置区的一个居民组织（属亲蒋派人士吴某把持）领回不少青天白日及若干庆祝补助费，吩咐各位成员加紧布置。当晚每户十面旗，贴到或挂到门外显眼地方。结果，上述三个涉置区未到双十那天，已经是旗山旗海了。9日午间，又再次在临街楼群墙壁上贴满纸旗、标语、纸串等等，甚至连浴室、公共厕所也照贴不误。

可是，李郑屋村却因挂旗问题，出现了纠葛。10日上午，涉置区一姓李的职员，看到公共墙壁上张贴着花花绿绿的纸物，认为这与管理条例有悖。于是，通知居民自动拆去，但谁敢应声呢。该职员只好自己动手拆了，然后回到办事处办公去了。可是，当那个居民组织知道此事之后，一个绰号为猪肠粉（“十四K”分子）的男子，集合三四十人包围了办事处，质询此事，职员解释一番，但未能被接受，人群云集，后来竟达600多人。办事处职员见势不妙，忙通电深水涉警署，请求派警维持秩序。20名警员随后赶到，但发觉实在是警力有限，只能是采取保守态度。滋事分子见状，胆子也大了，由猪肠粉提出条件，限涉置区在15分钟内答复，否则采取行动。条件是：重新张贴上纸旗，并加上蒋介石像；燃放价值五百元的爆竹作为认错；李姓职员向蒋介石像三鞠躬道歉；在全港大小报章刊登由滋事分子拟定的道歉启事，不得更改；以纪律处分于撕旗职员。条件苛刻之甚，办事处难以答复。

猪肠粉原来只是一个摆摊卖猪肠粉的，哪有这等精明？细想原委，是那个居民组织的吴某幕后操纵。吴某原来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专门负责海外工作的）的外围人物。在教唆猪肠粉提出条件之后，立即派人打电话向在××戏院开坐的梁××报告。梁××是六组驻港特务头目，公开身份是出版社副总编辑。梁××获悉情况，立即奔赴现场，与吴某商议计策。岂料事态发生变化。原来涉置区办事处主任，为了息事宁人，竟然答应滋事分子的部分要求。但滋事分子拒不让步。深水涉警署援兵赶到，为首的是位副警司。另外，九龙警察总部也取消各级警务人员休假，待命行事。

梁××与吴某，也设立临时指挥部，当梁××获悉官方让步之意后，急令滋事分子要为“国家”争口气，条件不得变更，如有拖延，立即以暴力相对。接着，暴徒们蜂涌而入办事处，冲开警察拦护，见人便打。那位副警司，立即吩咐部属，全力保护20多名办事处职员离开。但暴徒们一面纵火焚烧办事处，一面追打警察和职员，直至在永隆街口展开混战，致使警察职员多人受伤，暴徒最后被警方发射的催泪弹驱散。

事已至此，本应告结。但是，梁××却想乘机掀起大浪。还有比梁××更有地位者，乃是军统（六组属于中统系统）派遣在港的头

目毕××(少将)。于是,梁××便把事件始末报道上级和毕××。毕××指示,此后此事由军统处理。以后,事态发展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直接与台北方面联系,获得指令。同时,香港警察总部的政治部主任英籍人哥×,也召集几名部属研究此事,得知台北驻港特务机构有可能从中策划,为避免事态扩大,便采取种种措施,抽调各区警署人员一部分到九龙总部,并令九龙总部尽量多派警员守护现场,防止暴徒再次集结。

岂料,台北方面已直接派遣物务前来指挥,利用这个偶发事件做起文章来了。10日当天傍晚,在九龙长沙湾道××号2楼屋内,潜伏在港的军统物务陈×阶,作为毕××的心腹助手,又与“十四K”人马密谈,面授机宜。指出,此事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国家”的体面,为了香港方面不敢轻视“右派”力量,台湾方面准备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希望“十四K”和香港洪门兄弟报效“国家”,把左派打得落花流水,出出这几年的怨气。5名“十四K”头目听得眉飞色舞。陈×阶继续指示:由十四K联络全港洪门,编成5个大队,人数、武器、联络事宜,10月晚10时之前完成;由台湾方面派人指挥,5个大队以孙逸仙先生为编号,台北来人分别以孙君、逸君、仙君、先君、生君作为代号;大队召集人仍以“十四K”人物为主,其他若忠贞可靠亦可,人选得立即通知指定联络人×先生,必要时召集学生参与宣传工作;香港总督葛量洪在度假,署理港督戴维德才智不足,尽可放手大胆干,攻击对象主要是左派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等等,力求一举摧毁左派在港实力;斗争区域主要是九龙与新界,香港方面视情况发展而定,尽量不要分散精力;各大队于明日(11日)午间领取连夜赶印的“国旗”,战斗指挥部暂定为长沙湾球场,……如此如此,陈×阶唾沫飞溅,布置停当。

就在10日晚9点30分,一场大规模的洗劫发生了。一辆消防车被推倒,若干警察及消防员被玻璃瓶、砖头打伤;嘉顿公司十多辆货车被烧毁;新中国货公司、荣华茶楼、大丰国货公司……被砸开门窗,推动一空;大发土产公司、学生书店、元×参茸行、益丰食品公司均遭洗劫;周生生金铺被毁坏,但保险库坚不可摧;暴徒围攻九龙警察总部、旺角警署和九龙交通部,警察关上大门,采取保守态势。

11日凌晨,受害地区逐渐扩展至旺角、长沙湾以及整个深水涉区。11日早晨8点,暴徒们分别集合,多者二千,少则三百,长沙湾球场,更是人头攒动。球场内外还有约二百左右的骨干分子臂缠白布到处巡逻。一面青天白日巨旗不知何时树在球场中央。可能整个九龙地区的黑社会组织都已接到通知,编成若干大队。军统特务陈×阶,也到处驱车指挥。上午,暴徒们首先攻占了中建国货公司、龙门冰室、雪山冰室、×祥匹布店,益群食品公司……等,掠烧一空。警察却不敢单独行动,只能百人方队在远处向暴徒施放催泪弹。

同时,台湾方面又派出7台特务来港,致使暴乱形势更加恶化。一是凡进入北九龙地区的车辆,都要用10元或10元以上代价购得一面纸旗,贴在车头之上,方可能行。一位佩戴名贵金表的车主竟被诈取1000元。有些车辆一路驶过,竟然被勒索十一次之多。二是发放特别通行证给他们的同路人以及有特殊身份的人。三是整个北九龙地区的商户被暴徒强行勒索,言之支持反击香港左派的斗争,如若不“捐助”,抄家灭族则有之。少则100元,多则竟达5000元。如长沙湾道一个五金店,因挂一幅毛泽东像,被勒索5000元,还强迫店主在门口跪罚半小时。“捐助”之后,发给暗玛纸旗贴在显眼处,据说便无人敢来骚扰了!四是围攻香岛中学、嘉顿公司和宝×纱厂、南×纱厂、东×酱油厂,揪打左派职工,勒索巨款。至于葵湾闹市所有商户均遭劫掠,极少幸免。五是酝酿成了轰动中外

的惨剧,即焚烧瑞士共和国驻港领事馆副领事兼参赞及其夫人同坐的汽车,司机当场死亡,参赞夫妇均负重伤入医院抢救,但参赞夫人终因医治无效,在第三天死亡。

10月11日由早到晚,九龙半岛被烧杀抢掠,已无半寸净土。据统计,被洗劫焚烧的工厂、学校、工会、商店不下300家,死伤人数到11日下午5点,已过300人。至于参加这次暴乱的人数,除了乘机混水摸鱼的居民之外,各堂口黑社会人物竟达3万人之多。台北方面,则大加赞赏,鼓励暴徒为“护旗”战斗到底。但却回避这场事变与台湾的联系。

下午3时,港府召开高级紧急会议。署理港督戴维德决定颁布戒严令,并调英军进入市区,维持秩序。戒严令明言:由11日晚上7时30分起至12日午10时止,整个九龙半岛将实施宵禁。参与者将指挥部由长沙湾球场移至于葵涌的一处民宅,筹划下步密谋。主要事件有:一是洗劫三×布厂、联×兴漂染厂以及一家工会宿舍,二是血洗荃湾,杀死居民50多人,被强暴的妇女有60来名,伤者不计其数,至于财产损失,则难以估量;三是攻占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人员伤死数名。但是,香港政府逐渐控制了局面。

10月13日,周恩来总理约见英国驻北京代办欧念儒,严正指出,在九龙的中国居民,其生命财产在国民党特务的残杀劫掠下遭受重大伤记损失,特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关注。对于香港英国当局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国民党特务分子策划的暴乱,以保障中国居民的生命财产,提出严重抗议。强烈要求香港英国当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厉制裁国民党特务分子,切实保扩在港九的中国居民和中国政府附属机构和企业。同时,英国政府应对上述问题予以答复。中国政府保留在以后提出要求的权利。周总理这番话,指明了这次暴动的性质,斥责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的丑恶行径和香港英国当局的软弱立场,果断地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态度。

在中国政府压力之下,港府加快步骤进行大搜捕,自13日晚至16日解除戒严令,共拘捕人数达5300余人。当然,真正的黑社会人物确实不少,但也不敢肯定没有无辜市民受牵连。但港督葛量洪否认国民党策划、指挥暴动,而且竟然指责周总理对港府的措施不当的批评为“干预内政”,把这场暴乱说成是香港“难民”对“左派”的报复。由此,港府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反抗议”。香港英国当局之所以持这种立场,应该联系1956年的国际局势加以解析。当时英国和美国是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伙伴,而英国视美国为西方世界的盟主。美国当然庇护台湾当局,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因而,香港英国政府怎敢指逆盟主之意,抨击台湾呢?除此之外,港英当局也有从港岛的安全、稳定考虑的因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港岛居民何以能接受?

镖　行

什么是镖

镖行是缘票号而生，理由是“镖者，金票也。”保镖就是保金票。

镖局和票号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是镖局和票号均是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其次是镖局和票号都是属于封建经济范畴，就是在“新政”的冲击下由鼎盛急转直下归于衰落；再其次是镖局、票号和清王朝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二者是相关企业。

一提起票号，人们立即会联系到晋商。中国两大商帮有南徽北晋之说，而且从经济实力上来讲，晋商要超过微商。因为晋商控制着票号，在经济领域中有举足轻重之势。可是山西在明、清两朝均不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于省份来说称得上是贫穷之地，自然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万历时实行“一条鞭法”，山西未能推行；雍正时推行“摊丁入亩”，山西执行时阻力也很大。原因很简单，商品经济不发达，老百姓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一时难以变成银两去交纳田赋。但晋商为何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创造出了富甲天下的山西票号？要弄清这个问题，要上溯到明朝初年。

明初设“九边”以防御蒙元的残余势力南下，防卫的重点在山西地区。当时山西布政使的辖区还包括现在的河北、内蒙、陕西的许多地区。沿边的军事重镇如章化、大同、东胜、榆林、太原、延绥……或设于山西境内，或临近山西省区。所以山西就成了明廷对付蒙元残存势力南下的战略后方和补给基地，出现了许多军需承包商，这些大小承包商均发了“军财”。

民族关系缓和下来后，明廷又开了“茶马互市”和沿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通有无。名为“茶马互市”，其实贸易的范围很是广泛，盐、布、绸以及百货之属无所不易。晋商利用地利之便垄断“茶马互市”，从法律形式上来说“茶马互市”是官营，可是山西商帮也成了互市的承包商。

万历之后明王朝的防卫重心已转向了山海关外，山西失去了军事重镇的地位。但是此时的晋商羽翼已丰，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已有虎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之势。位于大运河汇入长江的水衢扬州是中国南北商帮的会聚之所，晋商、徽商均“择扬州而居，以窥天下之利。”二者虽然同居一城，但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和特色。晋商善于聚财、守财，经营上比较保守重信，生活上也比较有所节制；徽商在经营上比较灵活，生活上好大肆挥霍。

晋商发祥于承包军需和茶马互市，和朝廷有传统的联系，好走上层路线。晋商南下北归均沿京杭大运河，所以北京是其中转基地。在扬州“窥天下之利”，在北京“窥天下之势”，“挟利势而无敌于天下”。

综上所述，晋商这个概念不是活动在山西地区的商人，而是山西籍的商人。许多地区的会馆称之为山陕会馆，从广义上来讲，晋商这个概念还包括部分陕西商人。许多晋商

在经商地区已经生活了许多代,但仍然保留山西省籍,其原因是山西商帮的势力大,招牌响,可做依托。

晋商足迹遍布全国,为了保障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当然要寻求保护。不但要寻求官方和半官方的地方势力的保护,也要进行自卫。商人进行武装自卫,可以说是伴随着商业活动的产生而产生的,但自卫的形式有多种。康熙初叶,隐居在陕西华阴县的顾炎武致书在山西的傅山,商议以护商为名建立武装力量以谋反清复明的大业。有的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镖行缘起于山西,并推论镖行和票号同根、同源,得出了"镖者金票也"的结论。

镖行的产生并不排除多元论,更不排除镖行笔票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但保镖做为一个行业来说它是独立的,绝不是任何行业的附庸或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保镖和被保护对象不是一种简单的雇佣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等的合同关系。"丢镖"的镖局要按合同进行赔偿,订立合同的双方有明确的权力和义务。

北京会友镖局的镖师们师徒口碑相传,该镖局创建于康熙年间。即使是口碑无讹,镖行的产生也只能是在康熙末年,或是康雍之际。因为在此以前不存在着镖行产生的条件。

票号的产生可溯源到唐代"奏事院"的"飞钱",但有文字可考,也得到各界人士公认的说法还是雏形产生于乾隆时期。第一家见诸记载的票号日升昌是嘉庆年间(约 1824 年)在山西平遥诞生的,该店前身是染料庄。在乾嘉以前可以说也不存在着产生票号的条件,因为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垮了国家对主要商品的垄断专卖制度是镖行、票号产生和兴盛的前提条件。而真正具备了这种条件时应该说是乾嘉之际。

大型镖局的镖路覆盖大半个中国,在主要城市均设有分号和外柜;大型票号的分支机构不但遍布全国,而且打出国门在大阪、神户、新加坡等地设有分号,俨然有国际化的趋势。可是二者对外的经营方式,对内的管理方式都是封建性质的。

镖行和票号有业务关系,可以说是相关企业。镖局不但为票号护院、坐店,还为票号运送银两。票号之所以用"逢百抽五"的高额费用请镖局运送银两,是因为镖局一旦"丢"了"镖银",将按合同照价赔偿。如果镖局是票号的附庸或是票号的组成部分,那么票号也就失去了请镖局运送银两的意义。

有的票号研究专著上认为"票号兴而镖局衰",从表面上来看确是如此。庚子之后票号进入了鼎盛时期,而镖局却是一蹶不振了。但镖局一蹶不振的原因绝不是票号兴,只能说是票号鼎盛也并不能挽救镖局的衰落,何况票号由鼎盛到败落也不过是八九年的时间。

票号在咸丰朝渡过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太平天国攻下镇江后切断了京杭大运河,清廷不但漕运中断,而且江南各省的饷银也难以解送到京。此时票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利用民间渠道为清廷提供金融服务,几乎成了"国家银行"。此时镖局也发了票号的财,正常情况下运送银两"逢百抽五",在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绝非此数,价码多少,视路途"匪情"而定。

清廷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在道咸以后大肆卖官,四品的京卿、道员之下直至监生(相当于秀才)皆可用银子来"捐"。票号包揽这项买卖,用银子打通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关节,俨然成了吏部的分支机构。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光绪"西狩长安",户部银库成了联军的"战利品"。清王朝没有国家银行,所以此时完全失去了财政来源。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只好再度依靠票号。票号此时也全力以赴支持清廷度过了财政危机,所以庚子以后票号鼎盛。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国家开设的汇

丰(英国)、花旗(美国)、道胜(俄国)、正金(日本)等银行在中国的大中城市普遍设立了分支机构。一九〇五年后清廷推行“新政”,也开始设立大清银行、大清邮政等新式的金融、邮电机构。各省也设立了“省行”或“官银号”为地方官办的金融机构。当国家和地方的官营金融机构建立起来并发挥实体效用后,票号也就一撅不振纷纷倒闭。所以票号由鼎盛到全面衰落只用了七八年的时间。

镖局的全盛时代是“同治中兴”时期,从时间上来说不但早于票号而且长于票号。辛丑条约签订后镖局一蹶不振,二十年之后以会友镖局的关闭标志着中国传统镖行的瓦解。可是票号不但在辛丑之后“红火”了七八年,而且有的票号苦苦撑持到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

综上所述,镖局和票号只是相关企业,而且不是同步相关。但镖局和票号在对外的经营方面、对内的管理方面、对社会的交际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造成这种相似之处的原因是镖局和票号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同,二者都是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又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畸型成长起来的,在成长的道路上和清廷上上下下的官僚体系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镖局和票号有很深的业务联系,可是这种联系并未造成二者之间兴衰与共。但二者的兴衰均和清王朝的政治局势有直接关系。镖局和票号之间的关系是否只限于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同、成长的时期大体一致、以及业务上镖局为票号运送银两、护院、坐店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保镖就是保金票说也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研究。一些研究票号的学者把票号本身拥有的武装自卫力量和镖行混一而谈是有些欠妥的。镖行是由镖局、镖户、个体镖师所组成的一种行业,镖行和被保护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自由雇用和受雇之间的关系。镖行的主体部分镖局已经把这种自由雇用和受雇之间的关系上升为权利和义务分明的商业合同关系,丢镖后照价赔偿正是对等的商业合同关系的集中反应,也是保镖做为一个行业而独立存在的具体标志。镖行的独立性不但在研究镖局和票号的关系时要给与充分的注意,在区分镖师和警卫、家丁、团丁、打手……时也应给充分的注意,不要把绅、商、黑社会直接拥有的武装力量和镖行混一而谈。

镖缘水起

北京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码头，运河对北京地区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隋炀帝把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北上开通到涿郡(北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东征高丽的军事需要。当时涿郡是辽东前线的后勤补给基地和朝廷的前进指挥所。元、明、清三代是以北京为首都的统一王朝，大运河是连接京师和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其功效是综合性的，体现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诸方面。清代平定三藩之后，南方各省局势稳定，长城之外亦无“边患”，运河的功效在经济上突出了起来。清廷维护运河畅通的直接目的是确保南粮北调，解决北京地区十余万携眷驻防的八旗官兵的口粮和朝廷命官的俸米。

由于京杭大运河横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和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大省区，在航管上、运输上有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和跨越省区的河政问题，所以清代设河道总督综理黄河、运河事务，官阶为正二品，并例兼兵部侍郎和右副督御史衔。河道总督额定三缺，北河由直隶总督兼任；南河由漕运总督兼任；东河为专任。河道总督直辖的军队名曰“河标”。本标有左中右三营，分防驻守的部队有八营。河道总督衙门之下辖有“管河道衙门”，直隶、河南、山东、江苏四省的河政官员总计有同知 22 人、通判 13 人、州同 5 人，州判 13 人、县丞 37 人、主簿 42 人，巡检 11 人，河政机构之庞大可想而知。由于漕运也是跨越省区的复杂问题，所以清代设有总漕部院衙门，简称漕运总督衙门主管漕政。漕运总督驻节淮安，管辖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并节制八省卫(守备)、所(千总)官兵，官阶为正二品(加尚书衔者为从一品)，因例兼兵部侍郎、督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所以全称为总漕部院衙门。漕运总督直辖的部队称为“漕标”，本标有左中右三营，分防的城守、水师部队有七营，驻守运河沿岸要冲之地。在运河沿线还设巡漕御史，分驻淮安、济宁、天津、通州四镇巡视漕务，稽查漕政。巡漕御史是钦差官(监察官)直接向皇帝述职。

由于清代的河政、漕政独立于地方行政之外，所以大运河两岸具有特殊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风尚诸方面也均有其特殊性。大运河流经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全长一千八百余华里，两岸途经的地区又是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所以造成的影响也甚为巨大。中国有句俗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运河就吃运河。吃运河的人，士、农、工、商，各界均有，本书只就黑社会吃运河的情况加以介绍，因为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与镖行的存在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运河两岸的黑社会团伙通称之为“吃漕的”，吃漕的方式“非偷即抢”，“偷不到就抢”，“偷时被发现就抢”。总之是以偷为主，抢为辅。从官方来讲，“吃漕的”自有漕标官兵进行镇压，偷者锁拿送县，交地方官治罪。抢者格杀勿论。可是官船(运粮船)上的船丁和押

船的官兵对运河两岸的骚扰也足构成一害。为害方式是白天穿着号坎(官衣)为非做歹;晚间官船照例停航,船丁和押船官兵脱下官衣或偷或抢,做案之后只要跑回运粮船,地方官则奈何不得。

“吃漕的”既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偷抢官船,对于航行在运河之上的民船更是不会轻易地放过。从历史上来看,人类最早的暴力行动——抢劫行为比交易活动产生的更要早。因为交易活动只能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有了剩余产品时才可能产生部落之间的交易行为。而在此以前,原始人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原始群之间,部落之间即有暴力行动,而且早期的交易活动,经常伴随着抢掠行为。“神农氏日中为市,聚天下之民,交易而退”。为何非等到“日中”才“为市”呢?其主要原因是光天化日之下便于管理和控制,防止发生暴力行动。早期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到达我广东、福建沿海地区时也是“交易”和“抢掠”相结合,在有驻军守卫,或地方势力控制下的武装力量十分强大的地区,有些西方“客人”就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在没有防卫力量的地区,就从事海盗式的抢掠。所以官方、非官方、合法、非法的商业活动都存在着“保卫”问题。国家专卖、垄断形式下的官营贸易,自有国家机器进行有效的保卫。非法商业活动中的与官方对抗行动,以及“黑吃黑”的互相火并的行动,是伴随着非法商业活动的产生而产生的社会现象。早在春秋时期,齐桓公用管仲为相,实行食盐专卖时,也就产生了“私盐”。为了保护私盐经销的顺利进行,非法商人在组织非法经销活动时也就组织了非法武装,但这种非法武装是非法商业活动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也不可能是商业性质的雇佣关系。明朝中叶以后就有“松江衣被天下”之说,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实行“一律征银”促使民间商业交易活动频繁了起来,因为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只有销售出去后,才能变成银两,来交纳明王朝的“征银”。这无疑是刺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客观上也起到了刺激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产生的积极作用。而大运河的南段正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浙地区,因此明代万历之后,大运河南段地区,镖行产生的条件已经开始趋向成熟,所以笔者妄加推论,大运河上的水路镖,可能比华北平原上的陆路镖产生得要早一些,在明代万历之后,可能产生过雏形镖局、镖户,但未见文献记载,又无口碑相传,因此只敢妄论,不敢妄断,只有抛砖引玉,求教于诸贤达。

清廷移鼎入关,八旗兵挥师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浙地区惨遭空前浩劫,生产力遇到了严重的破坏,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亦为战乱所摧残,即便雏形的镖局、镖户已经产生,兵锋所至,亦随兵风逝矣。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京杭大运河开始逐段断航,但华北平原上以白洋淀为中心,还存在着一个水网地带,保定、天津、沧州等地区仍有水道可航,所以水路镖仍然留下了一些有限的文字记载和相传的口碑。有些内容前文已述,本章仅就镖行和船户的关系进行阐述。

民谚有云:“车、船、店、脚、衙,无罪都该杀。”其实从事这五种职业的人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也不一样,以船户的地位最为低下。车、船同为交通工具,但车户的专业性不强,因为农户离不开车马,历代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均是以农为立国之本,士、农、工、商,农居第二。船户就不同了,明初朱元璋的竞争对手失败后或潜迹江湖水泽,或远走沿海岛屿,所以明王朝实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海”。同时极力贬低内陆江河之上的船户的地位。清初以郑成功等人为首的南明武装力量,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水泽之中与清王朝对抗了将近半个世纪,清廷视舟船几乎与叛逆为同意语,所以继承了明朝歧视船户的政策。康雍

之后广东沿海的淡水船、浙江的江山船、江苏的花船又兼有水上妓院的性质，所以船户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更为低下。镖师的封建正统思想很浓重，虽然长年以车船为伴，但只和车马结缘，镖局、大车行，大车店、骡马店是相关企业，甚至形成保镖、运输、贩卖骡马一条龙。镖师虽然视走水路为美差，但和船户共处而不合流。

清初，大运河上的官船都是运粮船。康熙时台湾统一由中央管辖后，清廷对福建水师进行了裁撤，将淘汰下来的战船转入内河，成了长江、运河之上接送官员上任下任的官船。康熙和乾隆二帝均六下江南，此时大运河上的官船非常之多，龙舟的护卫船、运输船首尾相接，遥连百里。但这些官船平时利用率极低，中下层官员上任、下任均雇用民间船户的私船，私船上挂起了雇主大人的衔牌，夜间点上带有品级的官灯，于是私船也就成了“官船”。

清末时江、浙一带的官员上任下任，因公出差，大多公然乘坐江山船、花船，富商大贾对江山船、花船也颇感兴趣。江山船、花船上有类似妓院“臭靴”的打手，“臭靴”是船主雇来的，其职责是对付妓女反抗，嫖客闹事。镖师是乘客雇来的，其职责是保护乘客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二者各司己责，业务上泾渭分明。镖师和船主不论是一般的客船，还是江山船、花船，均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职业的需要。镖师最看不起“臭靴”，但“臭靴”也决不会和镖师“叫份”，这也是职业的需要。镖师走水路镖时，如保的是“货镖”，则在运输货船上插镖旗，衣着打扮也“带像”。如在水道上走“客镖”，一般不在客船上插镖旗，衣着打抢也不“带像”。插不插镖旗，带不“带像”都是根据工作上的需要，因为大运河的水道上贼匪们的作案方式都是入夜之后暗偷、暗抢，镖师也是根据具体情况或明保或暗保。大体上是货船明保，客船暗保，但江山船、花船上的“臭靴”都挺“带像”，所以不明真像的人就把二者混一而谈，这是不适当的。

京杭大运河未断航时，水路镖是镖行的大宗买卖，运河开始分段断航后，不几年也就进入了“同治中兴”时期。这时虽是镖行的黄金时代，但水路镖已是局限于运河沿线的部分地区，因此水路镖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京杭大运河也可以说是镖行最早的一个摇篮，但这个摇篮还没有等到婴儿成长为中年壮汉时就消失了。消失了也就意味着被遗忘了，所以小说中，评书艺人的段子中，一般世人的心目中，镖师的形像都是马上健儿，或是夜行高手，不是驾舟弄帆的水上豪杰。

北京最大的一家镖局是会友镖局，它一直存在到一九二二年才走完了自己最后的路程。它不但名气大，给市民们留下的印象也深，都知道这家镖局是康熙时代开设的，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老北京的市民有个习惯，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老的好，吃米讲究吃陈年的老仓米，喝酒要喝窖存的老白干，所以商人们迎合这种心理，把新米熏成老米，把新酒乔装成老酒，到市场上加价出售，以显示本店资本雄厚，存货多，来个名利双收。有人认为会友镖局开创的时间，可能比康熙要晚一些，是雍乾老店，即便确是康熙年间创办的，也是康熙末年，或是康雍之际的产物。因为康熙初年，汉满间的民族矛盾还很尖锐，统一战争尚未结束，生产力还没有得到全面恢复，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未能超越前代水平，封建人身束缚也还普遍存在着，不存在创建镖局的条件。

统一战争结束后，清王朝的统治得到了相对的稳定，但人压迫人的社会里，社会的稳定总是相对的，所谓稳定就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阶级对抗或民族对抗的战争，也没有“匪情”。但贼资的活动，在“盛世”中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匪、贼、盗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匪、盗、贼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匪是揭竿而起，和封建王朝公开进行武装对抗，但不一定有政治要求和主张的武装力量。盗有“偷

盗”和“强盗”之区分,“偷盗”者暗窃也,“强盗”者明抢也。贼者,小偷小摸之暗窃也。镖行把自己的对手统称之为“贼”,镖师所称的贼是小股的“匪”、“强盗”、“偷盗”这三概念的综合外延。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政治上相对稳定的盛世是不难出现的,可是政治上的“盛世”,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盛世。政治上是“盛世”,商品经济也得到发展,封建人身束缚全面松动,却只有康雍乾时代,所以镖行只能在这时诞生。

商品经济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雍乾以前的商品经济不外是三种形势,(一)是邻近地域的民间交易;(二)是为官僚贵族服务的长途贩运;(三)是国家的垄断贸易(专卖物资)和官方严格控制下的交易。邻近地域的民间交易是自然经济的自然补充。为上层服务的长途贩运,不但为上层服务,而且依靠和附属于官僚贵族阶层。国家的垄断和控制下的贸易,是国家机器运行过程的一个环节。自然经济的自然补充不可能请镖行去保护;为上层服务的长途贩运;为国家垄断、控制的官营贸易,自有国家机器保护运输过程中的安全。只有在康雍之后形成的商品经济,才具有较大的民间性和自由性,才需要镖行去保护。

既然康雍之际镖行产生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那么镖行的雏型是如何产生的呢?政治上动乱的地区,匪患不断的地区,商人对之是裹足不前,避而远之的。无匪患的地区,在封建社会即称之为太平之地。可是太平之地也不乏盗贼之忧、商人长途贩运仍然需要有一种外在的保护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华北平原上的保镖行业应时而出。

冀南豫北的民风多习武尚勇,练功者豪侠仗义,好打抱不平。路遇盗贼抢劫商人旅客时挺身而出,抗暴安良是武德所系,驱走盗贼之后,认为自己对弱者有帮人帮到家的义务,往往送上一程,目睹商旅进入安全的地界后才返回。被救护者自然是千恩万谢,援救者最初认为这只是一种义务。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过境商人登门请求保护,于是义务也就向着职业发展。

镖行的雏型是三二习武之人,在交通枢纽之地,等候要求保护(雇用)的商旅。他们推着一辆小车子,车上装着武器和生活日用品,为了醒目,车上往往插着一面小旗子,旗子的功效类似商店的幌子。过境的商人和他们谈妥后,就推车上道,送上一程。发轫之初,送的路程不会太长,本乡本土、地熟人灵,一远离本地区未免人地两生,所以雏型的镖行有接力衔接的性质。因为原始的镖师是本地人、盗贼也是土著之士,双方都很熟习,若考究起习武世序来,说不定还是一师所传,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都知根知底,所以都不会做出“绝”事来,留有再见面的余地。镖师和盗贼都是熟人,都不会做出“绝”事来的特殊关系,奠定了双方共事的准则,而且贯穿了镖行的始终。

原始镖师的团伙,根据组合之初的不同结构、向着镖户和镖局两个方向发展,以同族、同里为基础的团伙,往往形成镖户;以习武练功之友为基础的团伙,大多形成镖局。

“镖”字望文生意是一种武器,属于暗器的范围。旧小说中称之为金镖,有“金镖压绿林”之说,其实金价高而质软,绝无用之制造武器的道理。金、斤二字同音,金镖者,斤镖也,镖这种暗器轻了杀伤力太小,重了打不动,一斤一个较为适合,故称之为斤镖。镖师之中善使镖这种暗器的人固然有之,但镖太笨重,身上不便多带,不是镖界偏爱的武器。

镖行之所以被称之为镖行,确实和镖这种武器有关,镖行发轫之初,原始镖师的小推车上放着的生活日用品和武器中,最醒目的武器是许多短矛,短矛的头类似镖,一排排的短矛,矛头朝上立放着,以便于遇到贼匪拦路时迅速“飞”出去,其实这种武器应称为“飞矛”,由于矛头类似镖的形状,所以世人又称之

为“飞镖”，它比镖的杀伤力大，飞出去后又便于找回来，重复使用，也可当做近战武器，用于白刃格斗。久而久之，世人就把原始镖师的小推车称之为镖车，车上的小旗称之为镖旗，镖行的名称也就确立了下来。

还有一种说法是：“镖”是指镖师所护送的财物银两，所以镖行的人管外出执行任务叫“走镖”；财物银两被贼人抢去称之为“丢镖”；贼匪们管抢夺镖师护送的财物叫“劫镖”、“夺镖”。笔者认为两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甚至是因果关系，前说是因，后说是果，两说结合起来，是较为完整的释意。

世间存在着的事物，都会在文学艺术中有所表现，清末民初，以镖客为题材的小说喧闹一时。可是，保镖这一题材且不说不见之于唐宋传奇、宋人评话和明代的小说，就是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红楼梦》也未涉及镖行的内容。《红楼梦》号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部百科全书，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所不包容，无所不反映，镖行在书中无立足之地，可见镖行在当时的影响还不大，镖行的黄金时代是“同治中兴”时期，存在落后于意识，所以镖行反映到文学艺术中时已是清末民初之际。尽管进入二十世纪后，镖行已迅速衰落，可是“达官爷”（镖师的尊称）在小说和评书艺人的演说词中正在走红。

镖行不同于土匪

镖行和贼匪是斗争的双方。镖行的存在单方面依靠贼匪的存在,因为没有贼匪的盗窃和抢劫,也就没有人会花银子雇用镖师保卫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镖行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所以镖行的存在和发展,不但依靠商品经济的兴隆和发展,同时依靠贼匪们的存在和发展。如果商品经济发达,交易的商队络绎不绝,可是四境安康没有匪情贼患,镖师们也只好另谋生路。

贼匪们铤而走险的目的是盗窃、抢劫钱财。图财害命,杀人越货,在受害者看来是一个统一体;在官方看来是一个案件。但从匪贼们角度来讲,图财和越货是目的,害命和杀人是手段,是一种最好不采用的手段,因为害命和杀人的过程中必然要引起受害者的反抗,妨碍图财和越货的顺利进行,同时一旦出了人命,地方官由于职责所司不得不过问,事情闹大了,不但马步捕快会奉命限期缉匪归案,甚至巡防营也会出动限期剿灭以绥靖地方。所以贼伙、匪股拦路抢劫时总是横刀舞枪,拿出一副山大王的面孔,满脸杀气,商人行旅见到后如吓得叩头求饶,或是弃财而逃,那是贼匪们最期待的效果,因为不杀人就达到了越货的目的,如果这个匪读过孙子兵法,他就会说:“不战而屈人之兵矣!”

镖行的目的是保障雇主生命财产的安全以收取酬金,和贼匪武力对抗是镖师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是镖师最不愿意采取的一种手段。因为镖师无剿匪缉盗的责任和义务,只要不丢镖,就是完成了任务,既然完成任务的途径和方法可以是多样的,镖师当然选择不流血、不对抗、不动武的和平方式。可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贼匪和镖师都是吃镖路上这碗饭,敢来劫镖的一定是剽悍的强人,敢出来走镖的也一定是武艺高超的镖师,否则不但会丢镖,还会丢命,一旦相遇,双方心里都有个“谱”,不会胡乱来,更不会妄动。土匪们常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豁着干啦。”但人活着才能享有钱财,人死了钱财是带不走的,贼匪虽称为亡命徒,其实都是欺弱畏强的惜命鬼。和镖师相遇之后,当然明白不杀人就能越货只是幻想,但杀人的过程中,很可能也被杀,人死当然也就财空。所以贼伙匪没有绝对的把握、绝对的优势和周密的善后安排时,是不会用流血的方式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来劫镖的。但拦路抢劫本来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事,何况又是两强相遇,很难说谁具有绝对的优势和善后安排,更不能保证不出差错,所以再强悍的贼匪,拦住镖车时心里也有点打鼓。因此,镖师利用贼人胆虚的心理状态展开和平攻势,以求达到屈人之兵的目的。斗争双方的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可是贼匪们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是:镖师这个朋友是战而不屈的角色,更不会不战而屈,这是由职业性质所决定的,而战与不战,流血与不流血的主动权不掌握在镖师手里,全凭自己决定。镖师从实践中得到的经

验是:贼匪是个知难而退的朋友,只要给他面子,他就会不战而屈,高抬贵手,放自己过路,避免一场流血格斗。用贼匪们的行话来说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放走了扎手的(镖师),就能捞到顺手的(无抵抗能力的商旅)。用白刀子挣白银子;要用红刀子挣白银子,划得来划不来就难说了。所以镖路上斗争的双方虽然经常相遇,可是真正"斗"了起来百不遇一,发生流血事件更是"斗"中所常见。

镖师们在走镖过程中,最常碰见的是"打杠子"的朋友,所谓"打杠子"的都是些半路出家的业余贼匪,不但劫道的经验阅历不深,而且武艺往往也不高,或三五结伙,或数十成群,临时组合起来捞一把,这些团伙大多是输光了的赌徒,或是村镇中的无赖,手持大片刀或红缨枪,身上头上打扮得花里胡哨,脸上有时还勾着花脸,拦住镖车去路时,口里唱着由评书艺人那里学来的套语:"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从此路走,留下买命财。牙蹦半个不是字,大刀管杀不管埋。"镖师一见就知道是群利巴,也范不上和他们废话,"三下五去二",就把这群"山大王"通通打翻在地,把刀搁在他的脖子上教诲几句,劝其改邪归正,当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然后放他走人。如果"山大王"确实改邪归正了,那么和镖师也就只有此一面之缘;如"山大王"在实践中闯了出来,由"业余"上升为"专业",真正的落草为匪了,那么总会有和镖师重逢的时候,既然是重逢,当然就是故知,况且故知还有不杀之恩,当然要继续交朋友。镖师和利巴们交手时不但不杀,而且尽量手下留情,不把"山大王"们打残,这固然是为了交朋友,同时也为了别结冤家和少找麻烦。因为"山大王"们好歹也是地头蛇,一旦出了人命,就会纠缠镖车处处做对,时时寻机报仇。同时只要一出人命,镖师就得报案,地方官验明正身,查清事相后才能了结,说不上要耽误上十天半个月,给自己找一身麻烦。

走镖的路上,碰上一群"山大王"是小事一段,可是遇见了"朋友"就得好好应酬应酬。按照走镖的规矩,沿途要喊镖号,镖号又称为"趟子",因此镖行内部称走镖为"走趟子"。镖号是"合吾"二字,其意是"和我合的来的",也就是"朋友"之意,越是爱出事的地段,镖号喊得越要勤,目的是向朋友——贼匪致意,礼多人(贼)不怪嘛。过桥、过山口时"合吾"二字喊得要抑扬迂回,叫作"凤凰三点头"。因为朋友大多在这些地方恭候镖车,如贼匪是打过交道的"熟人",看见镖旗后就打算放镖车过去,是不看僧面看佛面的仗义朋友,他就也喊一声"合吾"。于是埋伏在暗处的小贼们听到首领的号令,也就一齐喊"合吾"以壮声势。这时领队的镖师赶紧下马,走上前去和贼首见礼,不管认识不认识,一律抱拳拱手道:"当家的辛苦了。"镖师称贼首为"当家的",就等于承认贼匪是镖行的老板,镖行的这碗饭是贼匪赏的。如二人未见过面,贼首就会说:"贵宝号的某某达官可好?"镖师回答:"小字号的某某托我向您问好,这回又惊动宝山,在下姓×草字××,吃的是朋友饭、穿的是朋友衣,又给朋友添麻烦了。"这几句话是恭维贼首的,但也是实话,于是彼此叙叙旧,拉拉老关系,又谈谈心,这个朋友就进一步交上了。

如果朋友看见镖旗后不买账,听到镖号后不答腔,横刀拦住去路,是位生脸的朋友,眼看就是一场厮杀,可是领头的镖师却赶紧跳下马来,放下武器,上前施礼道:"当家的辛苦。"贼首也回礼答道:"掌柜的辛苦。"这时镖师要自报名号,可是不能问"当家的"名号,因为为贼、为匪,焉有留下姓名、籍贯、住处之理。接着双方用黑话对谈,镖师得承认吃的是朋友饭,穿的是朋友衣,天下习武之人同师同源,所以得讲江湖义气,求朋友借路。如果有缘份,朋友交上了,贼首同意"借路",就会回头喊一声"合吾",埋伏在附近的小贼,有几个人就喊几声"合吾",以示人多势壮,有时"合

吾”声连接不断，喊上好大功夫，其实未必有那多人。

如二人话不投机，总也说不拢，贼首叫镖师留下××两银子买路钱才肯放行，可是镖局的规矩是绝无交买路钱之理，这个例不能开，交了买路钱不但镖师栽了，也没处报账去。这时镖师只好说道：“既然当家的不肯放小字号过去，那也别叫弟兄们伤了和气，在下就陪当家的玩几招，当家的赢了，我就照着您的吩咐办，如在下赢了，求当家的放我们过去。”这时出阵的二人都很明白，如果镖师赢了，贼首理当要借路，如镖师输了，也用不着交买路钱了，镖车上的东西全归贼匪了。一般说来贼首们重江湖义气的，如果输了，会借路放行，但也不排除恼羞成怒后仗着人多势众，背信行抢。

和贼匪谈判，镖界行话称之为“点春”。因为与贼匪相遇，本应是一场厮杀，异常严酷凛冽，恰如寒冰冷霜，如谈判成功，自然是冰河解冻，带来大好春色，故称之为“点春”。吃镖行这碗饭光凭武艺高强还不行，还要“点春”有术，方能化险为夷，趟开镖路。总的说来在发生劫路时，匪方有人出来答话就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只要镖师不卑不亢，“点春”得当，都能交上朋友，化险为夷。从匪首贼头们的角度讲，他们横刀拦住镖车去路时，往往是正等着镖师前来“点春”，因为只敢“捞顺的”，不敢碰“扎手的”，未免在“小的们(部下小贼匪)”面前也显得跌份，难以压众。对没有什么真本事的匪首来说，劫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内是树威，对外是找朋友。可是镖师对这种朋友也不能慢怠，俗语说：“羞刀难入鞘”要是点僵了，也会弄假成真，因为没有真功夫的人往往有混劲，急了眼后就铤而走险，不考虑后果。

镖师们赶趟子时最怕碰上“饿虎”。“饿”者，饿红了眼也。“虎”者，有些真本事也。饿红了眼，而又有些真本事的贼匪，见了镖车当然志在必夺，所以和“饿虎”相遇，无“点春”之余地，只能是景阳岗上的老虎与武松——你死我活。“饿虎”劫镖时绝不出来答话，因为已经志在必劫，匪首也就没有必要出头露面，叫镖师给他画画像，登登记，好来个冤有主，债有头。“饿虎”劫镖大多首先阻断交通，如破坏桥梁，设置路障，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事先锯断了路旁的两棵树，用绳子牵着，等镖车一到，立即放倒，同时树倒就是动手的号令，潜伏在路旁的贼匪们一拥而上，见了镖师后不容分说举刀就砍，由于倒树断了道，押车的镖师无法打马狂奔夺路冲出，几个贼罪用车轮战的方法困住一个镖师，当镖师们都被“钉”住后，小匪们就扛起镖车上的财物狂奔而去，车上的东西差不多被抢光了时，一声口哨，围困镖师的贼匪们狂逸而逃，劫镖行动也就宣告完成。如果“饿虎”没有阻断交通，那么这只虎真是饿极了，饿得连镖车也准备一同吞下，所以有经验的镖师一见到这种情况，立刻把骡马的牵引绳割断，使饿虎无法连车吞。在劫镖的过程中，无论匪方阻断交通与否，镖师都希望能打一场持久战，因为时间只要一拉长了，就会惊动官府和地方势力，官方的治安机构由于职责所司，不能不出来拿匪擒贼。地方势力虽无缉匪捕盗之责，但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在坐地虎的地盘上劫道，是把他看小了，无视他的存在，一气之下也会鸣锣集众，上千条壮汉浩浩荡荡地开赴出事地点。坐地虎一旦出动，“饿虎”也得退避三舍，走为上策。

走镖时一旦和“饿虎”相遇，免不了要付出血的代价，所以说镖师以身殉职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不过“虎(匪)”要不是真的饿极了，也不会去扑武松(镖师)，还是叼只大肥羊(无抵抗能力的商旅)，既省事，又不冒风险。不过景阳岗上的老虎扑了武松，武松才成为打虎英雄，镖路上有“饿虎”劫镖车，镖师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可能。所以镖师真正的衣食朋友不是打杠子的“山大王”，而是敢于共同流血的“饿虎”。

打杠子的“山大王”没有资格和镖师往来，劫镖的“饿虎”又没有可能和镖师往来，所以镖路上的朋友，只有经镖师点过春的，才能成为镖局的坐上客，是镖局经常需要接待的朋友。贼头匪首们在山沟、道边呆够了，蹲腻了，和镖师们混熟了，于是心血来潮也要进京城逛逛，开开眼界，这是惯例，因为贼和镖师交朋友，所图也就是到北京城时有个落脚之地。

贼头匪首们进北京时都乔装成商人，可是其言行举止、起居做派和商人的距离都很大，往往是贼风不改，匪气尤存，一进城门就让采访局的探子给盯上了，探子们的办案方法都是放长线钓大鱼，盯上了后看“窝”在哪，到时候来个连锅端。可是发现贼人进了镖局，探子们也就不盯了，因为黑道上有规矩，贼匪进城，只要是到镖局落脚，就不是来做案的绝对奉公守法，不给朋友添麻烦，在城里不做案，也就抓不到捕他的把柄，生抓进去，镖局就会搬出“大门坎”(后台)来要人，弄不好给自己招麻烦。

贼头匪首们到镖局不报姓名，只说：在下是某某达官的朋友，和贵宝号跑×路的达官们都认识。坐内柜的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朋友”到了，赶紧就请进去，哪位镖师和他最熟，就负责出面接待他，寸步不离地陪着这位朋友逛庙会、听戏、洗澡、遛天桥。下馆子吃饭一律由镖局结账，不能叫“朋友”在城里破费了。好吃、好喝、好待承，一切悉听尊便，只是有两样不行：一是上妓院；二是去宝局(赌局)。因为贼头匪首们到了妓院和宝局后非出事不可。同时宝局和妓院也是镖师们禁忌之处，怕沾上臊臭气。

贼头匪首们在北京逛够了，玩腻了，也就该回乡重操旧业了。镖局给朋友雇好骡车，派镖师送他出城上路，事先已经关照好了车把式：“不要问客人上哪去，只管听吩咐。叫向哪赶，就向哪赶，到地点后客人自会有重赏。”望着朋友扬尘而去，镖局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贼头匪首们如在北京城里闹出了事，叫官府捕去，镖局就算栽了，镖路也就封了。朋友进京时又爱凑正月十五灯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的热闹，万一酒后一时高兴，在帝京之内，御辇之下演出了一场闹元宵或闹花灯，那镖局可真吃不了兜着走了。

镖局和贼匪交往如此之密切，会不会有跳槽的呢？贼匪改邪归正入镖局当上达官了；或镖师入黑道落草为匪，啸聚山林，成了山大王。这均是不会发生的事，因为江湖上有规矩，贼匪可以“金盆洗手”。但洗手不干后只可异地为民，不能投官，也不能入镖局，洗手后干这两行就是黑道上的死敌，贼匪们不除掉这个祸患誓不罢休。因为知根知底的人一但投入对手的行列，会泄露出全部的内幕，造成极大的危害。镖行的规矩也不收留黑道上的朋友，怕是“饿虎”的引线，造成引狼入室的恶果，更怕造成收下了一个，得罪了一片的局面，那是自封镖路，因小失大。镖行的达官如想落草为匪，那也只能在镖路之外另辟蹊径，因为黑道上也有规矩，不收镖路上的达官。吃江湖上这碗饭的人，都重义气，讲究礼尚往来。如落草的达官在镖路上另立山头，自成门户，那么镖、匪就会组成联军共讨之。当然这种联军不是并肩作战或分师进剿，而是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借刀杀人，以除掉这个最危险的对手。“弃明投暗”的镖师在镖路之外落草，不破坏镖行的利益，镖行当然也就犯不上非除掉他，可是镖路之外大多是商旅稀少的穷乡僻壤，在这样的荒漠之地当山大王，也就只能劫探亲赶集的老乡民，或是绑土财主的“票”，没有多大油水。所以镖、匪两家泪泾分明。尽管长年在一起厮混，是礼尚往来的朋友，但没有跳槽的，各自都不招降纳叛，都注意保持自己队伍的纯洁，俗语说“镖门、匪门，只入一门”，就是这个道理。

斗争艺术

走江湖卖艺的人有句口头禅，“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镖师一年四季在外走镖，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贼故然是镖师的对手，也是镖师的衣食朋友。但和贼相遇的时候毕竟是少数，和贼真刀真枪打起来的时候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但官方的巡防营、巡检司、税务司、厘金局在镖路上却是比比皆是，地方势力更是无处不有，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外出走镖，如处理不好与官方及地方势力的关系，那将是寸步难行，其危害程度，远远胜于贼人。所以镖师走镖必须和沿途的官员及地方势力的头面人物交好朋友。

镖路上的官方机构分三种：一是管理治安、弹压地方的巡防营、巡检司等武装力量；二是设关立卡课收税款的税务司、厘金局等财税机关；三是如沿运河走水路镖，那就要和河政、漕政机关打交道。清代设漕运总督，称之为漕师；河道总督，称之为河帅。漕政、河政均独立于地方行政机关之外，自成系统，故走水路镖，必须通晓“河漕之道”，方能畅行无阻。

镖车起程前不但镖局开有“镖单”，官方还发给“路引”，一路之上本应畅行无阻，沿途官兵均应放行并给与保护。其实不然，官视商为一块肥肉，雁过尚且拔毛，肥肉焉有从嘴边放过之理，故镖车经过巡防营、巡检司的驻地时照例先行呈上镖单、路引，如系初次见面，还要出示大门坎后台的官帖，声称：“某大人命在下向贵长官××大人(或老爷)致意。”说罢也就将官帖收起来，并不实递，原因是只有此一张通行证。兵头将尾们见镖车通行的手续齐备，无可挑剔，又有大官的帖子，也就只好放行了。这时镖师也乘机和他们攀谈、混熟，摸清其底细，但尽量叫官面上的人对自己是丈二的和尚——摸不清头脑。不知道镖局的来头有多大，门坎有多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官兵们对镖局有三分恭敬之心。一旦镖师与贼人相战时发生失利，求助于官兵，兵头将尾们看在熟人的份上，大门坎的面上，不能不助一臂之力。况且谁都知道，弹压地方，缉拿贼盗，是巡防官兵职责。但破贼之后，镖师的雇主总得意思意思吧，所以这个忙是不会白帮的。再说镖师和这些把总、哨长、棚头混熟的过程中，免不了已经先破费上了二顿酒肉，镖车遇劫时，他们帮助喊几嗓子、放几枪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好歹是朋友嘛。

镖师对雇主的责任是防劫、防盗，保证货物安全到达，沿途和税务司、厘金局打交道是雇主自己的事。但有时雇主自己并不押车同行，而把一切事情委托给镖局代办了，即便是雇主押车同行，地方沿途的税关、厘卡，也未必有镖师熟悉，所以在交纳税金、厘金时，镖师们还要帮忙打通关节。所谓打通关节，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偷税漏税，坑国家，肥执法人员，利自己，花一个要省十个。但镖师对雇主这个忙也是不会白帮的，到达终点后，雇主也当然要意思意思，有所表示。

如果说沿途打通税关、厘卡的关系，镖师对雇主是帮忙之举，那么和地方势力打交道，则是镖师的正差了。因为大车上只要一插上镖旗，就称之为镖车。在地方势力的眼中，只知有镖局，不知有雇主，一切纠纷均以镖师为对象。地方势力最强大的地区，在镖道上要属河南省。中州大地上遍布着半官方的乡兵、团练等组织和地方豪强控制的红枪会、大刀会，以及强宗大姓，习武团体等等。地方势力的特点是均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雄踞一方。在其势力范围内可谓是名符其实的土皇帝，其作用和影响甚至不亚于官方。镖车要想平安通过，就必须避免和土皇帝们发生矛盾。地方势力和黑社会不一样，不抢、不劫、不盗，也不勒索过境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和镖师斗得是“气”。称雄争霸的地方势力也明晓自己只不过是地头蛇，生怕外来的强龙把自己看小了，来个强龙压倒地头蛇，这样不但失了面子，倒了行市，而且无颜和同侪相见，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争一口气，佛受一炉香”“不蒸馒头，也要蒸(争)口气”，这往往是地头蛇的待客之道。

镖师们深知各种地方势力的心理状态，故采取强龙礼敬地头蛇的策略来与周旋。遇有半官方性质的民防局、团练所，镖师用对官方的礼节待之，主动出示镖单、路引，并要求保护。在乡兵、练勇眼里镖师们是由京城里出来的人物，又有大门坎的贴子，自然是要礼敬三分。常言有云：“礼尚往来，交友之道也。”红枪会、大刀会等组织系地方豪强所控制的武装团伙，成员较为复杂，其中不乏歹人，但这此歹人大多也是在本地盘称王称霸，对过境的强龙的要求只是礼敬自己而已，以满足颜面上的“风光”。强宗大族、习武团体，对过境者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不斗气、我不争气。正因如此，当镖车通过村、集、镇、屯时，镖师是均下马步行，以免马上的英姿，触动地头蛇的自尊心，造成不愉快。镖车要进入较强大地方势力的地盘时，镖师一般都策马先行，拜会其头面人物，称给地头蛇烧香顺气，然后再驱车过境。

可是有些地方势力中的头面人物，或是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或是逞强心切，骄横已极。把镖师的礼敬当成胆小怕事，认为走镖的只不过是凭旗号吓唬胆小的，没什么了不起的真功夫。于是地头蛇也想腾云驾雾，要出穴斗斗强龙。当镖车将进入他所控制地盘时，率领手下强徒，列“一”字阵挡住去路。镖师下马与之见礼，地头蛇狂妄地宣称：“别害怕，看见没有，我旗上所书是‘保境安民，联村自卫’。我们一不劫、二不抢、三不收过路钱，只因乡土狭窄，镖车不便通行，要想借路，那就把镖旗拔下来，拖在车后，拉着过去。”镖师不卑不亢地答道：“小字号走镖为生，镖车多次途径贵宝地，想来有骚扰地方，失礼得罪之处，在下赔礼了。”说罢一抱拳。地头蛇把脑袋一晃，扬言道：“车过压路、马过踩草，本应让你们从哪来，回哪去，今天看在你这一揖的份上，也不得不给你点面子，留条道，你要赢得了我手中的家伙，我就闪出条路来礼送镖车过境，要赢不了我手中的家伙，那就对不住了。达官爷是见过世面的人，今天就露两手叫大家长长见识吧！”碰见这种蛮横的人，实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只好让他见识见识。于是镖师又一抱拳道：“朋友既然看得起，在下只好奉陪了，但客不压主，先让您三招。”凡是伏势逞强，依众欺寡之徒，大多武德甚差，往往没有什么真功夫。因为武林名师传徒都是很慎重的，最怕不肖徒儿败坏自己的名声，一但发现徒弟有不轨不肖之处，即弃而不传，打发他走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地头蛇，往往没有出去闯荡过，是井底之蛙，不但没有见过什么天日，更没有受过名师的传教，不知武德、不晓事理，听镖师说让他三招，认为是把他看扁了，于是勃然大怒，愣头愣脑地扑上来就连进三招，常言道：“程咬金三斧——把看家的本事都使出来了。”三招进完了，镖师也就把地头蛇的底摸清了，于是狠狠

地回敬他三招，这三招不但使地头蛇清醒了，而且长了见识，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镖师再进三招后，混小子可真有些搪不住了，可是又找不到台阶下台，真是欲进不得，欲退无路，心里十分懊丧。而这时镖师却突然收住招式，抱拳拱手道："小字号走遍直、鲁、豫、皖，没见过足下这样的真功夫，敢问大名？何师所传？跟您走这几招，胜过练功十年，在下受益非浅。"地头蛇一听这番恭维，头脑又立刻发涨，答曰："我打遍三十六万，今天才算碰上对手，不打不成交，赶快进标，好好叙谈叙谈，喝上两盅。"说罢回过头去喝道："快备宴，接客"。于是化敌为友，镖路上又添了一条门径。

如果镖师也逞强好胜，把地头蛇打翻在地，使其"风光"全无，颜面扫地，那么这伙亡命歹徒说不定会恼羞成怒，仗着人多势众，一拥而上，来个好虎难敌群狼，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说不完造成一场惨烈的流血事件。无论官了还是私了，或是不了，都难以善其后，这条镖路只好不走了。即便是地头蛇被镖师的武功所镇慑，被迫来个光棍不吃眼前亏，礼送镖车过境，从表面上来看是强龙压倒地头蛇，达官爷大获全胜，但实际上却是后患无穷。因为这些逞强歹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但会尾随镖车沿途捣乱，或许还会勾结贼匪，明劫暗袭，镖师们最怕的一招是夜间纵火，当镖车进店之后，歹徒们乘着夜色，用火箭攻击镖车。所谓火箭就是用弓射出的箭上安装有发火装置，箭射到哪里，就在哪里起火。一旦遇见火攻，镖师心里就明白了，这回遇见的不是贼人，是仇人。镖车遇贼人是劫而不烧，因为烧毁了镖车也就失去了劫的意义。遇仇人是烧而不劫，因为劫车是个案子，地方官不能不过问，烧车往往是无头官司，地方官可以不受理，来个不了了之。

总之，地头蛇地熟为灵，一旦结仇为害，程度实胜于贼匪；一旦结友，等于给镖路上添个兵站。因为贼匪们一般是不敢骚扰地方势力控制下的村、屯、镇、集，也怕和地头蛇结仇。

镖师外出走镖时，会交上形形色色的朋友，而形形色色的朋友也会找上门来，以武会友。京中有些名气的镖局，免不了有人找上门来，声称：自己是武林之士，粗通器械，略知拳脚，今日登门前来请教，以武会友。凡是上门以武会友者，不外是三种人士，一是潦倒的习武者前来混吃混喝，实是请求救济。二是有真功夫的武林高手，前来亮亮相，想在镖局从业。三是专门前捣乱、恶作剧的公子哥，老北京称之为秧子(意为小苗，小雏)。对此三类人镖局的接待原则都是以礼相待，坐而论道，即兴表演，决不较量，因为"相骂无好口，相打无好手"，如进行比试，一旦失手使对方受伤，穷朋友就吃上了，公子哥就讹上了，镖师若败给了以武会友的高手，不但自己面上无光彩，镖局也会进退失据，因为留下了不好安排(份太大，是打出来的)，不留下又显得太小家子气，容不得能人。因此对三种来访者，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接待。对武林中的失落朋友，本着人不亲，功夫还亲的原则，总要留他吃顿饭，送些银两和衣物，好生送这位朋友上路。对武林中的高手，则热情留他多住几天，以客礼相待，暗中火速摸清这位高手的来路和师传，一旦确认是正道中的朋友，就直言请他帮忙，以客卿相待，走上几趟镖后，认为"是块材料"，不但武功，而且阅历、胆识、人品均够得上位达官，就由前辈老镖师出面请他留下来一道干了。若道不相合，则婉送之。在帝京之内、御辇之下，敢于胡折腾的公子哥大多是王公之后，或是宗室、觉罗、高官、显宦的衙内，这些人周围往往有一群歹人，挑唆他闹事，以便从中混吃混喝，甚至敲诈勒索。老北京称这些游手歹人们为架秧子，或捧秧子的。秧子们都是不知世事的小雏，一架就晕、一捧就转。歹人们把"秧子"架到镖中来以武会友，镖师们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个你会架秧子，我会哄秧子——连恭维带奉

承，使"秧子"把进店时的初衷早忘得一干二净，有的"秧子"高兴糊涂了，竟在附近酒楼上摆上几桌，宴请镖局诸达官，庆贺以武结友，而镖局也说不定因祸得福，又添个"大门坎"。

由镖师交友之道看来，达官们不但是武林中的练家，也是颇有阅历和经验的社会活动家，善于折冲衔樽的外交家，能巧合秦楚的纵横家。不但武功十全，而且有公关先生的气质和风度，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故又可谓是久经战阵的谈判家，能通过谈判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镖行行规

镖师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在外走镖，以逆旅为家。若赶上走水路镖，泛舟而行，得免鞍马车骑之劳，实为美差，因为水路较陆路安全舒适得多。水镖大多沿运河而行，途经地区多属富饶之地，故铤而走险者相对减少，运河沿线税务司、厘金局林立，水关、船闸甚多，这些地方都有官兵驻防，少有贼人出没。在运河行船，船家要经官方注册，行船要有河泊课的船票路引，船家又是携眷行船，以船为家，故通贼之事罕见，对于镖师来说，船家是可靠伙伴，舟行内河，风波不惊，一日三餐，自有船家安排，但走镖不是旅游，镖师重任在肩，因为运河沿线虽无"明抢"但多"暗劫"，要想一路平安不出岔子，必遵水路"三规"。

"水路三规"可称为镖界的"水法"。第一规是"昼寝夜醒"。白天除值班者外，其余的人都进舱酣睡，直到红日西斜才走出船舱，准备夜晚上岗。因为白天几乎不会发生拦河抢劫之事。夜晚贼人经常前来夜袭，或抢或偷，镖师不得不防备。第二规是"人不离船"。运河沿线多是人烟稠密地区，城、镇、村、集，数里相望，一些繁华地段，茶楼、酒肆比比皆是，不但献艺者、卖唱者出没其间；村会、社戏亦属常见；运河之中"花船"、"江山船"（载妓而行的客船）经常是笙、管、笛、箫，歌舞翩翩，但镖师们决不会登岸围观或移船相看，因为"走神"即意味着"失镖"。镖师们不但不会离船去看热闹，也不会离船去追贼，怕中贼人调虎离山之计。岸上出事，镖师们绝对置之不理，甚至恶棍们欺男戏女，也不与过问，怕是"套子"，因为贼人常常利用镖师们扶危济弱的武德，"调虎离船"。第三规是"避讳妇人"，船家以船为家，妻女同舟，船家女在封建社会中是最"开放"的女性，而镖师们大多是阳刚豪爽的汉子，如按照旧小说中英雄美女、才子佳人的逻辑，那将是"一路行舟一路情，郎情如意妾情浓"了。其实不然，镖师素重武德，船家女亦守闺道，皆知自尊自重，恪守封建道德规范。镖师登船后均不入后舱，一帘之隔如内外宅之分，如雇主携有"宝眷"，镖师更是退三舍以避之。至于沿途青楼女子、花船歌妓，镖师绝对不屑一顾，怕"色眩"误事，也怕贼人"放白鸽"。因为这样才能使船家和雇主放心，如果镖师登船吓跑了盗贼，但又造成色狼入舱，那岂不是一得一失，得失之间，船家和雇主可真是"细权量了"。

走陆路镖，护送镖车，是镖局的主要业务。南道上不论东路还是西路，都处于华北平原，是地平人稠之区，镖车顺着大道，一天可行进八十多华里，一路之上镖师们大多骑马护卫着镖车。镖师骑马不是为了摆威风，而是在贼人一旦出现时，能迅速灵活地做出反应，同时也避免旅途的疲劳。因为进入大车店后，镖师的任务并不是休息，镖车总是找个较大的村镇投宿过夜，这种村镇的地方势力一般都比较强，有民团、乡丁一类的自卫组织，在夜间执更巡逻，贼匪在作案时会有所顾忌，比较安全。尽管如此，镖师在住店时还有

"三不住"之原则,一是不住新开设之店,因为镖师一般都走固定的镖路,对沿途客店均很熟悉,并和店家结成好友,对新开设之店由于不知根底,总是驱车直过,绝不留宿,怕遇见《水浒传》中张青、朱贵式的店,闹个人财两空。二是不住易主之店,老店突然易主,必有原因,在未弄清之前,镖车对其总是敬而远之,怕老店易主后成为贼店,所以镖车未进村镇之前,镖师总是策马先行,打探一番。三是不住娼店,所谓娼店就是旅馆、妓院的功能合二为一,这种客店门前总站着几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卖弄风姿,招揽客人,娼店的客人正经人少,歹人多,难免明者为娼,暗者为盗。

住进店后,镖师们并不忙着休息,而是要按照"进店三要"的准则,首先在店内巡视一遍,看看有无"异相",怕被贼"瞟上"。二是在店外巡视一遍,看看有无"异风",是否有人"贴着"。三是进厨房巡视一遍,看看有无"异味"。所谓"异相"就是店中有可疑的人;"异风"就是店外有可疑的迹象;"异味"就是厨下恐有手脚。如有"异相"、"异风",当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如恐有"异味",则宣称已经"打过尖了(即吃过饭了)",等到晚上关上房门,再吃些随身携带的干粮充饥。

吃过晚饭后,除值更者外,镖师们都上炕就寝,北方人睡觉的习惯都是头枕炕沿,图个暖和,免得窗外寒风吹着头部。可是镖师睡觉一年四季都是头枕窗户,脚蹬炕沿,因为这样一来便于视听窗外动静;二来一但有情况不用翻身下炕,只要一蹿,即可着地。一般人上炕时总是鞋的后跟向外,下炕时再倒过鞋来穿上,但镖师总是脱鞋上炕时就把鞋倒过来,让鞋跟向着炕,一旦出事,跳下炕来,也就穿上了鞋。镖师的这些习惯都是在血的教训中养成的,因为一旦发生夜袭,刹那之间,生死已定。

入睡时,镖师还要执行"三不离"的"睡法",所谓"三不离"首先是武器不离身,此条法规不言自明,一旦手无寸铁,镖师比常人也高明不了多少,银幕上的武打尽是拳术,八卦掌、鸳鸯腿之类的套路使观众眼花缭乱,其实真正拼杀起来是你死我活的搏斗,有谁会靠拳头取胜呢?所以兵器是决不可离身的,特别是"腰间之物(手枪)"不但决不离身,而且决不示人。贼人有规矩,不许向朋友借腰间之物一用或一睹。镖行中的人久和贼人打交道,也知"借枪"和"下枪"的关系,故也以借腰间之物一用、一睹为忌,怕遭人暗算。况且腰间之物不外是盒子(驳壳枪)、橹子(白朗宁)、左轮,一旦"曝光",动起手来对自己不利。二是身不离衣,镖师在旅途中一年四季都是和衣而卧,因为一旦出事,决无穿衣服的时间,北方的冬天也不便赤臂上阵。三是车马不离院,镖车进店后,就有值更的负责看护车马,院外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镖师们均不闻不问,怕中"调虎离车"之计。

镖行中的人有句口头禅,叫"三分保平安"。所谓"三分保平安"就是:带三分笑,让三分理,饮三分酒。镖师的做派不是电影中横眉立目的角色,而是十分谦和,待人接物总是面带三分笑,尊老敬长,礼贤下士,实为谦谦君子,颇有武德风范。如在行车、打尖、住店时与人发生矛盾,镖师总是礼让三分,不以武压人,尽量不和地方上的"恶人"发生冲突,遵行强龙不压地头蛇之道。地方上的"恶人"一般也不找镖师的麻烦,深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没点真本事,敢出来走镖吗?故镖师遇事礼让三分,诸事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镖车上路后,镖师们就不再喝酒,但隆冬时节,为了御寒暖身,年高辈长的镖师有时也喝上两盅,但以三分酒量为限,决不多饮,中午打尖时不喝酒,更不会和不相识的人开怀畅饮,道逢亲朋好友,虽是久别,也是以茶代酒,老镖师饮酒是进店后一切安排妥当了,关起门来独乐自饮,年轻的镖师则滴酒不沾。

走北道的镖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出安定门过昌平州后就进了山,长城蜿蜒于燕山之中,有许多关口,如古北口、冷口、喜峰口、杀

虎口等等，所以一出长城就通称为“口外”了。当时口外人烟稀少，所以不论东路还是西路，食宿都很不方便，镖车在途中一旦出点差错，就会造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局面，只好就地风餐露宿了。所以走北道镖的人在生活上多能自理。跑口外，有“三会一不”之说。三会首先是会搭炉灶。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地，路遇风霜还是雨雪，镖师们都能因地制宜，因天制宜，搭起一个炉灶，埋锅做饭。其二是会修鞋，旅途之中如果鞋发生了问题，很烦人，所以出远门的人多备有新鞋，但“新鞋上脚，别扭三天”之说并非虚语，因此镖师们都会修鞋，以保自己两脚不受委曲。三是会理发，一路之上风尘仆仆，胡子头发乱成一团，过城、镇、村、屯时，免不了要去拜访“地方人士”，如果一副狼狈像，就容易被人看轻了，所以镖师要理过发后再前往，俗语云“理理发、刮刮脸，有点晦气也不显”。理发刮脸后换上一身干净衣服，气宇轩昂地前往会晤地方头面人物，一者不跌份，二者也显显镖行人士的气派。

“三会”之外，还有“一不”。所谓“一不”就是不洗脸，因为口外冬季寒风凛冽，春秋风沙扑面，夏季草滩上骄阳似火，烈日灼人，当时的肥皂是洋物，镖师尚与之无缘，用土造碱面洗脸后经风一吹，容易造成皮肤干裂，所以镖师进旅店后只用毛巾擦一把。在北道走镖的过程中，“洗脸”和“到家”是同意语，年轻的镖师们欣然曰“明天该洗脸了”，也就是明天该到家了，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

走镖有时护送的不是财货，而是旅客，能雇镖师护驾的旅客当然不是平民百姓，这些旅客大多是上下任的官员，或是迁居及回籍探亲的富商大贾。不是有权，就是有钱，或是二者皆备于一身，因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雇镖师护驾者都是携眷、携财的阔主，是贼人算计的对象，不但目标大，而且行动不便，故保客镖比保货镖要难，不但不能“丢镖”，而且要给大人、小姐、老爷、太太们以诸方面的安全感。

保客镖有三忌之说，首先是忌问行囊内为何物，只问一但发生意外时，哪件行李为必保之物。因为“财聚于身、德失于心”，旧社会发财的人，发的都是不义之财，最怕“露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曝光”，为商者怕“曝光”后树大招风，为官者怕“曝光”后御史闻风参奏。二是忌同雇主“宝眷”接触，高官富贾大多是三妻四妾之辈，平日家居，金屋藏娇，最怕“戴绿帽子”，甚者男仆不许进二门，但旅途之中饥餐渴饮，晓行夜宿均无法回避镖师，所以心中总有些异样感，故镖师只和男主人一人打交道，这样一者可使大人、老爷们放心；二者也避免太太、小姐们提出些不好解决的问题，造成不愉快。三是忌中途“讨赏”，因为中途讨赏往往被视为敲诈勒索，即使是因意外之事开口借钱也会认为企图“讹一笔”，一般说来平安到达终点后，雇主总会酬劳镖师一宴，并给些赏银，这就是镖师的“外快”。如果反三忌之道而行之，往往会带来一些不愉快，影响本镖局以后的生意。况且雇主都是有钱有势之辈，即便是下任的官，凭三寸官贴，仍然可以给镖师些颜色看看。所以三忌之道，实为走客镖的“路规”。

镖师的旅途生活之中规章、制度如此之多，现在的年青人或许难以置信。其实众多的“法规”，均无成文条例，尽管大型镖局的分号遍布半个中国，从业人员不下千人，但均不设检查和考核机构。因为镖局的规章制度不是什么人定的，而是在多年实践中形成的，既代表了镖局的利益，也代表了镖师的利益，可以说是十几代镖师用血的教训写成的经验总结，在自然形成的过程中得到了自觉的贯彻执行，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同时在执行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得到了完善，逐渐达到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标准。维护这种规范的思想基础是镖师的武德之道；执行这种制度的外在力量是群体的凝聚力；持之以恒的原因是这些规范和制度已与镖师融为一体。

镖行的武功

俗话说,“没有金钢钻,别揽磁器活”,没有点真功夫,也别想吃镖行这碗饭。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身怀绝技,就出去走镖,那等于去送死,所以镖师都是实打实的练家,有一身硬功夫。打场卖艺的人中有“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当兵吃粮的职业军人可以当“营混子——开仗就溜”,福气大、造化大的还可能当个“太平军人——没打过仗”。镖师可就不同了,路不拾遗的太平世界没有请镖师护驾;如“见贼就溜”,那将是“照价赔偿”;如“光说不练”,碰上贼人是只“练”不说的“朋友”,那将是无开口的时间和余地。所以要想当一名镖师要比习武卖艺、当兵吃粮困难得多,非精通水战、车战、马战、步战、夜行五大门类的功夫不可。

在运河尚且畅通的时候,南道镖路大多是沿运河而行,由京东通县的张家湾登船,放棹南下,可直达临清、永济、淮安、扬州、镇江、南京以及苏州、杭州、湖州、绍兴等地,故走水路镖,是镖局的大宗业务。走水路镖的镖师非习水(会游泳)会使舟船不可。行船使帆、过闸升船,这虽然均是船家的事,但镖师不能不晓,否则上了贼船还蒙在鼓里,非吃“馄饨”不行(捆上手脚,装入麻袋中,投入水里)。镖师一旦和水贼交上了手,交战地点不外是船舱之内和两船之间。地域异常狭小,长兵器绝对要不开,所以双方都是使短兵器或超短兵器,尤其是在舱内交上了手,那更没有回旋余地,往往斗不了几招,生死已定,所使的套路又只能是直刺,故“闪功”特别重要,不管什么兵器刺来,都能让利刃在离身寸间之距闪过。如在舱顶上或两船之间交了手,“轻功”和“梅花桩”功夫绝不可少,因为船顶都是蓆木结构组成,若没有“轻功”双足会陷入舱中,而且可供立足之点不多,不打过梅花桩,非失足落水不可,镖师们虽习水,但水性和水贼相比,往往是逊色三分,一旦落水就要吃亏。

自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车战就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秦汉之间已声销迹灭。可是镖师们非习车战不可,因为运河中断之后,南道商旅、货运,都集中到东西两条陆路上来了,南道陆路均处于平原之地,无需使用骡驮,一马平川之地正好走大车。所谓大车就是由骡、马拉的平板木车,这种车辆在我国北方农村至今仍在“服现役”,只不过是换上了橡胶汽轮胎,装上了滚珠、轴承。镖师们走镖时,如车上所装的是珍贵的货物,在行进途中不但有人骑马在车旁护卫,还有人坐在车上“压车”。“压车”者的任务是人不离车,人在车在,故一旦与贼相遇,要进行车战。车战时车把式的任务只是策马狂奔。车行有行规,不参与雇主和贼匪之间的械斗,严守中立。如车被迫停了下来,车把式则仍然手持鞭子以表明自己的身份,在一旁静观双方的战斗,贼匪们也以不伤害车把式为贼匪之道。战斗结束后,车把式有处理双方善后工作的义务

(当然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车把式策马狂奔时,镖车异常颠簸,镖师要有“站功”,能在颠簸的车上保持自己的平衡,不但不被颠下来,还要与贼人进行战斗,镖师进行车战时的武器是丈八长矛和单刀,一手持矛,一手握刀,矛的任务是保护骡马不被贼人所伤,以便迅速奔逸,夺路而走。单刀的任务是不叫贼人爬上车来,保证自身安全。对贼人的战术是远者枪挑,近者刀砍、脚踢,所以十八路转盘刀、三十六路绝命枪是车战必用之术。鸳鸯腿也是不可缺少之功。

北道镖路地处塞外,沿途都是荒滩、草原,是无路政可言之地,大车行走不便。所以跑口外买卖的商队大多使用骆驼运输货物,镖师则骑马跟随护卫。口外有句俗语“好汉要配千里马,千里马配千里人”。所以跑北道的镖师都要亲自“压”出一二匹好马来,未经调训出的马称为“颠马”,这种马奔跑时前蹄双双并抬,向前蹦着跑,人若骑在这种马上非颠个翻肠倒肚不可。所谓的调训就是“压马”,在马鞍前坠上两袋沙土,使马无法蹦着跑,只好双蹄分开走着跑,训成习惯走着跑的马,称之为走马,人骑着很是平稳。把马压出来后,还要把马弄出点“毛病”来,目的是使马除了主人之外,别人休想骑,“飞蹬”、“飞鞍”就是镖师们常用的养马“毛病”之计。“飞蹬”是一足刚踏上马蹬,还未及翻身入鞍,马即飞奔起来,在飞跑的过程中,骑者翻身入鞍,另一足入蹬。“飞鞍”就是骑马的人刚一贴近马腰,准备踩蹬,马即飞奔而去,骑士要从马的臀部蹿上马鞍,马飞跑,人飞起入鞍,故称之为“飞鞍”。试想,有这些“毛病”的马,如果骑者不是主人,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镖师们把马训出“毛病”来,故然是为了叫马只能为我所骑,同时也有以骑技显胜、示威之意,因为贼人在动手劫镖时,总先派探子尾随观察一段路程,摸摸虚实,而镖师的骑术,对贼人是有威慑作用的。

大草原上一望无际,商队和贼匪均处于明处,商队无法隐藏,贼匪也无法进行袭击。故一旦相遇,贼匪往往采取两翼包抄,围而后劫的战术。镖师们则环阵以待,因为商队行动迟缓,不可能在大草原上突围逸去。当贼匪们进入弓箭的射程时,一场马上战斗就展开了。唐诗有云:“挽弓当挽强,射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走北道的镖师,大多是神箭手,有百步穿杨,辕门射戟的真功夫,弯弓搭箭,专射贼人的马鼻子,因为鼻子是马最敏感、最娇嫩的部位,一旦中箭就狂逸不止,什么样的骑手也休想驾驭,非翻身落马不可。如脚不能及时离蹬,说不定会落个拖死狗的下场。如贼人被镖师箭法慑服,也许会知难而退。但贼匪所最忌的是“走空”,所谓“走空”就是什么也没抢着,一旦“走空”就要用血来洗洗晦气,商队和镖师都知道这一点,当贼人被弓箭所阻,暂停进攻,重新调整队形时,就把无用的老病骆驼赶出环阵,有意让贼人抢去,于是贼人有了台阶,赶着“胜利品”呼啸而去。若这股贼匪都是此亡命之徒,舍命不舍财,或是因自己的好兄弟被射死,非以血还血不可,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就不可避免了。所以镖师们都会拼马刀,讲究马上十八路转盘刀的功夫。但镖师是不希望和贼人拼马刀的,故“射人先射马”,避免造成以血还血的局面。

南道的镖路有时也会发生马战。但南道的贼人一般不骑马,因为骑马目标太大,易暴露自己的身份,所谓马战,其实是马(镖师)步(贼)相搏。镖师和贼在大道上相遇,若双方首领总也说不拢,交不上朋友,只要一翻脸,在车旁进行护卫的镖师就催马向前,用手中长矛挑开贼人所设的路障,引导着镖车夺路而奔,并用“苍龙出水卷两堤”的招路,闪电般地挥动着长矛,使胆小的贼人根本无法拦劫镖车,其他镖师则纵马在镖车两侧来回奔驰,一方面配合“压车”的镖师车战,一方面威慑着路旁侍机蹿出的小贼,使其望而生畏,怕被马趟了,如胆大的小贼跳出拦截或袭击,远者

枪挑,近者刀砍。

由于南路上人烟稠密,村镇林立,贼人一般不敢打持久战和追击战,怕惊动了官兵,或追近村镇后引起地方势力的干涉。当镖车冲出危险地段后,在车队后面断后的镖师总和企图追赶的贼人打个招呼说:"朋友,别再伤面子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还是交个朋友吧。"这时为首的贼人也就会乘机下台阶道:"告诉你们当家的,这个朋友咱们是交上了,在这条道上,遇事尽管提我的名字。"这时镖师也下马和贼人相见握手言欢,说道:"咱们是不打不成交。"

在镖路上有时也发生步战。步战发生的地点大多在镖车的夜宿之地,镖师对镖路上的夜宿点都很熟悉,住宿时总是尽量找城、镇、村、集之处,因为"贼人胆虚",一般不敢在人口密集之地下手。但也有要钱不要命的亡命贼,在镖车住店之后进行夜袭。凡是夜袭,都是贼人早就瞟上了,但路途上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只好冒风险,豁着干了。所以一旦发生夜袭,镖师与贼匪无言和的可能性,双方只要一交上手,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谁都不会手软。交战地点大多在客店院内进行,因为镖师有人不离车的"路规",绝不会出门迎敌接战,打胜了也不会进行追击,由于交战之地在院内,甚至室内,所以步战也是以短兵器为主,是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如果这场夜袭发生在十九世纪末期以后,那将是一场枪战,镖师身上的手枪是备而不用的威慑性武器,但威慑作用只能发生在"冷战"之时,一但展开"热战",当然要使用热兵器(手枪)。混战之中往往从房下打到房上,从房上跳到房下,所以镖师在步战之时要用蹿房越脊的"轻功"。由于步战大多在夜间进行,镖师还要掌握一些"夜行术",方能从容应付。

如果说走镖时发生的步战多在夜间进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那么镖师"坐店"时发生的步战,则是一场打人不兴带外伤的特殊拳斗。老北京的一些商店,为了防止"恶人"到店中敲诈勒索,扰乱正常营业秩序,往往出资到镖局聘请镖师到店中"坐店"以示威慑。常言道:"动铁为凶",所以"恶人"进店闹事时一般是手无寸铁,因此,镖师"坐店"时也是寸兵不携。一旦和"恶人"发生了冲突,讲究干净利落,三招两式,就将其打翻在地,而且还能叫他爬起来,自己走着回去。如果镖师和"恶人"大战三百回合,才将其制服,那必然是观者如墙,妨碍店家正常营业。要是出拳过重,把"恶人"打个筋断骨折,按照老北京不成文的习惯条例,店家要负责医治,如恶人致残,店家要养其终身,所以镖师和"恶人"交锋,特别要注意手下留"情",有的"恶人"系一介无赖,被打倒了就装成筋断骨折,躺在地下不起来。可是镖师心里有数,因为习武练功者,大多有些骨科知识,一看即知真假,碰上要赖皮狗者,镖师就搔他痒处,使其要赖不成,在围观者哄笑声中,狼狈离去。

镖师的夜行功夫,主要用于为"宅门"看家护院,和为商号"坐夜"。北京城是"天子腹里,辇下重地",正常情况下,"宅门"和商号均不会发生"明火"事件。所谓"明火"就是"长灯"之后,贼人进宅入店明劫、明抢,因为一旦发生"明火",那将是一件大案子,要轰动五城十六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衙门、五城兵马司指挥,均会"严行缉访"。光绪年间,因为皇城之中发生了白日抢劫案,"都老爷"(御史)们一本竟参倒了步军统领。所谓皇城就是天安门、地安门之间的地区,清末时已是三教九流杂居之地。对于偷,清廷一向不大关注,可以说是只重视匪情,不重视盗案,故"宅门"和商号雇聘镖师的目的是防偷盗和防仇家纵火。

所谓"坐夜"就是镖师吃过晚饭后到商店去值夜班,凡能雇得起镖师的商号,都是中型以上的企业。东家和掌柜的都不会携眷店居,而是另有私宅,所以"上板(即停止营业)"后,店中只剩下徒弟、伙计等人。由于东家、

掌柜的均另有私宅，所以他们的细软不会存放店中，店里值钱的东西不外是前柜后柜的货物和账房先生的小金库。“上板”后一般也不会发生歹徒前来骚扰的事件，若破门而入，就是非偷即抢了。下更前店方还要给镖师准备夜宵，街上的更鼓一响，徒弟、伙计们也就开始入睡，镖师正式上岗了。因为商号的院子不会太大，而需要保护的对象又都集中在前柜和后柜，所以镖师一般都是坐在屋里听外面的动静，故称为“坐夜”。如有贼进店行窃，镖师一般不惊动他，而是任凭窃贼溜门撬锁形成明显偷盗现场后，镖师再大呼捉贼，窃贼如有此功夫，当然蹿房跃墙而逃；如系笨贼，也就难免被擒。镖师这一嗓子捉贼，行话叫“送客”，实际上是给贼人打个招呼“快逃”，如窃贼蹿墙而逸，镖师也跳上房去故作追找，这时伙计、徒弟们一拥而出，镖师也就跳下房来，大家一齐检查做案现场。贼虽然没有捕获，但东西没有丢失，镖师总算有一功，如窃贼刚一进店，镖师就大喊捉贼，窃贼逸去，店方没准要说镖师是“瞎咋呼”，闹个劳而无功。

和坐店相比，镖师的护院业务就复杂得多了。能够雇用镖师护院的“宅门”可以分为三档，一是王公府第，以王公之尊，是不会到镖局雇聘镖师进府护院的，王府中的镖师都是有渊源的，身价高的有客卿之尊，一般者处于半客半仆的地位。但真正的武林高手大多是侠义之士，不愿进王公府第。因为府中规矩太多，繁琐的礼节，有辱五尺之躯的尊严，因此王爷的镖师未必有什么真本事。再说一般的窃贼和歹徒，吃了熊心豹胆，也未必敢到王府行窃，护院工作有名无实，所以镖师只不过是王爷及其子弟外出闲逛，寻花问柳时的护驾侍从而已。二档的宅门为高官府邸，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侍郎、满汉大学士以及外省的封疆大吏，一般在北京都置有私人官邸，这些官邸的护院工作，大多由他们退役的旧部担任，但也有委托给镖局负责的。李鸿章京中的寓所，就由会友镖局来护院。三档宅门是富商大贾的私人住宅，这些人有钱无势，寓所虽大，街门不大，一方面是受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怕“露白”、“树大招风，人阔招祸”。不过钱能通神，商贾们虽然多数不招摇，但也不是好惹的主，何况他们大多都捐了个道员之类的虚衔，所以商人们的寓所一般都雇镖局的人来护院，因为商贾们长途贩运，和镖局打交道的时候较多，形成了老主顾的关系。

宅门不论大小，都有一定的规矩和礼节，对于镖师来说，最重要的一条是白天不进二门。大小宅门均有内宅外宅之分，以二门(垂花门)为界，门外为外宅，系男人天地：门内为内宅，是女性的世界。垂花门前备有几件大褂，如外宅短衣帮阶层的仆役，因工作需要进入内宅，得先罩上大褂，以示斯文。镖师向来短衣襟，小打扮，如果变成“长衫党”，那非误事不可。好在镖师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才上岗，下更之后，太太小姐们闭户入睡，镖师和“打更的”才进入内宅执行自己的任务，更夫的职责是报时、报点，由一更到五更得按时敲响梆子，并注意防火。镖师的职责是缉拿夜间入宅者，因为夜入民宅非偷即抢，何况官邸乎？镖师和更夫进入二门后，走路的规矩是只许走院子中间，不许靠近门户，以防窥视“宝眷”。

镖师护院时穿的工作服称为“夜行服”，因为护院工作是在夜间进行，“夜行服”是保护色，故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穿一身黑，云月朦胧时穿一身深灰，一弯半月时穿一身浅灰，皓月朗照时穿一身月白，雪夜则穿一身白，目的是减少反差，和周围景色和谐起来，融为一体。在这点上，镖师的工作服和飞贼的工作服是完全一致的。胆敢进宅门做案的飞贼，绝非寻常之辈，故镖师不可等闲视之，所以护院和“坐夜”不同，要携带武器，一般的情况下是带一口单刀和一袋飞蝗石子。十九世纪末，镖师们先后准备上了左轮手枪。由于手枪系威慑性武器，一般的情况下是备而

不用,故镖师们又称之为腰间之物,腰间有物,就是身带手枪,腰杆硬起来了。

镖师进入宅门后,在行规上是对雇主的家政不闻不问,但为了展开工作,不得不注意人际关系,以便确定重点保护对象。所谓重点保护对象,就是钱财细软的持有者,一般说来是老爷主政,太太掌财,但也有时是太太虚有主妇的名份,而是姨太太掌财。旗门(满族贵族)有时是姑奶奶终身不嫁,一生呆在娘家既主政又掌财。俗语说:“没有家贼,引不来外贼。”窃贼入宅门行窃,不能大海捞针,往往先买通内线,为之指明钱财细软的存放处,护院的行规虽然不许打听雇主的钱财状况以及存放之处,但镖师不能心中无数。镖师最关心的是雇主有无仇家,以及如何结的仇。一般说来王公高官的仇人大多是政敌;富商大贾的仇人往往是生意上的竞争者。雇主来头大,他的仇人的来头也不会小,镖师要特别小心,别成了他们之间矛盾的牺牲品。故镖师护院,驱贼为上策;击毙为中策;生擒活口为下策。一旦生擒活口,说不定给自己和雇主都带来麻烦。对于雇主的仇家,镖师不但不能明问,就是暗中了解到了,也要装作全然不知。忌知仇家,甚于忌知钱财。

常言道:“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入宅门做案,不论是行窃,还是纵火、杀人,大多发生在雨夜、风夜以及节日之夜,故每逢这些“日子口”镖师都特别小心,风夜、雨夜,镖师的行动和视听都受到了限制,给入户做案的窃贼造成大好时机,所以雨夜镖师不会穿上当时流行的黄色油布雨衣,因为雨打在这种雨衣上有一种特殊的声响,等于给飞贼送信。当然,飞贼也不会穿着雨衣做案,那等于给镖师送信,所以雨夜之中,镖师和飞贼是一对难兄难弟。风雪之夜镖师也不会披上斗篷,或穿上长大衣,因为一旦长衫裹身,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无法蹿房逾脊。节日之夜宅门上下往往是红灯绿酒,歌舞翩翩,或是“竹城大战”,夜半方散。众人各入梦乡,窃贼此时入户,真是如入无人之境,故镖师于节日之夜绝对滴酒不饮。

入院的飞贼一旦被镖师发现,当然是夺路而逃,镖师则大呼捉贼,上房追赶,双方有时也会对上几招,但多是虚晃,为的是给打更的看的,贼人逃逸后,镖师决不真追,一者是镖师忌擒生口;二者是怕飞贼走投无路,只有死中求生,对镖师下毒手。而飞贼有时也故意留下点“遗物”,给镖师去当报功的凭证,避免镖师追赶。飞贼留下“遗物”时往往喊声“接着”;镖师则回一声“着打”,并飞出两颗飞蝗石子,打得房瓦振响,一场夜战也就告结束了。

清末北京习武者之间有一种说法:当个“达官(达官系镖师的尊称)”比考个武进士还难,因为武进士的考试课目“文场”为策论兵经,只要熟读了几部指定的兵书也就可以应付了。“武场”考“移石”(举重)“较弓”(箭术)“马技”和“器械”(自选一种兵器进行表演)四种而已!一旦喜登龙门即可简拔内廷侍卫和出任军官。清代兵种只分马、步、水三种,通晓一种即可独挡一面。善扑营、健锐营、火器营等特种部队也均是以一技而鸣长。可是镖师非精通水战、车战、马战、步战、夜行五技不能成为合格的镖师,否则被同行称为“半路货”。“达官”之中目不识丁者不乏其人,但要把镖师所应具有的经验、阅历、知识总结起来,汇编成书,恐怕比武进士们腹中的兵经也少不了多少。正因如此,武进士先于镖师退出历史舞台。

镖行的武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百工之人尚且知道“器”和“事”之间的关系，何况生死存亡，依靠手中兵器的镖师乎。人们常说十八般兵器，其实我国古代的兵器何止十八般。有的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战中被淘汰，只留下了习武、健身、装饰、仪仗的功效。旧武侠小说之中，英雄豪杰、传奇侠士，大多是剑术高超之士，古代龙泉、太阿、莫干等名剑，更被描写得神乎其神，有“削铁如泥”、“吹风断发”、“杀人不沾血”等功效，实际上我国古代冶锻技术虽然先进，但也达不到上述水平。春秋战国时代的剑，大多是短剑，因为当时的金属中磷、碳含量均较高，脆而易折。秦汉以后，剑已在实战中被刀取代，渐渐成了军官们随身的装饰品，习武者的健身器械，书房宅院中的镇邪之物。后来陆续出现的金瓜、钺斧、画杆方天戟等，也大多是仪仗部队的兵械，实战价值不高。镖师所钟爱的兵器是长枪和单刀。长枪称为百兵之王，最适于车战，马战；单刀是防身佳器，近战、夜战实不可少。试想镖师走镖时所携带的长兵器不是长枪，而是“金钻开山钺斧”，短兵器不是单刀，而是“紫金八棱锤”，不但行旅不胜其劳，一旦和贼人交战，恐怕要不了几下就会汗流浃背，被手中兵器所拖垮。走水路时镖师所携带的兵器更要短小，除单刀之外，还要带上舱战、水战时使用的分水搅、雁月刺、峨嵋刺、梅花状元笔之类的兵器，至于随身的“暗器”，镖师们常用的是紧背花装弩，一旦和贼人说翻了，紧背低头，冷不丁地给他一家伙，同时也少不了装上一袋飞蝗石子。至于飞镖，轻了杀伤力小，重了也就“飞”不起来，以一斤一个为适当，带十个飞镖就是十斤重，所以镖师对这种暗器并不垂青。

在洋枪没有引进之前，镖师们所使用的大多是上述传统的武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黑社会就出现了左轮手枪，开始是在沿海地区，后来逐渐进入内地。贼盗手持洋枪，镖师当然也不会甘当洋枪的靶子，于是争相引进各种新式武器。洋务运动开始后，清军开始用后膛枪炮装备了起来，克虏伯的毛瑟枪(步枪)、左轮手枪开始进入现役。镖局因为给一些洋务派大官僚、大军阀护院，所以能请求他们“代购”一些新式洋枪，一些大方的高官，为了自身的安全，有时也慷慨地赏镖师几支好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深入我国内地，建立了不少银行、洋行，这些银行和洋行有时也请镖局去护院，镖局可以通过洋人获得新式枪支，华俄道盛银行就雇聘会友镖局的镖师来为其护院，并向护院镖师赠送了俄制左轮手枪。俄国为了把长城以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极力拉拢蒙族上层人物，向王公们赠送、出售武器即是其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走北道的镖局，经常往还于内外蒙地区，所以也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一些俄制武器，但俄国武器比较笨重，使用枪弹的口径通用性低，在我国不大受欢迎，镖师们还是喜欢使用德国造的枪支。

习武者大多重传统，但职业的性质又使镖师在对武器的态度上不能当顽固派。端王是清廷顽固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端王府护院的镖师当然不允许使用洋枪，但后膛枪优于前膛枪和弓箭；而“六响炮”（左轮手枪）的功效和威力更是远远胜过形形色色的暗器。这是正在发生着作用的客观现实，端王府的镖师们急于更新装备，于是向端王爷建议选用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创办的汉阳兵工厂所生产的武器，没想到这位王爷听罢连连摇头说：“张之洞虽是两榜进士，正途出身，但空读了圣贤之书，身为天朝的封疆大吏，却购洋人的机器，聘洋匠，耗中国之财力习舶来之淫巧，他造的枪，使不得！使不得！”最后这位王爷在众人劝说之下，选定了高记铁铺的产品，该店用土造方法生产“金眼毛瑟”（土造后膛步枪）和“六响炮”。产品上均锻有“高记”二字。但端王爷还不放心，亲临高记铁铺视查，确信该店确无洋机器、洋匠之后才定购了二十支“金眼毛瑟”和十把“六响炮”。高记铁铺的产品，枪管均无膛线，发火后子弹乱飞，打不了几枪，枪管即灼热膨胀，不能再打，而且做工粗糙低劣，可是王爷验枪后却十分满意，在他的心目中，只要不“哑火”，就是好枪，而且还拨下一批巨款，叫高家为他生产“快炮”。据高氏后人在六十年代回忆，这笔银子到底有多少也说不清了，只记得有一炕之多，后来“快炮”生产出来了，但“快炮”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武器，现在已无从考查。既然名之为“炮”，想必不会是镖师所用。由于端王爷的捧场，高记铁铺的声名大振。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河北兴起之后，南道东西两条镖路都被团民所控制。义和团的旗号是扶清灭洋，视一切带有洋字者均为异端，洋人、洋教、洋鬼子，故然当代天诛灭；一切带有洋字的物品也应代天摧毁。甚至和洋兵开仗时，缴获洋枪、洋炮也毁而不用。走南路镖的车队和义和团相遇时，团民们照例要检查镖车上有无洋货，镖师身上有无洋枪，镖车之上如有洋货一律没收，镖师身上如有“六响炮”，例行收缴，并哂笑镖师无真功夫，有的镖师携带的六响炮是高记铁铺的产品，经解释后竟免于被收缴，于是高记左轮手枪一下子成了镖界的抢手货，但却给高家带来了想不到的灾难。一些团民认为高记铁铺既然会造洋枪，则一定是私通洋鬼子的二毛子，留下来一定是祸害，于是将掌柜高文祥杀害，其弟高星桥只好弃店另谋生路，入开滦煤矿后发迹成为天津最大的房产主，劝业场和惠中、国民等饭店均是他的私产。

进入二十世纪后，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九子毛瑟，十响驳壳，在镖界特别走俏，甚至白朗宁手枪也成了镖师们的腰间之物。国内兵工厂生产的老套筒、汉阳造木把左轮等武器，称得上是不起眼的家伙了。但万变不离其宗，君子不忘其本，镖师们虽然身佩洋枪，仍把中国传统武术视为正统功夫、看家本领，故镖行之中神枪手的地位不如神拳手，对洋枪的态度是备而不用，对贼人起到威慑作用而已，因为一旦用上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根本战略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

镖师从官方和洋人手中购买武器，是否就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他们是一丘之貉呢？笔者认为这种结论是欠妥的，因为武器是一种商品，它的销售只受价值规律制约，你买我卖是一种现金交易，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国家把武器卖给清政府；也把武器卖给太平天国。用军火商的话来说就是：“谁的银子都是白的。”在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中，德国报刊作过如下报导：驶入大沽口的英国军舰被击沉的事实，说明了克虏伯的大炮在中国人手中并没有失去它的威力，再过几天，德国士兵就可以领略一下本国杀人武器的滋味了。

镖　　户

如果说镖行是由镖局、镖户和个体镖师所组成,那么三者间的关系有如现代同行业中的大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个体户三者之间的关系。镖局是大中型企业,镖户是小型企业、个体镖师是自由职业者。镖行中的人同吃一锅饭,你吃多了,我就得吃少了,是竞争的关系,但竞争中都不排斥对方,尚能保持良好关系,这是因为各有自己的镖路和护院、坐更、坐店的门径,在别人的传统世袭领地上,外来的人极不易插手,如果不识时务地到别人镖路上去抢生意,那是最不明智之举,因为一来得罪了同行;二来和“朋友”不熟,非出事不可。况且三者之间各有自己的优势,抢别人买卖就是放弃自己的优势,用自己之短,和别人之长竞高低。

要想弄清镖户对镖局的优势,首先要从二者的人员组成关系谈起。镖局的从业达官彼此间大多是师兄、师弟、师伯、师叔、师祖,是习武授业上的师承关系。所有的从业人员的从业目的都是一个——养家糊口。而镖户的组成人员都是同宗、同里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用镖户们自己的话来说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走镖要找一村的。”因为一村的人往往既同宗又同里,彼此之间“砸烂了骨头还连着筋”。

镖局和镖户几乎是同时形成的,但镖户比镖局更具有地域性。镖局趟开镖路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和地方势力搞好关系,而镖户本身就是地方势力,镖户在自己的声势所及的范围内走镖,比镖局有明显的优势。

镖户形成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镖户的前身大多是习武尚勇的强宗大族,强宗大族叫子弟们习武尚勇的目的有二。一是不受外界骚扰,不受外人欺压,在封建社会里,大村欺压小村,大户欺压小户是正常现象,不闹出人命来,官府是不过问的。二是称霸一方,取得联乡共主的地位。《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章节,就是习武的强宗大姓在小说中的反映。

强宗大族大多是军功地主之后。封建王朝在战争结束之后,对各级统兵将领往往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政策,按照他们军功的大小、职位的高低分配给田宅土地,这些人率领家族和部属在赏赐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后,享有一些封建特权,再加上昔日的余威、余势、余部、余众,就形成了称雄百里以至数百里的强宗大族,这些退役的将领及其余部、余众都是久战疆场,精习鞍马,所以子弟大多也是习武尚勇之辈,虽然时过境迁,封建特权已不复存在,但仍不失为雄踞一方的地方势力。

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建立了许多卫、所,卫、所士兵及其家属被称之为军户,他们免赋、免役,不受地方官管辖,是一个特殊阶层。卫、所解体之后士兵们往往就地转化为属于地方官管辖的编户民,将领们也就成为了享有一些封建特权的豪强地主。北京城内有许多拱卫皇帝的京卫,由于京卫是皇帝安危所系的亲军,所以无屯垦任务。后来国家的财

政不景气，养不起这么多只吃闲饭的京卫，于是令驻防城内的京卫开出城来，在京畿近地屯垦就食，这些卫、所由于有拱卫帝京的职责，所以解体得较晚，在北京郊区遗留下来一些以卫所为名的村镇。这些由卫、所军营转化而来的村镇里，居民们当然有习武尚勇之风，又系“祖上都是穿一个号坎的，”所以凝聚力较强，大家都是客籍，故和外村往来较少，往往自成一体，形成一股地方势力，卫、所将领们的后裔，大多成为控制这股势力的强宗大族。

商旅们为了平安地通过地方势力控制下的地区，往往在车队入境前，先行拜谒地方势力中的实权派——强宗大族的头面人物，要求容许通过，进而要求保护，并送上一份礼品恳请笑纳。强宗大族认为这是自己的荣耀，理当慨然应允，派习武子弟或庄户送一程，并在商队的运输工具上插上一面大旗，上书某地、某姓以示“风光”。人世沧桑，当豪门大姓进一步失去封建特权，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时，“豪户”也就转化成了镖户。

总的说来，虽然镖局和镖户几乎是同时形成的，但形成于不同地区，在交通干道上、商旅云集之地往往形成镖局，在地方势力强大的地区往往形成镖户。

镖局和镖户形成的历史过程不同，形成的地区也不同，所以经营的方式也不同，尽管两者走镖时都在运输工具上插上镖旗，押镖的达官们的言谈举止，衣着做派也大抵一样，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一致，不是经营方式的统一。

大镖局往往有遍布半个中国的分号和外柜，趟开的镖路长的可达二三千华里。镖户只走固定的一两条镖路，而且镖路一般说来也不会太长，因为“坐地虎”是不能远离自己的势力范围去发挥威力的。

镖局受理走镖的业务不分一年四季，镖户多少要受些时令上的限制，好在农闲时正是商忙时，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几乎全部是农业人口，所以消费市场在农村，消费高潮是秋收之后和过旧历年之时，两者都是农闲时期，农闲商忙，镖户们正好去走镖。

开办镖局不但要呈官方注册登记，还要有三家以上资产丰厚的大店铺来当“店保”，镖局一旦“丢镖”，要赔偿雇主的经济损失，这是法律上的责任。镖户承揽走镖的业务，既没有官方的营业执照，也没有三家以上的“铺保”，所凭借的是镖户的声望和家庭的名誉。

镖户的镖旗在自己声威所及的地区，比镖局更具有威力，因为镖户属于地方势力，而贼匪们做案也不能离开自己的地盘，两者共存于同一个地区，彼此都很熟悉，若反目相争，必然是两败俱伤的结局。所以贼匪们是不会去劫镖户的镖，因为镖户“丢镖”后“追镖”一定会追到底，而且能轻而易举地查清劫镖的贼匪，不惜以血夺回失镖，确保家族的声望和荣誉。

由于镖户声威所至不会太远，能走的镖路不会太长，所以镖户和镖户往往联合起来，像接力赛跑一样，各跑一段，各自护镖一二百里，到衔接地点后，就换人换旗，这样一段一段的走镖，镖路也能延长到千里之外。

镖户和镖局相比更具有封建性，不能根据外界的变化而调节自己，总是在自己的世袭势力范围上墨守成规，所以镖户比镖局早二十年退出历史舞台。当二十世纪的钟声敲响时，他们还手持传统的十八般武器，顶多加上两支火枪和手冲手，可是他们镖路上的对手，正由贼伙向匪股转化，习武世家的声望，传统的十八般兵器，对匪股已失去了威慑能力。

北京地区最著名的镖户要属贯市李家，相传雍正时的“神弹子”李五就是贯市人。李氏世居贯市，是习武世家，雄视京北二百多年。贯市位于京北昌平州的交通干道上，分为东贯市、西贯市两部分，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市镇。昌平在历史上一直是军事重镇，明朝建都北京后成为皇家陵寝的所在地，所以驻

军众多，遗留下不少军户，民间也颇有习武尚勇的传统。清代统一大漠南北，贯市又成了内地商队前往蒙古草原的必经之地。贯市通往北京的大道可以说是安全地区，从贯市往北就开始进山了，出了长城就不属直隶首管辖，算是口外之地，所以商人大多都愿意在贯市雇镖师，把贯市当做中转和落脚之地。于是贯市的保镖行业应时而兴，声名大振，贯市居民多信仰伊斯兰教，故对西北镖路也是地熟人熟。

贯市李家最出风头的事是走了一趟特殊的镖——护驾。庚子时（1900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没在军队护卫的情况下慌忙逃出北京，这就是所谓的“两宫西狩”。途经贯市时，到李家求援。因为慈禧入宫之前，已幸临贯市后，李家赶忙用黄布围制了两乘骡轿，做工虽然不精细，但还算说得过去。献给慈禧后，老佛爷心花怒放，因为蒙难之中有子民进献黄轿，意味着大清国运尚在，自己仍有太后之尊。于是光绪和慈禧乘坐着李家进献的黄布骡轿，在李家伙计的护送下，直赴太原。故贯市李家享有护驾之荣。辱国丧权的《辛丑条约》签订后，两宫由西安返京，慈禧感念献轿护送之功，明旨褒扬，李家不但受了皇封，而且获得了实俸的恩惠，给慈禧牵骡子的杨某人也受封为引路候，每年新春正朔赶上大车，扯起黄旗，上书“引路候”三字进宫进贡（送些土产）领赏，一路之上招摇过市，观者如堵，于是贯市的声威大振。李家虽有御前镖户之称，可是已无镖户之实。因为进入二十世纪后，京张线由张家口延伸到绥远，后又延伸到包头，顽固不化的慈禧太后，也还知道乘坐火车比乘坐骡轿舒服，故对贯市李家进献黄幔骡轿，仅赏四品顶戴，对监制“太后专列”的比利时工程师沙窦，赏二品顶戴。虽说庚子之后慈禧已经崇洋媚外了，但也说明了在慈禧的心目中，火车的功效确实是胜过骡轿。镖户这时仍然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先于镖局二十年退出了历史舞台。

镖　　局

保镖行业的主体是镖局，首先是由于镖行的从业人员大多数在镖局工作。其次是镖局的规模大、业务范围广，业务项目多。在大型镖局就业的人员可达千余，在总号之下设有许多分号和外柜，业务覆盖范围可达半个中国。镖行的主要业务项目：走镖、护院、坐店、坐夜、保护库丁、汇款等。而镖户和个体镖师就不行了，最多可以承揽其中的二三项，至于汇款业务，非大型镖局不难办理。在邮政和银行未兴办之前，大型的镖局确实担负起了邮局和银行的汇款业务。由于镖局的从业人员多，规模大，所以影响也大，人们和达官们攀谈时，开始总先问"贵宝号是那个局子"，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镖师都是镖局的人。

现代的人一提到"局"，立刻联想到国家机关的公安局、税务局、民政局、教育局等，其实镖局是地地道道的民办企业，镖局所承揽的各项业务都是完全的商业交易。

镖局的企业性首先表现在国家的法律规定上，开办镖局要向地方官领取执照、交纳商税。从内部组成来说镖局有股东、掌柜的、伙计、徒弟，四者按照不同的身份获得工酬和红利，完全是企业性质的组合。在对外开展业务时，以独立的法人地位承担责任和义务，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以赢利为目的，以效益为中心进行商业活动。只不过镖局的经营方式不是以货易货、以钱易货或以货易钱的买卖形式，而是金钱和责任的交易——受人钱财，为人保安。

但镖局这种企业确实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在镖局建立的过程中和股份制度上，即便是在镖局生意兴隆的全盛时代，也不会有哪位富翁出资兴办一个镖局，因为镖局几乎是无本的买卖，用不着多少资金就可开办一个镖局。在后膛火器(洋枪)没有进入镖局之前，镖师的武器都是属于个人私有的，不是柜上发的。马匹也是个人的。但由柜上发饲料喂养。这项制度是仿照清王朝骑兵部队的典章制定的，清军中的马匹都"私马公养"，因为"公马不肥私马肥"，士兵对乘马有所有权，退役时可带走，战马在战斗中如致伤残或死亡，由国家另行补发一匹，但所有权仍属于个人。因为八旗士兵早期都是带着战马来服兵役的，故马匹是个人财产，但在服役过程中由国家发饲料喂养。镖局的门面房和后柜房大多是租的，一个镖局能否办得兴旺发达全靠人的因素。镖局也有股东，每个股东的股份也不一样，但每个股东领股的大小不是由出资多少决定，而是由能耐大小决定，是公议出来的，股份的多少决定分红的数额，但也决定丢镖时出钱赔偿的份额，领股多的多赔，领股少的少赔。至少在镖局的组建初期是这样，后来形势发展了，机构增多了，业务范围和项目也有所变化，情况也有所变化，但基本框架还是不变。人力股不是终身的。更不能传之子孙，一旦告老，或"退居二线"立刻一笔勾销。所谓退居二线是个借用名词，当时叫"领个外柜"，更确切的含义是"办个三

产”，继续发挥余热。

镖局的创建过程，大致有三种形式，各有自己的特色，三种特色汇集到一起，构成了镖局的总体特色。

习武的人受结成练功的小团体，以便切磋技艺，互相提高。小团体往往是师兄弟之间的自由结合，即便不是一师所传，由于地域的限制，也免不了互有师承关系，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嘛，在此基础上组成的镖局，自然是友情为重，所领的股份也比较平均，人际关系也比较平等。

以习武世家为主体所建立起来的镖局，在创建之初以血缘关系的长幼之序维系着成员之间的关系，但它毕竟是镖局，和镖户还是有着严格的区分，镖户是坐地虎，不会离开本地盘，在经营方式上是等客上门的业余户，还是以务农为主体。走镖时临时组合，其成员之间无固定的股份和工资。镖局建立在中心城市里和交通枢纽上，是按照商业布局的分布来选择营业地点的，在经营方式上是招客上门的专业户，其成员之间是固定的股份、工资，股东之间是组合关系；与镖师之间是雇佣关系。创始之初的血缘关系，长幼之序，后来逐渐演化成了成员之间的恭悌之礼。

清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依靠了由汉族地主武装发展起来的湘军、淮军。当太平军北伐进入直隶，京、津告急时，远在长江流域的湘、淮军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朝中一些大臣建议在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模仿湘军、淮军的建军模式，建立新的武装力量。当捻军驰骋中州大地是，直、鲁、豫三省虽未能出现湘军、淮军式的部队，可是地方武装得到了扩编和发展。“同治中兴”以后，清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开始大规模裁军，湘军，淮军大幅度缩编了，直、鲁、豫三省的绿营也恢复了原来的建制。大肆裁军缩编后，被裁的士兵又没有适当的安排，不免又有铤而走险、落草为匪者，所以世人讥之曰：“化兵为匪。”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清军每打了一个胜仗就放抢若干天，放抢的天数多少，看胜利的大小而定。所以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有不少“家当”，营官、哨长有个上千两白银不足为奇，士兵也往往不失一二百两。行武之中重德守，讲道义之士，往往是长官放抢，我也不抢，恪守武德和军规，这些人投军时是两手空空，复员时是“二只胳膊夹一个脑袋——一无所有”。在军旅之中尚知洁身自爱，复员后当然也不肯落草为匪，除了一身武功之外，又别无谋生之技，于是不论原来是长官还是下属，现在以义相聚，凑在一起开个镖局共度余生。以退役军人为主体建立起来的镖局，其成员之间的凝聚力是个“义”字，在战场之上共同出生入死，镖路之中当然也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了。

由三种不同的原始形态组建而成的镖局，在组建的过程中，组建后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一些自己原始形态时的特征——情、礼、义。而情、礼、义三要素汇集在一起，也就构成了镖局的经营方式、分配原则、管理制度、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特征。

镖局均设立在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上，清代几乎尚无工业中心可言，所谓的中心城市是指政治、军事中心，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必然会成为人口集中之地，成为商业和消费的中心。在镖局兴盛时期，铁路尚未开通。所以交通枢纽这个概念与铁路无关，是指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水运及元、明、清三朝修筑起来的，北京通往各省的官道。所谓官道就是地方官负责维护保养的道路。一般说来官道的路面比较平整，沿途的桥梁也坚实安全，渡口、码头管理也比较统一。如果绘制清代的镖局分布图、交通图、物资流通图，三者几乎可以重迭。商人的目光总是盯着由于政治、军事原因而形成的城市消费市场。所以城市消费市场也就成为了商业的中心区。镖局是为商人和官僚这两个阶层服务的，所以，镖局的分布和交通的设置、物流的走向是统一的。

清代的物流主要是粮、棉、绸、茶、盐、糖、

碱、皮货、药材以及日用品等。四川、湖南、湖北三省的稻米,均由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东下,在镇江、扬州一带聚集,然后沿运河北上。江浙一带是丝绸产地,又是棉布的生产区和产茶之地,绸缎、棉布、茶叶三大宗南货沿运河源源北上。蒙古地区的毛皮、革制品,直、鲁、豫三省的原棉,直沽和两淮的海盐又沿运河源源南下。这是清代总的物流趋势。各省的省会和将军、都统的驻节地往往是物资的聚(收购)散(消费)场所和中转地。但聚、散、中转都是相对的,张家口是副都统的驻节地,是北货的聚集地,南货的销散地,但对蒙古地区来说,张家口是个中转市场。

镖局根据物流的走向,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选择自己的大本营和辐射地。北京的大型镖局可以说是得天独厚,雄踞京师可以辐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湖北、陕西九省,北向可达热河、张家口、绥远等将军、都统的驻节地。确有通朔漠、俯中原、连江淮、控秦晋之势。

镖路和官道从地理上来说是重合的。北京各大镖局在镖路的终点大多设有分号,镖路的终点一般是省会或将军、都统的驻节地。分号的任务是招揽生意,避免镖师归途走空,同时也为了以分号为基地辐射周围城市,如北京的总号接受了一批由张家口运来的皮货,专走北道的镖师到京后就算完成了任务,无特殊情况不再向南走,要是临时走趟南路镖也是跟着跑跑龙套,不能当"角"。而皮货的运送终点是山东烟台,于是总号派专走南道东路的镖师把"皮镖"押运到济南的分号,分号再派镖师把"皮镖"押送到烟台。济南的分号在附近城市设有外柜,分号辐射外柜,就像总号辐射分号一样,外柜大多设在府、道二级的行政中心或是商业、交通的枢纽。以山东为例,济南分号大多在烟台、威海、青岛、德州、泰安、兖州和号称小扬州的维县设外柜,外柜也承揽业务,是总号和分号业务上的分支机构(总号也设有自己直属的外柜)。

总号、分号、外柜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归纳起来不外三种:一是派出机构,在经济上统一核算。二是联营伙伴,在经济上各负赢亏。三是类似今日企业和"三产"之间的关系。清代的镖局在三百年前就开创的这种经营方式,到清末之时,已经发展得很完备了。总号向分号辐射,分号向外柜辐射,反过来外柜又向分号辐射,分号向总号辐射,大型镖局就是这样形成了自己的镖路网络。总号的大掌柜,相当于今日联营公司的总经理,总号就是今日联营公司的主体企业,在联营中起着主导作用。

北京是清王朝的政治中心,又是大运河的终点码头,不仅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又是南货北运、北货(口外)南运的中转市场和货驿,不但官僚云集,而且商业发达,于是为官僚阶层和商人阶层服务的镖局比比皆是。镖局全部座落在外城,因为清初实行"迁汉",把内城变成"满城",变成一座大营房供八旗官兵携眷驻防。除了八旗营地外就是六部、九卿和内务府诸院、司的衙门,不准汉人居住。外城是"汉城",不许满人居住,是北京的商业区、居民区、娱乐区。在外城众多的镖局中,会友、永兴、义合、志成、正兴、同兴、义友、光兴最为驰名,号称八大镖局。会友镖局是老北京最大的一家镖局,开设在粮食店街南头路西,全局内外有一千多人,清末民初时掌柜的是孙一廷,前门、珠市口一带几乎无人不知道孙老四,或孙四爷、孙四掌柜的大名。会友镖局的镖路遍布在东三省、口外(张家口、热河)直、鲁、晋、陕以及江浙地区,在天津、南京、上海、西安等地都设有分号,在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设有许多外柜。

镖局在城里的业务主要是护院,顾名思义护院者保护私宅也,但世人为什么称镖师为护院的达官,不称为护院的打手呢?原因是镖师虽为宅门护院,但不替宅门打人,正宗的镖局在鉴定护院合同时有不少条款,如:只防飞贼夜人,不管家贼外盗;强行人宅者,不

过内影壁不管等等，这些条款是为了划清工作界线，不介入宅门内外的人际关系，如老爷、太太要对奴仆实施家规——责打若干大板，此事镖师当然不管，少爷在外和人发生了冲突，镖师从不与过问，总之镖师只负责防匪防盗，不介入宅门内务和外部斗争，有的镖局还和宅门定有"回避宅主"或"客礼相见"的条款，所谓回避宅主，就是宅门的主人地位虽尊贵，但镖师不与他相见，自然也就不用请大安，行大礼了。"客礼相见"就是不请大安、行大礼，见面时拱手做揖，虽无宾客之尊，也要有半个客人的地位，不能如仆人而视之。

老北京还有一些"流外镖局"、"野鸡镖局"，这些镖局都是嘎杂子们中的头面人物开设的，从业人员都是嘎杂子们中的习武尚勇者。嘎界的精英们凑在一起，租上二间铺面房，挂上块镖局的招牌，也就对外称起达官爷来，世人称其为流外镖局，是由于正统的镖局不和他们往来，镖师不把他们视为同仁，镖局的行会也不吸收他们参加，视之为"末九流"。又因为这些镖局专给妓院"打岔"，所以又称之为"野鸡镖局"。妓院的"岔"确实很多，一旦出了岔，就需要有人来"打"。如嫖客要给妓女赎身，在价钱上和老板总也谈不拢，嫖客恃强动武；或妇女被拐卖到妓院后，其父兄带领着族人找上门来要人；或两人嫖客同时来嫖一个妓女，各不相让，打了起来；或嫖客把妓女包下来后，老板乘嫖客不来之机，叫妓女接待了别的客人，包主来时碰上了，发雷霆之怒，大打出手。遇到这种情况，妓院既要有打手来出面打人——把弱者打跑。也要有能挨打的人来"应差"——让强者臭揍一顿来消消气。所以凡是到妓院打岔的，不但会打人，也能挨打，打弱者时讲究不打出外伤来，也不打成筋断骨折，受了内伤后还能"爬着走"。挨打时讲究扛得住，任凭"强者"拳打脚踢，滚爬起来还得叫声"爷息怒，您碰痛了脚没有"，所以能挨打也是个功夫，要会躲、会闪，但又不能真躲、真闪，还要叫"强者"打着、踢着，实在扛不住时，自己碰破鼻子，流一身血，躲在地下装死，"强者"的气也就出了，于是扬长而去。

为了防止"流外镖局"、"野鸡镖局"破坏达官爷的声誉和影响，许多正统镖局的镖师外出时都穿上号坎，带上腰牌，号坎和腰牌上都醒目地标出镖局的字号，以示身份和区分。

大小镖局，包括非正统的"流外镖局"、"野鸡镖局"都得有个后台，后台的势力和影响与镖局的活动范围几乎是相等的，大型镖局的活动范围几乎达到半个中国，投靠的"大门坎"也得是中央大员，所以会友镖局利用给李鸿章护院的关系，请出这位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来当名誉东家。其他的大型镖局也物色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侍郎为自己的后台，并打通镖路沿途各省的三大宪衙门，一旦出事时好有个依托。所谓"打通"，并不是非交结上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不可，因为对于镖局来说，这是很难办到的事，只要能同三大宪的幕友、亲朋说上话，必要时能请得动一纸公文、一封书信、一张贴了(名片)也就行了，往往是备而不用，以免得临时抱佛脚。走口外的镖，跑蒙古买卖，非交结上绥远将军、都统、巡防统领和张家口都统不可，因为口处和蒙古道是多事之区，没有这些地方军政大员相助，是寸步难行的，一旦和这些官员"交上了"，沿途的驻军也就成了镖路上的保安队了。运河畅通时，水路镖是北京各镖局的大宗生意，在运河上走镖虽然安全，但是麻烦，两千多里的大运河上到处都是"司漕的"和"吃漕的"，"司漕的"是漕运总督属下的官方人员；"吃漕的"是类似北京嘎杂子团伙的歹人，要想在运河上走镖首先要条通漕运总督衙门关节，同时也要和沿河的牙主、大舵头们搞好关系，同税务司、厘金司通上气，对沿河的闸务所要按时意思意思。活动范围不出省界的处柜，当然用不着打通中央要员和封疆大吏，但也要和本地区的道、府、县三级行政衙门中的有关人员说得上话，

和巡防营的驻军长官在所交往，对兵头将尾也不可小视之，因为一旦出事时，这些人能帮大忙。有的地区有跨县的地方势力，如河南省的红枪会，但只要和会首“交上了”，小会头们自然是“惟会长马首是瞻了”。

打通的门径、说得上话的要员、“交上了”的官员、搬出来的“大门坎”、混熟了的“有来头”之人，在镖局出面相求时，根据彼此的关系，大小都能给些帮助。所以可以通称为镖局的后台。镖局不是富翁，更不是散财童子，各后台的关系不是银子买出来的，主要是趟出来的，因为在邮政、铁路没有兴办之前，后台也确有不少事要让镖局代劳。

和镖局关系最密切的企业是货栈和大车店。一般的商店都是整买零卖，赚批零差价之利，货栈是整买整卖，取地区差价之利，所以凡是货栈都是千里经商长途贩运，货栈和镖局的业务往来最多，是镖局的主顾。在大运河断航以后，南来北往的物资可以说是全部依靠大车来进行运输，大车业由大车行和大车店组成，大车行备有若干辆大车等待雇用；大车店就是专供车把式投宿的旅店，所以被称之为大车店是由于这些旅店都备有停车场、牲口棚，并负责喂饮骡马。镖局、货栈、大车行、大车店，可以说是相关企业，兴衰与共。有的货栈把运输工作完全委托给镖局，镖局又定点雇用车行的大车，大车上路之后又在固定的大车店投宿，于是无形之中就形成了“货支一条龙”。镖局、大车行、大车店都建立在中心城市、货运枢纽和交通干道上，大车行和大车店本属同业，只不过各有侧重，大车行备有停车场、牲口棚；大车店也备有大车，平时运送饲料，如投宿的大车发生了意外，也可进行替代，二者本无严格的区分。镖局都养有不少骡马，也免不了有几辆大车，常跑北道的镖局往往买下一批物美价廉的好马，自己也办起大车行来，镖局办大车行的主要目的是安置多余人员，因为镖局办得红火之后，镖师们的亲朋免不了前来投奔，这些人未必是达官爷的材料，但拒之门外又有伤和气，所以柜上总有些住闲的人，很不好安排，办个大车行、开个大车店，这些人也就都有活干了。镖局和所开办的车行、车店有的是单立门户，也有的是附在柜上，是本局的一部分。一些告老时不愿意务农的镖师，如老家在镖路上，一般都开个大车行、大车店以度余生，由于退休镖师懂得镖局的业务，所开的车行、车店又是在镖局扶持下创建的，如果所处的地利条件好，往往发展成镖局的外柜。

货栈把运输业务委托给镖局，久而久之镖局对镖路上的货流走向、时间差价、地区差价都了如指掌，有些物资只要能准时由出产地运到消费地或中转市场，是旱涝保收的行市，多少也会赚，于是镖局也就不光瞧着货栈发财，自己也带上一批快货，赚上一笔。最典型的是财货中的茶叶，运到口处就能卖出好价钱。北货中的骡马，只要一进长城，口内和口外就不是一个价，秋肥时贩一批牲口到河南、山东、准能多换回几成银子。镖局做生意的特点是不和货栈竞争，只是看准时机抓上一笔，镖局做买卖是捎、帮、带，很近似现在的企业家经营的原则——“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走。”因为压价竞争、拼死争夺某一市场是愚蠢的事，弄不好两败俱伤，况且镖局也无力、无心和货栈竞争，所以绝发不了大财，但也赔不了本。因此镖局很难发展成货栈，因为镖局的人员构成、人员素质、资金积累上都不具备转化为货栈的条件。有的老北京认为庚子事变中有不少镖师成了义和团的武术教练，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许多有钱的人把细软送到镖局保存，因些镖局改成了八国联军洗劫的目标，从此镖行一蹶不振，许多镖局改成了货栈，并能历数在镖局旧址上建立起来的货栈名称，对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镖局确是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庚了之难”北京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在劫难逃，可是“两宫回銮”之后，北京的商业很快的恢复了起来，但

镖局的确没有“中兴”，其直接原因是几条以北京为中枢的铁路干线先后通车，镖师们无事可干了。在镖局旧址建立起来的货栈，大多已经易东易伙，由于镖局和货栈的建筑格局相近，都是几间门面房，但后院很大，可以存货，存放车马，住房比较多，所以镖局关闭时往往把房屋倒给了货栈。在镖局旧址建成的骡马店、大车行、大车店一般说来到和镖局有直接关系，大刀王五 1900 年遇难，源顺镖局被清政府封闭，大刀王五之子王少斌在母亲王章氏的佐助之下，把镖局改成了骡马店，民国初年还火红过一阵子。由于王少斌中年早逝，所以骡马店也就中衰了。

镖局业务

镖行的主体是镖局，镖局的业务范围比镖户和个体镖师要广泛得多，镖局的业务归纳起来有六项，即走镖、护院、坐店、坐夜（坐更）、汇款和保护库丁。

走镖是镖局的主要业务，走镖要有“镖路”，按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承揽业务的范围”。在北京的任何一家镖局都不会受理西北、西南地区的业务，因为过远地区不但民族杂居，而且地方势力盘根错结，镖师一旦打着镖旗闯入人地两生的地区，不但会失镖，而且会丢命，到头来落个人财两空，所以不管雇主出多大价钱，镖局也决不会承揽这丢人赔本的生意。北京的镖局所能达到的地区大致分布如下：

北道有两条镖路，一条是出居庸关，过八达岭，经宣化到张家口，被称之为西路。一条是出古北口，途经鹰手营子等地到热河（承德），被称之为东路。东道是出山海关到锦州、营口、奉天（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西道是出娘子关途经太原、运城等地到西安。南道有两条，东路是经任丘、河涧、大名等地进入河南省城开封，再取道徐州、蚌埠到南京、上海等地，该路徐州以南地区大体上沿现在的津沪线而南下。西路经保定、正定（石家庄）、邯郸、郑州、信阳，到达武汉，基本上是按照现在的京广线行进。还有一条山东道，途经廊坊、天津、沧州、泊头，进入山东德州府，然后到达济南。

北京地区最重要的交通线是京杭大运河，运河是否畅通事关北京的兴衰，因为北京城中人类众多的各级官员的俸米，和携眷驻防的十几万八旗官兵的口粮，都是沿运河水运而来。为此清代设有漕运总督，总管南粮北调，官阶为正二品，俨然同各省封疆大吏等而同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了京杭大运河，清政府在南京接受了城下之盟，签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京杭大运河再次被切断，清政府改漕运为海运，以确保南粮北调。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轮船公司——招商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实行海运后京杭大运河对清政府来说已失去了重要意义，所以河政随即无官过问，山东境内的运河首先湮阻，只能分段行船了。

在京杭大运河畅通时，北京镖局最大的一桩买卖是走运河的水路镖。水运平稳、方便、安全、舒适，不但南来北往商人利用运河水道交汇南北的物资；大小官员离京上任，进京述职也总是尽量沿运河而行，以免车马之劳。运河中断后，河北省境内的天津、保定、沧州三角地带仍是水网交错，尚可通航，故直到二十世纪初，北京的镖局还有一些走水路镖的买卖。

老北京城里有三多，一是王公勋戚多，二是达官显贵多，三是富商大贾多。这三种人都是“窃天下钱财以供己欲者”。财宝汇聚后，既得之，患失之，怕贼人入府行窃。同时，

为官、为商，大多有不义之行，难免要树敌，不论政界的冤家，还是商界的对头，明枪斗罢未分胜败，就难保不施以暗箭，所以不得不防。故此北京城内的“宅门”多请镖师驻府护院，以保生命财产的安全。

北京城内的王公勋戚、达官显贵、富商大贾，是形形色色的消费市场上的大主顾，因此北京城内的各种商店、饭馆、戏园子、宝局(赌局)、妓院比比皆是，大小老板们怕贼人偷，同时也怕嘎杂子(老北京对歹徒、恶人的统称)前来骚扰，所以也请镖师来坐夜、坐店，确保财产安全和正常营业。

上叙四项镖局的业务，在“镖师的武功”等章节内已经介绍，本章仅将“汇款”和“保护库丁”两项业务的概况略加说明。

早在唐代，我国就出现了类似邮政汇款的“飞钱”。唐代的文武封疆大吏——观察使和节度使，在京城都没有“奏事院”，其职能类似今天的外省市驻京办事处。商人们外出经商携带巨额银两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就将银两交给经商地的“奏事院”，任奏事院的收据到经商地的观察使、节度使衙门领取银两。封疆大吏们所以代办邮政汇款，是由于此事一举两得，一是可从中收手续费，二是可按收据的数额减少向京城运送税款的数额，减轻运输的工作量。北京的一些大型镖局的账房先生，腹中也颇知些诗书，受到了唐代“飞钱”的启发，也承揽起荡款业务来。由于大型镖局的信誉高，分号和外柜遍布半个中国，镖路也是四通八达，所以开展汇款业务很是方便。具体的办法是“逢百抽五”，每汇一百两银子收取五两的手续费，除巨额汇款外，镖局一般不派专人送款，而是走镖时顺手就办了。清末实行新政，成立了邮传部，于是“大清邮政”在十八行省之地，甚至行省之外的边陲地区都建立了起来。镖局的汇款业务也就自然无人问津了。

镖局还有一项特殊的业务——保护库丁。顾名思义，库丁者，一介贱役也，怎能出得起钱请镖师去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即便是有钱，身为贱役，又何用烦镖师去“护驾”，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得从清代的税收制度说起。

康熙末年宣布了一项税收制度的重大改革政策——“盛世兹生丁口永不加赋”。雍正初年在此基础上实行了“摊丁入亩,”并宣布税收“一律征银”，取消了人头税、劳役税和实物税。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不但促进了农民的人身自由，而且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官吏借口征收的碎银不便直接上交国库，要改铸成银锭(圆宝)、银块(方宝)，方能上交，所以征银时要加收改铸时所造成的损耗，并把这种损耗称之为“火耗”，成为征银时的定例。最初是一分或二分，后来层层加码，有的地区竟然增加到四分、五分，增收火耗的土政策是基层地方官借此从中渔利，同时也是朝廷的户部和各省主管财政的藩台衙门向基层加收“库耗”的恶果。白银的性质稳定，很难造成自然的损失，为什么会不库耗呢？其直接原因是藩户和户部银库的库官、库吏、库丁，均有究取银两的高招妙计，库官、库吏的妙计与本文无关，姑且不谈，现将库丁盗银的高招简介如下。

清代的户部银库警戒守卫得十分森严，外贼是休想入内。可是家贼难防，所谓家贼就是库丁。针对库丁偷盗的方式，银库订立了许多奇特的规章制度，库丁进库工作时首先换上库衣方可入库，离库时脱下库衣裸体走出，在执法队的监视下喊着号、拍着手，双脚并起，跳过十二条横放着的扁担，如没有发现“下蛋”(从肛门里、嘴里、耳朵里掉出银子)，即可离库下班，如发生“下蛋”行为，“立即正法”。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些有真功夫的库丁仍可从肛门里、嘴里、耳里、鼻孔里带出数两银子，一年能有几百两，甚至上千两的外快，据说这种真功夫是一种气功，发功这后人体产生磁力，故银两不会掉出。

库丁是一介贱役，社会地位十分低微，可

是一年又有几百两，甚至上千两银子的外快，怎能不叫嘎杂子们红眼？于是嘎杂子们结起伙来，专门对库丁进行敲诈、勒索，甚至绑票。库丁们的银子是豁着命挣来的黑钱，对于嘎杂子们的欺扰不便声张，更不能诉之于官，因为报官会把自己送上断头台。所以惟一的方法是出钱请镖师保护自己的安全。

库丁们的外快来之实为不易，所以他们不会把拿命换来的钱大把大把地送给镖局，而镖局也知道这些人的油水也不大，鉴于这种情况，历史遗留下来了一套镖局保护库丁的传统方法。这套方法不仅是根据库丁的经济条件而制定，也是根据嘎杂子们对库丁敲诈、勒索，甚至绑票时所采用的手段而制定。

库工们早晚上下班的时间甚为严格，因为一旦发生迟到行为就会赶不上穿库衣，进不了库，弄不好就会丢了差事，故嘎杂子们在库丁上班的途中制造意外事故，如手捧着一个打破了的罐子，破瓷是用蜡沾上的，内装些淡茶水，迎面往库丁身上一撞，罐子破了，淡茶水洒了，于是拉住库丁说："你撞碎了我的罐子，我罐子里装的是吉林老参汤，是给我老娘灌下去救命的药。"说罢扭住库丁不放，库丁见势不妙，怕因小失大，只好息事宁人，掏出二两银子来消灾免祸。嘎杂子有时找个"老头子"往库丁身上一撞，就躺在了地下装死，在场的嘎杂子们一拥而上，拉着库丁要去见官，说是出了人命。库丁一看这个阵势，知道"中了局子"，只好破费破费，只要够数的银子一掏出来，嘎杂子们就会架起"老头子"一拥而散，声称带"老头子"去抢救。如碰见"不开面"、"不晓事"的库丁硬不肯掏出银子来；或是银子的数量不够——"打发要饭的还行"。嘎杂子们就会群起而上，将库丁扭架而走，弄到没人的地方藏起来，通知家属来赎票。

所以凡是到镖局要求保护的库丁，镖局都派车接送他上下班。在商店坐夜的镖师，白天除了睡觉之外别无他事，于是利用坐夜前和下夜后的时间接送库丁上下班，镖师赶着一辆骡车，这种骡车档次较低，一般都是小骡所拉，按照事先排列好的路线接四至六个库丁去上班，下班时再送回家去。嘎杂子们法制观念很强，总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闹事"而不犯法的范围内，在阻劫库丁敲诈勒索时，一定是寸铁不带，因为大清的王法是动铁为凶，带上铁制武器，当然也就可以说是有行凶犯罪之意图。鉴于这种情况，镖师接送库丁上下班时也是寸铁不带，顶多揣上一条枣木三节棍，棍头上还包上厚厚的皮子，打在人身上软中带硬——不出外伤。赶车的镖师都是神鞭手，手中的鞭子把短、鞭绳粗、鞭梢长，讲究打掉人头上的帽子不伤头皮，打掉人嘴上叨的洋烟卷，不碰上人的鼻子，飞鞭可以打落麻雀甚至蚊蝇，如遇不识像的嘎杂子敢拦车闹事，则以鞭相向，轻者给脸上、手上留点记号，重者抽个一溜滚。

上下班路途之外的时间，库丁们只得好自为之了，以深居简出为妙，嘎杂子是不会破门而入的，因为强入民宅，非劫既抢。可是库丁们也免不了会出去听个小戏、洗个澡……嘎杂子们就趁这时下手，库丁被绑票后，则通知其家属赎票，家属于力赎票时向镖局报案，镖局受理后则要执行找票、救票的侦破任务，从这项业务来看，镖局也具有西方国家私人侦控所的性质。

镖局受理找票、救票的业务岂不是大海捞针吗？其实不然，镖师们心里有数，北京城的五城十六门均有步军统领衙门的巡捕五营的官兵把守，大活人绝架不出城去，装入箱子、柜子中也休想混出城去，因为崇文门关在十六座城门均派有司税巡检、员役，专门检查出入城门的人有无挟带私货，遇有大箱柜非开箱查验不可。小说、电影中经常出现把活人或禁物装在棺材里运出城去的情景，但在清代的北京城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因为北京城区的户籍、里甲制度甚是严格，满族居民(旗人)的户籍、里甲工作由步军统领衙门和

八旗都统衙门双重管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户籍、里甲工作由顺天府衙门和五城巡城御史双重管理。人死后要报地面上的街坊官吏,查验后方可销籍入殓,凭丧埋条上指定的城门出城安葬。一介小小的嘎杂子,休说把大活人弄出城去,就是把大活人从内城弄到外城,恐怕也没有这个能力。嘎杂子只能在本地盘闹事,所以出事地点和藏票的地点不会相距太远,若是在同、光之间,镖师甚至不担心嘎杂子们把"票(绑架的库丁)"夜间转移,因为当时北京内外城的街头巷尾有不下二千道栅栏,由官方司管夜闭晨启。

镖局受理找票、救票的业务后,首先到出事地点,分析一下失踪库丁所走的线路,了解一下沿线嘎杂子的团伙的活动情况,然后确定几个窝藏库丁的地点,分头去寻找。嘎杂子知道绑票是犯法,决不敢把"票"藏在家里,同时嘎杂子们都是流氓无产者,家居都是平民区的大杂院,也不可能在家里藏个大活人,所以排除库丁被藏在住户中的可能性。能藏"票"的地方只能是离出事地区较近的破庙、废屋(无人敢住的"凶宅")以及其他荒僻之所。嘎杂子们也决不会派人看守着"票",而是把"票"手脚绑上、眼蒙上、嘴堵上、藏起来后一走了之。街头巷尾的栅栏无人管理后,嘎杂子们就有可能在内城或外城的城区范围内将"票"转移,所以镖师们找"票"救"票"的工作也就麻烦了一些。但在外城失踪的库丁大多也就被藏到龙潭湖、陶然亭等幽避之地的草丛中,或是破庙、废屋里。在内城失踪的库丁大多是被窝在北城根一带的废弃旧屋里,因为清末北城根一带人烟稀少,旗地上空屋子甚多。所谓旗地就是废弃了的八旗营地,在当时是三不管地区。镖师们只要下些功夫,是不难把库丁找回来的。如果找不回来,嘎杂子也不会撕票,因为"票"有时会被窝藏地的附近居民,或捡破烂的、甚至捉蛐蛐的小孩发现,并送回家中,被绑架的库丁家属如果真是无力赎"票",镖师也一时找不到"票",可就要出人命了。因为"票"手脚被绑着、嘴堵着、眼蒙着,嘎杂子们决不会派人供应食物和饮水,人生命的耐力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不了几天,嘎杂子们不派人看守"票"的原因是一旦"票"被官方或镖局发现,看票的不免会被缉拿归案就地正法,所以不看为佳,估计"票"快顶不住了时,嘎杂子们就装成过路行人,发现了"票",并把票送回家去,家属当然要表示酬谢,因此绑库丁的"票"纵发不了大财,也可发笔小财,即便是"票"被镖局找到,嘎杂子也不会赔上饭钱。

镖局联军

镖行对外界的一切挑战，都是采取避战的政策，善于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术原则。这并不是镖界人士高人一筹，是镖局的营业目的和镖师的从业原因所决定的。开办镖局的目的是赚钱，使用的手段是保证雇主人财平安。习武者到镖局从业，冒着流血的风险去当一名达官，是为了养家活口，且不说地主老财家中的少爷，就是小康人家的子弟也不会冒着风险去干这行当。镖师对雇主的责任是不丢镖，无擒贼剿匪之义务；将军对朝廷尚知留寇自重的道理，镖师又何苦对贼人非赶尽杀绝呢？留着贼等于给自己留口饭吃，因为贼盗尽灭之日，也就是镖师失业之时，所以镖师和贼人完全可以成为"朋友"，犯不上结成死"冤家"。一旦发生交战，双方均是胜败难卜，即便是大获全胜的一方，也不会不付出代价，何况往往是两败俱伤呢？可是北京镖行的历史上，确发生过八大镖局组成联军开往冀中地区会剿宋锡朋的战斗。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会友镖局受理了一桩大买卖，是押"皇杠"。凡是朝廷的税银，民间都把它称之为"皇杠"。所走的镖路是由保定到天津，雇主是盐法道，当时海河流域的水网还是四通八达，"皇杠"由保定上船可以直达天津。当四条镖船走到下西河时，遇到了税务司巡检拦河检查，这批"检察官"身穿着号坎、青坎肩、白边、白字，上书"税务司"，喝令镖船停航，领班的镖师赶紧迎上去出示路引、镖单以及盐法道衙门的公文，可是"检察官"们声称要查查有没有夹带私货，打头的镖师赶忙说："'皇杠'上都有道台衙门的封条，您可以照单点箱，小字号的规矩也是不许不有带的……"言未毕，"检察官"们已强行登船，上船后镖师们才发现来者是匪不是官，在船上打了起来。镖师们借助于六响炮(左轮手枪)的威力，很快把"检察官"们打了出去，可是船被困在河心走不出去，只好派人突围去报官，巡防营派来一哨马队，才把围攻镖船的土匪击溃。在等待救兵的过程中，土匪又组织了二次进攻。战斗十分惨烈。押船的达官死伤过半。这是会友镖局开业以来最大的流血事件，战后清点"皇扛"损失了二千多两，镖局只得照数赔偿。以后南道的水旱镖路上又发生了好几起劫镖事件，而且干得都很干脆，上来就抢，根本没有交朋友的余地，各镖局都蒙受了不同的损失，一向平安无事的冀中地区，一下子成为了镖师们的畏途。镖局派人到冀中一带明查暗访，获悉南道上劫镖的大案都是宋锡朋所为。宋是冀州李家庄人，自幼武艺出众，后闯关东当了"马达子(马匪)"，乘庚子之乱，又回到冀州，纠集了一批歹人，为匪做案。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许多团民又投奔了他，手下有一千多人，盘踞在南道的镖路上。八大镖局为此举行了联席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朋友"胃口太大，没法交，只有把他除掉，否则南道不通，北京的镖行要失去大半生意。于是八家联名照会宋锡朋，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但宋依然我行我素，

凡有镖车过境照劫不误，八大镖局只好组成联军，开往冀中地区进行会剿。

宋锡朋在迎击镖局联军的战斗中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如果他进一步化整为零，或停止活动转入地下，则镖局联军只有空手而归。可是宋锡朋一时气盛，不但想一战打垮联军，叫镖局向他纳贡，还想夺取镖师手中的洋枪，改善一下自己的装备，所以和联军打了一场硬仗。宋锡朋是双枪将，而且枪法极好，但他手下的人几乎没有洋枪，手中的火器大多是白洋淀上打野鸭子用的抬枪，再加上大砍刀和长矛，临时组织起来的庄稼汉，没经受过训练，哪能是习武高手们的对手，况且双方手中的武器又悬殊极大，尽管宋部以死相拼，还是被联军打垮了。但是他们垮而不散，继续和联军周旋了好几个月，最后在保定地区被联军打散了，于是庄稼汉们回家务农，宋锡朋又窜回东三省当他的："马达子"。一年多以后，会友镖局忽然接到冀州衙门的信，说宋锡朋已从关东潜返回冀州，现藏匿在家中，和党徒们频频往还，图谋东山再起，衙门约会友镖局派人前往冀州，协助擒拿宋匪归案。

会友镖局接到信后认为机不可失，因为一旦宋锡朋从官府手中溜掉，招集余党，再拉起杆子，后果则不堪设想。于是派出了一支四十多人的精悍队伍，由久经战阵的老镖师焦林朋率领，骑马星夜驰往冀州。到州城后没有声张，分批进城，住进了两家客店，冀州的马队捕快得知："会友"的镖师到达的消息后也整装待发，得到在李家庄蹲坑的密探回报说宋锡朋确在家中，两支马队分批出城在半路上会齐，直赴李家庄。乘着夜色把宋家团团围住，五更后天已放明，捕快们鸣枪示警，想把宋吓出来，可是宋坚守不出，大家畏于宋是神枪手，谁也不敢冲进去，只是逗着他开枪，把他的子弹耗光，宋锡朋把子弹打光了后，从房上蹿了出来，刚一落地，焦林朋迎上去就给了他一个"夫子三拱手"，当场把宋犯擒住。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慈禧太后也知道有个叫宋锡朋的土匪，双手会使洋枪，而且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的神枪手。宋犯被擒之后，老佛爷一时心血来潮，想看看他是一条什么样的好汉，于是下了道懿旨，把宋犯解到北京去。消息传到会友镖局后，大家心里都有些不安，因为老佛爷晚年办事喜怒无常，万一碰上她一时高兴，一言出口就能把宋犯赦免了，说不定还会赏给他什么官当，对镖行来说可真是后患无穷。可是宋锡朋面圣之时吓得面无人色，体似筛糠，哆嗦成了一团，瘫在地下起不来，老佛爷一见大为扫兴说："敢情是这么块料呀，快给我拉走。"宋犯被押解回保定后砍头示众了，镖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会友镖局在北道上也和土匪发生过一次较大的战斗。这次走的是花市的麻镖，价值有十几万两银子，都是用毛驴驮着。由于北道一向爱出事，所以这趟镖跟出去的人也比较多，出了居庸关后，在八达岭地区遇见了一股土匪，用火枪封住了前进的道路，镖师们本想退回去，但后路也被截断了。好在土匪们使用的是灌沙子的火枪，射程近、威力也不大，镖师们只好躲在毛驴和麻包的后面，用"驴城"掩护自己，毛驴很快就被打死了十好几条，躲在"驴城"后面的人也伤了好几个，由于土匪害怕镖师手中的洋枪，故不敢冲上去劫镖，形成了对峙状态。镖师们只好派人冲出去报官，眼看太阳就要下山，如果天一黑，镖师们更要吃大亏，恰巧这时县队赶到解了围，麻镖虽然没丢，可是人员伤亡惨重，毛驴损失也不少。和地面上的人一打听，劫镖的匪首叫大光棍、二光棍，在延庆、怀柔一带啸聚山林，各股合起来也有好几百人，走北路镖，过了昌平州就进山，有这二条光棍出没山林，镖师们对北道真是有点发怵。好在事情闹大了后，密云、延庆、怀柔、怀来几个县的官兵开始会剿，大光棍和二光棍在怀来县境内被巡防营捕获，就地正法了。

镖师和大股土匪发生武装对抗时，地方

官和治安部队接到求救的报告后，都能及时赶到解围，故然是由于职责所系，从治安部队的角度来说，土匪劫镖时往往是结集各股的实力，镖匪相争，正是官兵进剿的好机会。告捷之后长官当然会有奖，镖局也必然要酬谢，一箭双雕，公私两利，真是何乐而不为。如果不闻不问不采取有效措施，必然会给自己带来些麻烦，因为雇得起保镖的人，不是“大门坎”，也是“有来头”，在北京城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势力，一旦请出御史老爷奏上一本，弄不好就会使小小地方官头上的项戴保不住。

京西妙峰山本是朝廷香火圣地，敕封为金顶娘娘，自康熙朝以来香火极盛。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是妙峰山开山的时间，也正是赏春踏青的好时机。山中十余里长的涧沟，号称玫瑰谷，朝山的香道蜿蜒其间，十里飘香，使游者如醉如迷，京城之中的农工商各界人士，达官显贵、甚至王公勋戚都前往妙峰山朝山进香，大有万人空巷之势。天津、保定、济南等地的善男信女也不远千里而来，一时冠盖如云，仕女如潮。可是在庚子之后，仅距朝廷香火圣地妙峰山十六里之遥的滴水岩，却有一股土匪据险而守，公然安营扎寨称起山大王来，并不时地下山进行骚扰，出没于北安河、三家店一带，匪锋所及，竟达温泉、太平庄地区，直接威胁到颐和园附近的治安。尽管这股土匪的主要作案方式不是明抢而是绑票，也很快就被官兵所剿灭，但也可谓一叶落而知秋矣。

镖道上的贼伙发展成匪股，劫镖的方式由劫得成、劫不成均是速决、速撤，发展到敢于围困镖队，长时间对峙，京畿近县也出现了匪患，这一切不但说明了镖行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同时也说明了《辛丑条约》签定以后，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卖国的本质已暴露无遗，统治上的相对稳定时期已经过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镖局与走会

中国是个多神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供奉不同的神，各民族又有自己图腾崇拜的神，三百六十行几乎又都有行业神。可是华夏人民对宗教的信仰又很淡薄，主宰人们意识的主流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传统观念，对神的态度是"祭神如神在"，"信之则有，不信则无"。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老百姓对当官的态度是不论官大小，见面总得行个礼，对神的态度是不管教义如何，见着就叩个头，反正是礼多人神都不怪。自唐代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三教圆通的观念更是流行，儒生是孔门弟子，在至圣先师牌位前行礼，可是在太上老君、释迦矣尼的像前也烧香，所以盛行于民间的庙会活动，不是宗教的道场，而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民俗活动。

走会，广义来说，就是在庙会期间结队进香。北京城区的庙会大多按月举行，三十天中排得满满，所谓庙会，是按月定期开放的商业市场，所以在庙会期间没有人结队去朝山进香。而且不少举行庙会的寺观"香火已绝"，根本不再接待施主前来叩头烧香。

走会从狭义上来讲，是指在庙会期间，专门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前去朝山进香的群众团体。走会又可分为文会和武会。文会被称为善会，专门在朝山进香的过程中做好事、行善举，广结善缘。武会又被世人称这为花会，专在朝山进香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娱乐形式的表演。群众看到表演队伍后，尾随围观，称之为"看走会的"或"看过会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走会"是指在朝山进香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娱乐表演的武会。

北京地区的庙会甚多，但影响大、香客范围广、走会的多的庙会还要数京西妙峰山和京东丫髻山。两山距北京城区都在百里上下，开庙的日期都是在春季。囿于城中过冬的居民们借进香之名行踏青之实，出城领略一下郊原春色，山林风光，妙峰山和丫髻山都是皇家的香火地、御道场、丫髻山还建有行宫，清朝皇帝曾多次前来与民同乐，共同朝山进香。丫髻山不但是香火圣地，开山之时也是京东、京北的货物集散地和商贸市场。山下的十里长街，摊商林立，百货云集，"聚四方之物为一衢，虽京师无以过之也"。妙峰山坐落在京西旅游线上，大觉寺、金山寺、莲花寺、妙高台、鹫峰等景观环列山前。进香的山道途经十六华里长的玫瑰谷，开庙之日，北京城中工商士子倾巢而出，王公显贵亦混迹其间，一些直、鲁、豫、晋的香客，不远千里而来，故妙峰山金顶有天下第一香火圣地这称。

善男信女在朝山进香时故然要当施主，但阔绰的施主还要数高官、巨商和贼匪这三个阶层中的人物。因为这三个阶层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状态——怕。当了大官后怕丢官，发大财之后怕破产，做大案之后怕落入法网。向空门施舍几个钱，破财消灾，是三者的共同愿望。

走会的名目繁多，有舞狮、龙灯、扛箱、小车、旱船、高跷、开路、五虎棍等等，总之，"会"

的内容大多和习武练功者相关连，能够组织起一伙人去走会、大多是习武团体、村社、镖户和镖局，千里走会也只有镖局才有这份人力物力。因为走会和走江湖卖艺不一样，是一项自我娱乐的活动。途经城、镇、村、集，地方上的人士“截会”是友好的表示，走会的表演一场分文不取。

镖局组织千里走会，从表面上来看是劳民伤财之举，其实不然，走会的效果是一箭双雕，名利双收。首先走会是为了进行宣传，镖局的会队确实阔绰，一个个会众(镖师)骑着高头大马，后面跟着许多辆大车。车上装载着生活用品和走会时所用的“行头”。队前飘扬着两面大旗，上书“××镖局×××进香”和××镖局××老会”。如该会曾在御前表演过，就打着一面皇上赏赐的黄旗，世人一见就知道这是朝见过天子的“皇会”，顿时风光异常，声价十倍。一路之上会首拿着帖子，遍拜地方人士，地方人士也扶老携幼拦路“截会”，宾主执手联欢，然后会众尽兴表演，“会规”虽说“所过之外茶水不扰”，可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见会首前来拜谒，会众在门前列队表演，觉得很风光体面，也免不得要出面招待招待，如果是“皇会”，那更会受到礼遇，因为黄旗在大门上一插，宅院仿佛顿时四壁生辉，也沐浴了天恩。千里走会千里表演，千里结友，岂不是一支千里宣传队。

同时走会也是为了进行“示威”，因为镖局的会是结结实实的武会，大多是开路、五虎棍之类的武打行当。走会的有路规，两会相遇，皇会先走。两皇会相遇，开路先走。所谓开路就是耍叉，名为开路当然忌单，所以耍叉的人都是偶数，最多时可达八八六十四人。一路之上叉光闪闪，叉盘鸣响，不论有多少围观者，耍叉的总能把路挤开，所以称耍叉的叫开路。明晃晃的钢叉在人群中飞舞，可不能碰着任何人，要碰伤了人，开路的就算栽了。所以敢在庙会时开路，没有点真功夫可不行。到了进香时还得露两手绝活，要破纪录，创纪录，如到妙峰山、丫髻山进香都要过十八盘。所谓十八盘，就是十八段陡峭的石阶，想露脸的人，就单腿或双腿蹦过去，一蹦跃几道石阶，一口气蹦多远，都有最高纪录，而且年年都有创最高纪录的，如哪家镖局在创立的纪录中总是独占鳌头，或年年总是首先开路上山，那不但在同行前面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在朝山进香的贼匪面前，也显示了自己的威慑力，在官僚、富商面前扩大了影响，在世人面前露了脸、出了名。

在名山古刹举行庙会之时，武林高手往往摆下擂台，以武会友。擂主有时是一人，有时是若干人。设擂的人有两种，一是具有武德的侠义之士，想借此结识天下武林豪杰，确实是以武会友。也有的人是地方上的土皇帝或是称霸府州的地方势力，这些人摆下擂台的目的是为了镇灼四方，加强自己的霸主地位。镖局对这两种不同的擂主，采取不同的对待方法。对侠义之士以武会友，当然希望一举夺魁，风光本局声威，如败在高手名下，也可增长见识，仍不失以武会友之初衷。对待土皇帝们设下的擂台，则送上“过擂”的贴子。所谓“过擂”，就是告诉设擂的擂主，本局的会众将从擂台下经过。当镖局的会队打着镖旗、会旗、边表演边行动，路过擂台时，擂主到擂台前抱拳向下一礼，台下带队的会首也拱手向台一礼。台上的人一礼是表示自己的身份不是擂主，是看过会的观众。台下一礼是表示自己的身份是走会的会首，不是前来打擂夺魁的猛汉。观众施礼，会首当然还礼。于是一场打擂和过会的分案就了结了，双方都赏得自己很露脸、很风光，都扩大了影响，起到了宣传和示威的作用，也就算彼此交下了朋友。过擂的方式很稳妥，所以后来镖局走会时，遇见设擂的大多采取过擂的方式。

走会起到了宣传、示威的作用，使镖局获得了名，镖局走一趟会，也就是走一趟镖，而且是走一趟最平安的镖。官僚们的夫人、小姐、少爷，在庙会期间朝山进香。贵人出行，

当然要请镖局保护。商人们赶庙会,是借朝山进香之便,做趟生意,也免不了请镖师护卫,求个平安。贼匪们有不劫香客的行规,地方势力也不会刁难过境的会队,于是会队、商队、夫人小姐们的卫队混杂在一起,浩浩荡荡平平安安地直达进香的圣地,礼佛纳福后皆大欢喜而归。镖师们一路虽然辛苦些,准能得到一笔赏钱。所以北京各大镖局的会众,不但每年必在妙峰山、丫髻山开山门时去朝山进香,也不远千里到泰安、扬州等地走会。

慈禧太后是北京土著。幼年时就喜欢看走会的、入宫后还记忆犹新。颐和园的北宫门位于北京城区通向妙峰山的要道上,所以庙会期间老佛爷也驾临北宫门门楼上看过会的,一来饱饱眼福,二来可以显示与民同乐,共享太平。如果老佛爷看上了哪档子会,就叫进宫来表演,演完了后赏一面黄旗,该会也就被人称之为皇会了。

辱国丧权的《辛丑条约》签定以后,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由西安起驾回京。由于"庚子蒙尘"的"教训",老佛爷不但完全接受了半殖民地的政治铁序,也变得:"开化了"、"维新了",进了娘子关到达正定府后,就乘上了火车直奔北京。一路上她心花怒放,高兴之余,赏给了"太后专列"的监造者比利时工程师沙窦一个二品顶戴衔,洋人受宠若惊,也双膝跪倒,向老佛爷行起叩头大礼来。这一礼可真使得老佛爷飘飘然了。到前门车站下车后,在子民的欢呼万岁声中,穿过张灯结彩的街市,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紫禁城。可是余兴犹未尽,为了庆祝"与列国重修万年之好",下懿旨大办"皇会"。

北京地区的走会活动,是人民大众自发的娱乐活动,是一种民俗活动,由太后下诏,官方组织的走会活动尚属首次。顺天府衙门负责承办这次庆典,所以京兆二十四县的县太爷们格外卖力气,生怕属下小民在走会时出了什么差错,误了皇差,断送了自己七品县太爷的前程。在各级地方官的层层催办之下,会首们岂敢把这次活动等闲视之,因为出了岔子当然要获罪,若老佛爷看着高光赏一面黄旗,就成了堂堂正正地御前皇会,露脸、风光的事也就接踵而来了。

镖局往年走会,都是传统的开路、五虎棍、少林十八棍等等,对这些节目,想来老佛爷也看厌了,而且,断命刀、追魂枪、夺命剑等称谓往往令人闻名胆颤,生怕老佛爷听后不悦。于是各镖局纷纷争先创出什么进禄刀、定福枪、祝寿剑,会友镖局赶排了"八仙祝寿剑"。

各走会团体排出的节目,经过各级地方官的严格审查后,呈报到内务府的还有一百二十多起,若每个节目演十分钟,得演二十多个小时。分三天演,也得每天演六个小时。老佛爷不会有如此大的雅兴。于是内务府堂官们和大总管李莲英进行了多次商议,结果是把全部节目表呈送老佛爷御览,凭圣意定夺。消息传出后,各大镖局纷纷托门路,把自己报送的节目向前排,拼上一笔银子,也要挣面黄旗回来,以振镖威。

不知道是银子的功效,还是名子的功效,会友镖局的"八仙祝寿剑"让老佛爷选中了。在御着表演后,老佛爷虽然没有大加垂青,可是赏了一面黄旗,于是镖威大振,预期的目的完全达到。八仙祝寿剑在走会的过程中沿街表演,引起了北京市民的注意,后来梅兰芳先生演"霸王别姬",其剑法就取材于八仙祝寿剑,是李尧臣镖师把这套剑法传授给梅先生的。

大办皇会之后不到六年,老佛爷魂归西天。二十年后,会友镖局也走完了自己最后的一程。可是八仙祝寿剑却长传了下来,走会的活动也长传了下来,十年浩劫之中,走会活动才中断。进入八十年代后,各地的老会又陆续恢复了活动。

镖局与解饷

清王朝实行中央集权，不但军权、人权集中在中央，财权也高度集中，由朝廷统一收支。故各行省、盐运使、海关道以及户部所属的稽征百货的户关，工部所属稽征竹木船钞的工关，所征税银均需解往北京，入户部银库，然后按各部门的需求，再统一分拨。清廷实行摊丁入亩后，各种税收一律征银，地方官把征收的碎银集中后，再熔铸成二百两一锭的大圆宝解往北京。熔铸的理由是碎银不便运输，容易造成失漏和偷资，二百两一锭的大圆宝既便于运输保管，又不易失漏，入库行窃的家贼、外贼也不易把重宝携带出去。清王朝的各级财政当局认为把碎银熔铸成巨锭乃是万全的金科玉律。所以官方向民间征收税银时要加收熔铸时的火耗，大圆宝解到北京后，户部声称大圆宝的成色不合格，要熔铸成统一规格，统一成色的方宝再行入库，所以也要按质增收火耗。加工熔铸方宝的“银炉”均是户部核准颁照的专商，并享有世袭权。“银炉”设在前门外珠市口一带与镖局为邻，解到北京的大圆宝也有不少是由镖局负责解运来的。

朝廷的税银民间俗称为皇杠，事关重大，本应由军队解运到京。可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许多皇杠却由镖局解送到京，这种现象实在令人费解。究其源是太平天国和捻这起义的过程中，清王朝风雨飘摇，上下动荡不安，军队解送饷银的过程中有时被山大王所劫；有时解饷的官兵哗变，抢了皇杠去当山大王。如果饷银确实是被山大王所劫去，那么解饷的官员是失职之罪，出事地点的地方官是纵盗之罪。如果护饷官兵哗变，则主管解饷事务的布政使、盐运使、海关道等大人们则有“滥用匪类”的失察之罪，头上的顶戴花翎恐怕要保不住，所以官场之上，均视解饷为畏途，特别是负责交验的文职委员，受委之后坐立不安，仿佛死期已近，因为一旦出事，不被山大王或属下哗变官兵所杀，就是被朝廷“明正刑典”。于是大人们就想出了一条妙计，把皇杠分批分期委托给镖局解运到京。解饷委员去京验收镖局解来的“皇杠”，点验后如签封未开、成色未变、数量不少，则可逢百抽五，也就是说平安解送一百万两银子到京后，有五万两银子的“赏钱”。镖局若丢了皇杠则照价赔偿。地方财政当局虽然多花了一笔银子，可是主管解饷的大人、负责解饷的委员均是无责一身轻，但大人们也怕丢了“皇杠”后镖局赔不起，所以多找几家可靠的镖局分批分期把“皇杠”解送到京，大人们为了头上的顶戴花翎，可谓用心良苦。

解送“皇杠”是镖局最爱受理的业务，解“皇杠”虽然关系重大，但不用专门派人解送，而是将带有官封的大圆宝夹藏在其他货物中运送，这不光是算经济账，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需要，十万两银子折合成市斤约六千斤(每斤按十六两计算)杂在棉、麻、丝、绸、茶等包装中很不显眼，到京后即可获得五千两赏银，真是何乐而不为。一旦经常受理解皇杠的业

务，布政使、盐运使等大吏还会给带队的镖师委任个八九品武官的虚衔，以便在和匪盗相遇时，持公文调附近的驻军解围助战，所以解“皇杠”对镖局来说是名利双收的买卖。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洗劫了户部大库中的数百万两存银。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西逃西安，在“行在”颁发上谕，令各省饷银解往西安。由于“行在”的机构不健全，许多技术上的问题无法解决，大圆宝无法转铸成成色规格统一的方宝，只好又改为“留省听候户部调用”，由户部派委员到省查验，查验合格后加盖封记，然后才能按照户部通知发往领取单位。户部的验收委员到省后大敲竹杠，百般挑剔，于是地方财政当局只好和验收的委员意思意思，“打点”奏效之后，负责验收的委员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开绿灯，通通放行。银饷发放到有关衙门后，接饷的官员又认为成色不够，规格不符，于是纷纷向朝廷告状。《辛丑条约》签定之后，大清国又恢复了“平静”，于是一切“率由旧章”，地方财政当局和户部依然加收火耗，镖局依然解饷到京后逢百抽五。清廷和镖局都企图以不变应万变，但世界在变，二十世纪的晨钟已惊醒了神州大地，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被迫实行所谓的“新政”，在财政金融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成立了大清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龙洋”，各省也成立了“官银号”，在这种情况下，镖局逐渐失去了解“皇杠”的生意。

进入二十世纪后新式的银行、邮局、铁路、海运纷纷在中国兴起，银行汇款用电讯划拨，邮政通信由铁路挂专用车皮包揽。铁路沿线有路警负责保护列车沿线的安全，车上也有武装乘警负责押运，保护旅客和托运物资的安全。这一切无疑是敲响了传统镖行的丧钟。可是镖局这种企业有自己的特殊性，往往是僵而不死，因为镖局有一张关系网，镖师也是“能人”，用镖行人士自己的话来说：“到什么时候也能挣搏几下。”新开设的银行、银号，往往也请镖局派镖师常驻，有大宗款项往还时大多也雇镖师解运以防止发生意外。当镖局先后歇业时，这些由镖局派往银行、商店、私宅的镖师大多变成了由雇主直接雇用的保镖，二十年代初期“请愿警条例”公布实施后，银行、商店(主要是新型大商场)的保镖又纷纷被请愿警所取代。因为请愿警是官方的现役警察，又是私人所雇用，故有双重身份，既听雇主指示，又可以以官方的身份处理各种非常情况，其作用实胜保镖一筹。

镖局与车马

北京地区自秦汉以来，历朝均是边陲重镇。辽金时民为中国北部王朝的都城，元、明、清三朝均是统一王朝的京师。封建王朝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修筑了由全国各地通往京师的官道(又称驰道)。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京杭大运河逐渐断航，于是各省通往北京的官道就成了北京地区交通运输的主动脉，这种现象直到二十世纪初期，铁路、海运畅通之后才发生变化。官道上的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驴力挽的车辆，运输货物的通称之为大车。有几个牲口拉挽就称几套车。客车通称之为骡车，高档的套一匹马骡，低档的套一匹驴骡。马车这个概念比较特殊，是专指“庚子”之后出现在北京街头的西式客车，由于这种车是泊来物，所以拉车的马匹也需用洋马。

镖局的主体业务是走镖，走镖就离不开骡马和各种车辆，镖师自己要乘马，所护送的客人乘坐不同档次骡车，货物大多由大车运载，珍贵怕碰的装箱后用毛驴驮。由于许多客商都把货物的运输工作委托给镖局代办，所以镖局就纷纷附设大车行，免得肥水外流。走北道的镖局，有贩运骡马的传统，许多镖局也附有骡马店，出售由口外贩运进来的牲口。镖局、大车行、骡马店有相关企业，往往形成保镖、运输、贩卖骡马的“一条龙”。有的镖局不但以保镖闻名，而且还以运输有道著称，镖界的京北贯市李家就以所备的骡轿舒适闻名遐迩。北路、西路的客商贪图乘坐骡轿比乘坐骡车舒适，所以贯市的保镖行业十分发达，针对这种情况，各大镖局都备有许多不同档次的骡车、骡轿，供客人选乘。

北京地区有养马传统，明代京畿各县有不少马户，马户专替国家养马，免除其他力役。也就是说，国家把马寄养在马户家中，马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马户，一旦国家有应时之需就向马户调马，马户要保证马匹健壮。清初八旗兵进关，“旗兵”在当时也可称之为“骑兵”。清末时北京城中养马、赛马、斗马的人士仍然不少。能够玩马的人在经济上当然是中产以上之家。摄政王载沣的胞弟贝勒载涛就有爱马之癖，而且是马背上的高手，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民谚有云：“千里马还要配千里人。”涛贝勒固然是马上健儿，但王公勋戚，公子王孙大多是提笼架鸟的游手之徒，根本驾驭不了烈马龙驹，所以八旗子弟赛马时少，斗马时多。所谓斗马就是互相攀比坐骑是否是《马经》上在谱的千里驹，马的毛色越有讲究声价就越高，黑马头上有块白，称之为“乌骓抱月”，白马黑尾，名之曰“雪中送炭”……总之马的名字起得越雅声价也就越高。还攀比马的装饰，非金鞍玉佩、风铎响铃不足以眩世。所以跨下宝马良驹，坐上金鞍玉佩的代价往往是千儿八百两银子。有的花花公子只知青楼问柳，实属花腰软腿之徒，就是跨马招摇，也力不从心了。所以就热衷于跑骡车。跑骡车者，名为跑骡车，实为斗骡车，因为骡车由车把式架驭，公子只是稳坐其中。

骡车兴起于乾隆年间。清初官员们多乘轿,不同品级的官员乘坐不同品级的轿子。雍正年间实行摊丁人亩后,各种赋役摊人田亩,一律征银,官员乘轿所需轿夫不能再从民间征役,要自己掏腰包雇用。雍正又整顿吏治,严罚各级官员贪污,京官们的合法收入只是有限的俸银,又身居皇帝眼皮子底下,就更不敢乘轿摆排场,大多互相标榜清廉、简朴。所以上朝外出,均乘坐驴车。驴小力单,车行缓慢,外观也显得寒酸。到了乾隆时,官员们又先后改乘骡车。当时骡车有两种,一种是低档的客货两用车,以客运为主。这种车大多套一匹驴骡,车轮在车身的中部,载重时重量垂直地压在车轮上,挽车的骡子负重不大,主要起向前拉的作用。但乘车的人上下不方便,只能蹬着一张长凳子,由辕木上进入车棚内。高档次的骡车专门载人,车轮在车的后部,车的中部两边均设有门,乘车者上下都很方便。但载重时重量一半压在车轮上,一半压在辕骡身上,运行时马骡又驮又拉,故只便载客,不但载货,可谓专用客车。此种车发展到清末时日趋豪华,不但制造车身的木材十分考究,而且车身上的紧固件、挽骡缰绳上的衔接环也由锻铁件渐渐发展成铜制品,甚至包金、包银。挽车的走骡也是物以稀为贵,大多使用毛色稀少的青色、黑色、红色的马骡。“枣木、铜活、大青骡”,是人等的标志。等而上之的是“朱辕披紫(铜)火龙驹(红色骡子)”、“银鞍玉挂菊花青”、“堂紫金环铁乌雅”等名目众多的、互相配套的高级豪华车和雄健的大走骡。镖局也预备不同档次的骡车当然不是为了斗富,而是用于待客,但对车质和挽骡也不能不讲究。镖局骡车的优势是在骡不在车,车身的材质大多是“枣木铜活”,因为枣木坚硬结实,“铜活”不生锈,枣木通红,青铜镫亮,组合在一起后反差大,对比度强,显得富丽堂皇,光灿夺目。

清末盛行的跑骡车,主要是斗车富,不是赛车速。每年春季是“秧子”们斗骡车的季节,斗骡车的地点大多在庙会前的空场上,或踏青寻芳之地。如正月的白云观、大钟寺,三月蟠桃宫、高梁桥,四月的南顶碧霞元君庙等地。由于南顶附近地势平坦,所以成为斗骡车的主要赛场。庙会时期各寺观开山门进香,届时摊商林立,士女如云,王公之后、勋戚子弟、富贾儿孙都爱趁庙会的热闹来跑骡车,以夸富显胜。跑骡车并无竞赛规则,更无裁判员,只是“拉出来遛遛,亮亮像,叫人见识见识”。与其说是比赛,不如说是比富。首先是比走骡的高大雄健,其次是比车质的豪华程度。由于斗骡车是自发性的活动,所以竞赛的方式也不一样,有时是十几辆,甚至几十辆骡车自然结合成车队,在庙会前的空场上绕圈子,是和平游行,招摇过市,显胜显富,风光风光而已,自视牲口和车子均不够上场之份的,则灰溜溜地扬尘遁去。有时是一人想独占鳌头,尽夺风光,于是驱车扬鞭在空场上放驰三圈。车把式有二种鞭子,一种是小鞭子,专打牲口屁股,一种是大鞭子,鞭杆、鞭绳、鞭梢加起来有二丈多长,其功用并不是打牲口,而是抽出巨大的声响,振奋牲口前进,其性质有些类似古代的战鼓。车把式驱车振鞭放驰是“叫份”,如果跑满三圈无人应战,则站立在车上,用大鞭子连甩三个“振天鞭”宣告“夺魁”。在“叫份”的过程中如有驱车应战者,那么双方就要斗一斗,斗车的方式是两辆车并行疾驰,挽车的骡子个头大、力气足、跑得快,骡车结构坚实,在并行疾驰的过程中就能压对方一头,将其挤到路旁。“秧子”们是来斗车的,不是来拼命的,车把式心中更有数,一般在胜局已定时就嘎然而止。但是如果对手不甘失败,或胜者不知“见好就收”也会发生车毁人伤的事件。

镖师们都是驱车走马的行家里手,而且都打过梅花桩,练过车战的功夫,所以站在疾驰的车上决不会被颠下来。镖师参与跑骡车的活动,当然不是斗富,是来卖骡子,所以车子虽然不能夺魁,但骡子一定能够压众。雄

健高大的大走骡一上场就鬃尾乱炸，嘶鸣不已。镖师站在车上徐行放驰，手中的长鞭连甩“振天鞭”，发出了惊雷般的声响，向四周的“秧子”们“叫份”。只要应战的一上场，镖师立刻驱骡绝尘而去，叫对手望尘兴叹，想斗也斗不上，在众人的叫好声中，“秧子”气急败坏，于是就对镖师说：“这骡子我买了。”“斗骡车”有个不成文的条例——失败者只要把胜利者的骡子买下来，就算反败为胜，夺回了风光和体面。镖师这时则和颜悦色地回答说：“这骡子我不卖，就是卖您也买不起。”“秧子”一听勃然大怒，扬言道：“你说得出价，我就给得起钱。”镖师见火候烧得已到，就缓和下来说：“我是不想卖，您既然非想买，您就给个价，您给的价合适我就卖，不合适我就不卖，咱们不打价还价，就听您这一锤子定音。”“秧子”的特点是死要面子，这种场合下当然不能当众栽跟斗，所以开口没准就是七八百两银子，“振振雄风，壮壮场面”。于是一场斗车之急宣告结束，“秧子”觉得异常体面，夺尽风光，镖师则揣着七八百两银子满载而归。

清末跑骡车之风久盛不衰，跑车的人士中杨三最为有名。杨三爷是北京富贾金灯杨家的少东家，杨家乾隆年间就垄断了紫禁城中宫灯的制作和修理，制做宫灯的原材料，均出产于南方，经过长途运输，才能到达北京，长途运输自然要和镖局打交道，所以杨家和镖局也算是“世交”。杨三爷虽然是京师游手，但不赌，不抽，也不嫖，专好赛马跑车，马术虽然不甚高超，但车技甚为出众，跑车时不用车把式，而是亲掌鞭杆。由于性格豪爽，出手大方，又略知拳脚，练过几天功夫，所以在镖行之中交了不少朋友。镖师们也都是重交情讲义气之士，帮助杨三爷物色了不少骏马走骡。杨三深知骡马的秉性。骡子的特点是耐力强，动作迟缓；马的特性是爆发力大，动作敏捷。权衡骡马之间的利弊，杨三爷大胆创新，断然革了骡子的命。在跑车、斗车中以马代骡，结果是出尽风头，大获全胜，连夺魁首，风光和体面集于一身，赢得了“快马杨三”之称。杨三爷以马代骡成功之后，又“引进”西方马车的制造工艺，对传统的骡车进行了改造，更换木轴，木轮为铁轴、铜瓦、铁轮，于是车速大增，并在车棚上安装了西洋花玻璃，前后左右共安装十三块，取十三太保之意。各阶层路车的玩主，争相效法，京城之中，一时马贵骡贱。各镖局乘机卖马买骡子，大发“秧子”财。“置车、购马、雇把式”，“驱车、走马、交朋友”，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支出，中产之家能够因之倾家荡产，故清末民谚有云：“和谁不对，劝他拴车走会。”以“快马杨三”为例，金灯杨家在北京城中可谓殷实富有之户，财运长达百年之久，可是辛亥革命后不到十年，“快马杨三”已经落破到给人看房的地步，其主要原因故然是宫中买卖断绝，但跑马、赛车造成的巨大开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镖师们参与跑马、赛车和千里走会一样，是为了做广告。乘骏马，挽强骡，夺赛车之魁首，是为了吊“秧子”们的口味，迫使“秧子”开口出大价，“秧子”伤财，镖师才能发财。

庚子之后，西洋马车开始时兴，宅门中的少爷、小姐夏季晚饭后乘坐马车出来兜风乘凉，当时称之为“跑热车”。开始时马是海运来的洋马，车是外洋舶来的“洋”车，但洋马海运而来常闹水土不服，“洋”车跑了一段时间后也要整修或重造，于是仿制的“洋”车很快在北京城内出现。镖局给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们护院，这方面的信息自然是很灵通，于是捷足先登，由外蒙地区购入大批俄国后贝加尔湖马，这种马身材高大，可骑乘、可挽车，价格比海运来的洋马贱得多，由于是经陆路而来，所以无水土不服的毛病，于是大受欢迎，镖局从中又发了一笔。

进入民国以后，各大镖局先后歇业，传统的镖行趋于瓦解，但会友镖局还苦苦支撑到1922年才宣告解体，其原因众多，但善于从口外贩运骡马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区出售，从中获取重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段祺瑞借参战之名，编练了三师参战军，参战军对外是“宣而不战”，对内是“战而不宣”。当时的军队骑兵是重要兵种，炮车、运输车也都由骡马力挽，所以参战军司令部马政司由内蒙地区购进大批骡马，其中有一部分是委托会友镖局代办，“会友”从中着实发了一笔，否则撑持不到1922年。贩马、赛马、跑车不仅是镖局的生财之道，也是镖局交结权贵的途径，是打开“大门坎”的敲门砖，是扩大走镖和护院业务关系网中的一条重要通道。

镖局做为一种企业，镖师做为一种职业，确有其特殊性。清代重文轻武，镖师乃是一介武夫，武举人、武进士尚且不可与文举人、文进士同日而语，难入士绅之流，所以镖师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如果习武练功者是一座金字塔，处于最低层的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中间阶层就是传统的镖行；武举人、武进士为其上层。纵观有清一代的提、镇大员中，武举人、武进士出身的人并不多。武举人、武进士即便是熬红了顶子，当了提、镇大员，也不会像“正途出身”的督、抚大员那样尊荣显赫。由此可知镖师(包括上层镖师和掌柜)也不能算是上层人物，不但政治上的地位如此，经济上的地位也是如此。因为镖局不是资本雄厚的企业，镖师也不可能是富有者。可是镖师又决不会反对上层社会，并和上层社会中的官、绅、商三界都有密切的联系，不但为其服务，而且从上层人物身上获取不少“外快”，但“外快”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获得的，也要有“投人”，必须当“穷大手”，在应酬场合花掉许多银子，才能给世人以“衣着阔绰，举止豪爽，出手大方”之感，让“门官”不把自己看小了，让“秧子”把自己当个“人物”。所以镖师的路子也不是光凭一身功夫趟开的。

爱犬与宠鸽

大型镖局的镖路遍布半个中国，在邮政、电讯没有创办之前，总号、分号、外柜之间的联系全靠走镖时带信，但遇见非常之事，镖局不可能像总督、巡抚、将军、都统那样发个"八百里快秉"，换人换马地接力飞奔。这样耗资巨大，平均计算，一封"快秉"要花上二百多两银子，朝廷都感到这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区区镖局，当然无法效尤。为了解决通信联络，许多大型、中型镖局都训养有大批镖鸽，镖鸽其实是信鸽由于为镖局所训养，所以世人也就称之为镖鸽。

大型镖局的总号、分号、外柜均训养有大批镖鸽，如从北京向西安走镖，出发时带上总号的镖鸽，平安到达保定后即放飞报平安，由保定起程进带上保定外柜的镖鸽，到正定放飞报平安……镖师走一站，放飞一次镖鸽，无事时放鸽子添趣，发生非常之事时，可以放出镖鸽进行联络，请求援助。所以镖鸽在镖局中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鸽子生性喜群和恋旧，不论在天涯海角都有强烈不可遏的归巢"信念"(动物学上称之为归巢欲)，所以镖局往往把鸽子看成是吉祥物，鸽聚、鸽来是事业兴旺发达的象征；鸽去、鸽散，则是不祥之兆。同时鸽子也是平安的象征。镖师们在走镖时好唱镖歌"千里镖路镖旗展，三江五湖汇一川。财源人缘两皆茂，镖鸽站站报平安。"

清末民初时，北京养鸽子之风很盛，养鸽子的阶层很广泛，各档次的人均有。王公贵族、富商大贾、名优红角的宅院之中均雇有鸽把式，负责训养大批的鸽子，其目的是显胜。这些玩主见镖局的鸽子能"千里传书"，于是争相购买，但镖鸽进入邸院之后，也就成了"宅鸽"，至多是主人出城踏青、进香、赶庙会、打猎时放飞助兴的玩物。阳春四月京西妙峰山、京东丫髻山开山门进香时，"香客"中就有不少"放鸽子的"。鸽子平安返回，则大肆夸耀自己训鸽有术；鸽子一去不返，则是放生(回归大自然)的"善举"。有时阔少们互相争胜，出重金斗鸽子，同时放飞后，鸽子先飞回来为"大胜"，后飞回来为"小输"，没飞回来为"大输"，双方鸽子均未飞回来为"平局"。由于放飞的地点越来越远，所以只好出资委托镖局代为放飞进行比赛。镖师们都会哄"秧子"，二位阔少谁出钱多，就先放谁的鸽子，所以胜负几乎操纵在镖师手中。胜者为了保持独占鳌头的荣誉，一定要多买镖鸽从中选拔出色的再行参赛。败者为了挽回失去的体面，当然不惜出重金物色佳品。镖师们往往使斗鸽子的"秧子"各有胜负，吊其胃口，从中大发其财，一只好镖鸽开价能高达五十两纹银。

镖师们在外走镖，虽有车马代步，但常年与风霜雨雪为伴，终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差事。风尘仆仆地奔波了一整天，投宿之后确实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住店后，店方并不负责保卫旅客生命财产的安全，土匪对住店过夜的镖车进行夜袭也是常事。所以镖车夜宿

时得留值班人员，少数值班人员看守众多的镖车确有困难，一时失神就可能发生严重的后果。所以镖师上路时都带有训练有素的镖犬，镖犬白天关在镖车上的木笼子里睡觉，晚上放出来守护镖车。如果镖师在旅店中占了一个独院，镖师就会对店家说："晚上我们的狗就不锁了，也就甭麻烦您了。"这时店家就会明白，这是镖师通知自己晚上别进入院内，否则会被镖犬咬伤。走北道镖的镖师，如果遇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情况，就要在草原荒滩上露宿，不但要防止马匪抢劫，还要防止狼群袭击，可是北道上的镖师夜宿荒原时都全部安然入睡，从不留值更的，因为大草原上一望无际，千米之外就会暴露目标，所以镖犬对于夜间进袭的马匪、狼群都能准确地发出预警信号。

由于镖犬在走镖的过程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各大镖局都很注意镖犬的训养。要想培养出合格的镖犬，首先要找好种，甘南地区的藏獒(当时称为蕃犬)，体重凶猛，"一只可敌三狼"，体大性烈的藏獒，甚至敢和"熊瞎子"(黑狗熊)对峙，但对主人却十分温顺忠诚，是不可多得的好犬种。遇有出色的藏獒，镖局不惜重金买下，训熟后和狼犬共育后代。镖局的狼犬也是精心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当时无现代人工杂交技术，要想培育出狼犬很不容易，最简单的方法是发情期把母狗锁在狼道上，如遇公狼，则交配可能成功，但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因为狼大多群体活动，母狗更大的可能性是葬身狼腹。所以镖师们只好掏狼窝，把小狼弄回来，在发情期和狗交配，第一代狼犬，狼性太大，不易训养，但和藏獒相配，产生的后代是最理想的镖犬。这种狗个头大，性格凶猛，但善解人意。所以镖界有"趟子(走镖)三件宝，走马、毛瑟(九子)、二代獒"之说，因为骑着走马不颠，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毛瑟枪虽然重些，但射程元、精确度高，弹槽内一次可以压进九发子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步枪之林中的佼佼者，为镖师所钟爱。一身好功夫，骑着好走马，身背九子毛瑟枪，在镖路上就大有所向无敌的气势。若身边再有条好镖犬(二代獒)为之守夜，不但可以睡上安稳觉，出事时还可以助上一臂之力，真是如虎添翼。

镖师们宠爱镖犬，与世人钟爱宠物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哈巴狗、狮子狗之属是太太小姐们怀中的玩物，镖犬是镖师们的"助手"，非常之时，关系到镖师生死，同时也可以给镖师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清代定制是诸皇子按其德行，受封为亲王、郡王、贝勒之爵，除八大铁帽王之外，受封后代代降封一级，降至辅国将军为止。不袭爵的诸子就成了闲散宗室、觉罗(由清"太祖"之父起算，他的本支是"宗室"，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但宗室、觉罗也由宗人府负责供养，遇有婚、丧、嫁、娶之事还有"恩恤"、"恩赏""恩加"。亲王的年俸高达两万两白银。满洲贵族挥师入关，定鼎燕京时，大肆实行圈地，强行占据了众多的田产，经过多代经营，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旗庄"，所以经济收入颇为丰厚。到了清末之时，北京城中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八旗贵族阶层。这些人依仗着"天恩祖德"不耕、不桑、不工、不商，终身坐吃俸禄，无所事事，整日以斗车、赛马、养鹰、放鸽、训犬、提笼架鸟、斗蛐蛐为乐，玩物丧志。

八旗贵族以弓马取天下，天下太平之后又好行围打猎，代代相传，于是狩猎也就成了八旗贵族的一项传统活动。到了清末之时，北京城中的八旗子弟早无猎虎殪熊的气概，只以放鹰纵狗猎取野兔为乐。猎兔要鹰犬配合，才能稳操胜券。清代在京北、京东设有养鹰的专业部队——鹰手营。专门为皇家捕鹰，清末时皇家已无用鹰之需，所以养鹰部队捕获的鹰大多高价卖给八旗子弟。各大镖局的镖犬在北京城中有独树一旗的地位，镖犬不但性格凶猛，而且体貌魁梧，确实非常犬可敌。于是"秧子"们最喜欢镖师的二代獒，一

旦看中，不惜重金。镖师们闲暇时牵犬外出亮相，“秧子”看见镖犬之后一时兴起，拦住镖师道：“这条狗，我买了。”镖师们知道“秧子”大爷最好“体面”，讲“气度”，认为打价还价是小家子气，有失阔少的身份，最怕镖师当众说：“这条狗我不卖，就是卖也没人买得起。”碰上这种情况时，很容易“吊”出“秧子”大爷拍着胸口道：“你说得出价，我就给得起钱。”只要这句话一出口，镖师即可漫天要价，秧子只能就地付钱。老北京有句歇后语：“五百两银子买条狗——追着找坑。”其出典是几个“秧子大爷”都看上一只镖犬，追着镖师非买不可。这条狗是典型的二代狼獒，长吻、利爪、细腰、长腿，身躯高大，实有力敌三狼的气派。秧子们执意要买，镖师执意不卖，在大街上招来了不少围观者，镖师见火候差不多了，于是说：“您非要买，我要是再不卖伤了您的面子，只好这么办了，您出个价，我看着值，我就卖，我看着不值，咱们就各忙各的去，都别再开口，免得失了体面。”秧子们最怕当众栽跟斗，也最好在同侪中显胜斗富，于是一个“秧子”脱口而出：“本少爷出五百两。”其他秧子被镇住了，镖师也愣住了，于是交易成功，留下了“五百两银子买条狗——追着找坑”这句歇后语。

清代北京城中的王公勋戚、达官显贵、八旗子弟、富商大贾均有斗蛐蛐之嗜好，并对蛐蛐的产地颇有讲究，常言道，“物以稀为贵，以远为奇。”北京地区并不缺少蛐蛐，可是玩主们偏要以山东、陕西等地的蛐蛐为“上品”。于是镖师们利用工作之便，从山东、陕西等地收购，捕捉些“上品”的货色到京中宅门出售。上场一斗，只要“秧子”们看上了，一二十两，三五十两，甚至百八十两银子即可到手，“秧子”们不惜重金购买蛐蛐的目的是豪赌，因为斗蛐蛐时不但双方出赌金，观阵的有时还押了一宝助兴显胜，押准了的借此宣耀自己“有眼力”，是行家里手。

镖局训养镖鸽、镖犬是要耗费资金的，所以只有家底厚、买卖兴隆的大中型镖局才花得起这笔钱，但这笔钱是投资，往往是花一个，捞回十个的赚钱买卖。贩卖蛐蛐往往是无本的买卖，弄好了即可赚个百八十两的银子，只要镖师在宅门中有出手的路子，旱涝保收，净赚不赔。

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海运、铁路的畅通，警政、邮政的兴办，传统的镖行逐渐失去了走镖、护院、坐店、汇款几项主要业务。辛亥革命后，八旗贵族退出了历史舞台，斗骡车、赛走马、放鸽子、斗蛐蛐、饲猎犬……也随之声消迹匿，镖局是雪上加霜，又失去了“外快业务”，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镖行，未能使自己跟上时代的变化，在经济上已无立足之可能，所以急转直下，由“庚子”前的“兴隆红火”，到传统镖行的最后堡垒——会友镖局的关闭，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年。

蒙古道上的镖局

唐熙平定了噶尔丹叛乱后，在多伦召集蒙古诸部分盟，内蒙、外蒙统一建立盟旗制，大漠南北连为一体，割据和混乱的局面得到澄清，为牧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生产恢复、商路畅通后，蒙古草原和内地的物资交流也兴旺了起来。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根据《恰克图条约》的有关条款，规定俄商自恰克图入境，俄国在恰克图建立了贸易市场，中国在其对面兴建了买卖城，作为双方互市场所。自此以后，俄国商队不再由尼布楚经黑龙江绕道进入北京，可以由买卖城，经绥远、张家口直抵北京。

北京安定门外至今仍有一处地名称为外馆，外馆是清王朝《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签定后接待俄国商人和留学人员的招待所。这些俄国商队，经常和蒙古商队一齐结伴进京，所以内外蒙各盟的商人也就在外馆地区下榻，因为该地地处北郊，卸货、上路都很方便，一些专做蒙古买卖、俄国买卖的内地商人也在外馆附近建屋开店，以利就近开展业务。人们称这些商号是做蒙古买卖的，其营业范围属于贸易货栈性质。蒙古买卖的最大商号名为大盛魁，总店在绥远，分号甚多，几乎遍布内外蒙各地，其商路南起北京安定门外外馆，中经张家口、绥远、包头、二连、库伦，直到中俄边境的买卖城，形成了以绥远为中心，辐射南北，连贯中俄的贸易网络。

绥远城始建于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由阿拉坦汗妻三娘子所建，明朝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三娘子城赐名为“归化城”。乾隆二年(1737年)，距归化城五里另建新城，因绥远将军驻节该城，所以称之为“绥远城”。自明清以来，归化、绥远一直是内蒙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内地和外蒙地区商业贸易的中转市场和对俄外贸的基地。辛亥革命后绥远划为特别行政区，最高长官为绥远都统，后来特别行政区改为绥远省，省会就设在绥远城。清末时绥远地区在行政关系上隶属于山西省，最高民政长官是道台(归绥道)，绿营驻军的最高长官是巡防营统领，巡防营的任务是“弹压地方，保护商旅”，防区西起包头东接张家口，所部共有八营，系左宗棠西征时的湘军东归后缩编而成，装备大多是克虏伯的老毛瑟和湖北兵工厂的汉阳造，在当时的地方部队中尚属精良。清廷在绥远地区还驻有将军和都统，其职责是统率八驻防营和管理旗务、边务。

内外蒙地区多沙漠、戈壁、荒原，自然条件较为险恶，在行政区域上又是蒙古王公的领地、地方军政长官的辖区，主管边务、旗务的八旗驻防营营区，交相杂错，有许多三不管、三全管的地区。茫茫草原上不但狼群出没，而且马匪嚣张，匪股多且杂，群龙无首，外界很难和这些马背上的亡命徒打交道、“交朋友”。所以北京各大镖局的北道镖路，一般都是东路止于热河(承德)，西路止于张家口，延伸到绥远的不多，几乎没有镖局敢深入蒙古腹地。

跑蒙古买卖，只要中途不遇到抢劫，那是有利可图的生意，蒙货只要运到张家口，南货只要运到绥远，立刻就能换成白花花的银子，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运输过程中的安全。蒙古道上的保安措施和内地商路上“走镖”相比，是绝然不同的方式。因为马贼呼啸草原之上，匪股繁多，行动迅捷骠悍，不但不扎寨据守，而且又不划分“盘子”（地盘），根本无法和他们交朋友。雄踞塞上，垄断口货的“大盛魁”，为了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根据蒙古地区的特殊性，建立了一套特殊的保安措施，所以“大盛魁”虽是货栈，却也起到了镖局的作用，可称为蒙古道上的镖局。“大盛魁”的具体保安措施是以官压匪、联官抗匪、武装商人，结队运输。

大盛魁“跑外的（业务员）”都捐有候补官的虚衔，小跑外的捐上个八品县丞（副县长），大跑外的甚至捐到候补知府、候补道台。也有捐内阁中书、主事等京官虚衔的，以便给人以钦差私访的错觉。所捐之官不但不是“急补”，而且也不用“到省效力”、“候委”，纯属虚衔，故花费的银子不多，即可顶戴花翎，官仪、官帖地招摇一番，不但可以以同僚的身份拜访地方官，还可以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和蒙古王公打交道，真是一旦翎顶在身，顿时身价十倍。马贼虽多，但《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终归是少数，黑道上的朋友，劫富济贫者固然有之，但大多数还是欺软怕硬，仰信“光棍不斗势力”的哲学，即便马贼是要钱不要命的亡命徒，候补大人也可以凭官帖要求驻军沿途给予保护。

联官抗匪就是“大盛魁”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厚结绥远地区的军政官员，特别是巡防营统领。因为巡防营部队由包头到张家口成长蛇阵摆开，其任务是“弹压地方，保护商旅”。地方上只要不发生反清起义和重大骚乱，无须军队出面弹压，于是保护商旅就成了巡防营的主要职守。“大盛魁”交结绥远地区军政长官的方法不是送礼，它的高招是拉诸位大人做蒙古买卖，刚开始是“大盛魁”给他们搞捎、帮、带，让他们尝些甜头，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大人们的代理人，当官的大多不会经商，不懂得资金在周转中的妙用。“大盛魁”利用他们的银子做买卖，资金周转了三圈时，只告诉周转了一圈，昏庸的官僚只关心这趟买卖赚了多少钱，不关心这笔银子做了几趟买卖。大人的鸡（银子）生了三个蛋，只挑一个大的送给他就行了。既然商队中有大人的货，沿途驻军当然要严加保护。巡防营的职责原是保护商旅，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分段护送“商旅”。碰上大买卖时，甚至绥远将军属下的驻防营，也会以野操为名，开出来千里护送。“大盛魁”不但厚交绥远地区的现任军政长官，而且对卸任的官员也给与礼敬，不时地帮着捎带上点快货。民国初年时，清朝的绥远将军揾岫和巡防统领周介仁已经是将军府和陆军部挂名的闲员，可是逢年过节，“大盛魁”总得送上些土特产意思意思，目的是让现任绥远地区军政长官们看，“大盛魁”待人不薄，只要一切按前任的事例办，那一定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商人一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夫，跑蒙古买卖的商人强悍些，会些马上功夫，可是也仍然不是挎着盒子炮，背着汉阳造，能够进行自卫的角色。商人不持枪的主要原因是怕招事，一怕被贼匪抢去，因为贼匪们对枪最感兴趣，路遇时“没看上你这个人，还看上你这支枪了呢”；二怕被官方收缴，因为枪照有地方性，弄不好就被沿途军警没收。“大盛魁”针对这种情况，把所购的枪械均在陆军部、内务部备案，在绥远都统公署领有枪照，只要不带进北京城，在直隶、察哈尔（张家口）、热河、绥远，以至外蒙地区均属合法，不会被军警所收缴。“大盛魁”把枪和枪照租给跑蒙古买卖的商人，每支驳壳枪的押金是一百元，每发子弹押金一元，其实枪都是旧货，绝不值一百块现大洋，一发子弹也不值一块现大洋。商人们租枪的目的是一者可用来壮胆自卫；二者

平安归来后把子弹和枪如数交还，押金则如数退还，分文不少。商人既省去了自己买枪的费用，又省去了办照的麻烦。而“大盛魁”把淘汰下来的老枪出租后，所收取的押金，又可用于周转，此事一举三得。

在马匪嚣张、人烟稀少的草原上长途贩运，一般商号的做法是化整为零，分散上路，即便和马匪相遇，损失也只是一部分，最忌大队行进，一旦碰上了马匪就会倾家荡产。“大盛魁”的做法是反众人之道而行之。分头出城，上路后就汇齐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前进发。分头出发的原因是怕上路前就被马匪派在城中“卧底的”侦知，所以上路前尽量缩小目标，进入不安全地带后再汇聚起来，此时已是人众枪多，小股马匪们见商队阵容颇为强大，不下百八十的人枪，也就不敢下手了。或是有巡防营护送的大型商队，在这种情况下，大股马匪也就只好望洋兴叹了。

“大盛魁”集中运输的原因并不只是人多、枪多、气就壮，以势压匪，而是有个通盘算计。如果商道上有一百股马匪，有一百支商队，那么相遇的可能性是一比一。如果只有一支商队，相遇的可能是一百比一，商队集中了，马匪并没有集中，商队强大了，马匪并没有强大，二者在草原上相遇，马匪就不敢妄动了。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潜艇在大西洋航线上截击美国开往英国的运输船队，美国运输能力损失惨重，于是采用了扇形航线、分散航行的方针，力求减少一旦与潜艇遭遇时所造成的损失。分散航行后护航的兵力更单薄了，由于德国潜艇也是分散活动，所以与运输船队相遇的机会也增多了，损失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呈直线上升之势，把美国海军搞得狼狈不堪。后来美国一位数学教授通过精确的理论计算，得出了集中运输、集中护航的最佳方案。大队商船在众多的驱逐舰、护卫舰、猎潜舰的护航之下，浩浩荡荡地横渡大西洋。德国分散活动的潜艇，被强大的护航力量所威慑，不敢发动攻击，即便是冒险发动了水下攻击，也往往成为护航舰队深水炸弹的靶子，使自己葬身海底。战争结束后，美国给这位教授授勋，大肆吹捧他的神机妙算，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大盛魁”就采用了这种最佳的运输方案，而且也取得了实效。

“大盛魁”的分支机构遍布内外蒙地区，形成了收购、销售、交通运输的网络，所以在塞外草原上有独占鳌头之势，跑蒙古买卖的商人都惟“大盛魁”马首是瞻。“大盛魁”向前来投靠要求给与保护的商人发“路引”，凭“路引”在所属的各分号和外柜都可以得到接待和照顾，沿途的巡防营见到了“大盛魁”的“路引”也会给予保护，实效胜过张家口(察哈尔)都统衙门签发的通行证，当然路引不是无代价的，是用银子换来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章法，凡是跑蒙古买卖的商人一到张家口，就到“大盛魁”柜上领路引、租枪，“大盛魁”负责安排结队起程的日期，在大道上会齐后就插上“大盛魁”的“镖旗”，向着蒙古大草原浩浩荡荡地进发了。每队之中都有“杆子手”(神枪手)负责押运。“杆子手”们都是双枪将，肩背九子毛瑟枪，腰挎盒子炮。进入二十世纪后，还装备了捷克式的轻机枪，所以马匪们确实不敢轻意地打“大盛魁”的主意。马匪们似乎也没有合过股，也没有组织过联军，因为呼啸草原上的马匪都是群龙无首的亡命徒，相互之间动辄火并，谁都不服谁，彼此之间的“过节”甚深，不可能组成联军，同时草原上的客观环境也不可能组成非官方的几百人的部队，因为人集中了后，不但居住和饮食都会发生问题，而且会造成驻防营、巡防营和蒙古王公的会剿，容易被一网打尽。

“大盛魁”的商队之中的“杆子手”固然是威慑力量，但所饲养的巨獒确也不可小看。“大盛魁”在组织法中规定了神、人、犬三大股，狗是股东之一，溯其源是“大盛魁”始创之时，狗起了不小的作用，而守成之时，狗的作用也未消失。“大盛魁”的巨獒一只可敌三

狼,马匪逼近商队时,狗会突然窜出,把马匪从马上扑下来咬死。

“大盛魁”虽然是个货栈,但在保障蒙古草原商路通畅的作用上,确是发挥了镖局的攻效,只不过是方式和内地镖局不同罢了,采取了镖商一体化的原则,商队之中的“杆子手”并不多,可是人人能持枪上阵,人众枪多,声势夺匪。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千米之外马匪就暴露了目标,就会成为“杆子手”的靶子,临近商队时又会遇到强大火力的阻击和巨獒的扑咬。由于商队能进行有效的防卫,使马匪见到“大盛魁”的旗号,如同见到了镖局的镖旗,在一般的情况下还是不劫为妙,免得人财两空,横尸草原。

清末实行新政,在归绥一带“放垦”,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动荡。辛亥革命时,四子王旗的蒙古王公大兴“勤王之师”要为清室誓死效忠,袁世凯派张绍曾出任绥远都统,用武力平息了动乱,可是政局并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再加上归绥地区的军政长官更替频繁,使得“大盛魁”在展开业务之时难以“率由旧章”。

民国初年,外蒙的封建王公在沙俄的挑动下,多次宣布独立,经济上也逐渐纳入了俄国的经济体系,和内地贸易日稀。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接轨后,恰克图失去了中俄贸易枢纽的地位,所以进入二十世纪后“大盛魁”基本上以内蒙地区为主要市场。京绥铁路通车后,不但北京的镖局失去了北道买卖,“大盛魁”也失去了蒙古道上镖局的地位。

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偶尔还能看见骆驼队在市区行进,二十年代电车刚开始运行时,还得礼让过街的骆驼队,这也是中国人尊重传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吧。这些驼队,大多是跑蒙古买卖的商队。老北京几乎无人不知道安定门外有个外馆,那儿的人专做口外的生意,如果说江苏场州出盐商,苏州出丝绸商,安徽六安出茶商,那么外馆就是专跑口外买卖、做蒙古生意的北京商人的发祥地和聚集区。说到北京商人,只有外馆能称为正宗,其他字号大多是客籍。明清两代商业的繁荣,固然是由于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所造成的,但是沿大运河而北上的南货,由东北地区、热河、张家口南下的北货,在北京相聚集,形成了中转市场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外省的商帮控制着北京市场上绝大部分行当,只有外馆的口外买卖是北京商人所垄断,北京商人、大盛魁和镖局共创了外馆的商业繁荣。

做口外买卖离不开大盛魁和镖局,北京的镖局虽在张家口设有分号或外柜,可是张家口以北,镖局就得依靠大盛魁。大盛魁虽然雄踞塞上草原,可是从张家口南下后又得依靠北京的镖局,两者之间各有自己的天时、地利、人和、各占不同的优势,彼此之间无法互相取代和排斥。合作的范围已经超过了安全方面的互补,还贯通着经济方面的互补——捎、帮、带的共同利益。

北京的镖局大多是靠北道的生意起家,著名的镖师也往往在北道之上成名,不敢走口外镖路的就会被同行小瞧,哂之曰:“没见过什么世面。”镖师告老或改行时一般也是经营大车店、大车行、骡马店,仍然离不开北道和大盛魁。外馆、大盛魁、镖局,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范围已经超出了保镖的业务,贯穿到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方面,这确实值得研究北京地方史、经济史、民族史的学者们给予一定的注意,挖掘其更深的内在联系和内在影响。

镖局与嘎杂子

清代北京城虽为天子辇下的首善之区，可是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嘎杂子闹事官不问，嘎杂子是老北京居民对流氓、地痞、无赖、恶棍之辈的统称，其外延有时延伸得很广。嘎杂子们"闹"的是"事"、"犯"的不是"法"，也可能是由于《大清律》中对嘎杂子们的闹事行为无处罚条例，所以一般情况下嘎杂子们闹事时，民不报官，官也不究问，而是双方自行解决，试举三例，就可以使现在的年轻人对老北京嘎杂子阶层明其大端。

北京从元代起居民的口粮都要依靠南粮北调，特别是清廷移鼎北京后，北京地区一下子增添了十几万携眷驻防的八旗官兵，这些官兵其及家属都是由国家供应口粮的特殊阶层，所谓当兵吃粮，即当兵是义务，吃粮是权利，每年要消耗巨大的"国供粮"。同时北京城又云聚着清廷的众多官员，各级官员均向国家领取俸米，故清政府特别重视"漕运"。每年由漕运总督从南方产粮区沿运河向北京运送大批稻米，这些大米到京后储存在东城的几大仓库中，直到现在北京是城区还有禄米仓、东门仓、海运仓等地名。这些仓库本是国脉所系的紧要之区，应不容许有任何窥测骚扰之举，其实不然，老北京专门有一群"吃仓讹库"的嘎杂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而"太岁"对动土者动十分宽容。如嘎杂子中有一条"硬汉子"铤而走险，躺在仓库大门口不肯起来，叫满载大米的马车从他腿上压过去，闹得观者如堵，交通中断。这时库方就会"依例办理"，叫满载大米的马车从他腿上压过去，如果这位嘎杂子咬住牙关，不吭一声，则承认这条"硬汉子"吃仓讹库得到成功，速派人请上驷院绰班处的御医赶到现场，把压碎的骨头给他对上，打好夹板，送回家中休养，并发给他终身有效的米券，按月领取口粮。御医们医术高超，一般情况下都会使嘎杂子痊愈。如果系粉碎性骨折，使嘎杂子致残，则给两份米券。还有一项更奇怪的规矩——就是从嘎杂子腿上压过去的马车装的是什么米，嘎杂子就按月领取什么米，如果车上装的是高级官员领取的上等俸米，或是皇上享用的"御米"，那么这位嘎杂子真是口福不浅。但嘎杂子如在被压、候医、医治的过程中哼出声来，则众人哂笑而去，诸事一笔勾销，死活均与库方无关。故吃仓讹库者，失败的也不乏其人。在嘎杂子吃仓讹库的过程中，掌管北京行政治安的机关，如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衙门，均不与过问，更不会绳之以法，这种听之任之的方式，不知是由于无法可依呢，还是"率由旧章"，尊重历史前例，实令不不解。

嘎杂子吃仓讹库成功之后，不论致残还是不致残，均洋洋得意，以硬汉子著称，俨然嘎界的知名人物，而且此生不愁吃。

有时嘎杂子数人来到一家饭馆，均是小衣襟短打扮，腰横把带，一副恶棍之相，对跑堂的声称：速备十桌酒席，送到某处，而且要快，否则误了我们兄弟聚会，惟你是问。说罢连连拍桌子敲板凳地催促。跑堂的见事不

妙,赶紧把掌柜的请了出来。按照当时的惯例,凡是叫送酒席的均是酒席送到之后,客家罢宴终席之时,送席的伙计才收拾盘碗,领赏收款。而嘎杂子们叫送酒席的地址,都是南大洼(今陶然亭),天坛东墙等令人闻名生畏的荒僻多事之地,分明是来勒索敲诈。如拒绝这项业务,嘎杂子们就会乘机闹事,大兴问罪之师,闹得营业中断,权衡利弊,掌柜的只好陪笑道:"诸位稍候,小店一时也赶不出十桌酒席,容以他日定行酬办,今天诸位既然来了,先坐下品尝一下小店风味。"说罢连忙吩咐跑堂的安排嘎杂子们入坐,虽不上山珍海味,但也需肥鱼大肉,再加上几斤老白干才能送"客",临走时嘎杂子们还声称:"这顿饭记在账上,明天酒席送到后一总交钱。"

如果饭馆老板向官方报案,无论那个衙门的捕快,都无随叫随到之"理",定会耽误生意,即便马班捕快及时赶到,但嘎杂子们一不抢,二不偷,是在坐催酒席,无犯法之举,说不定报案这一招,不但未驱走私嘎杂子,反而又招来了官嘎杂子(捕快),要赔上几桌肥鱼大肉,才能送"客"。

不同经历的嘎杂子,有不同的招数,有的嘎杂子把一捆芹菜根往药铺柜台上一放,声称是掌柜的托他代购的,共花了四十两银子,今天前来送货收钱。有阅历的伙计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和颜悦色地说:"您来的不巧,掌柜的外出了,下月才能回来,这么大的钱数,柜上也没有,您这货可真是好货,不愁买主,到别处或许还能卖个高价钱,我看您也犯不上等我们掌柜的了。"说罢到柜上给他拿二吊大钱,送"客"了事。如果处理不当,或嘎杂子嫌钱给得太少,就会大骂店家诓了他,一跃跳上柜台,声称:我这根"人身"你们收不收,不要钱,只要管饭就行了,躺在柜台上不起来,闹得坐堂的医生起身告退,买药的顾客纷纷离去。如果店家报了官,这桩官司确不太好打,因为那时既无《合同法》,又无商检局,正好给刑房师爷们有可乘之机,先将原告、被告双方均按"闹事"锁拿到堂。如果掌柜的识相,衙门里上下"打点"一下,店方被锁拿到堂的"闹事犯"(一般是和嘎杂子直接发生冲突的伙计)则当堂开释,如掌柜的不识相,则将双方带枷示众,逼着店方非破费不可。如果掌柜的"打点"时出手大方,也许将嘎杂子责打二十大板,带枷示众七天,要想获得如此结局,不花上一大笔银子那是办不到的。所在碰上嘎杂子闹事,店方决不报官,而是息事宁人,自行了结为上策。

从以上三个事例中,可以看出嘎杂子在老北京的影响和危害,吃仓讹库的对象虽是官方,但那毕竟是十分罕见的事,是嘎界"精英"所为,一般的嘎杂子是没有这种胆量和横劲。中国黑社会有个传统,叫"光棍不斗势力",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和官方作对,如嘎杂子们排着队到官仓门口,依次叫大车从腿上压过去,尽管《大清律》上对此无明款,步军统领大人也不会听之任之,定对闹事者严惩不贷。平民百姓虽然力单可欺,可是油水不大,故嘎杂子闹事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商人。而商界人士为了镇慑嘎杂子们的骚扰,只好求助于镖局,花钱消灾,以保证正常营业。于是大字号、大买卖家就雇用镖师去"坐店";中小商号也合资聘请镖师去"保驾"。受雇的镖师们也搞起了"联防",一旦有嘎杂子依群仗众闹事时,附近"坐店"的镖师也一齐出动。一些中小镖局,由于人力所限,无法在外地趟出"镖路",所以就专门受理京中的坐店业务,八大镖局对京城之内的"坐店"业务也是来者不拒,但不接受赌局、妓院的雇聘,原因是赌局、妓院的老板都不是正经人,和外界发生冲突的原因十分复杂,素重武德和声誉的镖师耻与之为伍,也不参加赌局、妓院的"联防",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好鞋不踩臭狗屎","好汉不沾臊臭气"。所以为妓院"扛岔",给赌局"坐店"的镖局均被排斥在正统镖局之外,"扛岔"的"镖师"也就渐渐演变为"臭靴"(妓院中的职业打手),已不属于镖界的人

了。

镖师坐店如遇嘎杂子前来闹事，也是采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首先是自报“门号”：“在下是小字号××的，朋友既然来了，此处人多杂乱，不便招待，改日到敝号一斟如何？朋友不会不给面子吧！”所报“门号(镖局名称)”越响，对嘎杂子的威慑力量越大，而嘎杂子们一般都没有什么真功夫，又奉信“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名言”，于是来个顺坡溜，抱拳拱手道：“改日必到宝号骚扰。”说罢扬长而去，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要改日到镖局登门比武较量呢，其实他是自找台阶一走了之。因为嘎杂子登门的目的是敲诈勒索一些钱财，不是为了打架，更不是前来寻个高手比武较量。闹事是手段，敲诈勒索才是目的，目的既然达不到，手段也就不必使用了。如嘎杂子自负有两下真功夫，彼此还要盘盘道，各报师传以及所学的套路，这时镖师就要“露一小手”。如伸手拿过一个茶杯，用硬气功攒碎，然后心平气和地说：“这里的茶碗不结实，朋友还是改日到敝号喝茶吧。”如嘎杂子被镇住，则灰溜溜地退去。有时嘎杂子们仗着人多势众，认为好虎不敌群狼，于是镖师只好诉诸武力一战，但镖师的战略是有理、有利、有节，决不扩大战果，更不打追击战。尽管如此，镖师们还是和嘎杂子结成了冤家。

老北京的嘎杂子没有统一的组织，只有一方之霸，如康小八就是他们中间的头面人物。康小八是京东康家营人，从小横行乡里，他的信条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来到北京后，很快就成了嘎界的一方人物，而且声名旧增，手下也聚集了一批人。他的武艺并不超群，但心黑手狠确是过人。康小八有些飞檐走壁的夜行功夫，传闻他在夜间潜入东交民巷的英国公使馆，窃得了英国国王送给光绪皇帝的礼品——两支蓝钢左轮手枪。所谓蓝钢就是枪支的表面镀有一层烧蓝(四氧化三铁)，这种工艺在当时很是罕见，属于兵工界的上乘精品。于是康小八成了双枪将。这段传闻很具传奇色彩，但笔者认为大概不会属实，因为英王赠送大清皇帝的礼品在英国使馆被资，那将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官方会有详细的记载，并见诸报刊和档案材料。也有人认为康小八是一介地地道道地土造嘎杂子，不可能从洋行中购买两支洋造蓝钢左轮手枪随身携带。况且《辛丑条约》签定后，东交民巷使馆区已不归中国政府管辖。英国公使馆被资，英王礼品丢失，和中国当局无关，英国公使只好自认晦气，因为声张出去，中国政府无责，英国使馆丢人。总之，一旦双枪在手，便是如虎添翼，与人相争，动辄开枪射击。走夜道时发现身后有人尾随，疑心被盯梢，于是有意识地放慢了行走速度，缩短了双方的距离，然后突然回首就是一枪，把后面的人撂了，第二天才知道被击毙者是一跛足老翁，系捡破烂为生者。康小八不但没有负疚之感，还得意洋洋地宣称：“那个庙里没有几个屈死鬼，虽然阎王爷没传他，可是康八爷叫他先走些日子，判官也照样得收。”有一次康小八在理发馆刮脸，听理发匠和等候理发的熟人闲谈，二人均大骂康小八“净胡来”、“心黑手狠”、“真不是个玩意”。康刮脸毕问二人曰：“你们认识康小八吗？”二人回答说：“正经人谁认得这东西。”康小八嘿嘿一乐说：“你们既然不认得他老人家，我也不叫你们当糊涂鬼，叫你们见识见识，我就是康八爷。”二人听罢吓得面色如土，跪地求饶，康小八说：“明白了，也晚了，去当个明白鬼罢。”言毕拔出手枪将二人击毙。回头对另一个等候理发的人说：“算你走运，这两个混蛋骂我时你没搭腔，回去给八爷传个话，告诉他们一声，要想多活的，就避避康八爷的字讳。”说罢扬长而去。

康小八及其手下的嘎杂子们横行街市无恶不做，而镖师们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事闹到自己头上时没有不挺身而出之理，所以镖界、嘎界不断地发生冲突。但康小八处世，“混”中有“清”，他知道镖局的人也是腰间

有物(手枪),起码是个“六响炮(左轮手枪),所以心照不宣,谁都“没动真格的”——枪战。但双方都打红了眼,不管是哪个镖局的人,只要和康小八及其手下的人相遇,都会大打出手,恶战一场。

康小八所做所为,早已超出了“民不告、官不究”的范畴,于是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兵马司指挥所属的巡检、捕快、练勇奉命捉拿他。通缉的告示张贴出去后,康小八手下的人如鸟兽散,因为嘎杂子们都奉信“光棍不斗势力(官府)”的原则,谁还跟着他去冒坐大牢、掉脑袋的风险呢。于是这条恶棍“落了单”,后被五城练勇(警察的前身)所捕获,解到顺天府衙门大牢之中,不等秋审,刑部的批文就下来了,在菜市口“身正刑典”,处以剐刑。

关于康小八被捕获的经过其说不一,有人说他的子弹打光了,于是令人畏惧的蓝钢左轮,变成了蓝钢废物,只好弄了两支手冲子防身。所谓的“手冲子”,就是土造的前膛式一响手枪,响过之后要从枪口向枪筒里填火药和铁砂,威力有限,射程不远,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又遇到官方和镖局“联防队”的追捕,被五城练勇堵住后双方展开了枪战,康小八的“手冲子”响了两声后,只好上房逃命,在房上被五城练勇中的高手打翻落地,当场擒获归案。有人说他误杀亲叔,其婶母向官方告密,乘他洗脸时将他捕获。

三四十年代,北京的评书艺人有以说“康小八大闹北京城”为业的人。他们把康小八的劣迹汇编起来加以渲染,很具有传奇色彩,于是康小八的声名大显。其实康小八只是活动于北京外城的一介恶棍,是个标准的亡命徒。但康小八及其手下嘎杂子们的猖獗,使得清末之时镖局的“坐店”业务兴隆一时,从这点上来讲,康小八可谓为镖师们的衣食朋友了。进入二十世纪后,铁路、海运已经畅通,镖局的走镖业务很快的萧条了下来,如不是坐店业务兴旺一时,镖师们恐怕要提前改行。

镖局与绑匪

中国官僚有悠久的历史,民谚有云:"官匪一家",也就是说,有官就有匪。匪字前面常常冠以个"土"字,于是匪就成了土匪。这是由于匪和贼、盗不同,匪是公然呼啸草原,出没山林,安营扎寨,据险固守和官方进行对抗,因而是失去"国家"户籍的"歹人"。匪徒们划分地盘,只能在自己的"盘子"范围内称王称霸,所以世人往往在匪字前加个土字,于是匪就成了土匪,以便于区别户籍尚存,仍以"良民"身份活动于城镇之中的不法之徒。绑匪者,在匪字前面冠以绑字,其行径当然和土匪有所区分。和土匪相比,绑匪做为专用名词,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此以前,土匪、海盗均有"虏获勒赎"的行径。但只是一种做案的补充形式,公开行抢时无所获,于是以"虏获勒赎"为"无所获"的补充。其起源于原始战争中双方交换战俘,或赎回战俘。"虏获"是战场上的一种行为,"勒赎"是战后的补充。

道光十五年(1835 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叶利我妥因阿柔号水手十二人被海盗"虏获勒赎"和两广总督卢坤进行交涉,叶利我妥赴总督衙门的途中,被前去阻拦他进谒总督的清军击倒在地。英方认为外交官受侮,"水手"被"虏获勒赎",决心用武力改变"英国商人"在华的地位。其实中国当局并未接受叶利我妥的委任书,也未承认他为外交官(驻华商务监督)。阿柔号上的"水手"本是鸦片走私贩子,于法应送上断头台。走私贩子和海盗发生了冲突,被"虏获勒赎",实乃"黑吃黑"的纠纷,中国官场上的惯例是不过问黑社会内部之事,故此事不是绑票案,而且文字记载上也未见"票匪"、"绑匪"、"票"、等专有名词。

绑匪的做案手段是绑票。"票"者,强行抓走的人质也。绑匪强行抓走人质后,通知其家属限期"勒赎",如果过期不赎,即行"撕票(杀掉人质)"。所以绑匪又称之为票匪,人质的家属称之为"票属"。土匪的做案方式是公开抢劫,不但路途之中的商旅,村、镇、集、屯中的居民,甚至偏僻地区的中小县城,均能成为其洗劫的对象,洗劫完毕后立即返回其根据地,官兵进剿时或据险固守;或化整为零,逃之夭夭。总之是凭借武力和官方或周旋或对抗。

绑匪是由贼盗发展而成的。活动于大中城市的绑匪是正宗绑匪,活动于村镇的绑匪是土匪的一种兼职行径。因为大中城市总驻有一定数量的军警,城门和通往农村的水陆要道之上均设有关卡、警所,土匪要想持枪公开抢劫是很困难的,只好用绑票的方法做案。村镇中一般无军警驻防,公开抢劫后可迅速撤离,在撤离的途中又无城门、警所、哨卡之类的治安检察机构,很容易返回根据地,所以土匪在乡间的活动以明抢为主,绑票为辅,抢不到时才绑票。

绑匪绑得肉票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存票"。由于绑匪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监狱",所以总得找个既安全又方便的"存票"之所。其

次是“说票”，说票的核心内容是采取适当的方式和“票属”联系，确定赎票的时间、地点、方式、价格。城市中的绑匪经常把“票”存放在农村土匪的山寨中，土匪结寨据险而守，小股官军进剿时遇险难攻，也就只好望洋兴叹。于是慌报军情，声称土匪四散无踪，就班师了。大队官兵进山会剿，声势浩大，沿途之中征粮拉夫，常常是剿匪不成，扰民有余。土匪得知大部队进山的消息后，立即弃寨而逃，化整为零。所以“票”存放在山寨之中很是安全，可是土匪的山寨也不白替绑匪“存票”，“票属”来“赎票”时，交纳的赎金“二一添做五”，各分一半，山东临城抱犊崮就是各路绑匪存票的大本营。抱犊崮地势险峻，四周均是悬崖绝壁，绝壁间有一条羊肠小道，行人能攀登而上，山顶平坦，有几十亩可耕地，并有一个天然储水池。由于大牲口无法攀登石岩，所以要想利用牛来耕种山顶的土地，只有把小牛犊抱上山顶，这就是抱犊崮之名的来源。官兵多次进剿，均未能攻破抱犊崮这个天然要塞，所以匪势十分嚣张。匪首孙美瑶在津浦线上劫客车，绑了十几名“洋票”，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对绑匪无计可施，只好进行招安，于是孙美瑶就抚，荣任少将旅长。孙部下山之后，地方官和一些慈善机关清理抱犊崮的善后事务，由于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官兵围困了抱犊崮多日，所以赎票活动完全终断，各方绑匪寄存在山上的“票”甚多，其中有的“票”是“废票”。所谓“废票”，就是勒赎令发出后无人前来赎票，匪方为了“积阴德”起见，未与“撕票”，来了个废物利用——男票服苦役，女票当众匪的压寨夫人。官兵进剿时又把“废票”摆在阵前当肉障，“废票”受残害的情况实令人发指。

绑匪把“票”寄存在山寨中故然是很安全，可是赎金被土匪分去一半，而且把“票”由城市中运送到山寨里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以北京地区百言，城里的绑票案不多，可是距北京东城只有四十里之遥的通县，却是个绑匪猖獗的地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票”运不出城。因为京师首善之区的五城十六门，均有步军统领衙门、京师警察厅、崇文门关的值勤人员把守，稽查出入城门的车辆和行人，“票”是出不了城的。于是绑匪们想出种种办法在城内“存票”。可是把“票”存在城内的风险很大，一旦被官方查获，绑票的“存票的一律由军方的执法机构立即执行枪决。上海、天津、汉口等商埠之地，华洋杂错，租界之中更是藏污纳垢的场所，所以绑票的案子较多，绑匪们经常把“票”藏在“眼皮底下”，甚至藏在警署对面的小阁楼上，来个“危中求安”。

“票”运不进山寨存票固然有许多困难，赎票时的问题就更为复杂。因为到山寨赎票的手续很简单，土匪们讲“信义”，十分重视为匪之“道”，只要按照勒赎的价码送来现金，即可一手交钱，一手放人。可是“票”藏在城里，交钱和放人的方式就复杂多了。交钱时匪方怕票属届时带着军警前来救票擒匪；票属怕匪方收钱后不放人再行加码，所以双方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匪方在办理赎票手续前都严正地发出警告：“只要发现交接现场有警方人员设伏，立即撕票。”有时匪方在交接现场雇用一个“叫花子”（乞丐）乔装成人质，票属在远处不容易区分出来，这时故意制造些纠纷，诱使警方设伏人员暴露。绑匪进行火力侦察时如发现有警方人员设伏，只要真“票”没有暴露，一般也不会撕票，而是将赎金加倍。票属在办理赎票手续时往往提出先行验票，然后交款，可是验票也是担风险的事，即要验明正身，又不能叫验证人也变成“票”，有时验证人在绑匪的威胁下，被迫发出“验证属实”的信号，所以办理赎票手续时，双方都挖空心思寻求万全之策，都想把交接地点设在自己有优势的地方，于是繁华的闹市，偏僻的山村，戏园子的包箱，澡堂子的雅号都成了交接场所。更有甚者，北洋政府交通部的外客

厅、大饭厅，都让绑匪当过赎票的现场。原因是交通部在北京众多的衙门中人数最多，有八百多名办事员以上的“文官”，其业务管辖范围是铁路、海运、邮政。在各部之中，交通部是不欠薪的单位，而且部机关的排场最大，“堂官”（总长、次长）有上客厅，“司官”（各司司长）有中客厅，大客厅是处级、科级干部（佥事、主事）会客的场所，人来人往经常的高朋满座。茶房（服务员）对待客人一律恭而敬之，目的是图个小费。大饭厅就是公共食堂，总长、次长以下的官员都在大饭厅就餐，大饭厅是纯商业性质的经营，有名厨料理，办得挺有特色。由于饭厅设在衙门里，所以不用纳税，也不会受到“官扰”和“私扰”。于是北洋政府其他衙门的中下级官员往往也到交通部就餐，交通部大门二门均设有双岗，但只要是穿大褂和西装的即可畅通无阻。票匪和票属之所以看中了交通部的客厅和饭厅，是由于双方都认为这里很安全。票属在交通部院内验票，不用担心验票的人也变成“票”，因为大门、二门均设有双岗，绑票的斗胆包天，也不敢在大衙门里绑票。绑匪也把交通部院内视为安全之地，原因是门卫虽然是双重、双岗，可是实为虚设，而且看见汽车、豪华型西洋马车出入，立即敬礼，决不阻拦。交通部院内最简单的赎票方式是票属携带赎金坐在大客厅（或大饭厅）内等候，绑匪雇一辆汽车或高档马车驰入交通部大门，在大客厅（或大饭厅）门前停下来，“票”坐在车内，旁边有绑匪暗中用枪顶着，另一个绑匪走进大客厅（或大饭厅）通知票属到车门口验票交款，验明正身后，一手交钱一手交“票”。然后一个票匪携款登车而逸，另一个则满面笑容地邀请“票”和“票属”进入客厅内休息，或到大饭厅进餐，待“票”和“票属”坐定之后，这个绑匪才离去。“票属”不敢通知警方在交通部院内缉匪的原因是绑匪预先警告说，大饭厅（或大客厅里）都安排了“黑无常”（绑匪的射击手），只要交接现场一发现有警方设伏，“票”和赎票的都休想活着出去。因为按照“民国惩治盗匪条例”，绑票是死罪，遇有警方设伏，现场撕票只是找个垫背的，已犯死罪的人，不怕罪上加罪。

绑匪猖獗的受害对象大多是富有者，而票属大多不向警方报案。票属不报案的原因不止是绑匪发出了报官即撕票的威胁，更主要的原因是报官对于救票来说是有百害无一利。警方经常借救票为名行敲竹杠之实，有时为了报功，就抓说票的严刑逼供。说票的人员很复杂，有的是匪方的外围人员，有的是“票”的亲朋好友，匪方不便和票属直接联系，就通知这些人转告，也有的是地方上爱出风头的好事者……不论说票的人是何种身份，只要说票的一被捕，就说明了票属已经报案，赎票当然无望，所以匪方立即撕票报复。警方还经常在票属交出赎金后，匪方释“票”之时，开枪打死票匪，一者可对外宣称“毙匪破案”；二者可乘机哄抢赎金，来个名利双收。对于“票”的安危，全然不顾。二十年代末期，北京东四十条发生了一起涉及到银行界、京戏界、新闻界知名人士的绑票大案，案情各说不一，似有所隐，本书不便引用，其最后结果是宅主向警方报了案，于是侦缉队包围了现场，当赎金送到时，官匪们红了眼，乱枪并发，把匪和“票”一齐击毙，哄抢了赎金。对外则宣称：“毙匪破案”，把绑匪的头割下来挂在胡同口示众。

东三省本是“胡子”、“马匪”出没之地，后来绑匪又猖獗其间。二十年代奉军几次进关，其兵锋达到长江流域。奉军的总参议杨宇庭号称“小孔明”，此公首创过一条“法令”，此法虽然没有认真执行，但也使票属闻之生畏，因为此法核心内容是：凡是遭绑票之人，一律立即注销户口，由官方宣布死亡，并令家属为之发丧，如有说票、赎票的行为，说票的、赎票的和赎出的“票”一律按通匪论处——就地处决。其“理由”是抓不到绑票的，就毙赎票的，没有人敢赎票了，也就自然没有绑票的

了。在这种法令之下，票属不但不敢报官，而且不敢声张，怕落个通匪的罪名，无奈，只有求助于镖局。

票属求助于镖局有三项目的，一是要求侦破，因为票属难以分辨说票的是真是假。地方上的歹人获悉有人成了票匪的人质时，就会冒充说票的，票属信以为真，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方式交纳了赎金，可是上当受骗了。更有甚者，有时会出现好几起说票的。于是票属只有请镖局来进行侦破，以便确定真伪，镖局此项业务有些类似西方的私人侦探所。票属在去伪存真之后，方能进行赎票谈判，确立双方同意的时间、地点、验票、赎票的方式。二是营救性的，票匪开价太高，票属无力支付赎金，只有和票匪以死相拼，设法救票。三是保卫性的，一般说来，票匪也有“职业道德”，不会伤害赎票的，可是有些黑社会成员专劫赎票的，票匪称其为“黑票的”，绑票的对“黑票的”只要查清之后，千方百计的设法将其除掉，决不会有半点手软，因为大块肥肉焉有狼叼来喂狗之理。可是票匪没有保护赎票的义务，赎票的身携巨款，到指定地点赎票，特别是到土匪的山寨去赎票，途经荒山野岭，难免发生意外。正牌的土匪一般都遵守行规，不会在别人的地盘内干不仗义的事，可是“吃生米的”可不管这一套。“吃生米的”是指未能加入黑社会行业组织的单干户，这些人有的是初出茅庐，和同行尚未挂上钩，有的是艺高人胆大，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准备自立山头，谁的账也不买，逢货则劫，遇香火则受。票属的赎金在未交给票匪之前，当然是谁劫去就是谁的，所以赎票时得请镖师去保驾。

镖局对于各票属侦破性的要求，大多受理，因为镖师都是阅历很深的行家里手，不难甄别真伪说票的。对于救票的要求，镖局则慎重考虑，不敢轻意地承诺。因为镖行的人士最重信义，不诺则矣，一诺千金。对于赎票现场的保卫工作，镖局一般也都受理，因为票匪也有“匪德”，一般不会把验票的、赎票的也变成“票”，如果赎票现场出现“黑票的”，票匪也不会手软，往往形成“绑票的”、“黑票的”以死相拼，镖师则保护着赎票的安全撤离。但镖局不受理赎票现场救票的要求，因为现场救票的结果十中有九是“同归于尽”，而且事后还有许多麻烦，因为镖师一旦暴露了身份，票匪会对镖局进行报复，彼此结下死过结。

镖局对绑匪的方针是预防为主。绑匪再猖獗也不敢在城市中破门而入公然抓走人质，而是暗中物色，一旦确定猎取对象后即因地、因人而宜地制定行动方案，最理想的方案是乘猎取对象外出时巧妙地将其变成“票”。绑匪常用的方式是乔装成赶骡车的车把式或洋车夫，在预定地点等候猎取对象的雇用。只要猎取对象一登上车，自然也就成了“票”。方法可谓既简单又方便。可是中产以上之家均自备有骡车，所以票匪就千方百计地在车把式身上打主意。最常用的方法是换人(车把式)不换车，例如猎取对象外出听戏，归途中绑匪乘着夜色突然窜出，把跨在车辕上的车把式一闷棍打下车来，于是换人不换车的行动宣告成功，车棚里的猎取对象也就自然成了“票”。针对这种情况，份小的镖师在保护对象外出时也就兼任了车把式，或和车把式一右一左均跨坐在车辕木上。正统的镖师自己不嫖不赌，对被保护对象，则明言告之：凡是去宝局(赌场)和妓院，镖师不跟随前往。因为宝局和妓院是是非之地，镖师无法保障嫖客和赌客的人身安全。绑匪和妓女结合起来，可轻而易举地把嫖客变成“票”。特别是街头拉客的暗娼，受雇于绑匪后，把嫖客诱至预定的地点后就直接交给了票匪，所以绑票的获悉猎取对象是好色之徒时则大喜，只要放只“白鸽”，则大功即可告成。对待不嫖不赌，平日深居简出的猎取对象，绑匪只好用“掏被窝”的方式将其变成“票”。所谓“掏被窝”就是入夜后绑匪信逾墙而入，把猎取对象从被窝里掏出来强行架走。所以绑匪们又管

"掏被窝"叫"暗进明出。"所谓暗进就是暗暗地翻墙潜入院内，明出就是把猎取对象强行从大门架出变成"票"。针对这种情况，镖师受雇之后首先把雇主家的狗白天关起来。狗被关了一整天，也就只能睡一整天，晚饭后才把狗放出来，饱饱地喂上一顿。狗白天睡了一整天，晚上又吃足了，所以精神头十足，一旦有生人夜入，自然会惊觉，发现了目标后定会扑咬。镖师听到狗的叫声后即可赶来。此时镖师的腰间之物(手枪)，可不是威慑性的武器了，因为镖师和夜间入户的绑匪绝无"点春"的余地。在黑夜之中枪战，绑匪们门径不清，镖师是地熟人灵，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准能把绑匪击毙。

民国初年绑票的大案很多，不但农村中的土老财常常变成肉票，就是城市中的企业家、银行家有时亦不能幸免，不论何人，一旦变成了"票"，自然是票匪的阶下囚，其结果不外是四种：(一)由家属赎出；(二)被撕票；(三)由镖局救出；(四)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军警当局全力破案，票匪见势不妙，将"票"释放了事。镖局救票都是暗中进行，事成之后绝不宣扬，以免票匪报复，所以翔实可考的救票案传留下的并不多，本书选两例以明大端。

张家口是内外蒙地区和内地商品交易的中转市场，由于蒙族以牛羊肉为主食，所以茶叶是不可缺少的生活必备品。销往寒外之地的茶称为茶砖，是一种紧压茶，状似长方形的砖，用茶树的老叶压制而成。此种茶便于携带，味纯厚浓重，深受内外蒙地区的消费者欢迎。而生产的成本又很低，所以安徽、江苏、浙江的茶商均向张家口地区贩运大批茶砖，然后转销内外蒙地区。许多以贩茶为主体业务的货栈，都在张家口设有分号或外柜。安徽六安是茶叶产区，茶商张广缘专营口外的买卖，以六安为收购点，以北京为大本营，总号称皖源货栈，位于珠市口东街，张家口的分号名为察源货栈。"察"是张家口地区的简称，"察"、"茶"同音，可谓字简意深。张广缘是茶行的行家，由收购、运输到销售形成了一条龙。所以事业上大有"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势。张老板春天在六安居住，以便就近掌握茶叶的采收情况。夏天在北京居住，指挥新茶的运销。秋天时在张家口居住，亲自布署茶砖的批发业务。因为秋季正是牛、马、羊膘满肉肥之时，蒙古商人要在张家口地区出售大批牲畜，换回大批茶砖等物品。由于近年来茶行的竞争颇为激烈，张老板这次张家口之行准备和竞争者一块雌雄，以期威震察绥。所以下车伊始就遍访商界头面人物，"拉场子"，造声势，因而社交特别多。由于"富贵生淫欲"，张老板在商务之余，也不时地寻求一些异乡情调的刺激，故眠花宿柳之事也非偶然。张家口地区的绑匪获悉张总经理莅临的消息后，已是跃跃欲试，又闻总经理是"花间常客"，于是惊喜若狂，遂布下了一张大网。

察源货栈有一辆豪华型骡车，枣木、铜活、花玻璃，辕上的走骡是一匹菊花青，此车在北京也算得上是"入档的"，在张家口地区更是十分惹眼。张总经理莅临后，此车当然是老板的专用车。一日张广缘青楼会友，车把式知道这一进去，不近午夜不会出来。塞外秋寒风硬，所以车把式也走进附近小酒店自寻其乐。三杯酒入肚后和同桌的酒友谈得甚为投缘，于是互相满了几杯，结果是平时海量的车把式酩酊大醉，同桌的"客人"代付了酒钱后，扶着新交的朋友上车而去。进入车棚后两个绑匪就扒了车把式的衣帽和大皮袄，换人不换车的行动也就宣告完成。由于票匪盯了骡车多天，所以车把式伺候总经理上车的规矩完全知晓。当张老板青楼尽兴之后，带着醉意走向了自己的骡车时，"车把式"掀开毡帘扶总经理上车后扬鞭而去。总经理青楼会友，夜宿未归，分号的同仁们也没有介意。第二天一早，车把式慌慌张张跑回来报信说："总经理和车都丢了。"于是大家如梦方醒，一致认为张老板已成了"票"。此时京张

线已经通车,但绑匪绝无携带着“票”乘车南下之理,大家认为此案系马匪所为,张老板已经连人带车远走塞上,若花重金请官方派马队分路追赶,茫茫大草原上如同大海捞针。即便追上了,马匪也会弃车撕票而逃。要是城中绑匪所为,很可能就地存票,张老板说不定就在市区之中,在眼皮子底下。由于谁也拿不定主意,只好电告总号同仁并请少老板速来张家口。第二天早上“察源货栈”大门内发现了一封由门缝塞进来的信。信封是白纸、黑框、红字,懂行的一看,就知道是票匪的“催命单”。信中明言相告,张老板安好,令票属在两个月内凑齐十万块现大洋,赎票的时间、地点、方式另行通知,不准讲价还价。

常跑口外的商人都知道,呼啸草原的马匪也经常进城绑票。马匪绑票的特点是开价大,赎票时间长。原因是马匪的做案方式主要是在荒原草滩上行抢,一旦和商队相遇,车辆、骡马、骆驼及所载运的财物均洗劫一空,进城绑票也不小打小闹,总是物色一条“大鱼”。“大鱼”都不是张家口的土著,票属都在“口内”(指长城以南地区)。马匪和票属联系很不方便,而票属凑齐巨款赶到张家口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在茫茫大草原上,马匪存票很是方便,内地的商人一旦成了“票”,票属根本无法营救,而“票”民无法自行逃跑,因为逃跑的结果不是被马匪轻而易举地追回来,就是丧身狼腹。所以马匪存票不怕夜长梦多。从“催命单”上开价大,赎票时间长来判断,绑张广缘票的准是马匪。马匪们都是价真货实的亡命徒,只要成了马匪的“票”只有按价、按时、按指定地点去赎“票”,决无讲价还价和救票的可能。和马匪办理赎票手续是统一的模式,大草原上一望无际,千米之外一目了然,赎票时各出对等的“杆子手”(神枪手)在后膛步枪的射程外列队排开,票属方面派出一人在中间地带验人、交钱,票匪方面派出一人押着“票”在中间地带验钱、交票。双方验证完毕后,即向本阵发出预定的暗号,然后票方代表领着“票”,匪方代表扛着钱袋,背道走回本阵,人阵后各自扬尘而去。如票属方面企图在验票交款时强行抢“票”,那么验人的、验款的和“票”都会在杆子手枪下作鬼。因为双方的杆子手均在步枪射程之外,而“票”和双方的验证人都步枪射击范围之内。

总号的二掌柜和少爷、侄少爷赶到张家口后,分号的人总算有了点主心骨,因为同车到达的还有盛远镖局的十几名镖师,个个都是肩背九子毛瑟,腰挎二把盒子的杆子手。侄少爷眼皮宽,路子多,认识驻防大境门的一位营长,可以借出一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必要时还可以出动一个连的兵力助阵。具体的营救计划是由镖师充当“票方”的验证人、交款人,十万块现大洋得用好几峰骆驼驮到中间地带,骆驼跪下卸“货”时就成了掩护体,张老板只要进入骆驼障之后,镖师立刻干掉匪方验钱的代表,隐藏在“票方”阵后骡车上的重机枪也同进开枪射击,马克沁式的重机枪的射程和威力均在步枪之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匪方的杆子手,十万块大洋分文也不会少。但此项计划也不是万全之策,因为匪方钱交“票”的代表如果是个老奸巨滑的贯匪,就很可能在验钱之后先把骆驼拉走,然后再释放张老板,所以有的镖师认为这个方案不妥,万全万安之策是等双方验人、验款、交“票”的手续完毕后,张老板进入本阵,重机枪再开火射击,马匪们见事不妙,一定哄抢现大洋,成麻袋的现洋放在马背上,任凭什么样的好马也休想逃出重机枪的火力网。可是马匪也决不是肯吃亏的角,在张老板返回张家口的途中,一定会进行追截报复,所以还得请驻军出来接应。但驻军开出来接应,也是要用现大洋才能请出来的。万一兵大爷又见钱眼红,哄抢由马匪手中抢出来的大洋……

正在众议难决的时候,突然得到了张老板南下的消息,一位由宣化回张家口的同行,在半路上和张老板的豪华型骡车走了个碰头,于是掀开车帘招呼道:“张总经理到宣化

吗?”可是没见张老板搭腔,车把式也没有停车,扬鞭向南疾驰而去。这位同行心里很不高兴,回到张家口后,听说张老板已经变成了“票”,于是赶忙跑到“察源货栈”来报告消息。张老板是连车带人一块被绑走的,骡车南下,老板是南下还是北上,大家一时众议纷纷,拿不定主意,怕骡车南下是个幌子。张广缘好交往,在镖行中有不少朋友,此时够交情的镖师都先后赶到了张家口,这些达官爷都是走南闯北,阅历很深的行家,大家一致认为到大草原上追“票”、抢“票”是不可能的事,因此马匪没有必要用“声南走北”之计做幌子,从马匪活动范围来看,大多是南到张家口为止,不会再从张家口南下,既然骡车在宣化以北地区发现,此案并非马匪所为,张老板可能被“存”在宣化地区,于是众镖师分兵分路进入宣化地区查访。在宣化城东关,镖师们找到了张老板的豪华型骡车,赶车的把式是两个穷孩子,穿戴和豪华型骡车很不配套。镖师借故和这两个半大小子闲聊,这两个孩子由于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所以有点缺心眼,很快就从他们口中得知,上半月他们哥俩在北门外看见了这辆骡车停在道旁,枣木车身通红,车上的铜活锃亮,花玻璃窗,拉车的大青骡子,骠肥体壮,遍身菊花斑,……小哥俩虽是车户出身,可是头次开眼,所以都看呆了。这时赶车的把式拍着大青骡子说:“看上我的车了,算咱们有缘,你们哥俩有福,我们掌柜的老娘生病时,在佛爷面前许了愿,只要老娘病能好,哪个赶车的童男子看上了这套车,就换给他,你们哥俩看上了这套车,是我们掌柜的吉兆。”我们哥俩以为他们是逗笑话,没想到这个车把式一本正经地说:“许了愿就得算数,不算数就得遭灾。”说着就把手中的鞭子扔了过来,喊了声:“接着!”车行的规矩换车先换鞭子,我接住了他扔过来的鞭子,他伸手抢过了我的鞭子说:“还愣着什么,这套车是你俩的啦。”这时他们从车上扶下来一个穿着大氅,戴着礼帽,鼻子上架着一副黑墨镜,嘴上戴着口罩的大掌柜来,还一个劲地向他道喜说:“掌柜的有福,老东家的选化大,刚许上愿,就换成了车……”说着就扶着他们掌柜的上了我俩的破车,赶起来就向南下去了。镖师一听心花怒放,因为穿大氅是人被捆着,戴黑眼镜是镜片里面涂上了墨,戴口罩是嘴里塞着毛巾。阔老变成了“票”之后,大多是这种打扮。看来张老板就在宣化地区。于是当机立断对小哥俩说:“你们哥俩真有福,我们看上你俩这套车了,想用我们这两辆车来换,哥俩一人一套还不好吗,省得娶媳妇分家时捣麻烦。”小哥俩见镖师的两辆车也挺够“份”的,以一套车换两套车也划得来,于是欣然许诺。换车的事定下来后,一名镖师赶着张老板的豪华型回张家口报信,另二名留下的镖师说:“从今天起,我们哥俩雇你们哥俩的车,你们小哥俩分头拉着我俩去找你们原来那辆破骡车,什么时候找到,什么时候算完,车钱一个也不少你们的,吃的更不会亏了嘴。”为了让小哥俩的打扮和车配上套,镖师在宣化城中给他们换了装束,免得照眼,惹人注意。

两名镖师分乘着小哥俩赶的骡车,在宣化地区分头查找了好几天。一天中午在鼓楼前找到了小哥俩原来赶的那辆破车,这辆骡车此时已是旧貌换新颜,车身漆新上色,还加了大铁箍和蓝布棉棚,可是拉车的驴骡还是原来的,所以旧主一眼就认了出来。镖师不动声色暗中盯了下来,发现这辆骡车现宣化西门后就上了通往山西大同的官道,跑了四十余里后在路旁一座小庙前停下来。赶车的搬进去许多食品,但未见有僧人出来接送,明眼的人当即知晓这个车把式和庙里的和尚是一屉。庙前有棵古槐,树下有个石桌和几个供行人休息的石墩。庙的左侧有口水井,井台上的辘轳显然是重新修整过的,为了加固起见,辘轳的两头都加了铁箍,铁箍的材质和小哥俩旧车上新加的铁箍完全一样,从工艺上来看,也是同一匠人所为。小庙不大,前院正殿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正殿后新接出来

了一个狭长的小院，院内有东西厢房各二间，此时镖师心中已经明晓，这座小庙是存票的“窝”。但不能直接进庙观察，以免打草惊蛇。

第二天镖师乔装成携带宝眷的军官，在庙旁歇脚，顺便进庙讨水喝。“军官”穿着大马靴，马靴踏在古殿的方砖地上分外地响，太太见佛烧香，还留下了两块大洋的功德钱，十二三岁的少爷不听话，到处乱跑，在殿后墙的木门上踢了一脚，殿后小院里立即传来了恶狗的叫声，太太立刻喝住儿子“净招人讨厌，还不快走”。于是一家三口和二个护兵上马驱车而去。此镖师已完成了侦察任务，“军官”的马靴踏在方砖地上声响不均，说明地底下有虚有实，定有暗道，殿的后墙加厚，佛像前移，墙内一定是中空，和殿内地下的暗道相连，“太太”跪在佛像前念念有词时，“军官”背着手在殿中徘徊，利用军靴踏地的不同振响声，已摸清了暗道的走向。这条暗道出自中空的后殿墙，由东殿墙下通向殿外，庙的四周均是旷野，土质又十分坚硬，暗道势必不能通得太远，庙左侧的水井一定是暗道的出口。为了保障从暗道中出走时方便，不但把辘辘加固，而且还垂下了一条粗绳，以备应急之用。“小少爷”向殿后墙的木板门上踢了一脚，后院立即传来了狗的叫声，说明后院关着一条长年不见人的恶狗，后院及东西厢房都是后建的，但庙内只有二僧，东西配殿各三间，二人居住已是绰绰有余，穷和尚那来的钱财修无用之房，所以后院一定是存票之外。东厢房中一定有和后殿墙相通的暗道口，后院只有四间房，所以看票的绑匪也有不了几个人，可是后院的具体情况不明晓、越墙救票不论黑夜还是白天，准会惊动恶狗，弄不好就会坏事。众镖师合计之后，决定用敲山震虎，引蛇出洞之计来确保救票的顺利进行。

两天以后，二十几名大兵在两名小军官的率领下押着十余辆大车，车上的麻袋装得满满，其实都是草充起来的，傍晚时从庙前官道上经过，由于天色已黑，就到庙里来投宿。大兵和车把式们共有五十多人，丘八大爷一进庙就吵吵嚷嚷，骂着叫两个僧人快给他们做饭吃。二个僧人好言相劝说：“老总们再向前赶二十几里就有个大镇子，那里有店，小寺实在住不下这么多人，更别说预备饭了。”大兵们听了后又吵又闹，说：“你们两个秃驴不让本老总住，是不是庙里藏着小尼姑，有小尼姑也不要紧，叫出来一块开开心……”说罢就用枪托碰开了正殿后墙的木门。恶狗见来者人多势众，没敢扑上来，退到了院子角汪汪地嚎叫，两个僧人连忙喝住恶狗，说：“老总们不怕后院狭小，就在后院住吧。”丘八大爷嘻皮笑脸地说：“老总们是想看看你们后院藏没藏尼姑。”说罢就闯进了东西厢房，看见屋内桌上有吃剩下的酒肉，于是大做文章，骂两个僧人是“花和尚”，叫“花和尚”快备酒肉伺候老总，没有肉就宰这条狗，再敢慢待连你们这两条秃驴也一同下汤锅……在这种情况下，躲在夹壁墙中的两个看票的见势不妙，赶紧架着“票”由暗道奔水井，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因为东厢房中的丘八大爷只要一搬动靠着后殿墙的木柜，暗道口就会暴露出来，一切均会真相大白。这时守候在井口的六名镖师，三名持枪准备射击，三名手持拍砖，准备上来一个拍一个。在小庙中丘八大爷的叫骂声中，井内传来了壁砖的落水声，辘辘上垂人水中的绳子也拉直了，显然是有人顺着绳子在向上爬，刹那间就由井口钻出了一个穿一身黑的人，镖师乘他低头整理辘辘上的绳子之机，从脑后猛地就是一拍砖，这小子连吭都没吭一声就倒下了。这时井下传来了一个急促而低沉的声音“你这小子快往上拉呀”，于是镖师摇动了辘辘把，拉上来了一个大的台筐，里面装着一个蒙着眼睛，堵着嘴的人，无疑是个“票”。镖师把“票”从抬筐中抱了出来，把绳子又顺了下去，紧跟着从井口又钻出了一个“一身黑”。这回镖师手急了点，还没等这小子迈出井台，就从脑后给了一拍砖，只听“咚”地一声，“一身黑”又从井口掉了下去，

这时井下再也无声了。把“票”的蒙眼打开，嘴里塞着的毛巾掏出来后一看，果然是张总经理。于是留下二名镖师守着井口，四名镖师拥扶着这位总经理走进庙内，两名僧人见真相已经大白，跪地求饶。经审讯后得知，老僧圆寂之后，两个不肖徒儿就和绑匪勾结上了。绑匪之所以看中了这座小庙，一者小庙位于官道旁，存票、取票都很方便；二者小庙是香火地，也供往来旅客歇脚喝茶，绑匪往来不显眼；三者小庙虽是人来人往之地，但乱中有静，同时谁也不会想到官道之旁、佛门之内会有存票之所，于是绑匪出资将小庙略加修整后，加盖了后院，又暗中修建了夹壁墙，凿通了暗道，建成了这座“肉票存放所”。两个“和尚”自称只计日收取“存票费”，绑票、看票、赎票均是绑匪的事，与自己无关。因此也不知道“票”的身份贵贱，赎金多少，只知道绑匪来存票就有钱花，还能跟着混酒肉吃，于是何乐而不为。镖师们商议了一下，认为既然已经乔装了大兵，干脆就装到底，让地方官去了结这个案子。这时天已放明，大队人马保着张总经理回张家口，四名“大兵”把两个“和尚”五花大绑起来，押解到了宣化城关巡警分驻所。这时巡官老爷还未到衙门办公，只有个当班的警长。四名“丘八”高声喧喝道：“你们管界内尽是他妈的绑匪，这两个秃驴是我们团长捉到的，告诉你们署长赶快审问，过几天，我们团长由北京回来还要听口供，要是找不出个头来，别说我们团长不客气。”常言道：“小巡警一身青，不怕别人怕大兵。”当班的警长也不敢多问，于是四名丘八上马扬鞭而去。

张广缘回到张家口后，当天就乘京张线火车回到了北京，镖师们大多同车而归。镖局救票成功后绝不声张。察源货栈对外则宣称是一场误会，张总经理和朋友去大同了，打算合伙办个煤矿，由于事情急，所以临行前没有回柜上交代一声，接电话的老张头耳朵聋，又没有听清，所以造成一场虚惊。察源货栈对外否定张总经理被绑票后由镖局救出来的原因是省得官方来调查事情的经过，捣麻烦。但事过境迁之后，镖局内部还是把事件的过程传了出来，因为露脸的事都愿意在同行面前说说。镖界人士对此案的评论是绑了张广缘这样的“大票”应该存到塞外，别怕和马匪“二一添作五”而且赎票时不能照旧例，因为侄少爷借来的马克沁式重机枪可不是一般杆子手能对付的，但白花花的五万块现大洋落在别人腰包里，谁都心疼。把“票”存在庙里也是个办法，但败就败在张老板的骡车上，这辆车太显眼，应该在张家口城内就来个换人换车，并把张老板的车把式灌了迷魂汤后塞入“豪华型”中，赶出大境门外，叫他有口也说不清。“豪华型”载着张老板南下，半路上被人认出，绑匪想用换车的方法嫁祸给两个傻小子，让小哥俩去当替死鬼，这招太损了点。因为官方发现了“豪华型”，小哥俩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非屈打成招，被就地处决不可，可是鬼使神差，太损了就遭报应，所以绑匪没有把小哥俩的破骡车当柴烧了，把骡子下了汤锅，竟然赶着原来的驴骡，拉着见新加固后的老车进城购买食品，叫小哥俩认了出来，这才轮到盛远镖局露脸。民国初年十万块现大洋是笔吓人的巨款，张广缘是个外场人，既然省了十万元赎金，在盛远镖局的酬金上当然也不会太缩手缩脚，于是“盛远”也发了一笔。总的说来，镖局对于救票这项业务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救票是狼口夺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不论失败还是成功，只要暴露了身份，就和绑匪结上了死过结。但镖行的人又最重义气，老主雇、老熟人出了事后，于情于理又不能不管，所以只好冒风险去救票。但是不论阅历多深的镖师，对救票也是没有绝对的把握。绑匪也有自知之明，对镖局的保护对象一般也不进行猎取，怕偷鸡不成折把米。但绑匪一旦猎取了镖局的保护对象，镖局为了自己的信誉，一定拼死救票，双方的死过结就算结上了。

通州(县)距北京只有四十华里之遥，河

北地区有一京、二卫(天津)、三通州之说,言下之意是保定府、王定府的繁华程度都比不上通州,因为通州不但是京东重镇,而且是京杭大运河的水路码头,运河断航后,通州乃是进京要道。民国时期,通县是拱卫北京的驻军之地,经常是军旅云集,故“县政良好”,在京兆有模范县之称。通县的西关住着一位徐老财,此翁平日颇有员外风度,其实家产也不过是中产之资。徐老员外的长子在保定经商,次子是乡间游手好闲之徒,只知提笼、架鸟、斗蛐蛐,还有吸鸦片烟的嗜好。一日午夜之后土匪逾墙而入,本想把细软洗劫一空,但徐家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到了保定,所以大失所望。于是绑了老员外和孙少爷的票。徐老员外这时已经年逾花甲,孙少爷不足八岁,这下二少爷可慌了手脚,天一亮就跑进北京城找其表兄问计。表少爷在前门外开饭馆,大号叫“兴盛居”,经营中档菜肴,以京东肉饼闻名于城南地区,生意很是红火。由于“兴盛居”附近有好几家镖局,许多镖师都是吃肉饼的常客,久而久之,老主顾和掌柜的也就成了朋友。因为表少爷也练过两天功夫,爱交结武林中的朋友,镖师们在“兴盛居”请客会友时,表少爷往往敬上二个菜,一壶酒,坐下陪着喝两盅,所以在镖界交下了不少朋友。

表兄弟俩见面之后,二少爷只知道哭天抹泪,表少爷也拿不出个主张,立即派店中的伙计请来了几位镖局的朋友。几位镖师听二少爷把昨夜发生的事情说过一通后,得出的结论是:(一)绑匪蒙面,阴阳怪调地说话,很可能是本乡本土的歹人;(二)追找细软延误了很长时间,其目的本是“明火”(抢),抢不到预想的东西才绑票;(三)离开徐家时已是大后半夜,即便附近有车接应,天亮前也走不远,很可能就近存票。由这三点来推测,绑票的大概是乡间的“土造”,叫二少爷回去等说票的。第三天上午,说票的果然来了,这个人是个镇中的游手之徒,和二少爷是熟人,虽无鸦片烟的嗜好,但好喝好赌,整天提笼架鸟,泡过了茶馆歪酒馆。这个说票的自称早上遛鸟回来,在镇外遇见一个生人截住他,叫他给二少爷带封信来。二少爷把信打开一瞧,真是大吃一惊,绑匪漫天开价,就是倾家荡产,也赎不回祖孙二人。于是嚎啕大哭,对说票的道:“我家只是个空架子,把房子和地都卖光了也凑不上这个数,而且房契、田契都在我大哥手里,他在保定的药店赔了本,把田契、房契都押给了银号……信发出去了也不见人回来,准是去江南办货去了,这叫我如何是好。”二少爷的这套说词都是镖师事先教好了的,这个说票的露了面之后,镖师就暗中盯上了他。此人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遛鸟,遛过鸟后上茶馆侃大山,把二少爷和他说的话原封不动地陈述一篇,一连二天都是这样。说票的在茶馆中演讲时,有个身穿蓝布大褂、头顶灰呢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黑墨镜的客人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独自品茗吸烟,仿佛和周围的人顶都不相关。镖师心里明白,这位客人是个“听鸟叫的”。因为说票的大多是绑匪的外围成员,并不认识“受香火的”(绑匪首领),也不知道“票”的存放处,只是按照“舌人”(连络员)的通知和票属接触,并在指定地点“遛嗓子”(公开汇报票属的动态)。所以票属向官方报案,把说票的抓起来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只会造成赎金加倍或撕票的后果。两天之后,徐家大门缝中扔进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先付五百块现大洋,权当老员外的生活费,否则饿死活该。镖师认为可以交这笔钱,先稳住绑匪。于是二少爷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接头地点,干等了半天,没人来收款,见太阳已经偏西,二少爷只好起身离去,快进西关时,迎面走来了二个人,见到二少爷后,亲亲热热地打招呼,二少爷还没有醒过味来,其中一人一把接过了二少爷手中的提包,并把一封信塞到了二少爷的手中,另一人大褂袖口里显示了枪口,命令二少爷不许回头,照直回家去,否则……。这位只知吞云吐雾的瘾士,此时已是吓得半死,心惊胆颤地回到家后打

开信一看，信中严辞责令大少爷速归，大少爷回到家中后，七天之内如数交纳赎金，否则撕票。第二天一早两名镖师也回来了，原来镖师知道绑匪不会在指定的地点受香火(收赎金)，而是在票属一出门就盯上，暗中尾随观察，看看有无“拆庙的”(官方或镖局人员)，如果在指定地点和路途之上都未发现有“拆庙的”，绑匪就在票属归途中“受香火”。两名镖师早就预料到绑匪这一手，就在西关外等候绑匪“受香火”。绑匪“受香火”后，径直进了西门，此时已近关城门的时间，镖师猛然醒悟到，这是绑匪惯用的“切尾巴”之计。于是一人跟随二名绑匪进城，一名盯在西门外。二个绑匪进城后，在离西门不远的一家小茶馆坐了下来，不一会就从茶馆出来了，猛地跳上茶馆门口的两辆自行车，像飞箭一般地直射向西门，在城门关闭前的一刹那飞车出城而去，尾随他们进城的镖师被关在了城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城门的管理上还是承袭清朝旧制——到了时辰就得关城门，不到时辰决不能开，对任何人都是一样，否则就会冲了城隍爷。城隍爷一怒之下，就会放出恶鬼附在违时辰出入城门的人身上做怪。因为关城门之前是“阳官”(县太爷)主“门政”，关城门后是“阴官”(城隍爷)主“门政”，按时辰分权，不可侵越。若遇非常之事，非违时开城不可，要先鸣炮、升伞(县太爷仪仗)然后才能通过。所以这招最灵，别说尾巴是镖师，就是侦缉队也准被切在城内。两名绑匪出城后车速就减慢了下来，好像在争论着什么，从守在城门外的镖师身边经过时，就听见其中一人骂道：“你这小子太没出息，钱刚到手就向窑姐裤裆里塞。”另一个说：“今晚你辛苦一趟，可别骑车去，太招眼，把车放在小凤家。”说着两个人就进了一家暗门子(土娼家)。其中一个绑匪进门后放下车就出来了，镖师盯在他身后，他全然不知，径直到了西关南村，进了村头的一所小院中。镖师施展夜行术飞身上房，看见“受香火”的正在给三名看票的分钱，分过钱后，四个人一同带上面具，进入西厢房内。不一会这四个人拥着一个蒙着双眼的老头子走了出来，由两个人架着在院子里乱转，院子里还设有许多障碍物，四个人连扶带拥地架着老头子攀登，折腾了半天之后才把老头子扶进屋去。镖师未惊动这四名绑匪，飞身下房而归。

二名镖师和二少爷合计了一下，认为既然已经找到了存票处，事不宜迟，今晚就动手救票，但不能报官，因为警察一到，不管人质死活，只管缉匪破案，所以还是自己救票为上策。于是当天就又请来了六名镖师，入夜后包围了南村口的小院，四名镖师在院外“观风”打接应，四名镖师飞身上房。这时三名看票的正在院子里扶着蒙着双眼的老员外乱转，又架又拥地攀越设立的障碍物，折腾够了后，才把老员外扶回西厢房。镖师们虽然都是阅历深、见识广的行家里手，但面对着这出戏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见不一会，三名看票的从西厢房内出来进入北屋酣然入睡，镖师们飞身下房，因而易举地就将三个看票的擒获，把老员外从西厢房中“请”了出来，可是却不见孙少爷。经单独审训后，三个人的口供相同，皆曰：“孙少爷由受香火的用自行车带走，下落不清，大概在三河县。原来也想把老员外用自行车带走，可是怕天亮后不方便，于是临时改变了主意，来个就近存票，两名受香火的每天一大早总有一个人来看一趟。”镖师们认为擒贼要擒王，只有抓住“受香火”的才能找到孙少爷，于是告诫三名小匪，要想活命就得听话，只要抓住“受香火的”，立即释放他们，决不一同送官。天亮后“受香火的”果然按时来到，用暗号叫开门后，问小匪道：“老头子怎样？可别给折腾大发了。”小匪回答：“没事。”“受香火的”见小匪面色不对，突然高声说道：“老乡，真对不住，我走错了门。”小匪正不知所措，镖师已从“受香火的”背后下了他的枪。起初“受香火的”还想抵赖，后来看到人赃俱在，自己身上又有

枪，镖师们又都是行家里手，于是表示愿作君子交易。具体的条件是匪方交出孙少爷和抢去的财物，五百块现大洋也如数交还。票方不报官、不宣场，把此案一笔勾销，并移居到北京城，免得碰头碰脑，从此彻底了结，来个河水不犯井水。双方达成协议后，六名镖师身上揣着二把盒子，分乘二辆骡车押着“受香火的”去三河县接孙少爷，到了地点后一名镖师下车凭着“受香火的”提供的信物，从一家小院中领出了孙少爷，验明正身之后，驱身驰上大道，镖师也就释放了“受香火的”。

徐家祖孙三代在镖师的护卫下进入北京城，下榻：“兴盛居”，表少爷设宴为舅舅压惊，谢众镖师搭救之恩。这时徐老员外才惊魂初定，向大家诉说了自己的历险记。……双眼被蒙着黑布，深一脚浅一脚地不知道走了多远，等到打开蒙眼的黑布后，发现自己在一间布帐子里，帐子外面是什么全然不知，有两个蒙面人给他道惊，劝他进食，说少爷把钱送到，立即送他回家，钱多钱少无所谓。孙少爷也很平安，由于小孩贪玩，安排在别处住了。吃过饭后，拿进了马桶请他方便方便，然后又送来了洗脸水和旱烟袋，一切伺候完了后，两个蒙面人就拿出了凶恶的语调说：“您老人家只要不出这顶帐子，我们保您平安无事，只要把头伸出帐子，可别怪我们不认人。”说罢撤灯而去。此时徐老员外已经疲劳之极，心想听天由命吧，也就安然入睡了。不知是什么时候帐子外面出现了灯光，两个蒙面人又进来请他喝茶、抽旱烟、吃饭、方便、洗脸、洗脚。然后对他说：“今晚要换个地方，把您老送到山里去，反正您老到那也住这顶帐子。”于是拿出了黑布带，在蒙他双眼时还在眼前放置了两个特大的“铜钱”，免得糊坏了眼睛，因为“铜钱”外圆内有方孔，有很好的透气隔离功效。被拥出帐子后，又是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有时山路很险，两边有人架着，后面的人推着他才爬了上去，实在走不动时，看票的就背他一段。好容易才迈进了门坎，等打开蒙眼布后，已经又进入了帐子里。看票的又请他喝茶、吃点心、抽旱烟，最后又让他吃一丸牛黄清心丸，才撤灯离去。老员外偷偷掀起帐子向外看看，只见内外一样黑，好像在阴曹地府里，由于山道走得太多，太累了，所以不久就睡着了。以后天天都是这套格局，最初老员外还听鸡叫计算时间，后来渐渐变得无时间概念，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被镖师救出帐子见到天日。这时镖师才明白两个绑匪在院子里架着老员外“爬山越岭”的原因。此举是个高招，一者使老员外认为自己被带进了深山，绝了逃跑的念头；二者活动老员外的身体，使他好能吃能睡。至于吃牛黄清心丸，是怕老头子一时心火上攻，魂归西天，验票时无法交待。孙少爷的经历比较简单。出门后绑匪威胁他不许哭，把一顶大帽子扣在他头上，于是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又把他抱到自行车的后座上，骑车的人用绳子把他两人的腰捆在一起，向前猛骑，天亮后车骑得慢了下来，把他们腰上的绳子也解开了，进了一个院子后，才把他头上扣的大帽子摘下来。这个院子是个后院，院墙很高，绑匪告诉他说：“别害怕，过几天你爸爸就来接你。”院子里什么人都没有，他只能和猫玩，但一天三顿，吃的还不缺……

众镖师听完这一老一小的叙说后，认为此案的绑匪还是有些阅历的惯犯，惟一的失招是先要了五百元现大洋，暴露了目标，而急要五百元现大洋的直接原因是嫖娼所需，看来身为绑匪，不但不能抽(大烟)最好还不嫖。中国封建社会经常用“女色误国”来评论帝王的得失，没想到评论绑匪时也有“女色误匪”之说，由此看来，“官匪一有”言之不虚。

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东三省易帜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可是由于只热衷于私斗和“江西剿共”，所以社会治安仍无好转，绑票热还在升温，被绑票的人员各阶层均有。蒋介石在武汉设有行营，行营参谋长朱柏林是中将官阶(该人后任福建军管区司令)，可

谓“党国军政大员”，其令尊在老家也竟然成了绑匪的“票”，朱柏林上书蒋介石，痛陈曰：“绑匪自称为通天教主；小民畏之曰扫地魔王。”“通天教主”之意是想绑何人，何人即变成“票”；“扫地魔王”之意是票属为了救票，只有倾家荡产，自行扫地出门。蒋介石见到朱柏林的呈文后很是震怒，下手谕给安徽省军政当局，严令破案。于是官方出动了一个保安旅的兵力，在可能藏票的地区拉大网，挨家挨户地搜查，虽世绅之家、豪强之宅，亦强行入院逐室搜查。凡与“说票的”有牵连的人，通通“扫地”入狱，严刑审讯。绑匪见势不妙，知道此时若是撕票，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偷偷地把朱老太爷送到村口外释放。老太爷进村时恰和一个外出的老友相遇，道惊之后问道：“这些天可犯烟瘾?”此言一出，朱老太爷突然倒地。原来成了“票”后心情紧张，无形之中戒了烟，听此老友一言，前功尽弃，烟瘾大发。

三十年代初期，京东通县地区又发生了一起绑票大案。美国教会所办的潞河中学(现为通县一中)，校址在通县城关，几个学生结伙外出购物过夜未归，第二天下午校方就向警方报案。第三天号房(传达室)收到一封绑匪致校长的信，信中声称失踪的学生现在平安，但已经成“票”，限令校方备款赎票，而且开价惊人。校方认为自己有保护学生义务，地方行政当局有保护学生的责任，于是通过美国驻华使、领馆和华北最高军政当局大办交涉，北平军分会严令通县地区的军政长官限期破案，冀东专员和地方驻军长官们连夜举行了联席会议，周密地安排了搜捕绑匪的行动方案。没想到第二天凌晨几个被绑票的学生平安地回到了学校。原来潞河中学的几个学生是被北平军分会收编的土匪队伍刘黑七绑去。官匪原以为洋学生的家长一定有钱，可勒出一大笔赎金，由于潞河中学的名气很大，在全国范围内招生，报考潞河中学的目的是为了毕业后报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办的协和医学院，被刘黑七绑去的几个学生的家长都在外地，联系不方便，于是官匪就把“勒赎令”送到学校，没想到学校系洋人所办，校方通过美国使、领馆向地方最高军政当局施加压力，北平军分会严令限期破案，刘黑七见势不好，乘着夜色用大车把学生悄悄地送到学校附近释放，于是一场绑票案化为乌有。

从以上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即便是绑匪有眼不识泰山，干了触犯特殊阶层的蠢事，地方军政当局定会全力破案。绑匪本着中国黑社会不斗势力(官方)的传统，不但不敢撕票，还乖乖把人质送回，来个“销案大吉”。至于城乡中产阶级，在不断升温的绑票热中，只有依靠镖行人员来保护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了。所以二十年代初期传统的镖局瓦解之后，在城市中的镖师有许多人成为了和雇主之间纯属直接雇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保镖，还乡谋生或养老的镖师则成为地主老财的护院头领，仍操保镖行业的营生。

镖 客

个体镖师是自由职业者，他的自由度要比镖局、镖户大得多，镖局、镖户属下的镖师，不但要对雇主负责，而且要受镖局、镖户的制约，承担着双重的责任和义务，对雇主来说他是雇聘来的，对本局、本户来说，他们是派遣出去的。

其次是个体镖师既然没有镖局、镖户名下镖师的凭借和依托，所以他们走镖和护院的方式和镖局、镖户也不一样。

再其次是个体镖师的地位和镖局、镖户名下的镖师的地位不同，个体镖师不是雇来的，也不是派来的，而是请来的，对于雇主来说，他们是客，故合则留，不合则去，全凭镖师本人的意志决定。

基于以上原因，个体镖师在走镖时不插镖旗、不声张，而是凭着自己的经验、阅历、胆识和贼匪周旋，因为黑道上的朋友大多也是势利眼，不会买“个体户”的账，而且个体户也不敢轻易地“交朋友”，因为“交上了朋友”也招待不起，弄不好就会落个通匪的罪名。所以个体户去走镖时不会受理大宗的货运买卖，而只承揽一些宝物细软的押运业务。既然个体户不交“朋友”所以只好瞒着“朋友”。瞒天过海、暗渡陈仓、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等招术为其所常用，而且无论武艺和胆识均需高人一筹。个体镖师上路后就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一般多乔装成办案的公差或外出的小军校，因为这些人多少都会几招，真假都能练几下，是不太好惹的主，而黑道上的朋友，又有不斗势力(官方)的传统。况且这些人身上也不会有什么大油水。同时个体镖师上路后没有那么多的框框，更无事先拟定的路单，而是根据途中所观察到的情况随机应变。如道上可能有“打扛子”的，则亲自乔装成脚夫推着小车先行，骡车则相隔半里之遥后随，贼伙当然不会因小失大，为了劫小推车而惊跑大骡车。或是骡车先行，镖师乘马怀揣宝物后随，贼伙们劫骡车时，镖师即策马绕道而逸。因为黑道上的朋友也有行规，不伤不劫车把式(车户)，也忌劫空车。如运送的宝物细软较多，则乔装成运灵柩回原籍安葬的丧主，骡车上拉着一具棺材，棺材内装宝物细软，一路之上白幡招展，缓缓而行贼人一见就觉得晦气，认为劫之不祥，所以一路之上畅通无阻。但贼人也不是傻子，一旦识破之后，焉有不劫之理，所以个体镖师更讲究速战速决，只要一交手，出招就要把贼人打倒，以便立即讲和。在一些匪患颇多的地区，个体镖师还会危中求安，来个昼寝夜行，因为贼匪们绝想不到会有押运宝物夜间行进的人。有时镖师们还恶作剧，乔装成夜游神出巡，如真和贼匪们相逢，则给他个“罩眼雷”。所谓的罩眼雷其实是类似礼花的一种爆炸物，众贼匪对夜游神正在恐惧、狐疑之际，突然一个罩眼雷使他眼花缭乱，以为天神显灵，即跪伏在地，叩头乞生。因为贼匪们不但贼人胆虚，而且贼人胆小，极为迷信，对鬼神的信念极强，镖师正好利用贼匪们作恶多端，惧怕因果报应的心理，

使用罩眼雷戏弄这些恶人一番。当然罩眼雷不能常用,也不是所有的贼匪都会被"罩住"。

清末民初时,个体镖师走镖的几乎没有了,因为在走镖业务上,镖局和镖户不可否认地具有优势。但在护院业务上,个体镖师又占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护院的达官,不论是雇的、聘的、派的、请的,都是为了银子而来,为养家活口而来,一旦出事时,有谁愿意为银子而丧命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镖师和他们的保护对象的关系渐渐地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金钱关系,发展成为道义上的关系,情谊上的关系。总之,镖师和他们的保护对象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归纳起来,个体镖师在和保护对象结合起来之前,不外是武林高手、江湖奇人或退役军官。武林高手、江湖奇人和保护对象的结合往往是道义上的结合。执法如山、为民除害、造福一方的朝廷命官,在国家法律范围之内为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在封建社会里,这样的青天大人太少了,于是物以稀为贵,其人其行也会感动一些武林高手、江湖奇人慕名而来。因为习武者重武德、浪迹江湖者重义气、青天大人重封建道德规范,于是保护者(武林高手、江湖奇人)、被保护者(青天大人)在传统的武德、义气、规范的基础上结合了起来,保护者(这可以称之为镖师了)虽然在经济上依靠被保护者,但不是雇用关系,这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不具有官方性质,所以笔者把保护者也称之为镖师。退役军官与保护对象的结合,往往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二者大多是老上级和老部下,同历戎行,战场上同生共死,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义,一旦老上司官场失意挂冠而去,老部下也愤然退役,追随旧主隐退;或是老部下因故失官,老上司在官场上爱莫能助时,也就把这位亲信部下留在府中以客礼相待,以求他日之用。对于退役军校来说,已不负有保护昔日上司的官方责任,在经济上又依靠昔日上司,二者间虽不是雇用关系,但笔者也把保护者称之为镖师。

封建社会的高官显贵,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时会用重金高价、美酒美女,豢养一些刺客、死士。但这些刺客、死士,不能称之为镖师,因为豢养者与被豢养者的结合是在金钱、美女基础上的结合,被保护者与保护者的结合,是在封建道德规范基础上的结合,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结合起来之时,往往是被保护者的失意之时,保护者在封建道德的感召下,毅然担负起保护被保护者的义务。

在清末民初之际,达官显贵府中的个体镖师甚多,庸庸者不足道也,笔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三人,就其与被保护者的结合与离异简介如下:这三位是福建巡按使汪晓岩的镖师李汝槐、新疆巡抚袁大化的镖师王仙斋、段祺瑞的镖师孙传久(九),这三人分别以武林高手、江湖奇人、退役军官的身份进入镖师的行列,又分别在不同的情况挂镖离去。

汪晓岩,安徽六安人,世家子弟,进士出身,既有家世之荣,又秉科第之贵,所以仕途风顺,但为人恪守封建道德规范,是封建社会的卫道士,正人君子。汪早年指腹为亲,亲家系世交。可是汪夫人出世后不甚聪惠,难当贤内助,汪中举后,女家主动提出退婚,汪执意不肯,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地成了这桩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婚后生男育女,未闻有三妻四妾之举,这在清末民初的官场上确是十分罕见之事。汪晓岩进入仕途后,不久即出掌淮军执法营务处,该职即现代官制中的军法执行总监。当时的淮军官兵都以中兴功臣自居,十分骄横,纪律松弛,骚扰民间实成一害。汪到任后厉行整顿军纪,凡触犯军纪者,有杀无贷。北洋军阀时期曾任参谋总长的张怀芝,系淮军管带(营长)出身,对福州镇守使(后改为督军)李基厚说:"总统派汪晓岩去当巡按使,负有监军之责,你可要当心,老家伙任营务处时,把我们整苦了,他哼一声,是五十军棍;哼二声,是一百军棍;哼三声是就地正法。他一哼哼,我们的腿肚子就转筋,许多

人都想干掉他出口恶气……”

汪晓岩秉公执法，严惩不贷的政策，确实使淮军的骄兵悍将不得不有所收敛，驻军防区的人民受益。但淮军军官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起家的亡命徒，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声称要和汪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看看姓汪的胆是怎么长的。于是汪晓岩几次险遭暗算，幕友们诫之曰：“遇事不可过于认真，积重难返之事，力返之，积怨深也。”有人劝汪暂且告病，躲避一下，汪笑而答曰：“临阵脱逃，杀无贷，临危而逃，岂不同罪乎。”此时一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谒门求见，声称父母双亡，自幼习武，略知文墨，慕大人之名而来，愿追随左右以效犬马之力。汪试之，武功果然不凡，遂慨然许之。幕友们曰：“安知不是欲加害大人的亡命徒所遣。”汪亦笑而答曰：“春秋乱世也，晋贤臣赵氏仍可使刺客愧死于阶下，若彼童子取吾胆而去，是吾德不济也。”幕友们询之来历，自云姓李名汝槐，潜山县人，幼入天柱山拜师习武，仰慕汪的为人，故愿追随左右，以肝胆涂地在所不辞。淮军军官大多是亡命徒出身，没有什么师传和真功夫，李汝槐在他们面前露了几手后，亡命徒也就变成了惜命鬼。

从此以后李汝槐一直追随汪晓岩，其身份既不是下属（未任公职），也不是仆人，只可称之为镖师。民国初年汪任福建巡按使，官职相当于省长，依照清初的旧例，巡按使负监军之责，袁世凯所以取名巡按使，有以文辖武之意也。一日汪忽然接到乃翁家书。告之曰：“白狼（白朗义军）破六安，汪晓岩长子蒙难，媳妇亦为夫殉节而死。汪长子早年赴日学习法政，归国后任黑龙江推事（法官），回六安完婚时遇白朗反袁义军攻破六安县城，为流弹所击毙，新婚夫人吞鸦片烟与夫同归，被救活后又吞金跳楼而死。乃翁书中责汪晓岩曰：“我家乃诗书门第，忠厚传世，不应遭此劫难，想汝在外为官多年，不有遣行，亦有冤案，天理报应……”命汪晓岩立即辞官，闭门思过。汪见乃翁家书后即命秘书长代拆代行，挂冠而去。督军李基厚送川资二万元，汪拿出大半分给幕友，亦与李汝槐二千元。李辞曰：“吾幼年亦小康之家，因被淮军帮统朱开基所欺，家破父母双亡，故入山习武，誓报双亲之仇。后闻大人查清朱开基劣行，将其正法，吾仇已报，本想遁迹空门，但觉得有仇必报，有恩也得必报，遂奔到大人门下，跟随大人多年，大人为官清廉，家无余财，吾自知之，力辞不受。汪强与之，曰：“吾家无余财，亦有薄产，汝无隔月之粮，可持此二千元回籍置几亩水田，盖几间房屋为美生之资。”严词令李不可再推辞。李汝槐曰：“大人厚意，吾持此钱回籍修父母坟墓，周济困饿之乡人，以示大人仁德，然后遁迹空门，亦是报大人之恩也。”后李汝槐在天台山出家为僧，“七七事变”前还健在。

老北京们也许还记得，西四仓颉庙中住着一位王半仙，其人精通医道，性格怪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些特异功能，是位气功师。这位半仙的大号叫王仙斋，无职业、无收入、无家室、独身一人，可是生活上又过得舒适安逸，三教九流之人无所不来往，但谁要是送钱给他，准碰一鼻子灰。京兆尹张广健的长子患病，久治无效，请王半仙过府一诊后，药到病除。张派幕友给这位半仙送去八百块现大洋，半仙严辞拒之。幕友道：“此钱不是谢先生的，是借先生之手，做些好事，施舍些药品以解寒士之病困者。”王厉声曰：“当官的钱来路大多不正，恐寒士骨耿，不但拒收施舍的药品，连我的药方子也不用了。”说罢指着门说：“请你由此出去复命说：“他儿子的病是不该死，该死的病也治不活，以后再害病就是该死，不要再来找我。”王半仙看病不收钱，又无其他济来注源，外间风传他能驱神役鬼，点石成金，所以根本用不着钱。又有人说他是江湖奇人、飞行大侠，夜入宅门，取富济贫。如果两说之中取其一，笔者当然是取信后者。王仙斋虽然被称为半仙，但确实是实实在在

的人——是一位以镖师身份进入北京的江湖奇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新疆省虽远在西陲，也卷入了革命的狂澜，伊犁地区成立了军政府，与迪化（乌鲁木齐）的清王朝新疆巡抚形成了对峙局面。巡抚袁大化鉴于自己已经无力控制新疆的时局，随让位给按察使杨增新，取道星星峡东归。行至甘肃嘉峪关附近时，遇到匪徒的拦截，危难之际，突然从庄稼地中窜出一条汉子，挥舞着锄头，将匪徒打散。袁向其谢救命之恩，来人却曰不足道出，并对袁说："你在新疆任封疆大吏数年，官声还好，我有所耳闻，今见你的行囊，知所闻不虚，你为官尚属清廉，现在兵荒马乱，匪贼遍起，我保你平安进京，不过一路之上，晓行夜宿，你都得听我安排，我也不和你同行。今晚你必须赶到某地住宿，我在那儿等你。"说罢飘然逸去袁大化赶到指定地点后，果然看见自称"不足道也"的壮士已在那里等候。连忙问道："壮士见爱，与我一同进京，总得留个姓名，以便称呼才好"于是"不足道也"笑而答道："王仙斋。"并对袁大化说："你明日起程，途经某地，到某地住宿。"说罢又飘然逸去。路途之上，袁大化发现王仙斋不但武功超群，而且满腹诗书，对沿途山川、河流、历史、人物、风土、民情无所不知，又精通医道，实为饱学之士，随改口不称王仙斋为壮士，而以先生呼之。可是王仙斋从不和袁大化同行、同宿，安排好行程后，就飘然逸去，在指定地点等候。袁大化一路之上按照王仙斋的安排行进，果然平安到达北京。

袁大化到京后任将军府将军，托旧友把王仙斋安排在陆军部任主事，以施展文武全才。王坚决不就职，表示自己不当官，找个谋生吃饭的小差事尚可。于是在陆军部军需司所属的清河织呢厂，当了一名办事员，不久王即去职，在仓颉庙里过起半仙的生活。三十年代初，吴佩孚寓居北京，王仙斋和这位一度"八方风雨会中州"的直系军阀首领谈得颇为投机。吴标榜平生奉行三不主义，即不签定志国条约、不借外债、不进租界，表示自己誓同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和友人唱答的诗词中有"百战愧无国际功"句，后被日本特务医生毒死。一日吴驱车到仓颉庙，邀王仙斋同游颐和园，汽车开出西直门后，王命司机停车，对吴说："我还有些事要在西直门外办一下，你先走，等会颐和园见。"说罢下车而去，吴乘车到达颐和园后，王仙斋已在乐寿堂前等候，吴佩孚及随行人员均大吃一惊。王仙斋从不与人同行，袁大化骑马、吴佩孚乘汽车，可是步行的王半仙都能先行到达，看来这位半仙可能是个飞毛腿，或是自有巧安排，故设虚玄以惊世人。

"七七事变"爆发后，七月二十九日凌晨一时，二十九军军部接到命令由中南海居仁堂转移到西苑，军部参议方仲纯和秘书处周处长所乘之车未到西直门，即得到报告说西直门已经换岗，由警察把守，不放军部人员出城。说"日军就在城外，你们出城是去送死"。副参谋长张克侠即命大家各自隐藏起来，方、周二人随即弃车而去。方仲纯未敢回家，乘着夜色来到西四附近好友陈贯生家中暂避，后闻寓所已被日本宪兵所查抄，私产被封，觉得留居城中决非长计，想取道天津租界，乘外轮南一。陈贯生不以为然，对方说："警界的人大多认识你，你若乘火车去天津，恐怕登不上火车就会被日本人抓去，闲着没事，不妨去和王半仙聊聊，听听他的高论。于是二人步行穿过小巷，来到了仓颉庙。时值秋日，王仙斋所住的小院内大丽花盛开，居室之中古朴高雅，多宝阁上无金玉之器，多为古瓷、青铜、海贝、珊瑚之属，窗明几净。壁上字画，多是扬州八怪手笔。王半仙的衣着打扮，可称得起是土气十足，布鞋、布袜，大五幅的白布上衣，和街上卖柿子的小贩相仿。但黑鞋、白袜、蓝裤、白褂子，均一尘不染，俗中免俗，颇有雅气，使人觉得他绝不是卖柿子的。书案之上墨迹未干，所书系柳诗、柳体，铁划银钩，

真是诗如其字、字如其人,深得柳河东之真意。宾主言入正传之后,王半仙首先问道:“方先生是军界中的人,国难当头,有何打算?”方仲纯答曰:“蒋委员长庐山谈话有云,一旦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打算取道天津,赴南京看看国民政府有何全局安排,再作个人打算。”王听罢忿然作色曰:“何为国民政府?贪污集团罢了。我路过南京时,但见黑气沉沉,劫数大了。”言谈之中,以江浙为偏安之地,颇不耻蒋介石之为人。以为抗日大业,当依靠河朔子弟、关陇健儿。力劝方仲纯勿南下,认为留在北方,才会有用武之地。

王仙斋于五十年代初期,在院子里打水浇花时突然倒地身亡。传闻他遗物之中有致国内外各方面头面人物的书信,传闻难以落实,不敢妄加引用。

以退役军官的身份进入镖师行列的人,以刘传久(九)最有代表性。刘系安徽人,与段祺瑞同乡,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段祺瑞为炮兵管带(营长),刘系段身边的马弁,虽目不识丁,可是武功超群,枪法绝伦。后来段祺瑞扶摇直上,官拜江北提督、第二军军统,俨然成为北洋军中的第一员大将,刘传久(九)也随之荣任营长。可他不善为官,因与标统(团长)发生冲突,触犯了“军纪”,险些被枪毙。因他是段祺瑞的马弁出身,不看僧面看佛面,才留下了一条小命。刘传久(九)被革去军籍后,只好来投老上司段祺瑞,段这时任陆军总长,可是觉得对这位被革去军籍,永不叙用的老部下不太好安排,因为刘的案子影响很大,若马上重任军官,怕有妨视听,于是叫刘暂在私邸中住了下来,成为了一名镖师。

袁世凯窃国后,派军警包围国会,雇用打手组成“公民团”,强迫议员们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宋教仁案件发生后,又挥兵南下,消灭了国民党在南方的实力。北洋军不但控制了湖广,而且兵锋到达了川、黔。袁世凯认为大局已定,要杯酒释兵权了。袁世凯第一个目标就是段祺瑞。因为段的门生、旧部,遍布北洋六镇,有举足轻重之势,而且为人刚愎自用,不好驾御。段企图以陆军总长的身份控制全军政;袁则在总统府内成立了陆海军统率办事处,直接指挥各省督军、各师师长,把陆军部架空,使之成为承上启下的行文机构。这时袁世凯权威正盛,段祺瑞敢怒不敢抗。洪宪的闹剧开场后,段认为时机已到,随称病去职,暗中指挥旧部拥兵自重,对袁的“旨谕”,讲价还价,消极对待。

段称病离职后,袁经常派人去探视,并送去食品、药品,以示关怀。外间传闻段祺瑞的一位姨太太,吃了袁送去的坛煨九斤黄(老母鸡)后中毒身死。其实这是谣传,段家并不缺少佳肴美食,绝犯不上冒着生命危险去吃袁世凯送来的食品,凡是袁送来的食品、药品都倒入了厕所中。在洪宪帝制的时候,段府中确是抬出了一具棺材,对外声称是某姨太病故,因为姨太太大多是从妓院中买来的,位微人轻,死后一埋了之,用不着发丧办事。这是为了遮人耳目,其真相是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夜间潜入段宅,被镖师刘传久开枪击毙。段祺瑞不愿此事声张出去,故命家人将死尸收殓,对外声称某姨太病故,一埋了事。如段家向警方报案,外间一定会认为被击毙的人是袁派来的刺客,一经新闻界渲染,便会添枝加叶,不论死者是否是袁派来的刺客,袁世凯见报后都会恼羞成怒,对段祺瑞更会不利。

直皖战争中皖系战败,段下野后寓居天津日租界,日本天津驻军在段的私宅中为他安装了无线电台,以便段和皖系的督军、师长们直接联系。刘传久知道此事后甚不以为然,认为日本是中国之死敌,亡我之心不死,怎能把小鬼子请到家里来,可见国人责骂段祺瑞为亲日派乃是事实,于是把随身携带的两支驳壳枪留下,只身离去。因为目不

识丁，当然不会有留言，可是老粗有时也会粗中有细，在枪下压了一张学生们所散发的反日宣传画，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也表明了自己来得正大，走得光明。

刘传久走后，无人知其下落，目不识丁，一文不名，只有一身武功，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哪里是这位镖师的路？他又能走向何方？

女 镖 师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保镖男性的职业。在女性刚刚被允许登上表演舞台的二十年代初期,镖局就走完了自己最后的一段路程,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一般人认为中国没有女镖师。其实镖界中确有坤角,只不过没有唱红,鲜为人知罢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官显贵、富商大贾,大多是妻妾成群的好色之辈,虽然金屋藏娇,自认为是艳福非浅,可是多占之,患失之,是最怕"戴绿帽子"的角色,所以不得不严加防范。而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里,各种清规戒律又都被视为理所当然,故凡宅门,均是划地为牢,以垂花门为界,门前为外宅,客厅、客房、外书房、外花厅、大厨房……以及"下人们"所居的住室,均设在外宅。门后是内宅,内宅的小花厅、闺阁、绣楼,是太太、小姐们的天地,是男性的禁区。老爷在没有太太们的陪同下,决不会出现在自己亲生女儿的房间,太太们陪同前往的惟一公干,是探视生病的女儿。少爷们更不会进入姨太太的住室,因为那将有"下烝上报"之嫌。男仆们无事不进二门,如要进入太太小姐们的房间,绝对要事先请丫环、婆子们回一声,如自行闯入,后果将不堪设想。太太小姐们送客,以垂花门为界,不下台阶一步,方符合妇道闺范。

镖师们在宅门中的地位一般是非仆非客,半仆半客。但不论仆客,只要是男性,对主人的宝眷"一律要回避。不但无事不可进入内宅,一旦发生路遇,绝不许争道或并行,要赶快侧目转身,让太太、小姐们先过去。一般情况下,镖师白天在外宅的客房里睡觉,下更后,太太小姐们的住室关门、闭户、下帘子,这时镖师方进入内宅执行勤务。因为内宅不但是藏娇之地,更是储财之所,和外宅相比,更需要加强保护,同时谁也不能保证,下更前,内宅就一定平安无事,说不定贼人还会专门利用下更前镖师不入内宅的时机来做案。可是大人、老爷们又不愿意授给镖师"内宅行走"的权力,因为镖师们都是阳刚豪爽、魁梧伟岸的汉子,老爷们在外是寻花问柳的高手,在家就生怕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怕他的家花被染。

北京城毕竟是畿内腹里之地,首沾王化的礼义之区,不但五城十六门均有重兵驻守,街头巷尾皆设栅栏,晨启夜闭。高官显贵、富商大贾们的官邸私寓又都是高墙环绕,门户森严的洞天福地,又有镖师长住外宅担任警戒和守护,一般情况下,安全还是有保障的。可是一旦大人"外放"(出任地方官)或老爷外出经商,情况可就不同了。不但路途之上缺少安全感,而且到达任所或经商地后,也难免时运不佳,碰上个不太平之区,使大人老爷们对内宅中的宝眷、宝物,实不放心。既然叫女人看管宝物,何不再找些会武功的女人来看护宝眷。在这种情况下,女镖师应时而出了。

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女性,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为守妇道。小门小户的良家女子也以"不依门倚户"为"知闺德",甚至于村姑

也把“至老何曾识别村”当做本份。所谓家教，上层是“请安行礼，女红针绣”，民间是“上炕一把剪子(做衣服)，下炕一把铲子(做饭炒菜)”，略知文墨者已经不多，通晓武功拳脚者更是罕见了。即便是习武世家中的女性，能习武知勇，也是少见。因为汉族妇女，大多是小脚，以三寸金莲为美，女性一旦失去天足，形如半个残废，走路尚且不稳，何况习武尚勇。小说中的十三妹、吕四娘，是缠足女性，但还会飞檐走壁，那毕竟是小说。汉族妇女，能天足习武者，只有江湖艺人之女。而少数民族中的女性，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相对而言比汉族妇女要解放和开放，知鞍马、通弓箭、习武尚勇者不乏其人，所以宅门物色女镖师，只能是习武世家之女、江湖艺人之女和少数民族的姑娘。

习武世家往往有一定的影响和声望，若想请其家族中的女性到宅门中来充当镖师，要登门邀请、重金相聘，一旦成约，进入宅门后有客卿之地位，太太、小姐们要依礼相待，虽无西宾(教书先生)之尊，但享为客之重。所以宅门主人往往买几个大脚丫头，伺候女镖师，并跟她习武约满之后也就礼而送之。由大脚丫头中培养出来的女镖师当然不能受她师傅的地位，但是晋升镖师以后，和其他的下房之女总会有所区别。江湖艺人之女和少数民族的女性，虽然进入宅门的渠道有所不同，但地位相近，都处于非仆非客的地位上，说她是仆吧，不干伺候人的差事；说她是客吧，又是雇来的，甚至是买来的，但买来的也不能狎之，因为她毕竟有一身好功夫，还指着她来护院，以保证“宝眷”、“宝物”的平安。

女镖师的职责是守护内宅，确保“宝眷”“宝物”的安全，由于职责所系，所以在饮食起居的待遇上大体和男镖师相同。他们的住室一般设在垂花门内的厢房之中，这种安排不仅为了就的守护二门，而且还有监视男仆、男佣们出入二门之意。太太、小姐们外出，女镖师同车护卫而行，即便是会亲访友，女镖师跟着进垂花门，升堂入室，也算不上失礼，从这点上来看，倒颇有些尊重女性之意了。

女镖师和男镖师虽然同居一院之中，但划门而守，大有分庭抗礼之势。因为凡有女镖师的宅门，男镖师则不许登垂花门的台阶，而女镖师也颇知自重，模仿小姐、太太们不逾二门一步。男女镖师们本应具有的协同关系，却仿佛根本不存在，更不用说同是武林中的人士，在一起切磋技艺了。因为宅门中的男女绝不会平等，老爷和太太不会平等；少爷和少奶奶不会平等；小姐和姑老爷不会平等。所以男女镖师之间也不会平等。扭曲的社会，把一切都扭曲了。男尊女卑的习惯势力使男镖师自尊，不把女镖师视为同道；女镖师自重、自爱，不与男镖师往来。但是透过这种自重、自爱，实是一种自卑，是封建社会里女性的悲剧。

在中国近代史上，能留下文字记载的镖师恐怕不多。留下文字记载的女镖师更为稀少，有一位只留下事迹，未留下姓名、籍贯、民族的女镖师，这位女镖师实为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一曲挽歌。

清末，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赵系正蓝旗汉军，举人出身，受过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是个忠实的卫道士，但又是个务实派、实干家。他在川边使用铁腕政策推行改土归流，同时修建了由成都到昌都的驿道，准备经略西陲，在西藏推行“新政”。实施这些措施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加强清政府在川滇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但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英、俄、法三国都在觊觎藏滇地区，企图染指。实行改土归流打击了割据势力，有利于加强祖国的统一。土司们为了保卫自己的世袭王国，群起反对，赵则用铁腕治之，发兵平定。

在赵尔丰经略川滇的过程中，在他身边出现了一位少数民族的女性，旧时的文字记载多称其为蛮女或蛮丫头，她的民族已不可考，有人认为是藏族，但是笔者认为不妥，因

为清末之时，藏族女性被称之为蕃女。她也没有留下姓名，至于她的身世和来到赵尔丰身边的因由，有两种说法：一是这位蛮女是一个勇敢的女性，因为不能容忍主人不轨的企图，起而反抗后，逃出土司城堡，被抓回后来，主人将对她处以极刑。恰遇赵尔丰巡视到该地，赵认为既然已经改土归流，土司和蛮女均是大清子民，同沐王化，均受《大清律》保护，所以对土司绳之以法，搭救了蛮女的性命；二是这位蛮女原是一位土司的掌上名珠，在土司们找冤家的战斗中其父被杀，家庭被毁，该女为报杀父之仇、灭家之根，投到赵尔丰门下，为民请命，力促赵氏实行改土归流，后又协助平定土司暴乱，为其父报了仇，为家庭雪了恨。两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赵尔丰是她的恩人。由于蛮女性格刚烈，英勇善战，赵对她颇另眼相看，叫身边卫士教她枪法，把她培养成能双手持枪射击的女镖师，保卫自己的内宅。

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后，这位女镖师跟随他一同来到成都。1911 年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成都各界群众云集总督府门前请愿，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打伤请愿群众二百余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四川也宣布独立，建立了军政府。军政府经过人事变迁，由新军中的实力人物尹昌衡出任了督都。可是赵尔丰仍然拥有一定的实力，巡防营还听他调遣，他命十营巡防营部队开入成都，拱卫他的总督府，俨然要同军政府分庭抗礼。赵尔丰如此不识时务，是由于他的封建正统意识的影响，总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同时也是由于他接到了袁世凯的密电，叫他“暂留成都，静观其变”，还企图东山再起，重掌蜀政。“政不出两门，地不存二主”。年轻气盛的尹昌衡，当然不能容许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于是利用自己是赵尔丰之兄赵尔巽的旧部的身份，向赵尔丰递门生帖子，亲自登门密访，向赵尔丰表示自己和赵家的渊源甚深，在时局动荡之际，谁也不能预卜未来，如民国开基，则有尹保证赵的安全，如大清中兴，则请赵保证尹的安全。于是二人执手定盟，指天立誓，定立了互保密约。尹乘机进一步向赵进言：十营巡防营驻扎在成都，造成军政府内部对他的压力，很不好应付，希望赵能下个手令给巡防营统领，令巡防营部队归军政府节制，反正这十营官兵都是大帅的亲信官兵，归谁节制都是大帅的卫队。赵认为言之有理，所以就慨然同意了尹的要求。尹接管了这支部队后，立刻用重金收买了主要的军官，把赵尔丰变成了光杆总督。尹昌衡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即令军政府警卫标(团)标统(团长)陶译坤去执行逮捕赵尔丰的任务。陶砂是巡防营管带(营长)，系赵尔丰早年的侍卫出身。故对总督府内的门径十分熟悉，破门而入后，带兵直扑内宅，赵的随身兵弁们未做抵抗，如鸟兽散，当陶泽坤进入总督衙门的寝院时，才遇到蛮女的抵抗。这位女镖师手持双枪，拼死守护赵尔丰的寝室，但寡不敌众，当场被击毙，躺在病榻上的赵尔丰在束手被擒。

赵尔丰解到军政府，当众斩首示众后，成为轰动全川的新闻，一时街谈巷议，妇孺皆知，但新闻很快就成了旧闻，赵尔丰也就成为了历史的陈迹，而蛮丫头的身世和以身殉职的事迹却久传不衰，不但当时许多文人为之写下了凄楚哀惋的祭文和挽联，事后一些评书艺人又把她的身世和封建社会中巾帼所少有的坚勇和刚烈编成评书段子来演说。人们听罢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上，或是赞叹，或是惋惜，四川人在茶馆摆龙门阵时，也经常以这位女镖师为话题。无论人们怎样评说，她的一生实是一曲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挽歌。她以惊人的勇敢冲出了牢笼，却又自觉自愿地带上了桎梏，最终还是勇敢地成为了封建社会祭坛上的牺牲品。

镖 师 生 涯

清代的最高统治者鉴于鳌拜专擅、三藩割据之祸，深知武人一旦大权在握是十分不好控制的，所以全国平定后，为了确保大清的一统江山，实行了一套重文轻武，以文辖武的政策。在官制上，武官的品位高，可是受品位低的文官节制。以封疆大吏而言，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提督的官阶为从一品，可是要受官阶为正二品的总督、从二品的巡抚节制，因公晋见时要执下属之礼，最多是来个“软进硬出”。清代官场上的礼仪是本官不外出，上司不莅临，衙署正门是关闭着的，下属进见一律走旁门出入。提督拜谒督、抚时也按属员之礼，但提督毕竟是一品大员，所以告退时督、抚开中门送客。武官自请转授文职，降级录用是皇上的恩典。雍正时发生了一起总兵和学政的纠纷，学政认为自己是钦差官，对总兵进行指令，总兵认为自己是皇上钦命的二品大员，不是举业考生，在官制上无听学政调遣之礼。学政吃了苦头后，诉之于皇上，雍正竟然变更官制，凡各省学政一律加提督衔。学政一般都是进士的外差，按原官品级赴任，职责是主管、举人的考试，加提督衔后俨然一省军官的上司。其重文抑武，以文辖武之意昭然若揭。在这种皇权思想的指导下，读书人的地位当然远远高于习武者。因为读书人读圣贤之书，明中庸之道，大多是封建社会的卫道士，一生不遇，至多以诗文自怜自叹，终会安贫乐业。习武者持力尚勇，如不被皇家所用，会铤而走险，以武犯禁，甚至亡命山泽，聚众造反。因此以军功起家的提、镇大员之后，绝大部分都弃武习文，改换门庭，走上了科举仕子之途。左宗棠中举人后在骆秉章门下作幕，一日和总兵官樊某相遇，左责问樊为何不与他见礼，樊答曰：“朝廷定制，有二品实缺大员给举人请安之例吗?”左听罢大怒，即打了樊两个嘴巴，樊没还手，告到朝廷，企图以“欧打朝廷命官”之罪，办左一个“犯上凌长”，置之于死地。没想到这场官司不了了之，樊一气之下辞官还乡，闭门课子，发誓要改换门庭，叫儿子给他争口气，中个进士，压左宗棠这个举人一头。后来樊总兵之子果然中进士，这位进士就是清末大儒樊樊山。

从民间来讲，“耕读继世之家”，也远远胜于“习武长久之门”。在地方官眼里，读书人知书达理，安分守法，是一介良民，习武者尚勇好斗，任侠持力，难免不生祸患。读书人集会讲学是明孔孟之道，教化乡里；习武人结社练功是谋图不轨，恐生奸妄。民间的上层社会里，也是习武者日稀，人们往往把习武和闯江湖联系起来，把练功和以力欺人相等语。镖师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习武者。长工、雇农身不由已，不便习武；整日为温饱奔命的贫农恐怕也无暇练功；上层社会不以子弟习武练功为正途；所以习武练功者除了武林世家外，就是小康之家的子弟。武林世家虽然不能和诗书旺族相比，但只要家道不衰，其子弟终归是世家子，成与不成，均

可在家中习武练功，奔武举、武进士的前程。小康人家只要“三十亩地一头牛，一套大车乐悠悠”的生活仍然存在，就不会干起镖师灾流血的行当来。当习武世家中衰、小康人家破败后，子弟们不甘半温半饱的务农生活，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又无军可投，何况我国有传统的“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说法，又由于家世所系，受封建正统的教育和影响较深，又不会聚啸山林，亡命草泽，于是就走上了当达官的道路。

当个保镖的达官，虽然冒着流血的风险，但也不是个容易的事。首先要有个好的身子骨和真功夫，镖局招徒弟伙计和官方招兵可不同，招兵时拍拍脑袋算一个，不够数就强行抓壮丁，进镖局要家世清白，师承有序，还要有三户铺保，证明所言不虚后方能进镖局的门坎。

开镖局的不会是达官显贵，也不会是地主老财，大多数的镖局是由习武朋友们自带武器、马匹组建起来的，柜房是租来的，朋友们按照武功高低、能力大小计算人力股，掌柜的是公推的，没有只出资不出力，坐等年终分利的股东，这是由镖局这种企业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首先镖局几乎是无本的买卖，其次是镖局的业务范围、业务能力、业务收入和从业人员的多少成正比，走镖、护院、坐店、坐夜、保护库丁都要一个萝卜顶一个坑，要实打实地去干，没有什么生意经和鬼花活，买卖做大了，就得添人，添人就得添开支，不会有太大的赢利，一旦丢了镖还得照价赔偿。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有钱的人不会去开镖局，富翁们也不会入股来当股东，当了多年掌柜的也发不了大财，保了一辈子镖也置不了几顷地，混不上一个小地主。

一般的镖师每月挣四、五两银子，武艺高强、德高望重的老达官，每月可挣到七两二钱银子。入镖局就领工资，学徒也是一样，未出师也能挣上二三两，柜上不但管吃，有时还发镖服，特别是冬装。清末光绪年间六品京官的年俸是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九品三十三两，外加俸米和冰碳。粗看起来镖师确是高薪阶层，一般镖师的工资和六品京官不相上下，刚进门的小学徒也顶得上一个刚入流的九品官，其实不然，清代的各级官员都不靠俸银过活，外官刮地皮，京官靠外官调济和吃孝敬，从一些杂谈日记来看，清末的穷京官年开支都不下几百两银子，都有私人的骡车，交游应酬的花销都不是小数目，没有个千八百的银子下不来。民元之后镖师的收入没有增加，把银两折合成现大洋，镖师的月收入在十元和四元之间。可是当时立立小学的教师月薪二十多元，京汉铁路局的办事员的月薪三十多元，各部主事在清朝也就是个六品京官，但月薪可达二百元上下，部里的科长月薪总得近三百元。镖师的经济收入表面上没有动，实际上在下降，但也没有下降到贫困线之下，因为民元时一个巡警月薪是四块大洋，巡警也是公家管饭，但没有镖局吃得好。

镖师的经济收入除了月薪之外，年终还有分红。分红的银子能有多少不太好说，首先要看这一年买卖如何，其次要看是否是打头的，有无人力股，总的来说由于平时开销大，年终分红时不会有大数，一般的镖师也就分个十两上下。护送官员上任，平安到达之后，大人高兴，每人赏个十两二十两的就是大数的外快，坐店、坐夜、护院的达官们，每到年终时，雇主也总得赏个三两五两的，若能到十两那就是大手笔了。一般说来镖师的年收入多的可达一百多两银子，少的也能五六十两。

镖师们的家庭绝大多数在农村，自己出来保镖，家中就少了一个壮劳动力，所以达官们逢年按节都得住家里捎钱以赡养妻儿老小，同时也得想方设法存点钱置几亩地，以便归老时有个依靠。镖师的工作是外向型的工作，身上的衣着，就是工作服，要不穿得体面一些，容易叫人看小了，所以镖服虽说不上豪

华,但也接近于阔绰,特别是坐店、护院的达官们,衣、帽、鞋、裤,总得和周周环境协调起来,再加上魁梧的身躯,轩昂的气宇,才能显示出镖师的风度和威慑的气派。在大字号、大宅门里坐店、护院的镖师都是冬夏绸,干净、利落、洒脱,所以服装费花去不少钱。镖师们一年四季都在外面闯荡,自然是路子广、朋友多,可是朋友多,应酬开销也就多,镖师们的银子确在饭馆、酒馆、茶馆中花去了不少。世人见镖师们出行则骑走马、乘骡车,衣帽比较阔绰,性格豪爽大方,又是酒楼茶舍的常客,所以误认为镖师是富有阶层,其实顶天也就是一百多两银子的年收入。

镖师们都有口福,不论走到哪里都吃得好,雇主都得管饭。镖局柜上的伙食,肥鱼大肉不常见,可是大米白面是有保障的,猪头、猪蹄、牛羊下水是餐桌上的常物。一般的商店开饭时分三桌,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内柜(财房先生)、外柜(跑外的业务员)是吃小灶;伙计们吃中灶;徒弟们吃大灶。镖局上上一下下的饭可是一个锅里出来的,不分等级,这是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一旦出了事,大家都得拼命,所以吃饭时也就得吃一锅饭。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年高望重的老达官刚进门的小学徒,在工资收入上也就差个一倍左右。从这点上来看,镖局是颇有些平均主义色彩。

镖局在组建过程中大多是合伙关系,几个习武练功过程中交结的好友或师兄弟,各自带着徒弟、武器、马匹,创办了一个镖局。镖局的发展过程中确是人的因素第一,因为走镖、坐店、坐夜、护院,靠得全是人。若众人不抱成一团,患难与共,一旦出了事,“能人”、“精英”一手,“能人”非见阎王去不可,“精英”也是没有单挑的能力,众人要是都看“能人”、“精英”也非成鬼雄不可。况且大这都是师兄、师弟、师徒的关系,遇险时当师傅的总是挺身而出,当徒弟的也是当仁不让,生死与共,结成了铁血情义,所以大家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讲情重义。镖局的组织原则既不像一般企业那样是单纯的雇佣关系;也不像军队、衙门那样是固定的上下级关系;所以镖局不像商号那样设立了种种规章制度、奖惩条例,也不像军队和衙门那样官大一级压死人,层层管辖,礼节繁多,等级森严。一个锅里吃饭,使镖师们好像都是一个家庭的成员;血铁之灾中生死与共,使镖师们如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可是镖局既不是家庭,也不是军队,而是企业。

由于镖局业务的特殊性,所以从业人员都是终身制,只要不亏德坏,规就不会被解雇。镖局有添人的时候,有散伙的时候,却没有裁人的时候。镖行的规矩是只有伙辞东,没有东辞伙,全局公议亏德坏规者的劣迹后,该人也就灰溜溜地离去,明晓事理的不待公议也就自行卷铺盖。镖局的生意兴旺时,大家多分红,买卖不济时少分红,到撑不住门面的时候,吃散伙面——关门。也就是说:“宁碰饭锅,不摔饭碗,全体成员,共存共荣,可称得起是“终身制的铁饭碗”。所以镖局都是进门难,对从业人员要严加审查,不但要考核武功、人品,还要调查家世、师传,一切合格后还要有三家铺保,才能成为“柜上”的正式成员。一旦端上铁饭碗后,镖师们当然珍惜它。所以镖局不景气时,镖师们都能同心协力地共度难关,很少发生伙计辞东家的现象,即便是有想裂锅的,也得先搁搁,等“过了罗锅子上山的节骨眼再说”,免得让大家笑话他不仗义。有想另谋高就或自行开业立字号的也是明人不做暗事,好来好散,决不挖墙角,讲究自己另闯一个新局面。

镖师因伤致残,家中无人的就在柜上供养,老家有人愿意还乡的,柜上花钱给他置上十来亩地,送上一头骡子、一匹马、一辆大车,好友们再帮他凑上一二百两银子送他回乡退养。镖局退役下来的骡马,走镖是差点劲,干庄稼活还是很顶用的好牲口,所以因伤致残的人还乡后也不会饥寒至身。

镖师以身殉职的，镖行负责厚葬，送灵柩还乡后，给遗属置上十几亩地，送上一辆大车和二头牲口。家中如有兄弟子侄愿意吃镖行这碗饭的，镖局也都挑一个收下，不是镖师的材料，就在柜上干点杂活。

有的行业不怕老，如教馆的先生、看病的医生，都是越老越有经验，只要走得动就能干。可是保镖的行当就不行了，四十多岁就算老镖师了，年过五十，干起来就力不从心了。年老的镖师大多不外出了，有本事的支应人分号，或者掌个外柜，一般的人也得在柜上再干几年，帮着支应支应，料理料理，老马识途，指点指点后辈，出出主意，当个主心骨，无家可归的老镖师就在柜上养老送终了。中国人有落叶归根的习惯，没有儿子的，有个侄子也要回老家去度过余年，所以镖师们对自己归养之路一般都早有安排，好歹都能置下十来亩地，走镖常年累月地和骡马打交道，所以都识货，特别是走北道的镖师经常从口外捎回物美价廉的好牲口来，几两银子就能闹上一匹，调训好了送回老家去拉车犁地，所以镖师告老前总能混个上中农。镖师告老时，柜上照例送一辆大车、一头骡子、一匹马，当时的大车都是木轮大车，值不了几个钱，镖局退役的骡马也还能再用一气，柜上派人送老镖师还乡，也是捎带脚的事，但在乡人眼看来，可真是衣锦还乡了，多少有些羡慕之情。可是老达官心里是酸溜溜的，因为骑走马、坐骡车、夏绸冬皮、大米白面、大碗肉、大碗酒的时代逝去了，人老还乡，等待他的是土屋土炕，贴饼子窝头。在外闯荡了一辈子，白刀子见过红，死里逃生，多少惊涛骇浪，多少艰难险阻他都闯过来了，现在总算平平安安地回乡了，回想起那长眠在镖路上的好友，他多少又有一丝满足和宽慰，但这一丝满足和宽慰，却远远赶不走浓郁的悲凉和怅惘。

一些上层镖师，由于“吃大股”，或当上了掌柜的，所以积下了较多的银子，或是工于心计，看得多了后，也搞起了捎、帮、带，发了点小财，告老还乡时蒙中能置上了上百亩地，当上了小地主，并且盖上了新瓦房，开了磨房、油坊、粮店等相关企业，日子过得挺火红，大有家道中兴的气派，但这是百里无一的镖界幸运儿。

镖师中也确有改行的。因为走镖的过程中和商界人士接触的比较多，走南闯北的眼界也宽了，逐渐掌握了各地区的商品差价，开始做起买卖了。镖师们做买卖大多从贩卖骡马开始，内外蒙均盛产牛马，秋肥后牧民们把将要出售的牲口赶到绥远、张家口等交易市场出售，价格比内地贱许多，镖师们常年在外走镖，懂得骡马的习性，挑骡子相马是不会打眼的，开始是走北道镖时给柜上和亲朋友们搞捎、帮、带，后来渐成副业，以至发展到喧宾夺主，当起马贩子来。镖师们走镖离不开骡马，经达官爷调训出来的大走骡，压出来的好走马骑起来稳当舒适，闹好了一匹能赚上个百八十两的银子，快赶上保镖一年的收入，于是在北道上的镖路趟开后，商情也就明晓了，有的镖师就活动了心眼，和柜上好离好散，当上了马贩子，把口外的骡马贩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出售，并在家乡地区开大车店，接待过往的商旅。贩马、开大车店和走镖可以说是相关的活动，互相服务、互相促进，镖师改行后和原来的同仁们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也不会骂他不仗义，一般都能继续合作。

沿运河走水镖的达官们，对江南的丝、茶，行情了如指掌，北京是茶叶、丝绸的消费地，也是中转市场，一些走南道的镖师改行从商后把大宗的茶叶、丝绸运到北京，卖给跑北道的老朋友运到张家口、绥远等地销售，长途贩运中确可以赚些大钱，等到买卖做大了后，又找原来的同仁给他保镖，所以说改行后的镖师大多能同原来的伙伴继续合作。

清代盛行清明节献新茶的习俗，京中王公勋戚、达官显贵、富商大贾们讲究品尝“江南春色”。所谓“江南春色”就是谷雨前采摘的新茶。鲜、嫩、新、清，品之春意盎口，故称

之为“江南春色”，俗称为雨前茶，即谷雨前采摘的茶。茶商们以小锡瓶贮茶数两，外贴红签曰“马上春色”。因为雨前茶是飞马接力运到北京的，所以价格昂贵。清明节前一天送到宅门府第的“马上春色”，一小坛价钱高达百八十两银子。清明后三于内运到北京的雨前茶每斤价五十两银子，再过几天后就跌到了二三两银子。一位姓杨的镖师，改行贩茶后，专门跑“马上春色”，由于他的道路熟，沿途各站衔接得紧凑，不会发生耽搁，所以号称为“马上杨”。杨记茶庄的“江南春色”准是第一家到京，故能卖出大价钱来。他的茶庄前有幅对联，“马上扬春色，杯中潜碧龙”。杨扬协音，龙指“龙井”，碧是“碧螺春”，两者都是江浙名茶，对得虽不甚工，可是很中肯。

俗语说无商不富，镖师改行从商后固然有富起来的，但败了的也不少，因为习武之人重德讲义，守信笃情，善于武战，不习商斗，在商海风波中略有闪失，就会闹个倾家荡产。可是镖师一旦改行后就走不了回头路，一旦开始经商，生活方式就变了，当了几年老板之后，在心气上、体质上就都当不了达官了，想回头时不但无颜开口，而且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改行经商的镖师一旦经商失败，处境是十分凄惨的，所以镖师对从商是十分慎重的，手中有了几个钱后不回家置地，宁可去开赢利不高的大车店，也不去跑买卖，因为大车店即便不景气，大车和骡马也跑不了，还可以卖掉后回乡置地，不担什么风险，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镖师是保守主义者。

义 字 当 先

镖师的祖辈大多是习武世家和小康农户，习武世家的子弟所憧憬的前程当然是武进士出身。可是家道一旦中衰，此路也就不可行了。“穷习文、阔练武”，虽是民间的口头禅，但反映出了习武练功，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考武秀才，武举人也要通文墨、知兵书，考武进士还要通兵经、策论，一般的教书先生只能传授子曰诗云、唐诗宋词和八股文的起承转合，要想走武进士的道路，非请专馆传习不可。弓马骑射是武科举的重要考试项目，耕田犁地的笨马是进不了考场的，专门调训出来的走马跑起来才能不蹦、不蹿，使马背上的人稳如泰山，便于骑射，只有马跑得快，箭射得准才有考取的希望。所以习武世家一旦中衰，子弟对于武进士的前程也只好望洋兴叹了。小康农户家的子弟，习武练功的目的是强身自卫，不受人欺，有人找上门来时，家中好有个“顶门杠”，可是家境走下坡路后，饥寒交迫，要为生存而奔忙，子弟练得一身好功夫后，又不甘心当一个贫穷的庄稼汉，有不少人走上了当镖师的这条路。

在封建社会里，习武世家被称之为“国家干城”，是正途军官成长的摇篮。小康农户也有“根本人家”的美誉，是国家的经济基础。从其政治、经济地位来讲，二者都是不反封建、不反皇权的，是正统观念很强的阶层。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习武世家和小康农户家境中衰之后，其子弟的意识形态也不会马上发生改变，正统观念也不会立即动摇，所以镖师的意识形态中封建正统观念极强，仁义礼智信是他们的思想基础，重情、仗义、守信是行动的准则，非礼勿为、情发有止是他们的为人风范，故尊师重道，恪守武德为其所标榜。总而言之，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形成的纯朴的道德品质、伦理观念、礼义行为反映到镖师身上时是和封建正统观念交织在一起，所以镖师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但也不会成为封建统治阶段的叛逆，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阶层。而镖师成长道路上的外部条件，更促进了镖师特定的思想意识的发展。镖行的主体是镖局，镖局的组成、经营管理的方式、劳动人事的制度，给镖师特有的思想意识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镖局的组建和创始基本上有三种情况，一是习武练功中结识的好友或师兄弟们在平等一致的基础上组合而成。二是以习武世家的家族为主体，以邻里乡党为辅，在血缘和地域基础上组合而成。三是退役军人组合而成。由于镖局组建过程中的特殊性，所以镖局东伙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雇佣关系，这种非单纯的雇佣关系反应在劳动分配上、人事关系上，就是工资悬殊不大；比较平均；大家吃一锅饭，比较平等；没有繁琐的奖罚制度和等级、礼仪观念，比较自由；概而言之，镖局组建之后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一些组建前的人际关系，而这些人际关系在镖局发展的道路上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镖局

的组建和发展所依靠的不是资金，是人，人的因素决定着镖局成败，只有众人拾柴火焰才能高。

镖师的意识形态能够得到保持和完善，镖局的内部环境固然起到了主导的作用，镖师职业的稳定性，也是重要的因素。和镖师打交道的不外是商、官、匪三方面的人物，这三方面也是保镖行业能够存在的相关阶层，可是镖师几乎不存在着向三个相关阶层的转化问题，镖师仿佛只能当镖师，和相关的阶层总是泾渭分明。

商人是镖行的雇主，镖行的存在和发展依靠着商业的发展和兴隆。商人在封建社会里不是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但是是富有阶层，镖师和商人的雇佣关系不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是你出钱我出力的平等交易，你有雇佣不雇佣的权利，我也有受雇不受雇的自由，达成交易后签订一纸文契，规定双方的权利、责任、义务，协议执行完毕后，一切关系即终了。如双方有缘份，就成为老主顾，建立比较稳定的契约关系，如无缘份，从此以后也就如同路人了。镖师中虽然有人改行从商，那只是偶然的，不带有普遍的意义。镖师和商人尽管是封建社会里荣辱与共的相关阶层，是业务上的老伙计、老搭档，可是在思想方法上几乎是黑白不染。商人惟利是图，镖师是疏财重义，有究大手之称。商人之间是互相倾轧，镖师之间是铁血同当，风雨同舟。尽管在偶然性之中有镖师商化的；可是绝对不会发生商人镖化了的事例。从中确可看出，镖师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中实有特殊的独立地位。

官僚是镖师第二人雇主，官僚是为皇权服务的阶层，可是官僚对于皇权来说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首先表现在旧王朝复灭时，大部分官僚是不会成为殉葬品的，新王朝不但可以接纳他们，同时也需要他们为自己服务，不但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内部斗争中是这样，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新政权也不例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就明令明王朝的中下级官员留任。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爱新觉罗氏移鼎入关后，不但拉收了大批的贰臣，而且对于不肯与清王朝合作的明王朝遣老旧臣，只要不仕南明者，一律保留官僚身份和免役特权。五代时的冯道写了一部《长乐经》，记叙了自己历任多朝、臣事多主、长享荣乐的历史，此公可谓官僚的典型，他的指导思想是不管谁当皇上，他都叩头称臣，都甘心当奴才。可是官僚之中曹操者流也是不乏其人的，为人臣之时，暗定取旧主而代之的反志。鉴于这二个原因，皇上对官僚又不得不防。皇帝最忌讳的是官僚建立自己的亲军，所以对文武封疆大吏经常调动，不能长时期专任一方。曾国藩是清王朝“同治中兴”的功臣，他统率亲手缔造的湘军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镇压下去后，带领为数不多的卫队北上进京，受封领赏，没想到慈禧太后和他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你带了多少兵来”？曾国藩回到私邸之后，绕室彷徨，有大祸即将临头之感。李鸿章接受曾国藩的教训，进京面圣时轻装简从，一兵不带。他任直隶总督时驻节天津，淮军劲旅距京近在咫尺，可是李鸿章在北京的寓所不驻一兵一卒。但大官僚宦海浮沉，各方面难免树敌结怨，私宅无武装力量保卫又深感不安，所以李鸿章用重金请会友镖局为他护院，后来索性当起会友的名誉东家来，在警卫住宅，保护自己人身安全方面可谓用心良苦。小官僚不怕皇上疑心他拥兵不轨，三年一任，二年一调，在任上也培养不出亲军，离任时在官制上又无带兵随卫之例，所以也找镖师长年相随，私人保镖对于官僚来说，胜过官方的卫队。因为卫队是国家的，首先是对朝廷负责，又听本官上司的调遣，弄不好对保护对象还负有监视之使命，用于保护衙门尚可，用于保护私寓，确实有些不便。

镖师为官僚服务既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也不是家丁、家仆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雇佣关系、契约关系，协议的条文基本上是平

等的，当然这种平等只是权利和义务上的平等，不可能是封建礼仪上的平等。镖局在开展业务的活动中确实离不开各等级的“大门坎”，但“大门坎”确也需要镖局的“孝忠”，故尊贵如李鸿章者，仍需兼任会友镖局的名誉东家。会友镖局固然以之为荣，李鸿章也不认为此举有损声誉，所以李鸿章有生之年，“东伙”合作得挺融洽。既然镖师和官僚关系如此密切，有的镖师又系退役军官出身，镖师能否步入官僚的行列呢？依笔者所知，清末民初是没发生过镖师向军官转化的反向运动，因为退役后还能当镖师的军官，总得年富力强，武功出众，本应在军界是有所作为的人，被弃退役的原因大多是抗上，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抗上之习者，难以见容于行武，退役之后，对于官场已心灰意冷，况且军界有“兵不再役，好马不吃回头草”之说。故镖师不可能成为军官，自己也不打算再成为军官。更主要的原因是两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军官被称为营混子，能够混得上去的都是获得了上级的欣赏，得到了有权势者的提拔和栽培。在战争环境中尚有可能凭战功而获得功名富贵，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军官的前程是退役还是提升，全凭长官是否垂青。所以官僚(不论武官文官)的处世哲学是恪守敬从之道侍奉上司，一切按长宫的意志办事，只对上级负责，不管士兵和百姓的死活，简而言之就是媚上压下，欺软怕硬，凌弱惧强。保官、升官的目的是千里为官只为财，所以刮地皮、喝兵血无所不用其极。镖师是恪守封建正统观念和传统道德的正人君子，敬上尊老、守信重义、抗强扶弱、非礼不为、非礼不取，而且为之有节、取之有道，所以在封建道德范畴之内，镖师和官僚的为人处世之道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镖师特有的思想作风做为一个阶层来说，很难向官僚转化。而军官之中洁身自爱恪守武德之士，由于在意识形态上和镖师相近，身体素质亦可以保镖为生，所以一旦成为了军中的弃儿，就有可能向镖师转化。

镖师和贼匪不能互转化的具体原因，在第一章第二节中已做了阐明，本节只就意识形态领域中，镖、匪的异同加以分析。意识指导行动，镖、匪不能互相转化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意识形态中的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皇权的态度上、对社会的态度上、对祖宗的态度上、对鬼神的态度上。

镖师和贼匪都承认皇权，可是对于当今皇上的态度可就不同了。镖师尊重皇权，并且礼敬当今皇上，愿意为其子民，盼着有个好皇上，自己也好沐德浴恩，当个尧舜之民。贼匪虽然承认皇权，可是并不礼敬当今皇上，对“皇上老儿”已经绝了望，不再当皇上的编户民，对当今皇帝为何主，并不感兴趣，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也想有坐龙庭的福份。

镖师和贼匪共处于一个社会之中，可是对客观存在的态度是绝然不同的。镖师虽然被严酷的现实从习武世家和小康农户的天地里赶了出来，可是镖师接受这种现实，镖师的职业和工作方法就是稳定客观存在着的现实。贼匪对于现实社会强加给他的不公平的待遇是不能接受的，落草为匪、结伙做贼就是对社会现实的抗议和反叛。

镖师往往有一个值得回忆的过去，有一个值得自己尊重的祖宗，列祖列宗给自己留下了习武世家的门第，给自己留下了小康农户的安适生活，可是自己“没有守住”，觉得愧对祖宗，生怕成为不肖子孙有辱了祖宗，时时刻刻想着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恢复逝去的过去，光宗耀祖，成为列祖列宗的可靠传人。贼匪在被迫铤而走险之前，往往诅咒自己的祖宗，认为自己今生今世还没有缺过什么德，为什么天不给条路，祖宗也不保佑，既然老天不开眼，祖宗不显灵，所以贼匪不信天命，也不信祖宗，在结伙为匪，下水当贼之前，大多更改姓、背井离乡，告别了乡亲，也辞别了祖宗，旧的一切已经死去，新的一切将在铁、火、血中诞生。

镖师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极深，可以说是儒家在武林中的传人，镖师信天命，对神佛虽然敬仰，可是并不崇拜和畏惧，也不畏鬼，认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贼匪不信天命，可是怕鬼畏神，对鬼神的态度，和对人间官吏的态度一样，是惧之、畏之，并不尊之、敬之，贼匪的鬼神观念极强，是怕神降罪、怕鬼敲门，所以叩头烧香，遇庙则拜，可是又没有宗教信仰，宣称“神鬼怕恶人”。镖师虽然在为今生血斗，可是对来生和彼岸也很关心，所以镖师遁迹空门、为僧为道者不乏其人。贼匪只顾今天，不考虑明天，来生和彼岸似乎与之无关，所以很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镖师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了镖师是镖师，不论做为一个阶层还是个体，它都是稳定的，这种稳定又进一步促成了镖师意识形态的稳定，意识形态不但决定政治态度、职业道德，也决定了镖师的生活方式。

镖师在个人生活上大多能洁身自爱，贼匪们常说：“吃喝嫖赌我不抽(抽大烟)”，因为当贼为匪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喝、嫖、赌，如抽上鸦片烟，五尺之躯也就要困卧在床，也就难以当贼为匪，也就不能吃喝嫖赌了。嘎杂子们是以“坑、蒙、拐、骗、我不偷”为信条，因为坑、蒙、拐、骗几乎无人过问，偷则触犯王法。镖师常年和贼匪、嘎杂子打交道，可是不但和坑、蒙、拐、骗、偷绝缘，也不沾嫖、赌、抽，在生活上追求的也就是吃大碗肉，喝三盅酒而已。

镖师的业余时间不多，但走镖回来后总得歇几天，在休息的日子里，镖师也仍然要早起遛马、练功、习武，这三件事完毕后方能休息，镖师们的休息娱乐之所是茶馆、饭馆、酒馆、戏园子和逛天桥，逛庙会。

北京人有喝早茶的习惯，早上起来练功的、遛鸟的、赶早市的、卖早点的……完成了所该完成的事情后，都到不同档次的茶馆来喝早茶，休息一下，消磨时光。镖师走镖回来后，忙中偷闲，早课完毕，也好到茶馆坐上个半天。老北京的茶馆中有不少书茶馆，茶客们一边品茗，一边听评书。茶馆中流行的书目大多是包公案、彭公案、雍正剑侠图、七侠五义等，其内容充满了封建正统思想，即便是人民性较强，带有反抗精神的《水浒传》中，也贯穿了忠君、敬上、守义、孝亲，而且是片面的愚忠，单方面的守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反抗，只能是带着桎梏的反抗。镖师心中敬仰的人物，也正是评书艺人口中赞美的人物，耳边听着赞歌，心里演奏着一支和谐的共鸣曲，镖师在茶馆里一坐，可以说是融娱乐和封建教化为一体。

和好友吃顿饭馆是镖师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八大堂、八大楼中的山珍海味、水陆八参自然是和镖师没有缘份，但老北京的许多中低档饭馆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和特殊风味，前门外的中小饭馆都是镖师们经常光顾之外。镖师们在饭馆中的做派是豪爽大方，不吝小费，但吃多少叫多少，不穷作、不摆谱，饮酒有德，七分而已，八分算尽量，决不会有酒后无德之举。

清末是京戏走红的时代，在北京的舞台上大有一花独放之势，前门一带镖行和茶园(戏院)大有竞盛之意。八大镖局均开设在前门一带，八大茶园(楼)和八大镖局几乎是比肩而立，所以镖师也就成了戏园子的常客。镖师听戏有不叫倒好、不起哄的行规，因为许多戏园子都有镖师“坐店”，自家人总不能拆自家人的台。镖师称得起是文明观众，模范看客，而且许多镖师还和演员结成好友，特别是武生。因为武打戏中也确需要演员有点真功夫，不能老是光摆不练的花架子功，所以许多演员都向镖师学习武练功，梅兰芳的剑术，尚小云的猴拳，就是向镖师李尧臣学的。五十年代初，梅先生和老友们谈到镖界的朋友时，不胜感慨地说，自己很感激几位镖师朋友的鼎力保护，使早年得以不失人身尊严。

前门一带的镖局和天桥是近邻，所以镖师们是天桥的常客。天桥有许多打把式卖艺

的武林朋友，老北京有“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的谚语，其实天桥的把式也不乏有真功夫者，但却也有不少光说不练的把式，于是一些习武功的人，对于口出狂言的把式就加以戏弄，教训教训他。可是镖师由于武德所系，决不干踢场子的事，不帮钱缘，也会帮个人缘。

老北京的庙会众多，一个月三十天几乎排得满满的。城区的庙会已经不带有宗教色彩，有的庙里香火已绝，只是个定期开放的商场和娱乐场所。每逢开庙之日商摊汇集，逛者如云。镖师门大多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有家室，所以也是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等地的常客。在镖行从业的达官和外地进京走镖的达官们的穿着、做派、言行、举止都很惹人注目，一在公共场的露面，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位保镖的达官爷，所以清末时在北京颇有影响。再加上镖师秉性刚烈、性格豪爽、仗义疏财，和人交往的过程中是爱交友的穷大手，遇事时总爱帮人排忧解难，在老北京街面上闻事的嘎杂子们和镖师相遇时总得礼让三分，市民们见之无不称快曰：“一正压百邪”，或曰“邪不侵正”。小商小贩们碰到嘎杂子们的敲诈勒索，旁人都怕祸及其身，所以不敢出来说句公道话，这时如有镖师在场，一定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久而久之，街面上如出了什么纠纷，受害的一方往往会拦住过路的镖师，“请达官爷帮着评评这个理”。镖师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理、有利、有节地解决这场争端。如嘎杂子们蛮横到底，“给台阶不下”，镖师也不惜武力解决，三招二手将其打翻在地，然后又把他扶起来，拉着他喝酒去，表示愿意交个朋友，声称：“不打不相交。”镖师所以赔上几个酒钱的原因是“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如将嘎杂子打翻在地后，责令他爬起来快滚，嘎杂子一定会恼羞成怒，待镖师走后，更加资本加利地闹事，使受害者蒙受更大的损失，老北京的市民们管这种情况叫“帮人不到家，不如不帮”。所以镖师宁可赔几个酒钱，也要“帮到底、送到家”，彻底了平这件事，也不枉叫别人喊声：“达官爷。”镖师的这种义举也就给小说家和评书艺人提供了素材，所以清末民初出现了不少描写镖师生涯的小说，和评书艺人自己编出来的段子。进入二十世纪后，北京街头的达官爷已经逐渐灭迹，可是评书艺人说得还挺起劲，赞美逝去的，仿佛是想唤起人们的记忆，又像是在鞭笞现实。

清末民初以镖师为素材的小说和评书段子，从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来说均不甚高，是不登大雅之常的俚俗之作，但是它反应了老北京的社会现实，特别是评书艺人编的段子，在当时具有写实性和新闻性，由于无文字记载，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至逐渐湮没了。今日的八旬老翁，特别是尚且健在的老评书艺人或许还能记忆着一些，若及时抢救，也可能会挖掘出一部分，这此评书段子植根于北京市井，带着天桥的气息，经加工后剔除其中封建思想意识的糟粕，吸取我国人民传统道德和正义行为的精华，那将是一支京味京韵具佳的曲坛奇葩。

镖师的家乡大多在山东、河北一带。镖师在京从业后，家室绝大部分仍在老家守着祖业，尽管祖业可能只剩下二间土屋三亩半地，可是依然眷恋如故、重土难迁。这固然是农民只有和土地结合在一起时才有安全感和归宿感，同时也由于京城米贵，居大不易，家室在京会造成不胜负担的经济压力，使买地建屋的计划落空，到告老时没有任何依托和凭借，无以养老送终。所以镖师不当上掌柜的是不会有家室相随的。可是镖局的徒弟、伙伴们毕竟比其他行业的人要富裕一些，而前门一带是妓院、暗娼、宝局比比皆是的地区，镖师虽重武德，但人总有七情六欲，不能皆是圣贤，所以暗中眠花宿柳，偷入宝局一赌为快者皆有之。但镖师既不是有钱阶层，也不是有闲阶层，在经济上、时间上都不容许经常光顾情场和赌场，所以纵有嫖赌之事，也只能是偶然暗中为之。对于嫖赌行为只要不伤

风败俗，有失镖局的声誉，同仁们也只是规劝而矣，而有嫖赌行为的镖师大多也是“为之有节、行之有度”，不会闹到非同仁“公议”不可。

专给宝局坐店、妓院“扛岔”的打手们为了壮声势，给自己脸上贴金，有是也会打出镖局的招牌，以达官爷自居，可是正宗的镖界人士不但不和他们往来，也不承认他们是同行，所以有的镖局还专门做了号坎，以示区分，免得鱼目混珠。镖局的行会也不接纳这些流外嫖局参加，久而久之这些人附骥尾无望，也就不再打镖局的招牌，进而和嘎杂子们勾结在一起，投到康小八之流的麾下，专和镖师为敌了。

大刀王五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宋辽对峙时代，以白沟河为界，边民多习武尚勇。河北沧州滨海地荒，曾是历史上专门发配犯人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林冲，就是在沧州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沧州人怀格豪爽耿直，阳刚不阿，是闻名遐迩的武术之乡，也是武林高手的荟萃之地和镖师的摇篮，镖界英烈——大刀王五就是沧州人士。

王五名文斌，字正谊，居家排行老五，所以江湖人称大刀王五。祖居沧州，回族，家世已不可考。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遇难，享年五十六岁。王五十二岁就到烧饼铺学徒，所以出身恐非习武世家和小康农户，即便是，也是在祖父时就已经衰落为微寒之士了。王五“志学”之年拜镖师双刀李凤岗为师，成了“成兴镖局”的一名小达官。沧州地处河北山东之间的交通干道上，大运河流经其间，是水陆交通的要冲，“成兴镖局”专给北运的南货押镖，跑口外的蒙古买卖。少年的大刀王五跟着师傅李凤岗出居庸关、越八达岭、纵览燕山群峰的耸峙，踏遍了热河、张家口、绥远、包头的山山水水，并深入到蒙古高原的腹地。塞外浑厚无垠的自然环境，不但开阔了王五的眼界，而且陶冶了他的性格，他心怀坦荡，不存民族的芥蒂，认为蒙族兄弟是可共生死患难的好朋友。十几年的塞上走镖生涯，不但使王五由一个习武少年变成了一条而立之年的壮汉，而且培养了他的意志和阅历，他不仅是个刀术精湛、马技超群的骑士，而且成为了一名老练成达、胆略过人的真正的镖师。

1874 年，年已而立的王五进京创办源顺镖局。七十年代是镖行的兴盛时期，外城一带镖局比比皆是，源顺镖局坐落在前门外东珠市口西头的繁华商业区，当时北京城中到处都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被镇压下去后，人民的反抗斗争暂时处于低潮，清王朝的统治处于相对稳定之中。这时尽管爆发了一系列的边疆危机，可是中法战争尚未爆发，封建文人讴颂的“同治中兴”，尚能是统治阶级欺人和自欺的幕布。王五进京后凭着十几年闯练出来的胆识、经验和阅历，事业上一帆风顺，源顺镖局办得挺兴隆。从宏观角度为来。王五创办源顺镖局时正是镖行的得意之秋，原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封建统治又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故镖行很是走红，这一切给大刀王五的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王五的源顺镖局在当时来说是一家小镖局，可是“小而专”、“小而精”，办得很有特色。所谓“专”，就是专走北道，所谓“精”，就是从业人员不多，但素质高、队伍精悍。王五为人豁达，通于进取，善于接受新事物，这在重传统、重正统、偏于保守的镖师队伍中，确是难能可贵的性格。五王创办源顺镖局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是名成业就的掌柜了，而且双刀王文斌在北道也确有些名气，但王五在

实践中发现双刀有些“虚”，于是不顾已经年逾而立，并且已是立门户的人了，毅然又拜武林高手“山西董”为师，改学单刀，由于王五武勇、骠悍、臂力过人，所以手中的单刀又大又重，为名匠所锻造，是世间稀有的上乘兵器，江湖上都称他为大刀王五。这把大刀不但威震塞外，而且享誉京华。但王五为人处事，从不以威相压，而是以诚相待，以义相交，以礼相序，以情相合。镖界同仁，对王五颇为敬重，感其仗义疏财、裘马与共的情怀，曾送王五“义重解骖”的金匾一块。赠匾的具体原因已不可考，此匾尚存于王五故居之中，王五故居之中还保存着一块“德容感化”的功德匾，此匾的意义深远，它是王五侠肝义胆，见识过人，深明大义的写照。

北京城是汉、满、蒙、回杂居的城市，清王朝的民族政策是尊满、联蒙、抑汉、制回。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抑汉”已经成为了过去，因为清王朝的军政实权已转移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封疆大吏的手中。这些人都是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缔造的湘军、淮军已经成为了清廷的主要支柱。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爆发的西南、西北回民起义，被清王朝镇压下去了，但回族人民的斗志并没有被瓦解，声称是“三十年一小反，五十年一大反，天下未先回先反”，要当反对清王朝腐败统治的先锋。清王朝推行了恶毒的以汉制回、以回制回的政策。当汉民和回民发生纠纷时，地方官往往“护”汉“抑”回，回民发生内部教派之争时，更给清王朝以可乘之机，地方官不予过问，不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干预，任凭事态发展，惟恐冲突不扩大。回汉械斗，地方官亦不积极制止，而是等到流血冲突结束后，再“绳之以法”，美其名曰：“如此方可以警效尤。”能够煽动起大规模械斗的人，大多是以土豪劣绅为代表的封建地方势力，地方官“绳之以法”时，被斩首示众的大多是盲从或胁迫而来参加械斗的下层百姓，所以在械斗发生前，械斗的组织者就往往安排好了地方官“强之以法”时送出去应差的替死鬼。

老北京是个官多、衙门多、僧多、寺庙多的城市，寺庙中有不少定期举行庙会。庙会其间摊商罗列，逛者如潮。每逢农历七月十五南横街东口的小东岳庙举行庙会，由于南横街和回民聚居的牛街较近，回民也爱到庙会来闲逛。这本和宗教信仰无关，但南横街的纨绔子弟和回民发生了冲突，出言不逊，说出了一些污辱回民信仰的话，引起了牛街回民极大的愤怒，定要到南横街去拼个你死我活。南横街的坐地虎当然也不示弱，于是双方磨刀擦枪、弓张剑拔。牛街方面久闻大刀王五之名，认为天下回回是一家，到源顺镖局王五出来助一臂之力，并向王五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应差”的替身，让王五放心地去杀，杀几个有几个“应差”的，绝连累不了王五。王五襟怀坦荡，深明大义，奔走于牛街和南横街之间，对双方晓之以理，明之以利害，终于平息了这场即将爆发的回汉械斗。事后地方上的各界人士，到源顺镖局向大刀王五赠送了“德容感化”的功德匾，以示崇敬之意。王五的义举，意义深远，不仅是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械斗，同时也维护了民族的和睦与团结，在北京的地方史上，确是留下了值得大书的一笔。

第一个为中国变法图强而流血的爱国志士谭嗣同，祖籍是湖南浏阳，但他出生在北京，从1865年到1877年，他在北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898年9月28日，年仅三十三岁的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为国家、为民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腔热血洒在了哺育自己生长的土地上。谭嗣同慷慨成仁的碧血，向中国人民郑重地宣告：丢掉对清王朝的幻想，革命的手段只能是铁、火、血的斗争。

谭嗣同不但生在北京，牺牲在北京，主要事业的政治舞台在北京，和大刀王五肝胆相照的友谊也建立在北京。谭嗣同自1877年离开北京后随父亲在陕甘、两湖等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洋

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北洋新建陆军覆没了，无情的事实说明了铁甲战舰和克虏伯的后膛枪炮振兴不了中国。年已而立的谭嗣同悲愤交集地来到了已经阔别十七年的北京，寻找康有为、翁同龢，共求救国图强之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结识了大刀王五。

谭嗣同和大刀王五在封建社会中是属于不同档次的人。谭是宦门之后，父亲官拜湖南巡抚，是封疆大吏，官运正红，本人是候补知府，出身门第和本人的身份已定下了他四品官的前程，如按照封建社会的正统道路走下去，或许也会不失尚书、总督之尊。谭嗣同博通群书，著有《仁学》一书，用"以太"来解释世界之本源，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刀王五不通文墨，出身寒微，是个小镖局的掌柜的，但从他个人来讲，已经是混得很不错了。十几年的功夫，由烧饼铺的小学徒混成了北京镖界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无论源顺的买卖，还是个人的声誉，都处在上升时期，继室夫人王章氏比他小十八岁，妻娇子幼，家庭美满幸福。尽管谭王二人的门第不同，身份各异，只要按照自己原来的道路走下去，都能出人头地。可是，他们都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道路，重新探讨、求索，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重新塑造人生，爱国忧民的仁者情怀，使他们成了知音，除旧布新，创造未来的想往把他们结合成同志。轻身重义为理想而奉献一切的信念，在两个不同的心弦上，弹奏了一支和谐的共鸣曲。英雄、烈士、义侠拥抱在一起时必然迸发出闪灼耀眼的火光，化成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谭嗣同和大刀王五相识恨晚。谭 1895 年到北京寻找康有为时，康已南归广东，谭在京结识了大刀王五。二人一见如故，遂成为莫逆之交，但不久谭又离京。第二年谭又进京，拜谒翁同龢在京住的时间也不长，刚和大刀王五把酒接风，弹指间又长亭相送了。两年之后，1898 年六月谭嗣同奉旨进京任四品京卿衔军队章京，参与新政，九月二十八日在菜市口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在京和大刀王五相处也只有百日之缘。在这百日之中，谭嗣同日理万机，恐怕和王五共叙友情的时间也不会太多，他们之间的知心不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渐悟"，而是理想和信念交融在一起后激迸出的"顿悟"，使之"立地"成为生死可托，患难与同的义友。有的书中记载谭嗣同幼年拜王五为师习武练功，此说恐不可靠。王五只身进京创办源顺镖局时，谭嗣同年仅十岁，而三年后谭即随父离京，王五进京之初艰难创业，又拜山西董为师改学单刀，正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塞外镖路之上，大概无暇在镖局之外收徒传艺。况且谭家是浏阳世族，书香门第，谭嗣同之父在京时又有司官之尊，不会叫儿子向一个小镖局的土掌柜的叩首称徒，拜师习武。即便王五确是谭嗣同的启蒙老师，有过师徒名份，当时谭只是十来岁的孩子，师徒之间谈不上是"知音"，王五百忙之中，对谭的教诲也是泛泛为之而已。谭既不是武林中的人，更没有进入达官的行列，所以他和王五谈不上什么师徒之序，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师徒关系，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关系，是一支理想和信念的共鸣曲，同时拨动了两个心弦而形成的知音，所以二人之间"顷刻间，生死同，一诺千钧重"。

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前夕，大刀王五为了挽救变法，曾出谋保光绪皇帝出走口外，到塞上之地，号令蒙古王公勤王。他凭自己多年的塞外生涯，认定了蒙族人民是可生死相托的好兄弟。从今天的高度看来，这个主张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因为蒙古之地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地区，不论是上层王公，还是下层民众，都尚未觉悟到要起来支持变法维新的阶段，但它反映了大刀王五在临危时不是个束手待毙的平庸之辈，而是有胆略、敢做为、勇挑重担闯难关的血性男儿。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天津乘英国轮船出走香港，梁启超也东渡日本。慈禧太后最

恨之入骨的人却是谭嗣同,因为他曾夜访袁世凯,共同定立了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用武力迫使慈禧就范的计划。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出卖了谭嗣同,他已经完全暴露,是后党必除掉的祸首。为了保护同志,避免诛连无辜,谭嗣同决定不走,牺牲自己。被捕后在三法司会审时,他把一切“罪行”都承担下来,这是谭嗣同在浏阳会馆坐等入狱的原因之一。他对好友们宣布说:“中国新旧两党,非闹得流血遍地,国家才有希望。”“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起。”他决心用碧血惊醒国人,唤起民众。

在谭嗣同被捕的前一天上午,他看望过已避居外国使馆的梁启超,梁执意劝他留在使馆不要走了,下午使馆中的友人又到浏阳会馆敦请他赶快去使馆暂避一时,谭直言谢绝了好心的朋友的安排。晚上大刀王五再次赶到浏阳会馆,力劝谭即刻移居顺源镖局。天明城门开启时,混在镖师之中,随镖车出城。谭再次斩钉截铁地向王五表明了自己的心意,并直言要求王五马上离去,王五深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道理,何况谭是秉性刚烈的顶天立地男子汉,所以本着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君子不夺人之志,不强人之所难,和谭嗣同洒泪告别。“男儿有泪不轻弹”,夺眶而出的英雄泪,是王五成为男子汉后第一次流泪,也是这位镖界英烈最后一次流泪。王五离开浏阳会馆后,凭直觉意识到今夜一定会出事,于是又悄悄返回,拿出夜行的本领,藏身于谭嗣同的住室莽苍苍斋对面的房脊后面,静静地观察着。他看见谭正在写什么,王五的热血在沸腾,他真想跳下房来,拉着谭嗣同就走,可是他的理智又告诉他,君子不夺人之志,谭嗣同既然心志已定,这时不应该再打扰他。谭写完后,拿出了信封,这时王五才知道谭在写信,其实谭是模仿父亲的口气,写了一封谴责儿子的“家信”,目的是为老父开脱,以免受到诛连。谭将信装入后,未封就把信的封口撕开了,王五看着真有些不解其意。谭嗣同就义后,清廷宣布谭是君之乱臣,父之逆子,并公布了这封“家信”时,王五才明白了谭临危之时的苦心。谭嗣同把撕掉了封口的信,收入书案中的抽屉里,就提着剑走出屋来,在院内松树下起舞。这时夜正深,雄鸡还未报晓。突然步军统领衙门的提骑破门而入,谭嗣同从容被捕了。谭嗣同就义后,王五冒着附逆的风险为谭收尸,并运回湖南浏阳安葬,此事一时成为京师各阶层的美谈,世人无不交口称誉。

老北京也盛传着谭嗣同被捕后王五打算冒死劫狱,可是刑部大牢守卫甚严,无从下手,于是王五布署了劫法场。清代的杀人刑场的菜市口,菜市口距广安门不过二华里,王五派人乔装成石匠,用三头壮骡子拉着一辆大车,车上载着一块巨形石头台阶进广安门,车过城门洞时故意造成断轴,挡住城门,使之无法关闭,谭嗣同是个好骑手,只要飞身上马冲出刑场,刹那之间即可从广安门夺路而出。可是后党们也有提防,不等午时三刻,就行刑开斩,使王五的计划落空。笔者认为上述传说恐怕不属实,因为由康有为出走到谭嗣同被捕,间隔有三天的时间。如果大刀王五要“夺”谭嗣同之“志”,完全可以带着源顺的镖师们,从容地把谭嗣同架上骡车,出城而逸。正是由于王五尊重谭嗣同必死之志,才没有实施类似的方法。所以也不会用劫法场的方式去救谭嗣同,因为镖师是最重诺守信的。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久慕王五之为人,由天津赴京,亲临源顺镖局,恳请王五出山,赴天津共建灭洋大业。王五慨然答应。到天津后,协助张德成整训团民队伍。天津的混混儿在义和团运动高涨时,有不少人参加了义和团,这些人本是“根基不正”的歹徒,带着自身的目的参加义和团是准备捞一把,王五厉行整顿义和团的队伍,使一些混入义和团的“混混儿”恨之入骨。义和团在天津的老龙头火车站、北仓、廊房等地

和八国联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与后膛枪炮相拼搏。前仆后继，王五率集训的大刀队冲锋在前，刀劈洋鬼子多人。战罢擦着刀上的血，对他最后收下的徒弟赵崇斌说："这把刀，今天才成为真正的刀，因为它开了洋荤，沾了鬼血，我王五也不虚称大刀王五了，对得起这把刀，也对得起祖宗了。"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王五返回北京，本想出走塞上，再谋发展。可是许多北京的友人都来投奔大刀王五，把源顺镖局当做避难之所，外柜、内柜三十多间房住得满满的。这些人携老带幼，既不能随王五出走口外，又不能丢下不管，由于王五是个义重如山的人，所以冒着风险留了下来。

关于大刀王五之死，老北京流传着许多说法。有的老人说在八国联军洗劫源顺镖局时，王五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中弹身亡。有的说王五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势不能免，在街口迎上前来逮捕他的八国联军，用双枪应战，击毙了洋鬼子多人，子弹打完了，挥舞着大刀冲了出来，进行肉搏，被架在街口的重机枪打成了马蜂窝，倒在血泊中后，又突然跳了起来，砍了一个企图刺他一刀的侵略军军官，倒在地上后两目圆睁，仍然手握大刀，人死气不夺。

大刀王五的继室夫人王章氏，1960年病逝于王五的故居，享年九十八岁，她生前对来访者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由于"混混儿"向清政府告密，五城练勇前来逮捕王五，王五怕连累了在镖局中避难的一百多口男女老少，没进行任何抵抗，从容就捕，后被清政府转送给八国联军，被德军枪杀在前门外东河沿。

大刀王五就义后，北京市民对他的传闻很多，把他描绘成了一个壮怀激烈、刚勇强悍、嫉恶如仇、一诺千金的传奇式人物。王五确是一个英雄烈士，但他不是武侠小说中或评书艺人自编的段子中的传奇式人物，而是个现实社会中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富于开拓，勇于创新，能接受新事物，当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人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他能毫不动摇地牺牲个人利益。可是他又是个镖师，具有封建正统观念的镖师，这就决定了他和谭嗣同的共同命运、共同悲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他们的情怀、理想、信念，在召唤着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抗争，可是又没有勇气与帝国主义、封建传统一刀两断，大刀王五比谭嗣同多在人世间和命运抗争了两年，所以他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但加入了义和团的队伍，而且大刀开了洋荤，沾了鬼血，他长眠在中华大地上时，确实对得起祖宗了。谭嗣同临刑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刀王五面对着八国联军带血的刺刀，灼热的枪口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无人知道了，可是他倒下后，谁又能说他只是一条江湖好汉呢？他是中国人民之中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志士英烈。谭嗣同题写在狱中墙壁上的《狱中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据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所释："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历史证明，康有为实有愧于昆仑之誉，大刀王五却无愧于昆仑之称。

九十年过去了，源顺镖局的旧址依然存在，大刀王五的四世孙依然住在高祖的故居之中。王五当年用过的红木八仙桌、太师椅和"义重解骖"、"德容感化"二块金匾保存得完好，金字虽然已经失去了光泽，但木匾饱经风雨之后，显得更加苍劲古朴。令人遗憾的是王五那把开过洋荤、沾过鬼血的大刀，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狂热中被送进了土高炉化掉了。可是大刀王五的形象一直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之中，闪烁在银幕之上，北京市民也一直传颂王五的英雄事迹，并不断地渲染，把它传奇化，这个逝去的英雄，永远长留在人间。

形形色色的保镖

公友镖局的关闭，标志着传统镖行的瓦解。因为传统的镖行以镖局为主体，镖局的业务范围广、影响大、从业人员占镖行的绝大多数，故世人一般把镖局和镖行当成同义语。二十年代之后，镖局成为过去，保镖行业依然存在，但是组成人员变了，服务对象也有所变化，业务范围变成单一了，即保护雇主的人身安全，所以人们不再尊称这些人为达官爷、也不称之为镖师、镖客，而是称为保镖，或贴身保镖。爷、师、客的称谓，无疑是有几分敬意，敬意的消失，说明了“保镖”和“达官爷”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保镖，有一部分是镖局瓦解之后的镖师。在镖局瓦解之时，这些人大多正在从事护院的业务，镖局不复存在了，这些镖师和雇主的关系仍然继续了下来，只不过是由镖局“派来的”，变成了直接“雇来的”，其服务对象基本上是富商大贾。身居要职的官僚、军阀，受到现代国家机器强有力的保护，似乎无需再掏腰包雇佣保镖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可是一旦失势或下野，那就另当别论了。清王朝的王公勋戚，只要府邸尚存，仍为富有之家，也需雇个保镖来壮壮门面。黑道上、帮会里，形形色色的老头子、大龙头、大舵头们和内部、外部往往结怨都很深，这些人在杀人的过程中，也会被人所杀，所以总得有几个贴身的保镖来助威壮胆，并确保不被暗算。于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形形色色的保镖和被保护的对象也就纷纷结合起来。

工商界中的头面人物，如纱厂大亨荣德生、报纸大王史量才，都有贴身的保镖，外出之时随车护卫，形影不离。保镖们都持有官方的枪照，不但可以在华界持枪，还得到了帝国主义的认可，可以在租借地持枪。保镖们都是通过各种途径物色来的神枪手，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根基和来路都正，和黑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平日厚待之，情如子侄，以求一旦遇非常之事，保镖可尽力相救。

史量才控制着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三十年代初，鲁迅等左翼作家以申报“自由谈”栏目为阵地，对国民党当局进行冷嘲热讽，掷出了许多刺中要害的“投枪和匕首”，军统特务们对史量才进行了恫吓，认为商人的胆子要比文人小，鲁迅先生敢于蔑视恐怖行动，不怕寄来的子弹，但史量才就未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慨了。没想到史量才虽是报界豪富，但对军统特务的恫吓却嗤之以鼻。于是戴笠决定杀鸡给猴看——干掉史量才，看哪家报纸还敢再登“嘻笑怒骂”的文章。史量才寓居租界之中，军统特务们不便下手，于是乘史由杭州乘自备的小轿车返回上海之机，在沪杭公路上将其刺杀。

荣氏家族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控制着上海、无锡一带众多的棉纺厂、面粉厂，抗战胜利后，军统特务在上海绑了荣德生老先生的票，强勒了三十万美元的赎金，后来此案虽破获，但荣家破费的美金却超过了三十万。

史、荣两案发生之时，保镖均在场，但未进行抵抗，可见不但黑社会不斗势力（官方），保镖亦不斗势力。

清王朝的遗老，当首推末代皇帝溥仪之生父——摄政王载沣。溥仪在伪满州国称康德天子时，载沣也避居天津租界，不敢留居北平。什刹海畔的摄政王府，遂无人掌管，许多不法之徒皆生觊觎府中财物之心，于是载沣雇用了一名日本浪人——持原武夫，充当府中保镖。该人每日酬金大洋一元，可见其身价并不高，更无武功可言，但以邪压邪，身跨东洋刀的日本“武士”，一旦逡巡于府中，打摄政王府宝物算盘的人就只好远避三舍了。持原武夫原系一介浪人，现在也是声价十倍，因为他是摄政王府的镖师，俨然武林高手，日本宪兵也对其有三分敬意，竟成一方人物。

载沣原系醇亲王，是光绪皇帝载湉之弟。醇亲王府在宣武门里太平湖畔，现在的中国音乐学院即其府邸。光绪登极后，醇王府就成了潜龙邸，载沣之父老醇亲王奕譞即移居什刹海畔的北府，将太平湖畔的南府上交朝廷，表明自己不敢僭越之意。从法律上来说，南府已是国家财产，与载沣无关，官方文件上对此事有明文记载。可是持原武夫竟能多方奔走，化公为私，最后由载沣出面将南府出售，获大洋二十万元，持原也就以功臣自居，一直在摄政王府充当保镖，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被遣返回国。

唐绍仪是外交界的政客，在清末之时颇有名气，民元南北议和时，唐是袁世凯的代表，与南京政府方面的代表伍廷芳是谈案桌上的对手。唐、伍二人在声望上是旗鼓相当之士。谈判结束后，唐绍仪见机行事，参加了同盟会，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袁世凯为了减少临时参议院对总理人选的阻力，也就请唐绍仪担任了袁政府的首届国务总理。唐是个久经官场，八面玲珑的人物，为人能上能下，只要有官干就行。失去总理的高位后，回到家乡广东中山县，打着建设家乡，造福桑梓的旗号，又当了中山县县长。东北易帜，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唐又以党国元老的身份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寓居上海租界之中。“七七事变”后，圣面抗战爆发，淞沪战役即将结束之时，国民党要员和各界知人士纷纷撤离上海，唐稳居租界之中，安然不迁，并乘机兼并左邻右舍的房产，大肆扩建私邸，还贱价大量购入珍贵文物，和日本住沪人员时有接触。种种迹象表明，唐绍仪要有叛国投敌之举，有关人士也多次劝唐速离上海赴内地，唐置若罔闻。于是军统决定除掉他。唐绍仪平日自卫甚严，家中雇有四名白俄保镖，都是久经战阵的沙俄军官，寓所又在租界之中，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保护，军统方面很不易下手。经周密策划之后，军统行动队的杀手们乔装成了古玩商，携带着古玩、古瓷、钟鼎之类的珍品到唐公馆献宝求售。此事乃唐家的常例，不足为奇，门口值勤的二名保镖略事检查就放了进去，唐绍仪正在鉴赏古玩之际，杀手抽出藏在古瓶中的锋利钢斧，猛击唐的头部二下，唐当场毙命，杀手们扬长而去，走到楼门口时故意高声说：“请老先生留步，只要有真货，我们一定首先给您送来。”说罢出门登车而逃。唐家的仆人发现唐倒在血泊中后，高呼主人被杀，保镖们才拔枪追击，但汽车已经冲出了手枪的射程。

日本浪人、流亡的白俄在中国充当豪门的保镖，并不是中国武林乏人，而是豪门崇洋，官方媚人，黑道上的人士也惧外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奇特现象。日本浪人，有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为靠山，故然有可“畏”之处；白俄已是有国难回，是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出来的丧家犬，可是由于是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所以身价也还不一般，身穿西装，腰带左轮手枪的洋保镖，总使旁人敬畏三分，真是丧家犬也是洋种的值钱。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保镖也应时而出。英国人的仆人、看门人（保镖）大多是印度人，于是一些买办阶层的“高等华人”，也就雇用个印度人来充当保镖，假

冒英国绅士，同时也可借助租界里印度“红头阿三”（印籍巡捕）的形象，以邪压邪，虚张声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真是无奇不有。

溥仪寓居天津时，仍然以真龙天子自居，做着复辟大清帝国的梦。一些封建正统观念极强的遗老、遗少，对张园（溥仪在天津的寓所）中的“小朝廷”也怀有故主之情。不但清王朝的孤臣孽子对溥仪有仰慕之心，天津、河北的一些武林高手也欣然充当了这位末代皇帝的镖师，并以此为荣。后来溥仪潜逃到东北，走上了背叛祖国的道路，这几位镖师封建正统观念虽强，可是深明民族大义，无人随其前往。溥仪在伪满洲国梦想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招募了一批满族、蒙族的青年组成护军，该军只有三个连，系溥仪的私人一批满族、蒙族的青年组成护军，该军只有三个连，系溥仪的私人卫队，想征招旧日镖师去充当武术教官，可是又都得到了敬谢不敏的回报。三十年代以后，武林中的人士就业极难，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各行各业几乎都是无业可就，习武练功之士，想找个衣食之所确实是很不易，可是这几位镖师不慕名位，不图厚禄，所重者武德，所明者大义，毅然再次与溥仪分道扬镳，实有武林风范，颇具有民族正气。

李莲英和小德张均是清末红极一时的权阉庞寺，李莲英为人老成，深明韬光养晦之道；小德张张狂，但也知晓进退之机。隆裕皇太后在民国二年死去之后，瑾妃即享有太妃之尊，并被袁世凯指派为“清室代表”，小德张知瑾妃不会容他继续留在小朝廷之中当“九堂总管”，于是立即辞职，恳请放其出宫为民。小德张出宫那天，他的专用骡车清晨即停在神武门外，等候接他回府，宫门口也聚集了一大群太监，有的是为他送行，有的是想痛骂他一顿出气，有的还备下了鞭炮，准备在他登车时放鞭炮、烧纸送瘟神。可是时至下午也不见这位总管太监出来，原来小德张深知自己积怨很深，已于夜间消然离宫，乘火车避入天津租界之中。清晨停在神武门外的骡车，只是个幌子，用来戏弄打算嘲笑辱骂他的太监们。

小德张虽然避入天津租界之中，可是还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于是厚交租界的工部局（帝国主义所设立的警察局），并用重金雇用了几名保镖，物以类聚，人以群众，这几名保镖都是为虎作伥之士。小德张的母亲身边有个贴身的丫头，年方花信，丰丽多姿，小德张将其收房为妾，身为太监，本不能人道，于是小德张用施虐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性欲，使该女侍寝如受刑，遍体伤痕累累。于是逃到工部局，要求帝国主义的巡捕依法给与保护，并向法庭申请“离婚”。小德张得到这个消息后大为震怒，花了五万块大洋，把租界有关方面上上下下都打点了一通，于是一切化为乌有，得到工部局领人的通知后，小德张即派保镖将该女用汽车接回，关在地下室里，施以骇人听闻的暴行。二天之后，该女气息奄奄，小德张又将其活体肢解，把碎尸装入麻袋，倒入海河。在这桩杀人案中，保镖不但是打手，而且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帮凶。

黑社会的头面人物，都有多名贴身保镖，这些人名为保镖，其实都是黑社会中的中坚分子，是一些心黑手狠、无恶不做的歹徒，这些人的所做所为，不但和传统的镖师无关，而且和保镖的公开身份也不相符，是名副其实的杀手和恶棍。他们从事夜黑杀人、风高放火的勾当均颇为能干，但保护雇主的人身安全时，却没有“士”为知已而死的气概。“七七事变”后，青帮大头子张啸林滞留在上海租界之中，既不肯内渡，又不迁居港澳，不久就下水当了汉奸。此人早年就做恶多端，故平日自卫甚严，当了汉奸后为虎作伥，更怕热血之士为民族除暴去害，于是从在帮的“高手”之中物色了六名贴身保镖，每人都有一手“绝活”。这些保镖乔装成不同身份的人，有的是长衫布袜，一派斯文，俨然府中之清客，有的西装革履，鼻子上架着博士镜，如同大公司的高级职员。此六人不论家居和外出，都跟随

在张啸林身边形影不离，要想除掉这个大汉奸，确实是很困难。军统特别行动队在青帮中明晓民族大义之士的协同下，混入张啸林的私邸之中充当门卫。这位特别行动队的队员以神枪手著称，其职责是守卫楼梯口，一日中午张啸林正在午睡，该队员故意和别人口角，竟破口大骂起来，将张吵醒，张平日最护睡，午休时间神圣不可侵犯，被吵醒后怒气冲冲地闯下楼来，大发雷霆之怒，该队员即出枪将张击毙，然后冲出楼门来，可是张的六名贴身保镖畏于神枪手的声威，不敢追赶，这个队员只好装成跌了一跤，将枪摔掉了，这时保镖们才追了出来，将其擒获。枪响之后惊动了在街上巡逻的租界工部局巡捕，到张家来查问，恰逢张的保镖正将该队员擒获，于是将双方一同带到工部局立案调查。该队员在租界的法庭上声称，张冲下楼来高呼："你这小子找死，我扒了你皮。"并回头呼叫保镖们动手，为自卫起见，先下手为强，将张击毙。租界法院根据英国的法律，处该队员 15 年徒刑。按照当时的司法协定，移交中国政府收监执行，该队员被押解到宁波后，立即获得了自由，到重庆归队报到。该队员故意跌一跤，摔掉了手枪，其目的是叫张的保镖将其擒获，到租界法庭上了结此案，张公馆门口巡逻的巡捕也是军统精心安排的，该队员行刺之前已宣誓舍身除奸，因为被擒后，在巡捕赶来之前，张的保镖很可能将其杀害，可是只有被擒才能到法庭上了结此案，变政治性刺杀，为帮会内部冲突，叫投敌的青帮吃哑吧亏，有苦难言。张啸林被刺后，其党徒和贴身保镖大多投到日伪特工总部，正式挂牌当了汉奸。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不但做恶多端，在国民党内部树敌也甚多，和黑社会结怨也很深，惯于从别人背后开枪的人，最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多方物色武艺高强，枪法出众的武林高手充当自己的保镖，出家为僧为道者亦在其网罗之中。可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武林高手，方外奇人，对军统的戴老板并不买账，皆退三舍以避之，直言谢退，有的虽迫于军统淫威勉强应约与戴笠一会，但话不投机，终以互诽而终。戴笠几个贴身卫士都是气焰嚣张，但枪法武功均很平庸之辈，和戴笠能共处的惟一原因是对老板逆来顺受，拳踢脚打是家常便饭，甚者竟有一碗热汤淋头之虞。常言道："国士待之，将国士报之。庶人待之，将庶人报之。不肖者待之，将不肖者报之。"士只能为知己者而用，为知己者而死，故戴笠有生之年，也没物色到一位保镖，可见奇人和高手都是有骨耿之气者，重武德、知自爱，虽以重金相诱，权势相逼，但都能洁身自好，不以物累，不至已忧。